

河北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河北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20）

本报告从系统概述、研究热点、活动管理、发展路径等方面，对 2019 年度河北社会科学发展进行阐释研究，以期全面认知、把握河北社会科学发展全貌。

一、河北社会科学系统概述

2019 年，河北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蹄疾步稳，社会科学机构组成、学科构建、人才队伍、研究成果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

（一）社会科学机构组成

1. 社会科学机构。按照传统分类，社会科学机构可划分为高等院校、党政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政研究机构和军事院校五大系统，以此划分标准，河北社会科学机构总数约为 1253 所。

高等院校系统作为社会科学教学科研主要机构，学科门类广泛，其发展变化倍受关注。截至 2019 年 12 月，河北高等院校数量达 129 所，其中普通高等院校 123 所，成人高等院校 6 所。普通高等院校中，本科院校 62 所，专科院校 61 所。从数量看，河北位列全国第 8 位，次于前 7 位的江苏（167 所）、广东（154 所）、山东（146 所）、河南（141 所）、湖北（128 所）、四川（126 所）、湖南（125 所）。^① 123 所普通高等院校按区域划分，排名前 3 的区域为石家庄 43 所、保定 14 所、廊坊 12 所。2019 年 5 月，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更名为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党政院校系统包括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和党委讲师团，约 210 个。党校系统的特点是按行政区划设置，除省级层面的中共

河北省党校（已与行政学院合并）和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外，另有中共河北省直工委党校、中共华北油田党校、中共雄安新区工委党校以及河北省 11 个设区市委党校和各个县（区、市）委党校。讲师团系统有中共河北省委讲师团、11 个设区市讲师团，讲师团在省内多个县（市、区）设立了宣讲站。

社会科学院系统包括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中共河北省委讲师团，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中共石家庄市委讲师团，石家庄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两个综合性研究机构以及保定市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共保定市委讲师团、保定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张家口市社科联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所。2019 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启动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成立 15 个创新团队，加快构建门类齐全、特色鲜明、燕赵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断推出有分量的创新成果。设立创新驱动发展研究中心等 9 个非编制的“智库研究中心”，构建起新型智库研究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通过积极的政策调整及深化改革，推动新型智库建设迈上新台阶，用新的考核机制为河北新型智库建设提供示范和积累经验。

^①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 http://www.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9/gd/202006/t20200611_464854.html

党政研究机构系统主要指省、市、县（市、区）三级党政机关的研究机构，省级层面主要是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以及宣传、组织、公检法司等系统的内部研究机构。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是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的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组织、管理机构，是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型智库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直单位重要的内部研究机构主要包括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河北省财政科学与政策研究所、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科学研究所、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2. 社会科学基地（中心）。社会科学基地可分为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社会科学普及基地两大类。

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河北省内高等院校联合共建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有 25 个，按区域划分，石家庄 7 个，保定 8 个，唐山、秦皇岛、邯郸各 2 个，天津、邢台、衡水、廊坊各 1 个。河北省教育厅近年来在高等院校建设的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 35 个。河北省科技厅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依托建立了 15 个软科学研究基地。

社会科学普及基地以 2014 年河北省政府颁发《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规定》为契机加速发展，2019 年全省省级社会科学普及基地达 55 家。各设区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依据《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规定》组建了一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如承德市避暑山庄博物馆、隆化民族博物馆、正定县图书馆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为规范河北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的建设和管理，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及时修订《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管理办法》，构建起较为成熟的全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网络体系。

另外，省内一些单位和部门建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研究中心如河北金融学院的省科技金融协同创新中心，以及新型智库如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 9 个研究中心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社会科学团体。社会科学团体是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分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各学科或各专业学会、研究会。

截至 2019 年底，由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主管、在河北省民政厅注册备案的省级社会科学学会、研究会 66 家，另外还有 36 家省级社会科学团体会员。2019 年新成立的河北省青少年生涯发展研究会是由省内生涯发展领域资深专家学者共同发起的地方性学术团体。河北省、市两级社会科学学会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宣传普及的骨干力量。

（二）社会科学学科构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涉及社会科学的学科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民族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科学、统计学、管理学、心理学 21 个一级学科。这种学科分类主要是直接为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规划以及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统计和管理服务的。

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分为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适用于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招生和培养，并用于学科建设和教育统计分类等工作。根据该目录，社会科学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 9 个学科门类，38 个一级学科。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几年的积累，已形成双一流（世界一流、国家一流）建设学科、省强势特色学科（群）、省级重点学科等学科体系。如河北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为中国语言文学，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有中国史、哲学、教育学，省强势特色学科为历史学，还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世界经济、外国教育史等 9 个省重点学科。河北师范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为考古学，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为中国史和中国语言文学，省强势特色学科（群）为历史学，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现代史等 8 个省重点学科。河北地质大学省级重点学科为企业管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技术经济及管理。河北经贸大学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为应用经济学、法学和马克思主义原理，有产业经济

学、会计学、企业管理、理论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经济法学等 10 个省级重点学科。河北农业大学只有农林经济管理 1 个省级重点学科。^①

(三) 社会科学人才建设

1. 社会科学队伍建设。截至 2019 年底，河北专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约为 18580 人，集中在高等院校、各级党校、社会科学院（所）、党政研究机构系统。按职称划分，高级职称约 6930 人，约占总量的 37%；中级职称 8320 人，约占总量的 45%；初级职称 3330 人，约占总量的 18%。

2. 社会科学专家建设。截至 2019 年底，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河北拥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管优秀专家、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含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青年拔尖人才、燕赵文化英才工程人选，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人选，省中青年社科专家五十人工程人选，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省“三三三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等国家级和省级各类专家约 1807 人次。2019 年评出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何振海、陈兰杰、刘永志、郭伟、李玉涵、刘相美、许蕾 7 人，第 13 届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把增强等 10 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田学斌、孟庆瑜、李会霞等 40 人，省“三三三人才工程”一层次人选王世杰，二层次人选于海博、李茂、阚景阳等 19 人。

(四) 社会科学课题立项

在不同级别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的立项数量，是反映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特别是国家级课题和省级课题更为突显。

1. 国家级课题立项。2019 年河北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全部项目合计 119 项，其中重大项目 4 项，重点项目 6 项，一般项目 85 项，青年项目 16 项，各类专项 8 项。如图 1。

排名前 5 位的是河北师范大学（33 项）、河北大学（27 项）、河北经贸大学（11 项）、燕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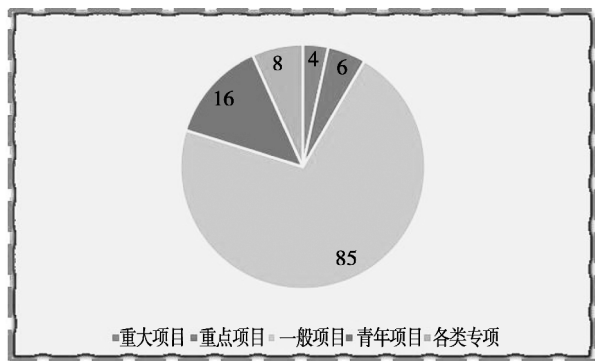


图 1 2019 年河北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分类图

大学（8 项）、河北工业大学（7 项），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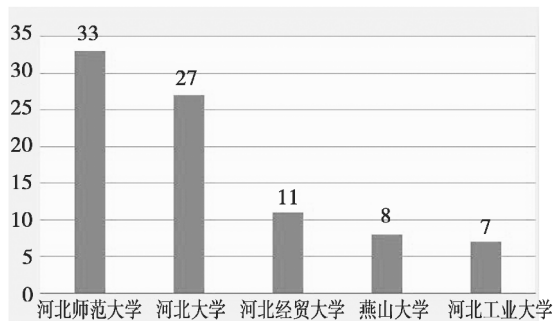


图 2 2019 年河北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前五名机构及立项数

2019 年河北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年度立项共 89 项，包括高校系统 84 项，省委党校 3 项，省文物研究所 2 项。其中，重大项目 4 项，为范铁权的《中国近代科学社团资料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崔红芬的《西夏文佛教文献遗存唐译经的整理与综合研究》、梁春胜的《魏晋南北朝石刻疑难字词考释与辨伪》、何晓芳的《满族民间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重点项目 5 项，即王金营的《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人口回旋空间及其作用研究》、姜锡东的《生产力发展与“唐宋中国变革”研究》、柴艳萍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研究》、程立涛的《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传播的新动向及其对策研究》、刘永志的《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研究》；一般项目 64 项，青年项目 16 项。按负责人所在单位划分前 5 名分别是：河北师范大学（26 项）、河北大学（20 项）、河北经贸大学（8 项）、燕山大学（6 项）、

^①http://mmbiz.qpic.cn/mmbiz_jpg/poMFUOv6KlbfYh_bZM45Vzjke

河北工业大学（5项）。^①年度课题与2018年相比，立项总数增加1项。2016—2019年河北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前期年度立项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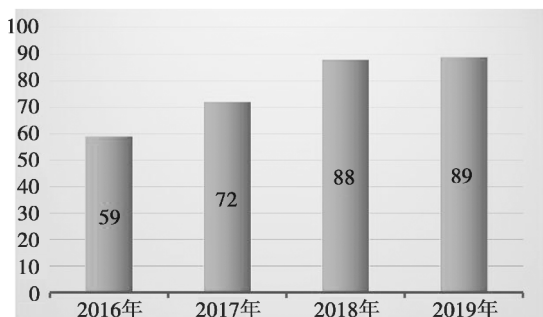


图3 2016—2019年河北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年度立项图

河北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是河北师范大学张怀通的《〈尚书〉新研》，一般项目20项（河北大学6项，河北师范大学5项，河北经贸大学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各2项，河北工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燕山大学、石家庄学院、保定学院各1项）。中华学术外译一般项目1项是石家庄铁道大学魏怡的《中国美学范畴史（王振复）》。各类专项8项，其中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6项（河北工业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传媒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各1项）；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两项（邯郸学院和河北大学各1项）。^②

2. 省部级及省直有关部门课题立项。2019年，河北不同部门管理的各类课题和有关单位个人承担的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立项总数约为1309项。其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47项；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立项课题7项，这7项中国家一般项目5项、教育部青年项目2项，承担单位中河北大学4项，河北师范大学、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和衡水学院各1项；省委宣传部的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立项546项（含新增重点项目17项），其中重大项目11项，河北文化研究项目17项；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709项，其中重点课题75项。此外，省直有关部门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省编委办课题174项，省人社厅课题818项。

（五）社会科学成果产出

1. 社会科学成果概要。据不完全统计，

2019年度河北各类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约12505项。其中公开发表论文约8750篇，约占全部成果总数的70%；公开出版著作约875部，占比为7%，其中河北大学106部，河北师范大学70部；各类研究报告2880篇，占比为23%，大部分产生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及有关党政研究机构。

2019年，被CSSCI收录的河北作者论文共666篇，分布于23个学科，比2018年增加29篇。从收录数量来看，排名前5位的学科分别是经济学96篇，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67篇，历史学58篇，政治学55篇，管理学49篇，教育学48篇，这5个学科收录的论文共373篇，占到全部收录论文的56%，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河北重要学科的发文情况。与2018年相比，增幅最大的3个学科分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增值分别为38篇、24篇和14篇，减幅最大的2个学科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统计学，分别减少26篇和18篇。另外，外国文学、宗教学仍是薄弱环节，需要不断加强力量进行研究。（2019年和2018年河北被CSSCI收录论文学科分布情况见表1和图4、图5）。

表1 2019年和2018年河北被CSSCI收录论文学科分布情况

序号	学科名称	2019年 篇数	2018年 篇数	2019年与 2018年相比
1	经济学	96	72	24
2	教育学	48	38	10
3	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	67	79	-12
4	哲学	28	22	6
5	历史学	58	44	14
6	法学	27	22	5
7	管理学	49	60	-11
8	中国文学	45	38	7
9	外国文学	1	10	-9
10	政治学	55	17	38
11	新闻学与传播学	28	43	-15

^①资料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和各有关单位报送的材料。

^②资料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和各有关单位报送的材料。

续表

序号	学科名称	2019 年 篇数	2018 年 篇数	2019 年与 2018 年相比
12	语言学	15	11	4
13	社会学	24	15	9
14	艺术学	44	32	12
15	体育学	6	18	-12
16	环境科学	18	25	-7
17	民族学与文化学	20	10	10
18	心理学	9	9	0
19	马克思主义理论	7	33	-26
20	人文经济地理	5	8	-3
21	统计学	4	22	-18
22	宗教学	2	1	1
23	考古学	10	8	2
24	总计	666	637	29

中国文学和历史学，3 个学科分别为 26 篇、23 篇和 21 篇，河北师范大学为历史学 18 篇，燕山大学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7 篇、河北工业大学为管理学 15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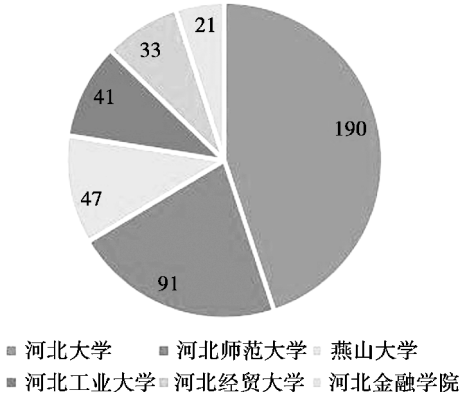


图 6 2019 年河北被 CSSCI 收录论文研究机构发文数量前 6 名

2. 社会科学成果影响。2019 年，河北作者在重要报刊发表论文、文章 50 余篇，其中《光明日报》发表 28 篇；《人民日报》发表 7 篇；《经济日报》发表 5 篇；《求是》杂志发表 1 篇，是河北工业大学刘新圣的《理论也要以情动人》。署名为“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补齐京津冀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指南》《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建京津冀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以科技创新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等理论文章刊发后，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其他在学术界比较有影响力的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河北师范大学贾丽英的《秦汉至三国吴的“訾税”变迁》发表在《历史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姚云的《合理的道德原则何以可能》发表在《哲学动态》等等。

被影响较大的期刊转载的研究成果。河北学者在 2019 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被《新华文摘》转载转摘的有 13 篇。其中转摘的 4 篇，分别是河北师范大学武吉庆的《遮蔽、越界与“后见之明”——论历史认知的若干误区》，河北经贸大学武义青的《怎样认识雄安新区》，河北经贸大学柴艳萍的《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及其伦理价值》，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柳翔浩的《高等教育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途径、机制与政策支持》。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转摘 9 篇，其中转摘的 3 篇，分别是河北经贸大学李冰的《农村贫困治理：可行能力、内生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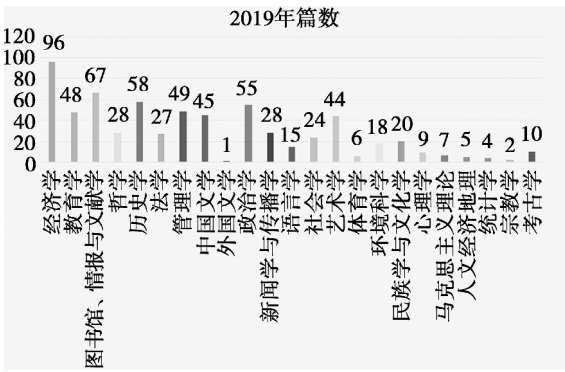


图 4 2019 年河北被 CSSCI 收录论文学科分布情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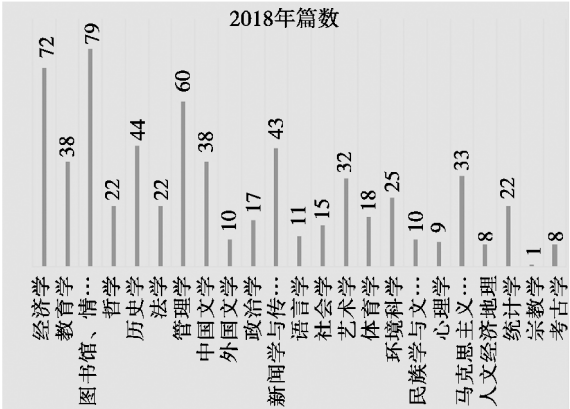


图 5 2018 年河北被 CSSCI 收录论文学科分布情况图

这些论文按研究机构发文数量由多到少排列，前 6 位分别是河北大学 190 篇、河北师范大学 91 篇、燕山大学 47 篇、河北工业大学 41 篇，河北经贸大学 33 篇、河北金融学院 21 篇（见图 6），其中河北大学被收录最多的学科为经济学、

与伦理支持》，河北大学程志华的《哲学为思想立法》，河北经贸大学李桂荣的《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转摘的有9篇，其中部分转载的4篇，分别是华北电力大学李玲玲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华北电力大学梁平的《京津冀协同立法：机制构建与模式创新》，河北师范大学孙雯的《近十五年应用逻辑研究的发展脉络》，河北经贸大学王利军的《如何发现权利》。

在获奖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2019年没有开展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其他类获奖成果中，在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河北共有9项成果获奖，包括河北大学王金营的《连片贫困地区贫困家庭调查及对策研究——基于燕山—太行山和黑龙江流域的调查》、河北大学田建平的《宋代出版史》（上下册）等6项二等奖，以及河北大学程志华的《中国儒学史（上下册）》、河北师范大学王长华的《〈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等3项三等奖。第29届中国新闻奖中河北有8项作品获奖，包括崔铁宁、申佳的《农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唱主角——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外记者见面会》和河北日报集团桑献凯的《纵横谈》等2项一等奖，王晓东、戴绍志、王雅楠的《让千年大运河只留下遗产不留下遗憾沧州市区运河两岸2.8万亩土地不做商业开发》等3项二等奖和王晓东、赵兵的《“三界碑”看新变》等3项三等奖。2019年河北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成果中，电影《古田军号》、图书《〈共产党宣言〉与新时代》获特别奖，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话剧《塞罕长歌》、广播剧《刀锋逐梦》获优秀作品奖。2019年第八届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省属院校（含学会）获奖项目259项，其中一等奖40项，二等奖86项，三等奖133项；驻冀国家部委属院校获奖项目40项，其中一等奖9项，二等奖11项，三等奖20项。

3. 社会科学成果应用。2019年河北社会科学机构更加注重和突出对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强调发挥党和政府的参谋智囊作用。由于各个研究机构的工作特点和社会职能不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成果更

多地产生在与实际工作联系更密切的机构中。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内完成的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成果约2880项，其中获省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的约1150项（次），被实际工作部门吸收采纳的约606项，二者之和约占年度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成果的61%。在这些成果中，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完成的调研报告有3篇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性批示。2019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通过《智库成果专报》上报省委省政府领导的研究报告获得省领导肯定性批示61篇，上报舆情报告获得中办、中宣部采纳或有关领导肯定性批示的15篇。省委政策研究室围绕省委省政府主要工作部署推出了一批调研成果，全年共上报《送阅件》22期，编发《政研与决策》21期、《政研与决策（清稿）》15期，获省领导批示64人次，其中省委主要领导批示6次、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5次，许多意见建议纳入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省政府研究室主要围绕河北省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研，2019年共完成调研报告约40篇，每个工作日编辑1期《信息关注》上报省领导，其中《推进“三区三中心”建设实现“五年倍增”目标——浙江省全面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做法及加快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的建议》等多篇报告获得省领导肯定性批示。2019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参与省委省政府和决策部门重要文件起草19项，开展各类重大调研活动26次，有85项咨政成果通过《河北智库报告》《决策参考》等渠道上报并获省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河北省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智库上报的《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建议信，获李克强总理批示。河北省委党校完成的研究报告《确保河北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特色、出实效的几点建议》和《以供销社改革为抓手激活河北省乡村振兴新动能》《河北省2018年政务公开考核评估成果》等研究报告获得省领导的肯定批示。

二、河北社会科学研究热点

2019年河北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呈现出热点集中、观点明确、关注广泛等特点。学术成果数量质量齐升，推出了一批高水平成果，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政治与社会研究

1.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成果数量较往年略有增加,而且从质量上看,注重研究视阈的多样性,既有从具体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与理论内涵的深度分析,又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鉴别分析,还有紧贴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从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面,宫敬才探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性质问题,同时还分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的节点意义,又探讨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张凡从走向权利的联合的向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制理论的时代价值。覃志红围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进行了研究。

在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方面,田海舰分析了《共产党宣言》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郭强分别从马克思的国家形态学说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逻辑问题、马克思关于中华帝国现代转型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祁松林探讨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与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乔荣生等对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的原初意蕴及当代启示进行了阐述。

在马克思的自然观方面,王伟采用文本解读法,围绕马克思早期自然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李维意、冯燕芳还分别对马克思的空间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成果质量较去年稳中有升,表现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均有成果出现。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多维研究。康振海认为马克思主义彰显了无与伦比的真理力量,深刻改变了中国,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王小梅研究了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论述问题。王菲等围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探讨。

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

为研究热点。周振国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结构。陈聚芳探讨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发展方略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王小玲、魏四海等学者围绕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践行路径进行了研究。斯琴格日乐分析了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逻辑体系与时代价值。周美娟、王天彤等围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探讨。

三是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问题的研究成果突出。学者围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构的逻辑基础,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演进与深刻启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代表成果有李素霞、冯艳玲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等。此外,田海舰还对我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的对策路径进行了论证。

3. 精神文明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精神文明理论研究。成果数量虽少,但质量上较往年明显提升,出版2本专著,在CSSCI期刊及《河北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与中国传统文化展开研究。和建华针对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系统研究。黄英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政府建设进行了探讨。在红色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王天彤阐述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个层面。田海舰认为,“赶考”路上,依然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研究范围涉猎较广,涵盖了燕赵文化和红色文化建设、农村和城市文化建设、诚信建设、家风文化实践等领域。研究的现实性、针对性增强,质量较去年有所提升。张勇、陈洁、王彦坤等分别从坚定理想信念、弘扬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思想政治教育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历程和规律,在基础理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方面展开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果。尤其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成果突出。出版5部专著:《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体系研究》(朱凯峰)、《现代德育建设与就业规划》(孙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机构》(唐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徐彬)、《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理论与方法创新》(徐小慧)。

本年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总体来说,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基础研究仍显薄弱,应用研究有待深入,研究视野略显偏狭,创新性需要加强,标志性论著缺乏。

4. 政治学与党的建设研究

政治学研究。学者除在以往的政治学理论、政治民主、国家与社会治理、网络政治、国际政治等领域精耕细作外,在干部管理和西柏坡精神等方面的研究明显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并将持续下去。出版学术专著6部,大报大刊上发表5篇,与往年基本持平。呈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传统论题的关注度持续走低。在理论研究方面,戴木茅围绕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君主观,从现世君主观、非人格化的君主、为国而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二是研究进一步走向对中国现实的解释,研究主题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白海琦指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从政治体制设计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梁瑞英重点解读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时代内涵。张治江围绕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探讨。袁秀围绕红色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冯学工等论述了西柏坡精神及其当代价值。三是国际政治研究突显重要时间节点。2019年既是中俄建交70周年,也是中俄携手并肩迈入新时代的元年。郭小丽认为,中俄已成为“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的典范,中俄可以从文明和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和资源,共同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论和行为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党建研究与往年相比,呈如下特点:一是成果的学术水平略有提升,在大报大刊上发表文章数量与上年度相比有所增加,体现了河北作者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二是重点突出,主要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执政能

力建设、“互联网+党建”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袁秀等提出,要传承“赶考”精神,培厚政治文化土壤。曹海霞认为党员干部要不断涵养“无我”境界,龙凤英对党员干部为什么要“舍我”“忘我”“无我”进行了分析。刘新圣提出,解决容错纠错机制运行不畅甚至被虚置的问题时,党内法规具有直接有效的制度优势。杨立元等探讨了李大钊的担当精神之深刻内涵与时代意义。

5. 社会学与社会问题研究

社会学研究领域继续深化和拓展,科研成果丰硕,成果质量与往年相比有所提高,出版了5部专著。成果仍以实证性、应用性研究为主,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较少。研究成果涉及扶贫、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社会管理、人口及老龄化、城市化、生态环境保护、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多个方面。在扶贫研究方面,张会敏等在小域条件下运用经验贝叶斯方法结合模拟实验对贫困指标进行测度和深入研究。在社会管理方面,主要围绕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方面展开。在人口及老龄化研究方面,贾志科分别从性别失衡对青年择偶的影响,以及时代变迁中的青年择偶与婚育等方面在青年择偶与婚育相关领域内做了系统的研究。胡耀岭等通过分析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运行机理,提出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实现路径。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田翠琴等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河北省环境保护的历史进程、特色、成效与经验等,构建了当代省域环境保护史研究的范式。

社会问题研究,成果较往年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专著成果欠缺。社会保障及社会救助问题、农民工问题、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等成为本年度学者关注的热点。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研究围绕河北省保障性住房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失业人员问题、儿童权益保障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农民及农民工问题上,众多学者围绕农民工流动、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主要围绕当今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制约因素及对策进行了探索。宋凤轩《去产能背景下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路径选择——以新时代工会组织之效能探讨为中心》、朱晓霞《突发公共事件社会舆情治理选择

——基于爆炸渗流理论》等成果现实性强,对学者和决策部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6. 法学理论及部门法学研究

法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成果质量较上年略有下滑,表现在 CSSCI 收录论文数量下降。除继续开展依法治国相关理论问题研究、党内法规研究、宋代法制研究、法学教育研究外,还在跨学科研究中有所涉猎,并关注到社科研究的新领域。杨福忠探讨了推动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机制构建,武建敏研究了中国传统法的哲学架构及其创造性转化,李大庆则关注了领域法学的知识创新问题。

部门法学研究,质量较往年有所提升,表现在专著成果较上年明显增加。研究内容较广,国家安全、边境管理、移民管控、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纠纷解决、法治建设、人工智能等热点问题成为本年度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公共服务、文化保护、农村法治已经发展成新的热点;国际私法研究得以维系,商法有所萎缩,专门针对劳动法律制度的研究有所减少,具体罪名的研究逐年下降;而应急管理、边境管理、移民管控方面的研究大量增多,反映出对客观形势发展的关注及对社会反应的一些隐忧。代表著作有:《风险社会语境下共同侵权行为制度研究》(张永辉)、《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人身危险性研究》(宋伟卫)、《新时代城市协同治理法治化研究》(马雁)、《环境污染犯罪治理问题研究》(冯军等)、《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研究》(刘茜)。

(二) 哲学与文史研究

1. 哲学研究

学者围绕逻辑学、伦理学、西方哲学,以及心理学等哲学基础理论及相关问题等领域进行研究,其中心理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但整体来看,成果与上年相比,数量基本持平,但质量略显下滑,表现在无专著出版和大报大刊文章发表。

逻辑学研究,沿模态逻辑、逻辑哲学、逻辑应用研究等路径展开。刘东等主要关注后克里普克时代以可设想性为基础的模式知识论,通过对模态怀疑主义、模态理性主义以及模态还原主义的逻辑分析,重新阐释可设想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孙雯基于国外《应用逻辑杂志》的内容分析,对近十五年应用逻辑研究的发展脉络、前

沿选题及其启示进行了探讨。

伦理学研究,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学伦理、生命伦理四方面。姚云通过梳理和反思中西道德哲学史上几种典型的道德原则,提出构建合理的道德原则的必备条件。柴艳萍等认为应该坚持循环经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真正和解。宋兆杰等围绕科学伦理学在苏联—俄罗斯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探讨。

西方哲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基础理论研究、政治哲学、科学哲学、雅斯贝尔斯研究等方面。吴三喜等分析了实用主义解释学的语言哲学和实践哲学两条进路。

心理学研究,围绕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等方面展开。高志华等探讨了否定加工中的情绪表征。贾宁等分别围绕掌握程度和社会性线索对元认知监控的影响、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对空间关系判断的影响、学习判断的框架效应以及加工流畅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王景芝等考查了流动儿童自我控制与其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及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石绪亮等分析睡眠质量与情绪调节困难在青少年的清晨型—夜晚型偏好与抑郁症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周建永围绕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化”进行了研究。郝海平等通过实验探讨了口头和按键反应对汉语被试时间空间一致性效应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王士良对《国语》中的生态哲学思想进行了述论。许春华挖掘和诠释了《老子》之“慈”。李振纲围绕《周易》“经”与“传”的分界及与“数”的关联,对基于上古先民狩猎—农耕生活方式的原始思维之“哲学突破”,作出历史与逻辑的还原。程志华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诠释理路问题、诠释的“普遍性方法”、诠释的“特定主张”进行了讨论。

在西方哲学史方面,冯燕芳探讨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及其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意义。张燕京以谈话录的形式对达米特与语言哲学进行了探讨。

2. 文学与艺术学研究

(1) 文艺理论研究

主要围绕当代文化与文论研究、西方现当代文论研究、中国传统文论与美学研究等领域展开。

当代文化与文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活跃态势,从知识学的层面探索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成为一个重要论域,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研究,是当代文化与文论从知识学层面进行开掘的一个重要方向。如邢建昌从知识、知识生产的视角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状况,从“元理论”层面展开的对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此外,聚焦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成果也值得关注。黄建生围绕新时代语境下宏大叙事的重构与创新进行了探讨。

西方文论研究。研究不断深化,不仅深入考察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源流,而且根据我国社会文化与文学的当代发展现实使其“本土化”,从而达到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理论建构目的,取得了良好的理论效果。孙秀昌关于雅斯贝斯的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学界对雅斯贝斯的哲学美学亦深有关注。王亚芹近年来关于舒斯特曼美学的研究不容忽视。

中国传统文论研究。这是河北省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优势研究领域。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深刻关联、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价值、传统文论经典的现代阐释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探究。胡海从美育理论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论诗学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考察。孙易君等对于简牍媒介时代的“文”学的特征及其所导引的文学及审美的衍变进行了富有学理的考察与分析。

(2) 古代文学研究

2019年河北古代文学研究共发表论文120余篇,出版著作15部,呈现出在传统领域深耕,在新的领域颇有创获的特点。

古典文学研究,诗歌研究依旧强势。《诗经》与《楚辞》是先秦文学的双璧,一直以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乐府学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乐府诗歌中各种意向的探讨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色彩。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研究重点以小作家、新作家为切入点,考证作品的创作时代、作者的生平。唐诗侧重于唐诗理论、杜诗及边塞诗的研究,宋诗研究也有较大力度,元明清诗歌研究取得可喜的成绩。代表作品有:王长华的《〈诗经学〉论稿》(专著)、向回《礼乐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乐府诗学研究》(论文)、韩宁等点校的《古乐府》、张蕾专著《〈玉台新咏校正〉整理与研究》、吴增辉专著《北宋中后

期贬谪与文学》等。

词学研究主要以宋词研究为主。王立娟等人编著的《苏辛词评注》,在苏辛词研究乃至宋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散文和骈文研究呈现多样化走势,涉及文体及文体特性的研究等。马燕鑫对张衡现存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探索,他还着眼于魏晋六朝地记与文学相通的特征,深入考察地记这种文体与文学的关系。

在小说研究领域,本年度学者的研究以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为主,立意新颖,角度独特。同时,一些学者将研究目光放到清末新小说上,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如蔺九章的《看透水浒》(著作)、李军的《论〈西游记〉叙事中孙悟空的能力表现矛盾——以现象、成因与艺术作用为中心》、李丽平的《〈儒林外史〉士人涉讼情节及其身份特权研究》、郑丽丽的《清末新小说中的女子“身体国家化”》等。

戏曲研究集中于元杂剧研究和曲学理论研究上。李俊勇对以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为代表的古典戏曲的歌唱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

此外,在“四库学”“国学”“北学”“杂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收获颇丰。出版著作4部:《四库著录河北先哲遗书辑存》(周小艳)、《先秦至清伯夷叔齐传说的意义考辨》(王芳)、《国学经典选注》(刘少坤)、以及王长华的《国学读本》,光明日报发表文章1篇:《“北学”引起学界关注》(梁世和)。

(3) 现当代文学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成果主要集中在鲁迅研究、文学史、小说等方面,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鲁迅研究在延续了一贯的学术产出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着影响。出版了专著《启蒙先驱心态录:〈野草〉解读与研究》(田建民),学界评价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田建民、刘玉凯分别对孔乙己形象进行了重新读解。

二是基于文学史料考释的现代研究,呈现上升势头。邓招华通过对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以期还原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而丰富的存在样态。宫立解读了新发现的熊佛西和周瘦鹃集外文。阎浩岗展示并解析了新发现的几封徐訏书简,认为对于研究徐訏思想历程具有参考价值。

三是文学史思考新意迭出,注意力多集中于文学史现场的还原和文学思潮的梳理方面。熊权聚焦“文学张闻天”及相关工读事迹,在新文化历史语境中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科学思想的互动对话。阎浩岗通过“地主”与“恶霸”之间的关系研究了现当代文学地主形象的不同塑造方式和不同叙事伦理。雷鸣反思近年长篇小说塑造的四种类型的乡绅形象分别存在的审美缺憾。此外,邓芳宁对70后小说中的“救赎”母题和“孤独”母题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

四是当代文学批评保持了前卫的姿态,以李浩和杪椽为中心在当代文坛和网络文学方面发声。当然,问题也比较明显,第一,研究选题集中在小说方面,其他的文体研究相对沉寂;第二,河北地域文学研究成果少,且质量不高,有待加强。

(4) 艺术学研究

艺术学研究以美术、音乐两大艺术种类为主导,研究成果更注重现实应用性。美术学研究主要着眼于美术教育、设计理论、书法理论,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建议。邢晓静围绕“互联网+”时代下,高校美术教学进行了探讨。音乐学研究主要从音乐教育以及声乐理论两方面展开研究。整体来看,成果数量少,质量低,缺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

3. 语言学研究

成果数量与质量均与上年持平。研究方向基本上沿续以往的基础研究、理论探讨,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研究内容涉及文字、训诂,词汇、辞书,语法,方言,外语教育与教学模式研究,外国作品研究,语言学与翻译学交叉研究等诸多方面。

汉字研究依旧显著。杨宝忠围绕文字、训诂展开研究,成果突出,不仅发表了系列论文,还出版专著《文字变易与古书通假》。张振谦以齐系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顾地域内的前期文字,出版专著《齐系文字研究》。

词汇、辞书研究主要围绕词语色彩、复合词释义、辞书理论史、词义学等方面展开。李智围绕《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双音复合词及其释义进行了探讨。

方言则主要是针对河北及其他地区方言发音特点,以及契丹语言文字研究。傅林利用契丹语文本和汉语相关文本对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做综合研究。

在外语教学研究中,王环宇、惠良虹、张素敏、黄永亮、张秀芹等分别围绕如何在教学中提高英语水平进行了探讨,吴柳分析了活动调节对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表达的影响,张素敏对高校外语教师培训有效性评价进行了探讨,肖潇对日语翻译教学理论与翻译技巧进行了研究。

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研究成果呈现出明显的“交叉”特征,也反映出翻译学研究同语言学研究紧密结合的发展趋势。张素敏考察了不同词类加工中“续译”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又对续译在情绪信息语篇加工中的效应进行深入研究。孙乃荣等通过概述民俗文化英译研究现状,围绕不同翻译实例的分析,提出“求同”与“存异”两种翻译取向。此外,《红楼梦》译本、《新青年》中所见外国作品题名翻译、藏族格言诗、西方译论等均成为关注的内容。

在外国作品研究中,郑朝红通过考察清朝苏努家族案的欧洲之旅揭示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信息的变异。王彦军探讨了《四个签名》中的伦敦街道美学。赵焯等认为邓恩的死亡观深受人文主义、古典哲学、宗教等各方哲学思潮的影响,其作品的死亡哲学具有多元化、时代性以及超前性的特点。

4. 历史学研究

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数量较以往有较大的萎缩,尤其是先秦秦汉史研究下滑严重。

先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史方面,历史史实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先秦史实研究方面,张翠莲利用二重证据法,对商先公踪迹和商人起源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法家和道家研究上。李振刚对易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戴木矛对韩非君主观进行了探讨。许春华对《老子》文本中的“慈”进行了分析。刘琪所著《先秦名辩学中的辩证思维研究》,值得参看。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史、社会史、历史地理等领域,社会科学诸学科交叉,特别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密切结合是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在经济史研究方面,贾丽英利

用简牍资料对秦汉至三国吴的“訾税”进行了考察。社会史为近些年的一个研究热点,其中乡村社会史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谷更有以井陘域内古村落为研究个案,重点分析了井陘域内古村落的发展历史及其演进轨迹。他还依据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对唐代村民经济身份变迁的事实和过程进行了探讨。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孙继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定郴州晋简年代和残存内容,并通过郴州晋简探讨了西晋时期曾经广泛存在的政区治所道里制度。马燕鑫认为魏晋六朝文学与地记存在着密切关系,它们是魏晋时代文化同一性的不同表现形式。

宋元明清研究领域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环境史、科技史以及宗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出版专著1部、论文集1部、译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汪圣铎《宋史探研》一书汇集了作者近十几年来宋史研究论文22篇,对研究宋代政治史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张勇试图揭示宋代淮南地区经济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贯穿线索。刘云军关注了宋代福建女性在地方社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世界史研究继续稳步发展,延展性较好。主要集中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区域国别史三个方向,其中经济社会史比重的加大、国别区域史研究的增多是值得注意的新现象。美国史、日本史依然是研究的重点。薛天依探讨了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从思想史的角度探究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脆弱性以及日本逐步走上侵略道路的思想根源。世界史研究依然不均衡,特别是在英法德等传统的史学研究上,仍有很大欠缺。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围有所拓宽。成果数量、质量整体较高,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政治人物研究主要围绕孙中山、吴汝纶、陈独秀与李大同展开。晚清政制研究侧重于清嘉庆时期海匪与闽浙水师战船数轮之更替的研究。

抗战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郑立柱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问题及其治理为研究对象,全面总结中共治理社会问题的历史经验,深入揭示了抗日根据地繁荣发展的内部动因。此外,华北根据地的“非婚关系”问题,赋税征收和农民负担,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禁烟法规等也得到了学

者的重点关注。

解放战争史以及共和国史研究中,学者重点围绕土地改革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治理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工资制度构建进行了探讨。

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思想、经济思想、进出口贸易问题、金融货币史等方面。戴建兵详细考察了具有影响的18家中国近代银行的设立、扩张、高峰到衰败的历史,对于中国现代银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史、教育史、学术史较上年有所深入,出版2部学术专著:《知识传播与学术转型:中华学艺社研究》(范铁权)、《中国环境史(近代卷)》(徐建平)。总的来看,成绩不俗,但问题依然存在,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精品力作动力不足,研究不平衡等。

5. 考古与发现

以主动性科研考古和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为主,通过对一些遗址的发掘,为相关的文化遗存提供某些新线索或科学依据。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太子城遗址规模小规格高,是金代龙门县唯一具有皇家性质的城址,推测出太子城即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发掘鱼咀沟2号地点东侧和棋盘梁地点,将泥河湾马圈沟剖面古人类文化遗存的数量增加至17层,为研究早期人类在东亚地区的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行唐故郡遗址考古发掘,新出土各类文物190余件,为研究戎狄等北方族群的华夏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以及复原先秦时期车马系驾方式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正定考古探寻千年古城历史格局,为进一步完善古城历史格局认识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年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出版学术专著2部,发表考古学研究文章30余篇。《南宫后底阁》以后底阁遗址埋藏坑出土的造像分析研究为中心,详尽记述了后底阁遗址的发掘、勘测、整理以及材质成分和彩绘颜料成分分析检测等一系列科研工作。《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一书为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整理的阶段性成果展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公布了131件造像。

(三)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年全球经济形势逆转,经贸摩擦此起

彼伏。国内,政府加大逆周期调节、积极实施“六稳”政策。河北经济稳中有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拓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进入新阶段,冬奥会筹办扎实推进。面对理论新问题与发展新实践,河北学者把握经济发展大势,坚持进取和创新,研究质量和学术影响都有了较大提升。

1. 经济理论研究

秉承学术理性,围绕西方经济学、体制改革、政治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创新经济和世界经济等几大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学者展开积极探索,针对经济理论中的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与就业、收入分配、财政政策、制度改革、资源与环境、公共服务、扶贫、创新经济、对外贸易、三农等现实问题,通过用数据分析、实例举证,用事实说话等方式,对相关问题的解决及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以研究实证分析为主,坚持问题导向,破解经济难题。李东松等将消费税率、劳动税率和资本收益税率以及政府转移性支付等公共服务支出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分析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变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柳天恩等基于 2006—2017 年中国 285 个地级及以上行政级别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赵萌和叶莉利用 46 个国家 1985—2016 年的数据,运用系统 GMM 模型估计金融衰退对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的影响。二是围绕热点问题,成果或以新视角,或以新数据,或以新发现进行了诠释和研究,创新效果明显。田学斌等提出推进生态协作,重点完善区际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是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应有之义。王金营等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从公共服务的视角探讨脱贫的方式,并提出建议。宋凤轩等以去产能为背景,从工会组织的角度出发,探索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路径选择。

2. 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

专家学者依然是围绕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竞争力、城市经济、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商贸经济研究等河北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全年实现研究成果 70 多篇。其中在 CSSCI 期刊或

重要报纸发表文章 16 篇,较上年略有下降。

研究成果特征如下:一是研究延续了往年的问题为导向的范式,以河北为研究对象,围绕河北经济的重大发展战略、地区发展问题、行业发展困境等展开学术探索,突出了地域性、现实性和应用性的特点。王春蕊提出要加快发展海洋特色产业,推动河北省海洋经济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陆刚等根据河北省电商扶贫的实践经验,提出电商产业扶贫助力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发展的建议。二是研究范畴相对集中。研究多集中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城镇化、产业集群等方面,围绕该领域的相关问题,从多个视角、运用多种方法展开研究。特别是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本年度成果涵盖了协同发展战略规划,发展路径、措施,政策效果评估,协同创新,信息产业,旅游,生态、环境,产业,市场,金融扶贫,服务业,人才,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如边继云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田学斌认为应构建京津冀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等。三是与其他学科相比,研究成果质量精品、亮点少,创新性不明显。

3. 财政与金融研究

财政研究。财政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公共经济理论、财政改革与治理、财政税收政策、财政绩效考评、税制改革、财税管理等六个方面展开,研究成果呈以下特征:一是公共经济理论的研究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本年度亦不例外。齐守印的成果尤为突出,其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进行研究,独立或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二是研究成果显出较强的靶向效应。李东松、崔海霞、耿永志、宋凤轩、范辉、李亚松等分别针对财政发展实践中的财税改革、财政政策、税收风险管理、保护纳税人权利等重大现实问题,深入探寻问题根源,精准靶向对策建议,其研究结论对河北省乃至我国财政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货币银行学理论与政策研究。专家学者在农村金融、金融精准扶贫、资本市场与衍生工具市场、农业保险、养老保险与家庭保险、房地产金融、民营与中小企业融资、供应链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公司金融、商业银行经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金融风险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

金融研究。在沿袭上年既有的农村金融、金融精准扶贫、资本市场与衍生工具市场、房地产金融、中小企业融资、商业银行经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金融风险等研究板块中,又增加了与民生相关的农业保险、养老保险与家庭保险、绿色金融等方面的研究。但成果总数并未增加,与上年基本持平。成果质量整体较上年有所下降,没有理论性的专著成果。林妍分析了注册制下的科创板市场主体责任,提出了监管路径。王健、孙文娜分别针对当前科技金融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这一难题,提出了破解思路。张丽琴等围绕如何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4. 管理科学研究

管理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科学理论研究和工业工程应用研究两部分,重点集中在一般管理科学理论、决策理论与方法、评价理论与方法、工业工程、金融工程、知识与创新管理、数量经济分析理论与技术、预测理论与技术等领域。而管理科学与管理思想史、组织理论、复杂性研究、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等研究相对较少。其中,以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为载体,涌现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研究注重实证分析,多数成果采用相关模型对实践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了有意义的研究结论,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指导作用。张培等基于服务生态系统视角构建了行动主体参与度、知识共创与服务创新三者关系模型并实证检验,揭示了多主体参与对服务创新影响的复杂作用机理,为企业开展服务创新提供理论支撑。黄春萍等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了新创企业品牌联合企业主体行为活动的基本模型和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模型,从外部竞争环境、合伙企业的企业类型、品牌资产、关系承诺和联合匹配性等特征对联合形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

二是研究注重创新,部分研究成果的创新内容经检验能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李佳钰等基于生态能量学和知识管理理论,提出了“知识能量流动”概念,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了不同情境下知识能量流动的特征与规律。王荣等

以2008—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基于倾向性得分匹配的差异性(PSM-DID)方法计算了高铁对房价的影响。杨宜等《银行介入、金融资产配置与民营企业创新——基于企业债务违约分析》一文对理解银行介入企业的经济后果以及提高银行预测企业债务违约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理解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经验证据。

5. 工商管理研究

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的社会责任、商业模式、会计转型、使命驱动型创新、企业创新、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多团队系统研究、丝绸之路旅游带等方面展开,学术成果多发表在核心期刊或相关领域的权威期刊上,取得了较高的学术价值。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

一是成果创新凸显。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不少成果实现了研究内容、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的创新。刘兵等人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爬虫工具爬取雄安新区成立一周年内与人才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识别出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中的区域、组织及个体3个层次12个治理主体,并测度主体间关系网络的相关指标。孙丽文等人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采集173份有效调查问卷,通过层次回归对影响企业转型和绩效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杨忠敏等人综合考虑影响对外投资的国内和国际因素,运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RE)方法研究知识产权制度距离与外向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的影响规律。

二是部分研究成果在该领域产生了较高的学术影响。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张学文等人对使命驱动型创新的源起、理论依据、政策逻辑与基本标准等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高素英等人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以微医为案例,对通过访谈获取的数据资料、企业内部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交互验证,探究共享医疗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因素。

6. 公共管理研究

研究依然围绕国家治理、政府职能与行政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政府人才政策、电子政务、政府信息公开

和舆情引导研究等领域展开。成果数量和质量上较上年均有很大提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经济日报等重要报纸以及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有 37 篇之多。如,《准确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康振海)、《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李鉴修)、《政府规制与环境非政府组织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俞会新等)、《乡村“治理有效”的意蕴与考量》(程瑞山等)、《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的网络治理模式研究》(韩兆柱等)、《基于舆情大数据的社会安全事件情报感知与应用研究》(夏一雪)等。

本年度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亮点颇多,但热点研究不平衡。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研究领域的既有研究板块上,虽然亦有对精准扶贫、京津冀协同、雄安新区、生态环境、数据应用与治理等热点的诠释,但在社会广泛关注的失业、网络安全、医疗、养老等热点问题上缺乏应有研究。

(四) 教育与文化研究

教育研究领域依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多专家学者在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继续拓展与深化,各抒己见,撰写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报告,出版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提出了若干颇具学术水准的理论观点和有效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教育理论体系,推动了教育实践活动。

1. 教育理论研究

教育理论研究内容较广,质量较高。在教育基础和基础教育方面,朱立明等从核心意蕴、理论基础、构成要素、生成策略等方面对深度学习的教学逻辑进行了分析。在高等教育领域,李东伟围绕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人才培养现状和优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职成教育方面,围绕职业教育提质升级,学者们进行了相关探讨。孙芳芳围绕职业教育质量以及职业院校内部评估、诊断与改进等主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徐莉创造性地使用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进行了研究。

教师队伍建设,是学者关注、研究的教育领域之一。张宛、侯佛钢等分别围绕大学教师的专业建构与提升,以及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进行探讨。

学前教育侧重教育改革和实践活动的研究。范明丽等通过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回顾,提出当今学前教育管理体制的方向。赵娟等从背景介绍、案例描述、案例分析以及总结等方面对精选的幼儿园教学案例进行了描述。

在中外教育史研究领域,成绩显著。吴洪成等通过对河北古代高等教育资料的系统分析,将其分期、分类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韩兵重点研究了 1922 年至 1948 年间河北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田山俊、李文英等分别围绕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日本在大学招生考试公平保障策略及启示进行了探讨。

在比较教育研究方面,白玫认为美国教育的新环境、教师职业发展的恶性循环以及传统教师教育项目备受质疑使选择性资格项目的出现成为历史必然。

2. 教育管理研究

专家学者围绕教育宏观管理以及各类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若干颇具学术水准的理论观点和有效的政策建议。

在教育宏观管理研究方面,徐莉认为学习型城市建设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势。白玫分析了美国教师教育选择性资格项目存在的合理性,并推断无论该项目是否消失,与其有关的教师教育问题会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张宛等围绕现代大学教师专业自我建构与教学品质的提升进行了分析。侯佛钢等研究了现阶段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制度困境及其变革逻辑。在教育史方面,刘京京分析了西南联大学生社会服务活动类型、特征和影响,为当今我国大学生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提供历史镜鉴。对于国外高等教育,田山俊探讨了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钱玲等基于 CHLOE3 报告,对美国在线教育进行了分析。李文英等研究了日本大学招生考试中的公平保障策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对职业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基础教育的校外教育等方面的关注较多,成为河北省今年相关研究中的新亮点。张栋科等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视角,对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行动逻辑进行反思,又

提出了职业生涯导向下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路径。

在基础教育管理研究领域,高小立等围绕新中国70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探讨。

3. 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主要包括:应用型大学课程体系研究、学科课程改革研究、创新能力培养与创新创业课程研究、教学模式与方法变革研究。基础教育研究集中在核心素养下学科教学变革、教育技术变革研究。教学方法研究集中在互联网带来的教学变革、翻转课堂等。在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实践应用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多。如王蔷等讨论了核心素养背景下教—学—评一体化的现实意义,探讨了其本质内涵,梳理了其理论渊源,分析了相关要素间的关系,提出了具体的操作建议。整体来看,教学研究成果数量相对其他领域较少,且高质量成果匮乏。

4. 图书馆文献学与博物馆学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涉及图书馆学理论、用户服务、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管理、文献学领域,其中尤以用户服务方面的研究比重为最大;研究主题覆盖学科理论、业务工作、事业建设和文献研究的各个方面。整体研究质量较去年有所下降,表现在发表CSSCI论文大幅度减少,但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阅读推广、信息资源共享共建、利用新技术营销等方面研究深度加强,出版了4本著作。金胜勇全面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肖佐刚等结合国内实际案例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经验讲述了科普阅读推广的发展与现状。吴国英基于河北经贸大学图书馆微营销实例,对大学图书馆的微营销实践进行了研究。

在文献学研究领域,赵嘉等探讨了《日本访书志》的版本问题。赵元斌等在梳理姚明达目录学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今后研究中,关于姚名达目录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学术渊源、实践需求等问题应该重点关注。

博物馆学整体研究薄弱,成果数量少,质量低。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博物馆事业发展、博物馆教育理念、文化服务、制度与管理、陈列展览、博物馆与新媒体应用、博物馆与文化旅游产业方面。李宝才、周蕾、蔡雨晴分别对河北省博

物馆事业发展、工作实践以及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进行了总结和探讨。

5.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

本年度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实践导向更加鲜明,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并与社会发展深刻互动,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质。新中国70年的新闻传播、网络视听、雄安新区的媒介形象建构、乡村振兴与对农传播等成为研究热点。

新闻与传播实务研究方面,田建平《当代报纸副刊及其媒介转型》一书对2006年版作了全面修订,并补增了新的内容。杨状振围绕新时代网络视听生态治理,在价值网理论视阈下梳理、总结和再构了“互联网+”语境下中国视听媒体的产业价值链观念及其理论。景义新等立足于新时代背景,对融合新闻教育的现状与未来改革方向进行了集中探讨。

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研究领域,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媒介与传播、对外传播、舆论舆情进行研究。魏茹芳对新闻工作者角色道德自觉的基础理论进行了阐释。张金桐等系统地总结梳理了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动态历程。

在新闻与传播史研究方面,成果主要集中在近现代时期。白贵等认为,晚清直隶省官方喉舌《北洋官报》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末官员的现代化。此外,他还分别对民国时期随着广播、新闻纪录片社会化进程的加快相伴而来的伦理冲突进行了探讨。《东方杂志》(1904—1948),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其文献价值日益凸显,也吸引了学者的目光。王玉蓉等关注其中的广告传播,分析了其“把关人”的角色构建。田建平对清末《东方杂志》(1904—1911)的出版、“社说”栏目、近代中国蒙古问题报道、女性问题报道、封面设计、图书广告等六方面作了专题研究,并建立了《东方杂志》研究文献索引(1955—2018)。

6. 体育学研究

研究主要围绕体育事业、体育人文、体育教育展开。在体育事业研究上,申富平提出了推进河北省冰雪装备制造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在体育人文领域,刘志国围绕国家非遗“梅花拳”文化研究的创新性发展进行了研究。崔雪梅通过居民的体育生活方式转变阐

释中国城市化进程。张萍萍针对老年群体,围绕老年公共体育服务多元化建设进行了研究。李燕等从全产业链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体育旅游协同发展并产生规模效益的路径。在体育教育学领域,李立分析了少儿不良体态成因,并给出了运动矫正指南。尹光、齐瑞明分别以河北美术学院的改革与实践和体育文化艺术展为例,对高校体育课程体系构建与差异化教学,以及高校体育文化与艺术的融合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总之,教育与文化研究侧重点是以实际问题为主导,回应教育事业和文化建设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从理论上和对策上提出咨询建议。一些研究不同程度存在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就事论事、质量偏低的现象。

(五) 应用与对策研究

1. 河北经济建设研究

2019年,河北经济理论及政策研究者紧跟经济发展形势变化和区域经济转型需求,在经济转型升级、产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对外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众多在研究思路上有创新、在研究方法上有突破、在研究内容上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对策思路,为促进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全省重大战略部署上寻求突破。颜廷标探讨了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他还提出要充分认识创新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依靠创新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边继云提出以科技创新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张彦忠等认为需要进一步创新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举措,切实增强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能力。张继文等提出要聚焦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

二是在促进特色产业发展提升上献计献策。郭晓杰提出了把握钢铁业高质量发展的四个原则。白玉芹认为要聚焦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与发展,加快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王春蕊、王会欣、陈建伟分别在加快发展海洋特色产业、乡村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了积极建议。

2. 河北政治建设研究

2019年,河北政治发展研究继续深入,成果覆盖广泛,数量丰硕,质量有所提高,呈现以

下几个特征:

一是抓住河北政治建设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继续围绕打造首都政治“护城河”、法治河北建设、基层党的建设、政府自身建设和职能转变、乡村治理、公共财政等主题深入研究,尤其是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立法和环境治理、基层党的建设、地方政治史等方面有明显的拓展和突破。王东峰围绕打造首都政治“护城河”撰写了系列文章,题目分别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严守政治纪律 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认真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二是直面回应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法律问题,雄安新区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法治环境打造问题等。于文轩等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立法在国家立法层面和在地方立法层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三是跨学科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尤其在河北法治建设、地方财政河北政治史等方面,研究质量有明显提升。孟庆瑜等人基于河北省的研究视角,围绕地方立法与法治政府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孙静等基于2010—201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7个环保重点城市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政策协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张海荣试图通过会计账册、私人记录等资料,尽可能地来揭示人民公社初期生产大队的收入及其来源,以期在拓展乡村财政史研究的同时,增进对改革开放前乡村治理的理解,也为促进相关问题的学术反思作些铺垫。

3. 河北社会建设研究

2019年,河北学者关注社会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展开研究,提出了具体而深刻的意见建议,体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研究范围广。涉及河北城乡建设、三农与扶贫开发、生态文明建设、公共文化与社会服务、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人才发展、教育与科技等多方面,雄安新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成果更具应用价值。如,张齐超利用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四个类别建构起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北11个设区城市进行初步评价,力图揭示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

分的状况。王春蕊通过对河北省涞源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的易地扶贫搬迁模式进行分析,找出当前安置区的产业发展、移民就业、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社区文化、搬迁群众后续扶持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是顶层设计突出。周爱军对创建雄安国家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进行研究,并从8个方面提出具体政策对策:(1)做好试验区的管理机构配备和人员、资金保障;(2)打造“雄安国际智谷”标志性建筑和“才智雄安”云平台;(3)推进试验区国际原创基地建设;(4)依托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推动京津人才入雄进程;(5)创新人才合作新模式引进海内外顶尖精英;(6)推进试验区人才管理服务市场化改革;(7)为试验区营造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8)提高新区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才战略意识和决策素质。

4. 河北文化建设研究

河北文化研究成果呈现数量大、类别多样、质量提升、热点凸显的态势。西柏坡精神、文化遗产、京津冀文化、雄安文化等议题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常规研究推陈出新,彰显出不断厚实的河北文化魅力。

在文化理论研究上,燕赵文化、西柏坡精神、文化遗产、京津冀文化突出了研究的厚度和高度。孙英臣认为,如今的燕赵文化,集合了慷慨悲歌的传统旋律、激情燃烧的红色旋律、追梦圆梦的磅礴旋律,以崭新面貌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王彦坤、康彦新对西柏坡精神内涵进行了凝练概括。田海舰围绕“赶考”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行了论述。袁秀等认为要传承“赶考”精神,培厚政治文化土壤。金剑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统计核算方法及其应用问题。任亮等探讨了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结构、特征及策略。

文化产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发展、农业和旅游文化产业等方面。陈璐在《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2019)》一书的总报告中客观描述了2017—2018年河北文化产业发展的形势与特征和2019年河北文化产业面临的有利环境,剖析了当前遇到的突出问题和障碍,提出了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文化建设研究方面,雄安文化、城市和农

村等方面成为重点,覆盖广,亮点多,但整体研究水平相对薄弱,有待提高。在文化史研究上,本年度成果数量较少,水平不高,涉猎内容主要在书院、音乐、商业。

5. 河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2019年河北生态文明研究,继续围绕生态建设、低碳发展、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为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是聚焦河北特点展开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刘书越等深入挖掘了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的事迹,并对这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进行了分析解读。牟永福提出必须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在绿色发展上,王会欣提出,明确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和治本之策,以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二是侧重以京津冀区域视角论证生态建设的路径。如在生态补偿方面,田学斌等认为,推进京津冀生态协作,重点完善区际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是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发展的题中之意。刘广明等提出须从强化市场推进、扩大公众参与和发挥中央政府作用等方面优化现行补偿模式。孟庆瑜等认为,应建立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推进的法律机制,具体包括: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规划的法律机制、京津冀环保产业对接对标的法律机制、完善京津冀环保产业科技创新的法律机制。

三、河北社会科学活动与管理

河北社会科学机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学术平台载体,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在学术交流、社科普及、服务决策、传播思想等方面都取得新成效。

(一) 社会科学学术交流

1. 重大学术会议情况。河北社会科学机构组织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术会议300余场,其中重大学术会议60余场,通过深化学术交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一是主办或承办全国性学术会议,主要有:河北大学举办流域资源开发利用与区域生态文明

建设学术研讨会、纪念滕大春先生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河北师范大学与相关单位举办“颜李实学及其现代价值”学术研讨会、“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暨张岱年先生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第五届全国区域文化研究会年会暨太行山文化学术研讨会,河北经贸大学与相关单位举办第 27 届全国法律逻辑学术研讨会、法律修辞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论坛、全国高校贸易经济教学研究会第 40 届年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与相关单位举办“第十九届国史学术年会”“‘北学’学术研讨会”“草原文化与燕赵文化学术研讨会”“源远流长——京津冀文化对话会”,邯郸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第八届中国古文书学——民间文书与基层社会”学术研讨会等。二是主办或承办全省性学术研讨会议,主要有:河北大学、河北地质大学等高校分别举办庆祝建国 70 周年系列活动,河北工业大学举办“新中国 70 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学术论坛,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省委讲师团)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集中宣讲联合活动、河北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河北省万企转型发展学术研讨会、2019—2020 年河北省经济形势分析会,石家庄铁道大学举办首届“青年博士论坛”,河北工程大学举办法律实务与法学教育发展论坛,廊坊师范学院举办“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高端学术论坛”等。三是各社会科学团体和有关单位组织的研讨活动也比较活跃,主要有:北京市社科联、天津市社科联、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省社科联)共同举办、沧州市社科联承办“第六届京津冀协同发展研讨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省社科联)主办第十四届河北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第十二届河北省社会科学博士论坛,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主办“纪念白求恩逝世 80 周年暨毛泽东发表《纪念白求恩》80 周年白求恩精神研讨会”等。

2. 国际学术交流情况。河北社会科学机构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传播中国声音,提升文化软实力。2019 年组织各类重要国际学术活动 40 余场,主要有:河北工业大学举办“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建设国际研讨会”,河北大学与韩国庆北大学举办“燕行录与燕赵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河北地质大学与相关单位举办“中

英挪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监测技术论坛”,河北师范大学与相关单位主办“国际视域下的张家口”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七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水边的城市——未来视域下的环境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届“一带一路”国际金融研讨会等,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与美国普渡大学举办“中美院校学术交流研讨会”,衡水学院与韩国高丽大学、韩中哲学会联合举办首届“董仲舒哲学与《周易》”国际研讨会等。

3. 学术交流年度特点与影响力分析。当前,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河北社会科学机构积极作为,牢牢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一是坚定政治立场,积极传播主流意识形态。2019 年是庆祝建国 70 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通过举办系列庆祝学术活动,总结回顾建国 70 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更加坚定了全省知识分子对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达到了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汇集力量的良好效果。二是主动服务政府决策,积极发挥咨政建言作用。通过举办学术活动建言献策,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推动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深化,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支撑。三是紧紧围绕学术前沿,传承燕赵文明和特色文化。通过举办专业学术会议,搭建高端学术平台,不断增强基础学科和河北特色文化研究深度,切实提升河北学术创新度和学理支撑力,在全国学术界发出河北声音。

(二) 社会科学普及传播

1.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情况。河北社会科学机构围绕提高全省人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科普及活动,社科普及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一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省社科联)成功举办 2019 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9 月 11 日至 10 月 11 日,2019 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举行,活动主题为“礼

赞新中国 唱响主旋律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本次社科普及月共确定 100 项主要活动，分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普及、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宣传普及、“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传学习、民生话题“面对面”五个专题，各项活动交叉进行，同步推进，由省市社科联、有关部门、社会团体牵头负责分别组织实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各市社科联和全省社科团体组织共安排活动 230 余项，300 多个会员单位的 6000 余名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者参加各项活动，直接受众超过 50 万人。二是结合全省社科普及工作，省社科联制定《2019 年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方案》，对 2019 年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进行了整体安排和重点部署，修订了《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管理办法》。三是围绕全面系统准确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选题内容，组织开展社科普及读物出版资助工作，确定《寻访河北红色印记》等 9 部书稿为社科普及出版资助读物项目，出版资助方式影响面大，有效地激励了社科专家和社科工作者的创作热情。

2. 社会科学媒体情况。河北社会科学媒体不断发挥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坚定政治立场，站在学术前沿，打造学术精品，推介学术新人，较好地发挥了学术媒体主流价值影响力。一是社科类学术期刊。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现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 78 种，其中 2019 年新增 9 种，停刊 5 种，总体数量与 2018 年相比基本持平，2019 年各类学术期刊共刊发学术论文、理论文章 1 万余篇。其中，2019 年河北社会科学期刊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2018 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目录》的种类，与 2018 年基本一致，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5 家刊物，包括《河北学刊》《河北法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河北经贸大学学报》《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入选 CSSCI 期刊的只有《河北学

刊》1 家刊物。二是社科类报纸和图书出版物。《河北日报》和各设区市日报的理论版、《河北经济日报》《河北青年报》等传统纸质媒体，继续发挥普及传播社会科学的作用，策划刊登社科类理论文章、学术活动 400 余篇。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河北大学出版社等图书出版机构，2019 年出版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类图书 200 多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按年度编著出版的《河北蓝皮书》，已形成经济、社会、文化产业、人才、农业农村发展等 10 个方面的蓝皮书系列，集中反映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走向，在省内外的影响力不断加大。三是社科类网站和各类新媒体。河北影响较大的社会科学类网站 40 余个，主要包括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网、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各高等院校网站、各设区市社科联网站等。其中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网是全省最大的社会科学综合性网站。省内各市社科联网站及其他社会科学类网站，也在发布社会科学新闻，报道省内学术活动，开展社会科学普及等方面突出了专业性、部门性和地域性特点。同时，随着新媒体广泛应用和发展，一些社会科学机构和学术刊物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各类新媒体，发布社会科学动态，推介重要研究成果，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扩大社会科学影响力。

3. 社会科学普及年度特点分析。一是围绕中心、突出主题。2019 年度河北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紧密结合时代主题主线，大力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切实提高了全省干部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为扎实推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思想引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二是聚焦大事、关注热点。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一主题，全面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宣传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省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历史性成就；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传学习专题活动，宣传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针对百姓关心关注的健康养身、投资理财、教育进修等内容，开展民生话题“面对面”活动，真正切合百姓需求，走到

百姓身边,走进百姓心里。三是突出服务、创新形式。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采取易于公众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创新普及形式,积极开展“网上科普”“媒体科普”“基地科普”“科普讲堂”“科普五进”,赢得了全省群众的广泛好评。

(三) 社会科学事业管理

1. 科研管理体制取得新进展。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研管理体制和科研领域简政放权工作,相继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河北高校、研究机构深入贯彻落实文件精神,不断把科研管理体制向纵深推进。一是重大科研管理创新政策密集出台。2019年,中央出台《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等重要文件,河北省出台《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举措,科研改革不断释放政策红利,科研环境不断优化,科研人员获得感不断提升。二是科研管理“放管服”改革继续深化。河北省印发《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科研管理若干政策措施》后,河北大学、燕山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高校,深入贯彻落实文件精神,不断探索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细则,邯郸、沧州、唐山等市出台《关于深化科研管理改革提高科研绩效的政策措施》,着力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按照“能放尽放”的要求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充分释放创新创业活力,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三是科研管理机制创新取得局部突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初步建立注重实绩、倡导精品的绩效评价体系,实行“创新团队—创新岗位—动态调整”新型科研组织创新模式,按科研业绩评估排名动态调整创新岗位,进一步激发科研创新活力,科研管理运行机制更加顺畅。

2. 科研成果管理与评价日益完善。一是成

果评价把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放在首位。在河北省各类国家级项目、省市级科研项目管理工作中,各管理机构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研究导向,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有政治导向问题的成果实行“一票否决”。二是成果评价标准更加科学、评价方式多样化。河北各高校、科研机构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不断出台配套政策举措,切实推动学术评价“破四唯”从理念走向实操,破除成果评价中“唯论文”、论文“SCI至上”等不良导向,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三是成果转化渠道进一步拓宽。河北各高校和科研单位不断加强成果转化力度,进一步拓展成果转化渠道和方式。在省级层面,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成果专报》《成果要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智库成果专报》,河北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等党政研究机构的《政研与决策》《调研内参》《专报》等直报件,都发挥了直接的咨政建言作用,2019年各类重大应用性成果直报件约500余篇直报相关省领导,批示率不断提升,在社科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市级层面,各设区市社科联、市委、市政府研究室,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与特点,分别有《决策参阅》《专家建言》《成果呈阅》《社科专报》等不同形式的报送件,上报各市委、市政府参阅,也是社会科学成果应用转化的重要渠道。

3. 人才评价与职称制度改革继续深化。河北各高校和科研单位不断加强人才评价改革,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人才支撑。一是全省人才评价工作成绩显著。进一步改革人才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科学、客观、公正评价科研人员学术水平和实际贡献,2019年河北省选拔产生一大批优秀科研人

才,如省管优秀专家、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充分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二是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取得积极进展。2019年中央推动科研评价破除“四唯”改革后,河北高校和科研单位对深化科研人员评价制度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改革。燕山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探索和实行分类评价,开展多维度多层次评价,扭转教师评价过于依赖“文凭、论文、帽子”的局面,让教师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贡献度都能得到合理体现,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和师德考核,在教师职称晋升中已经出现了不少“教得好没有论文也能评教授”的现象。三是职称制度改革打通“最后一公里”。2019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河北深入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出台《关于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进一步完善评价标准,探索试行代表作制度,强化创新和学术质量要求,根据不同岗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及科研活动特点,逐步分类制定科学合理、各有侧重的人才评价标准,避免“一刀切”。同时进一步下放评审权限,推动完善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人才智力密集的单位按照管理权限自主开展职称评审,进一步优化评审服务,加强职称评审信息化建设,逐步实现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反馈,减少各类申报表格和纸质证明材料,简化申报手续和审核环节,为科研人员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

四、进一步推进河北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随着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常态,河北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迎来了新的春天。为了胜利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目标,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河北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上实现新突破,进一步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河北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 河北社会科学发展的年度特征与整体评价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面对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即将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时代要求,河北广大社科工作者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激发科研生产力和科研活力,取得了积极成效,在燕赵大地上谱写了高质量发展的河北社科新篇章,为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 2019年河北社会科学发展的年度特征

一是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加强。河北社会科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的重要指示结合起来,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见成效。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河北学者发表了大量纪念性文章,其中《七十年汉字研究成果丰硕》《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意蕴与实践指向》《传承“赶考”精神 培厚政治文化土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等多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国家级权威媒体发表。组织出版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春风吹绿太行山——以前南峪为缩影的中国农村改革纪实》等优秀图书。

二是研究成果紧跟时代步伐、反映人民心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社会科学必须随时代脉搏跳动而发展。2019年,河北社会科学界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对象,包括“三大攻坚战”、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转型升级和国家安全等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形成不少有特色有水平的成果,包括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系列研究报告,初步统计共有数十篇被省领导肯定批示,多篇被中央领导批示。深化理论研究,讲好河北故事,河北学者也做出了

新探索。《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及其伦理价值》《怎样认识雄安新区》《哲学为思想立法》等文章被《新华文摘》等权威期刊转载。2019年出版的《读懂生态文明范例——塞罕坝告诉我们什么?》一书,结合塞罕坝动人事迹,分析了其中蕴含的生态文明理念,一经出版即引起广泛社会关注。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河北经贸大学柴艳萍教授参加了座谈会,并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立项名单中,包含了郭建等6位河北高校教师的课题。

三是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近年来,为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河北以学科建设为重点,加强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形成了双一流(世界一流、国家一流)建设学科、省强势特色学科(群)、省级重点学科的学科体系。2019年9月,河北大学恢复设立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该校哲学专业创办于1960年,是我国创办较早的哲学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和河北省“双万计划”建设专业,现为河北省唯一的学科层次齐全的哲学学科,拥有河北省第一个哲学学科硕士点(1993年)、第一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006年)、河北省唯一的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10年)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2年),是河北省重点学科(2005年)和河北省“双一流”建设学科(2016年)。社会学专业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筹建,目前拥有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和社会工作4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2019年该学院《哲学研究》发表论文2篇,近五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项。恢复设立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科的传统优势,重振河北哲学大省的雄风。

2. 2019年河北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评价

经历中美关系复杂化及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考验,2019年度及2020上半年,河北社会科学界始终保持整体稳定状态,发挥了社会科学在“首都政治护城河”中的独特又重要的作用。

一是社会科学成就突出。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河北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和服务发展的能力与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思想库、智囊团、宣传队作用充分发挥,理论教育与宣讲活动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建设和河北发展中,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愈加明显。在学科发展上,不少学科研究领域不断深化,内容不断拓展,方法路径不断创新,取得了新进展、新突破,呈现出热点集中、观点明确、关注广泛等特点,实现了学术成果数量质量齐升,人才与成果、成果数量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政治方向的正确是社科研究取得一切成就的保障。如果方向错了,再努力也达不到应有结果,甚至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过去的一年期间,河北社科界在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紧紧围绕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严把政治关,确保了河北社科发展行稳致远,走得稳、有成就、无差错。围绕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大时间节点,和抗击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河北社会科学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全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的意识更加积极、主动、明确,成为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是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河北社会科学虽然总体水平与其他先进地区相比有一定差距,但也存在自身优势。抓好优势学科,体现河北特色,促进河北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是河北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和努力方向。河北省紧邻京、津两大社科发展高地,在京津冀协同中,河北社会科学坚持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寻求进步,先后就扶贫攻坚、京津冀协同发展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成果。2019年河北大学依托该校史学、新闻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哲学与社会学及管理科学等优势学科,成立了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为扎根河北大地,多维度全方位诠释燕赵文化,努力打造“部省合建”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全新高地迈出了新步伐。

2019年3月《习近平在正定》公开出版发行,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一本新的宝贵教材,掀起了一个学习与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高潮。

四是始终坚持为现实发展服务。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的功能,河北社会科学界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河北发展进入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期,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努力在为现实服务上下功夫,形成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可操作的应用性成果。同时,河北还十分注重理论武装工作,积极开展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普及工作,在提高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思践悟水平得到提升。

(二) 河北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实践是理论之母。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跟上时代步伐,回答时代之问,研究时代课题。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确定课题、开展研究始终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力源泉。

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同时,要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出现,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挑战。

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在关键历史时期,党中央为我们制定了未来五到十五年的奋斗目标。这些奋斗目标让全国人民倍感鼓舞,信心满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学习与研究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有许多新表述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阐释,有许

多重大课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分析,找出党中央规划宏伟蓝图在河北落地生根的具体路径。比如,怎样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怎样开展乡村振兴行动,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等课题,都不是一蹴而就、吹吹打打就能实现的。这就是我们社会科学界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用武之地。要根据五中全会精神,尽快谋划一批重大课题,为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宏伟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北作出应有贡献。

哲学社会科学始终要随着社会发展而进步。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看到责任、担起使命,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群众,鼓舞全体人民斗志、提高全省人民思想觉悟。同时,我们还要对河北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理念支撑,要为如何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提出解决方案,促进时代新课题解决。

(三) 河北社会科学发展的努力方向和重点展望

在看到河北社会科学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河北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依然明显,制约河北社会科学发展的瓶颈因素依然存在,全面深化社科领域的改革仍有待加强。实现新时代河北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目标,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河北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找准努力方向,补齐突出短板,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第一,努力造就一批新时代的河北哲学社会科学大家名家。近年来,河北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但缺乏能够在历史上产生一定影响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数学科的专家教授基本上是河北知名型,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人才寥寥无几,全国性的大师级权威人物更不多见。比如,在国家社科基金会评专家中,河北每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就是典型佐证。国家社科基金会评专家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制约了河北在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上申报质量和立项数量的提高。河北需要创新政策,通过培养好自己的,留住已成长起来的,吸引京津及其他外地人才等多种途径,使燕赵大地涌现更多名家大家,可以不为所有,但能为所用。

第二,不断提高成果质量,多出顶尖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河北哲学社会科学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学术成果数量质量均有提升,但也存在一般性成果数量多、精品成果较少的问题,国家权威期刊论文或很有影响的著作鲜有出现。《新华文摘》作为全国公认的顶级转载类期刊,2019年共收入社科研究型成果749篇,^①而河北作者的文稿仅13篇被转载或摘登。哲学界的权威刊物《哲学研究》,2019年只有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2篇和历史学院的1篇得以发表;《历史研究》只有河北师范大学的两位作者各有1篇被采用。要引导河北社会科学工作者确立奉献学术精品的价值追求,坚持与时代同步、与实践同频、与人民同行,直面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的浮夸、浮躁、浮在表面的问题,推动学术研究从追求数量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努力创作出更多符合时代需求、人民需要的学术精品。

第三,积极搭建高层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平台。平台问题既是河北大师级人物少的原因,同时大师人物缺乏也制约着河北社科学术平台的提升,两者互相支持、互相制约。与缺乏社科名家大家相一致,河北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出版社较少,造成了河北学者的成果转化平台少,进而在全国的影响力整体偏弱。无论是学者本身,还是学科建设,都需要宣传推介。一些曾经在河北工作的社科专家,一旦调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机构,很快就成长为全国很有影响力的学者,除其自身能力确有一定程度提高外,因为所在平台更大、更有影响,项目比较容易拿到,慕名约稿的报刊多了,出席甚至主持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研讨会的机会多了,进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河北学者要走向学术高地,同样需要各界积极整合和拓展社科资源,建设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发表平台、展示平台和推介平台。

第四,不断优化河北社会科学发展环境。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人文社会

及自然环境。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是社科发展的基石。要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继续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的头脑,增强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责任感,强化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服好务、作贡献的观念,进一步提高社科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要不断完善社科工作者的学习实践制度,让广大社科工作者走出象牙之塔,去接地气、听民意,多出无愧于时代的成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制,破除“官本位”影响,坚持任人唯贤,为广大普通社科教研人员优化成长空间。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在生活待遇、项目支持、职务晋升、家属安置、子女入学等方面多为他们排忧解难,减少事务性工作,为广大社科工作者不断营造舒心的工作环境,以增强河北社科事业对人才的凝聚力,最大限度削弱京津等大城市和东南沿海等地对河北社科人才的吸引力。仁者爱山,智者爱水,良好的生态环境自古以来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如今也是一个地方聚集英才的重要因素。要继续打好大气、土壤、水体污染攻坚战,以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河北稳定河北社科队伍,吸引四海人才到河北建功立业,促进河北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

说明:本报告是课题组完成的第十篇年度《河北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报告》在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省社科联第一副主席康振海,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省社科联常务副主席彭建强的支持和指导下,王建强、金红勤、汪洋、刘书越执笔撰写,陈秀平、马瑞清负责协调、统稿、编校,张岳峰参与了部分调研、编校工作。文稿经课题组多次集体讨论,并多方听取专家意见,由陈秀平审改定稿。

^①去除文艺作品、美术作品和人物与回忆及科学技术等文稿后共计749篇,包括政治类100篇、法学类39篇、社会类36篇、新华观察75篇、哲学类72篇、经济类78篇、历史类74篇、文化类60篇、教育类72篇、管理类29篇、读书与传媒80篇、学术动态26篇及补白8篇。

年度学科综述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郭 强

2019 年河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看较往年略有增加，而且，从质量上看，注重研究视阈的多样性，既有从具体领域诸如经济哲学、生产理论、空间哲学、自然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与理论内涵的深度分析，又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鉴别分析，还有紧贴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从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

宫敬才探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性质问题。认为任何政治经济学都具有哲学性质，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不例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哲学性质是客观事实，从不同角度看这一事实会呈现不同的结果：随机角度呈现出来的是众多经济哲学观点；自成体系角度呈现出来的是劳动历史唯物主义；微观角度呈现出来的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命题中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元经济哲学角度呈现出来的是政治经济学逻辑前提论、经济哲学本体论、经济哲学价值论、经济哲学历史观和经济哲学方法论。不同角度呈现的结果证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独树一帜的哲学性质，是哲学经济学和人学经济

学。^[1]同时，他还分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的节点意义。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概括了其“黄金时代”15 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不是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是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结果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是互为内生变量的关系，关系性质决定了马克思原生态哲学是劳动历史唯物主义。1859 年是节点，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献载体由哲学性文献“唱主角”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文献“唱主角”，人们仅仅依赖《序言》的显性表达理解劳动历史唯物主义，遗失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恩格斯书评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设想。1870 年后，恩格斯把设想变成了哲学著作，有代表性的是三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三部著作提出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主要和基本的观点。此后人们依赖恩格斯路径理解马克思原生态哲学，最终结果是劳动历史唯物主义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取代。要重新理解劳动历史唯物主义，改变路径依赖式理解习惯是当务之急，回到原生态是有效路径。^[2]

此外，宫敬才还探讨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认为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四种形式表示存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

政治经济学命题中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从形成史角度看,青年恩格斯是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启蒙者和领路人。1859年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书评是起点,往后的思想进程情势大变,恩格斯的主观愿望是在捍卫、阐释和宣传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体系,即后人命名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恩格斯逝世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进而演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哲学体系则是被忽略,消失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黑洞之中,原因是没有表示存在的理论逻辑空间。^[3]

高红雨探讨了马克思资本批判路径的嬗变问题。认为马克思通过批判性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内在矛盾,揭露了资本的剥削本质和劳动异化的根源,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运用的资本批判路径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基于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人本逻辑对私有财产进行了批判,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进行了早期探索。随着唯物史观的逐渐确立及成熟,马克思运用科学逻辑对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了深层透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为主的辩证逻辑,深刻剖析了资本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批判路径的嬗变不仅彰显了马克思对资本批判思想的深度,而且对理解和指导我国提出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

张凡从走向权利的联合的向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制理论的时代价值。认为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制理论既是从广阔的历史维度与方法论视角对社会革命后农业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指引,同时也融入了其对农民自身主体地位与终极命运的深度关切。农业合作体制“异化”问题根本上讲是未能从劳动者主体性立场出发明确农民在“集体”中的地位及其权利实现方式。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实践,农业劳动者“权利的联合”应当成为新时代构建农业合作组织的基础,这既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所需,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内在要求。^[5]

二、马克思的生产理论

覃志红在其专著《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中,从马克思生产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主题、提问方式、理论内涵与逻辑方法等方面,准确把握理论的逻辑转换与价值旨归,深入挖掘和提炼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内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独到见解。该书旨在通过对马克思生产理论形成的思想史进行深度的文本耕耘,对其产生的历史环境,思想渊源和思想发展过程加以探究,特别是对马克思生产理论同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概括。该书主要包括“导言:马克思生产理论的问题域和时代课题”“上篇:生产的历史逻辑”“下篇:生产的现实境遇”“结语:推进面向实践的生产理论整体性研究”。其中,上篇又包括:“生产研究主题转换与新历史观形成”“走出纯粹经济学局限的生产批判”和“生产的自由论域与价值旨向”三部分。下篇则包括“信息技术时代的生产阐释”“虚拟经济、消费社会的生产批判”“发展困境中的生产目的再审视”三个部分。

作者创新性地指出,生产的历史阐释、社会批判与价值诉求的有机统一,恰恰是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原则,这也正是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理论品格和逻辑魅力之所在。关于生产的历史阐释层面,重点揭示了生产理论同唯物史观创立的历史逻辑关系;关于社会批判层面,重点探究马克思生产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关系,从而揭示马克思基于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纯粹经济学局限所呈现的社会历史整体视野;关于生产的价值诉求层面,重点将马克思对自由的追寻同启蒙思想特别是康德思想在哲学致思路径和自由实现途径探索方面进行比较,并以分工为思想节点揭示马克思生产理论超越启蒙思想的实践自由论域。同时,该书结合现时代生产的新特点,着重对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创造、虚拟经济和消费社会的生产批判以及现时代社会面临的诸如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科技异化和城市发展难题等发展困境,从生产的整体性视角加以审视,力图用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原则方法来思考生产现实及相关问题,并尝试为走出发展困境寻找出路。主张推进面向实践的生产理论

整体性研究,在强化方法论自觉的同时,把研究纳入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视界中,以问题导向桥接理论和实践的断层。这应该是本研究特色所在。

作者认为“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关于生产的观点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都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甚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中都起着奠基性的作用。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随着全球化浪潮、消费社会以及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中,马克思生产理论面临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生产理论还有没有解释力和批判力?其在本质上是否等同于生产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生产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理论品格和逻辑魅力何在?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它究竟有没有过时?当前,对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模糊甚至是错误认识所导致的认识误区和思想混乱极易动摇社会的思想根基,也不利于我们树立牢固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更会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这些疑问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得不面对和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精神实质,如何看待马克思生产理论在当代的价值,回应时代的挑战,已成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本研究尝试从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精神实质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在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关照中激活理论,就马克思生产理论在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作出有效的回应,以生产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推进生产理论的研究,以创新的理论来指导社会的生产实践,从而凸显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这对于廓清生产问题认识上的迷雾,创新与发展马克思生产理论,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和深化唯物史观研究,并在实践中促进社会的总体生产与科学发展,都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6]

宫敬才探讨了马克思语境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与特点。认为在马克思语境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重要且出现频率最高的范畴之

一,指称的具体内容如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生产关系、劳动生产条件、生产力发展形式、生产得以进行的物质技术形式、生产得以进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与消费的联结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商品性、工艺学、内在动力、革命性、人学和法权等六个方面的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内容和特点的再现使人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哲学气质,人们对生产方式范畴的习惯性理解与马克思语境中的原生态意蕴并不完全一致,直接表现是简单化。^[7]

田海舰探讨了《共产党宣言》的世界交往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认为《共产党宣言》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史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了世界交往思想,揭示了世界交往产生的历史前提、内在动力、空间布展、二重特性、发展趋向,剖析了世界交往与全球空间断裂的内在联系以及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为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为坚持对外开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方法指导和价值指引。^[8]

高红雨探讨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点的批判和超越问题。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黑格尔对劳动观点的理解和阐释。黑格尔把劳动从仅仅作为经济范畴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哲学意蕴。劳动在黑格尔那里是人的本质,是人和自然的中介,在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黑格尔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片面化,但他认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消除片面化的劳动只有通过自我意识、精神的发展。因此,他的劳动思想也就成为无果之花。理解黑格尔劳动观点的内涵,从中挖掘出马克思对其批判性超越之所在,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发现其当代革命意义,解决当下实践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9]

三、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

田海舰探讨了《共产党宣言》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认为《共产党宣言》明确将现代社会概括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科学阐释了资本

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揭示了资本现代性的本质和奥秘,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异化”弊端,指明了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力量;其现代性批判并非抽象性批判而是实践性批判、现实性批判,并非局部性批判而是总体性批判、整体性批判,并非片面性批判而是辩证性批判、全面性批判,并非僵化性批判而是动态性批判、世界历史性批判;提供了现代性批判的基本概念工具和规范基础,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和镜鉴。^[10]

郭强探讨了马克思的国家形态学说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逻辑问题。认为马克思把国家划分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两种形态。它与四种国家类型说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划分是基于马克思的五大经济社会形态说而作出的,其经济基础的划分标准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方式,着重回答“国家是哪个阶级的代表”;前者则是以社会三大形态说为基础的,其经济基础的划分标准则是生产力水平和经济运行机制,重点回答“国家如何代表这个阶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是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基础之上、以人民主权为价值取向的代议制国家。然而,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使现代国家的价值原则和制度安排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而需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继续完成。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其现代国家建构,必须遵循人民民主根本原则,必须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必须与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同步伐,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国家制度体系^[11]。此外,作者还探讨了马克思关于中华帝国现代转型的论述。认为在马克思的著述中,他经常沿用西方人的惯例,以“中华帝国”来指称当时的中国。“中华”标识了国家的民族属性,“帝国”则表明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性质,即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结构。在他看来,以权力本位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严重窒息了社会的创造活力,造成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西方的殖民入侵,客观上结束了中华帝国与世隔绝的状态,为这个古老的国家引入了现代元素,但这只是资本贪婪本性扩张的结果。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试图依靠西方殖民者的“恩赐”来实现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现代的变革是行不通的,

这个东方民族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变革自己国家的道路被彻底堵死了。马克思科学预见“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他不仅确信中国将来要走向社会主义,而且还确信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肯定会独具特色。^[12]

祁松林探讨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与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体现了社会历史逻辑与资本批判维度的统一。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晚期垄断阶段,一系列社会政策与意识形态的调整,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结构性危机与阶级冲突,使得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遭遇巨大挑战。20世纪后半叶,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判断,将生态危机的考察联系到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问题与新视阈。^[13]

城乡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孙秀芳、马凤娟、李彦玲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主要体现在时间与空间的内在统一、实践与认识的内在统一、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内在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14]

推进现代化,最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乔荣生、梁瑞敏、陈曦探讨了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的原初意蕴及当代启示。认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这一问题曾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但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冷却了下来,似乎是人们已经完全把握了这一问题。然而,从总体上看,多年来理论界对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的理解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不少观点存在要么只看到“人的全面发展”而忽略了“人的自由发展”,要么只看到“人的自由发展”而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要么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等片面化理解的倾向。因此,我们认为在当今人类已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仍有必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梳理和考察,以期从理论上真正厘清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原初意

蕴,为当今时代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和启示。^[15]

四、马克思的空间哲学

李维意、赵英杰探讨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空间批判维度问题。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立足唯物史观的哲学视角,从空间批判的维度揭示了资产阶级对“世界历史”的建设性和破坏性,论证了人类历史取代世界历史的经济必然性。在空间探索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拓展了物理—地理空间、重组了社会—经济空间、变迁了文化—心理空间;在空间意蕴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空间化本质是资本全球化,空间化形塑则表现为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即全球空间同质化和异质化的过程,空间化特征则表现为资本全球空间断裂所产生的“马太效应”;在空间批判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批判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落后国家空间、进行生态殖民主义的丑恶行径,揭露了虚拟资本恶性膨胀和全球经济风险问题,表达了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历史最终将被共产主义所主导的人类历史所代替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理想。^[16]

李维意探讨了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当代建构。认为马克思对空间哲学具有原创性、奠基性和革命性贡献。“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当代建构是在“空间转向”语境下争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需要。“马克思空间哲学”包括社会空间的实践本体论、“社会—历史”的辩证唯物论和“社会—历史”空间的本质规律论。“马克思空间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实践唯物主义空间本质论、空间的社会逻辑、空间生产理论、世界交往的空间叙事、资本空间化及其批判、社会空间的断裂及其解放、社会空间正义思想等。“马克思空间哲学”的研究有助于回应西方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挑战、彰显唯物史观“社会—空间”思维方式和建构马克思空间哲学思想体系。^[17]此外,他还探讨了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空间解放的历史逻辑。认为实现个人解放是马克思学说的主旨。对个人解放问题的研究,倾注了马克思毕生的心血。马克思解放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但是,“现实的个人”在资产阶级创造的资本空间中发生了个体与类的严重分裂,社会空间日益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

尖锐对立。从资本空间终结到劳动空间解放经历了一个逻辑转换。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推动这种逻辑转换的物质力量。资本空间化逻辑包含着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趋势,同质化是肯定性逻辑,异质化是否定性逻辑。异质化蕴含着劳动空间解放的力量。实现“现实的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成为空间解放的主体力量。“现实的个人”空间解放的目标是客体维度的“自由王国”和主体维度的“自由个性”。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为“现实的个人”的空间解放提供了条件。走向“现实的个人”解放的自由王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8]

此外,李维意还探讨了马克思资本空间化的历史逻辑。认为资本空间化就是在全球空间范围制造同质化的资本空间过程。资本空间化的旨趣在于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资本空间化可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等层面展开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深刻揭示了资本空间化所遵循的3大历史逻辑,即资本积累的驱动逻辑、资本生产的空间逻辑和资本形态的裂变逻辑。从资本积累驱动逻辑看,马克思剖析了原始积累和过度积累的方式,揭示了从原始积累向过度积累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资本生产空间逻辑看,马克思论证了资本空间化过程和空间资本化结果的统一,揭示了资本文明表象背后的野蛮本性。从资本形态裂变逻辑看,马克思分析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揭示了资本具有自我形态创新的能力。^[19]

五、马克思的自然观

王伟在其专著《马克思早期自然概念研究》中,以文本解读法为基本研究方法,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分章解读,从中分析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在马克思哲学理论中,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对自然优先地位的肯定以及对自然在唯物主义中的基础地位的强调都表明,自然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和基础地位。但在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中,自然概念并非具有同质性,不同时期的马克思对自然概念的理解是有着很大差别的。该书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自然概念的剖析和解读,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质的自然概念展示出来,并从中窥测出马克思是如何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进而生

发出自己关于自然的看法的。在作者看来,马克思对自然的最早关注出现在他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在那里,马克思写道:“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他、最能使他和人变得高尚的地位。”在这里,对于规定动物和人的活动范围来说,自然拥有了与神一样的地位,只是一个相对于动物来说的,一个是相对于人来说的。这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即动物与人的关系是直接的,动物完全依赖于自然,只在自然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会越出这个范围。人则不同,他要在自然中争取自由,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以达到自己和自然的共同完善。人与动物的这种区别,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是“选择”。人能选择,这是人优越于动物的地方。虽然马克思当时论述的主要是对职业的选择,但很明显的是,他已涉及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尽管其中还有很多唯心主义和神秘思辨的色彩,但同样明显的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对人的重视已经包含其中了。在大学期间,马克思潜心钻研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并以《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在论文中,马克思突破对伊壁鸠鲁的传统印象和刻板认识,致力于挖掘伊壁鸠鲁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内容。马克思认为相对于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调,马克思特别看重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运动对于确立人的自由观念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用他那偏离直线运动的原子打破了排斥人的一切能动性的铁链,给德谟克利特僵硬的自然界注入了生命和活力,恢复了人的能动性和自由。这时的马克思,就其主导思想来说仍然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但其对自由的追求却为其自然理论埋下了主体性和实践特质的萌芽。

作者认为《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生活贫苦的人。编辑的工作和关注的对象一起,使马克思对当时社会制度和陈旧陋习展开激烈批判,自然于是承担起社会批判的功

能,成为马克思批判的重要武器。马克思通过对自然界丛林法则的描写,类比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通过描述自然界的丰富多彩,反衬人类精神的贫乏单一;通过揭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批判剥削制度的不合理;通过呈现自然被作为商品出售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短见。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将自然视为“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的同盟者”。尽管此时的几篇评论文章是促使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动因,但对于写作这些文章之时的马克思来说,自然仍是哲学思考的对象。此时的马克思仍囿于在黑格尔哲学的框架内,被等同于自我意识的人,只能是自我意识的附属物。马克思亟须为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到出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由于费尔巴哈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与黑格尔有了本质的不同。以此为契机,马克思展开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自然于是成为马克思实现这种清算的重要理论武器。这种清算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展开的。费尔巴哈推崇人和自然,明确宣称把这二者作为自己新哲学的核心。他指出,人是其他万物的原因和根据,而自身却没有根据;人也只是自然的一个本质,其与动物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人由意识,人由于能意识到自己是类的人而与动物相区别。在费尔巴哈看来,这种意识,也仅仅是由自然而发展来的。因此,费尔巴哈得出结论:自然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人对自然的任何改变都会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虽然费尔巴哈也说过“理论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但他并未真正理解实践,也从未将实践付诸实施,而仅侧重于理论的直观。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不懂实践、工业。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还深受费尔巴哈“人和自然的统一”这一思想的影响,他借助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来批判黑格尔的自然概念,其思想主线也是关于人的自然存在的思想,如“人是对象性的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等思想,都有力地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作为绝对精神外化的自然观。但马克思致力于存在和本质、个体和类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和向真正“类本质”的复归,就其思想形式而言,无疑又带有思辨色彩。马克思把共产

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复归”，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等论断都表明，他正逐渐确立起唯物主义自然观，尽管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思想的痕迹。当然，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停留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水平上，他还看到了黑格尔“劳动的合理性”；看到了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指出饮食男女虽然是人的自然需要，却不是人所追求的唯一和终极目的，这些内容中都包含着马克思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的支点和契机。不难看出，此时马克思的思想是矛盾的。政治经济学的转向，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吸收，都有利于马克思历史意识的形成。同时，由于费尔巴哈的影响仍在，这种历史意识又是模糊不清的。尽管马克思也涉及到了实践，但他还不能自觉地认识到实践对于历史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一个未定型、充满矛盾、却有了新的内涵的发展过程，它同时兼具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双重内涵。但由于费尔巴哈的明显影响以及批判黑格尔的需要，自然主义成为此时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基调。自然概念的双重内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终确定下来，一种是指由人参与其中的包括人、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等一切存在物和对人的生存构成制约的物质条件，在这一含义上，自然是与人密切相关的人化自然；另一种是指与人、与人类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物质世界即自然界，在这一含义上，自然在其客观性上是部分经人改造或未改造的天然自然。其中，马克思这里的天然自然已经不同于费尔巴哈那个“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后者作为被马克思自然概念扬弃的内容，已然淡出马克思的视域。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然不是费尔巴哈式的自然，也不是可消解于精神、工业中的自然，而是“自然与历史相统一”中的自然。^[20]

此外，王伟还探讨了马克思后期著作中的生态基因。认为环境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指责主要来自其后期著作，特别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著作。他们认为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体现出的生态敏感性不同，在其后期著作中，马克思因戴上了“生态眼罩”，往往被置于环境保护的对立面。事实上，恰恰是在其后期著作中，马克

思理论的生态基因充分体现出来：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持续性的批判充分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特别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物质代谢中那个“无法弥补的裂缝”的论断更为环境社会学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起点；他提出的节约资源的主张和举措成为可直接应用于环境保护的策略和方法；他关于未来社会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观点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方向。这些因素表明马克思理论内含生态基因，一旦环境保护提上日程，它便能够成长起来并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21]

六、西方马克思主义

宫敬才对马克思在经济哲学语境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作了探讨。认为20世纪后期英美国家产生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该流派以“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自嘲，极力主张用分析哲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方法解读马克思文献，结果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攻击劳动价值论和“修正”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结果具有经济哲学性质且被冠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之名。用马克思经济哲学标准衡量，“重建”和“修正”造成了理论混乱，使马克思经济哲学面目全非。原生态地解读马克思文献是矫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缺陷的正确途径。^[22]

冯燕芳探讨了从卢森堡的自发性到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的思想演进问题。认为卢森堡结合1905年俄国革命深入阐发了自发性概念，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的觉醒”为前提，超越政党的人为安排，点燃和催生一连串的运动。德国始终没有发生像俄国一样的自发性革命斗争，卢森堡认为原因在于德国不具备俄国那样的革命形势，德国工人缺乏处于高度活跃状态的阶级本能、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德国工会领导人对于罢工的认识不足以及对待罢工态度消极。卢森堡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革命时期承担政治领导，加速事物的发展，赢得并带动最广泛的无产阶级进行真正革命的、坚决的阶级行动，在革命斗争中训练工人阶级使之成为一个统一体。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选择拓宽自发性概念所包含的偶然性边界，研究统一政治主体的建构机制，作为建构领

导权概念的重要理论来源。^[23]此外,她还探讨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及其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意义。认为为了批判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倾向,阿尔都塞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他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在比较视域下,批判了黑格尔“一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历史观;同时,从多维度深入阐发和论证了马克思“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历史观。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拉克劳和墨菲在继承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的基础上,解构了其中的本质主义因素,为其更好地分析新社会运动和建构接合理论奠定了基础。^[24]

陈翔、张同建、魏志祥、朱建军阐释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代价值。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将生态保护作为最高目标,对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在生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社会应审慎地对待技术进步、探索独具特色的生态保护之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育健康消费模式、发挥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作用、避免过量投资、推行道德革命、建设生态型政府、端正环保组织的功能、抵制生态帝国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价值和理论价值在中国将逐渐深化,进而产生更为强大的生命力。^[25]

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

覃志红基于马克思生产研究的社会历史整体视野对信息技术时代主体境遇作了生产透视。认为信息技术时代,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生产主体人的工作和生活样态也相应发生了改变,随之衍生出一些关涉主体境遇的社会问题。如主体的自我重塑及其在数字化生存中的异化,信息垄断或差异化获取所带来的主体间数字鸿沟,以及“机器换人”给人的生产主体地位所带来的挑战等等。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原则体现在其生产研究的社会历史整体视野中,即生产的历史阐释、社会批判与价值诉求的有机的统一,这为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处于信息时代生产大循环中的人的主体境遇,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26]

孙华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下的生态城市建设问题。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承载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城市经济

往往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但随着城市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对人类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在城市发展与生态发展之间搭建一条和谐共处的桥梁,成为了人们急需解决的难题。生态城市概念的提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27]

王永芹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历史发展中生成、弥坚、致远,认为马克思主义从产生至今,虽在发展过程中历经波折,但世界上从来没有哪种思想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由思想信仰转化为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物质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邃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历史洞察力,也必然昭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推动下,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会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伟大力量。^[28]

姚思好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的改革开放及其制度保障问题。认为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的利益诉求和创造力则是改革发展的终极动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原理指引下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迅猛发展,是中国取得惊人成就的根本原因。40余年的改革开放经验反复证明,根据民心所盼和历史发展趋势确定改革开放目标,通过改革开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改革开放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良性互动,推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和有序发展,是实现改革开放预期目标的最重要、最可靠的路径选择。^[29]

黄云明、王海探讨了《反对本本主义》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蕴。认为《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一篇非常重要的著作,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方法论思想。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学习此文,可以发现其蕴含着浓郁的政治教育论断和方法论思想。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方法,调查研究方法,群众路线方法,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和勇于创新方法等。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些思想方法,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30]

李慧娟探讨了《实践论》对新时代高校

“思政课” 教学改革的启示。认为在新时代, 为了不断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实践论》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应坚持以《实践论》为指导, 以实践性为导向, 实现理论认识与社会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31]

徐兰英、滑晓军探讨了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高校团属媒体传播力问题。认为高校团属媒体(以下简称“高校团媒”)是在高校党委统一领导下, 由高校共青团主办, 以关注青年、凝聚青年和服务青年为核心理念的官方校园媒体。高校团媒距离青年学生最近, 不仅是高校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重要平台, 也是培养马克思主义新闻人才的重要练兵场。因此, 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举得更高、摆得更正、唱得更响。^[32]

(郭强: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宫敬才.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性质问题论纲[J]. 河北学刊, 2019(3).
- [2] 宫敬才.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的节点意义[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9(6).
- [3] 宫敬才. 恩格斯与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 [4] 高红雨. 马克思资本批判路径的嬗变[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9(2).
- [5] 张凡. 走向权利的联合: 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制理论的时代价值[J]. 社会主义研究, 2019(4).
- [6] 覃志红. 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9.
- [7] 宫敬才. 马克思语境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与特点[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 [8] 田海舰. 《共产党宣言》的世界交往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3).
- [9] 高红雨. 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点的批判和超越[J]. 哈尔滨市委学校学报, 2019(3).
- [10] 田海舰. 《共产党宣言》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19(4).
- [11] 郭强. 马克思的国家形态学说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逻辑[J]. 观察与思考, 2019(6).
- [12] 郭强. 马克思关于中华帝国现代转型的论述[J]. 观察与

思考, 2019(11).

- [13] 祁松林.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与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J]. 科学社会主义, 2019(3).
- [14] 孙秀芳、马凤娟、李彦玲.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研究[J]. 管理观察, 2019(6).
- [15] 乔荣生、梁瑞敏、陈曦. 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的原初意蕴及当代启示[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9(2).
- [16] 李维意、赵英杰. 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空间批判维度[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1).
- [17] 李维意. 试论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当代建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6).
- [18] 李维意.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空间解放的历史逻辑[J]. 江苏社会科学, 2019(2).
- [19] 李维意. 论马克思资本空间化的历史逻辑[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 [20] 王伟. 马克思的早期自然概念研究[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 [21] 王伟. 马克思后期著作中的生态基因[J]. 观察与思考, 2019(10).
- [22] 宫敬才. 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9(2).
- [23] 冯燕芳. 从卢森堡的自发性到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J]. 广西社会科学, 2019(6).
- [24] 冯燕芳.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及其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意义[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 [25] 陈翔、张同建、魏志祥、朱建军.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代价值阐释[J].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9(6).
- [26] 覃志红. 信息技术时代主体境遇的生产透视——基于马克思生产研究的社会历史整体视野[J]. 经济论坛, 2019(4).
- [27] 孙华.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下的生态城市建设[J]. 决策参考(下), 2019(10).
- [28] 王永芹. 马克思主义信仰: 在历史发展中生成·弥坚·致远[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9(15).
- [29] 姚思好.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的改革开放及其制度保障[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6).
- [30] 黄云明、王海. 《反对本本主义》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蕴[J]. 保定学院学报, 2019(3).
- [31] 李慧娟. 《实践论》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启示[J]. 保定学院学报, 2019(4).
- [32] 徐兰英、滑晓军. 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高校团属媒体传播力研究[J]. 青年记者, 2019(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杨春娟

2019年,本学科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问题的多维研究,新时代新思想成为研究热点。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及其生成过程

关于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原则、主体与受众、实践路径及成效,李英、杨超认为,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原则有三个:一定要进行信仰教育的原则,党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领导权原则,对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先进知识分子成为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要实施主体;党员、工人、农民是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要受众。其实现路径:一是创办党校和工人学校,二是创办期刊杂志和报纸,三是创办出版社,四是参与工人运动与革命实践。其成效是初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规范化、组织化的尝试,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资源的准备,注重了信仰教育内容生活化、主题时代化和方式具体化的特点。^[1]

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四重逻辑,斯琴格日乐认为,理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础维度,知识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中介维度,思想转换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灵魂维度,实践指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践维度。^[2]

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过程,王永芹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历史发展中生成、弥坚、致远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探讨。认为,一是从科学学说科学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云激荡中生成升华;二是从曲折发展到有序建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宕中历挫弥坚;三是从信仰自觉到信仰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马克思主

义信仰在21世纪行稳致远。其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认同基础更加稳固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创立,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基础更加科学理性;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略,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路径更加具体现实;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众基础更加稳固;谋求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情怀与担当,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更加强大的吸引力和更加广泛的归属感。^[3]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姜德辉、李艳从背景条件、个体条件和外部条件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背景条件有两个:理论因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个体条件是李大钊不仅受过良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还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通晓英语和日语,即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是内在动力,中西教育背景是丰厚土壤,坚定的信念是思想基础。外部条件是中国近代社会现状和共产国际的支持。^[4]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及“承—进”关系,王菲、周振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和解决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重大问题,总结中国独特的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5]孟祥林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其理论内涵、实践、历史、主题都呈现出明确的“承—进”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是内涵的“承—进”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内涵在历史推进中不断丰富;二是实践的“承—进”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在曲折中得到发展;三是历史的“承—进”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紧密联系;四是主题的“承—进”关系: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在时代化、大众化进程中得到具体化。^[6]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

王菲、周振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一个整体推进的历史进程。^[7]孟祥林认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紧密联系的三个问题。^[8]

王菲、周振国还对如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需把握的科学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须强化内生动力，充分发挥科学理论对于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引领作用；需要把握科学方法，即整体推进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理论教育与实践体悟相结合，理论武装群众与服务群众相结合。^[9]

另外，张青卫对如何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进行了探讨。认为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既是世界需要了解中国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需要走向世界的主观诉求，更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它必须遵循相应的原则，要在源头上坚持理论自信的原则，在过程中坚持平等交流的原则，在结果上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其着力点：一是着力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同价值观概念的解释力；二是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示范引领作用；三是努力提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意义的认识；四是扎实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讲好中国故事。^[10]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新阐述与基本内涵

袁秀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阐述：一是明确目标，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二是强化路径，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方式方法，必须形成有效路径；三是突出引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环节；四是划分重点，即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全员参与，“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五

是文化浸润，即文化浸润心灵、滋养精神、引领风尚。^[11]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於素兰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从多个维度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一是时代维度：是在中华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历史时期提出的。二是结构维度：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三是思想资源维度：认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对全体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贡献了重要思想资源。^[12]孟祥林还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主导性、普遍性和包容性。^[13]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的同向性，袁秀认为，红色文化作为以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形态，所凝结的理想信念、道德操守、价值追求与坚定信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思想文化源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在理论渊源、思想内核、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同向性：一是在理论来源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优秀成果孕育形成的精神产品；二是有共同的思想内核，即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在价值功能上，二者的价值内涵与价值目标高度统一，育人功能与实践目标契合统一。^[14]

袁秀认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色路径：一是内化认知：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具体表现为红色教育开通滴灌式渗透大通道，让红色教育延伸至各领域多群体，将红色教育融入多维教育新思路。二是外化于行：红色产业铸造品牌，具体表现为红色资源产业化，提升红色产品竞争力；红色资源品牌化，增强红色基因影响力；传播渠道多元化，营造红色教育大环境；红色旅游人本化，彰显红色精神新活力；红色基地专题化，夯实红色文化主阵地。三是固化于制：红色路径有章可循，具体表现为建立健全红色资源开发机制，建立健全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建立

健全红色教育仪式机制。^[15]

(三)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路径

张杨认为,“互联网+”时代下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策略,一是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思想教育平台;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三是实现个性化思政教育教学。^[16]

徐兰英,刘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的策略进行了研究,一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塑造班级文化精神;二是坚持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营造班级文化氛围;三是坚持以专业提升和学生成长为本,打造特色班级文化;四是坚持文化挖掘和发展创新为动力,提升班级文化活力。^[17]

王琨媛、冯立刚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策略进行了探索,指出在全程育人中,要紧密结合教学过程和第二课堂的活动,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全员育人中,要抓住教师和其他服务人员这一关键,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在全方位育人中,要抓好校规校纪和校园文化建设这些载体。^[18]

王建洲、周春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研究生“双创”教育的途径进行了探索,一是组织、课程、师资等基础要素建设途径,要加强组织体系、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二是学校、政府、社会等多元协同培养路径,要健全党政宏观调控路径,完善社会资源共享路径;三是校内、校外、第三方机构评估促进途径。^[19]

陈艳梅、都三强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路径:一是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机制,加强顶层设计;二是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客体,强化情感认同;三是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活动载体,养成行为习惯;四是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坚定理想信念;五是融入创新创业教学理念,勇担历史重任;六是融入创新创业教学,注重价值引导。^[20]

(三) 河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

关于2019年河北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对策举措,王彦坤、刘钢虎认为,2019年河北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应当选择如下对策和举措:一是进一步唱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旋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定向;二是创新教育引导内容和形

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内化于心;三是继续打造培育践行新高地,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杆;四是继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全过程,确立人民正确价值追求的制度保障。^[21]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河北建设的展望与实践路径,蔡欣欣、曹哲认为,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法治河北建设;二要完善立法规范体系,为融入工作提供法治保障;三是扎紧执法实施环节,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压实司法公正体系,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五是创新普法宣传方式,营造全民守法良好氛围。^[22]

关于以河北省干部学习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创新路径,李鉴修认为,一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坚定理想信念;二要把重点放在学懂弄通做实上,做到知行合一;三要聚焦培育和践行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四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久久为功。^[23]

杨春娟还对河北省岗上村培育文明乡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做法和经验启示进行了总结。岗上村培育文明乡风的主要做法:一是建立组织网络,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规范评议机制,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丰富宣传载体,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开展“公德教育四进”活动,积极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是开展志愿服务,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六是强化保障机制,不断激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岗上村的经验启示,培育文明乡风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二是要善于发动群众;三要创新载体,搭建平台;四要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五要真抓实干,坚持不懈。^[24]

另外,孟祥林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理论维度、实践要求与激励动因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理论维度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科学精神引领社会发展是灵魂;二是发展道路体现中国特色是主题;三是爱国强国才有民族尊严是精髓;四是明辨荣辱需从身边做起是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要求:一是强化舆论宣传和教育引导;二是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状态;三是构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德体系；四是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大众化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激励动因：一是以科学精神培养优秀人才；二是以创业精神激励奋发图强；三是以爱国精神引导甘于奉献；四是以正义精神明辨荣耻界限。^[25]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萌芽与成熟

魏先法、王捷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萌芽与成熟的起点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正定时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起点；党的十八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熟的起点。从萌芽到成熟之间的发展过程，可以看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即从福建时期到党的十八大前。^[26]

（二）体系结构

周振国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基本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围绕时代课题形成“八个明确”的理论主体、理论主体向实践转化形成“十四条坚持”的基本方略、贯穿于思想体系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核心。^[27]

（三）重大意义

哈明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其重大理论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深度剖析了当代世界格局及其阶段性特征，科学回答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了对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提升到新高度；二是贯通历史与现实，深刻总结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立足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际，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到新境界；三是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科学揭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四是面对风险挑战，科学阐述了中

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把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推向新高度。其重大历史意义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人类社会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无产阶级作为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高度；二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角度看，“八个明确”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十四个坚持”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路径、方略、步骤等，为中华民族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行动指南；三是从人类文明进步史的角度看，积极回应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世纪难题，提出构建开放性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引领。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为破解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28]

（四）意识形态维度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维度，程洪宝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或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这一层面考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在包含了我们党所确立的价值取向（“为了谁”）、目标体系（“做什么”）、选择的实施路径（“怎样做”）等内容。其价值性内容有助于人民群众形成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其目标性内容有助于人民群众形成理想认同和目标认同，其策略性内容有助于人民群众形成制度认同和政策认同。^[29]

（五）共产主义意蕴

郭强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意蕴，在于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识和执着追求。其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共产主义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时代表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通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文明普遍交往的中国

方案。^[30]

四、新时代新思想专题研究

(一) 新时代

关于新时代的判断依据、主要特征及历史地位,冯立刚、姜文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主要特征:一是党的领导更加巩固;二是现代化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三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更加突出;五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被满足;六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逐渐形成;七是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特质明显;八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地位,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三次转折、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及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示范。^[31]

关于新时代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唐文玲、张林峰认为,新时代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具有深厚理论渊源;二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富有重要实践基础;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蕴含宝贵文明价值。^[32]

关于新时代中国道路思想的四重逻辑,冀素兰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道路思想具有历史、现实、未来和实践四重逻辑,一是历史逻辑: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出场是党和人民的历史选择。二是现实逻辑:中国道路“既造福中国,也富泽世界”的双重现实性,决定了中国梦与世界梦同频共振。三是未来逻辑:人类文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决定中国道路必须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四是实践逻辑:既要立足中国实践,彰显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又要立足务实民族特性,扎根民族实践,汲取外来智慧成果,保持中国道路的前瞻性,即在历史思维中,彰显中国道路理论在全球中的共识性;在道路定力上,不断培植中国道路的话语自信;在中国实践上,进一步优化中国道路的科学性,绽放中国道路的吸引力。新时代中国道路思想具有和平性、实践性、共生性与合作性。^[33]

关于新时代中国发展方略内容,陈聚芳认

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发展方略的重要论述主要包括九方面内容: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论;二是内外相成的发展道路论;三是中国梦为统领的发展目标论;四是五大(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论;五是四大(即改革、创新、科技、文化)发展动力论;六是三大(即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论;七是稳中求进的发展速度论;八是中国与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论;九是抓发展和抓党建相结合的发展领导论。^[34]

(二) 习近平新时代战略机遇期思想

关于时代背景及科学内涵,祁凤华、陈聚芳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战略机遇期思想是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世界发展面临新的态势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的实践中应运而生的。这一思想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一是习近平判断在新时代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二是同过去相比,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三是习近平认为最大的发展机遇来自中国自身;四是习近平强调要善于维护和延长我国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35]

关于时代特征与基本情形,祁凤华、陈聚芳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战略机遇期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习近平强调抓机遇必须要做到“观大势”;二是习近平的战略机遇期思想是紧密围绕党的“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展开的;三是习近平高度重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四是习近平极为重视主体能动性在机遇形成中的重要作用。^[36]李新市认为,多种机遇并存是新时代战略机遇期的重要特征。我国面临的各种战略机遇的基本情形是机遇与挑战共存于矛盾的统一体中,机遇大于挑战,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诸多战略机遇中我们可以大有作为。^[37]

李新市还提出了掌握抓住各种战略机遇的对策,一是全面认识面临各种战略机遇的标准,即全面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二是培育宽广的世界眼光,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增强抓住战略机遇的能力;三是维护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同时采取正确的措

施；四是抓住我们面临的各种战略机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五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机遇的观念。^[38]

（三）习近平时代新人思想

武东生、刘朝阁认为，习近平关于时代新人的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高尚的道德品质，高雅的生活情趣；三是丰富的文化知识，过硬的做事本领；四是自觉的纪律观念，明确的规则意识；五是健康的身体素质，坚强的意志性格；六是积极的创新精神，务实的工作作风。^[39]刘朝阁认为，时代新人的思想内涵可以从鲜明的时代特征、强烈的实践指向两个维度来把握，一是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为人生存的新时空境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人的新需要（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追求）；二是强烈的实践导向，表现为人的新使命（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任）和人的素养结构新要求（提升多方面素养）。^[40]

刘朝阁认为，时代新人的培育机制：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二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造灵魂；三是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四是以齐抓共管提供机制保障；五是以改革创新增强育人效果。^[41]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白太辉、陈聚芳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表现为生态文明建设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正确选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思想保证。^[42]沙占华、冯雪艳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多维探究，第一，从历史维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历了萌芽、发展及完善三个时期，具体表现为：1969~1975年，在陕北的七年知青岁月，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萌芽时期；从正定到福建再到浙江、上海，丰富的地方从政经历和始终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注和思考，使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和丰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随着时代发展和实践变化不断完善成熟。第二，从理论维度看，传

承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第三，从实践维度看，积极回应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挑战，落脚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的向往，着眼于构建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43]

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基本要求，王小玲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44]白太辉、陈聚芳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它是一般生态文明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表现在四个方面：从理论上讲，它既具有生态文明的理论共性又具有新时代的“中国国情特色”；从实践上看，代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党探索解决日益棘手的生态问题的新方案；从特征上看，更加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更加强调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规律和保护环境；从地位上看，它是我国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抓手。^[45]其基本要求：一是人类要自觉爱护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的破坏自然；二是人与自然要共生共荣；三是生态保护中，规律是人类不能逾越的“红线”；四是要以平等的心态来看待自然界中的每个个体；五是做到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的相辅相成。^[46]

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践行路径，白太辉、陈聚芳认为，一是引导人民自觉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二是坚持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三是优化土地开发新格局；四是加强生态文明的体制建设。^[47]王小玲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实践耦合的路径：一是着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二是着力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民行动体系；三是着力构建“生态环保铁军”的正向激励机制；四是着力打造“两山”地方创新实践的中国样板。^[48]牟永福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树立生态红线意识，构筑繁荣先进的生态文化体系；二是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构筑良性循环的生态安全体系；三是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构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四是建立科学的GDP考核机制，构筑系统完整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49]刘丽认为,新时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思路:一是转变发展理念,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二是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三是转变生活方式,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四是转变政绩考核“指挥棒”,更多指向生态环保。^[50]

另外,张雪还对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探讨,认为,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转折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现实依据和实践基础:时代背景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现实依据是对国内外生态危机的反思;实践基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主要有以下内容:其目的是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要义是开发资源节约使用;思路是深化改革协调发展;要求是综合考虑标本兼治。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代启示:遵循客观规律依靠科学技术,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破除部门利益加强顶层科学部署统筹规划。^[51]

(五) 习近平民生观

关于习近平民生观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主要内涵与时代价值,郭培培、曹海霞认为,习近平民生观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一是中国古代民本观念为习近平民生观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鉴;二是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为习近平民生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长期的基层工作实践为习近平民生观的形成创造了现实条件。其主要内涵体现在以下维度:一是从政治角度看,民生问题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关键问题;二是从经济角度看,改善民生是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尺”;三是从社会角度看,改善民生是稳定社会大局、加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其时代价值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为新时代更准确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指明了方向。^[52]

沙占华、冯雪艳对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民生观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及其思维方法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民生观的形成背景既有理论来源,又有实践基础,其理论来源:一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民生思想;二是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民生思

想;三是传承了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的生态民生思想。其实践基础:一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失衡的教训;二是长期关注民生的从政经历;三是其他国家的生态民生建设的经验教训。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民生观的主要内容:一是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二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是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是改善民生的优先领域;四是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是改善生态民生的重要环节;五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是改善生态民生的根本出路。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民生观的思维方法是辩证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和底线思维方法。^[53]

范拥军还对窦孟朔等撰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研究》一书的民生建设内涵及民生建设战略布局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该书以民生发展为主线,从静态和动态相统一的高度,给予民生和民生建设的内涵以科学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新时代民生建设战略布局。新时代的民生已经是人民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活“五种生活”构成的有机系统,由民生经济建设、民生文化建设、民生政治建设、民生社会建设、民生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民生建设战略布局。新时代民生建设战略布局所包含的民生经济建设、民生政治建设、民生文化建设、民生社会建设与民生生态建设“五大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互为条件,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其中,民生经济建设是根基,民生政治建设是保障,民生文化建设是灵魂,民生社会建设是枢纽,民生生态建设是依托。新时代中国特色民生建设的战略重点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民生社会建设的目标,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每一个人都有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新时代民生建设战略布局的实现路径:一是大力推进民生经济建设,坚持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为引领,整合人力资源,加大研发投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以协调发展为基础,大力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东西部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共享为目标,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让人们共享

改革成果。二是大力推进民生政治建设,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基层群众的选举权、管理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三是大力发展民生文化建设,繁荣公益性文化,加大乡村文化的投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四是大力推进民生社会建设,加大对幼儿教育和农村教育投入,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实现学有所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实现弱有所扶、老有所养;建立房价调控长效机制,实现住有所居;改革医疗保障制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现病有所医;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增加劳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劳有所得。五是大力推进民生生态建设,持续有效推进绿色、低碳、环保产业,提高人民的环保意识,增加环保投入,严格环保执法,加强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着力解决农村脏乱差现象,以及水土污染问题,提高国土绿化面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54]

(六)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

扈红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理论意涵与现实启示进行了探讨。她认为,在新的国内、国际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等相关概念,这是对新时期中国面对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诉求的时代回应。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构”等概念的提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加了新的理论内容;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的提出,为实现新时代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提供了行动的指南;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增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权威,实现了历史、现实、未来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新途径;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概念有利于整个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国家认同的探讨提供了新的着力点和新目标。^[55]

关于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逻辑体系、实践路径与时代价值,斯琴格日乐认为,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立足于多民族国情基础上,全方位阐述了共同体的法律地位、历史渊源、情感基础和未来走向,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公民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其实践路径是建

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其时代价值在于超越了传统民族自然观建立了民族国家观,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超越了民族政治观建立了民族一家亲观,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超越了民族大一统观建立了民族命运共同体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引。^[56]

代洪宝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及当代价值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是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从理论逻辑来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类存在”理论为思想坐标,选取“类存在”及“类存在”意识透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发过程;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变动过程,是中华文明不断演进、升华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价值是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理论价值表现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自觉,实践价值表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57]

(七)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念的现实依据、核心要义与实践展开,赵学琳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念来源于当前世界发展的前沿态势又超越于现实,具有深厚的现实背景:一是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人类的文化共识日益增强;二是互动交流日益深化,各国各民族的主体意识逐渐彰显;三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客观存在,文化生态不均衡性更加显著;四是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文化认同日益得到广泛认同;五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大,共同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正在形成。其核心要义是科学性,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天下为公、万物一体的文化理念,坚持多元共存、平等相待的文化理念,坚持和平共处、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坚持兼收并蓄、交流互鉴的文化理念,坚持合作共赢、共享发展的文化理念,坚持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的文化理念。其实践展开:一是推进对外文化传播战略,构建民主、公平、均衡的全球传播格局;二是推进自主、开放、包容的文化外交活动,拓展共商共建共享的文化工作机制;三是推进平等参与的对话

与交流战略,构建和谐融洽、共同互动的文化秩序;四是推进互联互通的文化科技平台,培育覆盖全球、各国共享的文化技术载体;五是提高全球文化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形成各国共同制定文化规则的体制;六是推进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战略,构建以人类共同文化问题为基准的文化创新机制;七是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凝聚与认同,构建人类文化的共同价值基础。^[58]

黄云明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传统世界格局逻辑的超越,体现在以仁爱逻辑取代资本逻辑,以多元文化主义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以生态逻辑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以陆海空综合发展逻辑超越近现代海洋中心主义。^[59]

张婧瑶、苗林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从四个方面展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是事物的关联性;二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三是推行公道正义的行为规范;四是可持续发展。^[60]

(八) 新时代正确义利观

张青卫、韩兴武认为,正确义利观是新时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因为树立正确义利观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以及满足人民的社会发展要求和历史发展要求。^[61]

新时代正确义利观的基本原则是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关注长远利益的原则。树立新时代正确义利观的基本途径,一是以共同富裕为依托,积极培育正确义利观;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全面树立正确义利观;三是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为归宿,切实践行正确义利观。^[62]

(九) 习近平强军思想和边海空防思想

关于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逻辑,程洪宝、杜旭宇从立论基础、中心课题、逻辑展开三个要素出发进行了分析,认为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立论基础是准确描述和判断“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心课题是在新时代如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和世界一流军队;逻辑展开是形成一套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是根本道路: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二是基本思路: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三是基本机制:练兵备战;四是基本路径:“五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

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五是主体力量: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六是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63]

周骥、杨振辉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内涵:一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筑牢我国边海空防铜墙铁壁;二是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推进现代边海空防管控力量体系建设;三是完善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加快构建合力治边格局;四是坚持陆海统筹,通盘合筹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五是坚持军民融合,贯彻落实改革强军和兴边富民战略。^[64]

(十)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实践观及辩证思维方法

李新市认为,习近平新时代社会实践观的本质特征:一是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二是坚持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三是坚持实践要求与时代要求的统一;四是坚持必要条件和根本目标的统一。^[65]

把握习近平新时代辩证思维方法,一是在培育科学精神和人民情怀过程中把握好质量互变规律;二是正确把握对立统一规律,要坚持党的领导问计于民;三是辩证地把握否定之否定规律,把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66]

(十一)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担当精神

魏彤儒、廉旭认为,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担当精神的内涵,即“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的气魄”。其特点可以归结为两点,即立足中国、着眼世界,着力创新、实干兴邦。^[67]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担当精神的时代价值,是青年成长的基本指向,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担当精神培育的主要方法是文化熏陶法、精神引领法、认真学习法和知行合一法。^[68]

(十二) 文化自信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何谓文化自信?陈洁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禀赋和所拥有的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生命力保持坚定的信心和发展的希望。^[69]孙晓梅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是通过认知、比较、继承、批判等途径,把握文化发展历史,熟知文化发展内容,在达到情感归

属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传统和价值给予高度肯定,对自身文化的未来发展作出理性判断,对自身文化生命力抱有坚定信念。^[70]

贾玉娥认为,文化自信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其表现:一是文化自信坚持目标引领,立足中国实际,勘定正确道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浪前行;二是文化自信强化思想导向,构筑中国价值,更好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三是文化自信重视文化繁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创新,努力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四是文化自信突出精神激励,涵养伟大精神,激发持久动力,凝聚民族复兴磅礴力量;五是文化自信注重文明重塑,顺应时代潮流,贡献中国智慧,实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71]

如何坚定文化自信?陈洁认为,必须不断培养并坚定文化自信,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文化自信来凝神聚气,形成民族共识;用文化自信来加强对外交往和文明互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72]

周美娟认为,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增强文化自信,一是以文化自信构筑中国力量;二是树立文化自信需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加强国际文化的交流互动;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自信。^[73]

王天彤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个层面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完成创造性转化、实现创新性发展,就必须树立科学的继承发展观。在器物方面,要盘活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在制度层面,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思想方面,要突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真正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74]

孙晓梅还对文化自信视域下的文化认同培育路径进行了思考,认为一是马学为体: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创新中增进文化认同;二是国学为根: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教育中增进文化认同;三是交流互鉴:化解文化冲突,抵制文化霸权,在推动文明对话中增进文化认同;四是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提高文化实力中增进文化认同。^[75]

(十三) 以人民为中心与坚持人民立场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时代内涵,张春艳、郭岩峰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符合宪法的本质和精神实质,具有合法性;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坚实基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历史观。^[76]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人民幸福,一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必须落实“国强民富”;二是在政治建设方面,必须落实“权为民用”;三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必须落实“汇聚民智”;四是在社会建设方面,必须落实“惠及民生”;五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落实“造福于民”。^[77]周振国认为,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把握导向性、全面性、过程性、具体性和评价的唯一性原则要求,突出利益动力之源作用。^[78]

徐淑贞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内在要求,就要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要补齐社会发展短板,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就要尊重群众主体地位,汲取群众首创经验和智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路径是践行群众路线,要求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于群众实践,必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79]

康振海认为,在民族复兴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就要始终为人民谋幸福,始终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始终凝聚人民实现复兴的磅礴力量,始终坚持以文化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80]

周振国认为,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发展,必须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地位。^[81]人民创造着共和国辉煌的历史伟业,表现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出人间奇迹,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紧紧依靠人民推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82]

六、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问题

(一) 改革开放

如何理解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田海舰认为,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具有必然的认识逻辑、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现实基础。^[83]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 40 年迎来了“三个伟大飞跃”？吴耀明认为，具体表现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84]

杨东广认为，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表现为创新是改革开放的源头活水，是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让创新成为新时代改革发展的鲜明底色，需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坚持和贯彻创新发展理念。^[85]

颜廷标认为，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这条强国富民之路，一要坚持不断解放思想，持续推进改革创新；二要根据我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三要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四要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在合作竞争中实现共赢；五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六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86]

姚思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探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及其制度保障。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革开放与制度体系建设互动发展的理论基石；唯物辩证法是指导改革开放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方法；完善和发展制度体系是实现改革开放预期目标的主要路径。^[87]

李素霞、冯艳玲还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绝对领导权，必须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必须坚持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方法。^[8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问题

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王彦坤认为，运用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89]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及有益启示，花永兰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一是社会主义是个运动过程，从而都是在不断开拓进取中向前发展的；二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四是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五是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益启示，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动摇。^[90]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演进与深刻启示，刘丽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敌对矛盾；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供需矛盾；三是新时代的社会供需矛盾。解决好新时期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的深刻启示：一是正确认识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辩证关系，把握好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改变、两个没有变”；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取向；三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路径。^[91]

关于我国现代化伟大进程的演进及启示，宋彦民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从中国式的“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再到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开创了一条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我国现代化建设伟大进程的启示：一是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坚持解决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92]

关于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与历史性跨越，王聚芹认为，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路径选择，一是指导理论路径凭借：马克思主义；二是领导阶级路径选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三是中国崛起的根本方法路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四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共同体路径选择：建设“人命运共同体”。中国崛起实现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唯一路径”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唯一中心”视域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对“对抗唯一方法论”视域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对“资本唯一共同体”视域的历史性跨越。^[93]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李辉敏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94]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康振海认为,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统一,坚持统筹兼顾与有序推进的有机统一,坚持制度执行与考核监督有机统一,坚持制度意识与治理能力的有机统一。^[95]李鉴修认为,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必须提高制度执行能力。^[96]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康振海认为,其总体要求:一是坚持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指导;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三是坚持改革创新的正确路径;四是坚持成熟定型的根本指向。其总体目标,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基础,吻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安排,伴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逐步实现。^[97]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王彦坤认为,一要深刻认识我国制度优越性,强化思想自觉;二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政治自觉;三要抓好贯彻落实,强化行动自觉。^[98]康振海认为,一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二要区别对待、有序推进;三要相互衔接、协调推进;四要谋划组织、共同推进。^[9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构的逻辑基础,黄云明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理论逻辑基础,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以及中华民族追求民族文化现代化的100多年历史是历史逻辑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文化现代化奋斗的近百年实践、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70年的社会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实现民族复兴的40年社会实践是实践逻辑基础。^[100]

周振国认为,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化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政治保证;二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筑牢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强大根基;三要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101]

康振海认为,以奋斗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一要坚持理论武装,坚定接续奋斗的理想信念;二要坚持实践锻炼,提升接续奋斗的素质本领;三要坚持改进作风,夯实接续奋斗的群众基础;四是坚持求真务实,书写接续奋斗的时代篇章。^[102]

另外,田海舰还对我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的对策路径进行了论证:一是在主体建设维度,国家层面政府要顺势而为,在理念上树立信息安全、网络主权意识和互联网思维,在战略上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出具有统筹性和前瞻性的互联网发展战略;在实践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网上阵地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疏导网民,积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二是在技术建设维度,要研究互联网未来发展趋势和动向,侧重于计算机核心关键技术的跟进与研发,在各类网络终端等核心部件研发上有所突破,加快下一代互联网工程建设;三是在信息传播维度,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加快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信息资源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汇聚正能量;四是在制度建设维度,加强领导,强化中央责任制互联网管理体系,构建完善的网络监管和治理体系,建立意识形态网络风险评估体系。^[103]

(杨春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李英,杨超.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J].云梦学刊,2019(6).
- [2]斯琴格日乐.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四重维度[J].社科纵横,2019(10).
- [3]王永芹.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历史发展中生成·弥坚·致远[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8).
- [4]姜德辉,李艳.论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5).
- [5][7][9]王菲,周振国.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N].经济日报,2019-10-10.
- [6][8]孟祥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承—进”关系分析[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9(2).
- [10]张青卫.关于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思考[J].重庆社会科学,2019(4).
- [11][15]袁秀.红色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
- [12]於素兰.习近平关于如何加强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教育思想的论述[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3).
- [13][25]孟祥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维度、实践要求与激励动因[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9(2).
- [14]袁秀.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向性思考[J].治理现代化,2019(5).
- [16]张扬.“互联网+”视角下的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J].新闻研究导刊,2019(10).
- [17]徐兰英,刘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班级文化建设研究[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9(1).
- [18]王琨媛,冯立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策略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23).
- [19]王建洲,周春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研究生“双创”教育机理与途径探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20]陈艳梅,都三强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研究[J].教育观察,2019(7).
- [21]王彦坤,刘钢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激发共同价值追求,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力精神支撑[A].河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报告(2018—2019)[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2]蔡欣欣,曹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河北建设的实践探索[A].河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报告(2018—2019)[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3]李鉴修.河北省干部学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路径创新[A].河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报告(2018—2019)[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4]杨春娟.培育文明乡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A].河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报告(2018—2019)[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6]魏先法,王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与成熟[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4).
- [27]周振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结构研究[J].河北学刊,2019(1).
- [28]哈明虎.深刻领会重大意义,科学指导办学实践[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29]程洪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维度论析[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2019(11).
- [30]郭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意蕴[J].观察与思考,2019(2).
- [31]冯立刚,姜文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性思考[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2).
- [32]唐文玲,张林峰.新时代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14).
- [33]冀素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道路思想的四重逻辑[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15).
- [34]陈聚芳.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发展方略的深刻把握[J].科学社会主义,2019(3).
- [35][36]祁凤华,陈聚芳等.习近平新时代战略机遇期思想探析[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6).
- [37][38]李新市.论习近平新时代战略机遇观[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1).
- [39]武东生,刘朝阁.论习近平的时代新人观[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9(1).
- [40][41]刘朝阁.时代新人的思想内涵及培育机制[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27).
- [42][45][46][47]白太辉,陈聚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J].世纪桥,2019(4).
- [43]沙占华,冯雪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多维探究[J].沈阳干部学刊,2019(1).
- [44][48]王小玲.深刻领会并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N].中国环境保护报,2019-09-24.
- [49]魏四海,牟永福.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N].河北日报,2019-01-30.
- [50]刘丽.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N].河北党校报,2019-03-20.
- [51]张雪.邓小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9(11).
- [52]郭培培,曹海霞.习近平民生观的主要内涵与时代价值[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1).
- [53]沙占华,冯雪艳.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民生观的形成理论与思维方法探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9(5).
- [54]范拥军.试论新时代民生建设的战略布局[J].邢台学院学报,2019(4).
- [55]扈红英.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研究综述与意义挖掘[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9(1).
- [56]斯琴格日乐.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逻辑体系与时代价值[J].科学社会主义,2019(4).
- [57]代洪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与当代价值[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58]赵学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J].探索,2019(2).
- [59]黄云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传统世界格局逻辑的超越[J].社会科学家,2019(7).
- [60]张婧瑶,苗林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策略分析[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19(8).
- [61]张青卫,韩兴武.正确义利观是新时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6).
- [62]张青卫,韩兴武.树立新时代正确义利观的哲学思考[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9(1).
- [63]程洪宝,杜旭宇.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逻辑[J].武警学院学报,2019(5).

- [64]周骥,杨振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边海空防思想浅析[J].武警学院学报,2019(3).
- [65]李新市.习近平新时代社会实践观的本质特征及其意义[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9(3).
- [66]李新市.习近平新时代辩证思维方法述要[J].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5).
- [67][68]魏彤儒,廉旭.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担当精神培育问题研究[J].宜春学院学报,2019(4).
- [69][72]陈洁.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N].河北党校报,2019-01-05.
- [70][75]孙晓梅.文化自信视域下的文化认同培育问题思考[J].武警学院学报,2019(7).
- [71]贾玉娥.文化自信:新中国成立70年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A].新中国70年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73]周美娟.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增强文化自信[J].人民论坛,2019(1).
- [74]王天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个层面[J].人民论坛,2019(10).
- [76][77]张春艳,郭岩峰.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幸福的内在逻辑[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8).
- [78][82]周振国.人民创造着共和国辉煌的历史伟业[J].共产党员,2019(6).
- [79]徐淑贞.深刻理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J].党建,2019(3).
- [80]康振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J].共产党员,2019(7).
- [81]周振国.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N].河北日报,2019-12-11.
- [83]田海舰.深刻理解伟大改革开放精神[J].共产党员,2019(6).
- [84]吴耀明.如何理解改革开放40年迎来了“三个伟大飞跃”[J].学习月刊,2019(3).
- [85]杨东广.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N].河北日报,2019-01-23.
- [86]颜廷标.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这条强国富民之路[N].河北日报,2019-07-31.
- [87]姚思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的改革开放及其制度保障[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 [88]李素霞,冯艳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N].光明日报,2019-08-06.
- [89]王彦坤.辩证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J].实践(思想理论版),2019(9).
- [90]花永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与启示[N].河北党校报,2019-05-20.
- [91]刘丽.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演进与深刻启示[N].河北党校报,2019-06-20.
- [92]宋彦民.我国现代化建设伟大进程的演进及启示[J].长春大学学报,2019(1).
- [93]王聚芹.中国崛起的历史性跨越及其当代价值[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94]李辉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N].河北党校报,2019-06-05.
- [95]康振海.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N].河北日报,2019-12-04.
- [96]李鉴修.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11.
- [97][99]康振海.准确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24.
- [98]王彦坤.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河北日报,2019-11-22.
- [100]黄云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构的逻辑基础[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101]周振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N].河北日报,2019-10-16.
- [102]康振海.以奋斗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N].河北日报,2019-10-09.
- [103]田海舰.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精神文明研究

郑英霞 鲍志伦

2019年,精神文明研究领域的成果颇丰。河北专家学者围绕学科发展,对精神文明这一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并结合当年社会发展现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学术规范、价值准则、人文精神和创新意识的范本。

一、精神文明理论研究

(一)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包涵四层意思: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孟祥林认为,四层思想需要转变人们的实际行动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让每个人都成为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和受益者。社会环境的养成一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强化舆论宣传和教育引导;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状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机制。为此需要做到:以科学精神培养优秀人才;以创业精神激励奋发图强;以爱国精神引导甘于奉献;以正义精神明辨荣耻界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浓缩和升华,具有主导性、普遍性和包容性,反映了人民普遍的价值诉求。^[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观念,是对我国新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的根本表达,是我国人民在价值观形成和引导过程中的根本指导思想。於素兰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广泛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多项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资源问题,认为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对全体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贡献了重要思想资源。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思想资源的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还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坚持自己基本立场和观点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批判借鉴和吸收。^[2]

王琨媛、冯立刚和黄耀宇认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意味着要通过“三全育人”的过程在教师和学生群体中树立牢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把这一理念落到实处,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新思路。第一,在全程育人中,首要就是与教学过程相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抓好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理念创新,利用好思想政治课这一主渠道;抓好“课程思政”,实现课堂教学育人的全覆盖;推进“第二课堂”隐性课程开发,实现大学历程的全渗透。第二,在全员育人中,要抓住教师和其他服务人员这一关键,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在对学校党委、行政的管理人员,学院(系部)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学生工作人员、教辅人员的管理过程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策略;在对提供后勤保障的服务人员管理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策略。第三,在全方位育人中,除了教学工作,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内容多样,从学生素质测评到奖学金评定、从宿舍管理到日常行为规范、从学校学习到社会实践等各个环节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载体,尤其要抓好校规校纪和校园文化建设这些载体。^[3]

袁秀认为,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理论来源上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形态,二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孕育形成的精神产品。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我党在革命斗争、和平建设过程中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去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都是将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对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融入具体实践当中,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在对待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态度。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孕育、形成正是立足我国国情,借鉴有益的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而不断发展的。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讲,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前提和坚实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红色文化的传承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红色文化的创新与发展。^[4]

郑建华、刘雅俊认为,高校重构核心价值观教育路径需要做到以人为本,同时也是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础前提,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切入点。外部客观要求逐步内化为主观需求的过程,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路径,教育主体在实践中不断形成价值认同感,将外部因素逐渐内化为自身素养。在重构核心价值观教育路径的过程中,应充分保证高校学生的主体地位,保障学生权益,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念。同时,给予学生正确引导和规范教授是高校学生核心价值观形成和教育的基础。因此,在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重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及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积极自觉参与到教育中来。同时,强化学生自我教育,让学生在实践中自主选择价值观念,进

而对所选目标坚定不移,使学生核心素养契合时代发展需求。在重构过程中,构建具有可行性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路径,促进学生将个人价值观与社会发展相融合,在多元价值观念中寻找平衡,形成正确的核心价值观。^[5]

王建洲、周春燕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研究生“双创”教育是以“双创”教育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为载体,在对“双创”教育过程和主要环节进行系统解读、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要素嵌入“双创”教育的理论环节和实践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类课程教学为路径,将关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内涵融进教材、带进课堂,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作为现代化强国的基本特征引领“双创”教育目标,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治理理念明晰“双创”社会责任,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塑造“双创”完美人格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研究生“双创”品质的逐步养成。而在实践过程中,检视和对比研究生的道德品质、思想观念层面的偏差,进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矫正。^[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在价值诉求、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价值引领,同时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载体支撑。为此,可从路径实现二者的融合。陈艳梅、都三强和杨萍等认为,第一,融入教育机制,加强顶层设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创新创业教育二者融合,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的长效育人机制。第二,融入教育客体,强化情感认同。创新创业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在尊重大学生自由和个性的前提下,强化情感认同,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家国情怀。第三,融入活动载体,养成行为习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仅凭简单的标语口号宣传,要在身体力行中感悟、体会。第四,融入师资队伍,坚定理想信念。第五,融入教学理念,勇担历史重任。第六,融入教学环节,注重价值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创新创业教学,就是要做

到:进课程、进教材、进课堂、进实践。^[7]

信息方面的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和多媒体的发展,对大学生价值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刻,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影响也在不断深化。张杨认为,互联网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带来的机遇。第一,核心价值观的辐射力、感染力及吸引力等在“互联网+”时代得到提升。“互联网+”与教育行业的融合,可直接为教师与学生提供相应的“互联网+教育”平台,能够使学生对价值观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第二,移动互联网将推动高校思政教育的数字化革命,伴随移动互联网5G时代的开启,在信息与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与微博、微信等当前广泛应用的移动网络社交工具一样,借助智能手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将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8]

杨福忠认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法律法规体现着鲜明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旨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法律规范、贯穿法治实践,以此体现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公民的价值准则。从技术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不是简单地在法律条文中加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而是借助一定的法律概念、法律条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以权利、义务、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变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进而实现良法善治。^[9]

(二)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李建英、马倩和张纯然认为,秦皇岛的传统文化主要有三种:第一,秦皇文化。秦皇岛是因秦始皇而得名的城市,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因皇帝而得名的城市。秦皇岛的市标——“秦皇爵”也是基于此典故设计,该标志以汉字“秦”的秦代古隶书进行演变,将“秦”字与“秦皇爵”的造型完美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第二,长城文化。在秦皇岛地域文化发展进程中,长城影响下的民族民间文化,是传承、接续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长城精神也作为城市人文精神提升的核心而存在着。第三,民俗文化。秦皇岛有很多别具一格的民俗文化,大致可以分为节日庙会、小吃特产、曲艺表演等几

类,内含着其艺术价值和蕴含其中的人文情怀。^[10]

李清章、苏平平和闫运格认为,具有丰厚传统的河北,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主要表现为五方面:第一,传承红色基因,补足精神之钙。要对红色文化中理想信念坚定、坚定听党话的政治定力,不避困难、敢于创新思维的亮剑精神;百折不摧、矢志为民的宗旨情怀进行精心提炼,成为繁荣河北的精神之钙。第二,选贤与能,论德而定次。在河北省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贤人政治思想,非常重视德、能、赏、罚的辩证关系。第三,刑政平而礼义备,反对不教而诛。必须重视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法律基因,并结合实践将之融入河北省法治理念之中,这必将为依法治省提供有益的启示,在实践中焕发出“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第四,重视民俗文化,保持情感血脉。在发展区域文化中,必须对颇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继承和革新,使之焕发出新的流动力。第五,重视河北省丰富的家训文化传统资源,传承家国情怀。^[11]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王天彤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完成创造性转化、实现创新性发展,就必须树立科学的继承发展观。首先,在器物方面,要融入文化产业化的现代观念,盘活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让优秀传统文化迸发出新的活力。其次,在制度方面,一方面,我们要用不断完善的制度保障人们在生活中的权利、义务;另一方面,要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挖掘其时代价值,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最后,在思想方面,要紧抓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真正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文化感召力增强民族凝聚力。^[12]

王小丽、勾正刚认为,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对高校立德树人过程中“文以养德、涵育品格”具有重要的价值引导功能。第一,推动大学生勇担历史使命。使命感是一个人奋发有为的内在驱动力,也是追梦路上面对荆棘丛生而坚守的强劲支撑力。第二,指引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取向,积淀崇高精神追求。深入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与价值必然对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淀精神追求提供价值与精神引领。第三,助益

大学生完善道德人格。挖掘阐释传统文化内涵的现代转化,结合古今先贤榜样作用对大学生进行渗透熏染,对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完善大有裨益。第四,陶冶大学生性情,启迪大学生处世立命智慧。^[13]

二、精神文明实践研究

(一)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邓小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涵丰富,张雪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第一,目的是绿化祖国造福后代。1982年邓小平在全军植树造林表彰大会上的题词中,在1983年的兰州部队规划中,在1983年义务植树时,在1991年全民义务植树第10年时,都提到了要绿化祖国,造福子孙后代。第二,要义是开发资源节约使用。邓小平为了解决中国人多能源少的问题,他从开源节流的角度部署,既要开发资源,又要节约使用。第三,思路是深化改革协调发展。针对一些企业只注重经济效益不注重保护环境的情况,邓小平认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协调发展来解决。并强调既要保护好古城,又要做好市政建设。第四,要求是综合考虑标本兼治。邓小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系统而深刻,他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扎实而卓有成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14]

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一项宏观工程。面对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发展受限,我们须把它放在历史的高度上去看待它,融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持续健康发展。白太辉、陈聚芳认为,搞好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我们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践行。第一,引导人民自觉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生态文明建设的治本之策在于人,而人的关键在其价值观念。第二,坚持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从发展的长远来看,我们必须加大保护力度,让环境休养生息,实现工业文明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第三,优化土地开发新格局。生态建设必须依靠必要的国土资源,土地是我们安身立命的载体,要加大大有限土地的开发与规划。第四,加强生态文明的体制建设,体制建设要符合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做到科学合理,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的长效性和有效性。^[15]

王小玲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实践耦合的路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着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加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专题的培训力度,使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四大建设中,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二是着力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民行动体系。要构建各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持续营造“生态文明人民建,建好生态文明人民享”的全民共建生态文明大格局。三是着力构建“生态环保铁军”的正向激励机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的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为基本遵循,切实为环保干部改革创新、担当作为系上“安全带”。四是着力打造“两山”地方创新实践的中国样板。需要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打造适合各类情况、可以复制和推广的“两山”地方创新实践的中国样板,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指导和借鉴。^[16]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辟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新境界。魏四海、牟永福认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一是树立生态红线意识,构筑繁荣先进的生态文化体系。二是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构筑良性循环的生态安全体系。生态产品是维系生态安全、发挥生态功能的自然要素。必须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三是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构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从资源使用的源头抓起,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建立绿色低碳循环产业经济体系。四是建立科学的GDP考核机制,构筑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17]

沙占华、冯雪艳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习近平在谈及新农村建设、城市建设时,多次强调了要吸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在中共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在省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孔子、荀子等的生态思想,提出“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品格和民族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我们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18]

刘书越、王少军和杨春娟等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要求的社会形态。它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人与自然相和谐的途径,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保证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的方式,构建社会制度,谋求文明进步和人类幸福。它最终要通过社会建设落在实处。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社会的责任,社会力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持,社会环保组织、社会企业、公众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成果的分享者。要通过加强社会环保组织建设、促进公众环保参与,将生态文明价值理念融入社会建设,打造生态文明社会。要推动工作生活和消费方式向生态化转型,让生态价值观融入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建设生态文明社会。^[19]

(二) 关于农村文化建设实践

在农耕文化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孝文化、勤文化、俭文化等都有深厚的积淀,这些农耕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都应该得到传承和保护。李婷花、李关亮认为,结合时代的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打造乡风文明的新气象、新局面。一是加强道德建设,建立长效机制。二是保护利用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优秀的民间文化;重建村镇文化模式,强化本村镇的文化特点、文化符号,努

力使本村镇在文化上有独特之处,走特色化、品牌化的道路。三是适时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四是政府要加大文化建设投入,健全村镇文化体系,尤其是公共文化系统的建设,离不开政府资金和人才的投入。五是政府要加大文化公共产品的供给,要鼓励有能力、有热情的文化志愿者,创新本村镇的文化形式,鼓励创作反映本村镇生活的文化作品,与新时代相适应,寓知识于文化作品中,进而提高村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六是日常性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把本村镇的文化活动开展起来,使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20]

陈静、栾文敬认为,乡土文化振兴蕴涵“孝治”“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家风家德建设、社区保障的完善以及乡村养老文化的重塑。乡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记忆既是家风家德建设的纽带,也是乡土文明的根系;根植在乡村留守老人生活记忆中的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变迁,也是对乡风乡俗的深刻体悟与活态传承。孝文化家庭传承的断裂、社会养老文化变迁和家庭照料机制的变化是留守老人生活困境的深层成因。关注和完善乡村留守老人精神支持网络的构建,具体应从家庭亲情关怀、社区互助关怀、社会道德关怀和老年人自我关怀四个层面给予社会关怀,帮助乡村留守老人远离孤寂和减少对走向生命尽头的恐惧感。第一,家庭亲情关怀是指家庭成员在物质反哺老年人的同时,应注重日常生活交流中的言语、行动所给予留守老人的精神支持和慰藉,家庭亲情关怀应以孝道为轴心。第二,社区通过邻里互助网络构建和空间设施规划建设,营造留守老人出行的便利环境。第三,社会道德关怀是源于生命平等的关怀制度伦理,通过营造尊老、养老、爱老的道德文化和构建诸如临终关怀,社区护理等社会关怀政策保障老年人精神和照料需求的满足。第四,老年人自我关怀是老年人知法、懂法和依法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生存必备技能和素质,也是老年人对生命过程的理解,对家庭和社会的关爱。^[21]

(三) 关于城市文化建设实践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提高邢台城市形象和综合竞争力,加强城市管理,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美誉度、知名度,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费凌婕认为,为使邢台早日进入全国文明城市的行列,

主要有七种解决对策。第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对创城战略意义的认识,把创城上升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作为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牢牢地抓在手上,进行部署安排,督导创建工作。第二,加快创城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形成责任落实机制、督查督导机制、强化激励约束。第三,营造全民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加强宣传,调动全市各级各单位发挥各自优势,组织各方力量参与“创城”实践,形成合力。第四,切实保障经费投入。第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市场秩序。第六,着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第七,在创城工作中要紧紧依托本地历史文化积淀,融入时代特色,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培养市民生活在邢台的荣誉感,加强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和利用。^[22]

侯静、陈健和何煜婷认为,语言文化建设对提升廊坊的城市形象,提高公民的语言服务技能和语言文化素养,打造精神强市、文明廊坊、美丽廊坊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语言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助于营造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和内外部环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推进廊坊经济健康发展。规范公共场合语言文字的使用,营造文明语言环境。一方面,政府应重视城市的语言文化环境建设,成立专门的部门加强对公共场所语言的管理和规范,制定相关条例监督和维护语言文化环境,营造健康良好的语言环境,提升廊坊的文明形象。另一方面,加大语言文明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语言文明的自觉意识。重视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助推廊坊经济发展。增强语言服务意识,提升行业服务人员的语言服务技能,加快廊坊国际化建设的进程。^[23]

城市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核心表达方式,是城市血液中流淌着的信息,承载着历史、价值观念、风土人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王静、付蕊和李冬媛等认为,要以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为纽带,提高秦皇岛的国际影响力。一是明确城市定位,科学规划设计。在规划中,要注重差异性,精准定位,实现高水平发展;要尽快制订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行动纲要,指导国际化进程。二是保护、传承历史、文化传统。要加强对于传统历史和文化的保护,并加大宣传和普及力度。普及的对象是本地的市民、本地高校学生和留学生。三是更新文化观念,建立

包容的人文环境。要加强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形成丰富的多元文化内涵。四是提升公共文明水平。五是深化城市对外开放和交往,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六是通过“大事件”,树立城市文化形象,提高美誉度。〔24〕

(四) 关于红色文化建设实践

红色基因不仅包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还包括共产党人的意志品质和道德风范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赓续,开辟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境界,而且还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升华。朱文通认为,在新时代,面对新问题、新机遇和新挑战,需要我们持之以恒传承红色基因,把红色文化基因所蕴含的革命精神、价值观念等发扬光大,让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持之以恒传承红色基因,第一,要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第二,要深入发掘红色资源、红色传统的时代价值,让红色基因永葆活力;第三,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四,要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既要理直气壮地与恶意抹黑、歪曲党史国史的各种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对历史虚无主义给予毫不留情地批判,又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始终站稳政治立场,理直气壮地开展红色教育,不断创新宣传方式和手段,使红色文化、优良传统更好地深入人心。〔25〕

曹海霞认为,红色文化资源是提升党性教育实效性的独特资源。对于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优良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保证了党性教育的政治方向。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着我党的优良传统,朴实的为民情怀,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这些优良的文化基因保证了党性教育的政治方向,为开展党性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红色文化资源为党性教育提供新的途径与方式。党性教育最佳方式就是把课堂放置于红色文化资源现场,让学员在互动式体验教学过程中,感受每一张历史图片背后的故事,了解每一件文物承载的革命文化,弄懂每一处历史遗迹背后彰显的民族精神,通过视觉的冲击,亲身的实践,能从具体实物中感受到精神的启迪,收到良好党性教育效果。〔26〕

红色文化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和价值是当今社会发展的瑰宝。李亚林、张洋认为,高校作为培养新时代人才的摇篮,应当要加强对红色文化的利用,借助红色文化来加强育人体系的构建。第一,把握红色文化育人的“时”。高校应当将红色文化融入到德育课程中,同时也将红色文化融入到实践活动中,做到“与事同步”,并开设红色文化通识选修课。第二,把握红色文化育人的“地”。既立足于地域优势,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也要连接校内外体现红色文化资源的连接,形成红色文化育人的长效机制。与此同时,汇集文化资源素材,丰富高校育人实践的红色资源库。第三,把握红色文化育人的“人”。高校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并注重学生的教育。〔27〕

(五) 关于诚信文化建设实践

蔺俊萍认为,诚信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第一,诚信建设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主体的诚信道德素养。加强诚信道德建设有助于公民道德水平的整体提高,通过诚信道德建设,提高政府官员的诚信道德素养,使他们能够形成道德自律,自觉做到讲诚信、守诺言,最终获得群众的信任,达到干群之间有效沟通与合作,提高社会治理效率。诚信道德建设也有助于公民道德素养的整体提高。第二,诚信建设有助于提供一个好的国家治理环境。通过加强社会诚信法律法规体系、社会诚信规章体系、社会诚信评价制度体系和社会诚信宣教制度体系等方面的建设,规范和约束社会主体的行为,减少社会矛盾和摩擦,创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社会环境,促进国家治理的有序推进。第三,诚信建设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弥补治理不足。〔28〕

(六) 关于家风文化建设实践

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家庭文化与养老文化的优秀成分,以期重构家庭文化,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提供文化支持。吕红平认为,要在正确认识家庭文化与家庭养老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支持农村家庭养老的新型家庭文化,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应当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高度重视家庭文化建设,夯实农村家庭养老的思想文化基础。在构建新型家庭文化过程中,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的优

秀成分,摒弃不合时宜的消极元素,结合时代特点,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形成尊老敬老养老是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孝老光荣和不孝可耻的社会文化氛围。其次,加强支持家庭养老的制度文化建设,形成对家庭养老的政策支持和制度约束。在具体的支持性政策方面需要做出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和具体谋划,也要制定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针对不孝子女和对父母实施家庭暴力的子女的惩罚措施,从制度上约束和规范人们的孝行。再次,注重村规民约建设和邻里互动,强化对家庭养老的民间约束与监督。在新时代,村规民约应当反映新时代特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髓,起到凝聚民心、净化民风、促进家庭和谐、振兴乡村发展的作用。最后,强化社会舆论作用,做好表彰孝行模范、鞭笞不孝子女的工作,形成有利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社会文化氛围。^[29]

三、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与时代精神研究

(一) 关于理想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不会凭空而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在真学真信上下功夫,夯实思想根基,把学习成果转化成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张勇认为,一是要在真学上下功夫。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基础。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要在真信上下功夫。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远大理想。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必须挺起精神脊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心中闪耀,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三是要在笃行上下功夫。对党忠诚,是理想信念坚定的根本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忠诚干净担当,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30]

(二) 关于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高度认同。陈洁认为,第一,弘扬家国情怀,就要把爱国和爱家统一起来。家是国的基础,国

是家的延伸。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就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第二,弘扬家国情怀,就要注重家风建设,弘扬优良家风,自觉将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感共融互通,积极传承弘扬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爱国爱家、向上向善、无私奉献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推动形成融洽和谐的家庭关系,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涵养全社会的好风气。第三,弘扬家国情怀,就要敢于担当担责。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前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依,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每个人都要敢于担当、主动奉献,至死不渝,这是一种对于国家、民族的大爱,也是真正的家国情怀。第四,弘扬家国情怀,就要爱国奉献。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大力弘扬爱国奉献精神,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用拼搏和奋斗书写属于我们的时代辉煌。^[31]

(三) 关于航天精神

张凯、赵津和赵鑫认为,航天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是对航天精神的高度概括。航天事业的发展浓缩出航天精神,也是时代精神。航天精神文化是一种长久时间积淀的高层面精神文化,航天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构成,是实现航天梦、中国梦的宝贵精神财富。航天精神变成了一种思想教育中的上进、勤奋、爱国精神,使命担当新时代、青春共筑中国梦,在以弘扬航天精神为途径增强大学生家国情怀和爱国意识。航天精神是一代代航天人传承下来的勇于攀登迎难而上的高贵的品质,是给予有限的科技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探索科学最高境界的崇高行为,航天精神对于当前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动态提供了生动、形象的范例,对青年学生的价值观有很强的示范指导意义。^[32]

(四) 关于抗震精神

唐山抗震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杨立元、杨春认为,它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唐山抗震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公而忘私的精神。在抗震救灾中,唐山广大党员干部用大公无

私、公而忘私精神，践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在大地震的废墟上处处闪烁着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党性光辉，使得克己奉公、清廉务实的廉洁风范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工作中得到全面展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至高利益的高风亮节。第二，唐山抗震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患难与共的精神。患难与共是唐山抗震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第三，唐山抗震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说：“40年前的大地震虽然摧毁了一个城市，但没有摧毁唐山人民和全国军民的坚强意志。”“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上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第四，唐山抗震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精神。勇往直前、无私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唐山精神的具体体现。^[33]

李娜认为，大学是对学生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进行提升的重要环节，因此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适当融合唐山抗震精神，不仅能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还可以实现对民族精神的有效传承。一是抗震救灾精神为构建和谐校园文化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发展方向。高校在对校园文化进行建设环节中，尤其是要发挥唐山大地震中形成的抗震救灾精神，在不断创新与思想理念继承中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进一步体现和发挥抗震救灾工作中的导向性作用和育人优势。二是抗震救灾精神为构建和谐校园文化提供了全新的教育实践内容。在唐山大地震后，我国又相继经历过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地震，在这些自然灾害面前，人民群众所展现出的抗震救灾精神都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了影响。因此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工作中，我们也要充分融合抗震救灾精神，进一步提升校园文化精神的吸引力和凝聚力。^[34]

（五）关于担当精神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担当精神的特点可以归结为立足中国、着眼世界、着力创新、实干兴邦。魏彤儒、廉旭认为，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担当精神首先是青年成长的基本指向。当前我们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青年肩负历史重任，青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实现。青年的发展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担当精神的科学指导，一方面，这有利于青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为青年的成长提供方向和动力，使青年能在各种错误思想的冲击下保持正确的努力方向，拒绝各种诱惑，艰苦奋斗，砥砺前行。能够把个人的成长进步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联系起来，在不断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担当精神有助于青年清楚的认识前进的道路。其次，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担当精神是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激励着青年持之以恒的去奋斗，不畏艰难、砥砺前行，担当起国家时代赋予的使命，既是追梦者，也要成为圆梦人，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并用实际行动促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现实。^[35]

（六）关于改革开放精神

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思想成果。田海舰认为，第一，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是当代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集中写照，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第二，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具有必然的认识逻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基于对世界格局和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特别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有着必然的认识逻辑。第三，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第四，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改革开放不停步，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华民族正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36]

（七）关于“赶考”精神

70年前，毛泽东同志离开西柏坡时提出了著名的“赶考”命题。争取考出好成绩，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执政“赶考”的永恒考题。田海舰认为，第一，“赶考”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

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到为世界谋大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始终深植于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基因,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了谁”的问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是共产党人始终坚守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第二,“赶考”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坚持群众史观、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不坚持这样的初心和使命,就不能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第三,“赶考”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我们党的历史本质上就是实现这个初心、完成这个使命的历史,是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第四,“赶考”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除病祛疾、固本培元、解决好党员领导干部“总开关”问题的良药,是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是把党建设好建设强、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实现“四自”和党的历史使命、使党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37]

“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张兆平、任文青认为,新时代,“赶考”精神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有着新的丰富和发展,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以人民为中心。当代中国的发展就要“围绕着人民群众这一主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以人民群众的呼声为方向,以人民群众的标准为标准,以人民群众的满意为满意”,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第二,励精图治、实干兴邦。面对新时代的“考题”,坚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秉承励精图治、拼搏进取的精神,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才能“考出”好成绩,有一张令人民满意的答卷。第三,从严治党。在新时代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代表着人民群众利益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证的政党。第四,依法执政。新时代,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对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提出新要求,必然要求我们实行依法执政。依法执政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执政方式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方式的丰富与发展。^[38]

“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节点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邵文英认为,“赶考”精神是一个科学的逻辑体系,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理论品质,表现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人民利益至上的为民精神、敢于斗争的进取精神、艰苦奋斗的廉洁自律精神。“赶考”在建国初期透露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执政自信,“赶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关于“赶考”精神与党风廉政建设的联系,主要围绕传承“赶考”精神的信仰价值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思想保障,传承“赶考”精神的民本价值为党风廉政建设凝聚中国力量,传承“赶考”精神的创新价值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精神支撑等三方面做了分析。^[39]

(八) 关于西柏坡精神

王彦坤认为,西柏坡时期的伟大实践,不仅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还孕育形成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为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面对革命即将胜利的新形势、新任务、新变化,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新时代履行新使命、应对新挑战、完成新任务需要继续弘扬西柏坡精神,通过广泛宣传、红色传承、党性教育、建功立业在新时代把西柏坡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40]

(郑英霞、鲍志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 [1] 孟祥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维度、实践要求与激励动因[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9(2).

- [2] 於素兰.习近平关于如何加强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的论述[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3).
- [3] 王琨媛,冯立刚,黄耀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策略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23).
- [4] 袁秀.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向性思考[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5).
- [5] 郑建华,刘雅俊.核心价值观与高校思想政治重构研究[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7).
- [6] 王建洲,周春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研究生“双创”教育机理与途径探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7] 陈艳梅,都三强,杨萍,庞亚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研究[J].教育观察,2019(7).
- [8] 张杨.“互联网+”视角下的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J].新闻研究导刊,2019(10).
- [9] 杨福忠.推动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机制构建[N].河北日报,2019-5-29.
- [10] 李建英,马倩,张纯然.“互联网+”视野下秦皇岛传统文化传承的策略研究[J].办公自动化,2019(4).
- [11] 李清章,苏平平,闫运格.河北省优秀传统文化的近期偏好、现代阐释和愿景设计[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12] 王天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个层面[J].人民论坛,2019(1).
- [13] 王小丽,勾正刚.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高校立德树人的价值功用与实现途径[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9).
- [14] 张雪.邓小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9(11).
- [15] 白太辉,陈聚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J].世纪桥,2019(4).
- [16] 王小玲.深刻领会并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N].中国环境报,2019-9-24.
- [17] 魏四海,牟永福.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N].学习时报,2019-2-2.
- [18] 沙占华,冯雪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多维探究[J].沈阳干部学刊,2019(2).
- [19] 刘书越.读懂生态文明范例——塞罕坝告诉我们什么?[M].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04.
- [20] 李婷花,李美亮.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邢台市村镇文化建设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9(12).
- [21] 陈静,栾文敬.变化中的孝悌:乡土文化振兴视域下留守老人的生活记忆和社会关怀研究——基于H省T村的口述史分析[J].兰州学刊,2019(6).
- [22] 费凌婕.邢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邢台学院学报,2019(2).
- [23] 侯静,陈健,何煜婷.基于廊坊文明城市建设的语言文化发展策略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9(1).
- [24] 王静,付蕊,李冬媛,张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加速秦皇岛国际化进程[J].国际公关,2019(3).
- [25] 朱文通.持之以恒传承红色基因[N].河北日报,2019-7-3.
- [26] 曹海霞.红色文化资源在党性教育中的开发与运用研究[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9(1).
- [27] 李亚林,张洋.河北高校红色文化育人体系构建研究[J].智库时代,2019(5).
- [28] 蔺俊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诚信建设[J].新疆社科论坛,2019(8).
- [29] 吕红平.农村家庭养老的家庭文化构建研究[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9(3).
- [30] 张勇.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N].河北日报,2019-3-22.
- [31] 陈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N].河北日报,2019-3-1.
- [32] 张凯,赵津,赵鑫,于博.航天精神对高校学生思想引领路径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9(4).
- [33] 杨立元,杨春.唐山抗震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J].红旗文稿,2019(7).
- [34] 李娜.唐山抗震精神与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J].传播力研究,2019(7).
- [35] 魏彤儒,廉旭.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担当精神培育问题探究[J].宜春学院学报,2019(4).
- [36] 田海舰.深刻理解伟大改革开放精神[J].共产党员,2019(3).
- [37] 田海舰.“赶考”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J].共产党员,2019(7).
- [38] 张兆平,任文青.“赶考”精神的时代价值[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19(9).
- [39] 邵文英.“赶考”精神与党风廉政建设[J].党史博采,2019(11).
- [40] 王彦坤.西柏坡精神: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N].河北日报,2019-4-17.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田海舰

2019年度河北省思想政治教育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历程和规律,在基础理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方面展开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果,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基础研究仍显薄弱,应用研究有待深入,研究视野略显偏狭,创新性需要加强,标志性论著缺乏。

一、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

刘朝阁认为,宣传、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深入分析两者的内涵、相互关系对于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宣传、教育的基本内涵各有侧重,两者又存在着紧密联系、对象差异、层次不同、统一于利益等四重关系。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突出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宏观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立德树人,全面提升微观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精准把握新时代人们的利益,全力服务于人们实现美好生活。^[1]

李秀红、张云飞认为,高校需要加以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涉及高等教育教学的培养目标,“怎样培养人”涉及高等教育教学的培养方法和工作重点,“为谁培养人”涉及高等教育教学的培养目的,“培养什么人”与“怎样培养人”最终要落实于“为谁培养人”。要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紧紧抓住“立德树人”这一中心环节。“立德树人”第一个层面是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第二个层面是对于学生的要求,即学生要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谁的思想、什么政治、如何工作。要落实主线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最终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总体目标。^[2]

郎琦认为,相对于现实来说,虚拟属于个体现实生存的映射,更是个体活动模式与内容在现实中的扩展和延伸。在教育层面上,虚拟并非是虚无缥缈之无妄存在,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全新的生存环境不但会影响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对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和教育生态环境也会形成冲击,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但同时要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应对这种挑战,积极探索基于虚拟生存环境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径。要培养感性交往能力,即提升理解并使用感性化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可以在虚拟生存环境中借助内隐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借助借代、隐喻等形式得以表达;要构建双主体教育模式,思想政治教师不仅要通过课堂讲解知识,还要借助智能手机或者移动网络终端对讲课内容进行补充;强化人生价值观引导,全面强化对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对这一群体的引导力。^[3]

董硕玲、陈有为以个人主体为对象,以主客兼体为根本,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主客体关系作了具体的理论阐释。在阐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统一规范、大班讲授、实践尴尬三个现实特点的基础上,论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教学策略关系的三层演进:从教师真信真会真教、学生入耳入脑入心的教学目标到教师主导主体、学生客体主体化的教学过程,再到教是为了不用教、学是为了会自学的教学规律,进而得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教学策略关系要实现师生双中心匹配、教学方案匹配和双向选择匹配,以期提升教学实效。^[4]

龚志军等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青年工作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丰富的科学蕴含。首先,蕴含着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战略判断。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是由当代青年的历史地位和崇高使命决定的,同时还是由当代青年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决定。其次,蕴含着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内容的深刻阐释。从根本目的、培养目标以及基本任务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进行了科学阐释。根据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的深刻变化,为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赋予了全新意涵。再次,蕴含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场域和教育方法的有益探索。指出高校和社会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最为主要的实践场域;强调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更加注重发挥实践锻炼的重要作用;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在引导广大青年崇德

修身的同时为他们树立学习榜样、先进典型；当代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彻底的科学性、浓厚的民族性、鲜明的政治性、突出的实践性等鲜明理论特征。^[5]

刘朝阁认为，时代新人不是一个宽泛概念，而具有特定意蕴。准确把握时代新人思想是全面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切入视角。时代新人思想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从社会历史的依靠力量角度论述了人的社会属性。时代新人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实践指向。时代新人思想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指南，明确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提供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遵循，丰富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开阔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思路。时代新人的培育机制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造灵魂，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以齐抓共管提供机制保障，以改革创新增强育人效果。^[6]

王红向认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向人们灌输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却忽视了人的能力和人格的培养，这个方法应该改变，应该重视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有效构建应该高度重视思想主阵地的作用，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努力促进思政课程建设，坚持创新和进取，开创教育事业新局面。她以唐山师范学院为例，认为高校思政课的有效性不足的人学原因是忽视了人学的现实性、实践性、主体性、具体性、综合性原则。高校思政课之有效课堂构建的人学路径有采用小班教学形式，关注大学生的专业性；加强人文关怀，立足于大学生的现实生活；探索以人为本的教育，注重大学的主体性培养；促进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关注大学的个性教育；各个系统有序协调，促进高校思政课良性发展。^[7]

李晶等从护理专业大学生的现实需要和特点出发，对护理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互动模式的建构进行了探讨，认为通过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形式、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转

向而建构的主体互动模式，是提高护理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途径。^[8]

温永强等认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新的特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主导着多元政治思想文化环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为支撑彰显着实效性，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创新发展的能量汲取之源、基础巩固之基。思想政治教育也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要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深刻内涵，切实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准确把握党员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两个教育客体。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式方法上的创新，要善于激发内生动力，唤醒主体意识；要体现人文关怀，加强心理疏导和干预；更要综合各类渠道，形成多方位宣传教育的合力。^[9]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朱凯峰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研究》，^[10]孙军的《现代德育建设与就业规划》，^[11]唐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机构》，^[12]徐彬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与实践》，^[13]徐小慧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理论与方法创新》，^[14]等等。

严淑华认为，新时代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提出新的目标任务，赋予新的工作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迎来重大历史机遇。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承担者，应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根据学校和学生特点，不断探索更加符合实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新路径。她以本校为例，提出通过建设理论研究学术平台将深厚的理论逐步传播给学生、坚持“三灵两动一核心”的基本做法打造灵动课堂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理论需求相结合以及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层级式、多方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把固态化的传统文化与活态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等创新途径。^[15]

梁捍东、牟文谦认为，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既需要努力发挥教师的德行示范作用，又需要不断激发大学生自主践行的内在动力；既需要协同优化高校各种载体，又需要发挥高校之间、高校与家庭、社会、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多方联动作用。所以，积极构建并完善教师德行示范

机制、学生自主践行机制、载体协同优化机制、家校社会政府联动机制等多维一体的实现机制,是推进高校立德树人实践创新、全面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16]

赵洁认为,大数据时代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为了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从国家层面来说,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完善规章制度,为教育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从教育行业来说,要与时俱进,完善教学方式,为行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水平事关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17]她还从新媒体视角出发,分析了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实行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对策,主张实现教师角色转变,创新教学观念及形式,形成完善的考核体系,提高实践教学效果。^[18]

邵东蕊认为,新媒体主导的“微时代”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挑战,要依托新媒体平台,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微媒体”的融合互动。大学生思想政治“微教育”的构建路径和模式主要包括:培育新媒体思政教育网宣精英化队伍,倡导新媒体多元化的思政“微教育”,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微教育”中的主体地位。^[19]她认为,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多元化价值观冲击,教育权威性受到挑战,教育格局正在发生转变。因而,高校要在大学生思想“微教育”中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始终占领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动权,通过多元化的新媒体“微教育”、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新媒体工作队伍,不断创建教育模式、扩充信息资源、拓宽覆盖范围、拉近教育距离、提高育人效果。^[20]

肖丽丽等对 H 省 5 所高校的大学生思想状况进行了调研。首先,从结果分析来看,H 省高校学生思想状况总体上呈现积极向上的状态,学生有理想有追求,积极乐观,同时也存在心理状况脆弱,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具体表现在:政治观日趋理性化,政治立场坚定;生活态度积极向上,但部分学生生命意识淡薄;学习态度坚定,目的明确,但部分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就业观较成熟,但具有一定的“公立性”且呈多元化发展。其次,从造成当前 H 省高校存在问题

的成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视程度不够,课程效果不佳;受现实经济利益行为影响;受互联网的消极影响;家庭教育缺乏。最后,他们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以下建议:要持续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形成“三全”育人的强大合力;要打造学生工作新媒体建设;要加强心理辅导,优化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环境;加快教育教学改革,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发挥家校合作的作用。^[21]

毛燕慧、李陶认为,各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现实影响表现在: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反思与创新,多元化的文化交汇与发展大大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但也为之带来了机遇;冲击并丰富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各种文化对学生身心的影响如何,需要看学校怎么去引导,学生怎么去运用;影响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文化交汇使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错综复杂,这不仅会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也会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对策至关重要,具体包括: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开展师生互动的实践性教学;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与各个学科教学的融合;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共同营造积极向上的精神氛围。^[22]

曹娟娟认为,高校要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精准掌握时代发展的规律,了解大学生学习与生活的真实需求,遵循思想政治工作、大学生成长以及教书育人的规律,在新社会建立起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大学生建立起科学、正确的价值观念,将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将其创新做活。首先,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基础。要不断创新高校思政教育的理念和内容。其次,做“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冲破固有模式的束缚,随时做好遇到新情况、新问题的应对准备。立足于灵活多样,要努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灵活、手段多样、形式多彩、措施得力。最后,贴近大学生生活实际进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要以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和困难为基础的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以及心理疏导,在关注大学生学习的同时,促进身心和谐

发展。^[23]

杨翌认为,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渗透文化自信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理想信念、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要求。在当今社会多元化文化发展的思潮中,大学生更应该坚定文化自信。要运用理论引导法、榜样教育法、活动宣传法、实践体验法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要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尤其是要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认同、不断创新思政教育模式、制定文化自信教育计划、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等路径提高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24]

王小丽等认为,高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育人之间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性。高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新时代的办学育人内涵,提升了办学育人品质,为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卓越人才提供了办学育人模式选择,为培育大学生涵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办学育人路径选择。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育人体系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而终极旨归则是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培育文化自信。^[25]

温永强认为,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问题是新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的新挑战。主观方面的角色定位偏差、自身素质不高、工作理念和方法滞后、发展前景受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合力尚未形成,以及客观方面的管理模式混乱、教育对象复杂化、教育途径局限化,是影响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两方面原因。要通过高校辅导员和高等院校两个方面增强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一方面,高校辅导员要明确自己定位、提高自身素质、创新工作方法的同时,要加强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交流;另一方面,高校要严格选聘标准、改进考核和激励制度、加强对辅导员的培训。^[26]

关彦琦认为,在现代教育中师德师风存在着责任心不强、不注重师德师风建设、处理学生问题方式不合理、过分追求个人利益等问题。因此,一方面要明确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在法律上、政治上、道德上和教育上的内在要求。在法律上,教师要做到知法、懂法,明确自身的职责和定位,用法律鞭策自己不要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政治上,要坚决支持党组织,以党为榜

样,管理好自身的言行举止,要坚决支持党的任何决定,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将党和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落实并执行党的决定和要求;在道德上,不断提升教师的道德素养,让教师在生活和工作中都能严格的要求自己,不要做任何违反师德师风建设的事情;在教育上,教师要不断提升教育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时代性。要通过加强师生之间和谐友好的关系、对教师工作和学生的忠诚与热爱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新时代高校教师的精神风貌;要在高校全面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最后,在加大对师德师风建设的宣传力度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考核力度,从而打造高素质的教师团队,进一步提升我国现代高校的教育水平。^[27]

李陶认为,加强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民心工程、希望工程、社会工程、战略工程,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加强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通过两方面来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提高大学生的自身修养;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推力,加强改善家庭环境、校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28]

郭飞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成才紧密相关。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成才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大学生成才又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时代赋予高校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路径主要有:强化核心价值观教育,树立正确世界观;净化高校育人环境,实现全方位全程育人;应用新媒体创新路径,掌控思想教育话语权;加强思想政治队伍专业化,实现人才培养高质量;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重视人文关怀心理疏导。^[29]

唐朝晖探讨了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态化创新路径,认为在新媒体时代,用生态思

维审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融入和应用生态思维,是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问题的深度思考和积极关注,有助于促进和维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的生态平衡,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思维和研究视野。^[30]

李辉指出,顶岗实习支教既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及时雨”,更是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塑造的“特训营”。新时代背景下优秀教师队伍的建设要求呼唤高质量师范人才储备,尤其需要培养拥有坚定教师职业理想和教育信仰的当代高校师范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我国师资队伍建设和新期待为高校师范生人才培养提供了新契机,也对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提出了新挑战。当前部分高校师范生缺乏对教师职业的理性认知和内心热爱,缺乏对基层教育工作的职业信仰。面对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弱化的问题,顶岗实习成为加强和改进师范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平台和有效载体,成为增强高校师范生良好思想政治素养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高校师范生职业力量的有效路径。^[31]

任莉认为,在大学生中开展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首先要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一个是有形环境建设,另一个是无形环境建设。通过教师对培养学生传统文化素质的影响、作用以及网络环境建设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次,要积极地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在活动地开展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学生的实际,形式要多种多样。最后,要组织开展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活动。可以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区域民族特色以及节日教育相融合。^[32]

邵东蕊认为,第二课堂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发挥第二课堂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要从思想上加强教育,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党建工作着手,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实践出发,增强学生团队建设;从网络平台建设着手,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33]

杜立文等基于协同发展理念,认为京津冀三地高校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化思维、正视差异、优势互补、树立网络思维、搭建区域化思政课教育教学共享平台,从体制改革、环境营造、资源投入、扩大开放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形成区域教学共建合力,促进教学质量共同发展,切

实提高教学实效,达成共赢格局。^[34]

何丹等认为,新时期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亟须解决贫困生所面临的各种心理困境,这也是社会稳定发展、建设平安校园、实现贫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基于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教育队伍不完善、教育方法不当等问题,必须健全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拓宽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35]

申文杰认为,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日常,就要做到以下四点:其一,思想政治工作经常化,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其二,思想政治工作生活化,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其三,思想政治工作具体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其四,思想政治工作精细化,往深处做、往细处做。^[36]他还提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切实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引导作用,就要在增强实效性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亲和力、说服力、感染力,使其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37]

刘朝阁认为,完成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壮大主流舆论的力量,促进全党全社会同心同德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坚持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宣传思想工作要在布局谋篇、具体落实两个方面秉持引导人民、服务人民的理念,把党的关切、人民的关注、具体的任务结合起来,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到具体的实践中,既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提振人民的精神,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工作深入开展,从群众中寻找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党和国家的主张、方针政策、思想理论讲全、讲准、讲透,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聚焦培育时代新人,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成风化人、以文育人,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构建立体化宣传格局,聚焦于培育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运用群众语言开展宣传思想工作,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让人民群众听得懂、乐意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的精品力作,创

作出有理论创新、有中国特色的原创佳作，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搭建对外宣传的窗口。^[38]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柴艳萍提出，巩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果与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样重要。她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立德树人的主渠道，是显性思政教育，不但要理直气壮地开，还要理直气壮地讲，并且要讲好。与此同时，其他课堂教学也是教书育人的主渠道，不能放松。学校要大力加强课程思政，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解决好各类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互配合的问题。这是隐性思政教育，也必须要讲好，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39]

王志清、刘涛认为，高校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创新（以下简称“思政课”）是把握高校教育教学规律，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当下高校思政课仍存在课程结构、教学方法单一、教学理论脱离学生实际、话语亲和力不足等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要通过高校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为思政课程提供根本保证；将优秀传统文化、先进文化、红色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活动中，激发思政课堂的趣味与活力；借助多媒体平台、开展德育教育，推动高校思政课堂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等创新路径，实现高校思政课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40]

魏彤儒、张彤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的功能、外显与影响要素进行了探析，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切实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话语权。而首要的便是明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的内涵并从理论上分析其功能、外显与影响要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具有政治导向、价值取向和文化培育的功能，外显为学生获得感、课堂影响力和课程延展力，在此基础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作用的发挥受教育者、受教育者、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教学管理、育人环境等要素的

影响。^[41]

回娅冬等认为，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深入探究如何采用多种实践教学模式，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根据实践场所的不同，可以分为课堂实践教学、课外校内实践教学和校外实践教学三种模式。课堂实践教学，通过学生讨论、课堂辩论、案例教学等方式，使师生之间实现了良性互动。同时又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内外实践教学，主要是包括参加社团活动和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式。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业余生活，又可以弥补实践经费不足的缺憾。校外实践教学，学生可以通过服务新农村建设、志愿服务、社会实践考察等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充分了解我国的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提高学生的个人素质。^[42]

孟祥林对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可操作性方法进行了思考，认为精细化参与式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修正。这种教学管理方法，完全改变了传统教学理念下仅凭一张期末试卷决定学生成绩的做法，让学生知道，其成绩不仅与期末考试相关，更与课堂上的平时表现相关，从而让学生在整個学期内都保持竞争性的学习状态，营造出良好的课堂氛围。精细化参与式教学适用于任何思政课堂，但对部分教师而言是一种挑战，需要教师能够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应对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热点议题，通过教师个人魅力提升课堂凝聚力，让思政理论真正入耳、入脑、入心。^[43]

李彩旗提出，思政课教学要挖掘适当载体传承民族精神。所谓载体，就是用以承载实体物质或某种价值意义信息的物质。它以此物的形式存在，展现着更为深厚而广阔的背景，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相关联的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就需要这样的载体，凝聚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民族的永续发展。思政课教学，要不断挖掘适当的载体，传道受业解惑，做好民族精神的传承工作，使学生乐于接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利用、挖掘创造适当的载体，就要利用已有的教材中本地英雄人物和红色基地，阐释理论，动人以情；组织学生挖掘未知的本土英雄人物英雄事迹；发挥学生特长，组织学生参与，用多种形式讲故事，再现感人场景和事迹；

结合城市特色,参与生活实践;结合党和国家大事,展望个人前途,营造家国情怀;结合学校活动,展示个人才能,调动学生积极性。^[44]

韩琳琳、杨静如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阵地。但据调查发现,大学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着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方法单一和教学流于形式等问题。在教学中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可以为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设计提供新策略;为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理念拓展新思路;为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增添新方法,从而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提升其吸引力。^[45]

李志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政治航标。改进和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时代课题。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教学还存在诸多问题,诸如理论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方式单一、教师专业素养缺乏等。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现状展开调查和研究,基于调查数据统计归纳和总结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学中的现实问题,有助于明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痛点”以及教学改革的着力点,为深入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提供借鉴和参考。^[46]

康超等借助 Cite Space 文献分析软件和 LDA 主题模型,通过分析、对比 2016 年和 2017 年中国知网相关期刊文献的关键词和文本内容,对“质量年”建设成就中的“导向正了”“取向好了”“风向变了”“气象新了”和“志向大了”等给出了证据性验证;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些规律、新趋势和不足。新趋势主要包括加强“大思政”格局、从细节上提升教学质量和加强与学科专业和特色资源的结合;主要不足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深化精细化不足和量化实证方法等科学方法引入不足。^[47]

闫学军认为,中国式沟通智慧包括诚信为本的沟通基础、动之以情的沟通方法、上下同欲的

沟通目标、换位思考的沟通方式、圆融而通的沟通技巧等,恰当运用这些沟通智慧,对构建和谐的师生环境,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认可度,达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将大有裨益。^[48]

王兆云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是一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性、鲜明通识基础性和突出逻辑性层次性系统性的课程。集政治性、公共性、基础性、理论性于一身,决定着“原理”课教学在选择影视资源时要注意知识论与方向论相结合、概念化与通俗化相结合、部分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相结合。^[49]

苏庆国、赵宏认为,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到基础课教学 and 实践中,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推进“三进”工作的关键环节。他指出,教师应积极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培训,整体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并寻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内容的契合之处,改进和完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真正体会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50]

刘琪认为,“形势与政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在授课过程中运用问题引导的显性方式使学生独立思考,利用课外实践、暑期社会实践等隐性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的引导,这些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新时代,高校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思想引领作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就应该下大力气改善课堂效果,提升学生的获得感。因此,教师就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简单等同于政治教育,在教学中只是采用“填鸭式”的灌输教育,而是应该引导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辩证的思考、批判的思考,要培养学生追本溯源,善于提问的能力,让学生对所学内容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是理解并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内核的必然要求,是抵制意识形态领域中错误思潮、网络或生活中错误理念的有力武器,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感召力、增强教学效果的必备条件。^[51]

肖继新认为,高校思政教师必须具有党性原则,站在正确的立场,始终传播正能量,倡导主旋律,成为我党在教育工作第一战线的坚实力量。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认识到教学中存在的教风、教态、政治素养三大党性问题,加强自身的党性教育、培养爱国爱党情怀。要从高校领导高度重视和思政教师提升自身素养两条路径提高高校政治教师党性。^[52]

李秀玲等认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是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的直接引路人,要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师政治素质工作,就要强化思政课教师的定位意识、提高思政课教师的政治素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的学习并深入实际、不断进行探索创新。^[53]

邹萍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改革依托于新媒介而探究新的教学理念、方法与机制,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协作,充分调动“三螺旋主体”教育能动力量,加强启发式教学、情景式教学、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构建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格局,不断适应经济转型与市场需求,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效果。^[54]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黄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政府建设研究》^[55]和建华的《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研究》^[56],等等。

田海舰认为,70年前,毛泽东同志离开西柏坡时提出了著名的“赶考”命题。争取考出好成绩,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赶考”的永恒考题。“赶考”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坚持群众史观、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赶考”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要征服,依然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才能不迷失方向,牢记使命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57]

王建洲、周春燕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引研究生“双创”教育的“定海神针”。为此,不仅要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研究生“双创”教育的内在实现机理,而且要从基础要

素、多元协同、评估体系等外在层面来探析“嵌入”过程的“立德树人”功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育人目标高度契合、教育内容相通相融、培养模式交叉重合。可从理论信服、情感共鸣、行为外化三个梯度实现对研究生“双创”精神的培育和“双创”行为的指导。理论信服是对教育内容融会贯通的基础阶段,是情感共鸣的前提条件,是行为外化的思想源泉。在这一逻辑框架下,可以从“双创”课程建设、关照职业发展需求、指导“双创”实践三个维度,来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新时代研究生“双创”教育的内在机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研究生“双创”教育的途径为组织、课程、师资等基础要素建设途径;学校、政府、社会等多元协同培养路径,健全党政宏观调控路径,完善社会资源共享路径;校内、校外、第三方机构评估促进途径。^[58]

周立斌、张曦丹认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必须以全方位的视野审视才能探索出新路径,进而收到实效。她从全方位的视野出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例,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全方位教育进行初步探索。提出了通过课堂教学完成内化的教学任务、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全方位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策略,总结出课堂必须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系统知性教育;教师在课堂上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性建构的任务;与学校的党委、团委、院系辅导员等各种组织和相关人员紧密配合3个全方位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要点。^[59]

李小东、王校倩认为,社会健康稳定发展需要主流价值观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谓应时代之需而生。当前,中国社会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期,中国社会迅速崛起的同时,亦面临主流文化价值引领缺失的社会问题。如何传承中华文化精华、重构社会价值体系成为当务之急。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深入剖析后提出的“文化自觉”和“差序格局”为此提供了思考借鉴: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特点,在差序格局的社会框架中,生成文化自觉,进而形成文化自信,自发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觉是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价值体现,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生成。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宣传必须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了解,培养公民文化自觉。差序格局是框架,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在于践行,需要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心理。民心所向是关键,在培育和践行环节,要紧紧围绕人民需求而动。^[60]

王琨媛等认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意味着要通过“三全育人”的过程在教师和学生群体中树立牢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把这一理念落到实处,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新思路。在全程育人中,要紧密结合教学过程和第二课堂的活动,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全员育人中,要抓住教师和其他服务人员这一关键,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在全方位育人中,要抓好校规校纪和校园文化建设这些载体。^[61]

郑建华、刘雅俊认为,高校重构核心价值观教育路径要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充分保证高校学生的主体地位,立足学生发展需求,给予学生正确引导和规范教授,并让学生在实践中自主选择价值观念。在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基础上保证重构的合理性,构建具有可行性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路径,促进学生将个人价值观与社会发展相融合,在多元价值观念中寻找平衡,形成正确的核心价值观。^[62]

刘朝阁认为,君子人格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不同时代的人所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仁者爱人、崇尚道义、自强不息、和而不同、安贫乐道的价值理念是构筑现代价值观的重要资源,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融入大学生的人格培养、价值观塑造,为新时代大学生精神家园的建设贡献力量,为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人格思想恰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大学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资源,需要深入地挖掘和阐释。传统君子人格思想涵养大学生价值观有五个维度:仁者爱人是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根基,崇尚道义能增强大学生的是非观念,自强不息能激发大学生的担当精神,和而不同能指引大学生的交往行为,安贫乐道是追求道德的至高境界。高校弘扬与传播传统

君子人格的途径主要包括:做好课堂教学的正面引导,加强细致入微的环境熏陶,坚持问题导向的学习探讨,坚持知行合一的实践深化,拓展可视化的传播途径。^[63]

张百霞、康爱荣认为,幸福观属于人生观内容范畴,在大学阶段对学生实施幸福观教育,是对其开展人生观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高质量的幸福观教育,还可达到帮助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学生幸福观层次以及树立起正确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的目标,对学生成长以及今后发展而言助益极大。科学幸福观是指个体需要具备追逐梦想的激情,要为圆梦不懈奋斗。要在奋斗中体会到幸福的内涵与真谛,突破低级幸福束缚,不断提高自身幸福层次,从而对更大价值人生取向与更高层次情感体验进行追求。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呈现出的新形势、新问题表现为幸福观教育重视程度有待提高,社会方面因素有待合理处理,学生综合素质水平有待提升。高校应明确认识到幸福观教育的重要性,增强幸福教育力度,树立正确幸福观;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做好网络媒体监督管理;合理开展思想引导,提高学生幸福程度。^[64]

(田海舰: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刘朝阁.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宣传、教育及其相互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2019(8).
- [2]李秀红,张云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逻辑结构略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11).
- [3]郎琦.基于虚拟生存环境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路径[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9).
- [4]董硕玲,陈有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教学匹配策略研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9(6).
- [5]龚志军,姬静怡,牛玉萍.习近平关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的科学蕴涵与理论特征[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9(2).
- [6]刘朝阁.时代新人的思想内涵及培育机制[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9).
- [7]王红向.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高校思政课之有效课堂的构建[J].教育现代化,2019(38).
- [8]李晶,秦爱军,彭素峦.护理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互动模式建构研究[J].护理实践与研究,2019(12).
- [9]温永强,闫晓静,张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研究[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19(2).
- [10]朱凯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研究[M].北京: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9.
- [11]孙军.现代德育建设与就业规划[M].沈阳:辽海出版社,2019.
- [12]唐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机构[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9.
- [13]徐彬.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与实践[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9.
- [14]徐小慧.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理论与方法创新[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9.
- [15]严淑华.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之路[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16]梁捍东,牟文谦.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机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17]赵洁.大数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对策探究[J].才智,2019(8).
- [18]赵洁.新媒体视角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究[J].新西部,2019(12).
- [19]邵东蕊.大学生思想政治“微教育”途径探析——以秦皇岛市高校大学生和团属微信公众平台为例[J].传播力研究,2019(3).
- [20]邵东蕊.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智库时代,2019(13).
- [21]肖丽丽,王瑜,李琳.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21).
- [22]毛燕慧,李陶.文化交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影响及建议[J].邢台学院学报,2019(1).
- [23]曹娟娟.对创新开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研究[J].才智,2019(5).
- [24]杨翌.大思政视野下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路径研究[J].智库时代,2019(5).
- [25]王小丽,肖守库,薛大忠.高校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育人的内在关系研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26]温永强.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9(15).
- [27]关彦琦.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内在要求及其时代性研究[J].智库时代,2019(27).
- [28]李陶.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策研究[J].才智,2019(5).
- [29]郭飞,夏建军,付文娟,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作用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21).
- [30]唐朝晖.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生态化创新路径研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5).
- [31]李辉.实习支教:新时代高校师范生职业理想教育的实践契合[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1).
- [32]任莉.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探究[J].现代农村科技,2019(5).
- [33]邵东蕊.论如何发挥第二课堂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J].智库时代,2019(26).
- [34]杜立文,王兆云,陆静,等.新时代京津冀区域高校思政课协同发展探究[J].黑河学刊,2019(2).
- [35]何丹,张丽玲,杨方,等.新时期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究[J].西部素质教育,2019(3).
- [36]申文杰.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日常[N].河北日报,2019-2-1(7).
- [37]申文杰.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N].河北日报,2019-7-24(7).
- [38]刘朝阁.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人民性取向[J].共产党员,2019(3).
- [39]柴艳萍.巩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果与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样重要[J].思想理论教育,2019(5).
- [40]王志清,刘涛.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新路径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33).
- [41]魏彤儒,张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的功能、外显与影响要素探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42]回娅冬,闫晓静,孟悌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模式探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2019(2).
- [43]孟祥林.精细化参与式教学设计: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可操作性方法思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5).
- [44]李彩旗.思政课教学要挖掘适当载体传承民族精神[J].福建茶叶,2019(10).
- [45]韩琳琳,杨静如.社会工作方法介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探索与分析[J].邢台学院学报,2019(1).
- [46]李志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现状调查研究[J].才智,2019(9).
- [47]康超,王建红,屈朝霞,等.验证与发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成就新探——基于2016—2017年期刊文献的文本数据比较[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2).
- [48]闫学军.中国式沟通智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有效运用[J].教育现代化,2019(90).
- [49]王兆云.影视资源如何融入教学维度的“原理”课[J].文教资料,2019(7).
- [50]苏庆国,赵宏.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基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思考与实践[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51]刘琪.注重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考——以“形势与政策”课程为例[J].唐山学院学报,2019(5).
- [52]肖继新.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党性问题探讨[J].现代教育,2019(4).
- [53]李秀玲,肖继新,孟文静,等.新时代如何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政治素质[J].文教资料,2019(12).
- [54]邹萍.新媒体下高校思政教育改革研究[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20).

- [55]黄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政府建设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9.
- [56]和建华.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9.
- [57]田海舰.“赶考”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J].求是,2019(11).
- [58]王建洲,周春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研究生“双创”教育机理与途径探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 [59]周立斌,张曦丹.全方位视野下的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J].学周刊,2019(23).
- [60]李小东,王校倩.乡土中国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基于费孝通社会文化理论[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5).

- [61]王琨媛,冯立刚,黄耀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校“三全育人”的策略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23).
- [62]郑建华,刘雅俊.核心价值观与高校思想政治重构研究[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20).
- [63]刘朝阁.传统君子人格思想涵养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五个维度[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9(2).
- [64]张百霞,康爱荣.人才培养视域下高校大学生幸福观现状与对策分析[J].人才资源开发,2019(4).

经 济 学

经济理论研究

田学斌 封玉荣

一、西方经济学

(一)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袁庆禄和刘翠侠基于京津冀43个地级行政区2009—2016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京津冀地区技术创新在银行信贷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下,京津冀地区银行信贷存在非线性效应,其中技术引进发挥了显著的助推作用,自主创新的推动力逐渐丧失,并提出京津冀地区要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坚持自主创新发展战略,以实现银行信贷的可持续增长效应。^[1]杨玉桢、宋文松和李姗基于我国2007—2016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运用PCF方法分析各区域绿色经济增长水平,探究生态科技创新能力对区域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科技创新能力对绿色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各地区影响作用不同,东部地区促进作用显著,中部地区促进作用较小,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2]王艳芳通过整理计算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物质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积累等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传导渠道,研究发现:对于第一产

业,金融通过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对于第二产业通过技术进步渠道、物质资本积累渠道和人力资本积累渠道影响均不显著;对第三产业,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渠道影响经济增长。^[3]

国家级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策试验田”,肩负着引领地区经济发展、落实区域发展战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的历史使命。柳天恩、田学斌和曹洋基于2006—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行政级别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设立国家级新区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国家级新区比东部地区国家级新区能更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低行政等级城市的国家级新区要比高行政等级城市的国家级新区能更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跨行政区域的国家级新区比单一行政区内的国家级新区能更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4]

(二) 就业理论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在去产能背景下,宋凤轩和杨竹晴认为大量企业职工会面临失业的困境,从而导致社会福利负担的加重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在政府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同

时,需积极探索工会组织促进去产能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新路径,有效解决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5]

(三) 收入理论

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导致收入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消费升级视角,魏熙晔、龚刚和李梦雨利用123个国家1980—201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模型,证明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研究发现:(1)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涓滴效应”被阻隔,经济增长出现瓶颈,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存在多重均衡特征,低收入阶段下的收入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阶段下的收入不平等存在最优水平,而高收入阶段下的收入不平等则阻碍经济增长;(3)经济增长率、消费增长率和服务业增长率均与基尼系数呈显著的库兹涅茨倒U形关系,存在最优的收入分配结构。^[6]基于制度变迁视角,宋高燕和邓宏图利用29个省市和自治区1990—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地区市场导向下,制度变迁诱发再分配机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导向下制度变迁会增强政府再分配能力;制度变迁和政府再分配能力增强会促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则相反;制度变迁具有长期影响效应,一些重大社会事件对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有显著影响。^[7]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加快,流动人口就业与收入呈现出新的变动趋势。杨胜利和王伟荣采用2016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的群体性差异。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教育可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给男性、已婚、年龄小、城城流动、跨省份流动、高学历和流动时间长的流动人口带来的收入效应更大;流动人口就业行业越高端,工作经验的收入效应越小,教育的收入效应越大。^[8]

(四) 财政政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降一补”任务已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李东松和赵志君将消费税率、劳动税率和资本收益税率以及政府转移性支付等公共服务支出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分析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变化对经

济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出与各税率均呈现负相关;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消费函数中所占份额的关系则因税种、效用偏好不同而存在差异,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9]

金融稳定对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有重要影响。赵萌和叶莉利用46个国家1985—2016年的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估计金融衰退对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的影响,发现金融衰退会降低政府执行逆周期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能力,同时采用面板门槛回归分析不同金融波动程度下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发现金融波动对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具有显著非线性影响,金融波动越剧烈,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越差,并提出财政政策在金融周期繁荣期应更加审慎,在衰退期应更加积极,使财政监督体系与货币政策更加协调。^[10]

(五) 政府与市场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所在。陈俊龙、张晓晗和王晓萌将市场结构划分为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和产品差异化3个维度,通过构建多寡头垄断模型揭示市场结构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同时基于中国工业行业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测度我国工业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以检验市场结构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和产品差异化与中国工业行业产能过剩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作者提出应当通过合并重组适度提高市场集中度,提高市场进入技术门槛,积极鼓励企业产品创新以扩大产品差异化。^[11]高立英和窦志信通过对政府干预商贸流通产业的路径进行区分,并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框架对政府行为的作用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带有市场化属性的经济促进行为对于商贸流通产业具有正向影响,相反经济规制对于商贸流通产业存在一定抑制作用。作者进而提出政府在干预商贸流通产业时应该采取合适的政府行为,鼓励经济促进行为,审慎使用经济规制行为。^[12]

二、体制改革

(一) 公共服务

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的有效衔接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深入发展的重要基础。杨胜利、段世江和柴方园通过构建京津冀公共服务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检验了京津冀人口空间变动与公共服务资源

供给的协调性。分析得出,2005—2016年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各市公共服务资源增长速度差距呈缩小趋势,协同发展程度逐步上升。作者建议应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方式,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13]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王金营、李庄园和谢秋实采用“河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从公共服务的视角探讨脱贫的方式,并提出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出力度、将公共服务纳入反贫困政策框架、重点对口建设基本公共服务、提高扶贫人员能力和待遇等建议。^[14]

（二）养老问题

有序推进京津冀异地养老服务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孙伊凡和陈丽莎经过实地调查发现,京津冀异地养老服务的推进仍然存在一系列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完善京津冀三地政府间合作方案、提高异地养老服务认知度、提升服务质量和提供多元化服务等对策建议。^[15]北京“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借助北京之力,尽快提高河北地区养老服务水平,创新养老模式,结合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河北特色养老服务。张茜和耿晓就如何依托特色小镇建设打造河北品牌养老新模式、提升河北省养老服务整体水平给出了意见参考。^[16]

王朋岗基于血缘关系和直系组家庭视角,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从供给与需求出发,通过评价老年人健康状况与经济状况构建家庭养老资源供给缺口指数。结果显示,我国有20.55%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养老,高达77.45%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养老,高龄、低水平教育程度、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女性老年人面临养老资源总供给缺口的风险最大。^[17]

三、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物质生产方式从一家一户的农业耕作发展成为工业化大生产,物质生活交往方式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黄云明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导致中国社会伦理关系

实现了从家族社会向公共社会、从差序社会向平序社会、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随着社会伦理关系的转变,协调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意识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体意识、差序意识、血缘意识、人情意识等伦理观念逐渐淡化,自我意识、平等意识、公共意识、契约意识等不断加强。^[18]

高红雨认为,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点的批判和超越,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9]宫敬才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概括了其“黄金时代”15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然而仅仅依赖《序言》的显性表达理解劳动历史唯物主义遗失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作者建议要重新理解劳动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改变以往恩格斯方式的路径依赖,回到对其原生态的解读。^[20]

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一）人口经济学

袁青川基于2014年中国卫计委流动监测数据对劳动迁移与未来再迁移决策进行检验,研究表明,户口在省际流动决策中具有显著的作用,改善当地经济状况是吸引人口迁入的前提,提高迁入者居住意愿在于形成良好的社会认同,省际迁移成本会降低社会认同。作者认为,提升省际迁移质量急需改革与户籍相关联的就业制度,降低迁移给劳动者带来的各种负担,加强流入地对省际迁入人口的包容性,以建立良好的长期居留意愿,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21]

袁青川和易定红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研究了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分配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尚属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转移,以提高工作匹配质量为目的的人口流动还未形成规模;北京市流动人口生产率禀赋回报最高,但农业户口等非生产率禀赋也给流动人口带来了明显的工资劣势;京津冀地区省际人口流动在行业优势工资引导下优化了就业结构。就此作者提出,须消除三地间人口流动的行政障碍,减弱户籍与附加福利的关联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对生产率禀赋的回报机制,实现以就业匹配为目的的京津冀地区人口有序流动。^[22]

（二）环境经济学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初钊鹏、卞晨、刘昌新和朱婧通过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查和公众参与第三方监管,构建中央—地方—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对模型收敛于理想“合作”演化均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能够在一定前提下实现“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的理想演化稳定均衡。为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需要形成生态文明理性预期,建立环保督查长效机制,同时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治污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23]贾巨才、孔伟和任亮以张家口为例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对2005—2016年张家口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张家口市旅游经济指数、旅游规模和旅游效益总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指数、生态资源和环境治理指数波动较大;张家口市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关联度逐渐增强,正处于协调发展的初级阶段。作者建议张家口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应兼顾自身优越的地理环境,稳步推进城乡环境治理进程,促进两者协调健康发展。^[24]

经济生态化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的本质要求。杨晓叶、米彦香和许东海利用200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的双向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方法,研究工业废气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及地区性差异。研究发现,工业废气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呈现双向的倒“U”形关系,且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双向性倒“U”形关系显著且稳定,而中部地区却为“U”形和倒“U”形互存的情况,既不显著也不稳定。^[25]

京津冀山水相连,共处一个生态单元,生态环境呈现出显著的一体性特征。田学斌、赵培红和张永杰认为,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推进生态协作,重点完善区际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是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应有之义。^[26]雄安新区承担着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新发展理念创新示范区和盘活中国经济战略布局三大历史使命,薛楠和齐严认为创新是其实现突围和完成三大历史使命的第一动力和唯一路径,要打造领军企业—创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风险投资/金融机构—企业三大创新生态链,促进创新主体之间实现角色转换,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协同发展。构建雄安新区创新生态系统,一要破除政策性束缚,吸引资源集聚和流动;二要培育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三要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整合资源,提高国际化水平。^[27]

（三）资源经济学

对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进行评价是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户艳领、李丽红和张婉双以京津冀为研究区域,从京津冀资源环境影响因素出发,选取经济水平、基础建设、人口与消费、资源环境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搜集整理2007—2016年的数据,运用熵值评价模型横向对比各地资源环境承载情况,纵向分析各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发展走势,定位承载优势和短板,最后依据实证分析为补足各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短板、推进协同保护提出对策建议。^[28]

孙丽文、王丹滢、杜娟和韩莹通过测算2000—2015年中国工业38个细分行业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EPICF),划分出高、中、低压行业并对每类行业的EPICF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取代能源强度成为降低高压行业EPICF的主导因素,中压行业减压的关键要素是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降低能源强度仍然是低压行业减压的重点,现阶段森林和草地的人口压力和能源结构作用不大,退耕还林还草和能源结构调整的效果并未得到真正发挥。^[29]陈凯、李鹏飞和焦阳运用秩序耦合模型测度京津冀地区2006—2016年能源耦合状态,研究发现,2006—2016年京津冀能源利用处于高耦合度状态,表明京津冀能源利用的相互一致性较高,且发展态势相对较好,但通过前期的秩序测评发现三地在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方面有退步的趋势。^[30]李志红和宋剑以唐山市为例分析了该市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打造高标准集聚发展园区、培育壮大一批龙头企业、提高产业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

打造节能环保产业人才高地和制定支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推动唐山市节能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31]

五、创新经济学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有效性存在争议。邢会、王飞和高素英将寻租作为调节因素引入“产业政策—企业创新”的研究框架,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产业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以及导致企业非实质性创新之寻租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创新,但不同层面政策效果各异,供给面和需求面政策促进了企业实质性创新,而环境面政策却诱发了企业迎合性创新,且寻租行为越频繁,诱发企业迎合性创新效果越强。^[32]孙丽文、米慧欣和李少帅采用文献资料和理论分析方法对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及创新对新旧动能转换的驱动机制开展定性研究,从国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探讨了新旧动能转换的创新动力来源,分析了作为核心驱动力的技术创新、作为关键驱动力的服务创新和作为保障力的体制创新对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相应策略。^[33]

政府政策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邢会、王飞和高素英从资源属性、信号传递属性协同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助能够发挥资源属性作用促进企业创新,但寻租行为的存在会引发策略性创新;另外政府补助也能够发挥信号传递属性作用,引进风险投资和银行短期贷款会促进企业整体创新;政府补助能够发挥双重属性协同作用,通过“资金补给效应”“创新倾向转变效应”和“补充监督效应”的交互影响抑制策略性创新促进实质性创新。^[34]虽然政府在企业创新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政策实施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无序性使得政府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必要性存在争议。邢会、王飞和郭辉丽对政策支持与企业创新关系进行回顾、评论和展望,首先在相关理论分析基础上对政府政策支持和企业创新概念进行阐述,其次重点梳理单一政策和不同政策协同

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分析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间接效应,最后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在完善和丰富现有研究的同时,为政府制定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的各类政策提供依据。^[35]

王智新和赵景峰在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和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研究开放式创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开放式创新显著增强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全球价值链嵌入并没有显著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开放式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交互作用显著正向提高技术创新绩效。作者建议提高对开放式创新的重视程度,积极获取外部创新信息,疏通传导渠道,发挥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提升企业内部创新和外部创新均衡协调力度,提高技术创新绩效。^[36]

六、世界经济

齐玮运用CMS模型,对1996—2016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效应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逐阶段减弱;产品竞争力效应的影响则不太稳定;交叉效应对文化出口的促进作用较为突出,其中竞争力效应是影响主要文化产品出口的最主要因素。^[37]唐山市作为全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城市已站到了国家新一轮开放前沿。熊艳和唐军从经济外向度、信息开放度以及社会开放度三个维度,回顾总结三十年来唐山市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综合分析唐山市开放状况,进而对唐山市对外开放战略的持续推进提出建议。^[38]刘钧霆、曲丽娜和佟继英基于2003—2016年中国对31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及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数据,从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视角,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种类、数量及价格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种类增加有负向影响,对出口数量的增加影响不显著,对出口价格的提高则具有正向影响。作者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创新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政策建议。^[39]

2009年以来,日本政府将基础设施出口上

升为国家级战略。马学礼和刘娟通过分析日本基础设施海外输出战略及其与“一带一路”对接,认为日本基础设施海外输出战略存在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可能性,但也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比如日本的相对收益偏好有可能导致其出现机会主义行为。^[40]日美贸易摩擦是否推动了日本的结构改革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裴桂芬和李潇潇通过分析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结构改革得出结论,日本利用美国施加的压力推动了国内必要的经济结构改革,对于并不亟须或不必要的改革,日本采取了迂回或敷衍方式,实现了“息战”。^[41]

现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国际贸易形势极为严峻。吴婷婷和徐勃从贸易视角、宏观视角和金融视角三个维度分析了贸易差额来源,并在金融视角下对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展开讨论。^[42]

七、三农问题

(一) 农业

农业作为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夏会军、马军和张冠楠结合农产品物流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中国特色农产品商贸物流基地建设提出针对性意见,以期解决当今制约农产品销售的主要问题。^[43]金福子和苏燕华认为各种农产品在农业产业化条件下分工日益密切,上下游环节之间的衔接和价值交换表现得更为频繁,形成了具有地域协同性的产业链条,提出推进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密切衔接和分工协同是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升级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出路。^[44]

马彦丽认为在发展农地股份合作社的过程中,“固定收益+浮动分红”式的分成契约已经成为合作社的核心制度安排,从两个层面讨论了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租金契约安排:一是在土地出租人与承租人作为自然人的层面上,认为在当今中国农业生产约束条件下,由于政府投资土地改良、货币地租普及、技术进步和农业保险的发展以及有效控制契约中的相关属性,使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固定契约成为优于分成契约的制度安排;二是在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层面上,认为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农户土地承包权不完整以及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权缺乏竞争市场,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可能性很小。作者建议,农地股份合作

社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功能定位,优先选择固定租金契约,并把服务内容限定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租地契约执行、管护农地资源等方面。^[45]

(二) 农民

李瑞和刘超基于流出地的视角,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流动范围对农村外出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跨省流动和市内跨县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具有最高的长期居住意愿,更容易实现城镇化和市民化。作者另从收入预期、融入成本和社会关系网络三个方面解释了流动范围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46]李瑞和刘超运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农民工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受益程度和城市规模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劳动力市场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每提高1%,农民工月收入平均提高4.3%~11.4%,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越高,且高技能农民工比中低技能农民工更能从人力资本外部性中受益,另外中西部地区农民工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高于东部地区。^[47]

职业培训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是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于艳芳、贾凯旋和闫薇认为,目前河北省还存在农民工职业培训积极性不高、职业培训主体不明确、满意度不高和效果不显著等问题,对此应宣传引导农民工积极参加职业培训,明确政府就业服务机构的主体地位,优化职业培训内容,注重培训质量,以提升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社会认可度,增强满意度,从而提升职业培训的效果。^[48]

(三) 农村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不断改革和创新,农业产业化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张冉、张丽元、张梦梦、李姜燕、高雅斌和徐祗坤基于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从政策体系、引导机制、统筹发展、科技人才等六个方面分析了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从精准扶贫和推动乡村振兴计划有效落实的战略角度就如何促进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科学健康发展提出对策。^[49]郭娜和李华伟通过构建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农村电商网商数量、农特产品市场、农村电商专业人才规模、资金规模4个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

系和动态反馈机制,并基于我国 2010—2016 年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统计数据对农村电商和乡村振兴的互动性进行了仿真模拟。结果显示,影响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业财政补贴力度,相关扶持政策在农村电商和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逐步加大农业财政补贴力度、构建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对于实现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应根据农村电商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状,分阶段、有针对性地重点推进相关政策,促进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发展。^[50]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力抓手。王会欣认为,河北省县域多、幅员广、资源丰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有着良好的基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特”字文章、打造产业园区集群、健全质量标准体系、打造知名品牌等有力举措,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51]

解决好“三农”问题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孟书霞和孙蓓认为,要改善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的问题,需要借鉴国内外经验,创新信贷模式、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充实和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及农业经营主体的致富能力。^[52]农村土地的高效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田素云和张庆考认为,当前农村土地的流转现状不太乐观,应进一步扩大经营权与承包权的分离程度,成立农村集体资产管理部门,统筹安排农村土地流转,发展多样化的农地融资产品,加快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建立高标准、统一的农地流转交易市场,设立农地质量、价值评估机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消除土地政策城乡二元制。^[53]

(四) 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扶贫政策中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扶贫政策重要思想对贫困地区进行精准扶贫。郭小卉、段胜英和冯艳博以河北隆化县“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为例,指出该模式可以有效降低贷款风险,破解了金融机构扶贫参与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同时也面临县级政府财力有限、产业层级较低、深度贫困和顽固贫困较多、贫困户脱贫意识不强等制约,存在政府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难以保障、低风险下对银行的激

励稍显过度、对保险公司的激励略显不足等诸多问题,最后从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深入推进隆化县“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的对策建议。^[54]段世江和张雪以燕山—太行山为例,探索了该片区减贫与发展政策目标及实践路径,认为该片区减贫发展的政策目标在于优化人口布局、生态文明、脱贫致富,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强化生态意识、协同意识和差距意识,充分发挥国家政策叠加的优势。在此基础上,要厘清政策目标的重点和优先领域,以合村并居和就地城镇化为重点,优化人口布局,突出生态价值,科学定位区域功能,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可持续脱贫致富的政策实践路径。^[55]

金融扶贫对于精准扶贫具有重要作用。康书生和冯艳博基于中国学术文献总库,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近年来国内金融扶贫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金融扶贫学术研究发展迅猛,研究体量较大、质量较高,金融扶贫理论和扶贫实践上都有所探索和创新,未来应积极创新金融扶贫模式,持续关注普惠金融发展,建立健全金融扶贫的良好生态环境和金融扶贫长效机制。^[56]

(田学斌: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封玉荣: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

参考文献:

- [1]袁庆禄,刘翠侠.京津冀地区银行信贷、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J].财会月刊,2019(9).
- [2]杨玉楨,宋文松,李姗.生态科技创新能力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9(5).
- [3]王艳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内生传导渠道影响的检验[J].统计与决策,2019,35(16).
- [4]柳天恩,田学斌,曹洋.国家级新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J].财贸研究,2019,30(6).
- [5]宋凤轩,杨竹晴.去产能背景下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路径选择——以新时代工会组织之效能探讨为中心[J].河北学刊,2019,39(4).
- [6]魏熙晔,龚刚,李梦雨.收入分配、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J].浙江社会科学,2019(10).
- [7]宋高燕,邓宏图.制度变迁、再分配能力与收入不平等[J].浙江社会科学,2019(8).
- [8]杨胜利,王伟荣.产业结构升级、教育与流动人口收入——基于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 [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35(12).
- [9]李东松,赵志君.税率、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基于当前财政政策的理论及模拟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9(3).
- [10]赵萌,叶莉.金融稳定与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系统 GMM 估计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19(9).
- [11]陈俊龙,张晓晗,王晓萌.多维度视角下市场结构与行业产能过剩:理论与实证检验[J].产业组织评论,2019,13(3).
- [12]高立英,窦志信.政府行为对商贸流通产业发展影响机制分析——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19(13).
- [13]杨胜利,段世江,柴方园.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综合评价与分析——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J].人口与社会,2019,35(2).
- [14]王金营,李庄园,谢秋实.公共服务全面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之固本大计[J].河北学刊,2019,39(3).
- [15]孙伊凡,陈丽莎.京津冀异地养老的认知困境与探索[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4(3).
- [16]张茜,耿晓.基于特色小镇探索河北省养老服务业发展[J].智库时代,2019(3).
- [17]王朋岗.直系组家庭视角下家庭养老资源供需缺口评价与风险人群识别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9,25(5).
- [18]黄云明.新中国 70 年物质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变革对社会伦理关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J].保定学院学报,2019,32(5).
- [19]高红雨.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点的批判和超越[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9(3).
- [20]宫敬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的节点意义[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6).
- [21]袁青川.劳动迁移与未来再迁移决策检验:经济推引还是社会认同?——基于 2014 年全国卫计委流动监测数据的证据[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35(2).
- [22]袁青川,易定红.京津冀地区省际与省内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分配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2015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经验[J].经济经纬,2019,36(6).
- [23]初钊鹏,卞晨,刘昌新,等.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7).
- [24]贾巨才,孔伟,任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冀西北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2).
- [25]杨晓叶,米彦香,许东海.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的耦合性分析——以工业废气排放与治理为例[J].生态经济,2019,35(1).
- [26]田学斌,赵培红,张永杰.构建京津冀生态补偿长效机制[N].经济日报,2019-09-11(15).
- [27]薛楠,齐严.雄安新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J].中国流通经济,2019,33(7).
- [28]户艳领,李丽红,张婉双,等.京津冀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及在环境协同保护中的应用研究[J].统计与管理,2019(6).
- [29]孙丽文,王丹滢,杜娟,等.基于 LMDI 的中国工业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因素分解研究[J].生态经济,2019,35(1).
- [30]陈凯,李鹏飞,焦阳.京津冀能源利用秩序及耦合治理研究[J].天津科技,2019,46(8).
- [31]李志红,宋剑.推动唐山市节能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机制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2019(21).
- [32]邢会,王飞,高素英.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了吗?——基于“寻租”调节效应的视角[J].产经评论,2019,10(1).
- [33]孙丽文,米慧欣,李少帅.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机制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1).
- [34]邢会,王飞,高素英.政府补助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了吗——资源和信号传递双重属性协同视角[J].现代经济探讨,2019(3).
- [35]邢会,王飞,郭辉丽.政府政策支持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述评[J].财会月刊,2019(17).
- [36]王智新,赵景峰.开放式创新、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绩效[J].科学管理研究,2019,37(1).
- [37]齐玮.基于 CMS 模型的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增长分解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9,35(12).
- [38]熊艳,唐军.唐山市经济对外开放度分析及对策建议[J].中国市场,2019(11).
- [39]刘钧霆,曲丽娜,佟继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三元边际视角[J].经济经纬,2019,36(4).
- [40]马学礼,刘娟.日本基础设施海外输出战略及其与“一带一路”对接研究[J].日本问题研究,2019,33(2).
- [41]裴桂芬,李潇潇.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结构改革[J].日本问题研究,2019,33(3).
- [42]吴婷婷,徐勃.从金融视角看中美贸易摩擦[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10).
- [43]夏会军,马军,张冠楠.特色农产品的商贸物流基地建设思路与发展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19(2).
- [44]金福子,苏燕华.现代农业发展中产业链的区域分工与协作研究[J].农业经济,2019(9).
- [45]马彦丽.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固定租金契约优于分成契约——兼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空间[J].农业经济问题,2019(3).
- [46]李瑞,刘超.流动范围与农民工定居意愿——基于流出地的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9(8).
- [47]李瑞,刘超.城市规模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影响

- [J].城市问题,2019(3).
- [48]于艳芳,贾凯旋,闫薇.完善河北省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对策研究[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21(1).
- [49]张冉,张丽元,张梦梦,等.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思考[J].南方农业,2019,13(9).
- [50]郭娜,李华伟.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19,27(4).
- [51]王会欣.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N].河北日报,2019-06-05(7).
- [52]孟书霞,孙蓓.邢台市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探索[J].河北金融,2019(2).
- [53]田素云,张庆考.乡村振兴中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研究[J].智库时代,2019(16).
- [54]郭小卉,段胜英,冯艳博.河北隆化县“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探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1).
- [55]段世江,张雪.燕山—太行山片区减贫与发展政策目标及实践路径[J].河北学刊,2019,39(6).
- [56]康书生,冯艳博.基于文献计量的我国金融扶贫研究动态[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40(1).

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

陈志国 席增雷

2019 年度研究延续了往年的问题为导向的范式,突出了地域性、现实性和应用性的特点,重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出思路 and 对策。

一、区域经济发展

(一) 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与战略

马宇博、裴桂芬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和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构建全要素生产率测评模型对京津冀三地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和评价。结果显示,整体来看京津冀三地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通过技术的提升是呈上升趋势的。河北省除了廊坊、石家庄,其余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远远落后于北京、天津;其中,张家口、邯郸等地在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方面十分薄弱。河北省与京津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且省内各市之间的差距也十分明显。要想缩小这种发展的差距,就必须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体制,构建京津冀区域创新格局。首先,要重点发展实体经济,推进京津核心区产业园区建设,用实体经济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尤其是河北省要提升保定和石家庄的战略地位,做好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准备;其次,发展生态经济,打造创新驱动经济新增长极。京津冀在完善产业结构和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也要努力挖掘三地的资源潜力,积极向环境友好型经济过度,发展绿色经济;最后,要抓住雄安新区的发展契机,发挥地区内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1]

王欣、王海蓉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

典型代表,随着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产业对接以及资源共享,探索京津冀区域在社会治理上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成为推动区域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通过对京津冀社会治理现状的分析,发现京津冀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一是京津冀城市居民数量庞大且需求存在多样化;二是网格系统还不能提供较为完备的数据采集支持;三是各部门及人员之间协作不顺畅。为了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在社会治理上的协同发展,提出以下举措:协同共治共享,加强体制创新,激发社会活力;不断推进京津冀城市服务管理精细化;加强三省市部门间协同合作创新。从而使京津冀地区以更加高质量的方式发展。^[2]

柳天恩、田学斌等以我国 285 个地级及以上行政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评估了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研究表明:一是设立国家级新区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并且存在 1 至 2 年的政策预期效应;二是中西部地区国家级新区比东部地区国家级新区能更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三是低行政等级城市的国家级新区比高行政等级城市的国家级新区能更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四是跨行政区域的国家级新区比单一行政区内的国家级新区能更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从而为引领地区经济发展、落实区域发展战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区域高质量发展新路提供借鉴。^[3]

(二)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赵青霞、夏传信等基于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京津冀地区科技人才

集聚、产业集聚及其交互作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 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才集聚以及产业集聚都与科技人才集聚形成正向的交互作用,而且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力更大。河北省与北京、天津两市相比,其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较低,科技人才聚集水平更低,存在较大的差距。河北省政府应大力支持科技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互动循环发展,优化本省的产业空间格局,重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以此吸引大批高科技人才流向本地,逐步缩短与京津地区的差距。^[4]

阎东彬、范玉凤认为京津冀在经济、生态、产业、城镇等空间分布上存在功能紊乱,从而导致了京津冀地区功能结构失衡。为了从功能空间分布角度提升京津冀发展水平,以相对稳定的状况保障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构建了京津冀区域的城市群功能空间状态指数,同时对该失衡状态进行了相应的测定和表达,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功能结构优化引领空间结构优化,实现二者的同向均衡;构建合理的功能结构体系,优化城市群空间布局;构建合理的功能结构体系,优化城市群空间布局;加强制度保障,促进区域要素流动等措施,从而推动京津冀区域功能结构的稳定,促使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5]

李昌明、刘海滨等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京津冀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合作共生能够对区域经济的 质量发展和区域环境治理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京津冀三地共同面临能源结构优化不足、空气质量急需提升以及增强能源供应等问题,这就使得建立京津冀能源合作发展新模式成为新能源领域在京津冀地区实现协同发展的关键选择。鉴于此,首先运用 Logistic 增长模型构建了产业集群协同合作发展模型,并对京津冀新能源集群合作进行了障碍分析,进而提出通过构建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模式、异构互补型合作模式、品牌驱动型合作模式等来实现京津冀新能源产业集群协同合作、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6]

(三)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王春蕊认为河北省是沿海大省,具有丰富的海洋生物、矿产、文化、旅游等资源,为发展海洋特色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但是河北省与其他沿海大省相比,远远没有发挥出海洋

资源带来的优势,加快发展河北省海洋经济向高质量高效益方向转变已经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需要发展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海洋特色产业,提高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对接国际市场,推进海洋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建设。其次,建设高水平海洋科学技术研发平台和协同创新联盟,利用省内外科研院的研究成果,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研发平台,为海洋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引进培育一批服务海洋特色产业的高端精英人才,加强海洋职业技能培训,为人才储备奠定基础,并建立开放的人才使用机制,立足河北省自身海洋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不断完善健全人才引进和交流体系。将河北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建设成具有河北特色的海洋经济产业。^[7]

二、区域竞争力

(一) 区域竞争力的选择路径

吴必善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河北省应该利用供给侧改革等经济政策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对河北省“雄安新区”能源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研究,针对区域能源产业集群化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金融资源问题,提出利用由新能源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建立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通过量化分析影响新能源产业体系各方利益分配变量,构建多方利益分配模型,为新能源供应链提供金融服务的新思路。“十三五”期间,京津冀地区能源产业转型发展的目的是通过生产与使用清洁能源逐步改善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其中,河北省的能源供给侧结构改革和低碳发展规划是重要一环。河北省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可借助于雄安新区绿色、现代、智慧城市群建设的机遇,利用“雄县模式”不断扩大“地热+多种清洁能源”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规模,从而促进河北省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8]

张亚明、杜翠翠等认为规划和建设特色小镇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决策。在大量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构建河北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 IFIC 模型,分别从四个层面提出河北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提升路径。在产业定位层面上,坚持以“特而强”为核心,根据河北省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把握特色产业,提升当地居民

的收入水平,形成企业、居民与政府三方“共建、共营、共享”的合作经营模式,进而提升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在建设形态层面上,坚持以“精而美”为基础,界定特色小镇范围要避免“摊大饼”现象,通过精准的功能定位打造独具竞争优势的特色小镇;在功能叠加层面上,坚持以“聚而合”为导向,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方向,借助京津冀发展的核心优势来提升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在制度供给层面上,坚持以“活而新”为支撑,要坚持政府引导,以社会资本为主,企业主体参与市场化运作机制,加快河北省实现特色小镇与全域经济产业联动发展。^[9]

颜廷标认为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力支撑。首先,京津冀三地要积极深化区域分工,将产业分工转变为产业链分工;其次,各地要不断创新协同模式,将利益冲突转变为利益共享;同时,各地要努力完善动力机制,将外在推动力转变为增强内生推动力;最后,要加快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将各个产业之间的简单链接转变为深度融合。除此之外,京津冀各地应该加快缩小京津冀区域间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水平存在的差距,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统筹建设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型基础设施,通过共建共享增强京津冀地区现代产业发展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10]

(二) 促进区域竞争力提高的政策措施

朱晓霞、王成亮等针对“命令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环境下如何发展多企业协同制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协同制造系统中的制造企业通过多种链条结构联系在一起,这些链条结构决定了企业追求的目标需求,确定了各个企业的最终目标,使制造企业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谋求竞争优势、占据有利地位;从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制造企业博弈的多种情境,建立了协同制造系统中企业博弈支付矩阵并构造了博弈模型,明晰了制造企业博弈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此外,通过平衡企业间的相对收益、提高企业绝对收益以及集中力量提高企业某一环节的制造水平,促进河北省协同制造企业的合作程度。通过彰显生产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而推动网络协同制造系统良性发展,提高河北省区域经济竞争力。^[11]

陈建伟认为农产品加工业已经成为河北省第三大产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农业建设,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生产率,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要想更好地发挥农产品加工业对现代农业的支撑作用,需要加强优化农产品加工业的空间布局,推动优势资源要素向优势企业配置,优势企业向优势区域聚集,从而提升聚集效应;需要完善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链条,即协调产业链、产品链和效益链,以提升整体质量;需要加强科技创新,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绿色高效发展,以提升农产品加工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培育优势品牌,提高品牌影响力、认知度和美誉度,以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还需要加大政策扶持,提升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能力,进而推动河北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12]

陈璐认为河北省应该加快推进“微中心”建设,加快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进而推动京津冀协同高质量发展。培育建设“微中心”,首先要真正理解“中心”是指能够发挥一定辐射带动作用的空间区域,“微”指空间尺度和人口规模要小。建设“微中心”需在五个方面着力:坚持规划引领,从顶层设计方面明确“微中心”载体群的选址布局与特色定位;突出承接对接,借力借势构建并延伸产业链与创新链,吸引各类发展要素聚集;强化对标学习,按照奥运标准提升“微中心”的绿色低碳化、智能化和公共服务功能;着力创新突破,构建符合“微中心”建设要求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保障体系;打造形象“名片”,以追求差异化和美誉度为目标全面推进“微中心”宜居化和特色化,进而弥补河北省城市发展滞后与模式类同短板,有效提升承载能力和水平。^[13]

(三) 河北省区域产业竞争力

宋之杰、唐晓莉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分析了河北省的信息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务对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关联效应,分别从后向关联、前向关联以及产业性质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后向关联效应来看,河北省信息制造业对上游相关产业的需求拉动作用超过信息服务业相应的经济效应;从前向关联效应来看,河北省信息服务业在供给下游相关产业生产,进而推动各产业

部门发展方面,发挥着更大的积极作用;从产业性质来看,河北省信息制造业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关联效应更强,积极影响更大。并提出从大力支持信息制造业的发展、着实鼓励信息服务业的提升、积极促进信息产业内部的融合角度来推动经济产业的协调发展、提升河北省产业竞争力以及带动河北省经济发展。^[14]

贾巨才、孔伟等基于城市化背景构建了河北省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并辅以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发现张家口市旅游经济指数、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均呈现增长的趋势,且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数也不断上升。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促进河北省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应该平衡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探索新型的多元化经济生态补偿机制,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子,创新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新道路,从而提高河北省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指数;学习并落实发展生态旅游的策略和具体方案,充分发挥旅游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中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抓好乡村旅游,另一方面开展环境整治,既发挥乡村旅游优势,又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从而达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多赢局面。^[15]

吴永立、王楠等认为河北省作为冰雪运动的举办地之一,应以筹办冬奥会为契机,充分利用冰雪资源,统筹规划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产业发展。在此基础上,运用SWOT分析法对河北省的冰雪经济进行分析得到:(1)河北省发展冰雪经济的优势为:政府在政策上对冰雪产业的支持、河北省冰雪资源较为丰富、区位和交通优势明显;(2)河北省发展冰雪经济的劣势为:人力资本表现匮乏、管理制度不成熟、缺乏自主品牌和创新;(3)河北省发展冰雪经济面临的机遇为:冬奥会的举办地、人民收入水平与消费层次提升是冰雪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河北省发展冰雪经济面临的威胁为:来自国际上欧美冰雪旅游以及来自国内吉林、内蒙古、新疆等地冰雪产业的竞争。为了加快河北省冰雪经济的发展,提出构建多元化冰雪产业体系、强化冰雪文化渗透、提升冰雪产业经济附加值等对策建议。^[16]

三、城市经济

(一) 新型城镇化建设

陈丽莎、孙伊凡认为,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城镇化速度持续加快,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发生了促进农转非效应、增加非农收入效应、农村市场开拓效应和农民工回乡创业效应,进而推动了农村居民减贫脱贫的显著进展,但也引发了一系列城乡发展中的消极问题。这说明,城镇化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必须依靠城市资源的优势来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但是,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平衡其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努力将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效益达到最大。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时,既要重视优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加大对乡村地区尤其是贫困乡村地区的投入,又要提高城镇化质量水平,缓解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人地矛盾突出、资源环境破坏、大量占用乡村用地等问题,最终实现城乡统筹、相互促进的新型城镇化格局。^[17]

张春玲、杜丽娟等指出虽然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持续稳定增长,但绝大部分县域的城镇化水平依旧低下,城乡之间发展极度不平衡,县域城镇化质量问题亟待研究。认为当前河北省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大致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近年来河北省有85%的城镇新增人口来自县(市)及以下城镇,县域地区已成为容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空间,且从整体上呈现出以就近原则为主的城镇化特点;二是县域经济充满活力,尤其是第三产业增长势头强劲;三是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各县市差距明显。由此,各县域应该充分结合自身特点,根据现有发展情况,选择适合自身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同时加快弥补不足之处,多渠道、多路径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18]

刘玲、杨欣玥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为河北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带来良好契机,但是目前河北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河北省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镇化水平明显低于京津城镇化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以及省内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两个方面;二是城市规模结构布局不合理,中等城市断档,小城镇封闭;三是城镇化水平与经

济发展水平的步调明显不一致,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四是城镇生态环境恶化,“大城市病”凸显。因此,在下一阶段应打破京津冀行政壁垒,实现区域内资源共享;河北省应合理调整城镇布局,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各城镇平衡发展的高质量新型生态城镇。^[19]

(二) 城市化与产业规划

李志红、宋剑指出,当前河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快车道,新型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关键期,在迎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环渤海地区加快崛起的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巨大挑战。目前,河北省面临着产业基础薄弱、新型城镇化助推力不足,城镇化水平低、产业发展受到制约,政策不够精准、引导城镇化和产业发展效果不佳等诸多问题。应根据自身实际完善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的规划设计,各级政府要根据各地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切实解决产城互动不良、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各地区要充分挖掘自身科技创新资源,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聚集,形成产业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注重科技、教育、医疗的发展,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增强城市经济竞争力,积极打造地区产业集群;增强政府协调力度,创新行政管理机制,为产业选择提供有力保障;同时要注意保护环境,大力研发绿色环保技术,推动各产业的绿色发展。^[20]

梁俊仙认为,社火作为冀西北地区宝贵的民俗文化,受城镇化水平影响较大。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社火演出时间和场所逐渐改变,展演形态由仪式性向观赏性转变,演员中妇女增多,并呈现高龄化特色,筹办社火的方式和资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合理性开发和产业化运作是新时代背景下加强优秀民俗文化保护的重要手段。当地政府应当积极利用社火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既要加强对社火文化的空间保护,又要积极进行艺术创新,运用多种方式对社火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推介,形成冀西北地区社火的文化品牌,促进社火产业化发展,使其成为表现地方文化、加强地域认同和发展地方经济、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效工具。^[21]

陆刚、孙芸莉指出发展电商产业是当前扶贫

工作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脱贫攻坚的“互联网+”新动能。应用电商新模式能够促进贫困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助力实现乡村振兴。作者总结了通榆模式、武功模式、陇南模式、沙集模式四种典型电商扶贫应用模式,并根据河北省电商扶贫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了电商扶贫存在的问题。包括:电商扶贫软环境跟不上硬件建设,服务体系尚未完善;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质量安全难以保障;农产品上行成本高,电商物流资源阻碍电商发展;贫困地区电商人才欠缺,忽视本地农村电商能力建设;某些地方对电商扶贫的认识有偏差,电商扶贫项目融资难等。最后,提出建设电商扶贫示范县、严控质量安全打造网络品牌、加快整合农村贫困地区物流资源、树立典型吸引青年回乡创业、充分发挥政府主体责任等建议,促使电商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发展。^[22]

(三)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王金营、李庄园等认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往往因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缺失而面临更大的风险,动摇着本就脆弱的生活、生产能力,也加速了区域间的不平衡。农村地区因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大量流出,城市规模扩张造成农村土地大量被占用,集中连片特困现象更为严重。作者采用“河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用层次分析多维测度方法,从家庭特征、收支状况、经营活动和服务获得及家庭住房情况四个维度,通过专家打分、指标赋值以及综合测算获得家庭的贫困—富裕度指数,依据该指数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家庭进行分类,利用反事实法验证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反贫困中越来越体现为一种制度保障和能力支持的结论,并由此提出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出力度、将公共服务纳入反贫困政策框架、重点对口建设基本公共服务、提高扶贫人员能力和待遇等对策建议。^[23]

岳晓鹏、刘畅等指出,城镇化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城市扩张而乡村萎缩的必然之路。城镇化会带来农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剧烈变动,进而对农村地域系统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者指出,由于城镇规模的扩张,造成乡村土地被大量占用,乡村空间进一步

萎缩,乡村人口数量急剧减少,撤村建居、撤镇改街、合村并镇等现象十分明显。因此,要提高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努力实现“深度城镇化”,加快示范小城镇建设,积极鼓励实现就近城镇化,加大对农村失地农民的补助,使农民能够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改善乡镇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和人居环境,吸引流动人群返乡,走健康的城镇化道路。^[24]

金浩、李瑞晶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成就瞩目,但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的非均衡发展问题也日渐凸显,大批农民失地、劳动力外流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作者结合我国城镇化的特征,构建四种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我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人口、资本和土地三重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1)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时空双向正相关,即一个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不仅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还受到周边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同向影响;(2)三重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不同;(3)两个地区接壤或地理位置邻近是导致变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发生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作用机制,而经济距离的溢出效应未能得到有效支持。据此,应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保障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均等的权利;改革农地征收制度,防止城市建设用地的过度扩张;协调好工业化、城镇化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提高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重视跨区域经济要素的天然联系,实现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强化地区间联系。^[25]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户艳领、李丽红等认为,开展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是客观认识区域承载优势和短板,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运用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科学、全面的指标体系,应用熵值评价模型评价京津冀13个城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系统,横向对比各地资源环境承载情况,纵向分析各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发展走势,定位了承载优势和短板。研究结果认为,提高京津冀地区整体资源环境承载力,要加强京津冀三地的合作,弥补河北省资源环境承载

力的不足,并且与京津两地进行协调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京津冀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发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城市承载水平;优化资源供给结构,扩大清洁能源供给;加强自然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6]

李丽红、宋剑等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开展承载力评价有利于厘清各地资源禀赋、环境本底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对区域发展的约束,提升环境保护意识。作者通过运用生态足迹理论,使用传统生态足迹法测度出京津冀各城市的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并以此为基础选取三维生态足迹法,在时空上对各地区的资源利用情况进行分析,进而对各区域的承载优势、承载短板以及承载力的发展趋势等进行对比和分析。研究结果认为,实现京津冀承载力优势互补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应合理配置资源,加强承载力区域间的优势互补,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同时还要不断完善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27]

王树强、徐娜基于2004—2016年京津冀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线性回归的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协同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随着京津冀经济协同度的提高,环境质量呈现出收敛式上升。建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一步识别京津冀经济协同的环境效应的内在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由于同时存在要素禀赋效应和污染避风港假说,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要通过结构效应而不是技术效应改善环境质量。最后提出了加强政府政策与市场资源配置相结合、促进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加强京津冀之间的环境治理合作等建议。^[28]

(二)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张晗、舒丹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尽管产业协同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目前京津冀三地产业相似度依然较高,特别是津冀的优势产业仍高度趋同,存在明显的竞争倾向,未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仍存较大提升空间。河北作为主要的产业承接地,其承接能力关系到京津冀区域产业的布局以及协同发展的成效。因此,为进一步提升河北省的产业承接能力,首先,应因地制宜通过加强比较优势吸引转移产

业。其次,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以地区经济的发展带动产业承接能力的提升。再者,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合理利用外资,加强技术创新。最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此外,承接地还应重视基础设施状况,增加政府投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29]

金浩、刘肖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异质性,探索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空间关系。利用京津冀地区 1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位是否存在协同定位现象。结果表明,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在本地市场并未存在协同定位现象,但是随着空间范围的扩大,产业间的吸引力逐渐增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仅在本地市场存在挤出效应,不受周围地区的影响。低级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在本地具有挤出效应,但周围地区会对本地产业的集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降低贸易成本会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吸引力。因此,要通过完善市场体制建设,政府适当减少保护主义政策,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助力合理产业布局。^[30]

蒋佳、赵天杨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背景,研究了在该环境下相关集聚产业的融合情况。发现河北省内目前除了物流产业外,农林牧渔业、工业和建筑业同时形成了产业集聚,利用耦合度模型对河北省 2010—2016 年的数据作出分析后,发现河北省物流产业与相关集聚业的融合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目前产业融合程度依旧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各产业之间的发展没有达到协同,物流产业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其发展水平与其他产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为提升产业协同发展水平,首先应打破产业界限,形成产业融合发展局面。其次,提高各产业专业化程度,打造产业集群优势。最后,主动提升物流服务优势,充分发挥产业间的相互促进作用。^[31]

(三) 京津冀市场协同发展

杜茂宝、王述芬等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及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促进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国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也逐渐受到关注。京

津冀市场一体化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京津冀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着区域内发展差距大、极化现象严重、产业结构不合理、行政因素导致市场分割严重等问题。因此,要有序加快合作步伐、实现产业互补错位发展、完成政府在协同发展中的职能转变、持续推动区域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32]

梁林、赵玉帛等利用超效率 DEA 测算京津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并运用 GIS、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Malmquist 指数分别对京津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变机理、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京津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虽整体呈现逐年提高的发展态势,但在空间上仍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地区差异化显著;技术进步是影响京津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基于配置效率的时空格局,应推进人力资源协同共享机制,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库,基于配置效率的演变机理,应使长期处于低速增长区的城市积极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建立自下而上的人力资源需求库,强化三地政府在人力资源供给、需求信息联通中的桥梁作用。^[33]

(四) 首都经济圈与河北发展

康书生、冯艳博等指出,脱贫攻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河北省补齐短板、加快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总体来看,河北省金融扶贫在政策制定和路径选择上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区域金融扶贫协同性不足、农村贫困地区弱质性、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等问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战略和 2020 年前全部脱贫的目标下,河北省应当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进一步完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与机制,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尤其应当注重金融扶贫的长效机制建设。^[34]

孙锦、曹秀丽等认为经济新常态下,要借助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河北省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实际需求和应用现状,政府不仅需要给予现代服务业发展足够的关注,更加要在政策等层面给予现代服务业发展极大的支持,积极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要突破传统的服务业发展观念,需要不断创新思维,努力提高区域性合作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服务水平,实现现代服务业发展带动河北经济发展的目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宏观经济增长压力的不断增加,现代服务业在发展上的压力也会随着上升。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中本身便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现代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问题也很可能随之产生。这一情形下,河北省政府要科学进行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相关问题的审视和分析,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促进现代服务业更快的发展。^[35]

陈玉玲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高新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如何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在提高综合效益的前提下与所在的城市协调发展,更好地承担其带动区域发展的职责,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的问题。高新区已成为河北省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但高新区存在综合实力不强、创新发展区域不平衡等现象,需要突出协同创新的引领作用,持续优化高新区的创新创业环境,走区内和区外协同发展相互促进之路。通过区内协同发展促进河北省高新区整体创新实力的提升,实现高新区的高质量发展,使河北省更好地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36]

五、产业集群

(一)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芦雅婷、邓丽基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河北科技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河北省2013—2017年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以及科技投入和产出效益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了发现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推进河北省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研究中结合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找出河北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短板,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均衡结构发展、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以及落实已有政策并加大扶持力度等对策。^[37]

赵学礼、王贺如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由粗放驱动型转向质量驱动型,创新质量的提

升离不开技术进步,而不同技术来源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重要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基于2007—2016年期间28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法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量技术来源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对于现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言,购买国内技术、直接引进国外技术能明显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且直接引进国外技术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最大;(2)购买国内技术对规模效率的贡献更大,直接引进国外技术对纯技术效率的贡献更大;(3)自主研发引领高新技术创新发展的动力还远远不足,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红利正在消失。最后,基于以上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38]

李星、佟继英基于生态位理论,结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引入生态位理论的概念,构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生态位适宜度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生态位适宜度进行测度与比较。在研究中通过熵权法确定权重,计算各个省(市、自治区)高新技术产业生态位适宜度及排名,摸清了京津冀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现状、在全国所处的地位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对京津冀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从而更好促进京津冀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39]

(二) 传统产业集群

王金营、贾娜通过对比硅谷的崛起和发展,对雄安新区前期产业与人口发展状况及问题进行分析,认为雄安新区的人口密度不高且分布不均、有相当多农业人口、经济发展以农业和其他中低端产业为主导、实体经济中人力资本匮乏的初始状态,未来雄安新区将起到承接京津高端产业转移、承担区域后工业发展、引领新兴产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平衡南北差异的重要功能。但原有的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配置很难满足和适应这些功能,所以指出:一方面需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高端制造和服务产业转移,替代固有产业;另一方面需要对原有人力资本进行重新整合,大力引进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培养能够为新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各类人力资本。并提出当务之急是健全职业教育和教育培训体系,增加教育投入,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增强高等院校和其他科研机构为雄安新区经济建设服务的

能力。^[40]

曹宪娜认为在廊坊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工业园区特别是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业园区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而人才在加快城市转型升级、提高城市与产业竞争力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研究过程中通过访谈法对廊坊市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人才管理现状进行了调研,发现工业园区在人才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不竭动力。^[41]

(三) 河北省产业集群

张晗、成微指出自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产业协同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京津冀区域内产业仍高度趋同,天津与河北地区存在明显的竞争倾向,未来区域内仍存在巨大的产业调整空间。所以本文通过建立衡量产业承接能力的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河北省 11 个城市的产业承接能力进行评估,得到 2009—2015 年河北各城市产业综合承接力得分及排名,并通过聚类分析就各个层次城市如何提升其承接能力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提升河北省产业综合承接实力,加快京津冀深入开展产业协同。^[42]

李继勇、曹秀丽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对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大引领作用,同时也是加快产业转型、精准对接京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所以在研究中通过分析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优势,依据产业发展原则,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兴技术模式、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和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模式,从而促进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高质量发展。^[43]

杨云飞、张译方等从微观层面出发,基于科技创新视角,探究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升级发展路径。采用文献分析法和频度分析法,结合产业实际调研情况,识别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升级的关键影响要素,厘清产业升级发展的核心脉络;并立足于关键影响要素,以识别的关键影响要素为指导,从四个角度出发提出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为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相关研究奠定理论基础。^[44]

六、农业经济

(一) 县域经济

孟祥林指出以涞水县的区位优势为依托,形成以涞水县为中心的“X”形城市构架,通过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才能在京保之间实现交通整合。并根据涞水县“东端—西端”的整合发展思路,在区域内实行三城镇的集聚整合。然而,涞水县的县域经济发展只有受到大北京经济圈的辐射影响时,才能在产业上谋求经济的协同发展,但是这种县域经济辐射作用受到交通通达性的限制,所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要打破这种限制,通过增加重要交通线的停靠站点等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协同。^[45]

王凤娟、姜阔以河北省廊坊市为例,以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为基础,通过对其发展功能、产业规划等进行完善来加强周边市县经济的发展。文章从“三个协同”机制角度来进行创新,首先,以廊坊市为产业示范带,对周边市县经济起到带动和促进作用;其次,北京周边的市县经济发展要通过大力引进高科技力量,使它们内部协同发展;最后形成以廊坊市为示范带,建立市县经济发展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来共同促进协同发展。^[46]

(二) 农业现代化

韩冬梅、刘静等以农业环境为主题,回顾和展望了 40 年来的政策,认为农业环境政策可以从四个阶段来进行分析,第一个阶段是酝酿阶段,农业环境研究缺乏有效行动;第二个阶段是起步阶段,农业环境的个别领域采取方式较为分散;第三个阶段是加速阶段,农业环境的目标由单一向综合性转变;第四个阶段则是全面提升阶段,以绿色发展引领农业化的乡村振兴为主,并指出在这个现代化农业背景下,需要做到以农业农村环境保护为主体。^[47]

陈建伟从现代农业产业建设角度出发,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号召,探索农业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模式,从而提升农业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力。^[48]

李宇峰、陈镜宇等以保定市 12 个“特色小

镇”的发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特色小镇存在趋同现象,缺乏一定的特色,并且这些特色小镇存在公共设施短缺、创新不足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化农业供给侧改革进行相关的分析和研究。研究表明:农业供给侧改革需要准确发展方向,解决资金缺口的同时加大当地政府的扶持力度。^[49]

(三) 土地经济

王大本、刘兵在对京津冀区域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评价研究时,运用“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构建了土地资源承载力理论框架和相应的指标体系,并通过运用“熵值—耦合协调—灰色关联”等系统分析方法,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综合水平、影响因素、系统协调发展水平以及系统内部的关联程度进行系统评价。在研究中指出京津冀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无论是综合水平还是有序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其中“使用消费”子系统对北京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生态破坏”子系统对天津市和河北省土地资源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影响较大。^[50]

杨豪以土地改革作为社会流动机制,研究了土地改革的发生机制、运行逻辑以及实践效应,对比了理想和现实交织中的土地改革,重塑与拓展了走向边缘的地富阶层的结构性流动以及挑战中心的农民阶层的结构性流动。得出土地的流动与改革实质就是一种权力实践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动,是源自于共产党革命与乡村民众互动和互惠的结果。^[51]

马彦丽研究了农地股份合作社功能定位和发展空间情况,在发展农地股份合作社的过程中,政府始终将建立合作社与农民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作为重要课题,“固定收益+浮动分红”式的分成契约成为合作社的核心制度。然而,在实践中,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分成契约被固定租金契约广泛替代,引发了对农地股份合作社制度有效性的争论。研究从两个层面讨论了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租金契约安排:一是在土地出租人与承租人作为自然人的层面上,认为在当今中国农业生产约束条件下,由于政府投资土地改良、货币地租普及、技术进步和农业保险的发展以及有效控制契约中的相关属性,使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固定契约成为优于分成契约的制度安排;二是在完善

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层面上,认为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农户土地承包权不完整以及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权缺乏竞争市场,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可能性很小。并建议农地股份合作社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功能定位,优先选择固定租金契约,并把服务内容限定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租地契约执行、管护农地资源等方面。^[52]

(四) 农业经济政策

郭娜、李华伟基于我国2010至2016年的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将农村农业经济电商与乡村振兴互动性相结合进行仿真模拟研究。通过对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检验表明:模型能够真实地反映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村电商和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实际系统结构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调整农村电商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参数、农村电商教育投资水平参数、农业财政补贴因子、农村居民消费补贴因子4个政策变量的取值,进一步对农村电商同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政策进行模拟。模拟结果显示:影响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业财政补贴力度;相关扶持政策在农村电商和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政策效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逐步加大农业财政补贴力度,构建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对于实现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应根据农村电商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状,分阶段、有针对性地重点推进相关政策,以促进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发展。^[53]

贾浩杰、齐红梅等从农业产品电子商务扶贫角度出发,研究了河北省西部山区农业产品电子商务扶贫的模式。并针对发展过程中的限制性因素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提出创新发展“互联网+”农业产品电子商务新模式,由于河北省西部山区农业产品经济发展受到薄弱的自然环境、滞后的经济以及人才的匮乏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大力发展,所以依托国家政策扶持来发展农业产品经济需要保护和开发当地自然环境,加强农村农业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不断引进注重农业经济发展的人才。^[54]

李芳提出要促进农业观光旅游和低碳经济共同发展,低碳时代是国家整体发展的走向,农业发展提倡节能减排,以推进绿色旅游业持续发展。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农业观光旅游建设可以从

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方面是观光式农业旅游，第二个方面是体验式农业旅游。但是这些低碳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政府作为主导力量采取相应措施来推动，比如加大旅游业建设投入资金等。^[55]

七、工业经济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

严文杰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角度探讨工业协同发展路径，选取了 2013—2016 年间京津冀三地的劳动生产率进行对比，发现河北省工业劳动生产率过低，京津冀劳动生产率差距在不断扩大，降低了三地的产业关联度；并选取了 2013—2016 年三地的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河北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投资增速由遥遥领先到大幅落后于京津。同时发现三地产业链条以各自现有产业为主，存在不完整，不合理的问题。研究认为，思想障碍、政策障碍、发展定位障碍是影响京津冀工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为推动京津冀工业协同发展，要加快河北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钢铁、纺织服装、食品、医药等传统产业标准；以雄安新区为依托，深化与北京中关村、天津自贸区的合作；实现京津冀产业政策协同与对接；加强北京科技资源向津冀的辐射，重点考虑将雄安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正定新区、廊坊市北三县建设成科技成果转化基地。^[56]

郭晓杰提出了推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应把握的四项原则。第一，推动钢铁产业绿色发展，要采用“疏”与“堵”相结合的方式，推动钢铁产业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利用新技术，将钢铁产业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转化成新资源新产品；第二，让创新引领钢铁产业发展，创新产业组织结构，探索适宜的兼并重组模式，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优化升级营销模式；第三，推动钢铁产业全产业链的协同升级；第四，推动智能制造在钢铁产业的应用，实现钢铁产业与智能制造的融合共生。^[57]

（二）河北省工业转型升级

贾荣言、刘涛采用 SWOT 分析和 AHP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河北省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行研究，得出研究结论：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存在明显优势和机遇，应采用增长型战略。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河北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应实施专项计划，在重点领域实现优先发展、重点突破；建立高端化、绿色化的制造业推进体系；抓住协同发展机遇，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形成新兴产业集聚效应；在轨道交通、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领域发挥比较优势；政府加大税收扶持力度，加大创新投入，引导金融机构适应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健全京津冀人才跨区域流动机制，实施高端人才引培工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58]

王英臣、赵妍妍对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物流能力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选取了 1978—2014 年间三大产业所占比重来分析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河北省区域物流产业规模状况进行分析，发现河北省物流能力正处于发展状态。他们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可有效提升区域物流能力，物流业对各类资源的需求加深了与各类产业的联系，区域物流能力的完善进一步提高了产业结构优化。因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关注传统高能耗、低产出、高污染产业，普及产业结构信息化，搭建信息平台，协调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稳定发展。^[59]

赵经华、安岩等从当前河北省正在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实验区的大背景出发，研究颠覆性创新对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指出颠覆性创新具有投入小、检测期短和相对风险较低的优势，为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在此基础上为河北省推进颠覆性创新产业提出了建议：要以投资公司的态度和理念选择产业和企业，以招商引资为主，内部培育为辅，把握京津冀科研红利，围绕颠覆性创新产业链打造新产业集群，助推河北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的建设。^[60]

（三）自主创新

张增臣选取了影响创新能力的三个主要因素——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为一级指标，选取了地区人均 GDP、R&D 经费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专利授权数量等九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创新能力测度和评价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对河北 2010—2015 年的创新能力进行综合测算与评价，得出结论：河北省综合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创新投入力度加大，创新环境明显改善。同时指出了河北省的创新能力存在研发经费投入不足、支出经费不合理、创新资源过

于分散以及投入产出效率低等问题,并提出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和政府资助力度,运用互联网、云平台等新兴技术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实施科技创新平台提升工程,推动专利法改革,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61]

李占雷、郑坤等以河北省 30 家上市公司为对象,以 2013—2017 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因素。文章选取了与科研创新强度、经营管理能力和创新激励动力相对应的 15 个指标,度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运用熵权—突变级数确定了科研创新强度是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因素;运用耦合度分析科研创新强度、经营管理能力和创新激励动力之间的协同效应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营管理能力和创新激励动力对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62]

边继云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立的大背景下,立足于京津冀“高资源集聚与低区域流动并存、高创新产出与低区域转化同在”的发展现状,提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几点建议。第一,发挥雄安新区创新载体的开放聚合引领作用,将雄安新区打造为全球创新环境的典范,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推进创新体系系统性变革。第二,强化首都科技成果转化,建立京津冀科研成果转化共同体,打造协同发展的科技产业关联链条,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合作。第三,建立一体联动式创新链群支撑体系,为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的发展创造条件。^[63]

(四)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保型社会

孙丽文、王丹滢等从工业能源碳足迹角度对当前我国面临的生态压力及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测算了 2000—2015 年中国工业 38 个细分行业的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指数 (EPICE),并根据 EPICE 历年平均值的大小,将 38 个行业分为高压、中压和低压行业。经计算后得出结论,我国 94% 的生态压力是由电力、热力的生产加工和供给业、石油加工和核燃料加工业等高压行业造成的,我国当前仍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压力。其次运用 LMDI 分解法对影响中国工业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经济发展是工业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增加的首要因素,产业结构是高压行业 EPICE 增加的主导因素,

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是中压行业实现 EPICE 下降的重要因素,能源强度是低压行业实现 EPICE 减压的关键因素。同时提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改善传统能源结构以及开发新能源等建议,实现中国未来工业低碳发展、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推动中国工业绿色发展。^[64]

田学斌认为,京津冀共处一个生态单元,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并提出存在深层次的障碍限制了生态保护积极性的发生,如主体责任不清晰、生态补偿标准模糊、补偿形式单一、生态补偿公众参与度不足等。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京津冀要加快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理清补偿主体责任;科学确立生态补偿标准,促进补偿来源与形式多样化;扩大公众参与度,建立健全实施保障机制,推动京津冀地区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65]

王喜平、杨莉坤认为自从我国以环境保护税取代实行近 40 年之久的排污费制度之后,环保税体现了社会通过制度创新来改善生态环境的美好愿望,但是,在排污制度走向终结的历史节点时,有必要对近些年来的排污费的实际效果进行测量、评判以及反思,从而能够使环保税的实行更好地为环境治理做出贡献。文章测算了我国 2005—2015 年 30 个省份的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结果表明:除北京、天津、上海等 7 个省份的排污费征收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较为显著外,其余绝大多数省份排污费征收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印证了“费改税”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从而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66]

八、商贸经济研究

(一) 流通体制改革

郭子雪、程涛等指出,由于河北省物流产业的快速扩张,以及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在物流业的应用,物流企业对于物流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掌握未来河北省物流业人才就业量,针对性地提出合理方案引进物流人才,才能满足企业对物流人才的需求。关于物流人才需求预测的研究一般选用组合预测法。为了提高物流人才需求预测模型的

预测精度,该研究运用三角模糊数来确定组合预测法中各单项预测的权重,构建了模糊组合预测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物流人才需求在 2017—2021 年呈持续增长趋势,物流人才供给远小于物流人才需求,物流人才需求缺口呈扩大趋势。^[67]

张亚明、李艳明等认为,目前针对冷链物流 VRP 调度优化方面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一方面,关于多车型冷链 VRP 模型目标成本构成分析中少有文献考虑多车型冷链 VRP 问题;另一方面,基于冷链物流特性,顾客满意度主要由配送时间及品质两因素约束,然而少有文献在构建多车型模型时将时间与品质同时考虑进顾客满意度约束中。另外,在改进算法上,传统遗传算法的寻优效率也劣于单亲遗传算法。因此,文章在模型上试图建立更加贴近实际的多车型冷链 VRP 模型;在算法优化上,采用改进的基于局部精英保留策略的单亲遗传算法进行求解,并且量化分析单车型配送和多车型配送时的成本差异。结果显示:多车型混合配送模式较单车型更能有效降低成本,且改进的局部精英单亲遗传算法具有更好的收敛性与稳定性;同时揭示了满意度随成本优化过程的变化趋势,表明满意度约束多车型 VRP 模型更适合冷链配送调度,为企业寻求成本与满意度均衡提供决策支持。^[68]

樊俊花指出,农产品物流效率对我国农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农产品物流又对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农产品物流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在运输过程中对产品的损耗和其高额的运输成本与较低的运输效率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对农产品产业化改革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应当以外在环境、内部组织和整体利润等方面组成的农产品物流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大力度的研究构建,使其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文章以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各个角度进行研究,以其外部环境 with 内部流程对农产品物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进行研究,为我国农产品物流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条件,将农产品物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深入研究完善,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69]

(二) 零售产业组织优化

杨念、王蔚宇等指出,零售业态已由单一性向多元化发展,以顾客为中心的零售业态升级成

为全社会焦点,如何围绕提升顾客满意度的诉求引导消费、扩大内需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从产业融合理论视角深入研究电子商务技术、流通组织等对零售业升级的影响作用对于打造多样性零售业态、提升顾客价值体验、激发消费潜力具有积极意义。文章以产业融合理论为视角剖析零售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构建 Panel Date 模型深层次分析制约零售业态转型的原因。结论显示,电子商务技术发展、互联网普及率、流通组织结构能够显著促进零售业态升级,而外资企业进驻加剧了零售业市场竞争,对整体盈利水平的提升呈现反向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趋于平稳。据此提出以下建议:加强电子商务技术发展,提升互联网普及率;提升零售产业链地位,致力“新零售”业态的推广;着力发展自有品牌,增强顾客的场景体验感;借力社交营销与数据营销,打造生态多样化零售业态。^[70]

陈松奕、崔艺指出,新零售背景下,消费者对物流的及时性和服务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数据驱动创新是我国物流企业及其他相关传统企业实现创新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创新模式,我国物流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对客户行为进行挖掘分析,以此帮助物流企业进行合理决策,从而实现物流企业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动匹配,最终推动社会化物流体系效率的提升。据此,文章在分析新零售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数据驱动分析了我国物流企业创新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并从物流企业自身板块数据融合、创建共享数据库及创新数据价值服务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我国物流企业数据驱动创新的方法。并提出如下建议:整合物流企业内外部板块数据资源,实现各板块信息资源的协同创新;与第三方合作共建数据资源开放网络平台,创新各主体以及客户之间的数据共享服务;挖掘物流企业自身数据价值,为第三方企业提供新的增值服务;国家需要尽快完善个人隐私保护政策,使企业通过正当的手段收集消费者行为信息。^[71]

薛楠、齐严指出,由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传统模式进行颠覆和重塑,北京零售业发展的现实与趋势可以为我国零售业的发展提供先进样本与现实参考。文章深入探索“新零售”背景下北京市零售业的发展趋势,发现符合“跨界经营与做

大做强”“国际化与民族化和谐共生”“体验化、智能化与无边界化”等几个特征。通过对北京市零售业发展的现实数据与典型案例进行综合分析,发现零售业的发展与所在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联,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城市科学技术环境条件等都可以为零售业发展带来动力与机遇。^[72]

(陈志国:河北大学教授,
席增雷: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 马宇博,裴桂芬.京津冀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测评与提升路径研究[J].经济问题,2019(6).
- [2] 王欣,王海蓉.十九大后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征程过程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9(10).
- [3] 柳天恩,田学斌,曹洋.国家级新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J].财贸研究,2019,30(6).
- [4] 赵青霞,夏传信,施建军.科技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和区域创新能力——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24).
- [5] 阎东彬,范玉凤.京津冀城市群功能空间失衡状态测度及治理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4(2).
- [6] 李昌明,刘海滨,张向东,张富强.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新能源产业集群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及模式选择研究[J].科技经济导刊,2019,27(31).
- [7] 王春蕊.加快发展海洋特色产业[N].河北日报,2019-03-27(007).
- [8] 吴必善.经济新常态下区域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22(13).
- [9] 张亚明,杜翠翠,何旭.特色小镇 IFIC 核心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河北实践的思考[J].商业经济研究,2019(1).
- [10] 颜廷标.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N].河北日报,2019-06-05(007).
- [11] 朱晓霞,王成亮,孟建芳,史佳睿.“三链”融合下网络协同制造下企业合作竞争机制研究[J].现代制造工程,2019(7).
- [12] 陈建伟.多措并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N].河北日报,2019-08-07(007).
- [13] 陈璐.加快建设“微中心”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N].河北日报,2019-05-08(007).
- [14] 宋之杰,唐晓莉.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信息产业关联效应分析[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49(8).
- [15] 贾巨才,孔伟,任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冀西北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2).
- [16] 吴永立,王楠,刘雨萌,任玥.基于 SWOT 分析模型的河北省冰雪经济发展策略研究[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9(3).
- [17] 陈丽莎,孙伊凡.城镇化对中国农村减贫的效应分析及对策建议[J].河北学刊,2019,39(5).
- [18] 张春玲,杜丽娟,马靖森.县域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40(1).
- [19] 刘玲,杨欣玥.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状及对策[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31(3).
- [20] 李志红,宋剑.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河北省产业选择研究[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21(4).
- [21] 梁俊仙.城镇化背景下冀西北地区社火保护策略[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2).
- [22] 陆刚,孙芸莉.电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基于河北省实践的再思考[J].当代经济管理,2019,41(8).
- [23] 王金营,李庄园,谢秋实.公共服务全面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之固本大计[J].河北学刊,2019,39(3).
- [24] 岳晓鹏,刘畅,吕宏涛,王君.城镇化背景下天津乡镇农村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初探[J].现代城市研究,2019(6).
- [25] 金浩,李瑞晶,安明.三重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8(1).
- [26] 户艳领,李丽红,张婉双,张学军.京津冀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及在环境协同保护中的应用研究[J].统计与管理,2019(6).
- [27] 李丽红,宋剑,刘志广,杜锦锦.基于承载力评价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6(2).
- [28] 王树强,徐娜.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环境效应及其影响机制[J].企业经济,2019,38(2).
- [29] 张晗,舒丹.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影响因素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9(3).
- [30] 金浩,刘肖.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J].中国科技论坛,2019(10).
- [31] 蒋佳,赵天杨.京津冀协同发展融合策略研究——以河北省物流产业与集聚产业为例[J].情报工程,2019,5(2).
- [32] 杜茂宝,王述芬,杜琳,鹿艳茹.京津冀市场一体化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玻璃,2019,46(2).
- [33] 梁林,赵玉帛,朱叶珊,赵雪.京津冀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时空格局、演变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3).
- [34] 康书生,冯艳博,郭小卉.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金融扶贫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 44(2).
- [35] 孙锦,曹秀丽,张凤仪.京津冀协同背景下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4).
- [36] 陈玉玲.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19(4).
- [37] 芦雅婷,邓丽.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科技和产业,2019,19(9).
- [38] 赵学礼,王贺如.技术来源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9,39(4).
- [39] 李星,佟继英.京津冀高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研究——基于生态位理论[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3).
- [40] 王金营,贾娜.雄安新区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源适应配置研究——对比硅谷启迪雄安发展[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0(4).
- [41] 曹宪娜.创新转型:廊坊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工业园区人才管理展望[J].营销界,2019(16).
- [42] 张晗,成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各城市产业承接能力研究[J].特区经济,2019(10).
- [43] 李继勇,曹秀丽.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研究[J].北方经济,2019(9).
- [44] 杨云飞,张译方,陈宾.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升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科技创新视角[J].中国商论,2019(5).
- [45] 孟祥林.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涞水县城镇体系发展对策分析[J].城市,2019(4).
- [46] 王凤娟,姜阔.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带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商讯,2019(32).
- [47] 韩冬梅,刘静,金书秦.中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政策四十年回顾与展望[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9,44(2).
- [48] 陈建伟.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N].河北日报,2018-11-02(007).(年份不符)
- [49] 李宇峰,陈镜宇,冯硕,张寒蒙.保定市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研究[J].内蒙古煤炭经济,2019(17).
- [50] 王大本,刘兵.京津冀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9,33(2).
- [51] 杨豪.社会流动视域下的土地改革再探讨——以冀中解放区为中心的考察[J].人文杂志,2019(6).
- [52] 马彦丽.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固定租金契约优于分成契约——兼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空间[J].农业经济问题,2019(3).
- [53] 郭娜,李华伟.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19,27(4).
- [54] 贾浩杰,齐红梅,尹登博,和晓霞,陈则谦,邢慧斌.河北省西部山区农业电商扶贫的策略探析[J].现代营销(经营版),2019(1).
- [55] 李芳.低碳经济背景下农业观光旅游发展研究[J].山西农经,2019(7).
- [56] 严文杰.京津冀工业如何实现协同发展[J].中国统计,2019(1).
- [57] 郭晓杰.把握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四个原则[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2-20(004).
- [58] 贾荣言,刘涛.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SWOT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19,37(1).
- [59] 王英臣,赵妍妍.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物流能力互动关系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9(2).
- [60] 赵经华,安岩,韩晓虎.以颠覆性创新助推河北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J].智库时代,2019(14).
- [61] 张增臣.河北省区域创新指数构建研究[J].统计与管理,2019(1).
- [62] 李占雷,郑坤,杨金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北省上市公司的实证[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4).
- [63] 边继云.以科技创新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N].经济日报,2019-04-07(007).
- [64] 孙丽文,王丹涪,杜娟,韩莹.基于 LMDI 的中国工业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因素分解研究[J].生态经济,2019,35(1).
- [65] 田学斌.构建京津冀生态补偿长效机制[N].经济日报,2019-09-11(015).
- [66] 王喜平,杨莉坤.排污费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J].生态经济,2019,35(7).
- [67] 郭子雪,程涛,张雅辉.基于模糊组合预测的河北省物流人才需求预测[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1).
- [68] 张亚明,李艳明,刘海鸥.满意度约束多车型冷链物流VRP 优化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9,35(4).
- [69] 樊俊花.农产品物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农业经济,2019(2).
- [70] 杨念,王蔚宇,杨孟阳.电商技术、流通组织与零售业态升级[J].商业经济研究,2019(9).
- [71] 陈松奕,崔艺瑄.新零售背景下我国物流企业数据驱动创新路径[J].商业经济研究,2019(11).
- [72] 薛楠,齐严.“新零售”背景下北京市零售业发展现状与趋势探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9(17).

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

孙健夫

2019年,河北省财政学界立足于推动财政学理论建设和积极有为的财政体制机制建设以及支持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标,追踪财政学研究前沿热点问题,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年内,省财政厅、河北大学和河北经贸大学的12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中国财政学会2019年会暨全国第22次财政学理论讨论会,河北省财政学会也组织召开了2019年会暨理论讨论会。多名专家学者提交了学术论文,受邀在会上作主题演讲,得到了广泛好评。张晋武教授还应约参加了在廊坊召开的财政学基础理论研讨会。综合来看,本年度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六个方面。

一、关于公共经济理论研究

公共经济理论与公共财政理论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以至于财政学界有人直接将公共经济与公共财政等同看待。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财政学界对公共经济理论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齐守印研究员在该领域的贡献相当显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能够花落于他的手中,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围绕着该项目的研究,齐守印研究员已经有了系列成果。

他和解建立合作完成的《我国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边界划分及其优化路径研究》是该项目的最新成果之一。他们认为,科学界定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活动边界对经济政治体制理论研究和深化改革社会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之所以需要明确划分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活动范围,是因为公共经济和民间经济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中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或大类部门。在这两大部门所提供的物品中,有些是凭借感性直觉和历史经验就可以明确区分应该由谁负责提供的,如国防、外交和法律秩序、产权制度安排等,自然需要由公共部门来提供;但也有许多是可以根据客观条件、居民偏好或公共部门意

愿进行主观选择的。从制度上界定公共经济的范围,就能够保证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相互清晰,不受侵犯,保证个体行为方式能够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观察我国的经济实践,公共经济活动范围错位现象,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方面同样大量存在。一方面,国有资本不断退出战略资源开发、城市基础设施、自然垄断行业、金融保险、先进设备制造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另一方面,许多国有资本却大量滞留在甚至被投放于宾馆饭店、休闲度假等纯属竞争性产业领域。这些明显错位问题既制约了公共经济服务民间经济和改善人民公共福利等应有功能的有效发挥,也不利于民间经济活力的充分释放。优化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边界划分应考虑市场失灵原则、主体属性原则、内在属性原则、占比适度原则和历史性原则。^[1]

在公共经济体系中,国有资产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齐守印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公共经济理论是研究国有资产管理问题的最佳视角。他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按照通常理解,所谓国有资产就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所占用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以及国家持有产权、具有经济价值的各种自然资源;这些经济资源通常以总资产和净资产(所有者权益)显示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之中。这固然不错。但这种理解只是一种表层认识,尚未能从深层内在联系上把握国有资产的本质,因而既难以据此分析判断国有资产管理及其体制机制中存在的根本性弊端,也难以准确把握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实现路径。要想突破这种局限性,必须借助于最佳的理论视角,以能否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的基本功能作为判断依据,通过深入观察和系统分析找出问题及其根源所在,依此判明通过深化改革优化国有资产管理及其体制的正确方向。分析研究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管理及其体制,应当以哪一种理论作为最佳观察视角呢?这必须依据国有资产、国有资

产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基本属性加以判断。毋庸置疑,国有资产属于经济范畴,国有资产管理属于一种经济管理,因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属于一种经济体制。进一步的问题是,国有资产属于哪一类经济范畴,国有资产管理属于哪一种经济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属于哪一类经济体制?无需详论,国有资产肯定不属于民间经济范畴,国有资产管理自然不属于民间经济管理,以此推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无疑也就不属于民间经济体制。这是因为,国家自产生后一直是公共经济的受托代理和实际组织主体,国家受社会成员之托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必须以占用、配置、运营各种必要的经济资源为物质手段,而这些经济资源在财务会计层面就表现为与负债相对应的资产,故名之为国有资产。由此可见,从本质上考察,国有资产属于公共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国有资产管理乃是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则是整个公共经济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重要侧面。既然如此,分析、研究国有资产管理及其体制的最佳视角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公共经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及其体制改革的实践也必须以公共经济理论为指导。反之,如果撇开公共经济视角,将很难将国有资产存在的必要性、国有资产的基本功能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从理论上透析并论述清楚;脱离公共经济理论指导,也就很难自觉而正确地系统推进国有资产管理及其体制改革。^[2]

齐守印、何碧萍还指出,从公共经济学视角考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所要规范的主体对象是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产权代理人、各层级管理者和资产占有者、经营者。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所要规范的不是国有资产相关主体本身,而是国有资产产权运行过程中各类、各层人格化主体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的行为,特别是他们之间围绕国有资产运营管理逐级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核心是各主体之间的广义产权暨责、权、利关系。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纵向和横向多维度的责、权、利关系都是需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规范和调节的客体对象。因此,在公共经济视角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指着眼于正确处理公共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矛盾,有效调节公共经济生产关系,充分发挥各类国有资产的固有功能,不断提高公共经济效率,合理安排各相关主

体之间的产权权能结构,从多维度上科学划分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国有资产管理责任和权力,恰当处理各相关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一整套制度规则体系。^[3]

二、关于财政改革与治理研究

(一) 建设新时代高质量财政

新中国成立 70 年之际,高云霄回顾了 70 年河北省财政所走过的道路,对新时代河北省建设高质量财政提出了设想。她做了四个方面的分析:首先,理财思路须因时而变,但政治引领的遵循不能变。70 年来,河北财政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相应确定每个时期的理财思路,有力推动了财政工作开展。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北财政立足新时代财政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将全面建设高质量财政、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全省财政工作的总目标,确保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财政部门真正落地落实,以财政之进服务全省改革发展大局。其次,支出结构须因事而变,但惠民利民的初心不能变。70 年来,河北财政始终围绕群众所需所盼,不断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雨露惠及人民群众。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北财政认真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生作为优先保障领域,研究出台《财政保障民生政策落实十项举措》,全省民生支出占比始终保持在 80% 以上,有力保障了中央、省各项民生政策落实和 20 项民心工程顺利实施。再次,财政改革须因势而变,但勇于创新的传承不能变。70 年来,河北财政始终勇立改革潮头,1998 年率先启动部门预算改革,2001 年最早试编社保基金预算,2008 年第一个探索发展性财政支出三年滚动预算。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北财政积极适应新时代要求,继续争当全国财政改革排头兵,预算绩效管理、水资源税、环保税、国有资产报告制度等多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圆满完成差旅电子凭证网上报销全国唯一试点,财政部专门在河北省召开财政核心业务一体化系统建设现场会,相关经验向全国推广。最后,干部素质须因需而变,但拼搏竞进的精神不能变。积极搭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舞台,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和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为全面建设高质量财政提供坚强队伍保障。^[4]

2019年是河北深入推进高质量的财政建设年,高云霄强调要以“六个更加注重”为指导原则建设高质量财政。一是准确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原则,更加注重“财随政走”“政令财行”;二是准确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更加注重壮大优质财源、助推高质量发展;三是准确把握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新判断,更加注重防范风险、持续保障;四是准确把握“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更加注重精准施策、有效供给;五是准确把握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的部署,更加注重政策落地、务求实效;六是准确把握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要求,更加注重改革创新、拼搏竞进。^[5]

高云霄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河北省财政部门要勇于攻坚克难的思路。她认为,当前财政改革发展已到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财政干部必须有勇于担当的精神。推动全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有许多硬仗要打,要注重用好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着力支持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强省等系列三年行动计划和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万企转型等部署落实。推动减税降费各项政策落实,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要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和调研督导力度,确保政策不折不扣落实,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还有很多难题要破解,必须继续完善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其激励约束作用,引导县级加强高质量财源培育,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后劲。推动财税改革在基层落地,也还有不少难关要攻克,预算绩效管理、财政体制、税收制度等改革都要加快步伐、统筹推进。^[6]

(二) 县乡财政管理

赵志伟、杜建政在文章中指出,我国县乡财政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县乡财政职能由粗放向精准、由管理向服务、由单一向多能转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治理职责,但也面临着宏观调控能力弱、自主权较小、管理水平亟待提升等问题。为此,在体现增长共享的基础上,如何加强县乡财政管理,迫切需要从体制设计、财源

培育、公共服务提升、重点领域保障等层面予以破题。一是围绕财政体制改革,建设激励相容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一方面,实现财政层级扁平化管理,探索推进乡镇财政机构条线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实现县乡财政体制统一。坚持强化县级宏观调控原则,结合“乡财县管”的管理经验,逐步将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统一规范为“统收统支”体制。二是围绕培植高质量财源,推动建设高质量的县乡财政。推动县乡财源高质量建设,首要是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各项经济政策引导作用,促进县域优质资源要素统筹整合、优化配置和集成化利用,进而推动县乡财源规模和质量双提升,实现县域经济发展与财政增收、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三是围绕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建设责权匹配的县乡财政。随着城乡融合进程加快推进,需要各级政府为城乡居民提供标准统一、制度并轨的基本公共服务,并从资金安排上给予支持和保障。四是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强化县乡财政资金管理。必须从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着手,使县乡财政职能作用得到更好地发挥。要着力提升县乡财政预算管理水平,做好财政资金安全和风险防范化解,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7]

(三) PPP 项目建设

PPP项目模式是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对公共建设项目投资方式所实施的一项改革创新。由于涉及到广泛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的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此项改革的进展,存在不少的争论。2014年以来,河北PPP模式推广工作始终坚持质量为本、规范运作,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河北省财政厅对已有的工作进程和经验进行了总结。首先,他们认为,质量和规范性是PPP模式健康发展的根本和基础。因此,河北省始终坚持规范运作,示范引领,发挥示范项目在引领规范运作、带动区域发展、推动行业破冰、推广经验模式方面的作用,努力打造PPP项目的高质量样板标杆,推动整体工作水平不断提升。其次,他们认为,PPP项目运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既涉及政府又涉及社会资本、中介机构,既涉及政策层面,又涉及法律、工程、招标、管理和技术等层面,专业化程度要求很高。为此,河北省财政厅主动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参与业务培

训、项目评审、规范辅导等活动,让专业人做专业事,有疏有堵、综合施策,努力促进项目全生命周期规范运作。再次,他们强调坚持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以外部监督促规范运作。通过建立省市县三级信息公开责任体系,对 PPP 信息披露(更新)的内容、时限、载体等作出明确规定,并大力推动制度落实,保证项目透明度不断提升。严格实施 PPP 项目库平台管理,按照“能进能出”原则,全面强化监督考评生命周期动态跟踪管理,强化监督考评。^[8]

谢恒等提出了将建筑信息化模型应用于 PPP 项目,以帮助大量 PPP 项目解决项目建设全过程中绩效评价难题的思路。建筑信息化模型是一个完备的信息模型,能够将工程项目在全生命周期中各个不同阶段的工程信息、过程和资源整合在一个模型中,方便被工程各参与方使用。通过数字化手段,此项技术在计算机中建立出一个虚拟工程,并提供一个单一、完整、包含逻辑关系的工程信息库。这些信息的内涵不仅包括几何形状描述的视觉信息,还有大量的非几何信息,如构件的造价和采购信息等。该模型应用的精髓在于这些数据能贯穿项目的整个寿命期,对项目的建造及后期的运营管理持续发挥作用。建筑信息化模型在建筑领域中的应用已经取得了广泛认同,将其应用于政府和 PPP 绩效评价具有可行性。因为 PPP 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整个周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需要一套全方位的绩效评价体系作为保障,建筑信息化模型正是适合建筑企业从项目开工建设到后期运营管理的全面评价技术体系。如果基于建筑信息化模型的某一阶段绩效评价结果不理想,说明项目在该环节出了问题;如果项目的绩效评价结果比较好,说明项目建设从前期规划到资金投入到工程进度到施工监理再到运营管理均实现了有效的落实。^[9]

吴玉凤、郭海玲分析了降低 PPP 项目增值税成本问题。他们认为,PPP 模式本身存在较大的增值税成本效应。政府作为非税主体,会因纳税主体变化而缴纳增值税,使得政府的收入出现再分配过程。从世界范围内看,PPP 模式中存在的增值税成本效应是普遍性问题。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不同做法,主要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效应。虽然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一些普遍性做法在不同的主体间都具有一定的适用

性,因而可以从中提取对我国 PPP 项目执行有益的经验或启示。^[10]

(四)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

基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宋立根等对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科学设计基本公共服务的分类技术标准及相应领域的具体技术指标体系,核心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实现问题。从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来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统一性的基础,是财政支出责任和财权配置的统一,不统一的后果是“事权大、财权小”或者“有责无权”。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政府和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极其脆弱,公共服务标准水平低,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顺序和标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以法律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强制性、长期性、稳定性的特点,在提供大体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就会促使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果均等,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更重要的是避免财政资金配置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问题发生。^[11]

三、关于财政税收政策研究

(一) 财税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降成本、补短板的经济举措在近几年的财政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李东松和赵志君在综合考虑政府转移支付等公共服务支出对消费所产生外部性影响的基础上,利用标准新古典理论框架,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基于不同的消费偏好规定,分别从理论上考察了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政策变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他们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降一补”任务已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把税率看作生产与消费的约束条件,考虑公共服务支出对消费的外部性影响,将消费税率、劳动税率和资本收益税率以及政府转移性支付等公共服务支出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从而构建一个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税率与公共服务支出所占份额变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在独立可加与非独立可加两种效用偏好假定下进行理论推导,并以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产出比

率数据为基准值进行数值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1) 产出与各税率均负相关; (2) 产出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消费函数中所占份额的关系则因税种、效用偏好不同而存在差异。作者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是: 首先, 要切实贯彻、循序渐进执行结构性减税政策, 逐步释放减税政策对不同要素的激励效应, 激发企业的生产活力, 提升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增强消费动力, 扩大内需, 从而提高产出。其次,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对产出的影响, 不仅与税种有关, 而且也可能与居民的消费偏好有关。所以, 考察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补短板”的产出效应要综合税种与居民偏好等因素。^[12]

赫连志巍等研究了创新基金和税收减免在创新网络活跃能力对产业集群升级影响方面的调节作用。按照他们的解释, 在集群创新网络中, 各节点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能力不同, 要想提升集群整体创新水平, 各节点之间的联结活跃能力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创新网络的结构属性及影响关系, 作者提出了创新网络活跃能力概念, 并建立其概念模型。通过多元回归研究得到创新网络活跃能力对集群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税收减免政策在创新网络活跃能力与集群升级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而创新基金在创新网络活跃能力与集群升级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结合创新网络活跃能力提升以及创新支持政策的完善, 作者为集群的升级发展提出了对策与措施。^[13]

(二) 财政支持农业发展政策

党的十九大提出, 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建设现代农业。河北省委省政府为落实这一政策精神, 进一步具体做出决定, 在全省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 完善政策体系, 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马磊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河北推进农业现代化工程, 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必然选择, 是破解“谁来种地”“地怎么种”难题的关键举措, 对于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北财政一直在研究如何处理好财政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 努力通过

“无偿”和“有偿”的支持方式,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尽量减少行政支持示范基地等“戴帽子”的办法, 更多依靠改革并运用市场力量,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政扶持政策体系, 通过进一步整合财政资金更加公平有效、更加科学地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快速发展。今后财政部门应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优化资源配置, 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 继续加大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 加快构建符合河北推进农业现代化需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扶持体系。其完善方向应围绕建立项目扶持精准投向机制、建立财政投入新型经营主体的资产权属机制、财政支出用途更加精准、建立涉农资金绩效管理制度而展开。^[14]

随着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即由高投入高资源消耗的农业发展方式向优质、高效、绿色、环保的可持续现代农业转型, 已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急迫要求。崔海霞等以此为主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其主要观点是: 中国农业面临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 亟须改革农业政策体系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欧盟与美国在农业发展中同样经历了从片面追求产量向高效环保转变的过程, 在转型过程中的政策调整和政策工具选择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并具有一定的共性规律。作者以OECD政策评估系统投入限制政策标签为基础, 对美国、欧盟农业政策及政策调整过程中的潜在环境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 发现两地区在农业支持政策的演进中, 越来越重视政策的环境影响, 主要通过强制性投入限制的政策方式, 并且支持政策逐渐从资源退出向在用资源有效管理转变, 但两地区均未改变市场价格支持的重要地位。最后从对中国的政策启示角度, 提出了以强制性投入限制政策获取最低环境效益、注重市场价格支持措施、注重技术服务支持、补贴逐渐脱钩化等政策建议, 为我国农业政策的转型与创新提供借鉴。^[15]

(三) 财政支持生态保护政策

京津冀作为一个紧密相连的生态区, 近年来从中央政府到三地政府都十分重视相关的政策协同问题。杜建政从分析京津冀的功能定位出发, 对涉及三地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研究。他指出, 开展跨区域生态补偿, 是践行受益者付

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理念的有益探索,有利于调动生态保护各方积极性,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从京津冀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来看,补偿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大气、水环境等领域,森林、草原等诸多领域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未纳入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由双方或三方共同协商确定,尚未从制度层面构建起系统全面的政策体系。按照中央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意见确定的生态环境保护原则,政府应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居于主导地位,要从制度建设、法规政策、体制机制上加以引导,采取经济、法律等手段,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落实到京津冀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层面,具体应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即重视和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区域生态补偿系列制度体系;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构建多元化、制度化的生态补偿机制;重视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构建统一规范、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16]

李素英等基于煤炭资源开发负的外部性研究了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他们认为,煤炭资源开发负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对水资源的污染、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和对大气环境的污染方面。补偿主体主要包括煤炭企业和政府;煤炭资源开发负外部性的受偿主体包括生态环境系统和矿区周围居民及其财产;制定补偿标准一要考虑生态环境治理和恢复成本,二要考虑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补偿方式基于煤炭资源开发带来的一系列负外部性,应当由开发者和受益者进行补偿。首先,应当是煤炭开发前的防范性补偿,在进行煤炭开采之前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其次,开发后的补偿主要是对新账和旧账的补偿。^[17]

(四) 财政支持社会保障政策

耿永志研究了农村低保制度的公平性问题。他认为,农村低保作为一项基本反贫困制度安排,公平性是首要价值性目标,同时也是基本的过程性要求。具体来讲,作为兜底性“社会安全网”,要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满足困难群众最起码的生活需要,维护他们生存发展的平等权利。农村低保制度的这种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在制度目标、制度框架、制度内容、制度执行等各个环节,通过各环节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然而,农村低保制度自

建立开始就一直饱受诟病,“错保”“漏保”等现象经常被暴露出来。这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信任度。作者以“福利治理”理论为依据,把农村低保制度实施的各环节作为研究观测点,从农村社会治理的现实乡土情境案例出发,将传统的“影响论”“治理论”两个分析思路进行综合,提出全新的多维福利治理分析框架,并对农村低保公平性问题进行验证和分析,以寻求关键影响因素和有效治理方案。该方案将农村低保政策执行过程划分为若干节点,在每一个节点上,以公平正义为导向,从目标(O)、主体(B)、关系(R)、过程(P)几个方面设定具体治理要求,并对现实差距给出定性判断,进而从技术(T)、体制(S)、利益(I)、环境(E)等四个方面分别探求差距背后的原因,对影响因素在各个节点上的重要性进行统计,然后根据重要程度大小确定关键因素,最终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18]

(五) 财政扶贫政策

崔元培等对建国70年来的国家扶贫政策演变与效果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和分析。他们指出,从扶贫政策的效果与政策模式来看,中国的扶贫政策大致经历了如下阶段:以救济、平均分配为主的扶贫阶段,以贫困地区开发为主的阶段,扶持贫困人口扶贫阶段,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阶段。各阶段扶贫政策相互交叉、逐步发展与过渡,扶贫目标由相对分散向精准集中、扶贫主体也由单一向多元转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贯穿于中国扶贫政策演变过程中,应继续形成多元互助开发组织体系,增强扶贫瞄准的针对性。^[19]

2019年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倒数第二年。在这个关键时期,精准扶贫的政策还有什么值得重视调整完善的方面?宋凤轩和孙颖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当前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不合理、扶贫主体信息不对称、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从而影响财政扶贫效果的发挥。在贫困识别上,基层政府在贫困户标准的认定上同国家标准存在偏差,民主评议的弊端导致财政扶贫资源的浪费;在财政扶贫资金支出结构上,差异化财政扶贫政策的设计带来了贫困群体受益不均衡,资金投向与政策预期效果之间存在偏差,影响扶贫效率;在扶贫信息

共享上,扶贫相关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宏观政策统筹与微观主体需求之间出现“脱节”;在扶贫资金管理上,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核制度以及扶贫项目审批的规范性还有待提升。基于以上问题,我国财政扶贫政策须继续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的科学配置与严格监督,进一步优化贫困识别机制与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机制,以完善的配套措施辅助提升精准扶贫资金的瞄准度,以科技助力精准扶贫效率的提升;以大数据带动实现扶贫资金的动态监管,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化发展;通过健全的财政扶贫资金监督体系,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进一步优化绩效评价和考核体系,并通过简化、规范财政扶贫资金审批程序,提高财政扶贫资金审计的公开程度,保证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20]

邢慧斌、刘冉冉发表论文,专题研究了集中连片特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绩效评价问题。他们认为,教育扶贫是集中连片特困区实现脱贫的有效路径和必然选择。实际上,教育精准扶贫在取得成绩同时产生了扶贫绩效的空间差异,而国内外对该问题鲜有关注。论文在全面阐释了集中连片特困区教育精准扶贫概念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技术系统构建了集中连片特困区的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并以燕山—太行山区8个连片特困县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这8个县的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著,但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这既表现在宏观层面的不同特困县综合绩效和均衡绩效的差异,也体现在微观层面的“贫困精准识别”“教育精准帮扶”“扶贫支持环境”等评估指标之间均衡绩效的差别。今后集中连片特困区应在贫困精准识别、教育精准帮扶以及教育扶贫支持环境等方面继续加大扶贫攻坚的力度,精准识别各贫困县和村的脱贫短板,开展更有针对性的精准帮扶及改善扶贫环境,以推动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脱贫攻坚。^[21]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在国家整体的精准扶贫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脱贫策略?王金营等认为,在这类地区贫困家庭在医疗、教育、养老方面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究其原因,农村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水平低,缺乏生产自救能力,获取相关能力的机会也有缺失,并且在缺乏公共服务供给的情况

下,没有能力寻找其他补救的方法。而且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老年人家庭的问题日益凸显。为此,应针对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老年家庭等,从公共服务的视角制定出一套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政策,有计划、有阶段性地帮助其改善贫困状况。^[22]

段世江和张雪在对燕山—太行山片区的减贫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强调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是实现脱贫致富长效机制的实践路径。其实质就是脱贫攻坚要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立足脱贫实际和乡村振兴要求,统筹谋划。一是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利用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为劳动力就地转移、农民就地增收拓展渠道。二是始终把优化城乡布局作为抓手和基础性工作。建立以城镇为基础的人口配置体系,有序推进村庄撤并集中居住工作。三是始终将扶贫攻坚与县域发展有机结合。在决战决胜打赢脱贫攻坚战之际,既要坚持到村到户到人的扶贫模式,更要着眼区域整体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着力推进全县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壮大县域经济规模和实力,为顺利推进脱贫攻坚和巩固脱贫成果提供支撑。^[23]

农村扶贫与涉农资金存在着密切联系,资金的使用方式“多龙治水”,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益,也制约着扶贫工作的成效。为此,2016年发布《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同时启动了新一轮的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司爽等研究河北省涉农资金整合情况的结果表明,截至2018年底,在省整合方案的引领指导下,纳入财政资金整合范围的全省6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均制定并实施了涉农资金整合归并方案以及有序退出方案,制定完善了整合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对本省具体贫困地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归并工作进行指引。以规划为引领,是河北省整合归并财政涉农资金的重要举措。同时,河北省审计部门加大扶贫项目落实情况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绩效的监测和揭示、审计监督力度,提高审计信息化程度,提升扶贫项目大数据审计水平,也对涉农资金助力精准扶贫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24]

四、关于财政绩效评研究

(一) 绩效预算考核体系建设

李杰刚等认为,预算管理是政府运行的基础和重要保障,实施全面绩效管理,考核政府绩效,构建绩效预算考评体系必不可少。本质上,绩效预算考评体系是政府绩效管理考评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必然归宿。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绩效预算考评体系,必须从这一判断和认识基础之上,进行科学谋划和全新设计。初步确定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绩效预算考评体系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强国富民导向,按照激励相容、突出重点、公开透明、分步实施的原则,加强顶层设计,着力构建新时代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绩效预算考评体系,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百年目标提供必要保障。根据上述思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绩效预算考评体系的重点任务,无非就是积极补齐前置条件、努力推进自身改革,这就需要立足国家视角,从国家治理、预算管理、考评管理三个层面作如下重点布局:一是以国家机构改革为契机,持续优化国家治理体系。二是以绩效预算改革为重点,持续改进政府预算管理。三是以健全考评体系为目标,着力解决考评技术难题。^[25]

(二) 教育支出绩效评价

教育支出的绩效评价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胡德仁等以河北省的小学教育支出为对象,从教育成本角度对地区间的学校教育支出绩效评价进行了探索。他们认为,现有的研究没有考虑地区间小学教育支出成本上的差异,把地区间小学教育支出成本和效率混为一谈,一些学者的研究虽然考虑了这些影响效率的因素,但是在研究中没有剔除地区间生均教育成本的差异,并不能客观地反映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真实水平,评价的结果造成生均教育成本高的地区效率低,绩效评价的结果就会有失公平,评价的结果就会缺乏公信力。作者选择了人力资源投入指标、财力资源投

入指标和小学教育产出指标,运用包络分析方法,对全省 25 个县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测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教育的基本国情是“穷国办大教育”,尽管近年来中国对小学教育投入在持续快速增加,但由于教育成本的增加和人们对优质教育的追求,可以预计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小学教育投入不足的局面还会存在,要使小学教育走出资源短缺的困境,不能光靠增加投入,更应注重提高资源利用率,使小学教育的资源利用从粗放向集约转变,推动我国小学教育事业由外延到内涵式发展,走科学发展之路。^[26]

在另一篇文章中,胡德仁等又对河北省高等学校的资源配置绩效评价进行了研究。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的公办性质,决定了对学校的资源配置关键在于财政支出的结构是否合理。他们认为,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但与此同时,部分高等院校却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和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作者以河北省所属高校为研究对象,设计了投入产出指标,采用 DEA 方法,进行了全面性绩效评价。他们的研究结果是,2014—2016 年,财政支出效率最高的分别有 9 所、5 所、8 所大学,财政支出效率较高的分别有 8 所、10 所、10 所大学,财政支出效率较低的分别有 6 所、8 所、4 所大学,财政支出效率最低的分别有 6 所、6 所、7 所大学。在分析效率不高的原因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政策建议:整体上应统筹各类高校资源,优化内部配置结构;人力资源方面,应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完善绩效薪酬制度;物力资源方面,应引入资源共享模式;财力资源方面,应引入绩效拨款制度,实施办学成本核算等。^[27]

王玉蕾等关注了高校学生助学金的发放问题。他们认为,国家助学金在地方高校大学生资助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作者基于对 H 省 6 所高校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研究发现,除其他变量外,人缘好坏、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也是影响国家助学金获得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主要由政策执行过程衍生,一定程度上会对政策效果产生消极影响。要改善这一局面,政府应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管理优势,多部门联动完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识别和认定。^[28]

五、关于税制改革研究

(一) 个人所得税制度

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七次修改决定,这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步骤。孙伊凡和谷彦芳从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方面对税制的创新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结构的设计在整体上体现了简化原则,尤其是在免征额的设计上,只有普遍适用的综合扣除额,且该项免征额的内涵究竟是由什么因素构成的,并未加以明确。加之纳税人计税所得及其免征额都是以其个人为主体规定的,而不考虑他们的家庭状况,所有这些,最终造成了个人所得税负担的严重不公平,也成为最受百姓诟病的税种。而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点就在于对纳税人不同的收入状况采取了普遍调节与差异化调节相结合的税负调节策略。即在提高免征额、扩大低税率级距以降低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的同时,增加了六项税前附加专项扣除。这标志着新的税制把一般的生计消费支出与非经常性的消费支出进行了一次边界划分,从而使普遍使用的免征额内涵更加清晰,非经常性消费支出则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可。这使得我国个人所得税与国际惯例逐步趋同,也必然会增强我国广大纳税人纳税义务的遵从度。^[29]

刘金珠等分析了个人所得税改革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为评价本次减税的效果及对纳税人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作者于2019年减税之初围绕纳税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减税意愿、减税前后消费情况、减税受益情况等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通过运用SPSS对216份网络问卷调查结果相关及聚类分析,得出结论,此次减免税得到了广大纳税人的支持,对“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税收负担减轻最多,且对家庭消费具有一定影响。减税资金的用途与年龄负相关,减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与年龄、职业、是否赡养老人相关。纳税人是否享受了减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减税的态度及减税成本的选择四者息息相关。被调查纳税人中,认为个人所得税减免对家庭消费有影响的占70%左右,但也应看到,个人所得税减免对纳税人家庭消费影响程度有限。

从总体趋势看,纳税人每月家庭最大支出项前三名为子女教育、日常生活费、住房租金或贷款;减税资金用途居于前三名的是补贴日常生活开销、投资子女教育、孝敬老人,二者基本一致。随着纳税人年龄的增大,减税资金用于补贴家庭日常生活开销的比例也越大。^[30]

孙健夫和舒飞不仅分析了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时代背景,也提出了未来税制继续优化的方向。他们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需要做出新的定位。在进一步的税制改革中,需要加快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改革,这要求必须立足于新时代大背景对税制的要求,改革需要站位更高,谋划长远,增强系统性,克服碎片化。基本方向是要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设置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逐步推进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征收模式,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31]

郭晓亮提出,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税目应进一步加以完善。其理由是: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将经营所得与其他类型所得并列,但并没有明确其划分标准,新发布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也未能将税目区分的标准明确化。作者以确定性和合理性为目标导向,采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并借鉴我国签署的国际税收协定关于税目的划分逻辑,主张经营所得的本质特征为行政登记,在税目判断中应适用经营所得优先原则,从而让税目划分标准相对清晰、合理,以达成税法确定性目标,最大程度化解涉税争议。^[32]

(二) 企业所得税制度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活动的一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为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有效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国家新出台了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其内容是: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可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可按照无形资产金额175%在企业所得税前进行摊销。王伊涓认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一定成效,政策效果初步显现,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导致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她分析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的影响因素,通过年度汇算清缴数据分析、实地走访企业调研、调查核实企业账簿资料等方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提出从五个方面落实该项政策的建议。^[33]

(三) 遗产税制度

遗产税是税收体系中的一个具有很长历史的税种,其功能不仅是为政府筹集财政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遗产税还对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承担着重要责任。2013年2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但到目前为止,遗产税并未付诸实施。李金荣、石颖探讨了我国目前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制度设计。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高收入群体也在持续增多。中国高净值人群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逐年增长,这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了可行的税源。征收遗产税选择哪种课税模式,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征税目标、税收管理水平、纳税人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在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是调控目标和税务机关的管理水平,这是选择遗产税课征模式的前提。根据目前的国情分析,我国开征遗产税宜采取总遗产税模式。即以被继承人死亡后遗留下的财产总额为课税对象,以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等为纳税义务人进行课征的一种税制模式。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比较适合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水平。^[34]

六、关于财税管理研究

(一) 政府采购管理

为了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减少政府采购环节的漏洞,引入评审专家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但是,该项制度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问题,对政府采购的严格规范管理带来了障碍。顾萍萍的文章对河北省政府采购办公室完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改革措施做了评述。这项改革被称为“三改三提”。“一改”评审专家入库管理,提升专业匹配度。建立评审专家动态管理系统,为提升评审专家抽取的随机性打下了基础。“二改”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管理,提升专家共享度。建立了评审专家抽取管理系统,实现了全省共用

一个专家库,所有专家资源共享。“三改”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评价管理,提升结果运用度。建立评审专家履职评价系统,将专家评价、评价审核、评价统计、评价应用、评价查看和专家申诉等功能集为一体,有力地强化了评审专家的自律约束。^[35]

(二) 税收风险管理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税收管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不断深入的“互联网+税务”提供了完善和提升的新机遇。范辉的研究认为,税收管理现代化需要以税收风险管理为导向,税收风险识别既是税收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也是税收风险管理的难点所在。科学有效的识别指标体系,作为税收风险识别的重要工具,有助于提高风险分析的科学性、增强风险应对的精准性、提升税收风险管理水平和纳税遵从度。基于这一视角,作者阐述了税收风险识别指标体系的重要性,剖析了当前税收风险识别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互联网+”思维下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税收风险识别指标体系质量的建议。^[36]

(三) 保护纳税人权利

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是税收法律规定的两项互相联系的税收行为。但是,从征纳双方的关系来看,税务机关作为执法单位,似乎占有更加强势的地位,而纳税人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因此,在税收征管的实践中,从保护纳税人利益的情况看,有理由要求征税机关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税务执法说明理由制度指各级税务机关在作出涉及或者影响纳税人、缴费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执法行为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当向纳税人说明作出该行为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李亚松认为,说明理由是税务执法程序中的一道必要程序,否则税务执法行为将违背基本的程序正义而使其效力存疑。税务机关在作出执法决定时说明其执法理由,使整个执法过程公开化,有利于提高执法透明度,提升税务执法行为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通过税务机关说明事实根据、法律依据以及实施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纳税人能够知道其所作的行政行为是否公平合法,是否侵犯了自身的权益。此外,纳税人也可以确定是否应提起事后救济,是否选择通过行政复议或行

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纳税人能够切实感受到、参与到执法程序中,进而提高其对税收执法决定的接受程度,降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概率,从而减少行政成本、提高执法效率。^[37]

(孙健夫: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解建立,齐守印.我国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边界划分及其优化路径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9(8).
- [2]齐守印,以公共经济视角全要素全维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J].财政科学,2019(4).
- [3]齐守印,何碧萍.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理论辨析、逻辑结构、国外经验与总体建构目标[J].当代经济管理,2019(4).
- [4]高云霄.河北: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建设新时代高质量财政[J].中国财政,2019(11).
- [5]高云霄.以“六个更加注重”为指导原则建设高质量财政[J].中国财政,2019(5).
- [6]高云霄.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切实走好新时代建设高质量财政赶考路[J].中国财政,2019(9).
- [7]赵志伟,杜建政.新时代加强县乡财政管理的若干思考——以河北省为例[J].预算管理与会计,2019(7).
- [8]河北省财政厅.坚持高质量发展规范推广应用PPP模式[J].中国财政,2019(8).
- [9]谢恒,王舒翼,章晓玲.PPP项目绩效评价与建筑信息化模型(BIM)应用[J].经济研究参考,2018(12).
- [10]吴玉凤,郭海玲.政府管理视角下降低PPP项目增值税成本的探讨[J].税收经济研究,2018(12).
- [11]宋立根,赵新峰,丁景霖.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思考[J].预算管理与会计,2019(6).
- [12]李东松,赵志君.税率、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基于当前财政政策的理论及模拟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9(3).
- [13]赫连志巍,孟庆洪,卞滨滨.创新网络活跃能力对产业集群升级影响研究——创新基金和税收减免的调节作用[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10).
- [14]马磊.财政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几点浅见[J].当代农村财经,2019(10).
- [15]崔海霞,向华,宗义湘.潜在环境影响视角的美国、欧盟农业支持政策演进分析——基于OECD农业政策评估系统[J].农业经济问题,2019(12).
- [16]杜建政.构建京津冀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几点思考[J].预算管理与会计,2019(10).
- [17]李素英,王亚菲,吴昱昊.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探究[J].财务与会计,2019(8).
- [18]耿永志.多维福利治理框架的农村低保公平性问题探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7).
- [19]崔元培,王建忠,薛庆林.新中国成立70年扶贫政策演变与设计[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9(12).
- [20]宋凤轩,孙颖鹿.我国财政精准扶贫的问题与优化路径[J].甘肃社会科学,2019(11).
- [21]邢慧斌,刘冉冉.集中连片特困区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的空间差异研究——以燕山—太行山区8个连片特困县为例[J].教育与经济,2019(2).
- [22]王金营,李庄园,谢秋实.公共服务全面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之固本大计[J].河北学刊,2019(5).
- [23]段世江,张雪.燕山—太行山片区减贫与发展政策目标及实践路径[J].河北学刊,2019(11).
- [24]司爽,侯小娜,李建民.整合归并涉农资金“四轮驱动”助力脱贫攻坚[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9).
- [25]李杰刚,李志勇,智荣卿.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绩效预算考评体系[J].地方财政研究,2019(8).
- [26]胡德仁,刘亮,解建立,朱云飞.河北省地区间小学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基于地区间小学教育成本差异的视角[J].预算管理与会计,2019(11).
- [27]胡德仁,刘亮,朱云飞.高等院校资源配置的绩效评价——以29所河北省省属高校为例[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9(8).
- [28]王玉蕾,王丽文,徐亚清.浅析地方高校国家助学金分配影响因素——以H省为例[J].改革与开放,2019(11).
- [29]孙伊凡,谷彦芳.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及其在中国的新突破[J].税务与经济,2019(7).
- [30]刘金珠,安福仁,云娜.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基于216份网络问卷调查[J].财政监督,2019(12).
- [31]孙健夫,舒飞.论面向新时代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改革[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32]郭晓亮.完善个人所得税税目划分的建议——以经营所得本质分析为切入点[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2).
- [33]王伊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影响因素分析[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4).
- [34]李金荣,石颖.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和制度设计[J].公共经济与政策研究,2019(上).
- [35]顾萍萍.“三改三提”助推河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改革[J].中国政府采购,2019(8).
- [36]范辉.“互联网+”思维下完善税收风险识别指标体系的探索[J].税务研究,2019(11).
- [37]李亚松.税务执法说明理由制度的现状与构建[J].税务研究,2019(8).

货币银行学理论与政策研究

王重润 蒋超楠

2019年,河北省学者在农村金融、金融精准扶贫、资本市场效率、农业保险、养老保险与家庭保险、房地产金融、民营与中小企业融资、供应链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公司金融、商业银行经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

一、农村金融

杨兆廷、尹达明从三权分置背景入手,介绍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现有模式,认为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其估值不合理和处置困境成为制约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有效开展的重要问题。具体表现为:1.法定处置方式大多难以实现;2.违约土地价值评估不科学;3.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有待发展。建议:完善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采用科学评估方法;建立土地产权交易中心,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建立多层次的风险保障分担机制,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1]

王艳芳整理计算了我国一、二、三产业的物质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积累等数据,分产业实证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传导渠道,结果发现:对于第一产业,金融通过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渠道显著影响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渠道并不显著;第二产业技术进步渠道、物质资本积累渠道、人力资本积累渠道均不显著;第三产业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影响经济增长,物资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渠道并不显著。^[2]

许月丽、王飞、刘志媛从长期动态的视角考察政府干预与城乡二元转型如何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问题。研究表明,二元转型与政府干预都对弱化农户融资约束具有显著作用,但是二元转型的作用更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具有对二元转型阶段的敏感性,政府干预须随二元转型阶段变化而适时变化;农户融资约束对于政府干预的政策类型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其中政府担保最为有效;农户融资约束对于二元转型所引致的不同机制的反应也不相同,其中,二元转型所引起的

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变化对于农户融资约束的放松效果最为明显。^[3]

徐运红、王华东、王娟认为正规金融对农民贷款有诸多限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具有普惠属性,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农民的高度分化及整个农业的内涵、功能、形态发生的根本变化使农村金融市场监管不足,建立健全适合普惠金融发展的农村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体系迫在眉睫。^[4]

二、金融精准扶贫

郭小卉、段胜英、冯艳博以河北隆化县“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为例,指出该模式核心优势在于有效降低贷款风险,破解了金融机构扶贫参与动力不足的问题。制约因素是县级政府财力有限、产业层级较低、深度贫困和顽固贫困较多、贫困户脱贫意识不强等。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府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难以保障、低风险下对银行的激励稍显过度、对保险公司的激励略显不足、企业和农户的风险责任边界模糊、监督约束机制缺位及普惠程度较低等。建议: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借助于电商平台和链式金融拓展产业链和供应链;全面协调各项扶贫政策,建立扶贫长效机制;加大扶贫资金争取力度,动态调整“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的技术参数;建立和完善对各类扶贫资金的监督约束机制;加强金融创新,拓展“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的内涵和外延。^[5]

康书生、冯艳博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近年来国内金融扶贫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我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阶段,金融扶贫学术研究发展迅猛,研究体量较大、质量较高,在金融扶贫理论和扶贫实践上有所探索和创新。展望未来金融扶贫研究,应积极创新金融扶贫模式,持续关注普惠金融发展,建立健全金融扶贫的良好生态环境和金融扶贫长效机制。^[6]

康书生、冯艳博、郭小卉认为脱贫攻坚是京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河北省补齐短板、加快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总体来看,河北省金融扶贫在政策制定和路径选择上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区域金融扶贫协同性不足、农村贫困地区弱质性、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等问题。河北省应当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进一步完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与机制,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尤其应当注重金融扶贫的长效机制建设。^[7]

刘莉、李海月认为深度贫困县在金融扶贫顶层设计和金融扶贫发展经济性等方面具有特殊性。通过建立健全扶贫攻坚制度保障,激发乡村脱贫内生动力等措施,构建农村脱贫长效机制,才能切实将扶贫攻坚工作引向深入。^[8]

田晓丽、任爱华在深入剖析河北省贫困区域金融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未来金融精准扶贫的应对策略:1. 推进农村贫困精准识别的动态管理,为金融扶贫提供基础数据保障;2. 加大贫困地区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力度,为金融精准扶贫提供良性循环的渠道;3. 建立金融风险 and 补偿机制,提升金融机构扶贫贷款的积极性;4. 积极开发农村金融特色产品,提升金融扶贫的针对性;5. 创建专业化扶贫队伍建设,提升精准扶贫的效率和准确性。^[9]

温然、王重润认为,由于贫困群体具有内生脆弱性,金融扶贫隐藏着一定风险,特别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外部冲击易演变为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加强对金融扶贫的风险防范工作已经迫在眉睫。运用河北省阜平县金融扶贫调研信息,对闭环式金融扶贫风险防范机制及其缺陷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金融扶贫风险链式防范机制,即:通过衍生品市场,利用期货市场的现货对冲机制进行风险分散;通过 ABS (资产证券化),把扶贫地区的资产整合打包,将风险转移给外部市场;通过 CDS (信用违约掉期),将链条中的信用风险进行转移。^[10]

三、资本市场效率

袁薇、汪聪聪以 2005 年 7 月 2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上证综合指数作为样本,并以 2007 年 4 月 4 日(次贷危机)和 2015 年 8 月 11 日(“8·11”汇改)为节点,运用基于交叉相关函数 CCF 的信息溢出检验方

法来探讨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信息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率溢出效应;其互动关系体现在线性关系和非线性关系层面上,既包括均值溢出又包括波动率溢出和极端风险溢出效应。^[11]

杨晓辉、王裕彬认为波动率表征未来一定期限内标的资产收益率波动的标准差,是研究衍生品交易的重要指标,受到市场交易主体的高度关注。以上证 50ETF 指数基金为标的,利用 GARCH 模型对其进行历史波动率研究,然后用 Black-Scholes 模型反推 50ETF 股指看涨期权的隐含波动率。研究表明,上证 50ETF 波动率“尖峰厚尾”、波动率聚集、长记忆性特性得到验证;隐含波动率数值相较于历史波动率研判结果更准确。^[12]

杨晓辉、谭红日选择单指数模型,利用上证 A 股指数及上证 A 股股票进行最优风险资产组合的构造,并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作为市场收益率测度的上证 A 股指数,其超额收益分布并不具有正态性,单指数模型并不适用于上证 A 股市场,其构造的投资组合会乐观估计组合的总体方差,从而低估风险。^[13]

闫屹、冯欣海、唐祯祯在国内外基金绩效评价研究的基础上,将传统的基金绩效评价方法、主成分分析法与 DEA 模型相结合,构建了针对开放式基金的绩效评价体系。选取了三种不同市场行情的样本区间(牛市、熊市和震荡市),对不同行情下 ETF 和其他类型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的业绩进行比较。^[14]

叶莉、樊锦霞、赵萌建立三元 VAR (6) - GARCH (1, 1) -BEEK 模型,从均值和方差层面刻画了我国金融系统不同维度流动性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市场流动性、融资流动性与货币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均值溢出效应;融资流动性对市场流动性具有单项均值溢出效应,对货币流动性则具有单项波动溢出效应;货币流动性、融资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波动非对称溢出,且市场流动性的波动溢出效应较强。监管者应加强不同维度流动性间的传导转换效率,同时密切监控金融市场资金状况,防止金融市场流动性出现大幅波动,并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兼顾各维度流动性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力的

影响。^[15]

任爱华、李鹏燕、王姝基于时变参数模型,从不同货币政策类型的视角探讨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非线性冲击效应。研究发现,非线性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模式非线性,从正向指标换手率和流动强度来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宽松货币政策都有利于为股票市场注入流动性;从反向指标非流动比率来看,价格型宽松货币政策不利于提高股票市场流动性,数量型宽松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有较好的推动作用。二是时期非线性,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期最强,在经济平稳时期最弱;股票市场流动性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在经济萧条时期最大,在经济平稳时期最小。建议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采取数量型宽松为主、价格型紧缩为辅的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来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回升。^[16]

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化市场各参与主体责任。林妍科认为科创板市场主体应重新审视自身职责,并通过规范信息披露监管程序,完善证券失信惩戒制度;理清证券中介机构职能定位,规范执业行为;引入声誉评价机制,夯实中介机构法律责任;推出投资者集体诉讼制度,增强投资者监督作用来监管市场主体行为,优化科创板市场运行模式,推动科创板改革顺利实施。^[17]

封文丽、韩佳颖认为信息披露是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的核心。由于科创板面向的是科技创新型企业,上市规则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仅强调了重点信息的披露,而且对披露责任主体和审核标准也做了改动和细化。出于保证高质量信息披露的目的,上市公司应把握好自身市场定位,着重对重点信息进行披露;监管机构和中介机构应提升自身水平,形成良好的审查监督体系;相关执法机构应从行政、民事和刑事等方面加大信息披露的违规成本,最终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信息披露体系。^[18]

封文丽、吕佳垚认为交易制度设计是科创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科创板在上市、二级市场交易和退市制度等方面都做了相应的变动,形成了一个“进出有序”、流动性强的资本市场。建议:加强科创板投资者教育,让投资者了解风险、防范风险;引进做市商制度,降低交易成

本;增强退市制度执行力。^[19]

封文丽、李晓可讨论了科创板高新科技企业IPO采用市销率定价法的合理性。对某一企业而言,影响市销率的因素有企业的核心价值、企业的生命周期和盈利模式、企业的融资需求和融资偏好等内部因素。除此之外,二级市场行情和相关金融政策、投资者对企业股票的购买意愿等外部因素也需要考虑。在使用市销率进行定量分析和影响因素定性分析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后,还需结合机构投资者路演询价结果确定最终上市定价。^[20]

封文丽、赵耀认为创新创业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具有债权和期权双重特性,使新三板创新层企业在不稀释股权的前提下获得资金,也可以丰富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和退出渠道,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可控。为了降低发行人违约风险,需要引入增信机制,可从外部融资和内部融资两方面入手。此外,规范其运作流程和完善条款设计也有利于双创可转债的发行,进而使其成为新三板市场上惠及投融资双方的工具。^[21]

自2001年2月A股市场退市制度正式开启,退市制度经历了三次改革和调整,虽日臻完善但退市程序相对冗长、退市效率较低、退市难等问题突出,封文丽、薛银雪讨论了基于注册制的科创板在退市流程、退市标准、退市执行等三个方面做出的改进和尚未完善之处,并提出了优化建议:1. 制定可量化的自愿退市制度。2. 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股票市场退出机制。^[22]

石善冲、康凯立、赵志刚以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在深沪主板上市的IPO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网络爬虫技术从微信文本中挖掘机构和个体投资者情绪数据,研究不同类型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积极情绪对IPO抑价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个体投资者积极情绪对其影响不显著;机构投资者积极情绪对IPO抑价的影响比个体更显著;机构和个体投资者消极情绪对IPO抑价都无显著影响;机构投资者积极情绪对低承销商声誉公司IPO抑价的影响比对高承销商声誉公司更显著。政策启示:监管者要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积极情绪的监管力度,有效防止机构投资者发布积极言论操纵市场。利用微信平台对舆情进行

管理和预警,把握舆情导向。通过内部投资舆情引导和外部有效监督相结合,维持股票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发行者可以对微信中的投资舆情进行观察与分析,在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积极情绪高涨时,是选择上市的较好时机。个体投资者可以根据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积极情绪的高低对IPO抑价程度进行预测,从而做出何时抛售新股的投资决策。^[23]

叶莉、王远哲选取2008—2017年上市金融机构数据,以机构间极端风险溢出能力建立有向加权网络,对我国金融行业间的风险动态关联趋势进行分析,并结合网络指标对其中关键金融机构节点进行了识别。结果表明,风险溢出网络对极端金融事件有较好描述作用;银行机构节点具有较强的风险外溢属性,证券机构较易受到其他网络节点的风险冲击,网络中风险溢出关键节点正从早期的国有商业银行向证券业转变。^[24]

叶莉、王远哲、陈勇勇基于尾部风险溢出思想,采用2007—2017年的周收益率数据,运用CoVaR模型测度银行、证券、保险及房地产四行业40家上市公司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并结合系统性风险指数,得出各机构风险吸收与扩散能力排名。运用极大平面过滤图(PMFG)算法对风险溢出网络进行化简,构建仅包含关键路径信息的 ΔCoVaR 有向加权风险溢出网络,并结合网络中节点关联特征指标,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识别提供了全新视角。总体来看,各行业依风险传递方向不同而对风险的敏感程度各异,网络中关键节点对系统的整体结构影响较强;证券公司内部风险关联较为紧密,房地产机构承受行业间风险多源自银行业,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对其他行业的风险发散能力较强。^[25]

李延军、刘华堂、葛林洁从股票短期回报可预测性的角度度量股市效率水平,选取沪深300成分股作为样本数据,通过分段线性回归,分析股票流动性对我国股市效率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熊市中,随着流动性的不断改善,股票市场效率随之提高,市场质量明显改善;牛市中,市场效率随流动性的改善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综合来看,在流动性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市场效率随流动性水平逐渐上升,随后出现下降。^[26]

叶莉、樊锦霞、赵萌通过建立三元VAR

(6) -GARCH(1,1)-BEEK模型从均值和方差层面刻画了我国金融系统不同维度流动性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市场流动性、融资流动性与货币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均值溢出效应;融资流动性对市场流动性具有单项均值溢出效应,对货币流动性则具有单项波动溢出效应;货币流动性、融资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波动非对称溢出,且市场流动性的波动溢出效应较强。监管者应加强不同维度流动性间的传导转换效率,同时密切监控金融市场资金状况,防止金融市场流动性出现大幅波动,并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兼顾各维度流动性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27]

郝永敬、呼晓英以2015—2016年沪深300指数的股市收益率数据为样本,采用精确断点回归设计,评估证交所首次调整融资融券保证金对股市波动产生的影响。断点回归结果表明,在股市剧烈波动时期,提高融资融券保证金能够有效抑制股市波动。断点处流动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动,表明保证金逆周期调节主要是基于投机效应。此外,我国市场融资融券交易比例严重失衡也增加了股市波动的风险。政策建议:加强市场层面监管;调整融资融券交易比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健全保证金监管制度。^[28]

翟华明、马静以2012—2016年中国A股市场中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中介变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融资约束和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家政治关联对现金股利分配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融资约束在二者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结果揭示了政治关联能否影响分红水平,部分取决于政治关联是否可以为企业带来融资所需要的资源。^[29]

翟华明、马静、朱清香从代理成本的视角,以我国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对融资约束、股权结构和股利平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股利平稳性,股权结构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国有控股、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均能够削弱融资约束对股利平稳性的负向影响。因此,加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治理以及解决企业当前的融资困境对促进现金股利的平稳性尤为重要。^[30]

牛丽文、张艳艳、冯绪以 1996—2017 年沪深两市全部正常的 A 股信息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提出股票历史最高收益因子,将其作为新的风险定价因子加入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并通过 Fama-MacBeth 横截面方法进行了单因子检验和多因子的有效性检验。研究发现:历史最高收益风险因子的系数均显著异于零,可以作为解释股票收益的必要因子,能够反映我国沪深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波动;新的风险因子的发现有益于投资者正确全面地判断影响股票收益的因素,从而使投资者获得更大的利益,同时能够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我国股票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31]

四、农业保险、养老保险与家庭保险

王培辉、张亚卓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社会网络对商业保险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网络对居民参与保险市场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的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越大。居民一旦参与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参与程度会随着家庭社会网络扩展而显著提高。家庭收入的提高、风险偏好、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加和良好的健康状况都会推动家庭参与保险市场。注重家庭社会网络间的互动是促进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有效手段。^[32]

晋颖、刘欢、宋超楠以河北省农业保险服务“新农体”的作用机制为研究对象,分析河北省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及在服务“新农体”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提出了解决对策:1. 增加河北省农业保险市场中供给主体的数量;2. 引进专业人员充实农业保险的队伍;3. 提高农户的参保意愿;4. 全面提高农业保险的创新力度;5. 政府要加大对农业保险创新发展过程中的支持力度。^[33]

刘梦月、王晓伟、锁罗曼、王士心从河北省贫困地区贫困原因入手,比较了河北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承德市隆化县“政银企户保”精准扶贫模式;阜平县农业保险“联办共保”+“政融保”模式,其共同特点是在政府担保下为贫困户获得贷款资金提供风险保障。^[34]

陈翠霞、王嘉璇、吴彤琳以 1997—2016 年美国 1572 家保险公司为样本,采用列联表法和

Spearman 相关系数法分析了保险公司经营绩效发生变动对公司风险承担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公司的经营绩效低于参考水平时,公司的经营绩效与风险承担水平存在着一种负相关关系;而当公司的经营绩效高于参考水平时,公司的经营绩效与风险承担水平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持前景理论。^[35]

郑涛、宋晓彤、李梦莹在资产负债视角下建立我国城镇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偿付能力评价体系,利用我国 31 个省市 2010—2017 年面板数据对城镇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的资产负债存量进行精算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基金偿付能力的空间格局和动态空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的空间区域差距明显,差距逐年增长,具有空间相关性,存在着空间格局分布不均衡、空间集聚效应较弱、养老保险基金存量不足等问题;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对基金偿付能力有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基金偿付能力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为减少老年人口带来的负向影响,政府应落实在岗职工延迟退休方案,通过退休政策调整实现基金管理的增收与节支,缓解养老保险基金偿付压力。同时采取相关措施对人才资源和劳动力流动进行合理引导,防止由于局域经济聚集导致人才和劳动力资源的分布不均。^[36]

五、房地产金融

张玉梅、王子柱分析了房地产调控经验教训,调控并没有解决高房价问题,原因在于信贷和税收政策过于宽松、土地和保障房供给不足、调控政策存在漏洞,执行出现偏差、政策外溢性、房价上涨预期强烈等。建议:短期可适度微调以合理满足改善性购房需求。长期应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即通过差别化信贷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以公平和绿色的税收原则促使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在多元化供给基础上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以共享理念完善住房保障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强行业自律和监管,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推动城市群战略和高质量住房供给。要分阶段有序实施长效机制,短期侧重信贷和土地,未雨绸缪防控断供潮;中期稳妥推进房地产税收改革;长期将重点放在住房供给侧改

革,以更好地满足改善性和养老等住房需求。^[37]

任伟、陈立文建立 PVAR 模型,采用我国 2001—2014 年 25 个省市的数据,对贫富差距、房价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房价之间整体呈相互促进作用。静态的贫富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动态的贫富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起初是瞬间内为正,之后始终保持一定水平的负相关。经济增长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型,但持续时间较短。贫富差距对房价的影响是先促进后抑制的波动型。^[38]

保障房开发对房价的溢出效应是保障房项目选址的关键参考标准,对于改善民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广平、陈立文从微观视角对保障房开发影响周边房价的研究方法演进进行了梳理,从宏观视角和投资、供给、价格和销售等四个方面归纳了保障房影响房价的传导机制与作用机理,并对保障房配建模式对房价的溢出效应研究进行了梳理。^[39]

张双才、孙汉康总结国内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包括七个方面:第一,银行和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需求不高。第二,银行和公积金管理中心不需要将住房抵押贷款资产移出资产负债表。第三,银行和公积金管理中心不愿意出售住房抵押贷款资产。第四,银行和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售住房抵押贷款资产并不容易做到。第五,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收益并不高且不透明、不确定。第六,资产支持证券的流动性很差。在美国,资产支持证券的转让交易很多,证券的流动性很强。第七,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少。国内的资产支持证券 80% 以上为银行机构相互持有,尽管有保险、基金、信托、资管等机构,但它们的投资较少,更鲜有社会公众投资者。^[40]

王重润、温礼瑶使用 2013—2017 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匹配相应的省级行政区域面板数据,建立中介效应实证模型检验房价上涨、企业投资性房地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房地产投资在房价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变量的作用。当企业的融资约束较高时,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边际作用大于低融资约束企业,导致房价上涨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较小。对不同所

有制企业来说,房价上涨对国有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挤出效应,但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国有企业通过将资金配置到房地产行业对其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更强。^[41]

六、民营与中小企业融资

胡恒松认为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社会发 展、稳定就业、对外贸易等的重要支撑。为保护民营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国家在金融服务、减税降负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由于制度歧视、经济政策、发展阶段、金融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是制约中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阻碍。政府应在融资担保、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多元化融资、发行纾困债、破除制度歧视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题,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42]

王重润认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利好政策不断出台,但也要看到,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在此背景下,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作用,消除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隐性壁垒,鼓励金融机构在精准研判民营经济风险特征的基础上,多措并举,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切实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探索长效机制,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43]

王重润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需进行金融体系和金融财税补助等相关政策的系统性设计,从机构、产品、市场、政策环境等方面深化供给侧改革,以系统化思维建立中小企业融资长效机制,形成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生态系统。包括:建立结构合理、市场定位清晰、广覆盖、风险偏好各异的普惠银行体系;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壮大多层次开放的资本市场;健全保险、担保等各类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从资金端、风险端以及信贷周转三方面同时发力,降低中小企业融

资成本；协调理金融、财税、土地、市场等政策措施，确保各项政策落地落实。^[44]

曹袁阳、王重润分析了河北省科技金融、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并分别从政府调控与金融支持两个层面提出了科技金融推动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的措施。政府可以采取法律与政策支持、组织机构推动、平台建设支持等方式，金融支持可以采取融资机构与金融中介机构支持等方式，具体包括：加强科技支行试点，创新银行信贷模式；建立和完善科技型小微企业风险投资机制；创新融资方式，充分发挥银行综合化经营试点优势；采用“直投+贷款”方式平衡收益与风险；建立健全风险监控、风险过滤、风险预警制度；推进融资市场建设、完善信用担保体系。^[45]

七、科技金融与供应链金融

李虹含、汪存华认为“供应链金融+区块链”模式已被国内诸多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探索应用，它可以有效解决供应链金融企业间的信用问题与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的困境，让金融机构能够更高效、便捷、稳健地服务于中小企业客户，确保借贷资金基于真实交易，依托核心企业的付款，使得整个产业链条上的企业都能快捷、安全、高效地融资。尽管区块链赋能供应链金融将有效提升金融效率，未来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区块链将削弱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属性与金融监管机构的“中心化”机制相悖，金融监管机构对市场的掌控度将因此下降；二是吸引上下游供销商加入到核心企业区块链体系中是“双链”结合应用的关键。企业水平参差不齐，加入到“双链”体系未必能提高单个优势企业的融资效率，将导致其参与意愿不强；三是区块链无法监督线下交易行为，当供销商、核心企业全链条、全方位伪造交易数据，全体系参与供应链金融骗贷活动，其欺诈行为无法识别，信用风险仍然存在。^[46]

刘兢轶、杨梅、郭净选取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 535 家科技型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检验供应链金融能否真正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研究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显著存

在融资约束，融资约束程度与信息不对称程度成正比，供应链金融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该结论为发展供应链金融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实证证据，并提出进行金融产品创新、提升企业自身素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以发展供应链金融实现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最终目的。^[47]

刘梦月、魏荟颖、付锦泉阐述了金融科技的基本涵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金融科技的发展为传统金融提供科学技术，在产品、销售、服务等领域对传统金融产生影响，不仅使金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还能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以及有效识别潜在风险，但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资金缺乏、风险性大、监管不完善等，需要政府主导资金流向以及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在风险管理方面需要加强投入。^[48]

科技与金融是经济增长的两大核心要素，二者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王健认为当前科技金融发展在银行信贷、资本市场、服务体系、风险监管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创新银行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拓展资本市场服务广度和深度、建立新型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及完善科技金融监管法规与手段，全面推进新时代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49]

在由单个供应商和单个零售商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系统中，康凯、高思颖、张敬考虑供应商和零售商双方风险态度，建立银行融资和延期付款两种融资策略下的供应商——零售商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得到零售商资金约束时供应链决策者的最优定价策略，分析供应链决策者风险态度对融资与定价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零售商存在资金约束时，供应商应优先选择延期付款策略；供应商和零售商的风险态度和融资利率对零售商融资策略的选择具有影响作用；融资利率较低时，供应链系统选择银行融资策略比延期付款策略更有利。^[50]

王海波、马金伟认为金融科技存在许多技术上及机制上的风险，加强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势在必行。而区块链技术作为金融科技的核心技术和重点技术，众多发达国家以“区块链+监管”的思想构建“法链”监管模式，以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更好的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从金

融科技监管工具和金融科技产品监管两个角度出发,探究了我国“法链”建设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并按照金融科技发展的成熟度状况制定了阶梯性的“法链”建设路径。^[51]

八、绿色金融

杨兆廷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需要金融支持,尤其需要发展绿色金融和文化金融,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在发展雄安新区绿色金融方面,提出应加强雄安新区绿色金融政策保障,健全雄安新区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以及加强新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提高国际投资能力;在发展雄安新区文化金融方面,提出应加强政府对文化金融的支持和文化产业引导作用,发挥市场对文化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决定作用,创新融资体系等。^[52]

郭禹辰、张亚琳、侯路营认为发展绿色金融是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的基本要求。推动雄安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应以政府引导为基础,优化政策制度环境;依托市场运作,打造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加强绿色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全体民众树立绿色发展观念,形成全方位综合性可持续发展。^[53]

王树、强庞晶指出健全的绿色金融体系不仅可以提升金融系统的环境风险管理水平,而且可以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绿色金融体系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并且在构建思想和发展模式上差异明显:在指导思想上,国外采用“自下而上”的市场推动,我国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在项目全程审查方式上,国外侧重事中审查,我国侧重事前审批为主、事中审查为辅;在项目筛选标准上,国外采用排放标准,我国采用行业标准;在项目监控主体上,国外采取第三方监管模式,我国采用政府监管模式。我国需要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以“强化市场引导、改进融资项目遴选模式、明确监管责任、完善激励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健全绿色金融体制。^[54]

王小江认为绿色银行评级可以影响银行信贷行为,进而影响贷款对象环境行为,形成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支持生态环境的改善的新体制机制。根据绿色信贷资金运行规律,论证了银行贷

款环境影响评价、绩效评价的方法和原理,构建了绿色银行评级系统正常运行的制度支撑与保障。^[55]

九、公司金融

林妍、王惠、刘霞基于2011—2017年新三板制造业企业的经验数据,对盈利能力、信用等级对融资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盈利能力与融资效率之间显著正相关;信用等级与融资效率之间显著正相关;信用等级显著增强了盈利能力对融资效率的促进作用。^[56]

魏洪福、付锦泉、孟晓倩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经营环境,指出其财务风险表现在发债数量多,债务规模大;资金缺口大,融资成本高;债务期限和资产结构不合理,短期偿债压力大;股权结构不合理,营收困难,坏账率较高。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93家平台公司的财务风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投入资本回报率与财务风险负相关,经营活动利润贡献率与财务风险正相关。提出对策建议: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促进区域范围的财政交流;合理控制债务规模,提高投入资本回报率;优化债务期限配置。^[57]

李俊强、刘琦琦利用2005—2017年间上市公司的违规和投票等相关数据考察了公司违规、议案事项对独立董事出具否定意见的影响。研究显示:在公司发生违规时,独董更倾向出具否定意见,然而,独董对违规公告发布后的明确监管事项出具否定意见概率增加,说明独董监督行为更多出于免责考虑而非主动勤勉履行监督职能。从两阶段 Treatment Effect Model 的样本选择偏差模型、否定意见的不同度量、具体的议案事项和违规发现难易等方面进行稳健性检查,结论依然成立。^[58]

张玉兰、翟慧君、景思婷、牛爽以2014—2017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数据包络BCC模型测算了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并检验了在融资约束作用下,研发投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R&D投入与企业投资效率呈U型关系,且只有当R&D投入积累至一定规模才会促进企业的投资效率;高水平的融资约束弱化了R&D投入与投资效率

的 U 型关系。^[59]

许楠、刘静、林春雷采用文本分析法,根据首因效应识别企业文化,以 2006—2016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员工导向文化对股权激励偏好、强度以及对象选择三方面的影响。研究表明:员工导向文化企业更倾向于进行股权激励,并且员工导向文化强度越大,企业进行股权激励的强度越大,激励对象选择的范围越广。^[60]

许楠、王策、牛晓蒙运用 SPSS 19.0 对 2009—2017 年沪深全部 A 股 1106 个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股权性质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强度。分析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对公司股权激励强度存在明显的负向影响;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对股权激励强度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非国有企业中市场化进程与股权激励强度分布图清晰地显示了二者的关系。^[61]

李媛媛、崔宸琛、刘思羽基于 2010—2017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样本数据,运用面板 VAR 方法,探讨了金融生态环境、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生态环境与制造业的企业创新效率之间为双向促进作用,且均具有长期促进作用;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有抑制作用。异质性研究发现:1. 金融生态环境对国企、非国企的企业创新效率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均为长期促进;2. 国企和非国企的企业创新效率均可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且均为长期促进;3. 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抑制了国企和非国企的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其中对国企的抑制作用大于非国企;4. 国企的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非国企中不存在这一关系。^[62]

林妍、刘霞以京津冀地区 2012—2017 年 454 家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的 BCC 模型从区域以及资本市场所属层次等视角比较分析科技企业融资效率。研究发现:京津冀科技企业的融资效率在不同维度存在差异,从归属地区看,河北地区融资效率不容乐观;从资本市场看,创业板市场融资效率较低。建议:优化企业管理、创新资本市场微观机制、促进京津冀多层次资本市场协同发展。^[63]

郭江山、李子轩基于中小企板上市公司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考察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和国有企业的区域 GDP 贡献对本地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同合作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而且,异质性研究发现,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改善效果更显著,并且经济发达地区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率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国有企业区域 GDP 贡献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政策启示: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采取合作发展策略,加大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做优做强国有资本,打造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健全制度体系,推动中小企业良性发展。^[64]

十、商业银行经营

袁庆禄、刘翠侠基于京津冀 43 个地级市 2009—2016 年间的数,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地区信贷的经济效应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下,京津冀地区银行信贷存在非线性效应,技术引进发挥持续显著的助推作用,而自主创新的推动力逐渐丧失。因此,京津冀地区需要经历技术引进过程,但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发展战略。只有完成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银行信贷才能实现可持续的长效效应。^[65]

辛兵海、张晓云、杜丽群基于中国 2001—2017 年的银行—企业信贷匹配数据,应用 Amiti 和 Weinstein (2018) 的研究方法,对特质性银行信贷供给冲击、企业需求冲击和共同因素冲击进行有效测度。实证检验时变特质性银行信贷供给冲击因素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并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特质性银行信贷供给冲击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贷款依赖程度较高、准入债券市场程度较低、国有股权占比较低的企业,其投资率对信贷供给冲击的敏感性程度更高;银行信贷供给冲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且主要是通过改善国有股权占比低的企业融资约束得以实现。^[66]

辛兵海、陶江基于经济价值视角研究中国上市银行的利率风险问题,动态测度并分析银行股价对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动的敏感性,实证检验影响银行利率风险敞口的微观因素。研究发现:

1. 样本期间银行业股价对利率波动显著敏感。国债收益率期限结构的斜率因素对银行股价具有正向影响, 水平因素和曲率因素对银行股价的影响存在年度差异性。2. 期限错配增加流动性风险, 也放大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敞口。3. 银行规模、贷款占比等指标上升时, 会扩大银行利率风险敞口; 非利息收入占比提高, 则会缩小银行的利率风险敞口。

叶莉、芮萍基于我国 101 家商业银行 2009—2016 年同业市场微观数据, 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的广义矩估计 (GMM) 方法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市场资金流入和流出的不同作用, 反映货币政策对我国银行流动性传导的影响。研究表明: 从整体上看, 紧缩性货币政策使我国银行总体流动性呈恶性传导, 相反, 稳健宽松性货币政策使我国银行总体流动性呈良性传导, 具体表现为对银行资金流入的正向影响大于资金流出。从银行异质性上看, 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传导的影响依赖于银行资产规模的大小和自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多寡。^[67]

叶莉、李园丰、王远哲运用部分上市商业银行 2007—2017 年股票价格数据, 采用分位数回归的 CoVaR 方法对各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进行测度。研究表明, 过去 10 年间, 宏观层面上, 各商业银行在危机时期对银行体系风险溢出效应明显增加, 其中部分股份制银行风险溢出效应高于大型国有银行, 而国有银行则通过控制自身风险价值降低了其风险溢出水平。从微观角度看, 银行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与风险传染的方向相关, 且单家银行对其他银行的风险外溢程度会影响其对银行体系的风险溢出作用。^[68]

孙文娜、苏跃辉指出,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不易获得融资的重要原因, 利用征信机构可以助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征信机构搜集的信息具有来源广、专业性强、准确度高、成本低的特点, 通过征信机构开发综合判断中小企业的征信指标和征信模型, 并借助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能够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信息不对称问题。^[69]

胡恒松梳理了监管部门针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政策, 通过分析政策特点、评价政策效果, 从强化政策落实、破除信用隐忧、实施信贷分类、成立专职金融机构、出台无还本续贷细则五个方面

提出具体措施, 以期达到提高小微企业获贷能力、缓解首贷难、提高融资可得性、降低融资成本的目的。^[70]

辛兵海、刘雪薇基于 2006—2018 年我国 32 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批发融资市场的市场约束问题。结果表明: 第一, 我国批发融资市场存在市场约束, 银行偿付风险对批发融资成本存在正向影响; 第二, 不同规模的银行所面临的市场约束程度不同, 相较于大型国有银行而言, 中小银行面临更为严苛的市场约束; 第三, 宽松的货币政策显著降低机构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 紧缩的货币政策显著提高机构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71]

郭江山、王澎涵基于 2011—2017 年 30 家商业银行的数据, 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拓展资本补充渠道政策对于商业银行效益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 与非上市银行相比, 上市银行由于资本补充渠道的拓展, 其净资产收益率提高。基于资本充足率视角的分组检验显示, 与资本较充足银行组相比, 资本较不充足的银行组受资本补充渠道拓展政策的影响更大。因此, 应当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未上市银行需积极争取上市, 以促进银行业可持续发展。^[72]

郭江山、解亚利用我国 2013 年在银行重启资产证券化这一准自然实验, 运用双重差分法与我国 23 家上市银行 2008 年至 2017 年的面板数据, 研究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 1. 信贷资产证券化有效提高了银行的盈利水平; 2. 信贷资产证券化活跃组的银行盈利能力提高得更多, 并且增强的趋势也较明显; 3. 与非国有银行比较, 资产证券化对提高国有银行盈利能力的作用更显著; 4. 基于杜邦机制检验, 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净利率的影响为负, 对资产周转率的影响为正。这些实证结果为政府改进资产证券化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即根据银行异质性特征, 可以采取差别化政策, 进而提高银行盈利水平并降低风险。^[73]

十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赵立三、李博文、刘立军从会计收益的微观视角, 回顾了低利率与流动性充裕的货币政策在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同时, 致使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上涨, 形成了不同资产、不同行

业、不同领域之间的收益率宽幅持续拉大的经济现象,导致杠杆率攀升、经济结构失衡,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加大。而税收杠杆与信贷政策工具能够及时转换经济增长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运用税收杠杆实施减税降费,可以增加投资者剩余,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支持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优化经济结构;完善当前的信贷政策,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可以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难题。^[74]

张丽琴、杨光宇、曾宪鹏认为,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要优化金融机构结构,满足不同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二是要优化融资结构,持续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三是要优化产品结构,提高金融产品的质量和可获得性。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有效提升金融风险防控能力,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75]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金融稳定对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有重要影响。赵萌、叶莉运用 46 个国家 1985—2016 年的年度数据,首先利用系统 GMM 模型估计金融衰退对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的影响,发现金融衰退会降低政府执行逆周期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能力。随之采用面板门槛回归分析不同金融波动程度下财政政策逆周期政策效果,发现金融波动对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具有显著非线性影响:金融波动越剧烈,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越差。因此,财政政策在金融周期繁荣期应更加审慎,而在衰退期应更加积极;应充分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财政监督体系应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框架更好协调。^[76]

2018 年 6 月起发生的 P2P 网络借贷行业大规模平台倒闭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关注,识别 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信用风险成为热点问题。全凌云、曹泽阳、安利平、梁强强通过构建 P2P 平台信用风险指标体系,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正常和倒闭平台的指标数据,引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识别出平台收益率、分散度、流动性和平台业务成就因子对 P2P 平台信用风险有显著的影响作用,通过训练 BP 神经网络得出 4 个因子识别信用风险准确率达 90%。^[77]

(王重润:河北经贸大学教授,
蒋超楠:河北经贸大学讲师)

参考文献:

- [1] 杨兆廷、尹达明.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土地估值和处置的问题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9(9).
- [2] 王艳芳.区域农村金融供给结构及发展的非均衡性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9(16).
- [3] 许月丽、王飞、刘志媛.城乡二元转型、政府干预与农户融资约束放松[J].金融论坛,2019(11).
- [4] 徐运红、王华东、王娟.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下新型农村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5] 郭小卉、段胜英、冯艳博.河北隆化县“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探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1).
- [6] 康书生、冯艳博.基于文献计量的我国金融扶贫研究动态[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1).
- [7] 康书生、冯艳博、郭小卉.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金融扶贫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2).
- [8] 刘莉、李海月.深度贫困县金融精准扶贫的特殊性与农村脱贫长效机制的构建[J].农业经济,2019(4).
- [9] 田晓丽、任爱华.金融精准扶贫在河北的实践[J].银行家,2019(2).
- [10] 温然、王重润.金融扶贫风险链式防范机制设计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9(5).
- [11] 袁薇、汪聪聪.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信息溢出效应分析[J].武汉金融,2019(10).
- [12] 杨晓辉、王裕彬.基于 GARCH 模型的波动率与隐含波动率的实证分析——以上证 50ETF 期权为例[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5).
- [13] 杨晓辉、谭红日.基于单指数模型的最优风险资产组合选择及分析[J].征信,2019(2).
- [14] 闫屹、冯欣海、唐祯祯.基于 DEA 模型的 ETF 与其他开放式基金绩效比较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15] 叶莉、樊锦霞、赵萌.金融系统多维度流动性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三元 VAR-GARCH-BEEK 模型的分析[J].金融与经济,2019(6).
- [16] 任爱华、李鹏燕、王姝.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非线性效应[J].改革,2019(2).
- [17] 林妍.注册制改革下的科创板市场主体责任审视与监管[J].人民论坛,2019(25).
- [18] 封文丽、韩佳颖.科创板注册制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探究[J].吉林金融研究,2019(10).
- [19] 封文丽、吕佳垚.浅析科创板的交易制度[J].海南金融,2019(8).
- [20] 封文丽、李晓可.浅析科创板企业上市定价问题[J].北方金融,2019(5).
- [21] 封文丽、赵耀.双创可转债与新三板企业融资问题研究[J].北方金融,2019(2).
- [22] 封文丽、薛银雪.注册制下科创板退市制度优化研究

- [J].华北金融,2020(1).
- [23]石善冲、康凯立、赵志刚.机构与个体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影响研究——基于微信文本挖掘[J].经济与管理,2019(1).
- [24]叶莉、王远哲.机构困境关联下风险溢出网络研究——基于我国上市金融机构的实证[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1).
- [25]叶莉、王远哲、陈勇勇.基于尾部风险关联网络的中国金融机构间风险溢出效应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9(3).
- [26]李延军、刘华堂、葛林洁.股票流动性对我国股市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9(6).
- [27]叶莉、樊锦霞、赵萌.金融系统多维度流动性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三元VAR-GARCH-BEEK模型的分析[J].金融与经济,2019(6).
- [28]郝永敬、呼晓英.融资融券保证金调整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J].金融监管研究,2019(7).
- [29]翟华明、马静.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政策[J].财会通讯,2019(21).
- [30]翟华明、马静、朱清香.融资约束、股权结构和股利平稳性[J].金融发展研究,2019(8).
- [31]牛丽文、张艳艳、冯绪.基于历史最高收益的风险因子定价研究[J].会计之友,2019(21).
- [32]王培辉、张亚卓.家庭社会网络与保险市场参与[J].武汉金融,2019(4).
- [33]晋颖、刘欢、宋超楠.河北省农业保险服务“新农体”作用机制创新研究[J].智库时代,2019(21).
- [34]刘梦月、王晓伟、锁罗曼、王士心.河北省农业保险产业扶贫模式[J].智库时代,2019(21).
- [35]陈翠霞、王嘉璇、吴彤琳.经营绩效对保险公司风险承担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美国年金保险公司为例[J].金融理论探索,2019(5).
- [36]郑涛、宋晓彤、李梦莹.资产负债视角下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的空间格局与溢出效应[J].保险研究,2019(8).
- [37]张玉梅、王子柱.基于历次调控视角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9(4).
- [38]任伟、陈立文.贫富差距、房价与经济增长[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 [39]刘广平、陈立文.保障房开发对房价的溢出效应研究:回顾与展望[J].现代城市研究,2019(11).
- [40]张双才、孙汉康.RMBS在中国的发展困境[J].中国金融,2019(12).
- [41]王重润、温礼瑶.房价上涨、投资性房地产与企业创新[J].金融与经济,2019(10).
- [42]胡恒松.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9(6).
- [43]王重润.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N].河北日报(知与行)2019-11-29.
- [44]王重润.多措并举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N].河北日报(知与行)2019-6-5.
- [45]曹衷阳、王重润.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河北省调研数据为例,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9(2).
- [46]李虹含、汪存华.区块链赋能供应链金融[J].中国金融,2019(23).
- [47]刘兢轶、杨梅、郭净.供应链金融能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会计之友,2019(10).
- [48]刘梦月、魏荟颖、付锦泉.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研究[J].智库时代,2019(18).
- [49]王健.推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J].人民论坛,2019(24).
- [50]康凯、高思颖、张敬.考虑决策者风险态度的供应链融资与定价策略[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9(5).
- [51]王海波、马金伟.金融科技监管新模式:“法链”模式发展路径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9(9).
- [52]杨兆廷.雄安新区绿色金融和文化金融[J].甘肃社会科学,2019(2).
- [53]郭禹辰、张亚琳、侯路营.雄安新区绿色金融发展模式探索研究[J].河北金融,2019(5).
- [54]王树、强庞晶.中外绿色金融制度对比及其启示[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9(3).
- [55]王小江.绿色银行评级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2.
- [56]林妍、王惠、刘霞.信用等级、盈利能力与企业融资效率[J].财会通讯,2019(26).
- [57]魏洪福、付锦泉、孟晓倩.京津冀区域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财务风险研究[J].会计之友,2019(4).
- [58]李俊强、刘琦琦.上市公司违规与独立董事监督行为研究[J].会计之友,2019(16).
- [59]张玉兰、翟慧君、景思婷、李爽.R&D投入、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会计之友,2019(16).
- [60]许楠、刘静、林春雷.企业文化会影响企业股权激励吗——来自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会计之友,2019(9).
- [61]许楠、王策、牛晓蒙.不同市场化进程下股权激励强度的分布——基于股权性质角度的研究[J].会计之友,2019(13).
- [62]李媛媛、崔宸琛、刘思羽.金融生态环境、企业风险承担与创新效率——基于制造业面板VAR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9(7).
- [63]林妍、刘霞.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科技企业融资效率研究——基于京津冀的比较视角[J].会计之友,2019(20).
- [64]郭江山、李子轩.国有企业经济效率对中小企业融资约

- 束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与经济,2019(4).
- [65]袁庆禄、刘翠侠.京津冀地区银行信贷、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J].财会月刊,2019(9).
- [66]辛兵海、张晓云、杜丽群.特质性银行信贷供给冲击如何影响企业投资——基于中国银行—企业匹配样本的分析[J].经济科学,2019(6).
- [67]叶莉、芮萍.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传导的影响——来自中国银行同业市场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会月刊,2019(20).
- [68]叶莉、李园丰、王远哲.基于 CoVaR 方法的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测度[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9(5).
- [69]孙文娜、苏跃辉.征信机构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难题[J].人民论坛,2019(29).
- [70]胡恒松.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信贷政

- 策视角[J].会计之友,2019(18).
- [71]辛兵海、刘雪薇.市场约束、银行风险与批发融资成本[J].金融与经济,2019(9).
- [72]郭江山、王澎涵.新增资本补充渠道对商业银行效益的影响[J].金融理论探索,2019(5).
- [73]郭江山、解亚.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分析[J].武汉金融,2019(9).
- [74]赵立三、李博文、刘立军.“收益率宽幅”与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政策工具选择[J].河北学刊,2019(5).
- [75]张丽琴、杨光宇、曾宪鹏.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N].经济日报,2019.
- [76]赵萌、叶莉.金融稳定与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系统 GMM 估计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19(9).
- [77]全凌云、曹泽阳、安利平、梁强强.P2P 网络借贷平台信用风险识别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10).

语言学研究

侯晓舟 杨清臣

2019 年河北省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省教学、科研人员公开发表语言学论文 10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或编著 10 余部。研究成果涉及汉语文字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多个方面。

一、汉语文字研究

(一) 文字、训诂

“特殊变易”是指不符合汉字演变一般规律的变易或不常见的变易现象。杨宝忠举例说明了近代汉字存在会合四字构成的俗体会意字、异体部件替换、形随音变、两形字、异体叠加等五种特殊变易。指出了解近代汉字特殊变易,有助于考释疑难字、分析疑难字构形理据、规范异写字形、整理修订与编纂大型字书以及汉字学、汉字史研究。^[1]

《周礼》是一部重要的古代典籍,“𩇑”字在《周礼》正文出现 2 次,汉代注文出现 3 次,但该字不见《说文》,《万象名义》《新撰字镜》《切韵》系韵书亦均不收,此字可疑。杨宝忠通过考察研究,认为始见于《周礼》的“𩇑”字乃“𩇑”字俗书而误为楷正者。在此基础上,仿照“同形字”提出了“同形部件”概念,指

出对同形部件加以规范、楷正需谨慎;指出利用新材料、新方法和先进的科研手段,可以发现疑难字并纠正前人误说,在继承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成就。^[2]

辽代僧人行均的《龙龕手镜》是一部为僧众通解佛经而编撰的字书,书中收录了大量佛经文献俗字。受其编纂体例所限,《龙龕手镜》收录的佛经俗字与佛经文献失去联系;加之编纂失误与传承失误,致使《龙龕手镜》收录的大量佛经俗字成为疑难字。《龙龕手镜》收录的佛经疑难字,有不少亦见佛经音义书,杨宝忠、王亚彬以佛经音义书为纽带,将《龙龕手镜》收录的佛经疑难字与佛经文献重新建立联系,借助佛经俗字出现的语言环境,对《龙龕手镜》疑难俗字做出考释,发现并纠正《龙龕手镜》异体认同失误。^[3]

《汉语大字典》和《中华字海》是当今最重要的两部中文大型字典,其中收录了一些来自辽代释行均所编《龙龕手镜》的疑难字。这些字经过当代学者考释,有相当一部分已被释出,但待考者也不少。梁春胜对其中的 16 个疑难字试作考释。^[4]

由于传承失误与编纂失误,《汉语大字典》

《中华字海》储存了成千上万的疑难字。大量疑难字的存在,不仅直接影响到两部大型字书的编纂质量和利用价值,而且还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近30年来,学界对大型字书疑难字的考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考释疑难字总数超过1万。虽然如此,《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中仍有大量疑难字没有得到考释,而已有疑难字考释成果有一些也需要补正。杨宝忠、王亚彬以《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为线索,对历代大型字书入部贮存的28个疑难字进行了考释。^[5]

杨宝忠以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文字材料以及汉代碑刻文字材料、《史记》《汉书》文字材料等为研究对象,在全面测查“同字异形”“同形异字”文字材料基础上,揭示汉字演变的一般规律,探讨“同字异形”成因;分析“同形异字”与古书通假的关系;最后论证“既有其字之假借”不为假借。研究成果对于与汉字史研究、对于古代文献的释读与整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参考利用价值。^[6]

按照书写材料分,齐系文字有铜器、兵器、货币、玺印、陶文、石刻等几大类,张振谦按照这些类别对齐系文字作搜集整理和考释研究,并对相关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制度作出相应的考证研究。同时对齐系文字形体的地域性特点作出细致、准确的描写。指出齐系文字在字形写法上与楚、秦、晋、燕四系文字不同,作出系统全面的总结。^[7]

(二) 词汇、辞书

依据以往的相关研究,汉语词语与印欧语等其他语言相比具有较为丰富突出的形象色彩。普通话词语的形象色彩问题以往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吴继章、李燕凌认为河北方言与普通话在词语形象色彩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成语(普通话)/俗成语(河北方言)、“自造词”等词语类型和一部分类型不明显的词语上。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方普在对前代语言继承上以及方普的使用者在知识水平、文化心态、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不同。河北方言形象色彩词语的描写分析不仅对河北方言词汇全面深入调查研究是必须的,而且对我们全面认识河北的社会与文化也具有重要作用。^[8]

李智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双音复合词及其释义为研究对象,以双音复合词的构词

语素义关系、构词语素义和词义关系为研究基点,分别进行词汇语义学和词典学范畴的描写;在共时中型语文词典收词范围内形成的构词语素和双音复合词两种词义系统;不同构词模式在释义方式和结构中的体现。进而归纳词义系统对词典释义系统的内在制约性,以及释义作为词典编纂的主要部分所具有的独立系统性。^[9]

在词汇语义学领域,义位组合研究与聚合研究一直受到中外语言学者的关注。相对于义位聚合研究而言,义位组合研究显得较为薄弱。义位组合可分成两类:一是义位外部组合,即义位之间的组合;二是义位内部组合,即语素义之间的组合。在语素义组合之外,义位内部其他成分的组合也属于义位内部组合。与义位外部组合相比,义位内部组合受到较少关注,宋贝贝、苏新春对动名型复合词义位内部组合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提出义位成分的概念及切分原则,总结、建构了义位成分的类型和层级系统,详细论述了义位成分的组合模式。动名型复合词义位内部组合模式大类分成基础组合模式、扩展组合模式和叠加组合模式3种,其中基础组合模式为主要组合模式。3种组合模式大类主要包括24种组合模式小类,其中有3种组合模式小类为最主要组合模式。最后指出了义位内部组合研究的意义。^[10]

刘伟对比了构词义场内部“网”“刷”在不同义项上的构词能力、新词的使用变化趋势及其网络搜索热度,分析了“网”“刷”新语素义生成的具体原因和途径,探究了《现代汉语词典》对“网”“刷”新语素义收录的取舍问题。从构词义场的角度探讨了语素新义确立的相关标准。提出了建立动态词汇学的必要性和意义。^[11]

褒贬陪义是词的诸多陪义类型中的一种,反映了语言共同体对伴随理性意义的褒贬情感,传统上将这种附属意义带褒贬的词称为褒贬色彩词,将理性意义带褒贬的词称为褒义词和贬义词。从称谓来看,两类词似乎界限明朗,十分清楚,但实际上经常有人混淆这两类词,甚至有些词典对这两类词的释义方式也是完全相同,不加区别。近年来有些专著和论文讨论这两类词的差异,但都不尽完善。郭佳兴、袁世旭针对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查漏补缺,对前人未能充分说明的地方予以补充和完善。^[12]

安新县地处雄安新区,素以“华北明珠”白洋淀而闻名。安新域内淀面积占到白洋淀总面积的85%,悠久的历史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安新特有的淀域特色;安新人世世代代在淀区生活,其生活有着鲜明的水乡特色,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知识与经验,这些知识与经验经过了淀区人们语言智慧加工,获得了谚语的表现形式。谚语是积淀人类实践经验的一种语言形式,以其寓意深刻及韵味隽永而著称。安新谚语,正是这样一种承载了白洋淀区域文化传承功能的语言。其数量丰富,内容极具白洋淀淀域特色。张莉通过阅读《中国谚语集成·河北卷》和《安新县志》两部著作,搜集梳理了两书所载全部安新谚语条目,共计390条,从中择取渔业生产谚、物产谚、事理谚百余条,通过典型谚条解读,分析其内容的知识性和语言表现形式的艺术性,探寻其中所蕴涵的淀域特色文化。^[13]

汉语辞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知识财富的集中体现。我国汉语辞书编纂历史悠久,成果丰硕。自先秦至今,中华民族编纂出近千种优秀辞书,拥有丰富的辞书编纂经验。袁世旭、郑振峰认为全面梳理古人关于辞书的零散观点,提炼辞书文本中蕴含的辞书理论,建立汉语辞书信息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中国汉语辞书理论史,整合并提升出汉语辞书的独特理念,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汉语辞书理论史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强化辞书学学科地位的独立,有利于提出符合汉语自身特征的辞书理论,加强对汉语辞书编纂的指导。^[14]

(三) 语法

使成式(动结式)是由动词加结果补语构成的黏合式述补结构,是述补结构中谓词作补语的一个较早的形式。汉语使成式的形成及发展与多种语法现象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使成式形成之前,表达某种致使行为及结果之意的句式主要由连动式和使动式承担,其次还有新兼语式等。使成式形成后,表达某种致使行为及结果之意的句式主要由使成式来承担。使动式、连动式和新兼语式中原有的那部分表达致使行为及结果的功能被使成式取而代之,原有的系统平衡被打破,那么上述诸句式的功能及使用频率一定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动。语言是一个自组织性极强的

系统,系统中任一因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引发其他相关因素的调整 and 变化。任何语法结构的产生或消亡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相关结构之间彼此竞争带来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孙书杰以语言系统的自组织性为理论基础,观察《左传》《史记》《论衡》等文献中使动式、连动式、新兼语式和使成式等相关句式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窥探使成式在上古汉语中的形成及其机制。^[15]

汉语史中表示比较的程度副词有愈、益、弥、滋、加、倍、转、更(更加)、越(越发)等,它们的使用情况大致是:上古汉语时期主要用“愈”“益”,中古汉语时期主要用“益”,近代汉语时期主要用“更”“越”。“愈”“益”“弥”等词语所具有的共同语义特征使它们能够递相类聚到比较类程度副词这一词类的范畴。杨振华认为语法化程度的高低、遵循“语音象似性”规律的倾向和语言系统的自我更新与调整是比较类程度副词发生历时更替的动因。^[16]

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具有重要的汉语史研究价值,韩书庚运用构式语法的理论对“不A不B”构式从语法、语义、语用角度进行研究。语法方面:A、B以单音节的语素或词为主,构式主要作谓语,还可以作状语、定语;语义方面:A、B以同义或近义关系为主,构式表达完全否定、部分否定及假设关系类型;语用方面:用于口语,感情色彩以贬义或中性为主。^[17]

(四) 方言

元氏县隶属河北省石家庄市,位于晋语和冀鲁官话的过渡地带,方言归晋语张呼片。张安生、王志勇、王亚男通过调查和研究,描写了河北方言元氏型儿化变音的地理分布、共性及差异,总结了元氏方言儿化变音的系统特征及规律。指出元氏方言类型的儿化变音也存在于河北南部多地方言中,但各有殊异。^[18]

儿化是汉语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音节形式,儿化的演变具有深远历史。鹿泉黄壁庄村位于河北省石家庄鹿泉区的最北端,北与灵寿县相邻,东有滹沱河,处于平山、灵寿、鹿泉(区)交界处,《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将其划归晋语张呼片。2016年至2019年间,桑宇红先后六次对黄壁庄村方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系统描写了河北晋语鹿泉黄壁庄方言儿化韵母的类别和来源,分析了儿化引起的变韵和变调现象。黄

壁庄方言共有 14 个儿化韵母, 根据韵腹、韵尾的不同可分为元音卷舌型和鼻音尾卷舌型, 其合音方式有拼合型、融合型。黄壁庄方言的儿化可以使平声区分阴阳, 也可以导致平声读如去声。^[19]

湘南土话主要分布在湖南郴州和永州两个地区, 与粤北土话、桂北平话连成一片。其内部种类繁多, 差异很大, 甚至难以通话。这一片是典型的双方言区, 人们同时能说一种西南官话。学界对湘南土话的性质归属一直没有定论, 主要是由于湘南土话的复杂性: 一是湘南土话并非向心型方言区, 不同地点的土话差异很大, 难以概括整区特点; 二是各地土话内部不同方面的复杂性, 如韵母可能有湘语特点, 而声调却有客家话特点; 三是有规律的演变往往不能贯彻到底, 导致有大量的无条件分化, 从而更不易分析其特点的性质。古全浊声母的今读在判定汉语方言性质时是一个重要依据。尹凯剖析湘南土话古全浊声母清化的历史层次, 看出古全浊今逢塞音、塞擦音的声母在早期层次中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无无论平仄全读送气音, 是客赣方言的特征; 另一种是古並、定母读不送气音, 其他声母读送气音。结合移民史和音位感知理论得出, 这是不同时代的客赣方言互相融合的结果, 是完成浊音清化的客赣方言向未完成浊音清化的客赣方言学习, 受母方言音位感知能力所限导致的现象。湘南土话的早期性质是客赣方言。^[20]

此外, 傅林利用契丹语文本和汉语相关文本对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做综合研究, 系统提取契丹文字单位和汉语、蒙古语语言单位的对应, 并综合根据文本分布、时代分布和汉语方言语音特征为具体的对应寻找限制条件。然后在此基础上推求辽代汉语音系和契丹语的各种信息, 并进一步归纳契丹语和汉语相互匹配的规律。^[21]

二、外语教学与研究

(一) 外语教育与教学模式研究

2020 年 2 月 20 日,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印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0 年工作要点》指出, 积极推进新文科建设。其中外语教育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 外语教育为我国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全球化对外语教育水平和质量的要求日益提升。在河北省外语教育

研究领域, 关于人才培养模式、师资水平提高等各类、各项外语教育改革也层出不穷。

王环宇指出, 21 世纪之初, 我国掀起了任务型教学的研究热潮, 任务型教学是交际语言教学理论发展起来的一种教学模式, 由教学目标、信息输入、活动方式、师生角色和教学环境等要素组成。任务型教学基于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求, 注重情意功能, 强调教学中要满足学生基本心理的归属感和影响力, 具有较强的情感性, 任务型教学过程中充满着情意色彩。任务型教学培养学生在真实生活中参与和完成真实生活任务的能力, 强调直接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用英语完成各种真实的生活、学习与工作任务, 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英语运用能力。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 运用任务型教学模式可以提高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水平。^[22]

黄永亮、王淑花、康静指出, 得体性是语言运用的首要特征, 是交际语言能力的核心要素, 也是语言使用者或学习者语用能力的评价标准。在分析得体性起源和界定的基础上, 考察不同交际语言能力框架中得体性的内涵, 可发现得体性主要体现为话语是否与社会文化语境和社交语境相符合。而语用学研究将得体性视为理论构念, 对得体性与语境之间关系的讨论兼顾语言语境和认知语境, 认为交际活动的意向性作为最基本的语用前提, 使得得体性构念和语境构念合为一体。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得体性的内涵, 提高得体性子量表的效用。^[23]

惠良虹等针对移动学习环境下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调控策略发放调查问卷, 在 5 所高校大一至大三学生中回收有效问卷 636 份。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了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的量表。量表由“价值调控”“掌握目标唤起”“设备控制”“兴趣提升”“同伴互助”和“自我奖励”六因子构成。结果显示, 学生对于“价值调控”“兴趣提升”和“掌握目标唤起”的使用频率较高。女生对大多数策略的使用频率显著好于男生。英语专业学生的策略使用总体上好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不同年级学生的策略使用不存在显著差异。^[24]

张素敏、张继东认为, “续”作的促学作用多采用终结性评价, 缺乏基于“多轮续写”的形成性评价分析。研究者通过对比高、低不同水

平英语学习者 9 次“多轮续写”中, 过去时间概念错误表达频次和综合阅读水平的变化, 首次从形成性评价角度分析英语学习者续写过程中的动态发展, 发现: 1. 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的时态表达错误均呈下降趋势并最终趋同, 但低水平者的变化曲线较大; 2. 低水平者的综合阅读成绩呈显著上升趋势, 但与高水平者依然差异显著。结果表明: “多轮续写”能显著提高学习者形式—意义匹配和阅读能力, 但其促学效果因测试任务和学习者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25]

张秀芹等以英语专业大学二年级学生为受试对象, 通过实验对比同一续写任务中不同输入模式对词汇习得的影响及同一输入模式下不同语言水平对词汇习得的影响。研究表明: 听后续写不仅可以促进词汇习得, 而且在促进词汇习得方面能够产生与读后续写相当甚至略好的效果; 听后续写任务中不同语言水平学习者词汇习得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但读后续写词汇习得效果受语言水平的影响较小。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二语教师在今后教学中通过听后续写任务充分发挥听力对词汇习得的重要作用, 同时为今后的“续”论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26]

吴柳运用社会文化理论和活动理论, 考察了活动调节中不同目标导向和主观能动性等因素对学习者的口语表达的影响。实验选取 40 名韩语母语者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信息差”方式的口语表述活动来获取数据, 采用 2×2×2 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的方法分析数据。结果表明: 活动调节可以提升汉语二语学习者的口语表达能力; 学习者的目标导向和主观能动性均会影响口语表达; 在四种组合类型中, “掌握型目标导向+主导角色”最有利于学习者的口语表达。^[27]

从外语教师培训有效性角度出发, 张素敏、孙钦美认为基于相关评价研究和高校英语教师培训实践,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首次尝试制定包含教师、组织者、互动、目标认知、服务设施 5 个因子的高校外语教师培训评价量表, 分析了教师培训有效性评价的影响因素, 指出学员的教龄与职称显著影响互动因子, 而学位与参训费来源则显著影响目标认知因子。研究不仅能为高校外语教师培训有效性的量化评价提供参考, 而且有利于多维分析外语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28]

马瑞贤、侯贺英、汤倩指出, 对外传播能力

是国家软实力的必要结构, 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对外传播能力有限, 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塑造、文化安全保障、国际合作交流等。未来, 要提升我国的对外传播能力, 首先要培养一批具有较高外语语言素养、跨文化素养, 以及新闻传播素养的复合型对外传播外语人才。然而, 目前国内高校的外语人才培养存在诸多问题, 影响了对外传播复合型外语人才队伍的建设。有鉴于此, 可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构筑、教学模式革新、师资队伍建设五个角度入手, 形成对外传播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路径。^[29]

从依托项目的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出发, 刘育东指出, 依托项目的外语教学 (PBLI) 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进入 21 世纪以来, 其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外语教学领域掀起了一轮新的高潮。大量实证研究表明, PBLI 是培养 21 世纪外语人才的有效教学模式或教学策略。然而, PBLI 的理论构架还处于探索阶段。从教育观、学习观和语言观三个角度探讨 PBLI 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对 PBLI 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必将起到促进作用。^[30]

张卫静、康玫认为, 教师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育教学质量的优劣。从目前来看, 我国教师整体的专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地方高校教师在专业自主发展道路上仍面临内、外阻碍性因素, 如专业理想缺失、教学方法固化、自主学习能力逐渐走低等因素, 制约了地方高校教师个人及整体的专业水平。面对这种情况, 需要考虑从地方高校教师专业身份认同、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自主性、发展意识等角度来探索地方高校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路径。^[31]

闫旭东认为, 教育的多模态化要求教师的教学方法与与时俱进, 多元读写教学法应运而生。基于当前高中英语教学现状, 以多模态化教学为背景, 以人教版高中英语课文 *Festivals Around the World* 为例, 提出在高中英语课上使用实景实践、明确指导、批评性框定等策略, 培养学生的多元读写能力。^[32]

在日语教学研究领域, 肖潇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对日语人才需求呈现多样化和高端化, 大学日语教学不仅要注重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教学与学习目标, 还要探究日语专业翻译教学理论、教学

方法改革和翻译技巧。由高宁等人合著的普通高等教育新世纪日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汉日翻译教程》一书,对日语翻译教学理论与翻译技巧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33]

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研究领域,赵清丽认为小学英语课堂教学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呈现知识的教师话语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针对该问题,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语义波概念,讨论了知识的内涵,从教师话语视角阐释了知识建构的语义波形成机制,以小学英语优质课的教师话语为例分析了课堂知识呈现的语义波模式,对构建高效小学英语课堂提供了理论指导。^[34]

此外,程钰情的《论外语阅读教学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优越性》,刘娜的《韩国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教育现状与发展策略》,刘芳的《以思辨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大学英语教学策略研究》,付晓丽的《高阶思维与学术英语写作》等也从多个角度和层次论述了外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的相关问题。

(二) 外国文学研究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与世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近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发展势头强劲,呈多样化趋势。诸多学者日渐认识到,从不同观点、视角审视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成为目前外国文学研究的主流。

王敬民认为,随着生产主导型社会向消费主导型社会的衍变,消费对象不再总是物品的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取而代之,成为消费者的重要关切,符号消费也由此应运而生。作为后工业化社会的显著特征,符号消费与物品的使用价值拉开了距离,并以符号政治经济学的面目,满足身份想象,区隔社会阶层,确保社会运行,实现了对社会的符码操控。^[35]

周建永指出,在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简化。出现这一现象既和弗洛伊德理论结构庞大、复杂有关,也和国内相关资料不足和文艺学学者的学术取向有关。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化主要表现为本能理论的简化、心理人格/心理结构理论的简化和潜意识理论的简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化,既有适当的取舍,同时也存在着忽视弗洛伊德理论复杂的心理学内涵和对弗洛伊德理论产生误读的问题。对弗洛伊德理

论简化后的借鉴,一方面使中国的文艺心理学在文艺创作研究上有所突破,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弗洛伊德理论批判上的偏差和理论创新方面的不足。^[36]

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出发,郑朝红指出,在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苏努家族案值得一书。该案借耶稣会士之手,漂洋过海,传播到欧洲,并成为欧洲思想家塑造中国形象的素材,可为考察跨文化交流提供样本。通过考察中西文本中苏努家族案表述的异同,以及欧洲思想家对该案解读的差异,可以揭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信息的变异,提醒信息传播者重视信息接受者的认知和心理需求与传播期待的匹配度。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内容,亦可为当今的文化交流提供启示。^[37]

王晔在对《聊斋志异》英俄译本的研究中指出,文学译本,尤其是古典文学译本的注释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比较互鉴的活跃场。与文学作品的注释相比,译本注释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重塑功能,译者在进行文化解读的同时,也在以“自我”的视角构建文化他者形象。本文通过对《聊斋志异》英俄译本注释的对比分析,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原理,考察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和阿理克(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两位汉学家建构的中国文化形象之异同,揭示形象塑造背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38]

约翰·邓恩身处文艺复兴与17世纪理性主义交汇时代,其死亡观极其复杂。赵烨、李正栓认为,邓恩的死亡观深受人文主义影响,他认为众生必死,人们应该活在当下;同时受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朴素唯物主义等古典哲学的影响,其死亡观中流露出对灵魂和肉体关系的深邃思考;宗教神学的影响使邓恩敬畏上帝,畏死求生;而当时萌芽的自杀哲学令邓恩形成独特的自杀理论,为自杀辩护。邓恩作品的死亡哲学具有多元化、时代性以及超前性的特点。^[39]

彭瑶在研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的忧郁美学理论时,指出法国思想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经常把忧郁这一概念放入文学艺术创作与审美中进行考察。自恋型忧郁在她看来是主客体模糊的

“临界状态”，这种状态中的自我边界游移，自我的否定机制活跃，不断对自身展开质疑、否定与重构。忧郁激发主体从迥异角度反观自身与看待外界事物，促进其艺术创新能力。文艺创作中，作者通常抗拒象征语言的驱力与情绪获得暂时命名，通过升华被感知为疗愈性愉悦。本文总结克里斯蒂瓦理论中忧郁的核心涵义，分析内在于自恋型忧郁的否定机制，并阐释克氏提倡的升华机制如何在具有忧郁特质的美学创作与接受中发生作用。^[40]

王彦军从《四个签名》作品入手对伦敦街道美学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四个签名》具有19世纪后期在英国流行的“街道文学”的典型特征，错综复杂的伦敦街道网络是福尔摩斯和华生探寻与樱塘别墅谋杀案相关的蛛丝马迹、寻找犯罪分子斯茂和托格的行踪并与他们不断博弈的重要空间。《四个签名》中的街道叙事展示出小说中伦敦街道隐含的空间颓废美学、行走与滞留的辩证实践美学和身份政治美学。^[41]

王诣理的研究表明：《假面罗曼史》是一部发人深省并带有极强的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史诗。其剧本改编自法国小说家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小说《危险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是法国著名放荡主义小说。这部小说曾经被改编成不同版本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日本宝歌剧团是全世界演出场次最多的剧团，对于《危险关系》这部小说，宝歌剧团到2018年为止共演出了四个版本的音乐剧。分别是1997年雪组初演，2012年宙组版，2016年以及2017年由花组top明日海里奥两次出演的全国擦版。但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并未直接使用“危险关系”作为报幕名目，而是由著名编剧兼导演柴田侑宏创作，并将此剧命名为《假面罗曼史》。但终归换汤不换药，讲述的仍是贵族花花公子瓦尔蒙和寡妇弗兰斯瓦兹玩弄爱情的故事，以及这个过程中溢发出的各种复杂的感情，对感情的表达技巧和对人物的塑造等，极大地升华了这部剧。^[42]

卞少辉指出，科幻文学是众多文学类型之一，是伴随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学样式。作者主要是通过幻想的形式来表现未来人类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中的内容多是在科学事实基础之上的预见和想象。^[43]

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霍君认为僧人文觉，历史上真实存在之人物，在《平家物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对他的评价常与日本天狗牵涉在一起。历来的研究着重强调文觉粗野的性格与天狗之间的关联。本文从“善天狗”这一角度切入，不仅将文觉粗野的性格包含入内，还将《平家物语》中文觉既守护佛法又反抗王权的“两面性”特征作为整体进行讨论，并从“善天狗”出现的文化背景出发，探讨文觉“两面性”形象的意义，深化作品对文觉形象塑造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中世时期慈惠大师去世后“转生”为天狗的传说，揭示出日本中世时期民众的集体意识中存在的“魔佛一如”的认识。^[44]

张文钰、于宝英指出，当代英国戏剧先锋萨拉·凯恩创作的第四部戏剧《渴求》，摒弃了前三部戏剧中直白的性与暴力，用极具音乐性和节奏性的语言探讨了关于爱、性、虐待、关系和死亡的话题。《渴求》的表现手法明显带有“后戏剧剧场”特征，作家运用这种强调“在场性”和“现时性”的剧场展演艺术，展现了当代城市荒原中爱之匮乏，以及身处荒原中的人们对爱之渴求而不得的痛苦。^[45]

在电影文学艺术研究领域中，刘宝惠、陈宝娣认为身体往往是被表现和审视的对象，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在动画电影中，由于非人类的动植物乃至无生命物都可以成为鲜活的、形象各异的主人公，身体话语有了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在蒂姆·波顿版《小飞象》（2019）中，身体就成为一种携带了值得深思的批判、反思信息的话语。片中，波顿以霍特、笨宝等角色的特殊身体带出了诸多冲突，对社会和人性进行了能动的再现，也凭借着身体话语寄寓了多种正面价值取向。^[46]

刘晶晶、倪家静指出，在电影艺术中，“女性特质”常常成为人们审视电影人或作品的角度，或是电影人主动为影片贴上的标签。弗朗西斯科·科波拉之女，曾揽获好莱坞年轻导演奖的索菲娅·科波拉人如其名（索菲娅 Sophia 在希腊文中为阴性，意为智慧，是缪斯女神的特性之一），不断在自己电影中以女性为主体，以女性经历为素材，让电影浸淫于引人深思的女性特质中。性别不仅是一个探究科波拉电影的视角，也是一扇我们拓展和深化对其他导演认识的

窗口。^[47]

闫柯菲在研究美国著名记者珍妮特·沃尔斯创作的小说《玻璃城堡》时指出,在这部入选美国亚马逊“一生必读的100部传记和回忆录”中,沃尔斯依照时间顺序,记录下自己困苦而发人深省的童年生活。2017年,德斯汀·克里顿将这一曲折生动的故事搬上银幕,虽然影片对原著小说进行了大量的删减,但依托于纯熟的改编手法,影片为观众展现了一个更具独特魅力的艺术世界。^[48]

此外,还有陈琳的《朝鲜半岛首部《庄子》注本研究》、张秀仿的《费奇诺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诗学》、侯楠的《安妮·埃尔诺作品中女性的异化》、李雪瑾等的《从“butterfly”一词看纳博科夫英文小说中的蝴蝶情结——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王娜的《麦尔维尔初期小说思想研究》等文章和专著也从丰富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外国文学研究。

(三) 语言学与翻译学交叉研究

本年度对语言学和翻译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明显的“交叉”特征,也反映出翻译学研究同语言学研究紧密结合发展趋势。

侯羽、杨金丹、杨丹采用文本对照细读方法考察了杨宪益夫妇语义显化翻译《红楼梦》的策略,得出四方面主要发现。首先,显化程度上,他们显化的数量不少,但幅度不大。其次,显化内容上,他们以文本建构显化为主、文化内容显化为辅,前者主要涉及明确人物关系、明示所指和添加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和目的等,后者主要包括成语典故、礼仪习俗、历史人物、诗词歌赋等。第三,显化方式上,他们采用了以隐性显化为主、显性显化为辅的方式,隐性显化方式中添加手段的采用略多于明示手段,显性显化方式中尾注的采用占主导,括号注的采用极为有限。最后,显化与叙述手法相结合上,他们以叙述中显化为主、对话中显化为辅。三位研究者认为,杨氏夫妇这一鲜明的语义显化翻译策略与其对待原著的态度、其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杨宪益先生个人文体偏好有着密切的关系。该策略对我国当下典籍英译实践的启示是:显化翻译必不可少但要注意适度性,同时在方式的选择上要因地制宜。^[49]

任淑坤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外国著

作翻译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时尚,各种翻译理论也异常活跃。激进者倡导“直译”和“忠实”,要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这种观点被后世的学术界认为是当时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新文化发展潮流的代表。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直译成为所有外国作品翻译者遵循的原则。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考察新文化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期刊《新青年》,就会发现,当时刊发的外国作品以及中国作品中提及的外国作品的题名翻译是既有直译的,也有非直译的,而非直译的情况显然更复杂,可谓多姿多彩。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多种翻译方法的存在仍是客观事实;“忠实”标准仍可作多元的理解;译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倡导直译的观点虽然成为时尚潮流,但在现实中并未也不可能一统天下。^[50]

经过研究,张素敏认为,“续译”是一种提高翻译水平的有效方法,译者主体性是翻译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目前尚缺乏“续译”对译者主体性的作用研究。其通过对比续译组和非续译组对形容词、名词和动词的翻译,考察了不同词类加工中“续译”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结果显示:1. 与名词和动词相比,“续译”对形容词加工中的译者主体性影响最大;2. “续译”能显著提升形容词加工中的译者主体性。结果说明:“续译”对译者主体性有显著协同效应,但这一效应因不同的词类而有所不同。^[51]

此外,张素敏还对续译在情绪信息语篇加工中的效应进行深入研究,并指出不同于前人脱离语境的情绪信息研究及侧重语言结构的“续译”研究,主要考察语篇情绪信息加工中“续译”对外语效应的作用。对比续译组和非续译组受试对语篇中“害怕”一词的英译和“afraid”一词的汉译,研究发现:(1) 母语使用与外语使用相比,情感激活较多、加工准确性较高;(2) 续译组情绪信息加工准确度及反应敏感度均更高。结果表明,语篇中的情绪信息加工存在外语效应,但“续译”能显著抑制这一效应而促进学习者的情绪信息加工。^[52]

郝翠屏从翻译史角度阐释了文学翻译教学的内容。她指出,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发生在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背景之下,翻译主体是知识界精英,他们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高度的文化觉

悟,为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带来诸多启示。回顾历史反思现在,外国文学翻译教学应注重文化觉悟导向,在宏观规划上深化国情教育、切合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培养目标、改进培养模式;在微观教学上,引导学生从文化的维度思考翻译活动,并在翻译实训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充分利用翻译前辈留下的翻译序跋,研究他们的文化觉悟及翻译经验。^[53]

赵玉珍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指出,早在1898年,上海的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及最高法院与领事馆杂志》就已刊登了澳大利亚小说家盖伊·纽厄尔·布思比的短篇小说《乔叔叔的遗产》,这是最早被介绍入中国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而第一部被翻译为中文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则是小说家弗格斯·休姆的侦探小说《白巾人》。根据她的考察,清末民初共有20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被译为中文,其中19部作品是被作为英美文学译入中国的。这些译作皆为通俗小说,包括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清末民初的澳大利亚文学译作代表了澳大利亚文学中文翻译的起源,具有一定的翻译史意义,对早期的中澳文学交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54]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学者们在藏族格言诗翻译领域取得成果颇丰,李正栓也撰文多篇表示纪念。他概述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藏族格言诗翻译情况,分为四个时期,即:新生时期(1950—1965年)、沉寂时期(1966—1976年)、全面时期(1977—1999年)与深入时期(2000年以后)。在国内,藏族格言诗的翻译与中央对西藏和藏族文化的关心密切相关,中央民族政策极大促进了藏族格言诗的翻译。在国际上,藏族格言诗翻译受到世界藏学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中国国力增强等因素的影响。在这70年期间,最初只是《萨迦格言》得到关注并被翻译,随着时代进步,其他格言诗被逐渐汉译和外译。藏族格言诗翻译的成就充分表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传播力,体现出翻译在文化与文明共生和互鉴中的重大作用。^[55]

同时,李正栓、赵春龙指出,藏族格言诗为藏民族重要的精神文本和文学文本,具有较高翻译研究价值。他们系统梳理了藏族格言诗英、汉翻译史,全面分析了其翻译活动对西藏地区经济

文化构建的重要作用。西藏是我国西南边陲重要桥头堡,宣传西藏文化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友好关系,促进文化交流以及保持周边安定有着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56]

李正栓、李子馨在进行《国王修身论》翻译与传播史研究时指出,1895年,米庞嘉措创作了《国王修身论》。在党中央指示推进西藏文化的大潮中,西藏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耿予方教授汉译的《国王修身论》。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李正栓和刘姣把汉译本进行英译。2017年,英译本在尼泊尔出版,用的是英汉藏三语。这填补了《国王修身论》英译的空白,使其得以在藏语区、汉语区和全世界传播,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构建文学对外话语体系和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化起到积极作用。^[57]

孙乃荣、史耕山在介绍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观”的基础上,通过概述民俗文化英译研究现状,围绕不同翻译实例的分析,提出“求同”与“存异”两种翻译取向。“求同”即对民俗文化原文适当编译,以译传异,尊重异文化;“存异”即对中华民俗文化做到充分了解,采用多种翻译策略,以保留文化特色,提高民俗文化英译的质量和效果,真正实现有效的传播。^[58]

通过研读《当代译学批判》,刘甜对建立翻译学新系统提出了新观点。其认为,综观今日翻译学界,解构之风日甚,传统译学的理论基石“忠实”“对等”面临倾覆之险。《当代译学批判》一书坚持学术思考的独立性,借解构主义的方法对自翻译研究学派以降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精要的梳理、解构和批判性研究,指出西方当代译论在回答译学基本问题上所存在的问题,澄清种种误读与偏见,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并探讨当代译学的发展与趋势,倡议译学界志同道合的学者齐心协力、共同研究,促成传统译论与当代译论的相互沟通、彼此接纳,建立译学新系统。^[59]

其他成果还包括王玉环的《〈老子〉一书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吴松林的《中国词律》、李正栓的《格丹格言》(藏汉英)、贾晓英的《乐府诗英译研究》等。

(侯晓舟:河北大学副教授,

杨清臣：河北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杨宝忠. 谈谈近代汉字的特殊变易[J]. 中国语文, 2019(5).
- [2] 杨宝忠. “甹”字琐议[J]. 语言科学, 2019(3).
- [3] 杨宝忠, 王亚彬. 《龙龕手鏡》异体认同举正[J]. 古汉语研究, 2019(4).
- [4] 梁春胜. 《龙龕手鏡》疑难字例释[A]. 中国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C].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9.
- [5] 杨宝忠, 王亚彬. 《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人部疑难字考释[J]. 励耘语言学刊, 2019(2).
- [6] 杨宝忠. 文字变易与古书通假[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9.
- [7] 张振谦. 齐系文字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 [8] 吴继章, 李燕凌. 略说河北方言词汇层面的形象色彩问题[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2).
- [9] 李智. 《现代汉语词典》双音复合词释义研究[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9.
- [10] 宋贝贝, 苏新春. 现代汉语动名复合词义位内部组合研究[A]. 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辑)[C].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
- [11] 刘伟. 当代汉语同素词族的衍生与语素义的发展变化——兼谈新语素义的入典标准问题[J]. 辞书研究, 2019(6).
- [12] 郭佳兴, 袁世旭. 论褒贬义词和褒贬陪义词[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3).
- [13] 张莉. 安新谚语的白洋淀域文化内涵解析[J].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 [14] 袁世旭, 郑振峰. 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A].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秋之卷[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15] 孙书杰. 使成式的形成及其与相关句式的互动[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
- [16] 杨振华. 汉语史中“更”类程度副词历时更替的原因分析[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 [17] 韩书庚. 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不A不B”构式研究[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9(4).
- [18] 张安生, 王志勇, 王亚男. 河北元氏方言儿化的特点及比较[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
- [19] 桑宇红. 河北晋语鹿泉黄壁庄方言的儿化[J]. 语文研究, 2019(3).
- [20] 尹凯. 从古全浊声母的读音层次看湘南土话的性质[J]. 方言, 2019(1).
- [21] 傅林. 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22] 王环宇. 任务型教学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探究——评《高校英语任务型教学与评价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9(3).
- [23] 黄永亮, 王淑花, 康静. 二语语用能力研究中的得体性及其表征[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9, 27(3).
- [24] 惠良虹, 张莹, 李欣欣. 移动学习环境下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动机调控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 2019, 40(1).
- [25] 张素敏, 张继东. “多轮续写”中学习者英语水平的动态发展研究[J]. 外语教学, 2019, 40(6).
- [26] 张秀芹, 武丽芳, 张倩. 续写任务中输入模式和语言水平对英语词汇习得影响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2(2).
- [27] 吴柳. 活动调节对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表达的影响[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9(6).
- [28] 张素敏, 孙钦美. 基于实践的高校外语教师培训有效性评价研究[J]. 外语界, 2019(3).
- [29] 马瑞贤, 侯贺英, 汤倩. 对外传播视域下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研究[J]. 传媒, 2019(11).
- [30] 刘育东. 论依托项目的外语教学理论基础[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21(4).
- [31] 张卫静, 康玫. 地方高校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现实困境、阻碍因素及路径探索[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9, 37(5).
- [32] 闫旭东. 多元读写模式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教学与管理, 2019(18).
- [33] 肖潇. 日语翻译教学理论与翻译技巧研究——评《日语翻译教程》[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 39(8).
- [34] 赵清丽. 小学英语课堂知识有效建构的语义波模式[J]. 教学与管理, 2019(18).
- [35] 王敬民. 论符号消费的内在逻辑[J]. 名作欣赏, 2019(33).
- [36] 周建永. 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化”[J]. 心理学探新, 2019, 39(6).
- [37] 郑朝红. 文化交流中的异变: 清朝苏努家族案的欧洲之旅[J]. 河北学刊, 2019, 39(2).
- [38] 王晔. 《聊斋志异》英俄译本注释中的形象建构[J]. 国际汉学, 2019(1).
- [39] 赵焯, 李正栓. 邓恩多元死亡观哲学透视研究[J]. 外语研究, 2019, 36(5).
- [40] 彭瑶, 朱莉娅·克里斯蒂瓦的忧郁美学理论[J]. 当代外国文学, 2019, 40(1).
- [41] 王彦军. 《四个签名》中的伦敦街道美学[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2(3).
- [42] 王诣理. 从《假面罗曼史》试析男女危险关系[J]. 戏剧文学, 2019(6).
- [43] 卞少辉. 科幻文学核心价值探析——评《英美科幻小说简史》[J]. 语文建设, 2019(23).
- [44] 霍君. “善天狗”的出现与古代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构建——以《平家物语》对文觉的塑造为例[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9(3).
- [45] 张文钰, 于宝英. 展演渴求之苦: 后戏剧剧场视阈下的《渴求》[J]. 四川戏剧, 2019(3).

- [46] 刘宝惠,陈宝娣.《小飞象》的身体话语建构[J].电影文学,2019(12).
- [47] 刘晶晶,倪家静.索菲娅·科波拉电影的女性特质[J].电影文学,2019(6).
- [48] 闫柯菲.《玻璃城堡》:跨媒介叙事的主题变更与现实审视[J].电影评介,2019(13).
- [49] 侯羽,杨金丹,杨丹.杨宪益夫妇语义显化翻译《红楼梦》策略之启示意义研究[J].红楼梦学刊,2019(1).
- [50] 任淑坤.《新青年》中所见外国作品题名翻译——“直译”策略的理想与现实[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51] 张素敏.不同词类加工中“续译”对译者主体性的作用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9(3).
- [52] 张素敏.续译在情绪信息语篇加工中的效应[J].现代外语,2019.42(4).
- [53] 郝翠屏.从近代翻译史看以文化觉悟为导向的文学翻译教学[J].中国大学教学,2019(10).
- [54] 赵玉珍.清末民初的澳大利亚文学翻译[J].国外文学,2019(2).
- [55] 李正栓.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藏族格言诗翻译[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4).
- [56] 李正栓,赵春龙.不同时期藏族格言诗翻译对西藏经济文化的构建作用[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2).
- [57] 李正栓,李子馨.《国王修身论》翻译与传播史研究[J].外语教学,2019,40(2).
- [58] 孙乃荣,史耕山.文化自觉视野下的民俗文化英译研究[J].上海翻译,2019(2).
- [59] 刘甜.翻译学的批判和批判性的翻译研究——读《当代译学批判》[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27(2).

文 学

文艺理论研究

姜文振

2019 年,河北省文艺理论工作者紧密追踪学术前沿,在当代文化与文论研究、西方现当代文论研究、中国传统文论与美学研究等领域深入探索、开拓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含量的研究成果,在国内文艺理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批中青年文艺理论学者迅速成长,彰显了河北省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实力,为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当代文化与文论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文化与文学艺术生态的发展变化,文艺理论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活跃态势,从知识学的层面探索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成为一个重要论域。2019 年,河北省学者在这一论域积极探索,完成一批重要课题,取得一批学术创新成果,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与肯定。

2019 年,由邢建昌主编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是邢建昌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该论著从知识、知识生产的视角考察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状况,从“元理论”层面展开的对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在邢建昌看来,与一般的文学理论反思研究不同,知识和知识生产的视角尝试揭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展开自身的内在逻辑,厘定每一阶段重要命题赖以形成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文化的语境,揭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增长的动力学根据以及谱系学图示,提升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学科化和专业化的水平。秉持“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问”原则,使问题语境化、历史化,从而超越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经验式感知和情绪化论证的偏见。这一研究思路有效地避免了文学理论反思研究中由于宏大叙事所带来的问题意识匮乏的弊端,从知识化、专业化等方面提升了文学理论的学科水准,发挥了文学理论介入现实与公共空间的能力。^[1]知识学模式既是理论的也是方法。文学理论某种观念的提出、某种方法的运用以及某种解释效果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基于经验的,而是受深层的“知识型”所决定。邢建昌在研究中一直秉承“知识型”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信念,他认为研究不只是实证性地进入问题,也是带着特定知识背

景进入问题的过程。尤为可贵的是,此书的著述呈现出一种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文情怀。作者把为一些人视作枯燥晦涩的理论研究作为自我生命的存在方式,作为使个人获得尊严和力量的方式。他引用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说道:“是‘思’照亮了‘在’的意义,赋予了‘在’的行动价值。‘思’因此是人为的、属于人的,是人难以摆脱的宿命。既然选择了‘思’,那就唯有笃定前行,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以超然的心态做入世的学问。如此,方能无愧于生命。”这种以学术为志业的情怀和担当,无疑是当今学术界最为缺乏的精神资源。^[2]

当代文艺学的反思研究,是当代文化与文论从知识学层面进行开掘的一个重要方向。孙秀昌的《“反学科”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针对本世纪初陶东风提出的“反本质主义”文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孙秀昌看来,陶东风所致力“反学科”文艺学知识生产是其“反本质主义”策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运思理路看,这种反学科实践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的:一是由反思“学科专业化”到颠覆经典秩序;二是由反思“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到倡导知识分子的政治化。从研究视域看,陶东风所倚重的“文化研究”视域拘囿于“权利”一元论与泛政治意识形态,从这种视域出发固然可以揭示出“利益—权力”化了的学科体制的弊端,但他在揭示学科利益化、权力化弊端的过程中,却不幸地认同了造成这种弊端的“利益—权力”机制。至于文艺学学科以及经典秩序得以确立的“良知—公意”机制则始终在他的视野之外,特别是当他以一元化了的“利益—权力”机制来谈论文学问题时,他实际上已把文学问题化约成单纯的社会政治问题了。孙秀昌指出,陶东风在发起“反本质主义”之争的同时,还发起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但是这种以“反学科实践”为基本策略的“文化研究”,带有一种难以掩抑的泛政治意识形态倾向。这种泛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学科实践”至少带来了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致使陶东风将“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文化功能简单地理解成了政治批判功能以及对大众的政治发动功能;二是致使陶东风在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视为文艺学的根本问题的同时,将文艺学学科的合法性简单地归结成政治意识形态

性。孙秀昌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他看来,一位纯正的学人,与其借着文艺学的名义遮遮掩掩地言说政治,倒不如径直依着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坦坦荡荡地言说政治。事实上,即便是研究政治问题的政治学,也须得研究者为其确立一个超越性的价值维度,这个超越性的价值维度说到底就是“正义”;唯有如此,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政治学才不至于畸变成某种热衷于策略的权谋学。^[3]

姜文振、苏泽的《当代中国文论反思范式之反思》将批判性反思进一步指向了包括“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和“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文论范式”在内的当代中国文论反思范式。在姜文振、苏泽看来,“反思”与“转型”,是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现代发展历程中的两个关键词。中国文论知识型从古代向现代、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换,都是以不同呈现方式的批判性“反思”为先导,作为“反思”的结果而实现的,由此形成了百余年来中国文论多轮次的范式构建与选择。可以说,“反思”是百余年来中国文论不断探索演进的重要动力。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学艺术生存方式的当代变化、后现代观念的日益深化、后理论的理论探索之影响的日趋深入以及后人文主义对于传统人文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的冲击,中国文论的反思与转型呈现为全方位跃动的、更为丰富多向的态势,其中影响最为显著、引发争论最多的反思型文论范式探索,当属本世纪初的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与近年来的反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文论范式。作为反思型文论范式,二者在形成对抗性张力关系的同时,其自身又都存在着矛盾、悖论甚至走向其所否定的理论状态的可能性。这种理论反思的尴尬处境提示我们,真正的理论反思不能仅仅局限于理论建构的知识论层面,还应包括人性论和历史观的、特别是对人类自身的思维局限的反省与反思。文学理论的当代反思并不是简单地贴上“后现代”“公共阐释”的标签就算大功告成了,我们必须思考“反思”要往哪里去的问题,即现代之后、后现代之后甚至未来更多的“后”之后,文学理论应该如何表达,我们应该如何存在。虽然“我们的自我反思是存在极限的”,反思需要谦卑意识,但我们也同时需要超越自我局限和主观性盲区的超越精神。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境绝不仅仅

在于文学本身或理论本身。我们所期待的未来,需要一种真正的反思和包容的氛围和机制。文学理论的反思须在观照“他者”的同时将反思的目光聚焦于各自理论自身,反思自身理论及其应用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局限,只有这样方可真正实现一种祛除自我中心、具有反思性真意的理论表达,方可在展开理论表达之时进入一种开放式的修正与纠错程序,以对差异的公共性的强调为前提,寻求一种可在反思中达至某种理论共识的公共阐释。^[4]

除上述关于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外,聚焦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成果也值得关注。黄建生的《新时代语境下宏大叙事的重构与创新》认为,宏大叙事曾是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书写方式,但一段时间以来,评论和创作界有些人不断颠覆、解构、抛弃宏大叙事,嘲笑崇高,放逐理想。宏大叙事仿佛成了陈腐、僵化的代名词,禁锢了创作者的思想,抹杀了创作者的个性。这种倾向将导致文学不再关注社会、时代、国家、民族等重大主题,不再弘扬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等主流价值,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精神内核逐渐被掏空。当今,我们国家正处于致力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鲜活的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素材,文学更是有责任用宏大叙事传达时代的脉动,从国家、民族精神的高度,用宏大叙事包含的历史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表现现实问题,反映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描绘新时代的精神图谱,把对生活的感受、思想情感融入到的时代之中,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思考,创作出具有家国情怀和思想穿透力的作品。同时,在深刻转型的时期,人们也遭遇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面临许多焦虑和困惑,需要充满价值建构的宏大叙事作品去凝聚精神力量,提升精神境界。当下文学创作要重构宏大叙事,不是固守原来的模式,而是要在“继承”中超越与提升,要根据时代和语境变化,对宏大叙事给予新的理解和把握,融入新的观念和表现方式,使其不断丰富和创新。^[5]

二、西方现当代文论研究

西方文论是百余年来中国文论体系建构的重要理论资源。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河北省文艺理论界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也不断深化,

不仅深入考察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源流,通过正本清源而清晰分辨来自域外的各种理论的意义、价值、启示,而且根据我国社会文化与文学的当代发展现实使其“本土化”,从而达到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理论建构目的,取得了良好的理论效果。

在西方现代文论美学研究中,孙秀昌关于雅斯贝斯的研究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在《雅斯贝斯〈大哲学家〉中的艺术家论探微》中,孙秀昌指出: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的艺术家论是其哲学家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运思思路贯穿于雅氏精神求索的始终。雅氏的《大哲学家》有两大特色:其一,他不仅以其无所不包的“大全”视野对世界哲学史上几乎所有富有创见的哲学家的思想都有所理会,而且以其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为底据对这些哲学家进行分组并排列了他们的“等级顺序”;其二,他在哲学与艺术的张力间致思“生存”“超越存在”“大全”“理性”“密码”等重要问题,进而将那些既契接“生存”之根又祈向超越之维的艺术家归入伟大的哲学家之列。就《大哲学家》第一卷的分组而言,作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的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被列为第一组,作为“思辨的集大成者”的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被列为第二组,被列为第三组的则是作为“原创性形而上学家”的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普罗丁、安瑟尔谟、斯宾诺莎、老子、龙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三个组别在精神的“等级顺序”中并不是平分秋色的,进而言之,它们依次标示着“精神王国”的三个等级序列。雅氏这种打破哲学与艺术之间界限的做法确实颇为大胆,无论在哲学史上还是在艺术史上,都很少有人敢于这样来处理。说到底,雅氏的勇气来自他的“生存”意识与“大全”视野。无论是哲学还是艺术,二者都应该根源于“生存”,它们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诉诸理性的形式,后者诉诸直观的形式。^[6]

在《雅斯贝斯与康德之间的思想关联》中,孙秀昌认为,雅斯贝斯哲学一以贯之的根本精神之一便是康德哲学。康德的根本精神是他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的人之为人的终极性问题,以及他在对那些问题作元探问的过程中所透出的批判品格。在回溯康德之路的过程中走自己的路,此乃

雅氏对康德的最根本的态度。在雅氏看来,“人”的问题既是康德哲学的出发点,也是他秉持的根本立场。鉴于时代精神处境所发生的变化,在雅氏那里,生存“首次将注意力转向自身”,并在“反诸自身”的生存选择中敞开了通往“形而上学”之路。对雅氏而言,如果说“先验人学”更多地涵养了他的“生存人学”的价值旨趣,那么“批判哲学”则更多地养润了他的“哲学逻辑”的措思方法。康德的“批判”的“理性”打开了“哲学逻辑”的空间,拓宽了哲学思维的广度与深度,无疑对雅氏这位自觉的“方法大师”的“生存人学”起到了不仅仅限于方法论意味的启迪作用。综观雅氏毕生的精神求索历程,下述一个论断当是不违其学说的宗趣的:用自由选择的“生存”来充盈“理性”,用“理性”的形式力量所开辟的“大全”来澄明“生存”,以便引导克尔凯郭尔式的“生存”经由自我坎陷的内在超越之路渐次达至在世生存的临界处,进而在直面生存深渊的瞬间契接康德式的“非对象性超越”之路,这无疑成为雅氏全部运思的动力与特征。这样一来,克尔凯郭尔式的“生存”与康德式的“理性”就成为雅氏哲学的不可或缺的“两只翅膀”。可以说,正是凭着“生存”与“理性”这两只翅膀的共同振动,雅氏在分别汲取克尔凯郭尔、康德的运思智慧的同时,最终又以自己的方式“走出”了他所敬重的这两位伟大的前哲。^[7]

雅斯贝斯的哲学美学对于中国学界亦深有影响。在《冯至与雅斯贝斯的相遇——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中,孙秀昌深入辨析了冯至与雅斯贝斯深刻的思想关联。在孙秀昌看来,冯至与雅斯贝斯都是带着切己的生命体验,不懈求索人类精神出路的生存个体,因此二人的相遇乃是互相敞开、互相发现的过程。从冯至与雅斯贝斯的交往过程看,他俩的交往始终是在“生存”的层面上展开的,而生存的自由选择、自我决断及其渴望交往的意志终于让一个生存型的中国诗人与一个生存型的德国哲学家走到了一起。冯至与雅斯贝斯都是带着切己的生命体验不懈地求索人类精神出路的生存个体,因此二人的相遇乃是互相敞开与互相发现的过程。冯至与雅斯贝斯的相遇乃是喻示“生存交往”之意趣的一个范例。在雅氏致力

不同于那种有条件的“实存交际”,说到底它是源发于生存决断的事件。这种“生存交往”意义上的相遇超越了专业、国别乃至一切外在的囿限,从而使得两位同样具有敏锐的时代处境意识与自觉的文化危机意识的生存个体在体味“个人的失败”、民族的苦难并探问人类可能的前景的过程中有缘并肩行进在探问与倾听“人类共同思想”的途中。同尼采一样,雅斯贝斯也给世人留下了这样一句忠告:“不要追随我,要追随你自己!”可以断言,“追随你自己”乃是生存交往的旨归所在,悟透了这一点,冯至与雅斯贝斯在生存交往意义上的相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就此而言,顾斌所下的这样一个断制——“谁要是紧随自我的话,这便意味着与他人

在交流之中共处,那么他便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一个不再区分德国人或中国人的人”——其实已经为我们觅到了破解这个学术难题的“阿里阿德涅之线”。^[8]

邢建昌的《虚构的意义——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阅读札记》对于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关于“虚构”的复杂讨论进行深入辨析。在伊格尔顿看来,“虚构理论可能是文学哲学当中最难解的部分”。关于这个话题,既产生了不少洞见,也存在着“远高于正常比例的难堪的庸见”,原因在于“虚构的哲学充满了令人愉快的悖论和谜题”。对虚构的混乱认识,是与对文学的简单化理解有关。邢建昌细致梳理了伊格尔顿关于“虚构”的几个追问,包括“文学与虚构”“作者与虚构”“事实与虚构”等多个问题,从而表明,虚构是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构使人们认识到了事件背后的意义,也将语言对现实的顺从、依附的被动地位中解放出来,而具有了“自我指涉”的意义。虚构就像演戏,人们不会指责或揭穿演戏的“假装”性质;同样,人们也不会将虚构文本指责为虚假。虚构所以被真实接受,就因为小说的形式自成一个世界。在形式的世界里,虚构支撑起了非实指、非命题、非真理(知识)的叙事空间——这是一个比真实的世界神奇得多的世界。邢建昌指出,与文学是自我指涉一样,虚构也是自我指涉的。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虚构只是关乎言说行为的,是与言说行为相联系的“事件”,它无需从外部世界里得到证明,也不可用现实的真假判断

规约虚构叙事的真假。其次,虚构是文本内部世界的游戏规则。在文本内部,虚构有特定的指称对象,不依赖外部世界的自成法则,自有逻辑、自我生成的。需要补充的是,虚构将其内部活动投射为一个看似外在的事件,但这只不过是为了使读者确信的修辞策略而已。虚构,正是凭借这种看似关联外部实质却是“自我指涉的属性”而使自身产生“某种奇特的力量”。虚构虽是自成一体的,但虚构的材料却源源不断地从现实中产生出来。虚构从身边的现实中选取材料用于自我形塑,它在自我指涉的行动中指涉现实,这就使虚构和现实发生了奇妙的关联。虚构语句的自我建构,并不是不受外部事物的制约。文学的虚构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相反,它们是众多历史因素的产物。同时,虚构帮助我们理解语言游戏的性质。语言游戏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游戏文本中的语言,并不指代现实中的任何事物,指代过程并不是符号和对象之间某种现实的连接,“它是一种具有多元模式的社会活动,依赖于在生活形式中扎根的共同理解”。在虚构的世界里,词语单一指称对象的功能大大弱化,或者变得模糊,而成为一种依托于语境的自我指涉行为。正因为虚构不是“实指”意义上的,所以虚构反而丰富了指涉行为。因此,虚构也可以像语言游戏那样,是指涉物不在场却可以照常发生的语言游戏,其意义并不依赖于主体经验。虚构的魅力在于符号的创造力量,这一切都以“假定”为前提。虚构的规则和语法的规则一样,虽然不能自证合法性,但却决定着“在其范围之内什么样的言说和行为是合理的,同时,在这些条件下什么东西可以被看作真的,又有哪些是假的”。^[9]

李卫华、张婷玉的《隐喻:作为语言和文学的本质》联系雅各布森的相关理论对于“隐喻”进行了深入讨论。李卫华、张婷玉指出,在西方诗学中,隐喻(metaphor)有两个不同层次的含义,一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微隐喻”(micro-metaphor),二是符号学意义上的“宏隐喻”(macro-metaphor)。作为一种修辞格,“微隐喻”有着广狭不同的三种含义:最狭的含义是与“明喻”相对的,是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暗喻”和“借喻”之和;第二种含义则等于现代汉语修辞学中的“比喻”,是明喻、暗喻和借

喻之和;最广的含义则包括一切用一物指代另一物的修辞格,包括比喻、借代、拟人、用典等。与将“隐喻”仅仅视为修辞格的“微隐喻”理论不同,俄裔符号学家罗曼·雅各布森通过对失语症的实证性研究,发现隐喻与相似性、转喻与邻近性之间的密切关联,并由此指出,作为传统修辞格的隐喻与转喻,其实是人类文化符号运作的两种基本模式。这就引导人们将目光不仅仅放在文学作品使用了哪些修辞格,而是将视野转向文学的本质、语言的本质乃至人类思维的本质。雅各布森所谓的“隐喻”和“转喻”已经不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微隐喻”和“微转喻”,而已经是符号学意义上的“宏隐喻”和“宏转喻”了。沿着雅各布森的思路,可以做进一步的理论延伸:诗性功能可以把对等原则由选择轴引向组合轴,说明隐喻关系可以演变为转喻关系;进一步说,转喻关系其实都可以视为由隐喻关系演变而来的,因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人类的语言就是隐喻的,人类的思维也是隐喻的;而文学在现代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把这种被现代文明发展所掩盖了的隐喻关系揭示出来,从而引领着在现代文明中迷失的人们去寻找精神家园。与“隐喻”一样,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比兴”同样有修辞学和符号学两个不同层次的含义:在修辞学上,“比”和“兴”分别指“比喻”和“起兴”两种修辞格;在符号学上,“比兴”则与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息息相关——凡有所讽谏兴寄皆为有比兴,无论是否用了比喻和起兴的辞格;否则即使用了比喻和起兴的辞格,如果“兴寄都绝”,仍是缺乏比兴的。这说明,中西文心相通,诗心相通,西方文论作为“堪借照焉”的“邻壁之光”,同样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10]

王亚芹近年来关于舒斯特曼美学的研究也引发国内学界关注。在《舒斯特曼“泛身体化”美学思想批判》中,王亚芹认为,在当下这样一个物质富足、文化迷失的消费时代,为了捍卫哲学与美学的生活之维,舒斯特曼提出了“身体美学”的理论愿景。毫无疑问,身体美学理论在拓展传统美学研究范围、重构身心和谐的美学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作为在西方消费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身体美学思想,一开始就带有不可

规避的矛盾性：由于舒斯特曼本人学术身份和学术背景的多元性，他的美学研究涉及到哲学、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甚至还将其扩展到美容化妆、体育健身等具体的身体训练和实践。如果我们还承认每一门学科正是由于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明确的研究范围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话，那么，舒斯特曼这种打破学科界限大包大揽、无所不包的“泛身体化”工程就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地探究。在王亚芹看来，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思想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消费文化场域中，由身体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所引发的“泛化”悖论格外突出：其一，“泛身体化”美学内在的不自洽性；其二，“泛身体化”思想实践的有限性；其三，“泛身体化”发展前景的矛盾性。从当下文化现实重新审视舒氏美学，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祛魅”的同时，也对我们建构中国化的美学体系具有启发意义。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要开展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在共时性的异质民族之间，在历时性的古今转换之间，实现全球与本土、传统与现在、高雅与通俗之间的平等互动。这种看似理论“乌托邦”的观点，既是舒氏“泛身体化”美学向未来的更高层面提升的新规划，也是当代美学发展的新趋向，更是人类异质存在之间彼此对话互动的探索。^[11]

三、中国传统文论与美学研究

中国传统文论研究是河北省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优势研究领域。在2019年的相关研究中，人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深刻关联、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价值、传统文论经典的现代阐释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探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文学超越价值祈向论略》中，姜文振从学术史层面系统考察了中国古典诗学所包含的丰富的超越价值观念。姜文振认为，在中国传统诗学关于文学心灵价值的丰富理论表达中，文学的超越价值观念在儒道诗学中均有深厚的积累并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学始终指向人的心灵的独特风貌。儒家诗学的超越追求着以儒家哲学文化为底蕴的理想人生境界，道家文论美学更凸显了其在审美与自由向度上的心灵超越取向。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学价值观念因其强烈

的人世情结而使其超越的诉求始终联结着功利之维，道家哲学文化影响下的文学审美价值诉求则敞开了以“自由”为核心的心灵超越的可能空间。超越与自由作为文学精神价值的高标，体现着对于文学与人生之密切关联的深刻体认，彰显着人的精神与生命或可到达的至高境界。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中心灵之维的最高指向，它引导着世世代代文人知识分子在文学艺术中寻求自我超越的实现，以文学艺术创作实现自我生命境界的成全和自我生命自由的外化。这表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及文论中所追求的超越境界更多地指向心灵自由的层面并呈现为一种由外部世界向自我心灵的复归，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学价值思想的内向性特征。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绝不甘心于困境中的沉沦与消亡，而是在指向心灵或现实的向度上不断探求以实现超越。文学是心灵的产物。在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念的多维呈现中，心灵之维意味着文学所具有的重要的精神价值，也是属于人的需要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重要方面。文学作为精神生产的产品，总是反映着人在精神层面的多样需求。在文学价值的多元构成中，指向心灵之维的文学的精神价值是其最重要的维度之一，而超越则是体现着精神价值之必然的一种心灵祈向。从广义上说，文学价值的各种维度均属于指向心灵的精神价值，因为文学价值本身既是人们关于文学的价值理想的呈现，又是人按照理想文学的标准对于文学进行的真、善、美向度上的判断。即使是文学的功能价值，它对于政治国家、社会生活和人的存在产生功能性影响也须经由心灵层面的接受与改变而得以实现。中国文学也是一种人学，超越与自由作为文学精神价值的高标，体现着对于文学与人生之密切关系，彰显着人的精神与生命或可达至的至高境界。^[12]

许春华的《美善相乐——荀子〈乐论〉思想理路发微》以荀子的“美善相乐”命题为核心，讨论了荀子《乐论》的思想理路。在许春华看来，生命情感乃“乐”之生发根源，这种自然天性情感为“天情”；“乐”有“适情”“安情”之作用。“道”乃“乐”的教化之道，是一种人伦关系之道、社会理性之道、礼乐调适之道；“雅颂之声”不仅从外在的社会伦理引导、教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情感，而且深入内心之“情性”，感动人之“善心”；“道”既

是一种由外向内的价值导引,又是一种由内向外的情感体验,这种双重转化的价值效应,凸显了荀子乐论思想的独特性。“中和”是“乐”的一种工夫路径,它既有生命根源之地由内向外的情感流动和畅显,亦有“正身”“安国”乃至“宁天下”的工夫效应,它开拓了“乐”通向“美”与“善”的路径。“美善相乐”乃“乐”之理想境界,“乐”之情感是艺术情感与道德情感的统一,“乐”之理性是审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统一,“乐”之规则是审美原则与道德原则的统一。荀子“美善相乐”思想是对孔门儒学“尽善尽美”乐论境界的传承与发扬,早期儒学存续的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的礼乐精神传统奠基了中华民族对“乐”之教化功能、善美内涵、最高境界的理想构筑。在音乐艺术繁荣昌盛、影响力愈加广泛与深入的时代,申张荀子《乐论》的思想主旨与理想境界,积极倡导“雅乐”“正声”的价值效应,大力消解“邪音”“淫声”的不良作用,强化其“移风易俗”“管乎人心”“美善相乐”等社会教化功能,这无论是对于个人完美人格的实现,还是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均有其现实价值与深远意义。^[13]

胡海从美育理论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论诗学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考察。在《美育的传统内涵和新时代目标》中,胡海认为,美育的传统内涵一是以艺术为手段,寓教于乐,培育社会德性,辅弼明道经世目标;二是以艺术为目的和独立价值,艺术与人生一体化,在艺术及一切美的事物中涵养心性,安顿和品味人生;并将超功利的人生观、价值观由士人阶层拓展到大众领域,以培养爱艺术、爱学问、爱智慧的社会风气。中西美育传统对接凸显出艺术与实业结合的美育新课题,反拨重道轻器、重道轻技传统,重视工艺制造能力及创意实践能力培养,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当下意义的课题。当下美育应该加强工科与艺术学科的联系,注重艺术主体的综合文化素质、创新精神、实践技能,以生产设计者的创新与创造满足消费者日益丰富而个性化的美好需求。新时代的总目标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此相应,美育除了继续发挥传统功能,还要突出培养创造力及实践技能的新目标。在这个创新驱动的时代,制造业将由机器复制转向更加注重生产者的个性化创造和消费者的个性

化需求,美的要素将和各类实用产品结合,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新技术主导的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艺术教育要兼容多种目的,培育学生及全民的综合素质,抗衡急功近利的价值观,让更多新人参与创新创业的队伍中来。^[14]在《刘勰谐隐论与通俗文艺的美育意义》中,胡海、杨玉婵认为,《文心雕龙·谐隐》篇所论谐辞隐语不仅是文字形态,还是口头形态或综艺表演形态,对应于今天的通俗文艺。该篇提出了一个可以发挥、应该发挥、以及如何发挥通俗文艺美育价值的课题。刘勰秉承儒家诗教与礼教结合、德育与美育相辅的宗旨,以宗经六义看待一切文体,指出谐隐之主流由经典开启,是有趣、有益、有用的通俗文艺;作者和受众的低俗趣味则使通俗文艺从内容到表达方式都不合雅正标准,故其末流是迎合人们低俗趣味的游戏文字。刘勰看到通俗文艺的广泛影响,故强调谐隐结合,寓教于乐,让讽谏教化主旨及各种思想道理以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开来,让培育健全人格和文明新风同时成为作家和批评家的使命。^[15]

在《詹镆对“意象”和“比兴”的心理学解释略论》中,胡海、王子珩对于詹镆的古文论观点进行了阐释和述评,以詹镆的心理学解释分析比、兴概念及二者与意象的关系。在胡海、王子珩看来,学界通常认为意象是思想感情与形象的结合;王元化认为“比”附理、“兴”起情,“比兴”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近于“艺术形象”。詹镆释“意象”为“意想中之形象”“心意中的形象”,表明形象可能但不一定与思想、概念、情感、意志结合;并指出比、兴相当于心理学上的类比联想和接近联想。詹镆的相关论述表明,比喻是人的某个表象记忆联系着某种情意或感觉,一个相同或类似的表象能够唤起这种情意或感觉;兴是变形、综合的表象唤起复合的情意或感觉,此即象征、暗喻。前者可谓单一意象,后者可谓复合意象。二者只有寄意显隐之别,没有附理还是起情之分。胡海、王子珩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文艺思想强调社会历史分析而不强调个体心理分析,文学的教育作用取决于作家的思想改造,隐隐贯穿了一条移植正确思想于文学、进而移植给读者的思路,要求以理智支配情感。这大概是心理学被视为伪科学的主

因。直到1984、1985年,文艺学界提倡文艺学观念研究要自觉运用这一理论方法。西方美学、艺术理论包含了心理学内容,直觉、移情、想象、联想、灵感等理论术语,是借助古代诗文评中类似词语来翻译的,同时也不无各自语境所带来的先天差异。詹锼《文心雕龙义证》中直接运用心理学分析文论问题的材料并不多,不过以上数例表明,切实把握和合乎规范地运用西方文艺学方法,对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是有推动作用的。^[16]

李华秀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论的研究与当代文学研究进行了结合。在《孙犁抗战短篇的拟情表达机制与中国文化传统》中,李华秀将孙犁小说放在中—西、古—今比较框架内思考,发现孙犁小说非常中国范儿、现代范儿。在李华秀看来,与西方小说比较,孙犁小说不讲究故事情节,有诗性特征,是典型的中国范儿;与中国古典小说比较,孙犁小说娴熟地运用空间进行叙事,关注底层人民生活,有鲜明的国家、民族意识,并关注人的主体意识,是现代范儿;与中国现代小说比较,孙犁小说不再批判国民性,而以讴歌和重塑国民性为主,色彩明亮,感情基调乐观、自信,是典型的孙犁范儿。孙犁作为被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过的一代文艺家,对中国文艺的这套法则深有所悟。但他生活在20世纪,又受到西方文化濡染,受到革命文化影响,其抗战时期的小说也就会带上这三种文化资源的痕迹,但又因其明确的文学志向而对已有传统进行革新。在早期文论著作中,孙犁也表达过类似观点。总之,孙犁秉承着中国文化传统,创造了现代拟情表达机制——将中国文化中的拟情表达传统,转化为现代叙事机制,创造了独特的拟情小说。孙犁抗战小说完成了将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拟情表达传统转换为现代拟情表达机制的历史使命;研究者感觉到的诗情、画意、音乐性、散文性,也都证明孙犁小说是典型的拟象小说;读者对孙犁小说的迷恋和热爱,一大部分起因于孙犁小说中所内蕴着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多重转换的拟象、拟情和拟理表达机制。^[17]

牛军的《牟宗三语言观探微》对于现代新儒家牟宗三的语言观进行了思考与辨析。现代新儒家学者唐君毅率先提出启发语言,认为在科学语言、情感语言之外还有第三种语言——启发语

言。牟宗三对此深表认同,多次论及启发语言,且更为详细。在牛军看来,唐、牟二人都是在强调中国传统儒学的文化特点时论及启发语言的。他们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不无悲情地继承、阐释和发展着传统儒学。他们对于儒学迥异于科学、西方哲学特点的发掘,使他们意识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牟宗三认为,中西文化从根底处就存在着不同。中国哲学关注的重心在于生命,西方哲学则关注的是自然。这决定了中西哲学必然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中西哲学具有特殊性的同时,还指出二者都具有普遍性:它们都是关于真理的学问,但这种普遍性又是通过各自的特殊性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外延真理,内容真理依赖于主体的内在明觉。儒家思想所体现的就是内容的真理。内容真理是具体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不同于概念表现出来的抽象的普遍性。在牟宗三看来,启发语言不同于概念语言的地方,首先表现在启发语言用具体的词语表示。他指出启发语言“用具体的词语表示,所以是启发性的”。其次,启发语言不同于概念语言的地方还在于它是“蕴而不出”的。牟宗三从言意关系的角度分辨了启发语言和概念语言的不同,在他看来科学的语言可以“尽意”,所尽之“意”也就是科学的真理,即外延真理。“言不尽意”之“意”是玄学真理、内容真理。牟宗三强调:概念语言是有层次性的,你要反省西方概念语言使用时是在哪一个层次上来表述的。启发语言虽然不同于概念语言但也具有自己的分际。这一特点使得启发语言可以转换为概念语言。牟宗三关于名家语言的论述与他关于启发语言的论述形成互补。他从语言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和独特的“境界形态”。语言言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中西哲学的差异。牟宗三对于语言的敏感为我们揭示出了一种研究、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18]

孙易君、孟庆雷的《简牍媒介时代的“文”学》对于简牍媒介时代的“文”学的特征及其所导引的文学及审美的衍变进行了富有学理的考察与分析。在孙易君、孟庆雷看来,第一,简牍媒介的普及影响了“文”的审美重心的转换。简牍的普及应用改变了文字早期造字时随物赋形的直观特征,开始向线条化方向发展。这样一来,如果要使文字更为充分地发挥其信息传递功

能,符号是否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相一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符号内部能否成为一整套完整并且互相区别的指事系统。因而,简牍媒介加速了文字的抽象化过程,逐渐模糊了其象形意义。不仅如此,简牍媒介的普及应用使“文”的审美价值从外在形式转向内在内容。当文字的传播速度提升之后,“文”本身所具有的审美特征开始被忽略,它所承载的内容成为比形式更重要的审美对象。可以说,继简牍媒介普及应用之后,汉字的象形功能开始大幅减退,其抽象意义却进一步提升。如果从“文”的审美效果看,文字本身直观的审美价值不断减弱,而线条所具有的美感及文字内容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却越来越受到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简牍媒介的普及应用改变了“文”的审美偏向。第二,简牍媒介的普及影响了“文学”内涵的转换。在简牍媒介的普及应用之后,“文化”的内涵成为新的时代标志。自西周之后,文化就成为重要的国家性议题,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先进的文化制度。如果说春秋时期“文学”一词的主要内涵还集中在文化典籍所承载的礼仪规范方面,那么进入简牍媒介更为普及的秦汉时代,“文学”一词指向所有书面资料的意义就更为突出了。《汉书》专门立《艺文志》,将所有典籍著作都纳入艺文范畴之内,这显然预示着“文”已经脱离感性直观层面成为书面典籍的统称。两汉时期的“文”已经指称所有的书面典籍。简牍媒介普及应用之后,“文”的概念内涵开始逐渐转换,从现实政治功业的辉煌向典籍本身的自在性靠拢。“文”或“文章”在通常意义上不再偏向感性直观的美感,而是指向文化典籍,用来泛指一切书面作品——由此生成一切书面作品皆为“文”的泛文学观念。第三,简牍媒介的普及还影响了文学体裁的变化。简牍媒介时代是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最初的碰撞时代,双方都需要尽量适应对方的特点。从简牍媒介来看,就会发现它在颠覆口头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口头文学的文学习惯与技巧,并将其融入到新的文学样式的创作中。散文的自由性、细致性与韵文的节奏感、流畅性融合起来,形成简牍媒介时代的独特文学体式——赋。可以说,赋是简牍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围绕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韵文与散文的关系,我们可以考察简牍媒介时代文学体裁

之间的关系。在简牍媒介时代,诗、楚辞、赋、诸子散文、历史传记是几种主要的文学体裁,如果我们以押韵与否为考察点,就会发现诗与楚辞在韵文这一端,诸子与历史传记则在散文一端,处于中间的平衡点则是赋。简牍媒介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韵文与散文的交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机制,并且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文学体裁。总之,简牍媒介时代的“文”已经开始摆脱单纯的符号意义,也不再以更广泛的文明、文化为自己的内涵。虽然当时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文”自身的独立价值,但已经在潜意识层面将“文”限制在书面文章、典籍等方面,“文”已经不再是内容宽泛的文化符号,而是由文字组织而成的书面话语系统。不仅如此,简牍媒介时代已经发展出诸多文学体裁,这些文学体裁一方面仍然吸收口头文学的优点,另一方面也开始颠覆口头文学的创作传统,形成自身的文学特点。^[19]

(姜文振: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邢建昌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李春青、李慧:《从知识、知识生产的视角进入——评邢建昌等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文艺报》,2019-09-16.
- [3]孙秀昌:《“反学科”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4).
- [4]姜文振、苏泽:《当代中国文论反思范式之反思》,《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3).
- [5]黄建生:《新时代语境下宏大叙事的重构与创新》,《河北日报》,2019-06-28.
- [6]孙秀昌:《雅斯贝斯〈大哲学家〉中的艺术家论探微》,《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9(秋).
- [7]孙秀昌:《雅斯贝斯与康德之间的思想关联》,《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6).
- [8]孙秀昌:《冯至与雅斯贝斯的相遇——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江海学刊》,2019(4).
- [9]邢建昌:《虚构的意义——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阅读札记》,《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9(秋).
- [10]李卫华、张婷玉:《隐喻:作为语言和文学的本质》,《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9(秋).
- [11]王亚芹:《舒斯特曼“泛身体化”美学思想批判》,《文艺美学研究》(2016秋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12]姜文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文学超越价值祈向论略》,《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9(春).
- [13]许春华:《美善相乐——荀子〈乐论〉思想理路发微》,

《邯郸学院学报》,2019(3).

[14]胡海:《美育的传统内涵和新时代目标》,《艺术百家》,2019(1).

[15]胡海、杨玉婵:《刘勰谐隐论与通俗文艺的美育意义》,《徐州工程学院学报(哲社版)》,2019(4).

[16]胡海、王子珺:《詹锓对“意象”和“比兴”的心理学解释略论》,《语文学刊》,2019(6).

[17]李华秀:《孙犁抗战短篇的拟情表达机制与中国文化传统》,《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5).

[18]牛军:《牟宗三语言观探微》,《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9(春).

[19]孙易君、孟庆雷:《简牍时代的“文”学》,《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5).

古代文学研究

吴秀华 蔺坤 张文青

2019年河北古代文学研究共发表论文120余篇,著作15部。研究呈现出在传统领域深耕,在新的领域颇有创获的特点。下面就研究的具体情况做出综述。

一、诗歌研究

2019年河北在古代诗歌研究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下面以时间为序,按照《诗经》与《楚辞》、魏晋南北朝诗、唐宋诗、元明清诗分别进行介绍。

(一)《诗经》与《楚辞》研究

《诗经》与《楚辞》是先秦文学的双璧,一直以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尤以《诗经》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李卫华着眼于“比”“兴”两种修辞手法的文化内涵,追溯“比”“兴”的区别和夹缠的联系,认为“比兴”的合成不仅是两种修辞手法的简单叠加,更与中国古代的诗教传统有关。作者还认为,就做诗而言,“比兴”具有“以诗言志”、诗以明道的作用。就说诗而言,它代表了儒家“正得失”的诉求。从此“比兴说诗”逐渐形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自由释义的传统。^[1]对比、兴问题研究的还有胡海、王子珺,二人在《詹锓对“意象”和“比兴”的心理学解释略论》一文中,借用詹锓从心理学角度所做的解释,分析比、兴概念及二者与意象的关系,认为“比”是单一意象,“兴”是复合意象;二者只有寄意显隐之别,没有附理还情之分。^[2]由此可见在传统的文学基本概念领域,学者们不断发掘出新的内涵,显示出对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视。

《诗经》在后世广泛流传,特别是它被列为十三经之一,成为明清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因

而历代阐释《诗经》的著作层出不穷,由此形成了一门学问——《诗经》学。本年度河北《诗经》学研究涌现出一些重要成果。王长华的《〈诗经学〉论稿》,是其多年来从事《诗经》研究的重要总结之作。书中深入探究了四种歌诗所颂的对象,考察了《鲁颂》产生的时代,认为《鲁颂》产生的年代当在僖公生前。作者从《诗经》学视角论述了先秦理性精神的发展和演变,对天人关系、历史与现实、生命意识进行了分析思考。该书还对以往的《诗经》学著作进行了梳理探讨,丰富了《诗经》学研究的内容,给《诗经》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3]易卫华的《印刷术普及与宋代〈诗经〉学》一文,深入探讨了宋代印刷术对宋代《诗经》学发展的作用,认为印刷术促进了《毛诗》刻印与校勘的发展,而《诗经》的大量刊刻,给宋代《诗经》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学术环境,并促成了宋代疑辨思潮的出现,由此促进了宋代《诗经》学的发展。^[4]尹雨晴、陈平、刘新英《西汉〈毛诗〉异于“三家诗”的阐释》一文,认为《毛诗》异于“三家诗”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阐释的主题内容不同。《毛诗》围绕“礼义”“天理人伦”的阐述方式,是其不同于“三家诗”的核心区别。同时,作者还认为这一主题内容,是《毛诗》得以流传至今的关键。^[5]

相比于《诗经》研究,本年度《楚辞》的研究成果不多,但却很有价值。李金善《苏雪林楚辞学“九天”研究及其文化意义》一文,系统阐释了苏雪林楚辞学的“九天”概念。作者认为,苏雪林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将西方神话引入到中国神话中的九重天神系中来,从而构建出中国的神话系统。苏雪林将西方神话与中国

神话对接式的研究,丰富了中国楚辞学研究的内涵,启示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世界眼光不失为一种新思路。^[6]

(二) 乐府诗与乐府学研究

乐府诗是古代诗歌中的独特门类,它原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的诗歌,后经人们整理称之为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到了唐宋时代,一些不入乐的也被称为乐府或拟乐府,可见乐府诗也有发展和演变。本年度对乐府诗歌中各种意向的探讨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色彩。曾智安将《江南》乐府古辞与汉画像砖中的《游鱼戏莲图》对读,认为它很可能是通过鱼、莲花和五行思想的结合,表达一种生殖崇拜和繁衍意图,并且由鱼环绕莲花推断其可能含有四方拱卫中央的政治意义。作者推测《江南》乐府古辞可能创作于汉武帝时期,并且也影响了之后墓葬画像和器物纹饰的形成。^[7]董莉着眼于《古诗十九首》中的城、城门、楼等意象,通过对比《诗经》《楚辞》和汉代其他诗歌中的这组意象,认为《古诗十九首》中的这组意象促进了后代诗歌中通过楼、城门、城的意象寄托失意文人的忠君爱国、感时伤世的内涵表达。^[8]这一结论应当说符合后世许多作品的实际情况。

乐府学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刘万川等着眼于1897—1949年日著《中国文学史》对于汉乐府的书写情况,进行了梳理述评。他详细阐释了十余部日著《中国文学史》对汉乐府的书写的基本样貌,对于国内的乐府学与乐府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9]向回则在《礼乐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乐府诗学研究》一文中,系统梳理了唐代乐府诗学的相关文献,从多个层面阐释了唐代乐府诗学的理论与创作的内在联系,认为唐代乐府诗学对后世乐府诗歌理论与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其表现:一是对历代诗话中的乐府诗批评鉴赏的影响。二是对历代诗评家的乐府诗学理论与诗歌选本的影响。^[10]乐府文献的整理成果以韩宁、徐文武点校的《古乐府》为代表。该点校本选用元至正刻本作为底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为乐府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整理本。^[11]

(三) 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

魏晋南北朝诗歌向来以山水诗和玄言诗为研究重点,但本年度的研究重点却是以小作家、新作家为切入点,考证作品的创作时代、作者的生平。如马燕鑫从诗韵入手,重新考察《文选》中所录“苏李诗”的创作年代,并断定其创作于三国时期。作者还将诗韵与东吴方言对照,认为“苏李诗”作者或为《会稽典录》中的李陵。该文有助于重新认识“苏李诗”的作者、创作年代及《李陵集》的编纂等一系列问题。^[12]孙耀庆的《刘宋诗僧惠休考略》一文,对惠修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述,研究其还俗的原因,以及他与鲍照、徐湛之、吴迈远、谢朝宗等人的交游情况。^[13]孙耀庆的另一篇文章《刘宋“文笔之臣”傅亮考略》,则对晋宋之际的傅亮进行了考述,考论傅亮的死因和他与同僚、释氏沙门的交游情况。作者认为:“傅亮手掌重权,威胁到刘义隆之权威,妨害到王华、王昙首等新兴势力派之利益,故其死虽与废杀少帝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有关,但亦有一定的冤枉成分。”^[14]这一研究丰富了学界对傅亮的认识。

赵延旭、那奇的《两晋时期“谣”研究》一文,对两晋时期的“谣”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考察,考证了“谣”的起源、类别、特征与影响。作者认为:两晋时期“谣”鼎盛发展,两种起源学说增加了“谣”的神秘性和可靠性。“谣”可分为叙事性和预言性两类,而预言类歌谣数量要远多于叙事数量。另外,“谣”具有指向性、政治性、准确性和地域性的特征。作者同时还指出,“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时人的命运和社会秩序。^[15]

张蕾《〈玉台新咏校正〉整理与研究》,是对清代纪昀《〈玉台新咏〉校正》一书的整理与研究。该书全面论述了《〈玉台新咏〉校正》的校订之功、批评理念和版本系统。作者参校各个版本,深入探究各本特点与得失,肯定了纪昀《玉台新咏》研究的眉批、夹注,认为其对《玉台新咏》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16]胡海、杨玉婵《刘勰谐隐论与通俗文艺的美育意义》,则着眼于《文心雕龙·谐隐》篇的研究,认为刘勰看到通俗文艺的社会影响,并且倡议作家和批评家应寓教于乐,充分发挥通俗文艺的美育功能。^[17]

(四) 唐宋诗歌研究

杜甫诗歌研究是唐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淑玲等着眼于杜甫歌行体诗的体类特征,通过与其律诗对比,确认了杜甫歌行体诗歌的体类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无声律限制,多采用自然音节,尽量回避律句;二是押韵形式多样,绝大多数作品押两个以上的韵部;三是有意回避对仗,出现较多词性虽同而声调不同的情况。^[18]吴淑玲等的另一篇文章则着眼于杜甫歌行体诗歌的艺术境界,认为杜甫歌行体诗歌拥有四个层面的艺术境界:一是散句抒情,“以气概盛”。二是结体方式自由书写。三是形成多角度的关注视角。四是潇洒飘逸的审美特质。^[19]王新芳等也对杜甫诗进行研究,经过考辨,他重新审视了杜甫《逃难》一诗的创作年份,认为《逃难》诗应创作于宝应元年(762年),这年发生的蜀中之乱是该诗创作的背景。^[20]此文对《逃难》诗的创作年份提出了新的见解。王福栋等研究了卢纶的《塞下曲》对于李广故事的创改,并针对小学课本《李广射虎》的种种错误,提出该文被选入小学课本的不合理性。^[21]

唐诗理论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方面。如《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张静在《再论司空图写作〈二十四诗品〉的合理性》一文中,梳理了司空图创作《二十四诗品》的各种因素与流传线索,认为《二十四诗品》产生于晚唐,符合诗格发展规律,而司空图完全可能采用四言的形式来写作《诗品》,并且《二十四诗品》约在南宋后期流行并命名为“品”。^[22]她的另一篇文章紧随其后,依据陈振孙在《一鸣集》中的记载,司空图确曾写过“诗格”类著作,《二十四诗品》很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且苏轼所说“二十四韵”,即指《二十四诗品》。并认为只有《二十四诗品》才能得到苏、陈二人的如此赞赏。^[23]两篇文章对《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研究颇有新见。另外,张志勇的《唐诗性格——影响诗坛千年的十六张面孔》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书以诗人的性格与诗歌风格的分析为主要选题内容,通过富有趣味、生动活泼的语言,分析诗人的性格特点,并探寻诗歌的风格与其性格的天然有机关系。将诗人当作活生生的人加以观照,也将其诗歌当作有生命的文字有机体,而不是毫无生机的

纸面符号,把诗人的性格、诗歌的风格与读者的审美贯通起来,让读者在赏读唐诗时能与千年前的诗人进行一次心灵的沟通。^[24]

本年度的宋诗研究也有较大力度。马小会的《杨亿汝州时期的仕宦心态与文学书写》一文,认为杨亿一生仅有两次外任地方官的经历。一是主动出守处州,其深层原因源于太宗朝晚年的党争。二是被动知汝州,则与真宗朝晚年党争息息相关。在汝州任上,杨亿郁虑深忧,常以佛理自遣作为主要生活方式,又以诗笔抒沦落之怀。其前后两次辗转为官的经历,透露了不同时期杨亿创作倾向与内心情态的微妙变化。^[25]于广杰的《北宋文人画思潮与李公麟绘画的诗性旨趣》一文,阐释了北宋文人画思潮的兴起,并且系统阐释了李公麟文人画内含的浓郁的人文精神和诗性旨趣。作者认为,李公麟在绘画理论上呼应苏轼,并与苏轼合作创作出多幅“诗意画”,为北宋以来诗意画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26]另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增辉博士论文《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一书,该书依靠北宋中后期的历史背景,以儒学复兴的演变、南北地域文化的冲突、士人心态的衰变及诗歌风格的流转为主要线索,对此期的贬谪与文学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其中第四、第六、第八章专门分析了北宋中后期的诗坛。作者认为,旧党与新党相比,有着更为深重的忧惧心态,表现为诗歌创作同样呈现出平淡风格。苏轼、黄庭坚晚年都追求平淡诗风,却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苏轼之平淡主要是其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的外化,黄庭坚之平淡主要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教的体现。尽管有这样的不同,二人的平淡追求本质上都标志着生命激情的消颓及时代精神的没落。同时,作者还考察了贬谪与江西诗派兴起之间的关系;又联系北宋后期回归儒学的学术思潮,以潘大临和陈师道的诗学选择为例,说明了为什么是黄庭坚的创作观念及创作模式最终成为了诗坛主流。^[27]

(五) 元明清诗歌研究

元明清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虽然总体意境风格没有超越唐宋,但作品数量却远超唐宋。周小艳等编著的《元代文学作品选》,按诗歌、散文、词、散曲、杂剧、南戏等体裁分别排列。所选诗歌作品为元代文学有

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富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是元代课程讲授和阅读的重要参考书。^[28]于飞关注房祺编纂的《伟观集》与吴福生编纂的《夜山图题咏》两部元人题画诗歌总集的研究价值。他认为《伟观集》与《夜山图题咏》对于元代诗歌文献考证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还具有诗学和艺术价值,是元人文学和艺术结合的典型代表,对于保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29]于飞另一篇文章《蒋易编〈皇元风雅〉的成书及其诗学价值》,考证了《皇元风雅》现存的两种元刊本,厘清了此书的成书过程,并认为此书有两方面诗学价值:一是反映了元人编选本朝诗歌总集的动态过程,较好地保存了元代诗歌文献;二是反应了元代“盛世文风”下诗人的精神风貌与诗学追求。^[30]叶会昌的《〈月屋漫稿〉“伪书说”考辨》一文,就杨镰先生认定元人黄庚《月屋漫稿》为伪书提出质疑,并提出三个证据。一是黄庚同名人甚多,杨镰先生所引作者材料不合理。二是二十余首重出互见诗的疏误,不能作为论证其为伪书的依据。三是《月屋漫稿》今传善本序跋本身并不能指出造伪证据。^[31]

明代诗人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在此口号影响下,明代诗人创作有明显的宗唐倾向。周小艳的《冯舒、冯班诗学研究》,即是探讨明人研究晚唐诗风流变的重要著作。书中详细梳理了冯舒、冯班兄弟二人的生卒年与其诗学起源、诗学理论、诗学影响。作者指出,两人主张统一格调与性情,在确立晚唐诗歌的典范后纠正了明代诗学在诗歌体制上的偏执,使诗歌在格调与性情之间达到了平衡,促进了明清诗学的转向。作者认为,二人从文本校勘、评点入手推广诗歌理论,打破明代评点的随意性,并促进了朴学的形成和发展。本书对于研究明清诗学的转变以及诗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32]在文人交游方面,王馨鑫、刘杨的《王世贞与明中后期北方文士交游考述》,论述了王世贞不同时期与北方文士的交游。嘉靖中期,王世贞在北方文士的介绍下开始了复古运动;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作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与北方文坛发生了一系列交往、互动;万历年间,随着活动区域的南移,王世贞与北方文士交游渐少,但以其为代表的复古观念仍然在其地域占有主流地位。明中后期王世贞与北方文士的交

游历程,印证了“后七子”复古文学思想的兴起、发展与盛行。^[33]

于广杰近年来进行清代“莲池学派文艺思想研究”,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于广杰、史宝莉的《遗民心态与诗古文创作——兼辑民国报刊所收王树楠未刊诗歌》一文,详细论述了王树楠作为清末民初大臣的遗民心态。认为他的古文得法于桐城派,注重文章神气,不专于字面雕琢。而其诗歌融入强烈的史学思维,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文章在后面兼辑民国报刊所收王树楠未刊诗歌,这些资料为王树楠诗文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34]另外,于广杰点校的《王树楠诗集》,收录了“文莫室诗”八卷、“陶庐诗续集”十一卷,为清末诗文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35]另外,在诗歌版本方面也有新发现。张静等《日藏孤本黄周星〈圃庵诗集〉考述》一文,关注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圃庵诗集》一书,对其进行考证。作者认为,此书中有大量墨丁,尚未编定卷次,很可能只是试印本,并没有大规模地刊刻流布。本文作为研究黄周星诗歌的重要文献,只有孤本收藏于日本,这对于研究黄周星的生平与诗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36]吴秀华《抄本〈燕川渔唱诗集〉的来历与价值》,介绍了新发现的清代诗人傅维禔的《燕川渔唱集》抄本,此诗集曾入选《四库全书总目》。现存同治年间的抄本。作者就这部抄本与刻本的区别进行了甄别和考证,指出抄本对刻本既有补充,也有勘误,并就抄本对刻本的勘误做了详细梳理,显示出抄本的版本价值较大。^[37]刘少坤等《王国维“人间”“境界”学术渊源考论》一文,探讨王国维“人间”“境界”用词的学术渊源。作者认为,此二者与其“中体西用”的主题思想密不可分,“人间”体现了王国维深沉的悲天悯人意识;“境界”说是其意图架构词学“新体系”的表征。这对于清末第一代学人意图构建中西合璧思想的集大成范式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38]

二、词与词学研究

苏辛词和温庭筠词在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苏轼、辛弃疾二人是最富盛名的词家。王立娟等人编著的《苏辛词评注》,仔细校注品评了苏辛词。书中全面阐发了苏辛词的词风词貌,在苏辛词研究乃至宋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39]余安安、田文雅的《论温庭筠创作的禅意审美与时空艺韵》一文,对温庭筠的词创作包含的佛教禅意进行了分析,认为具有般若智的温庭筠,能圆融佛教的时空意识和独特的生命体悟,并将其有意无意、或深或浅地流露在字里行间。温庭筠的词作借助不同的文学元素搭建虚实互摄、光阴短长、幻变绵延的立体时空境界,以蕴含深远的情思、微妙的禅意、灵动的趣味,在真俗二谛中彰显着佛性的审美特质。^[40]

王馨鑫《论王鹏运〈庚子秋词·渔歌子〉的“词史”品格》一文,对清代王鹏运《庚子秋词·渔歌子》作进一步笺释,论述其“词史”风格,认为这首词的“词史”风格在于揭示了珍妃之死的真相,以及珍妃本身的高洁品格,同时也体现出王鹏运的正直人格与高超的艺术技巧。^[41]

在词学研究方面,田玉琪等的《词“入代(替)平声”说之检讨》一文,对宋词中入声可以代(替)平声字而使用的观点进行了辨析。作者通过梳理这一观点的提出与发展演进的状况,一一批驳了入代平声、平入入声的观点,指出其不合理之处,充实了词律理论的研究。^[42]田玉琪的另一文章《词调学研究的学术空间》,认为词调学作为词学的专题性学科,应提倡词调学学科的建设。文中详细阐释了词调学的特有研究领域,包括词调的发生演变、运用、词谱、用韵、音乐五部分。同时还阐释词调学的应用领域,并涉及到词学的校勘等诸多方面。作者指出,词调学作为专题性学科,应梳理和规范词调学的话语体系,促进词学领域的开拓发展。^[43]

三、散文与骈文研究

(一) 辞赋研究

辞赋这一文体介于诗文之间,讲究声律辞采,艺术价值很高,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姜子龙《徐彦伯〈汾水新船赋〉探微》一文,着眼于《汾水新船赋》文本进行深入考察。文中认为,《汾水新船赋》中的“新船”,应承载着黄河流域运输的功用;“贤者”则应为举荐徐彦伯的初唐名臣薛元超,而此赋正是为赞美薛元超的造船政绩而作。作者在文中对赋作用典的隐蔽信息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些信息多与时政有关,而律赋中的经学用语应为初唐经学一统在律赋上

的反映,并据此推测唐代科举试赋可能发源于此。^[44]孙耀庆的《刘宋辞赋论略》,聚焦于刘宋辞赋的创作状况,考察刘宋辞赋的文学史地位。本文认为以谢灵运等人为代表的赋作承袭汉制,对物态精细描摹,以谢庄、鲍照等为代表的赋作则进行了变革,追求声韵和抒情。作者还考察了刘宋辞赋对齐梁赋作的影响,认为齐梁的辞赋大体沿其所开拓的方向发展,并刘宋辞赋“复”与“变”的双重特质影响深远。^[45]李娜《从班固的经学价值立场看〈汉书·艺文志〉赋之分类》一文,着眼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的赋的分类,考察其中蕴含的班固的经学价值立场。文中认为班固对赋分类的标准,取决于班固以经学价值构建为核心的价值取舍尺度,并据此推测《诗赋略》对赋之分类所秉持的标准尺度是重人大于重文、重价值大于重词句。同时,作者主张班固分类的重点是价值的评判,而非赋体自身的文学特征。^[46]

张衡是东汉时期著名的辞赋作家,他的代表作有《二京赋》和《归田赋》,当时曾达到洛阳纸贵的地步。马燕鑫著《张衡作品研究》一书,对张衡现存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探索。作者考察张衡作品的流传情况,特别是分析张衡一些辞赋作品的取材来源,以及模仿前人文章的写作特点。同时,又从崇典爱俗、好奇乐异、重尚文藻三方面,对张衡辞赋风格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书中还指出,张衡辞赋在文序、文病和文用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该书对人们了解张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汉赋研究具有重要价值。^[47]另外,马燕鑫的《魏晋六朝地记与文学书写》一文,着眼于魏晋六朝地记与文学相通的特征,深入考察地记这种文体与文学的关系。指出地记有人物传记与地理风俗两大部分内容,认为魏晋地记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的观念、体裁、修辞等各个方面。作者认为魏晋六朝地记文学作品广泛涉及到辞赋和散文,还涉及到一些歌行。作者通过研究地记文学作品发现,这些作品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地记的内容与格局,显示出与地记相似相通的特征。本文揭示出地记文学作品,特别是辞赋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意义,给魏晋六朝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48]

(二) 古文研究

古文的演变在古代文学发展中一直占据主轴

线的位置,题材最为丰富。同时,各个朝代都进行过不同程度上的古文变革。于广杰《贺涛的古文思想与“莲池学派”的现代转型》,着眼于“莲池学派”中贺涛的古文思想,对“莲池学派”的现代转型进行了深入考察。贺涛古文崇尚明体达用,倡导因声求气,形成了雄峭闲肆的审美风貌。贺涛作为“莲池学派”第三代古文群体中的佼佼者,为“莲池学派”的现代转型做出了有益尝试。^[49]于广杰的《王树楠与“莲池书院”山长交游考——兼论晚清“莲池学派”的兴起》一文,则是于广杰又一篇研究莲池学派的文章,该文详细考证了王树楠与张裕钊、吴汝纶等人的交游情况,阐释了王树楠在“莲池学派”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文中认为,莲池学派的形成得益于系统的桐城家法、学以致用的文化精神和三人深富张力的交游。由此,晚清“莲池学派”为清末民初以来文人的文化革新孕育了深厚的共同文化心态。^[50]孙春青的《古代女性散文创作性别文化内涵初探》一文,着眼于女性散文创作,考察女性作者形象和她们的精神世界。文中梳理了明清人对古代女性散文的整理刊刻状况,指出古代女性散文所展示的女性形象较为写实和多面,呈现出较丰富的精神世界。明中后期,受到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女性散文呈现出才德兼美、德情统一的价值导向。这些作品表达了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对传统女性境遇的审视与质疑。^[51]

(三) 骈文研究

骈文起源于汉末,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世称“四六文”。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其赋作即源自骈文的律赋。唐代公文亦为骈文,即四六体。骈文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骈文与散文地位的此消彼长体现出不同朝代文学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变革。况晓慢《李商隐古文转骈文写作始末与其文体观探微》,着眼于李商隐古文转骈文的原因,分析其文体观念。文中分析中晚唐古文与骈文角色转变对李商隐文体观念的影响,认为李商隐古文写作经历得益于早期教育与家学渊源,同时受到晚唐古文式微的影响。作者认为,李商隐由古文转向骈文的写作经历,是其以古为尊、骈文为辅的文体观的体现。这充实了李商隐文学研究的内涵。^[52]

刘万川《体制宏大考辨精,资料宏富集大

成》一文,对《唐五代文编年史》一书进行了评论。文中对此书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其对唐文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按照编年次序揭示了唐五代骈、赋、散文等各文体在各个阶段的存在状况,也为文体学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文中指出,此书有三方面的重要价值:一是体制宏大,视野宽阔;二是收集广博,甄辨考证有力;三是对多种问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53]

四、小说研究

在小说研究领域,本年度学者的研究以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为主,立意新颖,角度独特。同时,一些学者将研究目光放到清末新小说上,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水浒传》作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奇书,有关研究论著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而且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蔺九章《看透水浒》一书共十六讲,将《水浒传》放在北宋王朝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用北宋在历史上确实推行过的“崇文抑武”国策,来观照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环境,始终结合文本进行分析,从书名“水浒”二字说起,再依小说的自然顺序,条分缕析细细解读,不敢稍加穿凿附会。本书观点新颖,论证有力,求证严谨,有根有据。^[54]李军的《论〈西游记〉叙事中孙悟空的能力表现矛盾——以现象、成因与艺术作用为中心》,借助互文性理论,从文本分析的角度,结合史的考察进行论述,指出孙悟空能力表现的前后差异,并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作者认为,人物的前强后弱,一是受此前西游取经故事形态的影响;二是与作者构思相关;三是受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驱动,服务艺术真实的必然。世德堂本对孙悟空能力表现的书写,使小说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立体丰满,艺术成就远超取经题材的其他文本。^[55]霍现俊等《被侮辱者成为被谴责者——论〈金瓶梅词话〉中的秋菊形象》一文,指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对处于被侮辱被凌辱地位的下层婢女非但不同情,反而站在道德的高度对她们进行种种的谴责,这实际上是作者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深层意识在作品中的反映。^[56]

在《红楼梦》研究中,高光新发现《红楼梦》庚辰本的脸盆、面盆、浴盆、小沐盆与其他版本存在异文现象。《〈红楼梦〉“脸盆”考

辨》一文，仔细分析庚辰本中存在的异文现象，同时对用于洗脸的盆在清代小说中的表述进行统计分析。作者认为，面盆和脸盆在《红楼梦》同一部书里出现，以及《红楼梦》不同版本之间异文替换，是清代这两个词的使用习惯的真实反映。对于沐盆的表述，庚辰本只与甲辰本存在异文，反映的是甲辰本抄手众多，并且保留了脂本某些原始的面貌。^[57]高光新还对《红楼梦》中出现的贡品进行了分析，《红楼梦》记载的大量饮食与日常生活用品，有很多与中外进贡的贡品相同。《红楼梦》里贾府诸人对贡品很熟悉，反映了曹家对皇家事务很了解。还说明《红楼梦》有丰富的外来文化，曹雪芹“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伟大作家”。《红楼梦》中的外来词与外来文化，反映了“中外文化互渗”。国外进贡物品，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满足皇帝的方便性和趣味性，较少有最新科技产品，是当时清代历史的写照。^[58]对《红楼梦》中的外来事物进行探讨的，还有余振东的《〈红楼梦〉中的西洋美人和外国器物——兼谈曹雪芹创作的地理视域》一文。此文就曹雪芹对西洋美人特点及它提到的诸多西洋器物的描写作了梳理，指出这些描写应该是我国前代作品所少见的，非常具有文学史意义；体现出小说家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极为开阔的地理视域。^[59]张嘉鑫、李秋果从《说文解字》“玉”部字解释的角度，探讨《红楼梦》人名中反映的玉文化及其演变。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找出这些字更深层次的含义，以及词义从古到今的转变。作者认为，《红楼梦》人名中反映出三类人物：第一类人的性格、身世和其命名用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项和所反映的文化内涵相契合；第二类倾向于利用谐音暗示人物性格；第三类是单纯的契合贾府第四代以玉为名的传统。这一研究角度可谓新颖别致。^[60]

李丽平《〈儒林外史〉士人涉讼情节及其身份特权研究》一文，从法律诉讼的角度研究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深入分析小说中描写的诉讼结果与法律规定相悖的原因。作者将《儒林外史》中士人涉讼描写及相应法律规定对比，分析士人干讼的原因，及士人涉讼情节对文本表达的作用。作者认为，士人干讼是因为这些人的背后有基于科举制度而形成的庞大的“关系网”做后

盾，这个“关系网”的活动能量很大，以致产生了不成文的特权。作品中这些鲜活的描写，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认识当时社会士人阶层的生活状况提供参考。另一方面，这些涉讼情节对小说表现主题、塑造人物和推进情节也起到很大的作用。^[61]另外，她的《“歧路”灯下的阴影——论儒家观念涉讼时的隐形表现》一文，将《歧路灯》中与谭绍闻有关的案件及诉讼过程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小说在描写案件审理过程时，往往忽略了法律条文，而侧重考虑儒家的一些纲常伦理或涉案人的身份等，从而使案件的审理结果“合情合理”。这种现象一方面和儒家观念对法律条文和官员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同时和作者的生平经历相关。挖掘出这一点，对我们认识儒家观念在清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诉讼中的地位和影响有一定参考意义。^[62]王娜的《浅谈弹词〈再生缘〉中的几个小人物形象》，将研究目标关注到小人物身上，分析小人物的性格特征。《再生缘》中的小人物涉及笔墨不多，但人物形象丰满立体，在他们身上亦能看到一些人性的闪光点，塑造的很成功。^[63]《再生缘》虽然是说唱艺术的弹词作品，但它也适合于案头阅读，故本文将之介绍于此。

郑丽丽则将目光投向清末新小说的研究中，发表了一组文章。她的《清末新小说中的“黄祸”论评析》，从“黄祸”论所唤醒的民族意识和以和平为底色的“醒狮”两部分展开分析。清末新小说以其文学想象与虚构所做出的反应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借鉴日本模式以求新变乃是一种政治策略，民族国家意识成为政治格局考量的根本底色，“醒狮”成为极具民族文化特质的精神象征。^[64]她的《清末新小说中的女子“身体国家化”》一文，还原清末保国强种的语境，将当时的公共舆论与新小说作互文性阅读，论述了女子废缠足、兴女学、女权、自由婚姻、专心为国一系列的转变。这一由“国民母”到“女国民”，再到“女英雄”的逻辑行程，是典型的作为政治话语的身体国家化方案，说明了女性解放本身的复杂性。既要突破男权话语藩篱，亦需顾及国情。中国女性不但肩负着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也肩负着强国保种的历史责任。^[65]她的《清末新小说中的异域改革叙事——以〈新小说〉杂志为中心》一文，指出在“救国”思

潮引领下,清末以异域政治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对西方建国理念以及建构过程进行介绍,目的在于借鉴与学习,但囿于时代及作者个人学养等因素,并未意识到社会变迁背后的理念支撑。^[66]与“新小说”的兴起与没落相始终,晚清改良派与革命派都在以小说的形式宣传政治理念,从而争夺话语权。郭继宁的《晚清革命派小说中的“假志士”现象平议》一文,聚焦晚清革命派小说,将以革命为幌子的假志士作为分析对象。假志士分为“口头革命家”与“吃革命饭的先生”两种。这些革命派小说所营造的具有历史现场感的场景,一方面反映了鱼龙混杂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通过真假志士的对比,更加彰显出孤绝奋斗的革命者理想主义的精神内核。^[67]

五、戏曲研究

相较于小说研究以作品分析为主,戏曲研究在作品分析和理论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就。本年度戏曲研究集中于元杂剧研究和曲学理论研究上。

赵忠富《元代公案剧清官形象所折射的社会舆情》一文,认为元代公案剧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普罗性质的文艺样式,蕴含着无比丰富的社会舆情信息。通过分析元代公案剧文本中的清官形象,作者指出,公案剧作家们借助清官形象的塑造,既传达了广大底层百姓对于官员清廉、公正、仁爱、勤政的热切吁求,同时也对元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腐败、特权、酷刑、怠政等现象进行了严正地控诉。^[68]另外,他还对元杂剧的传播情况进行考证,在文献研读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元初真定和大都杂剧繁荣的因由与表征。赵忠富的《元杂剧在真定与大都的兴起及传播考略》一文,从元杂剧在真定的兴起、元杂剧在大都的繁荣发展、元杂剧在真定和大都间的传播三方面,论述了元杂剧的发展与传播,讨论了杂剧作家和演剧艺人在两地戏曲传播与交流中的关键作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对两地戏曲交流的历史进行深入梳理总结,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69]张静、唐元的《论清初黄周星〈人天乐〉戏剧中描述的理想世界》,分析了黄周星塑造的理想世界——俱卢洲。作者认为,黄周星四大部洲的概

念来自于佛教经典《长阿含经》,写作目的却是为了映衬道家的昆仑仙境,宣扬的是他浓厚的道教信仰。他塑造理想世界的背后,是他作为遗民诗人一生穷困潦倒的现实窘境。^[70]另外,对作品进行研究分析的还有倪金艳的《结构与语言:当代孟姜女戏曲的文本叙事探析》一文。^[71]

在地方戏曲研究方面,有陈静、井春妹的《保定地方戏曲文化挖掘与保护研究——以保定老调为例》一文,指出近年来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弘扬保定地方戏曲文化取得一定成效。^[72]井春妹、陈静、王洁的《高阳“北方昆曲”研究》,具体分析了昆曲在高阳县的兴起、存续和复兴。两篇文章都积极地为地方戏曲文化的传承寻求出路。^[73]

在曲谱和戏曲理论研究方面,魏洪洲的《早期南曲谱的建构与戏曲宗元》一文,分析了早期南曲谱《旧编南九宫谱》《九宫谱》《十三调南曲音节谱》的编纂动机、宫调系统之来源、曲牌分宫之依据、例曲选择之标准等内容。文中指出,在它们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宫调的确立,曲牌的分类,还是例曲的选择等,均受到明清戏曲宗元思想的影响。对此加以探讨,不仅有助于揭示传奇戏曲音律体制的建立情况,还可借之审视明清戏曲宗元等问题。^[74]李俊勇的《古典戏曲唱论研究》一书,为教育部项目成果,本书对以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为代表的古典戏曲的歌唱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该书对唱论理论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撰写了提要,对歌唱的唱本即曲谱也进行了整理并撰写了提要,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作者对唱论的理论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75]

六、其他研究

本年度在“四库学”研究、“国学”研究和“北学”研究等方面也收获颇丰。

(一)“四库学”研究

《四库全书》所收著者及存目著者籍贯遍及全国各省,然其数量分布,差距甚巨。就河北地域而言,到底有多少著者和书籍被收录进去,并不是很明确的。周小艳的《四库著录河北先哲遗书辑存》一书,在其《四库著录河北先哲遗书辑目》的基础上,补增《四库总目》《四库存目》中所遗漏者,并增补总目提要。还补增了

《续修四库》《四库禁毁》等四库系列丛书中著录的河北学人的著作和总目提要,使其更为完备。全书资料翔实,考据严谨,诸多资料在国内研究中非常少见,堪称这一领域目前最齐全的资料汇编,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76]张春国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考证〉考略》,对位于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来源进行研究。^[77]

(二)“国学”研究

本年度有两部“国学”著作问世,这属于民众普及性读物。刘少坤的《国学经典选注》,按照“经史子集”四大模块进行编写,选注“国学”经典,力图系统而全面的勾勒出“国学”之基本内容。在编写过程中,努力坚持三大原则:正本清源,扭转当今“国学热”中的错误倾向,选取有利于当代社会安定、适合社会发展之优秀元素,进而为“新国民精神”“新文化传统”的形成添砖加瓦。打破现在文、史、哲各自为政的现状,析出“经史子集”中最最核心、最最精华的部分,让每一节课都变成一部经典的小讲座。努力做一个经典“导读者”,吸引更多的人回归文本,阅读更多传统“国学”经典,潜移默化,进而内化成他们的思想,最终逐渐影响整个社会。^[78]王长华的《国学读本》大体上以时间为线索,排列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并附以“题解”“注释”和“评析”三个部分,以辅助阅读。“题解”对所选篇目进行背景介绍;“注释”对重难点字词进行解释;“评析”阐释选文的思想意蕴与当代价值。《国学读本》在编排上以史为经,尤其侧重先秦时代的文化经典。《国学读本》注重发掘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观念、提炼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使之与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79]

(三)“北学”研究

“北学”原指周代设在京城的最高学府之一,或者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经学。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北学”似乎成了北方的学问,它显然是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而重新被人们所提起的。本年度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北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梁世和《“北学”引起学界关注》一文,对会议内容进行了总结。与会学者对“北学”的含义与当代价值进行了研讨,对河北开展“北学”研究提

供了建议。关于“北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否成立,与会学者都给出了肯定回答。“北学”概念要放在区域性儒学与河北两个关键词之中,使之形成清晰的连接,并提出应当把“北学”学脉梳理清楚。^[80]

(四)杂学研究

王芳《先秦至清伯夷叔齐传说的意义考辨》一书,围绕伯夷叔齐的故事全面考辨,最终落实到其所承传的多元价值意蕴。^[81]李浩依照《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法,参考汉代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成果,用文献文化史的视角对《论衡》所见“诸子略·儒家类”典籍进行了穷尽式的梳理与分析,以此鸟瞰王充的知识来源与阅读视野。^[82]王云飞的《论王羲之隐逸思想——以郭象玄学为中心》一文,探析王羲之隐逸思想的成因。认为王羲之的隐逸,不仅有郭象玄学的理论背景,而且有江熙、沈居士、孙绰等众多人参与其中的整个社会上层关于玄学山林和庙堂关系大讨论的背景。^[83]马燕鑫在《〈文选〉音注所存古音现象类说》一文中,对《文选》音注中保留的各种类别的古音现象进行了分类整理,这为隋唐音韵的状况提供了数量众多的实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84]张静的《灾害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评李朝军著〈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一文认为,李朝军教授的《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一书,乃是古代文学领域第一本灾害文学研究的系统性专著,具有开拓性价值。将灾害与文学结合的研究,近年来显示出强劲的学术发展态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该书开古代灾害文学研究之先河,拓展了宋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在书中,作者全面把握宋代的灾害类型与文体,发掘了一批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重视灾害文学的社会功能与现实意义,该书对今后的灾害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85]诸葛亮信仰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之一。王树平、苏东来从清代统治者对诸葛亮的崇祀、清代民间的诸葛亮信仰、清代诸葛亮信仰的文化意义三方面进行了论述。在中央层面,清代帝王多推崇诸葛亮,康熙视其为“纯臣”,雍正视其为“纯儒”,乾隆称其为“全人”。诸葛亮崇祀从清初到乾隆皇帝时期,呈现出复兴到稳定的局面,其后则无明显变化。清代民间如南阳、沔县、成都等地的民众往往祈求诸葛亮除灾禳祸、赐福祐民,诸葛亮

遂成为具备多种神职的世俗神灵,由此民间的诸葛亮信仰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同时,作者认为,清代诸葛亮信仰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确立统治者“立教化民”的模范榜样、寄托士大夫“君臣契合”的功业理想、丰富民众“娱神娱己”的民俗文化。^[86]另外,田云明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隐者形象进行了梳理,归纳出拒官不仕型、佯狂型、归隐田园型、投身“无用”型四种隐者形象的类型特征,并对其进行了分析。^[87]

总之,2019年河北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域广阔,角度新颖,既有在旧议题上的新开拓,也有在新领域里的新发现,呈现出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景象。比如“北学”概念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反映了河北作为明清以来京畿之地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主体精神。它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内容,又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

(吴秀华: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蔺坤、张文青: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

参考文献:

- [1]李卫华.从“比”“兴”到“比兴”[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9(3).
- [2]胡海、王子珏.詹锓对“意象”和“比兴”的心理学解释略论[J].语文学刊,2019(3).
- [3]王长华.《诗经》学论稿[M].人民出版社,2019.
- [4]易卫华.印刷术普及与宋代诗经学[J].中国语言学研究,2019(1).
- [5]尹雨晴、陈平、刘新英.西汉《毛诗》异于“三家诗”的阐释[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19(4).
- [6]李金善.苏雪林楚辞学“九天”研究及其文化意义[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 [7]曾智安.汉乐府相和歌《江南》古辞新论[J].乐府学,2019(20).
- [8]董莉.何处安顿身与心——《古诗十九首》中的城、城门、楼意象[J].青年文学家,2019(29).
- [9]刘万川、曹向华.日著《中国文学史》(1897—1949)中的“汉乐府”述评[J].乐府学,2019(1).
- [10]向回.礼乐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乐府诗学研究[J].光明日报,2019(3).
- [11]韩宁、徐文武.古乐府[M].中华书局,2019.
- [12]马燕鑫.“苏李诗”的用韵特征及《李陵集》成书考论[J].文学评论,2019(6).
- [13]孙耀庆.刘宋诗僧惠休考略[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 [14]孙耀庆.刘宋“文笔之臣”傅亮考略[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 [15]赵延旭、那奇.两晋时期“谣”研究[J].史志学刊,2019(4).
- [16]张蕾.《玉台新咏校正》整理与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17]胡海、杨玉婵.刘勰诸隐论与通俗文艺的美育意义[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18]吴淑玲、韩成武.杜甫歌行体诗的体类特征[J].南都学坛,2019(5).
- [19]吴淑玲、韩成武.杜甫歌行体诗的艺术境界[J].南都学坛,2019(3).
- [20]王新芳、孙微.杜甫《逃难》诗作年新考[J].中国韵文学刊,2019(3).
- [21]王福栋、彭宏业、卢纶《塞下曲》对李广射石故事的创改——兼评苏教版小学课文《李广射虎》[J].语文建设,2019(14).
- [22]张静.再论司空图写作《二十四诗品》的合理性[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 [23]张静.从苏轼、陈振孙的论述再谈《二十四诗品》的作者[J].天中学刊,2019(5).
- [24]张志勇.唐诗性格——影响诗坛千年的十六张面孔[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
- [25]马小会.杨亿汝州时期的仕宦心态与文学书写[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2).
- [26]于广杰.北宋文人画思潮与李公麟绘画的诗兴意趣[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27]吴增辉.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M].中华书局,2019.
- [28]周小艳.元代文学作品选[M].人民出版社,2019.
- [29]于飞.《伟观集》与《夜山图题咏》的诗学文化价值[J].中国语言学研究,2019(2).
- [30]于飞.蒋易编《皇元风雅》的成书及其诗学价值[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 [31]叶会昌.《月屋漫稿》“伪书说”考辨[J].中国语言学研究,2019,(2).
- [32]周小艳.冯舒、冯班诗学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9.
- [33]王馨鑫、刘杨.王世贞与明中后期北方文士交游考述[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6).
- [34]于广杰、史宝莉.王树楠的遗民心态与诗古文创作——兼辑民国报刊所收王树楠未刊诗歌[J].保定学院学报,2019(3).
- [35]于广杰.王树楠诗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
- [36]张静、唐元.日藏孤本黄周星《圃庵诗集》考述[J].文献,2019(3).
- [37]吴秀华.抄本《燕川渔唱诗集》的来历和价值[J].山东大学中文学报,2019(1).
- [38]刘少坤、张寒涛.王国维“人间”“境界”学术渊源考论[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
- [39]王丽娟、卞轶男、刘少坤.苏辛词评注[M].北京理工大

- 学出版社,2019.
- [40]余安安、田文雅.论温庭筠创作的禅意审美与时空艺韵[J].武陵学刊(社会科学版),2019(5).
- [41]王馨鑫.论王鹏运《庚子秋词·渔歌子》的“词史”品格[J].唐山学院学报,2019(1).
- [42]田玉琪、李雪铭.宋词“入代(替)平声”说之检讨[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43]田玉琪.词调研究的学术空间[J].中国韵文学刊,2019(1).
- [44]姜子龙、徐彦伯《汾水新船赋》探微[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
- [45]孙耀庆.刘宋辞赋论略[J].社会科学论坛,2019(6).
- [46]李娜.从班固的经学价值立场看《汉书·艺文志》赋之分类[J].中国语言学研究,2019(1).
- [47]马燕鑫.张衡作品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9.
- [48]马燕鑫.魏晋六朝地记与文学书写[J].文学遗产,2019(2).
- [49]于广杰.贺涛的古文思想与“莲池学派”的现代转型[J].邯郸学院学报,2019(1).
- [50]于广杰.王树楠与“莲池书院”山长交游考——兼论晚清“莲池学派”的兴起[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 [51]孙春青.古代女性散文创作性别文化内涵初探[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52]况晓慢.李商隐古文转骈文写作始末与其文体观探微[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 [53]刘万川.体制宏大考辨精资料宏富集大成[N].文汇报,2019-09-09(W06).
- [54]蔺九章.看透水浒[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
- [55]李军.论《西游记》叙事中孙悟空的能力表现矛盾——以现象、成因与艺术作用为中心[J].明清小说研究,2019(2).
- [56]霍现俊、李皎月.被侮辱者成为被谴责者——论《金瓶梅词话》中的秋菊形象[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57]高光新.《红楼梦》“脸盆”考辨[J].红楼梦学刊,2019(2).
- [58]高光新.《红楼梦》与清代贡品[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4).
- [59]余振东.《红楼梦》中的西洋美人和外国器物——兼谈曹雪芹创作的地理视域[J].名作欣赏,2019(25期).
- [60]张嘉鑫、李秋果.探析《红楼梦》人名中的玉文化——以《说文解字》“玉”部字为例[J].邢台学院学报,2019(1).
- [61]李丽平.《儒林外史》士人涉讼情节及其身份特权研究[J].明清小说研究,2019(1).
- [62]李丽平.“歧路”灯下的阴影——论儒家观念涉讼时的隐形表现[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63]王娜.浅谈弹词《再生缘》中的几个小人物形象[J].邢台学院学报,2019(1).
- [64]郑丽丽.清末新小说中的“黄祸”论评析[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2).
- [65]郑丽丽.清末新小说中的女子“身体国家化”[J].社会科学战线,2019(4).
- [66]郑丽丽.清末新小说中的异域改革叙事[J].江汉论坛,2019(3).
- [67]郭继宁.晚清革命派小说中的“假志士”现象[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1).
- [68]赵忠富.元代公案剧清官形象所折射的社会舆情[J].大舞台,2019(4).
- [69]赵忠富.元杂剧在真定与大都的兴起及传播考略[J].大舞台,2019(1).
- [70]张静、唐元.论清初黄周星人天乐戏剧中描述的理想世界[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9(4).
- [71]倪金艳.结构与语言:当代孟姜女戏曲的文本叙事探析[C].戏曲传承与发展研究——新加坡2017狮城国际戏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9.
- [72]陈静、井春妹.保定地方戏曲文化挖掘与保护研究——以保定老调为例[J].保定学院学报,2019(5).
- [73]井春妹、陈静、王洁.高阳“北方昆曲”研究[J].北方文学,2019(6).
- [74]魏洪洲.早期南曲谱的建构与戏曲宗元[J].戏曲学报,2019(20).
- [75]李俊勇.古典戏曲唱论研究[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 [76]周小艳.四库著录河北先哲遗书辑存[M].人民出版社,2019.
- [77]张春国.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考证》考略[J].
- [78]刘少坤.国学经典选注[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
- [79]王长华.国学读本[M].河北教育出版社,2019.
- [80]梁世和.“北学”引起学界关注[N].光明日报,2019-9-7.
- [81]王芳.先秦至清伯夷叔齐传说的意义考辨[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82]李浩.《论衡》征引“儒家”类文献新探[J].荆楚学刊,2019(4).
- [83]王云飞.论王羲之隐逸思想——以郭象玄学为中心[J].中国书法,2019(2).
- [84]马燕鑫.《文选》音注所存古音现象类说[J].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19(2).
- [85]张静.灾害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评李朝军著《宋代灾害文学研究》[J].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9(3).
- [86]王树平、苏东来.清代诸葛亮信仰及其文化意义述论[J].中华文化论坛,2019(2).
- [87]田云明.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隐者形象[J].唐山学院学报,2019(2).

现当代文学研究

李致 田建民

现当代文学研究成绩集中在鲁迅研究、文学史、小说等方面,特别是田建民的鲁迅研究、杪楞的网络小说批评、李浩的作家重读系列以及熊权的孙犁小说研究令人印象深刻。田建民、阎浩岗、熊权、雷鸣、马云、邓招华、宫立等学者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学术产出,杪楞、邓芳宁、原帅等中青学术力量的崛起为河北现当代文学研究注入学术活力,研究队伍总体平稳。

一、鲁迅研究

2020年,鲁迅研究最大的收获就是田建民的《启蒙先驱心态录:〈野草〉解读与研究》。^[1]在五四思想文化启蒙这一总主题的统辖下,该书着眼于分析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的心态,提出《野草》系列散文诗在启蒙总主题统辖下着重表现了诗人对启蒙的执着与坚守和面对启蒙的困境时内心的困惑与焦虑。作者认为,《野草》表现的是鲁迅在五四落潮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的心态与情感,《野草》系列散文诗在启蒙的总主题统辖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现诗人对启蒙的执着与坚守;另一类是表现诗人面对启蒙困境时内心的困惑与焦虑,使《野草》研究不再纷繁杂乱而具有了统一的主题。《野草》中所描写的诸如“无物之物”“无物之阵”“空虚的暗夜”“奇怪而高的天空”“无边的旷野”等意象,是笼罩在诗人心头无法摆脱和驱散的旧传统文化和习惯势力所幻化的阴影,在这一“阴影”的重压下,诗人感到四面受敌,时刻处于短兵相接的战斗状态。这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承担意识使然。《影的告别》是告别奴性的依附性和奴隶道德文化所孕育出的“奴隶时代”;《我的失恋》意在以游戏姿态对传统的以“美人香草”喻忠君爱国的文学观念进行解构;《复仇》表现了启蒙思想先驱对愚昧的被启蒙者“怒其不争”的愤激与宁愿以毁灭自己为代价来唤醒大众的自我牺牲精神;《立论》表现的是鲁迅在思想启蒙中体验到的“情”与“理”的两难选择与内心的困惑等。《野草》的24篇

散文诗(包括《题辞》),表现的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投身启蒙的执着与坚守以及面对启蒙困境时的内心的困惑与焦虑,表现了一种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心态和对启蒙的反思与质疑。对启蒙的执着与坚守表现为对旧文化和旧习惯势力的不妥协的韧性战斗精神、对传统封建旧文化执着地揭露与批判和甘愿以死来抗争与“复仇”的自我牺牲精神。该书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有学者认为《启蒙先驱心录:〈野草〉解读与研究》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回到五四,回归文学,立足文本”,立足文本细读与互文阐释,将“《野草》内涵概括为‘启蒙先驱心态录’,简明而又准确”。由此视角和维度来解读作品就有了“整体感和创新性”,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

鲁迅小说《孔乙己》写于1919年3月,原载1919年4月《新青年》第6卷第4号。2019年是《孔乙己》发表100周年,以此为契机,研究者对孔乙己形象进行了重新读解。刘玉凯认为《孔乙己》写的是一个古老的题材,里面包含的文化内容非常丰富,可惜多年来因为人们解读太政治化,太概念化,没有好好地拿孔乙己也当个活生生的人来研究,至今存在着一些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小说主要写孔乙己的样子与性格可厌,并不是可笑。鲁迅写孔乙己,同情是多于鞭挞的。他用的是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一个老老实实、按部就班、普通真实的读书人。孔乙己的弱点,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的过于诚实,过于呆傻迂腐。他的可笑,是“学而优则仕”和“君子固穷”的。鲁迅就是想写中国晚清到民初那个特定的某一类读书人的人生片断^[3]。田建民、李梁也认为孔乙己被过度阐释:孔乙己通常被定位为“知识分子苦人”或“脱离群众的士大夫”的形象,并以此引申到政治批判或启蒙的国民性批判。其实孔乙己是一个孤独无奈而又有着“独异”个性与精神追求的知识者“苦人”形象,是世人都漠视、排斥文化的冷漠社会中的独异的文化守望者。鲁迅借此形象的塑造,用

“或一种”人生悲剧的艺术描绘如实传达自己别样的人生体察。^[4]

刘润涛和马云关于鲁迅生平与创作相关性研究也值得注意。1898年鲁迅赴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标志着其从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开始。研究者对这一人生选择原因的阐释多囿于鲁迅自述,虽有考虑维新思潮影响者,也因缺乏历史细节呈现,造成结论与史实存在相当距离。刘润涛在论文中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提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鲁迅既非时代的先觉者,亦非时代的落伍者,离乡求学既非迫于无奈,亦非完全主动,实是基于自身知识结构、晚清维新潮流、各校招考规则、现实人际关系等所作出的理性选择。所谓“走异路”实则“逐新潮”,所谓“学费贵”实则“无资格”,所谓“逃异地”实则“投叔祖”,才是鲁迅所云“仿佛是在走异路,逃异地”的史实本相。^[5]马云则考察了鲁迅长期抄古碑的经历对创作产生的影响。研究指出,鲁迅为搜集研究“古碑”付出过极大心血,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他陷入对“古碑”弃与留的情感纠结之中。长期抄古碑的经历给他的创作留下了一些印迹和投影,他研究古碑时延展的情绪和情感深入到创作中,他创作中的地狱与鬼魂意象是古碑投影的表现,在古碑投影中他洞见了无碑者的废墟与荒坟,更从古碑想到无碑者,决意要为无碑者立传。在此过程中,鲁迅表现出了超常的新旧文化的转换能力。^[6]

二、文学思潮与现象

近些年,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对“文学史”的思考却在持续,特别是文学史现场的还原和文学思潮的梳理一直是研究者关注重点。熊权聚焦“文学张闻天”及相关工读事迹,在新文化历史语境中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科学思想互动对话。作者分析指出,自新民主主义论以来,一般认为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即迅速发展为一元主潮。大浪淘洗只有唯一正统的“主义”,但删繁就简的历史过程其实出自“后设”的理想范型。青年张闻天接受无政府思想的“互助论”而质疑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但又恰恰从追求无政府乌托邦发现现代政党的重要意义。聚焦“文学张闻天”及相关工读事迹,既可以发掘革命文

学被忽略的面相也能够揭示一种并非斗争而是兼容的新文化图景。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里,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经与它种“主义”互动对话、才终于形成了自己。张闻天早年专注于文学事业、接受无政府思潮影响,后来却走上职业共产党人之路,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主义”对话的一个实例。^[7]阎浩岗则围绕“土改叙事”和“文艺大众化”思潮对当代文学史进行深入思考。关于中国大众化文艺的嬗变,作者提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艺是将大众化作为基本前提、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目标的人民文艺。工农兵出身、革命干部身份的作家是这种文艺的创作主体。与解放区文艺相比,它在继承民族民间传统基础上更多糅合了西方元素。“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大众化被以政治方式推向极致。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精英文艺一度占据主流,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到来,借助电视与网络的普及,大众文艺重新以娱乐驱动的通俗文艺形式走向前台。新时代文艺的特点之一是大众文艺、精英文艺和主旋律文艺三股并进,各行其道,它们分别有自己的创作与接受群体。新中国70年文艺大众化的经验教训,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总结。^[8]《在“恶霸”与“绅士”之间:现当代文学“恶霸地主”形象的形成与消解》一文,作者通过“地主”与“恶霸”之间的关系研究现当代文学地主形象的不同塑造方式和不同叙事伦理,认为以凸显阶级对立为宗旨的“恶霸地主”形象最早可追溯到华汉的《暗夜》。此前地主形象的“恶霸”特征并不明显,此后此类塑造方式也并未立即在文坛确立其主流地位,左翼、准左翼文学对之均有质疑或创作实践上的匡正。《白毛女》公演之后,“恶霸地主”才逐渐成为地主形象的主要类型。但是,在此期间,仍有作家作品在相关描述中显示出某些不同特征。自张炜《古船》始,非恶霸、非反面人物的地主形象接连出现,甚至有圣贤化、英雄化或善人化的地主。当年将“地主”与“恶霸”两个不同概念焊接在一起,是出于发起土地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这一做法曾带来一些副作用或负面作用,但并非没有理论与现实依据。有意将客观性系统暴力具象化为主观暴力,是因前者发生作用是隐蔽潜在的,不易为农民察觉,要消灭它更难。^[9]此外,作者还以《春回地

暖》为中心对当代文学史土改叙事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王西彦的《春回地暖》是作者平生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篇幅最长的土改题材小说，创作时间历时 12 年。这样一部倾力之作却并未被当代文学史重视。除了题材原因，它的被冷落还与其写法有关：它虽然也写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却并未将故事传奇化，难以像“红色经典”那样以情节吸引读者；它没有塑造高大完美的人物形象，又难使当时的批评家满意。这两种因素导致该作没有产生“红色经典”那种广泛的影响。在新时期语境中，作者为“政治正确”而采取的保护性修辞又使其被新的研究者忽略。由于作者信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虽然作品竭力向“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靠拢，却显示出诸多“非典范”特征，这使其具备了一定的内涵复杂性和更多的艺术真实性，值得研究者注意。^[10]

对当代小说的特征、主题与题材进行梳理。近年来长篇小说出现乡绅叙事热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为破解 21 世纪中国乡村困境，重建乡村，作家以文学的方式，表达着从传统探掘精神资源的立场这些长篇小说塑造了“道德圣者”、民族大义“殉道者”、经济型“卡里斯玛”、传统权威的“启蒙者”等四种类型的乡绅形象。雷鸣反思了这四类乡绅形象分别存在着艺术张力的缺失、重述历史的偏至、情感逻辑的虚妄、价值取向的反现代性等审美缺憾。^[11]而当代小说的乡村叙事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个场所是集市。《乡村变革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空间政治——论中国当代小说的“集市”叙述》一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变革及社会主义政治实践赋予小说中的集市以不同的政治属性和意义承担，或成为检视不同政治立场人物的德性隐喻，或成为求证农村改革正当性与必然性的意义空间，或成为后改革时代乡村颓败景观的镜像。当代小说所叙述的集市被赋予了时代的政治属性，成为当代乡村变革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表意空间。这亦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多维互动。^[12]有研究者分析工业题材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工业题材小说因其题材的特殊性，成为构建民族国家想象、增强工人

群体国家认同感的重要手段。工业题材小说记录了中国改革进程，蕴含了民族国家想象的不同维度，并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有着不同的表征。由民族国家神话所激发的爱国主义热情始终充斥在工业题材小说中，这源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现实，也在于工业题材小说以服务于工业化为最终旨归。它将国家置于现代化的时间序列上，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现实，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工业题材小说中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直接体现，以儒家文化、家族文化为核心，试验了民族传统文化融入、促进现代化的可能性与代价。21 世纪以来的“工业史”小说则尝试修复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回溯民族国家与工人群体之间的紧密关系，缓释了工人群体的身份焦虑，修复了工人群体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信心。^[13]也有文章对 2018 年长篇小说创作进行归述，认为小说出版在保持以往丰富繁荣的态势下，风格、题材、手法、载体等方面都有所拓展和创新；特别是在高扬现实主义旗帜，在日常生活中挖掘题材，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理想追求，呈现时代精神等方面有着不俗的建树。^[14]长篇小说读者群众多，业态变化大，生产活力充足。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化阅读的社会习惯正在建立起来，数字和在线形式的出版对传统纸质出版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阅读方式的变化极有可能反过来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此外，邓芳宁对 70 后小说的中“救赎”母题^[15]和“孤独”母题^[16]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

网络文学批评。杪楞对网络文学进行了较为深入追踪和思考。关于网络文学的年度发展，杪楞认为 2018 年的历史类型创作在整个网络文学“大盘”中有着不俗的表现。但从子类型分布、作品内容、创作方法和主题导向等方面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穿越历史和架空历史类仍然占比较大，忠实于现实（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正面反映历史生活的作品相对较少。各大网站无论男频还是女频作品排行榜单中，位居前列的历史小说以穿越架空、古代重生等居多，历史传奇类作品读者关注热度不足。其次，作品质量良莠不齐，一些写作者功力不足，作品逻辑不清或存在知识性硬伤；一些作品对历史生活做过度想象，故事情节有违常理，过度消费历史的倾向明显。在幻想、历史、现实这些主流类型之外，都市、军事、悬疑、武侠等其他类型创作也

获得丰收。不同类型的作品满足着不同读者对网络文学阅读的需求,共同营造了网络文学繁荣兴盛的态格局。^[17]关于网络文学的属性,作者强调网络文学的商业属性,认为“新群众”进入文学写作领域,促成了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写作的特征:文学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生成了新的审美规约,建构了新型的读写关系。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最本质的区别,或说是迄今为止网络文学最重要的特性,是它的“超文本”性。在网络文学中,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属性与“超文本”这样的技术属性、“粉丝化”的阅读机制共同作用,生成了第三重属性即商业属性。^[18]关于网络文学的功能,作者认为文学功能的发挥要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来进行,网络文学在这一点上更胜一筹。网络小说将作者主张和主题价值消弭在故事中,蕴含在人物的言行和命运发展中,使读者在阅读故事时不由自主地受到思想、道德和情感的影响。这个过程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相比于通过溢出故事之外的“说教式”或“梦呓式”的表达,更容易使人理解和接受。因此,一些优秀的网络小说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方面并不亚于严肃文学,至少在大众层面上更容易被读者接受。^[19]关于网络文学的批评原则,相比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不再是单一的文学活动,网络文学批评由大众批评和专业批评两部分组成,但由于大众批评缺乏理性,而专业批评又受到评价标准体系缺失、评论人才队伍缺乏等的限制,从而导致“双失效”状态。因此,批评实践需要直面对象的变化,以民主的态度、在场的姿态和开放的视野进入网络文学现场,才能真正在网络文学精品化和经典化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20]

三、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一) 当代作家作品

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小说研究。首先需要提及的是李浩的小说重读系列。李浩作为作家,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感悟和创作经验对莫言、残雪、史铁生、邱华东的作品探隐发微,呈现出不同于学院派文学批评的风致。《枯河》作为莫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创作特色尤为值得深入研究。李浩以文本为依托,探析《枯河》包涵的种种艺术可能:首先,在小说中“枯河”是一个隐喻性的存在,整篇小说以及其中的所有

的人物都可笼罩于这一隐喻之下,它是统摄性的意象,居于中心的位置。莫言的《枯河》建构的是一株枝繁叶茂的隐喻之树,它们有围绕,有分枝,也有环扣,隐喻具有想象力和整体性。《枯河》故事设计的精心处在于穿插和环扣,它是莫言小说在环扣的设计上最繁杂和有着最强勾联感的一篇,每一个场景都不是独立的和孤立的存在,莫言在其中的穿插让这个本有些简单的故事显得复杂丰厚。《枯河》将西方技艺进行东方改造、让它来讲述属于这个国度和民族的故事的诉求也在悄然进行,是对世界经典作品的继承与创新。^[21]残雪《从未描述过的梦境》所依借的支撑不是现实发生的而是想象,强烈的虚构感让她的这篇小说从一开始就渗透出“梦幻般”的气息,阅读它仿若是进入到一场让人着迷但也包含着心悸的梦境。残雪在《从未描述过的梦境》中创造了一个真实,但她在“必然后果”的考虑上有所欠缺,她有时太强势地安置她笔下的人物、太过信手拈来了,在这点上,多少让人遗憾。^[22]《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史铁生散文文化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其创作特色尤为值得研究。第一,作者通过运用音乐性语言打造别开生面的艺术化效果、巧妙地将文学性寓于方言之中;第二,通过小人物及其平淡的社会关系折射冷暖兼备的人生体验;第三,作品运用散文化结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呈现式的,它呈现出的是某一地域、某一生活状态下的“人的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感,你甚至察觉不到它有虚构的成分,就像生活生出来的一样。它作用于情感而不作用于理智,能够唤起悲悯,但让人反思、追问、审视自我存在的那种智力博弈感是匮乏的。^[23]分析邱华栋小说创作特点时,作者认为邱华栋的小说善于从“普通人”的小故事切入,展现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流以及人的精神状态,在中国新生代小说家中极具个人特色。邱华栋的写作可归入“百科全书式写作”的范畴,特别注重写作的整体性效果。他有意地让每个篇什分别承载“百科全书”的不同部分,各所侧重,表现了他宏大的叙事野心。邱华栋的小说将大量知识性因素、时代因素、人性因素融汇一体,又极其注重将作品的知识性和故事性相融合。此外,他的写作也表现出客观审视与个人印记相平衡的特质。^[24]

原帅从史料角度对当代作家进行了阐释。作者依据新发现的陈映真写给韩少功的两封信,韩少功与陈映真交往、文学影响的线索进行考察。陈映真与韩少功的文学活动和批判性写作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和文学的社会价值,他们的敏感与前瞻已被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全球化远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陈映真在情感立场和编辑思想上对韩少功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但客观来看,陈映真之于韩少功只是一个引路人和同道者。陈映真与韩少功所面对的“左翼革命”是不同的。在台湾,左翼革命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国民党独裁统治以及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等级结构的,是为了结束民族分裂、推动和平统一的。韩少功在理性上承认了乌托邦的失败,但在情感上却抗拒不了理想主义的召唤,于是他对浩劫的叙述充满了矛盾,在援引共产主义理想批判市场经济弊端时常常保持自省。正是基于他的生命痛感与人性良知,他在重审革命时坚持一条底线,即坚决否定极左政治运动,在批判资本时也坚持一条底线,即肯定人的合理欲望。以韩少功为参照系,我们就能客观地评价陈映真的左翼书写,在恢复历史真相、批判台湾社会问题时,他的左翼信仰可以作为不经自省的理論资源;但是他对左翼思想的异化缺乏反思,而这正是韩少功以及更多的亲历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作家写作的价值。^[25]关于晚年丁玲的文学活动,作者以考察创办《中国》时期的丁玲为切入点进行考察,认为办刊的种种艰难以及与作协党组的紧张关系,折射出她在新时期文学的“边缘”位置。晚年丁玲的“边缘”位置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先锋”姿态,她企图在新时期恢复延安文学传统,但最后拉开了先锋文学的序幕,她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转型。^[26]

当代作家作品方面,还有《〈人世间〉:重构德性文化的温暖与崇高》和《从卡夫卡到鲁迅——论余华小说的“非经验”写作》两篇文章需要提及。前文认为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在崇尚批判理性、智性文化的时代语境中,对社会历史认知和人性境界探索并将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和“应该怎样”融为一体,从意义格局建构、人物形象塑造到历史哲学意识提炼,多方面重构了德性文化的温暖与崇高,既具备“史外之史”的认知价值,又拥有“人之

为人”的思想探讨,极具时代针对性地彰显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性、方向感兼具的雄健气魄和雅正品格。^[27]后文对余华小说进行分析,认为20世纪60年代人的成长经历影响了余华观察历史的方式。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余华摆脱了生活经验的不足,形成了自己的先锋文学观念和写作风格。他的写作依赖的是“阅读经验”而非“生活经验”,他的小说与历史始终保持着“距离感”。进入1990年代,余华不断强调卡夫卡的现实感,不断遗憾阅读鲁迅太迟了,阅读资源的变化和他的写作调整密切相关。《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虽然增强了故事性、具象化了哲学思考,但小说的内核依然是先锋文学,余华与历史依然保持着“距离感”。《兄弟》《第七天》取消了“距离感”,反而丧失了成熟风格和文本魅力。^[28]

(二) 现代作家作品

老舍的思想和作品研究值得关注的有傅光明和马云。傅光明分析老舍在抗战期间的启蒙思想,提出“启蒙”是20世纪前半叶乃至整个20世纪都在研究的宏大课题。它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核心理念,又是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思想的延续。在中国,“启蒙”这一概念从引进到发展都带有明显的社会革命的痕迹。自清末维新运动到抗日战争结束,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启蒙思想一直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启蒙方式的转变及其背后的社会因素规约,不仅关涉文学现象认知,更影响对作家的思想阐释。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作家,对其启蒙思想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在抗战时期老舍不再单纯地停留于个体启蒙的层面,而是延伸到群体觉醒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知识分子自我改造与唤起民众群体觉醒,成为此时期老舍启蒙思想的重心。探讨抗战时期老舍启蒙思想,关键在于他的启蒙立场。老舍以突显“国家至上”为宗旨的国民性改造,逸出“五四”时期以“个人”为基点的启蒙框架,由个体启蒙转向群体觉醒。这一转变,既是时代对作家的要求,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自觉行动。民众群体觉醒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成为这一时期老舍启蒙思想的重心。^[29]马云则阐释了老舍《剑北篇》的艺术价值,认为老舍《剑北篇》以西北地区自然山水为经,百姓

的抗日生活为纬,描绘和抒写了祖国山河依旧,国民同心抗日的长篇山水画卷。大量的山水描写具有强烈的江山意识和民族精神。老舍《剑北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山水诗,但是大量的山水描写已不是单纯的比兴修辞,而是表现一种庄严的江山情怀,在山水的洗礼中深刻领略到祖国江山的伟大,民族国家的尊严。同时,老舍对自然山水的感知也影响着他对中国山水画的认识和评价。^[30]

现代文学史料考订与释读也取得令人可喜的成绩。论文《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片论》考察了部分相关历史语境的史料,认为不宜将西南联大这一学院空间理想化、本质化。究其实际,西南联大这一学院空间,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战争的影响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制约显而易见。接着对《文聚》杂志等刊物进行了文学社会学考察,指出《文聚》杂志拘囿于联大校园或西南地区之一隅,缺乏广泛的社会反响,将《文聚》杂志视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刊物,有违历史实际。论文最后考察了有关诗人的几则史料,发现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路径异质而多样,远非学院化的现代主义诗歌所能概括。论文以缜密的史料考辨为基础,在历史现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复现中,还原出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而丰富的存在样态。^[31]阎浩岗展示并解析了新发现的几封徐訏书简,认为对于研究徐訏思想历程具有参考价值。^[32]宫立解读了新发现的熊佛西和周瘦鹃集外文。《熊佛西集外文四篇释读》一文展示了熊佛西的四篇剧评,即《毕业论文序—为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一届毕业诸君作》《徐志摩与戏剧》《写在演出之前》《新闺怨艳阳天观感》等,均为《熊佛西戏剧文集》《山水人物印象记》(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等所未收,是研究熊佛西戏剧批评的重要文献资料。^[33]《周瘦鹃集外文五篇释读》中新找到的《我与报纸副刊》《无人知是御霜簪》《还乡记痛》《看了〈蜕变〉》《〈大戏考〉序》,均不见于《周瘦鹃文集》《周瘦鹃著译系年》和《周瘦鹃年谱》。周瘦鹃发表在《报学月刊》创刊号上的《我与报纸副刊》,深情回忆了他与报纸副刊倾吐不尽的感情。《还乡记痛》记录了自1937年8月日本飞机轰炸苏州,苏州沦陷期间,数次回苏州的“痛”,当是解读周瘦鹃在苏州沦陷期间心境的第一手文献资

料。《看了〈蜕变〉》这篇短小精悍的剧评,一是高度评价了石挥饰演的梁专员、丹尼饰演的丁大夫,二是对《蜕变》中的况西堂、孔秋萍这两个剧中人物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无人知是御霜簪》赞扬了程砚秋因反对日伪汉奸的压迫,毅然离开舞台到西郊青龙桥务农,坚持不为敌人演出的气节。^[34]

郭沫若与傅抱石的交往为学界所关注,有学者对两人抗战期间的关系进行了文化阐释,认为郭沫若是反传统文化的急先锋,傅抱石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抗战期间,两位对于传统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立场的人却走到了一起,结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统一阵线”。他们的结合缘于民族情怀、浪漫主义精神以及史学情结。郭沫若和傅抱石的统一阵线启示我们:反传统与坚守传统相辅相成。反传统与坚守传统并行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更加强大和丰富。^[35]

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被相对忽视的作家如艾芜、路翎和新感觉派作家也得到了较好的阐释。作为七月派的代表作家,路翎笔下的人物充满着时代和作家自身双重特色,而他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与描绘更是独具一格。《论路翎作品〈谷〉中人物心理的双向运动》一文对路翎的中篇小说《谷》进行分析,认为变动的人物心理时常呈现出双向运动的特点。首先是单一人物的心理从一个极端瞬间转移到另一个极端,其次对立人物的心理之间也存在着心理状态的互相转化。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成为《谷》中刻画林伟奇和左莎两个对立人物的主要模式,在心理的变动中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和人性的深度。路翎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在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特定时代展现出了特殊的思想价值。^[36]《论艾芜早期小说的文化人类学价值》一文认为,艾芜早期的创作具有人文高度,体现了丰富的文化人类学价值。异域文化风情是艾芜小说的一个鲜明特色,《南行记》等早期作品表现了滇缅边境的文化与荒野、自然的状态,具有鲜明的人文价值;艾芜的创作体现了多元一体的价值格局和边缘文化的活力,他笔下的边民们虽然身份卑微却自由、自尊地活着;形形色色的底层小人物和“江湖人”是艾芜作品的核心,他们身上体现着独特的生存哲学。而艾芜建构出的立体的社会文化世界,正是其作品文化人类学的价值所在。^[37]

也有文章将新感觉派置于都市文化视角下审视,指出新感觉派将目光聚焦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代都会上海,用现代的形式描写现代人的生。作为一种与新的经济形态相伴而生的文学流派,新感觉派的内容形式较之于以往的文学存在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对于都市文明的描写与追求,并且在更深的层面反映现代人的“现代创痛”。其次是写实手法和现代手法的结合,在真实描画都市光景的同时运用现代的写作技法。最后,深入挖掘了都市男女与前人不同的新型恋爱观,揭示西方思想涌入后与传统道德的相互对抗。新感觉派作品隐藏在物质文化与消费主义背后的文学变革的尝试。^[38]

四、河北作家作品研究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的抗战书写以“优美”风格著称,诗意美通常也被认为成为孙犁抗战小说个性的一个标志。熊权对孙犁的创作个性进行辨析,注意到孙犁小说不少著名篇章都是作家基于已有作品的再创作。考察这一未受重视的修改加工现象,可证孙犁式优美非但不是惯常认为的个性抒情,反而是克服个性、反复调试的产物,包含了曲折的历史过程和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冀中战时语境造就的“非个性”乃至“反个性”文学观,是孙犁“遇合”延安文艺体制、得以成名的关键。在对孙犁的评价上,“多余人”说法广有影响力却尚留讨论余地。文学的“五四”传统、源自西方的个性主义未必万试万灵,返回中国抗战语境,孙犁是一个投身抗战并且积极建构历史的“革命人”。^[39]

李浩是当代河北文坛的青年中坚,杪楞对他的小说集《封在石头里的梦》进行评析,认为在文学被大众化洪流裹挟而往的时代,李浩是少数没有被市场和文化权力驯服的写作者之一。他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封在石头里的梦》收录了创作于不同时期的八篇作品,这些作品再次重申了他与我们已经沉浸其中并且习焉不察的日常审美相对立的“李浩式”的美学意见。李浩在小说中对世界和人性的思考、呈现,已经超越了审美表达的范畴,而抵近哲学层面;利用语言和修辞进行的情节推演符合逻辑,小说的真实性是经过“科学式”的论证过程被证实了的。这种“李浩式”的写法虽然看上去具有较高的、

纯粹意义上的艺术性,但是稍稍调整一下视野就会发现,无论对于李浩个人的创作还是文学本身来讲,其中都隐隐显出潜在的“危险性”。过于抽象化的、陌生化的表达实际上是增加了文字游戏的规则性和隐秘性,但这会让小说的美感大打折扣。^[40]

五、结语

河北 2019 年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四个方面成绩比较突出:一是鲁迅研究在延续了一贯的学术产出基础上不断扩大着影响,形成以田建民、刘玉凯、刘润涛等为中坚力量的研究队伍。二是基于文学史料的考释的现代研究呈现上升势头,形成了以邓招华、宫立、原帅为中坚的学术队伍。三是文学史思考新意迭出,以阎浩岗、熊权为代表的研究队伍势头良好。四是当代文学批评保持了前卫的姿态,以杪楞和李浩为中心在当代文坛和网络文学方面发出。当然,问题也比较明显:第一,研究选题集中在小说方面,其他的文体研究相对沉寂,侧面说明研究梯队还相对单一。第二,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而其他高校和科研单位研究成果层次普遍不高。这些问题需要从全省高度出台相应政策进行引导。第三,河北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偏少,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河北作为一个文学大省而不是文学强省的尴尬现实。总之,从年度研究成果看,河北现当代文学成绩可喜,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李致: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田建民: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田建民.启蒙先驱心态录:《野草》解读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2]阎浩岗.回到五四,回归文学,立足文本——评田建民《启蒙先驱心态录:〈野草〉解读与研究》[J].鲁迅研究月刊,2019(9).
- [3]刘玉凯.论《孔乙己》悲剧的丰富性——纪念《孔乙己》发表 100 周年[J].鲁迅研究月刊,2019(11).
- [4]田建民,李梁.独异的文化守望者:孔乙己形象再解[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6).
- [5]刘润涛.鲁迅“走异路,逃异地”考述[J].鲁迅研究月刊,2019(6).
- [6]马云.为无碑者立传——鲁迅创作的古碑投影[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2(5).

- [7]熊权.新文化运动的“主义”对话——以青年张闻天的文学、思想为中心[J].鲁迅研究月刊,2019(5).
- [8]阎浩岗.试论新中国文艺大众化的历史阶段及特点[J].文艺论坛,2019(5).
- [9]阎浩岗.在“恶霸”与“绅士”之间:现当代文学“恶霸地主”形象的形成与消解[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1).
- [10]阎浩岗.王西彦《春回地暖》何以被当代文学史冷落[J].河北大学学报,2019(5).
- [11]雷鸣.近年来长篇小说乡绅叙事的审美反思[J].当代文坛,2019(2).
- [12]雷鸣.乡村变革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空间政治——论中国当代小说的“集市”叙述[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40(1).
- [13]高露洋.论改革开放四十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民族国家书写[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2).
- [14]杪樱.文学的市场与市场的文学——2018年中国长篇小说盘点[J].中国图书评论,2019(1).
- [15]邓芳宁.“从形象中求解救”——论70后小说的救赎母题[J].南方文坛,2019(1).
- [16]邓芳宁.寂寞沙洲冷:论70后小说的孤独母题[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6).
- [17]杪樱.繁荣兴盛的生态格局——2018网络文学历史类和其他类型概述[J].网络文学评论,2019(2).
- [18]杪樱.群众性写作视野下的网络文学观察[J].长江文艺评论,2019(6).
- [19]杪樱.网络文学阅读:“欣阅”才能“诚服”[J].新阅读,2019(4).
- [20]杪樱.变化与机遇:网络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原则[J].文艺论坛,2019(2).
- [21]李浩.隐喻的丛林和现代性书写——重读莫言《枯河》[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5).
- [22]李浩.重读残雪《从未描述过的梦境》[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6).
- [23]李浩.作用于情感的“涡流”以及背景依赖——重读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4).
- [24]李浩.“百科全书式写作”与自我的实现——略谈邱华栋的小说创作[J].写作,2019(4).
- [25]原帅.韩少功与陈映真的通信、影响与互鉴[J].新文学评论,2019,8(3).
- [26]原帅.晚年丁玲办《中国》与新时期文学[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5(7).
- [27]刘起林.《人世间》:重构德性文化的温暖与崇高[J].中国文学批评,2019(4).
- [28]原帅.从卡夫卡到鲁迅——论余华小说的“非经验”写作[J].中国语言学研究,2019,26(2).
- [29]傅光明,杨丽霞.论抗战时期老舍的启蒙思想[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4(2).
- [30]马云.老舍《剑北篇》:抗日烽火中的山水长卷[J].艺术评论,2019(2).
- [31]邓招华.西南联大诗人群史料钩沉片论[J].现代中文学刊,2019(3).
- [32]阎浩岗.徐訏佚信《孤岛零简》[J].新文学史料,2019(1).
- [33]宫立.熊佛西集外文四篇释读[J].戏剧文学,2019(12).
- [34]宫立.周瘦鹃集外文五篇释读[J].当代文坛,2019(2).
- [35]马云.郭沫若和傅抱石:反传统与传统坚守者的统一阵线[J].中国语言学研究,2019,25(1).
- [36]许丽宁.论路翎作品《谷》中人物心理的双向运动[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9,26(4).
- [37]聂章军.论艾芜早期小说的文化人类学价值[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9,34(4).
- [38]许丽宁.新感觉派:都市文化影响下的文学新变[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24(2).
- [39]熊权.“革命人”孙犁:“优美”的历史与意识形态[J].文艺研究,2019(2).
- [40]杪樱.“李浩式”叙述的特征及其“危险性”——谈谈李浩的几个短篇小说[J].新文学评论,2019,8(1).

艺术学研究

孟庆军

一、美术学

(一) 美术教育

杨灵敏认为,1937年后,抗战要求油画必须直面人生,贴近社会,用写实的手法表现现实人生的存在状态,与时代感情水乳交融。抗战期间大批著名油画家来到桂林,为桂林油画的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未来的油画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发展依据。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艺术家创作的优秀绘画作品,既是服务抗日救国,宣扬革命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普及大众文化,进行民众美育启蒙的重要手段。^[1]

杨灵敏、聂道汨认为,在国家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河北国画界应

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积极接洽和加强与京津高校及画家群体的交流,发挥地缘优势,拓宽人才的培养渠道与引进力度,加深理论以及策展推广的研究力度,加强对国画创作的宏观指引,为河北国画更大发展铺平道路。^[2]

杨柳、郝建文、张吟认为,古代壁画蕴含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着重要的艺术价值。河北蔚县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和“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经济带上,历史古迹遗存众多。蔚县壁画呈现出的特点很丰富,从题材和内容上不仅反映宗教题材,也反映了大量的社会风俗,在表现形式上也是力求色彩丰富和艳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3]

祁凤霞、李婷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和魅力,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而且为动漫卡通角色设计提供了新的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动漫卡通角色设计与应用的研究应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大众审美和道德标准,从而促使动漫产业进一步地发展。^[4]

张艳梅认为,动漫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而人才的质量取决于教育机构的培养策略。高校动漫专业应以教学改革为主体,加强与刊物、网络、电视台、相关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为动漫产业培养出高质量的复合型新型人才。^[5]

孟庆军、王建辉认为,美术人才培养应加强计算思维的培育。美术人才计算思维的培育并不是简单地依靠传统的理论知识教育就可以完成的。教育工作者要有效地创新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实现教学质量与效果的全面提升;注重教学评价的逐步完善,摒弃传统的以学习成绩为主要评价参考依据的评价方式,不断创新与丰富评价内容,使得美术人才计算思维评价手段多元化发展。^[6]

刘志蕾认为,山水画在宋代进入了全盛时期并到达了巅峰,在绘画技法、风格、理论等方面都更加完备和成熟,这一时期,很多文人参与到山水画的创作中,并把人文思想映射在绘画作品当中。人文思想在绘画作品中的显现,使画家不仅仅追求造型的传、移、模、写和技法的日趋臻妙,还更多地强调作品所传达出来的精神、情绪和思想,强调对抒写心意和象外意境的追求。^[7]

李凯月、张志强认为,我国美术教科书在内容设计上依然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在传承优秀中华文化的前提下,用什么方法和途径向学生呈现出更多的世界优秀文化,成为教育工作者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在美术教科书中的西方艺术家绘画作品的内容选择与编写上,美术教育工作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多元文化教育对中小学生的的人生发展及实现自身价值上有着重要作用,充分给予青少年去体会、思考、判断各种美的机会,让西方绘画艺术在青少年全面发展过程中发挥出其重要的价值。^[8]

蒋丽认为,在学前教育中,美术教育能够让孩子的审美能力、艺术创造能力、艺术鉴赏能力等都有所发展,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是目前学前教育专业中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前教育阶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高校学生来说,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改革关系到他们日后的工作,对于幼儿来说,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改革则直接影响到他们如何认识和理解美术,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则影响他们如何正确认识和执行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工作,因此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改革需要得到重视并采取措施促进其事业的发展。^[9]

刘佳、孙萌认为,艺术彩绘作为一种全新形式的装饰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和喜爱。艺术彩绘能够实现自身感受和个性的完美展现,并能够通过独有的艺术形态来实现对周边人的影响和熏陶。将艺术彩绘应用于城市文化建设工作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出艺术彩绘的优势,不断添加城市色彩,丰富城市文化内涵,进而让城市文化来有效的增加居民的幸福感,营造美好生活。^[10]

孙伯航、佟雪霏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文化思想碰撞,相互交融,优秀画家和画论作品相继涌现,诗画园一体论也逐渐形成。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促进了中国园林范式发展。^[11]

邢晓静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高校教育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美术教学是高校教育中专业性极强的一种,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在“互联网+”时代下,美术教学的知识视野更加广阔,美术教学的技术手段也更加丰富。美术学习者既需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发展以及美术教育

的重要意义,也要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便利多媒体环境,充分提高美术教学实践的质量,从而为我国美术教育培养更多人才,促进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12]

(二) 设计理论

田瑾、孟庆军认为,审美教育是在交叉学科的背景下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门新学科,是在设计教育过程中,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以及健康的审美观念。艺术设计美育范畴不仅仅涵括创造性思维引导、理论原理以及设计方法,而是在共创交融的过程中不断为社会提供艺术审美资源和创新平台。^[13]

张净认为,符号的概念与界定以及延伸到环境艺术学科中来的变化影响着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符号的选用与创造必须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要准确、恰如其分,要与其他造型因素相统一并成整体。作为设计师,要用洞察力的眼光寻找有特殊含义的符号,要善于利用条件创造符号表达自己的设计思想。^[14]

蒋丽认为,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在新时代,社会对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当前市场的人才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也有了很大提高,作为输送人才的重要平台,高校应当根据市场需求,确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15]

冯瑞霞认为,在宏观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提升,使得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愈加强烈,对公共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城市公共设施色彩规划在现代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作为一项繁杂的系统化工程,要在实际践行过程中以基于美学性、整体协调性以及区域文化协调性等原则指导,进行综合考量,并结合其功能分区合理规划,着重突出其实用性和美学性一体化。^[16]

王伟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合理搭配服装和化妆两者的色彩是一门深奥的学问。美观不仅仅是简单地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而是要选择大众视觉上比较合理舒服的具有艺术性的色彩搭配,只有将化妆色彩和服装色彩相结合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整体的美感,有效提升每个人的个人魅力。为了使得化妆色彩能够与服装色彩的搭配

更加合理,一定要遵循色彩搭配的基本原则。^[17]

孙宇认为,新时代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的发展,需要加强对环境艺术设计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具体流程的了解,并找准学科以及教育的定位。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的时候需要联合信息化技术进行教学,有利于加强学校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为了进一步提高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效果,必须要改革教学方式,树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这样才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加优秀的人才,也有利于提高学生自身的专业能力。^[18]

代秀峰、刘涛认为,校园文化墙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宣传校园文化、展示校园精神风貌、推动文明校园创建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校园文化墙的设计要围绕学校文化做好设计大纲的编排,在版面设计、色彩设计和展示尺度上要运用一般展示设计的规律和规则,结合校园文化墙内容、形式、展陈空间的特殊性,统筹规划、合理设计。^[19]

李昌浩认为,环境设计课堂教学方法研究,主要基于环境设计专业创新改革基础上,对其进行现代化调整。针对环境设计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解决,并且以开放式互动教学法为载体,创新教学模式,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教师与学生交流的方式将课堂教学价值发挥到最大,以此来提高环境设计专业教学质量。^[20]

(三) 书法理论

刘宗超、范宇光认为,林语堂的书法美学观和同时代的宗白华、邓以蛰以及稍晚时期的李泽厚有所不同。宗白华、邓以蛰关注中西对比,李泽厚强调中国本土特色,而林语堂站在书法的中国美学诠释和西方人接受心理的双重角度来阐释书法美学,对中国书法文化的国际推广有深远的意义。林语堂以西方抽象画为参照来欣赏书法的笔墨形式,并且指出了书法的核心范畴是“动”,这种独特的角度既是用中国传统的美学阐释书法,又符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当今,中国传统文化正处在国际推广的大潮中,林语堂的书法美学观点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价值。^[21]

刘宗超认为,中国书法近70年的发展史,从整体上说,无疑从属于中国社会的总体进程。这段历史,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

程;同时在体系内部,“传统”与“现代”也在对立与互动中运行。这段书法历史,自觉精进,走过了多姿多彩、轰轰烈烈的创变之路。^[22]

赵生泉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者对西夏文草书的解读主要循“艺术”和“文字学”两个不同维度展开;在掌握大量俄藏写本社会文书资料后,相关研究渐次铺开,并表现出历史、文字学、书写等3个不同研究倾向,成为国际化的西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3]

何林英认为,俗体隶书是汉代隶书的主要类型之一,它不仅发展培育出标准的八分隶书,而且还孕育衍生着楷书的成长。俗体隶书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楷书从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24]

韩宏宇、张惠、王迎杰、康辉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上不断沉淀的思想、风俗、意识形态的总体表现,高校是文化传播和交流、实现资源和资讯共享的主要平台。书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代以来都受到各个阶层的推崇,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书法已经成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宣传媒介,对弘扬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5]

二、音乐学

(一) 音乐教育

齐易认为,音乐节集艺术性、学术性、教育性于一体,已经成为国内优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交流展示的平台。从2006年首届智化寺音乐节至今,这个以展示和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促进民间乐种活力为宗旨的音乐节,在全社会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社会影响日益扩大。^[26]

王丽娜、张红娟认为,高等院校通识音乐教育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在通识音乐课程中应树立审美教育为核心的教学理念,以音乐及相关艺术学科为轴心,发展新人文教育,不断整合音乐及其以外的学科资源,创建新型教学模式,架构起音乐与文化、艺术与科学的桥梁,让学生在开放的音乐实践活动中能动地发现未知、激发想象力,进而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27]

王晓北认为,音乐学的美学转向,既是对传统的音乐学内部研究模式的一次革新,也迫切需要给予各种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的重新认识和定

位。当下的音乐学、美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思考审美、音乐学与文艺美学、哲学、美学之间的融通关系,进而探索出一条从美学视角来研究确定音乐学、美学理论的互文式发展的学术新路径。^[28]

常江涛认为,近些年音乐学界整体研究进入瓶颈期,“模式化”“套路化”“重描写,轻问题”现象严重,学术成果普遍缺乏问题意识,当下音乐学领域研究的困境或许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其能否突破旧有的研究误区和弊端。^[29]

陈瑶、孙涛认为,随着我国高校不断扩大招生,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音乐教育(学科教学)方向研究生基层就业还面临一定的问题和困难,要以教育教学为出发点,引导音乐教育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积极到基层的单位就业,学以致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30]

孙华认为,音乐活动在整个幼儿园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游戏可以开发儿童的智力,符合幼儿天性。在进行幼儿园音乐教育游戏化活动组织过程中,教师要提升自身的音乐素养,掌握基本的音乐技巧。要发挥幼儿主体作用,积极设计出喜闻乐见的音乐游戏活动,激发幼儿的积极探索意识,让幼儿能够感受音乐、享受音乐,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习音乐的快乐。^[31]

胡虹娟认为,音乐和人类息息相关,更是幼儿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文化领域。音乐活动不仅能给幼儿带来身心愉悦,对于其心智发展也有不可或缺的教育意义。提高幼儿的音乐赏识能力,加强幼儿的音乐审美情趣,如何让幼儿教师在玩的过程中教会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更好的启发他们智力,是我们学前教育工作者不断要研究探索的目标。^[32]

齐晓芳认为,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技术在音乐创作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在动画音乐制作方面日益凸显其低成本、传播快的优势,数字化音乐数量呈现急速增长的态势。但目前国内动画音乐产业的人才供给情况不容乐观,尤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动画音乐人才。^[33]

张娟认为,燕赵地区传统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发展创新的新挑

战,如何保持燕赵地区传统戏曲沿着创新而不失规范性的良性发展趋势,是需要整个社会各方协作完成的重要任务。燕赵地区传统戏曲本体创新的重中之重是要保持传统戏曲精髓的传承的规范性。燕赵地区传统戏曲本体创新的核心是培养专业的人才继承该地区传统戏曲表演和创作,不偏离传统戏曲本身的特性,在此基础上融入现在素材,利用网络科技扩大对燕赵地区传统戏曲的专业化的宣传。〔34〕

李响认为,从整体上来看,影视音乐在大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影视音乐中的一部分内容与大学音乐教学内容有相似之处,筛选出这些对教学有用的内容,一方面实现了时空的互补,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大学音乐课堂教学质量。相关音乐教育工作者要利用好影视音乐,以培养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和音乐创作能力。〔35〕

吴迪、郭丽微、罗畅认为,在钢琴教育中,不仅要將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中,还要將西方文化也适当融入进去,这样才能促进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互补,进而通过这种互补来提高学生的认知,并在此过程中实现钢琴文化在我国的平衡发展。〔36〕

张佳硕、乔春霞认为,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可归纳为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和文化理解三个层面,核心素养渗透到了音乐课程的方方面面,使不同模块的学习、教学评价体系的建立和教师的教学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37〕

(二) 声乐理论

王华君认为,声乐主要以演唱和表演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主体对知识进行拓展式教育,提升学生对音乐领域的认知度。通过为学生构建多元化教学体系,可有效提升学生的演唱能力和舞台表演能力。〔38〕

王华君认为,舞台表现力的培养是声乐演唱教学重要内容,是决定演唱氛围与效应的重要因素。演唱者在声乐演唱中,具有良好的舞台表现力,能够营造现场表演气氛,带动人们情感,使曲目深入人性,进而使人们情感与声乐作品情感形成共鸣。因此,在声乐演唱教学中,重视舞台表现力的培育十分重要。〔39〕

张伟认为,河北作为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主战场,曾经产生并传唱了大量的抗战歌曲,这些

歌曲不仅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中的宝贵财富,而且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舍身救国、坚持到底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仍是激发全民族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有力武器。〔40〕

王雪松认为,目前在高师院校及社会音乐团体的声乐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声音形象的示范和作品情感的引导普遍采用“意念教学法”。此方法在声乐教学实践中有着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在声乐教学中应适当将“机理教学法”融入其中,使之成为声乐教学的有力补充。〔41〕

在我国声乐文化的传播历史进程中,声乐教学活动是极为重要的传播方式,在不同时期也具有特定的传播模式,在声乐教学活动的传播过程中,整个教学活动都离不开“传”“受”和“信息的发送和反馈”三个方面,声乐文化从教授者处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发送信息,学习者通过视、听等感官接受信息,双方对信息进行反馈和处理,但与其他传播现象相比其传播内容具有特殊性。〔42〕

王鑫、孙晓丹、周慧敏、韩少阳认为,传统音乐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受到当前信息社会的制约,但实际上传统音乐与信息化社会是能够共存发展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音乐文化产业的兴起逐渐带动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对于各个地区而言,就需要充分挖掘当地的传统音乐文化资源,打造传统音乐文化品牌,提高文化竞争力,形成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音乐文化项目,迎合市场的发展需要,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43〕

刘建霞、乔春霞认为,风格多样性的声乐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在声乐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具备扎实声乐基础的同时,也拥有更加多元化的声乐演唱能力。在高校教学中探索声乐风格多样化,正是基于这种背景的影响,使学生能够在学习期间掌握丰富的声乐演唱风格,为今后的发展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尝试不同风格的声乐演唱,也有助于调节枯燥的声乐训练,激发学生学习声乐的兴趣,做到情感与思想的共鸣。〔44〕

(杨春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杨灵敏.抗战时期桂林油画艺术发展探析[J].歌海,2019(4).
- [2] 杨灵敏,聂道汨.新时期河北中国画发展述评(1978—2018)[J].歌海,2019(5).
- [3] 杨柳,郝建文,张吟.蔚县壁画研究[J].美术观察,2019(2).
- [4] 祁凤霞,李婷.新媒体时代动漫卡通角色设计与应用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9(15).
- [5] 张艳梅.河北高校动漫教学模式改革探微[J].美术观察,2019(8).
- [6] 孟庆军,王建辉.论美术人才计算思维培育——评《计算机视觉特征提取与图像处理》(第3版)[J].中国科技论文,2019(12).
- [7] 刘志蕾.论宋代山水画与人文思想的审美相通性[J].文化产业,2019(8).
- [8] 李凯月,张志强.我国中小学美术教科书中西方绘画作品的研究与分析——以浙江美术出版社1—5年级美术教科书(2012)为例[J].邢台学院学报,2019(1).
- [9] 蒋丽.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学改革思考[J].才智,2019(15).
- [10] 刘佳,孙萌.艺术文化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有效途径探索——以艺术彩绘形式为例[J].艺术评鉴,2019(13).
- [11] 孙伯航,佟雪霁.魏晋南北朝画论中的审美观影响中国园林范式研究[J].教育教学研究,2019(42).
- [12] 邢晓静.“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校美术教学——评《新编美术教学论》[J].高教探索,2019(7).
- [13] 田瑾,孟庆军.美育视域下设计教育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新探索[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14] 张净.符号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和创新[J].现代园艺,2019(12).
- [15] 蒋丽.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与探究[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19(13).
- [16] 冯瑞霞.城市公共设施色彩规划探析[J].新西部,2019(35).
- [17] 王伟.时尚设计专业色彩教学漫谈[J].才智,2019(22).
- [18] 孙宇.信息时代背景下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改革探讨[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9(6).
- [19] 代秀峰,刘涛.大学校园文化墙设计方法探析[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9(4).
- [20] 李昌浩.环境设计课堂教学方法的研究[J].读与写(教师),2019(9).
- [21] 刘宗超,范宇光.林语堂的书法美学观[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22] 刘宗超.新中国书法70年回眸:复兴传统与探索现代[J].艺术市场,2019(10).
- [23] 赵生泉.四十年来西夏文草书研究的回顾与分析[J].西夏研究,2019(1).
- [24] 何林英.从汉代俗隶看楷书的形成[J].汉字文化,2019(9).
- [25] 韩宏宇,张惠,王迎杰,康辉.传统文化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以唐山学院“翰墨致远”书法品牌为例[J].艺海,2019(4).
- [26] 齐易.古老寺院鸣雅乐——传统瑰宝耀京城——北京智化寺音乐文化节的特点与意义[J].艺术评论,2019(7).
- [27] 王丽娜,张红娟.大学生通识音乐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新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4).
- [28] 王晓北.论音乐学的美学转向——从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伟大”理念中得到的启示[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5).
- [29] 常江涛.区域音乐视角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探讨——第三届燕赵音乐文化研讨会述评[J].人民音乐,2019(1).
- [30] 陈瑶,孙涛.音乐教育研究生(学科教学)基层就业导向研究[J].艺术评鉴,2019(3).
- [31] 孙华.浅谈幼儿园音乐活动游戏化[J].文化产业,2019(23).
- [32] 胡虹娟.幼儿音乐活动教学研究——玩出来的课堂[J].邢台学院学报,2019(1).
- [33] 齐晓芳.动画音乐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现状分析[J].艺术评鉴,2019(18).
- [34] 张娟.燕赵地区传统戏曲的本体创新思路研究[J].大众文艺,2019(13).
- [35] 李响.探讨影视音乐对高校音乐教学的辅助作用[J].黄河之声,2019(1).
- [36] 吴迪,郭丽微,罗畅.基于文化视角下中国钢琴教育平衡发展的理论思考[J].北方音乐,2019(3).
- [37] 张佳硕,乔春霞.核心素养指导下音乐课程标准的新思路[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38] 王华君.高校声乐演唱与表演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北方音乐,2019(15).
- [39] 王华君.声乐演唱教学中舞台表现力培养策略分析[J].艺术评鉴,2019(13).
- [40] 张伟.河北抗战歌曲艺术特点与价值研究——基于抗战老兵张铁军的“忆唱”[J].当代音乐,2019(6).
- [41] 王雪松.“意念教学法”在声乐教学中的实践优势及问题对策[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2).
- [42] 王雪松.声乐教学活动在声乐文化传播中的“模式”探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5).
- [43] 王鑫,孙晓丹,周慧敏,韩少阳.传统音乐文化资源产业化建议及其研究[J].北方音乐,2019(3).
- [44] 刘建霞,乔春霞.高校教学中声乐风格多样性的演唱模式探索[J].黄河之声,2019(4).

历史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

魏建震 冯金忠 陈瑞青

2019年,河北省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数量较以往有较大的萎缩,尤其是先秦秦汉史研究下滑严重,其重要原因是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老一代史学家开始退休,而新一代古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影响力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下面将对201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先秦、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宋元明清几个历史时段的研究概况进行概述。

一、先秦史研究

2019年的先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史方面,历史史实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一) 史学理论研究

2019年的史学理论研究,成绩突出的是李长银先生关于古史辨研究的成果。李长银先生发表《“史学上的中央题目”:“古史层累说”再探讨》一文,对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层累说”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作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古史层累说”可以说是无法绕开的革命性创说之一。关于此说的来源,确如学界所认为的,起于崔述的《考信录》,但尚须补充的是,两者之间的这一学术因缘,与梁启超的《五千年史势鸟瞰》以及李泰棻的《中国史纲》密不可分。至于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古史层累说”,除了自觉地接受了前人尤其是崔述的“疑古”成绩外,更在于其能够有效地汲取近代的“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此说问世之后,不仅得到了“疑古”派的支持和认可,还对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的其他学术流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

关于崔述的古史研究与古史辨的关系,李长银发表《崔述的“考信之学”与“古史辨运动”》一文,提出“清儒崔述不仅是宋代之‘怀疑精神’的传承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正是受到了崔述《考信录》的启发,才正

式提出了‘层累说’。之后,‘古史辨运动’转向‘古书辨’,张寿林、钱穆等‘古史辨’派学人又从《洙泗考信录》以及《读风偶识》等著作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从而打破了‘孔子作《易传》之说’以及‘孔子删《诗》之说’。最后,‘古史辨运动’又转回‘古史辨’,顾颉刚又受到崔述《考信录》中‘驳五德终始之说’的暗示,撰写了著名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总之,崔述的‘考信之学’是‘古史辨运动’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本土学术资源之一。”^[2]

此外,李长银先生还对罗根泽先生的《老子》研究进行了评述。作者认为,在中国老学的近代化历程中,老子及《老子》书的年代之争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在论争中,罗根泽不仅提出了“老子就是太史儋”“老子的年代在孔、墨之后,孟、庄之前”以及“《老子》书确是一本专著,不是纂辑”等一系列颇为独到的一家之言,还对“历代学者考订老子年代总成绩”进行了提要钩沉,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非常棘手的学术问题。在中国近代老学史上,罗根泽的老子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客观存在。^[3]

(二) 先秦史实研究

在先秦史实研究方面,张翠莲先生对商代起源进行了新的探索。她发表的《商先公踪迹与商人起源考》一文,利用二重证据法,对商先公踪迹和商人起源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由《商颂》等先秦典籍和相关出土文献的考证,大致可以勾画出商早期诸先公的活动地域:始祖契的足迹可能涉及今豫东鲁西和冀南两个区域,昭明大致活动于冀南一带,相土则在豫东鲁西地区,王亥、王恒和上甲微时期的活动范围集中在冀中南地区。综合来看,商早期诸先公的活动地域当在太行山至泰山之间的古黄河下游地区,商人的起源地也应大致在这一地域范围

内。目前考古学界比较集中地认为分布于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属于中晚期先商文化,而相当于早期商先公时期的早期先商文化,亦即下七垣文化的渊源文化,在考古学探索上至今还没有集中明确的发现,但下七垣文化的原始构成因素则分别见于太行山西麓到泰山脚下的数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和岳石文化之中。这一地域乃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商人起源地所在,此与古文献考证出的商人起源地范围相较虽略有差异,但并无根本性错位,因此可以说二重证据基本互相印证。商早期先公活动区域较广的特点与早期商人屡迁有直接关系,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古文献考证还是考古学探索,均不能勾画出早期商人迁徙的详尽路线和早期商族文化形成的具体轨迹,此乃今后考古学探索及商人起源研究的重要方向。即使如此,将商人起源地大致锁定于太行山至泰山之间的古黄河下游区域,仍是目前商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收获。^[4]该作者发表的《商族探源在争论中走向第三次突破》,^[5]可以参看。

在中山国历史研究方面,何艳杰先生发表《战国行唐故郡墓葬研究》一文,对新近发掘的战国行唐故郡墓葬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战国时期今石家庄地区存在众多的北方部族,建立中山国的鲜虞族是其中之一。战国早期行唐故郡墓群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另一个消失的白狄部族的墓葬情况,众多的殉牲、积石墓、实用组合铜器随葬、附葬车马坑、东向的墓向等一系列葬俗,既显示了浓郁的北方丧葬风俗,也体现了中原华夏葬礼的影响,实证了战国时期华夏与戎狄、北方与南方之间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是战国时期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见证。^[6]

在先秦史实研究方面,张海先生发表的《西周东国之“侯”与东土边域的形成》可以参看。^[7]

(三) 先秦思想史研究

2019年的河北先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先秦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法家和道家研究上。

在《周易》研究方面,李振刚教授发表了《从〈易〉“数”看原始思维的哲学突破》一文,对易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李先生认为,《周易》的思维枢纽在“数”,它是《周易》卦

爻辞形式化、理性化的内在根据;通过《易传》对《周易》本经的语义转换和理论提升,《易》“数”摆脱原始思维“象数互渗”的神秘性,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范式。从内因说,“数”助推了《周易》古经文本的形式化、理性化;从外因说,又离不开《易传》对《周易》“筮数”原始思维的哲学突破。《周易》数物相生的思维方式实与现代“大数据”原理相通。^[8]

在孔子研究方面,苏俊霞先生发表《论孔子的幸福观及其现实意义》一文,对孔子的幸福观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作者认为,幸福是人生的一个永恒主题。孔子对幸福内涵及幸福实现路径进行了思考。在孔子看来,幸福是学习知识,幸福是拥有利益,幸福是拥有美德,幸福是拥有名声,幸福是拥有生命。孔子提出的幸福实现路径包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以其道得之、修德和重视养生等等。孔子的幸福观对于当今社会人们正确幸福观的树立,对于人们正确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对于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9]

在荀子研究方面,孙俊霞发表《荀子从人性改造角度探讨治国方略的当代启示》一文,认为荀子在批判地继承儒家重礼思想和法家重法思想基础上,提出隆礼重法的治国方略。荀子基于人性改造的需要而提倡隆礼重法。荀子对人性与隆礼重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为我们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思路。^[10]

2019年,先秦法家思想研究取得较丰硕成果。戴木矛发表《韩非君主观论析》一文,对韩非君主观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认为,韩非的现世君主观实现了对君主理解的转向,将先秦时理想的君主拉回到现实。作者指出,韩非认为君主的现世治理以道为依据,虽然以君臣关系为核心,但又不忽视人民,同时韩非理解中的君主具有非人格化特征。韩非试图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中人之治的治理模式,反对智治和德治。虽然韩非“术治重臣”的政治主张是以加强君权为核心的,但这只是过程性目的,其终极性目的是君主为国而治。韩非的这一论断建立在不稳定的“君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现实中则常常出现“君国分离”的情况,此时君主强权下的人民会受到很大压迫,而这一点是超出韩非预期的。^[11]

对先秦法家政治哲学,胥仕元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胥先生发表《先秦法家政治哲学的时代性》一文,认为先秦法家政治哲学反映了先秦法家的主要代表有关政治问题的实质、政治价值取向、政治理念的基本认知。这些认知在战国时代表现为变法图强、图霸,追求富国强兵。在帝制时代,成为统治集团治国理政、用臣治事的重要理论指导。在当今时代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先秦法家政治哲学中“为天下”的行政理念、“定名分”的规则意识、“一断于法”的正义观等,均有其重要的借鉴价值,值得扬弃后加以吸收,服务于当今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12]该作者发表的《先秦法家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一文,认为法家先驱管仲,始祖李悝,主要代表人物申不害、商鞅、慎到、韩非等,在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断于法”,主张威权政治和强国弱民的基本认知。“一断于法”反映了法家的正义理念和崇尚“法”之权威的倾向。主张威权政治的重心在于对君权至上和君主集权的特别肯定和维护,在此前提下,法家代表为君主威权政治的构建和实施提出了驭臣治官的重要措施和策略。强国弱民是法家独特的价值认知,作为先秦时期变法强国的主要倡导者,法家大多有重农强国的愿望,因此,对农业的重视是他们的不二选择。此外,管仲、韩非等对发展商业兴邦也有独到的认识。与主张国强相反,“弱民”成为法家价值取向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控制民之言行,从而使民完全成为服务于君主的工具是他们的共识。法家代表的这些认知付诸实践,对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法治的理念、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等措施也有值得当今借鉴的成分,但由“一断于法”而衍生的“严刑峻法”从而达到“弱民”的治理理念则不可取。^[13]

在道家思想研究方面,许春华发表《老子之慈释义》一文,对《老子》文本中的“慈”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认为,“慈”乃《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与孔子之“仁”的不同之处在于:“仁”按照“亲亲”—“仁民”—“爱物”的次序推己及人、由内而外,以“自觉”为法则,着力践行,追求道德理性;“慈”侧重悲悯挚爱,以“自然”为法则,惟其无心无为,旨在淳朴本然。“孝慈”作为《老子》版本的

“思想聚焦”现象,其价值在于,以“孝”之自然情感强化“慈”之天性本然,“慈”对“爱”是一种超越且含摄的逻辑关系。“慈”之义理蕴含了性质、内容、工夫三重维度,证解了“慈”之核心概念的哲学意义,透视出老子道家立场独特的思想旨趣:“慈”性为“道法自然”之天性,“复守其母”之德性;“慈”心为淳朴挚爱之“赤子心”,呵护众生之“同情心”,无所偏私之“悲悯心”;“慈”以“辅万物之自然”之工夫臻至生命精神的永存与生命价值不朽之境界。《老子》以天性、挚爱、本然、醇和、惠柔、同情、悲悯等元素构成的“慈”之思想整体,与孔子之“仁”共同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民族精神之中。^[14]

在先秦思想史研究方面,刘琪所著《先秦名辩学中的辩证思维研究》,值得参看。^[15]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

2019年,河北史学界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史、社会史、历史地理等领域,社会科学诸学科交叉,特别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密切结合是其中一个突出特点。

(一) 经济史研究

贾丽英利用简牍资料对秦汉至三国吴的“訾税”进行了考察。她指出,简牍文献中“訾”与“赀”是不通用的。“訾”表资财,“赀”表赀罚。訾税,即按照资财的价值或数量多寡征纳的一种税。岳麓书院藏秦简反映秦的赋税制度中已有针对普通吏民的訾税,后经两汉至三国吴始终未废。不过其征纳程序有一个逐步简化的过程。秦时通过自占家訾,以资财数额多少按比例征。至汉以“算”为征收单位,王莽时期有短暂的“訾三十而取一”。西汉抽“算”的方式灵活,数额和次数不固定,东汉中后期才逐渐固定为万钱一算,每算120钱。东牌楼东汉简和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简中的“訾”,是“訾算”的简称,为征收訾税而设。目前公布的材料显示分10个额度征收。汉武帝时的“以訾征赋”、吴简中的“户品出钱”均为据资产而征的税目,但不是訾税,它同秦汉史料中的“户刍”“户赋”一样,性质上属户税。^[16]

钱币史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朱安祥对两晋时期仍沿用旧币而未铸币的原因进行了

探讨。^[17]两晋时期有一种面文为“十朱”的圆形方孔铜钱,传世典籍与诸家泉谱均未收录,学术界对此也鲜有关注。朱安祥指出,十朱钱出现于三国两晋时期,它并非流通货币,其性质应与今天的砵码相同,具体作用就是在两晋社会实际商品交换过程中,用来精确称量各种货币的重量,以实现顺利称重交易之目的。^[18]北周政权先后铸造、发行了三种面文不同的虚值铜钱,即“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朱安祥通过考察北周政权的财政状况,认为发行大面额虚值货币是统治者故意为之的一项货币政策,这种虚值铜钱背后产生的巨额利润差使得北周在与西域诸国商业贸易中,赚取了更多的利益,并快速积累了国家财富,最终为北周统一北方奠定了经济基础。^[19]

(二) 社会史研究

社会史为近些年的一个研究热点,其中乡村社会史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谷更有《太行山东麓的古村落及其历史文化研究——以井陉域内为中心》一书系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太行山东麓的古村落及其历史文化研究——以井陉县为中心”的最终成果。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中国历史上村落的形成及其变迁——以唐宋为中心的考察;第二章太行山东麓地区及该地域古村落概说;第三章井陉域内的古村落概说;第四章井陉县域古村落考古及文物考察;第五章井陉域内古村落的形成类型及历史文化考察;第六章井陉村民传统生活的日常和精神世界。该书虽长时段考察,但研究重心和创获点主要集中在唐宋时期。它从太行山东麓的古村(聚)落入手,进而探讨与此相关的历史文化,以小见大,从乡野的角度呈现了民族和国家发展变迁的大历史。以井陉域内古村落为研究个案,重点分析了井陉域内古村落的发展历史及其演进轨迹,尤其对古村落的形成与社会构成、村民的生活日常与精神世界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20]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不少反映唐代乡村社会状况的资料。谷更有依据目前已刊布的敦煌文献和吐鲁番出土的户籍、契约文书和书信,特别关注了均田制下村民社会的经济状况、村民生活中的经济活动和村民社会构成的贫富分化,以期通过援引文书中记载的人及其日常经济

活动,更加直接地反映长时段内唐代村民经济身份变迁的事实和过程。他指出,通过唐代近300年乡村社会的裂变,可以看到另一种事实:对村落社会的掌控,从北魏前期地方豪族对村落的宗主督护,到孝文帝时的“三长制”改革,直至唐初设置行政村后,村落逐渐变为由里正、村正等为代表的国家掌控;但随着均田制的废弛,村落开始变为由各种富民势力来掌控。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村落的地缘认同。宋代以后,随着民间宗族势力的兴起,村落的血缘共同体性质日渐凸显,村落已与以往的聚落、坞堡有所区别,日益成为村民心目中生死都难以割舍的家乡。^[21]

谷更有指出,唐宋时期的村落已具有浓浓的“家乡”表征,但这一村落家乡的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城居”和“里居”是战国、秦汉时期比较普遍的居住方式,此时的城中和里中更多呈现出一种“父老—子弟”关系。散居于城外、里外的“聚”,其实可能是由于垦殖或其他原因形成的并不太稳固的居住场所,还不具有当时人的“家乡”的概念。此时人的家乡观念更多地是指某里或某邑。坞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之外的最主要的居住形式,是战乱时期避险的产物,是非正常时期出现的一种防卫型的居住形式。其形成的独特背景,坞主与坞民的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难以形成“恒产者有恒心”的家乡观念。这也是坞壁与后世的村落有很大不同的根本区别。隋唐以后,村落渐成为乡村最普遍的居住方式。从有限的关于记载村落的文献中发现,其时的村落已不是随遇而安的居所,已有了选址而居的“卜宅”理念。从先秦到宋时期“卜城、卜宅”的历史变迁,也能观察到2000多年以来社会的变化。通过“卜”的方式选择的宅兹家乡,可算是唐宋及其以后时代村落的最重要表征。^[22]

(三) 历史地理研究

2004年2月,湖南郴州出土的一批晋简中有两枚单简三行文字的简牍,其内容涉及西晋桂阳郡下辖便县和晋宁县的县令姓名、城墙长度高度位置及距桂阳郡江州京城里程等内容。孙继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定这批晋简年代在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至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之间,其性质除了桂阳郡“上计阶

簿”外,还有“祠先农祝文”和“祠社稷祝文”,而且“上计阶簿”至少应有两份,两枚单简三行文字简即“上计阶簿”的残存内容。本文经过考订认为,“上计阶簿”内容表明,西晋时期地方官府已经形成政区治所道里的报告制度,这一制度在《晋书地道记》的残存内容和近年出土的十六国后赵元氏界石中都有体现。由此可见,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四至八到”制度有关政区治所(包括两京)道里的书写方式至迟可以追溯至西晋时期。^[23]

魏晋之时,兴起了“地记”这一著述形式,其内容兼有人物传记与地理风俗两大部分。马燕鑫指出,魏晋地记编撰的繁荣,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理念、题材、修辞等方面均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地记编撰中所形成的文化意识和观察视角,潜移默化地重构了作家的创作思路和体物方式。该作者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地记学者的文学作品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地记的内容和格局。这些作品在创作动机和题材上将地记与文学融合起来,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魏晋六朝文学与地记存在着密切关系,它们是魏晋时代文化同一性的不同表现形式。^[24]

永济渠,是隋唐大运河的北段。常玉荣指出,隋唐永济渠的基本走向上承曹魏白沟,尤其是河渠中段,两者基本一致。隋、唐两朝永济渠的走向不同,主要表现在南段和北段。南段河道的不同主要因为上源的变化,北段河道的差异则主要因为桑干河的河道变迁。^[25]

潘艳蕊、顾乃武指出,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与唐代地志文献载录了大量的保定地区的人文遗存。这些人文遗存大体包括关隘、城邑、碑刻、寺庙、冢墓及亭台馆舍等。其地理分布具有不均衡性、随地理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特点,易县、定州则是前代人文遗存的主要分布地。发掘上述地志文献所载保定地区的人文遗存的历史价值,对发展保定县域人文旅游资源具有较高的价值。^[26]

墓志中地名资料十分丰富,赵镭饬、顾乃武利用唐代墓志对恒州乡里地名进行了研究。该文指出,唐代墓志中所见恒州地区的乡里村共19处,其中真定县有10处,石邑县有4处,九门县2处,平山县3处,存续至今的村落有3处。就其分布而言显示出了环绕大城市集中分布的特

点,可见唐代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聚落的变迁。^[27]

(四) 碑刻的个案研究

碑刻的纠史、证史作用已为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近些年随着碑刻的不断出土发现,碑刻的历史研究也形成了一个热潮。陶浚墓志最早见于《雒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为开卷第一件墓志,其出土时间和地点均不详。李樯对此墓志提出质疑,认为此墓志当为伪志,应是今人为鬻志石或拓本杜撰而成。他认为其中官职之误,代系缺失,文章、书法之拙是因作伪者学力不逮所致;错字的出现、月份的失漏或是作者有意为之。^[28]裴光庭是唐玄宗时期名相,近些年新发现一方裴光庭墓志。冯金忠对此墓志及其所涉及的裴光庭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该墓志内容丰富,许多内容较两《唐书》本传为详,不仅可以补充裴光庭早期仕历上的一些缺环,而且可以借以订正诸史籍中的一些舛异矛盾之处。裴光庭神道碑今虽存,但残毁严重,而且刻立时间较墓志为晚。如果将现存文集集中的神道碑文与此墓志相比较,便会发现在内容上颇有抵牾,可以互相参证补充。^[29]

三、宋元明清史研究

2019年,河北史学界在宋元明清研究领域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环境史、科技史以及宗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出版专著一部、论文集一部、译著一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一) 政治史与法律史

河北大学宋史中心汪圣铎教授《宋史探研》一书2019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作者近十几年来宋史研究论文22篇,总字数38.6万字,对宋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如王安石变法、宦官问题、朱熹的治国理念、漕运制度、官员俸禄、行政区划中的军、防贪治贪及审计等一一作了较深入的辨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对研究宋代政治史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30]

寇欢对宋代的乞留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乞留”就是民众或官员对于即将满任或离任的官员乞求留任。虽然统治者对乞留问题十分重视,但是对于这些乞留请求却不曾全盘答应,这

不仅是统治者对官员任职的全局考虑,更是对于统治秩序的维护。^[31]王海潮、常沁飞对宋代万言书进行了研究,指出宋代皇帝遇登基、自然灾害与灾异现象和国家危机等事项,为显示皇帝虚心纳谏的圣君形象和缓和民众焦虑情绪皆会下诏求言,这为宋代臣民呈递万言书提供了重要时机,宋代也有臣民主动上呈万言书陈述政见与诉求的情况。^[32]张春兰、祁玉勇利用《刘唐工墓志铭》,探讨了宋代中下层官员荫补制度。^[33]李欣通过《文昌杂录》所载熙宁五年(1072年)“文德殿视朝仪”与《宋会要》熙宁三年“文德殿视朝仪”以及与太宗、仁宗朝“入阁仪”等内容进行了对比研究,并指出其变化的内在动因。^[34]高云霄研究了金代官员除名制度,指出金代“除名”是对罪官的官职和爵位予以剥夺。在金代“除名”还可以表述为“除名籍”“除名为民”和“降为庶人”等形式,适用范围广泛,对于金代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道德风化都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35]

肖爱民对辽朝皇帝尊号中频繁使用“天”字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政治内涵就是“神道设教”,表明君权神授,统治获得了天神的护佑、辅佐,为皇位披上一层神圣的合法外衣。^[36]他还对辽朝追尊皇帝的成因进行探讨,认为辽朝追尊皇帝是依唐制进行的,与辽中晚期自称中国、自比于华夏、自视为正统的政治环境有关,是契丹统治者为了彰显王朝的正统性和政权来源的合法性以及皇位的神圣性等现实政治需要而进行的。^[37]侯昱认为辽朝作为由契丹人建立的王朝,在确立本政权正统性的过程中,对于正统的多种含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选择和利用,以满足自身统治的需要。^[38]耿涛则对辽世宗即位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扶余之变”以来契丹贵族政治斗争与辽世宗上位的关联,梳理太宗离世后众人各自的处境立场,重新诠释耶律屋质的复杂面相,在此基础上揭示出辽世宗即位后所面临的政治困局。^[39]

时亮认为明代职司吏部尚书者实有139名,除作为主体的正常任职者外,尚有知、兼、试、署、以大学士掌部事等重要补充形式。吏部尚书任职形式诸方面的变化,是明代官僚体制逐步完备的重要标志。^[40]李建武认为洪武末形成了以“二十四衙门”为主体的宫廷宦官组织,对宦官

的言谈举止、俸禄待遇、升赏降黜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完成了制度化和体系建设,成为有明一代的祖制家法。同时,洪武时期宦官的制度建设为明代宦官权势的扩张提供了可靠的保障。^[41]

关于军事史,史金波对西夏文军事文书进行了翻译和考释,认为这些文书反映出西夏不仅有以首领所辖军抄进行登录的军籍文书,而且有以溜和甲为单位进行登录的文书,也说明西夏对基层军事组织有多种检校、登录形式。在西夏,军抄与户籍相互渗透、交织,军抄与土地、牲畜等财产密切关联,将兵、民结合在一起,从社会层面反映西夏兵民合一的军事体制和管理特点。^[42]梁松涛则利用新发现的定州开元寺塔题名碑记材料,对北宋定州就粮禁军番号、驻军数量、分厢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真宗、仁宗朝定州驻扎的就粮禁军有云翼、忠猛、骁武、振武、武卫、神武六个番号,其中忠猛、骁武、神武番号正史不载其就粮禁军性质;就粮禁军以马军为主,其中神武、武卫在1040年前就分左、右厢;康定、庆历年间,定州就粮禁军来源主要是由地方军升为就粮禁军及直接招募。^[43]郑金波、梁松涛对北宋《石熙载墓志铭》进行了考证,指出石熙载的个人情况、家族世系、仕宦经历以及文学成就,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石熙载充任枢密使的条件,为北宋初期文臣充任武职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44]

王宏斌、耿健羽指出赶缯船是清代前期的主力战舰之一,也是风帆时代中国最优秀的战舰之一。在保卫海疆,征剿海寇的战斗中,赶缯船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建造制度的僵化,造船质量不仅不能与时俱进,反而逐渐退化,越来越不适宜海防斗争的需要。19世纪,在海寇战舰的挑战之下,赶缯船相形见绌,不得不退出海洋战争的历史舞台。^[45]耿健羽还指出清嘉庆时期,东南海匪出现了活动跨国展开、实力日益强悍和武器更加精良三大趋势,从而对清朝水师构成了强劲挑战。作为军事回应的重要手段,福建、浙江两省的水师战船进行了数轮更替。经过数十年的艰难探索,最终使大横洋船正式成为两省新一代制式战船,并最终借以消弭了东南海匪祸患。^[46]

关于法律史,高世伟认为两宋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重新组合,民众的法律心

理已由传统的畏讼发展到畏讼、愿讼、健讼共存的多种状态,与之相对,官员的法律心理也由传统的厌讼发展到厌讼、息讼、判讼共存的多重心理阶段,他们的心理状态共同构成了宋代官民法律心理的多重图景。^[47]张梦玥认为张耒的法律思想融合了简意相和的立法观,修德尚仁的礼治观以及看重人治的悯刑观。^[48]才俊良认为,辽道宗时,在“国法不可异施”的背景下进一步进行法制改革,统一地方司法审判方式,把死罪审判权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放弃辽法的二元特色,推行法律一体化。由于改革违背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加之地方司法审判能力缺失、吏治腐败等因素,导致改革以失败告终。^[49]程麒认为连坐制度作为刑罚的组成部分,在辽代的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籍设法贯穿辽代始终。辽代连坐制度体现了辽代法律蕃汉杂糅的特点,实行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辽代契丹贵族的统治。^[50]

(二) 经济史和环境史

张勇《宋代淮南地区经济开发若干问题研究》一书,2019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四章,总计18万字。该书选取宋代淮南地区经济开发进程中的水利、漕运、盐产为着眼点,对淮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加以考察,并选择淮南地区的泰州作为个案进行研究,试图揭示宋代淮南地区经济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贯穿线索。^[51]

美国学者许曼《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一书由刘云军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该书以“宋代福建女性”为切入口,关注其在地方社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跨越阶层、家庭内外的全方位、多角度考察,作者将女性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与性别网络中,探索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关注其在性别建构中的自身能动性。^[52]

关于宋代土地政策,姜密认为“不抑兼并”始终是宋代土地政策的大方向,它造成了兼并之事实;然而“不抑兼并”并不意味着放任兼并或者可以任意买卖土地,而必须以合法为前提。政府始终发挥其主导作用,用法律手段管理和调控土地的占有和流转,将土地有序地纳入到商品经济大潮中。^[53]张倩认为宋代乡村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下,依土地和资财

多寡所划“五等民户”,并将作为佃户的客户考虑在内,可分为“上户”“下户”和“客户”。将宋代乡村社会情态纳入社会阶层理论视角下,分析“上户”“下户”和“客户”所占比例及其生产经营方式和家庭生活之中存在的差别,有助于从微观层面深刻理解唐宋社会发展进步的宏观特征,全面把握宋代乡村社会运行机制生成相关的基本问题。^[54]刘新龙、刘秋根利用新发现的山西民间文献,对商号经营土地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商号不同于传统地主,它具有合伙因素,属于商人经营体制的创新,且商号的土地伴随商业资本的流动,不是世代占有。^[55]

崔玉谦对元丰库、元祐库、崇宁库、大观东库、大观西库、宣和库的设置时间、地点以及功能进行了研究。^[56]蹇雪认为宋代牛羊司既是一个政府机构,也是重要的畜牧业管理机构。牛羊司在规范国家礼仪制度、促进君臣关系和谐、加强各国政治关系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存在严重的冗费问题。^[57]

贾芳芳、姜莉认为宋代扬州的琼花和芍药誉满天下。东南都会特有的经济氛围令扬州的花卉种植在装点城市与生活之外有了经济的因子。花卉成为了古维扬商品经济繁荣、市井文化生活兴盛的重要表现。^[58]刘旭认为宋人对花卉的狂热喜爱催生出花卉食用、有偿观赏、花卉深加工等众多的花卉使用形式,花卉的消费在宋代十分引人注目。^[59]

关于商业与金融,刘秋根、刘娜认为,清代前期钱铺银号(也包括所谓“钱庄”)利用开发“钱票”“银票”等,可以融通资金,扩大资本规模。与此同时,商人运用钱铺银号所开“钱条”“钱票”还可以延长商业信用,扩大资金规模。这也反映出钱铺银号可以替商人、商品收付钱款。正是因为这些业务的开展,使钱铺银号本身表现出近代银行机构的某些特色。^[60]杨波、何慕明对清时期山西道商路上的山西会馆进行了研究,认为山西会馆最早建于晚明时期,晚明清初还有比较明显的家族和行业特征。清中叶之后,以盐、当、钱、铁和布等为主的各行业共同兴建山西会馆,沿商路会馆总体格局形成。山西道商路的山西会馆在名称称谓、商业史特征和神灵崇拜等方面均具有一些独特的区域特征。^[61]李昂认为明代张家口市圈兴起于隆庆协议签订之

后,随着互市贸易的逐渐繁盛,北方边境一改昔日的刀光剑影,蒙汉之间和平交流,张家口地区商业繁荣,茶叶之路初现雏形,更为后来张库大道的兴起奠定了基础。^[62]刘秋根、赵公智利用戏楼墨记,对清中期以来蔚县地方演剧活动进行了探讨,认为蔚州戏曲剧目以战争主题居多,其中既有本地的社火、秧歌、道情,又有河北梆子和北路梆子。从事长途贸易的山西商人之中的部分群体的经营及其商业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山西同乡戏班的在外演出活动以及梆子戏在异地的传播。^[63]

关于水利,廖寅指出在黄河流路上舍北保南,在流民流向上舍东保西,这是政治中心东移后北宋隐晦的首都战略。这一新的首都战略对京东社会带来了影响深远的负面后果,即常态化的河北流民。京东接受河北流民是对河患改嫁河北的变相补偿,京东“盗区”也以毗邻河北的曹州、濮州、济州、郛州、齐州一带为中心向四周延伸。金朝定都北京,河北、山东的河患与流民问题不复存在,京东特殊的“盗区”形象亦不复存在。^[64]郭志安认为北宋时期,黄河水情的复杂多变、火灾以及日常管理不善等因素都极易造成黄河桥梁的严重损毁。面对这种局面,宋廷采取多种举措对黄河桥梁进行维护,并建立起一套较为有效的奖惩机制,以利于黄河两岸人员通行和物资运输。同时,黄河日常守卫、人员、物资盘查的加强及桥梁税的征收,则进一步赋予北宋黄河桥梁更多的功能。宋廷对黄河桥梁的管理与维护日益完备,且其浓厚的军事功能更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65]周新富认为明清时期为保障山东运河水位采取了行政管理和工程管理等多项措施,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运河—湖泊(水柜)—河流—山泉济运一体,形成了完整的水源调控系统,对运河补给水源,调节水量起着重要作用。^[66]

关于环境,黄昌付认为宋代沙尘频发,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其发生频率较高。沙尘多发与当时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第三个寒冷期”气候的影响下,植被死亡、土地沙漠化,为沙尘天气提供沙源;过度开垦、伐木以及大量使用煤炭等人为因素破坏了生态环境系统,加剧了沙尘的发生频率。^[67]刘亚龙、李亚辉认为,雄安地区在历史上自然灾害多

发,尤其到了清代乾隆时期,无论是灾害的种类还是次数都有所增多。灾害的种类主要有四种:即水灾、旱灾、蝗灾、雹灾。雄安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二是人为原因。救灾既有灾前的预防又有灾后的赈济及蠲免等措施。^[68]

(三) 文化史和社会史

关于文学史,廖寅对《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的编纂与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名贤文粹》保留了630余篇独存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既可以增补名人之佚文,亦可以充实重大问题之史料。《名贤文粹》以及《播芳大全》还反映出了当时名贤观念的显著变化,即由南宋中期以前广义的名贤观念转变为南宋中期以后狭义的名贤观念。^[69]梁松涛、李鹏飞对西夏文《宫廷诗集》的性质进行了考辨,认为《宫廷诗集》与汉民族宫廷乐府歌辞的主要特点契合,有程式化的结尾套语,有雅俗形式杂言体句式运用,歌辞本身不是通过韵律,而是通过节奏和音乐来调整。西夏乐曲多受中原影响,其礼乐到元代仍有生命力,对元代礼乐制度有一定影响。^[70]

关于版本及文献价值,寇雅芳对《北梦琐言》版本进行了研究,认为最早的版本为陕刊旧版,属于这一系统的版本有孙道明抄本、吴岫藏本、叶万抄本、雅雨堂丛书本。古人多以雅雨堂本为善,今人则多以缪荃孙辑刻为善。^[71]程彩萍对《明孝宗实录》所载诏令价值进行了分析,指出《明孝宗实录》所载录的诏令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包括诏、制、敕、册、文、諭、令等90道,反映了弘治年间国家整饬兵备、治理水道、抚治安民等各方面措施,是目前可见研究弘治朝历史最重要的诏令类资料。^[72]刘昱枫指出明代藩府刻书,凭借其数量繁多,且种类丰富,质量精美的优点,被誉为明刻本中的经典代表。辽藩的刻书活动作为明代藩府刻书中的一大代表,校勘精准,版刻精美,纸墨精良,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独特的艺术价值。^[73]

关于方志编纂问题,李建武对嘉靖《雄乘》的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保存了雄县诸多珍贵史料,同时也开创了雄县地方志编纂的历史,万历、康熙所修地方志亦以《雄乘》为名。书中有大量关于雄县当时

现实问题的评论,体现了作者经世致用的思想。^[74]张楠以顺治、乾隆、同治、光绪四种《高平县志》为例,对清代地方志中对庙宇分类观念进行探讨,指出清代方志对庙宇的分类略有不同,总体上分为坛庙、祠祀和寺观三类,并非以佛道儒三教区分,更具有合理性。此外,县志中的分类方式反映的主要是当时士大夫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未必符合当时中国信仰状况的实际情况。^[75]

关于宗教问题,崔红芬、文健对英藏西夏文《无常经》残叶进行释读、版式考定和内容重新缀合,比较黑水城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汉文本的差异,并考察了此经典的现实意义。^[76]崔红芬还对黑水城出土的汉文写本《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传入西夏的时间以及来源等进行考证。^[77]梁韵彦对宋夏时期的佛经变相扉画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版刻艺术的奠基时期,具有独立的刻坊雕造经版,但尚缺乏专门画家从事版画创作。而对于宋夏时期的大量信众而言,这些佛经与变相并非阅读对象,更多的是作为佛事活动中的供奉用具。因此对于此期的大量扉画而言,从设计到阅读,变相扉画与佛经文本都是相互分离的。^[78]宋坤指出黑水城出土汉文佛教文献集中展现了宋、夏、金时期佛教信仰的不同面貌,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可进一步加深学界对这一时期佛教真实形态的了解。^[79]郭鹏宇、牛晓旭对山西岚县白龙庙宋代《敕赐灵渊侯庙碑》进行了考证,指出宋代地方龙神信仰背景、祭祀活动及官方对地方神祠的敕封等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地方神祠敕封背后隐藏的政治意蕴。^[80]曹金娜指出,清朝前期秘密教门活动非常频繁,此时也是传统社会中政府查禁及惩治秘密教门最为积极的时期。清代前期在治理秘密教门的过程中,清政府既取得一定成效,也出现了治理失误。雍正朝推行宽严并重的政策,坚持区分首从的方针,卓有成效。迫于形势,乾隆朝政策过于严峻,以致影响社会稳定。^[81]

关于医药史,梁松涛对黑水城出土的四则西夏文治风癩疮医方进行破译、考校,认为这四则医方既有内服方药,也有外用药物,其性质应为西夏民间偏验方,应为西夏民间医家所撰,在民族中医文献中具有重要地位。^[82]同时她还对俄藏

黑水城出土 6539 号的录文、释读及汉译文进行了研究,认为此编号的西夏文文献为《天医取师疗病吉日》《四季人神不宜灸》内容,主要记录灸疗时的诸多禁忌,其依据的底本与《太平圣惠方》卷一百有密切关系。^[83]

关于社会群体与家族,屈斌认为北宋初,国家初立,外敌虎视眈眈,纠纷不断,国内亦人心惶惶,叛乱不止。宋人笔记保留下来很多此间侠士的传闻轶事,其中尤以侠士柳开、张咏的轶事流传最广。入仕前,行侠仗义;入仕后,侠风依然,他们是宋初侠士的杰出代表。北宋的国家政策、社会状态造就了这些侠士轶事的书写与流传。^[84]李亚辉利用《蓝田吕氏家族墓园》中收录的吕氏家族 32 合墓志、墓砖,总结出吕氏家族的婚姻具有注重门第、择妻要求礼教、偏好与陕西本地家族联姻等特点。^[85]同时他还利用千唐志斋中收藏的王溥家族墓志,总结出王溥家族主要与以下四类联姻:皇亲宗室、开国功勋家族、科举世家、进士出身之人。在婚姻特点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表现出非常强的目的性,在于维护家族的社会地位与利益。^[86]

(魏建震: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冯金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研究员,陈瑞青: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李长银.“史学上的中央题目”:“古史层累说”再探讨[J].社会科学论坛,2019(3).
- [2] 李长银.崔述的“考信之学”与“古史辨运动”[J].东方论坛,2019(3).
- [3] 李长银.“因怀疑而思索”:罗根泽的老子研究述评[J].历史教学问题,2019(3).
- [4] 张翠莲.商先公踪迹与商人起源考[J].历史研究,2019(2).
- [5] 张翠莲.商族探源在争论中走向第三次突破[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7-30.
- [6] 何艳杰.战国行唐故郡墓葬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2).
- [7] 张海.西周东国之“侯”与东土边域的形成[J].海岱学刊,2019(1).
- [8] 李振刚.从《易》“数”看原始思维的哲学突破[J].哲学研究,2019(3).
- [9] 苏俊霞.孔子的幸福观及其现实意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10] 苏俊霞.荀子从人性改造角度探讨治国方略的当代启示

- [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20).
- [11]戴木矛.韩非君主主观论析[J].哲学动态,2019(1).
- [12]胥仕元.先秦法家政治哲学的时代性[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 [13]胥仕元.先秦法家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14]许春华.老子之慈释义[J].哲学研究,2019(1).
- [15]刘琪.先秦名辩学中的辩证思维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9.
- [16]贾丽英.秦汉至三国吴的“訾税”变迁[J].历史研究,2019(2).
- [17]朱安祥.两晋未铸币原因再探——兼及司马氏的货币政策[A].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0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18]朱安祥.“十朱”钱小考——两晋货币流通之一侧面[J].中国钱币,2019(2).
- [19]朱安祥.大收商估之利:北周货币政策初探[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20]谷更有.太行山东麓的古村落及其历史文化研究——以井陉域内为中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21]谷更有.唐代村民经济身份的变迁——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3).
- [22]谷更有.唐宋时期村落的表征与形成论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1).
- [23]孙继民.郴州晋简所见西晋政区治所道里制度初探[J].敦煌学辑刊,2019(1).
- [24]马燕鑫.魏晋六朝地记与文学书写[J].文学遗产,2019(2).
- [25]常玉荣.隋唐永济渠基本走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邯郸学院学报,2019(2).
- [26]潘艳蕊,顾乃武.《水经注》与唐代地志所载保定人文遗存的文献价值[J].河北科技图苑,2019(4).
- [27]赵镭饬,顾乃武.唐墓志所见恒州乡里村地名初探[J].中国地名,2019(6).
- [28]李檣.《陶浚墓志》志疑[A].李亚平,李俊卿主编.中国金石:第1辑[C].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9.
- [29]冯金忠,赵生泉.新见唐代裴光庭墓志及其相关问题[A].李亚平,李俊卿主编.中国金石:第1辑[C].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9.
- [30]汪圣铎.宋史探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31]寇欢.宋代的乞留与官方应答[J].商洛学院学,2019(1).
- [32]王海潮,常沁飞.宋代万言书研究[J].宋史研究论丛,2019(1).
- [33]张春兰,祁玉勇.北宋中下层官员恩荫入仕个案考释——以《刘唐工墓志铭》为例[J].保定学院学报,2019(1).
- [34]李欣.《文昌杂录》所见入阁仪与北宋文德殿视朝仪研究[J].殷都学刊,2019(4).
- [35]高云霄.金代官员除名制度探析[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9(4).
- [36]肖爱民.辽朝皇帝尊号中频繁使用天字的政治内涵分析[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1).
- [37]肖爱民.辽朝追尊皇帝及其原因钩沉[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2).
- [38]侯昱.试论辽朝对正统含义的选择和利用[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14).
- [39]耿涛.“扶余之变”到“横渡之约”:辽世宗即位始末考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6).
- [40]时亮.明代吏部尚书任职形式与名数考实[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Z1).
- [41]李建武.论太祖时期宫廷宦官的制度建设[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9(Z1).
- [42]史金波.西夏文军抄账译释研究[J].军事历史研究,2019(3).
- [43]梁松涛,刘会改.新发现题名碑记所见北宋定州就粮禁军考[J].中华文史论丛,2019(2).
- [44]郑金波,梁松涛.北宋《石熙载墓志铭》考释[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1).
- [45]王宏斌,耿健羽.清朝福建水师赶缙船兴衰探析[J].河北大学学报,2019(6).
- [46]耿健羽.清嘉庆时期海匪与闽浙水师战船之更替[J].河北学刊,2019(6).
- [47]高世伟.治理与共生——宋代官民法律心理的多重图景[J].宋史研究论丛,2019(1).
- [48]张梦玥.浅析张末的法律思想[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9(1).
- [49]才俊良.试论辽道宗的法制改革[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9(2).
- [50]程麒.辽代连坐制探析——兼与契丹籍设法比较[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9(5).
- [51]张勇.宋代淮南地区经济开发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8).
- [52]许曼著,刘云军译.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
- [53]姜密.论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与合法的土地买卖[J].河北师范大学学,2019(5).
- [54]张倩.社会阶层理论视角下宋代乡村民户析论[J].宋史研究论丛,2019(1).
- [55]刘新龙,刘秋根.清代鄂县商号泰来恒土地经营研究[J].农业考古,2019(4).
- [56]崔玉谦.北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诸皇帝年号财库设置考论[J].宋史研究论丛,2019(1).
- [57]蹇雪.宋代牛羊司相关问题研究[J].安康学院学报,2019(3).
- [58]贾芳芳,姜莉.宋维扬名花考述[J].河北大学学报,2019

- (6).
- [59]刘旭.宋代主要花卉消费形式[J].西部皮革,2019(16).
- [60]刘秋根,刘娜.清代前期钱铺银号银钱票[J].中国钱币,2019(1).
- [61]杨波,何慕.明清时期山西道商路上的山西会馆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3).
- [62]李昂.“互市”铺就通衢商道——明代张家口“市圈”的起源、发展和影响[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9(5).
- [63]刘秋根,赵公智.清中期至民国蔚县地方演剧活动管窥——以202条戏楼墨记为中心的考察[J].河北大学学报,2019(4).
- [64]廖寅.首都战略下的北宋黄河河道变迁及其与京东社会之关系[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1).
- [65]郭志安.论北宋黄河桥梁的维护与管制[J].保定学院学报,2019(4).
- [66]周新富.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水源管理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9(13).
- [67]黄昌付.宋代沙尘天气及其影响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19(6).
- [68]刘亚龙,李亚辉.论乾隆时期雄安三县的自然灾害[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9(2).
- [69]廖寅.《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的编纂与价值发微[J].文学遗产,2019(6).
- [70]梁松涛,李鹏飞.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宫廷诗集》性质考[J].宁夏社会科学,2019(6).
- [71]寇雅芳.《北梦琐言》版本考略[J].邯郸学院学报,2019(1).
- [72]程彩萍.《明孝宗实录》所载诏令及其价值探析[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4).
- [73]刘昱枫.明代辽藩刻书考[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3).
- [74]李建武.嘉靖《雄乘》史料价值探析[J].中国地方志,2019(4).
- [75]张楠.清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庙宇分类与观念研究——以四种《高平县志》为例[J].社会科学论坛,2019(6).
- [76]崔红芬,文健.英藏西夏文《无常经》考略[J].敦煌研究,2019(2).
- [77]崔红芬.黑水城出土《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考[J].西夏研究,2019(1).
- [78]梁韵彦.制作史视角下的宋夏“一段式”变相扉画阅读顺序再探[J].西夏学,2019(1).
- [79]宋坤.四十年来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西夏研究,2019(1).
- [80]郭鹏宇,牛晓旭.岚县白龙庙《敕赐灵渊侯庙碑》考释[J].史志学刊,2019(5).
- [81]曹金娜.清前期政府治理秘密教门政策变迁研究——以罗教为例[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
- [82]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四则治风癰疮医方考述[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19(1).
- [83]梁松涛.黑水城出土6539号西夏文《明堂灸经》考释[J].敦煌学辑刊,2019(3).
- [84]屈斌.宋初侠士轶事的历史书写、流传及意义——柳开、张咏的个案研究[A].新宋学(第八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 [85]李亚辉.北宋蓝田吕氏家族仕宦、婚姻与兴衰研究[J].西安航空学院学报,2019(4).
- [86]李亚辉.北宋王溥家族世系与婚姻考论[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王坚

2019年,河北省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取得了较为可喜的学术研究实绩,为繁荣全省人文社会科学做出了应有贡献。研究成果数量、质量整体较高,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而且,研究范围有所拓宽。

一、政治史研究

(一) 政治人物研究

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近现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王宏斌对孙中山最大幸福观进行了探源,认为,在既往的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

的研究成果中,人们很少关注其与英国功利主义的思想联系。仔细阅读其相关论著,可以发现孙中山先生不仅接受了英国功利主义代表人物的基本概念,而且承认功利主义的原理,还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贯彻于其民生主义的主张之中。孙中山先生海纳百川,他的民生主义中的功利主义色彩非常明显。^[1]

吴汝纶是晚清文学家、教育家,与曾国藩、李鸿章等都有过密切交往。董丛林对其与曾、李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观察,认为,吴汝纶与曾国藩的关系主要是基于“文缘”,与李鸿章的关系主

要是基于“政缘”，这与曾氏作为高官同时又挚爱和兼执文业的“双料性”、李氏惟“拼命做官”的“单一性”特点分不开。当然，所谓“文缘”和“政缘”皆非纯然，而其间有着一定的交叉、融通。吴、曾“文缘”中的“黏合剂”乃桐城古文，曾国藩作为咸同时期桐城文派的领袖，吴汝纶在相关方面所受牵系和影响颇大，保持关系至密。而他在与李鸿章的“政缘”当中，把握的则是所谓“不深不浅”的关系分寸。至于吴汝纶“弃官从教”的最后选择，固然是他觉得遇有合适机缘，而最根本的还是由于对文业的钟情。审视、比较吴汝纶与曾、李的关系，其自身而外，还可兼察湘、淮集团的相关情形。^[2]

陈独秀与李大钊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朱文通、丁钰津对新文化运动前陈独秀与李大钊社团活动异同及其原因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早在清末，陈独秀与李大钊已经分别开始从事社团活动，到新文化运动前，其社团活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由于反清立场坚定，陈独秀主要是组织或参加具有革命色彩的传统社团或新式社团的活动。相比于陈独秀，还处于求学时期的李大钊参加的均为新式社团，其社团活动以青年学生为主，游离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引领下，社团作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体现，他们的社团活动又呈现诸多共性。这促使陈、李二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逐渐地走到一起，终于共同完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伟业。^[3]

（二）晚清政制研究

王宏斌、耿健羽对清朝福建水师赶缙船兴衰、清嘉庆时期海匪与闽浙水师战船之更替进行了考察，认为，赶缙船是清代前期的主力战舰之一，也是风帆时代中国最优秀的战舰之一。在保卫海疆，征剿海寇的战斗中，赶缙船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建造制度的僵化，造船质量不仅不能与时俱进，反而逐渐退化，越来越不宜海防斗争的需要。19世纪，在海寇战舰的挑战之下，赶缙船相形见绌，不得不退出海洋战争的历史舞台。通过探讨赶缙船的兴衰历程，不仅可以了解清王朝造船制度的内在机制，还可以总结其利弊得失，鉴往知今。^[4]清嘉庆时期，东南海匪出现了活动跨国展开、实力日益强悍和武器更加精良三大趋势，从而对清朝水师构成了强劲

挑战。作为军事回应的重要手段，福建、浙江两省的水师战船进行了数轮更替。经过十数年的艰难探索，最终使大横洋船（同安梭船）正式成为两省新一代制式战船，并最终借以消弭了东南海匪祸患。^[5]

二、抗日战争史与解放战争、共和国史研究

（一）抗日战争史研究

为促进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共各级政权开展了各种深入的社会改造实践，改造的内容相当丰富，收效较为良好，同时也有一些惨痛的教训。郑立柱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问题及其治理为研究对象，全面总结中共治理社会问题的历史经验，深入揭示了抗日根据地繁荣发展的内部动因。^[6]

作为社会改造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非婚关系”问题历来是华北根据地各级政权社会治理的重点之所在，但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尚未完全改变之前，传统的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依然是影响乡村民众行为选择的基本逻辑，再加上身体的象征性与资本化，以及婚姻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偏差，使得华北根据地的“非婚关系”问题一直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杨豪从传统、身体、政策三个维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华北根据地的“非婚关系”问题并不能仅仅以所谓的“腐化”，抑或“落后”而加以论之。传统、身体、政策与“非婚关系”问题的相互纠结、共同作用，折射出妇女解放事业的任重而道远。^[7]

李春峰、李文娜对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粮食出入口贸易进行了考察，认为，抗战时期，面对严峻的粮食困境与生存危机，晋察冀边区制定了“对外统制”的贸易政策，建立了各级贸易机构，颁布了各种粮食贸易法令，积极开展对敌粮食斗争，在加强粮食入口、调剂边区物资、掌握粮食市场行情、建立经济情报制度、严厉打击粮食走私与投机行为、加强对粮商的团结与改造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进而获得边区民众的广泛认可，为边区经济秩序的稳定、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

冯小红以太行山文书所藏的1938年涉县甘泉村村账为中心，对全面抗战初期“财政无政

府”状态下的赋税征收和农民负担进行了考察,认为,1938年的“甘泉账本”记录了涉县甘泉村“财政无政府”状态下的赋税征收实况。与战前的田赋征收相比,全面抗战初期“财政无政府”状态下的农村赋税征收在征收方法、科则、征收时间、赋税形式等方面均呈现不同特征。甘泉村1938年的亩均负担高达5.115元,比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至少高出7.56倍。在“财政无政府”状态下,农民负担骤然大幅度增加,使本来就普遍贫困的甘泉村民不堪重负,农户纷纷以输出青少年人口来应对压力。^[9]

张同乐对华北沦陷区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禁烟法规进行了考察,认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在侵华日军的指使下出台了所谓的一系列禁烟法规,禁止禁烟机构控制以外渠道的鸦片及鸦片吸食器具生产、流通、消费。通过鸦片吸食、生产经营特许专卖制度,华北沦陷区形成以伪政权禁烟官署为龙头的利益链。华北伪政权各级禁烟机构滥用职权,名曰寓禁于征,以经济手段达到禁绝鸦片目的,实则明禁暗纵,以罚代法,敛取钱财,中饱私囊。在侵华日军以毒养战、以毒制华政策下,华北沦陷区烟毒泛滥,鸦片毒品成为日军从精神上灭亡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对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禁烟法规的分析,可以看到,禁烟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统治的风向标,禁毒问题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治乱,反映出社会心理和人心向背。^[10]

(二) 解放战争、共和国史研究

杨豪通过考察冀中解放区土地改革实践认为,经过土改运动的实践,冀中解放区的地富阶层和农民阶层实现了中心与边缘的身份置换,各阶层民众自身资本的积累方式、价值逻辑也呈现出了革命化的转向,社会流动的广泛性与土地改革的系统性则暂时遮蔽抑或消解了冀中解放区社会经济结构和革命发展路径的特殊性。通过土地改革这一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与有效实践,共产党政权重塑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增强社会的活力,开启了构建认同、整合社会、组织建政的新模式,并对个体民众的生命历程与生活机遇产生隐形影响。^[11]

华北解放区干部南下是全国干部南下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雅洁考察了1948至1949年华北解放区干部南下的准备工作和1948至

1952年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认为,为有效完成华北解放区干部南下这一重任,解放区各级政权机构均进行了充分的干部准备工作,包括增设副职与提拔培养干部的组织准备、进行革命前途与个人觉悟双重教育的思想准备以及进行常规审查与自我评估的干部年关鉴定,为实现逐级分配、层层调配、环环相扣的成系统、整体性的干部抽调奠定了基础。^[12]土改运动正式开始以后,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组织领导、培训干部、土改试点、工作队下乡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中共政权深深地嵌入了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跨越了革命的“地域”界限。然而,南方新区的土改运动也出现了一些偏差,特别是在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工商业、团结本地干部等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些问题的出现折射出南下干部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融入和调适的复杂性。“南下”绝非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占领,南下干部所主导的乡村土改极大地重塑了南方新区乡村社会的政治面貌、经济格局和社会结构,改变着一个个生命个体的人生轨迹,也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与治理框架。^[13]

肖红松、郭晓辉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治理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1953年以农村为中心的戒烟工作进一步巩固了华北地区前期治理成果,改造烟民以塑造社会“新人”,实现了新生人民政权与民众的有效良性互动。华北烟毒治理工作推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改造与建设进程,由此可探析党和政府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重塑社会调控系统的轨迹与内在逻辑。^[14]

范铁权、郭玮具体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卫运河私营民船的社会主义改造,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大潮推进和航运实际需求下,内河航运管理局领导了对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卫运河上的私营船舶,于船民家庭而言,兼具生产资料、生活空间的双重性,公私合营对私营者的经济和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在实质上使流动的船民最终离开河道成为便于治理的固定人口。^[15]

郑京辉以1957年河北省搬运工为例,对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工资制度构建进行了考察,认为,1956年工资改革后,搬运工人的工资收入“合理性”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地方政府认为搬运工人的工资收入与其他职工群体存

在悬殊现象,主张对搬运价格及搬运工工资收入进行调整,以实现地区及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收入平衡。究其根源在于,1956年工资改革基本确立起新中国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工资制度,而搬运工群体并未纳入此次改革,其工资收入仍游离在这一体系之外。地方政府对搬运工群体工资收入调整的主张,并非否定职工群体间的工资差异,恰恰相反,其工资制度合理性的追求,最终结果是不断强化和巩固1956年工资改革所构建的工资等级体系。^[16]

三、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一) 货币思想研究

戴建兵对孙中山货币思想及实践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近代货币思想与近代货币制度以及货币流通状况的发展密不可分,而每一种货币思想均有着其相对固定的时代特色。中国近代币制改革有着其特殊历史原因下的困境,面临着几个无法解开的死结:一是在追随世界金本位潮流时,由于国内经济困境而无资金实现,同时外部环境也无法求得资金支持。二是银本位落后于世界货币环境且白银的进出口受制于外人,但却是无可奈何的现实选择。三是政治混乱和战争导致的军阀割据与自然经济的残余结合从而使近代币制改革缺乏良性的环境。孙中山的货币思想在那个时代有着超越时代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性。^[17]

(二) 经济思想研究

李中庆对张謇的棉铁主义思想进行了再审视,认为,张謇基于实业实践和日常阅读,从外国工业品、特别是棉铁充斥中国这一实际出发,提出“棉铁主义”这一工业化方案,并将之视为救国良方,在不同场合进行宣传。然而,棉铁主义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业化方案,看似合理,却隐藏着不合理性。张謇不谙经济发展规律,希望中国直接进入进口替代阶段,并未意识到出口贸易对工业化建设的哺育作用。由于存在局限性,棉铁主义并不能使中国实现工业化,但对棉纺织行业的工业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棉铁主义是张謇对中国工业化发展路径进行的有益探索,是静态的思想,也是国人在试错中不断探索工业化路径这一动态历史进程的重要一环,既对郑观应等人商战、洋务派工业化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对后人继续探索中国工业化路径

也提供了借鉴。^[18]

(三) 进出口贸易问题研究

一战期间,作为国际甘草市场供货地的土耳其销路受阻,中国甘草开始作为替代出口海外。汪燕平具体考察了近代甘草产地和形象的变迁,认为,此前,先在《神农本草经》时期,甘草疗效记录在列,产地相关的记述则要晚至魏晋南北朝。直至清代早期,甘草产区的变动大致未能超出今甘肃、陕西、山西和内蒙古西部。一战期间,中国甘草开始作为替代出口海外。域内原有甘草产区难以应对持续且大量的出口,原生有甘草的内蒙古、东北三省、新疆、西藏等地陆续加入,开始成为新增甘草产区。与国内主要作为治病良药的社会情形不同,出口甘草的大端,是作为烟草等物的矫味剂来利用。迥异的利用方式,诚然深刻影响了本土甘草产区的变动。还有随着大量甘草的持续采掘,原生资源渐衰,栽培甘草也陆续在这一时期出现。此外,传统本草学发展至清代,医理、药性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本草主题,近代接续这一进程,开始逐步向鲜少涉及产地知识的药物学转变。^[19]

日本在冀东的走私始于1933年,此后,随着华北局势的恶化愈演愈烈。张同乐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及其影响,认为1933年《塘沽协定》的签订,使冀东成为日军威胁下的“非武装区”,南京国民政府对该区的行政控制力大为削减,日本武装走私浪潮初起。1935年6月、7月“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使冀察主权大量丧失。面对关税流失、冀东海关失防的危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缉私机构、组建了缉私队伍,欲在运、销、购三方面切断日本的走私网,但仍难以从根本上阻挡冀东走私的狂潮。1936年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实行只相当于1/4中国关税额的“查验费”后,日本在冀东的走私进一步合法化,走私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冀东走私是日本侵略者策划操纵的有组织的走私活动,是日本经济侵华的重要手段,是其“分离华北”政策的重要一环,也是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20]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逐步对出口大宗商品实施统制,但面对重重阻力,政策执行成效并不理想。李中庆对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出口贸易统制的建立进行了考察,认为,淞沪

抗战爆发后,长江下游航运阻滞丛生,商人不得不在诸多方面主动向国民政府寻求援助。国民政府适时通过中央信托局推出兵险,为商品运输提供保障,使商人对之产生依赖,并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等机构,在“调整”贸易的同时进行权力渗透。江阴、南京沦陷后,积压在汉口的出口商品只得通过政府控制的粤汉铁路运出,国民政府在初步完成权力渗透后整合中央与地方贸易机构,撕掉“调整”的面纱,将贸易调整委员会更名为贸易委员会,正式建立起对出口贸易的统制。^[21]

(四) 金融货币史研究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北方地区新式民族金融业出现发展高潮,短短十余年间,便已初步构建起包括国家与地方银行、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新式金融体系。康金莉对此时期官商资本与近代北方新式金融进行考察,认为,北方地区民族金融资本主要源于官商资本,这种现象的出现,为北方普通民族商业资本薄弱,市场发育不足背景下金融发展的必然结果。官商资本为北方民族金融业的起步、金融体系的构建起到必要的资本积累作用,但其过度依恃特权与注重政府业务,偏离服务工商实业的经营模式,不仅不利于金融体系稳定发展,亦使其自身过于脆弱,易受政局变动影响。^[22]

资本为华北财团的核心要素,亦为客观认识华北财团性质的关键因素。康金莉考察了华北财团资本之属性与演变,认为,基于中国浓厚的家族文化,华北财团资本应界定为“官僚军阀为核心的特权家族资本”,其本质应为资本主义属性,但同时具有较强的“人合”性质。华北财团资本经营具有特权性与强权性、封建性等非经济属性,长期依恃特权进行非市场经营,获取超额利润。但随着市场发育,政治局势变化,至北京政府后期,京津系、奉系与晋系三大财团因政治地位变化,出现不同分化趋势,分别向市场化、官商资本膨胀、公营化方向转化。华北财团现象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市场发育不充分,官本位意识顽固存在等经济文化背景下出现的特殊形态,其经验教训值得汲取。^[23]

康金莉还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对近代中国竞争性货币发行的制度成本与绩效进行实证考察,认为,19世纪末期至法币改革以前,中国

处于多元货币发行与流通体制时期,表现为货币的自由发行与多元流通,货币发行与流通情况主要依靠市场选择,形成一种竞争性货币制度。在竞争性货币制度下,同样不能避免货币失信,货币滥发,不能解决通货膨胀等货币现象。不惟如此,竞争性货币制度同时具有引发持币风险与投机,增加交易费用,增加市场不确定因素等弊端。^[24]

废两改元是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改变货币制度中“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而进行的一项重要币制改革,其中,倾向于近代化经营管理的银行及其代言人主张废除银两,只用银元,改变在洋厘和往来结算等方面长期受制于钱庄的局面。申艳广以与废两改元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天津银行公会为中心,考察废两改元在天津的实施过程及重要意义。^[25]

冀南银行是抗战时期最早筹建的根据地银行之一。毛海斌、戴建兵对冀南银行纸币的印制、发行、货币政策、印钞技术发行进行了考察,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冀钞是发行和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之一。以时代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当时的冀钞发行是比较成功的,它不仅探索印制出了晋冀鲁豫边区自己的本位币,并且纸币面额和种类比较全面,较好满足了部队和人民群众使用。在货币管理方面,面对混乱的货币市场,针对不同币种采取不同政策,经过长期艰难的货币斗争,最终完成了货币市场的统一。其中很多经验和做法,都集中体现了边区政府和人民的无穷智慧,时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26]

戴建兵主编的《中国近代商业银行史》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关于中国近代代表性商业银行的发展史,在概述清末民初中国金融发展状况、银行理论、国家政策、外国与华经济关系等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汇丰银行、华俄道胜、直隶银行、北洋保商银行、中法实业银行、殖边银行、盐业银行、中孚银行等具有影响的18家中国近代银行的设立、扩张、高峰到衰败的历史,对于中国现代银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7]

四、社会、教育、学术史研究

(一) 社会文化史

2019年社会文化史专题的研究呈现出较强

的地域特色。刘秋根、赵公智以 202 条戏楼墨记为中心,考察了清中期至民国蔚县地方演剧活动,认为,从清代嘉庆二十年(1815 年)到 1949 年的 135 年间,蔚州本地以及来自大同府、张家口、京师、直隶中部等地的 126 个作为商业主体的戏班,为了维持生计以及实现盈利甚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蔚州 56 个村庄演出了 324 个以战争主题居多的戏曲剧目,其中既有本地的社火、秧歌、道情,又有河北梆子和北路梆子。作为早期影响因子之一,从事长途贸易的山西商人之中的部分群体的经营及其商业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山西同乡戏班的在外演出活动以及梆子戏在异地的传播;清代中期以来,在蔚县的山西商人是该地梆子剧种流行的不可忽视的基础要素之一。^[28]

刘志琴考察了民初直隶省会天津城的电话业,认为,“德律风”(电话)于清末传入中国,中国人在天津架设了第一条电话线。1879 年,中国轮船招商局在天津架设了由紫竹林租界至大沽码头的电话线,由此改变了传统的“驿站式”的通信模式,开启了中国通信行业的现代化之路。此后天津电话业的发展基本与西方先进国家同步。1914 年于闸口建立电话新局,将旧的“磁石式复线交换机”换为“共同电池式”交换机。1922 年天津成为世界无线电话的试行基地。1924 年扩局增机。1927 年 4 月改用自动电话机,做到了“各国侨民无论能用华语与否,皆可自由通话”。此外,话务员的业务水平与服务质量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29]

(二) 个人生活史

张志永、戴建兵以改革开放前一名普通职工梁福的工作与生活,考察了他的政治情感与生活压力的冲突与调适,认为,梁福出身贫苦,解放后翻了身,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在部队中积极上进,退伍后成为一名普通职工,虽然在工作中没有做出惊人的成绩,但基本上尽职尽责。囿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工资和票证供应等原因,梁福家庭经济生活出现了暂时性困难,他逐渐蜕去理想主义情怀,多次偷拿公物甚至倒卖粮票;不过,梁福既不是盗窃成癖的惯犯更不是对社会制度不满,其所为仅仅是自发的生存策略而已。从梁福家庭收支情况中,可以管窥改革开放前职工家庭生活大致呈现

“高一低一高”U 型曲线状态,除了中年阶段易出现暂时生活困难外,青年和老年阶段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上,并在总体上呈缓慢提高趋势。^[30]

(三) 教育史

吕碧城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之一。武吉庆、韦震考察了吕碧城女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认为,深厚的家学渊源,出众的个人才华,勇于突破藩篱的“叛逆精神”,以及清末思想界探索女子教学问题的激发,加之当时天津一些社会名流的支持,共同促进了吕碧城女学思想的形成。她以男女平权和女子独立的视角,呼应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时代主题,蕴含其中的远见卓识和启蒙意义是不容轻忽或遮蔽的。她较早地从人权、女权和男女平等意义上倡兴女学,呼吁女性人格独立,注重国家利益和个人权益的有机统一,为此倡立“德”“智”“体”等多育并举的教学体系,在理论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于当时和其后的中国女子教育具有重要的开示和助推作用。虽然她对男女不平等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尚无更深层次的认知,但其女学思想的先导意义和独特价值理念应得到客观理性的肯定或认同。^[31]

胡小京以清末民初北洋女师范学堂为例,考察了改良年画中的女学与女学中的改良年画,认为,清末民初,改良年画作为影响最广泛的传播媒介,成为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普通民众的沟通桥梁,是宣传社会改良和民众启蒙的最佳路径。在诸多反映“开民智、兴女学”的改良年画中,以展现新式女学堂作品最为集中,成为引领社会风尚新的文化符号。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作为近代第一个官立女子师范学堂,旨在培养小学女教员,普及女学,是近代女学发达的起点,一时成为多个年画中心争相观摩、选材的示范基地,为研究近代女学的创建提供了可视化资料。结合北洋女师范学堂创办的相关文献资料,挖掘改良年画中女学题材中蕴含的历史信息,进一步剖析改良年画与近代女学兴起的内在关系,有着重要学术价值。^[32]

吴洪成、蔺士琦对清末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活动进行了考察,认为,学部编译图书局编辑了大量中小学及师范教育教科书,适应立宪运动中国国民教育思潮的要求,组织编辑社会教育教科书,并主动参与国外教科书的翻译出版。在后期活动中,其工作重心转向对民间自编及国外翻译

教科书进行审定。编译日本学校教科书是清末留日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留日学生成立编译机构团体从事教育、历史、地理、经济及哲学为主的多种教科书编译活动。这些教科书通过媒体刊载、印行并输入国内,适应清末“兴学”热潮中“新学制”推行的需求,有效解决了教科书匮乏问题,其对近代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33]

(四) 学术思想史

学术史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清代理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二是近代知识传播与学术转型。

作为从两宋产生而延续至今的儒学形态,理学不仅仅局限于宋明,而是历经宋明、清代、近现代。到清代,理学展现出新分化。王坚认为,理学在清代的分化表现出新的特征,分流为“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及考据学派、桐城派的兴起,是清代满汉杂糅政治格局下皇权与八旗贵族斗争和满、汉关系互动反应于学术格局之结果,是汉人利用文化思想优势推进“满人汉化”在学术上的体现。“理学家之理学”重践履、经世致用、下学上达、功夫论,学风兼容并包,使理学在清代帝制与八旗贵族制冲突中,跃居治国指导思想,深入八旗内部推行汉人相关制度。“文学家之理学”重文以载道,执着对程朱理学宣传,在清政府保护“国语骑射”、满人传统、“理学家之理学”推进困难情况下,反击各方批评,迎战汉宋学之争。清代汉宋学之争是考据学派与“文学家之理学”派的争论,“理学家之理学”派并未过深参与其中。^[34]

清儒崔述不仅是宋代之“怀疑精神”的传承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李长银具体考察了崔述的“考信之学”与“古史运动”的关系,认为,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正是受到了崔述《考信录》的启发,才正式提出了“层累说”。之后,“古史辨运动”转向“古书辨”,张寿林、钱穆等“古史辨”派学人又从《洙泗考信录》以及《读风偶识》等著作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从而打破了“孔子作《易传》之说”以及“孔子删《诗》之说”。最后,“古史辨运动”又转回“古史辨”,顾颉刚又受到崔述《考信录》中

“驳五德终始之说”的暗示,撰写了著名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总之,崔述的“考信之学”是“古史辨运动”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本土学术资源之一。^[35]

在中国古今学术知识的转型中,从经史子集四部到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的“分科”转型成为重要标志之一。李敏考察了1857至1897年期间西学冲击下国人对“文学”认识的演变过程,认为,近代中国学术分科体系的建立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不同学科的发展因受中学与西学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文学”观念与学科的演变尤其复杂。在19世纪较长时期内,受中西接触带来的西学知识的冲击,中国本土读书人对“文学”的认识呈现中西相融的特点。受西学分科与中国学术发展专门化的影响,“文学”成为分科学术中的一门。在不同来源思想影响下,其观念形态复杂多样,在甲午以后进入变法舆论,并进一步影响国人之认知。^[36]

在近代学术转型上,民国时期的学术社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范铁权在《知识传播与学术转型:中华学艺社研究》一书中,对中华学艺社在近代知识传播与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具体活动及其作用作了深入的探讨。^[37]他还具体考述了抗战时期的中国铸魂学社对“大侠魂”精神的塑造及其历史意义,认为,中国铸魂学社的前身为孤星社,1924年由安若定等人于上海大学创建。1932年在孤星社基础上成立的铸魂学社以“文武合一,知行合一”为号召,高举“平其所不平,爱其所当爱”的旗帜,极力宣传“大侠魂”理论。“大侠魂”由安若定借鉴日本的“大和魂”而来,呼吁开展铸魂运动,增强民族凝聚力。受其影响,无锡、汉口等地也成立了铸魂学社。1939年,为集中力量、统一领导,安若定等整合各地铸魂学社组织,在重庆组建了中国铸魂学社。铸魂学社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如发行《大侠魂》杂志、出版丛书、成立抗敌工作团等,致力于铸造国民“大侠魂”和抗日救国事业。铸魂学社倡举“大侠魂”“重铸黄魂”,极大地激发和增强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的贡献。^[38]

(五) 水利水政史

白洋淀淤地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

社会问题。在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清代以来白洋淀淤塞日益严重。肖红松、王永源具体考察了清代以来白洋淀地区淤地占垦中的官民应对,认为,清朝前期至中期,地方高级官员为了河淀治理与保护,主张严禁民众占垦淤地,清末民国时则为了减少淤地占垦纠纷,由严禁向弛禁转变,并逐渐收归官办作为官产进行处理。然而,为应对洪涝灾害和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地方下级官员和民众应对淤地的举措与高级官员的主张背道而驰。从官民的应对中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政府对淤地的政策呈现出严禁—弛禁—收归官办的变化趋势,这也说明了政府对地方社会管理的松弛或政策法令在地方的式微。^[39]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加强了对河务的管理。徐建平考察了北洋政府时期直隶水政监察、京直水资源的涵养与保护,认为,直隶地方政府在原有各河河务局的基础上,加大了对水政的监管力度,设置了水上警察局,建立了河务局工巡队,并责成地方官加强对河务的监管,在保障航路畅通、维护水路运输安全、维护水事秩序、保护堤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洋政府时期直隶的水政监察制度建设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40]同时,北洋政府时期,京直地方政府的水政工作由以防灾为主转向防灾与治理并重,开始关注水资源的涵养与保护。在民间舆论的呼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京直地区开始重视林业,并将发展林业与防治水灾、发展水利相联系。在中央颁布《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后,京直地方政府实行水资源保护新政,推广植树造林工作,增强京直河流上游的蓄水功能,使造林工作制度化,取得了一定成效。^[41]此外,由徐建平负责撰写的《中国环境史》(近代卷)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42]

(王坚: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王宏斌.海纳百川:孙中山最大幸福观探源[J].安徽史学,2019(5).
- [2]董丛林.吴汝纶与曾国藩、李鸿章关系比较论——基于“文缘”“政缘”的考察[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3]朱文通,丁钰津.新文化运动前陈独秀与李太钊社团活动异同及其原因初探[J].河北学刊,2019(6).
- [4]王宏斌,耿健羽.清朝福建水师赶缙船兴衰探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 [5]耿健羽.清嘉庆时期海匪与闽浙水师战船之更替[J].河北学刊,2019(6).
- [6]郑立柱.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7]杨豪.“另类”之相:华北根据地“非婚关系”问题新探[J].史学集刊,2019(3).
- [8]李春峰,李文娜.困境与应对: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粮食进出口贸易[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9]冯小红.全面抗战初期“财政无政府”状态下的赋税征收和农民负担——以1938年涉县甘泉村为中心的考察[J].近代史研究,2019(3).
- [10]张同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禁烟法规论析[J].安徽史学,2019(6).
- [11]杨豪.社会流动视域下的土地改革再探讨——以冀中解放区为中心的考察[J].人文杂志,2019(6).
- [12]代雅洁.华北解放区干部南下的准备工作研究(1948—1949)[J].党的文献,2019(4).
- [13]代雅洁.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研究(1948—1952)[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2).
- [14]肖红松,郭晓辉.雷霆扫毒: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治理问题研究[J].河北学刊,2019(6).
- [15]范铁权,郭玮.新中国成立初期卫运河私营民船的社会主义改造[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3).
- [16]郑京辉.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工资制度构建——以1957年河北省搬运工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9(9).
- [17]戴建兵.孙中山货币思想及实践评议[J].近代中国,2019(1).
- [18]李中庆.近代中国工业化路径在试错中探索:张謇棉铁主义思想再审视[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19]汪燕平.从地道到科学:近代甘草产地和形象的变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2).
- [20]张同乐.引爆祸端: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冀东走私[J].晋阳学刊,2019(4).
- [21]李中庆.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出口贸易统制的建立[J].抗日战争研究,2019(3).
- [22]康金莉.官商资本与近代北方新式金融研究(1912—1927)[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2).
- [23]康金莉.华北财团资本之属性与演变探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 [24]康金莉.制度成本与绩效:中国近代竞争性货币发行的经济学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
- [25]申艳广.天津银行公会与废两改元在天津的实施[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 [26]毛海斌,戴建兵.冀南银行纸币发行概述[J].中国钱币,2019(2).
- [27]戴建兵.中国近代商业银行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9.
- [28]刘秋根,赵公智.清中期至民国蔚县地方演剧活动管窥——以202条戏楼墨记为中心的考察[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29]刘志琴.民初直隶省会天津城的电话业——以《新天津指南》中的电话号码簿为例[J].城市史研究,2019(1).
- [30]张志永,戴建兵.政治情感与生活压力的冲突与调适——改革开放前一名普通职工的工作与生活[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
- [31]武吉庆,韦震.男女平权诉求下的多育并举——吕碧城女学思想略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1).
- [32]胡小京.改良年画中的女学与女学中的改良年画——以清末民初北洋女师范学堂为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3).
- [33]吴洪成,蔺士琦.清末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活动述论[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 [34]王坚.“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论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及原因[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35]李长银.崔述的“考信之学”与“古史辨运动”[J].东方论坛,2019(3).
- [36]李敏.西学冲击下中国人对“文学”认识的演变(1857—1897)[J].河北学刊,2019(4).
- [37]范铁权.知识传播与学术转型:中华学艺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38]范铁权.抗战时期的中国铸魂学社与“大侠魂”精神之塑造[J].理学学刊,2019(2).
- [39]肖红松,王永源.清代以来白洋淀地区淤地占垦中的官民应对[J].社会科学战线,2019(4).
- [40]徐建平.北洋政府时期直隶水政监察研究[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5).
- [41]徐建平.北洋政府时期京直水资源的涵养与保护[J].北京史学,2019(1).
- [42]徐建平.中国环境史(近代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世界史研究

汪鹏 倪世光

2019年,河北省世界史学科继续稳步发展。学者们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积极跟进学界最新研究动态,不断拓展研究视域。综合来看,世界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区域国别史三个方向,其中经济社会史研究比重的加大、区域国别史研究的增多是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赵克仁对古埃及象形文字与雕刻的同质性进行了考察。象形文字与雕刻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古埃及人智慧的结晶。古埃及人把文字称为“神的语言”,揭示了象形文字具有的宗教特性。象形文字与雕刻的同质性表现在形式、功能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性上。在形式上,古埃及的雕刻与象形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不同仅仅是二维与三维、大与小的区别;在功能上,象形文字与雕刻一样,都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广泛用于政治和宗教领域;在思维方式上,二者都是古埃及人“具象思维”的体现。之所

以表现出这些一致性,是由于埃及人具有原始的形象思维模式、宗教发展的需要、埃及人的自然崇拜情节和早熟的艺术法则等。经过详尽的论证,赵克仁指出,古埃及象形文字与雕刻表现出诸多同质性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出古埃及人通过各种途径传播文明的努力,蕴涵着丰富的信息。象形文字与艺术雕刻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是古埃及人留给我们的知识宝库,传承了埃及文明。^[1]

宋娇梳理了古代两河流域经济社会史特别是亚述学领域研究的新进展。经济社会史越来越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在亚述学研究上,越来越多的亚述学者开始把研究重点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等领域转向经济社会史领域,国内亚述学者对两河流域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呈现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当前国内亚述学研究中,经济社会史研究汇聚了一半以上的亚述学者,研究时段几乎涵盖了整个3000年的两河流域文明史。在此背景下,李海峰教授新著《古巴比伦时期动产交易活动研究》的出版具有重要的价值。该书通

过翔实的一手原始资料考证,提出古巴比伦时期商业活动建立在发达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这一观点,对国内长期流行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修正,具有创新研究、填补空白,实证研究、微观考察,专业研究、合乎规范三个鲜明特点,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和研究进展。^[2]

刘程对西方汉萨同盟史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指出,作为欧洲大转型时期地理跨度最大的国际性商业组织,汉萨同盟在物质文化、商业模式、法律、语言和地区开发等方面的贡献塑造了现代欧洲文明的重要部分,既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由于欧洲学界和政界“新汉萨同盟”提法的兴起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西方史学的分支,汉萨史研究同样经历了从政治经济学的“附属学科”到独立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如今展现出涉及领域广泛、研究视野外向和理论方法多元的发展态势。从国别到世界,从单一领域到多元视角,在漫长岁月里汉萨史研究逐渐成熟。当前汉萨研究已在西方形成多个中心,以德国吕贝克的汉萨历史学会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汉萨研究中心两处最为有名。网络分析方法成为当前汉萨研究的一个全新方向。^[3]

二、世界近现代史

孙海鹏讨论了近代早期英国银行业的兴起。他指出,国内金融学界对早期银行业略有涉及,但在认识上存在不少偏差。随着近代早期英国国内财富的增长、高利贷禁令的解除、原有慈善组织赈济职能的消失以及外族银行家势力的退却,伦敦等地的资本市场逐渐成长起来,出现了钱币兑换商、资本经纪人、包税商、公证人和金匠等一大批从事银行业务的群体。其中,资本经纪人、货币公证人和金匠银行家对英国早期银行业的兴起发挥了主要作用。都铎时期的资本经纪人多为商人和律师,发挥着类似银行的中介功能。公证人在承担文书性工作的同时开始代人保管财产,促进了存款银行业的兴起。金匠原本是金银器皿的加工者,他们凭借行业优势涉足早期银行业务,内战期间,金匠与英国银行业的联系开始变得紧密起来,逐渐扮演着当时纸币发行者的角色。资本经纪人、货币公证人和金匠,在英国银行业的整体演进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这些早期银行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们

的信贷活动推动了金融工具的创新,以及存放款和货币发行业务的扩张,为后来英国公立银行的创办和财政金融制度的变革奠定了基础。^[4]

赵克仁比较了法国与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他指出,“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是指二战期间被法西斯轴心国占领,或遭受法西斯威胁国家和地区人民进行的抵抗活动。二战中欧洲是遭受纳粹德国蹂躏的重灾区。法国和南斯拉夫两国人民开展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在西欧和东南欧具有典型性。两国人民在国内、在海外,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开展了反对纳粹占领的抵抗运动。法国抵抗运动兴起较早,中心是戴高乐在海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法国国内抵抗组织在他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是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立足本土与法西斯占领者展开周旋。虽然在两国抵抗运动中运动都采取了游击战,但在战略策略、任务性质,抗战规模和所起作用等方面有很大不同。赵克仁认为,虽然法国和南斯拉夫都赢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但结局却大相径庭。^[5]

刘雅军讨论了美国的黑人史书写问题及其对美国史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黑人史书写的分水岭。它逐渐从传统的贡献论、斗争论转向黑人共同体及其文化。1960年代之前的黑人史书写是对主流美国史的修正,但同时也为1960年代黑人史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做好了学术准备。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城市暴动、黑人意识运动等汇聚在一起,极大加强了美国社会对黑人史的兴趣。美国黑人试图从自身的视角理解美国历史与现状,进而通过新黑人史加强自我意识、自尊和族群凝聚力,寻求作为一个集团在政治上合一到美国社会中去的机会。刘雅军指出,1970年代中期以后,此种新黑人史书写虽然并未在民族主义方向上持续发展,但是,它的亚文化族群特征逐渐改变了美国史主体架构,与其他新兴的边缘群体史学一起,严厉谴责美国过去的罪恶,最终解构了传统美国史。八九十年代以后,经由大众传播和学校历史教育,“碎片化”的新美国史引发文化身份认同、多元文化教育、乃至国家分裂的激烈争论。刘雅军指出,未来美国史和黑人史的书写,尽管尚在探索过程中,大体上仍旧会在民族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框架内更多元、更具全球视野。美国国内黑白种

族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新闻阐释。^[6]

邓卓和庞世俊通过回溯美国现代生涯与技术教育的发展历程,探讨了18至19世纪欧洲对美国职业教育的影响。他们指出,美国的职业教育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还处于雏形阶段,几乎是对英国等欧洲国家发达职业教育体系的全盘照搬。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教育思想、19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职业教育观以及俄罗斯的课程模式等都对美国早期职业教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处于殖民地时期时,美国主要移植的是英国的学徒制,成为教育和培训大众最为普遍的一种形式,但学徒制的重要角色在美国工业革命后日渐没落。南北战争后,美国职业教育进入发展和创新阶段。^[7]

刘京针对防止核扩散这一重大热点问题,讨论了美国原子能国际管制政策的出台。她认为,二战之后,防扩散机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作为最早的核国家,最早提出要加强原子能的国际管制。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原子能国际管制政策及相关实践,可以说是核不扩散机制的最早起源。学术界对杜鲁门政府的相关研究侧重两个方面:一是考察美国的国际管制政策与冷战起源的关系,二是讨论科学家在美国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刘京以美国政府内部重要文本的生成、讨论为基础,讨论了美国原子能国际管制政策的出台经过和内容特点。^[8]

三、区域国别史

赵立新从历史学的视角考察了战后日本宪法的出台和性质,提出了一些新认识。通过追溯日本宪法的制定历史和具体条款,他指出《日本国宪法》中放弃战争条款或言放弃战争的理念究竟来自于美方还是日方,尚无有力的证据来说明。这一宪法不能说是“强制”下的产物。此外,和平主义是日本宪法的进步原则之一。与二战后的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国在宪法中放弃侵略战争的条款不同,《日本国宪法》规定了放弃包括自卫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因而日本宪法规定的是任何国家宪法中都没有包括的划时代的和平主义。维护该宪法不仅对日本,对世界各国而言都十分重要。日本国民为了保护这一宪法进行了

长期的斗争,从某种角度来说,日本宪法是比美国宪法还要民主的法律文件。综上,赵立新认为,《日本国宪法》并不是政治原则的罗列,也不是强加给日本的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将现实的政治权利从日本政府手中向国民的转让。虽然它并未得到完全实施,但仍然称得上是划时代的事件。^[9]

薛天依的专著《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是近代日本对华认识方面的一部新作。该书以1911年至1919年之间世界历史和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为线索,重点考察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冲击下日本思想界的变化,并分析了大正民主运动时代背景下日本对华认知中反映的民主主义思想与帝国主义思想的博弈,从思想史的角度探究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脆弱性以及日本逐步走上侵略道路的思想根源。他指出,与明治时代相比,大正时期的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关注度更高。与明治和昭和时代相比,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深受民主主义影响,日本认识中国时更加注重经济利益和英美列强的态度,对武力侵华手段表现出反思。^[10]

黄忠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家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思想。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有诸多社会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产生了危机感。大平正芳认为“经济时代”已经结束,依存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应改变,逐渐形成了超越“吉田路线”的“战后总决算”思想。1978年12月组阁后,他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田园都市等课题。其中既有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客观需求,同时又显示了大平正芳对“脱战后”的自觉。黄忠认为,虽然大平正芳的这些提法都是对战后“经济时代”的“总决算”,但他与中曾根康弘的认识基础与应对施策不尽相同,对时代的认知也体现出个人色彩。从媾和、日美安保到“吉田路线”,直至今日,受美国国家实力决定的美国政策的风吹草动,必然制约日本内外政策的变化。^[11]

丁宁回顾了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总结了其特点并归纳了能为我国所用的一些启示。日本在教育发展中一直秉承实用主义原则,重视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其职业教育

发端于 19 世纪 70 年代,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产业导向期、内容与层次扩充期以及信息化发展影响时期。纵观日本职业教育百年发展历程,学校职业教育内部体系层次分明,衔接畅通;私立职业学校办学体制灵活,成效显著;企业教育制度不断完善,终身教育体制已然建立。这些都为我国提供了良好借鉴。丁宁指出,我国应该完善学校职业教育的层次体系,强化衔接机制建设;加大对民办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构建并完善企业教育制度,以弥补学校职业教育制度的不足。^[12]

秦善进回顾了华人华侨在牙买加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牙买加的经济经历了土著时期与殖民时期、争取独立与独立后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以及 21 世纪改革与发展时期等几个阶段,经济规模也从单一的狩猎与种植园经济发展成为多元化经济结构体系。在牙买加的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一代代的华人华侨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殖民地时期,先后到达牙买加的华人多为岭南一带的客家人,充当种植园主要的劳动力供给。少数创业成功的华人开始向以零售业为主的初级服务业发展。在争取独立和独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更多华人来到牙买加,在牙买加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经济领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1 世纪以后,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新的华人华侨不断前往牙买加,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让中国人才、中国技术和中国资本成为促进牙买加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13]

(汪鹏:河北师范大学讲师,

倪世光: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 赵克仁. 象形文字与古埃及雕刻的同质性及其原因[J]. 西部学刊, 2019(17).
- [2] 宋娇. 古代两河流域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兼评《古巴比伦时期动产交易活动研究》[J]. 外国问题研究, 2019(3).
- [3] 刘程. 西方汉萨同盟史研究述略[J]. 经济社会史评论, 2019(2).
- [4] 孙海鹏. 近代早期英国银行业的兴起[J]. 经济社会史评论, 2019(1).
- [5] 赵克仁. 法国与南斯拉夫抵抗运动比较研究[J]. 外国问题研究, 2019(3).
- [6] 刘雅军. 20 世纪美国的黑人史书写及其对美国史的影响[J]. 史学月刊, 2019(11).
- [7] 邓卓, 庞世俊. 18 至 19 世纪欧洲对美国职业教育的影响[J]. 职业教育研究, 2019(6).
- [8] 刘京. 在苏联的映衬下: 科学家、史汀生备忘录与美国原子能国际管制政策的出台[J]. “世界现代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与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9(11).
- [9] 赵立新. 对战后日本宪法的再认识——一个历史学视角的考察[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3).
- [10] 薛天依. 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11] 黄忠. 论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思想[J]. 学习与探索, 2019(5).
- [12] 丁宁. 日本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特点及启示[J]. 教育与职业, 2019(4).
- [13] 秦善进. 华人华侨与牙买加经济发展[J]. 唐山学院学报, 2019(2).

哲 学

哲学及相关问题研究

张燕京 郑甲平 李月坤

2019 年,河北省学者在逻辑学、伦理学、西方哲学,以及心理学等哲学基础理论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进展,在省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逻辑学研究

(一) 逻辑哲学

张燕京、王路认为,达米特的学术成就和地位是公认的。他是最好的弗雷格学者,是杰出的

分析哲学家。关于达米特和语言哲学的相关问题所进行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达米特的著作难懂,是因为他探讨的都是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基础性问题,他考虑的问题是先验的,考虑问题的方式是逻辑的。具体来说,理解达米特著作的难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达米特使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谈论哲学问题,这样就有一种技术性的东西包含其中。另一个方面是,达米特常常审视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本身,这样就会涉及到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
2. “达米特框架”是王路提出的一种说法,指达米特关于意义理论的思想,即一个意义理论包括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意义理论的核心,其中关于所指的理论是内核,而在它之外的是关于涵义的理论。另一个层次是关于 force (力) 的理论。“达米特框架”是达米特对意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关于 force 理论的讨论超出了弗雷格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达米特关于形而上学基础的讨论,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讨论的重大理论意义,会在今后哲学的发展中日益彰显。
3. 作为当代语言哲学的代表性人物,达米特和戴维森都在弗雷格的基础上向前走,引领着意义理论研究的方向。但是二者向前走的方式不同:“达米特框架”和 T 语句显然是不同的。
4. 语言哲学所说的语言分析与一般人(包括日常语言学派)所说的分析语言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日常语言学派重视语言分析,但是缺乏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工作的能力。而语言哲学则是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从而提出新的探讨世界的方式,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哲学不是分析语言,而是借助语言分析来做事情。分析哲学不是孤立的东西,应该放在整个哲学史中来考虑。综上所述,达米特的讨论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弗雷格思想的研究,而且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他所讨论的问题以及他在讨论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的研究,对当代哲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哲学的研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关于先验的、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的研究则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我国应该重视当代形而上学的研究。^[1]

(二) 模态逻辑

赵贤、胡小伟认为,多模态逻辑是关于“包含多种模态的逻辑”的研究,它的系统内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模态算子,并且算子间不可归

约。多模态逻辑旨在为研究多种类型的模态提供统一的形式框架,其基础理论是模态逻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模态算子及其表述、多模态逻辑的研究视角、多模态逻辑系统的分离性以及多模态逻辑的语义选择,是多模态逻辑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澄清与解决将有助于多模态逻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首先,多模态逻辑是包含多种算子的逻辑系统,即是单模态逻辑通过添加更多算子得到的一种扩展。多模态语言是在一阶逻辑语言的基础上通过添加任意模态算子(集)得到的。因此,在对多模态逻辑研究的过程中,将采用单模态逻辑的做法,用算子表示模态,从严格语形的角度来分析多模态算子及其表述问题。从形式化角度来看,对多模态算子进行表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表述方法是直接表述,即所有算子的形成直接由模态概念的性质决定。另一种表述方法是间接表述,在这种表述方法中用模态参数表述模态算子。其次,多模态逻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考察不同模态在同一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关系。从模态交互作用公理的视角研究多模态逻辑,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模态交互作用公理的选择及刻画。模态交互作用公理的主要来源是模态交互作用原则的形式化。再次,多模态逻辑系统的可分离性问题主要关注多模态公理化系统及其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同类型的多模态逻辑系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同。根据多模态系统内模态算子、公理及规则的组合方式,多模态系统可分为包含交互作用的系统和不包含交互作用的系统。多模态逻辑基础理论研究分别考察这两类公理化系统的可分离性问题。最后,多模态逻辑基础理论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语义选择问题。其中,多关系语义能够为多种类型的模态及其联合提供解释。因此,它具有相对广泛的适用性。总之,多模态逻辑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模态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多模态逻辑基础理论,有助于构建全面、完整的模态逻辑理论体系,对于多个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2]

刘东、刘叶涛认为,人类理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会超越现实去谈论反事实命题成立的可能性,也会讨论那些无法确定真假的命题之成立的可能性。除了逻辑和数学的必然性,人们还会尝试追求一些非推理性的必然性,如物理必然性

与形而上学必然性等。由此,模态知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得知反事实命题和不确定性命题的可能性,以及得知非逻辑且非数学类知识的必然性”。这个问题本质上涉及人们如何获得模态知识或真实的模态信念,即模态知识的来源问题。针对于这个问题,哲学家给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方法。刘东、刘叶涛主要考察后克里普克时代可设想性方案的研究进展,通过对模态怀疑主义、弱模态理性主义以及模态还原主义的理论剖析,重新阐释人类设想行为的约束条件,并对模态的多样性进行简单刻画。在可设想性和可能性的关系上,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可设想性论题,但总体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没有为心灵的想象活动提出合适的限制条件,也没有对不同类型的模态进行层次的划分。休谟的可设想性论题所主张的是受逻辑约束的想象模拟生产逻辑上的模态知识。在逻辑的意义上,他认为关于观念间联系的知识是必然的,而关于实际事情的知识不是必然的。亚布鲁和冯·因瓦根模态怀疑主义的困惑在于,人们会想象一些在直觉上不具有必然性的命题,或者有限的认知能力何以保证某些命题的必然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他们都承认人类认识的有限性或局限性,但否定人类认识所固有的理性特质和内省机制。查尔莫斯在二维认知语义学的框架下,在首要的可设想性和首要的可能性之间作了逻辑链接,承认人的认识活动要受背景知识的制约,但在形而上学模态知识获取方面没有给出明确的认知方案。威廉姆森模态还原主义通过对模态知识的反事实条件句还原,明确了人类的想象模拟的约束条件,并对想象活动何以能够通达形而上学模态给出了解答,有助于人们理解模态的多样性。^[3]

(三) 应用逻辑

孙雯通过对《应用逻辑杂志》创刊以来所载文献内容的分析和部分具有代表性文章的介绍,评析应用逻辑近15年来研究的最新趋势和最新方法,总结并提炼当前应用逻辑研究的最新选题和前沿动态,从而进一步讨论其对我国逻辑学研究的意义。《应用逻辑杂志》客观地反映了应用逻辑的发展变化。从整体上看,该杂志在文献的收集上呈现出开放和交叉的特征,除延续经典主题之外,还包括很多新兴议题。自创刊起,

《应用逻辑杂志》关注于研究具体领域、特殊问题的逻辑理论。2003—2007年,它重点收录了概率和逻辑、逻辑的变体、神经网络、基于逻辑方法的信息集成、计算机辅助数学、问答系统、基于逻辑的主体验证等研究专题。在这一阶段,内容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凸显了应用逻辑多元化的特点,不仅体现了逻辑理论和具体研究领域之间的不断对话,而且彰显了应用逻辑的内在一致及其适应性,开启了应用逻辑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从2008年起,《应用逻辑杂志》所收录的热点和前沿选题有:计算机科学中的哲学、人工规范体系、基于逻辑的溯因、理性主体中信念变化的形式化模型、混合逻辑、智能主体和多主体系统中的逻辑、网络系统中的自动规范和验证逻辑等。在这个时期,应用逻辑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推进,所涉及的内容也更加深入和专业化。此外,《应用逻辑杂志》特别记录了近十余年的专业年度会议和国际研讨会,始终努力地站在现代学术的前沿,为应用逻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应用逻辑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是非常广泛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应用逻辑杂志》所展现出来的信息,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我国逻辑学者应当以开放和融合的心态,从该杂志中发掘出更多有用的元素,既关注于经典的传统议题,也要关注新兴的前沿议题,积极开拓多元化、交叉研究领域。^[4]

二、伦理学研究

(一) 社会伦理

姚云认为,道德原则必须具有合理性,作为规范全社会总体的理论,它决定着社会的价值导向。在既有道德理论的基础之上,要使道德原则具有合理性,至少需要符合六个条件。一是合理的道德原则要以自由为前提。自由是不受外界的强迫,是人的自由选择,既不是个体或者阶级的显示,也不是外在给予的意念。二是合理的道德原则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康德和黑格尔的观点,真正地实现了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指出道德原则规范性的实质。三是合理的道德原则具有普遍必然性。普遍必然性是被全体大众共同接受的,具有客观性,不以主观目的为目的,不依据人的意识而转移。四是合

理的道德原则应该体现出人的尊严。应尊重每一个个体,注重人的尊严,马克思认为尊严是建立道德的依据。五是合理的道德原则应该服务于社会中人们共同持有的利益。一种正当合理的道德原则只有以人们共同的利益为目标才会被认可。六是合理的道德原则应该具有相对稳定性。国家的社会制度如果不发生变化,那么合理的道德原则就不会变化,会呈现出相对长期而稳定的状态。关于合理道德原则的构建,应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吸取西方的道德理论的精华,并对中国传统道德理论进行现代性转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合理的道德原则体系。^[5]

程立涛认为,在严格划定“人情味”和“公德心”边界的前提下,引导人们在公共生活中使“人情味”自觉服从“公德心”,是现代道德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人情味”作为中国传统乡土文明的内生物,在维系人们彼此间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市场机制和实利性因素的牵引下,其原有的积极功能遭遇不同程度的扭曲。因此“人情”之“味”既是其价值大小的估值与评判,又是对人伦交往进行道德关系上的评判。每一种道德体系都是一种“地方性语言”,它们所负载的主要是“地方性道德知识”,因此强调人们相互尊重、平等的道德才是普遍性的伦理诉求。“公德心”是19世纪末由梁启超从日本输入的伦理概念,主要表现为个人对公共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认同和自觉遵守。公德心既是现代生活健康发展的要求,又能够增进个人对陌生人和社会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强化共同体的凝聚力。学术界关于“人情味”与“公德心”冲突问题的研究,是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所引发的。“人情味”与“公德心”冲突的实质是传统文明中的部分因素与现代公共理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若任由二者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则会成为现代文明进步的巨大障碍。同时,由于价值观念的逐渐更新、道德推理机制的改变、道德评价准则的有效转换以及相关法律的完善和制度约束,我们必须把当代新的价值观建设,尤其是新伦理态度和道德价值观建设作为重点来把握。^[6]

刘雨敏、王依娜认为,如今互联网信息技术已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因此对于网络舆论环境的

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关于如何提高用网治网水平,推进网络治理法治化、精细化、科学化,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其一,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统筹推进网络治理与社会治理。网络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两者要统筹考虑,共同推进。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掌握舆论主导权。其二,理顺治理思路,健全综合治理体系,主要从完善信息收集系统、完善风险评估系统、完善纠偏介入系统、完善治理反馈系统等四个方面入手。其三,优化网络法治环境,完善网络治理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手段、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对各个网络传播平台从源头上加强管理。通过建立网络举报受理渠道,建立群防群治的社会监督治理体系和机制,提高网络媒体行业的自律水平。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让网络舆论治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其四,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建构各方参与的共同治理新格局。网络治理是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充分发挥政府有关部门的作用,更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力量,通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全社会的强大力量。^[7]

(二) 经济伦理

柴艳萍、陈晓彤认为,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是对于生产和消费的排泄物的再利用思想。首先,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变换具有必然性,物质循环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界自己原有的循环系统,也就是生态循环;另一种是,自人类和人类社会产生之后,就形成了社会经济循环,物质来源于自然界,经过人类的加工和处理,吸取“有用物质”,又会将一些“无用物质”归还给自然界。其次,循环经济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变换裂缝愈合的重要途径。资本的扩张和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同时,引发了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各种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物质能量变换过程中裂缝的加剧。马克思不仅提出了再利用和减量化思想,而且还要求清洁生产,使一些排放废物能够得到再次利用,这是解决物质变换裂缝的根本途径,从而促进人与自然共生。最后,循环经济思想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使得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三者统一发展。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会破坏生态环境系统,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循环经济明确了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新转向,具有革命性,在减少污染和浪费保持清洁生产的同时,遵循了生态循环系统的法则,促进经济的高产出、经济利益最大化。循环经济还内含社会制度的要求,希望得到社会制度的保障,来实现消耗最少的力量进行物质变换。因此,应该坚持循环经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真正和解。^[8]

柴艳萍、王晓路认为,循环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蕴含着深厚的伦理意义。循环经济的产生不仅符合经济学原则,而且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还满足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首先,循环经济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混合义务论相契合。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扬弃”,一方面打破了功利主义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没有陷入义务论的理想性“泥潭”,而是将功利和义务结合起来,对于功利论与义务论的对立或取舍问题,提出应从其产生、发展的根源和条件上去理解和解决它们。循环经济产生的目的在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而达到保护人类共同居住的家园,这一目标在更高层次上体现了功利与义务的内在统一性,与马克思主义伦理主张相一致。其次,循环经济体现环境正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要求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以及生态环境的利益,循环经济缓解环境利己主义带来的伦理危机,使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平等发展,促进各国共同繁荣。最后,循环经济明确并深化了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责任。循环经济能否得到有效落实,企业是关键的实施者。随着循环经济的不断推广和落实,企业要承担环保责任,这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同时消费者要形成新型的消费方式,要求消费者在满足物质需求的方式转向有品质、负责任的方式,循环经济是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强调物质、精神、环保消费的有机统一。总之,循环经济伦理思想体现着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新反思,具有至善性。循环经济把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人与人之间公平正义、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超越了功利主义的有限追求,突破了狭隘的人类经济利益、财富中心论的片面性,打开

了一扇伦理进步的新窗口,体现了一种新的伦理追求,也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想。^[9]

(三) 科学伦理

宋兆杰、曾晓娟从苏联时期科学伦理学出现的历史背景,科学伦理学在苏联的发展,圆桌讨论会促进了科学伦理的研究,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伦理学的发展四个方面,对科学伦理学在苏联、俄罗斯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探讨。具体来说,二战后期,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世界科学界掀起了一股反对将核物理成就用于军事目的和反人文目的的运动。20世纪60年代苏联依靠科学的力量成为与美国抗衡的国家,随着其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的伦理问题愈加凸显出来。虽然当时科学伦理在苏联已经成为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并没有得到当时苏联学术界的认可。直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两个学派对科学伦理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个是列宁格勒的拉扎尔学派,主要在科学社会学—科学学框架下对科学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另一个是弗罗洛夫学派,主要在哲学框架下对科学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科学和科学活动伦理问题。另外,圆桌讨论会促进了科学伦理的研究。参加圆桌讨论会的多为苏联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科学与伦理的相互关系,对科学与伦理关系的解读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上的。圆桌讨论会的举办奠定了系统研究科学伦理学的基础。苏联解体后,社会科学家开始转向对政策的研究和对俄罗斯民意的调查,科学活动的伦理问题再次凸显出来。现在,核电站的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断制造,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人们的头上,都在牵动着科学界敏感的神经。科学的伦理问题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迫切。学者们深刻认识到,科学成果对于社会来说是善还是恶,不仅要取决于相关政策的制定,还要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道德和伦理。^[10]

(四) 生命伦理

苏俊霞、赵红星认为,幸福是人生的一个永恒主题。孔子对幸福内涵及幸福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很多在现在看来依然有价值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孔子论述了幸福的内涵。在孔子这里,与幸福意义相当的词汇是“乐”“说”“喜”。孔子的幸福内涵按

照内容可以划分为五类：学之乐、利之乐、德之乐、名之乐、生之乐。在孔子看来，幸福是学习知识，幸福是拥有利益，幸福是拥有美德，幸福是拥有名声，幸福是拥有生命。具体来说，孔子对学习知识有一种迫切的愿望，并认为学习知识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虽然肯定人们追求利益的正当性，但并非主张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而是提出人们在追求利益时要“见利思义”和“见得思义”。虽然孔子以拥有利益为幸福，但他认识到幸福与物质之间并非具有必然性联系：虽穷仍乐，且只有贫穷的君子才会虽穷仍乐。名声属于精神范畴，孔子认为，幸福是拥有名声。在思考生命与幸福的关系时，孔子认为幸福是拥有生命并反对战争。与此同时，孔子还主张人们杀身成仁，认为人在面临生命与道义的两难选择时，应该有舍身殉道的大无畏精神。其次，孔子探讨了实现幸福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有：1. 通过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才能掌握知识，也才能获得学习的快乐。2. 人们做正当的工作获得利益，从而获得幸福。3. 修德既是人们获得德之乐的途径，也是人们获得名之乐的途径。通过“克己复礼”和“内自省”的方法修养仁德，培养中庸之德产生幸福感。4. 人们要重视养生，从而获得拥有生命的幸福。总之，孔子的幸福观对于当今社会人们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正确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1]

三、西方哲学研究

（一）基础理论研究

程志华认为，“思想”和“哲学”是从事哲学研究经常遇到的两个概念。那么“思想”与“哲学”何以可能？两者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是哲学研究甚至整个学术研究的基础性问题，所以哲学界应该对其深入探讨并予以厘清。人与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思想”。从“思想”本身的词性来讲，它有动词与名词两义。作为动词讲，它指“思考”“思维”；作为名词讲，它指“思考”“思维”的成果。“思想”的对象是“事实”和“价值”，并且“思想”在形式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通常需要通过“观念”表达。“哲学”作为一门“爱智之学”或“智慧之学”，是基于对“思想”的

“反思”，在超越层面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哲学”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哲学”是“可学”的，它基于人类理性而建立。第二，“哲学”是超越的，它研究“事实”与“价值”之超越层面。与探究形而下世界的具体问题的具体科学不同，“哲学”探究的是形而上世界的一般问题，所追求的是知识根源和终极价值。第三，“哲学”是相对的，此相对于人类理性而言：一个方面，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理性可以建构哲学，因此“哲学”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另一个方面，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尽管理性可以接近真理，但永远不会终结真理，故“哲学”是永恒发展的。“哲学”的可能性源于人作为“有限性”而对“无限性”的追求，即对于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思想”的本质特征是“自由”，而真正的“自由”乃“思想”遵从自己设定的规则，此即意味着“思想”应为自己设定规则。这里所谓的“思想”为自己设定规则，实指“哲学”为“思想”“立法”。因此，“思想”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源于“思想”；“哲学”为“思想”“立法”，“哲学”是“思想”的“首脑”。^[12]

吴三喜、张文琦从心理主义指称理论（表象）、实践主义指称理论（意蕴）、以及语言主义指称理论（能力）三个方面对指称问题进行了探讨。一般而言，指称问题指的是符号与对象之间的指涉关系问题。心理主义指称理论试图通过诉诸心理表象、意象等概念来解释指称现象，这一理论成为近代以来指称理论的代表性立场。可以说心灵哲学构成了指称理论的根基。但是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思考心灵呢？在这一起点性的问题上，海德格尔和普特南均采取了反心理主义的道路，即摈弃了经验心理学将心灵还原为诸种心理构件和机能的途径。就海德格尔而言，其独特的反心理主义心灵哲学最终是以此在生存论来加以阐明的。海德格尔将指称问题还原为源始的意蕴、意指概念问题，用世界性现象来克服心理主义的表象主义。根据海德格尔的阐述，此在的自身领悟就是世界领悟，此在与世界一道绽现、如影随形，因而如果要准确地把握此在就必须能够同样准确地把握世界，对世界之为世界的把握关键在于正确地领会世界性。由此，以心灵哲学为基础的指称理论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世界

性问题之上。就普特南而言,他继承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反对心理主义指称理论的意象说,指出指称起源于一种独特的语言运用能力。具体来说,他的反心理主义心灵哲学走向了一种功能主义,与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比较而言,功能主义带有更多自然化的色彩。不过,普特南的这种功能主义所要求的绝不是心理机能意义上的能力,而是一种不可还原的由语言输入规则和语言输出规则共同组建起来的语言运用能力。普特南的这一思想很好地继承了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并与后来布兰顿的“推论语义学”思想相呼应。海德格尔解说世界性所依据的范例是“生产世界”,尤为重视 Logos 五种含义中的第一种,可以说,海德格尔还原指称问题是一种独特的实践哲学策略。与海德格尔不同,普特南走向的却是一条由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奠定的语言哲学道路,虽然他偶尔也会谈及非语言性成分的作用。因此,海德格尔和普特南的反心理主义指称理论,在根基上反映出实践策略和语言策略的差异。实践(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关系问题被表明为指称问题中的关键所在。此外,这一问题也是研究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之关系的重要途径。^[13]

吴三喜、张文琦认为,实用主义解释学是除了当代北美解释学以及后现代解释学以外的第三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解释学。它继承了实用主义和解释学传统中的反表象主义认识论要求,对肇始于笛卡尔的近现代认识论传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实用主义解释学是哲学解释学在北美传播的成果之一,其主要代表人是罗蒂和伯恩斯坦。在精神取向上,实用主义解释学既不同于狄尔泰主义解释学,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而是更加靠近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立场。不过,罗蒂和伯恩斯坦借鉴伽达默尔思想的路径有所不同,罗蒂是从英美语言哲学的路径来接纳解释学的,而伯恩斯坦则更加注重解释学中的实践要素。以罗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解释学,以表象认识论为线索重构了笛卡尔—洛克—康德式的认识论传统,并以语言行为主义为方法论途径,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最终要求将作为知识之可能性条件的先验法则再次置入具体的语言使用规则之中,因而呈现出典型的语言哲学色彩。罗蒂更新解释学的方式根源于他的新实用主义立

场,这种立场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采用分析哲学的语言主义策略。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解释学,虽然同样以笛卡尔认识论为批判性起点,但通过对科学解释学效应、社会科学解释学效应以及哲学解释学效应的考察,将实践理性突显为关键要素,因而最终呈现出浓重的实践哲学色彩。虽然两个人更新解释学的策略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借鉴解释学资源的初衷却是一样的,即二者都意在用解释学来克服近现代哲学中的意识哲学困境,即一般所谓的笛卡尔主义传统所面临的诸种困难。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两人对近现代哲学基本困境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在罗蒂看来,这一困境明显地表现为表象主义认识论问题,而在伯恩斯坦看来,这一困境则主要是指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14]

(二) 政治哲学

冯燕芳认为,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对于拉克劳和墨菲建构领导权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在他们代表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开篇就着重分析了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并将其作为建构领导权概念极具创新性的理论资源。卢森堡结合 1905 年俄国革命,深入阐发了自发性概念,并对其特征进行分析。自发性概念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发性”发挥作用,必须以“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的觉醒”为前提。二是超越政党的人为安排。三是点燃和催生一连串的运动。卢森堡一直希望能把俄国斗争的经验运用到德国。但他发现,在德国虽然局部的工人斗争时有发生,却从未转化成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自发性”从未发挥过作用。卢森堡指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德国和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德国不具备俄国那样的革命形势。二是德国工人缺乏处于高度活跃状态的阶级本能。三是德国工会领导人对于罢工的认识以及对待罢工的态度,是进行群众罢工的一个障碍。卢森堡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时期承担政治领导,赢得并带动最广泛的无产阶级进行真正革命的、坚决的阶级行动,在革命斗争中训练工人阶级使之成为一个统一体。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既包括偶然性的特征,也包含必然性的向度。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中所包含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并不是统一的,必然

性不能为偶然性提供逻辑上的支撑,反而还会限制偶然性发挥作用。拉克劳和墨菲选择拓宽自发性概念所包含的偶然性边界,在新社会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力图将其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将多种多样的分散主体建构成政治统一体。^[15]

(三) 科学哲学

宋兆杰、曾晓娟回顾了苏联物理学的兴起、繁荣以及后期的衰落,并对它们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的苏维埃化促进了苏联物理学的快速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物理学一度处于繁荣时期。苏联物理学的兴起和繁荣有两个原因:一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已经具备物理学的基础。在18—20世纪初,俄罗斯已经出现了许多世界级的科学家,如罗蒙诺索夫、罗巴切夫斯基、门捷列夫等。二是科学的苏维埃化促进了物理研究机构扩大。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由于苏维埃政权需要发展经济,而经济的发展又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所以在苏维埃政权的支持下,物理学成为优先发展学科。苏维埃政权敦促科研机构研发国防技术以确保国家安全,而国防技术的研发与物理学密切相关,因此促进了物理研究人员及研究机构的增加。但是,苏维埃化在促进科学发展的同时,也为科学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开始对科学领域进行苏维埃化,不仅让科学按计划为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服务,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抵制西方世界,中断了俄罗斯科学家与西方国家的学术交流,使得苏联物理学逐渐脱离了世界物理学发展的轨道。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苏联科学的发展,为苏联物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衰落埋下了隐患。^[16]

(四) 雅斯贝尔斯研究

孙秀昌认为,雅斯贝尔斯是在“理性”与“生存”的致思张力间觅寻现代哲学的新生之路。他几乎对哲学史上所有伟大哲人的运思智慧都有所洞察,是视野最开阔的的哲学家之一。从雅氏思想形成的内在轨迹看,哲学史上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前哲当属康德与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列专章论说了康德,从中可以看出,雅氏对康德“先验人学”的根本精神作了决绝地捍卫,并向其“批判理性”所赋有的形式力量送去了由衷的敬意。但是,雅氏毕竟是一位重心自在的哲学家,当他以自己所

期许的“生存人学”吸纳康德时,那因着致思轨道的稍作偏移而带来的独特气象便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雅氏期许的“生存人学”固然也是一种“人学”,但其重心却落在“生存”上。二是雅氏致力的“哲学逻辑”固然也是一种诉诸“理性”的形式力量的“逻辑”,但是由“生存”的视域来审视纯形式的理性,雅氏认为具有唤醒人的力量的理性仍有待于个体生存通过自由的选择,不断地在历史与世界中对它进行补充与实现。雅氏发现了用克尔凯郭尔那种赋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生存”智慧来补充康德哲学,进而将康德哲学所开拓出来的“最为广阔的领域”充分实现出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17]

四、心理学研究

(一) 普通心理学

高志华、鲁忠义采用情感错误归因范式(AMP)和经典情感启动范式(BFP),在汉语双音节中性名词的前面加上否定或肯定词,构成“没有/有××”短语,作为启动材料,以中性俄语词或汉语情绪词为目标材料,探讨了汉语否定加工的情绪表征。高志华和鲁忠义的研究只是对简单的陈述性否定的情绪表征的初步探索,他们的结果表明,利用BFP范式仍然探测到否定的消极反应倾向,表明否定的情绪表征并未受到加工资源限制,这支持了情绪的自动化加工理论。这也进一步证明,否定中性词所带来的消极反应属于否定本身,即否定本身具有一定的情绪效价,会在情绪任务中自动激活。作者通过2个情感启动实验:情感错误归因范式(AMP)和经典情感启动范式(BFP)。在实验1的AMP范式中,刺激反应不同步(SOA)时间为200ms和500ms,结果显示,否定短语比肯定短语有显著高的消极反应概率;在实验2的BFP范式中,否定短语比肯定短语同样启动了更高的消极反应概率。实验结果表明,否定本身具有消极效价,否定加工通过消极情绪实现具身化。否定加工中的消极情绪表征表现出自动化倾向。这也就是说,否定加工的结果是以消极情绪来表征的,或者说否定可以通过消极情绪来实现具身化。因此否定的情绪表征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不随语义加工深度增加而变化,稳定地表现出消极情绪

表征。^[18]

贾宁、容丽卓等人认为,掌握程度和社会性线索都对元认知监控有影响。元认知监控中信心判断和再认答案的调整不仅受到个体学习后掌握程度的影响,还会受到社会性线索的影响。同时,元认知监测的准确性是合理控制的基础。其中,元认知监测是指个体对认知过程的认知、检索和判断;元认知控制是指个体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对认知过程的调节和加工,社会性线索作为影响元认知的重要因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掌握程度和社会性线索对元认知监测和控制的影响。实验1证实了个体掌握程度对信心判断的影响和社会性线索对信心判断的影响。实验2的结果说明其实被试的信心水平在受社会性线索影响的过程中,掌握程度还是起到了调节作用。这一结果启发极大,即在元认知监测过程中,掌握程度也可能有调节作用,但是需要更为敏感的指标。研究发现:第一,掌握程度和社会性线索独立影响元认知监测。第二,掌握程度和社会性线索显著影响元认知控制,并且掌握程度还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当掌握程度高时,个体倾向于坚持自己的最初选择,较少受到社会性线索的影响;当掌握程度越低,社会性线索的影响越大,个体倾向于坚持使自己的选择与社会性信息保持一致。最后,该研究总结了学习任务中掌握程度和社会性线索对元认知监控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思路。^[19]

贾宁、冯新明等人通过三个实验考察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对空间关系判断的影响。涉及的空间关系判断包括上下关系判断、远近关系判断和距离关系判断。实验1采用上下关系判断任务,以反应时为指标,考察当道德词在屏幕上方或者下方时,个体对其空间位置做出判断时的反应速度。实验2采用远近关系判断任务,以迫选“远近”的个数为指标,考察个体在对处于标准距离的道德词所做出的远或近的反应倾向。实验3采用距离判断任务,以距离偏差为指标,对道德概念隐喻导致的空间距离判断的偏差进行量化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实验1出现了道德概念与空间上下位置信息的匹配易化,上下判断中,在空间上方时,道德词的反应快于不道德词;在空间下方时,不道德词的反应快于道德词。实验2

显示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会引起空间关系的认知偏移,远近判断中,在空间上方时,个体更倾向于将道德词判断为“远”,即道德词更偏上;在空间下方时,没有显著的偏向。实验3揭示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认知偏移效应,在距离判断中,个体对道德词的判断出现显著的向上偏移,对不道德词的判断则出现显著的向下偏移。由此得出结论: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会影响个体对空间关系的判断,具体来说是“道德是上”的隐喻会导致空间关系判断产生“向上”的偏移效应;而“不道德是下”的隐喻则会导致空间关系判断产生“向下”的偏移效应。^[20]

解晴楠、任维聪等人通过外显评价和内隐联系两个层面考察道德概念重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已有研究表明,具体概念常通过隐喻为抽象概念提供理解与表征的途径。除了空间、视觉、温度等经验外,重量感作为一种日常的感知经验,同样也被用来表征一些抽象事物。该研究以道德重量隐喻为研究对象,从外显评价和内隐联系两个层面对其心理现实性及结构特征进行考察,于传统道德文化以及语言环境的影响下,探讨道德概念是否有其外在的重量意象体现,道德的重量隐喻是否存在于国人的认知经验当中,是否对人们的内隐观念及外显行为产生影响,以及其内部结构的特点的问题。研究假设道德概念的两极(即道德与不道德)与重量经验之间存在隐喻联系(即道德—重;不道德—轻),这种联系将使得重量经验影响到人们对道德概念的加工,表现出一种道德重量隐喻效应;而与其他隐喻效应相类似,这种道德重量隐喻效应既会表现在外显的评价决策中,又会表现在内隐的观念态度上。因此,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分别从外显及内隐两个层面对此假设进行验证。实验1采用词汇评价法,要求被试在重量维度上对165个道德词汇进行7点评分,结果表明道德词在轻重水平上的评分与不道德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在外显的主观评价层面道德概念比不道德概念更偏向于“重”的一方。实验2采用反应时技术,通过检验被试对道德、不道德词汇和轻、重鼠标之间进行联合反应的反应时,在内隐层面考察道德与重量之间的隐喻联结。结果表明被试用重鼠标对道德词做反应的速度显著快于轻鼠标,而对于不道

德词,轻重鼠标的反应差异不显著。研究结果综合表明,道德的重量隐喻存在心理现实性,但隐喻的效应更偏向于“道德—重”一方。^[21]

贾宁、魏琳等人所进行的研究旨在考察学习判断中的框架效应以及加工流畅性的影响。框架效应指当决策情境通过不同方式表达时,决策者会对情境有显著不同的理解和选择结果。判断中的框架效应的解释点主要是心理锚点假说。该研究采用逐项即时学习判断任务,通过操纵指导语来设置正向框架和负性框架。其中,实验1和实验2采用低、高相关词对探索不同程度的加工流畅性对学习判断框架效应的影响,实验1共分成三个阶段:学习与判断任务阶段、干扰任务(减法任务)阶段、回忆任务阶段。实验2采用2(任务类型:学习判断,回忆)×2(框架类型:正性框架,负性框架)两因素的混合实验设计;实验3区分加工流畅性的两个主要指标,控制编码流畅性,考察提取流畅性对学习判断框架效应的影响。并且采用2(任务类型:学习判断,回忆)×2(框架类型:正性框架,负性框架)×2(词对类型:正向词对,反向词对)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在本研究中,实验1采用了低相关词对,结果没有出现框架效应,而实验2和实验3采用高相关词对后,学习判断的框架效应就出现了。由此可以看出,词对加工流畅性影响了学习判断的框架效应,而消极心理锚点假说可以解释这一系列的实验结果。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只有高相关词对的学习判断才会出现框架效应,具体表现为相比于正性框架,负性框架下的学习判断出现显著的低估。第二,加工流畅性中的提取流畅性对框架效应没有显著影响,研究支持了消极心理锚点假说,并且推测编码流畅性是产生接影响框架效应的主要因素。^[22]

(二) 发展心理学

廖雨依、王汉林探讨了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拖延和学习倦怠三者的关系,认为学习倦怠是当今大学生群体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往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和拖延是影响学习倦怠的重要因素。在缺乏自律的环境下,拖延会加重大学生焦虑抑郁的负性情绪,进而诱发学习倦怠,而来自同学、家长、教师的社会支持既能对拖延起到有效监督,又能够通过诱发大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其学习热情,使其克服

学习倦怠状态。该研究假设大学生学习倦怠、社会支持和拖延行为三者之间存在两两相关,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有显著的负向预测,拖延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方法采用社会支持量表、学习倦怠量表和拖延问卷随机对华北地区24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23份。研究结果是社会支持与拖延行为有显著负向关系($r=-0.167$, $P<0.01$),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有显著负向关系($r=-0.195$, $P<0.01$),拖延与学习倦怠有显著正向关系($r=0.473$, $P<0.01$),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拖延和社会支持均能显著预测学习倦怠,并且中介作用显著。研究结论表明,拖延在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培养大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机的过程中,应当为其创造积极向上的社交环境,引导其多与同学、教师和父母沟通交流,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的监督鼓励作用,使大学生避免懒散拖延的作风,明确目标,积极迎接挑战,从丰富的大学生活中体验学习的乐趣。^[23]

马慧、杨超等人探讨大学生抑郁症状与人格特征及应对方式的关系,分析应对方式在人格特征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河北省某高校2015级的960名本科生作为本研究的对象,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艾森克人格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测试抑郁症状、人格特征和应对方式,分析大学生抑郁症状、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960名大学生中,SDS评分(42.47 ± 9.85)分,抑郁症状检出率15.83%(152/960);抑郁组学生内外向人格特征、掩饰性人格特征、积极应对方式评分明显低于无抑郁组。神经质人格特征、消极应对方式与抑郁症状呈显著正相关性消极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人格特征与抑郁症状间发挥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0.54%。相关研究采用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大学生抑郁症状与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应对方式是否能够在人格特征与抑郁症状之间发挥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抑郁症状与人格特征神经质因子、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神经质人格的大学生多伴有完美主义倾向与自卑倾向特征,遇到不如意之事容易诱发焦虑、抑郁情绪,所以神经质人格是预测抑

郁症状的独立危险因子。神经质人格个体在面临不良应激事件时,多选择自责、退避等消极应对行为,这也是导致抑郁症状进一步加重的原因。因此大学生抑郁症状发生率较高,与神经质人格特征、消极应对方式显著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与抑郁症状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效应。通过研究表明,高校展开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辅导和心理危机预防工作可以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的心身健康。^[24]

王景芝、陈段段等人认为,心理韧性在流动儿童自我控制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当前中国城镇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很多农民工会选择将子女带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学习、生活,使其子女也加入流动人口的大军。流动儿童能否适应和融入新的环境就成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这不仅仅关系到流动家庭的幸福和谐、儿童自身的健康成长,还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甚至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以,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尽快地融入新环境,拥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是至关重要的。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自我控制、心理韧性等。他们测量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自我控制与心理韧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假设心理韧性在自我控制和社会适应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该研究采用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和 Connor-Davidson 韧性量表对的 5 所中小学的 680 名儿童进行调查,旨在考查流动儿童的自我控制与其社会适应的关系及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在控制系统和心理韧性上的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五年级高于初一;控制系统与心理韧性、社会适应呈显著正相关,而冲动系统上则相反;心理韧性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研究表明,自我控制双系统可直接影响社会适应,也可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社会适应。^[25]

石绪亮、范方等人采用复合清晨型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和抑郁症状筛查量表对 462 名青少年进行追踪调查。目的在于探讨睡眠质量与情绪调节困难在青少年的清晨型—夜晚型偏好与抑郁症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相关分析显示,青少年的清晨型—夜晚型偏好、睡眠质量、情绪调节困难和抑郁症状之间关系显著。第一,中学生的清晨型—夜晚型偏好并

不能直接预测抑郁症状的改变。清晨型—夜晚型偏好与抑郁症状关系的整体效应值偏低 ($z = -0.20$),暗示两者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第二,清晨型—夜晚型偏好能够通过影响中学生的睡眠质量进而影响抑郁症状。相比清晨型,夜晚型的大学生报告了更差的主观睡眠质量,更多的噩梦和日间功能障碍。而较差的睡眠质量或失眠又会导致个体出现更多的情绪性问题。越倾向于夜晚型的个体在睡眠质量上越差,抑郁症状也越严重;同时,睡眠质量在节律类型与抑郁症状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第三,清晨型—夜晚型偏好还能够通过睡眠质量与情绪调节困难的链式中介作用进而影响抑郁症状。这表明个体较差的睡眠质量不仅可以直接预测抑郁症状,还可以通过情绪调节困难的中介作用间接进行预测。先前的研究也表明,较差的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间的严重不足会削弱个体有效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较差的睡眠质量及情绪调节异常可能是夜晚型个体出现更多情绪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睡眠质量和情绪调节困难在青少年清晨型—夜晚型偏好与抑郁症状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26]

(三) 应用心理学

张馨滢对中国第一代移民警官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研究。由于公安边防部队全体官兵在 2019 年 1 月 1 日零时,集体退出现役,至此,中国第一代移民警察队伍由此诞生。作为担负严守国门、为国把关重要职责的移民警官们,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和转型后身份角色的变化,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作者通过心理测试、个别访谈等方式,对中国第一代移民警官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受工作性质、生活环境、自身特质等因素影响,移民警官的心理问题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综合分析发现以下五种问题较为突出,一是边防检查标准高、任务重、责任大、心理疲劳紧张;二是考核与竞争压力大,易产生自卑、烦躁等消极情绪;三是重复的工作环境和程序,易产生厌倦心理;四是执法执勤风险和社会舆论压力大,易产生抑郁心理;五是家庭生活自责感日益增大,易产生失望、焦虑等不良情绪。提升中国第一代移民警官心理健康水平的有四种效途径:一是创新工作方法,健全心理机制。邀请心理专家,传授心理技巧;组织“心理疗养”,提供心理服务;开展放

松训练,释放工作压力;开展团体辅导,激发工作斗志。二是畅通情感交流,开展情感宣泄。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警官座谈,适时邀请警官家属参加,为警官及其家属找一个诉说困难苦恼,缓解精神压力的良好渠道。三是丰富文化生活,营造和谐氛围。因地制宜地组织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为移民警官提供丰富的“心灵鸡汤”。四是坚持人文关怀,落实从优待警。将坚持人文关怀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在职务晋升、立功授奖、福利待遇等方面向一线警官倾斜,严格落实休假制度,坚持维权护警,对暴力袭警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查处,为官兵营造和谐工作环境,减轻执勤执法压力。^[27]

王润平、崔占玲认为,不同情绪和动机状态对创造力成绩有一定影响。该研究采用了实验法的研究方法,随机选取天津商业大学本科生60名,将被试分成四组,首先进行情绪和动机诱导,再使用情绪测评量表PANAS和用途联想测验对被试进行施测,比较不同水平的创造力成绩。情绪状态分为两个维度,分别为积极情绪维度和消极情绪维度。用途联想测验分成三个维度,分别用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的好坏来测量创造性的高低。其中自变量包括情绪类型和动机水平两部分,情绪类型有快乐和悲伤两个水平,使用情绪诱导材料诱导高兴悲伤情绪,再使用情绪自评量表进行测量。动机状态有高动机和低动机两个水平,通过指导语设置不同的动机情境,高动机组使其产生奖励期待,明确说明奖励是基于其创造性的表现,表现好的人会给予物质奖励。低动机组不刺激产生奖励期待,只告知被试尽可能创造性的回答问题。因变量为创造力得分,使用用途联想测验进行测量,分为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三个维度,计算各个维度上的得分代表其创造力的高低。结果情绪类型在创造力三个维度上的主效应均不显著;动机在创造力的流畅性和变通性上的主效应影响不显著,在独特性上显著;情绪和动机的交互作用在三个维度上均不显著。^[28]

周建永认为,弗洛伊德理论博大精深,虽然真理与谬误并存,但影响深远却是不争的事实。在20世纪初,弗洛伊德理论一进入中国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对弗洛伊德理论采取了“简化”的处理方式。简化后的弗

洛伊德理论经由与艺术创作实践、其他心理学理论的融合,主要被用来对艺术创作进行阐释,从而成为中国文艺心理学建构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简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为:首先,弗洛伊德理论结构庞大、复杂,真理与谬误并存,不当简化不足以批判和借鉴;其次,研究资料不足是出现简化现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最后,文艺心理学学者自身的知识背景和理论取向,是出现简化现象的第三个原因。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化主要表现为本能理论的简化、心理人格/心理结构理论的简化和潜意识理论的简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借鉴,使文艺心理学研究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突破,这是国内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成就,也是弗洛伊德理论对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的贡献。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弗洛伊德理论批判上的偏差和理论创新方面的不足。“简化”存在过失之处,其一,批判之失。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化,直接导致在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批判时显得证据不充分,主观性过强。其二,创新之失。反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心理学,由于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简化,弗洛伊德理论的精微之处被忽略。而这些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也正是因为简化,弗洛伊德理论的价值没有被充分挖掘,进而使国内的文艺心理学在精神分析研究方面失去了创新的契机。^[29]

郝海平、范宁认为,人类在理解时间时会借助前后、上下、左右的空间方位,表现出时间空间一致性效应。时间空间一致性效应的心理现实性已经得到了证实,但是对时间空间一致性效应中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观点:量值理论和隐喻构念观。其中,隐喻构念观认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会受语言习惯、反应模式等的影响。郝海平、范宁通过三个实验,用汉语时间词从前后、上下和左右三个方向,探讨单手移动按键和口头报告两种反应模式对时间空间一致性效应的影响。以检验反应模式和汉语表达习惯是否会影响时间空间的一致性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结强度。首先,应用两个反应模式,口头反应和单手移动按键反应,以及两个时间词(过去、未来)和两个空间词(前、后)进行试验。实验发现,反应模式逆转了时间空间一致性效应的方向,按键激活了未来/前、过去/后的一致性效应,口头反应激活了未来/

后、过去/前的一致性效应。然后把空间词换为上、下,其他不变,接着进行实验。实验结果与第一次相同,不同的反应模式激活了相反的时间空间一致性效应。最后把空间词再换为左、右,进行实验。实验显示,单手移动按键反应和口头反应都激活了未来/右、过去/左的一致性效应,反应模式不影响左右方向的时间空间一致性效应。综合三个实验的分析结果可知:其一,口头反应和单手移动按键反应都会激活时间空间一致性效应。其二,前后、上下和左右方向的时间空间一致性效应会受语言习惯和反应模式的影响而产生变化,从而支持隐喻构念观。其三,汉语被试对时间概念的表征综合了命题符号和知觉符号。^[30]

(张燕京:河北大学教授,
郑甲平:河北大学博士生,
李月坤:河北大学博士生)

参考文献:

- [1] 张燕京,王路.达米特与语言哲学——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个谈话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8).
- [2] 赵贤,胡小伟.多模态逻辑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 [3] 刘东,刘叶涛.可设想性是否蕴含可能性?——兼评模态知识论领域的若干争论[J].哲学动态,2019(6).
- [4] 孙雯.近十五年应用逻辑研究的发展脉络、前沿选题及其启示——基于国外《应用逻辑杂志》的内容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2019(3).
- [5] 姚云.合理的道德原则何以可能[J].哲学动态,2019(3).
- [6] 程立涛.中国社会“人情味”与“公德心”的冲突及其消解论析[J].理论导刊,2019(6).
- [7] 刘丽敏,王依娜.营造清朗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N].河北日报,2019-01-25.
- [8] 柴艳萍,陈晓彤.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及其伦理价值[J].新华文摘,2019(3).
- [9] 柴艳萍,王晓路.循环经济的伦理特质[J].中州学刊,2019(2).
- [10] 宋兆杰,曾晓娟.科学伦理学在苏联—俄罗斯的形成与发展[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1).
- [11] 苏俊霞,赵红星.论孔子的幸福观及其现实意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12] 程志华.哲学为思想立法[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13] 吴三喜,张文琦.意蕴与能力——反心理主义指称理论的两条道路[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14] 吴三喜,张文琦.语言与实践:实用主义解释学的两条进路[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15] 冯燕芳.从卢森堡的自发性到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J].广西社会科学,2019(6).
- [16] 宋兆杰,曾晓娟.科学的苏维埃化与苏联物理学的兴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3).
- [17] 孙秀昌.雅斯贝尔斯与康德之间的思想关联[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 [18] 高志华,鲁忠义.“没有”为什么隐含着“消极情绪”?——否定加工中的情绪表征[J].心理学报,2019(2).
- [19] 贾宁,容丽卓,代景华.掌握程度和社会性线索对元认知监控的影响[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9(6).
- [20] 贾宁,冯新明,鲁忠义.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对空间关系判断的影响[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9(3).
- [21] 解晴楠,任维聪,王汉林.善与恶的重量意象:道德概念的重量隐喻研究[J].心理研究,2019(3).
- [22] 贾宁,魏琳,代景华.学习判断的框架效应:加工流畅性的影响[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9(6).
- [23] 廖雨依,王汉林.拖延在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间的中介效应[J].心理月刊,2019(6).
- [24] 马慧,杨超,刘娜,陶建刚,张力国,高红新.大学生抑郁症状与人格特征及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19(2).
- [25] 王景芝,陈段段,陈嘉妮.流动儿童自我控制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9(10).
- [26] 石绪亮,范方,曾彦莹,朱亚.青少年清晨型—夜晚型偏好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一个链式中介模型[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6).
- [27] 张馨滢.中国第一代移民警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思考[J].心理月刊,2019(11).
- [28] 王润平,崔占玲.情绪和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J].心理月刊,2019(7).
- [29] 周建永.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化”[J].心理学探新,2019(6).
- [30] 郝海平,范宁.反应模式对时间空间一致性效应的影响[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9(2).

中外哲学史研究

郝晏荣

2019 河北省学术同仁,在中外哲学史领域共推出学术成果,包括论文、专著等有 48 项之多。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有重要推进。现摘取 32 篇论文的核心观点,以飨读者。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田海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到“世界交往”概念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而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对世界交往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形成了系统的世界交往思想。《宣言》所揭示的世界交往思想,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对坚持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方法指导和价值指引。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交往而逐渐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揭露了资本全球化过程导致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必然走向。其一,世界交往的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世界交往的历史前提和物质基础。其二,世界交往的内在动力——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是推动世界交往的内在动力。其三,世界交往的空间布展——世界市场。资本的逻辑是推动世界交往的内在动力,但从社会现实来看,世界市场的形成才真正使得交往的全球拓展成为可能。其四,世界交往的二重特性——空间断裂。这种从属的、不平等的交往使社会空间形态呈现出全球范围中心与边缘、主导与依赖的两极化空间形态,造成了全球空间结构的断裂。其五,世界交往的发展趋向——人的自由发展。《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揭示了整个世界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克服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而形成一个全新的“联合体”,揭示了人的自由发展是世界交往的目标指向和价值旨归。^[1]

田海舰认为,《共产党宣言》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宣言》的现代性批判并非抽象性批判而是实践性批判、现实性批判。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是变革世界的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最本质、最显著的特征。其二,《宣言》的现代性批判并非局部性批判而是总体性批判、整体性批判,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局限、阶级立场、思维方法的总体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是集形而上学批判、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经济学于一体的综合批判。其三,《宣言》的现代性批判并非片面性批判而是辩证性批判、全面性批判。它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辩证分析,在指出它与此前的其他社会制度相比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亦指出了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和历史过渡性,揭示了其终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发展趋势。其四,《宣言》的现代性批判并非僵化批判而是动态性批判、世界历史性批判。《宣言》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加以考察,特别是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加以透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仅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支世界历史性力量,而且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两种现代化发展模式。^[2]

李维意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立足唯物史观的哲学视角,从空间批判的维度揭示了资产阶级对“世界历史”的建设性和破坏性,论证了人类历史取代世界历史的经济必然性。在空间探索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拓展了物理—地理空间、重组了社会—经济空间、变迁了文化—心理空间;在空间意蕴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空间化本质是资本全球化,空间化形塑则表现为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即全球空间同质化和异质化的过程,空间化特征则表现为资本全球空间断裂所产生的“马太效应”;在空间批判上,马

克思的世界历史批判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落后国家空间、进行生态殖民主义的丑恶行径,揭露了虚拟资本恶性膨胀和全球经济风险问题,表达了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历史最终将被共产主义所主导的人类历史所代替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理想。马克思对资本空间运动的分析基于三个基本维度:一是时间维度,即用“世界历史”范畴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如何突破民族地域界限,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二是空间维度,即用“世界市场”范畴分析资产阶级瓜分世界市场的历史动机,揭露其在等价交换掩盖下的“空间剥夺”本质;三是批判维度,即用“殖民主义”范畴揭示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根本性质是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3]

李维意提出,时间与空间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尺度,是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基本维度。马克思、恩格斯对空间哲学的探讨是与其唯物史观的发展同步的。马克思空间的社会逻辑研究主要是全面揭示空间的社会本质,阐明社会运动的空间存在方式。空间是万物的存在形式、实践的布展场域和生命的寄寓处所。人首先在一定的空间持存和展开,并通过生产和交往塑造着社会空间形态。由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由自然空间向社会空间、由物理空间向人文空间的转化,只能当做实践去理解。马克思空间的社会逻辑研究,关注空间的社会化和空间的社会化、关注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空间统一性。在实践基础上,空间的社会化形塑和社会的空间化厝置是同一过程,其本质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相互建构。只有把握了空间的社会性才能揭示它的现实本质。空间作为生产要素是前提,同时,空间本身又是社会生产的结果。马克思对空间社会化重构的解释,是以生产方式为轴心的,尤其是重点解剖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对社会历史空间的形塑,揭示了资本旋风导致的空间异化,并且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空间解放诉求。西方空间理论家断言马克思存在空间理论“空场”、存在“时间偏好”。我们的研究要证明,马克思是一位真正的空间哲学家,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阐明了社会空间的实践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实现了空间哲学的革命性变革。^[4]

田海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于 1845 年秋

至 1846 年 5 月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现实的人为前提和出发点,阐释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分析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与规律。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了“交往”范畴的含义,分析了交往的前提、媒介、内容、形式和结果,阐述了交往与生产、交往与分工的关系,揭示了交往在社会共同体的演进、世界交往的形成和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交往的内在动力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形成的系统交往思想,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的”交往观,为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对新时代我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遵循。《形态》所系统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现了对全球化取向的洞察和前瞻,经济全球化说到底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交往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能解决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当今时代,“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根据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进行深刻思考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朝向普遍交往推进的,因而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应加强合作,同舟共济,打造国际合作平台,促进普遍交往,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5]

王永芹提出,信仰是信仰主体对信仰客体基于相信基础上的内心确信。如果仅从学理上去分析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学说的确证性,显然无法说清楚它是如何被无产阶级奉为圭臬的。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挫折,马克思主义信仰之殇在世界各地弥漫。许多国家共产党都陷入迷茫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还能坚持多久?在短暂迷茫之后,各国共产党在深刻反思和总结中发现,苏东垮台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而恰恰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导致在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出现重大失误的结果。因此,苏东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败,更不是共

产主义的失败。各国共产党重振精神,依据本国的现实环境,展开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探索。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判断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不断深化和正确把握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理理论前沿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也为坚定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依靠信仰立党、建党、兴党,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和信心是广大民众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动因。在当前复杂的执政环境中,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也复杂多样,困扰最甚的就是信仰问题、腐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两手抓,一方面,通过开展系列教育活动,重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权威,把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作为从严治党的“总开关”,补足全党“精神之钙”。另一方面,开展从严治党,“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和“刮骨疗毒”的勇气,一边剑指沉痾顽疾,一边扎牢制度笼子,许多积年陈弊得到有效整治,困扰已久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根本性改变,从源头上杜绝任何“颠覆性错误”发生的可能,党内外呈现出崭新的政治生态,党心民意为之振奋,从根本上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中,看到了无产阶级政党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众基础因此而更加稳固坚实。^[6]

李维意提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深刻揭示了资本空间化所遵循的3大历史逻辑,即资本积累的驱动逻辑、资本生产的空间逻辑和资本形态的裂变逻辑。从资本积累驱动逻辑看,马克思剖析了原始积累和过度积累的方式,揭示了从原始积累向过度积累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资本生产空间逻辑看,马克思论证了资本空间化过程和空间资本化结果的统一,揭示了资本文明表象背后的野蛮本性。从资本形态裂变逻辑看,马克思分析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

本的循环,揭示了资本具有自我形态创新的能力。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必然以不断扩大资本供应为先决条件来扩大生产规模并进行技术创新。资本为了维持自身发展不得不扩大自身规模,最终选择累进的积累,其结果必然走向过度积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竞争的自发性与无序性表明其内在“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倾向”。从马克思时代到当代,资本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经历了从单一形态到资本形态体系的形成。从最初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等实体资本主导,到金融资本的出现,再到虚拟资本主导,经济结构也由基于实体资本的工业轴心转向基于虚拟资本的后工业轴心。在当代,深入研究资本形态的类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是正确把握经济转型和走向的入口,而抓住资本形态更新的契机,打造新的经济形态,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7]

李维意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推动了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革命,其直接后果是民族交往向世界交往的跨越。世界交往具有三大空间效应:一是世界交往的时空转换效应。世界交往成功地实现了“用时间换取空间”和“用空间集约时间”,推动了资本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创造了资本文明的奇迹。二是世界交往的“空间剥夺”效应。世界交往把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扩展到整个世界,成功地实现了对落后民族、国家的“空间剥夺”。“空间剥夺”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视角和内容。三是世界交往的空间解放效应。资本空间解放虽然创造了文明奇迹,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无产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成为空间解放的主体力量,进而颠覆资本空间、解放劳动空间。劳动空间解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国”的飞跃。马克思追求的劳动空间解放是使无产阶级从资本空间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从资本空间解放到劳动空间解放是大工业和世界交往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劳动空间解放既继承了资本空间解放的积极成果又克服了资本空间解放的历史局限。随着世界交往的发展,无产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成为空间解放的主体力量。劳动空间解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自由王国”的旨趣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去消灭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追求人的彻底解放”。“自由王国”是精神空间革命与物质空间革命的统一。在“自由王国”，劳动阶级将成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主人，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8]人。

宫敬才指出，在马克思语境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重要且出现频率最高的范畴之一，指称的具体内容如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生产关系、劳动生产条件、生产力发展形式、生产得以进行的物质技术形式、生产得以进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与消费的联结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商品性、工艺学、内在动力、革命性、人学和法权六个方面的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内容和特点的再现使人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哲学气质，人们对生产方式的习惯性理解与马克思语境中的原生态意蕴并不完全一致，直接表现是简单化。什么是生产方式？源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解释非常流行，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这样的解释与马克思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其一，如此界定生产方式范畴确实具有马克思的论述根据。其二，如此界定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有简单化之嫌，本属于这一范畴的大量含义被丢弃。马克思的论述涉及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同行业之间生产方式革命的连锁反应，另一种是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生产方式革命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影响。两种情况都表明，在既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前提下，生产方式会发生变化。如果生产方式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那么，生产方式变化的前提之一是生产关系变化。马克思论述指称的事实表明，生产方式变化有时并不以生产关系变化为前提。由此可见，生产方式并不完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9]

宫敬才指出，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四种形式表示存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命题中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从形成史角度看，青年恩格斯是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启蒙者和领路人。1859年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书评是起点，往后的思想进程情势大变，恩格斯的主

观愿望是在捍卫、阐释和宣传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体系，即后人命名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恩格斯逝世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进而演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哲学体系则是被忽略，消失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黑洞之中，原因是没有表示存在的理论逻辑空间。政治经济学命题中存在哲学性内容是客观事实，也是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存在哲学性内容论断的必然性结论。既然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存在哲学性内容，那么，范畴展开所形成的判断中怎么能不存在哲学性内容呢？在马克思文献中，包含丰富哲学性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多到无法计数的程度。恢复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表示存在的天然权利，才会有名实相符因而名正言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0]

宫敬才指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是互为内生变量的关系，关系性质决定了马克思原生态学是劳动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语境中，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马克思自己如何看待这一关系。《序言》表明，马克思认为二者之间是结为一体、互为支撑因而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对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因、过程、结果和代表性文献的介绍证明了这一点。第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研究关系。《序言》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同时是哲学研究过程，马克思举出的例证主要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这几种文献具有哲学性质，但它们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有直接关系，是三大笔记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哲学性提升和概括。如果提及《序言》未能顾涉但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齐头并进且互为支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便能更明确地感悟到这一点。第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理论关系。这二者互为内生变量，政治经济学是哲学的内生变量，哲学是政治经济学的内生变量，二者之间是相互包含因而无法分割的关系。始自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学科性，人为分割是出于批判杜林的需要而不得不如此的做法，不能作为正面正式的提法加以接受。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到逝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性质始终如此。^[11]

宫敬才认为,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分析”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极力反对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主张运用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方法和理性选择方法。马克思对自己的哲学分析框架有明确界定:“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马克思的哲学分析框架是主、客体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哲学分析框架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认识和实践涉及的对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借用分析哲学技术,外加自己的想象,对马克思文献中的经济哲学进行分析,实际造成了曲解和误解。用马克思经济哲学标准衡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既不“分析”,也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意相去甚远,所谓“辩护”“修正”和“重建”,本质是借马克思之名说自己的话。这些“话”具有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外观,精神实质却南辕北辙。^[12]

宫敬才指出,任何政治经济学都具有哲学性质,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不例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哲学性质是客观事实,从不同角度看这一事实会呈现不同的结果:随机角度呈现出来的是众多经济哲学观点;自成体系角度呈现出来的是劳动历史唯物主义;微观角度呈现出来的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命题中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元经济哲学角度呈现出来的是政治经济学逻辑前提论、经济哲学本体论、经济哲学价值论、经济哲学历史观和经济哲学方法论。不同角度呈现的结果证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独树一帜的哲学性质,是哲学经济学和人学经济学。经济哲学历史观被持续地关注和研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人学理论,但问题明显可见,它们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联系被削弱甚至被虚无化,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它们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无关的纯哲学。逻辑前提论只是近些年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被人们提及和研究,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已被虚无化。^[13]

李维意指出,实现个人解放是马克思学说的主旨。对个人解放问题的研究,倾注了马克思毕生的心血。马克思解放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但是,“现实的个人”在资产阶级创造的资本空间中发生了个体与类的严重分裂,社会空间日益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从资本空间终结到劳动空间解放经历了一个逻辑转换。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推动这种逻辑转换的物质力量。资本空间化逻辑包含着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趋势,同质化是肯定性逻辑,异质化是否定性逻辑。异质化蕴含着劳动空间解放的力量。实现“现实的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成为空间解放的主体力量。“现实的个人”空间解放的目标是客体维度的“自由王国”和主体维度的“自由个性”。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为“现实的个人”的空间解放提供了条件。走向“现实的个人”解放的自由王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条件。^[14]

二、中国哲学史

许春华指出,“慈”作为《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上承道、德形上本体,下连宇宙万有众生,是生命挚爱的承载与担当,亦是生命精神的遍在与动源,更是生命价值的体现。通过对老子之“慈”与孔子之“仁”的比较,对“孝慈”概念“思想聚焦”现象的解读,以及“慈”对日常生活之“爱”的超越,已经透显出“慈”在老子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慈”爱乃“无心”之爱,“无心”即无欲无求之“心”。其分别体现为“赤子心”“同情心”和“悲悯心”。以天性、本然、醇和、惠柔、同情、悲悯、挚爱等元素构成的老子之“慈”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组合而成的慈爱、慈善、慈悲、慈祥、慈和、慈柔、慈忍、慈性、慈心、慈惠、慈晖、慈明、慈命、慈航、慈景、慈颜、慈容、慈良等一系列词汇,已然固化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之中。徐复观认为,老子之“慈”与孔子之“仁”同样“是忧患意识的更深的表现,是中国伟大思想家必有的性格”,二者“实有其精神的会通点”。“仁”“慈”之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和智慧资源,存有人类文

明“内在的普遍性”元素，在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应当成为各民族普遍共享的人类共同价值。^[15]

李振纲指出，《周易》用以占筮的“数”带有原始思维的神秘性，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是，在其神秘的形式下又蕴含着某些理性的因素，它使走出“原始思维”实现哲学突破成为可能。对这一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逻辑还原，需要从“前《易经》—《易经》—《易传》”三个时间节点加以把握。不难设想，在《易经》成书前，“占卜”“占筮”的术数活动已很流行，从殷商甲骨卜辞及《周易》卦爻辞可以推知，远古先民无论遇到自然界的异常变化诸如雷电、日食、月食、旱涝灾害、怪异星象，还是战争、商旅、迁徙、农事、祭祀、婚姻等重要社会活动，或是做了噩梦、得了疾病、有了身孕、迷失道路，甚至偶尔看到一只鸿雁飞过，房屋的栋梁弯曲，两只鹤在树荫间鸣叫，诸如此类，都会惊悸不安，继而产生神秘的联想，于是通过龟卜、蓍筮探问“神秘的原因”并祈求福佑。这是典型的原始思维，《易经》成书后，“原始思维”的情形有了明显不同，标志着学会使用文字的中华民族开始努力谋求从经验中把握普遍原理，并通过文字把这种把握凝结为普遍形式。^[16]

许卉指出，在汉唐儒家经学体系中，《孝经》具有核心地位。朱熹在构建以“四书”为根基的理学体系过程中，对《孝经》的权威性进行质疑，并对其文字进行删改，从而颠覆了《孝经》的传统地位。黄道周通过对宋明时期具有支配地位的朱熹《孝经》学的反驳与厘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孝经》学。他认为《孝经》是“六经之本”“治化之纲领”；肯定了《孝经》文本的权威性、完整性，认为《孝经》皆“夫子本语”，不分经传，努力恢复《孝经》原貌；从新的角度阐释“严父配天”，突出孝道的普世性、超越性。黄道周的《孝经》学被后人极为推崇，俨然成为明代《孝经》学的一个高峰。黄道周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努力破除朱熹《孝经》学的影响，通过回答朱熹对《孝经》的质疑，重新确立《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努力恢复《孝经》文本原貌，为孝治天下提供权威性理论根据。在对朱熹《孝

经》学批评和廓清的基础上，黄道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孝经》学思想。他的思想体现出晚明《孝经》学乃至晚明儒学发展的动向。^[17]

许卉指出，在晚明《孝经》学思潮及宋明《孝经》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影响下，黄道周对《孝经》极为推崇，他所作的《孝经》改本和外传对《孝经》义理和思想价值进行了系统而富有特色的阐发和重构，积极清理朱熹《孝经刊误》的影响，对推动晚明《孝经》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对黄道周的《孝经》改本和外传进行分析和讨论，阐释改本和外传的缘起、文本特点和思想价值，彰显其在《孝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 黄道周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思想的成熟，越发尊经崇圣，主张无需擅改文本内容。2. 黄道周作《孝经集传》，对《孝经》旨意的重新阐发和《孝经》奥义的再次挖掘亦需要尊重经典，所以不再作改动。总体来讲，黄道周对《孝经》的改动不大，其结构、内容并没有大的删削，只是一些字、句的改动和调整。即使增添的部分，也是其恢复古文旧本原貌的诉求，且后来在《孝经集传》中没有出现，表现出黄道周对《孝经》文本原貌的推崇和重视。^[18]

许春华指出，在荀子的思想视野中，“性”“情”“欲”三者之共同性在于都是天性的、自然的，自身不包含任何社会价值。“乐”只是“六情”或“七情”中的一种，和喜、怒、哀、爱、恶一样，都是人性中自然具有的。生命情感乃“乐”之生发根源，这种自然天性情感为“天情”；“乐”有“适情”“安情”之作用。“道”乃“乐”教化之道，是一种人伦关系之道、社会理性之道、礼乐调适之道；“雅颂之声”不仅从外在的社会伦理引导、教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情感，而且深入内心之“情性”，感动人之“善心”；“道”既是一种由外向内的价值导引，又是一种由内向外的情感体验，这种双重转化的价值效应，凸显了荀子乐论思想的独特性。“中和”是“乐”的一种工夫路径，它既有生命根源之地由内向外的情感流动和畅显，亦有“正身”“安国”乃至“宁天下”的工夫效应，它开拓了“乐”通向“美”与“善”的路径。“美善相乐”乃“乐”之理想境界，“乐”之情感是艺术情感与道德情感的统一，“乐”之理性是审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统

一,“乐”之规则是审美原则与道德原则的统一。荀子“美善相乐”思想是对孔门儒学“尽善尽美”乐论境界的传承与发扬,早期儒学存续的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的礼乐精神传统奠基了中华民族对“乐”之教化功能、善美内涵、最高境界的理想构筑。^[19]

周立斌认为,《心之力》是青年毛泽东在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基础上阐述自己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典型的作品。在《心之力》中,青年毛泽东对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的创造性阐发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王阳明宇宙观的创造性阐发。第二,对王阳明心学实践观的创造性阐发。第三,对王阳明心学价值观的创造性阐发。《心之力》这篇文章,虽然充满了浓厚的王阳明心学思想的色彩,但对当时的毛泽东及时代都是有理论价值的。因为,我们看待历史人物及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应当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方面的观点和主张,即从当时的时代和阶级立场出发,辩证地看他们的思想和成就,而不是苛求地从当今的时代和天生圣人的角度出发,一味地求全责备古人或历史人物。在毛泽东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一度成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础。毛泽东不仅用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解释世界,更用其指导自己的人生。^[20]

王士良指出,为应对近代自然科学与思维方式对儒家的冲击,使传统儒学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康有为采取了“续制新义”的方式,对近代科学进行了儒家式解读。他认识到“智”作为穷理知化的自然科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康氏推崇“智”,但依然将“仁”视为宇宙运行的最终目的。“仁”与“智”是人的主体性的两个方面,要求人类在同情和爱护自然的前提下认识和改造自然。这正是儒家的传统,亦是“天人合一”的内在要求。从世界历史来看,这个时期也是人类逐渐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的时期。康有为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儒家式解读与他的孔教思想及政治主张,共同构成了其思想脉络中的三条轨迹。这既是探寻儒家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价值的一种尝试,亦体现了儒家价值与科学的统一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站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化及中西交流融会这一历史背景和思想史的视野下,徐光启、康有为均

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他们的思想极具张力,涉及古今中西诸多内容,其对于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危机的应对以及中西文化融合,实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和普遍性意义。^[21]

李宏亮提出,宋朝贤能政治有其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第一,缺乏创新精神。统治者墨守清规戒律,在“法先王之法”的幌子下,维持现状,得过且过。各级官吏更是争相效尤,“在相位者多循默”,文武百官多以“因循默为得计”,不知通融变革,到北宋中期,官僚士大夫中的保守势力更加嚣张。司马光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论调,枢密使文彦博也认为“祖宗之法俱在,不须更张”。北宋王朝自上而下,已形成了一股顽固的保守势力。第二,崇尚文学空谈,缺乏实干精神。整个宋朝,空谈议论的风气盛行。君臣对唱,粉饰太平,议论之风蔓延朝野。多数官员以学问相高,以议论相尚,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不是积极地采取措施进行解决,而是彼此争论不休。第三,朋党纷争,宗派主义严重。他们交相纷争,唯胜是求。这种党争最初是围绕着变法进行的,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渐渐失去了是非标准,完全成为官僚士大夫们的意气之争。一方得势,全盘否定对方;另一方上台又反攻倒算,其给北宋政治造成了极坏的后果。第四,不务实际,崇尚虚名。历代宿儒们都耻言“功”“利”,宋代士大夫们尤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王朝只能满足于大国的虚荣和道的自慰,却很少关心国民的富强。这也是宋代受尽屈辱的原因所在。^[22]

程志华指出,王船山的观点是佛教背弃儒家伦理道德,可谓“同于盗贼禽兽尔”,此乃“绝可惧者”。究其原因,就“佛性论”讲,佛教所论“佛性”只是“作用之性”,而非“本体之性”,故其所论必为肤浅之论。就“空论”讲,事物乃“阴”“阳”二气纲缊而生,特性亦事物所固有,而佛教“谓实不可居而有为妄”,“知有之有而不知无之有”,故亦为肤浅之论。就“修行论”讲,其所主张者根本不属于真正的修行,反而如同奸商“不劳而获”,故而为不可能之事。基于此,佛教为“坏人心、隳治理”之“虚诞无实之淫辞”。依王船山的理解,上述即为其在“喻义”层面对佛教“所以立者”的指摘,而这些指摘可避免范缜和韩愈在“喻利”

层面辟佛的弊端。公允地讲,王船山所论既有合理之处,也有偏激不可取之处。合理可取之处在于,他的确深入到“喻义”层面对佛教义理进行了辨析和指摘,此为范缜和韩愈所不及者。偏激之处在于,他完全未正视佛教义理亦有的合理面,对佛教义理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23]

程志华认为,在唐君毅看来,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一种深切的肯定人生之苦罪之存在,并自觉自己去除苦难之能力有限,而发生忏悔心,化出悲悯心;由此忏悔心悲悯心,以接受呈现一超越的精神力量,便去从事道德文化实践之精神。对超越的追求所体现的也不是个人的“私心”,而是人类的“公心”,即是一种“宇宙之正义或大法”,即是“善之必主宰客观宇宙”的共同信仰。在唐君毅看来,此人类“公心”包含着两个原则:一是“有罪则当受苦,使罪得罚而苦罪皆去除”;二是“无罪之受苦,应被补偿”。这两个原则无论哪一个都不是仅凭人类本身所能解决的,因此,若要保证这两个原则在现实层面的实现,就必须在超越层面“设定”灵魂不朽与求神之存在;否则,别无他途。可见,是出于这份“公心”的“需要”,灵魂不朽与神之存在才“成为”了必然;在此基础之上,各式各样的宗教才得以“产生”。唐君毅说:“吾人如知人之宗教信仰包含:恶必由苦痛惩罚而被去除,善必由福而保存二原则之信仰,则知最高宗教信仰中,宜须包含灵魂不朽与客观普遍之神之存在二信仰。”因此,神存在成为宗教本身的大问题,无论犹太教、基督教,还是婆罗门教、佛教,几乎所有的宗教均肯定神的必然存在。人类的宗教精神虽然产生于“轴心时代”,但其产生具有当然的、必然的合理性。^[24]

李振纲提出,“生”是儒道哲学的核心价值。偏离“生生”原理,则有与无、始与终、一与多、同与异、心与物等的差异、对立、矛盾就缺少统一、转化的基础,现象界与本体界也就得不到通贯融洽的理解;立足于“生生之德”亦即宇宙万物生命的内在性原理说明世界存在的根据,现象界与本体界的矛盾、差异、对立才能找到统一性的逻辑前提或内在依据。《周易》哲学独步古今的理论魅力就在这个“生”的哲学上。“生生之德”作为宇宙本体或万有最高原理、绝对依据即“太极”。《周易》“太极”生

生本体论所涵藏孕育的生命智慧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25]

程志华提出,“思想”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它有动词和名词两义。作为动词讲,它指“思考”或“思维”;作为名词讲,它指“思考”“思维”的成果。不过,“思想”并不同于“意见”,因为它乃经过理性思考得出的相对稳定性的理论。“思想”的可能性在于它乃“人”的自然属性,即为不可否认的、经验性的事实。“哲学”作为一门“爱智之学”或智慧之学,是基于对“思想”的“反思”,为在超越层面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哲学”的可能性源于人作为“有限性”而对“无限性”的追求,即对于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而且,“思想”的本质特征是“自由”,而真正的“自由”乃“思想”遵从自己设定的规则,此即意味着“思想”应为自己设定规则。在此,所谓“思想”为自己设定规则,实指“哲学”为“思想”“立法”。从“技”或“用”的层面讲,“哲学”为“思想”“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维护“思想”“自由”的权利;二是对“思想”设定“规范”、施以限制。从“道”或“体”的层面讲,“哲学”为“思想”“立法”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思想”提供“知识之源”;二是为“思想”提供“价值之源”。总之,“思想”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源于“思想”;“哲学”为“思想”“立法”,“哲学”是“思想”的“首脑”。^[26]

程志华认为,“轴心时代”以后中国哲学的原创性下降了。在这个时期,西方哲学新学说不断涌现,为塑造近代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则多湮灭于历史长河,儒家虽未灭绝却总体上呈现衰落趋势。哲学理论创新的确是一个难题,因为哲学研究大多属于个体劳动,哲学学说的创立并没有规律。不过,哲学创新仍是可以探讨的问题,而由“诠释”切入便是一个重要角度。就哲学史来看,若要从事哲学研究,诠释往往是前提性的;如果没有哲学诠释,便很难有哲学创制。就中国哲学来讲,通常的诠释理路可概括为两种:一是“外在诠释”。所谓“外在诠释”,指诠释者的重点在于跳出概念、义理本身,探究时代背景对概念、义理的影响,并揭示概念、义理的社会功能。二是“内在诠释”。

所谓“内在诠释”，指诠释的重点为在概念、义理框架内进行诠释，侧重寻求概念间的联系和义理间的递进，而不过多涉及时代背景和社会功能。实际上，“内在诠释”本身即是哲学理路，故用于哲学研究更为“匹配”。既然如此，在治哲学时就应采取“内在诠释”理路，而不是“外在诠释”理路。^[27]

三、西方哲学史

冯燕芳指出，在批判黑格尔“一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历史观的过程中，在阐发、论证马克思“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和历史观的过程中，阿尔都塞表达了自己对“多元决定”的看法，建构了自己的多元决定理论。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矛盾观为拉克劳和墨菲分析和认识新社会运动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不得不说，矛盾的结构性和复杂性、不平衡性有利于深刻认识新社会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结束。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矛盾观为拉克劳和墨菲建构“接合”理论打开了可能性。阿尔都塞认为，单纯的经济因素并不能引起社会历史的变革，它必须通过上层建筑等政治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假如经济因素起“最后决定”作用、“归根到底”的作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他因素必然都从属于经济，受经济因素的支配或决定，那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或者回到其反面，即经济决定，或者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前者的可能性极小，因为经济决定论正是阿尔都塞明确批判的立场，阿尔都塞不可能退回到其对立面。后者成立的可能性较大。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以经济决定为前提，在经济决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谈论其他因素的决定作用。那么，多元决定发挥作用的范围是极其狭小的。^[28]

冯燕芳认为，罗莎·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波兰、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卢森堡不仅对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而且写了不少宣传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文章。卢森堡结合1905年俄国革命深入阐发了自发性概念，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的觉醒”为前提，超越政党的人为安排，点燃和催生一连串的运动。德国始终没有发生像俄国一样的自发性革命斗

争，卢森堡认为原因在于德国不具备俄国那样的革命形势，德国工人缺乏处于高度活跃状态的阶级本能、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德国工会领导人对于罢工的认识不足以及对待罢工态度消极。卢森堡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革命时期承担政治领导，加速事物的发展，赢得并带动最广泛的无产阶级进行真正革命的、坚决的阶级行动，在革命斗争中训练工人阶级使之成为一个统一体。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选择拓宽自发性概念所包含的偶然性边界，研究统一政治主体的建构机制，作为建构领导权概念的重要理论来源。^[29]

张燕京认为，达米特是最好的弗雷格学者，是杰出的分析哲学家。他探讨的都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性问题，他考虑的问题是先验的，考虑问题的方式是逻辑的。达米特框架是达米特对意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关于force的理论是超出了弗雷格基本思想和理论的。达米特关于形而上学基础的讨论，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讨论的重大理论意义，会在今后哲学的发展中日益彰显。达米特与戴维森都在弗雷格的基础上向前走，但是二者向前走的方式不同：达米特框架和T语句显然是不同的。语言哲学所说的语言分析与一般人（包括日常语言学派）所说的分析语言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它要基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哲学不是分析语言，而是借助语言分析来做事情。分析哲学不是孤立的东西，应该放在整个哲学史中来考虑。亚里士多德、康德、胡塞尔，一直到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再到奎因、达米特、戴维森等人，他们的研究都是先验的，他们的方法都是技术性的，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深入思考了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他们是形而上学的荣耀，也是哲学的荣耀。^[30]

宋兆杰指出，20世纪60年代，科学伦理学在苏联已经成为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对科学伦理学进行深入研究的有两个学派：一个是列宁格勒的拉扎尔学派，主要在科学社会学—科学学框架下对科学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另一个是莫斯科的弗罗洛夫学派，主要在哲学框架下对科学伦理问题进行研究。苏联时期，对科学伦理问题研究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的是一个主题为“科学·伦理·人

文”的圆桌讨论会,参加圆桌讨论会的多为苏联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其中有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他们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科学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他们对科学与伦理关系的解读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上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然重视伦理学的研究。2000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论文集《科学社会学》里面,收集的文章有些是涉及科学伦理学的。^[31]

(郝晏荣: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田海舰.《共产党宣言》的世界交往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2019(3).
- [2] 田海舰.《共产党宣言》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4).
- [3] 李维意.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空间批判维度[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4] 李维意.试论马克思空间哲学的当代建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
- [5] 田海舰.再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交往思想[J].思想教育研究,2019(10).
- [6] 王永芹.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历史发展中生成·弥坚·致远[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8).
- [7] 李维意.论马克思资本空间化的历史逻辑[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 [8] 李维意.论世界交往的空间效应[J].哲学研究,2019(10).
- [9] 宫敬才.马克思语境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和特点[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10] 宫敬才.恩格斯与马克思经济哲学体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11] 宫敬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的节点意义[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6).
- [12] 宫敬才.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2).
- [13] 宫敬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性质问题论纲[J].河北学刊,2019(3).
- [14] 李维意.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空间解放的历史逻辑[J].江西社会科学,2019(2).
- [15] 许春华.《老子》之“慈”释义[J].哲学研究,2019(2).
- [16] 李振纲.从《易》“数”看原始思维的哲学突破[J].哲学研究,2019(6).
- [17] 许卉.论黄道周的《孝经》学思想[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 [18] 许卉.黄道周的《孝经》改本与外传析论[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19] 许春华.美善相乐——荀子《乐论》思想理路发微[J].邯郸学院学报,2019(3).
- [20] 周立斌.论王阳明心学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J].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论丛,2019(4).
- [21] 王士良.康有为对近代科学的儒家式解读及其意义[J].原道,第36辑.
- [22] 李宏亮.宋代选贤政治中的制度架构与现实弊端[J].宋史研究论丛,第24辑.
- [23] 程志华.攻其所以立者——王船山对于佛教义理的指摘[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24] 程志华.将孔、释、耶、穆及祖先揖入一堂——唐君毅之新宗教思想[J].当代儒学,第13辑.
- [25] 李振纲.生生视域下的“太极”说——以太极生生思想的历史演进为线索[J].周易研究 2019(3).
- [26] 程志华.哲学为思想立法[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27] 程志华.中国哲学诠释四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
- [28] 冯燕芳.阿尔都塞的及多元决定其对后马克思主义建构的意义[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 [29] 冯燕芳.从卢森堡的自发性到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J].广西社会科学,2019(6).
- [30] 张燕京.达米特与语言哲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8).
- [31] 宋兆杰.科学伦理学在苏联—俄罗斯的形成与发展[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1).

法学

法学理论综述

董颖

2019年河北法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特点,除继续开展依法治国相关理论问题研究、党内法规研究、宋代法制研究、法学教育研究等,还在跨学科研究中有所涉猎,并关注到社科研究的新领域。

一、法治中国建设

(一) 公民理性精神成长的法治意义

马长山、李金枝认为,70年的新中国发展历程,不仅实现了向民主和法治国家的重大转型,而且人们的规则意识不断增强、权利义务观念渐入人心、民主参与诉求不断上升、监督制约观念日益强化,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内生动力及深层支撑。在公民精神理性成长的过程中,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发展不够平衡,导致人们的公民意识出现不平衡。进而使得法治实施的非均衡性持续凸显,特别是不同社会成员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守法能力落差日益增大。二是发挥不够充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上,也体现在政治发展上,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不充分。如为自己维权的参与远比为公共利益的参与更积极、更投入,城市居民的民主参与程度要明显高于农业转移人口,民主参与走形式、走过场的情况还不时出现,实质化的民主参与有待提高。三是理性程度不足,国家与社会、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待完善。必须通过贯彻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扩大智慧社会治理的公民参与空间,推进国民法治教育,培育理性公民精神。进而确保公民精神健康发展,并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1]

(二) 习近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文化基础

王宝治、陈康帅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

法治重要论述的文化基础,认为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对于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他的法治思想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中华传统法治文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础和灵魂,中华传统法治文化的思想理念与当代法治建设理念一脉相承。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重要论述也是对老一辈领导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不断出现新矛盾、新事物,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结历史经验,借鉴法家思想的经典,吸收了古代韩非子的奉法、变法、法不阿贵、以法制权思想的合理内容。在提出依法治国的同时进一步明确要完善法律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近代严复的民本思想和权力制衡监督理念也成为习近平依法治国理论的文化基础之一,突出表现在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推进法治现代化建设。而从孙中山的宪政思想到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的立法原则再到邓小平同志加快经济领域的立法,江泽民同志确立法治建设的目标,胡锦涛同志提出依宪治国的思想,通过几代领导人的法治实践,为我国的法治实践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多次在不同的场合阐述依法治国理念时对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引经据典,既说明他熟谙中国传统文化,也说明他对法制建设有科学的认识,即不能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法治的实践效果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撑。同时老一辈领导人的法治实践为当代的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价值。^[2]

(三)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

杨福忠探讨了推动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机制构建。认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不仅需要各有关部门的重视推动,还必须构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保障机制。法律法规体现着鲜明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旨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法律规范、贯穿法治实践,以此体现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公民的价值准则。要健全法案起草机制,从源头上确保立法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建立法案起草机构的遴选机制,完善法案起草的程序制度,建立起草人员培训制度;要强化内容保障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目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原则,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驱动机制。要建立对起草机构起草法案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情况作为重要评价指标,以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应构建事后审查监督机制。备案机关应加强对每一部报请备案的法规进行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审查,对没有有效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令制定机关修改完善,或者予以撤销。立法机关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要求对正在进行的立法进行审查,确保立法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3]

(四) 党内法规

田丽、梁瑞英研究了党员领导干部党内法规执行力问题。通过从某省委党校 2017—2018 年度中青班学员(省直处级干部)、市厅班学员(省厅级干部)、乡镇干部班学员(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中分别随机抽取了 45 份、34 份、43 份样本,共收集到 122 份数据,围绕党内法规执行力的相关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特别对领导干部执行党内法规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党员领导干部是执行党内法规的重要主体,是影响党内法规执行力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通过研究领导干部的职务级别,特别是在领导班子中的地位的影响,发现干部职务级别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干部在特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对其执行党内法规的行为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党内法规的监督检查环节,反映出党内对于正职领导干部即一把手所掌握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还存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反过来也会成为领导干部特别

是一把手有效执行党内法规的制约因素。解决此问题要注重从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角度提升执行力,并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内部的相互监督,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党外社会监督的效能。^[4]

二、法哲学

武建敏研究了中国传统法的哲学架构及其创造性转化。指出中国传统法有着自身卓然独具的思想世界。传统法在历史演进中保持了自身“实践本体”的基本立场,建构了“实践主义”的法哲学风格。儒家哲学的“实践本体”也正是中国传统法的本体论依托,传统法不从超验的世界为自身确立合法性根基,而是从生活世界中奠定自身的存在论基础。中国传统法之文本世界的创立根源于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是中国人生活实践的基本状态。作为传统法内在元素的实践智慧是传统中国法文化对世界法律文化的贡献。中国传统法充分显示了自身的辩证法风貌,这是一种实践论和生存论意义上的辩证法,它趋向于实践智慧的至高境界;实践面向的传统法内在地蕴含了“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这是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法的实践智慧和合理性问题的基本切入点;同时在传统法中也存在“法律实质主义”的思想倾向,虽然它有着自身的问题和缺憾,但同样需要认真对待。基于“实践主义”的法哲学立场,实现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谋划新法系建设,是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作为拥有独立中华法系风格的传统法在当代中国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现代价值,这正是探讨传统法之创造性转化的根本理由。中国传统法中所蕴含的包括“实践主义”在内的哲学思想理念的现代转化,需要现代法哲学家认真挖掘其内在的思想理路,并在现代语言中完成理论转化与发展的思想使命。在中国传统法当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资源,传统法的创造性转化是新时代中国法系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建构新时代中国法系的任务是实现传统法之创造性转化的迫切要求,也是要激起人们的理性自觉,正确合理地分析当下中国的法律文化事实,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一种具有实践合理性的新的中国法系。这个中国法系是新时代的中国法系,这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同时这个中国法系

理应是混合法系,是世界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5]

三、法制史

段立章认为,在现代法律规范中,儿童被赋予与成人一样的独立人格和尊严。然而,在古代法中,儿童却被作为工具、财产或附属物而存在。在古代社会儿童被作为权利的客体,而非权利的主体。在成人中心论下,儿童的特质泯灭不彰。这也正是造成古代社会儿童悲剧的总根源。要避免这种悲剧在当代的重演,必须通过立法充分保障儿童权利,必须在公众中培育起牢固的现代儿童权利观。关爱儿童、保护儿童不但需要在规范上建章立制,还需要在观念上清除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有关儿童的一些错误观念,使儿童权利观、儿童平等主体观真正在全社会树立起来,从而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构筑起制度和观念双重支撑的空间。^[6]

姜密通过对相关研究观点进行梳理,并在对史料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对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与合法的土地买卖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不抑兼并”始终是宋代土地政策的大方向,它造成了兼并之事实。上自官府下至民间,从官田到民田,“不抑兼并”从根本上改变着宋代的世情民风。兼并之普遍横贯南北、纵贯两宋。然而,“不抑兼并”并不意味着放任兼并或者可以任意买卖土地,而必须以合法为前提。不论是官田领域中或民田买卖中“兼并行为”都有合法性要求。在宋代,控制土地和“不抑兼并”二者并不矛盾,政府允许适当“兼并”,而且在某些时候也出台一些相应措施来配合“不抑兼并”政策的实施(如买卖官田的优惠举措等)。但是它强调的是,不管通过何种渠道兼并,必须按规定合法交易或登记,买契、过割、交税等缺一不可,否则视为非法。宋代“不抑兼并”政策不仅引发了官田领域的“兼并之风”,更直接推动了民间土地交易的活跃性,促使契约经济飞速发展。期间,政府不断规范土地交易的合法程序。宋代政府无论是法律上的规定还是实践中的作为看,一直在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解决政策背后的隐患。“不抑兼并”作为宋代土地政策的大方向,它并不意味着“放任兼并”或者任意买卖土地,而是必须以合法为前

提;合法兼并给与认可,非法兼并予以抑制。宋代一系列的措施使土地成为商品,从根本上推动宋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始终发挥其主导作用,用法律手段管理和调控土地的占有和流转,将土地有序地纳入到商品经济大潮中。^[7]

四、司法文化建设

王雪峰,苏黎明对监狱文化建设进行了研究,认为监狱文化最核心、最本质的内涵是组织氛围或者精神风貌。可以说,监狱文化就是一个监狱长期形成的组织氛围或精神风貌。开展各项活动、美化环境、完善各类设施、制定各项制度,最终目的是营造组织氛围或者培育精神风貌。明确了这个问题,就有了努力方向,也就能提高文化建设的有效性。监狱文化不是展示柜、观光廊,其功能必须与“改造人”这一宗旨一致,不能偏离。监狱文化的作用方式是潜移默化的、是润物无声的、是陶冶式的。监狱文化具有实践性,其核心理念的设计、凝练、提升要以监管改造工作实践为依据,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还要在物质、精神、制度多个层面上统一起来,体现整体性;监狱文化建设的理念设计也要跟上时代发展形势,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引领未来的管理和改造工作;监狱文化建设也应具有独特性、凝练性、体系性和可持续性。使各种表现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凝练核心价值,与时俱进,守正出新。^[8]

杨禹梅提出了监狱博物馆建设的创新思路。认为监狱博物馆建设不仅是监狱对外展示的窗口、监狱文化的传承,更是一项丰富全民文化的惠民工程,其任务和使命是发展弘扬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化,实现监狱工作的新阶段发展。监狱博物馆应在普通博物馆的布局、陈列、线路设计上有所创新,并设置相关互动区域。经营管理中重视目标观众,积极开展合作与推广活动。监狱博物馆是对外展示的窗口,监狱博物馆是监狱文化的传承,是具有公益性质的文化场所,公开向公众展示监狱文化的历史、艺术、功能等,向社会公众提供深层次、高品位的娱乐休闲文化服务。监除了可以向参观者介绍监狱文化知识,展现独特的美感和风格等艺术体验,实现文化推广的公共目的之外,因所展现的文化具有特殊性,还可以起到教育、警示之意,能够实现在一定程度上

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与再犯可能性的作用,推动社会公共关系和谐稳定发展。在监狱博物馆建设方案之创新思维设计中,应注重陈列展厅的情境设置、展品的审美陈列设计和参观线路的科学编排。作者提出监狱博物馆运营之创新思维实现路径:一是目标观众的预期设定;二是多方交流合作的有效展开;三是营销推广的适度开展;四是打造高素质专业队伍。要根据自身特色设定合适的发展战略,前提便是要在建设理念中突出“法治”与“创新”,拒绝一味效仿,要巧用社会媒体和新文化的力量,着重打造个性品牌,稳固目标观众群体,开拓广阔市场,并跟进后续文化与市场调研,补足内部发展动力。^[9]

董颖对法院文化展馆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全国法院系统努力打造既体现地方特色,又具有鲜明时代感的法院文化体系,并以各种载体传递文化信息,对于司法文化的传承、法官的精神塑造和精神激励、形成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法院博物馆、陈列馆、法院办公区域的文化展板等受到法律文化的浸润,是进行法制教育的良好契机。法院文化展馆对于培养司法人员的价值感和归属感具有象征意义,更好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以严谨和追求真理为导向,深入挖掘历史资源,形成鲜明文化特色,是各级文化展馆建设应继续思考的问题。法院文化展示具有精神引领功能,有助于办案人员培养归属感和价值认同,并提供学习场所,不断加强学习和自我完善,也是对社会公众进行法制教育的基地。作者提出了法院文化展馆建设的几点思考,首先要将严谨和追求真理放在首位。法院文化建设的定位必须明确。在文化建设的内容上要精益求精。同时,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关系。深入挖掘当地历史资源,不但反映中国法制史及审判史的历程,还应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追溯当地法制发展与历史继承的关系。当地的立法、审判资源应充分得到珍视,以建立文化自信,增加历史厚度,提升思考空间。体现专业化和现代性,并保持开放性与参与性,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手段,增强文化展馆的可感性。^[10]

五、法学知识创新

李大庆研究了领域法学的知识创新问题。认

为领域法学是在财税法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发现并传播开来的一种法学范式,是部门法范式基础上的“跨界资源整合”,也是应用法学对理论法学的提问和对话。领域法学的提出是对一定社会发展现象的敏感反应,在内涵上经历了从观念到方法的具体化过程,对现实的关注点经历了从社会关系到主体行为的迁移过程,其形态经历了从类型到范式的进化过程。领域法学的功能不仅是法的类型划分,而是一种“以问题的对象需要来整合法学知识”的法学范式,它自身内含着独特的知识生产和创新机制。在当前中国法学范式格局演化中,部门法学的基础地位受到来自现实的很多挑战,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还未平息,实践法学和领域法学又快速崛起。这些法学范式之间的竞争有助于繁荣中国法学的发展并促进知识创新。领域法学作为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范式,与其他范式之间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法学研究中,不同范式之间的关系既有竞争比较也有同构互补,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创造出新的可以共享的知识系统。领域法学的知识创新是在坚持法学知识特征和基本范畴的基础上,通过概念转化、范畴借用、开放正当性等知识交叉与融合的过程来寻找和发现知识的增长点。领域法学范式本身是新生事物,尚需不断打磨以提升其在实践中的功效,方能日臻成熟。领域法学也绝非法学范式竞争的终结者。不断有新的法学范式出现,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群雄争霸”的法学范式竞争格局,将提高法学知识生产率,进而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更好地解决各类法律问题。^[11]

高志明探讨了人工智能新发展对法律知识生成方式与制度体系的影响。认为人工智能实际是信息与知识生产力极大提高的产物,是信息与知识组织方式发生的巨大变革。人工智能新发展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包括大量重复性的脑力劳动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业等领域将被重新定义,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亦隐藏着巨大社会风险。作为人类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知识系统,可能出现本体论、认知论、发展论、方法论等方面的转变,可能出现向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乃至未来学等学科交叉与整合的转向,可能出现基于大数据库、大信息库、

大知识库分析而进行充分信息条件下研判的方式转型,一种基于技术理性的法学研究转向可能会应运而生,使法学研究更好地适应技术突飞猛进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人工智能对现代法律制度体系的影响不容小觑,这种影响可能至少包括法律主体制度、客体制度、权利体系等,网信立法一方面要促进现在人工智能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也要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予以充分考量,特别是要防止人工智能滥用给人类带来的风险。^[12]

六、法律教学

辛宇鹤、赵银、王雪梅对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实施翻转课堂教学实践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指出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基础理论学科需要实施课堂翻转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需要转变授课方式以扩大信息量。中国法制史的课程设在大一,大一学生的求知欲和积极性又为该课程改革提供了智力支持。以“秋审”一节为例,将翻转课堂分为预习环节、讨论环节、总结归纳环节和复习环节,并对每一个环节都进行详细的教学设计,力求以点见面,为翻转课堂在法学教学全面推广总结实践经验。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中始终要以实际提升教学效果为宗旨,不可以片面追求形式。中国法制史课程不是所有内容都适合翻转,因此翻转课堂的实施是有选择性的。翻转课堂的总结既要聚焦内容,使学生有所收获;又要紧密联系学生发言,要善于从学生发言中总结要点,丰富自己的授课内容。同时,翻转课堂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减少了课堂上的授课内容,一部分时间留给学生自我展示,但教师要站在更高的高度启发学生,起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要提供给学生丰富的文献资料,激发学生预习的兴趣,问题的设置也要逻辑严谨、环环相扣,才能引导学生深入思考。^[13]

张蕾、李燕芳以布鲁姆分类学为理论依据对我国已有的模拟法庭教学改革路径进行分析。近年来各高校的法学专业都在致力于模拟法庭教学改革路径的探索,在这些探索中运用布鲁姆分类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比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改的理论支撑,增加了教改的随意性,影响了教改效果。主要表现为模拟法庭教学目标单一;模拟法庭教学效果与案例的关系未引

起充分重视;教学内容和环节设计不符合教改发展要求。文章根据布鲁姆的学习理论,对模拟法庭教改提出建议:一是调整模拟法庭教学目标与任务,将理解能力、适用能力、分析能力、评价能力、创新能力培养和训练列为重要目标。模拟法庭重点教学目标理应由程序法学习向理解、适用、分析、评价、创新理论知识的能力的学习迁移,指导教师理应更多指导学生法律事实认定和法律运用能力的学习;二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案例库建设信息化。随着法治实务部门公开化、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法治实务资源向公众开放,各高校特别是非法学名校在获得包括案例在内的法治实务资源上的难度大幅降低,对于模拟法庭来说如何高效运用网络上的海量案例信息为教学服务成为其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尤其是伴随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各种新型案例持续涌现,这些案例更有利于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能力,有效提高教学内容的时效性,更能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14]

范履冰论述了高等司法警官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认为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人才培养目标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具有核心地位和导向性作用,影响和决定着人才培养的方法途径。高等司法警官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监狱、戒毒机关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培养人民警察后备人才的重要任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特殊的教育属性。高等司法警官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集中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直接影响司法机关警察培养的质量水平,事关我国司法事业的兴衰成败。高等司法警官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必须适应政法队伍特别是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实际需求,符合学校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要积极探索高等司法警官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途径。以牢牢把握政治建校、警校姓党的办学方针,培养党

和人民忠诚卫士;突出警务专业能力培养,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学科专业和课程、教材以及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实战、实用和实效,依托行业资源优势,构建院校与政法实务部门协同育人机制。^[15]

(董颖: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马长山,李金枝.公民精神理性成长的法治意义——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回顾与前瞻[J].知与行,2019(9).
- [2] 王宝治,陈康帅.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文化基础[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3] 杨福忠.推动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机制构建[N].河北日报,2019-5-29(7).
- [4] 田丽、梁瑞英.党员领导干部党内法规执行力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领导科学,2019(7)(下).
- [5] 武建敏.中国传统法的哲学架构及其创造性转化[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 [6] 段立章等.古代法中的儿童:规范描述与价值分析[J].唐山学院学报,2019(4).
- [7] 姜密.论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与合法的土地买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 [8] 王雪峰,苏黎明.监狱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与努力方向[J].犯罪与改造研究,2019(7).
- [9] 杨习梅.创新思维下的监狱博物馆建设[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9(4).
- [10] 董颖.法院文化展馆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审判,2019(14).
- [11] 李大庆.法学范式竞争与领域法学的知识创新[J].江汉论坛,2019(4).
- [12] 高志明.人工智能新发展对法律知识生成方式与制度体系的影响[J].长白学刊,2019(1).
- [13] 辛宇鹤,赵银,王雪梅.法学教学改革中翻转课堂的实践应用——以《中国法制史》“秋审”一节为例[J].法制与社会,2019(7).
- [14] 张蕾,李燕芳.模拟法庭改革路径探析[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15] 范履冰.试论高等司法警官院校人才培养目标[J].中国司法,2019(12).

部门法学研究

肖 辉

2019年,河北省法学界在部门法学研究方面继续承续已有特色,注重调研,注重对策,领域广泛,门类齐全,及时回应社会呼声,紧跟形势发展需要,数量和质量均有提升。

宪法及宪法性法律方面仍然主要围绕公民权利、政党制度、国家权力、立法及监察制度、国家安全等传统优势研究领域展开,宪法理论及实施、民主及民族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外国宪法的研究也出现一些亮点。行政法研究既有行政立法、行政公开、行政主体、行政权力、行政行为、行政许可、政府责任等行政法基本要素及基本行政活动的内容,也有对行政执法、执法合作等行政实践的思考;既有对行政改革特别是“放管服”改革的审视,也有对公共服务、文化保护、交通管理、应急管理、边境管理、移民管控等社会热点的关注。诉讼法研究一如既往,涉及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以及证据制度,还涉及公益诉讼热门话题;内容仍主要是探讨程序的合理性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而证据制度研究

成果的增加则彰显出现代法治理念所倡导的证据思维在现行司法运行中受重视的程度。民商法研究主要涉及民事行为、监护制度、婚姻家庭、物权制度、合同制度、侵权制度、知识产权等,且入典类的研究明显增多,反映出研究者对民法典即将出台的期盼和喜悦;商法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公司制度领域,有待拓展。刑法方面的研究表现为在理论研究和总则研究方面比较均衡,而总则研究有所上升、分则研究继续下降的特点,表明基础性的研究与思考明显增多,理性思考及理论厚度进一步增加。经济法领域仍是主要的研究部类,研究形式和研究内容也更趋于多样化,从经济法实施方式到企业制度内涵,从公平竞争、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到财会审计、财税法治、金融保险、环境保护等,其亮点是对农村农业法治建设的关注,形成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研究继续保持适度规模,与往年差别不大,但在结构比例上,学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关注已经超过了劳动法律制度。军事

法研究数量保持既有规模, 关涉军事立法、军事权力、部队建设、军产管理、军事行动、边防保卫等诸多领域, 但势头有所减缓。司法及相关制度等交叉研究领域范围进一步拓宽, 从司法运行到法院建设, 从审判制度到检察制度再到律师制度, 乃至监狱改造、犯罪预防及管控、人民调解及纠纷解决等各类相关制度均有涉猎, 内容丰富; 特别是对各类治理的研究更趋完整, 法治建设受到更加普遍的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已经在法学研究领域得到积极回应, 据此, 本次设专目对其予以梳理。国际法研究中, 除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较为稳定且稳中有增外, 国际私法的研究渐趋稳定, 保持一定比例。

总体上看, 国家安全、边境管理、移民管控、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纠纷解决、法治建设、人工智能等热点问题成为本年度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公共服务、文化保护、农村法治已经发展成新的热点; 国际私法研究得以维系, 商法有所萎缩, 专门针对劳动法律制度的研究有所减少, 具体罪名的研究逐年下降; 而应急管理、边境管理、移民管控方面的研究大量增多, 反映出对客观形势发展的关注及对社会反应的一些隐忧。

一、宪法及宪法性法律研究

(一) 宪法理论

张伟英、杨继永对习近平依宪治国理论的基础渊源与创新价值展开研究, 认为习近平依宪治国理论是新时代我国依宪治国思想的总结和升华, 是我国依宪治国的最新理论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与中国依据宪法治理国家现况相结合的最新成就, 开启了宪法发展的新征程。习近平依宪治国理论的产生, 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与鲜活的现实土壤, 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深刻理解习近平依宪治国理论, 重在把握习近平依宪治国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华传统优秀法律思想以及中国法治理论; 植根于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为宗旨的法治新时代; 致力于开创宪法发展统领法治建设的新局面。^[1]

郭晖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背景, 就宪法适应性问题作出探析, 认为在改革与法治关系上, 似

已形成了“改革在先, 法治附随”的思维定势和惯性, 导致长时期内宪法适应性问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十八大以来, 伴随改革要在宪法框架内进行和“于法有据”的法治理念的确立, 宪法适应性问题日益受到各界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授权试点”缓冲合宪性压力, 规范宪法修改, 推进合宪性审查制度改革, 宪法适应性逐渐得到加强, 并激发了宪法学界对于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制度等宪法适应性薄弱环节的探讨, 有力地推动了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架构内宪法适应性机制的逐步完善。^[2]

(二) 宪法实施

杨福忠研究了推动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机制的构建问题, 认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 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 也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立法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不仅需要各有关部门的重视推动, 还必须构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保障机制。为此需要健全法案起草机制, 强化内容保障机制, 构建事后审查监督机制。^[3]

(三) 民主制度

赵玥从本体论的角度对民主制度展开分析, 认为民主实则是人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的过程。民主思想既不是一套制度, 也不是一种政治体制, 而是政治之所以成为政治的方式, 这也是始终困扰着政治哲学的民主思想。实现本体论视域下的民主思想研究, 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政治民主实际上是继承并发扬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追根溯源为人民的本体论。^[4]

(四) 民族制度

于春洋、马瑞琪研究了民族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内在关联问题, 认为全球化背景之下, 通过民族建构而将国内不同民族和亚文化群体整合成为国家民族, 是每个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要去完成任务。民族建构需要通过对于族际关系的协调、寻求民族共识来达成, 这样才能有利于国家认同根基的巩固。通过实体性民族建构而把国家民族型塑成为一个民族实体, 以此进行国家认同主体的培育, 并通过虚体性民族建构而让国族意识得以凝聚, 进而实现国族自觉, 让国家认同成为一种共识。而国家民族的外在型塑与国族意识

的内在凝聚则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不仅共同培育了国家认同的主体,也为从政治与文化两个维度达成国家认同共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5]

李元元、于春洋以民族地方政府为中心,研究了府际关系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问题,认为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国家对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治理的目标诉求,而府际关系对于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为中心,可以将府际关系划分为由中央政府与民族地方政府构成的纵向府际关系,以及由民族地方政府与民族/非民族地方政府构成的横向府际关系,两个层面的府际关系都会对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产生影响。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诉求和实践绩效存在落差,需要在中央集权与民族地方分权的纵向府际关系中,确保自治权的真实有效执行,从而化解落差。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守望相助”思想为横向府际关系协调提供了新理念,而这一切都需要以民族地方政府为中心,以实现当代中国族际的政治整合。^[6]

(五) 公民权利

王利军就如何发现权利作出研究,认为权利是法学的基本范畴和本位,权利的发现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深入探讨发现权利的方法,特别是从人性中发现权利、从权利的基础中发现权利、从时代变革中发现权利、从道理(德)中发现权利、从已有权利中发现权利、从权利冲突中发现权利、从实践中发现权利等方法,对于更好地认识权利、发现权利、保护权利,以及促进法学发展和法治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7]

郭晖研究了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管制性征收问题,认为国家对财产权的限制分为不予补偿的单纯限制和应予补偿的管制性征收。前者属于财产权社会义务范畴,后者则具有与国家强制取得财产权相同的效果,二者之间的界限应视财产权所受限制主体、范围、程度和外部效应而定。因此,为了充分有效地保障公民财产权利,中国《宪法》第13条第3款的征收概念应当予以扩张,涵盖狭义征收和管制性征收。同时,管制性征收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并使其与补偿条款相连接,审慎界定公共利益。^[8]

高景芳、甄奇颖就作为社会权的公民体育权展开研究,认为根据宪法基本权利的分类,体育权本质上属于社会权之一种。首先,体育权的产生体现了社会权的基本理念。作为社会权的体育权的价值意蕴,强调的是其有由国家积极促进的一面。其次,体育权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彰显了社会权色彩。公民体育权对所有国家公权力都具有约束力,但主要是为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机关提供行动指南和价值准则,公民并不能据以直接请求国家给付。再次,体育权保障的国家义务突出了社会权特征。作为社会权的体育权,更为注重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受益型保障,而对以司法权为中心的防御型保障注重较弱。但在强调体育权的社会权面向的同时,也要防范无节制的政府福利给付所可能引发的财政、管理和道德危机。^[9]

高志明则通过法理融通与立法比较,对侵害个人信息权的法律责任予以研究,认为侵害个人信息权的行为威胁信息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安全,在中国进行统一的个人信息安全法律制度设计中,须跨越部门法律的藩篱,对侵害个人信息权的法律责任进行法理融通,以期形成整体性的“两层次”责任理论体系;同时,还需要对境外立法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形成综合性的权利救济体系。^[10]

(六) 政党制度

杨福忠就筑牢加强党的建设的制度根基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全方位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为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可靠制度保障。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就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强化执规意识,真正把党内法规落到实处。首先,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必须不断完善;其次,党内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第三,强化执规意识,真正把党内法规落到实处。^[11]

(七) 立法制度

伊士国对设区的市立法权展开研究,认为设区的市立法权,内容涵盖基本理论问题、历史变迁问题、监督与制约问题,以及与中央立法权、省级地方立法权的关系问题等,特别是其立法权

限问题、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问题更需要作出细致系统的分析和厘清。从历史发展看,设区市的立法权经历了一个从国家立法权到省级地方立法权、从省级地方立法权到较大的市立法权,再从较大的市立法权到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历史演进过程。从这一过程来看,设区市的立法权是最后发展出来的地方立法权,因此,无论其规范内容,还是其立法权限都存在一些欠缺和不足,需要对其不断进行完善;相应地,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也存在一定不足,需要进一步健全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12]

梁平、律磊研究了京津冀协同立法的立法技术、机制构建与模式创新问题,认为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现已初步形成了“三地人大常委会联席会议研究、各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批准”的协同立法模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协同立法机制和程序,并制定了关于协同立法的法规文件和实施了一批协同立法项目,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和阶段性进展。同时,也面临着诸如对“协同”的认识差异、重点领域立法尚待突破、立法项目来源比较单一、缺乏刚性约束机制以及区域协同立法的质量提升与数量控制等问题,为此,应从三地的发展程度等历史角度正确理解“区域协同”问题,以信息化为依托,充分发挥智库优势和扩大公众立法参与,建立京津冀区域标准化规范和问责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实施,切实推进深层次、高水平的京津冀一体化。^[13]

孟庆瑜则基于河北省的研究视角,对地方立法与法治政府建设进行研究,认为对于河北省来说,要做好地方立法与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必须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为背景,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雄安新区和法治河北建设为宗旨,加强与法律实务部门的深度合作,以京津冀区域协同立法、河北省地方立法和法治政府建设为研究样本,理论联系实际,及时总结和推广在京津冀地区和河北省域范围内厉行法治,发挥立法促进和引领作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探索和有益经验,以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河北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法治理论的交流与深化。^[14]

(八) 监察制度

孟穗、冯靖对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衔接问

题展开研究,认为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有效协调对接是职务犯罪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监刑对接问题在管辖、强制措施、证据适用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但是从技术层面来看,管辖衔接还存在着需要细化的空间,监察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亟待进一步完善,证据适用的衔接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加以规范。^[15]

张伟英、杨继永研究了监察留置措施中的人权保障问题,认为自改革试验到监察法正式实施,监察留置措施中的被留置人人权保障问题一直颇受争议。根据基本人权理论、宪法人权价值取向以及限制监察留置权的需要,不仅有必要保障被留置人权利,还要对其具体保障内容予以明确规定。要做到监察留置制度法治化运行,必须坚持法治反腐原则,处理好反腐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坚持程序法定原则,衔接好监察留置程序与刑事诉讼法的司法程序之间的关系;坚持权力制约原则,平衡好行使监察留置权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16]

(九) 国家安全

王宝治、芦丹对河北省电子认证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展开研究,认为电子认证是保障网络及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河北省电子认证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需要创新政府监管,加强人力、物力投入,鼓励开展跨省、跨境互认,推动电子认证服务创新升级,开展跨地区、跨行业电子认证协同,共建全国性密码与密钥基础设施。^[17]

郭永良对恐怖行为体“学习”框架进行了考察,认为恐怖行为体在不断“学习”,以变换策略,成功实现恐怖袭击。为打击和防范恐怖主义,需要深入了解这种“学习”是如何进行的。借助恐怖行为体是如何“学习”的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恐怖活动的升级变迁。“学习”主体、“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是该框架的核心内容。透过该框架,可以发现中国面临个体、代际、团体和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安全挑战,上述主体通过识别、传播、记忆恐怖主义知识和技能,更新袭击策略,突破反恐防线,实施恐怖活动,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风险。为做好新时代反恐工作,中国应对上述“学习”主体进行有效识别和类型化处理,动态观察不同

主体的“学习”进程,采取针对性策略,以降低其“学习”效果,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8]

杜伟涛基于新疆网格化视角,对反恐怖爆炸行动展开研究,认为近年来新疆网格化反恐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网格化条件下,多种反恐怖行动得到了极大的物质保障和技术支持,从顶层设计上提高了反恐怖行动的效率。然而,爆炸性恐怖袭击作为隐蔽性强、破坏力大、难以防范的一种袭击方式,仍然是当前反恐维稳工作中的重大难题。做好反恐怖爆炸行动在网格化条件下的有机结合,对于提高行动成功率、减少战斗损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应充分发挥反恐怖爆炸行动在技术、力量、信息获取及指挥等方面的优势,提高反恐处突绩效。^[19]

刘志勇对美国跨境反恐所面临的困境作出分析,指出,尽管美国先后经历了战争反恐、综合反恐及以内为主、内外兼顾的战略转变,在法律、政策、战略宣传、武力打击等方面也有很多实践。然而,其反恐成果显著的同时,反恐目标扩大化、侵害他国主权、过度用武、侵犯人权等问题也逐渐暴露,使其在反恐中陷入困境。基于此,我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维护我国海外权益时,必须立足长远,着力完善法律政策体系、反恐力量体系和反恐行动样式,依法谨慎行动,充分尊重人权与主权,构建反恐“话语权”。^[20]

王玉冲、郑坤芳研究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挑战、机遇和路径,认为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安全局势正经历着深层次的调整与变革,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走私猖獗、毒品泛滥等问题错综交织,地缘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替升温并趋于常态化,使得安全问题变得难以管控。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共同体建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指导,以利益共享为基础,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情怀和责任担当。安全共同体是符合区域安全实情的中国倡议,它必将扫除各种障碍,实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夯实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之基础,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21]

王亚宁则认为随着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思考和研究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可

能遇到的困境,并探寻走出这些困境的出路,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当前,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存在五大困境,即概念界定困境、一厢情愿困境、存异困境、浅层命运共同体困境和命运共同体的动力转化困境。要走出上述困境,首先要科学界定“命运共同体”概念,在此基础上营造共同参与的氛围,在“求同”中“存异”,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强化内部动力生成机制,顺利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22]

(十) 外国宪法

赵立新研究了日本修宪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认为应当以日本修宪的十字路口为开端,以《日本国宪法》的修改为中心,从历史、现实到未来的整体视角来看待和分析日本修宪的全过程。《日本国宪法》诞生之初即确立了其基本原则,一直变化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末的日本修宪活动、21世纪的修宪风云,集中体现并反映着日本靠前各党派的修宪态度及构想,和平主义、政治体制、基本人权成为其主要内容。其间也存在着“左”翼政党的反修宪运动,因此,日本的直接修宪较为曲折。我们应立足于历史视角和国际视角审视日本的宪法与修宪,以了解其未来走向。^[23]

赵立新进一步研究认为,战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以其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备受瞩目,但这一宪法是在美国“压力”下制定的,在1952年日本重获“独立”后,修宪与反修宪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一条主线。从历史的视角,厘清新宪法在制定中和制定后美国的影响以及新宪法所体现的和平性特征,是理解当前日本政治及修宪活动的核心。^[24]

二、行政法研究

(一) 行政立法

司谨源立足于全面依法治国背景,对公安情报工作的立法问题作出研究,认为通过梳理现有公安情报法律体系内容,会发现,当前公安情报工作立法不论是在情报工作方法,还是工作流程,抑或是共享与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为此,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就须严格遵循公安情报立法的基本原则,加强情报搜集监督,完善公安情报工作规定,健全公安情报共享机制等,不断完善公安情报法律体系,提高公安情报

工作的法治化水平。^[25]

（二）行政改革（放管服）

杜胜利研究了我国政府科技创新宏观治理的“放管服”改革，认为科技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其规律和特点决定了政府在其中重要作用。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政府必须对科技创新进行宏观治理，但这种治理的前提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必须实现“放管服”改革，通过提高科技创新管理水平、健全科技创新政策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等方面，不断创新宏观治理机制。^[26]

寇大伟则具体研究了“放管服”改革中监管力度的构建问题，认为监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尤其是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以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更加重要，“宽进严管”成为“放管服”改革的重要特征，其重要性主要体现为“宽进严管”中监管责任更重大及保障公正的营商环境。为此需要明确审批和监管的具体职责，健全审管衔接互动的制度和平台，实现监管对象全覆盖和监管的专业化，整合“碎片化”的行政执法，克服政府作为单一监管主体的弊端。在此基础上，实现监管方式精细化，即：准确界定“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以做到精细化，下沉综合执法和执法力量以弥补监管不足，扩大监管主体以提升监管效能，从以政府为唯一监管主体的模式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政府、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公众在内的多主体共同监管模式转型，最终达到提升监管效能的目标。^[27]

蔡欣欣、田勇研究了“放管服”改革在简政放权中需要处理的关系及应对问题，认为在新的发展阶段，“放管服”改革利在当前惠及长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使“放管服”改革更加精准高效，应处理好放与简、放与管、放与服三个关系，在法治视野下，保证科学有序放权，加强社会监管，强化信息宣传服务，真正提高群众对“放管服”改革的满意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28]

（三）行政公开

王晓烁、吴伟华对县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问题与完善路径作出研究，认为我国县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满足县域民众知情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依然存在如下问题：主动公

开政府信息的范围和方式不当、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效果不理想、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和问责不足等。对此，可通过完善县级政府信息公开自制机制、加强对县级政府信息公开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等路径，完善我国县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县级行政权依法行使。^[29]

（四）行政主体

徐昊阳就我国公安机关的名誉权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当前关于我国公安机关名誉权的存废存在较多争议，主要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三种观点。结合我国现阶段的警民法律关系，认可并赋予我国公安机关名誉权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公安机关名誉权受到侵害时，不仅可以依照刑事和治安法律法规追究责任，还可以追究侵害者的民事侵权责任。但是，承认公安机关具有名誉权的同时应当遵循权力制约理论，合理规范和限制公安机关的名誉权。^[30]

迪莉娅从提高政府主体能力的要求出发，对政府数据开放成熟度模型作出研究，认为成熟度模型是衡量政府数据开放能力的重要方面。政府数据开放是促进政府开放、透明以及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应从政府主体的角度构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成熟度的模型。这就需要提高政府部门对数据开放的认知能力，加强政府开放数据集聚的治理，建立独立、统一和集成的政府数据开放门户网站，加强对政府开放数据服务及利用效果的监管与评估，不断提高政府主体对于政府数据开放成熟度的认识，不断加强其内容建设，为平台提供高质量服务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为用户提供有内涵的服务。^[31]

（五）行政权力

王晓烁、吕中行就县级权力清单实效性的司法检验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县级权力清单因监督和制约县级行政权的实践需要而产生，具有高度实效性才能实现其预期目的。从司法监督角度进行检视，县级权力清单作为证据在行政检查案件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发挥了较大作用，监督行政不作为的实效性较高。但由于法院对县级权力清单证明力的认可度偏低，限制了其实效性程度。对此，应从提升对县级权力清单的司法监督力度、法院阐释权力清单与法律的关系、将政府信息公开列入县级权力清单、推进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入手，提高县级权力清

单的实效。^[32]

李铭峰立足于大数据时代公民信息安全的视野,对警察权规制问题展开研究,认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层出不穷,公民信息安全成为社会热点问题。而作为公权力中能够直接监管、干预公民信息安全的警察权,在保护公民信息安全方面应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现实问题,在限制监管程序、加强队伍建设、公开信息运行、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立法规制和完善,确保警察权得到有效规制和管控。^[33]

(六) 行政行为

徐丹彤对我国警察携带枪支行为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警察携带枪支行为具有公务枪支管理行为与使用行为的双重性质。其作为使用枪支行为的起点和重要形态,应当受到法律法规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严格规制。对警察携带枪支制度的完善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宏观上,确立警察携带枪支的原则,主要包括最小携带枪支原则、安全携带枪支原则和便于使用枪支原则;微观上,进一步明确携带枪支的具体要求,细化携带枪支的禁酒规则及在航空器上携带枪支的规则等。^[34]

(七) 行政许可

关于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徐荧研究认为,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是移民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科学界定其法律属性是我国永久居留制度立法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我国永久居留制度的法律属性尚不明朗,无法对立法实践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通过对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的形式属性和实质属性进行分析发现,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是具有国家主权特性的行政许可制度,应以此方向通过立法完善我国的永久居留制度。^[35]

(八) 行政执法

黄新宇基于“智慧缉私”背景,就东南沿海地区联合打击成品油走私活动进行研究,认为东南沿海地区成品油走私形势较为严峻,不但严重扰乱了国内市场秩序,而且油的质量问题难以保障,对走私、贩卖、存储、使用等各个环节,都形成了较大的安全风险。对此,结合海上缉私部门执法现状,应当完善联合作战新模式,构建全方位立体防控体系,以及打好“网上缉私”攻坚战,切实提高海上缉私能力,强化海域管

控,对目前猖獗的走私态势形成一定的遏制。^[36]

(九) 执法合作

桂彬、林毅斌就粤港澳大湾区刑事警务合作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受历史因素影响,内地与香港、澳门形成了三个不同法域。如何在单一制国家不同法域之间建立刑事警务合作机制是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课题。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刑事警务合作已推进多年,但在合作的法律依据、法律文化、管辖权、合作内容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对此,可从完善立法、加强理论研究、构建合作机制、增进交流互信及搭建大数据信息共享平台等方面,整合警务资源、以构建警务合作机制方式破除警务合作障碍,更好地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37]

刘雪瑶、牛继承则以黑龙江省黑河市为视域,对中俄互贸区俄罗斯公民免签政策及警务合作作出研究,认为中俄边民互市贸易区俄罗斯公民免签政策施行以来,入境我国的俄罗斯公民数量逐年递增,出现了入境俄罗斯公民非法居留,涉外案(事)件增多等问题。为此,应从法律制度层面完善外国人出入境管理,完善跨境交通运输工具与人员信息预报制度,加强中俄双边区域警务合作,对入境俄罗斯公民实施精细化管理,培养全能型检查员,提升口岸服务水平,借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经验,优化中俄边民互市贸易区俄罗斯公民免签政策。^[38]

(十) 公共管理

王丽娜对公共服务体系的标准化建设进行了研究和展望,指出,公共服务体系面向广大群众,日常工作量大,重复性高,接受服务的人群具有多样性,对所接受服务的理解和熟悉程度不尽相同。标准化建设对提升公共服务体系的效率、质量和体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标准化要遵循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指导原则,通过大人群服务对象的不断锤炼,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性和影响力的优质标准,组成“一带一路”文化输出的重要内容。^[39]

(十一) 文化保护

高国忠、李剑方从“健康中国”视域出发,研究了太极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认为太极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太极拳文化对于助力“健康中国”具有重要价值。但随着原生环境的变迁,原生态太极拳文化面临着

“基因”消失与变异的风险,其某些技理技法濒临失传,传统教化认同的功能也在弱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王其和太极拳,是原生态太极拳的典型“标本”,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与王其和太极拳协会在抢救性发掘其原生态技理技法,开展王其和太极拳“生态传承”与“现代性”创新及推广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和个案研究价值。^[40]

彭光明、邓楠等通过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就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41]

崔璨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应从法律制度建构、法治思维养成等角度探究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径,必须正视文化遗产立法存在的问题,充分认识文化遗产立法在整个文化领域的地位,既重视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如文物捐赠以及私人文物所有权的限制,明确文化遗产保护对私法规律的适应与变革,同时也要重视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从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和行政执法着手,发挥文化遗产公法保护的优势。此外,从法律责任为切入点,形成文化遗产的法律救济机制,充分认识文化遗产领域引入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特别强调对特殊类型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历史文化街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以及流失文物的返还等近年来文化遗产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构建不同语境下文化遗产的多元化保护方式。^[42]

崔璨还就发挥PPP模式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积极作用作出研究,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政府主导的保护与传承模式。PPP模式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选择,这种模式将社会资本引入非遗保护与传承中,能够

实现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主体对非遗的多元化、协同化保护,有利于非遗的可持续发展。^[43]

刘勇基于法律保护视角,对非国有博物馆的现状、困境与出路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中国非国有博物馆的法律保护体系已初见雏形,并对非国有博物馆发展持续产生正面影响。与此同时,包括准入制度、法人财产权确权制度、与其他制度衔接和运营保障制度上的不足在内的法律困境的存在,则成为建立科学、全面的非国有博物馆法律保护体系的消极因素。据此,应健全民间文物流通制度、文物鉴定制度,完善法人财产权确权制度,发展非国有博物馆多元化筹资体制,加强非国有博物馆管理相关法律问题研究,为非国有博物馆健康发展提供法制保障。^[44]

梁岩妍研究了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法律保护问题,认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法律保护既是一个立法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学界应当充分考虑不可移动文物法的规范构造、价值定位和社会实效。不可移动文物在现代经济发展与历史传统文化碰撞的表象下暗含着关于公民权利保障、行政机关权力运行和文化立法等深层次法的运行问题。在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时应当坚持原真性、完整性原则,其价值在于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文化多样性。当前,不可移动文物破坏现象严重,其根源就在于实际的法律实施行为背离了法律规范与价值。文化遗产权是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法律关系主要内容,以第三代集体人权的形式存在,形式多样,可分解为私益性文化遗产权和公益性文化遗产权。因此,应当建立公众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机制,行政机关也应当履行保障公民文化遗产权的职权,使不可移动文物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45]

(十二) 交通管理

亏道远、冯兆蕙研究了高速铁路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化治理路径问题,认为高速铁路安全法治化治理是交通强国建设、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面依法治国等战略实施的现实需求。在高速铁路运营中存在安全隐患频现,安全事故难以彻底根除,安全因素复杂,安全运营规律难以准确把握,以及安全立法滞后,难以满足维护高速铁路安全需求等现实困难。反思传统的行政规制及铁路系统内部单一治理路径,皆难以满足维护高速铁路安全的现实需求,需要探索新

的治理路径。共建共治共享法治化治理路径为高速铁路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主要内容是共建安全管理体制、安全责任体系和安全文化氛围,共治安全行为和安全环境,共享治理信息和治理成果,该路径的实现需要建立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考核评价、诚信惩戒和安全举报等制度做保障。^[46]

郭辉、张文强研究了共享单车租赁的法律问题,认为共享单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具有诸多优点。但共享单车在运营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共享单车承租双方权利义务尚未明确、共享单车租赁过程中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缺乏明确规范、共享单车资金安全监管空白、共享单车安全欠缺有效规制、单车使用人信息安全存在泄露危险等。为维护共享单车租赁中各方权益,需明确共享单车承租双方权利义务、理清共享单车租赁过程中人身损害责任、严格共享单车资金安全保障、规范单车使用人信息安全保护等,确保共享单车运行正常有序,健康发展。^[47]

(十三) 应急管理

胡正凯就新的应急管理体制下社会应急力量的管理联动机制展开探索,认为在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革、成立应急管理部的背景下,以促进社会应急力量与政府应急救援力量形成有效合力、实现应急救援处置效果最优化为出发点,结合当前相关工作的运行体制机制,有针对性地提出社会应急力量的管理保障和联动协作机制方案,更好地将社会应急力量纳入到国家应急救援体系中。^[48]

赵家鹏、刘立文则提出构建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设想,指出,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完善航空应急救援法律体系,健全航空应急救援运行机制,建立覆盖全国的应急救援网络,统筹应急救援直升机机型配备和加大应急救援专业人才培养。在航空应急救援网络的设立上,设立全国航空应急救援中心及网点和直升机配备,在全国范围设置七个航空应急救援中心,有力提升我国开展直升机救援行动的能力,科学构建航空应急救援体系。^[49]

李一行、刘兴业从定位、理念与制度角度出发,就自然灾害防治综合立法问题展开研究,认

为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发布了防灾减灾救灾系列重要文件,实施了应急管理体制机制重大改革举措。落实防灾减灾救灾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契合国家发展改革的现实需要,就应加紧推进自然灾害防治综合立法。自然灾害防治综合立法的定位是自然灾害防治的基本法、应急管理的特别法、公共安全的支撑法。自然灾害防治综合立法应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风险防范、综合防治、权利保护等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危险区避让及搬迁转移、自然灾害科普、自然灾害防治社会参与、自然灾害保险等制度,从而为推进我国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提供法制保障。^[50]

(十四) 边境管理

白永峰立足于移民管理改革的背景,对外国人入出境安全风险防控问题作了研究,认为加强外国人入出境管理是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我国移民治理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我国外国人入出境管理存在配套立法缺位、体制运行不畅、监督机制乏力、保障体系不全等问题,构建面向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外国人入出境安全风险防控体系迫在眉睫。对此,须运用法治化思维推进我国移民管理体制改革的,在强化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和满足外国人入出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外国人入出境安全风险防控的法制体系、运行体系、监督体系和保障体系。^[51]

杜松则对基于大数据的中国移民及出入境管理信息应用制度建设进行研究,认为以大数据应用为基础的移民及出入境管理信息应用制度建设,是移民管理部门适应信息社会发展、构建现代警务机制的必然选择,是推动边防检查工作以及在华外国人管理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举措。应该建立国家统一的移民及出入境管理大数据信息平台与信息系统,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优化警务工作内容,制定科学的工作流程制度和配套管理制度,以确保中国移民及出入境管理信息应用安全、可靠与高效。^[52]

(十五) 移民管控

刘红星结合移民管控要求,就拘留审查制度的完善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以我国拘留审查制度规范为基础,结合对欧美主要移民国家移民拘留制度与实践的考察,可以看出,我国拘留审查存

在功能定位单一、专门的羁押场所不够、羁押期限设置考量因素不全面、法定羁押期限偏短、替代措施单一和司法救济缺位等问题。据此,应当增设服务待遣的功能,增设专门的羁押场所,完善羁押期限设置考量因素,适当延长法定羁押期限,优先增设担保人和保证金保释的替代措施,以及给予适当司法救济。^[53]

苏林政研究了美国非法移民遣返政策对中国的启示,认为美国既是最大的移民国家,也是当代非法移民的主要目的地。鉴于巨大的非法移民压力,美国一贯重视非法移民遣返问题的研究,在制度设计和实践中都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当前美国非法移民问题总体有所好转,但仍存在许多难题和争议。美国通过实施其非法移民遣返政策来控制非法移民的增长态势,这些政策都力求最大限度适应美国国情,在不同时期都具有鲜明特点,对中国搭建非法移民遣返制度框架和推进非法移民治理工作具有启示意义。^[54]

王子立通过比较中美移民法律体系得出相应启示,指出,随着我国移民管理体制重大变革的稳步推进,原有的移民管理法律体系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亟须重构。美国完善移民法律体系的相关经验,对于我国制定移民法典、加强技术移民立法、完善非法移民立法、重构难民立法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55]

(十六) 政府责任

陈雪对政府环境责任法制化的路径展开研究,认为近年来,各种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断催促着各种环境保护和解决机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政府作为执行国家权力的机关,必然也要肩负起环境保护的责任。政府的环境责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事前对环境的保护和对环境问题的预防义务,其次是不履行环境保护义务需要承担的后果。对此,有学者将其分为第一性环境责任和第二性环境责任,也有学者将其分为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政府环境责任设定合理与否,履行落实与否,监督严格与否,都将对环境法的实施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56]

三、诉讼法研究

(一) 民事诉讼

郭雪慧以激励机制为视角,研究了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问题,认为随着民事诉讼

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的修订实施,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了法律保障。但是,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却在现实中遇冷。实践中,社会组织面临的工作与资金压力很大,同时,原告胜诉奖励制度缺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也不完善,这就需要建立与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衔接的多种法律激励机制。首先,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完善诉讼费用减免措施,加强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的管理,明确基金的申请规则与支付要求,重视对基金的内部和外部监督;其次,要创新律师收费制度,健全法律援助制度;第三,要对起诉主体加强安全保护,进一步改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的收取方式。^[57]

梁平基于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分析、司法运行与具体完善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基于诉讼信托和环境权司法化理论,环境公益诉讼符合权利保障、公民参与和诉讼效益的价值导向。2013年民事诉讼法第55条首次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诉讼主体不明、受案范围狭窄、配套细则缺乏、必要限制缺位、公益诉讼单一等对司法运行带来了诸多障碍,应在立法层面确立环境权并补强民事诉讼法,建立和细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配套细则,探索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58]

王磊研究了公民纳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合理性问题,认为只有以完善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为目的,通过梳理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法律制度,并对美、日、德等国的相关制度展开比较,才能阐明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的发展阶段。同时,通过法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当下推动公民作为主体的主张根本就不能成立。据此,大约10年后,当制度发展到“充分的利益关系”阶段时,将公民纳入法定主体范围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59]

刘阳对我国家事调查制度的现状与程序完善问题作出研究,认为2016年我国实行家事审判改革,家事调查制度在我国新鲜出炉。通过梳理立法和实践运行状况,可以从立法、实践和法理之间的冲突中找到家事调查实践和立法中的问题。为此,应当拓宽家事调查启动权限,规范培训方式,重置调查范围,完善辅助机制,统一调查结果应用,使其在理论上与家事诉讼相协调,

进一步增强其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60]

陶建国具体研究了我国家事审判中的家事调查员制度,认为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选择部分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导入家事调查员制度是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这一制度是职权探知主义实质化的表现,体现了家事审判的社会化,也有利于维护诉讼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各法院在家事调查员选聘资格和程序、工作职责、调查事项和方法、保密义务、调查报告制作与提交、调查报告利用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基本规定,制度运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该制度在诸如选聘资格和方法、调查程序的启动、调查方法、调查报告的利用、家事调查员培训等方面尚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当针对相关问题探索改革对策。^[61]

柯阳友、李琼则对我国家事审判改革的重点展开研究,认为我国家事审判改革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转变家事审判理念,树立家庭本位和保护弱者权益的理念;拓展家事审判职能,使司法职能与社会职能相结合;转变家事审判方式,强调职权探知主义和限制辩论主义;完善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构建家事审判工作新格局;创新家事审判程序制度,制定家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提升家事审判专业化水平,创建柔性审判环境。^[62]

柯阳友、李琼还进一步就家事审判中程序正义的维护问题作了研究,指出,家事诉讼不同于普通的财产型诉讼,往往涉及到身份关系及社会公益,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慎重地审视家事案件的处理过程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为了维护家事审判中的程序正义,在审判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对案件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的平衡兼顾,而不能重实体、轻程序。有鉴于此,就应当从家事审判中程序权利的保障、程序利益的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特殊保护,以及程序正义受损时可采取的救济程序等方面入手,强化并完善相关制度及措施,以更好地维护家事案件中的程序正义。^[63]

(二) 刑事诉讼

庄炳芳、刘红月就完善中国海警海上犯罪现场勘查工作的对策展开研究,认为海上犯罪现场勘查工作是中国海警进行刑事侦查工作的起点和基础,是收集、提取犯罪证据的重要手段。目前,中国海警在开展海上犯罪现场勘查工作中尚

存在诸多困境,为此,应提升侦查人员专业化水平,注重取证技术的引进和运用,加强访问人员沟通技能及沟通应变能力的培养,重视指挥员勘查指挥能力的培养,以期完善中国海警海上犯罪现场勘查工作的开展。^[64]

李和国、李志研究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贩卖毒品案件侦查的影响及应对,认为从分析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本质和要求入手,对照剖析当前贩卖毒品案件侦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口供依赖程度高、调查取证活动不规范、侦查手段相对落后以及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收集的证据不符合法庭质证要求。为积极适应改革,公安机关应当革新侦查理念和调查取证方式,逐步建立大数据情报共享体系,并规范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收集证据的开示条件及程序。^[65]

刘卫红、张翼翔等研究了税务机关应对税务行政公益诉讼的困境,并提出相关建议,认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依法确立后,税务机关面临的税务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可能增加,对税务机关的执法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税务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和价值认识不足,相关的应对制度尚不完善,难以准确应对可能面临的税务行政公益诉讼。为此,税务机关应当在了解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内涵和目的的基础上,尽快完善税务行政公益诉讼防控、应对、问责及协作制度,形成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为主动防控和应对税务行政公益诉讼提供明确的制度指引。^[66]

孟庆瑜、张思茵以沐阳县农业委员会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为分析样本,研究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刑事责任衔接问题,认为只有在行刑事责任衔接理论和相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按照同步协调原则确定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适用顺位,区分不同阶段对于行刑事责任进行合并适用,在深入理解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前提下确定行为人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确定行政机关依法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方能依法全面保护生态环境安全。^[67]

(四) 证据制度

王超则通过数据挖掘方法,从中国裁判文书网采集38699例盗窃案件法律文书,对盗窃案件的证据标准统一问题作出研究,发现,我国盗窃

案件裁判文书中对八类证据的体现程度不一致,司法机关对八类证据的采信程度不同;法官裁判案件常采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很少直接标明采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据准则;法院确认或采信的证据远多于不予确认或采信的证据,法院在采信证据方面存在证据类型差异、时间差异、地域差异、法院审级差异、程序类别差异等多方面差异。改进法院裁判证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需要国家在加大案件物证取证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力度以及提高司法机关的认识程度等多方面做出努力,提高裁判机关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认识程度并加大国家在法律和制度上的有力保障,以此促进该项证据标准落地。^[68]

柯阳友、蒋楠对医疗诉讼证明妨碍制度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医疗诉讼中,以医方为妨碍主体的证明妨碍行为时有发生,进而引发医患关系紧张、诉讼公正难以实现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亟待予以规制。我国医疗诉讼证明妨碍实践运行中存在认可率偏低、行为界定标准模糊、救济措施欠缺合理性等诸多问题,已影响到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要化解这些现实境,就需要以医疗诉讼主观证明责任的重构为机理,从事前的预防、事中的合理认定、事后的救济与惩罚三个方面,对医疗诉讼证明妨碍进行体系性完善。^[69]

四、民法研究

(一) 民法原则

胡雪亮就诚信原则在共享经济中的应用问题作出探究,认为近年来,共享经济逐渐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是人们在享受共享经济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没能很好的贯彻共享经济的理念,哪怕是最基本的诚信原则都没能很好的落实,使得共享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阻碍。为了保证共享经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人们应当重塑诚信观念,配合共享经济发展理念,主要以民法中相关诚信原则内容为依据,使共享经济能够得到健康、持久地发展。^[70]

(二) 民事行为

冯兆蕙、李霞对《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中的“决议行为”进行探析,认为我国《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首次将“决议行为”

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类型纳入立法规范中。与合同、共同行为相比,决议行为在主要适用领域、意思的形成和表达方向、调整的法律关系、效力范围等方面都有其显著特性。由于决议行为是由成员人数众多的团体作出的,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意思一致相比较为宽松,因此正义价值对决议行为在形成程序、成员表决意思、“少数者”的权益救济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使其意思在最大程度上符合所有成员的共同意愿。不过,在效力瑕疵类型上,民法总则只是规定了无效和可撤销两种,应借鉴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确认的决议不成立之诉,将决议行为不成立这一效力瑕疵类型理解为现行民法总则立法框架下的默示性规定,确定决议行为不成立、无效及可撤销的“三分法”格局。此外,决议行为作为团体内部行为,其成立、生效与否不影响善意第三人的利益。^[71]

田韶华研究了通谋虚伪行为规则的司法适用问题,认为“虚假意思表示”是构成通谋虚伪行为的关键因素,这决定了实践中所谓的“名实不符”的合同并非均为通谋虚伪行为。在通谋虚伪行为和隐藏行为同时存在的情形下,二者在形式上既可能相互独立,也可能合二为一。而对于《民法总则》第146条对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方面的缺失,在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情形下,应以类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等予以漏洞填补。在通谋虚伪行为与恶意串通、诈害债权行为发生竞合的情形下,通谋虚伪行为规则可以和恶意串通行为规则同时适用,但不能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同时适用。就通谋虚伪行为规则的适用范围而言,其不可适用于决议行为,但对共同行为和身份行为则有适用的余地。^[72]

(三) 监护制度

肖辉就当代中国老年监护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其完善路径展开研究,认为老年监护制度是伴随社会进步、弱势群体受到关注及老龄化社会需要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当代中国老年监护制度创设为时尚短,从规则内容到社会实践都存在着一一些问题:规则层面主要是老年监护体系不完整、监护制度不完备、鼓励及监督机制缺位、权责不明、细化不足等;社会层面则包含从理念认知到职责确认,再到监护落实等方面的欠缺;最后是司法保护不足。因此,应当在规则创设及适用、

社会运行及监督等四个层面加以完善,充分尊重和保护被监护人意愿,建立监护人培训机制和鼓励机制,强化公权色彩,构建科学、完整的老年监护制度体系,在有条件的地区尝试设立专门的老年司法保护机构和机制,健全相应的社会组织,建立专门性的涉老保护社会载体,完善社会监督系统,确保老年监护制度良好运行。^[73]

(四) 婚姻家庭

吴海婷就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完善问题作出研究,认为2018年1月18日施行的《夫妻债务解释》改变了“第二十四条”对债权人的过度偏爱。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夫妻共同债务方面仍存在两大误解,其根源在于我国缺乏夫妻共同财产管理制度。为此,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就应当规定债务人配偶个人财产原则上不对共同债务负责,未用于共同生活的个人债务也能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清偿。^[74]

田韶华研究了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债务的清偿问题,认为界定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根本目的在于确定二者的清偿规则,现行立法在此问题上显有缺漏。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债务的清偿规则既要兼顾交易安全与婚姻安全,也要符合夫妻甘苦与共的伦理期许。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并不等同于共同财产债务与个人财产债务,夫妻共同债务也并非连带债务。夫妻共同财产既要为夫妻共同债务负责,在特定条件下也要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负责。夫妻的个人财产既要为个人债务负责,在特定情形下也要为夫妻共同债务负责。在夫妻共同债务以个人财产清偿,或个人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的情形,产生相应的补偿请求权。共同财产制存续期间夫妻债务的清偿规则较共同财产制结束后应有所不同。^[75]

罗杰、尹鸽就“走婚同居”养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在我国,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走婚同居”养老。由于我国老年人同居立法缺失,导致老年人“走婚同居”面临诸多法律问题,如“同居养老”的合法性问题、日常家事代理权享有与否的问题、有无扶养权利与义务的问题、有无亲属权的问题、同居养老之共同财产的处理问题、同居养老者的继承权问题。对此,亟须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创设老年人“走婚同居”养老合同制度,为老年“走婚同居”专门立法;同时,为涉老案件提供法

律援助,成立社区与村老年人服务组织,切实解决这一问题。^[76]

(五) 物权制度

张凡研究了“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抵押权的法律构造问题,认为我国农地抵押制度曾长期受制于对农民失地的担心,相关制度约束导致农地财产价值与融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为化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经营权的流转将成为今后农地流转的基础模式,农地抵押的客体也将主要定位为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抵押的基本原理——经营权的抵押价值及其作为抵押资产的实现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对农地抵押权的法律构造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农地抵押权的权利设置与运行规则。^[77]

徐超研究了承包地“三权分置”中“三权”的权利属性界定,认为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不断强化农户对于其承包地权利的同时,亦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中央适时提出“三权分置”的政策指引,为重塑我国农地权利制度提供了契机。当前学界对于“三权”的权利属性尚存较大争议,不利于地方实践的推进及最终立法的制定。“三权”之间是内在统一的整体,应当以整体性思维解析“三权”的权利属性界定,确定“三权”由政策向法律转化之后的权利性质,由此达到放活并规范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目的。^[78]

苏艳英则就“三权分置”下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既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地制度演化的必然,也是集体所有制下农地制度的又一次重大选择。农地权利是土地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农地权利体系的构建关乎中国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民权利。这就需要始终围绕农地“三权分置”这一政策背景,使所构建的农地权利体系与“三权分置”政策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遵循物由“所有”到“使用”的原则,构建以提高“农地利用”为主线,以农地的归属关系、使用关系和流转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农地权利体系。^[79]

梁岩妍通过案例反思与立法完善的路径,研究了我国文化遗产私有财产权保障问题,认为我国诸多文化遗产破坏现象的背后存在私有财产权

受损问题,其原因在于我国文化遗产立法的价值取向过于强调公益优先,减损了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私有财产权,并加重其义务,致使对受损的私有财产权的补偿和文化遗产保护经营管理激励的制度构建存在缺失。对此,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应以私有财产权保障为前提,建立文化遗产私有财产权补偿与文化遗产保护激励制度,以平衡文化遗产保护公益事业与私有财产权保障间的紧张关系。^[80]

(六) 合同制度

张婧从对民法典编纂中合同编的建议出发,就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问题进行了比较法考察及立法完善研究,认为基于现代商业社会的实践诉求,中国民法典当中应该对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进行系统的规定。一般规范对于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至关重要,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会突破合同相对性,是合同编时代性的重要表现方面。而比较法上的经验也表明,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立法很好地适应了现代商业活动的复杂性。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一般规范既应体现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精神,也应注重提升理论解释力。真正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权利救济的重要保障,而其请求权产生模式的立法选择则应有利于权利救济的要求。^[81]

贾玉平对民法典合同编快递服务合同的条文提出建议稿,指出,在我国民法典分编制定过程中,于合同编中进行合同类型的扩增已经成为各方共识,但目前草案并未将快递服务合同纳入其中。近年来,快递服务的普遍使用给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并已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起到基础性支撑作用,从而使快递服务合同愈来愈凸显出其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而目前我国包括货运合同在内的全部有名合同,均无法涵盖快递服务合同之丰富权利义务内容,更不能体现其复杂特征,因此导致实践中无论对其适用合同法总则规范,还是进行法律规范上的类推适用,均表现出明显的不敷为用。这就意味着,快递服务合同已经具备有名化的必要。就实现路径而言,应借恰逢民法典分编制定之机在合同编之典型合同中对其进行规范,并以独立的合同类型在合同编中作出专章规定。^[82]

冯建生基于民法典编纂视角,研究了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有名化问题,认为商业特许经营合

同先被写入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室内稿”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却令人不解地在“提请审议稿”中被删除了。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在我国市场经济活动中得到普遍采用,已经发展为成熟的合同类型。该类合同具有不同于其他合同的独有特点,在缺少直接裁判依据的情况下,法官审理相关合同纠纷案件存在找法困难,需要专门的合同法规范进行调整。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纳入《民法典》有着迫切的现实需要,且已条件成熟。当务之急是对《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条文进行完善,做到法律规范的科学化,以此推动其在《民法典合同编》中的有名化。^[83]

冯建生还研究了美国禁令制度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的适用及其借鉴问题,认为美国禁令制度作为一种预防性救济措施,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领域广泛适用,以保护当事人免受难以弥补的损失,法院归纳出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实体法胜诉的可能性、申请人将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双方利益损失的权衡和不得损害社会公众利益。我国实体法上的预防性救济措施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主要适用于绝对权受到侵害或危险的情形,原则上不适用于纯债权性违约行为。我国能够针对纯合同行为适用的、与美国禁令制度最相近的就是行为保全制度,但其适用条件并不明确。为此,可通过借鉴美国禁令制度的“四要件”适用标准,对我国的行为保全制度进行完善,对商业特许经营合同当事人提供预防性救济措施,保护其合法权益免受难以弥补的损失。^[84]

柴振国针对区块链下的智能合约,从合同法的角度进行了思考,认为智能合约是在计算机代码中构建的形式定义的承诺,合约参与方可以执行存储在区块链上的分散的承诺协议。从智能合约的技术维度分析,智能合约具有自动性、执行性、匿名性三个特征。其功能在于寻求弥补传统合同法方面的不足,增加交易的安全、效率和旨在消除法律强制执行的必要性。相较于传统合同法律框架,智能合约以牺牲灵活性换取效率,不确定因素订约对智能合约的影响更小,可以避免多重解释和重复谈判,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的保

护隐私安全。从传统合同法维度分析,智能合约在意思表示、合同订立、合同解释等方面影响合同法律规则。面对智能合约对传统合同法的影响及其不足,应将智能合约纳入合同法律框架。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应完善智能合约的形成规则、履行机制及违约和救济规则,建构现代合同理论,为智能合约这些新类型的无名合同预留法律规制空间。^[85]

(七) 侵权制度

张永辉基于风险社会语境,对共同侵权行为制度作出研究,认为风险社会对传统侵权行为制度的责难表现为“风险预期的灾难性”对传统侵权行为法前提预设的责难、“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对传统可赔偿性损害制度的责难、“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困境对传统侵权归责制度的责难,以及风险社会对传统侵权行为法功能的责难。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并导致侵权行为法的功能变迁,而侵权行为法的功能变迁对侵权行为制度又会产生影响:行为人注意义务内容由具体到抽象,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由预期到共识,可赔偿损害的范围由“实际损害”到“灾难性损害可能性的增加”,侵权责任类型的增加,预防性责任形式的常态化,侵权责任范围划定的影响因素更加多元。再结合其制度功能、认定标准及责任承担,就需要改进规则用语、完善“过错”规则内容,完善连带责任规则,以达到风险社会语境的要求。^[86]

(八) 知识产权

刘勇、李薇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知识产权公共领域的作用机制作出研究,认为知识产权法语境下的知识产权公共领域是指知识产权专有权保护范围以外的知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没有纳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内容的知识产品、已过知识产权专有权保护期限的知识产品以及知识产权专有权人放弃权利保护的知识产品等。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知识产权公共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逐渐突出,其促进创新的价值取向越发明显,并在促进创新、促进创新成果传播利用、促进再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知识产权制度的最终目的在于激励创新,基于这一目标,知识产权公共领域成为支撑知识产权制度不可或缺的要害,并通过各种机制作用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87]

薛秀娟、彭长江对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健全与完善展开研究,认为随着国民素质提升,产权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产权交易平台建设也愈发受到关注。虽然我国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规模和作用不断扩大,但距总体目标仍有差距,需要通过市场导向、多层次协调布局、多元化创新服务相结合,推动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发展建设。^[88]

刘春霖、孙路瑶对 FRAND 承诺的域外法律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展开研究,认为 FRAND 承诺是一种善意协商义务,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未履行该义务则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寻求禁令救济的请求宜采取限制适用态度,不满足特定条件的禁令救济请求,应当认定为必要专利滥用行为;在考虑 Georgia-Pacific 因素的基础上,可采用事前技术竞争模式合理确定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许可费用。而欧美相关法律实践表明,运用多个部门法保障 FRAND 承诺实施,是标准必要专利制度正常运行的基础。^[89]

(九) 商法研究

赵金龙基于公司法要求,对公司信息服务电子化问题展开反思,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改革中,都对公司信息服务电子化予以回应,美国电子传输方式的弹性规定、英国材料电子化的细致规定、日本公司信息服务电子化的单独规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电子平台设置强化公司信息披露和法人透明度的规定,都对我国公司法变革具有借鉴意义。随着信息技术在公司运营中日益普遍应用,我国公司信息服务电子化具有良好基础。我国公司法应当从相关材料电子化、文件传送电子化和信息公告电子化三方面进行回应,以期有利于我国公司治理水准的提升。^[90]

林妍研究了注册制改革下的科创板市场主体责任审视与监管问题,认为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化市场各参与主体责任。科创板市场主体中应重新审视自身职责,并通过规范信息披露监管程序,完善证券失信惩戒制度;理清证券中介机构职能定位,规范执业行为;引入声誉评价机制,夯实中介机构法律责任;推出投资者集体诉讼制度,增强投资者监督作用来监管市场主体行为,优化科创板市场运行模式,推动科创板改革顺利实施。^[91]

李慧英、王育红则对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

风险隔离法律制度的困境与优化进行研究,认为PPP项目资产证券化为社会资本方提供融资并增加退出渠道,提升项目落地率,是未来政策重点鼓励的方向。其健康发展的核心是做好风险隔离,但在实际操作中,囿于将来债权转让、专项计划设立、基础资产真实出售在法律制度层面的诸多矛盾与障碍,无法切实达到风险隔离的效果。为了保障社会资本获取确信的投资权益,需要针对如上三项制度中的法律困境,分别从多角度进行制度性优化,构建将来债权转让制度,完善专项计划设立制度,健全基础资产“真实出售”制度,推动我国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健康、有序发展。^[92]

五、刑法研究

(一) 刑法理论

苏永生就法益保护理论中国化的反思与重构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法益保护理论是费尔巴哈权利保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以启蒙时期形成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并以作为法治原则和刑法首要原则的罪刑法定原则、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以及以文义解释为限度的刑法解释方法体系为逻辑前提。法益保护理论中国化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益侵害说与社会危害性说的关系,就此形成了话语转换型和批判型两种解决思路。前者是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延续,对法益保护理论中国化助益不大,后者才是真正的法益保护理论中国化之路,但具体建构不足。法益保护理论中国化不但要求提升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地位,而且要求提倡与贯彻符合中国国情的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同时应当坚持形式解释论,确立以文义解释为桂冠的刑法解释方法体系。^[93]

宋伟卫立足于刑事一体化视野,对人身危险性问题作出研究,认为人身危险性是行为人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现代刑法的发展中,行为人主义与行为主义的理论之争推动了刑法学理论的繁荣。梳理人身危险性的历史发展脉络,考察其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刑事实践中的运作状态,会发现刑法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断裂与背离。因此,应该对人身危险性在刑法理论中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扩大人身危险性的定罪功能、限缩量刑功能。同时,基于人身危险性对刑事的重大意义,刑事立法应对人身危险性的影响因素

作出相应规定,在刑事实践中确立科学的预测体系。^[94]

(二) 刑法总则

敦宁、韩玫对我国轻罪范围的划定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合理划定轻罪的范围是构建轻罪制裁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对轻罪范围的划定应以法定刑为标准,以3年有期徒刑为上限,即凡是法定最高刑或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在3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都属于轻罪。同时,我国应将有必要适用人身自由罚的行政违法行为也纳入轻罪的范围,但在实现方式上应采取循序渐进的路径,即随着轻罪制裁制度的逐步完善而有序地实现这一目标。^[95]

敦宁还研究了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界分问题,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犯罪集团,其往往是由恶势力犯罪集团演变而成的。对二者的司法界分,应主要着眼于危害性特征的差异。前者需要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了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后者则只要求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在此,应当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正确理解和实质解释,并对“保护伞”条件给予足够的重视。^[96]

余博对聚众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探析,认为在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对聚众犯罪的概念理解各异,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无法科学而准确地定罪量刑。这就需要从犯罪主体和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入手,从根本上厘清聚众犯罪与共同犯罪、集会犯罪之间的区别,准确界定聚众犯罪的基本定义、范围及适用问题,以利于促进我国刑法细则的完善,进一步发挥刑法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97]

牛忠志、曲伶俐就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立体化”修正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为永葆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生命力,需要对其各要件加以立体化修正,包括对其各个要件从形式和内容、质和量、静态与动态、纵向和横向等维度“加宽加厚加高”。把犯罪客体修正为刑法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关系及其载体的统一,以使之成为“有血有肉”,看得见、摸得着,增强其实体性和可测量性。在危害行为的定义中加入“犯罪工具”和行为“强度”的限定,既突出实施危害行为对犯罪工具的利用,又满足中国刑法对犯罪规定既定性又定量的特点。在刑

事责任能力的基础上把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人格也纳入进来,以形成动静结合的主体要件内容,赋予犯罪动机的选择要件地位,为切实全面贯彻规范责任论,在《刑法》第16条增加关于因“期待可能丧失或者减弱”而刑事责任丧失或者减轻的规定。^[98]

牛忠志进一步围绕完善犯罪成立条件体系的宏观问题作出分析,认为改良犯罪构成四要件与移植德日的阶层体系是完善我国犯罪成立条件体系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但是,德日的阶层体系只定性不定量、弱化主体要件地位、不能体现行为入社会危险性等缺陷,都决定了其难以简单移植以适应中国现行刑法。所以,改良犯罪构成四要件是较好的路径选择。因此,需要进一步回答犯罪构成要件的个数以及四要件之间的结构关系等问题。否定犯罪客体要件的诸种观点不可取而必须坚持四要件说。全面评析当今国内学者的多种排序观点,可以得出:犯罪客观要件、客体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主观要件的排序主张较为合理。四要件之间的耦合关系是相乘或者幂的关系而不是相加关系,不能把四要件的司法运用看成是“堆积木”游戏。^[99]

梅真硕研究了治安管理中正当防卫标准的异化表现及对策问题,认为正当防卫理应存在于我国治安案件实践中,但是实务中常以“互殴”否认正当防卫,曲解构成要件,因调解而不予认定,导致正当防卫鲜见于实践。正当防卫与互殴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证据难以获取使得正当防卫难以认定。实务部门应当客观认识治安案件与刑事案件中限度条件的不同,在对行为人主观目的判断中使用客观归责理论,在执法办案中正确协调调解与正当防卫的关系,在评价行为时依据规范的正当防卫理论。^[100]

李天发、李晓强对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基本意涵作出剖析,认为终身监禁作为我国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措施,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法适用均缺乏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我国终身监禁的内涵、外延、特征及与相关刑罚之异同等基本问题缺乏准确且系统的阐释,进而影响到立法规制、司法适用及具体执行等刑罚功能的有效实现。因此,有必要对终生监禁的基本意涵作出明确的阐述的辨析,以完善相关的刑事法律制度。^[101]

关于累犯制度,赵子昂通过评析“三振出

局法”,就其对我国累犯制度的启示作出研究,认为“三振出局”原本是棒球运动中的一项规则,在比赛中若一方连续投出三个好球,对方方便被淘汰出局。这一规则在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美国刑事立法之中,成为针对常习犯的一项特殊规定。立足该法案背后的刑罚学原理对其正当性进行评析,进而探索“三振出局法”规范本身的理论价值,据此,可以从正反两个层面寻求它对完善我国累犯制度的启示与警戒,提高制刑合理性,凸显行刑科学化,严格掌握量刑幅度,严格区分“终身监禁”与“无期徒刑”,切实完善我国累犯制度。^[102]

吕哲、高恩泽就民事赔偿及对死刑限制适用的影响展开研究,认为刑事法意义的民事赔偿专指判决生效前加害方对被害方的民事赔偿,其既有体现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减少而限制死刑适用的合理性,也有“赔钱免死”之虞,只有表明人身危险性降低的民事赔偿才能成为限制死刑适用的情节。民事赔偿对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限制适用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对于死缓适用的限制,仅包括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降格为死缓的情形。^[103]

(三) 刑法分则

敦宁、李昊天研究了盗墓犯罪集团及其首要分子的司法认定问题,认为近年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呈现出了高度的职业化和集团化特征,因而需要对盗墓犯罪集团及其首要分子进行准确认定。盗墓犯罪集团具有一定的特点,实践中既要将其与一般的盗墓团伙加以区分,也要处理好其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竞合问题。对盗墓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认定,应当先明确该集团中主犯的范围,而后再根据法定的成立条件,从主犯中界分出首要分子。^[104]

苏永生对虚假诉讼罪的“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规定作出研究,认为虚假诉讼罪中,“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与“妨害司法秩序”之间系包含关系。立法把“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规定为虚假诉讼罪的选择性成立条件,显然是受到了虚假诉讼犯罪的现实样态和“从一重罪处断”思维的影响。但是,这不符合形式逻辑和虚假诉讼罪保护法益的要求,而且会出现处罚上的不协调,也与我国《刑法》第307条之一第3款的规定存在重复。所以,应当把

“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删除,为想象竞合犯原理的运用留下足够空间。^[105]

六、经济法研究

(一) 经济法理论

孟庆瑜对经济法实施方式的变化问题加以研究,认为经济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回望中国经济法理论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路,有关经济法的实施问题从来没有淡出过经济法理论研究的视野和制度实践的历程。其间,既有关于经济法实施效果的整体关照,也有关于经济法实施机制的制度探微,需要从立法到执法,再到司法作出全面梳理。立法上,协调好经济法的科学立法与自觉遵守;执法上,处理好经济法的严格执法与行政谦抑;司法上,解决好经济法的公正司法与社会实施,以全面把握经济法实施方式的变化。^[106]

(二) 企业制度

刘洋洋、李景春等从悖论视域出发,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困境与治理问题,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悖论的存在,表明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悖论如不能有效化解,容易产生混淆社会认知、引发社会矛盾和弱化企业功能等社会危害。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导向、责任伦理建设的滞后和道德约束的乏力,企业社会责任陷入重重困境并产生诸多消极影响,不仅伤害消费者利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生态环境,而且严重阻抑企业自身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认真研究新时期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治理方略,构筑强大的企业社会责任支撑体系。^[107]

孙文娜、苏跃辉对征信机构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难题进行研究,认为在当前,资金供给者难以获取中小企业信息,是导致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不易获得融资的重要原因,利用征信机构可以助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因为征信机构搜集的信息具有来源广、专业性强、准确度高、成本低等特点,通过征信机构开发综合判断中小企业的征信指标和征信模型,同时借助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够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信息不对称问题。^[108]

(三) 反不正当竞争

霍艳梅、刘志军等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展开研究,认为始自2016年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提升了行政主体的反垄断意识,彰显了政府在维护统一市场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方面的职责所在,标志着我国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确立,也意味着反垄断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该制度确立以来,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围绕之予以贯彻。但从实际看,无论内涵认识还是审查机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亟待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为此,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估,发布公平竞争审查的指导示例,进一步提高行政主体的公平竞争审查认知及能力,就公平竞争审查与合法性审核的关系、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科学性自我审查方式下的监督问责机制强化等方面加强调研,给出明确的指导性意见。^[109]

(四) 消费者权益保护

赵娜萍针对净化网络购物环境的需要,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作出研究,认为网络环境鱼龙混杂,充斥着垃圾邮件和网络推广,这些行为损害了网络消费者的选择权,而垃圾邮件和商业推广也是商家侵犯网络消费者权利的集中体现。为此,应完善网络购物消费者选择权的保护,完备网络购物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强化网络购物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保护,加强电子商务的行业自律,构建商家实名制度,建立异地协同系统,拓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110]

(五) 食品安全

孙丽虹研究了食品安全中“法制”与“法治”之间的平衡问题,认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为了保护公民的食品安全,我国积极推进食品安全的法制建设和法治建设,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而法制建设和法治建设之间的平衡点是秩序。要实现法制建设和法治建设之间的动态平衡,就需要二者之间相互制约。^[111]

(六) 财会审计

陈玉玲基于信息化环境,对金融审计风险展开分析,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审计工作的方法、工具和流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审计效率明显提升。但是由于任何系统和流程的操作者都是人,因此必然存在灰度,这就意味着即使企业和

审计信息化程度再高,都会存在瑕疵和漏洞。金融行业是应用信息化进程较快的行业之一,其对于安全和规范的要求比其他很多行业都要高很多,其中金融审计风险控制就是重要的推动因素。目前,我国金融信息化还处于中等水平,尤其是小型金融机构的信息系统还不够成熟,近年来爆出的诸多案例反映出金融审计风险仍然形势严峻。为此,应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金融信息化的发展现状,掌握信息化环境下金融审计的特点,明确信息化环境下金融审计面临的主要风险,在此基础上,探讨相应的控制措施。^[112]

(七) 财税法治

李大庆就法学范式竞争与领域法学的知识创新问题作出研究,认为领域法学是在财税法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发现并传播开来的一种法学范式,是部门法范式基础上的“跨界资源整合”,也是应用法学对理论法学的提问和对话。在当前中国法学范式格局演化中,部门法学的基础地位受到来自现实的很多挑战,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还未平息,实践法学和领域法学又快速崛起。这些法学范式之间的竞争有助于繁荣中国法学的发展并促进知识创新。领域法学作为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范式,与其他范式之间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113]

(八) 金融法治

王海波、马金伟就金融科技监管中的“法链”模式发展路径展开研究,认为当前,金融科技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优化了传统金融业务的流程,还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拓展了金融交易的边界,推动了金融产业的变革。但金融科技存在许多技术上及机制上的风险,加强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势在必行。而区块链技术作为金融科技的核心技术和重点技术,众多发达国家以“区块链+监管”的思想构建“法链”监管模式,以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更好地实现金融监管目标。这就需要从金融科技监管工具和金融科技产品监管两个角度出发,规制我国“法链”建设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按照金融科技发展的成熟度状况制定阶梯性的“法链”建设路径。^[114]

王海波还认为,区块链技术凭借其不可篡改性、去中心化、去信任以及集体维护等特征,不仅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还被作为各领域创

新的基础。尤其是其与金融领域的融合,推动了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金融科技有别于传统金融,传统金融监管存在明显的滞后性。鉴于此,需要从我国多地区“法链”监管模式的实际发展状况出发,总结我国“法链”监管模式的发展难点与困境,结合我国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水平,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115]

胡颖欣研究了我国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创新问题,认为现阶段我国的金融扶贫制度由于缺少法律法规的规范,使得扶贫工作的效率低,扶贫对象缺少针对性和完善的筛选条件,扶贫内容以经济利益为主。为了改善当前状况,应该将紧紧把握扶贫的“准”和“精”,并且不断推出扶贫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推进农村金融扶贫工作有效进行。^[116]

(九) 保险制度

董敏、吕红平等研究了人工智能反保险欺诈的私法效果和路径选择,认为保险欺诈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人工智能在反欺诈领域的应用刚刚起步,迫切需要完善配套机制。为此,需要从保险欺诈的界定与私法效果出发,分析识别模型中保险欺诈的内涵,通过技术上利用专家系统和裁判辅助系统提高模型数据的权威性,研发场景适应的识别方法,同时设立专门的反保险欺诈机构,并通过立法厘定保险欺诈的定义和类型,真正达到人工智能反保险欺诈的效果。^[117]

(十) 农村法治

刘广明从强化政府干预的要求出发,对新常态下推进农村文化消费的路径展开探索,认为文化消费之于农村居民个体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当下,推进农村文化消费更具特殊意义,直接关系到农村消费的梯次升级,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顺利转变。但从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化消费虽已取得积极进展,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消费支出占比过低、城乡差距过大、消费层次不高等。在新常态下,有效推进农村文化消费,亟须进行路径创新,而强化政府干预则是应然之举。为此,应强化政府干预以推进农村文化消费,加大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治理农村文化消费环境,加强农村文化消费引导。^[118]

张凡就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制理论的时代价值展开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制理论既是从广阔的历史维度与方法论视角对社会革命后农业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指引,同时也融入了其对农民自身主体地位与终极命运的深度关切。农业合作体制“异化”问题根本上讲是未能从劳动者主体性立场出发,明确农民在“集体”中的地位及其权利实现方式。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实践,农业劳动者“权利的联合”应当成为新时代构建农业合作组织的基础,这既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所需,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内在要求。^[119]

杨兆廷、尹达明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的土地估值和处置问题作出研究,认为近年来,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不断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现行经济和法律环境下,各试点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其估值不合理和处置困境,成为制约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有效开展的重要问题。对此,应完善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采用科学评估方法,建立土地产权交易中心,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建立多层次的风险保障分担机制,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120]

(十一) 环境法治

刘茜研究了生态福利方面的法律制度,认为生态福利在法律上的定位即为生态福利权,应以法学视角探讨生态福利及其制度设计,充分掌握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借鉴发达国家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经验与启示,认真审视我国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现状及问题,以生态福利权为核心建构我国生态福利法律制度体系,改进生态福利供给制度、健全生态福利分配制度,优化生态福利救济制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等,进一步完善我国生态福利法律制度。^[121]

刘茜、李铎等还具体研究了城市绿地与实现居民生态福利的关系及协调问题,认为城市绿地与实现居民生态福利之间的关系及协调程度,直接影响城市建设的进程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质量。理论上,两者应关联紧密且协调,但在实践中,却存在部分城市绿化率偏低,削弱了实现居民生态福利的物质基础,某些城市绿化建设甚至偏离了为实现居民生态福利服务的宗旨。对此,

应通过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和社会支持来调和两者的关系,最终实现城市景观优美,居民尽享生态福利,生态永续发展。^[122]

刘广明、尤晓娜则对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模式进行了检讨,提出了优化建议,认为补偿模式系决定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效果乃至成败的关键环节所在。政府主导的现行模式契合了生态补偿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回应了京津冀区域的现实状况,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社会效果。但现存问题亦表明,单一的政府补偿模式有其一定局限性。因此,为促进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充分发挥其应有功效,须从强化市场推进、扩大公众参与和发挥中央政府作用等方面,优化现行补偿模式。^[123]

任继尧就我国绿色消费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问题作出研究,认为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造成环境破坏与资源的浪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出现了巨大矛盾,而绿色消费制度成为了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绿色消费制度的法治不健全,执法水平不高,缺乏相应的保障制度,使得绿色消费制度在我国难以施行。我国亟待完善绿色消费促进立法,提高执法水平,建立合理的保障制度,以促进绿色消费制度的有序推进。^[124]

郭雪慧、李秋成对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路径与对策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面对京津冀地区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最有效的手段便是通过法律来进行协同治理。当前环境协同治理存在一些困境,环境协同立法不够协同,京津冀地区尚未建立良好的利益协同补偿机制,环境污染联合预警与信息共享措施不健全。对此,应借鉴美国与日本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的经验,加强环境协同立法,协调推进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司法合作的新模式,构建多元化的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与环境协同治理基金,建立京津冀地区环境信息共享平台,着力建设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监测与监督制度,构建利益协调与利益补偿与环境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加大立法、司法与执法的保障力度。^[125]

孟庆瑜等则就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法律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既体现区域生态环境整体性特征以及跨界污染、利益分配、行政壁垒等共性问题,又因其背后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地理等因

素相互作用而具有特殊性,需要借鉴国内外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有益经验,结合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及治理现状找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机制对策,以“协同治理法治化”为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实现路径,从法治运行模式、主体性制度、配套性机制等维度,全面构建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政策法律体系,充分发挥协同性政策法律在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126]

京津冀雾霾治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立足于协同治理视域,构建京津冀雾霾治理联动机制。对此,寇大伟认为,2017年“大气十条”确定的目标如期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的新机制基本形成。2018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目标,对雾霾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在雾霾治理过程中,要打破只能“等风来”的困境,就必须通过各级政府部门、各相关企业和广大公众的力量来共同努力。从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出发,应当设立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沟通平台,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推进京津冀雾霾治理技术层面的更深入协同,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积极参与的雾霾协同治理机制,开展京津冀雾霾协同治理第三方评估,切实提升京津冀雾霾治理区域联动机制的成效。^[127]

宋阳、李硕宁研究了京津冀协同视角下的大气污染治理问题,认为由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功能地位存在差异,各行政区域政策呈现碎片化特征,环境成本和责任与经济效益长期处于不对等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法治治理结构存在瑕疵,导致大气治理出现地区政府“各自为战”的局面。为此,必须转换地区政府政绩优先的思考模式,加强政府整体责任,强化政府、企业、法律、公众等不同群体互联互通的横向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线,以人为本作为根本制度出发点,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与平衡。^[128]

七、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研究

(一) 劳动法律制度

霍泽宇则对当前劳动法领域中弱势群体的维权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目前对于弱势群体并没有明确的划分界限,在劳动法领域也没有专

门针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法律,致使我国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经常受到侵害,而且在受到侵害后也没有法律能够帮助他们进行维权,显示出我国当前的劳动法领域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还存在一定差距,导致弱势群体在受到权益危害时,没有办法进行有力抗争。因此,有必要对此做出分析和研究,以解决当前劳动法领域中弱势群体的维权问题。^[129]

(二) 社会保障制度

肖辉对我国养老院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对策展开研究,认为伴随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养老院建设逐年提速,服务类型和内容进一步齐全,但多还停留在较为低端的层次,有些问题还较为突出和明显:支持养老院建设与发展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政策调整也存在一定缺位;软硬件建设存在短板,服务队伍专业化水平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经营理念落后,市场化程度较低,结构不够合理。理论上,养老院建设既有人道主义和社会契约论的共同思想基石,也有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适度普惠型福利和福利多元主义的特别理论支撑。国外经验如管理体系规范、人性化程度高及种类齐全等,都可作为借鉴。因此,我国养老院建设应从理念更新入手,以立法完善为根本保障,在经营方式上勇于创新,健全人才培养体系,改进理念和观念,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其中,法治完善是最根本的手段,为此需要加强涉老领域整体立法,构建系统完整的养老院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政策到法律的转化进程,进一步加强养老院财税、管理、监督、软硬件建设、安全防控及相关市场立法,明确责任,加大执法力度,营造适应养老院建设良好发展的整体法治环境。^[130]

肖辉、肖蒙还具体研究了养老机构中老年监护制度的适用与完善问题,认为养老机构中如何处理好老年监护问题,涉及众多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必须慎重对待。养老机构中老年监护制度的适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养老机构作为养老人所形成的老年监护制度的适用,二是养老机构作为监护人所形成的老年监护制度的适用。适用路径和方式包括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及委托监护的适用等,而监护职责的获取方式可通过老年监护协议、遗赠扶养协议和养老服务

协议等模式确定。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老年监护监督制度,确立有偿监护机制及设立监护人报酬制度,探索双监护人制度及设立第二监护人,构建限制性监护制度,加大司法介入力度。^[131]

盖宏伟、刘博对改进完善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作了探讨,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日渐增多,对社会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逐渐流行。为了更好地满足养老需求,需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构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理想框架。同时,针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进一步改进完善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132]

陈雷从制度缺陷与福利治理的角度研究了社区居家老年临终关怀问题,认为社区居家临终关怀服务建设在我国有一定程度的推进,但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总体来看,我国社区居家老年临终关怀缺乏顶层设计、制度治理缺失、责任缺位,法制、体制及政策支撑缺乏,发展迟滞,在制度、资金、管理、机构软硬件建设等宏观与微观层面存在诸多问题,整体处于补缺型福利服务阶段。为此,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立法确权赋予居家老年人优先权。加强经济福利治理,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其有效发挥人文关怀和社会化照顾临终老年人的作用。^[133]

张丽、严晓萍研究了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实现的路径,认为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智慧养老正成为中国化解养老服务资源供需矛盾的可行途径和必然选择。目前,智慧养老发展存在缺乏有效的顶层设计、智慧养老企业发展存在瓶颈、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老人需求之间存在偏差、智慧养老服务缺乏专业型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设立国家智慧养老产业大数据中心;积极推动智慧养老企业的自我提升和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需求平衡;拓展智慧养老产品购买渠道,提升老年人购买智慧产品的能力;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推进智慧养老相关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人才培养,培育壮大智慧养老服务队伍。^[134]

杜兴涛则对去产能要求下做好职工生活保障

和再就业工作作出研究,认为职工安置分流和再就业工作既关系社会稳定和职工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去产能政策的成效。因此,要总结安置职工的经验,协调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充分关注特定群体,建立健全不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的长效机制,保障职工生活,实现职工再就业。^[135]

八、军事法研究

(一) 军事立法

白永峰从立法学的视角,对《军事立法工作条例》作出评析,认为军事立法工作是推进依法治军的基础性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颁行的《军事立法工作条例》积极回应了改革强军目标下规范军事立法活动,提升军事法制质量,完善军事法治建设等现实需求。《条例》在立法权限配置、立法程序完善、强化立法监督以及立法解释适用等方面呈现出诸多亮点,成为我国军事立法技术显著提高的重要表现。新形势下,应结合深化军事法制建设的总体部署,在健全军事法制体系、优化立法技术,以及完善军事法治配套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136]

(二) 军事权力

华阳、李宇杨就我国海警部队登临权问题展开研究,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多,海上船舶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愈加频繁。作为承担维护我国海上权益的职能部门,海警部队必须要对海上国内外船舶进行有效管理,而登临权恰恰是海上执法权的核心所在。目前,关于登临权的规定较少,对该权力的行使比较困难。原来的公安边防海警部队在进行国防改革后被列入武警序列,是一支充满活力的执法队伍。因此,对海警部队登临权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37]

(三) 部队建设

郭其云、魏清就加强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展开思考,认为通过分析我国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发展总体情况,发现当前还存在着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法律定位模糊、待遇不高、队伍稳定性差、管理问题突出、专职队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结合专职消防队承担任务的实际需要,亟须进一步加强立法研究,明确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的法律定位,建立健全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招收保障制

度,提高福利待遇,营造拴心留人环境,创新管理教育方法,培育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努力提高政府专职消防队履职尽责能力。^[138]

(四) 警卫工作

谢明刚就重大活动警卫安全的风险特征与应对作了探析,认为重大活动警卫安全风险与大型活动安全风险、一般警卫任务安全风险不同,有其自身的特征,主要是复杂性、易发性、引发后果的严重性。公安警卫部门应认真研究威胁重大活动警卫安全的风险因素,采取建立高效指挥机构、实行风险评估、明确风险因素、强化科技支撑、加强反恐国际合作等有效应对措施,以确保重大活动的绝对安全。^[139]

张伟研究了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的警卫工作创新发展问题,认为随着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推进,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安警卫工作事关党的领导集体切身安全和政权稳定,在创新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挑战和考验,特别是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新形势和党中央日益严苛的新要求成为新常态,公安机关必须积极承担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在新时代社会治理思维指导下,依托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系,不断革除积弊、锐意创新,推动警卫工作更加坚强有力地履行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助力公共安全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发展。^[140]

孙鼎则立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对新型警务指挥人才素质能力构成要素展开分析,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潮头,准确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提出的新时代我国应遵循的纲领性准则,对警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作为警务工作直接谋划者、决策者、指挥者的警务指挥人员,是警务工作的主体。因此,警务指挥人员的素质能力直接影响、决定了警务工作的效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141]

刘海营具体研究了警卫安全检查工作,认为新形势下,为了保证警卫任务顺利进行,必须做好基础工作,警卫安全检查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警卫工作的成败。为保证绝对安全,警卫安全检查工作应包括防爆安全检查、设施设备安全检查、窃听窃视安全检查、环境安全检查、核生化安全检查、消防安全检查、食品饮料安全检查、交通工具安全检查等

内容。^[142]

(五) 军事行动

刘圣皇、胡建国就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军警民协同问题作出研究,指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主要参与方包括军事人员、警察及民事人员三部分,三方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任务。在多元化维和行动背景下,为提升行动效率,节省经费成本,形成整体合力,联合国已然建立了包括制度机构建设和行动实操两个层面的军警民协同机制。但也存在着任务授权重合、指挥体系不够坚强有力、合作意愿不够强烈、职业文化背景迥异等困难和挑战,需要加以解决。^[143]

何银基于国家身份的视角,对中国的维和外交展开分析,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的国家发展及其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变迁,促使中国的国家身份发生了 3 次演变:1949 年到改革开放以前是游离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之外的革命型国家;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2012 年是逐渐回归国际社会的融入者;2013 年以来,中国开始在国际制度体系中发挥“引领者”的作用。中国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身份对应的是不同的国家利益,以及不同的维和外交行为。当前,已经成为“引领者”的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超越了政治和物质层面,开始成为一名规范供应者。然而,一些国内和国际因素制约了中国有效地在维和事务中发挥引领作用,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维和外交需要认真应对的挑战。对此,中国需要对自身的能力、利益诉求和国际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在发挥引领作用时科学决策、量力而行,避免行为冒进和资源浪费。^[144]

(六) 军产管理

于鸿贤基于全面停止有偿服务背景,对军队房地产租赁纠纷问题展开研究,认为 2016 年 11 月 24 日,中央军委印发的《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指出,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正式启动。军队房地产有偿服务是本次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军队停止房地产有偿服务产生的矛盾集中在空余房地产出租合同纠纷方面。如何有效处理好此种纠纷,不仅影响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推进,更关乎军地之间的关系,必须予

以妥善处理。^[145]

（七）边防管理

周骥、杨振辉等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边防思想展开分析,认为推动边海空防科学全面可持续发展,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历届领导集体边防思想,扬弃古今中外边海空防治理经验教训,提出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内,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完善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坚持陆海统筹,坚持军民融合,周密组织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维稳行动,全面落实改革强军和兴边富民战略,持续推进边海空防信息化和法治化建设,着力解决制约边海空防的体制机制问题和障碍,不断提高新时代边海空防管控能力和防卫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军梦提供保障。^[146]

王亚宁研究了“一带一路”建设对传统边境安全观的冲击问题,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以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为前提的,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不仅改变了边境地区的战略地位,而且对传统边境安全观产生了很大冲击。要顺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首先必须搞清“一带一路”建设对传统边境安全观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冲击。这些冲击可概括为:对封闭边境安全观的冲击,以军事防卫为主的边境安全观的冲击,静态边境安全观的冲击,以陆地为主的边境安全观的冲击,以分散管理为主的边境安全观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的边境安全观,以助推“一带一路”建设。^[147]

九、司法及相关制度研究

（一）司法制度

高志明研究了适法型争议案件的语用界定、冲突模式及解决机制,认为适法型争议案件关注的是特殊案件引发的理、法、情争议问题,不同于争论案件事实问题的认证型争议案件。从宏观上看,理、法、情的非同步性及法律的局限性,思维与对象的矛盾关系导致的人类认知局限性,这是特殊案件引发适用法律争议的结构性的原因;从微观上看,面对特殊案件,理、法、情各自的内部特别是理的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这是特殊案件引发适用法律争议的功能性缘由。适法型争议案件是法治的溢出点,导致司法裁判陷入

困境,而解决适法型争议案件,包括法治体系内部的方法机制或语用机制、特殊程序机制,法治体系外部的倒推机制、民主机制等;同时,适法型争议案件客观上会推动相应法律的立、改、废,反过来使法律又再适应一定之情、顺应一定之理。^[148]

徐昀以舆情公案为例,就国家与社会视角下司法公信力的重构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在全媒体时代,我国司法公信力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根据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司法公信力的危机本质上是社会对于国家的信任危机,作为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的诚实/不诚实的两种应对方式,将会对司法公信力产生双向的叠加效应。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必须树立国家来源于社会的理念,积极面对政法舆情,诚实依照事实和法律作出回应,坦然面对错误,宽容对待不当指责,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可以说,2017年的于欢案就是司法公信力重构的典型正面样本。^[149]

（二）法院建设

陈海平、赵春莲以河北省为例,对庭审网络直播作出实证研究,认为中国的庭审网络直播纵深发展尚面临制度设计合理性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平台运行质量不高、资源浪费较严重等难题。对此,河北提供了自己的经验,即:建立统一平台、实现地方特色、发挥第三方力量,切实做好庭审网络直播工作。当然,庭审网络直播的深化发展尚需从制度设计合理化、平台建设多元化、直播效益最大化等角度发力。^[150]

肖辉就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权益法院的设立构想展开研究,认为设立老年权益法院是适应我国老龄化社会快速发展、更好地从司法层面维护老年人权益的需要,既与加强老年权益司法保护的国际趋势和国内需求密切相关,又与司法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紧密相联。为此,应当立足于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总体布局,谋划设立老年权益法院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必要性及现实性。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法院已经相继设立了老年法庭或老年审判庭,专门负责审理涉老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仍需要进一步改进和调整,探索设立老年权益法院并逐步加以完善。在设立模式上,不论是专门的老年权益法院还是老年权益法庭,抑或纳入其他专门性法院或法庭如家事法院等,都有利于老年人权益司法救济的有效运

行,但相对来说,设立专门的老年权益法院更直接、更有效;在设立方式上,可分别考虑采用分步走的过渡方式、通过纳入其他相关专门性法院的折衷方式,以及直接创设老年权益法院的专门方式来实现。此外,从空间布局到审判流程,探索相应的特殊程序规则,同时在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中尝试“三合一”的可能性,确保这种新型的司法运行机制能够更高效、合理地解决老年权益纠纷及其不同的诉讼问题。^[151]

梁平则研究了司法改革语境下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与运行机制问题,认为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是我国司法体制的重大改革,既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趋势和国内需求有关,也是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的重大突破,应当立足于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总体布局深刻地理解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目的。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已按照司法改革的要求建立了新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逐渐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并深入推进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的“三合一”改革,在此基础上探索诉讼与行政复议的程序衔接,最终运用新型审判机制有效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涉及的不同诉讼问题。^[152]

(三) 检察制度

田旭、胡筱琳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三个着力点展开研究,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2012 年联合发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长期以来,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局限于对社区矫正适用,变更的判决、裁定、决定的合法性监督上,而将对社区矫正执行的功能发挥与价值追求剥离在监督之外,淡化了对实现刑罚执行目的与功能的监督与促进,以致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系统性的设计和考量。基于此,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具体监督模式上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即:注重程序失范性监督,注重配合性监督,注重合规性监督,以更好地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153]

(四) 律师制度

陈海平、刘丰通过对死刑辩护的万例大样本展开分析,研究了从“有”辩护到“有效”辩护的相关问题,认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死刑

案件已基本实现辩护全覆盖,可谓“确有”辩护,一审强制辩护全面落实,二审辩护覆盖面不断扩大。但如果进行深度考察会发现,死刑辩护效果堪忧,实为“低效”辩护:指定辩护聊胜于无,委托辩护难孚众望,辩护理由严重形式化,辩护意见对裁判影响力极弱。为此,应当强化死刑辩护,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多措并举,提高死刑辩护准入门槛,扩大公设法援律师规模,提升辩护意见的影响力,引导辩护薪酬绩效化,努力实现从“有”辩护走向“有效”辩护。^[154]

(五) 监狱监管

王超以 163 例 12348 中国法网监狱矫治个案为例,研究了我国监狱罪犯矫治模式及效能问题,认为通过对 163 例 12348 中国法网中的各监狱罪犯教育矫治典型个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罪犯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学特征,分析我国监狱教育矫治罪犯的模式特征及矫治效能问题。结果显示:监狱矫治罪犯在年龄、是否顽危犯、法制教育、管控措施、心理措施等维度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我国的监禁矫治措施对某些罪犯具有较好效能。这表明我国监狱矫治罪犯工作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罪犯教育矫治模式,且已在各监狱扩展开来,心理矫治措施已在较多监狱推广使用并取得了较好效能。^[155]

张丽欣对监狱心理矫治组织机构规范化建设问题作出评价,指出,为了了解当前心理矫治组织机构规范化建设的现状,参考层次分析法,构建心理矫治组织机构规范化建设评价指标,随机抽取某省 13 所监狱心理矫治机构为研究样本,发现心理矫治组织机构的硬件指标达到了规范化建设的要求,但在工作规划、制度规范、受重视程度等软性要求上还存在很大差距,不同监狱的心理矫治开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对此,应重点加强专职心理矫治队伍建设,构建适用于监狱系统的心理矫治干警培训和督导机制,着重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工作成效。^[156]

翟中东、孙霞就设置低度戒备监狱与开放监狱的设想作了探索,认为设置低度戒备监狱与开放监狱的设想低度戒备监狱、开放监狱是相对于高度戒备监狱、中度戒备监狱而言的监狱类型。根据监狱对罪犯的控制力度,监狱可以分为超高度戒备监狱、高度戒备监狱、中高度戒备监狱、中度戒备监狱、中低度戒备监狱、低度戒备监

狱、最低度戒备监狱（即开放监狱）。在上述监狱类型中，超高度戒备监狱下的监狱管理控制力度最大，当然投入成本也最大。与超高度戒备监狱对应的最低度戒备监狱，当然对罪犯的控制力度最小，投入成本也最低。我国要推进低度戒备监狱与开放监狱建设，需要先行立法，由《监狱法》作出初步规定，然后细则中进一步规定。这是低度戒备监狱与开放监狱推进的前提。^[157]

贡太雷、苏春景研究了服刑未成年人教育矫正与人权保障问题，认为服刑未成年人教育矫正是一种针对特殊青少年群体的人权保障。它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和立法、行政、司法等方式，凝聚了各种资源和力量，增强其有效顺利回归社会的能力和效果，预防其重新犯罪，满足其健康成长和教育的基本权利。当前服刑未成年人教育矫正工作伴随着人权保护已取得显著新进展：违法犯罪预防更加重视前端干预，教育矫正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全面综合帮教建设更加丰富，文化艺术帮教活动更加多样，社区矫正教育机制更加健全，立法和制度建设更加完善。但服刑未成年人教育矫正仍存在着法治程度不高和专业不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快健全法治矫正，提升专业矫正和拓展社会矫正。^[158]

李代荣则研究了看守所不予收押的犯罪嫌疑人监管问题，认为出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生命健康的考虑，法律规定对患有急性传染病或其他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不予羁押。实践证明，对于此类特殊群体回流社会后仅依靠公安机关监管，并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反而使该群体愈加边缘化，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此，应以公安机关为主导，联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心理服务组织，贯彻群众路线，切实化解这一现实困境。^[159]

（六）犯罪防控

侯静研究了海上盗窃犯罪的侦防对策问题，认为海上经济贸易活动的增加使得海上盗窃案件数量也随之上升，由于海上盗窃犯罪发生的特殊环境，后期侦查工作难以开展，因此海上盗窃案件的侦破始终是一大难题。为此，应当从海上盗窃犯罪团伙性明显、犯罪区域广、现场痕迹难提取等特点出发，针对此类案件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同时还就海上盗窃案件多发的原因进行概述，进而就如何进行侦查和预防提出可行性的

措施。^[160]

王超以贷款诈骗风险智能建模预测为分析路径，研究了金融犯罪的人工智能预防路径问题，认为金融诈骗类犯罪的智能防控路径是人工智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对金融犯罪中银行防控贷款诈骗风险的数据进行数学建模分析、评估，是运用数据挖掘模型探索有效防控贷款诈骗风险的重要路径。朴素贝叶斯模型、马尔可夫覆盖结构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均可用于贷款诈骗风险防控，且在风险预测中具有较好效果，可用于未来的建模预测。目前，人工智能建模预测贷款诈骗风险还需要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如黑箱模型的解释问题等，而金融诈骗类犯罪的人工智能防控将是未来犯罪防控的一种必然趋势。^[161]

（七）纠纷解决

唐超、范凯等对边境安全风险民间化解机制的运行与优化问题加以研究，认为通过对两组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村寨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边境安全风险民间化解机制的主体是民间力量，民间友好关系是其基础，地理交通和信息相通、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生产生活资源是其外在条件。化解机制运行的主要途径有涉外矛盾的民间调解、边境安全风险的及时预警等。可从国家认同感的普及、边境安全风险意识培养、建立完善风险共同评估机制等方面优化外在条件，将机制与法治相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相衔接，形成边境安全防控的合力。^[162]

韩艳丽、魏爽基于多元主体博弈的动态分析框架，从个案考察出发，对小城市业主的维权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把握小城市业主维权的基本面貌和特征，能够丰富对当前我国业主维权的整体认知。多元主体博弈动态分析框架强调从“多元主体博弈”和“动态”两个特征来看待业主维权，认为业主维权是在动态维权情境下多元主体相互博弈的过程。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小城市业主维权中业主的权利意识和行动力不断增强，业主维权呈现出一定的组织化和较强的理性，但维权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维权策略也不够成熟。为此，要充分认识业主维权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积极功能，不断加强制度设计，为业主有效维权提供有力支撑。^[163]

毕连芳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制度

作出研究,认为调解本身就是一种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地方自治制度的倡导和推行,以及出于对法院调解成效不彰进行补救的需要,乡镇调解委员会开始承担起调解基层社会纠纷的重任。由于地方制度的屡屡变更、乡镇调解制度设计的粗浅以及制度执行中的敷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制度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制度的价值却不容忽视。乡镇调解制度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缓解了基层司法资源短缺的压力,推动了中国调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可以说,乡镇调解制度改变了传统基层社会调解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初步实现了调解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这一制度化的形式一直被延续到当代,为现代调解制度建设和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164]

(八) 社会治理

任广造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要求作出研究,认为立于法治之维观察,面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法治体系和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以及当代中国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所面临的治理困境,应当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及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通过对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基层治理法治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分析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法治化对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影响,这样才能有助于推进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研究。^[165]

高艳研究了风险不确定性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治理逻辑问题,认为现代社会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而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不确定性成为解读风险的“钥匙”。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陷入“边治理边膨胀、边控险边凸显”的当下,从不确定性视角重读债务风险本质、审视债务治理逻辑、寻求债务安全之道,就显得尤为关键。债务风险判断的不确定性、债务风险后果的不确定性和债务风险事件爆发的不确定性等,构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不确定性本质。在不确定即为不安全的逻辑支配下,风险主体的焦虑和恐惧加剧,对债务风险呈现避险倾向与治理懈怠、冒险倾向与治理激进两种不理性态势。基于此,正视债务风险不确定性的正效应,治理逻辑由“消除风险”转变为“维护安

全”,通过控险目标下的短期安全之策和提能目标下的长期安全之本,可以实现相对的、动态的债务安全。^[166]

马雁就新时代城市协同治理法治化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依据新时代中国特色城市治理的方略,从城市规划、城市更新与区域协同视角,研究城市法治治理结构、治理路径、区域法治治理、治理效益及评价体系,围绕城市法治治理的良法善治,软法与硬法的协调机制及技术,落实整体性治理原则在城市协同发展中的功能,突出城市行政规划、行政决策、责任政府职能与城市发展中的绿色、创新、智慧目标的法治程序,以及治理机制、主体、客体与方法的整合,规范城市日常治理、治理流程和区域协同,以此提升新时代城市协同治理法治化水平。^[167]

冯军等对环境污染犯罪治理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基于对社会危害性的考量,环境污染犯罪一直是环境污染治理的重点,也是刑事法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目的,是将环境污染犯罪控制在社会能够容忍的限度内。为实现这一目的,应当充分发挥刑事司法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的功能,加大环境污染犯罪的追诉力度,重视单位犯罪和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惩治,构建环境污染犯罪预防性治理模式。当然,由于环境污染犯罪一般都是趋利性犯罪,再严厉的刑罚也不能完全阻止有些犯罪人为追逐高额利润铤而走险,因此,对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不能唯刑事治理是赖,还应当针对环境污染犯罪发生的规律,积极挖掘和利用刑事惩罚之外的手段,努力把环境污染降至最低限度。^[168]

宋阳、李硕宁基于京津冀协同视角,对大气污染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由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功能地位存在差异,各行政区域政策呈现碎片化特征,环境成本和责任与经济效益长期处于不对等状态。由此可见,我国的环境法治治理结构存在瑕疵,导致大气治理出现地区政府“各自为战”的局面。因此,必须转换地区政府政绩优先的思考模式,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线,以人为本作为根本制度出发点,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与平衡。据此,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政府整体责任是环境治理的重要环节,而探索一条政府、企业、法律、公众等不同群体互联互通、横向区域协同治

理的路径,则更是势在必行。^[169]

吕新建研究了正当程序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规制问题,认为自四川省遂宁市率先在全国创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以来,已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这项制度在预防社会稳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特有的功效。但以正当程序原则对其进行审视,这一制度还存在着立法依据不足、评估主体单一、评估信息不公开及缺乏说明理由等问题,应通过完善立法、评估主体保持中立、公开信息披露及充分的说明理由等措施加以完善,以保障此项制度健康发展。^[170]

梁平就基层非正式治理的法治化路径作出研究,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但因制度供给无法满足基层治理需要以及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与国家主导下的正式规则不完全一致的“非正式运作”,尽管缺乏充足的合法性,但具有治理的有效性。基层非正式运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与法治化治理既具有同向性,也存在冲突,从长远来看,只有立足于现有的社会条件,加强契合基层治理需要的制度规范供给,尊重私法领域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不断培育民众的法治意识,非正式运作的空间将会逐渐缩小,最终迈向法治化治理。^[171]

杜胜利就政府科技创新宏观治理机制展开研究,认为科技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其规律和特点决定了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政府都需要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宏观治理,并通过提高科技创新管理水平,健全科技创新政策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等方面不断创新宏观治理机制。^[172]

冯军、田旭立足于政治学视野,对黑恶势力犯罪治理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黑恶势力犯罪严重破坏政治秩序,诱生并加速政治治理机体的腐化,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降低了公众对政治治理的认同感。正是基于对当前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政治危害性的深刻认识,党中央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决策,以期弥补政治治理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控制政治治理被黑恶势力染指的风险,阻却黑恶势力介入政治治理的途径,为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

坚强的制度保障。^[173]

陶建国、马鹏程对日本校园欺凌预防对策的新近发展作了研究,并思考了对我国的相关启示,认为近年来,为了提高校园欺凌预防效果,日本文部科学省深入推进校园欺凌法制的实施,采取了诸多对策:制定校园欺凌重大事态调查指南,完善欺凌事件的调查规则;出台欺凌自杀预防措施,预防学生因遭受欺凌而选择自杀;确立SNS系统欺凌咨询体制,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咨询手段。中国也面临着校园欺凌严重化问题,在制度构建和完善方面,日本的经验有一定借鉴意义。^[174]

程瑞山、任明明则对乡村“治理有效”的意蕴进行了考量,认为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乡村“治理有效”内涵着对治理主体、治理决策、实施执行与治理效果的较高要求。乡村治理的效度考量,需要从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促进乡村发展、解决乡村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治理资源的“投入”与治理“产出”等多面相衡量。当前实践中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就要从乡村组织振兴、治理主体良性互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注重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下好功夫。^[175]

(九) 法治建设

王利军研究了法治评估指标设计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评估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法治评估指标的设计。目前对于法治评估指标的设计还存在随意性,影响到法治评估的科学性。为了避免这种现象,需要认真研究解决法治评估指标设计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包括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结合、事实指标与价值指标相结合、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普遍指标与特殊指标相结合、整体指标与具体指标相结合、内在指标与外在指标相结合。^[176]

赵德勇对打造法治冬奥的相关问题作出研究,认为打造“法治冬奥”是落实依宪治国的必然要求,在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筹备和举办冬奥会,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必须积极地依宪施政和依法履责。为此,需要强化规则意识,为冬奥会筹备和举办奠定法治基础,进一步规范执法和

司法行为,为法治冬奥提供有力保障。在筹备和举办冬奥会的过程中,执法机关尤其应当在执法理念上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原则,确保正当执法,而处理与冬奥会有关的司法纠纷,则应当公正公平且程序规范。此外,还应做好法治宣传教育,为法治冬奥营造良好法治环境。^[177]

冯军就“健康中国”建设的刑事法治保障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为了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要求,强化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法治意识,完善健康保障领域的刑事立法,规范刑事司法活动,切实提高刑事法治在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进程中的保障能力。立法上,完善健康保障领域的刑事立法,将精神伤害明确纳入故意伤害罪法定结果的范畴,让健康权回归污染环境罪立法所保护的法益体系,对于个别类罪罪名的设计应当精细化,分解成具体的罪名,以体现对人体健康保护的要求。司法上,规范侵害健康犯罪案件的刑事司法,完善精神伤害的司法鉴定制度,规范侵害健康犯罪案件的司法运作机制,统一立案标准和裁判标准,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这就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相应司法解释来进行规范,或发布典型案例加强对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业务指导。^[178]

(十)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郎正午通过证伪的方式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刑事风险展开研究,认为人工智能的独立人格以从各种自然共同体和人为共同体的依附中独立出来为前提,能为自己代言是人工智能获得独立人格的基础。强行赋予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行为是如同猎狐人规则一样的伪善,是极端不正义的体现。即便是赋予超人工智能独立人格,但由于人类应当具有控制人工智能的能力,人工智能的独立人格便成为了减损的人格,从而使人工智能失去了非难的可能,人工智能的独立人格也变成了伪命题。因此刺破人工智能的人格面纱,对人工智能独立主体地位的否定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否定了人工高智能的独立人格,教唆犯和间接正犯变成了无稽之谈,从而过失共同正犯也就凸显了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追究人工智能研发者和生产者的过失责任成为了德国实务界的共识。对人工智能独立人格的否定和对人工智能犯罪增设独

立条款的相继否定,并不意味着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的忽视,而是指现有体系内足以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对刑法的冲击。风险刑法在应对未知风险时显示了其独特的价值,结果避免之虞是过失犯罪和不作为犯罪的归责条件,而动物风险则对行为人利用人工智能去犯罪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模式。^[179]

高志明则研究了人工智能新发展对法律知识生成方式与制度体系的影响,认为人工智能实际是信息与知识生产力极大提高的产物,是信息与知识组织方式发生的巨大变革。人工智能新发展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包括大量重复性的脑力劳动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业等领域将被重新定义,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亦隐藏着巨大社会风险。作为人类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知识系统,可能出现本体论、认知论、发展论、方法论等方面的转变,可能出现向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乃至未来学等学科交叉与整合的转向,可能出现基于大数据库、大信息库、大知识库分析而进行充分信息条件下研判的方式转型。人工智能对现代法律制度体系的影响不容小觑,这种影响可能至少包括法律主体制度、客体制度、权利体系等,网信立法一方面要促进现在人工智能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也要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予以充分考量,特别是要防止人工智能滥用给人类带来的风险。^[180]

迪莉娅对大数据环境下 App 用户隐私计算影响因素作出研究,认为大数据环境下,App 已经成为工作、生活、娱乐甚至是赚钱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App 也成为用户隐私泄露的重灾区。用户一方面担心隐私的泄露,另外一方面由于 App 所带来的益处,却愿意主动提供隐私数据供商家利用,这就是所谓的“隐私悖论”现象。隐私计算是研究隐私悖论的重要方法之一,据此可以分析悖论存在的原因。App 用户隐私的保护需要不断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开发商与运营商的监管,而不断提高用户隐私保护的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181]

蒋冰晶、李少军则研究了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开放的行政法治理念,认为及时、高质、安全的政府数据开放需要法治理念引导。以法治方式化解政府数据开放中“不愿、不敢、不公”现

象,应秉承包容发展理念,建构包含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原则、避风港原则、违法归责原则、免费原则、同等开放原则的法律制度;化解“不会、不快、不优”现象,应秉承合作治理理念,建构包含自由参与原则、“三分”原则、元数据共享原则、完整性原则、一致性原则的法律制度。为此,应以包容发展与合作治理理念弥补控权理念的不足,而致力于提高行政任务执行力和社会需求回应力,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构建全民共享格局的重要一环。^[182]

十、国际法研究

(一) 国际公法

王亚宁就硬边界的内涵作出研究,认为硬边界不仅指边界线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险峻,而且还指跨越边界线的难度较大。在边界线已经划定的背景下,硬边界所具有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系统梳理硬边界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边界的“硬”属性。硬边界的内涵主要表现为边界线的位置具有难以逾越的自然属性、边界线附近具有浓郁的军事氛围、边界制度较为严格和边界管控的智能化水平高等。由于边界的内涵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因此不同历史背景下,硬边界的主要内涵有所不同。此外,理解和研究硬边界的内涵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183]

魏鑫立足于国际法视角,研究了南沙岛礁建设的环境保护问题,认为菲律宾在2013年单方面提起了南海南仲仲裁案,在七项诉求中环保诉求涉及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生态体系等,指控中国岛礁建设以及不合理的渔业活动破坏了南海海洋环境。针对指控中关于南沙岛礁建设的污染,我们在分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内容、南沙岛礁工程建设的过程控制以及岛礁的环保整治措施等基础上,驳斥菲方的无理之说。同时,中国也在南沙岛礁环保方面有新进展,建设生态保护修复相关设施,正式启用中国科学院岛礁综合研究中心,不断摸索创建海洋环保的南海模式。中国有义务法维护南海海洋环境,应适时发布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鼓励公众参与,推进《海洋基本法》的立法,完善《岛礁保护法》等专门性立法,在加强环保宣传开展生态修复工作的同时,积极寻求南海国际环境合作,以期从低

敏感领域解决南海争端。^[184]

(二) 国际经济法

李俊然、赵俊娟以国际投资协定的实体规则为视角,研究了国际投资协定与气候变化协定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认为由于在现有国际投资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规则与国际投资规则存在本质区别,因此,国际社会一系列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定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气候协议》等,与传统上作为保护投资者私人利益法律工具的国际投资协定存在冲突。为此,应通过国际投资协定与气候变化协定的宏观协调,重构国际投资协定的目标价值体系,将可持续发展列为国际投资协定的最高价值目标,注重国际投资协定实体规则与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协调,在国际投资协定环境条款中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在气候变化协定中纳入投资者的应对气候变化义务,切实解决这一冲突。^[185]

王学庆对碳关税问题进行研究,认为随着碳关税这一措施的提出并在航空器方面的逐渐试用,碳关税这一问题成为了国际贸易关系和各国利益之争的讨论热点,发达国家推行碳关税政策背后必然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提高发达国家在自由贸易中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制约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以形成有利于本国的国际低碳经济发展体系。随着碳关税推行的愈演愈烈,我国不能一味地依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保护性原则,而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应对这一挑战,对国内的碳税法律政策进一步做出调整和修订,以适应新的国际贸易关系发展的需要。^[186]

宋阳基于开放新视野的要求对商事惯例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透过对不同时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事惯例、交易习惯的历史适用考察,来探寻交易习惯适用的一般法学原理,并通过对这种历史规律的把握,预测未来商事惯例、交易习惯适用的发展趋势,以指导我国相关制度的建构。同时,还要实现理论与实务相衔接,不但要梳理国际商事惯例、交易习惯适用的相关理论,更要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交易习惯的具体内容,并努力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交易习惯内容和适用方法的认知水平。这就需要基于新开放理念,在“一带一

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了解和运用沿线国家相关的商事惯例以及交易习惯。^[187]

宋阳还研究了国际商事惯例（习惯）中的主观要素，认为国际商事惯例或习惯的构成要件是国际商法学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一般认为若欲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惯例必须满足客观要件即一致和反复的行为，以及主观要件即“法律确信”这两方面要求。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惯例的主观要件认识不足、界定模糊，在惯例的识别层面出现了“去主观化”的理论趋势。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国际商事惯例与不具有约束力的通例之间的界限，赋予裁判者过多自由裁量权限，破坏法律规则适用的统一效果，进而破坏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减损司法裁判的可预测性。鉴于此，应当继续坚持国际商事惯例的主观要件理论。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以专家证言为切入点，引入基于批判反思态度的考虑因素，作为国际商事惯例约束力的承认规则和判定标准，精准构建国际商事惯例的新“法律确信”理论。^[188]

安文靖结合对我国民法分则合同编立法的启示，就 CISG 根本违约“可预见性”标准的学理与判例作了分析，认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根本违约的“可预见性”标准是一个自产生时起便颇具争议的标准。我国 1999 年《合同法》引入 CISG 根本违约制度时并未对可预见性标准加以规定，民法分则合同编立法面临对根本违约制度的完善问题。尽管 CISG 根本违约可预见性标准本身存在争议，但从对该标准的理论与近 30 年各国适用的 400 余则判例的分析可见，实践中裁判者在逐渐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即可预见性标准不是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该标准是对违约方根本违约构成的例外，其构成对合同解除的合理限制。我国民法分则合同编需对根本违约制度做进一步细化规定，可预见性标准有必要作为限制性标准加以明确。^[189]

（三）国际私法

孙学栋、王珊珊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识别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对识别涉外民事诉讼程序问题一直以来是国际私法中一个长久的问题，对于识别的对象和证据等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涉外民事诉讼程序问题适用法院地法已为国际条约和各国立法普遍采纳，成为外国法被

排除适用的领域。在我国法律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问题的识别没有明确作规定的前提下，法院可参考涉及国外因素的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识别的规定和程序问题，按照我国程序法的法律适用规范，适用我国程序法审理程序问题。^[190]

王慧则研究了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认为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大多数国家根据效率原则的衡量选择引用冲突规范解决法律争端，但其适用结果或许会与立法者的目的相背离。公共秩序保留作为排除外国法适用的“安全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护内国利益。由于现阶段我国关于国际私法相关的单行立法还未制定，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完善应分步骤逐步实现。第一，仍需保持公共秩序保留相关条款在已颁行的现行法律当中的效力，等待国际私法法典的出台。第二，新的相关民事法律立法时，防止对该制度的重复立法，防止法律效力减弱。在将来制定国际私法法典时公共秩序保留应该使用更准确的概念，根据我国相应的社会实际情况在立法方式的选择上应更适应社会发展。^[191]

（肖辉：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 张伟英,杨继永.习近平依宪治国理论的基础渊源与创新价值[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 [2] 郭晖.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宪法适应性问题探析[J].河北法学,2019(2).
- [3] 杨福忠.推动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机制构建[N].河北日报,2019-05-29.
- [4] 赵玥.本体论视域下的民主思想研究[J].法制博览,2019(34).
- [5] 于春洋,马瑞琪.民族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内在关联[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 [6] 李元元,于春洋.府际关系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以民族地方政府为中心的讨论[J].青海社会科学,2019(6).
- [7] 王利军.如何发现权利?[J].南京社会科学,2019(8).
- [8] 郭晖.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管制性征收[J].河北学刊,2019(2).
- [9] 高景芳,甄奇颖.论作为社会权的公民体育权[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9(2).
- [10] 高志明.侵害个人信息权的法律责任:法理融贯与立法比较[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 [11] 杨福忠.筑牢加强党的建设的制度根基[N].河北日报,2019-12-04.

- [12] 伊士国. 设区的市立法权研究[M].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
- [13] 梁平, 律磊. 京津冀协同立法: 立法技术、机制构建与模式创新[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2).
- [14] 孟庆瑜. 地方立法与法治政府建设: 基于河北省的研究视角[M].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
- [15] 孟穗, 冯靖.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研究[J]. 河北法学, 2019(4).
- [16] 张伟英, 杨继永. 监察留置措施中的人权保障[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5).
- [17] 王宝治, 芦丹. 河北省电子认证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 [18] 郭永良. 对恐怖行为体“学习”框架的考察[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 [19] 杜伟涛. 新疆网格化视角下的反恐恐怖爆炸行动研究[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9(4).
- [20] 刘志勇. 美国跨境反恐评述与启示[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 [21] 王玉冲, 郑坤芳. 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挑战、机遇及路径[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1).
- [22] 王亚宁.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困境与出路[J]. 公共外交季刊, 2019(2).
- [23] 赵立新. 日本修宪: 历史、现状与未来[M].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
- [24] 赵立新. 对战后日本宪法的再认识——一个历史学视角的考察[J]. 河北学刊, 2019(2).
- [25] 司谨源.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公安情报工作立法研究[J]. 武警学院学报, 2019(9).
- [26] 杜胜利. 我国政府科技创新宏观治理的“放管服”改革[J]. 现代管理科学, 2019(7).
- [27] 寇大伟. “放管服”改革中监管力度构建[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10-08.
- [28] 蔡欣欣, 田勇. “放管服”改革在简政放权中需要处理的关系及应对[J]. 经济论坛, 2019(2).
- [29] 王晓烁, 吴伟华. 论县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问题与完善路径[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19(1).
- [30] 徐昊阳. 关于我国公安机关名誉权的几点思考[J].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19(6).
- [31] 迪莉娅. 政府数据开放成熟度模型研究[J]. 现代情报, 2019(1).
- [32] 王晓烁, 吕中行. 县级权力清单实效性的司法检验[J]. 河北法学, 2019(1).
- [33] 李铭峰. 大数据时代公民信息安全视野下警察权规制研究[J]. 武警学院学报, 2019(11).
- [34] 徐丹彤. 我国警察携带枪支的法律问题研究[J].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9(1).
- [35] 徐荧. 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的法律属性研究[J]. 辽宁警察学院学报, 2019(4).
- [36] 黄新宇. “智慧缉私”背景下东南沿海地区联合打击成品油走私研究[J]. 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 2019(1).
- [37] 桂彬, 林毅斌. 粤港澳大湾区刑事警务合作研究[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9(4).
- [38] 刘雪瑶, 牛继承. 中俄自贸区俄罗斯公民免签政策研究——以黑龙江省黑河市为视域[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9(6).
- [39] 王丽娜. 浅析公共服务体系的标准化建设及其展望[J]. 科技风, 2019(24).
- [40] 高国忠, 李剑方. “健康中国”视域下太极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王其和太极拳的抢救性发掘为中心[J]. 河北学刊, 2019(5).
- [41] 彭光明, 邓楠, 杨莉英.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 [42] 崔璨. 我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M]. 上海三联书店, 2019.
- [43] 崔璨. 发挥 PPP 模式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积极作用[J]. 人民论坛, 2019(7).
- [44] 刘勇. 非国有博物馆的法律保护: 现状、困境与出路[J]. 中国博物馆, 2019(3).
- [45] 梁岩妍. 我国不可移动文物法律保护研究[M].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9.
- [46] 亏道远, 冯兆蕙. 高速铁路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化治理路径[J]. 河北法学, 2019(6).
- [47] 郭辉, 张文强. 共享单车租赁的法律问题研究[J]. 保定学院学报, 2019(1).
- [48] 胡正凯. 新的应急管理体制下社会应急力量的管理联动机制探索[J]. 中国应急救援, 2019(5).
- [49] 赵家鹏, 刘立文. 构建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设想[J]. 消防界(电子版), 2019(24).
- [50] 李一行, 刘兴业. 自然灾害防治综合立法研究: 定位、理念与制度[J]. 灾害学, 2019(4).
- [51] 白永峰. 论移民管理改革背景下的外国人出入境安全风险防控[J].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9(3).
- [52] 杜松.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移民及出入境管理信息应用制度建设[J].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9(5).
- [53] 刘红星. 论拘留审查制度的完善[J]. 武警学院学报, 2019(11).
- [54] 苏林政. 美国非法移民遣返政策对中国的启示[J]. 山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9(3).
- [55] 王子立. 中美移民法律体系比较与启示[J]. 上海公安学院学报, 2019(6).
- [56] 陈雪. 政府环境责任法制化的路径研究[J]. 法制博览, 2019(2).
- [57] 郭雪慧.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以激励机制为视角[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9(3).
- [58]梁平.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分析、司法运行与具体完善—基于《民事诉讼法》第55条而展开[J].山东社会科学,2019(1).
- [59]王磊.公民纳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之合理性[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1).
- [60]刘阳.我国家事调查制度之现状与程序完善[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0).
- [61]陶建国.我国家事审判中的家事调查员制度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19(2).
- [62]柯阳友,李琼.我国家事审判改革的重点[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 [63]柯阳友,李琼.家事审判中程序正义之维护[J].河北法学,2019(3).
- [64]庄炳芳,刘红月.完善中国海警海上犯罪现场勘查工作对策研究[J].公安海警学院学报,2019(1).
- [65]李和国,李志.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贩卖毒品案件侦查的影响及应对[J].武警学院学报,2019(5).
- [66]刘卫红,张翼翔,吕艳华.税务机关应对税务行政公益诉讼的困境与建议[J].税务研究,2019(4).
- [67]孟庆瑜,张思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刑责任衔接问题研究——关于沐阳县农业委员会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的探讨[J].法律适用,2019(12).
- [68]王超.盗窃案件证据标准统一问题实证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38699例文书为例[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9(6).
- [69]柯阳友,蒋楠.医疗诉讼证明妨碍制度之实证分析[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1).
- [70]胡雪亮.民法之诚信原则在共享经济中的应用探究[J].法制博览,2019(25).
- [71]冯兆蕙,李霞.《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决议行为”之探析[J].河北法学,2019(1).
- [72]田韶华.论通谋虚伪行为规则的司法适用[J].北方法学,2019(4).
- [73]肖辉.当代中国老年监护制度发展现状及其完善路径[J].河北学刊,2019(6).
- [74]吴海婷.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完善[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2).
- [75]田韶华.论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债务的清偿[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5).
- [76]罗杰,尹鸽.“走婚同居”养老的法律问题研究[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77]张凡.“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抵押权的法律构造[J].理论导刊,2019(4).
- [78]徐超.承包地“三权分置”中“三权”的权利属性界定[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7).
- [79]苏艳英.三权分置下农地权利体系构建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
- [80]梁岩妍.论我国文化遗产私有财产权保障:案例反思与立法完善[J].河北法学,2019(6).
- [81]张婧.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比较法考察及立法完善——对民法典编纂中合同编的建议[J].云南社会科学,2019(1).
- [82]贾玉平.民法典合同编快递服务合同条文建议稿[J].河北法学,2019(7).
- [83]冯建生.民法典编纂视角下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有名化[J].法商研究,2019(4).
- [84]冯建生.美国禁令制度在商业特许经营合同中的适用及其借鉴[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1).
- [85]柴振国.区块链下智能合约的合同法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19(4).
- [86]张永辉.风险社会语境下共同侵权行为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9.
- [87]刘勇,李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知识产权公共领域作用机制研究[J].法学杂志,2019(10).
- [88]薛秀娟,彭长江.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健全与完善[J].人民论坛,2019(7).
- [89]刘春霖,孙路瑶.FRAND承诺域外法律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90]赵金龙.公司信息服务电子化的公司法回应[J].证券法苑,2019(2).
- [91]林妍.注册制改革下的科创板市场主体责任审视与监管[J].人民论坛,2019(25).
- [92]李慧英,王育红.PPP项目资产证券化风险隔离法律制度的困境与优化[J].当代经济管理,2019(6).
- [93]苏永生.法益保护理论中国化之反思与重构[J].政法论坛,2019(1).
- [94]宋伟卫.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人身危险性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9.
- [95]敦宁,韩玫.论我国轻罪范围的划定[J].河北法学,2019(2).
- [96]敦宁.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界分[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97]余博.对聚众犯罪若干问题的探析[J].昆明学院学报,2019(5).
- [98]牛忠志,曲伶俐.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立体化”修正[J].政法论丛,2019(1).
- [99]牛忠志.完善犯罪成立条件体系的宏观问题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9(4).
- [100]梅真硕.治安管理中正当防卫标准的异化表现及对策[J].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19(3).
- [101]李天发,李晓强.初论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基本意涵[J].中国司法,2019(4).
- [102]赵子昂.“三振出局法”评析及对我国累犯制度的启示[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3).

- [103] 吕哲,高恩泽.民事赔偿及对死刑限制适用的影响[J].中国检察官,2019(9).
- [104] 敦宁,李昊天.盗墓犯罪集团及其首要分子的司法认定[J].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19(3).
- [105] 苏永生.虚假诉讼罪的“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从定罪条件到注意规定[J].法学杂志,2019(7).
- [106] 孟庆瑜.经济法实施方式的变化[J].经济法论坛,2019(1).
- [107] 刘洋洋,李景春,张雅楠.悖论视域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困境与治理方略[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108] 孙文娜,苏跃辉.征信机构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难题[J].人民论坛,2019(29).
- [109] 霍艳梅,刘志军,孟庆瑜,和金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110] 赵娜萍.净化网络购物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J].品牌研究,2019(10).
- [111] 孙丽虹.食品安全中的“法制”与“法治”之间的平衡[J].中国调味品,2019(6).
- [112] 陈玉玲.基于信息化环境下的金融审计风险分析[J].金融经济,2019(6).
- [113] 李大庆.法学范式竞争与领域法学的知识创新[J].江汉论坛,2019(4).
- [114] 王海波,马金伟.金融科技监管新模式:“法链”模式发展路径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9(9).
- [115] 王海波.我国“法链”监管模式的现状、问题及优化路径[J].财会月刊,2019(21).
- [116] 胡颖欣.我国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J].农业经济,2019(2).
- [117] 董敏,吕红平,刘轶.人工智能反保险欺诈的私法效果和路径选择[J].金融教育研究,2019(6).
- [118] 刘广明.新常态下推进农村文化消费的路径探索——基于强化政府干预的主张[J].长白学刊,2019(1).
- [119] 张凡.走向权利的联合: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制理论的时代价值[J].社会主义研究,2019(4).
- [120] 杨兆廷,尹达明.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土地估值和处置的问题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9(9).
- [121] 刘茜.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9.
- [122] 刘茜,李锋,赵琪.城市绿地与实现居民生态福利的关系及协调[J].广西社会科学,2019(3).
- [123] 刘广明,尤晓娜.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模式检讨与优化[J].河北学刊,2019(6).
- [124] 任继尧.我国绿色消费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2).
- [125] 郭雪慧,李秋成.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路径与对策[J].河北法学,2019(10).
- [126] 孟庆瑜等.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法律问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9.
- [127] 寇大伟.协同治理视域下京津冀雾霾治理联动机制研究[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3).
- [128] 宋阳,李硕宁.京津冀协同视角下的大气污染治理[J].政法学刊,2019(4).
- [129] 霍泽宇.当前劳动法领域弱势群体维权问题的分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9(5).
- [130] 肖辉.我国养老院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对策[J].甘肃社会科学,2019(6).
- [131] 肖辉,肖蒙.养老机构中老年监护制度的适用与完善[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6).
- [132] 盖宏伟,刘博.改进完善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探讨[J].理论导刊,2019(3).
- [133] 陈雷.社区居家老年临终关怀:制度缺陷与福利治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134] 张丽,严晓萍.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实现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135] 杜兴涛.去产能要做好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J].人民论坛,2019(18).
- [136] 白永峰.《军事立法工作条例》的立法学评析[J].武警学院学报,2019(1).
- [137] 华阳,李宇杨.我国海警部队登临权问题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中),2019(11).
- [138] 郭其云,魏清.关于加强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应急救援,2019(2).
- [139] 谢明刚.重大活动警卫安全风险特征与应对探析[J].武警学院学报,2019(1).
- [140] 张伟.社会治理新格局下警卫工作创新发展研究[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19(2).
- [141] 孙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新型警务指挥人才素质能力构成要素分析[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4).
- [142] 刘海营.警卫安全检查工作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9(3).
- [143] 刘圣皇,胡建国.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军警民协同概述[J].武警学院学报,2019(3).
- [144] 何银.中国的维和外交:基于国家身份视角的分析[J].西亚非洲,2019(4).
- [145] 于鸿贤.全面停止有偿服务背景下军队房地产租赁纠纷问题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中),2019(5).
- [146] 周骥,杨振辉,李丽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边海空防思想浅析[J].武警学院学报,2019(3).
- [147] 王亚宁.“一带一路”建设对传统边境安全观的冲击与思考[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19(1).
- [148] 高志明.适法型争议案件的语用界定、冲突模式及解决机制[J].法律方法,2019(2).
- [149] 徐昀.国家与社会视角下司法公信力的重构——以舆情公案为例[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150] 陈海平,赵春莲.庭审网络直播的实证研究——以河北

- 省为例[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151]肖辉.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权益法院的设立构想[J].河北法学,2019(12).
- [152]梁平.司法改革语境下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与运行机制研究[J].知识产权,2019(2).
- [153]田旭,胡筱琳.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三个着力点[J].人民检察,2019(7).
- [154]陈海平,刘丰.从“有”辩护到“有效”辩护:死刑辩护的万例大样本分析[J].河北法学,2019(6).
- [155]王超.我国监狱罪犯矫治模式及效能问题实证研究——以163例12348中国法网监狱矫治个案为例分析[J].警学研究,2019(6).
- [156]张丽欣.监狱心理矫治组织机构规范化建设评价[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3).
- [157]翟中东,孙霞.设置低度戒备监狱与开放监狱的探索[J].犯罪与改造研究,2019(10).
- [158]贡太雷,苏春景.服刑未成年人教育矫正与人权保障[J].中国特殊教育,2019(10).
- [159]李代荣.看守所不予收押的犯罪嫌疑人监管问题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9(5).
- [160]侯静.海上盗窃犯罪侦防对策研究[J].公安海警学院学报,2019(5).
- [161]王超.金融犯罪之人工智能预防路径研究——以贷款诈骗风险智能建模预测为分析路径[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9(2).
- [162]唐超,范凯,蔡威.边境安全风险民间化解机制的运行与优化[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19(1).
- [163]韩艳丽,魏爽.基于多元主体博弈动态分析框架下的小城市业主维权研究——以Q市X小区业主维权为考察个案[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 [164]毕连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镇调解制度初探[J].江西社会科学,2019(7).
- [165]任广浩.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之维[M].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
- [166]高艳.风险不确定性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治理逻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167]马雁.新时代城市协同治理法治化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9.
- [168]冯军等.环境污染犯罪治理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9.
- [169]宋阳,李硕宁.京津冀协同视角下的大气污染治理[J].政法学刊,2019(4).
- [170]吕新建.论正当程序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规制[J].河北法学,2019(3).
- [171]梁平.基层非正式治理的法治化路径[J].法学杂志,2019(10).
- [172]杜胜利.政府科技创新宏观治理机制研究[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9(4).
- [173]冯军,田旭,王嘉璇.政治学视野中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174]陶建国,马鹏程.日本校园欺凌预防对策的新近发展及启示[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2).
- [175]程瑞山,任明明.乡村“治理有效”的意蕴与考量[J].科学社会主义,2019(3).
- [176]王利军.论法治评估指标设计的基本原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9).
- [177]赵德勇.打造法治冬奥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路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31.
- [178]冯军.“健康中国”建设的刑事法治保障[N].检察日报,2019-08-06.
- [179]郎正午.伪命题:人工智能带来的刑事风险[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9(3).
- [180]高志明.人工智能新发展对法律知识生成方式与制度体系的影响[J].长白学刊,2019(1).
- [181]迪莉娅.大数据环境下App用户隐私计算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情报,2019(12).
- [182]蒋冰晶,李少军.包容与合作: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开放的行政法治理念[J].河北法学,2019(12).
- [183]王亚宁.浅析硬边界的内涵[J].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3).
- [184]魏鑫.论南沙岛礁建设的环境保护[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9(6).
- [185]李俊然,赵俊娟.国际投资协定与气候变化协定的冲突与协调——以国际投资协定的实体规则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9(7).
- [186]王学庆.碳关税的法律思考[J].纳税,2019(28).
- [187]宋阳.开放新视野下的商事惯例[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
- [188]宋阳.论国际商事惯例(习惯)中的主观要素[J].环球法律评论,2019(2).
- [189]安文靖.CISG根本违约“可预见性”标准的学理与判例分析——兼论对我国民法分则合同编立法之启示[J].河北法学,2019(1).
- [190]孙学栋,王珊珊.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识别及法律适用[J].法制博览,2019(18).
- [191]王慧.论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J].河北农机,2019(12).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

田翠琴

2019年,河北省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增加了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等方面的内容,深化了人口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尤其生态环境保护与京津冀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出版了多部社会学专著及相关内容的著作,如《河北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1978—2018)》(田翠琴等)、《贫困指标测度的研究范式与机理分析》(张会敏)、《性别失衡与青年择偶》(贾志科)、《中国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以快速老龄化为背景》(胡耀岭等)、《河北省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政策研究》(袁丽蓉等)、《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分级诊疗机制研究》(李蔚)、《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与前景的生命道德思考》(边林)等。学术著作的数量有所增加,质量有所提高。本年度的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

作为科学建制的一部分,科技社团在推动科技创新、知识传播与普及、政策建议等方面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国家科学院作为科技社团的一种特殊类型,由特定领域的学术精英组成,代表了该国的最高科研水平,处在科学建制结构内顶端。鲁云鹏、李晓琳以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核心观点为理论依据,结合治理思维对国家科学院的治理理论进行分析。其主要结论是:首先,国家科学院治理的基础是自主性,并借助科学规范与法律体系作为治理机制,实现科技的创新与传播,治理要义在于如何高效安排组织内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强而独立的学术权力和弱而规范的行政权力是较为理想的博弈结果;其次,我国国家科学院在治理过程中表现出治理资源较为集中化与显著的行政型治理特征;再次,尽管默顿学派的诸多理论饱受诟病,但其核心观

点却构成现代科学院治理理论的基础,仍旧是研究科学建制的有效理论工具。^[1]

科技社团通常被视为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的柔性科技类社会组织,也是作为非机构化、可接受非职业科学家参与的科学共同体。鲁云鹏以科技社团的概念与本原性质为逻辑起点,借由治理环境变迁,聚焦科技社团治理的问题、内涵与特征,搭建起科技社团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首先,科技社团的本原性质是由互益性衍生的组织社会性与公益性,由契约性构建的组织独立性与生产性;其次,当代科技社团治理需解决的问题在于自治权维护、决策能力与协作效率提升;再次,科技社团治理是指大科学时代下,科技社团通过协调会员同各利益相关者间的权责利关系,并合理设置决策、激励监督及互动合作机制,以实现科学高效创新与传播的动态性制度安排过程。而组织属性趋向混合、结构高度柔性、使命重视公正,也使得科技社团治理区别于其他组织类型治理。^[2]

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突发公共事件频现引发舆情危机的环境中,研究舆情爆发机制及治理有重要意义。朱晓霞等基于爆炸性渗流理论,考虑各节点不同影响力构建了改进的社会舆情爆炸性传播模型,探究了舆情可能的爆发机制。进而提出随机免疫、目标包围免疫、全面科普三种舆情治理选择,通过仿真和案例分析验证其合理性。研究发现:社会舆情的爆发存在阈值,在感染率小于阈值前爆发规模几乎为0,超过阈值后会快速引爆舆论场。对比随机免疫,目标包围免疫能够有效控制舆情爆发,而全面科普作用时间较久,研究可为政府的舆情治理提供一点新思路。^[3]

“数据”毋庸置疑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黄金资源,政府数据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主政治、共享经济和公共服务有着强大推动力;然而,政府数据治理理论在实际治理过

程中存在着制约因素。盖宏伟、刘红丹通过新型数据治理理论框架的构建,从技术、伦理道德、制度和执行等四个层面提出政府数据治理体系发展路径,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4]

社区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制度创新、社会资本建构和社区共同体塑造,这也成为分析社区治理问题的三个向度。孟祥林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分析了社区治理的发展历程、模式选择、制度变迁以及制度瓶颈,认为制度创新是增加社区资本存量并促进社会资本建构的基础,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都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资本的可建构性特点要求在行政力量引导下,拓宽社区居民信息的交换通道,降低社区居民的次优选择,提升居民合作的博弈水平,遏制业委会的寻租行为,减少社区治理的交易费用,从而推进社区共同体塑造。但社区治理中“名实分离”的制度瓶颈阻碍了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为此,孟祥林结合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在三个向度上进行了探索,构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治理结构,以扩大社区自治权,通过制度创新增加社会资本,从而推进社区共同体塑造。^[5]

孟祥林总结分析了发达国家社区治理的模式与经验,认为美日新澳德英等国家的社区治理已经经历了较长的发展时期,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我国需要充分借鉴。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社区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实行“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模式,日本实行“地域中心”模式,新加坡实行行政控制模式,澳大利亚实行“政府+社区”的混合控制模式,德国实行权力钳制下的高度自治模式,英国实行政府较少干预下的高度自治模式。无论采取何种治理模式,其核心都是提升社区治理效率,通过在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间进行职能分割,让社区治理走向善治。对比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亚洲国家的社区治理实践中,政府的行政力量发挥作用较大;而欧美国家的社区治理实践中,社区自治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的社区自治,需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处理好社区自治与政府控制之间的关系,探索更加高效的社区治理模式。^[6]

青少年社区参与是创新社区治理的必然要求,多元共治理论需要建立青少年社区参与的多

元主体协同协调机制。目前我国已经探索出一些青少年参与的有效途径,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青少年社会化的进程,然而青少年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刘晓静基于当前社会治理的大背景,探讨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中遇到的多种问题、困境,并就如何实现青少年参与的路径和主体性再造建言献策。^[7]

城乡殊异的儿童福利供给困局、社区支持乏力、福利政策基层执行体系建设的滞后、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及孤儿群体构成的复杂化导致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孤儿社会保护制度面临深度挑战。陈静认为,共治型儿童福利旨在整合多元主体的优势力量拓展孤儿与社会相连的网络,通过物质救助和精神供给的双重保护来淡化孤儿在困境童年的负面情感体验,增强孤儿的社会适应能力。应以共治型福利理念为导向创新孤儿社会保护政策及其衔接机制,政府应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完善对民间孤儿院的儿童照管能力和福利供给质量的评估体系,让孤儿接受包括组建家庭生活方面的社会教育,为孤儿提供学习成长和融入社会的空间。^[8]

二、人口社会学

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出生率与儿童出生总数的提高,儿童问题日益成为社会问题最尖锐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的儿童福利政策有其存在的不同现实背景。贾志科等通过梳理近70年来我国实行的儿童福利政策,将政策实施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政策演变做了历程回溯和特征总结。结果发现,儿童福利政策在保障儿童生存、保护、参与权利,搭建基层儿童服务体系,建立分层型儿童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成效有限。因此,未来完善儿童福利政策的方向在于有计划地扩大儿童福利覆盖面、丰富儿童福利的内容、建立儿童问题社会检测机制、实现福利资源均等化配置,将儿童福利从家庭范畴过渡到社会范畴,从注重儿童的生存需要提升到关注儿童成人成才需要。^[9]

贾志科等利用江苏南京、河北保定两城调查的数据,以18—35岁的558名城市青年夫妇为研究对象,重点从数量维度和性别维度分析了青年夫妇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

究发现,城市青年的实际子女数与理想子女数、意愿子女数之间差异显著,而与政策意愿子女数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特征的城市青年在生育性别的选择上以“无偏好”居多,但“女孩偏好”越来越明显;理想生育数量和性别得到满足的程度均比较低,而意愿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的满足程度也只有近20%,生育水平的提升还存在一定空间。通过与现有研究结果对比发现,随着生育政策逐渐走向宽松,城市青年夫妇的生育意愿可能越来越接近于实际生育行为,尽管“意愿大于实际”的比例仍居高不下,但却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而“意愿等于实际”和“意愿小于实际”的比例则逐渐增加。此外,性别偏好是否得到满足、家庭是否拥有孩子以及从事何种行业对理想与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差异具有显著影响。^[10]

贾志科通过统计数据资料、问卷调查、实地访谈资料,对我国婚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并以大型相亲会为例,对城市地区未婚青年择偶拥挤状况进行探索性研究;对当前城市青年择偶问题的基本状况进行描述,并探讨性别失衡对城市青年择偶的直接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对农村青年的择偶观念、择偶现状及择偶窘境呈现出的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其原因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提出防范农村青年择偶拥挤风险的策略和服务建议。^[11]

贾志科近年来在青年择偶与婚育相关领域内做了系统的研究。其出版的《时代变迁中的青年择偶与婚育》一书分析了青年择偶与婚育的研究概况,并分别对都市青年的集体相亲现象、都市青年的择偶标准与观念、城市在职青年择偶模式的差异、农村大龄青年的择偶压力与社会风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分析。还从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婚恋窘境、城市在职青年的婚恋年龄期望及影响因素等问题,展开研究与探讨。^[12]

科学预测雄安新区人口有利于落实规划纲要以及配套政策的制订。梁林等参考深圳建设发展速度,采用灰色系统预测模型分阶段预测了雄安新区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基于深圳发展速度的判断,未来雄安新区人口规模前期与后期存在较大差距,人口增速在不同发展时期可能呈现“慢—快—慢—快”的趋势,2030年人口规模预计达到400万左右,而至2050年人口规

模预计将突破1200万。为避免雄安人口过快增长成为超大人口规模城市,保障新区人口高质量增长,结合预测结果,从科技产业、城市服务、普惠民生、生态环境和政府服务五方面提出相关建议。^[13]

三、老年社会学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成了各方关注的话题,也成为老年社会学的核心议题。

人口老龄化是死亡率和生育率双双下降的必然结果。胡耀岭、原新从人口老龄化机理出发建立数学模型,定量研究各因素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贡献率及其变动规律。结果表明:总和生育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将决定和主导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死亡水平将持续深入影响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发展累积所形成的惯性作用对人口老龄化有着重要影响;相对而言,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较为微弱。建议:理性认识人口老龄化过程,科学看待未来老龄化决定因素,合理制定适合我国老龄社会发展的相应政策。^[14]

胡耀岭等对缴费率、替代率、退休年龄等养老资源供需参数指标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并对养老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参量指标设置不规范、运行理念缺乏整体性和统筹性以及投资环境不利于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等问题做出基本判断。通过分析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运行机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数学模型,模拟不同参量条件下的养老资源供需平衡效果,进而提出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实现路径。^[15]

“嵌入式”养老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的新模式,不仅克服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局限性,又集三种模式的优势于一身,在居家和社区之间形成有效的服务传送和服务闭环,是我国未来养老服务发展的趋势。但该模式在运行中由于遇到了功能定位不精准、投资回收期长、利润率低、易引发邻避冲突等瓶颈问题而陷入发展困境。赵小兰、孟艳春认为,只有对嵌入机构功能进行精准定位,有效提高服务能力,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合理构建多元化邻避冲突解决机制,才能使“嵌入式”养老摆脱困局,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16]

中国目前 4000 多万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既考验着政府、社会和家庭的责任能力及爱心,又是老年人护理问题研究的重点。只进行基本生活照料的家庭保姆式护理,不能满足这部分老人多层次系统护理需求,但专业老年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又严重缺乏。任杰慧针对老年护理人员专业知识匮乏及残缺的护理现状,研究了北京 C 养老机构。北京 C 养老机构以人为本,运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为构建老年护理系统培训和系统护理的体系进行了有益尝试。需要注意的是,老年护理专业化发展应被置于当代中国养老事业中进行宏观系统考察,同时增进政府功能,增加科技含量,构建机构、社区和家庭老年护理的多样结合体系,也是较为积极有效的措施。^[17]

张丽等对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实现路径进行了研究,认为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智慧养老正成为中国化解养老服务资源供需矛盾的可行途径和必然选择,指出智慧养老发展存在缺乏有效的顶层设计、智慧养老企业发展存在瓶颈、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老人需求之间存在偏差、智慧养老服务缺乏专业型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实现路径,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设立国家智慧养老产业大数据中心;积极推动智慧养老企业的自我提升和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需求平衡;拓展智慧养老产品购买渠道,提升老年人购买智慧产品的能力;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推进智慧养老相关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人才培养,培育壮大智慧养老服务队伍。^[18]

城市“互助型社区养老”是最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种养老模式,是集体养老模式和居家养老模式的有效补充。城市互助养老模式大多依靠社区,利用社区资源,在社区内成立起互助组织,发动和鼓励健康老年人照顾患病老年人、低龄老年人照顾高龄老年人,采取互帮互助,以老助老的方式。吴帅、张岭泉通过对社区中老年人养老需求进行评估,从而建立起信息网络平台,并不断链接资源,为社区中的老年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缓解老龄化引起的社会问题。城市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缓解了城市老年人在当今老龄化背景下需要解决的养老问题。通过以老助老的形式,一方面实现了高龄老人的老有所依,另一方面也丰富

了低龄老人的生活,增加了社会参与机会,也保障了低龄老人未来的养老。其次,城市互助养老充分地利用了社区内的资源,大大降低了社会养老的成本。最后,城市互助养老模式包括老年人亲友互助、邻里互助、社区志愿互助等多种多样的互助形式。在互助的过程中老年人的生活照顾、社会参与的需求都得到了很好地满足。^[19]

栾文敬等运用尼尔·吉尔伯特(Neil Gilbert)的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以 B 市四家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为例,探讨我国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发展过程中的困境与发展。与政策规定的单一综合性不同,我国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多类型并存。发展困境主要包括:在服务对象方面,未完全实现在地老化、服务对象偏差、覆盖范围狭窄;在服务内容方面,非专业化的娱乐休闲同质性较强、整合型服务不完整;在服务递送方面,大多数日照中心还达不到国家建设标准,且部分设计不合理;在资金来源方面,过度依赖政府补贴、规模效益差。最后从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功能再定位、分类管理与补贴、品牌化与连锁化经营、制度建设与完善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20]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养老机构资源短缺、成本过高及其粗放化的管理模式使老年人难以获得优质养老服务。郑涛等从养老服务满意度视角建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居家养老服务定价模型,研究在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对养老服务提供方给予激励性补贴前提下,对比市场规模小和市场规模大两种情形的居家养老服务定价策略。研究发现:随着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增加,平台最优服务价格增加。研究表明:初创期(市场规模小)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为打开市场扩大用户规模应选择较高的定价策略,成熟期(市场规模大)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为盈利应选择适中的定价策略。^[21]

养老服务需求和养老产业空间随老龄化社会到来而扩大,这就提出了需求多样化条件下供给方差异化定价问题。郑涛等基于我国养老产业服务定价不合理的现状,考虑不同弹性因素,构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双边市场模型,以及长者和养老服务提供方效用函数,探讨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上不同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服务的最优定价策略,并运用 MATLAB 软件进行模拟分析。结果

显示：当市场规模较小时，针对如上门诊疗等需求价格弹性大而供给收入弹性小的服务，平台对长者收取低价，对养老服务提供方补贴高价；针对如智能穿戴等需求价格弹性小而供给收入弹性大的服务，平台对长者收取高价，对养老服务提供方补贴低价。当市场规模较大时，针对如上门诊疗服务，平台对长者收取高价，对养老服务提供方补贴低价；针对如智能穿戴服务，平台对长者收取低价，对养老服务提供方补贴高价。市场机制作用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企业可通过差异化服务定价模式获取最大利润，促进智慧养老产业可持续发展。^[22]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日渐增多，对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逐渐流行。为了更好地满足养老需求，需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盖宏伟、刘博在梳理总结当前国内外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理想框架，并结合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完善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的方略举措。^[23]

中国是一个有着优秀家庭文化和养老传统的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的现实背景下，养老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吕红平认为，农村人口流动性强、老龄化程度高、收入水平低、代际文化转向和养老文化弱化等特点，决定了农村养老问题的复杂性。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原则和利益原则至上、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传入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流传数千年的家庭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代际关系原则和养老文化受到严重冲击，成为家庭养老的思想文化障碍。正确认识家庭文化与家庭养老的关系，构建支持农村家庭养老的新型家庭文化，形成有利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做好农村家庭养老工作的重要思想文化保障。^[24]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速，家庭生命周期与结构性问题相交织，空巢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张岭泉、吕子晔认为，已有研究针对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问题给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但忽视了农村社区自身在养老功能方面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前屯村互助养老、孙家寨

“饺子宴”和景家庄老年协会三个案例表明，农村社区在应对空巢养老困境方面能够自主进行适应性调整，形成内生增能的组织化自治和功能性替代选择。建议肯定这种内生增能经验的合法性，并将其纳入“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格局中。^[25]

四、环境社会学

河北省是全国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最早的省份之一。河北省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不仅紧跟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步伐，积极落实国家的环境政策与制度安排，又创造出具有本省特色的环境治理经验，具有典型性和可推广性。田翠琴等出版的《河北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1978—2018）》一书，系统梳理了1978—2018年河北省环境保护的发展主线、历史分期、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进程，建构了改革开放以来省域环境保护史研究的范式与主要框架。提出，河北省经过1972至1977年对环境保护的初创与探索，1978年之后，全省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其发展与变迁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环境保护快速发展时期（1978—199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期（1992—2002）；实施生态立省战略时期（2003—2012）；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时期（2013—2018）。其各个时期的环境政策、环境制度、环境法规建设基本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其出台的一些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具有较大的创新性、开拓性和影响力。该书以环境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和研究方法，以各个时期的环境保护战略、环境规划、环境政策、环境制度、环境治理、环境状况等方面的变迁为主线，梳理分析改革开放40年河北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发展进程与历史演变，总结各个时期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特色、成效、经验与教训，探寻河北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路径，对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推进京津冀环境协同保护与协同共治具有积极作用。^[26]

王树强等人在环境税开征条件下，构建了多寡头排污企业间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各企业间产量博弈，研究了环境税对企业竞争的内在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的调整变量 K_k 满足一定条件时，整个行业的产量竞争是收敛的，可以求出此均衡解，并据此分析得出三个结论：一是环

境税对于整个社会的环境改善大有裨益,环境税制下,企业排污大幅下降;二是环境税存在税收扭曲,通过价格机制使得一部分税额转嫁于消费者,加重了消费者负担;三是环境税的征收使得整个污染行业的竞争格局发生转变,由环境税产生的成本差异促使清洁企业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行业向着绿色化转型升级。^[27]

在当前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治理迫在眉睫。为有效解决当前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司林波等通过对目标管理与协同治理内在契合关系的分析,探讨中国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有效方法。研究认为,目标管理与协同治理二者之间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目标的一致性保证了协同治理过程的统一性与完整性,而协同治理则为目标管理提供了前提,保证了目标管理政策的科学性。通过进一步对目标管理在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中的有效性分析,指出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的原则,在目标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将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框架分为问题诊断机制、目标确定机制、目标分解机制、目标评估机制等4个有机联系的部分。^[28]

生态环境质量是评价区域协同效果的重要标准,科学评测协同的环境质量效果是调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走向的重要依据。王树强、徐娜基于2004—2016年京津冀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线性回归的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协同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随着京津冀经济协同度的提高,环境质量呈现出收敛式上升。建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一步识别京津冀经济协同的环境效应的内在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由于同时存在要素禀赋效应和污染避风港假说,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通过结构效应而不是技术效应改善环境质量。最后,为了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提出了加强政府政策与市场资源配置相结合、促进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加强京津冀之间的环境治理合作等建议。^[29]

明确具体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经济的影响,是正确选择环境政策工具、提高环境规制效率的重要前提。王树强、庞晶基于部分排污权交易试点2010年进行跨区域交易这一自然实验,运用

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的方法(PSM-DID),以省级排污权交易试点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排污权跨区域交易政策对绿色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消除可能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和时间效应后,试点地区排污权跨区域交易政策对绿色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教育程度、技术水平、大气污染治理投资、排污费、环境效率等经济因素也能促进绿色经济发展,财政水平、工业化程度、外商投资水平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负向效应。^[30]

京津冀及周边城市在协同发展的同时,面临着环境污染的威胁。王树强、孟娣以京津冀及周边3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了产业转型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发现该区域的空气污染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局部空间相关性检验发现该区域的中南部城市为环境污染集聚区,两者验证了产业转型的环境效应分析纳入空间溢出效应的必要性。据此,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标量化产业转型水平,进而应用空间计量模型综合测度了产业转型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该区域城市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的左侧,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亟待协调;产业转型具有明显的环境改善正效应,但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环境的改善作用明显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加快推进该区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协调环境和经济关系的政策重点。^[31]

“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作为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可持续性的战略支点,其意义被赋予了特殊功能定位。但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功能定位的实现受制于诸多影响因素,如环境承载力、产业布局、生态贫困、生态代价转移性补偿等。基于此,牟永福提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获得预期稳定可持续的支撑力,必须构造“一城四带”绿色发展格局:“一城”,即雄安新区生态城,“四带”即冀西北冰雪经济产业带、燕山—太行山生态旅游产业带、冀中南绿色农业示范带和滨海循环经济产业带。^[32]

杨晓叶等利用200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的双向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工业废气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及地区性差异,以深入研究环境污

染和环境治理的耦合性。研究发现：工业废气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存在双向非线性关系，即双向的倒“U”型关系，且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工业废气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之间存在一个优化区间，即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的对数大于 10.583 和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对数大于 12.992。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双向性倒“U”型关系显著且稳定，而中部地区却为“U”型和倒“U”型互存的情况，既不显著也不稳定。^[33]

地表河流的流域性水污染问题与区域性产业不合理布局密切相关。卢越以海河流域为例，建立包含空间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污染产业集聚对流域水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污染产业的集聚总体上不利于水环境改善；针对水污染的治理虽然可以遏制水环境的恶化，但其效果仅限于污染产业集聚程度较低的地区。此外，上游地区的污染产业集聚抵消了下游的环境治理成效。因此，应当严控集聚带来的增排，加强对流域上游地区的产业规划和环境治理。^[34]

乡村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难题。为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环境污染问题，李进、王会京从当前乡村环境问题出发，以美丽乡村管理为要点，基于生态理念，建立较为完善的乡村环境管理体系框架，可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实际开展提供基础，具有较为重要的社会实用意义。^[35]

五、城市化研究

城市群不能独立发展，城市群彼此间只有建立起紧密联系，才能整合为高效互动的城市体系。孟祥林根据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情况，将我国的城市群区分为 7 个片区：“黑+吉+辽”“京+津+冀+晋+鲁+豫”“沪+苏+浙+闽+赣+皖”“湘+鄂”“粤+桂”“川+渝+滇+黔”“陕+甘+宁”。这些片区内的核心城市间的联系程度不同，核心城市的辐射力也有较大差别，所以需要对这些片区进行详细分析，通过构建“子城市链”“子城市团”等措施，不断完善各个片区内核心城市与腹地间的联系，在各个片区内形成“分层+分片”的发展秩序，使得核心城市与腹地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各个片区内都逐渐形成“核心城市—子中心城市—县级中心地”的多层次的城市发展结构，推动全国城镇化水平稳步

提升。^[36]

区域内城市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提升，更体现在区域内城市间的交织化协同发展。梁林等基于人口流视角，利用腾讯位置大数据，运用 GIS 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京津冀城市网络测度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对比分析雄安新区成立前后京津冀城市网络的复杂特征。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网络中城市地位变化呈现上升、下降、持平三种趋势，网络整体在雄安新区成立前后呈现无标度和层级化特点，表明城市网络联系呈现非均衡性和异质性。从城市网络结构来看，平均联系强度和网络密度正向指标均呈现高水平状态下的下降趋势，而平均聚类系数持续降低；从网络空间分布来看，城市网络呈现“北疏南密”分布态势和“一大三小”多中心空间格局，网络重心有南移趋势。总体来看，雄安新区成立后，京津冀城市网络日趋成熟，向多中心均衡化演进。^[37]

为在最大程度上解决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经济建设要求相匹配的问题，实现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目标，田桐羽、李百岁以呼和浩特市市区为例，结合 2001—2016 年研究区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变化特征，围绕经济—社会效益目标分别运用目标规划法和层次分析法对 2030 年用地需求方案进行模拟预测和择优，并通过 CLUE-S 模型对上述 2 种目标的优化方案进行空间模拟和最佳用地方案决策。结果表明：（1）2001—2016 年研究区城市建设用地总面积增率达到 94.104%，其中增幅较大的 2 类用地为交通运输用地和住宅用地。（2）与现状城市用地结构变化趋势不同，基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目标的优化方案中，增幅最大的城市建设用地类分别为商服用地和工矿仓储用地，且 2 种方案的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均衡度比 2016 年现状值分别高出 0.259、0.462，各类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构成趋于动态平衡的态势。（3）2 种不同效益目标优化方案的城市建设用地预测总面积有所不同，经济效益方案比社会效益方案高出 30.828 平方千米。社会效益优化方案在城市用地结构及布局的动态平衡度上优于经济效益方案，设定其为最佳城市用地优化方案。^[38]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工作和生活而形成的人口、资源不断集中化的现象。中国城镇化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速度持续加快,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发生了促进农转非效应、增加非农收入效应、农村市场开拓效应和农民工回乡创业效应,进而推动了农村居民减贫脱贫的显著进展,但也造成了一系列城乡发展中的消极问题。陈丽莎、孙伊凡认为,增强城镇化的减贫效应,需要正确处理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间的平衡关系,优化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政策,着力加强农村优秀青年的系统培训,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农村减贫实现双赢。^[39]

作为城乡连接的纽带,小城镇一直是城乡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注热点。白淑军等针对区域性发展格局变化对大城市郊区小城镇发展带来的影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下对石家庄郊区小城镇的发展机制与路径进行研究。以刚性控制与弹性引导原则相结合,界定和选择研究区域与对象;在对石家庄郊区小城镇基本发展态势判断的基础上,研究京津冀协同和雄安新区建设给石家庄郊区小城镇带来的整体发展能力提升和重点领域的发展机遇,分析其区域竞争和要素吸纳的相对劣势。提出石家庄郊区小城镇发展的路径指引,良性互动与错位发展,释放区域竞争优势;主动对接雄安新区建设,借力发展;立足城乡统筹与规划引领,实现健康城镇化。^[40]

农村特色小镇是城市和农村双向渗透的基本“社会细胞”,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路径选择,同时特色小镇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单元镇,而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地域综合体,建设特色小镇可以促进乡村的产业升级、功能承接和人口转移。李东雷、王琳琳认为,应该积极完善农村特色小镇的建设路径,以促进特色小镇建设不断向纵深延伸。^[41]

六、扶贫研究

贫困指标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贫困水平的关键,而如何对贫困指标进行科学有效的测度又是研究贫困问题的核心,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此非常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张会敏等以贫困问题为研究对象,以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经典理论为研究基础,基于 FGT 模型分析框架,主要借鉴国内外小域估计的前沿理论与方法,在小域条件下运用经验贝叶斯方法

结合模拟实验对贫困指标进行测度,并对我国贫困指标的测度进行深入研究。^[42]

健康扶贫不应限制在身体健康与扶贫上,而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仅是身体没有疾病,而且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吕红平认为,这个健康定义完全可以用于扶贫工作,即把健康扶贫不仅仅理解为对因病、因残致贫人口的扶持和救助,以及努力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工作;还应当包括贫困群众对贫困原因的认知和对摆脱贫困的自信等心理文化构建,即扶贫对象要正确认识致贫原因,面对现实,从我做起,挖掘优势资源,树立自立、自强、自信意识;形成脱贫的内在动力。由于健康扶贫必然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贫困人口;另一个则是扶贫工作者,也包括扶贫机构在内,可称之为扶贫主体。健康扶贫的作用:一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关键环节,二是贫困人口拔掉贫困根源的必由之路,三是真扶贫、扶真贫的内在要求。健康扶贫的推进策略:一是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增加健康扶贫投入。二是注重物质扶贫与文化扶贫相结合、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的综合扶贫模式。三是做好技能培训工作,提高自我脱贫能力。四是减少贫困群众看病就医支出,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五是利用各类扶贫资源,打好健康扶贫组合拳。^[43]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离不开精准研策和精准施策,需要借助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在社会层面形成大扶贫格局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制度安排,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选择。产业扶贫事关贫困地区造血机能,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社会公益参与其中并引导和帮助村民发展产业是实现贫困群众稳定可持续脱贫的根本路径,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的理论困境以及诸多现实难题。王春城、杜建芳通过对“马兰实验”的个案研究,可发现一种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特征的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独特机制:“共建”即多方主体共同兴办扶贫产业,“共治”即各方主体共同管理扶贫产业,“共享”即各方主体共享产业成果,借此形成一套由社会公益组织小农户融入现代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机制。该机制能够有效地防治志愿性政策

工具失灵,形成精准高效的扶贫共同体,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精准脱贫的可靠推进。^[44]

产业扶贫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魏县在长期的扶贫实践中,总结出“3+X”的产业扶贫模式。但在长期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与新问题,包括产业扶贫资金后劲不足、主体内生动力缺乏、扶贫产业项目分散化以及缺乏动态监管等。鉴于此,韩梦娟认为,需要从民间资本的引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培育新型产业主体、立足实际,打造综合性扶贫产业片区和利用大数据,建立统一的数据动态管理等一系列对策实现产业扶贫的新突破。^[45]

任伟、陈立文将贫富差距、房价和经济增长放在一个框架下对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建立 PVAR 模型,采用我国 2001—2014 年 25 个省市的数据,对贫富差距、房价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房价之间整体呈相互促进作用。静态的贫富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动态的贫富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起初是瞬间内为正,之后始终保持一定水平的负相关。经济增长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型,但持续时间较短。贫富差距对房价的影响是先促进后抑制的波动型。^[46]

七、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五年来,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两个“一体两翼”加快建设,交通、生态和产业三个重点领域不断突破,区域协同创新势头良好,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进展。但区域“断崖式”发展差距仍未根本改变,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存在结构性难题,交通一体化存在路网布局和交通方式衔接短板,生态环境保护存在市场机制不健全难题,产业升级转移存在承接平台分散、承接能力不足和承接产业错位等问题,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尚未彰显。柳天恩、田学斌认为,在未来三地的协同发展中,应把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探索结合起来,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把北京“减量发展”和“辐射带动”结合起来,加快缩小河北与京

津的发展差距;以两个“一体两翼”建设为契机,培育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以“京津雄创新三角”为引领,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以交通和生态领域为突破口,开创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47]

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大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田学斌、陈艺丹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长期演化特性,以 2004—2017 年数据为基础,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五个维度出发,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及其相互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及其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程度较高,2015 年之后发展趋势良好。从两两差距尺度观察,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主要体现在京冀和津冀之间,且各维度差距大小排列不同。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加大京津优质资源向河北转移的力度;提升河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确“重点地区,优先打造”的发展思路;扩大对河北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强京津冀之间财政协同合作;建立健全京津冀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支持体系。^[48]

武义青等采用基于碳排放视角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判别方法,结合《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对京津冀 1996—2015 年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京、津、冀三省市的经济增长方式分别为低碳Ⅳ型、低碳Ⅱ型和高碳Ⅰ型。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先后经历了低碳Ⅲ型、高碳Ⅱ型和低碳Ⅳ型三个阶段;碳排放量增长率随经济增长率的增加呈增加趋势,碳生产率贡献率随经济增长率的增加呈减少趋势,表明过高的经济增长率不利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要提高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加大技术创新、人才引进,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协调发展。^[49]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支持关乎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推动与落实,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成为业界和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洪帅、田学斌通过对检索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支持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识别出我国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支持主要围绕国家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配套

政策、社会发展政策等方面,对我国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支持的研究特点和局限性进行了总结、分析,探讨其未来可能的研究趋向,以期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提供参考和启示。^[50]

人口—经济协调发展是增强区域联动发展活力的重要前提。田桐羽以京津保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 GIS 和 Geoda 等空间量化分析平台,采用空间可视化的方法并以京津保三地市所辖区县为评价单元,对 2003 年、2007 年、2011 年和 2015 年等年份的人口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及其关联性的空间格局的逐年均衡度和变化态势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各市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其所辖县域发展的均衡度间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县域间人口和经济发展均衡程度也会对其人口—经济发展协调度布局产生直接影响,市中心辖区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性高,协调度也高,而市边缘辖区因人口与经济发展不一致而使得协调度较低。因此在协调度空间关联性方面主要形成“高一高”型和“低—低”型两种局部空间集聚形态。研究对于京津保三地市率先实现协同发展和增强其对河北其他地区的辐射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51]

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养老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而且是很重要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需要政府和相关社会主体统筹应对。京津冀养老服务应该基于一个整体框架下协同发展,从缓解大城市养老压力和为公民提供更优质的养老服务两方面考虑,协同优化三地养老服务供给。韩兆柱、邢蕊认为,整体性治理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不同地区、政府部门以及公私部门之间的协调整合,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从而提供满足公民生活需求的高效公共服务。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加快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的步伐,打破政策性壁垒、破除地区本位主义、促进公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是破解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困境的必然选择。^[52]

雄安新区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不仅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重要平台,也是缩小河北与京津发展差距、带动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武义青、冷宣荣认为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互动发展,形成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良好

互动关系,有利于以雄安新区建设这个“点”带动周边地区乃至整个河北的发展。因此,要把握《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实质,发挥雄安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周边地区也要发挥地缘优势,主动在产业、交通、生态等方面对接融入。同时要协同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建立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新格局。^[53]

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直接关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深化京津冀协同目标的实现。目前,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内外部因素、共享因素以及隐形因素的掣肘,突出表现为雄安新区发展基础的滞后性、京津城市的虹吸效应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落差、顶层设计的推进与落实缓慢以及区域内城市主体定位的不明确、发展目标的偏差与机制的不完善等问题。司林波、吴振其认为,基于协同学理论,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应谋求多元、系统的运行模式。具体来说,加强协同的顶层设计是基础,有序推进协同发展的交通圈、产业圈、智慧城市圈、环境治理圈是关键,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是催化剂,完善沟通反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与联合监督考核机制是保障。^[54]

八、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程瑞山、任明明认为,乡村“治理有效”内涵着对治理主体、治理决策、实施执行与治理效果的较高要求。乡村治理的效度考量,需要从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促进乡村发展、解决乡村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治理资源的“投入”与治理“产出”等多面相衡量。当前实践中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就要从乡村组织振兴、治理主体良性互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注重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下好功夫。^[55]

乡村振兴是一项集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于一体的全面性、综合性工程,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这项系统工程建设的进程中,合理、有效地整合乡村内外优势资源,尤其是激活村庄发展的内在动力、挖掘村庄内资源与关键力量、重视社区组织

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结合河北省乡村振兴实践,分析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动力要素和提升村庄内生动力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培育与提升村庄内生力的四种路径。^[56]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乡村治理的现状与预期水平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实践中村官“缺位”问题非常严重,因此探索乡村善治的出路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乡贤“补位”完善乡村治理是乡村治理走向善治的出路。历史上乡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就发挥过重要作用,新时期的乡贤在将政府组织与村民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仍扮演着纽带角色,但是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在制度设计层面还不具备完善的通道。孟祥林认为,为了尽快做到“管理归位”,需要尽快完善乡贤“补位”的制度设计,乡村治理在组织结构、激励措施、媒体宣传和约束机制等方面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构建“基层管理者+乡贤理事会+村民代表”的多元化决策制度。^[57]

公平正义是农村低保政策的首要价值目标,屡治不清的农村低保“乱象”对公平性构成严重破坏。耿永志认为,传统“影响论”“治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和解决此类问题,但为构建多维福利治理分析框架提供了基础。在农村低保政策执行的每个节点上,以公平正义为导向,从目标、主体、关系、过程四个方面设定具体要求,对现实差距和问题给出判断,从技术、体制、利益、环境等方面进行原因分析,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结果表明,农村低保公平性破坏问题主要集中在申请环节和评议环节,技术和体制因素成为破解农村低保公平性难题的重要原因。利益因素的影响在政策末端表现得更为突出,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各个环节都比较普遍。相对于其他方面的要求,过程性要求更容易遭受干扰和破坏。^[58]

“离土中国”背景下的乡村,在劳动力空心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乡村文化建设遇到瓶颈。政府力量、市场力量 and 传统力量是影响乡村文化发展状态的三个重要因素,三种力量的不同组合方式会影响乡村文化的发展状态,突出表现在效率与效果两个层面,最好的预期状态是“效率~高+效果~强”,但往往会出现“效率~高+效果~弱”或者“效率~弱+效果~弱”的状态,因此过多强调追求效率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

效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需要将效果放在突出位置,除了“效率~高+效果~强”这种最佳组合方式外,“效率~弱+效果~强”组合方式也可以作为备选方案。在所有组合方案中,只要存在“效果~弱”的状况,相应的组合方案就不应该列入考虑范围。为了推进三种力量的组合效果,需要在乡村文化的供给侧方面做文章,加强文化项目的建设质量。^[59]

价值观念碎片化和居民群体异质化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式微,为乡村公共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了阻力。这要求从历史视角对乡村公共文化进行深入考察,理清乡村公共文化变迁的轨迹并对其发展进行前瞻性思考,处理好国家干预、市场机制以及乡村精英三种力量间的关系。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经历改革开放初期的复活到目前新旧理念纠缠的变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正在面临需求场域、空间场域与情感场域的发展困境,对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进行多向度考察就显得非常重要。观念表达、力量支撑和功能承载是三个关键向度,成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质量的三个测度标准,要分别从内在素养、底层支撑、功能外显等方面进行把控。与三个测度标准相对应,在推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需要在培育精神、整合资源与打造空间等方面下功夫。^[60]

乡土文化振兴蕴涵“孝治”“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家风家德建设、社区保障的完善以及乡村养老文化的重塑。乡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记忆既是家风家德建设的纽带,也是乡土文明的根系;根植在乡村留守老人生活记忆中的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变迁,也是对乡风乡俗的深刻体悟与活态传承。孝文化家庭传承的断裂、社会养老文化变迁和家庭照料机制的变化是留守老人生活困境的深层成因。家庭结构、乡村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和文化共性是留守老人生活记忆的抽象载体和构建老年社会关怀制度的重要切入点。陈静、栾文敬基于“记忆—教育—传承”的框架梳理老年人生活记忆、养老文化变迁和敬老环境优化的内在关联机制,明晰留守老人社会关怀的内容包括基于代际合作的家庭亲情关怀、社区邻里互助网络和公共生活空间营造、敬老助老的社会道德关怀、以及老年人自我关怀能力的构建。建议通过家庭教育的传承、学校教育的引导、社会教育的倡导和熏陶绵续乡土社会的孝治关怀和文化

振兴。^[61]

(田翠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鲁云鹏,李晓琳.国家科学院治理理论研究——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9(21).
- [2] 鲁云鹏.科技社团治理:内涵、问题与实现[J].中国科技论坛,2019(11).
- [3] 朱晓霞,孟建芳,宋嘉欣.突发公共事件社会舆情治理选择——基于爆炸渗流理论[J].情报科学,2019(3).
- [4] 盖宏伟,刘红丹.政府数据治理制约因素与发展路径[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9).
- [5] 孟祥林.我国社区治理的三个向度:制度创新、社会资本建构与社区共同体塑造[J].新疆财经,2019(4).
- [6] 孟祥林.社区治理模式:发达国家经验与我国发展选择[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 [7] 刘晓静.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与主体性再造[J].中国青年研究,2019(4).
- [8] 陈静.共治困境童年:我国孤儿社会保护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制度基础和政策创新[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
- [9] 贾志科,李文强,王思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儿童福利政策的演进历程——兼述政策效果及未来方向[J].少年儿童研究,2019(10).
- [10] 贾志科,沙迪,朱鹏举.农村大龄青年的择偶压力及社会风险——基于华北九个村落的实地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 [11] 贾志科.性别失衡与青年择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12] 贾志科.时代变迁中的青年择偶与婚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 [13] 梁林,曾建丽,刘兵.雄安新区未来人口趋势预测及政策建议[J].当代经济管理,2019(7).
- [14] 胡耀岭,原新.决定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因素分解研究[J].老龄科学研究,2019(3).
- [15] 胡耀岭,王媛,刘娜娜.中国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以快速老龄化为背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16] 赵小兰,孟艳春.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优势、困境与出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17] 任杰慧.从残缺到系统:中国老年护理专业化发展研究[J].思想战线,2019(3).
- [18] 张丽,严晓萍.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实现路径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19] 吴帅,张岭泉.城市“互助型社区养老”模式的运行机制问题研究[J].百家论点,2019(13).
- [20] 栾文敬,信焱文,刘静娴.我国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发展的反思与展望[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21] 郑涛,李梦莹,侯玉梅,宋晓彤.共享居家养老服务定价策略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9(1).
- [22] 郑涛,李梦莹,侯玉梅.基于弹性理论的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差异化定价策略[J].产经评论,2019(1).
- [23] 盖宏伟,刘博.改进完善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探讨[J].理论导刊,2019(3).
- [24] 吕红平.农村家庭养老的家庭文化构建研究[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9(2).
- [25] 张岭泉,吕子晔.内生增能:农村社区空巢老年人养老功能的适应性调整及其支持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26] 田翠琴,田桐羽,赵乃诗.《河北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1978—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7] 王树强,耿明阳,庞晶.环境税制下污染行业竞争结构的动态演化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9(3).
- [28] 司林波,聂晓云,吴振其.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29] 王树强,徐娜.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环境效应及其影响机制[J].企业经济,2019(2).
- [30] 王树强,庞晶.排污权跨区域交易对绿色经济的影响研究[J].生态经济,2019(2).
- [31] 王树强,孟娣.雾霾空间溢出背景下产业转型的环境效应研究——基于京津冀及周边31个城市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19(1).
- [32] 牟永福.“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生态价值及其战略框架[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1).
- [33] 杨晓叶,米彦香,许东海.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的耦合性分析——以工业废气排放与治理为例[J].生态经济,2019(1).
- [34] 卢越.产业集聚对流域水污染的影响分析:以海河流域为例[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35] 李进,王会京.基于生态理念的美丽乡村景观环境管理体系框架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9(2).
- [36] 孟祥林.中国城市群片区划分与区域城市群构建对策分析[J].中国名城,2019(4).
- [37] 梁林,赵玉帛,武晓洁.人口流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网络时空特征研究——基于雄安新区成立前后的对比[J].经济与管理,2019(2).
- [38] 田桐羽,李百岁.基于目标约束视角的城市土地利用格局优化模拟研究——以呼和浩特市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19(9).
- [39] 陈丽莎,孙伊凡.城镇化对中国农村减贫的效应分析及对策建议[J].河北学刊,2019(5).
- [40] 白淑军,杨一帆,许峰.京津冀协同视角下石家庄郊区小城镇发展机制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41] 李东雷,王琳琳.农村特色小镇的形成机理与建设路径

- 探析[J].农业经济,2019(6).
- [42] 张会敏,刘超,刘秉龙.贫困指标测度的研究范式与机理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43] 吕红平.农村家庭养老的家庭文化构建研究[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9(2).
- [44] 王春城,杜建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创新[J].行政论坛,2019(3).
- [45] 韩梦娟.乡村振兴视角下的特色产业扶贫模式研究——以河北省魏县模式为例[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1).
- [46] 任伟,陈立文.贫富差距、房价与经济增长[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 [47] 柳天恩,田学斌.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成效与展望[J].中国流通经济,2019(11).
- [48] 田学斌,陈艺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特征分异和趋势[J].经济与管理,2019(6).
- [49] 武义青,孙久宇,韩烁烁,张浩.京津冀经济增长方式及阶段性特征[J].经济与管理,2019(1).
- [50] 洪帅,田学斌.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支持述评[J].北方经贸,2019(7).
- [51] 田桐羽.基于 ArcGIS-GeoDa 的县域人口—经济系统协调格局演变特征研究——以京津保地区为例[J].经济师,2019(2).
- [52] 韩兆柱,邢蕊.基于整体性治理的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9(1).
- [53] 武义青,冷宣荣.推动建立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新格局[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54] 司林波,吴振其.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逻辑与运行模式——基于协同学理论的分析框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3).
- [55] 程瑞山,任明明.乡村“治理有效”的意蕴与考量[J].科学社会主义,2019(3).
- [56] 钟静静,杨寅红.乡村振兴视域下村庄内生力提升的理性思考[J].当代农村财经,2019(7).
- [57] 孟祥林.“村官缺位+乡贤补位+管理归位”:乡村治理走向乡村善治的问题与出路[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
- [58] 耿永志.多维福利治理框架的农村低保公平性问题探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59] 孟祥林.“离土中国”背景下乡村文化发展的力量组合与发展对策[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9(5).
- [60] 孟祥林.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困境、向度与方向[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61] 陈静,栾文敬.变化中的孝悌:乡土文化振兴视域下留守老人的生活记忆和社会关怀研究——基于 H 省 T 村的口述史分析[J].兰州学刊,2019(6).

社会问题研究

闫坤

2019 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工作者辛勤耕耘,笔耕不辍,不断深化对社会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学者们结合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对于新时代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救助问题、社会治理问题、农民工问题、就业模式问题、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养老问题、城镇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科研成果丰硕。

一、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

(一) 保障性住房问题

王迎、刘彤彤指出,为了实现住房的公平性,解决弱势群体住房难问题,保障性住房旨在满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需求,但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户籍、家庭等状况又不尽相同,供给政策应根据需求制定多层次的供给体系。^[1]

(二) 失地农民问题

郭艳、柴佩文指出,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失地农民群体面临着权益保障困难、社会排斥及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通过凸显特色产业,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特色小镇发展,注重旅游特色商品开发、发展休闲农业和完善社会保障等方式,可以提升失地农民的再就业,缓解失地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2]

(三) 失业人员问题

宋凤轩、杨竹晴指出,在去产能的背景下,大量企业职工会面临失业的困境,而大量人员的失业会造成社会福利负担的加重、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多种负面影响,如何妥善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成为一大难题。新时代下,政府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主体责任毋庸置疑,而作为维护职工权益的工会组织同样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工会组织在促进去产能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着就业信息掌握不充分、维权职能发挥有所欠缺、再就业培训落实到位、扶贫帮困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因此,需积极探索工会组织在新时代下促进去产能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新路径,以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3]

(四) 儿童权益保障问题

陈静指出,城乡殊异的儿童福利供给困局、社区支持乏力、福利政策基层执行体系建设的滞后、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及孤儿群体构成的复杂化导致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孤儿社会保护制度面临深度挑战。共治型儿童福利旨在整合多元主体的优势力量拓展孤儿与社会相连的网络,通过物质救助和精神供给的双重保护来淡化孤儿在困境童年的负面情感体验,增强孤儿的社会适应能力。应以共治型福利理念为导向创新孤儿社会保护政策及其衔接机制,政府应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完善对民间孤儿院的儿童照管能力和福利供给质量的评估体系,让孤儿接受包括组建家庭生活方面的社会教育,为孤儿提供学习成长和融入社会的空间。^[4]

贾志科、李文强、王思嘉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的儿童福利政策有其存在的不同现实背景。通过梳理近70年来我国实行的儿童福利政策,研究将政策实施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政策演变做了历程回溯和特征总结。结果发现,儿童福利政策在保障儿童生存、保护、参与权利,搭建基层儿童服务体系,建立分层型儿童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成效有限。因此,未来完善儿童福利政策的方向在于有计划地扩大儿童福利覆盖面、丰富儿童福利的内容、建立儿童问题社会检测机制、实现福利资源均等化配置,将儿童福利从家庭范畴过渡到社会范畴,从注重儿童的生存需要提升到关注儿童成人成才需要。^[5]

二、社会救助问题

于向辉、李素枝指出,经过多年的努力与实践,河北省已经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较为充分地发挥了社会救助的“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作用,在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

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在救助水平、救助方式等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为此,健全当前的社会救助体系,将有助于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中国梦”的伟大目标。^[6]

赵丽亚等人通过分析当前我国社会救助的现状 & 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会救助的现状、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会救助的有效途径,包括加强制度化建设,为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会救助提供保障机制;构建突发性社会救助的助物参与模式;强化日常社会救助的助力参与模式;探索长效性社会救助的助志、助智参与模式。^[7]

三、社会治理问题

王欣、王海蓉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应时代发展需要而联结成的共享共治新的有机体,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典型代表。伴随经济协同发展、产业对接、资源共享、疏解人口的同时,探索京津冀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能够更好的提升本区域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更有效的维护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鉴于社会治理问题研究尤为重要,必须推进创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和事业改革体系,继续强化转变政府职能,保障社会事业改革稳步进行。^[8]

朱晓霞、孟建芳、宋嘉欣指出,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突发公共事件频现引发舆情危机的环境中,研究舆情爆发机制及治理有重要意义。基于爆炸性渗流理论,考虑各节点不同影响力构建了改进的社会舆情爆炸性传播模型,探究了舆情可能的爆发机制。进而提出随机免疫、目标包围免疫、全面科普三种舆情治理选择,通过仿真和案例分析验证其合理性。研究发现:社会舆情的爆发存在阈值,在感染率小于阈值前爆发规模几乎为0,超过阈值后会快速引爆舆论场。对比随机免疫,目标包围免疫能够有效控制舆情爆发,而全面科普作用时间较长,研究可为政府的舆情治理提供一点新思路。^[9]

吴明、张茜、李慧斌指出,当前社会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尤其是进入到了改革关键性的阶段,要面对诸多领域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给出对

策。对于社会来说,突发事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不仅会引发精神和物质层面的损失,同时也会阻碍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得社会政治不稳定。而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媒体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面对突发事件时需要政务新媒体更好的发挥平台的作用进行舆论引导,最大限度的降低突发事件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10]

孟祥林指出,社区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制度创新、社会资本建构和社区共同体塑造,这也成为分析社区治理问题的三个向度。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分析了社区治理的发展历程、模式选择、制度变迁以及制度瓶颈,认为制度创新是增加社区资本存量并促进社会资本建构的基础,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都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资本的可建构性特点要求在行政力量引导下,拓宽社区居民信息的交换通道,降低社区居民的次优选择,提升居民合作的博弈水平,遏制业委会的寻租行为,减少社区治理的交易费用,从而推进社区共同体塑造。但社区治理中“名实分离”的制度瓶颈阻碍了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为此,结合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在三个向度上进行了探索,构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治理结构,以扩大社区自治权,通过制度创新增加社会资本,从而推进社区共同体塑造。^[11]

四、农民工问题

(一) 农民工流动问题

李瑞、刘超基于流出地的视角研究流动范围对农村外出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选取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农民工主要输出省份河南省和安徽省的流出人口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跨省流动和市内跨县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具有最高的长期居住意愿,因此更容易实现城镇化和市民化。按性别、年龄分样本回归以及使用混合估计模型和PSM检验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回归结果间略有差异但不会改变基本结论。从收入预期、融入成本和社会关系网络三个方面解释流动范围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影响机制的检验符合预期。^[12]使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检验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受益程度,分析了城市规模

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劳动力市场大专以上学历占比每提高1%,农民工月收入平均提高4.3%—11.4%;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越高;高技能农民工比中低技能农民工更能从人力资本外部性中受益;中西部地区农民工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高于东部地区;从事生产操作类职业以及其他职业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高于从事商业服务类职业的农民工。^[13]

(二) 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

于艳芳、贾凯旋、闫薇指出,职业培训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是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河北省还存在农民工职业培训积极性不高,职业培训主体不明确,职业培训满意度不高,职业培训效果不显著等问题。因此,应宣传引导农民工积极参加职业培训,明确政府就业服务机构的主体地位,并优化职业培训内容,注重职业培训质量,以提升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社会认可度,增强职业培训的满意度,提高职业培训的效果。^[14]

(三)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李凡等人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背景,采用访谈法和信息检索法确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结构要素初级指标,在初级指标的筛选上又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实证遴选确定最终指标,构建出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结构要素体系,并对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出了建议:社会资本的提升需要社会、企业、政府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努力和维持;政府要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上做好两点工作,一是要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二是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外出务工择业能力。^[15]

王妍、张丽元、陈子宇、张丽英指出,在农民工的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在城镇化、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驻城市,他们为城市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遇到的困境提出了国家应完善社会保障,加大技能培训,或促进农民工返乡回流创业促进乡村振兴,已达到共建和谐共存的社会。^[16]

李凡、张富强指出,《河北省工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将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列为主要任务之一。目前,河北省正处于产业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作为产业工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是否适应这一转型发展,实现高质量就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规划能力,既是他们在城市中“求生存”的基础,更是他们摆脱职业选择的迷茫与盲从,回归自我干预的理性化,促进职业向上流动的重要策略。应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规划意识:加强职业规划意识的培训和引导、发挥榜样力量的示范作用。应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规划能力:加强职业生涯规划的技术指导、企业要进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生涯管理。应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体系: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指导框架、加强职业规划能力培育的专业化建设。^[17]

(四) 新型职业农民问题

张冉等人指出,在农业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的趋势下,农业产业链、农业所引用的生产技术、农业融入的信息资源已经非常丰富,为了适应新型的经营模式,必须加强对职业农民专项培养的重视培训:丰富培训“主题”,追求“一主多元”;推进“全面化”“立体式”的专项培训工作;利用政策扶持,寻求社会帮助;创新培训渠道。^[18]

孟建锋等人指出,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导力量,其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是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现状仍不容乐观,因此,需要大力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精准培育,重塑乡村振兴骨干力量意义重大。通过职业理想引领、顶层设计、精准培育对象、精准培育方案和精准培育管理等途径,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素质全面提升,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保驾护航。^[19]

周瑾指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提升农民素质水平、保障农民稳定就业、消除城乡二元差距的首要环节,是现代农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平衡的核心推动力,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具有基础作用。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归纳,对培育工作的制度建设内容与工作方面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结合产业发展特点,提出与食品安全、市场建设、新型经营主体、项目建设紧密结合的产业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20]

高玉峰、闫志利、刘敏指出,自中央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战略决策以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效显著,但在培育对象、培育体系、培育主体等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下一阶段,要着力从建立保障机制、加强农科院校教学改革、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建立农民田间学校、大力开发在线学习资源、大力开展示范培训、开展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构建“一模式四体系一机制”整体培育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推进。^[21]

张丽英、高雅斌、白光、王大江指出,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居住在农村,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的从业人员。而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职业农民的综合素质和生产经营水平,从而提高职业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如何实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河北省要以服务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为导向,加大政策扶持,创造良好的培训环境,整合教育资源,以提升农民综合素质、职业技能为重点,全面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制度,着力造就一批爱农业、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队伍,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撑。^[22]

赵永刚、徐立敏从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出发,分析了美丽乡村建设人才困境的成因,提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是解决该困境的主要力量之一,进而给出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创业效率的策略:第一,舆论宣传,思想动员,做好返乡创业的人员的宣讲工作。第二,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特色创业项目。第三,心理疏导,职业培训,树立新型职业农民的形象。^[23]

薛晴、陈会谦、孙秀芳指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和历史高度,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论断,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勾勒出新型职业农民应具有的“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特征内涵,其中贯穿着唯物史观主要观点,具有深厚的理论底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根本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和发展。^[24]

五、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

(一) 大学生就业问题

宋薇、陈秋实、冉磊指出,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现状: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存在着突出的矛盾;现实的就业环境与毕业学生的期望不相符;就业形势的不断严峻使得部分毕业生盲目就业;各类中小企业所需的人数随着就业结构的调整不断增加;政府大力促进就业,鼓励创业,大学生就业形势良好。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对策:重视制度改革,促进社会融合;注重加强整合各个部门,通过教育整合促进就业;整合市场资源,推进经济发展对教育的影响;统筹管理,促进就业一体化。^[25]

周立斌等人指出,当代就业形势严峻,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标准提高,考研成为大热趋势,就业问题与我们当代大学生息息相关。究竟何时就业、何处就业、如何就业成为不少大学生关注的问题。从国家、企业、学校、学生四个角度提出建议。^[26]

王媛媛、刘佳、赵丽亚、郝永建通过“调查问卷+个别访谈”的方式,深入研究大学生选择基层工作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与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呈显著正相关的因素有两个:基层工作因素和个人因素,其中个人因素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重点从供给两侧对涉及的各影响因素分析,科学提出大学生基层就业创业的可行性策略建议:树立基层就业意识,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强化宣教引导培训,完善服务支撑系统;创新基层机制体制,优化基层工作环境;转变基层就业观念,包容基层就业选择。^[27]

周德等人指出,社会实践是高校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途径。为了提高医学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项目组以“实践育人”的人才培养理念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医学专业的优势,组织医学生利用节假日等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完善社会实践长效机制的同时,促使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不断提升,专业知识得以巩固。^[28]

常江指出,随着近年来高等医学教育的迅速发展,学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不断增加的毕业生数量与就业市场提供的岗位数量的矛盾不断深化,就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加之,医学生的

专业性强,就业时选择的方向较少,对医学生就业带来一定困难。应高度重视就业工作,落实“一把手”工程,不断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推进就业指导课程教学改革;加强毕业生就业观念引导;加强对学院和教学医院的管理力度。^[29]

常江、史广玉、赵丽娟以河北医科大学2015届本科毕业生为例,在毕业一年后,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对毕业生的就业落实、就业特色和就业质量等进行调查,并通过数据的处理及分析,了解掌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毕业生基本处于就业或深造状态;升学比例高,职业发展需要成为毕业生升学主要理由;六成以上毕业生在京津冀地区就业;就业单位具有行业特色,主要为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的专业相关度;毕业生工作起步阶段薪资偏低;因“个人发展空间不够”和“薪资福利偏低”成为离职的主要原因。^[30]

王冰指出,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需要高校的人才培养观念、思想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应该坚持以本为本,坚持四个回归。真正做到“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31]

张蓓蓓指出,人才资源是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要素,高校毕业生是人才资源的主力军。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河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提供了挑战。河北省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依托,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增强学科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加强区域间的“产学研合作”,打通人才资源的聚集、流通渠道,以推动河北省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32]

尚晓丽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引导大学生农村基层就业的工作,从2003年起出台了多项政策推进此项工作的实施。但是,由于受就业观念、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农村基层工作状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政策实施的效果有待提升。精准扶贫战略是国家在新时期为实现全面脱贫采取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改变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改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有利于改变农村基层的工作状况,精准扶贫战略对引导大学生农村基层就业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在精准扶贫战略下,应积极转变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加大社会宣

传力度,以期能够借着精准扶贫战略的“东风”,引导大学生农村基层就业。^[33]

景瑞蓉、张晓丽、樊瑞丹指出,地方高校秉承“立足地方、面向基层”的办学宗旨,在引导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战略上具有极高的使命性。地方高校应在认清当前大学生基层就业现实顾虑前提下,结合自身优势,将引导机制从“求职时”前置到“培养过程中”。通过建立面向基层的培养模式、开展基层工作思政教育、强化基层工作能力训练、鼓励以创新创业带动基层就业等途径,从而形成有效的引导机制。^[34]

王鹏举指出,目前是我国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阶段,要提高对社会事业发展并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战略机制的重视程度,给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体育锻炼,社会对体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高校培养高素质体育人才的综合水平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加强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对策:加强宏观调控,规范就业制度,健全毕业生就业市场;完善高校就业指导工作;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提高就业竞争力。^[35]

杨静如、韩琳琳指出,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内容。运用小组工作的方法,结合优势视角理论、增能理论及情绪ABC理论,在邢台学院开展“Let it go”大学生就业减压小组活动,以探究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途径。研究发现,小组工作方法的介入使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得到转变,能力得到提升,压力得到缓解。^[36]

李跃男指出,就业新形态带来的就业新模式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提出了新需求。通过对河北省4所高校7182名学生的调查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力、通用能力、职业适应、自我控制和个人品质相对非困难学生并无明显不足,仅专业能力欠缺,此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自我认知也较不清晰。建议社会加大支持力度、高校完善帮扶体系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升自我认知,以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力,应对就业新形态带来的新要求。^[37]

(二) 大学生创业问题

倪迎华指出,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焦点问题,大学生通过自己努力创业不仅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因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新浪潮。政府应落实和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高校应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积极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应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38]

王媛媛等人通过调查问卷阐述了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认识现状,然后分析了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新时代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路径,包括领会悟透习近平新时代青年思想、优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思路、强化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综合素质培养、深化国家创新创业政策宣传教育、量化组织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全面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的支撑体系。^[39]

王岚等人指出,随着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不断增长,就业压力日益加剧,而大学生正处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众创时代中,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大学生进行创业就业,因此,在毕业后选择创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然而,创业过程中存在自身、学校、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那么在众创时代下如何促进大学生创业就业便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应培养大学生具有积极的创业意识和明确的创业目标;大学生的创业教育要与创业培训联合起来,倡导理性创业观念;社会尤其是家长应支持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政府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大学生积极参与创业项目。^[40]

刘海英、赵航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方式,选取了河北省多所高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情况进行了调研,指出大学生创新创业存在的问题:了解渠道有限、指导相对缺乏、团队组成不科学、指导教师等问题。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应增强师资力量、打造浓厚创新创业校园氛围、建立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41]

李丽丽、赵雪基于100名河北省返乡创业大学生的调查,从创新和知识两方面研究了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模式构建,并提供了几种可供选择的返乡创业模式:产品创新模式、手段创新模式、

综合模式、纯资源模式、资源创新模式。^[42]

张龙指出,在现代教育发展的总体规划下,高校大学生的能力培养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且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鼓励与支持下,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逐渐成为高校教育课程体系中最具创新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官成、黄文胜主编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出版)顺应经济市场对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的需求,对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教育展开了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探索与发展,并力图构建起一个现代化和规范化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与模式,有效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为推动我国创新创业的战略性发展提供更多的创新型高素质人才。^[43]

付鸿彦、顾岩峰指出,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能力是目前创业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高职院校作为提升大学生学习能力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场所,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从社会认知学习理论的视角出发,力图揭示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效能感向创业能力转化过程的途径和机制,构建创业效能感、创业动机与创业能力之间作用关系的中介模型和创业氛围的调节模型。通过最小二乘法测量技术对大学生创业者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创业效能感与创业能力关系中,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创业动机发挥中介作用,高校创业氛围发挥调节作用。^[44]

张龙指出,随着现在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运用现在的先进技术进行生产,利用互联网进行创新创业也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大学生成为“互联网+”背景下的最直接的受益者,面临着较多的发展机遇,但随着不断的发展,其中存在的巨大挑战也逐渐的展现出来,利用“互联网+”进行创业的难度也成为现代大学生前进路上的拦路虎,为更好的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发展,就需要对其中的挑战进行充分的了解,并从提升学生自身能力角度出发,促进“互联网+”背景下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发展。^[45]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提升的策略:实现人才标准多元化;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制约;优化教学方法,加强实践教学。^[46]

王子岩等学者指出,当今社会发展中,大学

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在此情况下,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很有必要。实践过程中,各高校不仅要对创业培训体系进行创新,同时还要明确基本的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具备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从而更好的适应未来社会发展。^[47]

六、养老问题

(一) 养老模式问题

张丽、严晓萍指出,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智慧养老正成为中国化解养老服务资源供需矛盾的可行途径和必然选择。目前,智慧养老发展存在缺乏有效的顶层设计、智慧养老企业发展存在瓶颈、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老人需求之间存在偏差、智慧养老服务缺乏专业型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设立国家智慧养老产业大数据中心;积极推动智慧养老企业的自我提升和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需求平衡;拓展智慧养老产品购买渠道,提升老年人购买智慧产品的能力;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推进智慧养老相关信用体系建立;强化人才培养,培育壮大智慧养老服务队伍。^[48]

刘晓静、张向军、谢秋实指出,河北省人口老龄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养老服务面临资金瓶颈、医养结合存在现实障碍、养老服务人才短缺、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方面的挑战。为此,政府应该加大财政补贴并拓宽投融资渠道、发展医养护结合模式以方便老年人养老与就医、加大养老服务护理、管理和评估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以居家社区养老为重点的养老服务体系。^[49]

张幸、董银霞、吴琼、李梦嘉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养老融资体系的发展现状及融资障碍,提出将数据金融理念与养老融资体系进行融合,解决京津冀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资金需求,实现养老金融,最终促进京津冀地区养老融资体系的协同发展。^[50]

韩兆柱、邢蕊指出,养老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而且是重要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需要政府和相关社会主体统筹应对。京津冀养老服务基于一个整体框架下协同发展,从缓解大城市养老压力和为公民提供更优质的养老服务两方面考虑,协同优化三地养老服务

供给。整体性治理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不同地区、政府部门以及公私部门之间的协调整合,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从而提供满足公民生活需求的高效公共服务。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加快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的步伐,打破政策性壁垒、破除地区本位主义、促进公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是破解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困境的必然选择。^[51]

郑涛、李梦莹、侯玉梅指出,养老服务需求和养老产业空间随老龄化社会到来而扩大,也提出了需求多样化条件下供给方差异化定价问题。基于我国养老产业服务定价不合理的现状,考虑不同弹性因素,构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双边市场模型,以及长者和养老服务提供方效用函数,探讨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上不同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服务的最优定价策略,并运用 MATLAB 软件进行模拟分析。结果显示:当市场规模较小时,针对如上门诊疗等需求价格弹性大而供给收入弹性小的服务,平台对长者收取低价,对养老服务提供方补贴高价;针对如智能穿戴等需求价格弹性小而供给收入弹性大的服务,平台对长者收取高价,对养老服务提供方补贴低价。当市场规模较大时,针对如上门诊疗服务,平台对长者收取高价,对养老服务提供方补贴低价;针对如智能穿戴服务,平台对长者收取低价,对养老服务提供方补贴高价。市场机制作用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企业可通过差异化服务定价模式获取最大利润,促进智慧养老产业可持续发展。^[52]

郑涛、李梦莹、侯玉梅、宋晓彤指出,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养老机构资源短缺、成本过高及其粗放化的管理模式使长者难以获得优质养老服务。从养老服务满意度视角建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居家养老服务定价模型,研究在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对养老服务提供方给予激励性补贴前提下,对比市场规模小和市场规模大两种情形的居家养老服务定价策略。研究发现:随着养老服务满意度的增加,平台最优服务价格增加。研究表明:初创期(市场规模小)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为打开市场扩大用户规模应选择较高的定价策略,成熟期(市场规模大)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为盈利应选择适中的定价策略。^[53]

王朋岗指出,以往对家庭养老资源的研究,大都基于同住子女的视角,缺乏从直系组家庭的

视角将非同住子女的养老支持也考虑进来。研究基于血缘关系而非居住方式,站在直系组家庭视角,使用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从供给与需求出发,借鉴国内外老年人综合评估方面的计分处理方法,通过评价老年人健康状况与经济状况,相应的计算出老年人的养老资源需求指数;基于当前子女的养老资源供给水平和每一个子女赡养父代的意愿、条件和能力,构建未来老年人家庭养老资源的供给指数;最终构建家庭养老资源供给缺口指数。结果显示我国有 20.55% 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养老存在总供给缺口、高达 77.45% 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存在缺口、48.25% 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的生活照护存在缺口、24.83% 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的精神慰藉存在缺口。使用多因素回归对风险人群进行识别,发现不同老年人家庭在生活照护、精神慰藉、经济支持缺口面临的风险存在差异,但高龄、低受教育程度、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女性老年人存在养老资源总供给缺口的风险最大。^[54]

孙伊凡、陈丽莎指出,京津冀异地养老服务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之一。这种特殊的异地养老服务需求具有内在动力,得到了三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但实地调查表明,在了解与认知方面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亟待研究和解决的制约因素。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京津冀三地政府间合作方案、提高异地养老服务认知度、提升服务质量,并在提供多元化服务方面提出解决对策。^[55]

孙伊凡指出,我国的养老方式正在经历着一系列新的发展变化。无论是居家养老方式内涵的扩展,还是异地养老方式的迅速形成,都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多层次因素的影响。经济收入增长是养老方式发展变化的经济支撑,政府推动是养老方式发展变化的政策支撑,追求更美好的晚年生活是养老方式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56]

林顺利、赵唯辰、刘玢指出,目前家庭逐渐核心化,空巢期逐渐增长,空巢家庭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空巢老人养老具有特殊性,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空巢养老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进一步推动城市养老问题解决应对机制的专业化进程,重视养老系统的统一设计,加大对城市空巢养老的专项投入和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并尝试引入三社联动工作模式。^[57]

肖辉指出,京津冀养老一体化的路径和对策:尊重市场规律,形成多元共赢的保障体系;发挥助老类社会组织作用,推进养老一体化进程;整合京津冀三地现有养老资源,打造多层次的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强化政策协同,保持政策的统一性和联动性;加强协同立法,努力提高有效性和针对性;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为养老一体化提供技术支撑。^[58]

(二) 养老产业问题

耿永志、魏云娜、周瑾指出,在“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养老服务产业正在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平台转型升级,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互联网和养老服务两个领域有机融合,逐步打造智慧养老新业态。针对当前我国“互联网+养老服务”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继续优化民政部门处室职责,增强管理灵活性和创造性;建立部门沟通渠道,形成推动“互联网+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合力;增强科技研发力度,在人工智能、远程监测等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拓展融资渠道,防范“互联网+养老服务”产业“异化投资”风险,推动互联网和养老深度融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开放、包容、创新发展。^[59]

张嘉威、宋建修以河北省老龄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河北省老龄产业的市场需求,重点研究了河北省老龄产业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最后提出了河北省老龄产业发展的路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培育行业组织,强化行业建设;完善河北省老龄产业政策;培育老龄产业品牌企业。^[60]

尹凡、张亚明、刘明指出,目前学术界关于养老产业研究成果颇丰,但与我国老龄群体的实际需求有一定的错位,表现为投入要素不足、供需不匹配、实操性较差等问题。通过对 CNKI 收录的有关养老(老龄)产业的题录信息,结合 SPSS22.0 对高频词汇进行集中度方差分析,并结合 Cite Space 工具,通过对养老产业按关键词的中心性聚类分析发现,我国养老产业的学术研究存在:研究方向分散;微观分析和定量分析不足;成果应用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不匹配等问题。因此,提出强化养老产业前瞻性理论分析、关注微观产业系统协同演进、加大定量研究的建议和主要措施,为我国养老产业的理论研究,以及从

业实践和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61]

张茜、耿晓通过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各类特色小镇为依托,将“候鸟式养老”或“旅居养老”等离开家的老年发展项目融入特色小镇发展中,逐步建成综合性较强的养老服务融合体。尤其针对京津冀地区,对于环境要求较高的老年人,选择通过在不同季节,辗转多个地方享受不同的养老服务来达到颐养天年的目的。这种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的方式是支持老年人从居家养老、养老院养老的方式中走出来,鼓励利用新环境、新生活迎接养老的积极方式。在河北特色城镇建设的产业定位中指出特色城镇应注重特色产业集群,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现代旅游服务。发展好的养老项目,一个优雅舒适、适合居住且具有特色的小镇就成为了不二之选。从乌镇雅园这一经典养老小镇可以看到,主题鲜明、综合性发展的小镇不仅可以提供养老服务,同时满足老人对于环境的需求。^[62]

宋凤轩、张泽华指出,日本拥有世界上对投资人较为有利的两个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投资工具——个人型定额供款养老金计划和日本个人储蓄账户计划,二者可共同为投资人免除每年高达 55 万日元的税收缴费,具有丰富多样的投资产品和较高的收益水平,是日本民众重要的养老储蓄方式。日本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管理通过较为完善的制度设计、高效的市场化运作和有效的风险管理,在较短时间内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为我国更好地推动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运营管理提供了经验借鉴。结合我国目前第三支柱养老金发展现状,建议:应增强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计划间的运营管理联系;金融机构在创新养老金融产品供给服务的同时还应积极承担起投资者教育的责任;扩大第三支柱商业养老金计划覆盖的人群范围。^[63]

肖辉、肖蒙指出,养老机构中如何处理好老年监护问题,涉及众多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必须慎重对待。养老机构中老年监护制度的适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养老机构作为养护人所形成的老年监护制度的适用;二是养老机构作为监护人所形成的老年监护制度的适用。适用路径和方式包括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及委托监护的适用等,而监护职责的获取方式可通过老年监护协议、遗赠扶养协议和养老服务协议等模

式确定。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老年监护监督制度,确立有偿监护机制及设立监护人报酬制度,探索双监护人制度及设立第二监护人,构建限制性监护制度,加大司法介入力度。^[64]

肖辉指出,伴随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养老院建设逐年提速,服务类型和内容进一步齐全,但多还停留在较为低端的层次,有些问题还较为突出和明显:支持养老院建设与发展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政策调整也存在一定缺位;软硬件建设存在短板,服务队伍专业化水平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经营理念落后,市场化程度较低,结构不够合理。理论上,养老院建设既有其人道主义和社会契约论的共同思想基石,也有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适度普惠型福利和福利多元主义的特别理论支撑。国外经验如管理体系规范、人性化程度高及种类齐全等,都可作为借鉴。因此,我国养老院建设应从理念更新入手,以立法完善为根本保障,在经营方式上勇于创新,健全人才培养体系,改进理念和观念,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其中,法治完善是最根本的手段,为此需要加强涉老领域整体立法,构建系统完整的养老院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政策到法律的转化进程,进一步加强养老院财税、管理、监督、软硬件建设、安全防控及相关市场立法,明确责任,加大执法力度,营造适应养老院建设良好发展的整体法治环境。^[65]

肖辉指出,老年监护制度是伴随社会进步、弱势群体受到关注及老龄化社会需要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当代中国老年监护制度创设为时尚短,从规则内容到社会实践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规则层面主要是老年监护体系不完整、监护制度不完备、鼓励及监督机制缺位、权责不明、细化不足等;社会层面则包含从理念认知到职责确认,再到监护落实等方面的欠缺;最后是司法保护不足。因此,应当在规则创设及适用、社会运行及监督四个层面加以完善,充分尊重和保护被监护人意愿,建立监护人培训机制和鼓励机制,强化公权色彩,构建科学、完整的老年监护制度体系,在有条件的地区尝试设立专门的老年司法保护机构和机制,健全相应的社会组织,建立专门性的涉老保护社会载体,完善社会监督系统,确保老年监护制度良好运行。^[66]

(三) 社区养老问题

栾文敬、信焱文、刘静娴运用尼尔·吉尔伯特的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以B市四家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为例,探讨我国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发展过程中的困境与发展。与政策规定的单一综合性不同,我国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多类型并存。发展困境主要包括:在服务对象方面,未完全实现在地老化、服务对象偏差、覆盖范围狭窄;在服务内容方面,非专业化的娱乐休闲同质性较强、整合型服务不完整;在服务递送方面,大多数日照中心还达不到国家建设标准,且部分设计不合理;在资金来源方面,过度依赖政府补贴、规模效益差。最后从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功能再定位、分类管理与补贴、品牌化与连锁化经营、制度建设与完善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67]

栾文敬、华若昕、陈静指出,作为养老机构和医院的替代品,国外社区日间照料的发展并未经过严格的规范化设计、技术参考或者专门管理,以致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呈现多样化特征。学者们在传统的社会型、医疗型两分法基础上,又提出了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和八分法,对社区老年日间照料类型的划分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在分类的基础上,学者们对社区老年日间照料进行了概念界定,在社区为依托、类型多样化、政府主导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在入住老年人类型、非正式照顾者、服务时间等方面还存在分歧。国外日间照料发展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资金来源等方面为我国提供了一定借鉴。^[68]

盖宏伟、刘博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日渐增多,对社会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逐渐流行。为了更好地满足养老需求,需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在梳理总结当前国内外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理想框架,并结合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完善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的方略举措。^[69]

张岭泉、吕子晔指出,已有研究针对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问题给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但忽视了农村社区自身在养老功能方面的主

动性和自发性。前屯村互助养老、孙家寨“饺子宴”和景家庄老年协会三个案例表明,农村社区在应对空巢养老困境方面能够自主进行适应性调整,形成内生增能的组织化自治和功能性替代选择。建议肯定这种内生增能经验的合法性,并将其纳入“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格局中。^[70]

梁智迪、林川琪指出,目前,我国上海、山东、天津、辽宁、四川、重庆、江苏七个省市已全面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传统养老模式面临挑战的背景下,“智慧”技术的出现为社区养老提供了新思路。以深度老龄化省市为例,在梳理社区智慧养老实践的基础上,了解到我国社区智慧养老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平台建设、社会参与、技术研发与养老服务等方面进行完善与提升。^[71]河北省廊坊市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传统养老服务模式面临挑战,“智慧”技术的出现为解决社区养老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对廊坊市老年人社区智慧养老认知与需求进行调查后发现:老年人对于社区智慧养老的认知不全面;老年人对于社区智慧养老的需求较弱;老年人在安全保健与情感慰藉方面有更多需求,其中,便携式健康测量和上门诊断是最迫切需要的医疗服务;此外,老年人希望满足交友和陪同聊天等情感需求。因此,社会工作人员应扩大社区智慧养老宣传面,加强社区老年技术教育,提高老年人社区智慧养老认知水平;注重智慧养老产品研发及引进,满足老年人医疗与精神需求。^[72]

(四) 养老保险问题

郑涛、宋晓彤、李梦莹指出,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养老问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及区域发展差距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资产负债视角下建立我国城镇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偿付能力评价体系,利用我国31个省市2010~2017年面板数据对城镇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的资产负债存量进行精算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基金偿付能力的空间格局和动态空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的空间区域差距明显,差距逐年增长,具有空间相关性,存在着空间格局分布不均衡、空间集聚效应较弱、养老保险基金存量不足等问题;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对基金偿付能力有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基金偿付能力具有负向溢出效应。最后,根据上述结果提出推动各地

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73]

(五) 农村养老问题

陈静、栾文敬指出,乡土文化振兴蕴涵“孝治”“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家风家德建设、社区保障的完善以及乡村养老文化的重塑。乡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记忆既是家风家德建设的纽带,也是乡土文明的根系;根植在乡村留守老人生活记忆中的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变迁,也是对乡风乡俗的深刻体悟与活态传承。孝文化家庭传承的断裂、社会养老文化变迁和家庭照料机制的变化是留守老人生活困境的深层成因。家庭结构、乡村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和文化共性是留守老人生活记忆的抽象载体和构建老年社会关怀制度的重要切入点。基于“记忆—教育—传承”的框架梳理老年人生活记忆、养老文化变迁和敬老环境优化的内在关联机制,明晰留守老人社会关怀的内容包括基于代际合作的家庭亲情关怀、社区邻里互助网络和公共生活空间营造、敬老助老的社会道德关怀、以及老年人自我关怀能力的构建。建议通过家庭教育的传承、学校教育的引导、社会教育的倡导和熏陶延续乡土社会的孝治关怀和文化振兴。^[74]

吕红平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优秀家庭文化和养老传统的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的现实背景下,养老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农村人口流动性强、老龄化程度高、收入水平低、代际文化转向和养老文化弱化等特点,决定了农村养老问题的复杂性。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原则和利益原则至上、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传入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流传数千年的家庭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代际关系原则和养老文化受到严重冲击,成为家庭养老的思想文化障碍。正确认识家庭文化与家庭养老的关系,构建支持农村家庭养老的新型家庭文化,形成有利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做好农村家庭养老工作的重要思想文化保障。^[75]

七、城镇化问题

李姜燕等人指出,3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现代化建设进程输出了不竭动力。但是,从城镇化建设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农村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城镇化进程仍显缓

慢。在农村城镇化建设上,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和不可回避的问题。面对这种发展态势,只有积极寻求新思路,探索应对措施,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才能不断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76]

孙晓然、王影指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化,保定市城镇化工作在金融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系统而完善的金融支持。不过就目前来看,保定市城镇化的金融支持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难以推动城镇化进程的稳定发展。应优化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健全金融组织体系、协调城乡金融支持、拓宽融资渠道、鼓励金融创新。^[77]

金浩、李瑞晶、安明结合我国城镇化特征,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我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 30 个省份人口、资本和土地三重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时空双向正相关;人口城镇化和资本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土地城镇化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邻接距离和地理距离的空间溢出是各变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渠道。^[78]

任伟、陈立文建立 PVAR 模型,采用 2001—2016 年我国大陆 30 个省份的数据,分析了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和房价三者的互动关系。静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与房价之间存在着倒 U 型关系,房价与城乡收入之间存在着 N 型关系,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影响受房价调节。动态结果表明,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和房价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地区,房价对城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波动性。在房价较高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波动性较强。在房价适中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波动对城镇化影响较大。^[79]

孟祥林指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涞水县依托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以及文化优势,赢得了更多发展机会。涞水县在发展中也存在很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行政区域狭长、东西两端发展差距较大、中心地区镇级中心地少、东端与西端交通通达性程度低。涞水县需要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津保协同发展的有利条件,在整合行政区划内部资源的同时,强化“涞水县—北

京市”“涞水县—保定市”之间的互动,通过发展大都市周边短途旅游产业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在涞水县西端需要以三坡镇为核心向西逐渐将赵各庄镇、龙门乡等整合,将拒马河发展为生态旅游链,并通过构建“C1+S+C2”的城镇体系,整合涞水县东端与西端,在涞水县东端构建“半圆+△”形的城镇格局,在涞水县西端构建以计鹿村为中心的“X”形城镇构架,让多条入涞交通干线通过环首都高速公路整合,提升涞水县的城镇化水平。^[80]

孟祥林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任丘在连接“保定—沧州”方面逐渐显示出优势,进而在京津沧保腹地内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推进任丘城镇体系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需要理顺其与周边中心地的关系,并在行政区划内部通过构建子片区的方式进行分区发展。根据乡镇中心地间的位置关系,任丘行政区划可以区分为西北子片区、东北子片区和西南子片区,分别以“苟各庄镇+郑州镇”“吕公堡镇+长丰镇”“辛中驿镇+石门桥镇”为中心,每个区域通过整合子片区内的其他乡镇中心地和村庄而成,然后要构建连接子片区的城镇链和以任丘为中心构建城镇环,将三个子片区整合在一起。在这种发展设计中,要注意提升微观层面交通通达程度,同时要将发展基础较好的村庄作为新的增长点培养,必要时要对乡镇进行区划调整。^[81]

孟祥林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为“大保定”南侧清苑区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文化基础厚、近邻核心城市和旅游资源丰富,是清苑区发展的有利因素,而城镇体系不完善、行政区域间整合力度弱则是清苑区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清苑区的城镇体系必须以“三 C+三子核”为框架进行构建,即将清苑区划分为区域 X、区域 Y 和区域 Z 三个子区域,区域 X 以冉庄镇为核心构建 C1 城镇团,区域 Y 以大庄镇为核心构建 C2 城镇团,区域 Z 以臧村镇为核心构建 C3 城镇团,在此基础上形成臧村镇—冉庄镇—大庄镇三角形发展构架,从而推动清苑区的城镇一体化发展。^[82]

李爱民指出,基于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城市群空间发展现状:城市人口空间规模呈现“多中心”格局;城市经济空间呈现多级分布特征;城市空间发展呈现开散状扩张趋势。基于新型城

镇化道路的城市群空间优化方法：明确本发展区域的综合承载能力，完善城镇等级规模与结构；立足于本地域的发展特点，合理选择城市群布局模式；掌握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问题，消除发展中不利因素。^[83]

八、人口老龄化问题

陈翠霞指出，在老龄化背景下构建河北省城市社区老年健康服务项目的优化管理，将对不同模式养老机构实现社区老年健康服务理念的转变、完善社区老年健康服务项目体系、确立不同层面的基本社区老年健康服务项目体系、提高社区老年健康服务项目整体服务能力和发展活力提供理论和实证性研究，对推动社区老年健康服务可持续发展，促进老年健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84]

胡耀岭、原新指出，人口老龄化是死亡率和生育率双双下降的必然结果。从人口老龄化机理出发建立数学模型，定量研究各因素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贡献率及其变动规律。结果表明：总和生育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将决定和主导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死亡水平将持续深入影响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发展累积所形成的惯性作用对人口老龄化有着重要影响；相对而言，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较为微弱。建议：理性认识人口老龄化过程，科学看待未来老龄化决定因素，合理制定适合我国老龄化社会发展的相应政策。^[85]

肖辉指出，设立老年权益法院是适应我国老龄化社会快速发展、更好地从司法层面维护老年人权益的需要，既与加强老年权益司法保护的国际趋势和国内需求密切相关，又与司法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紧密相联。为此，应当立足于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总体布局，谋划设立老年权益法院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必要性及现实性。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法院已经相继设立了老年法庭或老年审判庭，专门负责审理涉老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仍需要进一步改进和调整，探索设立老年权益法院并逐步加以完善。在设立模式上，不论是专门的老年权益法院还是老年权益法庭，抑或纳入其他专门性法院或法庭如家事法院等，都有利于老年人权益司法救济的有效运行，

但相对来说，设立专门的老年权益法院更直接、更有效；在设立方式上，可分别考虑采用分步走的过渡方式、通过纳入其他相关专门性法院的折衷方式，以及直接创设老年权益法院的专门方式来实现。此外，从空间布局到审判流程，探索相应的特殊程序规则，同时在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中尝试“三合一”的可能性，确保这种新型的司法运行机制能够更高效、更合理地解决老年权益纠纷及其不同的诉讼问题。^[86]

胡国华指出，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大力发展老年教育事业，提高老年学员教育满意度，不仅有利于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而且对提升老年学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究老年学员教育满意度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对河北省 363 名老年大学学员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老年学员教育满意度对生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对教育内容的满意程度是影响其生活质量的关键要素。因此，可以通过采取构建多样化课程体系、打造专业化师资队伍、建立规范化服务管理等措施来提升老年学员的教育满意度，进而有效提升其生活质量。^[87]

耿海燕等学者指出，河北省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如何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将成为整个社会和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河北省老年人群的健康需求为切入点，对老年人的身心特征及身心需求进行剖析，根据雾霾污染天气下老年人健身状况推进城市老年人健身服务体系构建，为解决老年人在雾霾污染天气下进行科学的锻炼提供参考。^[88]

九、社会心理问题

王晶指出，提升社会心理服务水平面临着民众普遍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志愿者服务配套工作机制不健全、社会心理服务配套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将心理建设纳入政府社会治理体系、成立社会心理综合服务中心、以“社会工作+心理服务”助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素养、推动社会心理服务领域优秀人才建设、加强规范化、信息化建设。^[89]

彭丽华通过调查京津冀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健康和心理需求的关系。方法采用老年人基本信息调查表、老年人心理健康问卷和老年

人心理需求量表,对京津冀 145 名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心理健康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心理需求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心理健康总分及部分维度、心理需求总分及部分维度在居住地、退休前职业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心理健康总分和心理需求总分呈显著负相关。且得出了以老年人心理健康总分为因变量,心理需求总分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的通径模型。结论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心理需求呈负相关,老年人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后心理才会越健康。^[90]

十、粮食安全问题

张静宏、高建立指出,保障粮食安全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作为粮食生长的核心土壤也出现被污染的现象,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通过对土壤污染引发粮食安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了土壤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提出要加强执法监管力度、提高保护意识、加强对农田的修复、发展绿色农业等提升粮食品质、保障粮食安全的建议。^[91]

十一、就业模式问题

王宏斐、汤新程、陈冠洲分析了共享经济对就业模式的影响,阐述了河北省共享经济背景下新型就业模式的现状:共享经济对劳动力的虹吸作用冲击了传统就业模式;共享经济实现的平台化变革促进了新型就业模式的发展;共享经济产生了就业模式的多元化。共享经济背景下河北省新型就业模式对策:建立完善对于共享经济行业的监管制度;制度保障与教育培训并行以避免市场风险;政府适度干预与扶持以防范共享经济的寡头垄断。^[92]

(闫坤: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王迎,刘彤彤.河北省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分析[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9(4).
- [2] 郭艳,柴佩文.特色小镇建设中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探讨[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19(3).
- [3] 宋凤轩,杨竹晴.去产能背景下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路径选择——以新时代工会组织之效能为探讨中心[J].河北学刊,2019(4).
- [4] 陈静.共治困境童年:我国孤儿社会保护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制度基础和政策创新[J].扬州大学学报,2019(5).
- [5] 贾志科,李文强,王思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儿童福利政策的演进历程——兼述政策效果及未来方向[J].少年儿童研究,2019(10).
- [6] 于向辉,李素枝.河北省社会救助体系优化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4).
- [7] 赵丽亚,李建红,王媛媛,于海印,邵东蕊,郭灵西.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会救助调查研究[J].西部素质教育,2019(2).
- [8] 王欣,王海蓉.十九大后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征程过程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9(10).
- [9] 朱晓霞,孟建芳,宋嘉欣.突发公共事件社会舆情治理选择——基于爆炸渗流理论[J].情报科学,2019(3).
- [10] 吴明,张茜,李慧斌.探究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舆论引导策略[J].智库时代,2019(7).
- [11] 孟祥林.我国社区治理的三个向度:制度创新、社会资本建构与社区共同体塑造[J].新疆财经,2019(4).
- [12] 李瑞,刘超.流动范围与农民工定居意愿——基于流出地的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9(8).
- [13] 李瑞,刘超.城市规模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影响[J].城市问题,2019(3).
- [14] 于艳芳,贾凯旋,闫薇.完善河北省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对策研究[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
- [15] 李凡,张宏卫,王湘玉.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指标体系构建分析[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9(2).
- [16] 王妍,张丽元,陈子宇,张丽英.浅析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农家参谋,2019(9).
- [17] 李凡,张富强.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规划能力提升策略[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11).
- [18] 张冉,张丽元,徐祗坤,徐莉,李姜燕.河北省新型职业农民专项培养现状及创新模式分析[J].吉林农业,2019(2).
- [19] 孟建锋,李魏瀚,续淑敏.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探究[J].农业经济,2019(11).
- [20] 周瑾.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制度建设与产业内培育的路径选择[J].当代经济,2019(10).
- [21] 高玉峰,闫志利,刘敏.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对策[J].经济论坛,2019(4).
- [22] 张丽英,高雅斌,白光,王大江.河北省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11).
- [23] 赵永刚,徐立敏.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效率提升策略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19(1).
- [24] 薛晴,陈会谦,孙秀芳.新时代新型职业农民的特征内涵及理论价值[J].农业经济,2019(8).
- [25] 宋薇,陈秋实,冉磊.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现状与对策分析[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9(6).

- [26] 周立斌,袁思清,徐永伟,严明昊,田欣雨,石楠山.当代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以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为例[J].教育现代化,2019(7).
- [27] 王媛媛,刘佳,赵丽亚,郝永建.供给侧背景下大学生基层工作的影响因素及策略研究[J].智库时代,2019(12).
- [28] 周德,霍金侠,张琳,李洪武,张甜田,段汝和,魏会平,韩敏,宋小青.以社会实践为载体加强医学生就业能力培养[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9(7).
- [29] 常江.医学院校就业指导与服务模式的探索[J].现代经济信息,2019(9).
- [30] 常江,史广玉,赵丽娟.医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以河北医科大学2015届本科毕业生为例[J].中国校外教育,2019(1).
- [31] 王冰.高校就业工作应如何做到“四个回归”[J].中外企业家,2019(2).
- [32] 张蓓蓓.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大学生就业促进机制研究——以河北为例[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19(3).
- [33] 尚晓丽.精准扶贫战略下引导大学生农村基层就业的问题研究[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19(1).
- [34] 景瑞蓉,张晓丽,樊瑞丹.地方高校毕业生农村基层就业引导机制构建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2).
- [35] 王鹏举.河北省高校体育毕业生就业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9(2).
- [36] 杨静如,韩琳琳.小组工作介入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问题的分析研究——以邢台学院“Let it go”大学生就业减压小组为例[J].邢台学院学报,2019(2).
- [37] 李跃男.就业新常态下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力现状及提升策略的实证研究——基于河北省4所高校的调查[J].智库时代,2019(15).
- [38] 倪迎华.大学生创新创业促进就业的对策分析[J].办公自动化,2019(1).
- [39] 王媛媛,郝永建,刘佳.新时代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路径探索——以河北省某高校为例[J].西部素质教育,2019(3).
- [40] 王岚,李方方,李佩忠,陈海菊,高欣.众创时代下如何促进大学生创业就业调查研究[J].办公自动化,2019(4).
- [41] 刘海英,赵航.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现状及对策研究[J].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2019(5).
- [42] 李丽丽,赵雪.乡村振兴视野下河北大学生返乡创业模式调查[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2019(2).
- [43] 张龙.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策略研究——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J].化学教育,2019(14).
- [44] 付鸿彦,顾岩峰.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效能感对创业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9(2).
- [45] 张龙.“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J].才智,2019(17).
- [46] 张龙.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J].才智,2019(16).
- [47] 王子岩,刘志遥,毕鑫.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的策略与途径——基于高校视野[J].现代商业,2019(11).
- [48] 张丽,严晓萍.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实现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2019(7).
- [49] 刘晓静,张向军,谢秋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下河北省养老服务面临挑战及发展建议[J].河北大学学报,2019(1).
- [50] 张幸,董银霞,吴琼,李梦嘉.数据金融与京津冀地区养老融资体系的发展研究[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9(10).
- [51] 韩兆柱,邢蕊.基于整体性治理的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9(1).
- [52] 郑涛,李梦莹,侯玉梅.基于弹性理论的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差异化定价策略[J].产经评论,2019(3).
- [53] 郑涛,李梦莹,侯玉梅,宋晓彤.共享居家养老服务定价策略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9(4).
- [54] 王朋岗.直系组家庭视角下家庭养老资源供需缺口评价与风险人群识别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9(5).
- [55] 孙伊凡,陈丽莎.京津冀异地养老的认知困境与探索[J].河北大学学报,2019(3).
- [56] 孙伊凡.养老方式嬗变及其原因探析[J].人民论坛,2019(13).
- [57] 林顺利,赵唯辰,刘玢.社会工作助力城市空巢家庭养老的对策研究[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1).
- [58] 肖辉.京津冀养老一体化路径与对策[N].河北日报,2019-7-30.
- [59] 耿永志,魏云娜,周瑾.“互联网+养老服务”发展问题探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9(1).
- [60] 张嘉威,宋建修.河北省老龄产业发展现状及路径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12).
- [61] 尹凡,张亚明,刘明.基于文献计量的养老产业研究热点图谱分析与展望[J].城市发展研究,2019(4).
- [62] 张茜,耿晓.基于特色小镇探索河北省养老服务业发展[J].智库时代,2019(3).
- [63] 宋凤轩,张泽华.日本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管理评价及借鉴[J].社会保障研究,2019(6).
- [64] 肖辉,肖蒙.养老机构中老年监护制度的适用与完善[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6).
- [65] 肖辉.我国养老院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对策[J].甘肃社会科学,2019(6).
- [66] 肖辉.当代中国老年监护制度发展现状及其完善路径[J].河北学刊,2019(6).
- [67] 栾文敬,信焱文,刘静娴.我国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发展的反思与展望[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19(7).
- [68] 栾文敬,华若昕,陈静.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概念辨析及启示[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2).
- [69] 盖宏伟,刘博.改进完善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运行机制探讨[J].理论导刊,2019(3).

- [70] 张岭泉,吕子晔.内生增能:农村社区空巢老年人养老功能的适应性调整及其支持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2019(1).
- [71] 梁智迪,林川琪.我国社区智慧养老实践现状分析——以深度老龄化省市为例[J].改革与开放,2019(14).
- [72] 梁智迪,林川琪.老年人社区智慧养老认知与需求研究——以廊坊市为例[J].社会与公益,2019(11).
- [73] 郑涛,宋晓彤,李梦莹.资产负债视角下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的空间格局与溢出效应[J].保险研究,2019(8).
- [74] 陈静,栾文敬.变化中的孝悌:乡土文化振兴视域下留守老人的生活记忆和社会关怀研究——基于 H 省 T 村的口述史分析[J].兰州学刊,2019(9).
- [75] 吕红平.农村家庭养老的家庭文化构建研究[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9(2).
- [76] 李姜燕,高雅斌,黄万猛,张冉,徐莉.农村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思考[J].南方农业,2019(3).
- [77] 孙晓然,王影.保定市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5).
- [78] 金浩,李瑞晶,安明.三重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2).
- [79] 任伟,陈立文.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房价波动研究[J].价格月刊,2019(6).
- [80] 孟祥林.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涿水县城镇体系发展对策分析[J].城市,2019(4).
- [81] 孟祥林.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任丘城镇体系子片区发展构想[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19(1).
- [82] 孟祥林.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清苑区城镇体系发展对策分析[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19(3).
- [83] 李爱民.基于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城市群空间优化探讨[J].科学咨询,2019(1).
- [84] 陈翠霞.河北省城市社区老年健康服务项目优化管理策略研究[J].劳动保障世界,2019(10).
- [85] 胡耀岭,原新.决定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因素分解研究[J].老龄科学研究,2019(3).
- [86] 肖辉.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权益法院的设立构想[J].河北法学,2019(12).
- [87] 胡国华.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学员教育满意度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J].终身教育研究,2019(4).
- [88] 耿海燕,武常宏,程燕飞,杨永祥,周建,珂子涵.雾霾污染天气下河北省城市老年人健身服务对策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9(14).
- [89] 王晶.浅析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策略[J].决策探索(下),2019(1).
- [90] 彭丽华.京津冀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心理需求的关系[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13).
- [91] 张静宏,高建立.土壤污染防治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分析与建议[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9(8).
- [92] 王宏斐,汤新程,陈冠洲.共享经济背景下河北省新型就业模式研究[J].河北农机,2019(11).

政 治 学

政治学研究

李 娜

2019 年,政治学研究主要分布在政治学一般理论、民主政治、国家与社会治理、干部管理、政治文化、网络政治、国际政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往年相比,政治学一般理论仍是最为集中的论域;干部管理和政治文化研究成果明显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政治学理论

戴木茅指出,韩非的现世君主观实现了对君主理解的转向,将先秦时理想的君主拉回到现

实。韩非认为,君主的现世治理以道为依据,虽然以君臣关系为核心,但又不忽视人民,同时韩非理解中的君主具有非人格化特征。韩非试图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中人之治的治理模式,反对智治和德治。虽然韩非“术治重臣”的政治主张是以加强君权为核心的,但这只是过程性目的,其终极性目的是君主为国而治。韩非的这一论断建立在不稳定的“君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现实中则常常出现“君国分离”的情况,此时君主强权下的人民会受到很大压迫,而这一点是超出韩非预期的。^[1]

古代中国对分配正义思想的讨论最早可以追

溯到先秦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群体基于人的尊严,主张每个人的生存需求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敦鹏指出,在儒家的分配理念中,承认平等与不平等并存,并以仁礼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要求职位与俸禄应当按照人的贤能与贡献程度来进行分配,旨在以相对机会开放的形式使有德行的君子占据高位,以有利于民众的方式实施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尽管儒家分配正义思想对当时各等级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儒家的正义观与现代分配正义观存在明显不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现代社会的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甚至还存在矛盾和对立,有必要对其进行现代的反思和扬弃。^[2]

张治江认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必将会造福中华民族,谋福世界人类。《纲要》体现了我国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背景下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引领。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起点,公民道德建设具有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加快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坚定文化自信等多重意义。不过,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既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也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公民道德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需要知行合一。这不仅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更好成绩,更需要凝聚公民认同,更需要公民践行。公民道德建设关键在于全体公民的认可认同,并在此基础上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困难的、亟须解决的问题就在于此。^[3]

冯军从政治学的视角来分析,黑恶势力犯罪严重破坏政治秩序、诱生并加速政治治理机体的腐化、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降低了公众对政治治理的认同感。正是基于对当前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政治危害性的深刻认识,党中央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决策,以期弥补政治治理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控制政治治理被黑恶势力染指的风险,阻却黑恶势力介入政治治理的途径,为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4]

康振海指出,从贫穷落后到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从濒临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70年来,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正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正确引领。^[5]

程瑞山指出,伟大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6]

王政燃认为,伟大事业总是始于梦想而成于实干。回望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我们之所以能创造世间罕见的人间奇迹,靠的正是一代代中华儿女脚踏实地、夜以继日地实干。踏上新征程,只有继续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成为新时代的奋斗者、实干家,真抓实干、埋头苦干。^[7]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战胜前进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要求我们切实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更加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本领。^[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新时代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实现人民幸福。张春艳提出,深刻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人民幸福价值追求的内在逻辑联系,正确把握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9]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发展的终极价值从偏重于社会价值转向人文价值,并明确提出当代中国的发展就是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唐文玲认为,新时代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具有深厚理论渊源“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马克思主

义的核心价值。^[10]

于建星指出,行政改革的成功需要精神的引领。后工业社会呼唤一种新行政管理范式来取代管理型行政,同时需要建构一种新行政精神来取代理性化的行政精神。后现代行政精神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实社会也为其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建构后现代行政精神需要从人之重生、制度之再造和想象与启蒙三个方面着手。后现代行政精神的建构面临着诸多挑战,只有战胜这些挑战才能使后现代行政精神成为科学思运与现实活动而不至于成为乌托邦式的智力游戏。^[11]

万永彪提出,历经数年的构思探究、精细打磨,上海歌剧院推出了其在 2018 年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大型原创民族歌剧《李大钊》。该剧立足民族戏剧蓬勃发展、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背景,以缅怀伟大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展示卓绝斗争、警示激励后人,全力打造了一部回顾历史、致敬先驱、展望时代的革命史诗巨制。^[12]

二、民主政治

党内法规内容的规范和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为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制度资源和实践途径。刘新圣认为,推动党内法规的理论发展和制度建设,首先要阐述党内法规的政治性问题,党内法规的政治性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服务于加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其次,要深入到党领导和执政的实践中去,对党领导人民建设政权、执掌政权的历史过程有比较清晰的把握。再次,要以规范权力运行的理念,综合运用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深入挖掘党内法规同法治精神的契合之处。^[13]刘新圣指出,党内法规的完善为处理“全面从严”和“宽容失败”之间实际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制度基础。在解决容错纠错机制运行不畅甚至被虚置的问题时,党内法规具有直接有效的制度优势。推动容错纠错机制的完善,要善于寻找其同干部考核,议事决策等制度的契合点。^[14]

西柏坡时期在人民政协诞生史上是一个辉煌时期,它开启人民政协的发展航程,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充分体现了民主协商的精神。以详尽的史料,严密的论证,不

可辩驳地证明了人民政协从西柏坡走来。张同乐研究认为,人民政协从诞生至今已走过 70 年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人民政协制度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展望新时代,人民政协必将不忘政治协商初心,牢记多党合作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汇聚更加蓬勃的力量,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15]

魏先法指出,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人民政协要发挥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重要论断,为人民政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16]

杨福忠认为,近来乌克兰冲突不断,伊拉克局势堪忧,这些热点问题无不折射出民主发展的现实困境。“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不是万能的,更不是什么“救世主”。将西方民主嫁接到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是诸多民主乱象和民主烦恼。“美式民主”所标榜的“完美制度”,不过是金钱政治的游戏。^[17]

民生是人民生存发展的整体样态。刘彦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研究》一书,以“建设什么样民生,怎样建设民生”为主题,通过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的思想与实践基础,发展创新与内涵,现实指向与价值,尝试回答了特色民生理论是什么,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是怎样的科学体系,有着怎样的现实要求,凸显怎样的时代价值等基本问题;反映了其理论发展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凸显了思想研究整体性与独立性的统一,突出了人民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既做到了视野开阔,内容厚重和与时俱进,又兼具知识丰富,问题鲜明和可读性强的特点,可谓一部关于中国特色民生思想的简明百科。^[18]

王玉芬提出,民生权益是民众享有生存发展的权利与利益,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研究》作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的学术专著”,立足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民

情,系统阐述了民生政治建设问题,不仅丰富了人民生活即民生的内涵,而且明确了人民政治生活在民生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提出了实现政治权利、保障民生权益的基本路径,对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民生建设、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需要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9]

陈志军认为,公共管理机构对合法性的渴求、民主观念的普及、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使得公共舆情事件成为合法性危机的表现形态。社会公众价值认知的差异化、公职人员的个人品行、公共价值规范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和公共管理的绩效危机等问题的存在决定了舆情事件无法根除。公共管理机构可通过将事件纳入既有价值规范话语体系、调适公共价值规范与社会发展的差异、诉诸治理的有效性和消弭负面信息的传播和影响等路径维护、重建合法性,应对公共舆情事件。^[20]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相应思维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是人们将现实事物的相关方面联系起来的一种经验法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研究中,窦孟朔努力把握民生及其理论发展的内在联系性,综合运用价值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系统研究相结合、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全面研究与重点研究相结合、实证研究与推理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与创新研究相结合的“六个结合”研究(思维)方法,其研究成果被国家社科评审专家称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的学术专著”。由此可见,做研究需要依据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性,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十分重要。^[21]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范拥军提出,新时代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就要根据新时代民生内涵的不断丰富,来制定新时代民生建设战略布局,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窦孟朔教授等撰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研究》一书,积极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规律,建构了新时代民生经济、民生政治、民生文化、民生社会、民生生态“五位一体”的民生建设战略布局,分析了新时代民生建设战略布局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阐述了新时代民生建设的战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为新时代民生建设提供

了理论支撑。^[22]

三、国家与社会治理

(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白海琦指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进入21世纪后时代赋予中国的开创性课题,政治与行政体制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突破西方政治逻辑,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架构,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展开对政治与行政体制的现代化改革探索。最终在秉承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下,改革和完善中国的科层行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监督监察制度、司法制度,从政治体制设计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23]

一国法理学与治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把握自己国家的治理实践及其整体模式与理论机理?又如何认知它的未来走向?或许,对于“大转型”“巨变中”的中国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古今中西的关照、政治经济法律历史社会诸学科打通的视野,以及背后所包含的“现实感”“历史感”与“实践感”更为重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成就给予这种思路以可能,法政与治理理论也应面向实践。穆瑞丽、程爱军、张继文等试图拉近观察的视角,在中国治理、中国现实与中国制度之间建立某种理论上的关联,牵引治理行为演化的制度及其运转逻辑。^[24]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进化过程。李兰色认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要求,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工程,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必须抓住以下四个着力点:坚持依法执政,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制度建设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突出位置;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坚持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25]

国家治理需要催生了智库的产生,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刘风光、刘晋伟等指出,我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加

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6]

刘学谦、何新生认为,国家凝聚力是指国家内部不同民族、政党以及民众,在理想、目标、利益共同的基础上,国家满足其物质、精神、政治、文化、安全等需要而产生的内向凝聚力和外向吸引力。国家凝聚力包括国家物质凝聚力、国家精神凝聚力、国家政治凝聚力、国家文化凝聚力、国家安全凝聚力等。国家凝聚力的原理表明,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国家对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是国家凝聚力形成的源泉和动力。国家凝聚力的源泉和动力,与国家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密切相关。^[27]

(二) 乡村治理

白德全在分析乡村振兴与合作社互动机制的基础上探讨了合作社促进乡村振兴的困境与出路。合作社通过合作共享机制、民主参与机制和集中规划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乡村振兴通过产权改革机制、金融发展机制和人才培养引进机制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在实践中,城镇化的推进、合作社经营体制落后和全球化冲击使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受到较大负面影响,并使合作社促进乡村振兴的道路陷入困境。为克服这一困境,应通过政府扶持逐步优化城乡之间资源配置,实现合作社的初步发展;通过改革合作社的经营体制提高其决策效率,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现;通过双向一体化提高合作社的市场竞争能力,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多维目标。^[2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而根基是否夯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看乡村治理的有效程度。程瑞山、任明明强调乡村治理有效既有长远战略之考量,又直面乡村突出矛盾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29]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乡村“治理有效”内涵着对治理主体、治理决策、实施执行与治理效果的较高要求。程瑞山、任明明指出,乡村治理的效度考量,需要从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促进乡村发展、解决乡村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治理资源的投入与治理产出等多面相衡量。当前实践中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

性,就要从乡村组织振兴、治理主体良性互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注重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下好功夫。^[30]

韩梦娟、王英杰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农民上访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揭示乡村治理中权力运作的基本逻辑和实践过程,进而为乡村善治提供一种启发性思考。主要围绕农民上访博弈过程所涉及的五个方面:博弈主体、博弈场域、博弈目标、博弈行动、博弈结果等进行反思,揭示农民上访的行为逻辑及其变化,以期实现农民、乡村政府、国家的“正和博弈”。^[31]

马正英、王欢探讨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法治建设的基层工程。近年来,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三农”问题解决的法治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从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概念着手,分析了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真正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法治保障。^[32]

(三) 社会治理

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提出,要加大社会力量的有序参与,加强协同治理,完善灾害预警、信息共享、应急响应、灾后重建、社会动员等运行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王晓端、王飞认为,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防范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自我管理和服务。^[33]

201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雄安新区规划,明确提出“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城市安全运行,灾害预防,公共安全,综合应急等体系建设为重点,构建城市安全和应急防灾体系,提升综合防灾水平”。王晓端、贾永江认为,雄安新区建设过程时间跨度长,建成后地位重要,未来将承载很多重要功能。如果没有针对雄安新区风险治理的全面思考,未来新区将无法抵御重大风险的冲击,甚至影响新区的稳定和长远发展。^[34]

四、干部管理

梁瑞英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同时结合中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重点解读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时代内涵。领导干部要想有新担当新作为,首要的就是克服“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思想,狠抓落实,不断提高执行力。为了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干事创业,一定要营造更好的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通过对策探寻、机制构建等更好地调动和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励他们更好地担当、作为,这些不仅是摆在当前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面前的一道艰深的命题,也需要广大学者积极探索解决之策。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作为,而要有新作为,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不断提高执行力,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良法之治重在执行,执行力是制度的生命线。一分部署还要九分落实。领导干部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其执行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兴衰和成败。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升执行力。^[35]梁瑞英从政治性、自主性、实践性三个方面研究和总结“互联网+”背景下干部教育和成长规律。在此基础上,从互联网与学习交流、队伍管理、教育培训、群众工作四个维度探索网络背景下干部成长成才的路径。^[36]

梁瑞英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有力武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坚持实事求是,真点问题、点真问题,以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近日,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开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要求民主生活会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确保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新气象。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以对党、对事业、对同志、对自己高度

负责的态度,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真点问题、点真问题,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37]

袁秀指出,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新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面对空前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领导干部应把学习本领作为第一本领,切实加强学习,以学增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更好地担当新使命、创造新业绩。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注重领导干部的学习,他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习本领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第一位本领”,“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就没有止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把学习本领作为第一本领,勤于学、敏于思,在学深悟透、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避免少知而迷、无知而乱,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38]

申灿指出,河北红色教育资源丰富,种类齐全,涵盖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这些红色资源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历史意义重大。如西柏坡、涉县129师司令部旧址和狼牙山五壮士等享誉全国的红色资源。整合开发各地的红色资源,不仅能够保护资源,加强地方史的建设,而且能为干部教育培训提供革命历史和传统教育的平台,丰富和拓展干部教育形式和内容。^[39]

王秀华认为,“理论学习有收获”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一项具体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努力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学习有收获,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取得新进步,加深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大政方针的理解,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指明了努

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40]

孙英臣指出,干部要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铭刻于心,这样,人生奋斗才有更高的思想起点,才有不竭的精神动力。在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41]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重大任务。”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肩负的责任,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切实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孙英臣提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治理能力如何,关系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制度意识,提高治理能力,努力成为懂治理、能治理、善治理的行家里手。^[42]

田丽指出,党员领导干部是执行党内法规的重要主体,是影响党内法规执行力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通过研究领导干部的职务级别,特别是在领导班子中的地位的影响,发现干部职务级别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干部在特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对其执行党内法规的行为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党内法规的监督检查环节,反映出党内对于正职领导干部即一把手所掌握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反过来也会成为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有效执行党内法规的制约因素。解决此问题要注重从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角度提升其执行力和加强党内外监督等方面入手。^[43]

刘丽认为,干部成长无捷径可走,经风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才干。广大干部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成为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2019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要求大家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实干家。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广大干部在新时代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提供了遵循。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既要在学深悟透上花精力,又要在知行合一、实干担当上下功夫,以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埋头“钉钉子”的韧劲,创造无愧历史和人民的业绩。^[44]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越是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越要重视和抓紧学习。曹海霞指出,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即将走向全面执政,然而,党的干部理论素质、知识文化水平还远不能适应转型的需要,干部队伍面临“本领恐慌”问题。为此,党中央在全党开展干部学习运动,号召广大干部学习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切实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的干部学习经验。^[45]

曹海霞认为,“无我”强调的是毫无私利,追求的是务实为民,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一致。涵养“无我”境界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题中之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优良传统,是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的内在要求。为此,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涵养“无我”境界,切实担当作为,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46]

祁刚利、李鹏指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至关重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加强政德修养、打牢从政之基,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至关重要。^[47]

龙凤英提出,我们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切实担负起肩头的责任,

践行新担当、展现新作为。以“舍我其谁”的胸怀和“忘我”无私的专注与执着,达到以“无我”成就“大我”的高尚境界。^[48]

王政燃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家风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奠基石。家风正,则民风淳。《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要求党员干部“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党员干部家风建设中蕴含的立德修身、勤俭廉洁、家国情怀等内容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文化基础。党员干部家风建设已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因此,领导干部要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引领,做培育良好家风的表率。^[49]

李芬、刘银松指出,学习本领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第一位本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否具备学习本领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巩固的一个根本问题。当前,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我们正面临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练就学习本领,使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50]

一个政党要走在时代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指导;一个领导干部要做好本职工作,一刻也离不开理论学习。李芬提出,广大干部要切实为加强理论学习作为一门必修课,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干部要成长,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强调在学习理论上,干部要舍得花精力,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对广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提出明确要求,而且为如何加强理论学习指明了方向。广大干部要牢记总书记的要求,切实把加强党的理论学习作为一门必修课,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51]

五、政治文化

精神是文化的内核。袁秀聚焦共产党人的

“赶考”研究,认为“赶考”精神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传承这一宝贵的革命精神和传统根脉,是我们党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营养剂,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的重要动力。^[52]

袁秀认为,红色文化作为以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形态,所凝结的理想信念、道德操守、价值追求与坚定信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思想文化源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在理论渊源、思想内核、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同向性。红色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天然的物化载体,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奠定了优秀的文化根基,也增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53]袁秀对当前红色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提炼和升华了成功经验和做法,探究了融合路径,为更好发挥红色资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提供了有益参考。一是视野开阔、内容翔实。不仅纵向上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价值观教育的经验与做法进行梳理,还横向上深入对比世界上一些国家在价值观建设方面的有效做法,并对新时代互联网背景下红色资源运用的典型做法进行深入剖析,多维度展现了红色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经验。二是观点鲜明、见解深刻。她在书里全面系统研究了新时代红色资源运用现状,特别是对存在的现实困境及深层原因进行分析,探索红色资源传承在教育、文化、仪式、传媒、旅游、制度等方面的融合路径。三是角度新颖、注重实践。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探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可行路径,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应用性。^[54]

王彦坤指出,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一系列事关党的领导、旗帜道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斗争任务,对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在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砥砺

斗争精神、切实增强斗争本领，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在新的伟大斗争中书写新的光辉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登高望远、视野宏阔，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指引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遵循，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和年轻干部健康成长的重要指引。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复杂多变的新环境中保持清醒头脑、坚定政治立场，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顽强奋斗。^[55]

王彦坤提出，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铸就的一座精神丰碑，是全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风雨兼程，70 年砥砺奋进。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我们要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56]

曹海霞指出，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党性教育，已成为河北省委党校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一大亮点。近年来开发了“重走赶考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定探源”等独具特色的体验式教学课程。主要做法是以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为抓手；以完善教学制度机制为保障；以构建多渠道红色文化教育模式为方向，不断提升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57]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为了进一步弘扬西柏坡精神，总结西柏坡经验，冯学工、王金池、刘建军等深入研究、探讨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光辉实践及其培育形成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经验等，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信仰支撑、精神动力和根本方法。^[58]

李芬、张国强认为，70 年前，党中央从这里进京“赶考”，新中国从这里走来。70 载栉风沐雨，70 年沧桑巨变。太行山深处这个曾经封闭贫困的平山县小山村，依托老区人民的战天斗地、传承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脱贫致富，绿色发展，已然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新乡村，在新时代的“赶考”征程中又交上了一份完满的答卷。^[59]

刘建军指出，红色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各种优秀传统文化的总和，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当前，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把党的红色传统继承下来、坚持下去、光大起来，使它们发挥更大作用。广大共产党员要按照党的建设总要求，围绕锤炼党性、增强党性这一中心，积极发扬、践行红色传统，争做合格党员。^[60]

邵文英指出，“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节点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当前，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大力弘扬“赶考”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政治保障。她阐述了“赶考”精神的科学内涵，从“赶考”的信仰价值、民本价值、创新价值等角度分析了与党风廉政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61]

“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张兆平、任文青提出，新时代，“赶考”精神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有着新的丰富和发展，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励精图治、实干兴邦，从严治党，依法执政。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依然复杂、严峻。因此，弘扬“赶考”精神仍然具有时代价值。^[62]

六、网络政治

刘丽敏指出，当下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互联网信息技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进器，以此为支撑的网络运用大大拓展和延伸了社会大众的活动空间，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随着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断融合，作为社会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网络舆论，正在日益深入地影响着

网民特别是年轻网民的价值判断、行为取向,同时也对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切实加强网络舆论治理,着力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营造更加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清朗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63]

吴明、于欢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将计算机技术充分融入政府的组织架构中,打造“互联网+政务”模式,成为智慧政府建设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鉴于此,就新时期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创新建设路径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思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社会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尤其是进入到了改革关键性的阶段,要面对诸多领域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给出对策。对于社会来说,突发事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不仅会引发精神和物质层面的损失,同时也会阻碍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得社会政治不稳定。而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媒体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面对突发事件时需要政务新媒体更好的发挥平台的作用进行舆论引导,最大限度的降低突发事件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64]

七、国际政治

6月,中俄两国元首创纪录地在一个月之内分别在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相会。这不仅说明两国领导人具有深厚的个人友谊,更因为2019年既是中俄建交70周年,也是中俄携手并肩迈入新时代的元年。郭小丽提出,第一,中俄已成为“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的典范。中俄在文明起源及文化特性上存在差异。从文化发生学视角来看,中国文化产生于本土,属于原生型文化;俄罗斯文化在接受基督教(后改称东正教)为国教后开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起初属于西方的卫星文明。由于古代俄罗斯处在东(伊斯兰文明)西(基督教文明)南(拜占庭文化)北(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四种文明之间,在与多种文明的对话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西方结合部文明。^[65]

王军指出,自2007年6月正式成立至今,德国左翼党在德国联邦议院、各州议会以及欧洲

议会三个层面的选举中均取得了稳定的选举业绩。经过12年的嬗变,德国左翼党摆脱了当年民社党面临的那种严峻生存窘境,实现了向“全德党”的转型,填补了德国政党体制中社民党左侧的部分政治真空,建立了双头领导体制,但依然面临着领导层孱弱、组织缺乏集体认同、意识形态模糊等多种困境。要想实现在联邦层面成为执政伙伴甚至主要执政党的目标,左翼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66]

王军提出,联邦议院内外大量“小党”的存在,是德国这个“政党国家”政治万花筒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德国政党政治中发挥着两大“人民党”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在二者之间充当着特殊的筹码作用,是德国政党体制和政党政治的稳定平衡器;另一方面,其发展壮大和力量消长,又使德国政党体制出现极化和碎片化趋势。长期以来,两大“人民党”在处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二者选举业绩的日渐衰微,为各“小党”腾出了借以填补的特殊政治真空。联邦议院内“小党”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各“小党”选举业绩的稳定发展,使得两大“人民党”长期主导的德国政党政治面临考验。^[67]

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周振国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结构体系。这个价值结构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党的初心使命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核心内容是人民美好生活,价值实现的社会政治条件是美好社会和强盛国家建设,价值实现的基础是平衡和充分发展,价值发展的领域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价值实现的路径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价值实现的具体行动是“四个伟大”社会实践。这是一个从价值抽象到价值具体,从价值理念到价值行动,逻辑层次清晰,内容丰富充实,价值实现路径科学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结构体系,具有显著的实践性、时代性、原创性、科学性、民主性和先进性,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践行。^[68]

王小玲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从梁家河,到河北、福建,到浙江、上

海,一直到党中央,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追求,逐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69]

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黄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法治政府建设为研究对象,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政府价值取向的契合性,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要素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系,法治政府建设中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要素实现的因素,探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70]

孟祥林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涵四层意思: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层思想需要转变人们的实际行动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让每个人都成为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和受益者。社会环境的养成一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强化舆论宣传和教育引导;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状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机制。为此需要做到:以科学精神培养优秀人才;以创业精神激励奋发图强;以爱国精神引导甘于奉献;以正义精神明辨荣耻界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浓缩和升华,具有主导性,普遍性和包容性,反映了人民普遍的价值诉求。^[71]

王英杰、张朝彬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的高度凝聚,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与核心价值观紧密关联。提升文化自信能有效促进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维护和赞同;核心价值观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自信的根本在于核心价值观自信。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存在一个独特的动态确认、内在固化和自觉践行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面临着诸多文化困境,包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淡漠、西方文化的话语植入以及核心价值观认同融入日常生活不足等。基于文化

自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机制构建须增强文化的理性认知能力,营造文化自信的舆论氛围;增进传统文化的认同,创新文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机制;强化文化话语权建设,提升主流话语的感召力;促进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实践,夯实文化自信的现实根基。^[72]

(李娜: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戴木茅.韩非君主观论析[J].哲学动态,2019.(2).
- [2]敦鹏.儒家的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反思[J].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9).
- [3]张治江.立德铸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M].东方出版社,2019.
- [4]冯军.政治学视野中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7).
- [5]康振海.以思想之光引领复兴征程[N].河北日报,2019.(1).
- [6]程瑞山.弘扬伟大精神实现伟大梦想[N].河北日报,2018.(12).
- [7]王政燃.奇迹是干出来的[N].河北日报,2019.(10).
- [8]王政燃.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N].河北日报,2019.(1).
- [9]张春艳.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幸福的内在逻辑[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3).
- [10]唐文玲.新时代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5).
- [11]于建星.后现代行政精神的现代性谋划:科学运思抑或智力游戏[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5).
- [12]万永彪.思想性与艺术性关系的成功处理[J].中国戏剧,2019.(4).
- [13]刘新圣.党内法规建设:对相关研究的评论与反思[J].新视野,2019.(1).
- [14]刘新圣.容错纠错要靠党内法规引领[J].人民论坛,2019.(3).
- [15]张同乐.投身新政协:民主党派在行动.[N].人民政协报,2019.(9).
- [16]魏先法.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专门协商机构[N].河北日报,2019.(8).
- [17]杨福忠.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J].河北党校报,2019.(4).
- [18]刘彦芬.中国特色民生思想的简明“百科”——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9.(9).
- [19]王玉芬.论民生政治建设——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9.(9).
- [20]陈志军.政治合法性视域下的公共舆情事件:解释框架与处置路径[J].邢台学院学报,2019.(9).

- [21] 窦孟朔.民生理论研究的多元思维方法[J].邢台学院学报,2019.(12).
- [22] 范拥军.试论新时代民生建设的战略布局——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9.(12).
- [23] 白海琦.论政治体制改革视阈下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J].体制改革(人大复印全文),2019.(1).
- [24] 穆瑞丽,程爱军,张继文.法治暨国家治理现代化[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6).
- [25] 李兰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J].河北党校报,2019.(11).
- [26] 刘风光,刘晋伟.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现实审视与发展策略[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1).
- [27] 刘学谦,何新生.我国国家凝聚力进入全面增强新时期[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3).
- [28] 白德全.合作社促进乡村振兴的困境与出路分析[J].理论探讨,2019.(9).
- [29] 程瑞山,任明明.乡村治理何以有效[J].社会科学报,2019.(6).
- [30] 程瑞山,任明明.乡村治理有效的意蕴与考量[J].科学社会主义,2019.(3).
- [31] 韩梦娟,王英杰.农民上访与乡村善治的运作逻辑——以博弈论为视角[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3).
- [32] 马正英,王欢.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出路设计[J].法制与社会,2019.(2).
- [33] 王晓端,王飞.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实现机制[J].决策探索,2019.(4).
- [34] 王晓端,贾永江.应急管理典型案例研究报告(2019)[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1).
- [35] 梁瑞英.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兼论提高领导干部执行力[M].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
- [36] 梁瑞英.“互联网+”助力干部健康成长:原则、路径[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9).
- [37] 梁瑞英.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N].河北日报,2019.(6).
- [38] 袁秀.学习本领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第一位本领[N].河北日报,2019.(1).
- [39] 申灿.干部教育培训中红色资源整合、开发和利用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老区建设,2019.(11).
- [40] 王秀华.学深悟透融会贯通[N].河北日报,2019.(6).
- [41] 孙英臣.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N].河北日报,2019.(3).
- [42] 孙英臣.切实提高新时代干部队伍治理能力[N].河北日报,2019.(5).
- [43] 田丽.党员领导干部党内法规执行力存在的问题和对策[N].领导科学,2019.(6).
- [44] 刘丽.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N].河北日报,2019.(4).
- [45] 曹海霞.西柏坡时期党的干部学习经验[J].学习时报,2019.(5).
- [46] 曹海霞.党员领导干部需涵养无我境界[J].人民论坛,2019.(9).
- [47] 祁刚利,李鹏.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N].河北日报,2019.(6).
- [48] 龙凤英.党员干部为什么要“舍我”“忘我”“无我”[J].人民论坛,2019.(4).
- [49] 王政燃.家风正政风清[J].共产党员,2019.(1).
- [50] 李芬,刘银松.如何炼就学习本领[J].学习时报,2019.(8).
- [51] 李芬.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N].河北日报,2019.(3).
- [52] 袁秀.传承“赶考”精神培厚政治文化土壤[N].光明日报,2019.(2).
- [53] 袁秀.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向性思考[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5).
- [54] 袁秀.红色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M].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
- [55] 王彦坤.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N].河北日报,2019.(1).
- [56] 王彦坤.西柏坡精神: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N].河北日报,2019.(6).
- [57] 曹海霞.红色文化资源在党性教育中的开发与运用研究[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9.(21).
- [58] 冯学工,王金池,刘建军.西柏坡精神及其当代价值[M].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
- [59] 李芬,张国强.追寻西柏坡的精神图谱[J].学习时报,2019.(4).
- [60] 刘建军.发扬红色传统增强党性修养[J].井冈山大学学报,2019.(2).
- [61] 邵文英.“赶考”精神与党风廉政建设[J].党史博采,2019.(11).
- [62] 张兆平,任文青.“赶考”精神的时代价值[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19.(5).
- [63] 刘丽敏.营造清朗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N].河北日报,2019.(7).
- [64] 吴明,于欢.“互联网+政务”打造智慧政府的新路径研究[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9.(8).
- [65] 郭小丽.中俄是大国文明对话与交流的典范[N].光明日报,2019.(7).
- [66] 王军.当代德国左翼党的嬗变:“全德党”及其困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10).
- [67] 王军.联邦德国的“小党”:类型、特征与功能[J].德国研究,2019.(3).
- [68] 周振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结构研究[N].河北日报,2019.(4).
- [69] 王小玲.深刻领会并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J].中国环境报,2019.(9).

[70]黄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政府建设研究[J].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9.(4).

[71]孟祥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维度、实践要求与

激励动因[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9.(3).

[72]王英杰,张朝彬.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机制构建[J].重庆社会科学,2019.(5).

党的建设研究

张 勇 郑时雨

2019年党建研究重点是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执政能力建设、“互联网+党建”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孟庆云认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体现了我们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我们要深刻认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大意义,真正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奋力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局面。^[1]

程瑞山认为,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要切实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2]

孙英臣认为,干部要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铭刻于心,人生奋斗才有更高的思想起点,才有不竭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全党同志尤其是广大干部,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坚持人民立场,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发扬斗争精神,投身火热实践,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书写时代华章。^[3]

李凤瑞认为,抓落实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总要求之一。广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抓落实的重要意义,真正把初心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抓落实,就要找准方向、持之以恒,真正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实效,同时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4]

刘丽认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激发学习动力;力戒形式主义,端正学习态度;掌握学习方法,筑牢信仰之基;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学习实效。^[5]

王彦坤认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主线,理论学习有收获是重要具体目标。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6]

李鹏、祁刚利认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到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要真学深学，树立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7]

曹海霞、祁刚利认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党性锻炼，吹响了新时代党员干部以实干诠释初心，以担当践行使命的行动号角。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理论武装，练就攻坚克难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常怀赤子之心，涵养为民情怀，以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埋头“钉钉子”的韧劲，狠抓落实注重实效，创造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业绩。^[8]

尹会兰、高文越等认为，对高校学生党员开展初心教育意义重大。在当下学生党员教育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部分高校学生党员党性、初心意识淡薄；党务工作出现缺位；初心教育方式单一等。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员的不忘初心教育需要不断创新，可以通过理论学习常态化、教育方式多元化，建立党员教育长效沟通机制，实现学生党员初心教育的路径创新。^[9]

二、党的政治建设

孟庆云认为，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要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10]

杨东广认为，党的领导制度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制度密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关键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根本要求，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提高制度执行力作为关键举措，把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作为根本目标。^[11]

魏先法认为，政治建设是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既是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又

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现实针对性。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和魂，决定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把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12]

张兆平、任文清认为，以人民为中心即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与依宪治国具有目的的一致性，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提高人民群众在依宪治国中的主体意识，同时还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13]

三、党的思想建设

（一）坚定理想信念

张勇认为，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不会凭空而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要在真学上下功夫，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真信上下功夫，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要在笃行上下功夫，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14]

李毅峰、刘岩认为，人性是共产党员的自然属性，德性和党性从人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统一于阶级政党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力与战斗力是其人性、德性与党性的有机统一。共产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和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需要从鲜活的人性出发，在不断提升德性修养的过程中淬炼党性，实现自身价值，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统一。^[15]

龙凤英认为，“舍我”首先是舍弃自我、不讲私利、甘愿奉献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敢于担当、肯于担当的气概。“忘我”是共产党人优秀的品质和精神，更是能担当的专注与肯担当的执着。“无我”是一种为民的情怀，体现的是能担当的胸怀；更是一种境界，体现的是肯担当的奉献。党员干部要以“舍我其谁”的胸怀和“忘我”无私的专注与执着，达到以“无我”成就“大我”的高尚境界。^[16]

曹海霞认为，“无我”强调的是毫无私利，追求的是务实为民，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一致。涵养“无我”境界是中

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题中之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优良传统，是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的内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涵养“无我”境界，切实担当作为，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17]

（二）革命精神

王英杰认为，精神状态决定事业成败。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勇于担当作为，善于攻坚克难，只争朝夕、夙夜在公，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奇迹。^[18]

袁秀、刘森等认为，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铿锵前行的坚实步履和不懈求索，“赶考”精神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这一宝贵的革命精神和传统根脉，要常怀忧患，秉持“两个务必”的政治追求；要不懈进取，锤炼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要严明规矩，铭记清正廉洁的政治约束；要勇于担当，涵养执政为民的政治品格。^[19]

王彦坤认为，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铸就的一座精神丰碑，是全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我们要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20]

杨立元、杨春认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当精神既是他高尚道德情操和伟大人格力量的凝聚，也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勇敢前行的精神动力。李大钊的担当精神源于对国家、对民族、对党、对人民具有无比深沉的大爱情怀和牺牲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要弘扬担当精神，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21]

（三）红色文化及党性教育

袁秀认为，红色文化作为以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形态，所凝结的理想信念、道德操守、价值追求与坚定信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思想文化源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的理论同源性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要义、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滋养以及一脉相承的文化形态。红色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内涵与价值目标高度统一，价值传承与转化嫁接同向合一，育人功能与实践目标契合同一。红色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天然的物化载体，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奠定了优秀的文化根基，也增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22]

刘建军认为，红色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各种优秀传统文化的总和，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红色传统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红色传统的灵魂；实事求是红色传统的精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立场是红色传统的本质；艰苦奋斗的奋斗精神和作风是红色传统的显著标志；纪律严明是红色传统的重要方面；担当有为、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是红色传统的鲜明特点。^[23]

袁秀认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凝魂固本的基础工程，红色文化在有效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从内容与形式上是应然的优质资源，但是却遇到了实然的“困境”。拓展红色文化融入的实践路径，打通应然与实然的通道，需要充分挖掘和提炼蕴涵在红色文化历史资源中的红色元素，通过红色资源产业化、红色文化品牌化、红色传播多元化、红色旅游人本化与红色基地专题化等，多措并举，构建适时性的红色教育内容、方式与方法。^[24]

朱文通认为，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生命密码。有了红色基因，共产党人才有改天换地的志气和决胜未来的底气，才能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持之以恒传承红色基因，要加强科学理论武装，深入发掘红色资源、红色传统的时代价值，坚定理想信念，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25]

申灿认为，河北红色教育资源丰富、种类齐

全,涵盖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整合开发各地的红色资源,不仅能够保护资源,加强地方史的建设,而且能为干部教育培训提供革命历史和传统教育的平台,丰富和拓展干部教育形式和内容。在整合和开发河北红色资源过程中要注重顶层设计,合理统筹规划,深入挖掘当地红色教育资源,为“老资源”注入新内涵,构建信息化、智能化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和监管体系,打造河北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中的领先地位。^[26]

牛余庆、牛家驹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精神信仰、政治信仰,具有心理认同的实践本质。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在长期的党性修养、党性锻炼中生成的,是“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心理认同过程。认同问题说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权衡的心理选择和思维变化问题,应着力构建认知、情感、意志、行为认同机制,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增强“看家本领”。^[27]

四、党的组织建设

(一) 基层党组织建设

张勇认为,在我们党9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党支部的定位职责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为新时代加强支部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重要启示:要科学合理设置党支部,在提高覆盖面上下功夫;牢牢把握党支部的基础定位,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充分履行党支部的职责;既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又要加强支部自身建设。^[28]

赵红霞认为,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变化。从当前大背景形势来看,意识形态无所适从摇摆不定;从基层实践来看,党员干部对占领意识形态前沿阵地、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认识不足;从自身建设来看,意识形态工作人员队伍建设不足,工作手段单一。在新时代提升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领域的统领能力,一是培养好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二是基层党组织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学习;三是建设好意识形态工作阵地。^[29]

沈艳华、张献蕾等认为,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共河北省委在实现非公企业党组织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转变、增强党组织内生动力、整合各方资源、搭建思想政治工作平台等方面做出了

有益探索,并实事求是查摆问题,探寻务实管用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机制。非公企业党建将以培育企业家精神为主线,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主体作用,保障非公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30]

孟祥林、王倩雯认为,高校基层党建质量可以从政治生活质量、政治生态质量、基层组织质量、党员队伍质量、领导决策质量、制度设计质量、语言表述质量等方面进行测度。实践表明,高校基层党建存在诸多瓶颈因素,包括组织建设虚弱化、组织活动形式化、组织领导专断化、组织成员区块化、组织管理业余化、组织利益集中化等。提升高校基层党建质量,需要为基层党组织在精神、制度以及自律层面补钙,并且在基层党组织管理者的选拔机制、硬化基层党组织生活以及党组织队伍建设等方面做文章。^[31]

沙占华认为,数字化新媒体的出现,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机遇,有利于拓展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时空,增强了对高校基层党组织内部的互动,强化了对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权力监督。但是,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也面临些许困境:“键对键”取代“面对面”降低了工作效度、新媒体党建技术专业人才缺乏、监管的困难等。充分运用新媒体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活力和成效,需要自觉树立互联网空间的阵地意识,创建新媒体党建平台,提高广大党员运用新媒体的技能,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32]

李娟维、荆淑霞等认为,完善高校学生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对于推进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发挥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包括以下内容:组织体系标准化、党员队伍标准化、组织生活标准化、活动载体标准化建设四个方面。^[33]

李毅峰认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以及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对高校学生党员的发展和培养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也产生了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加强学生党员的思想教育、整合教育资源开辟多种形式的教育阵地、提高学习效果 and 发挥基层团组织在党员教育培养中的作用、加强党务工作队伍建设以及开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网上新阵地等方面加以改进。^[34]

（二）干部队伍建设

杨东广、田丽认为，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组织动员、提供服务、协调关系、维持秩序、推动发展和引领价值等角色功能。城镇化导致农村“空心化”的严峻现实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使村干部选拔培养工作既面临新挑战又要适应新要求。为进一步发挥村干部角色功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我们必须构建贮备机制、选拔机制、培育机制、考核机制、任用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和保障机制，努力探索村干部选拔培养长效机制。^[35]

刘丽认为，干部成长无捷径可走，经风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才干。广大干部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成为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首要的就是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其次要在基层实践中历练才干；最后要敢于负责、勇于担当，要有恪尽职守的责任心。^[36]

张磊认为，基层“双子”干部（“慢性子”和“混日子”干部），是官场的一大危害。“回炉锻造”机制与“双子”干部治理存在着显著契合性。“回炉锻造”机制包括民主评议筛选程序、分类“回炉锻造”程序、主辅结合提升程序、持续考核跟踪程序等内容。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并进行优化，构建“回炉锻造”联动体系，夯实“回炉锻造”责任基础，完善“回炉锻造”执行机制，推进“回炉锻造”创新机制，真正发挥“回炉锻造”机制的价值。^[37]

五、党的作风建设

康振海认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勇于直面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以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新时代新征程，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不渝以自我革命精神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38]

孟庆云认为，当前特权思想和行为，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对规范化权力的僭越，都是对权力人民性的异化和滥用，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干部的

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出了问题。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看家的本领，作为自己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圭臬，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这是根除特权思想和“四风”问题的治本之策。^[39]

李聚山认为，既要干净、又要担当，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员干部必修、必践的终身课题。做到干净担当，要厚植对党忠诚的政治根基，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严”字体现在日常管理和监督中，正确选人用人。要解决为官不为的问题，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40]

王英杰认为，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铲除形式主义，首要的是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的政绩观。其次，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来审视，从思想根源上来解决问题；再次，要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最后，要把好选人用人关，树立正确的“风向标”。^[41]

祁刚利、李鹏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加强政德修养、打牢从政之基，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忠诚是党员干部的根本政治素养，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清正廉洁是对每一位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是不能丢弃的政治底色。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使命所在。^[42]

张勇认为，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从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智慧，从基层实践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匙。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43]

龙凤英认为，践行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不断攀越高峰、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践行群众路线应警惕虚化、弱化、形式化。广大党员干部应该秉持实干作风，在思想上切实敬畏人民群众、感恩人民群众，在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在行动上切实深入人民群众，关注人民期盼，回应

人民诉求,满足人民愿望。^[44]

于欢、钟瑛等认为,干部间的一团和气容易异化为拉帮结派、附庸依赖、刻意讨好及羊群效应。要实现干部间一团和气的理性维系,就必须端正“和”之目的,明确“团”之底线,坚持自我之独立性,维系必要之突破勇气。应确保待人态度谦和,待事理性分析;讨论氛围宽松,决策结果慎重;用权恪守原则,事后打成一片;包容不同观点,营造和谐氛围。^[45]

王淑萍认为,基于群众路线逻辑的官民互动,可有效促进官民之间相互信任与合作,增进民众的政治认同,增强政府的凝聚力。但在实际操作中,此互动模式的局限性亦逐渐显现:利益博弈逐渐凸显背景下的官民“服务与被服务”的互动主旨存在背离之处;现代法治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官民“领导与被领导”的互动方式难以产生硬性规则,且不易于制度化;网络社会背景下官民“诉求与回应”的互动渠道不对称。为克服此局限性,需要充分发挥多元互动主体的力量,建构党、政、民三元互动关系结构,实现党权、国权、民权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保障。^[46]

六、党的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汤文颖、范立勇认为,习近平强化党内监督的理论、强化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党内法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党内监督思想在中国的最新实践成果。习近平始终坚持从严的原则,提出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论论断,形成了以党章为核心、以监督条例为主干、以配套规定和其他监督规范为重要补充的强化党内监督理论法规制度体系,将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有规必依、违纪必究;执政为民、风清气正;始终坚持改革创新。^[47]

朱文通、张静认为,西柏坡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经验主要有:一是坚持制度治党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保障;二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中之重;三是加强纪律教育是推进党的纪律建设的有效方法。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柏坡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经验,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严的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磅礴

力量。^[48]

张国岚、于怀新等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需要加大惩治力度,进一步强化不敢腐的高压震慑;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扎牢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不想腐的思想自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49]

刘建民认为,延安时期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不仅有助于理解党在社会大变动的年代如何加强自身建设,而且对今天的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既是对党内从严治党思想的传承与发扬,反映了从严治党思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又是在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的语境下,其在实践活动中的感悟和经验总结,充分体现了陈云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50]

七、党的制度建设

张勇认为,制度是定国安邦之本,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自信,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自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来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永葆生机活力。^[51]

伊士国、曹丽丹认为,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制度是一种政策性制度,包括问责依据、问责主体、责任主体、问责情形、责任形式等实施要素。这一制度目前存在责任主体范围较窄、评价标准不明、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了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应扩展责任主体范围、构建法治建设工作成效评估体系、健全制度运行的监督机制等,提高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职责的能力,以健全并保证该制度的贯彻落实。^[52]

梁瑞英、田丽认为,党员领导干部是执行党内法规的重要主体,是影响党内法规执行力有效

发挥的重要因素。通过研究领导干部的职务级别,特别是在领导班子中的地位的影响,发现干部职务级别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干部在特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对其执行党内法规的行为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党内法规的监督检查环节,反映出党内对于正职领导干部即一把手所掌握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反过来也会成为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有效执行党内法规的制约因素。解决此问题要注重从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角度提升其执行力和加强党内外监督等方面入手。^[53]

伊士国、郭康认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指标体系是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置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指标体系必须要遵循协调性原则、代表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多元化原则。我们应在借鉴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党内法规自身特色和实际情况,构建“七指标式”(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协调性、可行性、规范性、实效性)的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指标体系。^[54]

黄云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构的理论逻辑基础;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以及中华民族追求民族文化现代化的100多年历史,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构的历史逻辑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文化现代化奋斗的百年实践、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70年的社会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实现民族复兴的40年社会实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构的实践逻辑基础。^[55]

刘新圣认为,党内法规内容的规范和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为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制度资源和实践途径。推动党内法规的理论发展和制度建设,首先要阐述党内法规的政治性问题,它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服务于加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其次,要深入到党领导和执政的实践中去,对党领导人民建设政权、执掌政权的历史过程有比较清晰的把握。再次,要以规范权力运行的理念,综合运用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深入挖掘党内法规同法治精神的契合之处。^[56]

八、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王英杰认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制度意识是制度执行的思想基础,也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这既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57]

曹海霞、祁刚利认为,从历史经验中借鉴得失、汲取智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树立历史眼光,坚持以史鉴今;把握历史思维,尊重规律辩证分析;增强历史意识,强化文化自觉,把成功的历史经验有机地融入推进各项工作的实践中,在新时代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创造新的辉煌。^[58]

袁秀认为,新时代迫切要求基层党员干部转变传统的工作思维,认清基层工作的复杂性,不断提升自身依法行政能力、驾驭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基层党员干部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讲实话、办实事;必须要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素养。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能力既要调动党员干部内在的主观能动性,更要强化外部监督,让每个基层党员干部愿意练就真本领、能够练就真本领。^[59]

李芬、刘银松认为,学习本领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第一位本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否具备学习本领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巩固的一个根本问题。练就学习本领的前提是“愿学”,练就学习本领的途径是“勤学”,练就学习本领的基础是“真学”,练就学习本领的秘诀是“深学”,练就学习本领的方法是“善学”。^[60]

王政燃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战胜前进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要求我们切实增强辩证思维能力,不断提高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本领。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要加强理论武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求真务实;要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发展中的各种矛盾。^[61]

王宁认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

要完善的制度体系,还要在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既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基本要求,也是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实现的重要保证。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制度意识,带头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切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62]

九、互联网+党建

梁瑞英认为,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运用“互联网+”思维,充分发挥互联网对干部成长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人才培养体系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全面推动干部成长成才。一要学习交流,拒绝本领恐慌,增强履职底气;二要队伍管理,强化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三要干部教育培训,打破时空限制,多渠道获取知识。^[63]

赵雪认为,高校“智慧党建”是指在高校里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基于组织建设、教育管理、教学工作、互助帮扶等工作,将分散的、零碎的、独立的党建信息化系统、物联网系统进行整合,提升为具备较好协同能力和调控机制的有机整体,是对传统意义上党建信息化的升华。高校“智慧党建”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具有的管理功能、育人功能、服务功能、协同功能四个方面。^[64]

刘赞、郝明认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传播的垄断。对于党报而言,应利用新技术手段拓展传播渠道,以不同渠道的分层覆盖提升总体传播力,尊重不同平台的传播规律,打造传播渠道的个性,并通过跨界、合作拓展传播渠道,从而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重构渠道优势,做好新形势下的舆论引导工作。^[65]

[张勇、郑时雨: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

参考文献:

- [1] 孟庆云.深刻认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大意义[N].河北日报,2019-06-14.
- [2] 程瑞山.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永恒课题[N].河北日报,2019-07-24.
- [3] 孙英臣.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N].河北日报,2019-03-27.

- [4] 李凤瑞.以狠抓落实诠释初心使命[N].河北日报,2019-07-31.
- [5] 刘丽.真学真懂真信真用[N].河北日报,2019-09-11.
- [6] 王彦坤.在学通弄懂做实上下功夫[N].河北日报,2019-07-05.
- [7] 李鹏,祁刚利.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这门必修课[N].河北日报,2019-08-21.
- [8] 曹海霞,祁刚利.以狠抓落实践行初心使命[N].河北日报,2019-10-23.
- [9] 尹会兰,高文越,步秀君.新时代学生党员初心意识唤醒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10] 孟庆云.党的领导是新中国7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证[N].河北日报,2019-09-25.
- [11] 杨东广.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N].河北日报,2019-12-20.
- [12] 魏先法.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逻辑[J].共产党员(河北),2019(13).
- [13] 张兆平,任文清.以人民为中心与依宪治国[J].理论观察,2019(1).
- [14] 张勇.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N].河北日报,2019-03-22.
- [15] 李毅峰,刘岩.共产党员的人性、德性与党性分析[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16] 龙凤英.党员干部为什么要“舍我”“忘我”“无我”[J].人民论坛,2019(11).
- [17] 曹海霞.党员领导干部需涵养无我境界[J].人民论坛,2019(25).
- [18] 王英杰.始终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N].河北日报,2019-02-13.
- [19] 袁秀,刘森,张彦卿.传承“赶考”精神培厚政治文化土壤[N].光明日报,2019-05-13.
- [20] 王彦坤.西柏坡精神: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N].河北日报,2019-04-17.
- [21] 杨立元,杨春.李大钊的担当精神之深刻内涵与时代意义[N].光明日报,2019-09-26.
- [22] 袁秀.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向性思考[J].治理现代化,2019(5).
- [23] 刘建军.发扬红色传统,增强党性修养[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24] 袁秀.应然与实然:红色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思考[J].观察与思考,2019(9).
- [25] 朱文通.持之以恒传承红色基因[N].河北日报,2019-07-03.
- [26] 申灿.干部教育培训中红色资源整合、开发和利用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老区建设,2019(20).
- [27] 牛余庆,牛家驹.在开展主题教育中着力构建党员干部自觉增强“看家本领”的认同机制[J].机关党建研究,2019(9).
- [28] 张勇.党支部定位职责的历史变迁与重要启示[J].治理

- 现代化研究,2019(4).
- [29] 赵红霞.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的探索[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30] 沈艳华,张献蕾,田茜.论新时期非公企业党组织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主体作用的途径——以河北省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为例[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8).
- [31] 孟祥林,王倩雯.高校基层党建质量的测评维度、存在问题与提升对策[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32] 沙占华.新媒体环境下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考[J].保定学院学报,2019(3).
- [33] 李娟维,荆淑霞,宣孝义.新时代从严治党视域下高校学生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探析[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9(5).
- [34] 李毅峰.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培养工作的现状与创新[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35] 杨东广,田丽.村干部选拔培养长效机制探析[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3).
- [36] 刘丽.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N].河北日报,2019-04-10.
- [37] 张磊.治理基层“慢性子”和“混日子”干部的“回炉锻造”机制探析[J].领导科学,2019(13).
- [38] 康振海.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N].河北日报,2019-04-26.
- [39] 孟庆云.铲除特权思想重在“固本培元”[N].河北日报,2019-08-29.
- [40] 李聚山.既要干净又要担当[N].河北日报,2019-08-09.
- [41] 王英杰.驰而不息反对形式主义[N].河北日报,2019-07-10.
- [42] 祁刚利,李鹏.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N].河北日报,2019-06-16.
- [43] 张勇.从基层实践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匙[N].河北日报,2019-08-14.
- [44] 龙凤英.走群众路线不能作秀[J].人民论坛,2019(3).
- [45] 于欢,钟瑛,黄磊.干部间理性维系一团和气的原则与艺术[J].领导科学,2019(3).
- [46] 王淑萍.基于群众路线逻辑的官民互动优化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9(1).
- [47] 汤文颖,范立勇.习近平强化党内监督理论的研究[J].决策探索(下),2019(11).
- [48] 朱文通,张静.西柏坡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与启示[N].河北日报,2019-02-13.
- [49] 张国岚,于怀新,陈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N].河北日报,2019-09-18.
- [50] 刘建民.延安时期陈云从严治党思想探析[J].廉政文化研究,2019(2).
- [51] 张勇.显著优势彰显制度自信[N].河北日报,2019-11-27.
- [52] 伊士国,曹丽丹.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制度实施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2).
- [53] 梁瑞英,田丽.党员领导干部党内法规执行力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某省领导干部为调查样本[J].领导科学,2019(14).
- [54] 伊士国,郭康.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指标体系之构建[J].政法论丛,2019(4).
- [55] 黄云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构的逻辑基础[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56] 刘新圣.党内法规建设:对相关研究的评论与反思[J].新视野,2019(1).
- [57] 王英杰.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N].河北日报,2019-11-29.
- [58] 曹海霞,祁刚利.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N].河北日报,2019-02-01.
- [59] 袁秀,路利云.基层党员干部要具备哪些真本领[J].人民论坛,2019(13).
- [60] 李芬,刘银松.如何炼就学习本领[N].学习时报,2019-08-16.
- [61] 王政燃.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N].河北日报,2019-01-25.
- [62] 王宁.在提高制度执行力上下功夫[N].河北日报,2019-12-18.
- [63] 梁瑞英.“互联网+”助力干部健康成长:原则、路径[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9).
- [64] 赵雪.互联网时代高校“智慧党建”的功能定位和路径探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11).
- [65] 刘赞,郝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党报渠道优势的消解与重构[J].新闻战线,2019(8).

教 育 学

教育理论研究

薛 滩

2019 年度,河北教育专家、学人、一线的工作者,以及关心、支持教育的人们,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建议,撰写成文章、报告、图书,或者作为教育类课题进行广泛调查与研究,抑或在各级各类学术会议上阐述自己的见解或观点。这些对我国教育理论体系和内容进行补充、丰富和完善作用,也在各级各类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起引领或辅助、借鉴、参考作用。当然,也有的观点或成果受到批评或责问,这是教育科学理论发展之路上的必然现象,说明教育研究领域照样执行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河北教育

(一) 农村幼儿园教师

王颖认为,河北省农村地区占地广袤,且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发展学前教育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选取了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 5 个地区共 300 名农村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调查显示,农村幼儿园教师儿童观、课程观、教师观等教育观念存在很多误区,很多的具体观念还较为落后、不够科学。因此,要建立农村幼儿园教师发展专项经费;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准入门槛,努力提高待遇水平;制定具体的帮扶措施,并积极推动落实;加强农村幼儿园教师的自主学习。这样,才能赋予儿童个性化发展的空间,促进儿童快乐成长、全面发展。^[1]

(二) 自闭儿童调查

唐军通过采用以选择题为主,问答题为辅,同时结合实地访问的形式进行了自闭儿童现状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面临的困境,包括父母因子女患病而精神压力巨大,治疗费用高,缺少专业有效的指导帮助孩子康复;社会人士对自闭症的了解主要来源于社交网络上的宣传和慈善公益机构的宣传,大部分人不知道有专业的自闭症康复训练机构;唐山市儿童自闭症的发生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自闭症迄今还是

一个原因不明的人类自身先天缺陷问题,对于自闭症儿童,只有采取终生养护的方式,由社会来为这个特殊人群提供终生的生活保障。建议建立自闭症儿童专业康复训练机构,建立自闭症儿童社会支持体系,完善自闭症儿童志愿服务团队。^[2]

(三) 近代河北高等教育发展

闫志军等认为,近代河北高等教育发展深受京津冀区域关系变化影响,当河北省与京津两市处于“一体化”状态时,河北借助其畿辅地位的优势和天津府较发达的经济实现了高等教育较早、快速发展;当京冀畿辅关系和津冀隶属关系结束后,河北高等教育失去了诸多有利条件,良好发展态势受到抑制。当前京津冀一体化进程重新启动并逐步向纵深推进,对河北高等教育发展具有直接影响;河北高等教育应立足地方、着眼区域,以实现地方和区域两个层面诉求的协调与平衡;京津冀各方需要强化合作机制和法治建设,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3]

(四) 河北高等教育研究分析与提升

李明忠等从研究主体(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研究内容、成果转化)两维度四指标对河北省高等教育研究现状进行调查,发现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数量少、受重视程度不够、建设力度较小;高等教育研究整体实力较弱;高等教育研究主题与河北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求联系不紧密;研究成果未得到合理而有效的转化等。借鉴先进省份成功做法,河北省高等教育研究水平提升策略主要有:重视并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结构布局;以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设立专项课题,促进研究成果的有效转化;加强学术交流与平台建设,有效提升研究水平和服务能力。^[4]

(五) “双一流”背景下河北省重点高校学科发展

李兴国认为,截至 2017 年 5 月,河北省拥

有普通高等学校 121 所,数量居全国第 7 位。然而,在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河北却仅有原先具有“211 工程”高校身份的河北工业大学的 1 个自定学科入选。在客观分析国家首轮“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遴选标准上,参照该标准,分别从教育部学科评估排名、ESI 学科排名、国家科技奖励等三个角度具体分析了河北省骨干高校与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遴选标准的差距,河北省重点高校优势学科冲击,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潜力。面向国家下轮遴选,提出对策建议:集中有限资源重点支持,谋求单项指标精准突破,整合高教资源做大做强,学科优化调整增强内涵,争取国家特殊政策支持。^[5]

(六) 管办评分离高等教育发展

齐艳杰等认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通过深化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明确高等学校功能定位、构建高等学校内部质量评价体系等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还存在高等教育社会贡献力不足、供给需求不平衡、人才结构性流失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应通过强化顶层设计,理顺高校决策机制,打造新型“智库联盟关系”;引入市场机制,坚守人才培养底线,挖掘多元结构性投资可获得性;完善质量评价体系,优化专业类别结构,提升人才培养与就业质量等可操作性策略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6]

(七)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于海认为,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全面深入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也必然成为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尤其是教育教学的改革重点和突破口。河北省高校推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创业教育经验做法,取得一定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今后应采取以下措施:全面准确认识创业教育内涵;做好顶层设计,逐步建立符合自身特点和实际的运行机制;尽快建立起一套适合河北省高校实际情况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培养高水平的专业师资,培育打造“双师型”师资;构建创业实践园;尊重个性发展,调动学生潜能。^[7]

二、教育基础

(一) 杜威教育观误读

傅松涛等认为,百年前杜威来华游历讲学,

是中西文化在中国文化本土主场上的第一次真正的理念碰撞、交流和牵手。强势的原生态中国道德实利主义文化理念对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理念进行了本土化的整体策略主义误读,形成了中国文化色彩浓重的所谓实用主义哲学及其教育理念。实用主义理念的误读和标识在保留和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经世致用的优秀品性的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的急功近利基因找到了精确复制和顽强延续的现代样态和载体。中国文化理念乃至整个社会在误读了的实用主义的濡染、诱导和镜鉴下,走过了曲折迂回、起伏跌宕和升坠激越的百年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社会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今天,冷静地正视、回归和超越误读为实用主义的中西原生态行动主义文化形态的真实基因和内涵,无疑是跳出和避免历史性封闭周期循环,开启一个新社会形态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8]

(二) 深度学习的教学逻辑

朱立明等认为,深度学习是基于学生有效学习本质的教学设计范式,旨在提升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深度学习的教学逻辑由学生认知序列、学科内容特征、学科核心素养、学习效果反思四个要素构成。促进深度学习的教学逻辑的生成策略集中体现在:以“理解与聚焦”为教学主题的价值取向;以“融合与联结”为课堂活动的基本特质;以“创新与实践”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抓手;以“反思与批判”为思维拓展的关键路径;以“发展与进阶”为多元评价的核心视角。^[9]

(三) 微观史学下的教育生活史

刘京京认为,微观史学是在批判与克服新史学弊端下而产生的史学潮流,它关注个别的、具体的事实研究。微观史学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运用“提名法”和“证据范式”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多渠道搜集史料,文字表达运用生动的故事叙事。教育生活史作为一种“接地气”的原生态研究,与微观史学有着类似的价值诉求。教育生活史研究可以借鉴微观史学的研究理路,其研究对象需要关注普通人物的教育生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丰富多元的史料来源,以“问题取向”为研究导向,以生活叙事为主要的表达方式。^[10]

三、教师教育

(一) 教师专业素养测评指标体系

朱立明等认为,随着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与其对接的教师专业素养研究也成为热点,如何对我国教师专业素养进行测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对教师专业素养的结构进行理论构建,利用教师访谈,采用实证检验,初步构建起我国教师专业素养测评指标体系。我国教师专业素养测评指标体系包含教师知识、教师能力、教师情感、教师信念四个维度、18个一级指标和59个二级指标,以此构建的我国教师专业素养测评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教师专业素养,是新时代背景下进行教师专业素养测评的有效工具。^[11]

(二) 幼儿园教师教育观

王颖等认为,幼儿园教师的教育观念是指幼儿园教师所持有的对于教育实践中的幼儿、课程及自身职业角色的认识和看法,内涵是认识层面的心理活动,它是幼儿园教师持有的主观性认识,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幼儿园教师教育观念由儿童观、课程观和教师观三个部分构成。这样可以有针对性地帮助教师进行改善与提升,从而推动教师教育行为的改善以及学前教育质量的提高。^[12]

(三) “幼师国培项目”实践

董莎莎等认为,“幼师国培项目”对于农村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以河北北方学院“幼师国培项目”为对象,分析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总结“幼师国培项目”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具体做法和有效经验:多方统筹,周密组织,做好教师专业发展的服务;多次调研,明确需求,找准教师专业发展的脉络;多维构思,精心设计,奠定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所以,要建立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长效培训机制;注重培训中的交流,搭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以利于后期“幼师国培项目”的顺利开展。^[13]

(四) 大学教师的专业建构与提升

张宛等认为,在推动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诸因素中,专业自我的主动建构处于核心地位,为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专业自我建

构是将自我运用于专业活动之中的实践与反思过程,亦是个体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与标志。对现代大学教师而言,“教学自我”与“科研自我”是其专业自我构成中的两大核心角色,二者在发展中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支撑。唯此二者共同发展,大学教师专业自我建构的完整性与整体水平才能保证。大学教师专业自我的完整建构终将助力其专业发展,同时带来教学品质的提升。^[14]

(五) 高校新入职教师教学角色

薛国风认为,高校教师新入职阶段是其整个教学职业生涯和专业发展的起始阶段,也是其教师教学角色社会化的奠基与初步形成过程。高校新入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一些普遍问题:对教学角色理解不到位导致教学角色社会化意识缺乏,教学与科研关系未得到恰当认识导致教学角色社会化过程减慢,教育教学条件性知识不充分导致教学角色履行不完全,教学技能缺失或运用不合理导致教学角色实践效果差等。本着新入职教师职业可持续性发展以及高校教学质量持续提升与优化的考虑,有必要大力推进其教学角色社会化,可以从平衡教学与科研关系、落实教师传习制度、加强培训的针对性、保障有效的教学环境、重视教学评价的发展性功能等方面进行。^[15]

(六) 新时代教师专业化研究推进

徐莉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领域的国际趋势转向教师实践,带动国内教师教育研究出现同样的趋势,产生出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但国内外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与缺失,突出表现在对教师职业发展过程的规律性了解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国内研究,整体的系统性框架定位不清晰;研究取向局限于教师单一向度,缺少对学生方面及与其学习改进关联环节的拓展和关注;研究品质在层级方面还显不等足。推进教师专业化向深层转向中,应该以研究教师独有的职业知识为取向,着眼于教师专业化与学生学习行为改进的关联性和整体系统性研究,并要与教师培养培训实践相结合。^[16]

(七) 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

侯佛钢等认为,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属于应用型高校教师的核心专业素质能力,其与高校教师管理制度息息相关;现阶段,应用型高校教师管

理制度学术导向、学术考量倾向明显,缺乏对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明确指向与规范举措,成为制约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掣肘。究其原因,以国家评价评估体系为主的外在制度环境诱发应用型高校教师管理制度异化,而内在“学术漂移”倾向引致应用型高校教师管理制度趋向学术本位。提升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存在着国家、地方、高校三个层面的制度变革逻辑,包括创设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外部制度环境,深化省级政府责任落实、扩大应用型高校教师管理自主权,调整和完善应用型高校现行教师管理制度。^[17]

四、幼儿教育

(一) 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变革

范明丽等认为,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包括国家组织领导和管理学前教育事业的基本体系和工作制度,是学前教育体制的核心。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集中领导,分级管理,成立托幼工作领导小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地方负责,分级管理,进一步明确主管部门;政府主导职责回归,地方负责,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 basic 方向是促进公平,保障质量;明确政府主导责任;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合理配置权责,实行绩效管理;充分考虑基本国情,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推进改革。^[18]

(二) 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马晓辉通过梳理 1988—2019 年间我国发布的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政策,分析发现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经过不断修订和发展,明确了定位,细化了目标和要求,拓展了途径与方法,完善了组织保障和师资建设机制,有效推动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区域发展不平衡、教育开展不全面、师资和保障投入不足等情况。建议加强政策促进资源整合、构建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合理投入和分配资源、完善评价和保障机制等工作。^[19]

(三) 国际儿童教育范式的渐变

王宏方认为,蒙台梭利(Montessori)儿童教育范式可以用“热爱儿童”与“早期智力开

发”来概括。而华德福(Waldorf)指出首先要发展出一个健康的精神生命,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更高的认知,让儿童过早地发展读、写、算等认知技能是不健康的。蒙台梭利与华德福儿童教育都表现出了对儿童的尊重与热爱,但在表达方式与侧重点上二者有明显区别。按照蒙台梭利的规则,可以顺利地做很多事,这就是拥有一种范式的好处。华德福教育更注重儿童在每个年龄层的身、心、灵的发展,帮助身处当今社会的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精神之源,同时找到一种与当代生活相适应的形式。重开人类原有的智慧,将生命的真谛与使命,虔诚地延续下去,是值得所有从事教育工作者的人所省所思的。^[20]

(四)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范明丽等认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作为居住区社会基础公共服务设施,既是配置和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有效手段,对为城镇幼儿就近提供学前教育服务、满足城市居民基本学前教育需求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小区配套园建设存在数量不足、质量参差,布局不合理与收费过高等实践困境。在政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明晰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根本属性是公益性和普惠性,明确小区配套幼儿园的产权和管理权归属,并健全小区配套园的组织保障与管理制度。^[21]

刘志慧等认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是破解“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的关键之举,是提升学前教育公益性、普惠性的重要举措,内蕴并体现着公众对学前教育机会公平和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的正义诉求。但是,学前教育不均衡发展以及实践的错综复杂等发展困境限制了正义的充分实现,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推进学前教育立法等共同期盼,在促进学前教育的正义实现中仍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22]

(五) 幼儿园活动案例评析

赵娟等精选了幼儿园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的教学案例,分为小班、中班、大班三个年龄段,每个教育活动案例大多是教学过程中真实发生的教学故事,包括背景介绍、案例描述、案例分析以及总结四个部分。可帮助幼儿教师了解幼儿的学习特点和发展规律,全面提升幼儿教师的教学能力,对幼教工作者共享优秀的教育案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3]

五、基础教育

(一) 新中国 70 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

高小立等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主要经历统收统支、“条块”结合、分级包干、以乡为主、以县为主、省级统筹、城乡统一七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从集权到分权再到集权、从地方财政过渡到中央财政再到公共财政的变革过程,其变迁受到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也深受国家财政体制变革的影响。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划分、完善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健全监督机制是今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24]

(二) 现代德育的属性

赵献梓等认为,现代德育是将社会相通的道德标准与个体自发的道德诉求相结合的教育过程,价值观念趋同、文化积淀共通、教育方向一致等德育发展规律推动二者融合。学校应采取积极措施,推动现代德育内在属性向公共属性的有序转化,加强公共元素对内在属性的改造,进而实现德育公共属性与内在属性的有机融合。^[25]

(三) 教育家型校长培养

刘静等认为,教育家型校长是拥有高尚人格、巨大贡献和持久影响的履行学校领导与管理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科学的培养和合理的培训是教育家型校长成长过程的助推器。基于河北省教育家型校长培养工程的实践,对教育家型校长培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当前培养中存在忽视对教育家人格与精神的培育、欠缺对教育家实践技能的有效提升、缺乏对凝结教育家思想有益的理论体系构建、培训模式有待创新等问题,应从加强对教育家人格与精神的培育、重视教育家实践技能的养成、加强对思想凝练方法的培养、创新培训模式、丰富培训内容等方面入手,对培养模式进行改进。^[26]

(四) 少年儿童校外阵地

薛国凤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校外阵地建设基于国家校外教育事业的政策要求而获得促进与发展,呈现出阵地意识鲜明、阵地构成多样化、阵地建设全民化等特征。总结少年儿童校外阵地 70 年建设与发展经验,主要表现为以政策为指导推进校外阵地建设;强调学校、

家庭和社会资源作为阵地的尽可能协同利用;把开展适合少年儿童身心特点的活动作为阵地建设主要方式等。为此,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将少年儿童校外阵地建设融入国家和地方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以及社区建设等党政总体工作和相关规划中,并在场所、经费、人员等方面给以充分保障和支持。^[27]

(五) 少先队校外阵地

梁明伟等认为,少先队校外阵地是指依托校外资源开展常态化的少先队活动,形成固定的教育场所,包括青少年宫阵地、青少年活动中心阵地、市博物馆阵地、市图书馆阵地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系统化和体系化的少先队校外阵地建设管理模式可以为少年儿童提供完善的校外服务。校外阵地建设管理模式研究是教育学、组织学和管理学的交叉领域,因而可以借鉴企业管理模式的 IOS 管理模型,即“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系统结构+操作方法”,来探讨少先队校外阵地的建设。基于管理主体的不同,将管理模式划分为学校与阵地共建共管模式、政府与阵地共建共管模式和阵地自建自管模式三种。^[28]

(六) 少先队课程整合

薛国凤等认为,少先队活动课属于国家课程。虽然其作为活动课程区别于学科课程,但二者之间也可以架构起紧密的联系。基于对现阶段少先队活动课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思考,将少先队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进行整合,不失为一条新的路径。为此,把握二者整合的政策依据和教育理论依据,厘清二者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途径、课程实施形式、课程评价五方面的整合维度,寻求二者整合的学校内部保障与外部环境支持对策,将有助于在实践中实现少先队活动课与学科课程的有机结合,把少先队活动课真正落到实处。未来,还可以从课程整合、校本课程开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等多种角度建构和完善少先队活动课程实施策略。^[29]

(七) 小学家校协同教育

焦伟婷等认为,在小学阶段学校和家庭教育是两个密切相关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紧密沟通配合,可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目前家校协同教育存在缺乏连续性、内容片面、家庭教育被忽视等问题。所以,要健全家校合作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开办“家长学

校”，提升家庭教育水平；把家校合作技能列为教师培训内容，提升教师家校合作能力；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形成重视家庭教育的风气。^[30]

（八）小学生“影子教育”

张桂荣等认为，“影子教育”在我国通常被称为课外补习。为了更好地了解小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实际情况，以Q市小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小学生“影子教育”的参与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现代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助推、学校教育存在不足、课外辅导灵活多样以及经济和家庭因素等是“影子教育”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大对校外辅导机构的监管、学校积极推行教育教学改革，家长要对子女课外兴趣方面的学习避免盲目性和从众性等建议。既可以解决小学生放学后无人监管的问题，还可以减少低收入家庭的教育经费的支出，满足学生和家的需求，减少校外“影子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31]

六、高等教育

（一）高等教育研究热点

李明忠等通过对2018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教育》转载论文的统计分析发现，文章来源较为广泛，第一作者单位以高校为主，高等教育研究合作趋势逐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治理、大学教师队伍管理、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等四个方面。所以，未来高等教育研究将关注“双一流”建设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大学内部权力重心下移为重点的大学内部治理、一流本科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基本理论、新中国成立70周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回顾与反思等方面。^[32]

（二）科举学跨学科研究

冯用军等认为，科举学开宗立学26年来，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已经从单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演进到跨学科研究的新时代。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科举学研究重要而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有望成为科举学界的主流方法论。在合理界定科举学跨学科研究评价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分析科举学跨学科研究评价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科举学跨学科研究评价的主要技术与核心标准，以期从评价上推

动科举学及其分支学科领域研究的繁花怒放，加速科举学理论大厦迈入“全面施工内部装修”阶段。^[33]

（三）高等教育质量

薛彦华认为，根据教育部于2016年4月发布《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在高等教育高速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务必深刻反思当前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高等教育质量价值取向应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状态。具体实现路径：高等教育的目标管理应与高校的过程管理相统一；要建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34]

（四）基于ESI的一流大学学科建设

王伟伟基于ESI数据库，应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41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建设绩效进行评价。得出以下结论：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绩效差异显著；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绩效与学科规模强正相关，且在0.01水平上显著；多数一流大学在学科建设中存在“重规模、轻质量”问题；评价结果客观验证了国家首轮“双一流”遴选标准的科学性。参考评价结果，将41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分为5个层次，并分类提出发展策略。^[35]

（五）转型高校“观念转变”

闫志军等认为，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改革进程中，改革参与者观念的转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通过质性访谈、问卷调查和DEMATEL量化分析，最后确定主客观两大维度共计12项因素，其中核心因素3项、原因性因素5项、结果性因素4项。转型高校在推动观念转变过程中，应围绕高中心度因素重点解决主要矛盾，根据原因性因素建立动力机制，注意客观维度实践性因素的作用，辩证分析观念转变的具体问题，合理发挥各项因素影响。^[36]

（六）研究生教育改革特征

李明忠等认为，“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奖”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为表彰研究生教育改革典型、深入促进研究生教育创新而设立的一项重要奖项。对三届122项获奖成果进行数据统计发现：获奖成果类型以教育实践类为主；获奖成果所属单位集中于高层次高校；获奖成果完成人以集体合作为主；

获奖成果内容聚焦于单一具体学科。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体现为构建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方式、设置结构合理的课程体系、建设高水平的导师队伍、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四方面。建议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充分发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专业引领作用。^[37]

（七）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

李东伟描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人才培养现状，探讨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模式优化的，梳理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开设背景、12 年发展历程。同时，对培养现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并以第一批、第二批获批建设的 81 所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院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参与式观察、跟踪体验，收集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就业信息、课堂教学录像的方式，采用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提炼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构建框架，并对培养模式内部构成要素及构成要素之间关系进行了论证。同时，针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模式优化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提出了“培养模式优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培养模式优化的结果是多元化模式；多角度需求分析是培养模式优化的逻辑起点；确定具体、明确的培养目标是关键”等基本观点，提出了“五位一体培养目标选取理论”。^[38]

（八）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

齐艳杰认为，世界高等教育逐渐步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以来，世界各国（地区）在加强和完善高等学校内部质量治理体系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新时代的到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的逻辑起点已从应对高校外部环境问责转向内部大学生学习质量的探讨。从价值观转向与重塑的分析视角，运用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范式，探讨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质量治理价值转向的社会背景需求，提出高等学校应基于“至善”的社会身份认知、“多元极化”的思维逻辑、“有限理性”的行动机制、“履行承诺”的评价策略，重塑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行为的价值观体系。^[39]

（九）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合作

李健等认为，校企合作已成为培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校企合作的成效影响着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学质

量。从深化校企合作模式，提高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为出发点，校企合作面临的困境：企业积极性不高，校内、企业双导师指导机制薄弱，管理机制不完善等等。所以，要加强基地建设，提高企业积极性；加强双导师指导机制；完善管理运行机制等。^[40]

（十）“金课”教学设计

崔佳等认为，建设“金课”是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也是强化本科教育的关键。学习内容聚焦是建设“金课”的基础性原则，要求以教学目标为导向，根据不同层次目标进行动态调整；全脑教学是建设“金课”的科学性原则，倡导顺应大脑规律，通过多通道信息输入提高认知加工效率，探究多样化教学和学习方式。^[41]

（十一）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

张栋科认为，行动逻辑反映了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内在规律，决定了其发展的未来路向。调研发现，已有专业群建设实践秉持“产业—专业—就业”的线性行动逻辑。线性逻辑偏差的理论根源是对职业教育适应论的机械解读，其实质在于忽略了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引入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理论，将高职教育视作以专业群作为“代谢生产网络”、以“自我指涉”机制运行的自创生系统，进而将高职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解读视角由单向、被动的静态适应转向互动、主动的动态适应。秉持高职教育内部与外部“双联动”行动逻辑，高职教育与外在环境耦合关系的实质，是以专业群为特色的人才生产网络的复杂性来“化约”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复杂性。^[42]

（十二）高职院校专业设置

侯小雨等认为，专业设置是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关键，应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求。根据国家及河北省统计部门发布的相关数据，利用匹配度和吻合度模型，分析了“十二五”期间河北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状况。结果表明，河北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第三产业的匹配性最好，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差。在高职院校设置的 19 类专业中，1 个专业无人才培养需求，4 个专业人才培养“供过于求”，14 个专业人才培养“供不应求”。提升高职院校服务社会能力，需基于区域产业结构变化调整专业设置，基于供求平衡调控

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数量,基于特色职业院校建设目标设置特色专业,基于质量评价体制机制优化专业结构。^[43]

(十三) 职业院校质量诊断授权评价

孙芳芳在系统分析职业院校质量诊断的背景及内涵的基础上,重点阐释了诊断的理论基础、授权评价作为职业院校质量诊断方法的解释;授权评价的原则;授权评价的工作程序;授权评价的实践效果;授权评价的元评价;职业院校质量诊断环境等问题,试图明确授权评价作为质量诊断工具的适用性,以促进职业院校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进展。^[44]

七、职业教育

(一)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

姜丽杰等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在不断学习借鉴苏联的三段式知识本位学科课程、德国双元制、工作过程导向课程、加拿大能力本位课程等多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职业教育发展实际,探索形成了“宽基础、活模块”课程、项目课程、工作过程系统化等课程开发技术,在中职示范校、高职骨干校建设过程中不断推行与发展,必将突破国外话语垄断,在课程目标上实现多元整合,在多种课程模式上实现更加融合,在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融合上发展综合课程,促进校企“双元课程”实施载体更加融通,优质课程资源建设数字化、共享化。^[45]

(二) “互联网+职业教育”的哲学反思

张栋科等认为,“互联网+职业教育”是以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将云计算、大数据、泛在网络等技术全方位地融入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促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培养质量提升的职业教育新样态。“互联网+职业教育”是以生为本的职业教育教学的全方位改革,包括“云+网+端”的泛在教学环境重构、动态调整的人才培养方案决策、共建共享的优质资源建设机制、微型化与网络化的教学方式创新、大数据支持的数字学业管理与评价等,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泛在网络技术在职业教育教学活动的深入应用,形成校企深度合作、多方协同参与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形态。^[46]

(三) 职业教育质量保障

孙芳芳等认为,评估作为促进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手段,历来受到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高度重视。从“评估”到“诊改”,一度给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带来诸多谜思与困惑,亟待从多角度深度剖析。研究发现,职业教育质量保障范式的变革脉络表现为:质量观影响了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方式方法评估的变革;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诠释了评估与诊改的哲学归因;“内部诊改为主”与“外部问责为辅”的融合发展实为质量保障的未来走向。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从量化到质的评估方法,从理论设想到实践创新进行系统思考,对促进“诊改”理念下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7]

(四) 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

刘京京等认为,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推进职业教育均衡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式。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面临着职业教育信息化观念薄弱、教师信息化素养有待提升、信息化保障机制不够完善、信息化建设内外部条件薄弱等问题。为了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进程,需要强化职业教育信息化理念,增强职业教育信息化的战略地位;重视职业教育信息化基础工作,保障软件、硬件的落实;提高教师信息化水平,打造高素质职业教育信息化队伍;继续推进信息化资源建设,实现信息化均衡发展;创新职业教育信息化推进模式,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48]

(五) 近五年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侯小雨等认为,近五年,我国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表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具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多重功能,职业教育目标与精准扶贫目标存在一致性,职业教育对象与精准扶贫对象存在重合性,职业教育内容与精准扶贫内容存在兼容性,职业教育方式与精准扶贫方法具有协调性。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可运用职业教育政策扶贫、校企合作共同扶贫、送教下乡实地扶贫、创新创业高效扶贫等行动模式,采取完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体系,构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机制,以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精准扶贫,以考核评估提升精准扶贫质量,以终身职业教育实现长效扶贫等具体措施。^[49]

（六）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

李欣旖等采用德尔菲法,调查了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现状,确认存在24项阻力因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合作主体、合作资源6个维度。同时,明确了各阻力因素的阻力强度;采用决策试验和评价实验室研究法,分析了各阻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逻辑关系,明确了各阻力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原因度和中心度。在此基础上,遵循全要素、全方位原则,构建了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政治推动机制、经济拉动机制、社会联动机制、合作行动机制、文化带动机制、资源流动机制。^[50]

（七）京津冀中职教育生均经费

李欣旖等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资源配置均衡性与效率性的有效途径。生均教育事业费是衡量教育投入的重要指标,基于2006—2016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京津冀三地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差距及其与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研究表明,京津冀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存在严重失衡现象,且呈逐步扩大趋势,影响了区域职业教育公平的实现。区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生均中职教育经费支出水平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河北省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弹性高于京津两市。为了推进京津冀中职教育的协同发展,应优化京津冀教育经费投入制度;建立京津冀中职教育财政法规体系;努力拓展中职教育办学经费来源;建立中职教育经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强化中职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考评与监管。^[51]

八、成人教育

（一）从保障学习权到寻求共同利益

刘奉越认为,在迈向学习型社会的进程中,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终身学习视为自身的核心任务,为推动其持续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关于发展成人教育的建议》《学习权利宣言》等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作为终身学习重要构件的成人学习理念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由“保障学习权”向“寻求共同利益”演进,充分体现了UNESCO对其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彰

显着国际成人学习的价值意蕴和未来走向。厘清成人学习理念演进的脉络有助于更为完整深刻地认识国际成人学习发展的进程,也能够为推动我国成人学习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确保《教育2030行动框架》提出的“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使人人可以获得终身学习机会”的总体目标得以实现。^[52]

（二）国内成人学习共同体

刘奉越等认为,近年来共词分析技术在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在文献研究方面更为凸出。运用共词分析的方法,对1998—2018年国内成人学习共同体的研究成果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一定的研究基础形成,发文的核心作者和机构群出现,相对集中的研究范围聚焦,但同时也存在亟须完善之处。为推动国内成人学习共同体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在进一步的深化研究中应拓展研究对象,加强运行机理探讨,构建学术共同体,注重研究范式多元化。^[53]

（三）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

徐莉聚焦于2010—2015年由国家首推的两个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项目:学习型城市建设和开放大学建设。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终身教育的研究背景及现状,创造性地使用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内审视我国的终身教育改革案例,从不同视角对试点改革路径进行审视与反思:要明晰现状:增强对理论滞后的危机和紧迫性认知的自觉性;找准问题:确立走出理论困境的新目标和新方向;选对路径:从深刻总结本土实践经验中走出新道路;精准落实:出台鼓励系统研究的配套政策措施;改革再出发:重组管理机构和重新设计终身教育发展的改革方案。^[54]

（四）成人教育学形态与变革

安英红等认为,从理论主题的站位上看,中国成人教育学科可以划分为“人本”成人教育学、“行本”成人教育学、“实本”成人教育学三种历史形态。这种划分不仅是对学科历史进程的理性回溯,也是对学科未来发展的科学把握。因此,有必要从历史视域对学科的历史形态进行重新解读,且从理论、实践和社会的范畴去寻求学科历史形态划分的依据,并由此对学科现代变革趋势做出前瞻性研判,为现代成人教育学科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的支持。^[55]

（五）新时代成人教育主要矛盾

王颖认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视野出发，就可发现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对优质高效的教育需求与成人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在成人教育结构、成人教育质量、成人教育效益几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政策平衡是化解成人教育主要矛盾的前提，责任平衡是化解成人教育主要矛盾的基础，分配平衡是化解成人教育主要矛盾的关键。这样，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化成人教育的认识，也对我国成人教育的现实与未来发展大有裨益。^[56]

（六）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

胡国华等认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老年教育中的供需矛盾问题日益突出。采用调查法对河北省老年教育供需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在教育需求方面，老年人教育需求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居住类型的老年教育内容需求有所差异；在教育供给方面，存在“供给机构数量不足，主体单一；供给资金不足，资源有限；供给模式陈旧，内容片面；供给政策不完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所以，应该在此基础上，从改革供给主体、增加供给资金、创新供给方式、优化供给内容、整合供给资源、完善供给政策等供给侧方面，为今后老年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提出新路径。^[57]

九、教育技术

（一）SPOC 学习环境建设

高丹阳等认为，在数字智能化时代，建设优质学习环境成为满足“数字土著”需求的重要问题。SPOC 凭借其线上线下相结合、易于管理、促进交流交互的特点迅速成为人们关注、认可的教与学方法。由 SPOC “结课率高”“出勤率高”的优势为高校教学方式改革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基于学习分析处理学习过程数据，发现学习者学习规律及访问课程行为与考试成绩间的关系，SPOC 学习环境的优化的建议：提高教师业务能力，加强学习资源的针对性，突出交互活动的社会性等。^[58]

（二）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研究

高丹阳等认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对

我国教育教学的变革起到了巨大作用。为进一步了解人工智能在我国教育领域中的研究现状，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以 2015—2019 年发表的 264 篇国内人工智能研究文献为对象，运用 CiteSpace V 分析工具进行可视化分析，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梳理并阐述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的研究现状，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人工智能在国内教育中的研究特征为：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中的研究是从理论讨论到实践应用的研究；是从现象到本质的递进研究；是从单一到多元化的研究。^[59]

（三）慕课微视频的交互设计

白然认为，教学微视频是慕课课程资源中的关键要素。教学微视频主要应用于非正式学习环境中的个别化学习，是单向传播的视听媒体，是教师教学行为的视频化表达。慕课教学微视频中的交互本质上是虚拟的师生教学会谈，是操作交互和信息交互的结合。可从三个维度进行慕课教学微视频的交互设计，即利用问题交互引导对话和互动，利用操作交互引导活动的深入参与，利用情感交互形成氛围、传达关怀。恰当的交互设计的完成需要两方面的保障：一是主讲教师前期精细的教学设计，二是视频制作人员的默契配合。^[60]

（四）城乡异地同步课堂教学

高丹阳等认为在教育信息化推动城乡教育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乡村教育落后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立足于网络资源异步教学组织形式和网络同步视频互动教学组织形式，并针对其不足之处，提出了具有“一体、双管、三进”特点的新型网络教学组织形式——城乡异地同步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建议：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亟待提高，城乡合作一体化关系有待加固，乡村同步课程种类亟须丰富，保障机制尚需完善等。^[61]

十、比较教育

（一）美国教师教育选择

白玫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选择性资格项目是一个有关美国教师教育最具争议性和令人困惑的主题。美国教育的新环境、教师职业发展的恶性循环以及传统教师教育项目备受质疑使选择性资格项目的出现成为历史必然。选择性资格项目从一出现就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

注,尽管遭到了大学教师教育者的抵制和专业协会的指责,但仍然在夹缝中生存壮大,逐渐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和认可,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尽管无法预料选择性资格项目是否会消失,但可以肯定的是,与选择性资格项目有关的教师教育问题,如开发高度预测的工具、寻找共同的价值以及追求教育公平等,会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62]

(二) 日本 COE 计划的实施

唐钰滢等认为,日本的 COE 计划是日本文部省为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基地,融合政产学研深度合作,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有机结合的创新之举。COE 计划历经 20 余载,三次修订,在学术导向、学科项目建设、全球化资源运用、公正评估考核等方面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体制构建,为我国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转型的政策支持策略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整合资源分配,重视高校学科建设;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培养创新型人才;完善考核评估机制,激发高水平科学研究。^[63]

(三) 国际文凭组织职业教育项目课程

刘硕等认为,国际文凭组织职业教育项目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业行为以及跨学科、跨文化意识,培养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实现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合,为学生就业创业或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借鉴国际文凭组织职业教育项目课程的经验,我国应加快中职教育的国际化、推进职业教育的终身化、注重课程改革的适应化、促进教育与产业融合化、实现质量评价的体系化。^[64]

(四) 美国社区学院学生学习成果

郝理想等认为,学生学习成果评估逐渐成为美国衡量高等教育机构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社区学院的学生学习成果评估是教育利益相关者从多个维度对学生学习状况开展的系统性和递进性评估过程,其产生与发展受到来自政府高层、社会环境及高等教育评估机构等方面的影响。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教学范式的转变,有助于凸显重视“证据”的教育质量文化氛围,有助于扭转评估实践中偏重考察“输入端”教育教学条件及资源投入指标的倾向。^[65]

(五) 美国 CTE 产教融合质量观

张栋科等认为,“双高计划”下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产教融合实践正在迅速发展,然而如何定义“高质量产教融合”并对其进行有效评估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生涯与技术教育协会发布了《定义高质量商业和社区伙伴关系》报告,该报告从伙伴招募、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形成、伙伴关系活动和附加条件 5 个方面对高质量商业和社区伙伴关系进行了具体阐述。通过分析其制定经验,应从配套持续性的法律支持体系、形成多样性的参与主体结构、完善多元化的主体参与机制、构建系统性的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建构我国“双高计划”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质量观,以期对其实践进行有效评估来提升建设成效。^[66]

十一、中国教育史

(一) 科举学学科文化

冯用军等认为,学科文化是文化的亚文化,既是学科生长的基底本质,也是学科成熟的衡量标志。科举文化是科举学学科文化形成的理论源泉,也是科举学学科建设的文化底蕴。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形成与科举学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双方互为依存、共生共消。在解构文化与学科文化概念基础上,对科举学学科文化的 9 大特性与表征在跨学科研究框架内进行了重构,进而推演学科文化与科举学学科建设的互动关系,提出了科举学学术共同体推进学科建设的文化理路,科举学学科文化建设应注意学科文化环境、学科价值观念、学科模范、学科仪式、学科网络 5 个要素。^[67]

(二) 颜元著述史初探

吴洪成等认为,明清之际实学教育家颜元思想经历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及实学的三次转型;其著作反映了这种思想变化的心路历程,同时又具体体现不同阶段思想的内涵特征。颜元的著述篇章不仅构建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想体系,而且因其与当时程朱理学主流意识形态的抗拒,带有鲜明反传统的理论战斗性力量,开启了近代社会思想的新征程。颜元实学思想的教育学思考:教育全面发展旨趣的追求;重视感性经验而轻视人的理性,重视直接经验而轻视间接经验。毋庸置疑的是颜元的实学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近代西方科学有一定的契合。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一些

人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教育思想的论断。^[68]

（三）傅增湘与北洋女师范学堂

刘京京等认为，清末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浸染，兴办女学呼声的日益高涨，女子教育的创办逐渐走向合法化。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傅增湘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顺应潮流及时事之需，定规立制，亲往招生，创办了北洋女师范学堂，并以学堂监督身份全面主持校务。办学成效斐然，所培养的毕业生在基础教育及其他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傅增湘作为社会转型中的传统知识分子，尽管思想存留着保守的痕迹，但其创办的北洋女师范学堂，开女子师范教育风气之先，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69]

（四）清末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

吴洪成等认为，编译日本学校教科书是清末留日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留日学生成立编译机构团体或机构，如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国学社、湖南编译社以及其他教科书编译机构，从事教育、历史、地理、经济及哲学为主的多种教科书编译活动。这些教科书通过媒体刊载、印行并输入国内，适应清末“兴学”热潮中“新学制”推行的需求，有效解决了教科书匮乏的问题，其对近代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70]

（五）梁漱溟中国特色乡村教育

吴洪成等认为，现代教育家梁漱溟通过山东曹州办学探索、广州乡治教育活动以及河南村治学院实践初步形成的乡村教育理论，成为他从事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的理论导向。基于对乡村建设缘起、内涵及道路选择的思考，梁漱溟主张乡村教育一方面通过订立乡规民约、建设新礼俗，另一方面适度引入西方文化科技知识和组织方式，实现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则在于包括社会非制度化教育在内的大教育。因此，在改造学校教育的同时，应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成人教育等多种形式教育的功能，以汇聚成建设乡村社会的教育合力。其思想观点不仅在民国乡建运动中影响深远，而且对当前乡村教育振兴也有积极意义。^[71]

（六）清华国学院的价值追求

王喜旺等认为，在 20 世纪初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清华国学院（1925—1929）绘制出学

术理想和教育理想的独特蓝图，致力于发展一流学术、培养一流学子，其仅存在 4 年时间，共招收 4 届 70 余名学生。实际完成学业的 68 人中，除 11 人出国深造外，其余 50 多人分散在各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学术理想中，清华国学院注重以研究国学昌明文化，追求学术独立与融汇中西学术；在教育理想中，清华国学院注重寻找教育的文化根基，对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与培养通才硕学念兹在兹。启示：在学术发展中，大学要注重学术、文化与国运的关系，努力追求学术自主性的实现；在教育发展中，大学要注重为教育理想奠定文化根基、致力于教育理想人格向度的回归。^[72]

（七）西南联大学生社会服务

刘京京认为，西南联大学生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优良的文化传统，运用自身的学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以新思想、新文化的知识份子形象，开展了文化启蒙、服务当地、变革社会、改良风气的社会服务活动，发挥了大学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联大学生以爱国活动为主旋律，以学生自治会、各种社团等组织为活动媒介，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活动载体，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服务活动。联大学生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对于学生个体发展而言，促进了个体社会化的转变，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发挥了大学所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推进了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联大学生社会服务活动的价值、活动方式、活动内容、活动载体等内容，可为当今大学生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提供历史镜鉴。^[73]

（八）河北古代高等教育史

吴洪成等认为，河北具有悠久而丰富的文化资源及高等教育办学历史，系统整理、开发河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数千年的宝贵历史遗产，能对河北教育发展现实图谱的认识更加充分，也能明了灿烂多姿的燕赵文化背后多彩、扎实而绵延不绝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基因。以古代书院为中心视角，系统开展对河北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河北古代高等教育的理解，进而丰富河北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体验，对当能为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高等教育崛起之路提供丰富的思想力量及话语价值。时间从春秋战国到清代鸦片战争前 2000 多年，从古代贵

族教育、太学教育到元明清书院的兴起,以及从古代经典教育到八股取士,叙述了河北古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源头及发展,填补了河北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也有助于为河北省高等教育的现实发展路径提供某种历史镜鉴。^[74]

(九) 河北职业教育史

韩兵重点研究了1922年至1948年这个时段河北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定义做了科学界定,对在该时段河北地区出现的与职业教育相类似的教育类型与实体也予以甄别和比较。梳理了河北省职业教育的推广计划,并根据实际办学状况总结出一些计划未能如期完成的原因。详细论述职业教育中经费、师资和学生这三个核心要素。并从人力资源输出、产品输出和技术输出这三个方面论证了民国河北地区职业教育的办学成效。^[75]

十二、外国教育史

(一) 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

田山俊认为,短期高等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兴起的一个新的高等教育类型。作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短期高等教育发轫于19世纪末的美国,二战之后开始在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得到大规模发展,在推动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短期高等教育在发达国家的成功发展积累了如下宝贵经验:明确的立法保障了短期高等教育的地位,政府和社会对短期高等教育提供了扎实的支持,积极促成短期高等教育与传统大学间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以灵活高效的人才培养为短期高等教育赢得发展空间,以持续的改革不断推动短期高等教育的自我更新与完善。^[76]

(二) 日本大学招生考试

李文英等认为,大学招生考试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和择优录取。日本在大学招生考试公平保障方面,统筹设计考试内容和形式,彰显统一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完善组织管理与监督,确保综合素质评价的客观与公正;实施市场调控和政策调控,调控考生录取的区域间均衡;出台政策抵制招生考试腐败,严惩招生录取的舞弊行为;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及选考制度,维护弱势群体的招生权利。日本大学招生考试中的公平保障策略对我

国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和深化高考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77]

(三) 一流大学智库崛起

田山俊等认为,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内高速崛起,成为世界大学智库中的佼佼者,为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众多重要策略。对贝克研究所高速崛起的内在成因进行深度剖析,发现该研究所致力于特色鲜明的研究专长、占据国际化的研究领域、健全完善的人才机制、坚持多渠道的资金筹集和实行多方位的成果推广。贝克研究所高速崛起的历史现象对我国大学智库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发展具有自身优势的特色研究、推进研究领域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储备机制、拓宽资金筹集渠道以及加大研究成果的宣传与推广力度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78]

(四) 日本幕末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教育

朱文富等认为,在教育研究中要辩证地看待吉田松阴的教育成果。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末期,面对幕藩体制危机和民族危机,国内有志之士特别是武士阶级认识到只有改革图强才能使国家摆脱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于是,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改革派武士,手持“尊王攘夷”的改革大旗,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文化,了解世界局势,并开塾授课,通过教育培养革新人才,继承变革图强之志。吉田松阴和松下村塾作为幕末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教育家和私塾,在短暂的教育活动开展中培养出了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幕末维新志士和近代化领导人才,在日本教育史上留下了不朽功绩。^[79]

(薛滩:河北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王颖.河北省农村幼儿园教师教育观念调查研究[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4).
- [2]唐军.唐山市自闭症儿童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9(6).
- [3]闫志军,朱如楠,李佳琪.近代河北高等教育发展机理探析——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视角[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4]李明忠,李盼盼,李静.河北省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分析与提升策略[J].保定学院学报,2019(3).
- [5]李兴国.“双一流”建设下河北省重点高校学科发展对策[J].中国高校科技,2019(9).

- [6] 齐艳杰,胡楠,薛彦华.管办评分离视域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策——以河北省高等教育发展为例[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4).
- [7] 于海.河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问题与对策[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8] 傅松涛,刘亮亮.杜威教育观百年误读:实用主义还是行动主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5).
- [9] 朱立明,冯用军,马云鹏.论深度学习的教学逻辑[J].教育科学,2019(3).
- [10] 刘京京.微观史学视野下的教育生活史研究理路[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19).
- [11] 朱立明,马振,冯用军.我国教师专业素养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J].教育科学研究,2019(12).
- [12] 王颖,肖潇雨.幼儿园教师教育观念的内涵及结构[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4).
- [13] 董莎莎,李玉峰,陈香,张冬霞,刘正泉.教师专业发展视角下“幼师国培项目”的实践探索——以河北北方学院幼师国培项目为例[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 [14] 张宛,王立娟.现代大学教师专业自我建构与教学品质的提升[J].中国高教研究,2019(5).
- [15] 薛国风.高校新入职教师教学角色社会化:概念、问题与建议[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9(1).
- [16] 徐莉.教师专业化向深层转向中的范式缺失——我国新时代教师专业化研究推进策略的着力点探讨[J].当代教育科学,2019(10).
- [17] 侯佛钢,张学敏.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制度困境及其变革逻辑[J].教师教育研究,2019(4).
- [18] 范明丽,洪秀敏.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与方向——改革开放40周年回眸与展望[J].学前教育研究,2019(1).
- [19] 马晓辉.近30年来我国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的发展分析[J].少年儿童研究,2019(10).
- [20] 王宏方.从蒙台梭利到华德福:国际儿童教育范式的渐变[J].世界教育信息,2019(10).
- [21] 范明丽,孙美红,刘志慧.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实践困境及其破解[J].教育观察,2019(6).
- [22] 刘志慧,范明丽.正义视角下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政策的分析[J].教育观察,2019(9).
- [23] 赵娟,沈永霞,王玉.幼儿园教育活动案例评析[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9.
- [24] 高小立,李欢欢.新中国70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探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 [25] 赵献梓,王剑彪.现代德育的公共属性与内在属性融合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25).
- [26] 刘静,刘乐.教育家型校长培养模式的改进策略——基于河北省教育家型校长培养工程的实践[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9(1).
- [27] 薛国风.建国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校外阵地建设的历史与经验——基于政策的视角[J].少年儿童研究,2019(4).
- [28] 梁明伟,陈蜜娜.论少先队校外阵地建设的管理模式[J].少年儿童研究,2019(4).
- [29] 薛国风,江河.少先队活动课与学科课程整合:依据、维度与对策[J].少年儿童研究,2019(11).
- [30] 焦伟婷,郝晓芳.小学家校协同教育存在问题及提升策略研究[J].办公自动化杂志,2019(2).
- [31] 张桂荣,崔万秋,郑国萍,李海英,王晶.小学生“影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 [32] 李明忠,任林芳,王志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分析与未来展望[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5).
- [33] 冯用军,赵雪.科学学跨学科研究评价:原则、技术与标准[J].大学教育科学,2019(1).
- [34] 薛彦华.高等教育质量应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J].大学教育科学,2019(2).
- [35] 王伟伟.基于ESI的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绩效评价及发展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11).
- [36] 闫志军,朱如楠.转型高校“观念转变”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探析——基于转型发展试点院校的调查[J].职教论坛,2019(10).
- [37] 李明忠,李盼盼,王志杰.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奖”为例[J].山东高等教育,2019(6).
- [38] 李东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人才培养现状与优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9.
- [39] 齐艳杰.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的价值转向与重塑——基于组织行为学的分析与探讨[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3).
- [40] 李健,王春梅,陶颖,苏泽盛.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深化校企合作的困境与对策[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9(3).
- [41] 崔佳,宋耀武.“金课”的教学设计原则探究[J].中国高等教育,2019(3).
- [42] 张栋科.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行动逻辑反思与重构——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9(1).
- [43] 侯小雨,曾姗,闫志利.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问题及优化措施——以河北省为例[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9(1).
- [44] 孙芳芳.职业院校质量诊断授权评价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9.
- [45] 姜丽杰,宁永红,巩建婷.建国7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引进、改造及创新[J].职业技术教育,2019(16).
- [46] 张栋科,冯瑞,刘舒畅.“互联网+职业教育”的哲学反思与应用启示[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9(2).
- [47] 孙芳芳,闫志利.评估与诊改: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理论

- 演进与范式融合[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3).
- [48]刘京京,马静仪.我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问题与实施路径[J].教育与职业,2019(5).
- [49]侯小雨,闫志利.近五年我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研究与实践进展[J].职教通讯,2019(5).
- [50]李欣旂,闫志利.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阻力因素与动力机制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9(7).
- [51]李欣旂,刘硕,闫志利.协同发展视域下京津冀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差距研究[J].当代职业教育,2019(1).
- [52]刘奉越.从保障学习权到寻求共同利益:成人学习理念的演进——基于 UNESCO 报告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9(23).
- [53]刘奉越,符莘悦.国内成人学习共同体研究态势与发展趋向的共词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19(5).
- [54]徐莉.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研究(2010—2015)[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
- [55]安英红,张钊.中国成人教育学的历史形态与现代变革[J].中国成人教育,2019(1).
- [56]王颖.新时代成人教育主要矛盾的逻辑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2019(3).
- [57]胡国华,刘春惠.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与发展研究——基于河北省老年教育的供需分析[J].继续教育研究,2019(5).
- [58]高丹阳,赵燕燕.基于学习分析的 SPOC 学习环境建设探究[J].中小学电教,2019(1).
- [59]高丹阳,张双梅.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研究现状与特征分析[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9(13).
- [60]白然.慕课教学微视频的交互设计策略[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3).
- [61]高丹阳,张泽晖,郭伟.城乡异地同步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提出与实践[J].教育现代技术,2019(5).
- [62]白玫.试析美国教师教育选择性资格项目[J].比较教育研究,2019(4).
- [63]唐钰滢,赵子剑.日本 COE 计划的实施及其启示——基于双一流背景下高校转型的政策支持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64]刘硕,李欣旂,闫志利.国际文凭组织职业教育项目课程的特点及启示[J].职业教育研究,2019(6).
- [65]郝理想,吴芳.美国社区学院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的缘起、实践与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36).
- [66]张栋科,冯瑞,吴婷婷.美国 CTE 产教融合质量观构建的经验与启示——基于 ACTE 报告《定义高质量商业和社区伙伴关系》的解读[J].职教论坛,2019(12).
- [67]冯用军,赵雪.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形成与科举学学科建设研究[J].教育与考试,2019(4).
- [68]吴洪成,翟蒙毅.学术思想视野下颜元著述史初探[J].社会科学论坛,2019(6).
- [69]刘京京,付延.傅增湘与北洋女师范学堂的创办[J].社会科学论坛,2019(6).
- [70]吴洪成,蔺士琦.清末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活动述论[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9(5).
- [71]吴洪成,蔡晓莉.梁漱溟中国特色乡村教育理论的建构及其现实意义[J].教育史研究,2019(1).
- [72]王喜旺,张双婷.学术理想和教育理想:清华国学院的价值追求及其当代意义[J].当代教育科学,2019(5).
- [73]刘京京.西南联大学生社会服务活动的类型、特征及影响[J].高教探索,2019(5).
- [74]吴洪成,任志惠.河北古代高等教育史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9.
- [75]韩兵.河北职业教育史(1922—194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76]田山俊.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J].高教探索,2019(3).
- [77]李文英,李冠男.日本大学招生考试中的公平保障策略及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19(8).
- [78]田山俊,陆军.一流大学智库高速崛起的内在成因——以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为例[J].现代教育管理,2019年(8).
- [79]朱文富,郝雪.日本幕末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教育管理研究

杨今宁

2019年河北省的专家学者在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对教育宏观管理、高等教育管理、职成教育管理、基础教育管理等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若干的颇具学术水准理论观点和有效的政策建议。其中对职业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基础教育的校外教育

等方面的关注较多,成为了河北省今年相关研究中的新亮点。

一、教育宏观管理

(一) 终身教育研究

徐莉基于首轮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项

目,通过对试点单位: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济南市4个城市试点项目成效的考察,认为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与完善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该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学习型城市建设试点项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成效为:政府的意愿与理念和制度建设成效突出、终身学习平台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成绩突出、学习文化和新型组织萌生。认为学习型城市建设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势,是一种最有利于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实践形式,也是最适合中国用以推进终身教育的一种策略。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中国探索,开创了远远超出想象和预期的本土理论新元素,对新时代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价值凸显,亟待引起重视和系统的研究关注。^[1]

(二) 教师发展研究

徐莉对教师专业化研究推进策略的着力点进行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领域的国际趋势转向教师实践,带动国内教师教育研究出现同样的趋势,产生出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但国内外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与缺失,突出表现在,对教师职业发展过程的规律性了解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国内研究,整体的系统性框架定位不清晰;研究取向局限于教师单一向度,缺少对学生方面及与其学习改进关联环节的拓展和关注;研究品质在层级方面还显不足。推进教师专业化向深层转向中,应该以研究教师独有的职业知识为取向,着眼于教师专业化与学生学习行为改进的关联性和整体系统性研究,并要与教师培养培训实践相结合。^[2]

(三) 教育管理史

吴洪成、岳五妹基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了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认为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旨在借助农村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解决农民的愚穷弱私问题,改善农村社会落后的面貌,改变广大劳苦大众的命运。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是振兴乡村,核心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对“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切实的借鉴价值,为我国乡村文化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启迪。^[3]

吴洪成、辛然对现代实业家卢作孚教育社会论进行了研究。指出现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卢作孚将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深深植根于中国现实问题,并贯穿于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和民生公司建设的始终,在具体丰富的实践活动中逐渐深化。卢作孚希望借助教育,进行社会改革,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他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社会论思想:教育目的涵括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教育与社会之间互相依存且彼此促进,以及教育在乡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等。^[4]

(四) 国外教育管理

傅松涛、刘亮亮研究指出,我国对杜威教育观是“实用主义”还是“行动主义”存在百年误读。百年前杜威来华游历讲学,是中西文化在中国文化本土主场上的第一次真正的理念碰撞、交流和牵手。强势的原生态中国道德实利主义文化理念对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理念进行了本土化的整体策略主义误读,形成了中国文化色彩浓重的所谓实用主义哲学及其教育理念。误读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话语误译:行动贻化实用;二是主旨误解:目的消解方法;三是现实误判:实利替代民主;四是建构误用:问题遮蔽主义。实用主义理念的误读和标识在保留和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经世致用的优秀品性的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的急功近利基因找到了精确复制和顽强延续的现代样态和载体。中国文化理念乃至整个社会在误读了的实用主义的濡染、诱导和镜鉴下,走过了曲折迂回、起伏跌宕和升坠激越的百年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社会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今天,冷静地正视、回归和超越误读为实用主义的中西原生态行动主义文化形态的真实基因和内涵,无疑是跳出和避免历史性封闭周期循环,开启一个新社会形态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5]

白玫对美国教师教育选择性资格项目进行了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选择性资格项目是一个有关美国教师教育最具争议性和令人困惑的主题。其争论主要在于:教师职业的定位是手艺还是专业;教师职业的主体是潜在的教师人口还是教育学院毕业生;教师职业的依托是学科知识还是专业知识;教师职业的通路是传统路径还是选择性路径。然而美国教育的新环

境、教师职业发展的恶性循环以及传统教师教育项目备受质疑,使选择性资格项目的出现成为历史必然。选择性资格项目尽管遭到了大学教师教育者的抵制和专业协会的指责,但仍然在夹缝中生存壮大,逐渐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和认可,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尽管无法预料选择性资格项目是否会消失,但可以肯定的是,与选择性资格项目有关的教师教育问题,如开发高度预测的工具、寻找共同的价值以及追求教育公平等,会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6]

二、高等教育管理

(一) 高等教育办学方略

李兴国进行了“双一流”建设下河北省重点高校学科发展对策研究。他客观分析了国家首轮“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遴选标准,参照该标准,分别从教育部学科评估排名、ESI 学科排名、国家科技奖励等三个角度具体分析了河北省骨干高校与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遴选标准的差距和河北省重点高校优势学科冲击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潜力。面向国家下轮遴选,提出河北省“双一流”建设的对策建议:集中有限资源重点支持、谋求单项指标精准突破、整合高教资源做大做强、学科优化调整增强内涵,争取国家特殊政策支持。^[7]

梁捍东、牟文谦对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既需要努力发挥教师的德行示范作用,又需要不断激发大学生自主践行的内在动力;既需要协同优化高校各种载体,又需要发挥高校之间、高校与家庭社会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多方联动作用。教师德行示范机制包括:培育教师核心价值观,以之引领高校教师德正行范;树立师德榜样,积极发挥其正向激励功能;优化高校教师道德素质结构,增强其德行示范功效。学生自主践行机制包括:增强大学生“立德树人”的自觉性;积极优化大学生“立德树人”的日常生活空间。载体协同优化机制包括:目标一致是各载体协同优化的基点;功能吻合是各载体协同优化的关键;运行协调是各载体协同优化的保障。高校、家庭、政府、社会联动机制包括: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高校与家庭之间的及时沟通;高校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高校

与社会之间的积极互动。积极构建并完善其多维一体的实现机制,是推进高校立德树人实践创新、全面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8]

闫志军、朱如楠基于转型发展试点院校的调查,探索转型高校“观念转变”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发现对于每次重大改革来说,观念转变都绝非易事。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改革进程中,改革参与者观念的转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他们通过质性访谈、问卷调查和 DEMATEL 量化分析,最后确定主客观两大维度共计 12 项因素,其中核心因素 3 项、原因性因素 5 项、结果性因素 4 项。指出转型高校在推动观念转变过程中,应围绕高中心度因素重点解决主要矛盾,根据原因性因素建立动力机制,注意客观维度实践性因素的作用,辩证分析观念转变的具体问题,合理发挥各项因素影响。^[9]

王喜旺、张双婷探究了清华国学院的价值追求及其当代意义。指出在 20 世纪初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清华国学院绘制出学术理想和教育理想的独特蓝图。在学术理想中,清华国学院注重以研究国学昌明文化,追求学术独立与融汇中西学术;在教育理想中,清华国学院注重寻找教育的文化根基,对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与培养通才硕学。其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学术发展中,大学要注重学术、文化与国运的关系,努力追求学术自主性的实现;在教育发展中,大学要注重为教育理想奠定文化根基、致力于教育理想人格向度的回归。^[10]

(二) 高等教育学术管理

齐艳杰基于组织行为学,分析与探讨了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的价值转向与重塑。指出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的逻辑起点,已从应对高校外部环境问责转向内部大学生学习质量的探讨。她从价值观转向与重塑的分析视角,运用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范式,探讨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质量治理价值转向的社会背景需求,提出高等学校应基于“至善”的社会身份认知、“多元极化”的思维逻辑、“有限理性”的行动机制、“履行承诺”的评价策略,重塑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行为的价值观体系。^[11]

李明忠、李盼盼、李静对河北省高等教育研

究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河北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亟须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专业智力支持。他们从研究主体(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研究内容、成果转化)两维度四指标对河北省高等教育研究现状进行调查,发现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数量少、受重视程度不够、建设力度较小;高等教育研究整体实力较弱;高等教育研究主题与河北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求联系不紧密;研究成果未得到合理而有效的转化。借鉴先进省份成功做法,河北省高等教育研究水平提升策略主要有:重视并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结构布局;以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设立专项课题,促进研究成果的有效转化;加强学术交流与平台建设,有效提升研究水平和服务能力。^[12]

李明忠、任林芳、王志杰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分析。他们通过对2018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教育》转载论文的统计分析发现,文章来源较为广泛、第一作者单位以高校为主、高等教育研究合作趋势逐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治理、大学教师队伍管理、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4个方面。他们认为,未来高等教育研究将关注“双一流”建设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大学内部权力重心下移为重点的大学内部治理、一流本科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基本理论、新中国成立70周年高等育改革发展的回顾与反思等方面。^[13]

(三) 高等教育教师管理

张宛、王立娟对现代大学教师专业自我建构与教学品质提升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在推动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诸因素中,专业自我的主动建构处于核心地位,为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专业自我建构是将自我运用于专业活动之中的实践与反思过程,亦是个体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与标志。对现代大学教师而言,“教学自我”与“科研自我”是其专业自我构成中的两大核心角色,二者在发展中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支撑。唯此二者共同发展,大学教师专业自我建构的完整性与整体水平才能保证。大学教师专业自我的完整建构终将助力其专业发展,同时带来教学品质的提升。^[14]

薛国凤对高校新入职教师教学角色社会化进

行了研究,指出高校教师新入职阶段是其整个教学职业生涯和专业发展的起始阶段,也是其教师教学角色社会化的奠基与初步形成过程。高校新入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一些普遍问题:对教学角色理解不到位导致教学角色社会化意识缺乏,教学与科研关系未得到恰当认识导致教学角色社会化过程减慢,教育教学条件性知识不充分导致教学角色履行不完全,教学技能缺失或运用不合理导致教学角色实践效果差。本着新入职教师职业可持续性发展以及高校教学质量持续提升与优化的考虑,有必要大力推进其教学角色社会化,可以从平衡教学与科研关系、落实教师传习制度、加强培训的针对性、保障有效的教学环境、重视教学评价的发展性功能等方面进行。^[15]

侯佛钢、张学敏对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制度困境进行了研究。指出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属于应用型高校教师的核心专业素质能力,其与高校教师管理制度息息相关;现阶段,应用型高校教师管理制度学术导向、学术考量倾向明显,缺乏对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明确指向与规范举措,成为制约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掣肘。究其原因,以国家评价评估体系为主的外在制度环境诱发应用型高校教师管理制度异化,而内在“学术漂移”倾向引致应用型高校教师管理制度趋向学术本位。提升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存在着国家、地方、高校三个层面的制度变革逻辑,包括创设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外部制度环境,深化省级政府责任落实、扩大应用型高校教师管理自主权,调整和完善应用型高校现行教师管理制度。^[16]

(四) 高校学生管理

孟庆强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背景下学生发展评价变革进行了研究。指出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已经成为继一流学科和一流高校建设战略后国家层面提出的又一高等教育发展计划,其本质在于以专业建设为抓手实现培养一流专业人才的根本目标。学生发展评价变革与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两者的关系是:学生发展评价变革是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基本内容;学生发展评价变革是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基本方式;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是学生发展评价变革的重要动力;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是学生发展评价变革的重要目标。现有专业人才培养中学生发展评价的突出问题是:学生发展评价理

念偏差：工具导向的结果评价；学生发展评价内容单一：知识考查的单维评价；学生发展评价方式陈旧：纸笔测验的静态评价；学生发展评价标准滞后：分数优先的量化评价。提出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下学生发展评价变革的路径是：从结果评价转向过程评价：实现评价理念由工具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移；从单维评价转向多维评价：实现评价内容由知识考查到能力考查的转换；从静态评价转向动态评价：实现评价方式由纸笔测验到情景体验的转变；从量化评价转向画像评价：实现评价标准由分数优先到素质发展的转型。^[17]

郭伏良、李文文以河北大学为例，对影响外国留学生社团建设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留学生社团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校园社团资源的基础、指导教师的付出以及留学生自身的诉求。政策支持是留学生社团的发展保障，校园社团资源是留学生社团的存在基础，指导教师是留学生社团建设的关键，来华留学生是留学生社团的活动主体。这四大因素共同促进留学生社团的建设与成长。留学生社团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是社团管理、学校支持力度、社团建设以及留学生自身方面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18]

（五）高等教育史

闫志军、朱如楠、李佳琪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视角，对近代河北高等教育发展机理进行了探析，指出近代河北高等教育发展深受京津冀区域关系变化影响。当河北省与京津两市处于“一体化”状态时，河北借助其畿辅地位的优势和天津府较发达的经济实现了高等教育较早、快速发展；当京冀畿辅关系和津冀隶属关系结束后，河北高等教育失去了诸多有利条件，良好发展态势受到抑制。当前京津冀一体化进程重新启动并逐步向纵深推进，对河北高等教育发展具有直接影响；河北高等教育应立足地方、着眼区域，以实现地方和区域两个层面诉求的协调与平衡；京津冀各方需要强化合作机制和法治建设，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19]

刘京京对西南联大学生社会服务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西南联大学生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优良的文化传统，运用自身的学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以新思想、新文化的知识份子形象，开展了文化启蒙、服务当地、变革社会、改良风

气的社会服务活动，发挥了大学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联大学生以爱国活动为主旋律，以学生自治会、各种社团等组织为活动媒介，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活动载体，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服务活动。联大学生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对于学生个体发展而言，促进了个体社会化的转变，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发挥了大学所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推进了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联大学生社会服务活动的价值、活动方式、活动内容、活动载体等内容，可为当今我国大学生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提供历史镜鉴。^[20]

刘京京、付延研究了傅增湘与北洋女师范学堂的创办。指出清末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浸染，兴办女学呼声的日益高涨，女子教育的创办逐渐走向合法化。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傅增湘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顺应潮流及时事之需，定规立制，亲往招生，创办了北洋女师范学堂，并以学堂监督身份全面主持校务，办学成效斐然，所培养的毕业生在基础教育及其他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傅增湘作为社会转型中的传统知识分子，其创办的北洋女师范学堂，开女子师范教育风气之先，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21]

（六）国外高等教育

李欣旖、闫志利以格拉茨大学、克恩腾应用技术大学为例，研究奥地利高校创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经验。指出奥地利高校内部创业教育实施体系包括课程体系、学分体系、内容体系、实践体系、教师体系及认证体系6个方面，体现出诸多特点。奥地利高校重视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建设，与政府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建立了永久合作关系，为学生创业实践提供优质服务。他们分析克恩腾应用技术大学情况发现，奥地利高校外部创业教育支持体系包括创业研究、创业实践、创业辅导、设施服务4个方面。^[22]

田山俊研究了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短期高等教育发起于19世纪末的美国，二战之后开始在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得到大规模发展，在推动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短期高等教育在发达国家的成功发展积累了如下宝贵经验：明确的立法保障了短期高等教育

的地位,政府和社会对短期高等教育提供了扎实的支持,积极促成短期高等教育与传统大学间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以灵活高效的人才培养为短期高等教育赢得发展空间,以持续的改革不断推动短期高等教育的自我更新与完善。^[23]

郝理想、吴芳对美国社区学院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演进逻辑及社会基础进行了研究。指出美国社区学院的教育质量评估制度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重视客观测量、强调目标描述、探索价值判断、建构改进协商和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等阶段,评估方式也从单一的质量认证发展到学生学习参与度评估和学习成果评估等多元并存的局面。评估制度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受不同社会力量和要素的影响,是多种评估主体在利益需求驱动下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系统中的多个部门和利益群体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形成复杂的群体互动场域,具有社会需求驱动的特征。^[24]

钱玲、徐辉富、郭伟基于 CHLOE3 报告,对美国在线教育进行了分析。指出美国在线教育发展全景报告 CHLOE,从美国高等教育管理视角全景式地调查了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构在线教育的策略、影响和发展趋势。报告数据源于各样本高校的首席在线教育领导,其视角可为人们了解美国在线教育的发展与趋势提供直观的认识。报告的主体内容是美国高校决策者关心的问题:在线教育的注册趋势和在线教学论、在线教育的管理策略、在线教育的质量保证。他们对美国在线教育的实践、影响与趋势的分析,将对我国高校在线教育管理和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25]

孙昭磊、冯琳对欧洲学分转换与积累系统的发展历程及运行机制进行研究。指出创立于 1989 年的欧洲学分转换与积累系统经历了萌芽、确立、推广和完善四个阶段,从仅具有转换单一功能发展到具有转换与积累双重功能,从只为高等教育服务拓展到为终身教育服务,在欧盟教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分析欧洲学分转换与积累系统的运行机制,剖析其关键要素、运行流程、证明文件等,对于中国区域学分银行的建设具有如下启示:加强法律政策保障、着眼组织保障、强化校企合作、开发系统平台和完善核心要素。^[26]

唐钰滢、赵子剑基于双一流背景下高校转型

的政策支持研究,分析了日本 COE 计划。指出日本的 COE 计划是日本文部省为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基地,融合政产学研高度合作,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有机结合的创新之举。COE 计划历经 20 余载,三次修订,在学术导向、学科项目建设、全球化资源运用、公正评估考核等方面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体制构建,为我国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转型的政策支持策略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27]

李文英、李冠男研究了日本大学招生考试中的公平保障策略。指出日本在大学招生考试公平保障方面,统筹设计考试内容和形式,彰显统一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完善组织管理与监督,确保综合素质评价的客观与公正;实施市场调控和政策调控,调控考生录取的区域间均衡;出台政策抵制招生考试腐败,严惩招生录取的舞弊行为;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及选考制度,维护弱势群体的招生权利。^[28]

田山俊、陆军以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为例,研究一流大学智库高速崛起的内在成因。指出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内高速崛起,成为世界大学智库中的佼佼者,为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众多重要策略。对贝克研究所高速崛起的内在成因进行深度剖析,发现该研究所致力于特色鲜明的研究专长、占据国际化的研究领域、健全完善的人才机制、坚持多渠道的资金筹集和实行多方位的成果推广。贝克研究所高速崛起的历史现象对我国大学智库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发展具有自身优势的特色研究、推进研究领域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储备机制、拓宽资金筹集渠道以及加大研究成果的宣传与推广力度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9]

三、职业、成人教育管理

(一) 职业教育办学方略

孙芳芳、袁梦琦等对我国职业基础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我国职业基础教育存在明显缺位,表现为相对于职业专业教育而言,我国对职业基础教育的研究极少,即我国基础教育“学术性”丰盈有余、“职业性”严重不足,导致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弱化甚至处于缺位状态。基于职业教育发展导向偏移、职业教育的工具理性危机、职业选择错位严重等现实问题,困境之

源追溯至尚道轻技的文化根源、对人才职业成长规律的认知缺失、传统主导课程的霸权等因素。^[30]回归职业启蒙教育,既是职业教育“经济决定论”发展模式招致批判后的一种觉醒,又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回归基础和制度创新的必然使命。作为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要研判之一,职业启蒙教育可谓绘制职业教育未来发展图景的新的逻辑基点。但问题在于,当前的教育呈现出“基础教育的职业性”和“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双重缺失现象,具体表现在中小学教育的职业性缺失、职业学校的基础教育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过度与不足几个方面,使其愈发背离杜威提倡的“通过职业而教育”的本质和培养完整的人的教育价值。基于此,推进职业启蒙教育需要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弘扬与认知;建立普职融合的职业体验机制,关注情境性学习,深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系;以社会运行为背景,开发以软技能为核心的职业体验项目;建立管理、激励及综合评价制度。^[31]

张栋科、冯瑞、刘舒畅对“互联网+职业教育”进行了哲学反思。指出“互联网+职业教育”是以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将云计算、大数据、泛在网络等技术全方位地融入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促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培养质量提升的职业教育新样态。“互联网+职业教育”是以生为本的职业教育教学的全方位改革,包括“云+网+端”的泛在教学环境重构、动态调整的人才培养方案决策、共建共享的优质资源建设机制、微型化与网络化的教学方式创新、大数据支持的数字学业管理与评价等,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泛在网络技术在职业教育教学活动的深入应用,形成校企深度合作、多方协同参与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形态。^[32]刘京京、马静仪指出,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面临着职业教育信息化观念薄弱、教师信息化素养有待提升、信息化保障机制不够完善、信息化建设内外部条件薄弱等问题。为了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进程,需要强化职业教育信息化理念,增强职业教育信息化的战略地位;重视职业教育信息化基础工作,保障软件、硬件的落实;提高教师信息化水平,打造高素质职业教育信息化队伍;继续推进信息化资源建设,实现信息化均衡发展;创新

职业教育信息化推进模式,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33]

(二) 区域职业教育发展

张怡真、李玥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对河北省高职院校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河北省高职院校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挑战,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省高职院校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从河北省高职院校的纵向发展来看,存在着办学底子薄、专业重复多、布局不合理、合作程度浅等困境。在与京、津地区横向比较中,又存在着生师比高、优质院校资源少、办学资源匮乏等问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力度,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校企合作办学;另一方面,河北省高职院校应利用政策优势,整合区域教育资源,突出院校特色,提高办学质量,加强校企合作,扩充院校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34]

李欣旖、闫志利对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阻力因素与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采用德尔菲法,调查了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现状,确认存在24项阻力因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合作主体、合作资源6个维度。同时,明确了各阻力因素的阻力强度;采用决策试验和评价实验室研究法,分析了各阻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逻辑关系,明确了各阻力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原因度和中心度。在此基础上,遵循全要素、全方位原则,构建了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政治推动机制、经济拉动机制、社会联动机制、合作行动机制、文化带动机制、资源流动机制。^[35]

李欣旖、刘硕、闫志利在协同发展视域下,对京津冀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差距进行了研究。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资源配置均衡性与效率性的有效途径。他们基于2006—2016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了京津冀三地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差距及其与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研究表明,京津冀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存在严重失衡现象,且呈逐步扩大趋势,影响了区域职业教育公平的实现。区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生均中职教育经费支出水平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河北省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弹性高于京津

两市。为了推进京津冀中职教育的协同发展,应优化京津冀教育经费投入制度;建立京津冀中职教育财政法规体系;努力拓展中职教育办学经费来源;建立中职教育经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强化中职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考评与监管。^[36]

(三) 中等职业教育管理

辛夏夏、曾姗、闫志利在河北省中职学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适应性方面进行了研究。指出优化中职学校专业设置有利于满足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他们根据河北省政府发布的相关数据资料,明确河北省中职学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现状,并分析两者的匹配度和吻合度。结果表明,河北省中职学校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匹配度较差,且存在部分“供求失衡”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需遵循适应性、稳定性和效益性原则,基于产业结构变化趋势调整专业设置,基于专业人才供求平衡调整专业设置,基于现实提升中职学校专业设置水平,基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设置特色专业,基于完善质量评价体制优化专业结构。^[37]

李欣旖、玄远程、闫志利以河北省迁安市职教中心为例,对中职学校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他们分析近五年迁安市职教中心专业结构与迁安市产业结构的对接情况,发现迁安市职教中心专业结构、新生规模与产业结构的吻合度较低、偏离度较大,存在第一产业人才培养缺失、第三产业人才培养匮乏、第二产业人才培养过剩的状况。提升迁安市职教中心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需要开设第一产业相关专业,改革第二产业相关专业,增设第二产业相关专业。实现中职学校专业结构随产业发展的动态调整,需要构建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学校内部主导机制以及三方协同治理机制。^[38]

(四) 成人教育发展战略

闫树涛对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成人与继续教育发展进行阶段性划分,这既是回顾演进历程、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途径,也是分析变迁规律、把握本土特色的重要手段,更是立足当下实际、推进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据。70 年来成人与继续教育发展主要经历了起步发展、快速发展、转型发展、深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五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39]

(五) 农村职业教育管理

侯小雨、闫志利通过对近五年我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进行分析,指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具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多重功能,职业教育目标与精准扶贫目标存在一致性,职业教育对象与精准扶贫对象存在重合性,职业教育内容与精准扶贫内容存在兼容性,职业教育方式与精准扶贫方法具有协调性。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可运用职业教育政策扶贫、校企合作共同扶贫、送教下乡实地扶贫、创新创业高效扶贫等行动模式,采取完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体系,构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机制,以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精准扶贫,以考核评估提升精准扶贫质量,以终身职业教育实现长效扶贫等具体措施。^[40]

刘顺霞、辛夏夏、闫志利对河南省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优化及路径选择进行了研究,指出河南省综合运用多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使贫困户持续减少,贫困人口持续下降,脱贫攻坚从“全面推进”转入“集中主攻”阶段。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将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强调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河南省应扩张扶贫视阈,强化扶贫行动,拓展扶贫主体,壮大扶贫队伍,延续扶贫效能。建议完善职教体系,实施常态精准扶贫,强化考核评价,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终身职业教育,从而优化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为新时期河南省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拓展路径,确保 2020 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41]

刘顺霞、侯小雨、闫志利对河南省贫困人口学历特征及培训需求进行了调查。他们在河南省选择了三个贫困县,调查了贫困人口的学历特征及培训需求情况,发现河南省贫困人口多为初中及以下学历,不同学历贫困人口对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机构、培训教师、培训地点、培训时间、培训时长等需求均存在差异。实施精准培训扶贫,需精准调查培训需求,依据培训需求优化培训要素,持续提升培训要素质量水平,强化培训活动管理,健全培训效果评价追踪制度。^[42]

(六) 职业教育教学管理

姜丽杰、宁永红、巩建婷对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他

们指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在不断学习借鉴苏联的三段式知识本位学科课程、德国双元制、工作过程导向课程、加拿大能力本位课程等多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职业教育发展实际,探索形成了“宽基础、活模块”课程、项目课程、工作过程系统化等课程开发技术,在中职示范校、高职骨干校建设过程中不断推行与发展,必将突破国外话语垄断,在课程目标上实现多元整合,在多种课程模式上实现更加融合,在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融合上发展综合课程,促进校企“双元课程”实施载体更加融通,优质课程资源建设数字化、共享化。^[43]

侯小雨、曾姗、闫志利以河北省为例,对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选取河北省为案例省份,根据国家及河北省统计部门发布的相关数据,利用匹配度和吻合度模型,分析了“十二五”期间河北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状况。结果表明,河北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第三产业的匹配性最好,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差。在高职院校设置的 19 类专业中,1 个专业无人才培养需求,4 个专业人才培养“供过于求”,14 个专业人才培养“供不应求”。提升高职院校服务社会能力,需基于区域产业结构变化调整专业设置,基于供求平衡调控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数量,基于特色职业院校建设目标设置特色专业,基于质量评价体制机制优化专业结构。^[44]

张栋科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视角,对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行动逻辑进行反思。他指出行动逻辑反映了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内在规律,决定了其发展的未来路向。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已有专业群建设实践秉持“产业—专业—就业”的线性行动逻辑。线性逻辑偏差的理论根源是对职业教育适应论的机械解读,其实质在于忽略了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由此,引入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理论,将高职教育视作以专业群作为“代谢生产网络”、以“自我指涉”机制运行的自创生系统,进而将高职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解读视角由单向、被动的静态适应转向互动、主动的动态适应。“自我指涉”机制背后是高职教育内部与外部的“双联动”行动逻辑。秉持“双联动”行动逻辑,高职教育与外在环境耦合关系

的实质,是以专业群为特色的人才生产网络的复杂性来“化约”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复杂性。^[45]张栋科、李园园、冯瑞认为职业生涯导向性应是高职教育的本质属性,也是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价值取向。职业生涯导向下专业群建设的实质是促进“人才供需信息”与“个人生涯信息”的对接来为其提供决策依据,但需要解决高职院校外部联动的“时滞效应”与内部联动的“孤岛现象”等问题。因此,基于“互联网+”建构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追踪平台,形成多方协同参与机制,并从动态化专业结构布局调整、智慧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终身化职业发展服务等三方面来引领高职院校专业群动态建设,以期提升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46]

张倩、宁永红、杨玉芬指出,2014 年我国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随着试点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需要深入分析并探索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规律。通过梳理学徒制的发展历程,发现学徒制具有人身依附、相处融洽的师徒关系、明确的考核标准和用工制度、企业(师傅)主导、全程参与等特有基因。随着企业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出现,以及职业学校教育的快速发展,学徒制特有的优势基因如师徒关系、契约机制、学习场所、学徒考核主体等方面的继承中出现了断裂。有鉴于此,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应坚持政策引导,构建师傅遴选与契约制度;用工工匠精神塑造学徒技艺技能;建立企业主导下的现代学徒制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学习真实情境;以行业企业为主导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顺应学徒制发展趋势,构建校企共育的新型师徒关系。^[47]

孙芳芳、闫志利研究职业教育质量保障问题,指出评估作为促进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手段,历来受到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高度重视。从“评估”到“诊改”,一度给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带来诸多谜思与困惑,亟待从多角度深度剖析。研究发现,职业教育质量保障范式的变革脉络表现为:质量观影响了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方式方法评估的变革;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诠释了评估与诊改的哲学归因;“内部诊改为主”与“外部问责为辅”的融合发展实为质量保障的未来走向。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从量化到质的评估方法,从理论设想到实践创新进行系统思考,

对促进“诊改”理念下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8]

(七) 职业教育管理史

吴洪成、郭海洋对传统学徒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嬗变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传统学徒制是指在近代的学校教育出现以前,店铺或者手工作坊中的师徒共同劳动。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兴起,工业生产组织不断演化,传统学徒制度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异变,随之兴起了养成工制度与练习生制度。养成工制度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一些大型纺织企业,有学者称养成工制为“学徒制的变种”,将练习生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学徒”。养成工制度和练习生制度的推广和发展,为近代中国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廉价、稳定而又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这样的制度变迁适应了近代以来传统手工业分化加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促进了中国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大工业的转型发展,起到了激活近代社会流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社会转型。^[49]

(八) 国外职成教管理

丁宁研究了日本职业教育发展历程。指出日本在教育发展中一直秉承实用主义原则,重视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本职业教育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产业导向期、内容与层次扩充期以及信息化发展影响时期。纵观日本职业教育百年发展历程,学校职业教育内部体系层次分明,衔接畅通;私立职业学校办学体制灵活,成效显著;企业教育制度不断完善,终身教育体制已然建立。这些都为我国提供了良好借鉴。我国应该完善学校职业教育的层次体系,强化衔接机制建设;加大对民办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构建并完善企业教育制度,以弥补学校职业教育制度的不足。^[50]

四、基础教育管理

(一) 基础教育校长管理

刘静、刘乐基于河北省教育家型校长培养工程,对教育家型校长培养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他们认为当前培养中存在忽视对教育家人格与精神的培育、欠缺对教育家实践技能的有效提升、缺乏对凝结教育家思想有益的理论体系构建、培

训模式有待创新等问题,应从加强对教育家人格与精神的培育、重视教育家实践技能的养成、加强对思想凝练方法的培养、创新培训模式、丰富培训内容等方面入手,对培养模式进行改进。^[51]

(二) 基础教育学生管理

张桂荣等人对小学生“影子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其“影子教育”是指课外补习,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培优补差的活动。他们以Q市小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小学生“影子教育”的参与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现代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助推、学校教育存在不足、课外辅导灵活多样以及经济和家庭因素等是“影子教育”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大对校外辅导机构的监管、学校积极推行教育教学改革,家长要对子女课外兴趣方面的学习避免盲目性和从众性等建议。^[52]

梁明伟、陈蜜娜对少先队校外阵地建设的管理模式进行了研究。指出系统化和体系化的少先队校外阵地建设管理模式可以为少年儿童提供完善的校外服务。校外阵地建设管理模式研究是教育学、组织学和管理学的交叉领域,因而可以借鉴企业管理模式的IOS管理模型,即“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系统结构+操作方法”,来探讨少先队校外阵地的建设。基于管理主体的不同,将管理模式划分为学校与阵地共建共管模式、政府与阵地共建共管模式和阵地自建自管模式三种。^[53]

(三) 幼儿园建设

范明丽、刘志慧等人对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的实践困境进行了研究。指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作为居住区社会基础公共服务设施,既是配置和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有效手段,对为城镇幼儿就近提供学前教育服务、满足城市居民基本学前教育需求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小区配套园建设存在数量不足、质量参差,布局不合理与收费过高等实践困境。本文在政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明晰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根本属性是公益性和普惠性,明确小区配套幼儿园的产权和管理权归属,并健全小区配套园的组织保障与管理制度。^[54]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是提升学前教育公益性、普惠性的重要举措,内蕴并体

现着公众对学前教育机会公平和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的正义诉求。但是,学前教育不均衡发展以及实践的错综复杂等发展困境限制了正义的充分实现,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推进学前教育立法等共同期盼,在促进学前教育的正义实现中仍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55]

(四) 基础教育管理史

薛国凤基于政策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校外阵地建设的历史与经验进行了分析。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校外阵地建设基于国家校外教育事业的政策要求而获得促进与发展,呈现出阵地意识鲜明、阵地构成多样化、阵地建设全民化等特征。总结少年儿童校外阵地 70 年建设与发展经验,主要表现为以政策为指导推进校外阵地建设;强调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作为阵地的尽可能协同利用;把开展适合少年儿童身心特点的活动作为阵地建设主要方式。^[56]

马晓辉对近 30 年来我国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他通过梳理 1988—2019 年间我国发布的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政策,分析发现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经过不断修订和发展,明确了定位,细化了目标和要求,拓展了途径与方法,完善了组织保障和师资建设机制,有效推动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区域发展不平衡、教育开展不全面、师资和保障投入不足等情况。建议加强政策促进资源整合、构建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合理投入和分配资源、完善评价和保障机制等工作。^[57]

高小立、李欢欢对新中国 70 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探析。指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主要经历统收统支、“条块”结合、分级包干、以乡为主、以县为主、省级统筹、城乡统一这七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从集权到分权再到集权、从地方财政过渡到中央财政再到公共财政的变革过程,其变迁受到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也深受国家财政体制变革的影响。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划分、完善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健全监督机制是今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58]

(杨今宁: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徐莉.首轮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项目的成效及启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12).
- [2] 徐莉.教师专业化向深层转向中的范式缺失——我国新时代教师专业化研究推进策略的着力点探讨[J].当代教育科学,2019(10).
- [3] 吴洪成,岳五妹.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9(6).
- [4] 吴洪成,辛然.现代实业家卢作孚教育社会论初探[J].职业技术教育,2019(24).
- [5] 傅松涛,刘亮亮.杜威教育观百年误读:实用主义还是行动主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9).
- [6] 白玫.试析美国教师教育选择性资格项目[J].比较教育研究,2019(4).
- [7] 李兴国.“双一流”建设下河北省重点高校学科发展对策[J].中国高校科技,2019(9).
- [8] 梁捍东,牟文谦.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机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9] 闫志军,朱如楠.转型高校“观念转变”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探析——基于转型发展试点院校的调查[J].职教论坛,2019(10).
- [10] 王喜旺,张双婷.学术理想和教育理想:清华国学院的价值追求及其当代意义[J].当代教育科学,2019(5).
- [11] 齐艳杰.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的价值转向与重塑——基于组织行为学的分析与探讨[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5).
- [12] 李明忠,李盼盼,李静.河北省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分析与提升策略[J].保定学院学报,2019(5).
- [13] 李明忠,任林芳,王志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分析与未来展望[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5).
- [14] 张宛,王立娟.现代大学教师专业自我建构与教学品质的提升[J].中国高教研究,2019(5).
- [15] 薛国凤.高校新入职教师教学角色社会化:概念、问题与建议[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9(1).
- [16] 侯佛钢,张学敏.应用型高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提升的制度困境及其变革逻辑[J].教师教育研究,2019(7).
- [17] 孟庆强.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背景下学生发展评价变革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12).
- [18] 郭伏良,李文文.试论影响外国留学生社团建设的相关因素与问题[J].继续教育研究,2019(1).
- [19] 闫志军,朱如楠,李佳琪.近代河北高等教育发展机理探析——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视角[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9).
- [20] 刘京京.西南联大学生社会服务活动的类型、特征及影响[J].高教探索,2019(5).
- [21] 刘京京,付延.傅增湘与北洋女师范学堂的创办[J].社会科学论坛,2019(6).
- [22] 李欣旖,闫志利.奥地利高校创业教育体系建设经验及

- 启示——以格拉茨大学、克恩腾应用技术大学为例[J]. 职业技术教育, 2019(26).
- [23] 田山俊. 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J]. 高教探索, 2019(3).
- [24] 郝理想, 吴芳. 满足社会需求: 美国社区学院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演进逻辑及社会基础[J]. 职业技术教育, 2019(19).
- [25] 钱玲, 徐辉富, 郭伟. 美国在线教育: 实践、影响与趋势——CHLOE3 报告的要点与思考[J]. 开放教育研究, 2019(6).
- [26] 孙昭磊, 冯琳. 欧洲学分转换与积累系统: 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及启示[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9).
- [27] 唐钰滢, 赵子剑. 日本 COE 计划的实施及其启示——基于双一流背景下高校转型的政策支持研究[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
- [28] 李文英, 李冠男. 日本大学招生考试中的公平保障策略及启示[J]. 全球教育展望, 2019(8).
- [29] 田山俊, 陆军. 一流大学智库高速崛起的内在成因——以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为例[J]. 现代教育管理, 2019(8).
- [30] 孙芳芳, 袁梦琦. 论我国职业基础教育的缺位与回归[J]. 当代职业教育, 2019(5).
- [31] 袁梦琦, 孙芳芳, 王颖. 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现状与推广路径[J]. 江苏教育, 2019(76).
- [32] 张栋科, 冯瑞, 刘舒畅. “互联网+职业教育”的哲学反思与应用启示[J].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19(6).
- [33] 刘京京, 马静仪. 我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问题与实施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19(5).
- [34] 张怡真, 李玥融.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高职院校发展路径研究[J].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19(6).
- [35] 李欣旖, 闫志利. 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阻力因素与动力机制研究[J]. 职业教育研究, 2019(7).
- [36] 李欣旖, 刘硕, 闫志利. 协同发展视域下京津冀中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差距研究[J]. 当代职业教育, 2019(1).
- [37] 辛夏夏, 曾姗, 闫志利. 河北省中职学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适应性研究[J].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19(1).
- [38] 李欣旖, 玄远程, 闫志利. 中职学校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以河北省迁安市职教中心为例[J]. 职教通讯, 2019(2).
- [39] 闫树涛. 新中国成人与继续教育发展的五个阶段[J].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19(6).
- [40] 侯小雨, 闫志利. 近五年我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研究与实践进展[J]. 职教通讯, 2019(5).
- [41] 刘顺霞, 辛夏夏, 闫志利. 新时期河南省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优化及路径选择[J]. 教育与职业, 2019(18).
- [42] 刘顺霞, 侯小雨, 闫志利. 河南省贫困人口学历特征及培训需求的调查分析[J]. 成人教育, 2019(1).
- [43] 姜丽杰, 宁永红, 巩建婷. 建国 7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引进、改造及创新[J]. 职业技术教育, 2019(16).
- [44] 侯小雨, 曾姗, 闫志利.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问题及优化措施——以河北省为例[J].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2019(1).
- [45] 张栋科.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行动逻辑反思与重构——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视角[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1).
- [46] 张栋科, 李园园, 冯瑞. 职业生涯导向下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路径研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5).
- [47] 张倩, 宁永红, 杨玉芬. 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基因、断裂与传承[J]. 教育与职业, 2019(15).
- [48] 孙芳芳, 闫志利. 评估与诊改: 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理论演进与范式融合[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3).
- [49] 吴洪成, 郭海洋. 传统学徒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嬗变[J]. 职教论坛, 2019(6).
- [50] 丁宁. 日本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特点及启示[J]. 教育与职业, 2019(4).
- [51] 刘静, 刘乐. 教育家型校长培养模式的改进策略——基于河北省教育家型校长培养工程的实践[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19(1).
- [52] 张桂荣, 崔万秋, 郑国萍, 李海英, 王晶. 小学生“影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J].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 [53] 梁明伟, 陈蜜娜. 论少先队校外阵地建设的管理模式[J]. 少年儿童研究, 2019(4).
- [54] 范明丽, 孙美红, 刘志慧.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实践困境及其破解[J]. 教育观察, 2019(6).
- [55] 刘志慧, 范明丽. 正义视角下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政策的分析[J]. 教育观察, 2019(9).
- [56] 薛国风. 建国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校外阵地建设的历史与经验——基于政策的视角[J]. 少年儿童研究, 2019(4).
- [57] 马晓辉. 近 30 年来我国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的发展分析[J]. 少年儿童研究, 2019(10).
- [58] 高小立, 李欢欢. 新中国 70 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探析[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9).

课程与教学研究

魏会茹 邢秀茶

2019年河北省课程与教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高校应用型大学课程体系研究、学科课程改革研究、创新能力培养与创新创业课程研究；教学模式与方法变革研究；教学方法研究集中在互联网带来的教学变革，翻转课堂等，基础教育研究集中在核心素养下学科教学变革，教育技术变革研究，其中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实践应用成果较多。

一、西方教学理论研究与借鉴

魏彤儒探讨了赫尔巴特“教育性教学”理论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教育性教学”理论是赫尔巴特德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以往“教育”与“教学”相互分离的情形，使两者能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构成了更加科学有效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教育性教学”强调教育与教学相结合，突出兴趣、教师、家庭环境等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这些内容启示我们要坚持教育与教学全面融合、展现兴趣的特有优势、发挥教师的重要作用、上好家庭教育“第一课”，以切实增递我国新时代道德教育之实效。^[1]

王宏方对国际儿童教育范式的渐变进行了研究，指出从蒙台梭利到华德福，国际儿童教育范式的渐变，蒙台梭利（Montessori）是教育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与实践者之一，蒙台梭利理论的确立，使儿童早期教育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蒙氏儿童教育范式可以用“热爱儿童”与“早期智力开发”来概括；“热爱儿童”体现在把儿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要求教育者顺应儿童成长的自然规律，创造适宜的环境，让儿童在“工作”中养成独立性，完成自我成长的使命；蒙氏教育哲学的精华被总结为“强调自由、不教的教育”。华德福（Waldorf）教育是在奥地利哲学家与教育家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的“人智学”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教育体系。“人智学”的核心包括“对一些关键能力的系统培养，如观察能力，培养儿童对于色彩、形状、声音和对话的敏感度，有规律地训练清

晰、客观并且有专注力的思想，有决断能力的、持续一致的意志力，以及有纪律的、与具体情境相适应的情感生活”。作为同时产生于欧洲大陆的两种伟大的教育哲学，蒙台梭利与华德福儿童教育都表现出了对儿童的尊重与热爱，但在表达方式与侧重点上二者有明显区别。蒙台梭利是儿童教育史上一位世代传诵的人物，她的很多实践，如环境设置、促进儿童积极学习、促进智力提升的教学材料等，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被整合到很多的儿童教育课程中，我们按照蒙台梭利的规则，可以顺利地做很多事，这就是拥有一种范式的好处。好的范式的精髓依然要保留，如尊重儿童永远也不会过时。华德福教育更注重儿童在每个年龄层的身、心、灵的发展，帮助身处当今社会的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精神之源，同时找到一种与当代生活相适应的形式。^[2]

朱立明等人对深度学习进行了研究。深度学习是对学生有效学习本质的揭示与理解，旨在发展人的高阶思维能力、提高人的问题解决能力。21世纪以来，艾根（Egan. K）关于“深度学习”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其核心成果聚焦课堂学习和教学问题，即师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作者从知识论的角度，论述深度学习是关于知识学习广度、深度和关联度充分性的问题，指出深度学习的教学逻辑由学生认知序列、学科内容特征、学科核心素养、学习效果反思四个要素构成。促进深度学习的教学逻辑的生成策略集中体现在：以“理解与聚焦”为教学主题的价值取向；以“融合与联结”为课堂活动的基本特质；以“创新与实践”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抓手；以“反思与批判”为思维拓展的关键路径；以“发展与进阶”为多元评价的核心视角。^[3]

二、传统文化与学科课程教学融合

丁昭对课程文化进行了研究。研究指出，当下课程学研究中课程文化自觉是一个热点，课程文化自觉是人类有意识地发展课程文化，在课程文化上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不断超越的理性态

度,它包括逻辑的思维、严谨的态度和高尚的目标。在课程文化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问题和挑战,即外部控制与主体需求的矛盾、主体意识与价值中立的对立以及文化惯性的阻滞;课程文化在当代出现了“迷失”,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就是扎根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回归,就是要打开胸怀,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外国文,处理好这些问题和挑战,课程文化才能走向自觉。^[4]

杨永刚对以文化自信为导向的大学英语进行了教学研究,从文化认知、文化交流等方面入手,概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提升大学生英语学习的重要意义;根据大学英语教学中出现的汉语文化缺失现象,提出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采取将英语教学同继承传统文化相结合等策略,以提升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5]

闫学军对中国式沟通智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有效运用作了研究。中国式沟通智慧包括诚信为本的沟通基础、动之以情的沟通方法、上下同欲的沟通目标、换位思考的沟通方式、圆融而通的沟通技巧等,恰当运用这些沟通智慧,对构建和谐师生环境,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认可度,达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将大有裨益。^[6]

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发生在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背景之下,翻译主体是知识界精英,他们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高度的文化觉悟,为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带来诸多启示。郝翠屏从近代翻译史看以文化觉悟为导向的文学翻译教学,回顾历史反思现在,外国文学翻译教学应注重文化觉悟导向,在宏观规划上深化国情教育、切合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培养目标、改进培养模式;在微观教学上,引导学生从文化的维度思考翻译活动,并在翻译实训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充分利用翻译前辈留下的翻译序跋,研究他们的文化觉悟及翻译经验。^[7]

三、基础教育核心素养课程教学

2014年3月,中国教育部颁布了“核心素养”相关文件,这是继新课改之后教育界掀起的又一轮改革风潮,时至今日,“核心素养”一词已经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并且在教育领域逐渐

发挥重要作用。“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个人发展和社会参与等方面需要的各种品格和能力。高中阶段学生的智力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思维能力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塑造成为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语文核心素养教学方面:吴丽君等人指出,在写作教学中,教师应丰富学生的人文精神,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创新思维方式,改变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在独立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个人写作风格,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写作技巧,而且能践行基于核心素养的写作教学理念。^[8]高海芳等人则从四个维度提出了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作文教学四个策略:观看与演讲相结合,提升“语言建构与运用”素养;仿写与创新相结合,达到“思维发展与提升”;小组互评互改与推荐展示相结合,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素养;阅读经典与关注当代文化相结合,提升“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9]潘斌军等人提出核心素养理念下高中语文写作教学对策:以立德树人思想引领写作教学理念;以思维创造力激发深化前写作指导;以审美鉴赏力培养渗透后写作讲评;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写作教学的情怀,明确了高中语文写作教学的努力方向。^[10]

在数学核心素养教学方面:陈雪梅等人根据概率素养的要素,对美国CPMP高中数学教科书九年级概率专题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CPMP教科书的设计提供了丰富而易理解的概率与统计语言;任务的设计与组织突出数学的联系;呈现概率模型探索的推理过程与方法;利用各种社会问题情境发展批判意识;利用核心概念群促进学生建构随机性概念;以“问题—探究”为导向组织不同层次与功能的习题。作者提出了对我国教材设计中落实数学核心素养的五点启示:确定恰当的课程设计途径与目标;重视统计与概率核心概念群的确立、组织与呈现;重视情境的多样性,特别是增加社会情境下的建模任务;重视概率推理与建模过程的呈现,发展统计思想;开发习题的多种功能。^[11]

在英语核心素养教学方面:王蔷、李亮从教—学—评一体化的角度指出,提出教学评一体化的意义、理论与方法。研究提出整合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学的成效三个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课堂关键要素,对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

促进学生有致学习,落实核心素养目标、实现学科育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教师只有将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转化为具体的课堂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课堂实践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学生表现作出及时的教学调整,确保学生在提升语言能力的同时,通过多元思维,逐步形成跨文化认知、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正确的行为取向,从而把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目标落到实处。^[12]

四、地方高校课程体系改革

课程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地方高校承担着为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任务,同时也面临着课程设置存在不同专业趋同、内容与实际脱节、实践性课程占比小、内容更新滞后、评价方式欠科学等问题。

刘伟斌对转型高校课程改革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转型高校课程改革应坚持专业性、应用性和时效性原则;提出了转型高校课程改革的策略,包括创建特色品牌课程、注重学生职业方向培养、增加实践课程比重、注重应用能力培养、注重课程评价多元化、注重更新课程内容等,以期对转型高校课程改革有益。^[13]

李俊杰等人对师范类本科专业课程改革进行了研究,以河北省三所省属普通高校的四个师范专业为样本,对其中300名学生和41名教师就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通过整理调查、访谈数据以及分析各专业的培养方案发现,当前师范类专业课程体系存在“重知识、轻能力”“全人教育”难以贯穿课程建设和课程模块过于单一等问题。为此,作者提出构建以能力为导向和将“全人教育”融入课程建设全过程的模块化师范类课程体系。^[14]

周红星等人以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从对地方本科院校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入手,探索创新教育与专业认证指导课程体系建设的可行性路径,表明在“创新创业+专业认证”背景下开展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必将推动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应用型大学建设探索新的途径。研究指出,地方本科院校专业课程体系存在应用型定位不准、课程模块与社会需求脱节、能力结构不清晰、互联网技术应用不足等问题,从而提出了创新教育与专业认证

指导课程体系建设建议,包括明确建设目标、优化课程体系、完成课程整合、优化实践教学环节、加大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大胆探索与实现毕业设计改革突破。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社会需求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也要多样化,在“创新创业+专业认证”背景下开展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将推动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应用型大学建设探索新的途径。^[15]

高校课程改革还包括具体某一门专业课程改革的研究。梁秀娟等人在“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背景下,对会计学原理作为经济管理学院本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目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实践教学师资力量薄弱以及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落后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会计学原理需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修改教学计划,增强实践教学师资力量,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移动客户端,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等,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学生及早适应社会工作奠定坚实基础。^[16]宫立恒等人针对我国医学信息学专业发展现状,分析医学信息学的学科内涵和课程设置,提出本着以健康医疗大数据领域需求驱动医学信息学学科发展、以医学信息学课程融合优化和学科长远发展为牵引力、以培养“厚基础,宽口径”和富有医学信息底蕴的复合型人才为推动力的原则,构建精准化、系统化、动态化的教学内容体系和立体化的教学模式,促进学科健康发展。^[17]秦睿玲等人以培养应用能力为基础的动物形态学基础课程建设为研究,指出动物形态学基础课程群是畜牧兽医各专业必修的重要专业基础课,为响应国家应用性高校转型发展的战略布局,需要从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实践教学及考核模式等方面进行诸多创新与实践,旨在为动物形态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培养具有较强动手能力、动物解剖及组织技术相关人才奠定基础。^[18]

五、创新性人才培养

在“创新”“创业”理念的大力推行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高绣叶认为创新人才内涵的认知偏差导致我国创新人才培养话语的精英化取向,进而形成创新人才的能力定位偏高,创新人才的培养流于形式化。作者提出高等教育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生态系统,

其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不同结构要素的协同进步和相互支撑;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背景下,需要重新界定创新人才的内涵,拓宽创新人才的外延,从而重构创新人才体系,进而基于高等教育的职能分化建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创新人才的培育系统,才能使创新人才培养真正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实践走向实现。^[19]

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及高等教育教学理念趋势引导下,赵松岭等人进行了基于知识向能力高效转化的课程设计研究,研究基于河北金融学院“四驱动态自由化”财经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对知识向能力进行高效转化提出具体的课程设计路径,提出缩短大学生由知识向能力转化的时间,使学生的技术技能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真正落地、提升,提出增强其就业创业能力,全面提高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的建议。^[20]

徐占云等人认为动物外科手术学是动物医学学生学习临床手术技能的重要专业核心课程,而实践教学是外科手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外科手术学的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适应社会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近几年的教学中他们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突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注重实践训练,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21]

李恩博等人针对河北北方学院化学类学科特点,对化学类本科生专业创新能力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索。该探索将该专业本科生分配给具有专业课题和研究方向的学科专业教师,组成专业课题组,课题组依托自身软硬件资源及专业平台优势,通过个性化培养方案实现本科生专业创新能力的培养。实践证明,这种课题组模式针对性强,符合学生创新能力形成发展规律,推动了学生专业创新能力培养工作的开展,实现了科研活动对教学工作的促进。^[22]

刘艳等人认为将创新创业教育嵌入专业课程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有效途径,基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他们探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市场营销》课程的新教学模式,提出必须把握创新创业大背景下课程改革面临的新情况和新挑战,才能通过阶段式案例教学、全天候的营销场景、师资结构优化、创新创业绩效评价和项目平台教学设计等途径,激发全

体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从而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23]

六、互联网+教学改革

随着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到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及区块链等为基础构建而成的智能环境,不仅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而且已经开始深入影响教育的理念、文化和生态。探索智能环境中的教育教学创新、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是凸显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内生力量的重要举措。

秦丹等人对课堂精准教学实践的现实进行审视与反思,认为精准教学是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背景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数据驱动型教学的典型代表,已逐渐形成由精准学情分析、精准目标分析、精准内容分析、精准路径选择和精准教学干预等核心环节构成的一般教学流程。以精准教学实践在不同发展阶段所依据的学习理论和技术基础的不同,提出精准教学 1.0 和精准教学 2.0 概念,并分别对其内涵和教学实践路径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精准教学实践中呈现出的学生观、教学观以及教师能力三个维度进行学理性反思,提出:在学生观上,精准教学应尊重学习者作为一个生命实践体的本质属性,而非简单的数据集合;在教学观上,精准教学应突破“特殊认识活动论”的分析框架,努力在预设性路径和生成性路径之间寻求切实的平衡点;在教师能力维度上,为保证精准教学的有效实施,应将数据素养作为教师必备的能力结构之一。^[24]

刘钰等人“新工科”建设、“双创”教育的影响下,进一步探索“互联网+”背景下创客教育在高校的应用,对“互联网+”背景下在高校开展创客教育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高校在创新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互联网+”背景下创新教育在高校的应用可能性论述,指出为了实现目标,就必须重视创客教育的课程结构,保证它的合理性;同时也要激发教师开发创客教育课程资源的兴趣,让更多的教师投身到课程资源开发工作当中;加强对教师以及学生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正确看待创客教育,提高他们的创客意识;重视对创客教育工作反馈机制的建设,要求相关负责人能够定期

在学生、教师之间开展调研,收集信息,及时掌握创客教育情况。^[25]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在线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的结合越来越常见,基于TPACK的混合式已经成为英语专业教学的重要模式。田丽丽认为基于TPACK的混合式英语语法教学模式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深度混合,课程资源、教学方式和教学环境的混合是重中之重。同时还指出对基于TPACK的混合式英语语法教学模式而言,传统的教学评价考核体系已经不再适用,需要构建全新、合理的评价考核体系。研究指出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结合教学内容而制定出相应的任务清单,强化评价考核对学生主动性、积极性的调动作用。^[26]

翻转课堂是信息化时代社会背景下的新型教学模式,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流程,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王金明认为翻转课堂重新建构课堂结构,需要大量信息化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源的介入,增加了教师组织课堂的难度。翻转课堂教学程序主要由教学前期准备、课前活动、课堂活动、课后学生巩固练习和教师教学反思等部分组成。作者提出翻转课堂有效实施的对策,强调:第一,教师应准备充分的课程资源;第二,学生应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第三,构建课程学习的服务支持体系。^[27]

程钰情以韩国语阅读教学为例,探讨了“翻转课堂”模式下在线资源的构建和利用问题。在资源构建方面,主要以教学实践说明了如何构建课程主体和如何发布互动任务;在资源利用方面,重点强调了实现师生、生生互动的多元性和便利性,以及考核方式的客观科学性。^[28]

教学微视频是慕课课程资源中的关键要素。白然认为教学微视频主要应用于非正式学习环境中的个别化学习,是单向传播的视听媒体,是教师教学行为的视频化表达;慕课教学微视频中的交互本质上是虚拟的师生教学会谈,是操作交互和信息交互的结合。可从三个维度进行慕课教学微视频的交互设计,即利用问题交互引导对话和互动,利用操作交互引导活动的深入参与,利用情感交互形成氛围、传达关怀。^[29]王树等人则认为新专业培养方案的出台和学时的减少使工业药剂学的课堂理论教学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可通过制作高水平工业药剂学学习课件与制药工艺

操作视频、进行工业药剂学双语授课、增强制药工业人文历史教育以及增加课外知识库等途径构建合理实用的工业药剂学慕课体系,以此来弥补理论教学的不足,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工业药剂学知识,为未来的药物制备和研发等工作奠定扎实基础。^[30]

七、教学方法研究

教学方法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研究课题,它是教学过程最基本的要素。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素质、能力的要求,刘春凌等对PBL+LBL教学法优势互补进行探索,从优化教学结构、方法的角度,对PBL、LBL两种教学法的利弊进行剖析,探讨其“优势互补”的结合点。PBL是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中心,以小组讨论为方法。它与传统教学主要区别和优势是: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的培养,PBL的实施需要两个基本条件:1. 硬件设施。教学是以讨论为方法,学生讨论小组的人数不能太多,一般以8~12人为宜,需要相应数量的PBL教室,教室内要配有供小组讨论的桌椅、电脑、投影仪、网络等教学平台,以及相应的教学参考文献资料等。2. 软件要求。必须要有和教学内容相符合的“案例”作为讨论主题,优秀教师队伍培养是PBL教学的关键,培养学生课堂教学角色变换。PBL教学过程大致可分为7个步骤:熟悉概念、问题界定、头脑风暴、重组优化、界定学习目标、信息共享、小组互评。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教学方法,如何使PBL+LBL两种教学法实现优势互补,应重视三个问题:PBL不可一哄而起,LBL教学法不能独占讲台,PBL+LBL要和教学对象、内容相适应。^[31]

项目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由学生实施完成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教学活动的教学方法。杜丽春认为在市场营销策划课程中,应用校企合作的项目教学法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增加可体验性、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有助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的实现。项目教学法的实施需要:1. 精心设计安排课程教学内容;2. 精心设计项目内容;3. 项目及主题宜精炼统一、不

偏离; 4. 教师减少指导, 促进学生独立完成项目; 5. 建立全面客观的评价系统; 6. 激发学生参与项目实践的热情; 7. 保证项目教法的效果。^[32]

八、实践教学研究

地方一般本科院校应以应用型本科教育为本, 不断探索“以学生中心”的发展理念, 统筹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重视实践教学理论应用研究, 全面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朱飞等人认为地方一般本科院校应坚持系统性、实用性和融合性的基本准则, 不断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 从三个方面构建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 加强“五位一体”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规划设计; 构建校内外实践教学平台; 健全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以此全面提高地方一般本科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33]

孟亚男等人认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具有“双层”生态系统, 一是教务系统, 一是机构为主体的本专业的职业化系统。而以机构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的本土情境体现为资源依赖, 并有着政府主导的政府、街道和社区三方互动关系结构为基础的本土化工作情境。因此, 以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为背景, 高校校外实践教学需要“嵌入”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系统情境, 以“共赢”为导向, 兼顾机构和实习单位(包括学生)的需求, 精心设计合作内容和形式, 规避可能对社会工作职业化产生的不利风险, 并在职业化发展中发挥高校的主动性。^[34]

刘钰等人对电子信息类新工科实践体系建设方案进行了研究, 从新工科、工程认证相关概述及其发展趋势入手, 对工程教育模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探析了电子信息类专业开展新工科教育的路径与电子信息类专业新工科教育产出目标, 最后探究了电子信息类专业新工科教育考核方式。^[35]

陈强等人结合唐山学院艺术系环境设计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 在探析市场对环境设计专业人才的需求变化的同时, 进行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 总结出针对环境设计专业以提高就业能力为目标的实践教学体系。从模型制作实训, 毕业设

计、项目化实训、专业技能实训, 集中实践课程的连续性, 教学课程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议。^[36]

赵玉华等人从实践教学内容设置、仪器使用与维护等方面总结了当前仪器分析实践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 结合教学经验, 从结合食品专业设置实验项目、重点强调各精密仪器结构及维护、科学地进行样品前处理、开展综合性实验和编写适合于食品专业的仪器分析教材五个方面对仪器分析实践教学改革方法进行阐述, 充分利用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从而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37]

九、高校思政课程教学研究

沙占华认为“互联网+”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做好“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网络空间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坚持分类指导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推动“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建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平台, 建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信息反馈与评价机制,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从“思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38]

沈艳华以河北大学思政课微电影教学改革实践为例, 研究了“对象性活动”对思政课教学改革的观照, 认为思政课教学的任务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如何发挥其对大学生思想引领、价值观塑造和人生导向的作用, 一直是思政课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河北大学对思政课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其中, 在“对象性活动”哲学理论观照下进行的微电影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让思政课教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温度; 对象性活动是实践的主客体之间内在相互作用的过程, 是改造实践客体、提升实践主体的有效途径; 思政课微电影教学本质上是对象性活动, 它通过搭建实践载体, 构建对象性活动的主客体关系, 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践温度, 使思政课教学在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中增强时效性和吸引力。^[3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在社会风尚、荣辱观念、爱国情怀、担当意识、人际准则和教育思想等多个领域, 具

有许多值得当代人汲取的智慧和力量。杨岱等人认为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创造性转化中存在如下问题:思政教育内涵急需挖掘和完善;教育者专业背景不同,传统文化素养不齐;大学生对传统文化重视不够,缺乏兴趣;传统文化转化形式老旧,传播途径不够多样化;校园文化特点不够鲜明,机制不健全。作者提出为推进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创造性转化,可采取以下对策:坚持正确方向,挖掘完善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内涵;创新教育理念,提高师生传统文化素养和思政修养;把握特点规律,推进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创造性转化;重塑育人环境,打造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40]

十、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在不断学习借鉴苏联的三段式知识本位学科课程、德国双元制、工作过程导向课程、加拿大能力本位课程等多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职业教育发展实际,探索形成了“宽基础、活模块”课程、项目课程、工作过程系统化等课程开发技术,在中职示范校、高职骨干校建设过程中不断推行与发展。姜丽杰等人提出了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创新发展思路:突破国外话语垄断,在课程目标上实现多元整合,在多种课程模式上实现更加融合,在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融合上发展综合课程,促进校企“双元课程”实施载体更加融通,优质课程资源建设数字化、共享化。^[41]

国际文凭组织职业教育项目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业行为以及跨学科、跨文化意识,培养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实现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合,为学生就业创业或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硕等人认为借鉴国际文凭组织职业教育项目课程的经验,我国应加快中职教育的国际化、推进职业教育的终身化、注重课程改革的适应化、促进教育与产业融合化、实现质量评价的体系化。^[42]

2014 年,我国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随着试点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需要深入分析并探索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规律。张倩等人通过梳理学徒制的发展历程,发现学徒制具有人身依附、相处融洽的师徒关系、明确的考核标准和用工制度、企业(师傅)主导、全程参与等特有

基因。指出随着企业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出现,以及职业学校教育的快速发展,学徒制特有的优势基因如师徒关系、契约机制、学习场所、学徒考核主体等方面的继承中出现了断裂。有鉴于此,他们认为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应坚持政策引导,构建师傅遴选与契约制度;用工匠精神塑造学徒技艺技能;建立企业主导下的现代学徒制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学习真实情境;以行业企业为主导建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顺应学徒制发展趋势,构建校企共育的新型师徒关系。^[43]

十一、其他研究

李明忠等人以《中国教育报》“聚焦‘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系列报道”为例,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课堂教学改革路径。对 18 篇改革报道统计分析发现:各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成果显著,其改革目的各有侧重,改革范围以全校和某门或某类课程为主;改革的高校类型聚焦在行业类、综合类、理工类和师范类,高校层次以地方高校最为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下的大学课堂教学改革呈现四方面特点:以加强顶层设计为基础,以改革课堂教学为重点,以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为根本,以系统整合教学资源为保障。其课堂教学改革成功经验为我国高校教学改革提供了四条合理建议:注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改革路径相结合,加强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实践相结合,提升教师课堂教学改革的素质能力,构建高校教学支持系统。^[44]

高丹阳等人为进一步了解人工智能在我国教育领域中的研究现状,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以 2015—2019 年发表的 264 篇国内人工智能研究文献为对象,运用 Cite Space V 分析工具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梳理并阐述了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的研究现状,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人工智能在国内教育中的研究特征,为后续相关研究做了奠基。^[45]

钱玲等人依据美国著名的在线教育质量保证机构 Quality Matters(QM)和高等教育研究咨询公司 Eduventures Research 联合发布的美国在线教育发展全景报告,从美国高等教育管理视角全景式地调查了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构在线教育的策略、影响和发展趋势。报告数据源于各样本高

校的首席在线教育领导,其视角可为人们了解美国在线教育的发展与趋势提供直观的认识。报告的主体内容是美国高校决策者关心的问题:在线教育的注册趋势和在线教学论、在线教育的管理策略、在线教育的质量保证。对美国在线教育的实践、影响与趋势的分析,将对我国高校在线教育管理和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46]

(魏会茹:石家庄学院副教授,
邢秀茶:石家庄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 魏彤儒,廉旭.赫尔巴特“教育性教学”理论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J].现代教育科学,2019(4).
- [2] 王宏方.从蒙台梭利到华德福:国际儿童教育范式的渐变[J].世界教育信息,2019(10).
- [3] 朱立明,冯用军,马云鹏.论深度学习的教学逻辑[J].教育科学,2019(3).
- [4] 丁昭.课程文化自觉的意义、问题及实现路径[J].教学与管理,2019(11).
- [5] 杨永刚.以文化自信为导向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9(4).
- [6] 闫学军.中国式沟通智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有效运用[J].教育现代化,2019(11).
- [7] 郝翠屏.从近代翻译史看以文化觉悟为导向的文学翻译教学[J].中国大学教学,2019(10).
- [8] 吴丽君,郝佳方,李生鹏,陈冰.核心素养视角下高中语文写作教学探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8).
- [9] 高海芳,刘宏英.语文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作文教学探微[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0).
- [10] 潘斌军,吴凤翔等.核心素养理念下高中语文写作教学对策探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11] 陈雪梅,姜辉.基于概率素养的数学教材设计特征的分析与启示——以美国 CPMP 教科书为例[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9(3).
- [12] 王蔷,李亮.推动核心素养背景下英语课堂教—学—评一体化:意义、理论与方法[J].课程教材教法,2019(5).
- [13] 刘伟斌.对转型高校课程改革的思考[J].武警学院学报,2019(2).
- [14] 李俊杰,吴婷婷,王伟平.浅议省属普通高校师范类本科专业课程改革——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0).
- [15] 周红星,张聚涛,赵金秀.创新创业+专业认证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以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9(6).
- [16] 梁秀娟,王新刚等.应用型本科“3+1”人才培养模式下会计学原理课程改革研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8).
- [17] 宫立恒,郭晓伟等.医疗大数据环境下医学信息学课程体系的构建[J].教育现代化,2019(9).
- [18] 秦睿玲,李忠浩等.以培养应用能力为基础的动物形态学基础课程建设的创新与实践[J].安徽农业科学,2019(7).
- [19] 高绣叶.从精英主义到大众主义: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话语实践转向[J].当代教育科学,2019(10).
- [20] 赵松岭,王宁,陈镜宇.基于知识向能力高效转化的课程设计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21] 徐占云,杜冬华等.动物外科手术学实践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9(11).
- [22] 李恩博,余秀娟.河北北方学院化学类本科专业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探索[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8).
- [23] 刘艳,杨念.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国际市场营销》课程改革研究[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11).
- [24] 秦丹,张立新.问题与优化:课堂精准教学实践的现实审视与反思[J].课程与教学,2019(11).
- [25] 刘钰,徐婷.“互联网+”背景下创客教育在高校的应用探索[J].教育现代化,2019(2).
- [26] 田丽丽.基于 TPACK 的混合式英语语法教学模式的探索与构建[J].教育教学论坛,2019(8).
- [27] 王金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组织行为学”课程中的应用[J].教育实践研究,2019(4).
- [28] 程钰情.“翻转课堂”模式下在线资源的构建和利用——以韩国语阅读教学为例[J].教育教学论坛,2019(8).
- [29] 白然.慕课教学微视频的交互设计策略[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6).
- [30] 王树,董明纲等.构建工业药剂学慕课教学体系模式的探索[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31] 刘春凌,王鹏,王贵喜.PBL+LBL 教学法优势互补探研[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5).
- [32] 杜丽春.校企合作的项目教学法在《市场营销策划》教学中的应用[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5).
- [33] 朱飞,牛春雨等.地方一般本科院校“以学生为中心”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探析[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34] 孟亚男,夏珑.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的高校校外实践教学建设研究[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35] 刘钰,马艳丽等.电子信息类新工科实践体系建设方案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9(11).
- [36] 陈强,王欣.以提高就业能力为目标的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优化[J].教育教学论坛,2019(5).
- [37] 赵玉华,李晓颖等.仪器分析课程实践教学的改革探索

- [J].教育教学论坛,2019(11).
- [38]沙占华.“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39]沈艳华.“对象性活动”对思政课教学改革的观照——以河北大学思政课微电影教学改革实践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40]杨岱,刘德华等.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创造性转化探析[J].教育观察,2019(1).
- [41]姜丽杰,宁永红,巩建婷.建国7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引进、改造及创新[J].职业技术教育,2019(6).
- [42]刘硕,李欣旂,闫志利.国际文凭组织职业教育项目课程的特点及启示[J].职业教育研究,2019(6).
- [43]张倩,宁永红,杨玉芬.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基因、断裂与传承[J].教育与职业,2019(8).
- [44]李明忠,王志杰.“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课堂教学改革路径——以《中国教育报》“聚焦‘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系列报道”为例[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 [45]高丹阳,张双梅.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研究现状与特征分析[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9(13).
- [46]钱玲,徐辉富等.美国在线教育:实践、影响与趋势——CHLOE3报告的要点与思考[J].开放教育研究,2019(6).

考古学研究

张春长 马超

2019年度河北省田野考古工作以主动性科研考古和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为主,全年主要考古项目共计39项,其中主动性科研考古项目13项,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项目26项。考古调查累计行程约3500千米,勘探面积约8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1.8万平方米。全力推进雄安新区、冬奥会崇礼太子城两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考古项目;促进泥河湾遗址群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张家口坝上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建立和行唐故郡遗址考古等课题研究考古工作;持续推进正定古城考古、邨城遗址考古等城市考古工作;继续做好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抢救保护了一批珍贵文化遗存,保障了基本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本年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出版学术专著2部,发表考古学研究文章30余篇。

一、重点建设工程考古项目

(一) 雄安新区考古工作

1. 雄安新区南阳遗址考古发掘

2019年继续对南阳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遗址面积1200平方米,解剖夯土城垣3处,发现灰坑85座、道路4条、沟1条、夯土遗迹2处,出土陶、铜、铁、骨、石等质地的小件标本及可复原器物共131件,文化遗存年代为战国、汉代。此次发现战国时期城垣地上墙体南北残宽23米,地下基槽宽17米,确定该城垣年代不晚于战国晚期,同时结合之前发现带有“易市”

陶文的西汉时期陶片,推测发现的战国时期城址为“易”城可能性非常大。南阳遗址考古工作揭开了雄安新区城市考古的序幕,为雄安区域两周、汉代城市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载体和范例,进一步推进了白洋淀区域先秦时期生态环境演变、人与生地互动关系研究工作。根据南阳遗址发现战国时期城址城垣,以及发现“易市”陶文西汉陶片等证据,证明“大南阳”(南阳遗址——晾马台遗址)是一个重要标尺性考古基准点,是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缩影,是雄安新区发展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探索其聚落演变与生态环境互动过程、生业发展模式,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次雄安新区考古工作成果收获颇丰,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指示,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增加新区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是弘扬雄安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是党中央、国务院设立雄安新区重要的文化支撑。

2. 雄安新区容城县东小里——白龙西南墓地考古发掘

2019年勘探面积23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274处,其中汉代砖室墓117座、灰坑16座、灰沟3条、窑3座、井1座、路2条、不明遗迹19处;唐代至元代砖室墓23座;明清土坑墓90座。另外发现一处汉代遗址,遗址范围东西约

130 米,南北约 200 米,面积约 3 万平方米。通过 2018、2019 年两次考古勘探,已探明墓葬 354 座,其中汉代墓葬 208 座,唐至元代墓葬 23 座,明清墓葬 123 座。基本掌握了东小里—白龙墓地南部区域遗迹的时代、数量、分布情况。为今后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以及配合新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田野发掘主要内容是对 2018 年勘探发现的部分墓葬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550 平方米,发掘两汉时期砖室墓 24 座,虽然大多数墓葬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但仍出土一定数量的随葬器物,共计出土各类器物 141 件,其中陶器 121 件、铜器 5 件、铁器 7 件、琉璃器 5 件、石器 2 件、骨器 1 件。另外出土铜钱 400 余枚,陶片约 1000 片。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少量夹云母红陶和夹砂灰陶,陶质火候较低,胎质疏松,模制或轮制,器表多素面,其次为拍印网格纹和绳纹。器类以陶质明器为主,如釜、灯、圈厕、案、耳杯、灶、魁、楼、仓及动物模型等。少量夹砂灰陶瓮、夹蚌红陶罐。铜钱均为五铢钱,朽蚀严重。墓砖多为双面素青砖,少量花纹砖。另外还有外绳纹里方格的板瓦和筒瓦。东小里—白龙西南墓地分布面积大,墓葬数量多,出土器物丰富,是雄安新区为数不多的大型汉代墓群之一,对研究汉代该地区的社会状况、物质生活和丧葬习俗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这批墓葬处于两汉之交的一个过渡期或转型期,从西汉晚期的无墓道砖圹墓,到东汉早中期有墓道的单室墓,再到东汉晚期的多室墓,前后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为了解白洋淀地区两汉时期墓葬形制的演变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通过对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归纳总结器型的发展演变趋势,结合墓葬形制变化,对确定该墓地的年代,乃至建立汉代白洋淀地区平民墓葬的年代序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材料。通过对墓葬的考古学研究,有助于了解汉代白洋淀地区平民阶层的丧葬习俗,以及家族、族群等团体的交流、融合、演变等情况。

3. 雄安新区雄县鄭州城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

2019 年勘探面积 30 余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考古勘探发现的遗址主要有城墙壕沟多处、道路 4 条、建筑基址 2 座、窑址 4 处、井 1 座、灰坑 5 个、砖瓦分布区 2 处。探明城址形状与城墙范围为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夯土城

墙东西约 1060 米、南北约 1290 米。分别对四周城墙及城墙内外顺城道路、城外壕沟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出土遗物多出土于城墙外侧壕沟中,见有砖瓦、陶器、瓷器、陶礮、弹丸、兽骨等残件。其中以砖瓦建筑构件为主,年代多为宋金元时期。初步厘清鄭州城遗址可能为唐末五代、宋时期莫(鄭)州的州县治所、金元时期莫(鄭)亭县治所。

4. 雄安新区容城县张市南遗址考古发掘

2019 年北京至雄安新区高速公路建设工程选线文物调查时首次发现该遗址,后又对其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 800 平方米,发掘清理各类遗迹 25 处,灰坑 17 座、沟 3 条、窑 1 座、水井 2 眼、墓葬 2 座。出土陶、瓷、铜、铁、骨、石等类遗物残片,完整器较少。陶器可辨器类有夹砂红陶釜、泥质灰陶折沿盆、泥质灰陶甑、泥质灰陶罐、板瓦、筒瓦、纺轮、陶磨、深腹圈足碗、直腹瓮等,纹饰多绳纹、凸旋纹、戳印纹、素面、网格纹等;石器主要有砺石、磨盘等;瓷器主要有黑釉四系罐、白釉酱花碗、瓶、青花瓷片等;另出土剪轮五铢钱、铁镰刀、兽骨等遗物。汉代这应是一处小型的带有临时作坊性质的聚落遗址,遗留下了陶窑、灰坑等遗迹,金元时期人类在此活动遗留下了水井等遗迹,明清时期人类在此活动更少,仅留有少量遗物。

5. 雄安新区南拒马河防洪治理工程考古勘探

2019 年对容城县城子遗址、西河遗址 2 处文物遗存点进行了考古勘探,实际勘探面积 4.5 万平方米。城子遗址勘探发现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层厚,内涵丰富,根据出土遗物推测遗址为战国、金元时期遗址,勘探发现灰坑 1 座、窑址 2 座,未定性遗迹 1 处,年代初步判断为汉及金元时期;西河遗址勘探未发现文化层,但发现墓葬 3 座、窑址 1 座,年代初步判断墓葬为明清时期,窑址为金元时期。

6. 北京至雄安新区高速公路河北段考古勘探

勘探文物遗存点 11 处,其中容城县 4 处、高碑店市 3 处、固安县 1 处、涿州市 3 处,实际勘探面积 12 万平方米。最终确认文物遗存点 3 处,面积约 3.8 万平方米,其中墓葬区 1 处。认

定的3处文物遗存分别是容城县张市南遗址、高碑店市保定营寺庙遗址、涿州市佟村遗址。容城张市南遗址文化层厚,内涵丰富,根据出土遗物推测遗址时代为汉代;高碑店保定营寺庙遗址的时代为明清至近现代,除了寺庙基址外,还存在较为丰富的汉唐时期文化遗存。涿州市佟村遗址,发现有砖室墓1座、窑址1座,时代为唐宋时期。

(二) 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

2019年发掘3000平方米,重点对前朝后寝过渡区域的五十九号院落、十一号院落、十四号院落、二十七号建筑基址进行发掘,明确了该区域建筑布局、营造方式、道路系统等重要信息。另对西外墙、北墙、东墙3处地点进行解剖发掘,明确了西外墙的规模与营造,北墙具体位置及东墙中部营造方式,为进一步探索太子城的规模、建筑布局、功能分区提供了翔实考古资料。太子城遗址规模小,但城内建筑规格很高,遗物中“尚食局”“内”“宫”“修内司”等体现皇家性质。据《金史》载,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与五年(1205)曾驻夏于西京路宣德州龙门县的泰和宫,这与太子城在时代、性质、位置、规模与等级上高度契合,且经考古调查,太子城是金代龙门县唯一具有皇家性质的城址,故可以推测太子城即金章宗完颜景的泰和宫。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重要城址,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城址双重城垣选址理念,主体建筑呈轴线分布、前朝后寝的布局方式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研究有重要意义。“尚食局”款定瓷、仿汝窑青瓷、雁北地区化妆白瓷的组合对金代宫廷用瓷制度、供御体系研究有重大推进。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在2019年同时荣获“2018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两项大奖。

二、课题研究考古项目

在完成以上重要建设工程考古项目的同时,积极促进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张家口坝上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建立和行唐故郡遗址考古发掘。

(一) 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

1. 泥河湾盆地棋盘梁、鱼咀沟2号地点发掘

为进一步确认马圈沟剖面顶部鱼咀沟2号地点上部文化层的人工属性,棋盘梁地点的文化层序及文化遗存内涵,2019年继续发掘鱼咀沟2号地点东侧和棋盘梁地点,总发掘面积70平方米。鱼咀沟2号地点在第20层(2017年发掘的第I文化层)发现石制品17件、动物化石4件,其中石制品有明确的人工打击痕迹,可以确认为人类活动遗留下的文化遗物,时代距今125万年前后。在其上的4个层位发现疑似人工打制的石制品或动物化石。棋盘梁地点发现文化层、动物化石层各一个。文化层位于上部,发现石制品22件、动物化石1件。动物化石层位于下部,非常丰富,发现1431件,动物化石风化严重,表面的有机质多遭到风化破坏,多呈碎块状,目前可鉴定种属有:牛、犀牛、马、羊、鹿,另有少量食肉动物下颌骨及牙齿。文化遗物埋藏于大田洼台地油房断层的上盘,低于半山遗址文化层约3米,依据已有的古地磁测年结果,时代在距今135万年前后。

2. 泥河湾盆地石沟遗址考古发掘

2019年度对石沟主发掘区河湾湖相沉积层中发现的形成于更新世早期的自然冲沟进行了重点清理,揭露冲沟范围长达13米之多,沟口最宽处可达1.9米,最深处达0.8米。累计出土遗物数量688件,其中石制品26件,砾石312件,鸵鸟蛋皮2件,粪便化石8件,化石340件。哺乳动物种类包括剑齿虎、犀牛、马等,骨骼部位包括颅骨、躯干及四肢。

3. 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考古发掘

东谷坨遗址为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河湖相堆积中的关键遗址,具有多个文化层位,本次发掘获得细致全面的地层序列,可为我们研究古湖演化和人类活动关系提供基本材料,探讨对泥河湾古湖演变和早期人类行为演化关系;结合飞梁遗址、麻地沟遗址,综合分析,重建东谷坨遗址及附近河湖相堆积的沉积环境,进而通过不同遗址不同层位人类活动的特点、强度等恢复古湖岸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系统研究东谷坨遗址时期古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过程,揭示早更新世泥河湾古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出土石制品2000余件,

动物化石 1000 余件,以及大量的筛选碎屑。

4. 泥河湾山神庙咀化石点考古发掘

山神庙咀遗址化石富集层顶面的高程是 914.23 米,化石富集层位于下灰绿色粉沙—黏土层,与小长梁遗址的化石层几乎位于同一水平,同属旧石器时代早期,获得哺乳动物化石标本 82 件,主要包括犬科、马、犀牛、鹿、牛和羊等属种,化石以破碎的头后骨骼居多,牙齿较少。

5. 蔚县盆地吉家庄旧石器遗址考古发掘

发掘分为吉家庄-E 地点、蔡家沟-A 地点和蔡家沟-B 地点。其中,吉家庄-E 地点 2019 年发掘面积约 50 平方米,出土编号标本 7 件,其中石制品 1 件,动物化石 6 件;蔡家沟-A 地点发掘面积约 30 平方米,出土编号标本 878 件,其中石制品 344 件,动物化石 534 件;蔡家沟-B 地点发掘面积约 20 平方米,出土编号标本 202 件,其中石制品 48 件,动物化石 154 件。

2019 年度发掘表明,吉家庄-E 点均埋藏于泥河湾盆地湖相沉积内,与前上营遗址属于同一层位,通过区域地层对比和哺乳动物化石的特征判断,年代大致为中更新世。蔡家沟-A 和蔡家沟-B 地点地层堆积情况与吉家庄遗址其他地点近似,其上皆为一层黄色马兰黄土,文化层位于上下两层灰—灰绿色黏土层之间。大量文化遗物出土于棕黄色致密粉砂层,该层局部夹粗砂条带,见波状层理和条带状棕黄色锈斑,局部区域可见炭屑。综合吉家庄区域内各遗址地层分布状况,推测蔡家沟-A 地点和蔡家沟-B 地点年代不晚于深海氧同位素第 5 阶 (MIS5),地质年代大致为中更新世。

(二) 张家口坝上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建立

1. 康保县兴隆遗址考古发掘

发掘面积 1100 平方米。主发掘区地层分为 6 层:第①层为现代表土层;第②层为辽金地层;第③—⑤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第⑥层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石器、动物骨骼、陶器、骨器等。遗址堆积丰厚,出土遗物丰富,初步构建起了坝上地区北部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序列,是本区域考古学文化命名和分期研究的标杆性遗址。兴隆遗址整体沿用时间跨数千年,为本区域所罕见。通过与区域内调查发掘的其他遗址对比,初步推断遗址至

少在距今 9000 至 7000 年间为区域内为数不多的常年性居住聚落,兼具大本营和冬季营地性质。其新石器时代第一期房址,更是代表了我国北方最早的定居聚落之一。

2. 尚义县四台蒙古营遗址考古勘探

四台蒙古营遗址是一处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C14 测年距今 7580 至 7670 年(未经树木年轮校正),发现有粟、黍、藜属和小麦族等植物。发现的遗迹主要为半地穴房址,出土陶器、玉玦、石铲、石斧、石磨盘、石磨棒等。遗址分布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由北往南分为呈不连续分布的四个聚落片区,区域之间相互距离 620 米至 50 米不等。

四台蒙古营遗址是河北省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又一重大发现,是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填补了新石器区系的空白;对研究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欧亚草原东端的文化面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开启了草原新石器文明时代。

3. 邓槽沟梁遗址发掘

遗址面积超过 40 万平方米,C14 测年 8000 年—距今 4200 年之间,考古发掘 300 平方米,主要涉及对遗址中北部居址区的发掘,以及对遗址东部边界的解剖。其中对居址区的发掘,发现灰坑、房址等遗迹现象,其中灰坑多为房屋废弃之后的再利用,房址多为半地穴式房屋,形制为圆角方形,中部多有灶坑;遗迹均开口于近现代耕土层下。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动物骨骼等遗物,其中骨器所占比例较大,有骨簪、骨锥、骨针等,陶器器型有盆、罐、抹子、彩陶片等。陶器表多饰绳纹和篮纹,年代为龙山晚期。该遗址延续时间长,文化面貌丰富,发现有裕民(兴隆)、后冈(仰韶早期)、海生不浪(仰韶晚期)、龙山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该遗址对于厘清该区域考古学文化变迁与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龙山时期的城址为河北首次发现。

(三) 行唐故郡遗址考古发掘

2019 年发掘遗址面积 1025 平方米,清理东周时期灰坑 38 座、墓葬 5 座及附葬车马坑 1 座、水井 6 眼、灰沟 2 条、道路 1 条,此外还清理汉代墓葬 6 座,金元时期墓葬 5 座,出土青铜、陶、玉石、瓷器等各类文物 130 多件套。

通过 2019 年度考古发掘,使故郡的遗址地层、遗址分期、墓葬与遗址关系更加明确,遗址

内容更加丰富,新发现战国中晚期北向积石墓葬,随葬仿铜陶礼器鼎、豆、壶、匜、球腹壶等,与之前出土青铜器的墓葬方向、随葬器物不同,年代可能为赵灭中山后。另外新发现西汉土坑竖穴石室砖室墓葬4座、金元圆形砖室墓4座。

三、城市考古工作

(一) 正定古城考古发掘

正定开元寺南广场考古发掘面积共计1000平方米,发现遗迹现象80余处,出土遗物1700余件。经过一年的考古工作,对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的遗存布局及演变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对正定古城唐五代以降的城市布局、功能变化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状况都有了新的认识。

正定城隍庙项目地块文物勘察,勘探面积1.2万平方米,发掘面积648平方米,对城隍庙的建筑布局有了清晰的了解,为优化城隍庙的复建工程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

正定县东城墙合围工程考古勘探,勘探面积2.4万平方米,确认了勘探范围内城墙的位置、结构及保存状况,为正定县东城墙合围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正定广惠寺华塔东部区域考古勘探,勘探面积1.2万平方米,为广惠寺周边实施更新整治工程中的文物保护提供重要依据。

正定府文庙考古勘察工作,勘探面积5160平方米,发掘面积128平方米,清理出了府文庙泮池遗存,完善了对府文庙布局的认识。

正定古城墙东城门(四号山)遗址保护工程考古勘察,勘探面积4.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4950平方米,揭露了主城门、马道、城墙、月城等遗迹现象,明确了东城门的布局和分期。

(二) 邺城遗址考古工作

2019年邺城考古围绕“河北邺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创新课题,以探索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平面布局和核桃园北齐佛寺平面布局为学术目的,主要开展了两项发掘工作:第一,东魏北齐宫城区发掘,项勘探面积约7.4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掘工作主要围绕宫院东南角、疑似宫城东墙、206号大型建筑北侧及东北部附属建筑展开。第二,东魏北齐南郭区宗教、礼制建筑区的发掘,发掘面积550平方米,

发掘工作围绕核桃园北齐佛寺外围边界的探寻展开。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的发掘为探寻宫城区范围、平面布局、宫院制度积累了重要实物资料。宫城区206号大型建筑基址北侧及东北部附属建筑的发掘为了解宫城内部单体院落的格局、建筑组成、建造技术和工艺等均提供了崭新的材料。核桃园北齐佛寺西侧的发掘为探寻核桃园北齐佛寺范围和平面布局开辟了新的思路。赵彭城村东南地建筑遗迹的发掘为确认东魏北齐邺城明堂的位置及建筑形式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四、其他考古项目

(一) 曲阳修德寺遗址考古发掘

对修德寺遗址进行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总计勘探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勘探确认各类遗迹225处,其中灰坑98座、墓葬94座、窑27座、基址6座,对其中的81处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具体为建筑基址1处、灰坑54座、墓葬16座、窑5座、井5座。2019年修德寺勘探与发掘的主要收获有以下几点:1.基本明确了民国、明代、北宋三个时间段内,修德寺寺院围墙的位置、寺院规模及明代修德寺后殿的位置、规模与营造方式。2.清理了东汉、元代、清代等不同时期的墓葬16座,为研究曲阳地区不同时期墓葬形制演变、随葬品组合、埋葬习俗等提供了新资料。3.清理了一批灰坑、窑炉、井等生活类遗迹,基本搞清了修德寺遗址范围内,金、元、明清不同时期内文化层的叠压打破情况,为探索修德寺的演变提供了新资料。4.清理宋金时期的白石造像坑5座,出土各类造像残件100余件,为进一步研究定州系白石造像的形制、演变、特征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二) 蔚县三关辽墓考古发掘

本次发掘墓葬14座、明堂(墓镇)1座、兆沟4条,总发掘面积约870平方米。此墓地是目前燕云十六州地区发现较为完整的汉人家族墓地,以明堂为中心各墓葬依辈分有序排列,东南西北四面设置兆沟,这种结构在目前发现的辽代墓地中不多见。明堂、兆沟、M1-7作为墓地的主体遗迹单位,是“重熙五年”修建,从仿木结构和壁画中所绘器物看,为北宋风格。说明在辽统治下,汉人居住的燕云地区一直沿用前朝的

生活习俗,也充分证明了辽朝“因俗而治”“南北分制”的宽松政治制度。近年来,辽代墓葬在燕云地区屡有出土,但纪年墓很少。M1墓室内倚柱上的纪年题记和墓志文中均有“重熙五年”(1036年)的确切记载,此墓地的发现,不仅丰富了该地区的辽墓资料,而且也探讨了该地区辽墓分期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墓葬壁画的绘画种类可分为花鸟、人物、山水、界画等,内容多取材于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有侍奉、散乐、花鸟以及休闲对坐等场景;绘画风格多为工笔重彩,用色庄重,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绘画技法多运用双勾晕染填色,线条刚健清劲、皴擦点染等技法娴熟,点彩运用的尤为精彩,有五代遗风,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蔚县位于河北北部,辽代时属西京道,是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的重要地区。因此,该墓地的发现对两种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 献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考古发掘

发掘墓葬14座,窑址9座,井1座。其中墓葬时代从西汉到东汉均有分布,窑址时代以东汉为主。从窑址内出土的遗物判断,东汉时期的窑均为烧制砖的窑。这批考古资料为研究献县汉代文化和献县汉墓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东汉窑址的考古发掘为献县汉墓群中编号M8、M9的墓葬年代判断提供了重要参考意义。

(四) 鄂安沧输气管道馆陶樊堡遗址发掘

完成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29处。出土大量建筑构件,以砖、瓦为大宗,生活器类有瓷器、陶器、铁器和铜钱等,为一处元代民居遗址。樊堡遗址出土的瓷器特征与观台窑第四期瓷器特征相符,观台窑第四期时代为金末至元末,因此樊堡遗址时代主体为元代。樊堡遗址出土建筑构件,板瓦占绝对多数,青砖与筒瓦数量相对较少,未见瓦当和滴水,有一定数量的条子瓦,说明樊堡遗址的建筑为有脊瓦顶建筑,建筑围墙起建前修基槽。樊堡遗址为一处民居建筑遗址。樊堡遗址部分灰坑内填土和建筑构件粘连大量草木灰和红烧土颗粒,建筑显然经过大火焚烧。馆陶处于漳卫之间,水患常有,大平

原无高阜可凭依,又地处冀鲁交界,易闹匪患,樊堡遗址之毁坏可能与匪患有关。元代民居建筑保存至今的已十分稀少,樊堡的民居建筑遗址是研究元代民居的建筑形态和建筑方法的范例,同时对于民居建筑风格和技术嬗变研究有重要意义。

(五) 唐山 LNG 外输管线工程河北段项目考古勘探

为配合唐山 LNG 外输管线工程河北段项目建设,准确掌握地下文物埋藏的位置坐标、数量、分布格局及形制规模,对前期调查发现唐山市丰南县孙氏墓地、廊坊市永清县别古庄遗址、西张庄墓地、东镇遗址墓地4处文物地点进行了勘探,勘探总面积1.2万平方米,为下一步该项目文物保护工作提供重要资料。

(六) 涿州小柳村遗址考古发掘

北京至雄安新区高速公路涿州支线小柳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清理金元水井1眼,汉代灰坑1处,汉代陶窑1座。

(七) 鄂安沧输气管线工程献县窦三疃遗址考古发掘

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遗迹40余处,出土各类文物小件、标本百余件。明确遗址时代为唐代,为献县地区研究唐代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本年度进行的其他考古项目还有:阜平石槽沟水库工程文物考古调查、天津至北京新机场联络线工程文物考古调查、京雄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文物考古勘探、京德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文物考古勘探、廊涿城际铁路考古调查、荣乌新线工程文物考古勘探、平山东贤壁墓地考古勘探、行唐县中医医院考古发掘等。

五、课题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

(一) 课题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雄安新区文化遗产考古调查及分类保护研究》资料整理,据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雄安新区地域范围内共发现各类不可移动文物遗存21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未核定保护级别遗址204处。文物藏品总量为824件。非物质文化遗产213项。这些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存构成

了雄安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蕴含了雄安新区历史文化发生、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留住雄安新区的历史文化,就留住了雄安新区的根和魂。没有雄安的历史文化,就没有雄安的未来。因此,在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中,要始终注重雄安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延续雄安新区的历史文脉。避免在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中,使得雄安新区历史文化遗产遭到破坏。

本课题基于上述认识,把雄安新区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遗存作为研究对象,系统评估这些不可移动文物遗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社会价值,并对其进行分类研究,探讨其在雄安新区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作用,提出保护意见或建议。同时,为编制雄安新区文物保护规划提供基础资料,为雄安新区决策层出谋献策。。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北迁安爪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爪村遗址历经多次发掘,出土文化遗物丰富,主要包括石制品、骨制品、磨制骨器、动物化石等,总量接近1万件。石制品为主要的文化遗物,石器技术复杂,包含了东亚地区两种主要的石器技术模式:石片石器工业、细石叶工业,分别与非洲、欧洲的奥杜威模式、细石叶技术模式对应。在该遗址,石片石器工业是主流,自5万年前延续至3万年前后,这一技术工业的源头在华北地区可追溯至100万年以前,是小石器工业在本区的继承和发展。细石叶工业在该遗址仅出现于86020地点,距今2.6万年前,处于华北地区细石叶工业出现的最初阶段,对探索细石叶技术的来源具有重要价值。

爪村遗址的时代跨越“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论”主张的现代人在东亚地区出现、扩散的重要时期,其早期石器工业继承发展了华北地区百万年以来延续发展的小石器工业,是本地区古人类连续演化的重要证据。晚期阶段出现了华北地区最早阶段的细石叶工业,对这一技术工业的来源,学术界多有争论,本地起源、外地传入两种观点长期存在。该遗址地处主张“细石叶技术外地传入”观点认为的细石叶技术源自俄罗斯远东的东西伯利亚地区,自东北传入华北地区的重要通道上,结合该遗址细石叶技术的时代处于华北地区细石叶出现的最初阶段,对研究这一技

术的起源将起到推动作用,对研究华北地区现代人的演化过程将作出重要贡献。

执行该课题,对遗址的考古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将建立燕山南麓东段区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序列,揭示该区域现代人类的出现、演化过程,对研究东亚地区现代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探讨现代人的起源模式等提供重要资料。

(二) 考古资料整理工作

张家口早期长城资源调查资料整理、南水北调唐县淑间遗址资料整理、平山县郭村祭祀坑遗址资料整理、定州北庄子汉墓出土墓志石题铭拓片整理、南水北调邯郸磁县南城遗址发掘资料整理、武安磁山遗址发掘资料整理、肃宁后白寺遗址资料整理、郭堤城瓮棺葬资料整理、定州北庄子墓地资料整理、邢窑资料整理等正在有序进行中。

六、学术交流与学术研究

(一) 学术交流

2019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业务交流有:考古发现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黄淮七省考古论坛、第七届中国公共考古桂林论坛、考古发现与古代文明研究论坛等,通过学术交流,提升了业务能力。

(二) 学术成果

本年度出版的学术专著有:《南宫后底阁》,2006年4月,南宫市紫冢镇后底阁村村民取土时发现石造像70余块,考古队先后分两个阶段对后底阁遗址进行了勘查和发掘。抢救发掘地点出土大量精美造像,并部分建筑残迹,基本可以认定是一处寺庙遗址。遗址所出土的石造像为有意砸毁并掩埋,寺庙建筑也均被拆毁,可能和唐武宗时期的灭佛事件“会昌法难”有关。

此次发掘出土造像共279件,其中有铭文造像43件,造像时代初步判定为东魏、北齐—隋、唐代三个阶段。出土造像多为汉白玉石质,部分青石质和素烧陶瓷;按造像形制可分为背屏造像、龕式造像、圆雕造像三种;按尊格分为如来、菩萨、比丘、童子四类。

《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2012年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发现是中国佛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坑内出土造像数量众多,发掘编号2895件(块),另有造像碎片78袋。出土造像

绝大多数为汉白玉质，少数为青石和陶质。

本书为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整理的阶段性成果展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公布了 131 件造像，既为配合国家博物馆关于邺城造像的专题展览[“和合共生——临漳邺城佛造像展”特展（展览时间：2019 年 8 月 6 日—2019 年 10 月 27 日）]，同时也拟与国内外学界关心这批遗物的同行分享先期成果。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有：《战国中山国度量衡及相关问题》，中山国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由北方游牧民族——鲜虞族建立的国家，其实力仅次于七个万乘之国，在列国争强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度量衡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基本标准，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对战国中山国度量衡综合、全面的考察，以及与其他诸侯国度量衡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山国度量衡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作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度量衡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不仅可以弥补以往学界研究的某些不足，而且对研究中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相关问题颇有裨益。

《河北省考古七十年回顾与展望》，新中国走过了 70 年的辉煌历程，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步伐，河北考古经历了初创（1949—1965）—发展（1966—1981）—成熟（1982—2019）三个历史时期。在这期间，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短期停滞，但河北考古事业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经过三代考古人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 10 项考古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3 项入选“20 世纪重要考古发现”，出版 60 余部考古学专著，为河北考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河北黄骅发现的两处古墓葬》，2015 和 2018 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黄骅市博物馆分别对河北省黄骅市郑家口村和齐家务镇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郑家口墓葬为两座南北排列的唐代墓葬，齐家务墓葬为三座东汉晚期至隋唐时期的砖室墓。两处墓葬虽遭不同程度破坏，却是黄骅地区为数不多的进行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汉唐墓葬，多样的墓葬形制和一定数量的随葬品，丰富了该地区汉唐墓葬的基础资料，对研究该地区汉唐时期社会生活、丧葬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阳原县西白马营旧石器时代遗址 2015 年试掘简报》，西白马营遗址地处泥河湾盆地中部，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东约 8 千米，南距桑干河 5 千米，在白马营村南约 300 米的南沟东岸。该遗址于 1985 年发现，当年即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织进行试掘，并于 1986 年进行了正式发掘，两次发掘面积共 76 平方米，获取石制品 1546 件、骨片 315 件，以及大量脊椎动物化石。受当时发掘技术和研究手段所限，文化遗物埋藏状况等大量的遗址现场信息缺失，对遗址年代的认识并不精确。因此，201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阳原县文管所，对该遗址再次进行小规模试掘，试掘面积为 9 平方米。发掘区的文化层连续分布，厚 1.05 米；出土各类文化遗物 2000 余件，包括石制品、骨制品、动物化石（鸵鸟蛋皮碎片）等。

《河北平山访驾庄墓地 M8 发掘简报》，1998 年为配合朔黄铁路建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河北省平山县访驾庄村发现的 9 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其中 M8 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为丰富，为战国晚期中山国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北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勘察简报》，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位于正定古城内开元寺的南侧，是一处跨越晚唐至明清时期的古代城市遗址。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4 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展开考古勘察工作，发现了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晚唐五代城墙系统和唐宋至明清时期居民生活系统三个遗存系统，还出土了众多的珍贵文物。这一发现为研究正定古城布局和功能变迁，探讨唐宋以来华北平原城市历史和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材料。

《河北定州 2015 年出土北朝、隋唐白石造像》，2015 年 8 月，河北定州开元寺塔东北 80 米处施工时发现北齐白石造像残件 1 件。同年 12 月，定州静志寺塔地宫西南 80 米处施工时发现白石造像坑一处，出土造像残件 249 件，主要为东魏北齐时期，亦有少量隋唐时期，两次出土造像均由定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清理入库。后次是继发掘于 1953—1954 年的保定曲阳修德寺遗址、2006 年的邢台南宫后底阁遗址、2012 年的邯郸临漳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后又一次大规模出土定州系白石造像。

《河北地区古代瓷窑的谱系》，由于黄河和太行山的阻隔，河北地理单元相对独立。其瓷器、瓷窑，自北朝创烧到近代，有典型的演进形态，是北方手工业发展的缩影。本文按照窑炉、窑场、窑口、窑区、窑系等层级，采取个体描述、系统划区、互动分析的方法，梳理河北瓷窑文化发展的脉络，凸显中心—边缘的震荡递进模式、胎装饰与彩装饰交互影响、审美引领技术的同步共振，并推论文化变迁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原因。

《河北保定市满城区要庄遗址发现的周代青铜器》，要庄遗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要庄乡要庄村，地处太行山东麓的平原地带，西与眺山遥遥相对，东、北邻近漕河。该遗址发现于1977年，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以周代遗存为主。2013年，要庄遗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对于探索太行山东麓周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定窑“尚食局”款瓷器的分期问题》，关于定窑“尚食局”款瓷器的年代，有北宋晚期、金代熙宗以后两种观点。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宋金时期定窑均向尚食局进贡瓷器；对2009—2010年定窑窑址和2017—2018年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尚食局”款瓷器，及其他地点出土的该款瓷器进行汇总与分析后，可将其分为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后期三个时期，而不同时期的“尚食局”款瓷

器在器形、装饰、特征等方面各有特色。

本年度发表的其他学术论文还有：《河北隆尧乡观遗址 I 区战国墓葬发掘简报》^[1] 《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2] 《论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3] 《廊坊大城县燕南长城 2018 年发掘简报》^[4] 《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发掘简报》^[5] 《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浅识》^[6] 《河北滦平县梨树沟门墓地发掘简报》^[7] 《邺南城东魏北齐宫城釉陶瓦及相关问题》^[8] 等。

（张春长：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马超：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

参考文献：

- [1] 韩金秋等.河北隆尧乡观遗址 I 区战国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19(4).
- [2] 黄信等.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J].考古,2019(7).
- [3] 韩金秋.论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J].北方民族考古,2019(7).
- [4] 佟宇喆.廊坊大城县燕南长城 2018 年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19(3).
- [5] 韩金秋等.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9(6).
- [6] 韩金秋.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浅识[J].文物,2019(6).
- [7] 韩金秋等.河北滦平县梨树沟门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9(1).
- [8] 胡强.邺南城东魏北齐宫城釉陶瓦及相关问题[J].文物世界,2019(1).

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研究

金胜勇

2019年河北省的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在“图书馆学理论”“用户服务”“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管理”“文献学”领域，其中尤以“用户服务”方面的研究比重为最大；研究主题覆盖学科理论、业务工作、事业建设和文献研究的各个方面。这些研究及相关研究成果，代表了2019年河北省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一、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眼睛，理论建设是学术研究的

基础，对一个研究领域研究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19年的河北省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图书馆事业研究两方面。

（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如果说理论是实践的眼睛，那么基础理论则是眼睛的瞳孔。基础理论研究深刻影响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水平和走向，是学科研究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在北京大学组织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社会科学”丛书中，化柏林、金胜勇主笔了《中国图

书情报学四十年》一书中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章节,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进行系统的回顾与综述,认为“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内容更加系统,更有深度;研究机制更加完善,更有动力;研究流派更加多元,更有特点;研究范式更加科学,更有效度。这四个方面的积淀和进步,反映出改革开放四十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和态势,也为整个学科的发展奉献了划时代的引领价值。”^[1]

图书馆发展史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河北省图书馆作为我国北方早期官办的新式公共图书馆之一,前身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保定创办的直隶图书馆,1909年开馆服务,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期间,因省会三迁,1961—1987年有近30年空白期。丁若虹根据1908到1961年区间,在保定莲池及西城南马道建立的直隶图书馆、河北省立图书馆馆舍的变迁轨迹,梳理河北省图书馆的历史发展,使其发展变迁脉络更加清晰。^[2]

在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方面,孙红艳以英国威尔士公共图书馆在营销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为依据,探索7Ps理论中Promotion对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实践的指导意义及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认为公共图书馆要对自身海量馆藏数据、读者数据和开放数据进行存储、管理、分析、挖掘与运用,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渠道,还要有丰富的品牌营销和传播经验。^[3]刘静、柳贝贝等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5—2015年我国30个省份公共图书馆效率进行了测算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回归模型考察不同因素对公共图书馆效率的影响程度。其研究表明,区域公共图书馆效率发展存在不均衡性,而且导致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来源于技术效率的下降;对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公共图书馆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的共同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率、缩小区域差异的对策建议。^[4]张行从馆配商综合能力、采访书目信息、图书供应能力和特色服务能力4个方面构建馆配商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馆配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馆配商和图书馆可以从完善招投标环节,提高馆配商服务水平和加强馆配商与出版社联系等方面

来实现双方的共赢。^[5]

(二) 图书馆事业研究

对图书馆事业宏观发展的研究,是图书馆学应用理论研究的核心构成。图书馆事业研究包括人才建设、制度建设、体系结构、创新发展等多个方面。在人才建设方面,图书馆管理人员要积极顺应改革趋势,本着开拓创新的思维来进行新时期图书馆管理工作。李昱瑾等从人才队伍建设的视角,就高职院校图书馆管理改革创新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究,通过对高职院校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对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和完善管理策略进行了详细的介绍。^[6]陈则谦等人认为专业认知是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完成专业学习、形成专业素养、成为专业人才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们以H大学图书馆学专业为个案,综合运用扎根理论和类型分析的方法对相关内容进行处理,发现专业性、专业课程、专业教师和图书馆是影响图书馆学本科生专业认知的主要因素;专业认知的发展过程包括先验期、接触期和形成期三个阶段,专业认知会因所处阶段和影响因素的差异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7]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不仅在图书馆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其他行业也可以发光发热。李琳基于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大背景,进行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的招聘需求和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方案的相关探索。发现电子商务领域有必要增设招聘岗位、增加招聘专业,招聘具有信息组织、信息分析能力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图书馆学科有必要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合多领域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图书馆学科应加强与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促进互利共赢。^[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是中国第一部图书馆专门法,是为了加强对公共图书馆管理,推进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公共读书阅览权利而制定的法律,是我国在图书馆立法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金胜勇、李晓璐、章亭从法律的作用角度出发,按照法的规范作用分类,从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强制作用五个方面阐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价值,同时也具体指出公共图书馆法强制力不足,以及在调整各方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缺失和不足;对《公共图书馆法》中与信息资源建设关系最为直接的版权保护有关

部分作了客观的分析,为今后《公共图书馆法》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了建议和思路。^[9]此外,法的第43条提出对于读者个人信息应予“妥善保管”,从而对公共图书馆的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提出更高要求。王肃之、翟军平通过对美、英两国的国家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研究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提出要注重读者个人信息的类型化、注重对读者个人信息权利的保障、明确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内容与边界。^[10]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图书馆作为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也应紧跟时代的脚步,以创新谋发展。李和顺、齐雪洁等对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运用VR全景图书馆技术进行了简单介绍。在电子阅读大行其道、纸质书刊阅读量减少的情况下,图书馆采用VR全景技术可以拓宽读者服务渠道,为服务创新提供了新途径,能更好地推介图书、吸引读者,提高服务质量。^[11]在当前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成为各国战略发展重点的背景下,高校作为高素质现代人才培育的中心,传统的高校图书馆逐渐意识到探索转型发展,建立智慧图书馆的重要性。基于此,李岩等人论述智慧时代高校图书馆转型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根据传统图书馆发展现状,智慧图书馆发展特征以及当下我国高校图书馆转型困境问题,提出了我国传统的高校图书馆的转型对策。^[12]数字图书馆最大的特点在于其虚拟化和网络化。数字图书馆利用网络和数字技术,将不同载体、不同类别的图书文献信息资源,存储于一个开放式的硬件及软件集成平台,通过技术与产品的集成对各种文献载体进行数字化处理,实现跨越时空的、便捷的网络文献信息服务。尤其是通过搭建的数字图书馆技术服务平台,实现跨地域的多级图书馆之间的数字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推进区域性图书馆数字化、共享化服务体系的构建。^[13]高校图书馆作为为师生乃至社会科研、教育学习等的服务组织机构,在学校文化建设中起着引领作用。对此,苏然然等人分析图书馆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提出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的途径及对策。即,对图书馆环境文化进行改造,加强图书馆的保障制度建设,打造图书馆价值文化,强化品牌思维。^[14]赵雪云将低碳生活与高校图书馆相结合,提出高校低碳图书馆,提出要从加强宣传、形成

氛围、达成共识,监督检查,强化行动和落实,寻找规律,形成制度,循序渐进,达到自觉这四点入手建设低碳图书馆。^[15]

农家书屋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公共文化五大惠民工程之一。河北省农家书屋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陈丹丹、杨洪江等选取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10个行政村的农家书屋,就农家书屋工程竣工后的运营状态、资源建设、管理与服务现状等进行调研,提出从多元化的资金保障、规范化的管理运行、以需求为中心的读者服务、共建共享、监督评价与激励五个方面,构建农家书屋长效发展机制及应采取的相关策略。^[16]王庆良、王珩等通过分析国内农家书屋发展现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传统应对措施的限制性,解析国内同类网络平台的优缺点,坚持问题导向,整合解决思路,研发了一个功能相对完备的“农家书屋综合管理平台”。^[17]

二、用户服务研究

图书馆用户服务也称图书馆读者工作,是指图书馆利用馆藏和设施直接向读者提供文献和情报的一系列活动。2019年河北省图书馆学界在图书馆服务研究方面有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高校图书馆服务、阅读推广服务以及服务方式创新研究成果较多。和以往相比,今年河北省图书馆界对于服务方式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加。

(一) 阅读推广服务

阅读推广服务是图书馆向公众提供的一项重要的重要的阅读服务,对推进全民阅读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同时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国民阅读状况。杨秀丹、陆遥对当前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图书馆科普阅读推广活动开展现状进行整体性梳理,发现科普阅读推广活动在主体上呈现多元性,社会力量参与度较高;活动类型丰富繁多但不聚焦;活动内容以书目推荐、数字阅读为主;活动对象区分明确。论文提出公共图书馆以科普书籍与读物为核心和目的,走“激发阅读兴趣、聚焦科学知识传播与普及、品牌化持续性推广活动”的发展路径。^[18]杨洪江、丁若虹以河北省图书馆学会、河北省图书馆发起并连续举办14年的全省性青少年阅读推广项目“燕赵少年读书

系列活动”为例,介绍了项目概况,通过对项目设计、组织实施实践的分析,提出了推动区域性青少年阅读推广项目的途径与手段,阐述了组织与实施区域性阅读推广项目的意义。^[19]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方面,孙婧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研究背景,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影响京津冀高校图书馆联合进行阅读推广的内、外部优劣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京津冀高校图书馆联合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对策与建议。^[20]谷娜认为阅读推广工作是高校图书馆的创新服务模式,高校图书馆只有加强团队的专业化建设、优化工作流程、创新活动形式、打造活动品牌、提升知识服务水平,开展个性化的阅读推广模式,加强活动效果评价与分析,才能使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更加专业化、系统化、知识化、规范化。^[21]吕建新等人以媒介融合为视角,结合新媒体环境下读者阅读需求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实践,梳理当前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现状。得出结论认为,高校图书馆可通过变革资源组织模式、加强数字多媒体宣传推广、投身数字资源的组织利用等措施,拓展阅读推广渠道,创新阅读推广方式,为我国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提供借鉴。^[22]吴静、张蓓蕾认为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高校师生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而这一改变也对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与挑战。文章对高校图书馆新媒体阅读推广活动的实施效果和现状展开分析,并提出策略。^[23]寇爽、杜坤对“新生共同阅读计划”的目的、实现途径进行了介绍,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高校图书馆可以从成立专门的新生阅读推广机构、拓展新生阅读推广主体、建立新生阅读推广长效机制、丰富新生阅读推广内容、鼓励新生积极参与五个方面开展面向大学新生的阅读推广活动。^[24]王丽、臧晓畅、孙琪从高校阅读推广现状出发,将研发文创产品思想引入艺术院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分析了文创产品与阅读推广协同发展的优势,阐述了艺术院校图书馆文创产品与阅读推广协同发展的路径和深入思考,旨在进一步探究艺术院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实施方案。^[25]张慧敏、安琳在分析体育类专业学生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虚拟社区为例的阅读推广模式。^[26]

阅读推广人才培养方面,张忠凤、樊俊荣等

人阐述了图书馆阅读推广中馆员应具备的素养认知,分析图书馆阅读推广中馆员数字素养提升的必要性,提出了图书馆阅读推广中馆员数字素养提升策略,以便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作用。^[27]

在具体的阅读推广内容方面,赵俊玲、苑艺介绍了美国20世纪30~40年代公共图书馆阅读指导服务领域的代表人物——詹妮·弗莱克斯纳。指出,詹妮·弗莱克斯纳强调阅读指导的成人教育功能,注重读者对特定主题的系统阅读;认为阅读指导应以读者为中心,强调阅读指导的个性化,反对模板化的阅读指导服务,注重读者自身读物选择能力的培养;注重对阅读指导服务对象及效果的实证研究。她的服务思想对今天阅读指导服务的开展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28]肖佐刚、杨秀丹结合国内实际案例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经验讲述科普阅读推广的发展与现状。书中所论及的科普阅读推广理论、阅读推广组织与资源、空间设计以及推广方法方式均体现出较强的创新性,对有效推广科普阅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29]

(二) 知识服务

知识服务是当前图书情报界理论研究和工作的实践关注的热点之一,也是图书馆用户服务的重要发展方向。廉立军在对医学专业认证相关研究现实状况简要介绍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知识服务在医学专业认证中的地位与作用。从推进知识服务新发展、营造知识服务新氛围、夯实知识服务新基础、发挥知识服务新效能、提升知识服务新价值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专业认证视角下医学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发展的具体实施策略。^[30]

学科服务是知识服务基本模式之一。李梅、邵彦坤等以河北医科大学图书馆ESI学科服务实践为例,介绍河北医科大学ESI学科分析、河北省高校科研竞争力分析、同类医学院校科研竞争力分析、ESI学科发展动态跟踪、ESI期刊投稿指南编制和ESI学科文献资源建设;阐述在实践中对分析指标、数据处理工具与方法、平台建设、沟通机制的思考和建议。^[31]段红智指出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化服务的必要性,在学科化的实施过程中学科馆员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学科化服务和传统的服务模式,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并简要概括了学科化服务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具体建议。^[32]杨冉、郭虹良、曹茹桦认为高校图书

馆开展学科服务在助力高校“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发挥着愈渐凸显的作用。从学科馆员服务、学科服务内容、学科平台搭建三方面总结归纳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领域的研究现状。^[33]高珊在介绍云计算概念和特点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云计算环境下学科服务发展的新方向:包括建立学科战略联盟、实现学科服务知识增值、深入科研一线全程跟踪研究以及打造虚拟学习空间,介绍云计算技术为传统的“藏—参—教—联”学科服务模式提供了哪些新的可能性。^[34]焦玲霞、马岩介绍嵌入式学科服务,调研美国 and 我国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方式和特点,并从服务意识、嵌入对象深度和服务广度以及图书馆营销推广力度三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对我国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发展提出建议。^[35]许子媛认为随着我国“双一流”建设战略的贯彻实施,高校图书馆应该抓住“双一流”建设机遇,致力于构建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服务目标精确、服务内容精准、服务质量高效的学科服务新体系。为此,作者基于服务一流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从合作建立、合作路径、合作策略上构建面向一流学科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联盟模式,并给出联盟实施建议。^[36]

智慧服务也是图书馆用户服务中的发展热点。李东燕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图书馆也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图书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转变自身的发展观念,通过构建大数据分析和智慧服务平台的方式,强化图书馆的发展水平,这样才能够提高图书馆的竞争优势。^[37]牛宇峰认为随着微信公众号的发展、普及以及应用,高校图书馆用户的信息环境和学科信息需求变得复杂多样,用户对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要求、服务方式和方法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建立图书馆智库以转变传统的知识服务方式对于提供个性化知识服务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智库作为案例,分析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智库的知识服务内容。^[38]

(三) 服务方式创新研究

互联网时代,图书馆工作对于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已经不再陌生,特别是在图书馆服务模式创新方面。李东燕指出图书馆必须要了解和掌握大数据的本质和特点及其发展方向,这样才能最大

化发挥出大数据的优势,精准的定位读者阅读需求,让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提升,在多媒体网络智能化的帮助下,把大数据引入图书馆多角度管理服务中,才能使得图书馆的服务得以创新。^[39]曲素钦等认为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背景之下,进行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创新是有必要的,并找出目前读者服务工作中的不足,并且提出相应的可行策略:首先是提高对服务读者的积极意识;其次是完善读者服务的内容;最后采用多元化的服务方式。^[40]

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进程明显加快,关美认为在图书馆产业竞争态势加剧、消费需求多样化的趋势之下,借助数字化运营来扩大、丰富图书馆行业的内容与形式,逐步增强数字化图书档案的配套服务质量,为图书档案的服务机制革新提供了切实的借鉴。^[41]田静提出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图书馆的服务创新路径:明确服务目标,满足群众需求,实现资源整合,提供特色服务,实现跨界融合发展。^[42]

图书馆服务方式的创新,在于提出新的服务方式,也在于对传统服务方式进行变革。崔稚英对河北省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情况进行了详细调研,通过梳理全省讲座服务的现状,分析出讲座工作在该区域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提出河北省公共图书馆讲座业务发展的对策,对传统的讲座服务进行了创新。^[43]王云等人对高职院校阅读引导模式进行创新,认为对于图书馆而言,阅读引导模式创新亦是对其自身价值的发挥,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44]魏蕊、孙一钢提出我国国家图书馆支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策略,包括打造专业服务品牌 and 提供系统的专业信息服务来支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同时探索文创产品开发中心服务模式带动业界共同参与文化产业的模式创新。^{[45][46]}刘静等系统梳理了创客空间和图书馆服务创新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基于创客空间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分别从理念层面、服务层面、空间层面 and 用户层面分析创客空间对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正向驱动作用机制;从规划层面、资源层面、技术层面 and 馆员层面分析图书馆服务创新对创客空间的逆向反馈作用机制。^[47]

新媒体如今也成为了图书馆开展服务的途径。李东燕等以新媒体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服务模

式改进为基础,对新媒体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改进特点、改进新方法及改进策略等做逐一分析,为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应用适应新媒体发展环境,提供理论参考和建议。^[48]张利香等针对甘肃医学院图书馆管理系统没有及时提醒已借阅图书到期信息的问题,提出使用微信公众号结合小程序的方法实现学生图书借阅到期提醒功能,这种新的服务模式方便在校学生和老师能够及时收到图书到期的提醒,避免图书到期未还时产生的罚款,从而提高学校图书的利用率。^[49]

服务创新是必要的,服务创新持续发展的前提是找出影响服务创新的因素。刘静等对影响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影响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因素依次是组织管理创新、服务技术创新、服务资源创新和用户界面创新,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对策建议。^[50]

(四) 高校图书馆服务研究

开展社会化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段红智等阐释了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的意义,并指出在社会化服务过程中高校图书馆创新创业面临的瓶颈问题,从这些瓶颈问题出发为高校图书馆创新创业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提出对策和建议。^[51]安琳等开展了高校图书馆向地方提供文化服务的研究,提出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虚拟化技术和媒体融合技术向地方提供文化服务,从而避免一些局限,并能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及多层次的信息素质教育服务。^[52]冯竞争阐述了高校图书馆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移动图书馆的优势,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和职业技能培训现状,提出高校图书馆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移动图书馆服务的形式和内容。^{[53][54]}魏翠玲等认为高校图书馆要高度重视服务地方公共文化建设,将大学文化融入公共文化建设大局中,并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组织,高校图书馆参与新型城镇化公共文化建设有助于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参与服务项目的设计,提供人才与服务保障。^[55]

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深深的嵌入到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张小平分析了传统信息素养教育的低效率、边缘化困境,传统的信息素养教育已经不能适应“互联网+”环境下用户的需求,结合其他高校图书馆和本校图书馆具体的实践案例,提出从“互联网+”视角下创新微视频等新形式来

提升信息素养的教育方法。^[56]秦艺认为在互联网浪潮下,大学生的阅读形式日趋多样化、个性化,阅读质量良莠不齐,分析了作为校园文化主阵地的高校图书馆,有责任承担起大学生阅读的引领作用提出了自助式服务模式,并对此模式推出的可行性进行了详细分析。^{[57][58]}

张旭等基于高校图书馆的智库服务理论研究及实践情况,对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以及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能力的内涵进行分析界定,基于能力成熟度模型理论,结合相关文献分析,从理论层面构建了包含关键主题、关键过程、关键实践以及能力等级的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分析了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价体系框架。^[59]马静等从学科发展态势、学院贡献度、期刊投稿、科研合作机构、人才评价、竞争机构情况6个维度开展研究,综合使用多种文献计量工具进行学科分析,探索了学科分析助力“一流学科”建设的实践路径,为高校学科分析工作提供方法和思路。^[60]

国外图书馆服务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地方,王潇潇、魏蕊分析美国图书馆出版服务最具代表性的高校——普渡大学,在了解其学术出版服务的背景和模式转变的基础上,从资金来源、岗位及人员设置、出版服务流程、出版服务平台和出版物类型5个方面归纳普渡大学图书馆与出版社出版服务合作模式的特点,提出对我国开展图书馆出版服务的启示。^[61]鄂丽君、马兰调查了美国高校馆开展的本科生研究支持服务,归纳美国高校图书馆本科生研究支持服务的经验,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启示包括:开展本科生研究支持服务研究,为本科生提供研究空间支持,选拔学生同伴为本科生提供研究支持服务,成立图书馆员导师团队,设立本科生研究奖项等。^[62]

三、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一) 馆藏建设研究

信息资源选择是馆藏建设中最基础的工作和最重要的环节。李嘉仁从“价值论”和“需求论”的诞生、发展入手,深入剖析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结合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认为价值论与需要论的根本关系是矛盾,并提出从矛盾的三大基本规律入手进行新的积极变革,不断推动选书工作、推动文献资源选择理论、推动

图书馆学理论向前发展。^[63]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下,高校图书馆采编工作在图书采编内容、采编人员服务方式、采编人员工作职能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孙熠等人分析了信息时代高校图书馆采编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高校图书馆要加强采编工作体系化建设、采编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并坚持图书采访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64]王玉卿等人通过调查网站发布的河北20所省属高校2016年图书资料政府采购项目,结合其对近年来河北省各高校馆招标文件中的需求参数的了解,发现省属高校馆图书政府采购活动在经费来源、下达时间、采购周期、图书采购招标文件中的需求参数、采购结果、地方财政对支付进度要求等方面的一致性 or 相似性,由此提出将同一区域或同一系统内高校馆图书的单独采购改为联合采购方式,以降低政府采购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提升政府采购效率的建议。^[65]窦建爽着眼于特色文献建设,认为市属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文献建设必须建立在地方区域发展、所在高校发展及其图书馆自身发展的基础之上,构建由特色专业、地方特色、特色专题组成的市属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文献系统。为此,市属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文献建设要做好科学完善的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建立多方协作的共建共享模式,发展高效的特色文献服务。^[66]韩曾丽、赵蕾霞、张忠凤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和相关性理论,将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8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中的中国财经类大学排行榜中的54所财经类高校作为学校样本,统计了2007年至2016年财经类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总经费、电子资源经费、纸质资源经费和经费占比,进行经费投入分析、差异性分析和实例分析,发现文献资源经费总投入,特别是电子资源经费投入,与学校排名、学校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有极强的相关性。由此提出,财经类高校图书馆要在制度保障、资源配置、联合建设、均衡发展等方面谋求改革创新。^[67]

在馆藏建设工作中,数字信息资源建设越来越占据着显著地位。魏亨认为数字资源建设在购买、利用率、知识产权和服务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境,提出引入PDA采购模式、组成联盟来抵制不良数据商的垄断行为、有效整合数据库资源、建立完善的检索系统、加强与法律专家的合

作以及员工对知识产权的学习、利用新媒体扩大服务范围、创新服务方式、加强特色资源建设等应对策略。^[68]秦新立认为高校图书馆电子信息资源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主要表现为经费投入不足、管理机制不够创新、网络信息不能持续利用,并由此提出“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电子信息资源建设,应加强电子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重视高校科研人员对信息资源的研究要求,追踪收集相关专业最先进的信息资源,建立相关专业的特色电子信息资源库,加强电子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重视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建设等。^[69]数字信息资源检索的研究往往是与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实践研究相适应的,程东立所著《图书馆信息检索与资源共享》教材,以入学新生为主要读者群体,帮助入学新生及在校大学生学习掌握信息检索工具和途径,熟练使用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等图书馆馆藏资源,同时提高信息素养,有效率地利用网络信息资源,获取学习和生活中的所需信息,以适应数字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发展。^[70]

(三)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文献信息数量急剧增长,而单个的图书馆馆藏水平和服务能力是有限的;整个社会的文献信息需求是动态变化的,图书馆满足需求的能力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主动适应社会信息需求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资源真正实现共建共享成为可能,从而适应复杂庞大的网络环境和用户需求。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有助于减少信息资源建设的重复和遗漏,提高整体信息资源系统的保障能力,有利于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同时消除信息鸿沟,促进信息公平。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必然结果。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党宁以张家口市图书馆与京津两地图书馆开展协作的实践为例,思考并提出要以完善的规章制度为保障,以科技发展为主要动力,强化地方文献藏书建设的馆际协调,构建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协作机制。^[71]李东燕认为,区域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中存在宣传力度不足、推广力度不够、可以共享的数据库资源较少、缺少相应的评估机制等问题,并基于此提出加大宣传力度、健全信息资源共享体系的管理机制、增强区域图书馆数据

库共享资源、构建信息资源共享评估机制等应对策略。^[72]赵冉认为在图书馆资源协同与共享理论框架下,图书馆资源协同管理的内容包括信息过滤与推荐协同、参考咨询的协同、检索的协同,图书馆资源协同与共享工作的开展应包括建立信息资源协同共享的平台、形成信息资源协同共享数据库、同时完善资源协同共享的管理制度和法律保障。^[73]隋春荣等人在调查邢台市图书馆以及市区“一本三专”四所高校数字资源的基础上,针对各图书馆数字资源重复建设、读者使用权限受多种制约、数字资源共享程度低等问题,提出了通过建设区域数字资源平台充分实现节约经费、资源共享最大化的建议,提出了依托高校图书馆建设市区范围数字资源共享平台的构想。^[74]

随着我国“双一流”建设战略的贯彻实施,“学科建设”已成为高校在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一流大学建设与一流学科建设息息相关,挺进一流大学势必要拥有更多的一流学科。在服务再造、转型、创新的时期,高校图书馆应该抓住“双一流”建设机遇,致力于构建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服务目标精确、服务内容精准、服务质量高效的学科服务新体系。许子媛基于服务一流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从合作建立、合作路径、合作策略上构建面向一流学科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联盟模式,并给出“建立专向服务,搭建服务共享平台”“打破壁垒限制,提高协同创新服务能力”“控制合作规模,强化用户体验”“保障沟通渠道,树立联盟合作理念”等联盟实施建议。^[75]

四、图书馆管理研究

图书馆管理是一门关系到图书馆工作方方面面的学科。2019年,河北省学者在图书馆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空间功能分区、线上平台的利用、图书馆信息服务等方面。

(一) 图书馆空间功能分区

学术交流新生态下,传统图书馆的空间功能分区急需重新规划建设,这是提升图书馆吸引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大学文献资源保障中心和用户阅读自习交流的场所,高校图书馆近几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创客空间、学术研讨区、高新科技展示体验区等助力学校教学、科研、创新的新

功能区域被引入到高校图书馆的空间建设中,这些不同形式的功能分区促进了读者的知识创新和信息交流。赵蕾霞等人根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8中国大学排行榜前20强高校和部分国外高校图书馆提供的空间功能分区建设情况,将其划分为7个区域,包括综合服务大厅、藏书空间、阅览自习区、第二课堂、科技文化体验区、休闲文化区、虚拟空间。主要介绍了各个空间分区的功能以及高校图书馆空间分区布局设计的特点,并提出了对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分区建设的一些思考。^[76]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高校图书馆原有的空间及其服务模式渐渐不能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由于多数高校图书馆年代久远,且早期设计主要满足为高校师生的教育科研提供信息服务,在馆舍和馆藏空间设计、虚拟空间建设、运行机制等方面上存在诸多问题,造成多数高校难以开展旧馆信息共享空间的构建,或者难以达到信息共享空间构建的水平。沈清清等人则是对高校图书馆旧馆知识空间改造进行的研究,通过分析开放背景下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旧馆知识共享空间改造的成功实践案例,归纳总结高校图书馆旧馆知识共享空间改造过程中的共性和特性,探究高校图书馆旧馆知识共享空间改造的基本内容、关键问题,从实体层、虚拟层、支持层三个层面展开实体空间改造、虚拟空间改造和运行机制改造,建立高效图书馆旧馆知识共享空间改造模型,实现对空间、资源和服务的合理分配,为国内高校图书馆旧馆知识共享空间改造提供借鉴。^[77]

(二) 线上平台的利用

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提到,截至2018年12月,手机网民规模达到8.17亿,网民使用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达到98.6%,移动服务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图书馆也在努力突破传统服务模式的局限,努力开拓移动服务市场,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成为图书馆进军移动服务市场的媒介之一。高校图书馆正是借助微信这一新媒体的庞大用户群体及其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选择微信公众号微服务平台,建立高校图书馆微信服务业务,利用公众号向用户群体提供资源和服务。杜坤等人通过对河北省本科院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建设

现状进行调研分析。以 20 所教育厅直属本科院校为调研对象,对微信公众平台的总体情况、自定义菜单、消息推送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对河北省本科院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建设发展有所裨益。^[78]

微博、微信现如今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交工具,二者呈现出灵活、便于分享等特点。肖宗花等人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从认证、信息发布等方面,分析了“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如何使用微博和微信为读者提供服务。经过研究发现“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在使用移动社交应用方面很积极、很重视,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采用了这些移动工具。在使用微信和微博这种新型服务形式的时候,根据二者的不同特点,能够灵活掌握以提供不同的信息和服务。并且在服务时,高校图书馆能够把读者的需求放在前面,及时跟进关注者的活跃度。^[79]

(三) 图书馆信息服务

用户获取图书资源的重要途径是图书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馆信息服务迎来巨大挑战。在传统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下,所有用户统一使用一个图书馆平台,用户想要获取自己所需图书信息时,只需主动向图书馆平台提交查询请求,图书馆平台通过用户查询请求后用户就可获取需求信息。但是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高校图书馆信息量不断膨胀,导致传统信息服务模式下的用户难以快速发现符合自身偏好的图书信息。赵冉研究了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图书馆混合推荐技术,向不同类型用户精准推荐图书。构建以并行计算框架为计算前提的图书馆混合推荐系统。采用 Flume 采集图书馆用户日志信息和图书馆图书数据,将采集到的数据信息传输到 Kafka 消息中间件后,向集群中传入集群订阅的数据信息,集群在用户粘稠度较低时采用聚类算法聚类图书馆数据信息,获取聚类中心,依照聚类中心用户读书偏好向目标用户推荐图书。在用户粘稠度较高时,采用基于协同过滤的混合推荐算法分析目标用户阅读偏好,计算目标用户偏好和用户群中用户偏好相似程度,将偏好相似程度作为权值,组合多个权值产生预测评分,通过预测评分推荐图书。^[80]

在当前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利用数据分

析,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结合当前日益发展的电子资源对传统纸质图书的借阅产生的巨大冲击,为了应对纸本图书面临的危机,提高其流通效率,利用数据统计的方法,能够给图书馆剔旧、图书采购、图书推荐等提供更多参考。赵晓丹等人通过采集和分析河北经贸大学 2010 年至 2018 年读者借阅数据,提取图书“首次被借出的时间”,研究一般图书以及重点专业图书的新书流通规律,发现“出版后三年内有借出记录的图书,相较于出版后三年内没有借出记录的图书‘生存期’更长,借阅率更高”。因此在图书的剔旧工作中可以重点关注出版三年内没有任何借出记录的图书,对这些图书需要进行跟踪调查。该结论对缩小图书剔旧范围、确定重点剔旧对象以及新书采购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81]李仁玲、齐文君等根据河北中医学院图书馆 2017 年 4 类读者(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教师)行为数据,使用 Excel2007 对导出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计量分析,分析内容主要包括各类型读者不同时段到馆情况,纸质图书借阅种类及数量、数据库使用情况,研究医学院校读者行为特征,发现读者的行为习惯与阅读倾向基本符合中医药院校的办学宗旨,今后应在提供个性化服务、提高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及加强馆藏建设等方面进行改善与提升。^[82]

现代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持续促进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伴随高等教育机构的变革与发展,高校图书馆服务内容和方式也发生相应调整和创新。OCLC 与 IthakaS+R 对高校教育变革与高校图书馆服务体系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发布《高校与图书馆未来:对接图书馆战略与高校发展方向》。于伟对该报告进行解读,认为分类管理是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比较研究是高校图书馆精准施策的重要方法,支持教育多样性是高校图书馆的应有之义,支持灵活性教育是高校图书馆的有义之举。并提出今后应构建与高校分类体系对接的高校图书馆分类体系,强化多样包容的图书馆文化支持教育多样性,以及提升组织的敏捷性支持灵活性教育。^[83]

(四) 其他

虽然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不尽相同,但都是推动我国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下,公共馆和高校馆都对传播先进文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增强文化自信、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主雪梅等人对建设校地融合型图书馆进行了探究,在阐述建设校地融合型图书馆现状的前提下,重点分析两类图书馆在融合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二者如何深度融合,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具体措施。^[84]

随着许多大学搬迁或扩大规模,高校图书馆往往会面临搬迁的任务。如何在搬运过程中有效地保护好图书,快速有序地完成全部馆藏图书的下架到再上架的周转,成为我们不得不审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李彦芳等人分析了图书搬迁面临的主要困难及图书搬迁的方法,提出在图书搬迁过程中可以采取抓大放小的逆向思维办法,加快搬迁进程,并指出应尽量减少闭馆时间,妥善处理读者意见和建议,在搬迁过程中可以发挥学生读者作用。^[85]

随着多线典藏制布局模式的广泛采用,密集书架越来越成为现代图书馆中设备中的重要成员。密集书架的发展,经历了传统机械密集架、电动密集架、智能密集架三个阶段。杨睿在《图书馆密集书架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中首先对密集书架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概述,其次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利用 Incopat 数据库平台对中国相关专利技术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密集书架正处于技术的高速发展期。^[86]

随着知识经济经济的到来,高等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图书馆提供的强大辅助作用,承载着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任务,作为文献、知识等信息的储存中心,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开展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撑,从而对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的要求不断提升,需要管理人员具备较高的能力与素养。李东燕在对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提高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的必要性,以及提升素质和专业能力的途径,为资料管理人才素质培养提供参考。^[87]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蒸蒸日上,但是经费短缺、经费管理不善的问题经常困扰着一些地区公共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公民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都给现代图书馆经费资源带来了管理的考验。现代图书馆经费资源的调整 and 合理分配在

现代社会各种条件的制约和阻碍下,显得困难却尤为重要。王雅坤、方自金通过分析当前图书馆经费使用现状出现的问题,以及经费问题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一系列缓解经费问题的措施。^[88]

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图书馆传统营销管理模式带来新的挑战。吴国英在《大学图书馆微营销研究》一书中,基于河北经贸大学图书馆微营销实例,对大学图书馆的微营销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于大学图书馆管理创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将图书馆微营销置于大学图书馆转型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对学术资源供给的泛在化发展、师生个体学术资源购买力的变化、学术资源供给的过剩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对大学图书馆微营销产生的必然性进行了阐释;二是分析转型时期大学图书馆面临的挑战,将传统营销理论与现代管理理论相结合,系统阐述大学图书馆微营销理论;三是聚焦大学图书馆微营销实务,用实例和翔实的数据图表说话,具有较强的可读性。^[89]

五、文献学研究

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2019 年的河北省文献学研究,主要涉及到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等领域。

(一) 版本学研究

版本学是研究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是以版本的差异、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鉴别版本的真伪及优劣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版本学内容包括研究版本的源流;比较稿本、传录本及写本、历代刊本、不同的批校本间的差异;鉴别原刻本及翻刻本;判定善本和劣本等。

赵嘉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现藏清初述古堂钞本《述古堂书目》与其他几种钞本在分卷、前后序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了《述古堂书目》最初的特点,指出该钞本实非初稿本,只是其中的一个修订本,认为,钞本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会被传钞者有意改编等多种原因,使版本的研究难度增大。^[90]同时也对《日本访书志》进行研究,根据杨氏《留真谱》及《邻苏老人年谱》中的线索,结合《日本访书志》实际的版本情况,认为该书曾经多次刊印,有多种版本存世,并弥补了前人对此研究疏漏和不足的地方。^[91]

孟荣梳理历代《骑省集》的版本流传状况,得出《骑省集》的卷数和历代记载情况,认为《骑省集》有刻本和钞本两个系统,其中,刻本有四个版本,钞本有两种版本。^[92]

程宇静就《名花谱》的编纂背景、版本源流、作者、内容特点、流传及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该研究有利于对《中国明清时期农书总目》进行补辑考证。^[93]

寇雅芳从版本角度对《北梦琐言》的历代流传情况进行梳理,介绍了《北梦琐言》的主要版本、一些抄本及书局刻本以及主要流传版本的优劣情况,以填补今人对该书流传情况关注较少的不足。^[94]

(二) 校勘学研究

校勘学是一门综合群书,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纠正其讹误,力求接近原文真相的学科。

包得义、王树平对《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释氏诗歌部分存在的诗篇失收、作者小传不全以及诗歌归属有误三方面进行了研究,在诗篇失收上认为应该增加“萧齐慧绪尼《斋竟自索纸笔作诗》”“北齐慧化尼歌谣及讖诗”“北周卫元嵩《千字诗》、《十二因缘六字歌词》”这些诗词歌赋;在作者小传不全方面,对宋汤惠休、梁释宝志、陈释昙瑗、陈释智恺四人的籍贯、卒年、寿数、作品、相关记载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在作者归属、诗歌出处有误上认为应当删除慧净的《杂言诗》、释玄逵的诗和释慧英的《一三五七九言诗》。^[95]

(三) 目录学研究

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

赵元斌、李鹏梳理了姚名达目录学的相关研究,发现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姚名达目录学综合研究、姚名达目录学比较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研究、姚名达宗教目录学研究。但鲜有学者关注姚名达目录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学术渊源、实践需求,并认为这些问题在今后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96]

(四) 其他

在中国图书发展史中,类书是我国古代通过博采群书与辑录古籍中的相关资料,按门类或字韵等进行编排,以备查检的大型文献资料性书

籍,起源于战国时期,形成于三国时期,成熟于唐宋时期,鼎盛于明清时期。我国古代林林总总的类书,按其编辑性质、辑录内容与编排方式的不同,可进行不同的类分。探讨我国古代类书的发展与类分,对传承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非凡的价值。^[97]

在文献专书研究方面,张一凡从收字范围、目录设置、编排顺序、引文的排列四个方面入手对《骈字类编》(大型字典类类书)进行研究,发现该书专收“骈字”,在目录体例的设置、词条的编排顺序、引文的排列上分别遵循“齐以字首”“编则从类”“考索旧文”的原则。他认为《骈字类编》是一部极具创新性的字典类类书,是后世字典类辞书的“鼻祖”,具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98]

在古籍文献价值的开发与利用研究方面,潘艳蕊、顾乃武在《〈水经注〉与唐代地志所载保定人文遗存的文献价值》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北魏《水经注》与唐代地志文献所载录的大量的保定地区的人文遗存,并对上述地志文献所载保定地区的人文遗存的历史价值,对发展保定县域人文旅游资源的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做了系统阐述。^[99]吴江华等人在《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价值的开发和利用研究》一文中就我国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的保藏现状调查、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价值难以开发利用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并提出构建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价值开发利用机制,以解决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开发利用面临的问题。^[100]

在古文知识组织应用研究方面,常颖聪等人在《基于关联数据的古文知识组织应用研究》一文中通过文献及网络调研对古文知识组织及关联数据应用于知识组织的现状进行了总结,提出基于关联数据的古文知识组织模式,并对实现基于关联数据的古文知识模式需要解决的构建专有元数据、本体化语义描述、知识产权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101]

在古典文献学教学研究方面,赵嘉认为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多媒体教学越来越普遍,古典文献学教学中也应该加强多媒体的应用。在《古典文献学教学中的多媒体应用途径》一文中,作者针对古典文献学教学中多媒体应用的重要优

势进行探究与分析,提出古典文献学教学中多媒体应用的有效途径,以促进古典文献学教学质量的提高。^[102]

(金胜勇: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 化柏林,金胜勇.基础理论研究[M]//李广健.中国图书情报学四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0).
- [2] 丁若虹.河北省图书馆沿革概述——1908—1961年[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39(7).
- [3] 孙红艳.基于7Ps理论的图书馆营销方式研究——以英国威尔士公共图书馆为例[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9).
- [4] 刘静,柳贝贝,崔兰花.我国公共图书馆效率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19(6).
- [5] 张行.图书馆馆配商评价指标研究[J].情报探索,2019(5).
- [6] 李昱瑾,曲素钦,李岩.高职院校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管理研究[J].智库时代,2019(14).
- [7] 陈则谦,郑娜静,岳双双.图书馆学本科生专业认知的发展过程——面向在校生的个案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9(6).
- [8] 李琳.面向电子商务平台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探究[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9(11).
- [9] 金胜勇,李晓璐,章亭.公共图书馆法的价值体现与阙如[J].情报资料工作,2019,40(6).
- [10] 王肃之,翟军平.美、英国家图书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启示[J].图书馆,2019(2).
- [11] 李和顺,齐雪洁,殷刚.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VR全景图书馆技术的尝试与思索[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1).
- [12] 李岩,李昱瑾,曲素钦.智慧时代下传统高校图书馆的转型[J].智库时代,2019(18).
- [13] 李东燕.数字图书馆及系统平台的建设研究[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9,24(1).
- [14] 苏然然,于海波,韩薇.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分析[J].新西部,2019(29).
- [15] 赵雪云.高校低碳图书馆建设的几点建议[J].科技经济导刊,2019,27(36).
- [16] 陈丹丹,杨洪江,张春雨.河北省农家书屋长效发展机制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19,32(6).
- [17] 王庆良,王珩,赵国红.区域农家书屋综合管理平台研发背景与设计思路[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1).
- [18] 杨秀丹,陆遥.公共图书馆科普阅读推广活动现状、特点与未来发展着力点:基于1—2届征集案例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2019,31(8).
- [19] 杨洪江,丁若虹.区域性阅读推广项目的组织与实施——以“燕赵少年读书系列活动”为例[J].图书馆学刊,2019,41(1).
- [20] 孙婧.京津冀高校图书馆联合阅读推广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3).
- [21] 谷娜.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河北科技图苑,2019,32(3).
- [22] 吕建新,孙媛媛,李晋瑞.媒体融合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探索[J].现代情报,2019,39(5).
- [23] 吴静,张蓓蕾.高校图书馆新媒体阅读推广服务实践分析[J].才智,2019(25).
- [24] 寇爽,杜坤.面向大学新生阅读推广策略研究——基于美国“新生共同阅读计划”[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1).
- [25] 王丽,臧晓旸,孙琪.艺术院校图书馆文创产品与阅读推广协同发展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9).
- [26] 张慧敏,安琳.体育院校阅读推广模式研究——以虚拟阅读社区为例[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24).
- [27] 张忠凤,樊俊荣,胡永会,韩曾丽,赵蕾霞.图书馆阅读推广中馆员数字素养的认知与提升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4).
- [28] 赵俊玲,苑艺,詹妮·弗莱克斯纳的阅读指导服务思想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9(6).
- [29] 肖佐刚,杨秀丹.图书馆科普阅读推广[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9.
- [30] 廉立军.专业认证视角下医学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发展策略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9(8).
- [31] 李梅,邵彦坤,肖宗花,孔文娜,于欢.高校图书馆ESI学科服务模式探索——基于河北医科大学图书馆实践[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9(8).
- [32] 段红智.浅论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J].管理观察,2019(14).
- [33] 杨冉,郭虹良,曹茹烨.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可视化研究综述[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15).
- [34] 高珊.云计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模式的新发展[J].智库时代,2019(42).
- [35] 焦玲霞,马岩.中美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比较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3).
- [36] 许子媛.面向一流学科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联盟模式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28(3).
- [37] 李东燕.试析大数据分析和信息挖掘的图书馆智慧服务[J].科技经济导刊,2019,27(3).
- [38] 牛宇峰.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智库微信公众号知识服务研究[J].智库时代,2019(48).
- [39] 李东燕.基于大数据在图书馆管理与服务中的应用分析[J].科技经济导刊,2019,27(4).
- [40] 曲素钦,李岩,李昱瑾.互联网信息时代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创新探究[J].智库时代,2019(13).
- [41] 关美.图书档案数字化服务的思考[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1).

- [42] 田静.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图书馆创新服务研究[J].智库时代,2019(47).
- [43] 崔稚英.河北省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调查与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S1).
- [44] 王云,申晓杰,苏然然.高职院校图书馆阅读引导模式创新探究[J].智库时代,2019(24).
- [45] 魏蕊,孙一钢.面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国家图书馆服务模式与策略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28(2).
- [46] 魏蕊,孙一钢.国家创新能力建设视角下国家图书馆企业信息服务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9,63(16).
- [47] 刘静,柳贝贝,王素丹.基于创客空间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机制研究[J].情报探索,2019(5).
- [48] 李东燕,董文域.新媒体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改进[J].知识经济,2019(10).
- [49] 张利香,薄建国.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图书借阅到期提醒功能实现[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11).
- [50] 刘静,王智琦,柳贝贝.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9,37(4).
- [51] 段红智,武海娜.社会化服务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创新创业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对策研究[J].智库时代,2019(44).
- [52] 安琳,武学师.高校图书馆服务地方文化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15).
- [53] 冯竞争.高校移动图书馆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模式[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7).
- [54] 冯竞争.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助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提升[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6).
- [55] 魏翠玲,李振英,李素娟.高校图书馆服务新型城镇化公共文化建设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19,32(5).
- [56] 张小平.高校图书馆利用微视频教学实施的信息素养教育的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8(6).
- [57] 秦艺.浅谈高校图书馆推行自助式服务模式的可行性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2).
- [58] 秦艺.论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阅读的引领作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3).
- [59] 张旭,赵彬,卢恒,李宇佳.高校图书馆智库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及评价研究[J].图书馆,2019(7).
- [60] 马静,孙卫忠,张媛,廖文怡.ESI学科分析助力“一流学科”建设实践与探索——以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11).
- [61] 王潇潇,魏蕊.美国普渡大学图书馆出版服务实践研究[J].图书馆杂志,2019,38(7).
- [62] 鄂丽君,马兰.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本科生研究支持服务[J].图书馆论坛,2020,40(2).
- [63] 李嘉仁.图书馆文献选书法中价值论与需要论的关系认知分析[J].江苏科技信息,2019,36(4).
- [64] 孙熠,王云,白静.信息时代高校图书馆采编工作研究[J].新西部,2019(23).
- [65] 王玉卿,田蓁子,周俊一,张行.政府采购背景下高校馆图书联合采购研究——以河北省高校为例[J].河北企业,2019(9).
- [66] 窦建爽.市属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文献建设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9,34(2).
- [67] 韩曾丽,赵蕾霞,张忠凤.财经类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经费投入分析及相关性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9(5).
- [68] 魏亨.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困境与对策探讨[J].科教导刊(下旬),2019(2).
- [69] 秦新立.“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电子信息资源建设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8(2).
- [70] 程东立.图书馆信息检索与资源共享教材[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9.
- [71] 党宁.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公共图书馆区域协作实践初探——以张家口市图书馆与京津两地图书馆开展协作为例[J].图书馆学刊,2019,41(1).
- [72] 李东燕.区域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体系的构建探析[J].科技风,2019(7).
- [73] 赵冉.图书馆资源的协同与共享工作研究[J].传播力研究,2019,3(35).
- [74] 隋春荣,刘爱国,刘海涛.依托高校图书馆构建区域数字资源平台的研究——以邢台市为例[J].邢台学院学报,2019,34(2).
- [75] 许子媛.面向一流学科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联盟模式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28(3).
- [76] 赵蕾霞,朱丹,韩曾丽,刘丽华.学术交流新生态下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分区规划建设研究[J].晋图学刊,2019(2).
- [77] 沈清清,石晶,伍玉伟,滑康.高校图书馆旧馆知识共享空间改造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9(2).
- [78] 杜坤,迟辉,寇爽.河北省本科院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建设现状调查与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21).
- [79] 肖宗花,谭世芬.“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微信微博利用探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8(2).
- [80] 赵冉.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图书馆混合推荐技术研究[J].现代电子技术,2019,42(23).
- [81] 赵晓丹,王玉卿,赵蕾霞.基于读者借阅数据的图书流通效率分析[J].河北科技图苑,2019,32(4).
- [82] 李仁玲,齐文君,王恺笛,王建岭,陈征.医学院校图书馆读者行为研究[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9,43(5).
- [83] 于伟.“高校与图书馆未来”项目报告解读[J].图书馆建设,2019(3).
- [84] 主雪梅,张娟,张洪岩,李洪涛.建设校地融合型图书馆的探索与研究[J].智库时代,2019(6).
- [85] 李彦芳,李和顺,齐雪洁.也说图书馆藏书搬迁[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9).
- [86] 杨睿.图书馆密集书架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J].中国

- 市场,2019(16).
- [87]李东燕.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培养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9(12).
- [88]王雅坤,方自金.我国公共图书馆财务管理的问题与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8(17).
- [89]吴国英.大学图书馆微营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90]赵嘉.《述古堂书目》版本考[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9(1).
- [91]赵嘉,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的版本问题[J].图书馆杂志,2019,38(8).
- [92]孟荣.《骑省集》版本源流考[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9,35(8).
- [93]程宇静.《名花谱》版本、作者及流传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2).
- [94]寇雅芳.《北梦琐言》版本考略[J].邯郸学院学报,2019,29(1).
- [95]包得义,王树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释氏诗歌补正[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2).
- [96]赵元斌,李鹏.姚名达目录学研究述评[J].图书馆建设,2019(2).
- [97]李东燕,董文域.论我国古代类书的发展与类分[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9,24(2).
- [98]张一凡.《骈字类编》体例刍论[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19,40(1).
- [99]潘艳蕊,顾乃武.《水经注》与唐代地志所载保定人文遗存的文献价值[J].河北科技图苑,2019,32(4).
- [100]吴江华,刘青端,李菊花.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价值的开发和利用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21(4).
- [101]常颖聪,路程,翟军平.基于关联数据的古文知识组织应用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2).
- [102]赵嘉.古典文献学教学中的多媒体应用途经[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9(11).

博物馆学与文化事业研究

成彩虹 陈静

2019年,河北省的博物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博物馆事业发展、博物馆教育理念、文化服务、制度与管理、陈列展览、博物馆与新媒体应用、博物馆与文化旅游产业、博物馆陈列展览研究等几大方面,成果较为丰富,队伍相对平稳。尤其是在博物馆财务管理、博物馆安全管理、陈列展览研究方面颇有创获、亮点频出。

一、博物馆事业发展研究

2019年,新中国喜迎70周年华诞。河北省的博物馆事业与祖国风雨同舟、不断壮大。李宝才将河北省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分为创业发展期、恢复稳定期、质量提升期、高速全面发展期四个阶段^[1]。作者视野广阔、高屋建瓴,以时间为经、博物馆发展为纬,体例统一、层次清楚,资料翔实、取舍有度,全面梳理了河北省博物馆事业70年的发展历程,具有丰富博物馆理论研究和指导博物馆实践的双重意义。

李宝才认为,在创业发展期(1949—1977年),河北省博物馆的建设一波三折、举步维艰。1902年,直隶省(今河北省)天津考工厂设立陈列馆,为河北省博物馆事业的开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河北省博物馆的建设面临从零

开始的局面。直到1953年,河北省博物馆筹备处成立,才真正拉开河北省博物馆事业的帷幕,并带动全省各地掀起博物馆建设的高潮。在这一阶段,全省博物馆初步建立了文物藏品体系,培养了一批博物馆研究和管理人才,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历史原因,在1966—1976年的10年中,全省博物馆的数量不升反降,1975年省内仅剩3家博物馆,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在恢复稳定期(1978—1998年),李宝才认为河北省博物馆的事业得到明显复苏,全省博物馆数量由12家发展到40家,举办陈列展览的数量从18个增加到158个,观众数量由1979年的17.6万人次增加到1998年的209.7万人次。这一时期,设区市博物馆的发展开始起步,县区市博物馆的数量稳步增加,具有地域特色的专题博物馆、纪念馆相继建成,弥补了河北省专题馆、特色馆的不足。在提升发展期(1999—2012年),李宝才认为河北省的博物馆事业高质量拓展,类型不断丰富,结构日趋合理。全省博物馆总数达到80家,新增博物馆40家,已经初步形成具有河北地域特色、门类较为齐全、省市县相结合、发展质量较高的博物馆体系。尤其是2008年以后,党中央做出博物馆、

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重要部署,河北省先后有54家博物馆、纪念馆享受中央和省级免费开放补贴,并有《金缕玉衣的故乡——满城汉墓》《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等陈列展览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活动中荣获奖项。李宝才认为在高速全面发展期(2013年至今),河北省博物馆事业发展呈腾飞之势。截至2019年9月,全省登记在册的博物馆从2012年底的80家增加到137家。仅2018年,全省共举办各类展览864个,开展社教活动3377次,观众数量达3265.8万人次。在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的支持下,博物馆的文物科技保护意识、文物科技保护技术、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步伐加快,博物馆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开展,摸清了省内可移动文物资源的收藏状况,同时优秀的陈列展览层出不穷,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更加彰显。这一时期,博物馆行业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博物馆工作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1]

二、博物馆教育理论、实践与服务

文旅融合使博物馆的工作面临着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马率磊思考了文旅融合背景下中小博物馆服务能力提升的方法与策略。文章先对博物馆服务、博物馆服务能力等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认为“博物馆服务”实际上就是利用博物馆资源为他人或社会提供便利或帮助的过程。狭义的博物馆服务指博物馆教育,广义的服务指促使博物馆资源为他人或者社会提供便利、帮助的一切行为的总和;“博物馆服务能力”是博物馆服务人员利用博物馆资源(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满足观众合理文化需求(教育、研究和欣赏等)的能力。博物馆的社会服务过程主要涉及到服务提供者(博物馆服务人员)、博物馆服务资源、观众(服务享用者)三个要素。在某一特定阶段,博物馆服务人员、服务资源是相对可控的,观众则是相对多变的。因此,博物馆人应该把提升的重心放在可控的因素层面,努力提升博物馆人员的数量和能力,挖掘博物馆资源的服务潜力。他建议中小型博物馆通过五个方面提升服务能力,一是重视实践,在做中学,提高行动力;二是完善机制,群策群力,调

动积极性;三是内外协调,统筹兼顾,提升服务能力;四是强化反馈,拓展完善,增强精进力;五是提升理论,注重总结,扩大影响力。社会服务问题是博物馆事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应当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不断搭建新的平台,推进博物馆社会化的进程,推动博物馆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2]

讲解工作是博物馆提升服务水平的重要环节,而讲解员是沟通博物馆与观众的第一张名片,在观众参观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提高博物馆讲解工作的质量,更好地传播优秀历史文化,讲解员需在明确自身定位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展览内容,进一步提升讲解技巧。冯铁藜认为,除了做到与观众亲切交流、举止得体外,讲解员还应时刻注意站姿、走姿及体位的变化,根据需要调整步幅与节奏,对整个参观过程给予有效调控。对中小型博物馆而言,讲解员应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对展品等进行讲解,避免使用方言。在发音方面,要做到吐字清晰、字正腔圆。在交流中,要根据观众情绪的变化及时调整讲解内容,引导观众积极参与到讲解过程中。讲解员还应加强与观众的互动,采用提问等形式巧设悬疑,激发观众的好奇心,进而耐心听讲,寻找答案。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及博物馆资金的投入,可将电子档案、讲解机器人等新技术运用到讲解工作中,以更好地服务观众。^[3]

观众、游客是博物馆服务的重要群体,研究博物馆游客特征、游客动机、游客满意度等,对于新形势下博物馆和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高慧、孙蓉蓉等以河北博物院为例,对游客的行为特征及动机等进行了调查,并对博物馆建设提出了合理化建议。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行为特征、旅游动机、重游意愿等进行了统计。经分析,河北博物院游客群体中女性占比较大,达60.6%;学历以大专或本科为主,占72.7%;职业结构比例以学生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为主,学生占比最高,为45.4%。经对游客行为特征分析,认为河北博物院游客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个人经验和他人介绍,同行人员以家庭成员和朋友同学为主,游览时间在1~3小时之间的占78.4%。居半数游客的游览次数仅为1次,重游率低。旅游动机主要分为历史文化动机、社会认同动机、休闲解压动机,其中以休闲

为的游览不够深入。根据调查结果,她建议,河北博物院应在三个方面改进服务,一是拓宽宣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借助网络平台拓宽宣传渠道,充分利用网络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加强公众号、官网、微博、微信等宣传平台的建设推广。二是深入了解游客动机,完善服务项目。根据不同游客的旅游动机开发不同的服务项目,尤其应加强文化、休闲、体验项目的开发力度。三是创新展览方式,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考虑到部分游客的参观动机是休闲娱乐,应加强互动项目的建设,更好地提供个性化服务。^[4]

在具体的社教项目方面,省内多家博物馆策划实施了各具特色的活动。如河北博物院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观众打造了快乐学堂、文博讲坛、青葵剧社、博秀剧场等,以寓教于乐、灵活多变的方式,实现了博物馆的公共教育职能。其中“文博讲坛”是河北博物院面向公众推出的公益讲座,自2014年开讲以来共推出290余期,受益观众累计超过5万人次。周蕾就“文博讲坛”的工作实践进行了总结,并思考了努力的方向。她认为,文博讲坛在名师助力和专家的支持下,内容成系列体系,形式不拘一格。内容方面,涵盖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文物鉴赏、文物修复、诗词鉴赏、名窑名瓷、书画艺术、石窟造像等多个领域。形式方面,打破“你讲我听”的传统方式,采用圆桌座谈、现场演示、室外授课等形式,不仅开设茶道、香道、花道、戏曲、古琴等讲座,还开设“河博之旅”活动,成为文旅融合新形势下河北博物院的又一个新亮点。她建议,文博讲坛要想保持长久的活力和生命力,一要不断创新,继续在选题上下功夫,抓住文博爱好者的需求。要继续扩大专家队伍资源,建立国家级、省级、市级专家库,源源不断吸引业内知名专家授课;要深入联手媒体,打造文化品牌,通过新媒体形式加大品牌宣传力度;要在实践中精心组织,策划者要走出去深入调研,学习省内外同类型讲座的经验。二要激发听众活力,变被动听课为主动参与。要继续深入推出“河博之旅”,拓展教育空间;适当选择愿意参与活动的听众,成立“听众委员会”等服务机构,不断激发听众参与管理的热情,多方协力将“文博讲坛”推向更高的水平。^[5]

三、博物馆制度与管理

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对列入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免费开放相关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补助资金。刘栋思考了当下博物馆免费开放专项补助资金动态管理制度,并从“中央财政安排的运转经费补助”“中央财政安排的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补助资金”“省本级财政安排的免费开放专项补助资金”三个方面对博物馆免费开放专项补助资金的动态管理进行了制度设计。^[6]

文章首先从动态管理的基本思想、主要依据、管理原则等角度介绍了动态管理的理念,进而阐述了中央财政安排的运转经费补助的动态管理方法,提出要结合国家对第一批免费开放博物馆实行的免费开放经费补助政策、国家对第二批免费开放博物馆按不同等级制定的补助标准以及博物馆绩效考评结果三个要素,将免费开放补助政策、补助标准、博物馆等级、博物馆绩效考评结果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综合研究运转经费的动态管理方法。刘栋认为,针对中央财政安排的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补助资金的动态管理,要根据有关规定,按照因素加项目的分配办法,综合考虑博物馆的馆舍面积、藏品数量、地区系数、经费保障水平、陈列展览的数量和面积、观众数量、科研成果、绩效考评结果等因素,全面综合地研究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补助资金数额及动态管理方法;针对省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免费开放专项补助资金的动态管理,要综合考虑博物馆等级、绩效考评结果、博物馆规模等因素确定补助资金的金额。他提议,博物馆应积极倡导“因素分配法与绩效评价法相结合”的动态管理理念,以实现“奖优罚劣、奖勤罚懒、以效定补”为动态管理目标,建议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博物馆免费开放专项补助资金的动态管理制度,并将动态管理成效定期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从而激发各个博物馆争先创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他认为,我国东、中、西部各个区域的博物馆类型不同,发展条件各异,各省、各地区可根据上述制度设计理念,结合本省、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细化。

固定资产是保障事业单位日常办公、经营管

理活动平稳进行的重要支撑。陈永平以文博单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文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监督、人员等方面思考了文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优化的对策。他指出,文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管理制度不健全、固定资产存量不清晰、固定资产管理人员缺失、不注重监督评价四个方面。他建议,文博单位要从基础建设、流程操作、实际管理、绩效考评等环节入手,制定完善的固定资产管理机制。尤其在对文物、展品等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过程中,应加强资产盘查,每间隔12个月进行一次全面清查,每间隔1个月进行一次关键资产清查。在工作过程中,要注重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加快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对统计数据与资源的充分利用,及时更新并完善数据。文章对改善文博单位为代表的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方法、提升固定资产的管理水平有一定的借鉴意义。^[7]

随着博物馆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博物馆实践和理论工作的深入开展,全国80%以上的中小博物馆面临着人才不足的问题。有效整合人力资源、优化人员配置,是充分发挥中小博物馆社会功能、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和前提。马率磊思考了公共文化视野下中小博物馆人力资源的整合策略,并在走访调查的基础上探究了博物馆人才瓶颈问题产生的原因及人才整合的措施。文章分析了中小博物馆人才匮乏的原因和表现,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某些政府部门决策欠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博物馆内部管理不善等有密切关系。提出在目前事业编缩减的背景下,整合人力资源并不仅仅是向有关部门争取编制、引进人才,而是应加强对博物馆现有人力资源的整合以缓解专业人才匮乏的压力。具体措施方面,建议一要强化内部管理,在保持现有工作人员数量的情况下,通过精准分工、竞争上岗、优化绩效、重视学习、部室协作等方式,充分调动现有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逐步提升专业素养和工作效率,以缓解专业人才和工作人员不足的困境。二要加强馆外协调,通过馆馆合作、馆校合作、馆家合作、招募志愿者等方式整合馆外人员,将其有计划、有组织地纳入本馆的服务队伍中来。文章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对解决中小型博物馆的人才利用及管理

有积极意义。^[8]

李莉莉对基层博物馆的发展现状和提升路径进行了思考。认为目前基层博物馆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管理体制落后、经费匮乏、专业人才不足、缺乏交流合作。为实现基层博物馆的长远发展,她建议一要加强馆际沟通交流,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二要通过员工培训和教育活动,打造一支拥有良好服务意识和较高专业素质的团队,让员工自觉主动参与到博物馆事业建设中;三要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构建博物馆信息化平台,创新展览展示方式,让观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浏览到博物馆的展览及文物信息;四要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推广,通过微信、微博、网络等社交平台进行全网覆盖,让博物馆彻底走进大众生活。文章对实现基层文物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有参考价值。^[9]

巴西国家博物馆火灾事件使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物顷刻间化为乌有,是世界文博史上的一次严重灾难,也为我国博物馆的安全工作敲响了警钟。肖潇撰文从巴西国家博物馆失火事件思考了我国博物馆的消防安全问题。认为巴西国家博物馆的火灾一是因为经费不足,政府拨款不足以支撑日常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维护。二是博物馆内部隐患,如消防设备不到位、内部装修陈旧、电线老化裸露等。三是博物馆建筑有不少易燃的木质结构,加上纸质资料藏品,让火势迅速蔓延。针对这一情况,反思了我国博物馆消防安全及保护现状,认为目前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缺乏对消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保护方面的意识,政府对博物馆的安全督导不够,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不够具体,博物馆消防安全建设方面的专业人才匮乏等。呼吁要充分重视和加强博物馆安全,一要加强宣传和社会参与,引导公众参与博物馆保护事业。二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完善我国文物管理体系。加强和应急安全、设计规划等部门沟通联动机制,就文物安全管理进行定期会议沟通,请应急安全专业消防员对博物馆单位进行安全讲解,加强博物馆安全人员的专业救援能力。要注意防范雨水冰雹对博物馆建筑的破坏损失,同时要注意火险等级安全。三要完善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教育和就业机制,尤其是文物主管部门要拿出更完善的、更有吸引力的人才计划,培养一批文物安全专家。四要完善博物馆安全专业规范设计和

立法,会同文博专业的专家学者研究一整套文物安全规范。邀请国内文物系统的安全专家组成专家组,对《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等相关文件进行修订和充实,明确未完善的内容。地方主管部门应组织文博、法律、科技、应急管理专家研究文博安全立法,使相关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10]

四、博物馆与新媒体应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涌现,在网络上建立虚拟博物馆已成为博物馆文化的大趋势。虚拟博物馆是通过互联网将博物馆里的历史文化虚拟化、数字化,然后在网页上展示给人们欣赏的全新技术。近年来,博物馆业务人员纷纷开展了对虚拟博物馆的研究。

卢同民对新媒体视野下虚拟博物馆的发展状况和作用进行了分析。文章首先介绍了新媒体和信息技术的概念和特点。认为虚拟博物馆不仅能打破时空限制,加强与受众之间的沟通,还能突破博物馆场地的限制,弥补实体博物馆的不足。基于新媒体的先天优势,需加强虚拟博物馆的构建,让受众打开电脑或手机就能浏览博物馆的相关信息。对于如何在新媒体视野下建设虚拟博物馆,建议:一要搭建好基础平台和管理平台。基础平台中主要包括图文及音视频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加工形成丰富的资源库,为构建其他平台打下基础。管理平台是维持虚拟博物馆日常运行的主要平台,直接关系到博物馆的各项事务,是博物馆有效、有序运行的保障。二要根据受众的需要优化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力求给受众更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三要有一支知识结构完备、技术精湛的团队,通过整合不同层面的专业技术人员、维护发展的信息技术人员、艺术设计人员和其他服务人员,保证虚拟博物馆的服务水平、专业水平及技术水平。^[11]

蔡静楠以河北博物院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河北博物院利用新媒体运行维护的创新之道。认为自2014年新馆建成后,河北博物院每年与50余家媒体开展各类宣传合作,将资讯以更便捷多样的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地传递给公众。同时,河北博物院“一网、一端、两微”齐助力,开设官方网站、微信、微博,组织运营“河北博

物院”企鹅号等及时与受众互动,积极扩大品牌效应。在提升游览体验方面,河北博物院在馆区设立LED屏、指示牌,并创造性地利用地铁出入口、流动公交车电子屏等进行宣传。河北博物院还借助明星展品走向更大的宣传平台以提升品牌效应,如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栏目,不断提高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总结了河北博物院在新媒体运营的创新实践后,提出在紧抓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将新媒体技术和受众的兴趣点相结合,通过前期调查,精准定位,打造高端亮眼、不脱离群众需求又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栏目。^[12]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博物馆的建设从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李莉莉撰文探讨了智慧博物馆建设的必要性以及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她认为,智慧博物馆以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为载体,不仅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文化体验,还可以有效提高博物馆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能力,促进藏品保护不断升级。然而,在智慧博物馆的建设中,还存在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标准,部门之间沟通较少、协作不畅,版权保护意识薄弱,资金有限、人才匮乏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她建议,推动智慧博物馆建设,一要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智慧博物馆建设标准,做好相应规划,各个博物馆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适当调整相关的制度和方案;二要科学有效运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智慧博物馆建设服务;三要重视专业人才的积累,培养出既能掌握先进的技术,又会熟练使用专业的设备,同时具备先进的博物馆建设理念的复合型人才;四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通过设置专项资金的方式,使智慧博物馆的建设有完善的资金作保障,实现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引进、研发以及专业人才的培训、再教育等。^[13]

五、博物馆藏品管理与保护

文物保护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工作,也是博物馆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确保文物完好无损,才能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提高文物的研究价值。李莉莉撰文分析了博物馆文物陈列中文物保护意识的重要性。文章回顾了博物馆文物陈列与文物保护的现状,认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具体操作中存在工作不够细心、文物保护水平

不高的情况,个别博物馆存在保管条件有限、设施设备不足导致文物保护不到位的情况。号召工作人员要增强责任感、进一步提高文保意识和综合基础能力。如在认真学习与文物保护有关的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掌握专业的修复技术;加强对文物的日常管理,定期观察文物的细微变化,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并处理。在文物保护对策方面,建议:一要严格保证博物馆环境,确定温湿度适宜;二要加大文物陈列展示柜密封性,避免有机质文物的霉变;三要合理控制光源和除尘,使用绿色建筑材料减少对文物的损坏;四要加强对文物的修复与保护,完善文物保护的细节。^[14]

传世的古籍文献是博物馆藏品的组成部分,应纳入博物馆藏品的利用和保护范围。宋莉洁撰文探讨了博物馆古籍文献的管理及数字化问题。她认为,为更好地收藏古籍文献,对其展开合理地运用,应用数字化方式对古籍文献展开科学化管理。设定古籍文献的搜索目录,将古籍文献的有关信息录入,可以全方位地展现古籍文献信息素材,实现资源的共享。为实现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保护,建议:一要落实好人才的培育,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构建专业化的博物馆管理团队;二要设定工作方案,优化管理程序,在工作开展之前做好有序的规划,确立工作流程,根据既定方案严格推进;三要重视新技术的运用,提升设施设备的专业水平。文章对博物馆古籍文献的保护与利用有积极意义。^[15]

六、博物馆与文化旅游产业

作为文化文物资源的收藏、保护、展示与教育机构,博物馆拥有众多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资源。深入挖掘博物馆资源,进行 IP 授权与开发,能够让文物的价值内涵得到充分体现,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赵钊撰文对博物馆 IP 授权的内容、模式、授权流程等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文章阐释了 IP 与博物馆 IP 的内涵。IP 即知识产权,博物馆 IP 主要指博物馆拥有的知识产权,包括商标权、版权、网络域名、专利权和工业设计权等五大类。2013 年新版的《博物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修改了知识产权的分类,将网络域名扩充为网络域名与其他与社交媒体相关的标识形式,将专利权扩充为

专利权与商业秘密。博物馆对文物藏品的研究成果、数字信息资源,博物馆注册的商标,博物馆的名称、相关标记、符号或图案等,都是博物馆的 IP。她指出,博物馆 IP 授权是博物馆将馆藏资源的商标权、著作权和品牌等可用于商业使用的权利授予给被授权方使用,被授权方在限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将获得的权利应用于经营活动,并向博物馆支付许可费。其中,文创产品开发只是博物馆 IP 授权的一个方向。在授权模式上,博物馆 IP 大致分为直接授权、委托授权两种。她建议,博物馆要根据自身馆藏资源、品牌价值、管理水平等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授权方式。在授权流程上,要注意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明确可授权的内容,二是选择合适的被授权方或第三方代理机构,三是制定清晰完备、权责明确的合同,四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流程,确保博物馆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她认为博物馆 IP 授权工作,应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充分利用各项政策和市场规律,不断激发博物馆的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16]

蔡雨晴以河北博物院为例,探索了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设计策略,并对河北博物院文创产品的开发设计提出了建议。文章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论文写作的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方法;第二部分阐述了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的原因,并分析了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的特征,如文化性、地域性、故事性、亲民性等,概述了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的作用和意义;第三部分列举了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的现状与问题,并试着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第四部分指出了博物馆文创产品应注意的几大要素,如内涵底蕴、审美价值、实用性、情感共鸣等,并建议博物馆文创开发应做到系列化、多元化、策略化;第五部分在对河北博物院文化资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议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适合开发的资源,在重视产品系列化拓展、突出多层次、多种类设计的原则下进行文创产品开发。一系列建议对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推广具有积极意义。^[17]

赵春燕、张文娟思考了河北省中小型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设计的相关问题,在对文化授权与

中小型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的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河北省地域文化,从设计师的视角探索了具有河北地域特色的中小型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策略。文章梳理了河北省中小型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的现状,截至2017年底,除河北博物院有6大类630件文创产品外,国家三级和无级别的中小型博物馆在文创产品开发和销售方面不尽如人意,主要聚焦在文创产品设计实践匮乏,可借鉴的设计方法较少,设计范围受限等方面。建议中小型博物馆应以IP授权作为文创开发设计的突破口,以联盟式文创设计体系、金字塔式产品设计策略为方式方法,从而有效整合资源,推动文化传承。^[18]

七、博物馆陈列展览研究

截至2019年底,全省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共有141家,较2018年度新增备案5家。全省共举办各类展览927个,开展社教活动7218次,观众数量达3508万人次。其中影响较大的陈列展览有河北博物院的《行山——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形塑》和承德博物馆的《“和合承德”清盛世民族团结陈列展览》。

河北博物院主办的《行山——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形塑》在全国博物馆举办的几千个临时展览评比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十六届(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优胜奖。《中国文物报》刊登整版文章介绍了这一展览^[19],筹展组成员陈静也撰文从选题定位、展品遴选、形式设计、宣传推广、社教活动等角度探讨了博物馆举办当代艺术类展览的策展思路、传播模式及文化效应^[20],为博物馆举办当代艺术展提供了借鉴。

陈静认为,该展览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策划立意高远的主题以连接传统和未来。河北博物院立足传统文化与馆藏资源,用现代的雕塑手段表达文脉深沉的河北文化基因,并将展览标题确定为“行山——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形塑”。主标题“行山”契合了我国多山的地貌,突出了中国人民勤于攀登、淳朴务实、勇于牺牲、重情尚义的精神。“行”这一动词在时空概念上阐明了古代文明传承发展的动态历史进程,也反映了策展团队勇于攀登传统文化这座高山的坚定自信的态度。尤其是展览选用的雕塑作品在引领当代

艺术的同时,还关照了当代艺术与博物馆藏品元素的融合与创新,形成传统和当代的凝望与反思,追问与启迪。她认为展览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遴选内涵深刻的展品以紧扣主题。雕塑家为本次展览创作的雕塑类作品,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又有对当代艺术的阐释,同时兼顾了对未来审美引领,具有较强思想性、艺术性和原创性,可谓亮点突出、令人过目不忘。陈静认为展览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提炼准确的形式语言以营造氛围、烘托展品。展厅主色调选用了墨绿和灰白,形成墙面视觉叠加及反衬效果。展品定位时,选择重颜色的作品放在颜色明度较高的灰墙前面,而颜色明度高、质感轻盈的作品则以墨绿色作为背景。灯光设计科学合理,充分考虑观众的视觉感受和心理感受。从整体来看,展厅空间重点突出、错落有致,展线不交叉、不逆行,观展效果良好。她提炼的展览成功的第四个原因是高效全面的宣传推广。在河北博物院的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下,各种宣传方案扎实推进、成效显著。开展前后,利用官网、微博、微信、电视、广播、报刊等渠道对展览进行持续报道。同时,社教团队策划实施了“匠心独运·抟土塑形”“行山·琴水·遇知音”等社教活动,“文博讲坛”邀请雕塑家、青年学者开展3期学术讲座和学术研讨会,对展览进行深度解读,大大增强了展览的学术性。在实体展示的基础上,河北博物院还制作了虚拟展览,以360度视角再现展厅的真实场景,配合语音解说、视频播放等手段,呈现出身临其境的视觉效果。虚拟展览的自主性、互动性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丰富了展示手段,拓展了展览的广度和深度。

文章认为,该展览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选题视角独特,从康乾盛世时的民族关系视角出发,讲述了康、雍、乾三朝帝王以承德为舞台,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展览以人物为节点,以事件为主线,采用串珠的方式勾勒出清王朝民族团结的恢弘画卷,着重表达了承德在国家统一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对于引导观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有启迪意义。该展览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策展理念先进,策展团队敏锐地抓住了“民族团结”这一核心要素,用承德历史上特殊地位所形成的文化来诠释核心要素的价值,全面展示承德深厚

的文化积淀和兼收并蓄的城市文化特质。就表达方式而言,旨在突破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历史建筑具象的束缚,实现由物而形而神的创新视野,以展览语言表达承德历史文化的深邃内涵。就表达逻辑而言,以多种文化视角的整合连缀承德精神图谱,实现大处着墨、小处落笔的形神叙事。就表达内容而言,以文化视线、美学思维为指导,寻求从文物、景观到文化主题的精神置换,从具体历史文化背景向全方位沉浸式感受体验的突破。该展览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其中,第一部分以断代叙事的体例展示了清康熙乾隆三朝发生在承德的重大政治事件,讲述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清朝发展形成的历史进程。第二部分展现了清王朝与蒙藏等族在精神信仰上融合交流的历史见证。第三部分讲述了清代皇帝在避暑山庄的宫廷生活,为观众揭开清宫帝后生活的神秘面纱。文章认为,该展览成功的第四个原因是设计大气、准确,坚持将当今社会的现代性与承德历史文化的地域性相结合,注重清代文化符号与承德地域文化符号的统一。通过形式设计语言准确地表达陈列内容,在线条、平面、空间、光影和色彩中勾勒出承德的 历史、人文、自然的精彩风貌,塑造出承德作为清王朝政治分中心的文化形象。第五个原因是颇为重视展览的宣传和推广,如组织了由专职讲解员和志愿者讲解员组成的展览讲解团队,为观众提供免费的讲解服务;通过咨询服务台向观众发放与展览内容相关的导览手册,指引观众更好地欣赏陈列展览的内容;设置自助储物柜、母婴室等设施,为观众提供贴心温暖的服务;开设微信公众号,对外宣传陈列展览的内容和相关的教育活动,延伸展览的受众广度;积极组织电视台、报纸、电台等媒体对陈列展览进行报道;针对展览策划了未成年人教育研学活动,研发了文创产品在馆内集中销售。一系列服务给到馆参观的观众以愉快、轻松、温馨的观展体验。

(成彩虹: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

陈静:河北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参考文献:

- [1]李宝才.奋斗结硕果 扬帆再起航:新中国成立 70 年河北博物馆事业发展综述[J].文物春秋,2019(5).
- [2]马率磊.文旅融合背景下的中小博物馆服务能力提升策略研究[J].中国博物馆通讯,2019(12).
- [3]冯铁藜.博物馆讲解员的角色定位和技巧应用[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16).
- [4]高慧,孙蓉蓉,刘佳琪.河北博物馆游客行为特征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21).
- [5]周蕾.河北博物院“文博讲坛”近五年工作实践及思考[N].中国文物报,2019-5-7(3).
- [6]刘栋.博物馆免费开放专项补助资金动态管理制度的设计研究[J].东南文化,2019(4).
- [7]陈永平.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措施[J].财经界,2019(22).
- [8]马率磊.公共服务视野下的中小博物馆人力资源整合策略探究[J].中国博物馆通讯,2019(2).
- [9]李莉莉.基层文物博物馆发展的若干思考[J].中国民族博览,2019(16).
- [10]肖潇.从巴西国家博物馆失火事件看我国博物馆消防安全[J].科技风,2019(10).
- [11]卢同民.新媒体视野下的虚拟博物馆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19(16).
- [12]蔡静楠.河北博物院新媒体运维创新路径探析[J].传播力研究,2019(4).
- [13]李莉莉.浅析智慧博物馆建设中的机遇与挑战[J].中国民族博览,2019(14).
- [14]李莉莉.论博物馆文物陈列与文物保护意识[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18).
- [15]宋莉洁.博物馆古籍文献管理及数字化建设分析[J].收藏界,2019(1).
- [16]赵钊.博物馆 IP 授权与开发初探[J].南国博览,2019(2).
- [17]蔡雨晴.河北博物院文创产品设计研究与策划实践[D].湖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6.
- [18]赵春燕,张文娟.河北省中小型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设计现状及对策[J].大众文艺,2019(1).
- [19]罗向军,李新,范德伟等.让传统照进现实 走向未来:行山——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形塑展览工作纪实[N].中国文物报,2019-5-10(8).
- [20]陈静.行山——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形塑策展思路试析[J].艺术与民俗,2019(2).

新闻传播学与实务研究

张芸

随着媒体融合持续向纵深推进,全媒体建设进一步重塑媒介生态,本年度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实践导向更加鲜明,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并与社会发展深刻互动,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质。新中国 70 年的新闻传播、网络视听、雄安新区的媒介形象建构、乡村振兴与对农传播等成为研究热点。

一、新闻传播实务

(一) 报刊出版

近代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东方杂志》(1904—1948),以其海量、精粹、全面、权威的信息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的“资料库”,著名报人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其为“杂志中的杂志”。田建平的著作《〈东方杂志〉专题研究》分为上下编,上编分别对清末《东方杂志》(1904—1911)出版、《东方杂志》“社说”栏目、《东方杂志》近代中国蒙古问题报道、《东方杂志》女性问题报道、《东方杂志》封面设计、《东方杂志》图书广告 6 个专题作了研究。下编为《东方杂志》研究文献索引(1955—2018),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东方杂志》的图书、期刊及报纸文章、学位论文作了编年整理,基本反映了《东方杂志》研究的历程及其成果。^[1]

田建平的著作《当代报纸副刊及其媒介转型》系《当代报纸副刊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的增订版,该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当代报纸副刊研究的专著,出版后被学界研究广为引用。《当代报纸副刊及其媒介转型》对原书作了全面修订,并新增了我国报纸副刊研究综述、著名副刊栏目简评、新媒体与副刊转型 3 章内容,以反映初版 11 年来我国报纸副刊新变化及研究新进展。书中提出了报纸副刊由纸媒向数字媒体“转移说”,提出了“新媒体副刊”“数字媒体副刊”两个新概念,是对媒介变化与发展新环境中副刊的学术新构架,也是对传统纸媒副刊转型为新媒体副刊的完整描述及其演进

“切换”。^[2]

杨秀国等指出,《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人民的知音”,高度重视人物报道一直是传承和发扬的传统。创刊 70 多年来,《人民日报》通过一个个先进典型人物的报道、一篇篇普通人故事的书写,记录和见证一代代中国人的当代史,反映和呈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进入媒体融合阶段,人民日报如同一面全息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典型人物报道、普通人物报道、专题人物报道和全媒体人物报道“四大栏目集群”有机结合,形成了如摩天大楼般的“核心筒+巨型框架+加强桁架+塔尖”主体结构,呈现出巍然耸立的“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媒体镜像。^[3]

金永清等认为,党报副刊在当前新闻同质化、娱乐化、碎片化的趋势下,更当凸显其新闻价值和人文情怀的优势,以鲜活真实的情感表达、多向度的艺术审美来强化报纸副刊的“留客”功能,解决当前大众读者所面临的“信息爆炸”“信息过剩”的诸多困惑。发挥党报副刊的新闻价值和人文情怀优势,需要坚持正确新闻舆论导向,坚守党报副刊的文学性和审美品位,打造富有生活气息、饱含人文关怀、有温度有情感的创新人文精品。以文化品牌为依托策划重大活动,为构筑党报的文化高地打下坚实基础,在众声喧哗的全媒体批评时代加强文化评论工作,有效提升党报副刊的文化传播力。^[4]

人工智能技术日渐深融于出版业,催生了行业规则体系与业态实践的变革。白贵等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透于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但另一方面仍体现出一些现实的局限。譬如,选题策划创新力不足、审稿加工适用性有限、对象分析灵活性匮乏等。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编辑工作的流程,而仅是促使编辑工作重心发生偏移,编辑角色也将面临着再定位的问题。转型调整期的编辑角色正在悄然实现重新定位,定位为选题策划的决策者、稿件加工的终审者、人机关系的引导者。^[5]

杨金花认为,传统出版选题判断由于缺乏相

关数据,编辑往往凭经验或直觉将复杂的概率评估任务转变为简单的操作(如与同类书中的经典或畅销书某个方面的相似度进行比较),实践中这样的方法很常用,但有时也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错误。数字环境下,即使有了一些基础数据,也会发现一些编辑仍然忽视基率这样基本的外部信息,出版了缺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图书。对基率信息利用还是忽略,是把握读者需求的关键因素。作为专业人士,编辑人员还是应该在充分理解基率信息的前提下,努力在情境中把握读者需求,从而提高选题判断质量。^[6]

《纽约时报》在全球新闻摄影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以多项普利策奖和世界新闻摄影奖闻名于世。位迎苏等分析了《纽约时报》的年度图片,认为,《纽约时报》精心挑选的年度图片及其背后的故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真实的报道与客观的呈现方式、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维护、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对终极自由的不懈追求及率真自信的人格魅力等,在年度图片中得到了恰当的彰显。^[7]

杨金花等认为,尽管用户使用阅读辅助工具的目的很明确,主要是为了“自我成长”,但“自我成长”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人性大多懒散,因此仍需一定的阅读效果激励;在一次性接触或短暂使用后,所讲图书内容要能迅速获得用户认可;一段时间以后,书中的理论知识要实际管用或是使用户的社会位置获得内在提升。这对运营商的选书能力和图书解读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要能在用户使用生命周期内持续稳定地给其带来新知识,使其获得认知提升和精神愉悦。^[8]

赵树旺等考查了人工智能对美国出版业的影响,指出,人工智能正在不断改变着美国出版业的前景和结构。美国出版业应用人工智能进行内容分析与出版决策,尝试以人工智能进行内容创作,利用人工智能优化学术出版的评审与编辑过程,基于人工智能助力图书推荐与营销。同时,美国出版业致力于探索人工智能在非人化出版过程与情感元素两个维度的局限与突破。中国出版业应积极发展与构建人工智能的生态结构,着力研发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将人工智能具体应用于书刊策划、编辑和营销等出版流程。同时,亦

应警惕人工智能泡沫,避免陷入浮夸怪圈,不能过分夸大人工智能对出版业的影响和对人类的替代。^[9]

刘赞等指出,移动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作为党报而言,重构渠道优势,既是媒介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做好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工作的关键环节。应利用新技术手段拓展传播渠道,以不同渠道的分层覆盖提升总体传播力,尊重不同平台的传播规律,打造传播渠道的个性,并通过跨界、合作拓展传播渠道,与拥有稳定传播渠道和忠实用户的互联网公司合作,扩大党报的影响力。^[10]

(二) 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

杨状振的著作《网络视听生态治理研究:以价值网为视阈》关注中国互联网行业中生态最丰盈、活力最丰沛的领域——网络视听,其集休闲娱乐、“趣缘”社交、“粉丝”经济和文化消费功能于一体,是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中各种文化、资本和力量参与较深、博弈也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并从根本上改变着我国传统影视与新媒体行业的结构布局、供求关系与价值链体系。该书围绕新时代网络视听生态治理,在价值网理论视阈下梳理、总结和再结构了“互联网+”语境下中国视听媒体的产业价值链观念及其理论。认为,网络视听治理机制的完善,实质是视听治理体系的价值网络结构不断构建与完善的过程。“权威—秩序—活力”是中国网络视听治理的中轴原理,基于价值网络形成的“国家—市场—社会”治理体系和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制度,是其“中轴结构”。两者的匹配和互嵌,决定着网络视听治理的基本面貌和效能。^[11]

曹茹等关注近年来出现的史诗纪录片,以史诗学理论为基础,将“史性与诗性结合”作为史诗纪录片的核心观念体系,认为,史诗类纪录片的“史性”是具有历史维度的真实,“诗性”的核心在于哲学意味的思想。史诗纪录片的题材和主题重大、叙事风格严肃庄严、拥有百科全书般丰富的内容与辽阔的视野。史诗纪录片的表达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有些表达方式还具有观念的意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讲述民族故事,赋予史诗更高的价值追求,“英雄群像”的人物设置,将“群众史观”引入史诗,“历史与现实相互贯通”的表达方法,体现了尊

重历史的当下意识。^[12]

万强等认为,内容是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王牌,也是新媒体的薄弱环节。综合类电视媒体(卫视频道)创办的新媒体平台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存在着与节目两张皮、平台热度差、管理松散落后、缺乏市场意识等问题,形成了“鸵鸟思维”下的“茧房效应”,亟须提高竞争力,转变思维,直面市场,把传播力转化成生产力。用新媒体元素激活广电优势,用节目创意激发产品生命力,通过IP运营实现二次赋能,带动粉丝经济,从而拓展产业链条。^[13]

张惠程从央视《新闻联播》播出的《相约在零点37分》电视新闻的传播效果着手,探讨电视新闻的故事性表达特质。认为,故事性表达是指通过具体而微的场景捕捉和细节表达来关注“小事小人物”,却体现真情、展示“大爱大情怀”的电视手法。做好电视新闻的故事性表达,一是要关注小人物,体现典型性,把镜头对准普通人时抓住典型;二是要抓住细节,重视场景,事先预判事件过程中最能激发当事人的“场景”并有针对性地记录情节,表现细节;三是要立足时代情怀、讴歌社会大爱,追求宣传效益的最大化。^[14]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2019年新闻传播的重大主题。罗大成等以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制作播出的《了不起的70年》为例,探讨电视新闻叙事表达的特点。指出,故事化在观众感知社会、审视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电视新闻叙事表达的核心要义。电视新闻主题报道还要注重受众捕捉信息、吸收资讯时的内在需求。平民化是电视新闻蜕变之路,电视新闻的平民化叙事客观上对一元化的宏大叙事进行了消解,拉近了受众与媒体之间的距离,增强了亲近感。^[15]

韩春秒指出,乡村短视频爆发出野性生长的原始生命力,成为网络视频大家族中生动的单元。乡村原创短视频将田园生活之美、乡情乡趣、传统美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乡村特色美食等传播出去,吸引了海量关注,成为不少视频网站或综合性信息分发平台拉动流量的重要内容板块。同时,乡村原创短视频传播又面临题材困境、视野局限、规范缺乏等发展瓶颈,有赖于从外部环境、网络平台、媒介素养、社会合作

等多方面进行优化、引导与提升。^[16]

杨博等研究了短视频App的传播特点,指出,短视频App以其信息量大、传播性强、门槛低、娱乐性强的特点提供给大众一种社交方式的新选择,成为时下新媒体生态的佼佼者和融媒环境下的一股清流。它比任何一类社交平台更能吸引互联网巨头们的目光和投资欲望,更能带给用户完美的视频化应用体验,但也比任何一类社交平台更具有社会杀伤力。短视频App需要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下、融媒背景下不断革新内容,实现平台多元化发展,打造国内新款社交平台,实现华丽转身。^[17]

杨雪梅等以新华网、河北省网信办与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推出的“白洋淀故事”系列广播剧为例,探讨融媒体时代广播剧多样化的新业态。指出,在融媒体时代,广播剧的传播新业态不仅表现在传播渠道的拓展,还包括文本内容的创新和表现形式的多样等特点。“白洋淀故事”系列广播剧广泛深入挖掘故事素材,从历史故事、文化传说、风土人情、民俗饮食、区域地理等多方面向受众推介雄安新区。在表现形式上融合“广播+漫画+文字”,并以说书的形式呈现,利用多媒体形式满足受众多样化审美需求和兴趣爱好。形成了官方化与权威性、原创化与多样性、立体化与独家性的传播优势。^[18]

薛立磊等认为,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各类普通人制作的饮食节目开始集聚大量人气。短视频美食类节目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美食类纪录片。如何突破瓶颈创出新意成了整个纪录片行业面临的问题。从《早餐中国》短视频纪录片的成功不难看出,在当下互联网语境中,纪录片要更贴近观众,更鲜活,更倾向于吸引年轻观众;纪录片内容品类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增加趣味性和可看性,如借鉴综艺、短视频、网络剧等;短视频纪录片要精品化,要给观众在碎片化时间里提供有营养有品质的内容。^[19]

万莹认为,《小猪佩奇》是一部受到全世界低龄幼童欢迎的动画片,它的成功对我国低幼动画片的创作很有启发。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认知水平和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我国的动画片创作应当关注年龄分级,并将这一观念贯穿于整个动画创作中;低幼动画片创作应该以儿童为

本,故事要短小温馨,贴近儿童生活,将价值观等主观内容自然地融入内容中;同时,出于对市场的考虑,低幼动画片还应在满足儿童需求的基础上考虑家长的需求。^[20]

胡连利等关注近年来央视制播的《朗读者》《国家宝藏》《平“语”近人》等文化类节目,认为文化类电视节目将电视的传播特点与传统文化符号有机组合,展现我国优秀文化精髓并借助特定的信息和素材讲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传统文化在电视语境下的传播以严肃性思考与娱乐化手段相结合为主要形态,通过对隐含深度的事物进行通俗化处理来唤醒受众的文化记忆与认同。在叙事空间建构方面不断尝试场景化设计,将电视语境的审美意象和文化情感融为一体,创新受众的文化体验与想象。^[21]

(三) 新媒体与媒介融合

景义新、沈静的著作《新时代背景下的融合新闻教育发展研究》,通过量化分析方法描述当前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从不同高校类型、不同地域分布入手,详细梳理我国高等院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布局、师资队伍、课程设置以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情况,对当前我国高校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状况进行全景式呈现,并立足融合新闻教育发展之现状,指明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融合新闻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该书指出,未来的融合新闻人才应当具备全面的新闻传播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其核心能力包括融合新闻策划、采写、编发等全方位能力,一专多能将成为人才培养的常态。新闻传播院校要搞好融合新闻教育,需要不断深入推进实践教学改革,涵盖实验课程融合新闻教学、校内媒体平台融合新闻实践、校企合作平台融合新闻实践等各个层面。^[22]

刘烨探讨河北卫视的融媒体之路,指出,河北卫视在利用融媒体技术的过程中,认为新媒体与自媒体在内容上过度“贴地气”,不符合电视栏目制作观念。因而忽视网络媒体的互动功能,仅仅将网媒作为电视媒体的宣传工具,导致河北卫视无法有效挖掘网媒独有的互动化、个性化价值。为有效提升观众的黏性、提高观众的观众度,首先应从卫视栏目的内容着手,深化对栏目内容的认识,加大对当前观众心理特点以及社会特征的分析力度,并以创新的理念,挖掘能够满

足观众需求的栏目。^[23]

赵昆等以嘉兴广电的“禾点点”新闻客户端为例,探讨地方广电媒体的融合之路。指出,嘉兴广电的媒体融合产品“禾点点”新闻客户端通过打造融合传播的自主平台、整合相关资源、创新管理体制等方式,实现了成功转型。“禾点点”还通过立足本土、运用新技术、服务民生等方式生产用户喜闻乐见的高质量新闻产品,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这种内容生产策略为其融合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4]

目前,无人机因其简单易操作、突破空间限制及视角独特等优势普遍应用于新闻采集中。刘禹彤梳理了无人机新闻的发展历程,认为,无人机作为新闻媒体融合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创新技术,变革了新闻采集及新闻要素呈现的手段与方式,极大提高了新闻报道画面的震撼力、感染力和传播效果。但它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小觑,比如,技术不成熟导致操作失灵,不当操作易侵犯隐私和商业机密。记者在使用无人机进行新闻采集时,除具有新闻采编及操控无人机能力外,还需具备较强的安全风险意识,熟知民航专业知识、民航法律法规及民航运行程序等相关规定。^[25]

郑红等基于对唐山主流媒体的调查,指出,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地方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工作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凝聚社会共识、引导公众行为的重要力量。唐山地方主流媒体在当前传播格局下,谋求发展之路应各展所长、不拘一格,推动党和政府的声音全方位覆盖、多领域延伸。大策略方面必须树立服务当地百姓意识、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构建全媒体传播大格局,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又要走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如此才能提升影响力,赢得传播市场,赢得发展空间。^[26]

李峰等认为,在融媒体时代,对农电视节目必须明确自身的价值定位,客观审视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转变理念,树立互联网思维。从受众定位、内容生产、价值导向、产业拓展等维度入手,在加强资源整合优化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改进,实现对农电视节目与新媒体的深度整合。充分发挥对农电视节目在促进新农村建设、强化新农民引导、推动新农业转

型等方面的优势作用。在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基础上,为自身的融媒体创新转型提供根本驱动和全面保障。^[27]

丁琳认为,雄安新区正大量吸引着多元文化的涌入,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新媒体赋权的时代,公共传播使信任、对话取代权利、资源、资本成为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因此,雄安新区的建设必须重新审视城市与人的关系。目前,政府公共传播仍存在着体系不完善、人才匮乏、新媒体使用能力低、忽视公众文化认同感等严重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形成互联网思维,真正实现转向,从传递新闻转向公共传播,从而利用新传播技术创建开放、公平、有效的城市传播网络,促进政府与公众有效的交往和对话,真正呈现雄安新区独特的城市魅力。^[28]

张晴指出,互联网医疗时代的来临为健康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契机。“丁香医生”微信公众号通过标题设置、排版样式、编辑团队、辟谣专题等,以其独特的传播机制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但在运营过程中存在着文章原创率不高、内容重复化、付费课程价格高、用户购买率低等问题。公众号要不断挖掘新角度,从用户心理出发,抓住受众的健康痛点,提高文章的原创率。充分利用自己的忠实用户,通过建立患者社区,建构公众信任机制,提升健康传播力。^[29]

(四) 媒介经营管理

张巨才认为,目前,广告业面临的严重危机,如广告公司被兼并、业绩下滑,人才纷纷逃离,广告主广告预算大幅消减,逐渐抛弃广告代理模式,等等。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源于广告行业的佣金制、产业属性的局限及其与资本属性的冲突等天然缺陷,以及广告遭遇消费者的规避与抵制、广告的根本制度未能真正贯彻,行业地位未能真正体现等实践流弊;另一方面与大众社会的解构以及数字革命对广告传播媒体、传播机制、运作内容的颠覆式变革直接相关。除旧布新,适应科技革命和社会进步,实现低本高效的广告传播,以品牌运作和管理为核心竞争力,以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为视角,以整合营销传播为基本路径进行产业升级,可能是目前面临严重危机的广告业的最佳选择。^[30]

赵军霞认为,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从内容创意的出现到创意的实施,再到内容产品的

营销与传播,都与技术提供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每一个节点都在产业链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媒产业的跨界、重构、融合成为新常态。传媒产业链也由原有单向的、线性的链条关系走向了更复杂、更立体的传媒生态系统。面对这种转变,需要探索传媒产业链的发展路径,研究产业链条上每个环节的增值与发展之道。^[31]

陈娟认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涉农媒体作为党在农村新闻舆论工作的舆论工具,要服务好乡村振兴这一大局,同时,涉农媒体也要抓住这次历史机遇打个“翻身仗”,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壮大。媒体传播力是到达目标并与目标建立牢固连接的能力。涉农媒体提升传播力有效的路径之一,就是改变信息连接的传统范式,融入“三农”领域和农民生活,建立与“三农”的产业连接。这意味着涉农媒体的生产和经营必将超越传统的范围,跨入“三农”产业的领域。这不仅要求媒体“沉”下去,即改变以往高高在上的宣传姿态,下沉到田间地头,更要求其转型为新媒体平台并融入农业农村的产业链、价值链,与“三农”真正建立起共生联系。^[32]

宋杨认为,经历了2016年市场的空前火热与资本的高度青睐,知识付费正迅速由高速发展期走向市场成熟期。在这期间,知识付费向垂直领域下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究其原因,无外乎需求侧与供给侧的行为转变共同构成的合力的推动作用,即认知盈余背景下需求侧的用户由了解到掌握的消费行为转变以及供给侧的流量大平台与中小草根从业者由圈地到深耕的经营模式转变而形成的合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谋求构建以服务+内容、游戏与任务、圈层化社交为抓手的三位一体场景化范式便成了垂直领域知识付费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33]

陈剑晨等探讨广播电视工作室运营模式,指出,工作室是一个相对专业化和业务化的团队,可以充分发挥其“小、快、灵”的特点,突破传统体制和外部市场之间的障碍,快速适应变化的媒介环境,加速融入市场、开展全媒体运营,其管理扁平且高效,运作灵活,效率更高。根据设置目的,工作室的类型可分为创优型(节目型或品牌型)工作室、创收型工作室和垂直细分类型的工作室。工作室应该依托平台发展运营,被赋予更多的权限和空间,设置科学的考核

激励机制并与其他政策有效衔接。^[34]

二、新闻传播学理论

(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新闻行业道德追求和价值目标的实现要以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即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为前提。魏茹芳的著作《新闻工作者角色道德自觉》从新闻工作者作为社会角色具有的内在伦理意蕴这一逻辑前提出发,对新闻工作者角色道德自觉的内涵、价值、思想资源、理论依据等基础理论进行阐释,系统论述了新闻工作者角色道德自觉涵括的角色伦理期待、角色权责和道德义务、角色道德品质等理论问题。并以当前中国新闻工作者面临的角色道德缺失问题为切入点,从现实维度对新闻工作者角色扮演中的现状进行考察,分析新闻工作者角色道德缺失原因,从实践层面上探讨新闻工作者角色道德自觉培育的现实路径,从而使新闻传播活动更好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维护社会伦理秩序,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与运行。^[35]

徐兰英等立足高校团属媒体的传播实践,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举得更高、摆得更正、唱得更响,不断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在高校的引导力和公信力,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团媒在宣传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切实提高其传播力和影响力。高校团媒要遵守新闻内容生产的基本规范,加强对内容的筛选,杜绝虚假内容,避免重复、劣质的内容;要避免相互追随与模仿,避免造成内容的无价值重复以及受众在信息获取上的反复“咀嚼”;要加强相互交流,优化信息共享,消除学生受众因被动接受雷同信息而产生的阅读疲劳感,提升学生在网络参与、表达、互动中的愉悦感。^[36]

李洁探讨了新媒介环境下的新闻真实,认为,在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闻传播过程不再是传者和受众之间固定角色的单向传播。新的媒介环境一方面暴露出传播者素养水平参差不齐,信息源和传播过程难以掌控,谣言等假新闻等乱象横生。另一方面,新的媒介环境也呈现出多元化的信息供应渠道,让大众更无限地接近真实。但是在互联网平台中一起又一起民粹主义事件的作用下,有些时候反而在受众和无限接近的真相面前蒙了一层

纱,情绪的宣泄让受众无暇顾及事情的原貌。在新媒介环境下正确解读民粹主义,用深度报道和系列报道还原真相,坚守新闻真实才是民粹主义与新闻真实的必由之路。^[37]

(二) 媒介与传播

张巨才等以整合营销传播为视角,探讨当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广泛存在种种误区。比如,颠倒媒介融合基础逻辑,实质性落地措施不到位;过于重视形式和渠道创新,忽视内容建设和新闻产品的营销推广;定位模糊,核心服务对象信息需求被忽视等。依据融媒体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广大农村的实际,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核心路径要以用户为落脚点,以媒体逻辑为核心路径,以服务和本地化为着眼点,打造“新闻+政务+民生+党务”整合化的综合服务体系,提高用户黏度。充分利用新技术提高信息的针对性,以整合营销传播为基础,打通基层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38]

刘利永等认为,进入新媒体时代,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以往单向依赖为主的单通道传播模式,衍变成“共时代”的多通道传播模式。这种变化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极大提升组织传播的自主性,增加受众信息接触量,同时,由于对新闻价值的把握不足,以及法律意识、服务意识欠缺,有些组织生产和发布的信息,蜕变为冗余信息甚至有害信息。这就需要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运营模式、管理流程等众多方面再调整、再适应。对于组织来说,完善信息生产、发布的机制,提升管理水平,势在必行。对大众传播来说,要深刻理解并适应新媒体时代“去中心化”的特征,扬长避短。^[39]

李娜认为,话语与社会变迁理论认为话语能够投放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影响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由此构成利益角逐的社会力量。通过研究《人民日报》1949—2019年环境报道的1254篇抽样样本,探讨中国在地性环境话语变迁与意义实践路径。指出,主流媒体环境报道存在七种话语框架生产模式:环境卫生框架、国家主权框架、经济争夺框架、制度理性框架、技术治理框架、生存危机框架;框架签署矩阵显示环境话语生产存在变迁性、匹配性和修辞性,爱国、规范、文明构成意义实践系统的“纽结点”;通过制造对立认同、价值定

位、凝聚共识进行媒介动员。建议主流媒体环境话语传播从劝服向构建生态价值共同体转变,话语体现环境元价值和规范性价值,凭借对环境话语的价值定位、法定性的话语供给和意义建构来共意动员。^[40]

依靠强大的算法推荐,抖音已经在目前短视频白热化的角逐中逐渐占据上风。赵辰玮等研究认为,完全依靠协同过滤和精准分发的单纯算法推荐不能够充分适应目前快速发展的受众需求,平台需要进一步完善更多维度的算法推荐系统。采用更加多元和开放的算法,会更加合理地促进优质视频内容的传播。为此,应加强用户使用行为的数据挖掘工作,引入满意度、有用性等其他考量维度,提高原创视频的推广力度,积极引入或增加人工审核的机制。^[41]

朱良志分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传播力构成要素,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面向县域内受众,守土有责,应全力深耕本地内容,紧抓本地受众不放松,力争实现县域内受众全面覆盖。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受众聚合需要新的传播理念引领,从满足受众需求的角度出发,回应受众期待,把人民群众对优质传播内容的需求作为工作总目标,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将受众聚合在自身平台之上。^[42]

(三) 对外传播

张金桐、李锦云的著作《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系统性地总结梳理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动态历程。着眼于跨文化传播理论,跨文化媒介传播,跨文化语言传播,跨文化语言教学,文学跨文化传播,旅游、体育与艺术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企业管理与商业沟通等七大研究领域,采用“编”“篇”的形式对各领域各板块的分支内容作出了更为具化、细化的研究回顾,涉及新闻传播学、语言学、文学、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一篇总论、80篇专项研究议题文章、一篇大事记和各研究领域的主要参考文献,汇聚成了一部跨学科、多维度、全方位的跨文化传播学的学术史著作。此外,该书囊括了跨文化传播的调适理论、维度理论、符号理论、冲突与融合、文化认同、文化失语问题等多种理论研究,内涵深刻而丰富,展现了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40年的基本概况与发展态势。^[43]

张婧瑶等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中体现出的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探讨雄安新区所辖区域内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策略。指出,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载体。雄安新区地处古代宋辽边界,人杰地灵,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雄安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需要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各方面要求,充分考虑到雄安新区不同历史文化形态以及海外各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状况,在尊重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差异性的基础上,制定合适的方法,运用得体的传播渠道,注重中华文化在海外被当地群众认同的程度,提升我国文化影响力。^[44]

刘小杏等以《中国文化概况》为例,探讨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意义。指出,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力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国际话语权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出版业应积极肩负起知识传承和文化传播的使命来提升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增强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中国文化概况》作为中国文化的英译本,体系完整、结构清晰,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之美,而且使中国学习者坚定了文化自信,提升了自身母语文化的英语表述能力。它的出版及其MOOC的上线有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真正发挥了图书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45]

新闻发言人是一个单位对外交流的渠道。白红彬等结合新闻采访工作中的思考,指出,面对新形势下传播环境的深刻变化,新闻发言人必须全面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不断强化自身业务素质,善于和媒体沟通与交流,敢说话、能说话、会说话、善表达,切忌站在个人角度讲问题,不经核实而仅凭惯性思维进行主观推测,要为群众提供有效新闻信息,做媒体和群众的信息桥梁。^[46]

(四) 舆论舆情

王明好认为,加强网络舆论治理,统筹协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的信息化和网络安全重大问题,不仅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求,也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舆情治理中存在的民众利益诉求增多与治理机制不完善的矛盾,政府和主流媒体应做好

媒介“把关人”，提高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能力，同时也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完善网络立法体系。^[47]

杨秀国等指出，伴随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网民成为数量和影响力极大的群体，并以较大的热情加入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加之社交媒体的大量出现，联系愈发频繁密切的网民逐渐聚集为网络社群，这使得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内外、“三个地带”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社交媒体的出现一方面使得网络社群成为舆情的生产者，基于社群的圈群传播赋予网络舆情更快的传播速度及更广的传播范围；另一方面在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意见表达和交流机会的同时，也使得不同意见交织的网络舆论场中充斥着各种理性与非理性的情绪、观念、诉求，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48]

感知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网民情感的变化程度，研究不同类别情感之间的转移趋势，是政府精准治理网络舆情的关键。夏一雪认为，定性分析舆情大数据环境下网民情感演化和舆情信息交互的关系，可以得出网民情感转移的规律。构建多维度微分方程组描述网民情感“衰减—转移”过程，基于差分回归法确定模型参数，并通过数值仿真研究模型参数对网民情感“衰减—转移”的影响程度，最后在“雾霾”微博舆情环境下验证模型有效性。该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情感“衰减—转移”规律、感知情感衰减程度，以及衰减情感信息向其他情感信息的转移程度，并能够较好地预测网民各类情感的异常变化，可以为网络舆情治理提供理论依据。^[49]

樊拥军等探讨了热点事件短视频的舆论传播规律，认为，热点事件短视频因其自身传播要素的多元化，能够迅速抓取热点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激发舆论的社会合力，促进良好社会秩序的构建。同时，有助于改善部门机构的作风，弥补法律制度的缺失，增进各界沟通理解，最终实现舆论动员的正向价值。通过加强他律与短视频平台的自律来减少违法失范伤害，不仅能够保障舆论进益现实，而且在提高用户媒体素养和发展健全舆论机制等层面具有长远意义。^[50]

三、新闻传播史论

历史上，以《新华日报》为报名的大众传

播纸媒共有十种版本之多，这在世界新闻史、报业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乔云霞考查了重庆版《新华日报》（1938.10.25—1947.2.28）的办报实践，指出，这一时期的《新华日报》是在特殊条件下出版的共产党机关报。既要坚持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又要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要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又要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周旋。报纸积累了独特的采编经验，作为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日报，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维护统一战线、争取群众力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是中共报史上从未有过的经历，是勇于开拓创新的典范。《新华日报》在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红岩精神的构建和传播，促进了红岩精神的形成。^[51]

在晚清迈向现代化的社会变革进程中，近代报刊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通过创办官报或支持商办报刊，宣传新政，引导舆论。白贵等以《北洋官报》为例，指出，在“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促进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直隶省官方喉舌《北洋官报》大量报道国外的新知识、新思想、新道理，意在增长官员的学识，完善官员的知识结构，从中汲取各种有益的养料，用以改良中国的治国方略。《北洋官报》的创办使政府官员眼界大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末官员的现代化。^[52]

白贵等认为，广播是民国时期的“新媒介”形态，它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信息获取的壁垒。在广播的社会化进程中，相伴而来的伦理冲突也日渐凸显。特别在抗战时期，广播的伦理规范与社会责任问题持续引发争议。利用包括广播在内的媒介实现战略与舆论思想上的胜利，成为社会的普遍呼声。受众的“新媒介”批判，促使广播通过自律、他律强化伦理规范，并出台了监管层面的法规，共同使得抗战广播在改善不良内容、抵制低俗娱乐、进行战前思想动员与战时信息传递、普及战区大众教育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抗战广播的伦理规制强化了国民对国家与民族的认知，是民国“新媒介”社会化进程中伦理变迁轨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社会与人的互动，不断规制影响着新媒介的伦理与责任走向和媒介伦理思想发展的进程。^[53]

金强等研究了民国时期的《心声》校刊，

指出,在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剥夺进步文化的出版自由,并查禁一切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政府、要求民主和抗日的书报杂志的背景下,《心声》校刊仍围绕着革命这一核心主题进行文学创作,不同作者对待革命的不同看法则反映了人们的心理斗争。《心声》校刊的出现,不仅为当时学校内外的青年学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养料,也提供了一个使其能够畅言内心观点以及发挥创作才能的平台。同时,该刊作为在“新”与“旧”两者并行的趋势下文艺创作的载体,展现了民国文学的丰富形态。^[54]

魏海岩等考查了北宋时代政府的舆论管理,指出,宋代是古代中国时政舆论发展的高峰时期,政府针对时政评论建立起了一套非常严密的管理机制:统一的时政新闻发布机制、法规管理机制、监察机制。统一的时政新闻发布机制是由都进奏院统一发行邸报、进奏院月报以及其他不定期新闻出版物的方式实现的。舆论法规管理是通过制定法典和临时出台敕、御笔、指挥等规章来完成。监察机制包括以御史台、谏院和皇城司为代表公察、私察两套机制。宋代的时政舆论管理是约束规范和主动利用并行,较之前有相当大的进步。但当时的舆论管理也存在舆论监督滞后、利用虚假舆论打击政敌等负面效应,其根本原因在于舆论本质与皇权专制特点两者间的格格不入。^[55]

白贵等认为,民国前中期,随着新闻纪录片社会化进程的加快,相伴而来的伦理冲突也逐渐凸显。社会普遍呼吁新闻纪录片应秉持真实性原则,摒除不良内容,引导新闻纪录片发挥社会教育职能。抗战时期,提倡新闻纪录片记录、传播真实战况,统一舆论、思想,团结各界积极抗战成为了社会共识。大众媒介伦理批判与官方的管控措施共同使得新闻纪录片在真实性、题材内容、教育职责等方面得到不同程度的规制。新闻纪录片的伦理规制强化了国民对国家与民族的认知,是民国“新媒介”社会化进程中伦理变迁轨迹的重要段落。从公共利益至上、求善、无害等伦理学原则出发,追求媒介、社会与人的良性互动,不断规制、影响着民国媒介特别是新媒介的伦理走向。^[56]

《东方杂志》1904年3月创刊,1948年12月终刊,隶属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期刊史上

存在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性综合期刊。王玉蓉等关注民国时期《东方杂志》的广告传播,分析了其“把关人”的角色构建。指出,即使《东方杂志》在当时拥有可观的发行量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为中外广告主所青睐,中国商务广告公司秉承商务精神,仍然严格控制《东方杂志》广告刊载数量。《东方杂志》“把关人”对于刊载的商业广告,除了在内容选择上注重维护和塑造商务形象外,在形式上也秉承精益求精的商务精神,使其保持了健康的广告传播,最终收获商业广告的辉煌,成为媒介经营的传奇。^[57]

杨晓娟等考查民初新闻史发现,虽然中国效仿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订立《临时约法》,使结社、言论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成为报界甚至全社会的共识,但政权机构与报界间因限制与被限制“言论自由”引发的冲突却频频上演。这种激烈的冲突与对峙集中体现为报界的“抗争行为”,表现为针对袁政府的言论自由权利的抗争和针对租界工部局侵犯言论及人身自由的利益抗争。报界的维权抗争阻滞了报律及相关政令的出台,反抗了军事力量对新闻自由的武力干预,赢得了社会对言论自由权的认可。抗争是重构民主自由社会价值和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使报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获得提升。^[58]

孙会以《大公报》(1915—1925年)外商系列广告为例,解读近代报纸广告的审美意向。认为,1915—1925年间《大公报》外商系列广告逼真再现本土生活之象,隐喻手法营造品牌之象,通过文字描述和图画呈现的方式,把不同意象组合起来,建构产品和品牌的审美意象。这种审美意向表现出兼容并蓄、中西合璧,取材生活、灵活呈现、系列传播等特点,契合了受众的审美心理,成就了产品和品牌的形象,达到了促销的功效。^[59]

(张芸: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田建平.《东方杂志》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
- [2]田建平.当代报纸副刊及其媒介转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 [3]杨秀国,张雷.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媒体镜像”——媒

- 体融合阶段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透视[J].新闻战线,2019(11)下.
- [4]金永清,崔立秋,张晓华.全媒体时代党报副刊如何体现新闻价值和人文情怀[J].新闻战线,2019(7)下.
- [5]白贵,王太隆.人工智能环境下编辑角色的再定位[J].中国出版,2019(11).
- [6]杨金花.情境在读者需求判断中的应用探析[J].编辑之友,2019(8).
- [7]位迎苏,李赢.《纽约时报》年度图片的意识形态功能表达[J].新闻战线,2019(5)上.
- [8]杨金花,王俊明.基于扎根理论的樊登读书会用户留言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9(3).
- [9]赵树旺,付佳.人工智能在美国出版业中的应用、问题与启示[J].出版发行研究,2019(10).
- [10]刘赞,郝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党报渠道优势的消解与重构[J].新闻战线,2019(4)下.
- [11]杨状振.网络视听生态治理研究:以价值网为视阈[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北京:2019年10月.
- [12]曹茹,郭小旭.论史诗纪录片的观念与史诗性表达[J].现代传播,2019(2).
- [13]万强,李琳,宋丹丹.融媒体时代综合类电视新媒体如何创新[J].新闻战线,2019(8)下.
- [14]张惠程.小事小人物 大爱大情怀——从“神仙爱情故事”看电视新闻的故事性表达[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11).
- [15]罗大成,张驰,杨雷.电视新闻叙事表达的三个核心维度——以《了不起的70年》为例[J].传媒,2019(12)下.
- [16]韩春杪.乡音 乡情 乡土气——管窥乡村原创短视频传播动向[J].电视研究,2019(3).
- [17]杨博,贾宏宝.自媒体2.0环境下短视频运营及发展趋势研究[J].编辑学刊,2019(1).
- [18]杨雪梅,贾蓓.融媒体时代的广播剧传播新业态——以“白洋淀故事”为例[J].传媒,2019(3).
- [19]薛立磊,徐烨.《早餐中国》:短视频纪录片的一次成功尝试[J].传媒,2019(13).
- [20]万莹.《小猪佩奇》对中国低幼动画片创作的启示[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12).
- [21]胡连利,陈婧薇.电视语境下传统文化叙事形态创新[J].青年记者,2019(5)下.
- [22]景义新,沈静.新时代背景下的融合新闻教育发展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
- [23]刘烨.有关河北卫视融媒体发展的几点思考[J].西部广播电视,2019(7).
- [24]赵昆,彭聪.“禾点点”新闻客户端:地市广电媒体融合的创新示范之道[J].传媒,2019(18).
- [25]刘禹彤.无人机新闻发展历程及应用现状研究[J].传媒,2019(6)上.
- [26]郑红,林凡,杨继昭.媒体融合背景下唐山地方主流媒体接触调查与思考[J].新媒体研究,2019(22).
- [27]李峰,陈跃.媒体融合环境下对农电视节目的提升之道[J].传媒,2019(4).
- [28]丁琳.新媒介赋权下雄安新区政府公共传播策略[J].传播力研究,2019(10).
- [29]张晴.互联网医疗时代下微信公众号的健康传播研究——以“丁香医生”为例[J].今传媒,2019(9).
- [30]张巨才.天然缺陷与新困境双重碾压下的广告业:严重危机抑或浴火重生[J].河北学刊,2019(9).
- [31]赵军霞.新型传媒产业链的发展审视与建设路径[J].青年记者,2019(32).
- [32]陈娟.涉农媒体传播力提升的可行路径分析:从信息连接到产业连接[J].中国广播,2019(8).
- [33]宋杨.服务、游戏、圈层:垂直领域知识付费的场景化发展路径[J].编辑之友,2019(11).
- [34]陈剑晨,薛瞳瞳.工作室制:广电运营模式的改革与探索[J].青年记者,2019(10)中.
- [35]魏茹芳.新闻工作者角色道德自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 [36]徐兰英,滑晓军.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高校团属媒体传播力研究[J].青年记者,2019(14).
- [37]李洁.新媒介环境下的新闻真实与民粹主义[J].视听,2019(4).
- [38]张巨才,黄先超.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核心路径[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5).
- [39]刘利永,徐占品.新媒体时代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系衍变[J].新闻知识,2019(2).
- [40]李娜.从爱国到文明:建国70年主流媒体环境话语变迁与共意动员[J].新闻界,2019(12).
- [41]赵辰玮,刘韬,都海虹.算法视域下抖音短视频平台视频推荐模式研究[J].出版广角,2019(18).
- [42]朱良志.聚合与重构:县级融媒体中心传播力构成要素分析[J].传媒,2019(19).
- [43]张金桐,李锦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19(12).
- [44]张婧瑶,苗林,康婧.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策略分析——以雄安新区为例[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19(8).
- [45]刘小杏,申琪.对外传播视域下《中国文化概况》的出版及文化传播意义[J].出版广角,2019(17).
- [46]白红彬,姜瑞.新闻发言人如何“说话”[J].采写编,2019(6).
- [47]王明好.多措并举提高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能力[J].人民论坛,2019(28).
- [48]杨秀国,刘洪亮.网络舆情的主体、生产机制及导向构建[J].青年记者,2019(9).
- [49]夏一雪.基于舆情大数据的网民情感“衰减—转移”模型与实证研究[J].情报杂志,2019(3).
- [50]樊拥军,杨莹雪.热点事件短视频的舆论激发及社会影响分析[J].现代视听,2019(6).
- [51]乔云霞.重庆版《新华日报》:党报史上的创新典范[J].

新闻战线,2019(12)上.

[52]白贵,都海虹.《北洋官报》与清末官员的现代化[J].河北学刊,2019(1).

[53]白贵,康智.抗战时期广播的伦理冲突及战时规制[J].现代传播,2019(11).

[54]金强,唐甸重.民国时期河北沧县校刊《心声》研究[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4).

[55]魏海岩,刘非凡,杨丽丽.北宋政府时政舆论管理研究[J].中原文化研究,2019(3).

[56]白贵,康智.民国新闻纪录片伦理规制的历史考察[J].出版发行研究,2019(12).

[57]王玉蓉,安晓梦.民国时期《东方杂志》广告传播中“把关人”的角色建构[J].出版发行研究,2019(6).

[58]杨晓娟,贺慧桐.冲突到共识:1912—1913年报界维权抗争探析[J].国际新闻界,2019(5).

[59]孙会.近代报纸广告的审美意象解读——以《大公报》(1915—1925年)外商系列广告为例[J].青年记者,2019(1)下.

管 理 学

管理科学研究

陈立文 刘广平

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动客观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性交叉科学,为高效率地使用有限资源提供有力的支撑。本年度河北省管理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科学理论研究和工业工程应用研究两部分,重点研究集中在一般管理科学理论、决策理论与方法、评价理论与方法、工业工程、金融工程、知识与创新管理、数量经济分析理论与技术、预测理论与技术等领域;而管理科学与管理思想史、组织理论、复杂性研究、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等研究相对较少。其中,以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为载体,涌现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一、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一) 一般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

李素红、赵瑞等认为我国一些城市养老地产实现了品质地产和优良健管家服务的有机结合。然而,对于养老地产开发适宜性缺乏有效评价。本文通过构建人口因子、生活舒适度、居民消费能力、房地产市场成熟度和服务业发展程度五个维度指标体系,运用熵权、变异系数组合赋权法对指标重要性进行排序,构建改进突变级数法模型,选用2017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指标数据,对城市养老地产开发适宜性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利用改进的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影响各城市养老地产开发适宜性的主要障碍因子进行诊断。最后,提出提高城市养老地产开发适宜性水平的

建议。^[1]

张亚林、刘炳茹认为经过多年实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就斐然,但仍然任重道远。新农村建设在公共管理方面仍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基础差、底子薄、农村基础管理工作存在薄弱环节,限制了新农村公共管理绩效,不利于农村改革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从公共管理视角分析新农村建设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并从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等几个方面提出提高农村公共管理效率的对策建议。^[2]

李佳钰、张贵等基于生态能量学和知识管理理论将知识进行生态学解构,系统论述了知识能量的内涵和表征;提出“知识能量流动”概念,分析了知识能量流动的情境和机理,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了不同情境下知识能量流动的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知识具有生态能量学特征,知识势能、知识动能和知识内能共同决定知识能量结构;技术替代是知识能量流动的必要条件;知识能量结构是影响知识能量流量和流向的关键因素。^[3]

徐楠、凌云鹏等指出输配电价改革主要涉及到成本的监督和审查、电网投资等,对释放电力体制改革带来的红利、优化成本结构和电力市场化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输配电价改革也改变了电网企业以往的盈利和经营管理模式,直接影响了电网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投资能力。分析了输配电价改革对电网企业成本管理、固定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和预算管理等方面的影响路径,提出了“一个基础,三个抓手”的财务管理策略,建议电网企业积极满足改革要求,及时研究和调整新输配电价核定原则下的成本管理策略,夯实固定资产管理,建立有效的投资决策方法并及时强化预算管控体系,积极为企业争取合理的电价政策。^[4]

王重润、温礼瑶考察了房价上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房价上涨会通过“财富效应”及“资产替代效应”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利用2013—2017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构造了中介效应模型证明:房价上涨的“资产替代效应”起到了主导作用,挤出了企业研发投资,而投资性房地产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房价对不同融资约束及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高融资约束企业的研发投资受到房价挤出的影响较小,国有企业受到的挤出影响较大。^[5]

刘璞、李晗等按照“资源—能力—绩效”的逻辑范式,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引入客户关系管理能力,提出电子商务投资—电子商务能力—客户关系管理能力—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基于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能力与客户关系管理能力及其子维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其中,电子商务能力及其子维度对顾客知识管理能力的影响程度最大,对顾客赢返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弱;电子商务管理能力和电子商务技术能力对客户关系管理能力及其子维度的影响稍强,而电子商务战略能力的影响较弱;电子商务投资通过电子商务能力和客户关系管理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绩效。^[6]

王树强、史婧选取2005—2017年我国30个重点城市的数据,将其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空气质量不仅会影响住宅价格,而且具有区域差异性。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消费者购房时更关注空气质量,在东部地区空气污染每降低1个百分点,会引起住宅价格上涨5806%,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空气质量变化不会引起住宅价格变化。^[7]

王红宝、杨建朝等田园综合体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出的创新举措,国家已将其列入中央一号文件。从田园综合体内涵出发,分析了各个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明确共生冲突的表

现形式,从而构建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田园综合体核心利益相关者共生机制,以促进田园综合体和谐发展。^[8]

(二) 决策与对策理论与方法

刘一健、岳小云发现供需扰动在农产品供应链中普遍存在,易导致生产过剩或缺货风险,文章旨在探讨不同供需下供应链的最优决策。供应商采用双渠道销售某单一农产品,并在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利用均值—方差法描述其风险态度。分别在一体化和独立决策模式下考虑供需关系,针对四种不同情形进行分析,并利用数值算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供应商随着风险规避程度的上升,其两个渠道价格反向调整,使得需求量扩大,其最优供应量提高。市场最优的供应量有一定的鲁棒性,当供需偏差较大时,市场的最优供应量才会发生变动。并进一步分析渠道所占市场份额对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9]

张志宇、陈业华等针对新产品与再造品存在差别定价的情况,考虑政府从供应链源头上对制造商进行补贴,基于博弈的视角对闭环供应链系统集中式决策与分散式决策的最优定价策略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分散式决策下闭环供应链系统存在“双重边际效应”,导致闭环供应链系统严重失调。通过设计收益—费用分享契约,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和闭环供应链系统协调。最后给出算例计算分析,验证了理论方法的正确性与契约设计的可行性。^[10]

刘兵、牛楠等认为多团队系统是为了应对动态环境和复杂任务而产生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多团队系统内团队间冲突不可避免,冲突管理则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多团队系统情境以及中国本土管理情境的独特性,因此当前的西方多团队系统冲突管理研究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值得考量。基于此,运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了多团队系统内团队间冲突管理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对演化路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多团队系统内团队间冲突管理最终将稳定于(妥协,妥协)或者(竞争,竞争)这两种演化稳定策略;(2)沟通有效性、功能互补性、目标协同度、信任对称性、工作流程互依度、双重认同度这些因素程度的增加使妥协行为意愿增加。由此得出以下管理启示:科学辨识团队间冲突的性质及水平、高度

重视多团队系统的结构设计、加强培育多团队系统的组织文化。^[11]

代冬芳发现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扩大进口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技术创新,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福利,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中国的中间品、资本品、消费品以及能源产品等与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的进口贸易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应采取提高中间品进口的针对性、扩大核心零部件进口,推进进口便利化、优化消费品进口结构,适当扩大服务业产品进口、提升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内涵,加大环境保护类产品进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等措施,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2]

郭占冰发现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网上渠道和传统渠道之间的渠道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而在渠道冲突的研究是丰富的,网上顾客评论越来越显著的影响是很少考虑。因此研究了网上顾客评论在双通道的供应链,在渠道冲突是由在线零售商和传统零售商和在线客户评论之间的动态竞争为代表的影响,这种渠道冲突会影响潜在客户的购买通过提供关于零售价格在这两个信道信息进行决策。在此基础上,平衡点的稳定性,渠道冲突和零售商的利润的复杂性在两种情况进行分析,这取决于零售商是否有关于不确定性的影响或没有分布信息。结果突出了渠道冲突的复杂性下的在线顾客评论的影响,最后为零售商与网上顾客提供了相关建议。^[13]

康凯、赵宇杰等研究的重点是进化低碳供应链企业行为与政府的低碳政策和新兴的低碳市场有关的战略问题。建立零售商和制造商的供应链通过博弈来解决四种零售商和制造商的低碳策略组合,从其中的进化策略的稳定性(ESS)进一步分析这些策略。结果表明:在低碳技术的开发阶段,只有一方(制造商或零售商)应采用低碳行为;在先进的低碳技术阶段,只有零售商应采用低碳行为,产生积极的结果实现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帕累托改进,与政府的低碳要求的遵守,迎合了低碳的消费需求,并提高供应链的经济和环境性能。最后,从政府的低碳政策,消费者的敏感性,以及零售商碳的利息/补贴率融资

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中发现:政府可以鼓励企业通过减少碳排放控制碳的价格;企业需要关注消费者的敏感性作为这些的增加会降低长期运行的碳排放量;零售商可以通过降低碳融资利率稳定进化供应链系统。^[14]

林鹏、郭子雪等为科学有效地评价区域人力资本质量水平,构建了人力资本质量评价体系,提出了G1法和灰色关联度法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指标方法,建立了基于TOPSIS法的人力资本质量评价模型;并以河北省为例,构建了河北省人力资本质量评价模型,且以11个地市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15]

曾珍香、张钰琦等在消费者具有社会责任偏好的前提下,以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制造商构成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节点企业在供应链中的权重系数,构建不同方式下的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协同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分担问题。研究表明:当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采取SCSR协同治理时,相比于供应商、制造商一方承担或者双方共同承担但各自为政两种情况,其CSR水平和经济效益都有明显的提高。节点企业在供应链中的权重系数越大,其CSR努力对供应链系统的整体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越明显。而且,供应商作为核心企业领导的供应链结构更加有利于供应链长期竞争优势的形成,两个势均力敌的节点企业形成的供应链联盟最不利于实现双赢。^[16]

张玉梅、王子柱借鉴七轮房地产调控经验教训,有助于构建和实施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其中迅速精准出击、多种市场化政策、必要时采取行政化手段等经验值得借鉴。然而调控并没有解决高房价问题,这与信贷和税收政策过于宽松、土地和保障房供给不足、调控政策存在漏洞,执行出现偏差、政策外溢性、房价上涨预期强烈等密切相关。短期可适度微调以合理满足改善性购房需求。长期应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通过差别化信贷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以公平和绿色的税收原则促使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在多元化供给基础上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以共享理念完善住房保障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强行业自律和监管,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推动城市群战略和高质量住房供给。要分阶段有序实施长效机制,短期侧重信贷和土地,未雨绸缪防控断供

潮;中期稳妥推进房地产税收改革;长期将重点放在住房供给侧改革,以更好地满足改善性和养老等住房需求。^[17]

张学文、田华等阐述了使命驱动型创新政策的内涵和基本逻辑,构建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的使命驱动型创新政策体系的基本架构。研究强调:使命驱动型创新政策打破了市场失灵理论的局限性,强调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型,主动投资、干预创新的全过程;做好国家创新战略方向的引领;主动决策和承担创新的重大风险;创造新的市场或机会等。构建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使命与战略、普适性政策、专项政策和产业政策四大层次。^[18]

(三) 评价理论与方法

本年度的评价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企业评价研究、区域评价研究和信用及价值评价研究等领域。

1. 企业评价研究

牛楠、刘兵等认为多团队系统是当前广泛应用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团队间冲突对多团队系统有效性产生重要影响。运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采取构念积储格深度访谈技术深入多团队系统现实情境进行探索性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多团队系统内团队间冲突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潜伏阶段、感知阶段、管理阶段、结果阶段和反馈阶段。第二,冲突源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个体层、团队层及系统层输入的跨层次冲突源;二是多团队系统内团队内及团队间的交互式冲突源;三是以往冲突结果的循环反馈式冲突源;四是多团队系统外界环境及外界干预类冲突源。第三,冲突感知阶段包含冲突界定和冲突归因两个步骤,冲突源的位置包含我方、对方、第三方或者外界三类。第四,冲突管理基于关心我方、关心对方和关心系统这三个维度,可以划分为八种类型。第五,冲突产生的结果建设性与破坏性并存,对个体、团队和系统均会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19]

王法涛发现近年来,平台型电子商务模式发展日益成熟,平台型经济体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前,平台模式的电子商务企业表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电子商务平台逐渐由单一的双边市场演化为跨平台多边市场。网络效应既是平台型经济体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影响企业竞争策略

的关键因素。对平台网络效应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大多针对单一平台双边市场进行数理分析,鲜少针对多元经营模式下的跨平台网络效应进行研究。本研究边际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基于电子商务主平台及其从属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拓展已有双边市场分析框架,分别构建联营开放电子商务平台、自营半开放电子商务平台、物流电子商务平台、金融电子商务平台四种模式下的多边市场收益模型,并讨论各种商业模式下的平台定价与利润;二是通过案例研究,分析验证平台网络效应动态演化路径,并给出企业在不同演化阶段的核心竞争战略。研究结果表明,交叉网络效应会削弱企业对平台的控制力,而实施跨平台战略可以分散网络效应,实现网络效应红利的内部化;先发平台的网络效应扩散有助于企业跨界进入相关产业领域;多元经营战略可使平台获得更大定价空间。此外,处于不同演化阶段的电子商务平台其网络效应与核心战略也有所不同,成长期的平台注重用户数量,成熟期的平台重视平台质量建设,分化期的平台实施平台包络战略。^[20]

彭国富、张朝辉通过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形成与调节机制进行分析梳理,基于非金融企业的理性经营行为,构建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合理水平测算模型、评价模型和调节模型,并在相关数据采集和模型检验的基础上,对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合理性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长期处于不合理状态,且近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非金融企业生产税净值率和最终产品价格、央行存款准备金率对其杠杆率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作用。因此,调节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不合理性,可以从生产税净值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两条路径来进行。^[21]

张新宁、孟楠等利用序关系分析法和BP神经网络对铁路施工企业的信用加以评价。研究结论:(1)总结铁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现状及其相关理论后,构建了铁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并给出了其信用等级划分标准;(2)利用序关系分析法确定各信用评价指标的综合权重,并提出通过BP神经网络模型评价其信用状况;(3)本研究成果对铁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2]

郭净、魏荟颖等互联网金融企业兼具互联网

和金融的双重属性,其如何开展开放式创新是涉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重要问题。选取宜信公司进行纵向案例研究,探索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对开放式创新网络形成演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演化的过程中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创新机会由来自市场转变为来自社会,创新参与各方由经济联结转变为责任联结,创新模式由部分开放转变为完全开放,创新绩效由创造经济价值为先转变为创造社会价值为先,创新途径由价值链创新转变为与社会共生。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是联结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和开放式创新网络的两种重要机制,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扩大企业的利益关注点、改变创新资源配置,促进开放式创新网络的形成演化。^[23]

刘兢轶、王彧婧等首先分析了影响供应链金融模式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的因素,进而通过因子分析和 Logit 模型建立了供应链金融模式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验证了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及核心企业的信用水平显著影响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级。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预测准确度较高,对金融机构衡量供应链金融模式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及中小企业提升自身信用水平具有一定意义。^[24]

江石梅、胡伊美等这项研究旨在探讨的创新生态系统是如何构建的。对海尔集团的案例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六大创新工程/技术突破,提取和描绘出海尔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强调的创新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互补性,而同时集成了非技术问题,如战略,文化,制度和市场。此外,创新生态系统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方便实现某个具体项目,而是改善其内部创新的总体成功率。^[25]

李桂荣、温绍涵等以 2013—2016 年 A 股主板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按产权性质将企业进一步分组,实证检验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非国有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地方国有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比中央国有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引入政府环境规制变量后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政府的环境规制程度越高,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越明显。分析表明,利益相关者对不同产权

性质的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期望不同,从而导致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为此,建议地方国有企业加大履行环境责任的力度,同时地方政府需进一步健全对非国有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激励机制。^[26]

2. 区域及产业经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黄秀莲、李国柱以高耗能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偏离份额法分析我国 31 个省份 2006—2015 年高耗能产业转移的时空特征,并在 Stata12.0 中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导致不同区域高耗能产业环境污染排放差异的驱动因素进行数据回归,分析高耗能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高耗能产业呈现出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演变趋势,而污染转移和高耗能产业转移的特征基本一致,逐步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是我国高耗能产业污染排放的主体;相对净变化量 NRC、竞争力转移增量 DIF 与环境污染排放呈正相关关系,结构转移增量 STR 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关系。除了受产业转移的影响,高耗能产业的环境污染排放还和经济水平、科技水平显著正相关,和环境管制强度显著负相关。^[27]

杜颖在利用 CF 滤波直观考察国内粮价与国际油价关系的基础上,运用 ARDL-ECM 模型实证检验了 2002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粮食价格和世界石油价格之间的短期动态效应和长期均衡关系。研究发现:2012 年后国际油价与国内粮价之间周期波动的一致性日益减弱;国际原油价格与国内粮食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前者对后者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大豆价格对原油价格波动的敏感度最高;国际油价对国内粮价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鉴于我国生物燃料产量增速较快,需要关注生物能源发展带来的国内粮价上涨风险。^[28]

杨胜利、王伟荣发现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加快,流动人口就业与收入呈现出新的变动趋势。采用 2016 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产业结构升级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的群体性差异。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教育可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给男性、已婚、年龄小、城城流动、跨省份流动、高学历和流动时间长的流动人口带来的收入效应更大;流动人口就业行业越高端,工作经验的收入效应越小,教育的收

人效应越大。收入效应的群体差异来源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流动人口自身特征的差异性。^[29]

徐永利、徐正夫阐述了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和创新城市的高端定位,决定了必须培育和建设富有吸引力的创新环境。程序员是创新驱动的微观主体,众创空间是创新驱动的有效载体,教育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石。因此,从程序员、众创空间和教育特区三个维度,探讨以创新人才为本、以众创空间为载体、以教育为基础,构建雄安新区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创新环境,使创新者有意愿、有机会、有能力发挥才智,从而实现人才价值、创新产业和城市生态的有机融合与互动,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30]

孟萍莉、董葆茗认为农业产业链是农业生产分工与协作的载体,由于当前农产品供求结构的不平衡和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合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的存在,使得农业产业链在横向融合与纵向合作中各环节的增值效能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互联网+”为农业产业链升级提供了新动力,可以通过理念和技术创新来重构物质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因此,在析取了农业产业链中关键链环的基础上,对其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升级策略进行了探讨。^[31]

袁青川、易定红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最小二乘法估计,并结合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系统研究了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分配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人口流动尚属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转移,以提高工作匹配质量为目的的人口流动还未形成规模;在京津冀地区,北京市流动人口生产率禀赋回报最高,但农业户口等非生产率禀赋也给流动人口带来了明显的工资劣势;京津冀地区省际人口流动在行业优势工资引导下优化了就业结构。为实现以就业匹配为目的的京津冀地区人口有序流动,须消除三地间人口流动的行政障碍,减弱户籍与附加福利的关联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对生产率禀赋的回报机制。^[32]

李建英、武亚楠自李克强总理2015年首次提出“互联网+”计划后,利用互联网与农业价值链融合已成为破解传统农业价值链弊端的有效路径。依据融合程度的不同,将“互联网+”与农业价值链融资的融合分为互联网企业嵌入农业

价值链融资、互联网优化农业价值链融资及农业价值链上龙头企业自建互联网金融平台三个阶段,并分别研究每个阶段的运行机制、风控模式、运行效果及评价。研究发现:“互联网+”与农业价值链融资融合的不同阶段有效缓解了传统农业价值链薄弱环节的融资约束,满足了资金需求主体的多样化融资需求,增强了农业价值链稳定性。^[33]

赵松岭、杨子夜在全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形势下,作为我国十大振兴产业之一的物流业的节能减排势在必行。当前,京津冀区域内物流业正在深入协同发展,论文选取相关有效数据,通过统计京津冀物流业的能源消耗量,测算碳排放量,提出节能减排的具体措施,建设低碳协同发展机制,以期降低碳排放量,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绿色环保的物流体系,最终为京津冀区域经济的生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34]

刘兵、张荣展等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使用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创新人才要素集聚和创新资本要素集聚对区域协同创新的影响,并分析政府控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创新人才要素集聚和创新资本要素集聚对区域协同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控制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并且存在双重门槛,当政府控制力度低于门槛值时,调节作用非常显著,随着控制力度的增加,其调节作用逐渐减弱。^[35]

赵学礼、王贺如基于2007—2016年我国省级数据,采用系统GMM法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量技术来源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就高新技术产业现阶段的发展而言,购买国内技术和引进国外技术这类直接引进技术来源对其创新效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有本土适宜性的国内技术积极作用于规模效率,先进的国外技术积极作用于纯技术效率;而自主研发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动力还远远不足,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红利正在消失。^[36]

3. 信用及价值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岳娟丽、曾繁华等阐述了科学有效的政府绿色发展基金投融资模式,既要实现融资来源多元化、解决绿色融资期限错配、实现多层次资本结构、满足与融资来源匹配的多样化风险承担及多

层次收益分配等金融目的；还要平衡多种关联角色的利益和动机。基于上述金融目的以及关联角色的利益动机，提出我国政府绿色发展基金的投融资模式建议方案，以建立科学的约束制衡，确保绿色发展基金推动绿色发展目标。从融资角度提出了多层次的资金结构池设计方案；从投资机制角度，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分类提出了相应的投资机制。另外提出了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绿色基金在重点目标以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定位差异。^[37]

张培、张丽平认为政府是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过程中重要的外部制度主体，其参与度不同使得制造企业服务化所处的制度情境存在独特性和动态性。基于政府参与视角刻画制造业服务化中四种制度情境，探讨不同制度情境对制造企业服务化中创新网络形成产生的差异性影响，揭示政府参与对制造业服务化具有不可替代和动态变化的角色和作用机制。^[38]

柳天恩、田学斌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五年来，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两个“一体两翼”加快建设，交通、生态和产业三个重点领域不断突破，区域协同创新势头良好，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进展。但区域“断崖式”发展差距仍未根本改变，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存在结构性难题，交通一体化存在路网布局和交通方式衔接短板，生态环境保护存在市场机制不健全难题，产业升级转移存在承接平台分散、承接能力不足和承接产业错位等问题，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尚未彰显。在未来三地的协同发展中，应把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探索结合起来，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把北京“减量发展”和“辐射带动”结合起来，加快缩小河北与京津的发展差距；以两个“一体两翼”建设为契机，培育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以“京津雄创新三角”为引领，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以交通和生态领域为突破口，开创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39]

任亮、孔伟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经济协同更是文化协同。而文化协同发展需要通过文化协同治理来实现，文化协同治理则基于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构建。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由主体、客体和方式系统构成，治理体系多

元化。治理体系的策略应涵盖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层面。^[40]

侯小娜、李建民针对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提出新的要求。根据不同演化阶段的特征、支持重点的分析发现：未来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制定将更趋近于促进政府、市场、农村三方面相协调，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引领，以创新为驱动，构建农业农村创新生态系统，以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促进城乡农业农村共生、共享、融合式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快实现乡村振兴战略。^[41]

（四）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

张磊、李占雷等认为共同物流参与主体间的风险分担机制是共同物流商业模式稳健运行的一个关键问题。共同物流主体间的合作风险包括道德风险、管理风险、运作风险以及信用风险，在四类风险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共同物流商业模式合作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截尾平均数表示专家评估风险损失值的 Shapley 值法，以利用熵权法进行 Shapley 值修正，构建共同物流商业模式合作风险分担模型，通过实例分析验证模型，给出共同物流商业模式合作风险分担机制的优化路径。^[42]

辛兵海、刘雪薇基于 2006—2018 年我国 32 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批发融资市场的市场约束问题。结果表明：第一，我国批发融资市场存在市场约束，银行偿付风险对批发融资成本存在正向影响；第二，不同规模的银行所面临的市场约束程度不同，相较于大型国有银行而言，中小银行面临更为严苛的市场约束；第三，宽松的货币政策显著降低机构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紧缩的货币政策显著提高机构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对于商业银行成本管理，以及银保监会对批发融资市场风险的监管，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43]

王朋岗发现以往对家庭养老资源的研究，大都基于同住子女的视角，缺乏从直系组家庭的视角将非同住子女的养老支持也考虑进来。本研究基于血缘关系而非居住方式，站在直系组家庭视角，使用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供给与需求出发，借鉴国内外老年人综合评估方面的计分处理方法，通过评

价老年人健康状况与经济状况,相应的计算出老年人的养老资源需求指数;基于当前子女的养老资源供给水平和每一个子女赡养父代的意愿、条件和能力,构建未来老年人家庭养老资源的供给指数;最终构建家庭养老资源供给缺口指数。结果显示我国有 20.55% 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养老存在总供给缺口、高达 77.45% 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存在缺口、48.25% 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的生活照护存在缺口、24.83% 的老年人单纯依靠子女的精神慰藉存在缺口。使用多因素回归对风险人群进行识别,发现不同老年人家庭在生活照护、精神慰藉、经济支持缺口面临的风险存在差异,但高龄、低受教育程度、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女性老年人存在养老资源总供给缺口的风险最大。^[44]

全凌云、曹泽阳等自 2018 年 6 月起发生的 P2P 网络借贷行业大规模平台倒闭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关注,识别 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信用风险成为热点问题。构建 P2P 平台信用风险指标体系,选取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正常和倒闭平台的指标数据引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识别出平台收益率、分散度、流动性和平台业务成就因子对 P2P 平台产生信用风险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最终通过训练 BP 神经网络得出 4 个因子识别平台信用风险准确率达到 90%。以此为出借人甄选平台提供建议,为网贷行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45]

赵辉、韩志霞以 2012—2017 年我国主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经营不确定性、供应链集中度与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感知三者关系进行研究,最终得出以下结论:供应链集中度与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关系;经营不确定性与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关系;经营不确定性能够显著增强供应链集中度对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感知的影响作用。^[46]

(五) 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

王树强、耿明阳等人在环境税开征条件下,构建了多寡头排污企业间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各企业间产量博弈,研究了环境税对企业竞争的内在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的调整变量 K 满足一定条件时,整个行业的产量竞争是收敛的,我们可以求出此均衡解,并据此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 环境税对于整个社会的环境改善大有裨益,环境税制下,企业排污大幅下降;

(2) 环境税存在税收扭曲,通过价格机制使得一部分税额转嫁于消费者,加重了消费者负担;(3) 环境税的征收使得整个污染行业的竞争格局发生转变,由环境税产生的成本差异促使清洁企业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行业向着绿色化转型升级。^[47]

杨欣、曾珍香等面向制造型企业低碳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云制造平台运营商主导的 Stackelberg 博弈,引入价格与碳减排量共同影响的需求函数,综合对比了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下云制造供应链最优碳减排量、最优定价及供应链总利润,提出了云制造模式下供应链环境治理的协调机制。主要结论包括:(1) 为实现分散决策的帕累托改进,基于决策主体有限理性的假设,设计了旁支付自执行契约对分散决策的云制造供应链系统进行环境协调优化;(2) 通过算例验证了该契约的有效性,实现了对云制造供应链系统利润增加值的公平分配;(3) 在灵敏度分析中还发现,云制造供应链利润与碳减排成本及消费者的价格敏感系数负相关,与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正相关,且消费者的低碳偏好程度对云制造供应链的总利润的影响最大。本研究为我国云制造服务提供商和云服务平台运营商的运营及低碳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48]

原亚宁、李琳等研究发现交直流混合微网为较大容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提供了高效的管理平台。在光伏较大渗透率的情况下,针对交直流混合微网运行中光伏消纳率和综合网损率存在的矛盾,建立主从博弈模型解决该多目标规划问题,对源网进行协调。所建立的模型以光伏消纳方案为博弈主体,博弈的支付为最大化光伏消纳率;以微网综合运行方案为博弈从体,博弈的支付为多目标形式,分别为综合网损率最小和运行成本最小。通过博弈的方式得到微网运营商的光伏消纳方案以及交直流混合微网优化运行方案。所建立的模型可使微网符合综合网损率指标的同时,最小化运行成本,最大化光伏消纳率,保证了交直流混合微网运营的社会经济效益。最后通过一个算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49]

张玉梅、王昌昊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民间融资中各参与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逐渐加剧。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民间融资中介的风险控制能力越弱、借款人的违

约风险越大和违约成本越小,借款人的还款概率就越低。信息不对称导致委托代理问题,破坏权利义务的对等关系,弱化自律他律效果,引发民间融资高风险。只有将公正、平等、诚信等金融伦理核心理念贯穿于民间融资各主体及融资全过程,才能有效防范民间融资风险。^[50]

魏杰研究了具有互补产品的供应链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整合策略,考察了下游、上游和纵向整合对供应链成员的决策、利润和供应链绩效的影响。将集中化和分散化决策模型作为基准,与下游、上游和垂直整合战略进行比较。我们的对比分析表明,供应链的总利润随着整合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垂直整合比上下游整合更有利可图。然而,让我们惊讶的是,上下游整合策略并没有影响到总利润。^[51]

王俊龙、张璞等指出为了找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走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乏力的困境,探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安徽省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 1996—2016 年安徽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两大系统各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并以此使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安徽省地区城市化与经济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 1996—2016 年安徽省区域城市化系统中呈现出“土地城市化权重>人口城市化权重>产业城市化权重>生活城市化权重>生态城市化权重”情况,在安徽省经济发展系统中呈现出“经济规模权重>经济质量权重>经济结构权重”情况。研究又发现:安徽省的城市化与经济的发展在 1996—2016 年期间耦合发展趋势经历了低度耦合、中度耦合、高度耦合三个阶段。^[52]

徐征、林英明等认为近年来,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走高,其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利用 2007—2017 年企业债券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券信用价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提高企业债券信用价差。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时,债券信用价差将会显著增加 0.128bp。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通过融资流动性渠道影响债券市场信用价差的。基于此,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视角对债券市场提出了系统性风险管理的政策建议。^[53]

徐勇、苏雪等研究发现当今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下,合作创新成为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将企业按规模分成两类,建立企业合作创新耦合网络,采用概率型无条件模仿的策略更新规则,讨论企业间博弈策略随时间的演化规律。首先运用矩阵半张量积方法,将博弈的逻辑动态系统转化成离散时间系统,得到各企业每个时刻的策略;其次,给出所有企业以概率 1 参与合作创新的充要条件;最后,通过改变超额收益分配比例及违约成本、设计牵制控制算法使得所有企业以概率 1 选择合作创新策略。^[54]

(六) 预测理论与方法

李万庆、陈佳琪等研究表明针对建筑工程施工成本管理中成本难以预测的问题,提出用鸟群算法(BSA)优化极限学习机(ELM)模型的参数。首先,利用 BSA 对 ELM 模型的输入权值和偏置值进行优化;其次,构建出 BSA-ELM 建筑工程施工成本预测模型;最后,将 BSA-ELM 模型与实际工程施工成本数据相结合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模型在成本预测中的精度比 ELM 模型、CSO-ELM 模型、PSO-ELM 模型和 BP 神经网络模型预测精度高,也为类似预测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预测方法。^[55]

王震洲、聂亚宁等针对大气能见度预测算法来源单一、精度低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 BP 神经网络模型。该模型采用了 6 个气象因子和 4 个主要污染因子 NO₂SO₂PM_{2.5}PM₁₀的预处理结果。以石家庄市及其卫星城的为输入数据,24 小时后的能见度值为输出数据。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预测结果在绝对偏倚和相关方面优于石家庄气象资料的单项预测结果,可以进一步提高能见度预测精度。^[56]

王健通过近年来苹果市场价格波动时有发生,分析我国苹果市场的价格特点和波动规律对我国农产品生产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我国富士苹果的价格指数为研究对象,运用 ARIMA 模型对苹果市场价格进行短期预测,并构建苹果市场价格波动警限,进行价格波动预警。结果表明:模型能够较好预测苹果价格波动变化,以期为我国苹果市场信息变化提供参考。^[57]

颜湘武、徐韵等充分挖掘可再生分布式电源(RDG)动态无功电压调控能力,对改善配电系

统内风电、光伏出力随机性和负荷波动导致的电压稳定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建立了基于模型预测控制的配电网多时间尺度无功优化模型,包含日前优化调节层和实时滚动调控层。日前优化侧重于运行经济性,协调配合不同类型无功设备进行大尺度无功调节,并预留充足动态无功储备响应动态调控,降低运行风险;实时滚动调控侧重于系统运行可靠性,基于 RDG、负荷超短期预测进行滚动调控,根据无功补偿需求及时决策反馈校正,逐层细化实现配电网无功电压“大幅调节”“小幅调控”和“反馈调整”,抑制不确定因素导致的电压越限。最后,通过 IEEE33 节点算例进行仿真分析,验证了该文所提模型和算法可有效削弱预测误差影响,提升系统电压稳定性和电能质量。^[58]

潘佩佩、杨桂山等认识到耕地利用与粮食生产的耦合作用规律是确保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基于模型模拟、GIS 和多目标情景模拟等方法,在定量分析粮食生产对耕地利用变化动态响应基础上,分析流域粮食生产变化的关键驱动要素及粮食增产潜力,为流域耕地利用动态调控和粮食安全问题解决提供参考。^[59]

刘云鹏提出一种基于经验模态分解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浓度预测方法。首先,运用经验模态分解将气体浓度序列分解为一组相对平稳的子序列分量,以减少不同趋势信息间的相互影响;然后,针对各子序列分别构建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时序预测模型,并利用贝叶斯理论对网络相关超参数进行优化,以提高单个模型的预测精度;最后,叠加各子序列预测结果得到气体浓度预测值。算例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预测算法,所提方法能更好地追踪油中溶解气体的浓度变化趋势,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60]

孔强、谢晓彤以冶河灌区一干渠 1981—2018 年用水量观测数据为样本,在对连续 15, 20, 25, 35 年用水量样本序列马氏性进行验证的基础上,采用精度较高的加权马尔科夫链模型预测方法,检验了 2019 年预测数据的准确性,采用图表法讨论了马氏链的齐次性,利用状态特征值结合线性插值法估算年用水量值。结果表明:加权马尔科夫链模型适用于有较长系列统计数据的灌区年用水量预测,且相较于其他方法,

其理论依据更加充分,预测成果精度较高。本文研究结果,可为灌区年用水量预测和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重要参考。^[61]

陈坚、张轶凡等研究发现当投资者预期未来股票市场可能出现下跌时,会用虚值看跌期权来对冲下跌风险,因此这部分期权价格中隐含了未来股票下跌风险的信息。文章根据下偏矩的概念,通过无模型的估计方法,从看跌期权价格中提取出股票收益率分布的尾部风险指标或下跌风险指标,发现其对未来 1 个月的股票超额收益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加入控制变量后,隐含尾部风险指标的预测能力依然十分稳健,说明该指标中含有其他预测因子中所不具备的额外预测信息。^[62]

刘兆伦、张春兰等以蓖冷机关键参数蓖下压力为研究对象,提出一种蓖压变化趋势预测模型。利用主成分分析对数据降维,以主元序列作为观测序列,构建改进的多种群算法优化隐马尔可夫模型参数。种群内利用轮盘赌算子选择个体,设计双区与均匀行交叉结合的自适应交叉算子避免局部收敛,进行动态变异率的多项式变异操作提高收敛速度,种群间提出混合师生交流机制的自适应移民算子保证多种群协同进化。仿真表明本文算法可收敛到全局最优,能提高收敛精度和速度,利用该算法建立的模型跟踪性能好,预测精度高,能满足对蓖压趋势预测的要求。^[63]

(七) 复杂性与复杂系统

尹宁、代扬扬等将磁刺激技术、脑电图与传统穴位理论相结合,研究穴位刺激引发的大脑皮层功能网络协同调控过程。利用组独立成分分析、标准低分辨率脑电磁断层成像,对 14 名健康被试静息态、磁刺激内关穴的脑电信号进行反演,确定脑网络节点。通过短时傅里叶变换和互相关方法计算。频段功率谱间的互相关系数,基于 t 检验、错误发现率,校正 (FDR) 构建脑网络连接边 ($P < 0.05$ FDR 校正),并对脑皮层功能连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磁刺激时与运动相关脑区节点的功能连接减少 22.9%,与情绪、记忆相关脑区节点的功能连接增多 93.8%,位于额叶和颞叶节点的功能连接增多 21.2%。磁刺激内关穴引起的脑皮层功能网络拓扑结构变化与穴位自身功能相吻合,为揭示穴位调控机理提供新线索。^[64]

尹荣荣、尹学良等针对无标度网络的节点重要度评估问题,通过分析节点的邻居数量与其部居间的拓扑结构,得到节点的结构洞重要性指标,再融合相部节点的 K 核重要性指标值来确定相部节点间的重要度贡献,以此表征相部节点的局部信息;在此基础上,再结合表征节点位置信息的节点自身的 K 核重要性,从而提出一种基于节点间重要度贡献关系来评估无标度网络的节点重要度的方法。该方法综合考虑了节点的结构洞特征和 K 核中心性特征来确定节点的重要度,同时兼顾到了网络的局部和全局重要性。理论分析表明,此方法的时间复杂度仅为 $O(n^2)$ 。与其他几种算法仿真对比的结果表明,该方法可行有效,拥有理想计算能力,适用无标度网络。^[65]

王倩、胡松旺等研究发现软件缺陷具有继承性和传递性,根据软件动态执行的结构及节点间的关联关系,挖掘软件执行过程的关键点,对于软件缺陷的预防和排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一种有向复杂网络结构熵的软件动态执行关键节点挖掘算法,首先,基于复杂网络思想将软件动态行为映射为有向复杂网络模型,进而引入结构熵的概念,根据节点的全局出度和入度,提出面向缺陷结构脆弱性和结构传播性的向下结构熵和向上结构熵的计算方法,并分别计算全局向下结构熵和向上结构熵的平均值,将满足平均结构熵的关键节点排名。最后,在开源软件数据集 Cflow 和 Tar 的最新版本上进行实验,与其他中 V 性算法对比并在 SIR 模型进行验证,在单个节点排名和前 10 名节点的关键性挖掘上证明了算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66]

袁媛、张东生等研究发现复杂产品系统(CPS)是我国重要的高端装备系统,在如今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有效地提升 CPS 的竞争优势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价值链与价值网络有深远的理论联系,在价值网络视阈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CPS 的竞争优势有其特定的形成机理。CPS 特性是形成 CPS 企业特有价值网络的主要原因,不同企业 CPS 有其各自独有的价值网络核心环节,进而形成超越同行业对手的竞争优势。此外,企业 CPS 的价值网络具有动态性,其价值网络核心环节的强度和竞争优势会随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67]

曾珍香、林雨琛为探究供应链环境协同治理问题,本文从复杂适应系统视角分析了供应链环境协同治理中内部主体之间以及内外部主体间的协同作用机理,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供应链环境协同治理模型。为探究协同治理机制在该模型中的实际成效,本文运用多主体仿真技术,对二级供应链模型进行仿真模拟,验证了协同治理在企业运营发展以及供应链整体环境绩效方面的提升作用,并针对协同模型中制造商零售商间减排成本分担系数进行调整,检验上下游企业间减排成本分担系数变化对供应链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仿真结果显示,虽然供应链整体利润随着制造商承担的减排成本增加而增加,但供应链单位产值排放量却随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验证了协同治理的效果。^[68]

曾珍香、张云飞在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视角下,对供应链社会责任(SCSR)协同治理问题进行系统分析,重点探索 SCSR 协同治理的驱动因素、执行系统及其动态响应性过程,进而建立相应的治理机制,为 SCSR 的协同模式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69]

高荣等在不确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不确定股票模型,用于描述不确定信息下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研究了在金融市场不确定的情况下,股票买卖权的美国障碍期权定价公式。然后,介绍了四种新类型的概念,分别是美国看涨期权(既包括上涨期权也包括下跌期权)和美国看跌期权(既包括下跌期权也包括上涨期权)。并给出了相应四种期权的定价公式。同时,给出了一些实例。^[70]

黄春萍、赵林等认为品牌联合是新创企业克服其成长劣势的有效策略之一。为提高新创企业选择品牌联合伙伴的成功率,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了新创企业品牌联合企业主体行为活动的基本模型和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模型;研究了外部竞争环境、合伙企业的企业类型、品牌资产、关系承诺和联合匹配性等特征对联合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外部环境动态变化时,越来越多的新创企业会选择品牌联合策略,而其选择成熟企业还是新创企业作为联合伙伴,并不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品牌联合系统中,作为核心的新创企业选择合伙企业时,其自身特征并不影响其是否采取联合策略;不管核

心企业自身特征如何,均优先选择成熟企业作为联合伙伴;同时,合伙企业的关系承诺对联合伙伴选择的影响最显著,品牌资产次之,而联合匹配性影响不显著。候选企业在回应核心企业的联合请求时,其接受/拒绝联合的决策主要取决于核心企业对其评价的结果,其次是核心企业的品牌资产。研究结果对新创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71]

李冰指出贫困主体具有多样化,致贫原因具有多因性,贫困程度具有多层次性的差异。可行能力是人们获得各种资源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可行能力不足是贫困群体致贫的主要因素;内生动力是贫困主体摆脱贫困的思想条件,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脱贫攻坚的力量源泉。贫困治理必须关注个体因素的差异,要给予不同贫困群体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差别对待必然涉及到公平正义问题,治理贫困有技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伦理问题,不能获得伦理支持,技术就会陷入具体情况复杂性带来的公正拷问。伦理支持是一种分析思路,同样也是一种治理路径,农村贫困治理要以公平公正的伦理关怀精神,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采取扶贫措施。^[72]

郭军华、江帆发现在研究复杂网络的特性中社区起着重要的作用。蚁群算法由于其分布式的正反馈并行机制和较强的鲁棒性和稳定性,在社区发现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但研究发现,蚁群优化算法在求解群体问题时存在精度低、收敛速度慢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标签传播 BLP_ACO 的蚁群优化算法。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向量表达式,其中每个节点都位于该节点所属的社区的标签上。在求解过程的构建阶段,提出了一种基于节点内聚的蚂蚁转移策略,以减少蚂蚁转移过程中的随机性,提高算法的精度。为了使算法快速收敛,在蚁群搜索过程中引入了标签传播的思想。优化阶段采用基于模块化优化的组合算法,进一步提高了算法的精度。信息素在更新时保留在群落的所有边缘。实践证明,该算法能够准确有效地挖掘出真实网络和 LFR 基准网络上的社区结构。^[73]

梁林、赵玉帛等基于人口流视角,利用腾讯位置大数据,运用 GIS 和复杂网络分析等方法,构建京津冀城市网络测度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对比分析雄安新区成立前后京津冀城市网

络的复杂特征。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网络中城市地位变化呈现上升、下降、持平三种趋势,网络整体在雄安新区成立前后呈现无标度和层级化特点,表明城市网络联系呈现非均衡性和异质性。从城市网络结构来看,平均联系强度和网络密度正向指标均呈现高水平状态下的下降趋势,而平均聚类系数持续降低;从网络空间分布来看,城市网络呈现“北疏南密”分布态势和“一大三小”多中心空间格局,网络重心有南移趋势。总体来看,雄安新区成立后,京津冀城市网络日趋成熟,向多中心均衡化演进。^[74]

(八) 知识与创新理论与方法

段铸、程颖慧指出雄安新区于 2017 年 4 月 1 日正式设立,设立雄安新区是我国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家战略选择。雄安新区的战略部署决定了新区财税政策改革的要求,科学的财税支持政策会有力地推进与新区疏解、优化及创新相关事项的顺利发展。要创新完善财税对策举措,推动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75]

张学文、田华阐述了使命驱动型创新政策的内涵和基本逻辑,构建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的使命驱动型创新政策体系的基本架构。研究强调:使命驱动型创新政策打破了市场失灵理论的局限性,强调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型,主动投资、干预创新的全过程;做好国家创新战略方向的引领;主动决策和承担创新的重大风险;创造新的市场或机会等。构建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使命与战略、普适性政策、专项政策和产业政策四大层次。^[76]

王俊岭、张国华等研究指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良好协调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如何研究两者的耦合机制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我国 40 家主要钢铁企业 2011—2018 年的面板数据,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子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耦合效果最重要的子系统为产出一产销、投入—盈利、产出一盈利,其主要影响因子分别是专利申请数量和产品销售率、经营成本利润率、专利申请数量。另外,建立灰色预测模型,对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结果表明 2011—2018 年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耦合度预测值与实际值非常接近,

2018—2023 年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耦合协调度将突破新高度。在理想状态下,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将长期处于优质协调的状态。^[77]

张学文、陈劲指出使命驱动型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下的一种创新理论的重大转向,是应对社会“大挑战”问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创新范式。本文对使命驱动型创新的源起、理论依据、政策逻辑与基本标准等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使命驱动型创新超越了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强调创新不仅要有速度,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战略方向;创新不是简单修复现有的市场失灵,而是要创造新的市场;政府要主动参与和主导整个创新过程;政府应该具有创造市场的“企业家职能”,特别是基于国家重大战略和公共利益的创新;政府应主动承担重大创新带来的风险。^[78]

王鹏、朱苏加指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利用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对河北省各设区市 2013—2016 年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剖析了各设区市在创新综合能力、创新基础、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等指标上的优/劣势。通过对创新能力现状和提升速度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认为石家庄是河北省创新能力提升的领军区域,保定、唐山、沧州、廊坊、邯郸是河北省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区域,邢台、衡水创新能力具有较强提升潜力。^[79]

白仲航、刘雅男等通过引入 TRIZ 物质—场方法,解决人机交互过程中与用户注意力相关的感官交互问题。提出面向注意力的感官交互物质—场产品创新方法与流程,并将标准解内容转述为适用于解决感官交互问题的感官交互标准解。以送餐驾驶系统改进设计为例,通过对用户注意力分析,得出驾驶系统中的感官交互问题,使用感官交互物质—场模型分析问题,参考感官交互标准解获得多种求解方案,最后根据平静技术对方案进行评价并得出最佳方案。研究结果表明:将物质—场方法应用于感官交互问题的研究中,有助于面向注意力的感官交互问题向 TRIZ 一般问题转化和解决。^[80]

杨宜、程京京以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债务违约纠纷为事件冲击,在倾向值匹配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银行介入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发现企业创新水平呈显著性

下降且持续时间长。对于债权人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状况能反映企业代理成本。检验发现,金融资产配置水平越高的企业,银行介入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越大。进一步检验发现,在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银行介入对企业创新,尤其是低金融资产配置企业的创新的抑制作用相对更弱。文章对理解银行介入企业的经济后果以及提高银行预测企业债务违约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理解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经验证据。^[81]

邢丽云、俞会新等利用多元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内、外部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建筑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环保压力、竞争者环保实践、绿色动态能力均正向影响企业绿色产品及工艺创新;业主环保意识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高管环保认知单独影响作用并不显著,但与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效果明显。基于此,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提出具体解决对策与建议。^[82]

俞会新、邢丽云基于网络嵌入理论、创新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构建了网络嵌入、绿色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基于 216 家制造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网络嵌入和绿色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网络嵌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绿色创新中介影响网络嵌入与企业竞争优势间关系。因此,企业应努力通过各种形式提升外部网络嵌入水平,在积极主动开展绿色创新实践过程中增强自身竞争优势。^[83]

邢会、王飞等研究指出政府在企业创新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政策运行环境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无序性的加剧,使得政府政策支持对企业创新“是否必要、有何必要和多大必要”存在着争议,因此有必要对政策支持与企业创新关系进行回顾、评论和展望。首先,在相关理论分析基础上对政府政策支持和企业创新概念进行阐述;其次,重点梳理单一政策和不同政策协同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进一步分析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间接效应;最后,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在完善和丰富现有研究的同时,为政府制定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的各类政策提供依据。^[84]

蒋石梅等指出激烈的商业竞争促使创新活动由机械性向生态性、有机性转变。创新生态系统由多边组织组成,是一种有利于价值共创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但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新兴经济体领导人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深入研究还不够。研究旨在探讨创新生态系统是如何构建和协调的核心企业为基础的观点。采用探索性的海尔集团个案研究。通过对多层单元的分析,我们提取和描绘了海尔的创新生态系统及其生态龛位。我们强调以技术和资源互补为基础、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同时整合战略、文化、制度和市场等非技术问题。在生态系统协调方面,要保证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适宜性。^[85]

孟玉、高漩雨指出区域创新日渐成为经济学和现代区域科学领域的关注重点,运用因子分析与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测算河北省各县市创新效率,采用ESDA方法和克里金法探索创新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河北省创新效率有效区少、无效区多;各功能区调整幅度和侧重不同,环京津区、沿海区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较好,冀中南区规模效率最佳,而冀西北区需做出全方位调整;创新效率存在集聚效应,热点区位于区域中部,冷点区位于西北部;河北省创新发展整体呈现多中心结构和核心边缘结构,区位因素影响明显;环京津地区存在明显的中介效应。^[86]

杨培、曹国忠等发现并解决现有快递电动车使用时的的问题,提出创新设计方案。将多种设计方法结合,得到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首先,在iNPD理解机会阶段,引入TRIZ理论中基于专利分析的技术成熟度预测模块,运用智慧芽软件进行专利检索与分析,判定产品的生命周期,确定产品的创新方向。其次,概念化机会阶段,引入冲突矩阵分析法和40个发明原理进行产品创新设计。最后,对方案进行价值属性分析评价。设计出改良版的快递电动车。优化后的快递电动车车厢分为左右两侧,内部采用可灵活移动的隔板装置,解决了之前车厢空间利用率低等问题。TRIZ理论可以很好地解决设计中的具体问题;iNPD可以获取以用户为中心的准确需求,完善TRIZ理论中该部分的不足。^[87]

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题研究

(一) 运筹与运营管理

康凯等研究的重点是演进型低碳供应链企业行为以及与政府低碳政策和新兴低碳市场相关的战略问题。建立了由零售商和制造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摘要采用Stackelberg博弈方法求解四种零售商和制造商的低碳策略组合,然后利用进化理论博弈方法对这些策略进行进一步分析,并由此确定进化稳定策略(ESS)。ESS指出:(1)在低碳技术发展阶段,只有一个参与者(制造商或零售商)应采取低碳行为;(2)在低碳先进技术阶段,只有零售商才应该采取低碳行为。这些积极的成果实现了符合政府低碳要求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帕累托改进,满足了低碳消费者的需求,改善了供应链的经济和环境绩效。最后,从政府的低碳政策变化的影响,消费者敏感度和零售商碳融资利息/ESS补贴率进行了分析,从中发现:(1)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减少碳排放控制碳的价格,而不是征收碳帽;(2)企业需要关注消费者的敏感性,因为这些敏感性的增加将减少企业长期经营的碳排放;(3)零售商可以通过降低碳融资利率来稳定量产供应链系统。^[88]

宋晓刚、张敏等在分析地下综合管廊智能互联运营监控系统的需求,构建智能互联监控系统架构,包括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安全监控系统、通信系统和智慧管廊综合监控平台四个子系统,为综合管廊智能化管理提供参考。^[89]

张宏娟介绍了管理会计报告运用于医院的必要性,医院精细化管理需求促进医院建立管理会计工作,医院管理会计报告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管理者的需求。结合公立医院科室日常运营实际情况,从资源配置、运营效率、运营效益、资源利用和医改监督五个维度搭建科室层面管理会计分析报告的参考框架,并提出在财务部门设置财务助理,相关科室设置管理会计报告岗位,借助信息化系统融合财务与业务信息编制报告,保证分析报告信息及时准确,切实为科室决策提供服务。^[90]

张兰云、顾晓青针对原有装船顺序整数规划求解算法所求得的最优解精度较低的问题,设计遗传算法的装船顺序整数规划求解算法。根据遗

传算法演变规则设定整体算法求解流程；依照流程中的硬约束条件要求采用船舶重心与装船翻箱率结合的形式，设计装船规则；根据装船规则内容，采用箱率与船舶重心目标函数组成整数规划模型并进行求解。至此，遗传算的装船顺序问题整数规划求解算法完成。构建对比试验，与原有算法相比，此算法最优适度曲线与准确计算结果相近。原有方法与计算结果误差较大。因而，此算法求解精度更高，此算法更有效。^[91]

杨沐明、黄亚魁等指出多商品设施选址问题是众多设施选址问题中一类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中，顾客的需求可能包含不止一种商品对于大规模问题，成熟的商业求解器往往不能在满意的时间内找到高质量的可行解。研究了无容量限制的单货源多商品设施选址问题的一般形式，并给出了应用于此类问题的两个启发式方法。这两个方法基于原选址问题的线性规划松弛问题的最优解，分别通过求解紧问题和邻域搜索的方式给出了原问题的一个可行上界。理论分析指出所提方法可以实施于任意可行问题的实例。数值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可以显著地提高求解器求解此类设施选址问题的求解效率。^[92]

雷兆明、赵凡等认为作为整个钢铁企业生产过程的准备阶段，车辆入库环节关系着下游生产线的资源配置和库存的运转效率。传统的调度策略没有从车辆入库顺序和时间角度对库存调度的物流成本和效率进行分析，导致调度效率低，成本高，而选择合适的车辆入厂入库顺序和时间并考虑多车共同作业可以有效的提高库存效率且节省成本。为此首先建立了最小化货车出厂时间和传送带最小运转成本的整数规划模型，然后提出了改进萤火虫优化算法对复杂模型进行求解，通过自适应策略改进算法使其增强个体搜索能力，同时在萤火虫移动的过程中引入了 Levy 变异，避免算法陷入局部最优而无法寻到最优解，最后由测试函数和仿真实例进行测试。结果表明，改进算法可以迅速找出最优调度方案，从而指导企业合理安排资源入库，优化了物流库存管理。^[93]

赵璐阳、王丽娟等为降低日常非拥挤状态下城际间综合运输系统的客运总成本，对运输通道内多种交通方式的列车开行方案或车辆运行作业计划进行了协同优化。以广义运输成本最小为目标函数，以成本和客流为约束条件，将协同优化

归纳为最小费用最大流问题。为提高计算效率，根据图论中最小费用最大流常用算法之一的最小费用路算法设计出协同优化改进算法。以示例路网为基础，构建协同优化合适算例进行改进算法应用。结果表明，协同优化可以有效降低非拥挤状态下综合运输系统客运总成本，其改进算法表现出良好的有效性和准确性。^[94]

张苏英等将动态逃生指示系统主要应用于大型综合建筑物内，此系统可根据建筑物内发生的火灾等突发情况动态指示人员疏散逃生，缩短逃生时间提高逃生成功率。通过研究现有动态逃生指示系统路径规划问题，提出一种改进蚁群算法，将 Dijkstra 算法和蚁群算法相结合，利用 Dijkstra 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调整了蚁群算法启发函数中初始信息素分布情况，同时结合探测到的火灾实时信息对蚁群算法的启发函数，转移概率，信息素挥发系数和更新规则进行改进。通过仿真实验表明改进的蚁群算法提高了搜索效率和全局搜索能力，降低了陷入局部最优的可能性并优化了逃生路线。^[95]

申婵、崔洪军指出为实时优化定制公交线路，提出一种基于可靠性最短路的线路优化方法，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中，可以高效的将乘客送达目的地。对可靠性最短路进行问题描述，建立可靠性时空网络；给出求解可靠性最短路的算法步骤，构建乘客和定制公交运营商总成本最小的目标函数，采用禁忌搜索算法对问题进行求解；最后，以某市定制公交路网进行实例分析。结果表明：与最短路线路方案比较，所提方法更接近于实际运营；在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的情况下，所提方法可以提高车辆的可靠性，提升定制公交线路的服务水平。^[96]

马艳芳等提出了一种模糊逻辑控制器与模糊随机模拟相结合的混合优先级嵌套遗传算法。为了满足实际逆向物流中包含的所有复杂限制，开发了一个新的数学模型，用于同时处理具有时间窗口和多个决策者（SPDTW-MDM）的取货和交付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优先级的初始化方法，使初始化更具有可适用性；采用嵌套过程结构处理多个决策者；采用模糊逻辑控制器调节突变率；采用模糊随机模拟方法处理不确定性。最后，在案例研究中，使用田口方法调整遗传算法参数，并给出结果分析，以突出 SP-

DTW-MDM 优化方法的性能, 而通过不同规模的实例应用程序进行的算法比较显示了它的效率和有效性。^[97]

魏庆朝、潘姿华等指出中低速磁浮交通具有系统技术原理复杂、高架区间事故概率高、乘客疏散和列车救援难度大等特点。依据列车运行安全状态将运营事故分为列车火灾(爆炸)、列车冲突(碰撞)、列车运缓(途停)及其他事故类别。基于事故树分析原理, 建立列车火灾(爆炸)、列车冲突(碰撞)及列车运缓(途停)等三类事故树, 并进行最小割集、最小径集和基本事件结构重要度求解。结合集合思想, 依据基本事件的致灾特性构建致灾集合, 并根据致灾集合重要度进行排序, 进而对中低速磁浮交通运营工作中的防范措施提出改进建议。^[98]

贾雨龙、米增强等指出随着以电动汽车、温控负荷和分布式储能为代表的柔性负荷在新一代智能电网接入的比例不断增加, 柔性负荷聚合商将作为投标主体参与到目前电力市场的投标竞价中。该文提出计及不确定性的柔性负荷聚合商参与日前市场的随机—鲁棒联合投标决策模型, 以柔性负荷聚合商投标支出最小化为目标, 采用随机场景模拟电价的不确定性, 利用可调鲁棒控制系数处理电动汽车充电行为及温控负荷中外界温度变化的随机性, 使用响应意愿系数模拟柔性负荷的响应不确定性。通过对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的求解, 验证所提模型的有效性, 并得出不同时段在柔性负荷聚合商购买和售出能量的投标策略, 为其参与电力市场投标竞价提供决策依据。^[99]

(二) 工业工程与管理

康凯、赵宇杰等针对单制造商与单零售商构成的二级供应链, 构建了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嵌入延期付款策略的供应链订货经济批量模型。界定了制造商允许零售商延期付款并提供免息账期的三种延期付款策略。探讨了不同延期付款策略对经济订货批量、供应链碳排放及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 零售商经济订货批量随延期付款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通过优化运输计划, 延期付款策略可降低供应链碳排放, 有助于改善供应链环境绩效; 延期付款策略可降低供应链总成本, 但造成了零售商和制造商成本负担不平衡; 制造商可以通过增加二部收费契约下的固定费用进一步降

低供应链总成本, 且可以协调供应链成本负担不平衡; 在二部收费契约下, 延期付款可作为一种有效的碳减排策略, 既实现对供应链经济绩效的提高又实现对供应链环境绩效的改善。^[100]

康凯、高思颖在由单个供应商和单个零售商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系统中, 考虑供应商和零售商双方风险态度, 建立银行融资和延期付款两种融资策略下的供应商——零售商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 得到零售商资金约束时供应链决策者的最优定价策略, 分析供应链决策者风险态度对融资与定价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 零售商存在资金约束时, 供应商应优先选择延期付款策略; 供应商和零售商的风险态度和融资利率对零售商融资策略的选择具有影响作用; 融资利率较低时, 供应链系统选择银行融资策略比延期付款策略更有利。^[101]

王玖河、韩希卓等将园区划分为包括出入口在内的 11 个功能区, 采用改进的 SLP 法, 对影响布局的各类因素定量化分析, 并且通过分析各功能区之间的物流与非物流关系, 确定其密切程度后建立铁路物流园区布局规划模型。该模型以功能区之间总搬运费用最低和综合关系最大为目标函数, 设置最小间距约束、边界约束、出入口约束、铁路约束以及长宽约束的约束条件, 设计粒子群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相结合的 SAPSO 法对该模型进行求解, 并通过算例验证该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102]

刘力卓、赵义格等为了提高远程监控操作员的工作舒适度, 以 DK 公司远程监控中心操作台为研究对象, 以工效学为理论依据, 利用 Jack 软件, 进行数字人模型的建立, 对远程监控操作台建模仿真。对数字人工作时的舒适度和疲劳度进行检验, 发现其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改善方法。结果表明, 通过对座椅的构造优化与尺寸调节、对数字人安装脚垫板等方式, 可以显著提高数字人的舒适度。^[103]

付士峰、戎贤为了解决浅层掏土法在 CFG 桩复合地基中的应用问题, 首先基于浅层掏土法的基本原理, 应用弹塑性力学理论对掏土后 CFG 桩复合地基的复合模量以及沉降理论进行分析和参数确定。然后以一实际 CFG 桩复合地基高层建筑纠偏工程实例为背景, 应用有限元数值分析软件对阻沉加固、纠倾(掏土、堆载)等阶段

进行全过程模拟分析,验证提出理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通过理论计算值与数值模拟结果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纠偏建筑物四个角计算值与模拟值最大差值为 10.1 毫米,误差为 12.4%,最小差值为 2 毫米,说明提出的计算方法能够解决复合地基浅层掏土纠偏设计问题。^[104]

刘一健、岳小云研究表明,供需扰动在农产品供应链中普遍存在,易导致生产过剩或缺货风险,文章旨在探讨不同供需下供应链的最优决策。供应商采用双渠道销售某单一农产品,并在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利用均值一方差法描述其风险态度。分别在一体化和独立决策模式下考虑供需关系,针对四种不同情形进行分析,并利用数值算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供应商随着风险规避程度的上升,其两个渠道价格反向调整,使得需求量扩大,其最优供应量提高。市场最优的供应量有一定的鲁棒性,当供需偏差较大时,市场的最优供应量才会发生变动。并进一步分析渠道所占市场份额对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105]

潘卓、郑杨认为当前我国智慧物流发展十分迅速,物流供应链管理与规划能力日益提升。区块链与智慧物流都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二者有相通之处,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要求与无物流垄断企业现状相符,区块链技术的高效特点与智慧物流发展对高效物流的内生需求相符,区块链技术的特性与智慧物流的安全要求相符,具有很好的运用前景。应重点在区块链技术与智慧物流的交易主体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与智慧物流的交易机制高效化、区块链技术与智慧物流的交易过程安全化三个方面下功夫,实现区块链与智慧物流的有机结合。^[106]

陈松奕和崔艺瑄认为,“互联网+”背景下,物流企业的创新越来越关注数据本身,数据驱动创新成为我国物流企业实现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模式。新零售背景下,消费者对物流的及时性和服务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在分析新零售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数据驱动分析了我国物流企业创新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并从物流企业自身板块数据融合、创建共享数据库及创新数据价值服务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我国物流企业数据驱动创新的方法,并提出了相关建议。^[107]

张敬、李风华等源自中国现实与西方理论相背离的问题思考,试图将中国特殊情境纳入到供

应链模式选择分析框架,构建中国本土理论模型。首先,界定了供应链治理模式的内涵;其次,从交易成本理论、新制度理论与嵌入性理论等视角梳理了供应链治理模式选择研究的理论脉络;最后,基于多元制度逻辑理论构建了供应链治理模式选择理论模型,并指明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不仅丰富了供应链治理研究的成果,而且为中国情境下供应链企业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08]

(三) 工程与项目管理

陈立文、聂增民运用系统学方法和复杂系统理论,结合技术整合实践,科学表征施工项目管理系统,分析和构建施工项目技术整合的“丛网模型”结构及施工项目技术整合“三维结构体系”;进行施工项目技术整合机理研究、效应分析和对策探讨。在对策方面,一是重视跨学科、跨部门项目“干系人”协调和参与,二是联合社会科研机构与高校科研人员投入或咨询服务,三是强化项目现场运作协调与执行系统有效控制。认为推进施工项目技术整合机制的现代化,不断推进项目管理团队思维范式、模式创新,有助于提升项目管理团队现代化管理能力,实现项目管理增值与成功。^[109]

李慧英、王育红认为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为社会资本方提供融资并增加退出渠道,提升项目落地率,是未来政策重点鼓励的方向。其健康发展的核心是做好风险隔离,实际操作中,囿于将来债权转让、专项计划设立、基础资产真实出售在法律制度层面的诸多矛盾与障碍,无法切实达到风险隔离效果。为了保障社会资本获取确信的权益,针对如上三项制度中的法律困境,分别从多角度提出制度性的优化建议,以期为推动我国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做出有益探索。^[110]

李素英、田崖等认为,目前我国铁路建设正处于跨越式发展时期,工程规模扩大,技术要求提高,工程标准愈发严格,铁路工程项目面临着更多不确定因素。如何有效防范铁路工程项目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已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为探究影响铁路工程项目风险的关键因素,基于铁路工程项目的前期设计、中期施工、后期管理 3 个阶段,选取 12 个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明确各因素的指标权重,之后构建基于模糊综合评判

法的风险评估模型,并以石济高速铁路为例评估铁路工程项目风险水平。研究结论:(1)从权重来看,前期设计对于铁路工程风险影响因素模式的运行影响最大,其次是后期管理,再次是中期施工;(2)从评估结果来看,多数专家认为石济铁路建设面临较高风险,而前期的设计和后期的管理是整个项目所有风险因素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需要对这些风险因素进行重点防范;(3)本研究成果可为其他铁路工程项目的风险评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益探索。^[111]

孙汉康发现,为了解决 PPP 项目融资难的问题,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相继出台文件鼓励开展 PPP 项目的资产证券化,理论界也开始对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进行探索,但其发展历程却非一帆风顺。目前我国存在三种实现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的方式:信贷资产证券化、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票据。但在实施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还存在六大主要问题。因此,通过借鉴印度近十几年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经验,就如何在我国开展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给出相关建议。^[112]

任嵘嵘、阎明凤等将模糊多准则群决策方法应用于可持续项目的选择决策中。首先构建可持续项目选择框架,包括投资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及战略联盟、组织准备和投资风险六个评价准则。由于该框架的准则权重很难通过一组决策者不一致的偏好而确定,所以,运用乘法偏好关系和模糊偏好关系收集决策者对准则权重的偏好,利用目标规划方法进行建模并确定各个准则的相对权重;然后用模糊 TOPSIS 方法评估投资机会的适合程度。TOPSIS 方法是基于偏好比率的一种决策方法,其中偏好比率运用于模糊数排序和模糊距离测量,可以有效地计算出每个备选方案与理想方案的模糊距离,从而根据距离判断其亲密系数,并最终应用于最佳方案的抉择。最后,以某投资集团的可持续投资项目选择问题为例进行分析,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113]

孙建诚、蒋浩鹏等首先通过分析 BIM 数据交换标准的类型,针对公路工程设计、施工和运维阶段改进及优化了 BIM 的技术路线。其次通过结合我国某二级公路工程项目,对比了 Civil3D 与 Powercivil 软件在前期设计阶段中的过

程及应用,为 BIM 技术在我国公路设计中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路线和设计理念。^[114]

王荣、叶莉等以 2008—2016 年中国 28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基于倾向性得分匹配的差异性 (PSM-DID) 方法计算了高铁对房价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区域层面上,高铁显著促进了高铁沿线城市房价的上涨。高铁对房价有正向影响,高铁影响系数为 0.1511,通过 1% 显著性检验。从次区域和次城市规模结合的角度看,高铁主要对“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特别是中西部中小城市的房价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高铁可以缩小中西部地区“中小型高铁城市”与东部地区大型高铁城市之间的房价差距。最后,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对沿线城市房价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起到中介作用。^[115]

(四) 金融工程

李媛媛、郭宁宁以我国 2008—2017 年的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产权异质性和金融生态环境双重视角分析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制造业企业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存在基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双重门槛效应,呈现一种“斜 S 形”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存在基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双门槛效应,但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受金融生态环境影响的程度更明显。^[116]

刘兢轶、王彧婧等首先分析了影响供应链金融模式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的因素,进而通过因子分析和 Logit 模型建立了供应链金融模式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验证了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及核心企业的信用水平显著影响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级。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预测准确度较高,对金融机构衡量供应链金融模式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及中小企业提升自身信用水平具有一定意义。^[117]

叶莉、芮萍认为货币政策作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产生流动性传导,这直接关系到银行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基于我国 101 家商业银行 2009—2016 年同业市场微观数据,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的广义矩估计 (GMM) 方法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市场资金流入和流出的不同作用,反映货币政策对我国银行流动性传导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紧缩性货币政策使我国银行总体流动性呈恶性传导，相反，稳健宽松性货币政策使我国银行总体流动性呈良性传导，具体表现为对银行资金流入的正向影响大于资金流出。从银行异质性上看，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传导的影响依赖于银行资产规模的大小和自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多寡。研究结论为货币政策逆周期监管、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以及高效运用已有货币政策工具维护银行系统的稳定提供经验支持。^[118]

郭净、陈永昶发现，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其圈层发展模式逐渐取代点式发展模式而成为新趋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两大国家战略之下，构建雄安新区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京津雄国际金融中心圈是推动战略落实的重要举措。在回顾国际金融中心圈层发展相关理论及展现纽约、伦敦和香港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圈演进现实的基础上，分析构建雄安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意义，并从顶层设计、金融机构、基础设施、法律监管、人文环境等方面提出实现路径。^[119]

王树强、庞晶认为健全的绿色金融体系不仅可以提升金融系统的环境风险管理水平，而且可以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绿色金融体系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并且在构建思想和发展模式上差异明显：在指导思想上，国外采用“自下而上”的市场推动，我国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在项目全程审查方式上，国外侧重事中审查，我国侧重事前审批为主、事中审查为辅；在项目筛选标准上，国外采用排放标准，我国采用行业标准；在项目监控主体上，国外采取第三方监管模式，我国采用政府监管模式。我国需要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以“强化市场引导、改进融资项目遴选模式、明确监管责任、完善激励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健全绿色金融体制。^[120]

叶莉、樊锦霞等通过建立三元 VAR (6) - GARCH (1, 1) -BEEK 模型从均值和方差层面刻画了我国金融系统不同维度流动性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市场流动性、融资流动性与货币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均值溢出效应；融资流动性对市场流动性具有单项均值溢出效应，对货币流动性则具有单项波动溢出效应；货币流动性、

融资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波动非对称溢出，且市场流动性的波动溢出效应较强。综上，本文认为监管者应加强不同维度流动性间的传导转换效率，同时密切监控金融市场资金状况，防止金融市场流动性出现大幅波动，并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兼顾各维度流动性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121]

赵萌、叶莉运用 46 个国家 1985—2016 年的年度数据，首先利用系统 GMM 模型估计金融衰退对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的影响，发现金融衰退会降低政府执行逆周期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能力。随之采用面板门槛回归分析不同金融波动程度下财政政策逆周期政策效果，发现金融波动对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具有显著非线性影响：金融波动越剧烈，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越差。因此，财政政策在金融周期繁荣期应更加审慎，而在衰退期应更加积极；应充分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财政监督体系应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框架更好协调。^[122]

李媛媛、崔宸琛等基于 2010—2017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样本数据，运用面板 VAR 方法，探讨了金融生态环境、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生态环境与制造业的企业创新效率之间为双向促进作用，且均具有长期促进作用；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有抑制作用。基于制造业所有制性质进一步研究发现：（1）金融生态环境对国企、非国企的企业创新效率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均为长期促进；（2）国企和非国企的企业创新效率均可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且均为长期促进；（3）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抑制了国企和非国企的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其中对国企的抑制作用大于非国企；（4）国企的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非国企中不存在这一关系。^[123]

叶莉、王远哲等基于尾部风险溢出思想，采用 2007—2017 年的周收益率数据，运用 CoVaR 模型测度银行、证券、保险及房地产四行业 40 家上市公司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并结合系统性风险指数，得出各机构风险吸收与扩散能力排名。运用极大平面过滤图（PMFG）算法对风险溢出网络进行化简，构建仅包含关键路径信息的 ΔCoVaR 有向加权风险溢出网络，并结合网络中

节点关联特征指标,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识别提供了全新视角。总体来看,各行业依风险传递方向不同而对风险的敏感程度各异,网络中关键节点对系统的整体结构影响较强;证券公司内部风险关联较为紧密,房地产机构承受行业间风险多源自银行业,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对其他行业的风险发散能力较强。^[124]

(五) 信息化条件下的管理模式研究

白海宁、李哲认为高校学科发展以及相关人才培养,都受到科研经费管理的影响,如果科研经费整体管理质量较差,将会严重影响高校整体发展。在大数据互联网时代,许多新理念不断涌现,传统行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为了使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模式适应现代发展趋势,高校有必要加强科研经费精准管理。基于此,本文以大数据环境作为研究背景,站在高校科研经费精准管理的角度,对高校科研经费如何实现科学化管理展开了深入研究。^[125]

宋瑞莉在大数据环境下,我国农业经济的信息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我国农业经济领域中信息化的建设和功能还不健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空间。要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需要与时俱进,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因而应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深入探讨,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现代信息化的全面发展。^[126]

郭海玲、马红雨等利用隐私计算理论和沟通隐私管理理论为框架,结合隐私关注,构建社会化媒体用户信息披露意愿影响模型。以微信平台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样本数据,使用 Smart PLS 软件对模型合理性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感知收益、信任、感知信息控制均正向影响信息披露意愿,隐私关注负向影响信息披露意愿;信任负向影响感知风险;感知信息控制负向影响隐私关注;隐私倾向正向影响隐私关注和感知风险。^[127]

刘兵、朱叶珊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爬虫工具爬取雄安新区成立一周年内与人才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识别出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中的区域、组织及个体 3 个层次 12 个治理主体,并测度主体间关系网络的相关指标,研究表明: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过程中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密度较高,联系较密切;其重

要性排序依次是区域—组织—个体;政府的核心作用明显,其他治理主体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协作与发展。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以期对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的优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128]

刘松、石宝军分析京津冀信息化水平差异及成因,为京津冀信息化协同发展提供合理建议。通过构建区域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泰尔系数法、变异系数法对 2011—2016 年京津冀区域信息化指标的空间差异及信息化指数进行定量测评,并与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进行比较,最终提出相关建议。结果表明:(1)京津冀区域信息化各评价指标的泰尔系数值依然较大,但呈现下降趋势,空间差异逐年变小;(2)京津冀信息化指数值差距较大,呈现高、中、低三个梯队,但是三地信息化指数的变异系数逐年减小;(3)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均 GDP 变异系数值呈递增趋势,但其值低于同期信息化变异系数值。^[129]

梁林、赵玉帛等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运用 GIS 和复杂网络分析等方法,构建京津冀区域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网络模型,从网络结构和空间格局两个方面测度京津冀区域城市间人口流动的复杂网络特征。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间人口流动网络符合“小世界”网络特征,具有较高的连通性和运行效率,并且所有城市节点的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目前京津冀人口可以跨越行政界限自由流动,且保持相对平衡,京津冀协同战略发展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效果;(2)京津冀城市间人口流动网络具有明显层次性,呈现“北疏南密”流动分布态势和“一大三小”多中心网络空间格局,并非传统认知上“京津双核心”空间格局。研究结果对于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促进京津冀区域人口、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参考价值。^[130]

(六) 管理心理与组织行为

高记、孙平等认为领导者执行程序公正的影响因素有个人特质、领导—下属关系、领导者的身份特征。可以从领导者的选拔、领导—下属关系的营造以及领导地位权力的配置三个角度推进领导执行程序公正。启示组织通过特质类因素对领导者进行选拔与培训、对下属进行必要的培训,打造一个意义丰富的公正场所,以更好地实

现工作场所的公正对待。^[131]

崔文静、刘兵等认为职场挫折感的影响因素有挫折不容忍性、自我要求和其他个人特质等个人因素,工作角色和工作任务等组织因素,以及个人与环境匹配因素,可能引起攻击、倒退、固执、回避、离开、奋进等作用后果。以后的研究可以围绕职场挫折的“双刃剑”效应、职场挫折感的动态演变过程以及职场挫折感的亲社会性转变等方面开展。^[132]

刘兵、赵雪等通过改进 Lotka-Volterra 模型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与人才配置的协同演化模型,分析两者的演化路径,并以京津冀为例,验证模型的合理性。研究表明,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人才配置正负作用力的推动下,二者将发生协同演化,实现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提升;区域发展阶段不同,二者的演化路径也不尽相同,根据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人才配置协同动力学模型的定态稳定解得出两者 11 种协同演化路径。进而,通过计算得到京津冀创新生态系统与人才配置协同演化满足路径 10 的实现条件,并提出了优化协同关系的战略措施。^[133]

高记、孙平等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利用 312 份企业员工有效问卷数据,探讨了社会阶层对员工组织公正感的影响效果和机制。结果显示:社会阶层与员工的组织公正感呈显著正相关;内归因倾向在社会阶层与组织公正感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相对剥夺感在社会阶层通过内归因倾向影响组织公正感的间接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对于相对剥夺感低的员工,社会阶层通过内归因倾向的认知路径影响其组织公正感。^[134]

许长勇、王瑾慈等表示,实现个体与组织的匹配是组织长久发展与员工成长的重要保障,如何实现个体与组织的匹配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本研究选取信誉楼百货集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并基于意义建构理论,运用扎根编码技术分析了其实现个体与组织匹配的过程。研究发现:(1)个体与组织匹配过程是一个从组织意义给赋到员工意义建构的过程;(2)组织通过意义传递、意义强化以及意义赋能实现对个体的意义给赋过程,而个体意义建构以认知投入、情感投入、行为投入为标志;(3)匹配过程具有持续性和递进性,随着组织发展和个体成长,匹配过程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特征。综上,本

研究从个体与组织两个视角剖析实现匹配的过程,并构建了个体与组织匹配的实现机制模型,能够扩展和深化对个体与组织匹配实现机制的认识,对于企业相应的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135]

杨鹏、高素英等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实证探究创新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创新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具有直接正向效应;心理授权和员工创新行为在创新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企业绩效之间单独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当模型同时引入心理授权和员工创新行为时,二者具有链式中介效应,即存在“创新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心理授权—员工创新行为—企业绩效”的作用传导路径。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针对创新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介环节、内部动机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企业实现以创新促发展提供指导借鉴。^[136]

张明、王竞一认为有效的领导行为是组织管理过程中推动及影响员工积极态度与行为的重要方式,真实型领导通过四个核心特征,即自我意识、关系透明、内化道德、信息平衡加工对下属的职业召唤发生着重要的影响,驱动下属在工作中找寻和发现真实的自我,实现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和目的。^[137]

陈亮、沈文竹等研究发现,随着组织管理的发展,个体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心理授权关系到员工自我效能感提升和内在工作动机激发,在帮助员工自我赋能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从心理授权概念的由来与发展、结构与测量、理论模型、影响因素、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等多个方面系统评介了 30 年来心理授权的研究成果,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138]

李艳双、朱丽娜认为,改革开放 40 年来,民营企业家是重要的时代驱动者之一,他们所发挥出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社会对民营企业的认知偏差、社会舆论压力过大且容错机制不健全、民营企业发展中遭遇“三座大山”阻滞、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与企业家利益保护制度等问题,制约了我国民营企业发挥自身优秀的企业家精神。应围绕解决“三座大山”问题、营造有利于激发企业家

精神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提出具体的策略措施,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民营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139]

张培、杨迎为揭示行动主体参与度、知识共创与服务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基于服务生态系统视角构建了三者关系模型并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行动主体的高参与广度更易促进突破式服务创新,高参与深度更易促进渐进式服务创新;不同类型的知识共创对服务创新绩效具有差异性影响,其对突破式服务创新影响程度更大,内向型知识共创的影响作用更显著;知识共创在行动主体参与度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起差异化中介作用。揭示了多主体参与对服务创新影响的复杂作用机理,为企业开展服务创新提供理论支撑。^[140]

王飞指出领导决策情景对领导公正感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领导决策情景对利益激励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益激励对领导公正感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益激励在领导决策情景对领导公正感满意度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利益激励可以作为领导改善决策情景,消解公正与效率之间矛盾,化解内部冲突,提升改革发展中决策效率的有效抓手。^[141]

(陈立文:河北工业大学教授,
刘广平:河北工业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李素红,赵瑞,尹志军.城市养老地产开发适宜性评价研究——基于改进突变级数法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9(11).
- [2] 张亚林,刘炳茹.公共管理视角下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研究[J].农业经济,2019(11).
- [3] 李佳钰,张贵,李涛.知识能量流动的系统动力学建模与仿真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J].软科学,2019,33(12).
- [4] 徐楠,凌云鹏,程佳璐,王永利.输配电价改革对电网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9(9).
- [5] 王重润,温礼瑶.房价上涨、投资性房地产与企业创新[J].金融与经济,2019(10).
- [6] 刘璞,李晗,周平.电子商务投资与企业绩效——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视角[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40(6).
- [7] 王树强,史婧.空气质量对城市住宅价格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J].价格月刊,2019(10).
- [8] 王红宝,杨建朝,李美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田园综合体核心利益相关者共生机制研究[J].农业经济,2019(10).
- [9] 刘一健,岳小云.不同供需下农产品双渠道供应链的决策[J].系统科学与数学,2019,39(11).
- [10] 张志宇,陈业华,刘一健,岳小云.基于差别定价的政府补贴下再制造闭环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49(21).
- [11] 刘兵,牛楠,李娜.基于演化博弈的MTS冲突管理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9,38(10).
- [12] 代冬芳.中国进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及对策研究[J].价格月刊,2019(10).
- [13] Guo Z. Complexity and implications on channel conflict under the uncertain impacts of online customer reviews. Nonlinear Dynamics. 2019,96(3).
- [14] Kang K., Zhao Y., Zhang J., et al. Evolutionary game theoretic analysis on low-carbon strategy for supply chain enterpris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 230.
- [15] 林鹏,郭子雪,李韬.基于组合赋权——TOPSIS法的区域人力资本质量评价模型及应用[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49(17).
- [16] 曾珍香,张钰琦,王梦雅.供应链社会责任协同治理责任分担机制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9,38(8).
- [17] 张玉梅,王子柱.基于历次调控视角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9(4).
- [18] 张学文,田华,陈劲.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的创新政策:基于使命驱动型创新的视角[J].技术经济,2019,38(7).
- [19] 牛楠,刘兵,李娜.多团队系统内团队间冲突过程金字塔模型——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9,33(11).
- [20] 王法涛.演化视角下电子商务多边平台网络效应及竞争策略选择[J].中国流通经济,2019,33(11).
- [21] 彭国富,张朝辉.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合理性评价与调节路径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9,33(2).
- [22] 张新宁,孟楠,段晓晨,刘娜.基于序关系——BP的铁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研究[J].铁道工程学报,2019,36(9).
- [23] 郭净,魏荟颖,陈永昶.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开放式创新网络形成演化的作用机制——一个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纵向案例研究[J].东岳论丛,2019,40(11).
- [24] 刘兢轶,王彧婧,王静思.供应链金融模式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价体系构建[J].金融发展研究,2019(11).
- [25] Jiang S., Hu Y., Wang, Z. Core Firm Based View on the Mechanism of Constructing an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 A Case Study of Haier Group. Sustainability, 2019, 11(11).
- [26] 李桂荣,温绍涵,王乐娜.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40(5).
- [27] 黄秀莲,李国柱.偏离份额法下我国高耗能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研究[J].生态经济,2019,35(12).

- [28] 杜颖.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能源因素研究——基于 ARDL-ECM 模型的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9(9).
- [29] 杨胜利,王伟荣.产业结构升级、教育与流动人口收入——基于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35(12).
- [30] 徐永利,徐正夫.雄安新区创新经济发展与核心竞争力培育——基于程序员、众创空间和教育特区三个维度[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4(6).
- [31] 孟萍莉,董葆茗.“互联网+”背景下农业产业链中关键链环的析取与升级[J].农业经济,2019(11).
- [32] 袁青川,易定红.京津冀地区省际与省内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分配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2015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经验[J].经济经纬,2019, 36(6).
- [33] 李建英,武亚楠.“互联网+”农业价值链融资的融合模式、运行机制及效果[J].西南金融,2019(10).
- [34] 赵松岭,杨子夜.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量测算及低碳协同发展机制研究[J].生态经济,2019,35(10).
- [35] 刘兵,张荣展,梁林.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协同创新的影响——政府控制的调节作用[J].技术经济,2019, 38(12).
- [36] 赵学礼,王贺如.技术来源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9,39(4).
- [37] 岳娟丽,曾繁华,管鸿禧.我国政府绿色发展基金的投融资模式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9(12).
- [38] 张培,张丽平.制造业服务化制度情境与创新网络:政府参与视角[J].管理现代化,2019,39(6).
- [39] 柳天恩,田学斌.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成效与展望[J].中国流通经济,2019,33(11).
- [40] 任亮,孔伟.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结构、特征及策略[J].河北学刊,2019,39(6).
- [41] 侯小娜,李建民.新时代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演化与策略研究[J].河北学刊,2019,39(6).
- [42] 张磊,李占雷,杨金廷.基于熵权修正 Shapley 值法的共同物流商业模式合作风险分担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49(23).
- [43] 辛兵海,刘雪薇.市场约束、银行风险与批发融资成本[J].金融与经济,2019(9).
- [44] 王朋岗.直系组家庭视角下家庭养老资源供需缺口评价与风险人群识别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9,25(5).
- [45] 全凌云,曹泽阳,安利平,梁强强.P2P 网络借贷平台信用风险识别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10).
- [46] 赵辉,韩志霞.经营不确定性、供应链集中度与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感知[J].财会通讯,2019(21).
- [47] 王树强,耿明阳,庞晶.环境税制下污染行业竞争结构的动态演化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9,38(3).
- [48] 杨欣,曾珍香,张舜,魏津瑜.考虑碳排放与定价的云制造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9,24(1).
- [49] 原亚宁,李琳,赵浩然.基于主从博弈模型的交直流混合微电网源网协调优化运行方法[J].智慧电力,2019,47(3).
- [50] 张玉梅,王昌昊,王倩.信息不对称、金融伦理缺失与民间融资高风险[J].征信,2019,37(4).
- [51] Wei, J., Zhao, J., & Hou, X. (2018). Integration strategies of two supply chains with complementary produ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118.
- [52] 王俊龙,张璞,周正柱.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19(13).
- [53] 徐征,林英明,刘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价差的影响机制分析[J].财会月刊,2019(24).
- [54] 徐勇,苏雪,王金环,时胜男.非对称企业合作创新网络演化博弈[J].系统科学与数学,2019,39(12).
- [55] 李万庆,陈佳琪,孟文清,马利华.基于 BSA-ELM 模型的建筑工程施工成本预测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49(23).
- [56] 王震洲,聂亚宁,于平平.基于神经网络的多城市协同能见度预测研究[J].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2019,33(11).
- [57] 王健.我国苹果市场价格预测与波动预警研究[J].北方园艺,2019(9).
- [58] 颜湘武,徐韵,李若瑾,金永盛,李铁.基于模型预测控制含可再生分布式电源参与调控的配电网多时间尺度无功动态优化[J].电工技术学报,2019,34(10).
- [59] 潘佩佩,杨桂山,王晓萌,王丽艳,王雪然,葛京凤.太湖流域粮食生产对耕地利用变化动态响应分析及预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10).
- [60] 刘云鹏,许自强,董王英,李哲,高树国.基于经验模态分解和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浓度预测方法[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19,39(13).
- [61] 孔强,谢晓彤.基于加权马尔科夫链的灌区年用水量预测模型研究[J].水利水电技术,2019,50(S2).
- [62] 陈坚,张铁凡,洪集民.期权隐含尾部风险及其对股票收益率的预测[J].管理科学学报,2019,22(10).
- [63] 刘兆伦,张春兰,郭长江,王海羽,武允,刘彬.改进的多种群算法优化隐马尔可夫模型预测篦压趋势[J].控制理论与应用,2019,36(8).
- [64] 尹宁,代扬杨,生晖,徐桂芝.基于复杂网络的磁刺激内关穴脑皮层功能连接分析[J].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2019,38(6).
- [65] 尹荣荣,尹学良,崔梦麟,徐英函.基于重要度贡献的无标度网络节点评估方法[J].软件学报,2019,30(6).
- [66] 王倩,胡松旺,郭嘉伟,任家东,赵小林.有向复杂网络结构熵的软件动态执行关键节点挖掘算法[J].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2019,40(4).
- [67] 袁媛,张东生,王璐.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复杂产品系统竞争优势形成机理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9,27(8).
- [68] 曾珍香,林雨琛,张钰琦,张学民,熊立华.基于 CAS 视

- 角的供应链环境协同治理研究[J]. 中国环境管理, 2019, 11(6).
- [69] 曾珍香, 张云飞, 王梦雅. 供应链社会责任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复杂适应系统视角[J]. 管理现代化, 2019, 39(3).
- [70] Gao, R., Li, Z., & Lv, R. (2019). American Barrier Option Pricing Formulas for Stock Model in Uncertain Environment. IEEE Access, 11.
- [71] 黄春萍, 赵林, 刘璞, 都扬扬, 张芙幸. 新创企业品牌联合伙伴选择的计算实验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19, 27(8).
- [72] 李冰. 农村贫困治理: 可行能力、内生动力与伦理支持[J]. 齐鲁学刊, 2019(3).
- [73] Guo J, Jiang Fetal. An ant colony optiminzation algoritjm for discovery basde on tag propagations[J] Computer applications and software 36(6).
- [74] 梁林, 赵玉帛, 武晓洁. 人口流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网络时空特征研究——基于雄安新区成立前后的对比[J]. 经济与管理, 2019, 33(2).
- [75] 段铸, 程颖慧. 以财税政策完善助力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J]. 人民论坛, 2019(34).
- [76] 张学文, 田华, 陈劲. 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的创新政策: 基于使命驱动型创新的视角[J]. 技术经济, 2019, 38(7).
- [77] 王俊岭, 张国华, 郑云建, 徐丹宁. 我国钢铁工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耦合机制研究[J]. 经济问题, 2019(11).
- [78] 张学文, 陈劲. 使命驱动型创新: 源起、依据、政策逻辑与基本标准[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9, 40(10).
- [79] 王鹏, 朱苏加. 河北省各设区市创新能力特征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9, 35(4).
- [80] 白仲航, 刘雅男, 丁满, 孙慧慧. 面向注意力的感官交互物质—场产品创新设计方法[J]. 机械设计, 2019, 36(10).
- [81] 杨宜, 程京京. 银行介入、金融资产配置与民营企业创新——基于企业债务违约分析[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17(4).
- [82] 邢丽云, 俞会新, 朱兆同. 建筑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研究[J]. 建筑经济, 2019, 40(10).
- [83] 俞会新, 邢丽云. 网络嵌入、绿色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关系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9).
- [84] 邢会, 王飞, 郭辉丽. 政府政策支持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述评[J]. 财会月刊, 2019(17).
- [85] Jiang, S., Hu, Y., & Wang, Z. (2019). Core Firm Based View on the Mechanism of Constructing an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 A Case Study of Haier Group. Sustainability, 11(11).
- [86] 孟玉, 高璇雨, 贾成真, 冯忠江.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河北省区域创新效率评价[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44(8).
- [87] 杨培, 曹国忠, 周坤, 张家祺, 檀润华. 基于 TRIZ 理论的快递电动车创新设计[J]. 包装工程, 2019, 40(14).
- [88] Kang, K., Zhao, Y., Zhang, J., & Qiang, C. (2019). Evolutionary game theoretic analysis on low-carbon strategy for supply chain enterpris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 [89] 宋晓刚, 张敏, 郑少东. 地下综合管廊智能互联运营监控系统研究[J]. 建筑经济, 2019, 40(3).
- [90] 张宏娟. 管理会计报告助力公立医院科室运营分析[J]. 会计之友, 2019(6).
- [91] 张兰云, 顾晓青. 基于遗传算法的装船顺序整数规划问题求解[J]. 舰船科学技术, 2019, 41(22).
- [92] 杨沐明, 黄亚魁, 戴或虹. 一类多商品设施选址问题的基于线性松弛解的启发式方法[J]. 运筹学学报, 2019, 23(3).
- [93] 雷兆明, 赵凡, 廖文喆, 王鹏程. 钢铁企业物流库存的车辆调度优化[J]. 计算机仿真, 2019, 36(1).
- [94] 赵璐阳, 王丽娟, 宋金凤. 基于最小费用最大流改进算法的多种交通方式开行方案协同优化研究[J]. 铁道运输与经济, 2019, 41(3).
- [95] 张苏英, 郭宝樑, 赵国花, 刘慧贤.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大型综合建筑火灾疏散路径规划[J].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19, 19(36).
- [96] 申婵, 崔洪军. 基于可靠性最短路实时定制公交线路优化研究[J].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2019, 19(6).
- [97] Ma, Y., Li, Z., Yan, F., & Feng, C. (2019). A hybrid priority-based genetic algorithm for simultaneous pickup and delivery problems in reverse logistics with time windows and multiple decision-makers. Soft Computing.
- [98] 魏庆朝, 潘姿华, 初智杰, 李敏. 事故树分析法在中低速磁浮交通运营事故分析中的应用[J].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2019, 22(1).
- [99] 贾雨龙, 米增强, 余洋, 申皓, 范辉. 计及不确定性的柔性负荷聚合商随机——鲁棒投标决策模型[J]. 电工技术学报, 2019, 34(19).
- [100] 康凯, 赵宇杰, 张敬. 延期付款对供应链经济订货批量及碳排放的影响[J].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19, 24(2).
- [101] 康凯, 高思颖, 张敬. 考虑决策者风险态度的供应链融资与定价策略[J].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19, 24(5).
- [102] 王坎河, 韩希卓, 时国强. 考虑铁路分割线的物流园区功能区布局规划研究[J]. 工业工程, 2019, 22(5).
- [103] 刘力卓, 赵义格, 韩玉琪, 何明. 基于 Jack 远程监控操作台人机工效评价[J]. 工业工程, 2019, 22(5).
- [104] 付士峰, 戎贤. 浅层掏土法在 CFG 桩复合地基高层建筑中的理论与应用研究[J]. 建筑结构, 2019, 49(8).
- [105] 刘一健, 岳小云. 不同供需下农产品双渠道供应链的决策[J]. 系统科学与数学, 2019, 39(11).
- [106] 潘卓, 郑杨. 区块链在智慧物流发展中的运用研究[J]. 价格月刊, 2019(5).
- [107] 陈松奕, 崔艺瑄. 新零售背景下我国物流企业数据驱动创新路径[J]. 商业经济研究, 2019(11).

- [108]张敬,李风华,魏旭光.供应链治理模式选择的理论溯源与研究展望[J].管理现代化,2019,39(6).
- [109]陈立文,聂增民.施工项目技术整合机理及效应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6).
- [110]李慧英,王育红.PPP项目资产证券化风险隔离法律制度的困境与优化[J].当代经济管理,2019,41(6).
- [111]李素英,田崖,吴永立.基于FAHP模型的铁路工程项目风险评估研究[J].铁道工程学报,2019,36(7).
- [112]孙汉康.浅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资产证券化[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2).
- [113]任嵘嵘,阎明凤,杨帮兴.基于模糊多准则群决策的可持续项目选择模型[J].技术经济,2019,38(9).
- [114]孙建诚,蒋浩鹏,朱双晗.基于BIM技术的三维公路模型设计探讨[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8(1).
- [115]Wang R, Ye L, Chen L. Th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on Housing Prices: Evidence from China's Prefecture-Level Cities[J]. Sustainability, 2019, 11.
- [116]李媛媛,郭宁宁.资本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产权异质性和金融生态环境双重视角[J].武汉金融,2019(12).
- [117]刘兢轶,王彧婧,王静思.供应链金融模式下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价体系构建[J].金融发展研究,2019(11).
- [118]叶莉,芮萍.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传导的影响——来自中国银行同业市场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会月刊,2019(20).
- [119]郭净,陈永昶,刘兢轶.圈层发展模式下雄安国际金融中心构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4(6).
- [120]王树强,庞晶.中外绿色金融制度对比及其启示[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9,39(3).
- [121]叶莉,樊锦霞,赵萌.金融系统多维度流动性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三元VAR-GARCH-BEEK模型的分析[J].金融与经济,2019(6).
- [122]赵萌,叶莉.金融稳定与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系统GMM估计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19(9).
- [123]李媛媛,崔宸琛,刘思羽.金融生态环境、企业风险承担与创新效率——基于制造业面板VAR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9,38(7).
- [124]叶莉,王远哲,陈勇勇.基于尾部风险关联网络的中国金融机构间风险溢出效应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9,34(3).
- [125]白海宁,李哲.大数据背景下的高校科研经费精准管理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22(16).
- [126]宋瑞莉.大数据环境下农业信息管理对农业经济的影响[J].农业经济,2019(4).
- [127]郭海玲,马红雨,许泽辉.社会化媒体用户信息披露意愿影响模型构建与实证——以微信用户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9,63(15).
- [128]刘兵,朱叶珊,梁林.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中多元治理主体识别及治理策略研究——基于微信公众号大数据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36(8).
- [129]刘松,石宝军.京津冀区域信息化空间差异及协同发展研究[J].生态经济,2019,35(8).
- [130]梁林,赵玉帛,刘兵.京津冀城市间人口流动网络研究——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分析[J].西北人口,2019,40(1).
- [131]高记,孙平,郝佳新.领导执行程序公正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J].领导科学,2019(10).
- [132]崔文静,刘兵,李娜.职场挫折感研究述评与展望[J].领导科学,2019(6).
- [133]刘兵,赵雪,梁林,曾建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人才配置协同演化路径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10).
- [134]高记,孙平,郝佳新.高阶层员工更加认可组织公正吗?——内归因倾向的中介作用及其边界条件[J].技术经济,2019,38(11).
- [135]许长勇,王瑾慈,高记.意义建构视角下个体与组织匹配的实现机制——基于信誉楼的案例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36(11).
- [136]杨鹏,高素英,国慧.创新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的链式中介效应[J].企业经济,2019(1).
- [137]张明,王竞一.真实型领导对下属职业召唤的影响路径研究[J].领导科学,2019(8).
- [138]陈亮,沈文竹,郑伟波,徐师慧.自我赋能时代背景下“心理授权”的三十年研究述评[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36(3).
- [139]李艳双,朱丽娜.激发保护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J].宏观经济管理,2019(11).
- [140]张培,杨迎.行动主体参与度、知识共创与服务创新绩效[J].软科学,2019,33(9).
- [141]王飞.利益激励在领导决策情景与领导公正感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基于领导干部测评的实证研究[J].领导科学,2019(18).

工商管理研究

王冬年

2019年,河北学者对工商管理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商业模式、会计转型、使命驱动型创新、企业创新、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多团队系统研究、丝绸之路旅游带等方面。

一、企业管理

(一) 经营管理

在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视角下,王智新等人研究开放式创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开放式创新显著增强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全球价值链嵌入并没有显著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开放式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交互作用显著正向增强技术创新绩效。这些结论具有非常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同时这些结论保持较强的稳健性。作者建议,应更加重视开放式创新的核心作用,积极拓展和获取外部创新信息;多管齐下疏通传导渠道,发挥开放式创新的技术创新绩效促进效应;提升企业内部创新和外部创新均衡协调力度,增强技术创新绩效。^[1]

俞会新等人基于网络嵌入理论、创新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构建了网络嵌入、绿色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基于216家制造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网络嵌入和绿色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网络嵌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绿色创新中介影响网络嵌入与企业竞争优势间关系。企业应努力通过各种形式提升外部网络嵌入水平,在积极主动开展绿色创新实践过程中增强自身竞争优势。^[2]

朱清香等人基于会计稳健性中介作用视角,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会计稳健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会计稳健性中

介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3]叶陈毅等人以2012—2016年连续五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运用Stata 12.0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内部控制、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公司受媒体重视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履行社会责任;媒体关注起到调节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作用,且媒体关注越高,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越显著。^[4]

李桂荣等人以2013—2016年A股主板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按产权性质将企业进一步分组,实证检验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非国有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地方国有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比中央国有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引入政府环境规制变量后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政府的环境规制程度越高,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越明显。分析表明,利益相关者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期望不同,从而导致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5]

陈阳阳等人是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以4名具有失败经历的习惯性创业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纵向研究的方法,通过编码分析,得出创业失败复原过程:按照创业者的反应,创业失败复原过程可分为回避、接受、归因和学习4个阶段;在复原过程中,创业者的思维经历了恢复导向、下行反事实思维、损失导向和上行反事实思维的变化。研究结果为中国本土化创业失败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为中国创业者从失败中恢复提供了借鉴和思路,深化了创业失败复原研究,为进一步理论探索提供了思路。^[6]

张玉兰等人以2014—2017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数据包络BCC模型定量测算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并检验了在融资约束作用下,研发投入对企业投资效

率的影响。结果发现：R&D 投入与企业投资效率呈 U 形关系，且只有当 R&D 投入积累至一定规模才会促进企业的投资效率；高水平的融资约束弱化了 R&D 投入与投资效率的 U 形关系。^[7]

辛兵海等人基于中国 2001—2017 年的银行—企业信贷匹配数据，应用 Amiti 和 Weinstein (2018) 的研究方法，对特质性银行信贷供给冲击、企业需求冲击和共同因素冲击进行有效测度。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时变特质性银行信贷供给冲击因素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并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特质性银行信贷供给冲击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贷款依赖程度较高、准入债券市场程度较低、国有股权占比较低的企业，其投资率对信贷供给冲击的敏感性程度更高；银行信贷供给冲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且主要是通过改善低国有股权占比企业的融资约束得以实现。^[8]

郭江山等人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考察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和国有企业的区域 GDP 贡献对本地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同合作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异质性研究发现，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改善效果更显著；经济发达地区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率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国有企业区域 GDP 贡献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应采取合作发展策略，加大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做优做强国有资本，打造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健全制度体系，推动中小企业良性发展。^[9]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吴永立等人阐释了供给侧改革中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内涵及其现实价值，从政府企业协同的视角构建降成本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识别降成本过程中存在的误区与风险，指出在降成本过程中，政府是降成本策略的推动者，从宏观层面进行降成本的结构性的安排部署；实体经济企业是相应的执行者与受益者，从微观层面进行企业成本的调整配置。只有政府、企业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制约，才能实现预期效果。要从结构性动因方面优化资源配置，从执行性动因方面优化政策配置。^[10]

(二) 市场与市场营销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享经济商业模式演进路径、要素联动及潜在人口红利生成机理”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高素英等人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以微医为案例，通过深度访谈，对访谈获取的数据资料、企业内部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交互验证，探究共享医疗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服务、技术、需求、政策、投资等五个主范畴对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创新有明显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分析五个主范畴之间的关系，构建共享经济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因素模型，深入剖析共享经济商业模式驱动机制，以期有关部门决策监管、共享经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和公众对共享经济选择提供参考借鉴。^[11]

张敬伟等人借鉴已有的认知与行动互动的观点，建立了“认知引发行行动，行动反馈认知”的概念框架，用以解读新企业商业模式的形成过程。基于对两家互联网企业的跨案例研究得到如下初步结论：创业者的初始商业模式认知体现为商业概念假设和商业逻辑假设，这些认知内容来源于创业者的先前经验、信息扫描与心理活动机制；初始商业模式认知是新企业开展探索行动的起点，有助于指引创业者有目的地开展行动，以提升行动的有效性；创业者采取内部检验、外部检验、直接检验和间接检验等多种行动方式检验初始商业模式认知，虽然资源匮乏的创业者更倾向于短期内低成本的检验方式，但综合使用上述行动方式更为有效；创业者接受行动反馈后的认知调整是创业推理的结果，相比商业逻辑假设，源自创业者长期从业经验的商业概念假设更难发生变动。^[12]

近年来我国文创产品的跨际贸易取得了长足进展。辛文玉等人认为，文创产品跨际贸易的困境主要表现在资金跨境转移的制度困境、利益分割的法治困境、物流困境、品牌融合的文化困境、贸易纠纷的解决困境等几个方面。加快推进文创产品的跨际贸易必须发挥跨境电商零售优势、降低跨境文创产品的交易成本；积极打造区域文创产品跨际贸易共同体；积极规范文创产品跨际贸易的市场秩序；突破人力资源瓶颈，大力培养文创产品跨际贸易专业人才。^[13]

品牌联合是新创企业克服其成长劣势的有效

策略之一。黄春萍等人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了新创企业品牌联合企业主体行为活动的基本模型和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模型；研究了外部竞争环境、合伙企业的企业类型、品牌资产、关系承诺和联合匹配性等特征对联合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外部环境动态变化时，越来越多的新创企业会选择品牌联合策略，而其选择成熟企业还是新创企业作为联合伙伴，并不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品牌联合系统中，作为核心的新创企业选择合伙企业时，其自身特征并不影响其是否采取联合策略；不管核心企业自身特征如何，均优先选择成熟企业作为联合伙伴；同时，合伙企业的关系承诺对联合伙伴选择的影响最显著，品牌资产次之，而联合匹配性影响不显著。候选企业在回应核心企业的联合请求时，其接受/拒绝联合的决策首先取决于核心企业对其评价的结果，其次是核心企业的品牌资产。^[14]

张巨才指出，目前广告业面临着严重危机，如广告公司被兼并、业绩下滑，人才纷纷逃离，广告主广告预算大幅消减，逐渐抛弃广告代理模式，等等。这一方面源于广告行业的天然缺陷与实践流弊，另一方面与大众社会的解构以及数字革命对广告传播媒体、传播机制、运作内容的颠覆式变革直接相关。除旧布新，适应科技革命和社会进步，实现低本高效的广告传播，以品牌运作和管理为核心竞争力，以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为视角，以整合营销传播为基本路径进行产业升级，可能是目前面临严重危机的广告业的最佳选择。^[15]

张跃先等人基于顾客惊喜情绪评价，探讨了网上商家提供免费赠品对顾客惊喜的影响，考察了感知不确定性和顾客类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感知质量、感知独特性和感知一致性显著且正向影响顾客惊喜，而感知成本对顾客惊喜则没有显著影响；顾客类型和感知不确定性显著调节免费赠品特征与顾客惊喜之间的关系，且顾客类型与感知不确定性的复合调节作用显著，表现出不同的特征。^[16]

（三）公司治理与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

刘鑫等人以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为政策背景，从深度和广度二元角度检验独立董事参与度对 CEO 超额薪酬的影响。以 2008—2015 年

中国沪深 A 股的 2274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多种检验方法得到以下结论：独立董事任期所反映的参与深度对 CEO 超额薪酬具有抑制效应；独立董事兼职企业数量所反映的参与广度对 CEO 超额薪酬具有促进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在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期硬性规定的约束下，独立董事任期的延长有助于促进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而兼职多家企业的独立董事则会因为精力不足、监督动机受到其社会网络的抑制而削弱董事会监督职能。^[17]

张莉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 2009—2016 年我国 A 股主板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相对于无关联财务公司的上市公司，有关联财务公司的上市公司获得更多外部债务融资总额、更多的商业信用、更多的长期银行借款；不考虑关联财务公司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是商业信用的净提供方，与低成本的商业信用融资显著负相关，比国有企业使用了更多的短期银行借款，但其长期银行借款及外部债务融资总额显著低于国有企业；在考虑关联财务公司的情况下，关联财务公司使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额的增加、外部债务融资总额的增加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说明关联财务公司确实给民营企业带来了融资的便利。^[18]

安玉琢等人以 2012—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法分析了高管团队特征和董事长—高管团队“垂直对”差异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平均任职时间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而平均学历对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高管团队“垂直对”学历差异、任职时间差异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而董事长—高管团队“垂直对”年龄差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显著。^[19]

关菲等人基于经典 Hotelling 模型，在线性市场上二次运输成本条件下，讨论了企业在相互持股情形下如何进行产品的定位以及产品的定价，建立了企业间先同时选址，再同时定价的 Hotelling 拓展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博弈均衡与参数分析。理论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企业间相互持股比例的增大，企业会生产更具差异化的产品以获得更大的利润，且企业追求产品差异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随着企业间相互持股比例的增

大,产品价格会逐渐上升,并且增长幅度越来越快。^[20]

王明吉等人通过相关文献综述,提出新时代会计转型应在发展传统会计的基础上重视管理会计发展的观点,深入剖析了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的动因以及管理会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完善管理会计理论、培养管理会计人才、注重管理会计个性化发展及培养企业高层管理会计意识等方面提出了转型的具体路径,以期对推进我国会计转型工作提供借鉴。^[21]

刘常国选择 2011—2017 年沪深两市主板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财政补贴和公司治理对预算松弛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公司治理在财政补贴与预算松弛关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财政补贴与预算松弛之间显著负相关;公司治理水平越高,预算松弛程度越低;公司治理显著增强了财政补贴与预算松弛之间的相关性。^[22]

二、管理工程

(一) 战略管理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战略比较与实现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张学文等人对使命驱动型创新的源起、理论依据、政策逻辑与基本标准等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使命驱动型创新超越了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强调创新不仅要有速度,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战略方向;创新不是简单修复现有的市场失灵,而是要创造新的市场;政府要主动参与和主导整个创新过程;政府应该具有创造市场的“企业家职能”,特别是基于国家重大战略和公共利益的创新;政府应主动承担重大创新带来的风险。^[23]

企业发展受内外部因素的联动影响,孙丽文等人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采集 173 份有效调查问卷,通过层次回归对影响企业转型和绩效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情境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提升效应,但是伴随战略柔性强度增大,其贡献度减小;两者交互效应能显著正向提升企业绩效,且绿色创新在不同水平的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不同中介作用,说明变革管理理念和强

化绿色创新是遏制战略柔性过高导致企业绩效贡献度下降的重要措施,绿色创新对战略柔性的效应发挥起到纽带作用;动态环境规制在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动态环境下政府规制政策更多地对企业决策和创新行为带来抑制效果。企业应加强内生路径建设、注重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实现政企双赢与协同发展。^[24]

郭净等人选取宜信公司进行纵向案例研究,探索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对开放式创新网络形成演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演化的过程中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创新机会由来自市场转变为来自社会,创新参与各方由经济联结转变为责任联结,创新模式由部分开放转变为完全开放,创新绩效由创造经济价值为先转变为创造社会价值为先,创新途径由价值链创新转变为与社会共生。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是联结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和开放式创新网络的两种重要机制,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扩大企业的利益关注点、改变创新资源配置,促进开放式创新网络的形成演化。^[25]

(二) 研究与开发管理

张学文等人企业在企业开放科学行为理论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重点从内部研究活动、产学研合作、专利独占、R&D 人员 4 个维度,针对我国企业的开放科学行为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在科学开放性决策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专利独占、产学研合作、博士比例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博士比例的影响最为显著,而专利独占和 R&D 人员规模的影响均不显著。企业在科学论文披露决策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专利独占、博士比例的影响比较显著,而产学研合作的影响却并不显著,这意味着产学研合作中企业更关注的是技术难题的解决,而不是论文的发表。专利独占对科学开放性的决策影响并不显著,但科学披露和专利独占之间却具有显著的互补性关系。^[26]

李子彪等人以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开放环境下企业不同合作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和技术的中介作用与内部研发的调节作用。基于 2014—2016 年 816 家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数据的长短期对照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合作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有不

同影响,且无论长短期,境外合作的影响最强,产学、产政合作长期效应强,产研合作短期效应强;知识和技术起部分中介作用,内部研发正向调节产学、产政合作绩效,负向调节产研、境外合作绩效。^[27]

郭净等人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单独的产业政策以及产业政策与财政、金融、货币政策协同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效应差异,结果发现:产业政策的当期影响并不显著,实现效果存在时滞性;产业与财政政策协同对专利数的效应最大最显著,产业与金融政策协同对专利数为负向影响,产业与货币政策协同则对专利数和研发投入均不显著。说明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尚未达到有效政策,未来产业政策的完善应向创新政策转型,实现单一性政策向协同性政策组合的转变,同时注重选择性政策与普惠性政策的协同。^[28]

王重润等人考察了房价上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房价上涨会通过“财富效应”及“资产替代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利用2013—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造了中介效应模型证明:房价上涨的“资产替代效应”起到了主导作用,挤出了企业研发投入,而投资性房地产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房价对不同融资约束及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高融资约束企业的研发投入受到房价挤出的影响较小,国有企业受到的挤出影响较大。^[29]

刘冲等人基于2005—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利用2008年起各地区逐步推进的专利质押政策这一拟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来看,专利质押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显示:专利质押对大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强于中小企业;专利质押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的创新产出;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专利质押对其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30]

邢丽云等人基于制度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整合内外部视角分析外部环境规制和内部绿色动态能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动态能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间的调节作用,并利用山东、江苏和浙江等东部地区247家制造企业样本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内部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对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同时,绿色动态能力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作用关系。^[31]

李媛媛等人基于2010—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样本数据,运用面板VAR方法,探析了金融生态环境、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生态环境与制造业的企业创新效率之间为双向促进作用,且均具有长期促进作用;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有抑制作用。基于制造业所有制性质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国企、非国企的企业创新效率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均为长期促进;国企和非国企的企业创新效率均可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且均为长期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抑制了国企和非国企的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其中对国企的抑制作用大于非国企;国企的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非国企中不存在这一关系。^[32]

孔海东等人通过文献调查并结合案例的描述性分析,提出数字技术时代价值网络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赋能内涵、关键维度和基于赋能跨层次效应的价值共创行为分析框架。将“赋能氛围”“主体赋能”分别作为价值网络中赋能的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进行概念化。界定了两个维度的关键组成要素,分别包括信息共享、开放性结构、协同规则以及主体关系、资源整合和影响。构建了赋能的跨层次效应模型,分析了赋能的宏观—微观跨层次效应及其对价值网络生态和主体价值创造的影响。^[33]

高素英等人聚焦于共享经济,以滴滴快车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基于顾客视角从服务的需求方及供应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入手,探究滴滴快车的整个价值生成过程,进而剖析共享经济模式的创新机理,从中探索价值共创下影响共享经济模式创新的因素。研究发现滴滴依托第三方平台区别于传统出行方式,价值是在下单、乘车、支付三阶段形成的闭合回路中产生。基于此,构建了一个价值共创下共享经济模式的创新模型,发现技术与平台对创新的影响,定义价值共创视角下的共享经济,讨论共享经济在运行实践中面临的

新问题。^[34]

知识产权制度距离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具有重要影响。杨忠敏等人综合考虑影响对外投资的国内和国际因素,基于 1994—2014 年 49 个发展中国家间及 2003—2014 年中国与 46 个“一带一路”国家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RE)方法研究知识产权制度距离与外向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的影响规律。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随着知识产权制度距离由负到正,其对投资影响呈现出近似倒 U 形影响规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距离对“一带一路”不同地区的影响表现为正、负和不显著,主要取决于技术转移规模和东道国其他正式及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对于扩大其在“一带一路”国家范围内的投资具有积极作用。^[35]

宋扬认为,经历了 2016 年市场的空前火热与资本的高度青睐,知识付费正迅速由高速发展期走向市场成熟期。知识付费向垂直领域下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究其原因,无外乎需求侧与供给侧的行为转变共同构成的合力的推动作用,即认知盈余背景下需求侧的用户由了解到掌握的消费行为转变与供给侧的流量大平台与中小草根从业者由圈地到深耕的经营模式转变而形成的合力。谋求构建以服务+内容、游戏与任务、圈层化社交为抓手的三位一体场景化范式便成了垂直领域知识付费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36]

(三) 电子商务与物流系统管理

王法涛对平台网络效应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大多针对单一平台双边市场进行数理分析,鲜少针对多元经营模式下的跨平台网络效应进行研究。研究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基于电子商务主平台及其从属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拓展已有双边市场分析框架,分别构建联营开放电子商务平台、自营半开放电子商务平台、物流电子商务平台、金融电子商务平台四种模式下的多边市场收益模型,并讨论各种商业模式下的平台定价与利润;二是通过案例研究,分析验证平台网络效应动态演化路径,并给出企业在不同演化阶段的核心竞争战略。研究结果表明:交叉网络效应会削弱企业对平台的控制力,而实施跨平台战略可以分散网络效应,实现网络效应红利的内部化;先发平台的网络效应扩散有助于企业跨界进

入相关产业领域;多元经营战略可使平台获得更大定价空间。此外,处于不同演化阶段的电子商务平台其网络效应与核心战略也有所不同,成长期的平台注重用户数量,成熟期的平台重视平台质量建设,分化期的平台实施平台包络战略。^[37]

郭娜等人通过构建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农村电商网商数量、农特产品市场、农村电商专业人才规模、资金规模 4 个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反馈机制,并基于我国 2010—2016 年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统计数据对农村电商和乡村振兴的互动性进行了仿真模拟。对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检验表明,模型能够真实地反映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村电商和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实际系统结构和功能。在此基础上,通过调整农村电商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参数、农村电商教育投资水平参数、农业财政补贴因子、农村居民消费补贴因子 4 个政策变量的取值,进一步对农村电商同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政策进行模拟。模拟结果显示:影响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业财政补贴力度;相关扶持政策在农村电商和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政策效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逐步加大农业财政补贴力度,构建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对于实现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应根据农村电商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状,分阶段、有针对性地重点推进相关政策,以促进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发展。^[38]

郭海玲等人利用“S-O-R”模型,构建了电商平台短视频信息展示对消费者购物意愿影响作用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以短视频信息有用性、易用性和全面性作为外部环境刺激,将虚拟触觉、愉悦感和信任感作为受到外部刺激影响的消费者内部机体因素,将购买意愿作为消费者的行为反应。研究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虚拟触觉、愉悦感和信任感均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短视频信息有用性和全面性对虚拟触觉、愉悦感和信任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短视频信息易用性对虚拟触觉产生了负向影响作用,对信任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愉悦感未产生显著影响。^[39]

李美羽等人在系统评析传统鲜活农产品流通渠道模式的基础上,揭示出“互联网+鲜活农产品流通”的基本思想是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审视与设计鲜活农产品流通的各个环节,解决传统鲜活农产品流通渠道模式存在的问题,提高流通效率。在“互联网+”背景下优化鲜活农产品流通渠道模式,一方面应对传统的鲜活农产品流通渠道模式进行互联网化设计,以构建鲜活农产品流通综合信息平台;另一方面构建基于互联网思维和技术、以企业为核心的流通渠道模式设计。^[40]

刘璞等人按照“资源—能力—绩效”的逻辑范式,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引入客户关系管理能力,提出电子商务投资—电子商务能力—客户关系管理能力—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基于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能力与客户关系管理能力及其子维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其中,电子商务能力及其子维度对顾客知识管理能力的影响程度最大,对顾客赢返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弱;电子商务管理能力和电子商务技术能力对客户关系管理能力及其子维度的影响稍强,而电子商务战略能力的影响较弱;电子商务投资通过电子商务能力和客户关系管理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绩效。^[41]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韧性视阈下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刘兵等人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爬虫工具爬取雄安新区成立一周年内与人才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识别出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中的区域、组织及个体3个层次12个治理主体,并测度主体间关系网络的相关指标,研究表明: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过程中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密度较高,联系较密切;其重要性排序依次是区域—组织—个体;政府的核心作用明显,其他治理主体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协作与发展。^[42]

牛楠等人指出,多团队合作是应对复杂环境、完成动态任务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合作研发领域和应急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实践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突破以往研究对多团队合作现象的关注,基于系统观的视角,

将多团队合作视为一个系统,以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交互性、开放性及动态性等特征为出发点,构建了多团队系统运行的“金字塔”研究框架,得到了多团队系统输入的跨层次影响机制、中介的交互式影响机制、环境及干预的影响机制、输出及其动态反馈机制,分析了多团队系统运行的影响因素、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的特征,从系统观的视角回答了“多团队系统如何运行?”。^[43]

杨春江等人旨在探究中国情境下工作嵌入的内涵和开发有效测量工具,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首先明确工作嵌入的本土内涵和结构,进而开发了组合量表。步骤如下:对15名员工访谈,探索性分析他们离职的主要思考要素;收集和分析76位被试的开放式调查数据,确认工作嵌入的各维度内容和收集题项素材,结合以往文献编制出含25个题项的初始量表;预测试234名员工,通过项目鉴别和探索性因子分析修正量表,余下23个题项分属于组织匹配、组织联系、组织牺牲、区域匹配、区域联系和区域牺牲6个因子,量表信、效度均达到较佳的水平;复测试448名员工,验证性因子分析支持了量表的结构效度——前3个因子隶属组织维度,后3个因子隶属区域维度。以工作嵌入整体量表和工作满意为关联校标,皮尔逊相关分别为0.56和0.52,支持了量表的外部效度。^[44]

随着组织管理的发展,个体价值日益受到重视。陈亮等人认为,心理授权关系到员工自我效能感提升和内在工作动机激发,在帮助员工自我赋能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从心理授权概念的由来与发展、结构与测量、理论模型、影响因素、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等多个方面系统评价了30年来心理授权的研究成果,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45]

许长勇等人指出,实现个体与组织的匹配是组织长久发展与员工成长的重要保障,如何实现个体与组织的匹配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选取信誉楼百货集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并基于意义建构理论,运用扎根编码技术分析了其实现个体与组织匹配的过程。研究发现:个体与组织匹配过程是一个从组织意义给赋到员工意义建构的过程;组织通过意义传递、意义强化以及意义赋能实现对个体的意义给赋过程,而个体

意义建构以认知投入、情感投入、行为投入为标志；匹配过程具有持续性和递进性，随着组织发展和个体成长，匹配过程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特征。从个体与组织两个视角剖析实现匹配的过程，并构建了个体与组织匹配的实现机制模型，能够扩展和深化对个体与组织匹配实现机制的认识，对于企业相应的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46]

创业者能否根据环境变化进行认知变革，是其新企业能否成功适应环境的关键。张敬伟等人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构建了“环境扫描—信息加工—认知变革”的概念框架，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创业者识别和利用机会过程中的认知变革进行了经验探究。研究发现：第一，模式识别是创业者信息加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相关决策情境因素共同影响信息加工方式的选择；第二，基于不同模式识别的信息加工会对创业者认知变革产生差异化影响。^[47]

谢中起等人，利用因子分析对 32 家智库的网络影响力进行评价；以智库规模为自变量、智库自媒体影响力为因变量、智库自媒体产出为中介变量对自媒体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将智库年度预算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智库规模对智库自媒体影响力有显著作用，智库自媒体产出对智库规模与智库自媒体影响力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但智库年度预算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48]

马丽等人以人—环境匹配理论、边界理论与需求满足理论为基础，从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的视角，将组织与人的因素同时纳入研究，探讨了组织与人的工作家庭边界管理一致性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并且为深入探究发生机制构建了以工作—家庭促进为中介的研究模型。采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技术，以 745 名来自不同行业、职位的员工为调查对象，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不匹配，个体偏好—组织供给匹配使得员工工作满意度更高；个体偏好—组织供给匹配情况下，二者的匹配程度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呈倒 U 形曲线关系；工作—家庭促进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49]

四、旅游管理

翁钢民等人认为，景区区位条件是旅游空间

行为规划的基础。针对当前主流测度模型中“非此即彼”问题，以“丝绸之路旅游带”为例，基于旅游资源、旅游市场、旅游交通、旅游服务四大特征指数构建景区区位优势度测度模型，引入 D-S 证据理论对景区区位优势等级进行评价，并系统探究其影响机理。结果显示：“丝绸之路旅游带”AAAAA 级景区区位优势等级体系呈现“结构破缺—重心偏离—波动显著”的特征；景区区位优势等级空间格局具有较高的交通指向性和中心性；不同区域景区区位优势等级差异明显，制约因子不同；景区区位优势等级空间分布受自然和人文因素共同影响，其中资源禀赋、地形地貌是内生因素，社会经济、交通条件是外部推动力。^[50]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已成为旅游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杨秀平等人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指标体系、计量模型、应用研究和管理工具等 5 个方面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方向和侧重点。针对旅游相关主体偏好的区间性特征，界定基于多主体需求的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体系，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供给指标与主体对旅游环境的需求要素角度构建指标体系；提高旅游环境承载力计量模型的科学性与精确性，分析系统内部与系统之间的动态匹配机理、测度模型，模拟特定主体的行动轨迹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波动轨迹；结合时代特征，关注典型区域，展开应用研究；对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进行优化，分析可持续承载“潜力”转化为可持续承载“实力”的系统性管理举措。^[51]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旅游地理本体与众包旅游信息的时空语义挖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郎月华等人选择 GPS 轨迹内涵的移动速度、速度波动特征、移动状态持续时间、数据异常点等旅游行为基本特征，作为旅游行为模式分类的基础，提出 GPS 轨迹栅格化的概念模式，设计了基于 GPS 轨迹栅格化的旅游行为空间模式表达方法。该方法不仅能够区分观光式、休憩式和乘车式 3 种不同类型的旅游行为空间模式，而且能够描述旅游空间任意位置的主导行为模式，可以解决旅游时空行为和旅游地理格局与过程的精细化定量研究。九寨沟实例研究证明，栅格化的旅游行为空间模式计算结果与其他数据

源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描述视角更丰富、时空精度更高。该方法能够对旅游时空行为的研究提供支持,提高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精细程度,案例计算结果可以为旅游地规划与管理,特别是为观光路线和景区引导设计提供参考。^[52]

程瑞芳等人认为,乡村性是定义乡村旅游的重要标志。创造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是乡村旅游多元价值功能发挥作用的表现。在乡村振兴战略政策驱动下,基于乡村旅游的乡村性特征及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本位,构建乡村旅游多元价值功能提升开发逻辑框架,从生态环境监控、乡土文化保护、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和乡村旅游社区化建设等方面提出开发路径。^[53]

李燕等人从产业链的视角分析京津冀体育旅游全产业链的内涵,概括京津冀体育旅游的现状,从全产业链发展的空间链、产业链和供需链3个方面构建京津冀体育旅游协同发展路径:政策协同——京津冀体育旅游规划和服务质量标准的出台;资源统筹——人、财、物统筹配置;市场对接——产业协同、供需对接。提出京津冀体育旅游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措施:京津冀三地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深度协调,制定京津冀体育旅游行业服务质量标准;加大对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扶持力度,壮大京津冀体育旅游供给主体,促进体育消费升级;加强京津冀体育产业、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培育京津冀体育旅游市场,拓展京津冀体育旅游发展的新空间;加强京津冀智慧体育旅游建设,创新体育旅游商品销售方式;加强京津冀体育旅游社会团体建设和人才培养,以创新推进京津冀体育旅游发展。^[54]

兰新成认为,高校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旅游者新的选择和新的目的地,是极具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旅游形式,原因有三:其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二浓厚的学术氛围,其三丰厚的精神食粮。这种旅游形式为旅游者提供进入校园的机会,强调对旅游者文化生活的影响和精神层面的满足,是精神沉淀的最好方式。高校旅游纪念品是高校历史文化凝练、整合、传承的物质载体,高校历史底蕴和人文内涵是高校旅游纪念品设计的灵魂。现阶段河北省高校旅游纪念品设计缺少专业性,发展迟缓。高校旅游纪念

品的研发设计对高校的发展尤为重要,应将高校旅游纪念品打造成为品牌,与学科和专业建设齐抓共建。^[55]

(王冬年:河北经贸大学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王智新,赵景峰.开放式创新、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绩效[J].科学管理研究,2019(1).
- [2]俞会新,邢丽云.网络嵌入、绿色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关系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9).
- [3]朱清香,郭欢,李小青.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会计稳健性的中介作用[J].预测,2019(3).
- [4]叶陈毅,李聪,李佳萱,等.内部控制、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J].会计之友,2019(7).
- [5]李桂荣,温绍涵,王乐娜.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5).
- [6]陈阳阳,葛晶,彭建娟,等.创业失败复原过程研究——基于中国情境的多案例探索[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9(4).
- [7]张玉兰,翟慧君,景思婷,等.R&D投入、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会计之友,2019(16).
- [8]辛兵海,张晓云,杜丽群.特质性银行信贷供给冲击如何影响企业投资——基于中国银行—企业匹配样本的分析[J].经济科学,2019(6).
- [9]郭江山,李子轩.国有企业经济效率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与经济,2019(4).
- [10]吴永立,杨娉,丁妥.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路径研究——基于政企协同视角[J].会计之友,2019(10).
- [11]高素英,马晓辉,张烨.共享医疗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因素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微医的案例研究[J].兰州学刊,2019(9).
- [12]张敬伟,杜鑫,成文,等.新企业商业模式形成过程中认知与行动的互动:一项跨案例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2).
- [13]辛文玉,高洪显,刘宾.我国文创产品跨际贸易的机遇、困境和优化举措[J].对外经贸实务,2019(6).
- [14]黄春萍,赵林,刘璞,等.新创企业品牌联合伙伴选择的计算实验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9(8).
- [15]张巨才.天然缺陷与新困境双重碾压下的广告业:严重危机抑或浴火重生[J].河北学刊,2019(5).
- [16]张跃先,马钦海,张晓飞.基于感知不确定性和顾客类型交互作用的网上免费赠品与顾客惊喜的关系研究[J].管理学报,2019(1).
- [17]刘鑫,张雯宇.独立董事参与度对CEO超额薪酬影响研

- 究——基于深度与广度的二元视角[J].金融评论,2019(1).
- [18]张莉.关联财务公司与上市公司外部债务融资[J].会计之友,2019(2).
- [19]安玉琢,魏艳翠,于霞.高管团队特征与盈余管理——基于“垂直对”特征差异视角[J].会计之友,2019(14).
- [20]关菲,韩树新,任建勇.企业相互持股下的 Hotelling 拓展模型及其均衡分析[J].运筹与管理,2019(6).
- [21]王明吉,张馨元.新时代背景下会计转型方向与路径选择[J].会计之友,2019(15).
- [22]刘常国.公司治理、财政补贴与企业预算松弛[J].财会通讯,2019(21).
- [23]张学文,陈劲.使命驱动型创新:源起、依据、政策逻辑与基本标准[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10).
- [24]孙丽文,任相伟,李翼凡.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动态环境规制下的交互和调节效应模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22).
- [25]郭净,魏荟颖,陈永昶.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开放式创新网络形成演化的作用机制——一个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纵向案例研究[J].东岳论丛,2019(11).
- [26]张学文,田华.企业开放科学行为研究:理论构建与实证测量[J].科学学研究,2019(8).
- [27]李子彪,赵菁菁.高新技术企业多元合作研发模式选择——内部研发的调节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6).
- [28]郭净,孟晓倩,徐玲.产业政策及政策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效应比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 [29]王重润,温礼瑶.房价上涨、投资性房地产与企业创新[J].金融与经济,2019(10).
- [30]刘冲,耿伟栋,洪欣欣.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 [31]邢丽云,俞会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J].华东经济管理,2019(10).
- [32]李媛媛,崔宸琛,刘思羽.金融生态环境、企业风险承担与创新效率——基于制造业面板 VAR 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9(7).
- [33]孔海东,张培,刘兵.价值共创行为分析框架构建——基于赋能理论视角[J].技术经济,2019(6).
- [34]高素英,宋莹莹,刘宏波.价值共创下共享经济模式创新机理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9(4).
- [35]杨忠敏,杨小辉,王玉.知识产权制度距离与外向对外直接投资——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J].科研管理,2019(5).
- [36]宋扬.服务、游戏、圈层:垂直领域知识付费的场景化发展路径[J].编辑之友,2019(11).
- [37]王法涛.演化视角下电子商务多边平台网络效应及竞争策略选择[J].中国流通经济,2019(11).
- [38]郭娜,李华伟.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19(4).
- [39]郭海玲,赵颖,史海燕.电商平台短视频信息展示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5).
- [40]李美羽,王成敏.“互联网+”背景下鲜活农产品流通渠道模式优化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 [41]刘璞,李晗,周平.电子商务投资与企业绩效——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视角[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6).
- [42]刘兵,朱叶珊,梁林.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中多元治理主体识别及治理策略研究——基于微信公众号大数据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8).
- [43]牛楠,刘兵,李娜.多团队系统研究前沿与研究框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9(7).
- [44]杨春江,刘丹,毛承成.中国情境下的工作嵌入:构念内涵、维度和量表开发[J].管理工程学报,2019(1).
- [45]陈亮,沈文竹,郑伟波,等.自我赋能时代背景下“心理授权”的三十年研究述评[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3).
- [46]许长勇,王瑾慈,高记.意义建构视角下个体与组织匹配的实现机制——基于信誉楼的案例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11).
- [47]张敬伟,韩静,何一清,等.信息加工视角下创业者的认知变革过程——一项多案例研究[J].南方经济,2019(10).
- [48]谢中起,陈会然,彭建交.基于自媒体中介效应的智库影响力提升策略研究[J].情报科学,2019(8).
- [49]马丽,马梦媛.边界管理匹配与工作满意度——工作—家庭促进的中介作用[J].软科学,2019(10).
- [50]翁钢民,潘越,李凌雁.“丝绸之路旅游带”景区区位优势等级测度与影响机理[J].经济地理,2019(4).
- [51]杨秀平,翁钢民.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19(4).
- [52]郎月华,李仁杰,傅学庆.基于 GPS 轨迹栅格化的旅游行为空间模式分析[J].旅游学刊,2019(6).
- [53]程瑞芳,程钢海.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多元价值功能响应调整及开发路径[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6).
- [54]李燕,骆秉全.京津冀体育旅游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路径及措施[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9(4).
- [55]兰新成.高校旅游纪念品研发策略与评估[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9(4).

公共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

张秀玉 郭远远

2019年河北省公共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国家治理、政府职能与行政改革研究，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研究、“放管服”改革研究、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职能研究和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二是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包括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第三部门管理研究；三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包括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风险和质量评价体系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体系建设研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PPP研究；四是公共政策研究，包括精准扶贫政策研究、河北省精准扶贫政策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创新政策研究；五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政府人才政策研究，包括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行政领导研究以及雄安新区人才政策研究；六是电子政务、政府信息公开和舆情引导研究，包括电子政务和政府数据管理研究、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研究、政府舆情管理与引导研究。

一、国家治理、政府职能与行政改革研究

（一）国家治理体系研究

张彦台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历史发展高度，从理论和实践上全面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我们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认识这个显著优势，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更加坚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1]康振海指出，我们要准确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坚定信心、守正创新，科学谋划、转化见效，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李鉴修认为，我们要深刻理解把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依靠人民的力量、提高制度执行能力，将转化这篇大文章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做实做好。^[3]冯晓阳认为，增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中国表达还面临原有治理体系的制约，受到理念冲突的影响，存在话语权的缺失。为此，必须构建和完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达话语，充分借助国际表达平台，不断丰富表达形式。^[4]

蔺俊萍认为诚信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要完善组织领导，推进诚信体系系统构建；拓宽视野，完善现有社会制度为诚信建设构筑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激发群众主动参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诚信建设基础。^[5]王芳认为，要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以社会本位、公民本位和依法治国的理念为指导，通过规范执法机制、规范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等措施实现行政执法的规范化，能使政府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群众。^[6]刘风光等认为，要克服我国智库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问题，构建中国特色智库话语体系，增强智库主体意识，建立智库评价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打通智库与决策层沟通渠道，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强大智力支撑作用。^[7]韩兆柱等认为，共享单车存在乱停乱放、市场准入不规范、治理主体合作意识低、“公地悲剧”等社会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整合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资源、为公共服务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合作治理、构建与完善信用体系等途径加以治理。^[8]

（二）“放管服”改革研究

万倩倩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从完全主导变为宏观调控，市场由基础性作用变为决定性作用，社会在二者作用下，变为多种阶层、多样利益、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市民社会。未来三者应该发展为：政府有作为、市场有效率、社会有秩序。^[9]推行简政放权、深化“放管服”改

革,无疑是重塑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重大举措。杨凡认为,要准确把握“放管服”改革的时代内涵,从树立政府整体思维、拉近政策制定与落实、以政务公开深化简政放权、完善改革联动机制四个方面深化改革。^[10]寇大伟指出,“宽进严管”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特征,要明确审批和监管的具体职责,推进监管方式精细化,不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1]梁跃民认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方位打造便民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大力推行综合执法改革,夯实基层执政基础;全面推进网格化管理改革,实现服务市场主体过程扁平化、服务质量高效化;一网通办、联通百姓,全面提升综合服务和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将基层微观领域的“放管服”改革举措落到实处。^[12]蔡欣欣等认为,为使“放管服”改革更加精准高效,应处理好放与简、放与管、放与服三个关系,在法治视野下,保证科学有序放权,加强社会监管,强化信息宣传服务,真正提高群众对“放管服”改革的满意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13]李娜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应当通过“一门式”改革和“一网式”政务服务,实现“最多跑一次”的便利政务办理环境,从而提供更高效的服务方式。^[14]杜胜利认为,政府必须通过提高科技创新管理水平、健全科技创新政策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等方面不断科技创新宏观治理的“放管服”改革。^[15]

杨凡认为,以“强制性制度变迁”加“摸着石头过河”为组合方式的地方政府简政放权改革,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 and 沟通网络等行政环境要素的困境。突破这些困境需要树立整体政府思维、拉近政策制定与落实距离、坚持政务公开、完善联动机制。^[16]寇大伟等指出,在河北省“放管服”改革中存在创新性与合法性的张力、大范围实行“双随机、一公开”有难度、审管分离后“互联网+”的缺失造成效率下降、县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有难度等问题。为此,必须制定理顺审批与监管关系的法律法规、促进“互联网+”在“放管服”改革中进一步应用、理顺地方政府的横向和纵向府际关系、上级政府部门加大对下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17]孙欣欣也认为河北省在“放管服”改革中存在缺乏整体性、协同性、实质性、规范性和灵活性、创新性,以及“信息孤岛”等问题,必

须构建整体化及多元化的治理结构;逐步调整、健全权责清单体系;加大放权力度,优化地方策略执行空间;构建电子政务体系,加强信息互联互通。^[18]高文烟梳理了先进省市在“放管服”改革中的先进经验,指出河北省推进放管服改革要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树立法治思维,加强法治建设;要以现代信息技术作为重要技术支撑。^[19]

(三) 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职能研究

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生态文明作为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之一,生态文明建设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敬等认为,共享绿色价值理念,通过利益冲突协调实现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制衡,对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必须将政府、企业与公众的策略行为纳入环境共治研究框架,从宏观文化、政策引导、绩效激励、联合制裁等方面建构利益协调机制。^[20]俞会新等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实证检验了我国2005至2016年275个城市的政府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污染减排效应,并提出了加快构建政府主导、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多方协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环保宣传教育、环境信息公开、监督政府与企业行为方面的作用等政策建议。^[21]邢丽云等利用东部地区247家制造企业样本数据对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指出政府应制定适度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企业应努力提高自身绿色动态能力。^[22]孙丽文等通过对“碳锁定”问题的研究,指出中央政府以维护和实现整体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并确保政策实施的权威性;地方政府以政绩为导向,存在打政策“擦边球”现象;企业和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下致力于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诸方利益诉求的实现在于碳解锁制度路径的建立和实施。为此,政府应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企业应强化约束机制、消费者需树立绿色消费意识倒逼低碳转型。^[23]曾珍香等分析了绿色发展驱动下供应链社会责任所呈现的特点,然后从供应链内外部视角解析了绿色发展战略对供应链社会责任的驱动作用,最后提出了绿色发展驱动下供应链社会责任“外部环境—供应链成员间协作—企业内部绿色运营”三位一

体协同治理模型。^[24]岳娟丽等指出,为更好实现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职能,要建立具有科学的约束制衡机制、多层次资金结构池设计方案、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绿色发展基金投融资模式。^[25]司林波等在总结欧盟环境治理政策的特点及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治理特别是跨区域环境治理政策的完善提出了完善环境政策体系和治理机制、建立跟踪问责系统、加强区域及部门间的协同合作、重视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等建议。^[26]韩冬梅等通过对中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政策 40 年的回顾与展望,提出新时代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必须进一步明确农业农村环保政策的目标定位,采用恰当的激励和约束手段,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为实现乡村振兴打好绿水青山的底色。^[27]

(四) 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针对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司林波等指出,要建立包括问题诊断机制、目标确定机制、目标分解机制、目标评估机制在内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28]牟永福认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功能定位的实现受制于环境承载力、产业布局、生态贫困、生态代价转移性补偿等诸多影响因素。为此,必须构造“一城四带”绿色发展格局:即雄安新区生态城、冀西北冰雪经济产业带、燕山——太行山生态旅游产业带、冀中南绿色农业示范带和滨海循环经济产业带。^[29]张坤等认为,京津冀地区现有的环境治理工作存在碎片化、尚未建构利益协同补偿机制、尚未建构跨地区的环境协同治理工作机构的问题,必须切实强化京津冀地域的环境治理合作理念建设力度,完善地方政府之间的基本性利益协调机制,完善京津冀地区环境协同治理专门性工作机构。^[30]

关于京津冀生态补偿机制问题,陈亚恒等基于排放因子法核算了 2006 至 2015 年的碳排放、碳吸收和碳赤字,并将碳赤字与碳交易的价值结合,构建了京津冀生态补偿模型。^[31]孔伟等基于生态资产视角,通过分析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建立了京津冀生态补偿价值核算模型,并提出成立专门协调组织机构、拓宽生态补偿融资渠道、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建立多维生态补偿途径和开展区域间合作与协作等对策建议。^[32]张岩峰等也提出了类似的对策建议:划分生态功能保护

区,建立森林生态圈;引入市场机制,优化生态补偿模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加强地域合作,建立跨界补偿机制;规范生态补偿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建立环保数据共享平台,实现联防联控;完善奖惩机制,激发生态补偿内在动力。^[33]

此外,黄华等通过构建区域绿色发展与城市化两者的耦合度模型,对“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区域绿色发展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发展中各项指标贡献度相对均衡,但城市化水平中经济城市化贡献度最高;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区域间梯度明显,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京津较高、河北最低;绿色发展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协调程度均表现出阶段性特征,但区域间差距明显。^[34]孔伟等通过分析当前张家口绿道建设存在的“重视不够、零星分布、配套落后、内容单调、产业缺失、知名度低”等瓶颈,提出编制专项规划、秉持生态理念、打造全域旅游、整合城市空间、丰富绿道功能、突出地方特色、完善配套设施、举办体育活动、打造绿道品牌、鼓励多元参与、辐射贫困乡村的绿道示范城市建设对策建议。^[35]郭雪慧等提出,要加强环境协同立法,协调推进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司法合作的新模式,构建多元化的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与环境协同治理基金,建立京津冀地区环境信息共享平台,着力建设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监测与监督制度,构建利益协调与利益补偿与环境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36]陈胜开等认为,要从加强企业支持力度、细化部门协作交流制度、强化区域协同治理、加大全民关注力度等角度入手,不断强化环保税的绿色发展促进功能,推进京津冀生态协同。^[37]

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一) 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凤丽等指出,新时期,我国社会风险呈现一些新特征:从单一走向叠加,呈现共生性;从隐性转向显性,呈现公开性;诉求内容呈现多元性;大部分社会风险发生概率低,具有可控性。为此,必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减少风险源;做实做细本职工作,减少纠纷点;推进正确思维方法,坚持法治化;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要建

立健全风险识别、研判、评估和风险控制协同、责任机制。^[38]严晓萍认为,要借鉴精细化治理理念,精准区分不同群体需求,有效治理;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整体多部门合作协同治理;利用大数据科学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重视实地调研与科学分析相结合,增强“四力”;正确处理国家发展长远利益与个体现实需要的矛盾;用专业化、法制化的常规治理替代简单粗暴的运动式治理。^[39]邓寒怡认为在信息化背景下,我国要实施“网络化”治理,促进信息化的均衡发展,加强对专门技术人员的培训,从观念上由一体独治向社会共治转变,建立科学合理的“网络化”治理的体制机制。^[40]葛玮钰等认为,构建社会多元协同治理,要在利用国家顶层设计,做好重要战略部署,集中国家政治存量的基础上,注重基层治理经验,培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民主增量,使整个社会以增存量平衡增长的方式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41]

周保刚等指出,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与落实“十四条基本方略”、提升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衔接,把党的建设重大成效转化为直接动力;应当以矛盾论思维方法抓社会治理主要矛盾,以实践论行动立场克服理念滞后、思想僵化、思路狭窄、动力不足等局限,以法治思维转化基层治理中创造的制度累积;应当注意国家、省域、基层不同层级上,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制度、机制与措施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切实体现人民的价值主体与实践主体地位。^[42]耿永志认为,“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伦理关系以“共同价值”为基础,以“服务理念”为内核,在追求社会和谐目标的过程中,坚持公平、正义、合作、互助、诚信、友善等价值观。它们在人的价值层面实现了对传统治理模式的超越,并在“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伦理关系中发挥统摄作用,成为决定“伦理”能否真正走进“治理”的关键性因素。^[43]杨蕾认为,要做好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中信访伦理工作,必须建立完善基层信访伦理机制,不断增强政府自身公信力建设,提高干部为民服务的道德意识,加大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引导。^[44]

赵卫卫等认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问题导向,以应用型研究为主且随着实

际情况的发展不断演变,同时也存在着分散化和碎片化特点,且空间上局限于社区层面。应当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城市基层公共服务提供、城市社区公共价值重塑三个方面来丰富研究成果,更好地指导实践。^[45]冷宣荣指出,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必须以全新理念、全新思维和全新技术推动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实现经验型管理向法治型治理转变,推进城市治理法治化;实现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推进城市治理人本化;实现城市发展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性转变,推进城市治理生态化;实现传统管理手段向数字化管理手段转变,推进城市管理智能化;实现粗放型管理向细致型管理转变,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实现审批型管理向全方位服务型管理转变,推进城市治理服务化。^[46]阎国文等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指出,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县委是县域治理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47]

(二) 乡村治理研究

彭秀良等认为,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更是国家治理的基础。70年来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单向度的社会控制时期(1949—1982年)、全方位社会治理格局形成时期(1983—2011年)、协同共治格局形成时期(2012年—)^[48]樊雅丽指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失衡化”等诸种挑战,新时代呼唤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实现农村社会良性运行。^[49]

乡村治理何以有效?程瑞山认为,乡村治理的效度考量,需要从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促进乡村发展、解决乡村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治理资源的“投入”与治理“产出”等多方面相衡量。^[50]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要理解把握乡村治理有效的内涵意蕴,要转变乡村治理理念,要实现组织振兴,要形成基层多元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要夯实打牢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实现乡村治理与现代科技的有机融合。^[51]侯建华认为要补齐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短板,包括“筑巢引凤”,补齐人口人才短板;深化改革,补齐集体经济短板;协同共治,补齐社会组织短板;提档升级,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52]此外,王文录指出要构建乡村治理新秩序;^[53]李冰认为农村贫困治理要以公平公正的伦理关怀精神,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采取扶贫措施;^[54]王敬等认为应充分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建立干群之间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以及村民利益表达机制,以提升公共政策执行效果,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防止村干部“公权私用”;^[55]胥英明等认为要采取吸引并留住人才、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充分挖掘乡村文化、提高村民自治法治水平等举措来完善贫困山区农村社会治理;^[56]韩梦娟等认为要正确引导农民上访走法治化、制度化途径,早日实现乡村善治;^[57]田丽认为必须强化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立场,有效化解矛盾,促使村民形成发展的共识,凝聚发展的合力;^[58]李宸坤等认为要充分发挥农村民间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59]郭素霞认为要发挥网络信息技术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60]张会爽等认为乡镇政府应有效履行和科学行使行政职能。^[61]

(三) 第三部门管理研究

王晓端等认为,社会组织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还处于初级阶段,除少数大型社会组织外,普遍存在着发展不规范、分散、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必须完善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和制度保障,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平台,构建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完善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机制。^[62]王春城等提倡建立一种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特征的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独特机制:“共建”即多方主体共同兴办扶贫产业,“共治”即各方主体共同管理扶贫产业,“共享”即各方主体共享产业成果,借此形成一套由社会公益组织小农户融入现代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机制。^[63]

周志刚等认为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组织的行业协会很好地弥补了政府部分职能以及市场调控,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强。当前我国行业协会公共属性缺损现象日益严重,存在对所属行业的规划指导不足、监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足、承接政府职能不到位等问题。^[64]并提出了完善行业协会媒体生态环境;打造品牌形象,加强内容创作;建立公众话语平台,加强舆论监督等行业协会公共性缺损治理的对策。^[65]王建强认为行业协会人才建设面临负责人流失严重、吸纳

高层次人才能力较弱、社会地位和人才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人才开发资金投入不足等困境,可通过加强行业协会实力、实施引才引智工程、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建立人才信息库、加强人才职业化建设、加大对人才开发投入力度等措施加以解决。^[66]

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一) 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风险和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踪程等认为,在打造公共物品风险“脆弱性—韧性”共进治理新格局的过程中需要克服治理结构、治理制度和动态风险等方面的阻滞因素,从治理模式、治理属性和治理阶段等要素出发,设计公共物品风险治理新格局的建构路径,从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解决和全过程等四个方面寻找具体纾解策略。^[67]佟林杰等认为,可以根据助推在公共领域的应用特质,从公共服务简化机制、公共服务默认机制以及公共服务纠正机制三个层面界定并完善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机制。^[68]杨胜利等通过构建京津冀公共服务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检验了京津冀人口空间变动与公共服务资源供给的协调性,提出河北省应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方式,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69]刘平等通过定量研究发现,石家庄、保定、唐山三个城市有较明显的区域内差异,集中表现为城市中心比外围区域公共设施建设更完善,且服务质量呈圈层结构向外递减,居住在城市中心的居民生活更便利。建议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比较充足区域的新增居住用地的容积率,加快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区域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70]佟林杰等对石家庄市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做了简要分析,提出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城市文化体系的塑造,促进公民全面发展;加强城市环境的优化,改善市容市貌;完善公共交通设施,促进交通便利。^[71]

均等化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指标之一。刘邦凡指出,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解决了,将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向更深层次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也会更高。^[72]田学斌等认为,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加大京津优质资源向

河北转移的力度；提升河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确“重点地区，优先打造”的发展思路；扩大对河北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强京津冀之间财政协同合作；建立健全京津冀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支持体系。^[73]刘丽敏等也认为，促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补齐社保领域中的短板，完善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提升三地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居民的获得感。^[74]李素枝等认为，推进河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进一步调整全省的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和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来。^[75]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王立源指出，农村公共资源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内在资源，当前不少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利用率不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培育和发展集体经济，增强公共资源在乡村治理中的支撑能力。^[76]王金营等指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往往因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缺失而面临更大的风险，动摇着本就脆弱的生活、生产能力，也加速了区域间的不平衡。并由此提出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出力度、将公共服务纳入反贫困政策框架、重点对口建设基本公共服务、提高扶贫人员能力和待遇等对策建议。^[77]苏炜认为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根本，以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的建立为抓手，以规划的设计与动态调整、农民需求的表达以及互联网资源的运用为重点，多措并举，不断提升河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78]

农村公共空间是重要的公共产品类型。郑萍认为，我国乡村公共空间呈现出多元化和理性化特征，必须整合政府主导公共空间、规范网络公共空间、培养民间团体公共空间。^[79]孔俊婷等认为，农村公共空间更新要体现其多元价值，丰富公共空间的形式，为村民提供更多的活动可能。可以尝试构建“门户突出+重点提升+多点分散”的乡村公共空间更新模式，由点带面建立完整的公共空间系统。^[80]

（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体系建设研究

王建祥等设计了基于主观幸福法的政府文化服务产出和生产率测算，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调查得到的主观幸福感受和相应的意愿支付价格相乘，得到包含质量因素的产出角度的政府文化服务产出，同时对投入指标进行质量调整，并

在质量调整投入指标的基础上测算政府文化服务生产率。^[81]王彦林认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存在诸多问题：资本主义等文化的泛化、渗透与影响；文化体制中政府、市场作用错位仍然存在；公共文化服务不充分、不均衡问题突出；文化产业规模、质量、效益仍待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界区不清、互促不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的协同发展；提高文化产业系统协同发展水平；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82]马岩等认为，我国智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存在文化成果宣传推广意识薄弱、推广手段单一、用户需求把握不准、互动性差等问题。在媒体融合发展趋势下，要提高智慧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效能，需要智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树立成果推广意识，构建适应全媒体传播模式的智慧公共文化成果推广传播的话语体系，打造全媒体融合的服务推广宣传链，提高用户需求精准分析能力，完善社交互动功能。^[83]熊海峰等指出，目前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在国家宏观指引下，根据自身经济基础、社会力量发展水平、市民参与意识等多种因素，分层次、分类别、分阶段地推进，有序构建起一个多元共治、互惠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切实提升设施的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84]

刘潇等认为，新时期乡村文化治理主要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但因各方面因素导致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及文化发展存在不平衡性，需要结合实际，发掘乡土教育的优秀传统和特色，有针对性开展乡村文化治理，建设和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85]岳丽娜等认为当前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自上而下”以政府为主体的模式限制了公共文化建设和服务的效能、公共文化建设与服务“以文强志、以文增智”的扶贫功能发挥不足、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尚处空白阶段等突出问题。为此，必须将公共文化建设与文化扶贫工作统筹推进、大力推进特困地区数字化文化资源的建设、加大高校参与特困地区文化建设与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驱动型”公共文化建设与服务供给模式。^[86]刘广明认为，农村文化消费仍然存在消费支出占比过低、城乡差距过大、消费层次不高等

问题。为此,必须强化政府干预以推进农村文化消费,要加大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治理农村文化消费环境,加强农村文化消费引导。^[87]彭光明认为,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88]

任亮等认为,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由主体、客体和方式系统构成,治理体系多元化,治理体系的策略应涵盖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层面。^[89]李燕凌等认为,京津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以下突出问题:政府主导下的供给模式存在弊端,缺乏市场导向和活力;一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简陋,设施建设不符合国家标准;京津冀文化事业财政支出不平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均;京津冀之间的协同共享不充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情况差异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缺乏创新意识,有些地区依旧沿用过时的建设方法;公共文化服务监督不到位,村民表达意见的渠道不畅。^[90]为此,必须促进京津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化、规模化、市场化机制;对京津冀农民文化需求进行整合,确保供给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构建京津冀文化资源协同共享平台;各级政府树立服务意识,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探索京津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型供给模式;建构效率为主的多元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加强京津冀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91]徐蕾认为,推进河北省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措施包括:增强经济总体实力,明确城乡财政支出比例;继续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切实提高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质量。^[92]

(四)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 PPP 研究

赵晓冬等针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供应商及评估方的选择决策问题,从政府服务购买、服务供应、监管评估三方的匹配视域,利用三边匹配决策与多属性决策方法,构建了基于各方评价的三边匹配模型,对政府选择服务供应商及监管评估机构有实践的指导意义。^[93]刘彩云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服务供需不对应、购买过程执行目录不具体、服务产品评价标准不明确、地方

政府融资机制不规范等问题。对此,政府应理顺沟通机制、健全法律法规、善用评估机制、完善监督平台。^[94]韩兆柱依据网络化治理理论构建了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的网络治理模式,在等级制度的基础上融入网络化治理理念,将政府、私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热心公民等个体有序导入提供救助服务的整体网络中,实现多主体间信任沟通、责任共担、信息共享与协同合作,从而保障社会救助服务供给最优化和贫困群体利益最大化。^[95]

袁政等认为,目前我国的 PPP 政策执行中存在管理部门不明确、缺少更高效力的法律文件、程序繁琐等问题,必须进一步明确行业主管部门、投资管理部门、财政部门在 PPP 工作中的职责,加强建设、运营期的监管。^[96]梁彦红等认为,在 PPP 项目中,要做到监管与激励相结合,以激励为主,监管为辅,方能防止社会资本机会主义,实现 PPP 项目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97]孙汉康指出,我国发展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要稳妥有序,严格筛选 PPP 项目资产,完善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法律、法规,采用主信托方式进行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并改变现有发行机制。^[98]

四、公共政策研究

(一) 精准扶贫政策研究

游朋轩认为,推进“精准扶贫”治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为指导,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正义性价值体系的现实路径。^[99]王春城提出了政策客体层次论,将政策客体分为公共政策问题、政策目标群体、政策利益关系、社会发展状况四个方面,同时以精准扶贫政策绩效评估作为应用与检验个案得出:在深入挖掘其政策客体层次性的基础上,对照政策客体层次论于政策绩效评估的规定性,有助于实现整个评估活动的系统性优化。^[100]崔元培等认为,中国的扶贫政策大致经历了以救济、平均分配为主的扶贫阶段,以贫困地区开发为主的阶段,扶持贫困人口扶贫阶段,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阶段。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贯穿于中国扶贫政策演变过程中,应继续形成多元互助开发组织体系,增强扶贫瞄准的针对性。^[101]段洪波等通过分析改革开放 40 年扶贫开

发的历程与经验指出,精准扶贫以我国现阶段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特征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当前实情,有效地解决了我国脱贫效率降低问题,充分体现了长短期、国家救助和自我发展、普遍需求和个性需求的结合,最终目的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长期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进而确保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102]李伟指出,在目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为能够使精准扶贫工作更好符合实际需求,使其取得更加理想的效果,十分必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应当使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实现有效融合。^[103]王春城等也认为,可在产业扶贫—产业兴旺、生态扶贫—生态宜居、扶智扶志—乡风文明、脱贫攻坚责任制—治理有效四个方面找到接口,最终实现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与乡村振兴“生活富裕”目标的对接,并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具体路径进行相关政策的供给。^[104]李百超等认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中,应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促进行动者网络目标共识为导向,积极发挥党委和政府的引导与协调功能;二是以链接行动者网络为目标,注重发挥激进行动者的示范效应;三是以促进行动者间信任为重点,强化行动者间互动并加强网络管理。^[105]王宇认为在精准扶贫中,要统筹扶志与扶智的关系。^[106]

此外,学者们探讨了精准扶贫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宋凤轩认为,应进一步优化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机制,建立扶贫资金社会化筹资的配套措施,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扶贫,并配合完善的扶贫资金绩效评估体系,强化内外监管,提高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以促进我国财政扶贫事业的健康发展。^[107]蔡军认为,要通过增加贫困地区金融网点、开发创新金融产品、加强政府监管等途径完善我国金融精准扶贫体系。^[108]白德全等认为要通过政府扶持逐步优化城乡之间资源配置,实现合作社的初步发展;通过改革合作社的经营体制提高其决策效率,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初步实现;通过双向一体化提高合作社的市场竞争能力,发挥合作社促进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109]孔金平等也认为,社会组织是联系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帮扶资源与农村贫困人口的重要纽带,是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的重要载体,在中国扶贫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10]王文会等认为,政府做好顶层设计,政府、社会、企业、农民共同努力,充分发挥农村电商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111]具体对策包括:以政策引导,转变电商精准扶贫观念;培养专业能力强的电商人才;完善电商扶贫政策,将电商扶贫落实到户;扩大农村电商发展规模,形成完整的产业链。^[112]赵金丽等强调要培育新乡贤,凝聚扶贫力量,提供乡贤群体参与精准扶贫的舞台,着力发挥乡贤群体纽带辅助功能,构建扶贫主体联动机制,发挥乡贤群体在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时代价值。^[113]

(二) 河北省精准扶贫政策研究

段世江认为,要强化生态意识、协同意识和差距意识,充分发挥国家政策叠加的优势,厘清政策目标的重点和优先领域,以合村并居和就地城镇化为重点,优化人口布局,突出生态价值,科学定位区域功能,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可持续脱贫致富,以实现燕山——太行山片区减贫与发展的政策目标。^[114]马正英认为,河北省精准脱贫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脱贫精准度有待提高、脱贫攻坚责任落实不到位、贫困人员内生动力未充分激发、扶贫领域腐败作风等问题。为此,应通过精准落实政策、整合人员力量、发展脱贫产业、严实作风建设等更加优化的实施机制推进精准脱贫攻坚工作。^[115]冯凤莲等对河北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与群众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发现存在农户参与精准识别的积极性不高、部分农村没有贯彻落实精准帮扶、基层存在破坏精准扶贫的“害群之马”、扶贫资金不足等问题。为此必须加大“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确保帮扶效果;切实改进基层政府官员工作作风,发扬基层民主;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合力推进脱贫攻坚;更切实地进行精准识别,更切实地落实各扶贫政策;巩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增强脱贫信心。^[116]

(三)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创新政策研究

洪帅等认为,目前我国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支持主要围绕国家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配套政策、社会发展政策等方面,未来要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支持等基础概念研究,增加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支持的定量研究,加大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支持的国内外比

较研究。^[117]康振海指出,京津冀三地亟须构建协同发展新机制,其中,产业是核心,创新是引领,要素是基础条件,服务是基本保障,环境是硬性约束,五者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京津冀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框架和动力机制。^[118]柳天恩等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五年来,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两个“一体两翼”加快建设,交通、生态和产业三个重点领域不断突破,区域协同创新势头良好,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进展。但区域“断崖式”发展差距仍未根本改变,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存在结构性难题,交通一体化存在路网布局和交通方式衔接短板,生态环境保护存在市场机制不健全难题,产业升级转移存在承接平台分散、承接能力不足和承接产业错位等问题。在未来三地的协同发展中,应把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探索结合起来,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把北京“减量发展”和“辐射带动”结合起来,加快缩小河北与京津的发展差距;以两个“一体两翼”建设为契机,培育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以“京津雄创新三角”为引领,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以交通和生态领域为突破口,开创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119]武义青指出要积极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共建共享。^[120]

田学斌等认为,京津冀协同创新是当今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领域集中在科技协同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和生态环境方面,主要内容集中在协同创新模式、模型、影响因素和创新主体四方面。^[121]纪良纲指出,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要通过倾力打造雄安新区协同创新发展新引擎、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和交流互动、开展重大与共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引进更多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转化等有力举措,大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122]梁丽英等针对京津冀地区“五化”的科研创新能力整体较弱、产业结构水平不尽合理、区域差异较大、协调水平不高等问题,指出未来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布局背景下,继续增加科研技术投入,进一步加大高素质创新人才引进力度,优化调整产业利用布局与结构,加强地区之间的交流,保障就业,促进人居和谐及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增强区域的全面、可持续发

展能力;完善相关政策,坚持协调发展及内部优化策略,以京津地区为中心,扩散“五化”的整体影响力,为“五化”的协调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进而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123]李兴光等认为京津冀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策略包括:加强政府引导、促进资源产业集群升级、利用政策引导创新要素分布、充分发挥北京市创新辐射扩散作用、鼓励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124]

此外,一些学者探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创新的一些具体领域。王春城等认为,要强化公共政策落实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125]姜建华等从技术创新主体、知识积累、平台资源、创新能力等方面探索构建了京津冀区域技术创新实力评价体系。^[126]李庆博等基于治理理论构建了京津冀区域技术转移网络治理机制,从网络治理的模式选择、网络结构、机制保障及社会参与等方面具体提出了网络治理内容,并从京津冀区域技术转移的“供方—服务方—需方”三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127]窦丽琛等认为应该根据不同产业的分工协作现状,重构高新技术产业分工格局,加快京津冀创新资源要素合理流动,有效发挥京津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通过建立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联盟来打造京津冀错位竞争、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的高技术产业链条和分工新格局。^[128]张晗等认为,经济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劳动力资源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等是影响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的关键因素。^[129]河北省要通过以下举措来提升承接能力:因地制宜,通过加强比较优势吸引转移产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以地区经济的发展带动产业承接能力的提升;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加大人力资本投入,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增加政府投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130]韩兆柱等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关注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131]和养老服务协同发展问题。^[132]

五、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政府人才政策研究

(一)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黄华等认为,现行的公务员薪酬制度存在着结构和设计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必须构建职位分类和工作分析相结合的薪酬结构,建构与绩效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加快推进公务员薪酬立法。^[133]胡健等认为当前基层公务员考核中存

在评价工作导向作用不强、考核体系和指标设置不完善、考核评价的方法不完善、对评价结果的使用不够充分、考核方式和工具有待提升等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对公务员考核评价工作的管理,增强考核评价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优化考核方式,建立考核评价的容错纠错机制,强化考核评价结果的运用。^[134]白志华等认为,要依托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采用契约化方式,坚持“费随事转”“费按岗支”,实行“收”“放”耦合的策略组合,针对不同功能需求,发挥政府购买服务的功能替代作用,对履职岗位采取“收”的形式,对公共服务采取“放”的模式,以破解机构编制不足的困境。^[135]

(二) 行政领导研究

张向鸿指出,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在加强党管干部的前提下,将逐渐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与现代化国家治理相适应,好干部的标准将更注重政治性、务实性。^[136]袁秀指出,要深刻认识提升干部队伍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四中全会的要求,坚持长远规划与当前实施相衔接、综合培训与专业学习相结合,通过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全面提升干部队伍国家治理能力,更好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137]张青卫等认为,新时代提升领导干部的科学发展本领,需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灵活运用在现实工作中,深入理解提升科学发展本领的动力来源、重要原则、长久保障、基本途径和目标追求,掌握实现科学发展的规律,建立执行新发展理念的相关体制机制,坚持领导干部的正确选拔、积极培训、科学考核、全面监督,为提升领导干部科学发展本领提供制度保障。^[138]贺立军等认为,新时代,政治能力是衡量领导干部执政水平的重要因素,要从内在和外力两方面讨论,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把握政治能力的提升路径,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使其政治能力与担任的领导职责相匹配。^[139]曹海霞指出,党员领导干部需涵养“无我”境界,切实担当作为,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140]曹鸿飞认为要加强领导干部伦理素养

建设,不断完善以德行为先的选拔制度和监察体制,坚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强化自律与监督,努力打造一支勇于担当、有所作为、品行高尚的领导干部队伍。^[141]唐军书强调要切实加强青年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其牢固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142]王飞指出要将利益激励作为领导改善决策情景,消解公正与效率之间矛盾,化解内部冲突,提升改革发展中决策效率的有效抓手。^[143]杨瑞认为,领导决策时要掌握太极之道,要备物聚人,秉持太极中正之理;自强合众,秉持太极处世之理;进取与忧患同步,秉持太极立身之理。^[144]郭亚军认为应从巩固战略思维的哲学根基、坚守战略思维的政治灵魂、协商知识的专业性与理论体系的综合性相结合几个方面提升战略思维的创新动力着手,培养领导干部协商工作的战略思维。^[145]

针对领导越轨行为,孟莉指出,要强化越轨行为的内控机制,创设治理领导越轨行为的经济条件,构建规范领导行为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以保障组织良性发展。^[146]王东波研究了领导班子成员“顶牛”现象,指出应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规范组织资源使用、建构多重监管体系、做好思想上的宣传教育工作等方面着手加以消解。^[147]田丽等认为,要解决党员领导干部党内法规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必须注重从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角度提升执行力;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内部的相互监督;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党外社会监督的效能。^[148]张磊认为,针对基层“慢性子”和“混日子”干部,要建立“回炉锻造”机制,包括民主评议筛选程序、分类“回炉锻造”程序、主辅结合提升程序、持续考核跟踪程序等。^[149]杨晓星等认为,针对孔雀型领导的“佛系心态”,必须破除孔雀型领导的“面子工程”,变“佛系心态”为脚踏实地,创新务实、揽事担责、最终获得组织成员的认可。^[150]秦亚芹认为,要破解领导工作内卷化难题,须以改革促发展,坚持强势改革不停滞;以理念促管理,坚持思维同步不掉线;以竞争促活力,坚持业绩考核不松懈。^[151]

(三) 雄安新区人才政策研究

杨学新等认为,雄安新区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燕赵文化一脉相承。自

春秋战国时期至 2017 年新区设立,行政建置兴废分合、治所迁徙、辖属关系逐渐清晰,区域位置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并日益凸显和确立起来。^[152]王丽指出,打破三地间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边界和壁垒,应尽快吸引各种优质生产要素,尤其是人才涌入雄安新区是政府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153]梁林等研究指出,未来雄安新区人口规模前期与后期存在较大差距,人口增速在不同发展时期可能呈现“慢—快—慢—快”的趋势,2030 年人口规模预计达到 400 万左右,而至 2050 年人口规模预计将突破 1200 万。^[154]高志艳认为,要使雄安新区成为高层次人才集聚地,就要打破区域壁垒,吸引京津冀高等教育资源以促雄安经济建设;合理调整人才培养结构,提高人才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融合京津冀地区资源,推动高校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发展;营造良好的人才引进环境,加强雄安新区的体制政策创新。^[155]吴智育认为,要促进雄安新区本籍人力资源的开发,必须提高低端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雄安本土历史优秀人物的挖掘和优秀文化传承,加强学习型社区建设和基层文化服务投入,加强新型农民的培育和职业教育,做好本籍高端人才回雄安创业的宣讲,加强公职人员培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156]田学斌等认为,在大数据时代,要探索建立高度市场化的人才薪酬体系、柔性集聚机制、PPP 配置模式和新时代创新人才培育机制,为雄安新区高质量高标准发展提供人才支撑。^[157]刘兵等指出,在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中,要强化“政府+市场”的各司其职与协同合作的运行模式,探索“区块链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的金融链条;打造“多元社会组织+创新文化环境”的人才活动空间。^[158]

六、电子政务、政府信息公开和舆情引导研究

(一) 电子政务和政府数据管理研究

王伟玲等指出,我国电子政务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产业价值链停留在中低端、低水平同质化竞争普遍、缺乏产业协同合作、没有形成应用规模、产业支撑队伍不够等问题。为此,必须制定电子政务产业发展路线图,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深化产用互动建立发展良性产业生态,深化电子政务

应用建设,通过合理的项目采购资金申请制度来强化资金支持,制定合理有效的电子政务采购制度,通过加强产教合作来培育电子政务人才队伍。^[159]吴明等认为,要通过“互联网+政务”来打造智慧政府,必须转变思想,树立创新意识,加强网络监管;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信息化政务管理服务体系;扩大信息服务范围,增加信息服务种类;构建智慧政府“互联网+政务”体系,建设协调机构。^[160]孙曼曼认为,在未来的数据管理中,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引入大数据的意识以及技术,并加强管理技术的研发,促进跨部门的合作,建立数据管理的开放平台,让数据安全得到足够的保障,促进国家治理整体水平的进步。^[161]盖宏伟等认为,面对政府数据治理理论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必须加强技术创新,培养技术人才;建设伦理道德,保护数据隐私;完善制度体系,保障数据运行;提高执行能力,创造高效行政。^[162]

(二) 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研究

韩兆柱等指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政策 10 年内经历萌芽、发展、深化、完善四个阶段;权威工具和公开过程环节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政策工具和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在实现政策工具类型多元化、完善政策供给环节及保持政策工具运用的连续性与统一性三方面推进政府信息公开。^[163]路瑞红指出,我国政府开放数据研究还停留在探索的阶段,而关于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建设还停留在元数据、开放协议等微观层面,缺乏系统的、展现全国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建设的指导性内容等宏观方面的研究。建议在今后研究中,应加大作者与作者间、机构与机构间的合作,在研究内容上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把握总体方向,注重顶层设计,将政府开放数据研究推向深入。^[164]刘邦凡等主张构建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电子政府新模式——“全媒体政府”,具体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推进:强化顶层战略规划,完善相应法律体系;转换政府角色,适应新的服务模式;立足国情,选择混合型实施方案;建立统一综合的管理机构,统筹管理;塑造政府新形象,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选择双重技术战略,重视技术革新。^[165]蒋冰晶等提出要以法治方式化解政府数据开放中“不愿、不敢、不公”现象,应秉承

包容发展理念,建构包含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原则、避风港原则、违法归责原则、免费原则、同等开放原则的法律制度;化解“不会、不快、不优”现象,应秉承合作治理理念,建构包含自由参与原则、“三分”原则、元数据共享原则、完整性原则、一致性原则的法律制度。^[166]白献阳等以政府数据开放生态系统为视角,基于贵州省的数据,在分析目标一致、主体多元、客体多样、技术多维动议的基础上,构建了由主体协同、政策协同、资源协同、技术协同组成的政府数据开放协同机制。^[167]

(三) 政府舆情管理与引导研究

张慧双等认为,“互联网+”对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成为新时期现代化治理的新契机,国家、社会、地区治理逐渐突破了政府主导的管控模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治理格局,社会治理主体、公民参与方式、公共基础服务、民主监督方式等向“线上”扩展,使静态管理转向动态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68]对网络舆情的管理和引导是政府线上治理的关键内容。夏一雪等基于舆情大数据,构建了情报感知指标体系,并从异常识别、风险研判和情报获取三个阶段阐述了其实际运用;^[169]分析了突发事件负面情感引导模式和“时度效”标准,提出“时度效”一体化观点,构建了负面情感引导模型,并针对一般和重特大两种突发事件场景,提出了相应的“时度效”策略;^[170]研究了网民情感演化和舆情信息交互的关系,得出网民情感转移的规律,进而构建多维度微分方程组描述网民情感“衰减—转移”过程,并在“雾霾”微博舆情环境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171]陈志军基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认为公共管理机构可通过将事件纳入既有价值规范话语体系、调适公共价值规范与社会发展的差异、诉诸治理的有效性和消弭负面信息的传播和影响等路径维护、重建合法性,以应对公共舆情事件。^[172]朱晓霞等基于爆炸性渗流理论,提出了突发公共事件社会舆情治理的三种策略选择:随机免疫、目标包围免疫和全面科普。^[173]史路遥等通过研究虚假新闻的引爆原理,总结出导致虚假新闻引爆的三要素是信任因素、关注因素、需求因素,同时认为政府应从三要素独立引爆、相互引爆两个角度进行虚假新闻的监管。^[174]牛

文静等认为要通过协同治理来实现社会化媒体舆情突围,发挥社会化媒体舆情生态系统各子系统的正向功能以及舆情演化各阶段序参量的关键作用,通过自组织和自净化的内在驱动构建规范有序的社会化媒体舆情生态格局。^[175]

(张秀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教授,
郭远远: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张彦台.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10.
- [2] 康振海.准确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24.
- [3] 李鉴修.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10.
- [4] 冯晓阳.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中国表达探析[J].党政论坛,2019(3).
- [5] 蔺俊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诚信建设[J].新疆社科论坛,2019(4).
- [6] 王芳.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行政执法规范化[J].人民论坛,2019(3).
- [7] 刘风光,柴韬,李海红,梁娜,刘晋伟.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现实审视与发展策略[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1).
- [8] 韩兆柱,曹美晴.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共享单车治理路径探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9] 万倩倩.浅析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变化[J].河北企业,2019(10).
- [10] 杨凡.紧扣改革开放再出发要求深化“放管服”改革[J].改革与开放,2019(6).
- [11] 寇大伟.“放管服”改革中监管力度构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9-25.
- [12] 梁跃民.推进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放管服”改革的路径选择[J].经济论坛,2019(2).
- [13] 蔡欣欣,田勇.“放管服”改革在简政放权中需要处理的关系及应对[J].经济论坛,2019(2).
- [14] 李娜.“放管服”视角下优化服务方式打造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路径探析[J].经济论坛,2019(2).
- [15] 杜胜利.我国政府科技创新宏观治理的“放管服”改革[J].现代管理科学,2019(7).
- [16] 杨凡.地方政府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困境与突破——基于行政生态学视角的分析[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9(2).
- [17] 寇大伟,崔建锋.整体性治理视域的“放管服”改革——以河北省“放管服”改革为例[J].领导科学,2019(4).
- [18] 孙欣欣.国家治理现代化下地方政府的“放管服”改革[J].管理观察,2019(11).
- [19] 高文烟.“放管服”改革中的先进经验及对河北省的启

- 示[J].经济论坛,2019(2).
- [20] 张敬,杨冬,陈静.环境共治视阈下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利益冲突问题研究[J].价值工程,2019(26).
- [21] 俞会新,王怡博,孙鑫涛,李中圆.政府规制与环境非政府组织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J].软科学,2019(6).
- [22] 邢丽云,俞会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J].华东经济管理,2019(10).
- [23] 孙丽文,任相伟.我国“碳锁定”治理过程中的诸方博弈研究——基于制度解锁视角[J].企业经济,2019(8).
- [24] 曾珍香,张钰琦,林雨琛.绿色发展驱动下供应链社会责任协同治理研究[J].环境保护,2019(16).
- [25] 岳娟丽,曾繁华,管鸿禧.我国政府绿色发展基金的投融资模式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9(12).
- [26] 司林波,赵璐.欧盟环境治理政策述评及对我国的启示[J].环境保护,2019(6).
- [27] 韩冬梅,刘静,金书秦.中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政策四十年回顾与展望[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9(2).
- [28] 司林波,聂晓云,吴振其.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29] 牟永福.“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生态价值及其战略框架[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1).
- [30] 张坤,冯红.京津冀环境的协同治理研究[J].才智,2019(10).
- [31] 陈亚恒,闫丰.京津冀生态补偿模型探析[J].林业与生态科学,2019(1).
- [32] 孔伟,任亮,治丹丹,王淑佳.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基于生态资产的视角[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9(1).
- [33] 张岩峰,王翔宇,孔维昊.京津冀一体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途径[J].时代经贸,2019(1).
- [34] 黄华,申伟宁,袁硕.京津冀区域绿色发展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9(6).
- [35] 孔伟,任亮,王淑佳.多重战略机遇下京津冀绿道示范城市建设个案研究[J].生态经济,2019(2).
- [36] 郭雪慧,李秋成.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路径与对策[J].河北法学,2019(10).
- [37] 陈胜开,张云凤.基于京津冀生态协同视角的环保税现存问题与完善[J].现代商贸工业,2019(1).
- [38] 王凤丽,侯建华.完善风险化解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水平[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6-19.
- [39] 严晓萍.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下的精细化治理研究[J].经济论坛,2019(8).
- [40] 邓寒怡.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网络化”治理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9(17).
- [41] 葛玮钰,郝飞飞.社会多元协同治理的构建原则及其实现路径探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9(4).
- [42] 周保刚,马一超.新时代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认知与创新[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43] 耿永志.治理模式演进视角下的“服务型”社会治理伦理关系研究[J].江汉论坛,2019(1).
- [44] 杨蕾.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信访伦理的研究[J].河北企业,2019(11).
- [45] 赵卫卫,李媛媛.城市基层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领导科学论坛,2019(1).
- [46] 冷宣荣.更新治理理念提升治理水平[N].石家庄日报,2019-08-10.
- [47] 阎国文,阎若思.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J].廉政文化研究,2019(4).
- [48] 彭秀良,郭艳梅.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变迁[J].社会工作,2019(6).
- [49] 樊雅丽.新时代呼唤农村社会治理创新[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24.
- [50] 程瑞山,任明明.乡村“治理有效”的意蕴与考量[J].科学社会主义,2019(3).
- [51] 程瑞山,任明明.乡村治理何以有效?[N].社会科学报,2019-06-20.
- [52] 侯建华.补齐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短板[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24.
- [53] 王文录.构建乡村治理新秩序[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24.
- [54] 李冰.农村贫困治理:可行能力、内生动力与伦理支持[J].齐鲁学刊,2019(3).
- [55] 王敬,海莉娟,王明刚.农村资源分配方式、乡村治理模式与干群关系——熟人社会的“公私”逻辑变迁[J].南方农村,2019(4).
- [56] 胥英明,杨颜荣.贫困山区农村社会治理路径探究[J].山西农经,2019(24).
- [57] 韩梦娟,王英杰.农民上访与乡村善治的运作逻辑——以博弈论为视角[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3).
- [58] 田丽.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比较研究——以浙江象山和河北鹿泉乡村治理为例[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9(12).
- [59] 李宸坤,张杰.农村民间组织与乡村治理研究[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19(7).
- [60] 郭素霞.试析网络信息技术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作用路径[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12).
- [61] 张会爽,王志伟.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职能履行的问题与对策——以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大麻森乡为例[J].河北企业,2019(2).
- [62] 王晓端,王飞.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实现机制[J].决策探索(下),2019(4).
- [63] 王春城,杜建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创新[J].行政论坛,2019(3).
- [64] 周志刚,赵继春.行业协会公共属性在政府职能转变中的缺损现状及原因分析[J].人才资源开发,2019(7).

- [65] 周志刚,赵继春.行业协会公共性缺损治理及舆情对策研究[J].传播力研究,2019(3).
- [66] 王建强.政会分开改革背景下的行业协会人才建设问题研究[J].经济论坛,2019(9).
- [67] 踪程,何继新,陈立文.公共物品风险“脆弱性—韧性”共进治理新格局与建构策略[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68] 佟林杰,杨慧谦.我国公共服务质量助推机制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9).
- [69] 杨胜利,段世江,柴方园.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综合评价与分析——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J].人口与社会,2019(2).
- [70] 刘平,王晶,付一帆.河北省典型城市公共设施建设评价——基于石家庄、保定、唐山的实证研究[J].管理研究,2019(1).
- [71] 佟林杰,于杰.中等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研究——以石家庄市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19(24).
- [72] 刘邦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N].重庆商报,2019-06-21.
- [73] 田学斌,陈艺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特征分异和趋势[J].经济与管理,2019(6).
- [74] 刘丽敏,王依娜.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探析[J].经济论坛,2019(2).
- [75] 李素枝,于向辉,孙立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民生问题的对策研究[J].新西部,2019(14).
- [76] 王立源.夯实乡村治理的公共资源基础[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24.
- [77] 王金营,李庄园,谢秋实.公共服务全面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之固本大计[J].河北学刊,2019(3).
- [78] 苏炜.提升河北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方略[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9(9).
- [79] 郑萍.新型公共空间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24.
- [80] 孔俊婷,任家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河北省梁场村公共空间更新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9).
- [81] 王建祥,金剑,王倩,史皓冰.政府文化服务产出和生产率测算方法研究[J].统计与管理,2019(7).
- [82] 王彦林.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现存问题及其协同发展[J].社会科学论坛,2019(5).
- [83] 马岩,郑建明,王翠蛟.媒体融合视角下的智慧公共文化服务策略[J].图书馆论坛,2019(12).
- [84] 熊海峰,范周,柳鹏飞.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的“E-GSC-S”策略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9(11).
- [85] 刘潇,王虹.基层政府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治理研究[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9(9).
- [86] 岳丽娜,聂怀勇.集中连片特困区公共文化供需情况调查与分析——以华北理工大学定点扶贫地区为例[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87] 刘广明.新常态下推进农村文化消费的路径探索——基于强化政府干预的主张[J].长白学刊,2019(1).
- [88] 彭光明,邓楠,杨莉英.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89] 任亮,孔伟.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结构、特征及策略[J].河北学刊,2019(6).
- [90] 李燕凌,邵静祎,李亚宏.京津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现状调查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22).
- [91] 李燕凌,王潇华,孙永昌.协同共享视角下的京津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策研究[J].河北企业,2019(12).
- [92] 徐蕾.河北省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措施[J].中国市场,2019(20).
- [93] 赵晓冬,杨洋,张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边匹配决策模型[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11).
- [94] 刘彩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困境与优化策略[J].中国集体经济,2019(28).
- [95] 韩兆柱,邢蕊.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的网络治理模式研究[J].电子政务,2019(7).
- [96] 袁政,胡沛雨,冯筱琰.PPP 政策分析与期待[J].招标采购管理,2019(5).
- [97] 梁彦红,陈怀泽.PPP 项目中社会资本机会主义风险治理研究[J].经济论坛,2019(3).
- [98] 孙汉康.浅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资产证券化[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2).
- [99] 游朋轩.精准扶贫的正义性价值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视角[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5).
- [100] 王春城.公共政策客体层次论及其对政策绩效评估的规定[J].江苏社会科学,2019(1).
- [101] 崔元培,王建忠,薛庆林.新中国成立 70 年扶贫政策演变与设计[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9(4).
- [102] 段洪波,张洪硕.改革开放 40 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 [103] 李伟.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扶贫策略[J].科技经济导刊,2019(24).
- [104] 王春城,戴翊超.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公共政策供给[J].地方财政研究,2019(10).
- [105] 李百超,谢秋山.乡村振兴行动中的生存理念冲突:表现、负面影响及应对策略[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4).
- [106] 王宇.统筹扶志与扶智在精准扶贫中的关系[J].人民论坛,2019(20).
- [107] 宋凤轩,孙颖鹿.我国财政精准扶贫的问题与优化路径[J].甘肃社会科学,2019(6).
- [108] 蔡军.金融精准扶贫存在哪些问题[J].人民论坛,2019(18).
- [109] 白德全,王梦媛.合作社促进乡村振兴的困境与出路分析[J].理论探讨,2019(5).
- [110] 孔金平,黄郁婷.新时代社会组织在农村精准扶贫中的

- 作用——基于邢台市贫困地区的调查[J].鄂州大学学报,2019(2).
- [111]王文会,陈显中.精准扶贫下农村电商发展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20).
- [112]石翠仙,王文会.利用农村电子商务进行精准扶贫的策略思考[J].南方农业,2019(23).
- [113]赵金丽,王奕骅.乡贤群体在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时代价值及其实践路径[J].保定学院学报,2019(6).
- [114]段世江,张雪.燕山—太行山片区减贫与发展政策目标及实践路径[J].河北学刊,2019(6).
- [115]马正英.河北省农村精准脱贫实施机制优化研究[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9(9).
- [116]冯凤莲,郝阔,李宽.河北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与群众满意度调查[J].安徽农业科学,2019(9).
- [117]洪帅,田学斌.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支持述评[J].北方经贸,2019(7).
- [118]康振海.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机制[N].经济日报,2019-12-13.
- [119]柳天恩,田学斌.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成效与展望[J].中国流通经济,2019(11).
- [120]武义青.积极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共建共享[N].北京日报,2019-03-15.
- [121]田学斌,李桂,牛莉,孙文竹.京津冀协同创新文献综述[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9(2).
- [122]纪良纲.大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N].河北日报,2019-02-20.
- [123]梁丽英,黄志英,梁彦庆,史思琪.京津冀“五化”耦合协调时空分异及影响因子分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11).
- [124]李兴光,周海娟.京津冀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策略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9(25).
- [125]王春城,马学文.强化公共政策落实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N].河北经济日报,2019-01-26.
- [126]姜建华,郝胜杰.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技术创新实力评价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9(28).
- [127]李庆博,李子彪.京津冀区域技术转移网络结构与网络治理[J].科技管理研究,2019(3).
- [128]窦丽琛,孙文竹,程桂荣.京津冀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及协作路径[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4).
- [129]张晗,舒丹.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影响因素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9(3).
- [130]张晗,成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各城市产业承接能力研究[J].特区经济,2019(10).
- [131]韩兆柱,董震.基于整体性治理的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132]韩兆柱,邢蕊.基于整体性治理的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9(1).
- [133]黄华,谷雨,张强.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路径探析[J].河北企业,2019(12).
- [134]胡健,陶四海.新时代背景下的基层公务员考核评价[J].中国市场,2019(30).
- [135]白志华,郭文娟.“收”“放”耦合:以政府购买服务破解机构编制不足困境[J].领导科学,2019(6).
- [136]张向鸿.改革开放以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变革与创新[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9(4).
- [137]袁秀.努力提升干部队伍国家治理能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2-10.
- [138]张青卫,孙月琳.提升新时代领导干部科学发展本领的几点思考[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9(9).
- [139]贺立军,李悦.新时代领导干部政治能力提升路径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9).
- [140]曹海霞.党员领导干部需涵养“无我”境界[J].人民论坛,2019(25).
- [141]曹鸿飞.领导干部为何需要伦理素养[J].人民论坛,2019(22).
- [142]唐军书.青年领导干部应树立正确的权力观[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
- [143]王飞.利益激励在领导决策情景与领导公正感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基于领导干部测评的实证研究[J].领导科学,2019(18).
- [144]杨瑞.领导决策的太极之道[J].领导科学,2019(11).
- [145]郭亚军.从协商实践看领导干部战略思维能力的提升[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06).
- [146]孟莉.领导越轨行为的产生、影响与治理[J].领导科学,2019(6).
- [147]王东波.领导班子成员“顶牛”现象的负效应及其消解对策[J].领导科学,2019(23).
- [148]田丽,梁瑞英.党员领导干部党内法规执行力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某省领导干部为调查样本[J].领导科学,2019(14).
- [149]张磊.治理基层“慢性子”和“混日子”干部的“回炉锻造”机制探析[J].领导科学,2019(13).
- [150]杨晓星,张鹏.孔雀型领导“佛系心态”的成因与破解之道[J].领导科学,2019(9).
- [151]秦亚芹.领导工作内卷化的表现、危害及突破思路[J].领导科学,2019(20).
- [152]杨学新,刘洪升.雄安新区建置的历史沿革及其特征[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153]王丽.雄安新区建设中的政府责任与政府边界[J].甘肃社会科学,2019(2).
- [154]梁林,曾建丽,刘兵.雄安新区未来人口趋势预测及政策建议[J].当代经济管理,2019(7).
- [155]高志艳.“京津冀协同”下雄安新区急需高端创新人才目录编制与高层次人才集聚对策研究[J].福建茶叶,2019(8).
- [156]吴智育.雄安新区本籍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J].人力资源开发,2019(19).
- [157]田学斌,窦丽琛.大数据时代雄安新区人才发展的特性

- 及政策优化[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2).
- [158]刘兵,朱叶珊,梁林.雄安新区人才资源重构中多元治理主体识别及治理策略研究——基于微信公众号大数据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8).
- [159]王伟玲,王晶,尹静.我国电子政务产业发展对策研究[J].行政管理改革,2019(5).
- [160]吴明,于欢.“互联网+政务”打造智慧政府的新路径研究[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9(8).
- [161]孙曼曼.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管理的挑战与对策[J].时代农机,2019(4).
- [162]盖宏伟,刘红丹.政府数据治理制约因素与发展路径[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9).
- [163]韩兆柱,于均环.政府信息公开政策文本量化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十年间的政策文本为例[J].学习论坛,2019(7).
- [164]路瑞红.我国政府开放数据研究综述(2014—2018)[J].科技传播,2019(17).
- [165]刘邦凡,栗俊杰,陈朋伟.新时代我国“全媒体政府”之构建[J].重庆社会科学,2019(4).
- [166]蒋冰晶,李少军.包容与合作: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开放的行政法治理念[J].河北法学,2019(12).
- [167]白献阳,蔡昱,安小米.政府数据开放协同机制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图书馆,2019(9).
- [168]张慧双,周晨晓,冯雪梅.从“线下管控”到“线上治理”: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12).
- [169]夏一雪.基于舆情大数据的社会安全事件情报感知与应用研究[J].现代情报,2019(11).
- [170]夏一雪,王娟,何巍,张立红,兰月新.基于舆情大数据的突发事件负面情感引导“时度效”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9(5).
- [171]夏一雪.基于舆情大数据的网民情感“衰减—转移”模型与实证研究[J].情报杂志,2019(3).
- [172]陈志军.政治合法性视域下的公共舆情事件:解释框架与处置路径[J].邢台学院学报,2019(3).
- [173]朱晓霞,孟建芳,宋嘉欣.突发公共事件社会舆情治理选择——基于爆炸渗流理论[J].情报科学,2019(3).
- [174]史路遥,夏一雪,兰月新,张鹏,连芷萱.虚假新闻引爆原理与政府监管机制研究[J].情报杂志,2019(11).
- [175]牛文静,史雅楠.社会化媒体舆情传播的多元互动机制与协同治理[J].青年记者,2019(4).

体育学研究

常彦君

2019年河北省体育工作者从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方面对体育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体育人文社会学

(一) 体育文化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势头迅猛,据相关研究表明,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望达到65%~70%。然而,伴随着高速的城市化发展,大型体育赛事作为城市形象提升的战略工具之一,在逐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形象的发展也并非绝对完美。因为它将会给承办地带来诸如高昂的办赛成本、苛刻的赛事安保以及严重的交通压力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让很多的学者对大型体育赛事提出了质疑,更有一些城市迫于市民的压力,最终撤回了已经递交国际奥组委的申办报

告。李超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2022北京张家口冬奥会”这一双重契机背景下,重点选取河北省石家庄、张家口、邢台、衡水四个地市(四地市均有大型国际、国内赛事承办),来对大型体育赛事提升河北省城市形象发展策略这一命题展开研究,并指出河北省还应当积极开发当地高校教育资源,通过国内外院校学术交流和高端专业人才引进并举,努力提升大型体育赛事专业人才数量和质量。举办城市还应立足本地风土人情,提炼城市精神,寻找赛事与其关联点,形成独特的城市理念特色,从而最终实现赛事与城市形象的关联度提升。在赛事宣传渠道方面,可以借助手机自媒体等传播方式,开拓赛事宣传新渠道。^[1]

2019—2021年是张家口城市建设进程中的关键3年,既是进阶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时期,也是筹办冬奥会的决定性阶段。所以,全面了解市民公共文明现状,了解市民服务冬奥会的前期心理基础状况,既有助于为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

开展宣传引导和教育培训提供理论依据,也有助于为张家口市创城工作和冬奥会筹办工作提供智力支持。良好的市民公共行为文明素养是张家口成功举办 2022 冬奥会的重要保障。牛立蕊通过对张家口市民公共行为文明素养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城市公共文明建设成效初显,但市民公共行为文明素养整体层次还不高;市民公共文明素养各领域发展不平衡,传统文明素养表现优于现代公民素养;市民个体间公共行为文明水平参差不齐。为了提升当前张家口市民公共行为文明素养,建议从教育中提升、管理中约束和环境熏陶 3 方面入手。探索创新教育宣传形式,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全方位市民教育体系;规范完善制度规章设计,强化政府主导多渠道约束的管理机制;挖掘弘扬优良城市精神,营造市民积极参与的社会环境氛围。^[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弘扬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然而,近年来,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体育文化在西方意识不断渗透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其保护与传承的现状不容乐观,正面临着萎缩甚至消亡的危险。河北如何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政策来保护与传承民俗体育文化,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发展已成为国家的需要和必然的文化诉求。董立叔等对河北省民俗体育文化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究河北省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现状。得出生存环境的改变、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传承人的断层和宣传的力度不够等是河北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面临的主要困境。提出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确证民俗体育文化的时代价值、加强规划与管理、建立传承评价体系、开发民俗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等发展对策。^[3]

体育美学中身体美、运动美、人文美等这些美都是无处不伴随着体育运动存在的,我们从体育运动中发现这些美并欣赏这些美,从这些体育之美中我们感受到身体美中的健康美、姿态美、形体美、肌肉美,从运动美中我们感受到竞技美、技术美、器材美、游乐美、动作美;还有从人文美中感受到礼仪美、气质美、友情美、意志美。这些存在于体育运动中的体育美,在无形中

影响着我们的行为,看到运动员的身体美我们就想着如何地锻炼成他们的线条,达到身体美。运动场上当自己的国人拿到冠军的时候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更让我们感受到民族的凝聚力。王鹏举指出,体育美学中的自然美和社会美还有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美,经过了历史的洗礼是我们一生都无法学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经过历史的沉淀和新时代洗礼,融入我国特有的民族风味的体育美和精神,正符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 求。深入体育美育教育加快体育事业发展,使我们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

(二) 体育政策法规研究

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代表团在残奥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成绩背后,武巧玲指出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在我国残疾人体育基础薄弱且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成为我国残疾人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优先考虑的问题。在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背景下,从资源配置角度对我国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发展策略。

目前,我国的残疾人竞技体育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项目发展参差不齐、管理机构运行效率低、训练条件差、运动设施数量缺乏、训练器材老旧、体育师资短缺、激励机制僵化等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级残联、教育、卫生、民政、劳动保障、司法、文化、体育等社会管理部门和公共服务机构的共同参与。这就需要他们重视残疾人竞技体育的需求,为残疾人竞技体育创造公平、良好的资源环境。^[5]

2022 年冬奥会不仅能够提高中国雪上项目竞技水平,还能促进大众滑雪健身供给侧改革,普及大众滑雪健身,提升全民体质,推动中国大众冰雪运动持续健康发展。张家口崇礼拥有雪上娱乐健身的独特地理环境,近年来,随着大众滑雪健身需求的不断增长,崇礼滑雪场在服务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雪道设计不合理、运行设施设备陈旧、教练队伍素质不高、游客安全得不到保障、游客滑雪消费较高、冰雪文化落后和高端器材供给不足等,这势必影响张家口雪场的健康发展和阻碍大众滑雪健身的开展。

当前,张家口尚未形成大众滑雪健身气氛与热潮。王艳兵分析了影响张家口大众滑雪健身因素,提出张家口大众滑雪健身供给侧改革路径:通过区域产业合作和综合性度假区发展,促进大众滑雪健身发展;政府扶持,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推广与普及多样性健身项目,引导基层滑雪人群积极参与;打造滑雪文化,营造大众滑雪健身的气氛;提供良好的物质和政策保障,推动大众滑雪健身的升级。形成由政府、协会、社会、市场和企业等主体共同参与的多中心供给模式。^[6]

张家口作为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地之一,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巨大市场预期下,构建冰雪城市的蓝图已初具规模,但冰雪人才的匮乏仍是制约张家口冰雪运动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王莹指出了张家口目前在冬奥会筹办期间对冰雪人才的需求,针对冰雪人才匮乏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冰雪运动发展氛围缺失、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配套措施保障力度不足。建议大力弘扬冰雪文化普及冰雪运动,创新培养模式多路径培养竞技体育人才,在制度、人、财、物等方面完善保障措施,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冰雪运动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着大众的运动方式与价值观念,随着冰雪产业驶入快车道,我们在人才培养、设施建设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要想实现弯道超车,必须要加快解决冰雪人才瓶颈,从制度方面入手,加大投入,完善配套保障措施,切实解决人才匮乏的痛点,满足冰雪经济新常态下对人才的需求。^[7]

张建会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对 1994—2018 年七届冬奥会奖牌榜排名前 6 的竞技运动强国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德国、挪威、美国、奥地利、加拿大、俄罗斯 6 国位列冬奥会奖牌榜第一集团,其发展经验主要包括国家运动项目协会统领项目在全国的发展、非常重视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发展、构建了完备的“金字塔”式赛事体系、形成了健康可持续的运动员培养路径、注重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等,对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历史、文化特征,这也就直接决定了每一个国家体育的成功经验都具有其独特性,显示了其国家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优越性。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应创新项目协会管理方式,优

化项目发展环境;注重项目体系顶层设计,谋划项目科学发展;坚持多策并举,扎实推进运动员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与体育融合,助力冬奥备战;注重厚植冰雪运动项目文化,夯实项目发展的文化根基。2022 北京冬奥会的关键节点,全面而系统的把握冬季运动项目成长的本土环境和资源禀赋条件,针对性的借鉴相关冬奥会竞技强国的有关经验和做法,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冰雪发展道路,从而避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路径锁定困境。^[8]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格权和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实现了市场化和商业化。一些知名运动员的人格标识,如姓名、肖像、声音、形象等逐渐具有了资信价值,能够对消费者产生一定吸引力,对产品的销售、宣传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随着个人人格标识经济效益的增加,行为未经许可利用他人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化行为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如 1996 年王军霞诉昆明卷烟厂、2006 年易建联诉“易建联体育用品(中国)有限公司”以及 2016 年刘翔状告“滴滴出行”等等。因此,有必要对运动员人格权的法律保护现状进行研究,寻找其中的缺陷和不足,加强立法完善,保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

杜梦瑶指出,运动员人格标识的商业化特征日益明显,侵权行为也逐渐增多,存在未经许可使用、超出约定范围使用、合同到期还仍无偿使用等侵权行为。而立法层面,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人格权商品化法律,其保护条款主要分散于《民法基本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侵权责任法》《广告法》等相关法律以及社会行业行为守则中,且存在较大的滞后性,如保护范围狭窄、损害赔偿方式不明确、没有规定继承和转让等。在司法实践方面,法院对人格权商品化性质的认定模糊不清,对人格权商品化侵权行为的认定缺乏明确的依据,也没有统一的赔偿和判决标准。为更好保护运动员的人格权,可借鉴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的相关法律制度框架,完善与人格权相关的民事法律,健全《侵权责任法》救济途径,建立多元化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体育仲裁制度。^[9]

(三) 大众体育与健康研究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

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我们的先辈创编了很多有价值的健身养生功法,形成了一系列保健养生、调节内外身心平衡的技术与理论,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何将这些功法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并运用于医学临床为运动康复服务,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中提出:“推广太极拳、健身气功、导引等中医传统养生文化,开展药膳食疗。”尚宁宁等力求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生功法及其文化,充分挖掘其健身机理与健身价值,并积极探索其推广方式与途径,以期发挥传统养生功法在疾病防治和健康促进方面的作用。并同时指出,传统养生功法是最佳的绿色疗法之一,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与我国人口众多医疗资料缺乏的基本国情。传统的养生功法中既有便于推广与普及的内容,又有难于常人所接受的部分,符合现代人基本要求,基于运动康复理念的传统养生功法的梳理迫在眉睫。现代运动处方的研制一般基于西医学基础,而很多传统养生功法难于以西医理论解释,需建立在中医学的基础上研制针对性强的传统养生功法运动处方。^[10]

6—12岁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在这个阶段进行体育项目的培训对孩子终身体育是有重要影响的,这个阶段孩子的发展有一个运动敏感期,孩子们接触运动项目多,也学的快,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对孩子身体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子颀通过对邢台市6—12岁少儿参加校外体育培训的现状分析,了解其参加校外体育培训现状及特点,找出影响其参加校外体育培训的因素,进而对6—12岁少儿的身心发展产生积极地影响。校外体育培训作为新兴起的培训机构已被大多数家长所承认,成为学校体育课程的有益补充。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进行过校外的体育培训。主要培训机构为:教育培训机构、个人培训班、青少年宫、专业体校、健身俱乐部等。培训项目以篮球、足球、乒乓球、跆拳道、游泳为主,运动项目丰富多样化。家长对文化课学习的重视影响到少儿体育锻炼的参与。建议家长更新教育理念的,主管部门应加强体育培训机构的管理,使邢台市少儿在更好的环境中锻炼

学习。^[11]

(四) 体育经济学研究

服务质量是商业健身俱乐部生存之本。然而,我国商业健身俱乐部服务质量却饱受诟病。因此,探究健身服务质量形成模式,揭示模式构成要素,剖析健身服务质量形成过程及内在规律,对于提升我国商业健身俱乐部服务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薄雪松等认为,基于商业健身俱乐部服务行为的服务质量形成模式包括服务期望调查、服务规范设计、健身服务提供和服务内容传播4个要素;模式要素结构合理,要素之间具有高度显著性正相关关系;模式各要素与服务质量高度正相关,且具有显著的多元回归线性关系;模式要素对服务质量的形成各有作用,但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管理者要深刻理解模式的意义与内涵,从服务期望调查、服务规范设计、健身服务提供和服务内容传播4类服务行为入手,提高服务行为质量,确保高水平健身服务质量形成。^[12]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完善健身体闲服务体系,促进产业互动融合,大力发展体育旅游。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李燕等从全产业链的视角研究京津冀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明确京津冀体育旅游全产业链的内涵,分析京津冀体育旅游发展的现状,从空间链、供需链和产业链3个维度构建京津冀体育旅游协同发展并产生规模效益的路径。并提出政策协同——京津冀体育旅游规划和服务质量标准的出台,资源统筹——人、财、物统筹配置,市场对接——产业协同、供需对接。京津冀3地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深度协调,制定京津冀体育旅游行业服务质量标准。加大对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扶持力度,壮大京津冀体育旅游供给主体,促进体育消费升级;加强京津冀体育产业、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培育京津冀体育旅游市场,拓展京津冀体育旅游发展的新空间。加强京津冀智慧体育旅游建设,创新体育旅游商品销售方式。加强京津冀体育旅游社会团体建设和人才培养,以创新推进京津冀体育旅游发展^[13]。

根据相关统计,体育产业及相关领域产业增加值以年平均22.6%的速度增长,海洋体育产业是体育产业的一项重要组成元素。海洋体育产

业已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 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形成了一定规模和独具海洋特色的体育产业。许鹏展等立足于秦皇岛海洋体育产业的发展, 分析了秦皇岛海洋体育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 为秦皇岛海洋体育产业发展提出建议。秦皇岛便利的交通条件, 浓郁的文人环境, 丰富的海洋体育资源, 为秦皇岛海洋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海洋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上比较缺乏, 不能够满足现代海洋体育发展的需要, 应加大海洋场地设施的建设。建立秦皇岛特色海洋体育, 避免沿海相关地域的雷同建设无序竞争。政府相关部门继续加大海洋体育的宣传, 树立品牌赛事来带动海洋体育产业发展。充分挖掘海洋文化内涵, 加大海洋体育专门人才教育培养, 利用“互联网+海洋体育+滨海旅游”的发展平台策略, 带动秦皇岛海洋体育产业活力发展。^[14]

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国体育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当结合冬季奥运会的举办进行相应地调整, 充分发挥冬季奥运会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带动与辐射作用, 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安宁等指出, 在冬奥会的举办下我国体育产业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做出结构调整。积极实施“北冰南展”战略, 结合我国地理环境的特点而提出的体育项目发展战略, 能够为冰雪运动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人力支持、物力支持与财力支持。深化“体教结合”的培养模式, 提升我国冰雪运动的专业化程度, 有效加强冰雪运动的人才培养方式。以冬奥会为契机, 优化我国的冰雪产业, 积极探索冬季体育运动产业的发展模式。^[15]

2022年冬奥会带给河北省全域旅游和体育产业难得的推动助力和发展良机。但在拥抱发展机遇的同时, 还需要冷静分析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积极探索冰雪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如何将冬奥的效应延续下去并成为推动河北白色经济的持续动力, 如何在冬奥的驱动下将河北冰雪业发展模式形成我国冰雪产业发展的典范? 王春雷等指出, 在我国冰雪项目仍属于相对小众的休闲运动项目, 如果没有强大的消费人群支持, 继续吸引资本的投入, 以及经营不能创新, 也将会面临“后奥运陷阱”的威胁。这也是我们坚定的推动“三亿人上冰雪”的重要考虑。冰雪产业投资巨

大, 且回报缓慢, 但在冬奥过后, 能否保持冰雪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资本的良性运行至关重要。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 当居民平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时, 体育休闲娱乐消费将全面爆发。但中国的国情是, 真正的冰雪消费潜在群体集中于青少年, 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青年群体的婚姻、购房支出已经透支了冰雪消费的潜力。目前, 冰雪消费群体的培育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冰雪文化对于京津冀区域内居民而言, 相对比较薄弱。在广大群众尚未接受冰雪休闲运动理念、乐于在闲暇时间进行冰雪休闲消费, 这种表面上的冰雪文化是一种虚假繁荣。面对这些问题, 河北省冰雪产业优化发展应遵从以下几点建议: 加强宏观调控, 合理布局冰雪场馆建设, 形成集约效应; 加大监控力度, 杜绝资本潮汐带来的硬冲击; 加快培育消费群体, 用消费带动冰雪产业的供给; 加强冰雪文化推广, 用深入人心的文化发掘冰雪参与需求; 根据季节变化, 做好非冰雪季产品设计与开发;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由粗放式培训向精细化培育转变; 提升冰雪产业从业人员的整体服务质量。^[16]

蔡志强等指出, 在我国崇礼体育休闲旅游发展的基础上, 需要在低碳奥运的背景下实施全面发展。其核心内容主要是对体育休闲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此外, 在低碳环保理念背景下, 需要对崇礼体育休闲旅游开发形式进行全面创新, 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低碳体系结构实施有效构建, 使崇礼体育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向体育休闲游戏方向较好发展。低碳奥运背景下, 崇礼体育休闲旅游的持续发展, 不但能够使我国滑雪度假产业获得较快发展, 而且在较大程度上对崇礼整个休闲产业的优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17]

二、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

(一) 体育教学与改革研究

高校体育教学中最基础的就是田径教学, 而体能训练又是田径教学的基本内容, 通过定期进行体能训练可以提高学生的爆发力和反应能力, 增强学生的速度感知和意志力。但目前田径教学体能训练受思想意识、教师水平、教学方式、学生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 因此, 提高高校田径教学体能训练水平至关重要。郭林昊指出, 高校田径器械体能训练还处于摸索时期, 我国高校要重

视田径教学的开展,重视学生的体能训练指导,创新教学方法和内容,构建科学的保障机制,以训练学生的集体灵敏度、速度、爆发力等为主要目标,挖掘学生的实力,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提升,同时也为培养专业田径人才寻找科学的路径。^[18]

权超颖等指出,海洋强国战略离不开海洋人才,通过海洋休闲体育教育,使学生逐步形成“认识海洋、面向海洋、重视海洋”的海洋意识,树立“开放性、兼容性、开拓性、进取性”的海洋价值观,培养学生立志从事于海洋事业的远大理想,为社会培养海洋新型人才打好基础。由于我国海洋休闲体育发展较晚,海洋休闲体育专业人才缺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加强海洋休闲体育课程体系构建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势在必行。海洋休闲体育根据区域的不同大体上分为海空运动、海上运动、海底运动、沙滩运动、海岛运动5大类。依托学校现有的体育教学条件、教学场地、师资配备,依靠社会各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配合的基础上开设海洋休闲体育课程。海洋体育课程的满意度(包括技术、愉悦感、身心放松、时间安排)是学生们对海洋休闲体育课程参与度的最根本条件。其次,要对学生身体状况严格要求,修中级课程、困难课程的学生需提前进行体检。在不久的将来,海洋休闲体育将成为一门新兴、系统化的学科体系,为新一代海洋人才的培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加强体医结合、科学健身是促进慢性病预防与康复的重要手段。基于此,如何以能力培养为目标,设置运动康复专业课程教授内容,培养学生体育、康复、医学相结合的能力,成为教学改革中的重难点内容。张英媛等指出,“创伤急救学”是临床学科,理论性较高,技术性较强。在创伤急救学实践教学中,教师应该以能力提升为目标,打破原有学科体系,进行教学模块重设,革新教学内容。具体教学中,教师要讲解急救基本组织与设备、常用急救措施、创作内脏并发症等内容,还要细致分析、讲解颅脑、脊髓、胸部、腹部等内脏损伤。另外,由于该门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通过操作练习使学生能较为系统地、全面地掌握创伤急救学的基本技能,使学生具有在上级执业医师指导下正确

处理常见、多发的创伤急症的能力。能力本位教育对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创伤急救学”课程是运动康复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能够结合素质教育的特征及学生未来的职业能力发展要求,进行课程教学内容的选取及教学方法的确定,同时教学中教师要充分重视评价机制对于人才培养效果的意义。^[20]

体育课堂教学强调师生、生生间的行为互动和心理互动,关注和尊重学生的学习情感、个体差异。通过建立良好的互动协作、交流机制,更新体育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加快推进体育教学变革和互动方式创新,对于全面培养学生个性、突破传统单一线性(自上而下)体育知识信息传递和传统体育课堂教学思维、激发学生主动参与体育课堂学习、提高体育课堂教学效率均有着重要意义。体育课堂互动教学发起了向传统以教师为中心课程模式的挑战,确立学生为课堂教学中心的角色地位,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课堂话语权,不断改进体育课堂教学策略和教学艺术。尹海从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角度分析体育课堂互动教学的表现形式,阐述体育课堂互动教学中的误区主要表现为:互动形式局限于“刻板印象”,缺乏积极情感渗透;单一的互动形式不能满足学生的个体差异需求;体育教师的互动话语权权威压制了学生的个性成长;互动意识培养的缺陷。体育课堂互动教学的实施对策:应把互动效果纳入体育教学评价体系;转变体育教学观念,提高师生互动意识;创设多样的互动形式,提高体育课堂互动效率。^[21]

在现代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体育思想、行为和动机的差异性决定了学生差异性的体育需求,这也就有学者提出体育之差异化教学法、分层教学法、多样化学习模式等等,最大限度满足学生自我需求,从而赋予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体育学习内容的权利,这无形当中也就增加了教学组织过程管理的难度,以致在新课程标准实施背景下,体育课程改革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教学过程的组织混乱,教师不了解教学组织管理的方法和技巧,或者教师不愿意投入过多的精力去钻研课程组织管理相关理论,亦或教师对学生心理的把握不准确,增加了教学过程控制的难度。曹英、尹海指出,要转变思维,使教学过

程由教师“他组织”向学生“自组织”转变,这是一种创新性理论思维,也是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一次探索尝试。自组织控制强调系统内部要素的信息交互,实现组织内部的有序发展,这一理论与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相当契合,体现着教育主体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培育,彰显学校体育改革的时代诉求与强势回声。^[22]

运动康复是由于人们对健康保健的需求急剧增加而催生的新专业。《瑜伽与保健》作为运动康复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课程体系建设应以满足运动康复专业人才需求为前提,实现运动康复专业传统中医学技术与传统体育项目的结合。《瑜伽与保健》作为一个新兴的专业课程要实现以能力为本位,培养具有创新人才的目标,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能力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改变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学成果的唯一标准。尚宁宁等以能力本位为价值取向,根据社会对体育保健专业人才的要求,以及运动康复专业的特点,在分析了解当前《瑜伽与保健》课程教学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瑜伽项目的特点,对《瑜伽与保健》课程教学模式中的课程标准、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及考核环节等进行改革。强化专业基础,拓宽专业口径,重视社会实践等多层次的发展。通过基于能力本位为导向《瑜伽与保健》课程改革的研究建立课程标准,明确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加强硬件设施的配备,优化评价体系,深化教学改革,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瑜伽技能、自学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灵活运用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23]

目前高校在开设足球课程时多以足球选修或称为普修为主,还有一些体育院校把足球作为专选课,在报名足球的学生中有的有一些基础,有的一点基础没有,有的甚至就没有接触过只是由于好奇或其他原因才选,所以我们在制定教学大纲时要针对的教学对象的起点一定要明确,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刘珊等指出:学生缺乏对足球的正确认识;教师教学模式传统单一,缺少对教师的激励制度;足球课程教学硬件不足;足球课程考核标准的制定忽略学生的个体差异化。高校足球课程改革应从观念上加强学生对足球运动价值的正确认识;改革传统单

一的教学模式,增加体育专业足球专业课时,改变教学方法和手段,增开大学高年级体育课;增加足球课程教学硬件建设;考核应多元化。^[24]

(二) 运动训练学研究

网球运动可以有效调动全身的肌肉,可以促进学生体魄变得健康,更会让学生变的更加爱好运动。在网球的学习中,大学生必须要注意步法练习,这是想要学好网球的必经之路。为此,孙玉龙等从步法训练在高等院校网球教学中的应用来论述网球教学。网球是一个需要全身协调的运动,对大学生的上、下半身的要求都很高,对大学生的反应速度、移动速度和体力的要求都极高。所以,高校教师在上课的时候,要注意对大学生进行步法训练,这对于高校网球教学的发展来说有极大的益处,也会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25]

跨栏步和栏间跑技术是跨栏跑技术教学中的重点,跨栏步技术的好坏决定了跨越栏架速度的快慢,同时也为快速栏间跑奠定节奏基础。

跨栏步由起跨攻栏、腾空过栏和下栏着地3个环节构成,是教学过程中学生较难掌握的技术,学生因担心动作不到位出现摔跤等伤害情况而产生恐栏心理。为了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合理的跨栏步技术,防止伤害事故发生,克服恐栏心理,崔冬雪等设计了滑马过栏的教学手段来提高学生掌握跨栏步技术的效果。在起跨攻栏部分,遵循摆动腿与其异侧臂在人体额状轴的动量,为获得合理的抛物线轨迹降低人体在栏上的腾空高度并保持良好的水平速度,设计了起跨攻马练习。马上骑坐是针对跨栏步腾空过栏技术而设计的。起跨攻马通过起跨腿的蹬伸推送人体沿跳马的短轴向前滑行,在跳马上充分体会人体在起跨攻栏后的空中本体感觉,在遵循起跨腿与其同侧臂绕人体垂直轴及躯干与摆动腿在额状轴上的动量守恒及摆动腿的下压和起跨腿提拉过栏的时机、幅度及动作连续性要求的基础上,设计了支撑下马练习,以解决空中动力来源问题。为了达到实际跨栏跑的效果,在前三步的分解教学之后设计了完整技术滑马过栏练习,以此形成无差别的跨栏步技术。滑马过栏能有效提高学生掌握跨栏步技术的动作质量,缩短教学时间,是一种实效性强的跨栏步教学手段。^[26]

白柳珉根据自身实践的经验和体会,对锁舞

表现力、锁舞音乐表现和锁舞服装表现进行了研究。锁舞的表现力特点很适合在街舞啦啦队比赛时展示出来,符合了街舞啦啦操需要的视觉冲击力和动态表演,提升了展示效果。应巧用锁舞的特点,做出主题明显、风格诙谐幽默的舞台效果,让观众在欣赏舞蹈的同时也看到了一场有内涵的舞台表演。锁舞使用的音乐从速度和风格都是很适合放在啦啦队里使用的,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产生共鸣,更适合队员们在舞台上幽默滑稽的表现来感染观众。锁舞服装在街舞啦啦队中出现会让队伍看起来很精神,很有主题的带入性,更能体现出团队精神,因此每个参赛队伍应符合队伍风格的比赛服装,让队伍具有整齐靓丽、鲜明的时尚感。^[27]

三、运动人体科学研究

目前竞技体育领域运动员广泛使用各种补剂,科学合法的补剂应用确实对促进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表现起到很大的作用。茶是天然甲基黄嘌呤含量最高的咖啡因的主要膳食来源,科学有效的利用不同“茶饮补剂”可以起到加快脂肪代谢、节省机体糖元、提高耐力训练水平、促进身体恢复等功能。但是不同“茶补剂”的功效各不相同。夏洪涛根据我国茶叶的主要品种分类再结合本人多年的带队经验,通过不同训练时机、不同任务、不同环境,结合不同品种的茶饮功效特点,探究如何通过茶饮补剂改善竞技水平、提高竞技能力。黑茶:全发酵茶,性温。适合冬训以及每年三月份开春乍暖还寒的月份,在大量高强度训练后,可以有效补充体内矿物质。青茶(乌龙茶):半发酵茶(半发酵的绿茶),性平。运动员适合夏训期间饮用,配以果糖(冰糖或者蜂蜜)生津消渴,促进恢复,降低疲劳感。绿茶:不发酵茶,性寒。绿茶富含茶多酚,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合运动员在调整阶段或赛后恢复阶段少量饮用,有效缓解肌体乳酸的延迟性吸收带来的肌肉僵硬,但绿茶易引起肠胃不适,尤其不建议赛前饮用。红茶:发酵茶(发酵的绿茶),性温。红茶适合高校运动员冬季饮用,适当饮用红茶可以驱寒暖身,增强心血管供能系统。普通女生,生理期用红枣泡红茶服用可以有效缓解疼痛。花茶:百合花药性偏凉,具有安心、益肺止咳、治疗失眠多梦等功效,适宜运动

员夏季服用。绞股蓝茶:绞股蓝性寒,能调节大脑皮质兴奋和抑制反应的平衡,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双向调节作用,连续服用2至3天后,体力充沛,不易疲劳,同时具有镇静、催眠、抗紧张等功效。脾肾肠胃虚弱者不宜饮用。此两类茶适合运动训练疲劳期出现后在每次训练完服用,避免睡前服用。药茶:在赛前集训期内系统性饮用五味子茶可以有效提升运动员的抗疲劳能力。同时在冬训大运动量期间长期坚持“香附茶饮”(发酵茶6克+香附1.5克)理气护肝,促进运动员气血通畅,能有效延缓长期运动疲劳的发生。^[28]

肥胖者经常伴有胰岛素抵抗与脂代谢紊乱,这是引起各种心血管疾病的病理学基础。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FGF-21)是近年新发现的一种细胞因子,其主要由肝脏及脂肪组织分泌,属于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FGF-21主要的生理功能是通过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发挥信号传导作用,从而参与对机体糖脂代谢的调控,并有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虽然药理学研究显示FGF-21可有效降低肥胖及糖尿病动物的血糖及胰岛素水平、改善代谢紊乱、减少脂肪含量,但很多研究却发现肥胖者血浆FGF-21水平相对于正常个体明显增加,且与肥胖度、胰岛素抵抗指数及甘油三酯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提示肥胖者可能存在FGF-21抵抗。通过增加身体活动水平减少体脂、改善糖脂代谢被认为是降低肥胖者心血管疾病及代谢综合征风险的有效策略。有研究发现健康非肥胖者血浆FGF-21水平与身体活动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规律运动也具有提高FGF-21水平的重要作用。最近的研究还发现急性运动可以通过增加健康者血浆FGF-21水平促进其脂肪分解,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运动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产生的急性效应,有研究表明一次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使肥胖者胰岛素敏感性提高数小时,急性运动也可对肥胖者脂肪代谢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急性运动是否能够对肥胖FGF-21表达与分泌存在影响,以及FGF-21是否参与了急性运动调节肥胖者糖脂代谢的过程,目前尚未见报道。李曙刚等指出,肥胖男性青年存在一定程度的FGF-21抵抗,其血浆FGF-21对急性运动的反应较非肥胖者降低。此外,FGF-21水平的增加可能介导了急性运动调节非肥胖者糖脂代谢的过

程,运动诱导的 FGF-2 水平增加可能不会对肥胖男性青年胰岛素敏感性产生明显影响,但是有助于增加其脂肪分解速率从而有利于改善其体成分,减轻肥胖程度。^[29]

香菇中提取出重要的生物活性物质香菇多糖,其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力、促进肠胃消化和恢复等功能。长期摄入含有香菇多糖成分的食物,可以稳定肠道消化功能,提高身体免疫能力。高强度运动对胃肠道产生强烈的应激刺激,使得肠胃正常生理功能受损,胃肠道中菌落结构遭到破坏,最终会因为胃粘膜功能的损伤和调节失衡引发运动型肠胃综合症,使得肠胃功能紊乱。保证运动员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丰度,成为防治运动性胃肠综合征的新方法。孔宁宁等根据益生菌和香菇多糖对肠道微生态的改善作用,设计开发出一种香菇益生菌复合咀嚼片,实验表明有效促进了运动员的肠道蠕动,改善了消化功能,达到了轻微减重的功能,并提升了肠道的免疫调节功能,改善肠道菌落种类和数量具有非常显著性效果,能够预防肠道疾病的产生。^[30]

四、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

据 1985 年挖掘整理的《河北省武术拳械录》记载,河北区域内流传的有 70 余种拳种,其中 50 多个起源于河北当地。在河北地区流传的典型拳种有很多,如:太极拳、八极拳、戳脚、翻子拳、形意拳、通背拳、劈挂拳、鹰爪拳、八卦掌、六合拳、梅花拳、燕青拳、太祖拳、唐拳、清八仙拳、短拳等。武术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结晶,通过教育将其传承与发展愈显重要。特别是高校武术专业的学生,将来是武术传承发展的主力军,对于他们的培养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宁、武显治对河北师范大学武术专业学生的传统武术课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教学内容,师资匹配,成绩评定等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并针对当前情况提出:合理选择安排教学内容,增强师资力量,改善考核方式三条建议。^[31]

邢台历史悠久,是仰韶文化发源地之一,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武术项目。邢台梅花拳作为中国传统武术流派之一,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 年由邢台平乡县和广宗县联

合申报获批为国家级和省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梅花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动作朴实大方,不仅有健身和观赏价值,还具有技击的实战功能。邢台梅花拳主要流传于冀南邢台市的广宗、平乡和威县一带,又以广宗、平乡两县为主,在经历了数代传承人的努力下,梅花拳的社会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董立叔等运用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等方法对邢台梅花拳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邢台梅花拳起源、特征、传承方式和价值等。得出邢台梅花拳最早源于武术大家邹宏义;具有传统性、竞技性和文化性等特征;传承方式主要以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为主,以一徒多师为主要特点;主要承载着文化传承、健身健心和历史重现等价值。^[32]

(常彦君:廊坊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李超,吴志敏,付贵阳.大型体育赛事对河北省城市形象影响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9(3).
- [2]牛立蕊,屈建萍,尹长君.冬奥会背景下张家口市民公共行为文明素养提升路径研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3]董立叔,陈梦,王海军.京津冀协同的河北省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J].体育世界(学术版),2019(4).
- [4]王鹏举.体育美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19(6).
- [5]武巧玲.残奥会竞技项目与我国残疾人体育资源配置策略研究[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6).
- [6]王艳兵,王文霞,左建玲,孙玉龙.冬奥背景下大众滑雪健身供给侧改革路径研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7]王莹,秦树文,李颖.冬奥会背景下张家口冰雪人才需求及队伍建设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5).
- [8]张建会.冬奥会竞技强国冰雪项目发展经验与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2019(2).
- [9]杜梦瑶,刘希佳,李小溪.运动员人格权商品化的法律保护研究[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9(5).
- [10]尚宁宁,王海军,武琳娜,许朋展,李琼.传统养生功法践行之路[J].体育世界(学术版),2019(3).
- [11]王子颀,史挺尉,格旭.邢台市 6—12 岁少儿参加校外体育培训的现状研究[J].智库时代,2019(12).
- [12]薄雪松,韩芳.基于商业健身俱乐部服务行为的服务质量形成模式研究[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9(9).
- [13]李燕,骆秉全.京津冀体育旅游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路径及措施[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9(7).
- [14]许朋展,李立波,尚宁宁,王玉扩,常丽超,权超颖.秦皇岛海洋体育产业发展 SWOT 分析[J].当代体育科技,

2019(10).

- [15] 安宁,李朝霞,李涛.冬季奥运会体育产业发展的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9(6).
- [16] 王春雷,杨建丰,白华.机遇与挑战——冬奥风口下河北冰雪产业发展的冷思考[J].邢台学院学报,2019(6).
- [17] 蔡志强,张文亮,刘志国,刘志群.基于低碳奥运背景的崇礼体育休闲旅游发展探究[J].体育世界(学术版),2019(5).
- [18] 郭林昊.高校体育田径教学中体能训练的重要性及对策[J].当代体育科技,2019(9).
- [19] 权超颖,尚宁宁,康健,许朋展.海洋强国背景下海洋休闲体育课程体系构建研究[J].体育世界(学术版),2019(3).
- [20] 张英媛,康健,李伟光,杨建伟,支子.基于能力本位的“创伤急救学”实践教学研究[J].高等教育,2019(2).
- [21] 尹海.体育课堂互动教学中的误区及对策[J].教学管理,2019(2).
- [22] 曹英,尹海.学校体育教学自组织控制理论与改革尝试[J].教学管理,2019(9).
- [23] 尚宁宁,潘佳彬,李海玉,蔡志敏.以能力本位为导向《瑜伽与保健》课程改革的研究[J].科技资讯,2019

(10).

- [24] 刘珊,殷理卡,刘振磊.大学足球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J].邢台学院学报,2019(6).
- [25] 孙玉龙,赵倩,左建玲.步法训练在高校网球教学中的应用[J].体育世界(学术版),2019(4).
- [26] 崔冬雪,崔现飞,芦小伟.滑马过栏——跨栏步教学效果的实证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5).
- [27] 白柳珉.浅析锁舞表现力在街舞啦啦队竞技成套展示中的作用[J].科技资讯,2019(11).
- [28] 夏洪涛.普通高校竞技体育中不同“茶饮补剂”的应用研究[J].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
- [29] 李曙刚,李娟,尚宁宁.青年男性肥胖者急性有氧运动后血浆 FGF-21 及糖脂代谢的动态变化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9(1).
- [30] 孔宁宁,杨勇,姜慧涛.香菇多糖益生菌咀嚼片对高强度运动人群肠道的促进功能[J].中国食用菌,2019(9).
- [31] 张宁,武显治.传统武术在高等教育中发展研究[J].武术研究,2019(12).
- [32] 董立叔,王海军.邢台梅花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与价值研究[J].科技资讯,2019(5).

河北专题研究

河北经济建设研究

高智 吴谏

2019年,河北省经济理论及政策研究者紧跟经济发展形势变化和区域经济转型需求,紧跟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全省重大战略部署,在经济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众多在研究思路上有创新、在研究方法上有突破、在研究内容上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对策思路,为促进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经济转型

(一) 高质量发展

颜廷标认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依托创新提升实体经济应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在融合创新、混合创新中发挥出创新的最大效应;二是打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形成依靠创新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的

合力;三是构建有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四是搭建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和载体,聚集各类创新资源破解河北省产业技术难题。^[1]

姚胜菊、连智涌认为,全方位实现河北省高质量发展必将成为全省“十四五”时期的最核心发展取向。因此,一是要紧紧抓住观念更新,着力明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二是要紧紧抓好整体推进,在顶层设计上尽心智,合力谋划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体系;三是要紧紧抓牢重点突破,在提升行动上较实劲,全力确保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四是要紧紧抓准标杆牵引,在关键环节上下功夫,大力锻造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五是要紧紧抓实改革深入,在市场优化上用力气,强力营造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环境。^[2]

武兴伟、魏丽华认为,在全省开展的“三深化、三提升”活动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载体。坚持改革创新,以激发活力、增强动力为重点,深化“双创双服”活动,全面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是“三深化、三提升”活动的重要一环。因此,应围绕壮大市场主体搞好服务;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搞好服务;围绕推动转型升级搞好服务;围绕抓好项目建设搞好服务。^[3]

陈正其探讨了河北省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基础和动能转换的关系,认为河北省在新旧动能转换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产业升级艰难、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大、劳动力失业多等问题,新旧动能转换可选择以下路径:一是存量优化;二是增量扩容;三是风险防控。^[4]

张继文等认为,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产业环境成为营商环境竞争的一个新焦点。越来越多的地区聚焦重点产业,打造良好产业生态,进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发展。一是开展产业环境评估和对标活动,围绕重点产业打造营商环境;二是引进和培育平台型组织,嫁接高端要素,推动产业加快发展;三是提升产业服务队伍能力素质,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四是提高政策前瞻性、创新市场监管,推动产业和商业模式创新。^[5]

(二) 产业转型发展

赵经华等认为,河北当前正在加快建设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为消弭传统产业转型造成的影响,应以颠覆性创新的思路来选择和培育新产业。因此,河北省应以投资公司的态度和理念选择产业和企业,发展战略应以招商引资为主、以内部培育为辅,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科研红利、推动新产业的延续性创新,围绕颠覆性创新产业链打造新的产业集群。^[6]

赵树文等认为,雄安新区产业转移升级必须借助于科学法治体系的强力支撑。因此,有必要在明晰当前雄安新区产业转移升级法治保障问题的基础上,确立软法与硬法共治的产业发展协同治理思想,推进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低端产业转移以及产业政策评估为核心的主导产业制度建设,同时也要围绕金融、税收、行政管理、知识产权保护、住房与土地供给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内容推进产业发展的配套性法律制度

建设。^[7]

李志红、宋剑分析了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因此,一是统筹规划,促进产业选择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二是创新引领,助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选择;三是优化结构,实现产业选择与新型城镇化共同发展;四是政策支撑,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选择提供保障;五是保护环境,实现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8]

王丽媛等认为,制约雄安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障碍主要有:领军企业转型升级障碍多、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大、劳动力就业问题突出等。新区产业转型升级应选择以下路径:一是发展高新产业及服务业;二是提高现有产业科技含量及附加值;三是淘汰落后产能;四是推动加工制造环节的逆向外包或整体外迁;五是完善政策配套保障。^[9]

鲁芳等认为,河北省产业发展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向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在提高高质量科技供给、运用人工智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应采取以下措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实现产业智能化发展;支持、引导和要求企业积极自主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向产业转型注入活力。^[10]

魏震认为,产业发展遵循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经验规律,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水平不同步,要实现协同发展,河北省需要从客观角度评价自身产业发展水平及结构,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把握自身优势,为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合作制定标准。河北省应以产业承接为推动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速营造爱商护商益商的制度环境,推动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互补错位发展。^[11]

二、产业发展

(一) 现代农业

孙晓然、安然认为,现代农业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为支撑,人力资源要素发挥重要作用的现代产业。河北省发展现代农业、优化农业人力资源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改善人力资源环境,加大农业人才投入,提高农业参与者受教育程度。二是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立农业人才数据库。三是提升农业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四

是健全农业人才选拔机制。^[12]

王怡然等以养殖业为切入点,根据张家口市万全区与塞北管理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粮改饲”策略实施前后的效益,按照种植饲草饲料的规模计算表明,实施“粮改饲”降低了养殖业成本,提高了养殖业规模效益。因此,应从农牧业供给侧入手,引导耕地流转,扩大种养业结合经营规模;从农牧业产业各环节切入,延长产业链条,融合发展“产加销”;依据区域资源特征,创新粮草轮作模式;依据饲料饲草种植主体规模进行“粮改饲”补贴。^[13]

王会欣认为,河北省县域多、幅员广、资源丰富,发展现代农业、乡村特色产业有着良好的基础。要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特”字文章,打造产业园区集群,健全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打造知名品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当前,既要看到市场驱动、消费升级拉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机遇,也要看到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生产粗放、结构趋同、布局分散等问题,应切实采取有力措施,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加快发展。一是要加强产业顶层设计。二是打造特色产业园区集群。三是打造特色知名品牌。^[14]

郭立宏等认为,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农村各项产业融合发展。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强化规划和政策引导作用,三是以创新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转型升级,四是夯实农村特色产业基础,五是实施农村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及培训计划。并得出如下结论:农产品电商是农业信息化的突破口和农村数字经济的领头羊,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是精准脱贫的重要载体。发展农产品电商,有利于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成农产品产销衔接;有利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连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助力脱贫攻坚。^[15]

申思敏、孙建光实证量化研究了河北省2005—2017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变化情况,分析出河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提升的长期性趋势。同时,对构成农业现代化发展的4个子系统进行分析,发现农业社会、产出、可持续子系统均呈现提升趋势,但提升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农业投入系统则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

通过对河北省农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分析发现,其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相互作用,尤其是在2016年以后经济增长明显带动了河北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16]

崔俊辉等认为,河北省农业仍未完全迈出传统农业发展的路径。近二十年来,河北省致力于解决农业产业结构陈旧、技术落后、市场局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要素低效等事关农业发展全局的问题,但一直把农业排除在全省战略新兴产业体系建设之外,电子信息和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难以向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和服务领域延伸。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河北省农业面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等严峻挑战。河北省发展战略新兴农业应采取以下重点举措:深入组织实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举全省之力建设战略新兴农业示范区;加强高新技术人才和职业农民队伍建设。^[17]

宋健等认为,河北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农业产业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供给侧生产要素浪费现象仍然突出、生态循环系统仍不完善。最后,提出深化河北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建议:继续调优农业生产布局、完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构建与水资源承载力相匹配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加强农业科技创新驱动。^[18]

金福子等认为,现代农业产业链培育过程中,区域分工和协作具有降低生产成本、带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培育农业区域龙头企业、打造农产品区域品牌等作用。现代农业发展中以产业链推动区域分工和协作面临诸多困难:农村土地流转不畅,规模化经营困难;农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低,品牌培育意识不强;农产品安全问题凸显,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有待健全。应采取以下优化路径:一是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形成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二是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健全农业科技推广机制;三是立足区域分工与协同,将品牌打造融入产业链培育;四是强化食品安全意识,构建健全有力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19]

(二) 先进制造业

郭晓杰认为,促进钢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需要把握以下四个原则：一是绿色发展，依托工艺改进实现节能减排，通过“变废为宝”转出新资源。二是创新引领，依托产业组织创新提升行业集中度，提倡工匠精神，优化升级营销模式。三是产业协同，提升钢铁业与下游装备制造等行业的协同水平。四是融合共生，强化钢铁业与智能制造的深度融合。^[20]

白玉芹认为，推动河北省高质量发展，就要抢抓机遇，聚焦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与发展，加快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一是瞄准集群发展，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二是瞄准发展关键因素，以先进技术为引领完善创新生态体系。三是瞄准产业融合，通过工业设计提升产品品质与竞争力。四是瞄准核心资源，引导高端人才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聚集。^[21]

杨云飞等基于科技创新视角，采用文献分析法和频度分析法，结合实际调研情况，识别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升级关键影响要素，并提出了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一是重视人力资本积累，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二是加强研发投入和产学研协作，强化技术创新能力。三是更好发挥政府调控能力，助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四是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22]

李继勇、曹秀丽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按照带动性、协同性和优势性等原则，采取以下发展模式：一是通过自主创新支持新兴技术发展，进而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二是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利用京津拥有的核心技术，带动河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三是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进而形成新兴产业。^[23]

田宇等认为，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产业结构重型化、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缺乏创新人才和技术等实践困境，需要依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采取以下发展路径加以突破：一是结合国家战略与河北省实际，明确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对市场需求进行全面分析，明确所选择的产业是否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前景。二是要坚持全局性、技术性、可持续性原则，对当前河北省市场发展情况进行合理分析，并且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三是在创新驱动战略下，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投入力度，加强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四是增强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24]

庄志杰等以河北省制造业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关系。研究表明：要从根本上提升产业环境效率，就要实现传统末端治理模式向清洁生产方式的转变，构建能够促使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环境规制。首先，制定各个企业及各种产品废水废气等污染物的排放标准。第二，对使用清洁能源、新能源的企业给予所得税等税收方面的优惠。第三，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研发动力。^[25]

王春蕊认为，河北省是沿海大省，但与沿海先进省份相比，河北省在科技创新、投融资服务、高端人才引进培育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要积极向先进省份学习，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采取有效举措，加快发展海洋特色产业，推动河北省海洋经济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一是打造一批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型海洋特色产业，二是建设一批高水平海洋科学技术研发平台和协同创新联盟，三是创新一批精准对接全产业链的涉海金融产品，四是引进培育一批服务海洋特色产业发展的高精尖人才。^[26]

（三）现代服务业

孙锦等认为，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存在政策导向性功能较为薄弱、优质企业较少、行业发展不平衡、就业人员结构不合理和传统服务业市场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并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结合实际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二是在京津冀协同视角下强化现代服务业企业扶植；三是以区域性合作促进现代服务业平衡发展；四是培养并引进高质量现代服务业人才；五是促进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27]

王明吉等认为，乡村旅游业是河北省重点发展产业，但目前存在景点基础设施不完善、景区宣传力度不够、景区管理不规范、景区游客流量少等问题，应采取以下发展路径：一是在政府方面，加强管理和服

务，充分利用 PPP 模式，增加河北省乡村旅游的融资渠道；二是在景区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景区宣传力度，与当地民俗特色相结合，加强旅游人才培养。^[28]

王健伟认为，科技服务业是以科技和专业知

识为依托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新兴行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是新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新时代背景下,河北省科技服务业发展面临体制机制有待改善、财政扶持有待加强、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从业人员人数不足等问题,建议采取以下发展路径:一是完善扶持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二是加大对科技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三是拓宽科技服务业的投融资渠道;四是加强科技服务业人才培育;五是优化科技服务业产业布局。^[29]

陈建伟认为,乡村旅游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河北省乡村地形地貌类型齐全,自然景观秀美,文化底蕴深厚、特色明显,且环绕京津两大都市,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巨大,应从以下方面加以推动:一是规划引导优化资源配置;二是保护生态夯实发展基础;三是挖掘文化提升内涵品质;四是创新业态增强发展能力;五是规范管理塑造品牌形象;六是落实政策强化要素保障。^[30]

杜丽春、王学婧认为,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在河北省实现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的新跨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河北省休闲旅游产业发展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源和产业整合性较差、人文关怀理念应用不深入等问题,应采取以下对策加以完善:一是加强地方休闲旅游产业规划的融合度,并保证落地实施;二是加强、加快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三是构建休闲旅游产业聚集区,发挥产业联动作用;四是突出产品(线路)特色,切忌盲目跟风建设;五是在资源开发、产品设计、服务等方面加强人文关怀的深层渗透与行为呈现;六是加大品牌建设力度,塑造良好品牌形象;七是转变休闲观念,加强休闲需求的市场培育。^[31]

张茜等分析了特色小镇在养老服务发展中的作用,归纳了当前养老特色小镇普遍存在的问题,借鉴了浙江桐庐、荷兰“失忆小镇”等的有益经验,建议由点及面、培育和壮大河北省养老服务特色小镇:一是政府、企业、社会三方通力协作,提供便捷的设施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侧重以健康产业与文化产业为依托,增加宣传力度,转变养老观点。二是着力打造品牌,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树立养老服务品牌。三是探索多种管理模式。^[32]

陈显中、陈岩认为,近年来,河北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各种创新应用层出不穷,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欺诈投资者、挪用客户备付金、平台卷款跑路、个人信息滥用等一系列问题。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对策: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京津两地的互联网企业;打造河北省互联网金融品牌,加大互联网金融企业培育力度;在省内选择1~2个城市,构建互联网金融集聚区;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成立互联网金融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建设;健全互联网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33]

李桂认为,河北省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丰富的资源基础,但文化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文化市场主体竞争力弱、文化消费不足等问题突出。河北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要做到:强化人才引进,建立并完善融资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开发文化消费市场,推动河北省文化产业和市场更加繁荣。^[34]

蒋清文认为,河北省全域旅游发展成绩突出,位列全国7个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单位之一,但必须保持发展耐心和战略定力,走好新时代全域旅游发展之路。首先,深化认识,树立科学的全域旅游发展观。其次,戮力改革,破解全域旅游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第三,优化供给,打造优质完善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第四,统筹城乡,推动旅游公共服务全域化整合。^[35]

晋颖等认为,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发挥农业保险服务“新农体”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河北省农业保险的市场供给主体数量不多,农业保险工作的人才紧缺,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意愿不足,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发展动力不足,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创新型发展支持力度有待提升。因此,应增加河北省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主体的数量,引进专业人员充实农业保险队伍,提高农户的参保意愿,全面提高农业保险的创新力度,加大政府对农业保险创新发展的支持。^[36]

三、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

(一) 产业协同

颜廷标认为,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必须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放松,把产业协同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着力点,稳扎稳打、深入推进。要从

实际出发,破除制约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积极深化区域分工,实现由产业分工向产业链分工转变;不断创新协同模式,实现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共享转变;努力完善动力机制,实现由外在推动向增强内生动力转变;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现由简单链接向深度融合转变。^[37]

张晗、舒丹对京津冀产业相似程度与变化趋势进行实证分析,对河北省产业承接能力进行了测评,并建立模型对河北各市产业承接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作为京津产业转移主要承接地的河北省,产业承接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承接地的经济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劳动力资源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状况是影响当地产业承接能力的关键因素。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因地制宜,通过加强比较优势吸引转移产业;其次,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以地区经济的发展带动产业承接能力的提升;再者,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最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38]

关于京津冀农产品流通,薛建强、李子涵认为,京津冀农产品流通协同创新发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尊重农户选择,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二是优化农产品流通组织,推动“互联网+”农产品流通模式创新;三是完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推动物流模式创新;四是推进物联网技术应用,加强农产品流通信息化建设;五是建立协同政策支撑体系,强化政策措施的支持力度。^[39]陈玉玲认为,京津冀区域内目前主要有三种农产品流通模式:“农户+批发市场”模式、“农户+龙头企业”模式和“农超对接”模式,存在流通成本高、区域协作不足、冷链物流技术缺乏、深加工环节技术缺乏等问题,由实证分析验证的“由中心向外围”的农产品流通模式适用于京津冀区域。^[40]

李燕等从空间链、产业链和供需链3个方面提出京津冀体育旅游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措施:一是京津冀3地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深度协调,制定京津冀体育旅游行业服务质量标准;二是加大对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的扶持力度,拓展京津冀体育旅游发展的新空间;三是加强京津冀智慧体育旅游建设,创新体育旅游商品销售方式;四是加强京津冀体育旅游社会团体建设和人才培养,以创新推进京津冀体育旅游发展。^[41]

宋伟龙等认为,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

展面临机制体制障碍、产业梯度差、产业集群困境等障碍,区域创新体系是促进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并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培育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实现主体;二是强化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三是吸引集聚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核心资源。^[42]

于树江、赵丽娇认为,京津冀产业政策对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产业集聚作为产业结构特征,会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经过对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创新补贴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专业化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多样化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正U型”关系;专业化集聚对税收优惠、创新补贴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多样化集聚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43]

严文杰认为,工业领域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重中之重,但目前京津冀工业协同发展存在工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河北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大幅落后京津、京津冀三地产业链条不完整等问题,必须加快河北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搭建和完善京津冀协同创新载体平台,实现京津冀产业政策协同对接,加强北京科技资源向津冀辐射,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44]

金浩、刘肖对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定位的实证检验发现,京津冀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尚未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改进:第一,全面提升京津冀地区协同水平。第二,完善市场体制建设,政府适当减少保护主义政策。第三,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优化产业布局。^[45]

韩兆柱、刑蕊指出,京津冀养老服务必须是基于一个整体框架下的协同发展,从缓解大城市养老压力和为公民提供更优质的养老服务两方面考虑,协同优化三地养老服务供给。但目前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协同发展面临服务体系建设碎片化、地区本位主义、社会主体参与率低、养老资源整合效果差等问题。应通过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加快地区养老服务整合步伐、融合公私养老服务市场、整合养老资源推进异地养老等途径加以改进。^[46]

（二）协同创新

孙娜等认为,深化金融与科技的交互融合,是京津冀创新发展的重要方面。加强三地科技与金融的互动与合作,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加强金融要素区域内自由流动,走服务创新发展之路;重点发展特色化高科技产业,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三是加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分工合作,走合作创新发展之路;四是政府协作制定统一发展规划,走融合创新发展之路。^[47]

李研指出,河北省装备制造业规模增长迅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且表现出明显的产业集群式发展特征,围绕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地位,与京津实现更高水平协同发展应是河北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一是降低区域产业协同的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二是缩小河北与北京公共服务水平落差,三是加快区域统一市场建设,四是创新区域产业功能区协作体制机制。^[48]

边继云认为,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目前仍存在高资源集聚与低区域流动并存、高创新产出与低区域转化同在等问题,应采取如下措施加以改进:一是发挥雄安新区创新载体的开放聚合引领作用,打造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创新新引擎;二是强化首都科技成果的区域转化,构筑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科技产业联动链条;三是打造一体联动式创新链群支撑体系,重塑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49]

张恩泽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协同创新共同体发展现状认为,三地科技创新能力差距大,北京辐射作用有限,导致北京产业较难实现区域转移等困境,津冀科技创新环境、创新合作平台建设仍有待完善。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可沿用以下路径:首先,融入区域合作,实施区域经济的包容式发展战略;其次,优化产业布局,打造区域协同创新产业集群;最后,以政策衔接为保障、以利益纽带为核心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新局面。^[50]

曾鹏认为,目前京津冀区域创新基础差异较大,区域创新空间的分布格局具有“一核、双城、多节点”的特征,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为主要节点,其他城市为次要节点的协同创新网络。因此,应

明确城市创新层级,打造横向的创新空间网络;合理构建三地创新分工体系,优化区域协同创新平台,打造纵向创新产业链条。^[51]

李峰认为,雄安新区依靠自身资源禀赋,在短期内形成并发挥创新资源与要素的集聚效应较为困难,需要京津冀乃至全国的知识资本、创新资源与高新技术产业向雄安新区转移。因此,应以突破性变革推动雄安新区创新高地建设;以大区域、网络化视域推动雄安新区创新高地建设;以智能化推动雄安新区创新高地建设;以制度创新保障雄安新区创新高地建设。^[52]

姜建华、郝胜杰采用面板数据,从京津冀区域技术创新主体、资源要素、知识积累、成果转化等方面比较评价区域技术创新实力。分析认为,京津冀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与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显著的差异,最显著的特点是环首都的区位优势和政府主导色彩较强。虽然京津冀区域技术创新经费投入较少、国家专利授权量偏低、规模化企业偏少、专利技术成果不多,但是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成果转化效益。因此,京津冀地区应培育引领性企业、加大经费投入、促进成果产出,引导高质量发展。^[53]

四、科技创新

张增臣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等方面构建创新能力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认为:河北省创新能力主要存在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且支出结构不合理、创新资源投入的产出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一是加大创新的研发投入和政府对于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二是充分发挥科技人员在创新中的核心作用;三是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四是优化创新发展环境。^[54]

张冬燕等对新型研发机构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对河北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环境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从政府角度看,应完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鼓励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二是从研发机构角度看,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研发活动,并积极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探索科学有效的运营模式。^[55]

唐潇等利用实证方法对河北省科技创新人才

吸引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河北省对外省科技创新人才的吸引力较大,但是留才能力明显不足,河北省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度,为自身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建议采取下列措施加以改进:一是合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二是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是健全人才服务体系。^[56]

关于河北省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杨云飞、张译方对创新驱动的内涵进行阐释,依据全面性、针对性、动态性和科学性原则构建了河北省制造业创新驱动系统,将人力或人才资本、技术创新或技术驱动、对外开放程度、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等作为创新驱动系统关键影响要素,并提出了河北省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路径,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二是强化技术创新,三是提高对外开放度,四是推进智能制造与两化融合。^[57]

刘肇民等研究分析了河北经济及创新活动现状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是河北省面临的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是河北省弯道超车、跨越赶超的推进器;“一带一路”及河北自贸试验区给河北省对外开放提供了新天地;“中国制造 2025”是河北省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冬奥会”是河北相关产业跃升的加油站。以创新助力河北发展应做到:一是政策协同先行;二是产业发展追高端;三是取“京津长”补“河北短”;四是加速资源共享和要素流动;五是加大创新要素投入。^[58]

张彦忠等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路径,是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环节,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河北省科技成果转化仍不畅,需要进一步创新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举措,切实增强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能力。一是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二是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开放协同转化机制,三是健全以价值为导向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四是建立以目标为导向的全链条长效服务机制。^[59]

五、企业发展

关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李占雷等以河北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提出科研创新强度、经营管理能力、创新激励动力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度

量指标,建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表明:第一,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活动时,加大对科研创新关键要素的投入能显著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第二,经营管理能力与创新激励动力对企业自主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60]

芦雅婷等对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认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偏小,区域发展不协调,行业发展不平衡,R&D 经费与人员投入不足,产出效益不高,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善,应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改进:一是发展骨干高新技术企业,促进区域和行业平衡发展;二是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加大 R&D 经费与人员投入;三是完善成果转化机制、提高产出效益;四是落实已有政策并加大扶持政策。^[61]

刘兢轶等认为,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强,经营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比重较高,融资活动资金来源单一,融资风险较高,应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改进:一是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降低融资风险;二是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三是建立专门的科技金融服务机构;四是优化金融服务环境。^[62]

林妍、刘霞认为,近年来,河北省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为河北省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河北省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主板市场活力不足,难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二是新三板市场市值低,流动性较差;三是转板机制不健全,交易量较低;四是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特色不足。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强主板市场活力;创新创业板核准制度,实行宽松的市场准入机制;建立健全新三板市场融资制度;妥善处理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与其他板块间的竞合关系。^[63]

严军花认为,河北省大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综合实力弱,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应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强化政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实施差异化帮扶措施;二是加快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空间集聚和产业布局优化;三是切实解决融资难问题,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四是鼓励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大科技资源集聚共享和创新服务供给机制。^[64]

六、对外经济

潘保海认为,国际产能合作是河北省化解过剩产能的国际化路径,也是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抓手和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最大优势领域。但河北省优势产能国际合作存在诸多制约因素:自有资金不足、国内融资不易、金融服务滞后;环境陌生复杂、投资风险较大、风险保障薄弱;信息渠道零散、信息内容单一、国别信息不足。破解上述制约因素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创新融资方式、搭建统保平台、建立服务体系。^[65]

刘海云等认为,河北省与中东欧经济合作存在以下问题:合作虽有亮点,但尚未多点开花;虽有务实合作,但合作区域仍不平衡;虽然政府大力推动,但项目落地困难。提出对策建议如下:一是增加宣传力度,营造合作氛围;二是对中东欧国家进行功能分区,推进精准合作;三是提升中捷产业园的总体水平,打造河北省与中东欧合作的新名片;四是建构中东欧人才交流常态化机制。^[66]

刘玮琼、张文慧总结了河北省外贸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河北省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即:加快产业转型与升级,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强化发展加工贸易,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积极推进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发展;提升对外贸易综合实力,提升出口商品的质量和品牌影响力;优化对外贸易区域布局,构建一个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等。^[67]

梁春艳、段炜悦分析了河北省内主要进出口企业和进出口商品现状,结合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深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河北省外贸的直接影响及长期衍生效应。结果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对河北省进出口总量冲击有限,但对相关产品和企业影响较大;短期内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长期衍生效应波及多个领域,对外贸易的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应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外贸质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掌握竞争主动权;强化政策支持,稳定外贸预期;完善融资渠道,加强风险防范。^[68]

张慧娟等分析河北省外贸企业竞争力现状认为,在大的互联网经济环境下,河北省外贸企业紧抓机遇,数量及规模实现了同步扩张,并为社

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河北省外贸企业竞争力建设仍有诸多欠缺,企业产品结构单一,多与钢材、服饰、纺织等传统行业相关,贸易形式单一,出口总值中一般贸易占比约8成,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突出。因此,建议河北省加大政策支持,调整产业布局,大力培育人才,全面提升外贸企业竞争力。^[69]

吴雪洁认为,河北省应深度利用京津冀协同机遇,采取多种措施提升河北省外贸水平:一是承接京津高端产业,优化外贸商品结构;二是发展综合保税区,优化外贸方式及结构;三是利用国家政策和天津自贸区优化贸易伙伴地理分布;四是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外贸主体结构;五是利用雄安新区集聚创新要素,提升自主创新能力。^[70]

李志伟认为,“一带一路”的协同推进为河北沿海经济转型与振兴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主动融入和策应“一带一路”建设,是破解河北沿海经济发展短板、强化对全省经济引领和带动效应的重要途径。为此,应立足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不断强化开放型经济制度支撑;加速资源型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链对接与极化集聚;积极对接“一带一路”陆路通道,加快建设完善海陆交通体系;依托园区项目建设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优化沿海产业创新资源布局。^[71]

杨文婧、张越强认为,跨境电商虽然成为河北对外经贸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应该审视河北外贸与跨境电商平台实际情况,结合“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形势,融合河北境内外电商交易平台,扩大河北跨境电商外贸依存度,加大境外第三方支付平台监管力度,优化跨境电商贸易结构,创新与完善产业集群跨境电商综合服务载体,提升河北在京津冀电商版图中的地位,促进河北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72]

(高智: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吴環: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颜廷标. 依靠创新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N]. 河北日报, 2019-03-29(007).
- [2] 姚胜菊, 连智涌. 全方位推动河北省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思考[J]. 经济论坛, 2019(9).
- [3] 武兴伟, 魏丽华. 深化“双创双服”助力河北高质量崛起

- [J].共产党员(河北),2019(7).
- [4]陈正其.河北省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问题与路径选择[J].河北企业,2019(11).
- [5]张继文.聚焦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N].河北日报,2019-08-28(007).
- [6]赵经华,安岩,韩晓虎.以颠覆性创新助推河北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J].智库时代,2019(14).
- [7]赵树文,吴霞,李炫谕.雄安新区产业转移升级法治保障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19,32(5).
- [8]李志红,宋剑.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河北省产业选择研究[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21(4).
- [9]王丽媛,孙睿,李俊强.雄安新区产业转型与升级的路径研究[J].现代营销(经营版),2019(3).
- [10]鲁芳,贾莫昆,王芳,刘瑾,俞翠玲,赵艳霞.河北省产业问题及其转型升级路径研究[J].中国市场,2019(2).
- [11]魏震.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产业转移调控研究[J].智库时代,2019(15).
- [12]孙晓然,王安然.河北省现代农业关键因素与人力资源策略分析[J].农家参谋,2019(9).
- [13]王怡然,孙芳,丁珂.京津冀区域冀北地区“粮改饲”结构调整效益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1).
- [14]王会欣.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N].河北日报,2019-06-05(007).
- [15]郭立宏,高晓秋,王燕.河北发展农产品电商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J].农业技术与装备,2019(10).
- [16]申思敏,孙建光.河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其经济增长影响实证研究[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9,44(11).
- [17]崔俊辉,宋树恩,刘淑玲,赵红芳.新时代河北战略新兴农业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J].河北省科学院学报,2019,36(4).
- [18]宋健,张春锋,韩轩,王慧军,张晓.河北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析与建议[J].农业科技管理,2019,38(4).
- [19]金福子,苏燕华.现代农业发展中产业链的区域分工与协作研究[J].农业经济,2019(9).
- [20]郭晓杰.把握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四个原则[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2-20(004).
- [21]白玉芹.积极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N].河北日报,2019-05-22(007).
- [22]杨云飞,张译方,陈宾.河北省战略新兴产业升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科技创新视角[J].中国商论,2019(5).
- [23]李继勇,曹秀丽.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研究[J].北方经济,2019(9).
- [24]田宇,闫华芳,朱小梅,马丽亚,许慧萍,邓丽.创新驱动战略下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实践困境及路径选择研究[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9(10).
- [25]庄志杰,杨艳慧,刘阳,代冬芳.基于行业异质性的河北省制造业环境效率与规制研究[J].科技经济市场,2018(12).(年份不符)
- [26]王春蕊.加快发展海洋特色产业[N].河北日报,2019-03-27(007).
- [27]孙锦,曹秀丽,张凤仪.京津冀协同背景下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4).
- [28]王明吉,冯璇,王照清.河北省乡村旅游存在问题及完善路径[J].山西农经,2019(13).
- [29]王健伟.新时代背景下河北省科技服务业发展路径研究[J].智库时代,2019(16).
- [30]陈建伟.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N].河北日报,2019-01-30(007).
- [31]杜丽春,王学婧.河北省休闲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9(11).
- [32]张茜,耿晓.基于特色小镇探索河北省养老服务业发展[J].智库时代,2019(3).
- [33]陈显中,陈岩.河北省互联网金融发展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12).
- [34]李桂.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探讨[J].河北企业,2019(8).
- [35]蒋清文.河北省如何走好全域旅游发展之路[N].河北经济日报,2019-07-06(003).
- [36]晋颖,刘欢,宋超楠.河北省农业保险服务“新农体”作用机制创新研究[J].智库时代,2019(21).
- [37]颜廷标.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N].河北日报,2019-06-05(007).
- [38]张晗,舒丹.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影响因素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9(03).
- [39]薛建强,李子涵.京津冀农产品流通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19(1).
- [40]陈玉玲.京津冀协同背景下农产品流通创新模式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9(15).
- [41]李燕,骆秉全.京津冀体育旅游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路径及措施[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9,31(4).
- [42]宋伟龙,杜浩,田可心.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障碍与突破[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43]于树江,赵丽娇.京津冀装备制造业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J].工业技术经济,2019,38(2).
- [44]严文杰.京津冀工业如何实现协同发展[J].中国统计,2019(1).
- [45]金浩,刘肖.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J].中国科技论坛,2019(10).
- [46]韩兆柱,邢蕊.基于整体性治理的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9,21(1).
- [47]孙娜,刘政永,王健.京津冀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空间交

- 互效应分析及对策建议[J].统计与管理,2019(10).
- [48]李研.以京津冀协同创新促进河北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策略研究[J].河北企业,2019(4).
- [49]边继云.以科技创新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N].经济日报,2019-04-07(007).
- [50]张恩泽.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构建与实施路径[J].中国商论,2019(22).
- [51]曾鹏.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创新体系发展研究[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人民政府.活力城乡美好人居——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6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9.
- [52]李峰.以京津冀协同创新助推雄安新区创新高地建设[J].求知,2019(10).
- [53]姜建华,郝胜杰.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技术创新实力评价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9,16(28).
- [54]张增臣.河北省区域创新指数构建研究[J].统计与管理,2019(1).
- [55]张冬燕,王冬至,杨香合,刘丽.河北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对策建议[J].价值工程,2019,38(31).
- [56]唐潇,穆晓龙,史玲燕,崔涛,崔硕丹.河北省科技创新人才吸引力评价及其引进政策优化研究[J].智库时代,2019(21).
- [57]杨云飞,张译方.河北省制造业创新驱动系统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J].河北企业,2019(12).
- [58]刘肇民,郑红玲,鲁丽丽,司洁萌,赵志勇.以科技创新引领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2(3).
- [59]张彦忠.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N].河北日报,2019-12-25(007).
- [60]李占雷,郑坤,杨金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北省上市公司的实证[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4).
- [61]芦雅婷,邓丽.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科技和产业,2019,19(9).
- [62]刘婉轶,胡恒松.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模式探究[J].现代营销(经营版),2019(9).
- [63]林妍,刘霞.优化河北省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的对策建议[J].河北企业,2019(9).
- [64]严军花.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策略[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24).
- [65]潘保海.河北省优势产能国际合作的制约因素与破解对策[J].经济论坛,2019(10).
- [66]刘海云,栾天月,李颖,江梦莎,侯美玲.河北省与中东欧合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河北企业,2019(7).
- [67]刘玮琼,张文慧.经济新常态下河北省对外贸易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探究[J].商场现代化,2019(22).
- [68]梁春艳,段炜悦.中美贸易摩擦对河北省经济的影响[J].华北金融,2019(11).
- [69]张慧娟,薛曦,汪丽萍.河北省外贸企业竞争力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J].现代营销(信息版),2019(9).
- [70]吴雪洁.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外贸结构优化对策研究[J].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19(6).
- [71]李志伟.“一带一路”视域下河北省沿海经济转型发展对策研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41(6).
- [72]杨文婧,张越强.跨境电商平台对河北省外贸经济增长驱动作用探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9(1).

河北政治建设研究

吴耀明 程瑞山

2019年,河北政治建设研究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河北实际,抓住河北政治建设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继续围绕打造首都政治“护城河”、法治建设、党的建设、政府自身建设和职能转变、乡村治理、公共财政等主题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立法和环境治理、党的建设、地方政治史等方面有明显的拓展和突破。

一、河北打造首都政治“护城河”研究

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围

绕打造首都政治“护城河”撰写了系列文章。在《党建研究》他撰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7次视察河北,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亲自谋划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河北要认真践行“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作为政治之责、为政之要,切实做到思想统一、政治过硬、步调一致、执行有力,努力以河北之稳拱卫首都安全,以河北之进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1]

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王东峰发表题为

《严守政治纪律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的文章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严守政治纪律,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河北是京畿要地,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是政治之责、为政之要。我们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理论上的清醒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必须强化管党治党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以实际行动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2]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认真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的文章中,王东峰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回答了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推动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开创了新局面,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可靠安全保障。党的十九大以来,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安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坚定不移维护政治安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凝聚起新时代团结奋斗的强大正能量;坚定不移维护经济安全,在稳中求进中推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维护生态安全,加快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坚定不移维护社会安全,着力打造拱卫首都安全的钢铁长城。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坚强保证。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以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实际成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3]

刘凯撰文指出,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召开后,河北省委、省政府和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党委

高度重视,迅速传达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打造平安稳定示范区,以学在深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实际行动,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省公安厅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紧围绕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这一中心任务、核心业务,牢固首都战略纵深和安全屏障的定位,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河北公安机关落地生根。坚定不移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筑牢拱卫首都安全的钢铁长城;坚定不移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定不移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坚定不移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着力打造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公安铁军,切实担负起新时代公安机关的职责使命。^[4]

二、河北法治建设研究

(一) 地方立法

孟庆瑜等人基于河北省的研究视角,以京津冀区域协同立法、河北省地方立法和法治政府建设为样本,对“协同立法与地方立法”“立法评估”“法治政府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发挥立法促进和引领作用,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有利于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河北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法治理论的交流与深化。明确提出了中央专门立法、地方协作立法和地方单行立法等三种协同立法模式,以及包括协调机构、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和备案制度等在内的配套保障措施。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率先突破为宗旨,提出当前河北省高质量发展应以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为重要抓手,将生态根基的夯实摆在压倒性位置,建议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地方立法,在清洁生产协调管理、清洁生产审核等方面进行重点设计,并辅之以清洁生产教育、培训等配套制度建设,进一步巩固河北省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根基,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的绿色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明晰构建政府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目的和意义的前提下,系统分析政府立法评估的主体、对象与范围、内容、方法和程序等制度依据,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和多元化

原则,分为立法前、立法中和立法后三个阶段,构建河北省政府立法评估指标体系。^[5]

黄琛希对京津冀经济合作的立法保障予以研究,认为京津冀经济合作中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利益诉求不同、京津冀立法冲突和立法空白、制度壁垒和政策倾斜等问题。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立法中,如果由三方单独立法,由于不了解其他地方的实际情况,也出于对自己行政区域利益的保护,很容易产生地方保护主义。为保证区域立法的统一和完善,应产生第三方立法机构。首先,应由三地政府组成区域立法委员会,有立法权的省政府、省人大和省人大常委会以及较大市的政府、人大及其常委会为组成人员。其次,由于涉及经济立法,因此区域立法委员会还应包括可制定规范性文件的中央机关,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立法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其意见和建议。最后,还应保证区域内的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参与立法,鼓励其提出建议和意见,发挥其监督作用。京津冀三地都需要置身事内,为经济合作立法贡献力量,为真正实现协同发展保驾护航。^[6]

陈政栋通过对外国湿地保护立法的现状和法律分析,研究了我国相关湿地立法情况,提出衡水湖湿地的保护应发展区域性湿地“一区一法”,专门制定相关的地方条例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作者提出7条具体建议:一要构建以生态利益为核心的湿地立法体系;二要改变对湿地的要素式的管理,同时改变湿地的管理机制;三要明确现有管理机构、管理权限,建立管理协调机制;四要加强行政执法手段,扩大执法权限;五要扩大湿地的社会融资,培养湿地管理人才;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利用市场的作用,更好的开发和利用湿地;七要提升公民湿地保护环境意识和法律意识,形成社会监督氛围。^[7]

孙天瞳硕士论文以白洋淀水环境保护立法为研究对象,认为把以水环境为核心的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好、保护好,对于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论文从白洋淀水环境现状和水污染的危害出发,提出了白洋淀水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法律对策:首先,在白洋淀水环境保护过程中,离不开法治的引领与保障,做到国家、省、市不同层级的立法协调、无缝对接,才

能达致白洋淀水环境保护的目标。其次,将协同合作引入白洋淀水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突破京津冀及河北省内的行政区划梗阻和地方性制度、观念壁垒,以实现白洋淀水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第三,推进制度创新。一是统筹规划、分区施策,用统筹的眼光来进行保护和治理工作;二是进行白洋淀水污染治理制度安排,建立和完善污染源综合治理制度和入淀河流整治制度,为白洋淀恢复水质,恢复生态提供推力;三是进行白洋淀水生态修复制度安排,完善引水补水调水机制、排污总量控制监管机制;四是进行白洋淀水生态保护制度安排,建立和完善淀区水污染预警系统和淀区管护制度;五是设计多个白洋淀水环境保护立法的配套制度跟进,从组织领导、统筹资金、市场化运作、科技创新体制等多维度填补立法制度设计的空白,强调立法的科学性和针对性。^[8]

张立辉、刘媛媛撰文认为,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订出台新的《河北省公路条例》,是实现全省公路建设发展科学化、规范化的基本要求,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公路行业依法行政、依法治路的必然要求。在立法过程中还需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实现立法引领,将新的发展理念融入公路发展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二是注重合理衔接,健全和完善公路交通法制体系。要把握好立法站位,发挥支撑河北公路交通法制体系的骨干作用,理顺立法主体关系,衔接和协调好上位法与下位法,促进河北公路交通法制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9]

江东、王雪尧对雄安新区的立法需求撰文指出,雄安新区立法首先应当明确其立法需求,确保所立之法能够瞻前顾后、有据可依、特色创新。这就要求其运用立法技术深入研究雄安新区的社会发展现状,准确定位立法需求,科学预测未来发展前景,依据不同层级的立法授权,充分考虑地区的发展特色,推进其立法体系的科学化。雄安新区的立法应当在高质量的起点上注重瞻前顾后,对现实的接纳和对未来的把握,在明确国家授权依据之后加快立法进程,着眼于雄安新区的基础特色,从本地出发,制定符合其定位的法律法规。^[10]

(二) 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法律问题

孟庆瑜、梁枫等撰文提出,在京津冀协同发

展国家战略稳步实施的大背景下,必须充分重视环保产业协同推进。京津冀三地生态环保等相关部门已针对区域环保产业的协同推进展开了深入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此同时,关联度差、集中度低、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硬性约束机制缺失等问题仍阻碍京津冀区域环保产业协同推进的步伐。要解决这些顽固问题,就必须从制度层面寻求根治之道,其中当务之急是完善相应的法律机制。只有建立健全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规划的法律机制、对接对标法律机制、科技创新法律机制、投融资法律机制和信息共享法律机制,才能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持续的产业和生态支撑。^[11]

张玉霞对河北北部山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研究,撰文指出,河北省北部山区新农村建设是实现河北省建设农业强省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应高度重视当地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从法律层面给予有效保护。河北北部山区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着城市工业生产污染向农村转移、农业生产废弃物成污染隐患、农村生活垃圾废物危害农村环境等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加快推进制定农村环境保护法;二是加强建设农村环保执法部门,提升执法人员素养;三是增强新农村环保宣传,提高农村主体环保法律意识,为全面提升河北北部山区新农村建设夯实根基。^[12]

郭雪慧、李秋成对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路径进行了研究,认为京津冀地区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最有效的手段便是通过法律来进行协同治理。当前环境协同治理面临一些困境,存在着环境协同立法不够协同,京津冀地区尚未建立良好的利益协同补偿机制、环境污染联合预警与信息共享措施不健全等问题。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问题背后是有深层次原因的。要做好环境协同治理,需要环境协同立法,协调推进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司法合作的新模式,构建多元化的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与环境协同治理基金,建立京津冀地区环境信息共享平台,着力建设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监测与监督制度,构建利益协调与利益补偿与环境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要加大立法、司法与执法的保障力度。在这方面,美国与日本的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经验值得我们学习。^[13]

丁鑫磊、康月盈撰文对京津冀一体化水资源

保护的法治策略予以分析研究,认为京津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着部门之间分工负责不明确、思想认识不统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缺乏一体化规划,缺乏一体化统一经费保障,民间监督体系不完善、渠道不畅通等困境。作者提出以下建议:立法上,应制定京津冀流域生态保护综合性立法、建立区域冲突法规清理的常态机制,增加京津冀三地区间流域立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执法上,应构建京津冀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的执法模式,在执法方式、执法队伍、执法政策等方面实现统一;司法上,应设立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法庭,建立专业能力、实务能力强的环境法官队伍。^[14]

赵海艇硕士毕业论文专门研究京津冀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问题,认为京津冀三地农村水污染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治理,一方面对农村人居环境、饮用水安全等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与威胁,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命健康;另一方面也不符合现阶段我国建设美丽乡村,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期待。针对京津冀农村地区水污染防治存在的法律问题,作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由国务院制定一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在其中提高有关农村水污染防治内容的比重,并作出详细规划;二是完善京津冀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为农村地区水污染防治提供权威的领导推进机制与保障机制;三是构建适宜京津冀农村水污染防治的具体法律制度如水环境保护激励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四是强调在农村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农民参与的重要性,并对农村地区的公众参与制度进行革新。^[15]

王妍对京津冀区域扬尘污染治理法律问题予以分析研究,认为扬尘污染不仅加剧了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形势,严重危害民众的身体健康,而且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不断加大扬尘污染治理力度,对于根本改善京津冀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形势紧迫、意义重大。京津冀区域扬尘污染防治应坚持源头治理、突出重点,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分工负责、协同防治的原则,根据扬尘源的不同种类分类施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同治理,逐步完成京津冀区域扬尘污染治理目标,为根本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提供制度支撑。^[16]

于文轩、孙昭宇指出,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立法在国家立法层面,存在可操作性不足、对地方差异性考虑不足,法律效力低、权威性不足,区域协同立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等问题;在地方立法层面,存在现有地方立法内容上协同性不足,立法进度协同不足,三地签署的行政协议可操作性差,尚未形成高效的立法协同机制等问题。建议应尽快通过加强立法顶层设计、实现立法机构协同、明确立法目标定位、完善立法协同保障机制等路径推进协同立法。实现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区域大气污染排放物标准制度和区域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协同,建立重污染预警会商和应急响应机制,完善区域利益共享和生态补偿机制。^[17]

付裕对京津冀雾霾治理区域合作法治化进行研究指出,京津冀区域合作法治保障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存在不少的问题,如:缺少统一区域环境立法,缺少高层协调、决策机制,环境案件审判保障机制运行不畅,审判人员环境司法能力有待提高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充分发挥京津冀三地内部和相互之间政策协同,重视和强化法治中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作用,通过区域合作治理政策与法律的有效匹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无缝对接、协调联动才能达到京津冀区域雾霾治理的目标。^[18]

(三) 司法与行政执法问题

王立军、田谧对雄安新区建设中群体性事件防范予以研究,撰文指出,雄安新区建设是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在这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中,牵扯了太多人的利益,当地居民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所以,积极稳健地推进新区建设进程,照顾到各方利益的均衡,及时发现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避免引发群体性事件,是新区管理者、建设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沟通交流机制、重视源头预防、完善冲突化解机制入手,才能有效的抑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新区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19]

陈海平、赵春莲以河北省市县法院的庭审网络直播为研究对象,对庭审直播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庭审网络直播的河北经验有:建立统一的庭审网络直播平台,结合地方具体情况发挥地方优势,积极引入第三方力量,实现庭审视频

资源效益最大化,将庭审网络直播工作落到实处。庭审网络直播建设的关键着力点在于合理设计顶层制度、构建便民平台和深入发掘潜在价值,因此,要通过制度设计合理化、直播平台多元化、直播效益最大化,全面提高庭审网络直播水平,有效推进庭审网络直播工作的科学化。^[20]

刘畅对京津冀地区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研究,撰文指出,近年来人民法院尤其是京津冀地区法院的案件受理数持续攀升,涉互联网新类型纠纷尤甚,与其相适应的新的解决纠纷流程成为社会公众的新需求。在此背景下,京津冀三地法院将纠纷解决机制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依托司法人工智能将办案模式从线下逐步移转至线上,使部分案由案件的诉前分流、立案、审判、执行通过全流程在线“一站式”的方式解决,是对京津冀三地法院传统审判方式的一次革命性的流程再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的案件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流程再造的大致过程进行了应用效能前瞻,通过对“诉讼前端”“诉讼中端”“诉讼后端”的全流程“网上案件网上审”,形成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京津冀三地法院的“新枫桥经验”。^[21]

郭雅雯针对京津冀协同执法撰文指出,京津冀协同执法中缺乏统一的执法机制和执法程序,容易引发争议、影响执法效率和执法结果的公正性。作者提出两点建议:一方面应建立京津冀协同执法机制和执法程序。一要坚持统一的执法标准,要做到标准统一,增强京津冀协同执法中的协作性。二要把整体利益放到第一位,避免和减少协同执法过程中三地的利益冲突,提高执法的效率;另一方面要完善协同执法信息公开平台,既有利于行政相对人更好地了解执法过程和结果,也有利于不同地方的执法机构互通信息,加强执法的针对性,提高效率性,更好地促进京津冀三地协同执法的发展,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22]

王雷、闫琳特通过对河北三级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改革和相关数据分析,认为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划分标准不具体、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简易程序受到抑制、现实保障不足等问题。对于民事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机制,宏观层面提出从司法改革、立法与实践、践行“枫桥经验”、司法规律等方面进行整体思路设计;微观层面提出的实现路径包括设立

识别标准,建立专业法庭、速裁庭与实行标准化、要素化庭审,推进司法文书改革,做好“后勤”保障。同时提出繁简分流改革应当具备的司法意识,避免司法实践中“花架子”和“浅尝辄止”的改革形式,倡导在“因院制宜”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有效路径和改革方法。^[23]

梁平撰文认为,京津冀三地法院应当以强化审判执行核心职能、推进非诉机制多元化解纠纷、运用案例优势普法宣传教育等作为着力点,深化区域治理主体协同、矛盾纠纷化解协同、社会风险防控协同、跨域规则体系协同等机制,构建跨区域的司法协同治理网络。京津冀司法协同制度规范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实践中诸如司法协作、网上立案等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同时面临着司法协同治理的内卷化、同质化、表层化、悬浮化等困境,亟待运用技术治理的逻辑,不断深化京津冀司法协同的技术治理机制,加强司法对社会治理要素的整合利用,以机制建设为重点增强京津冀司法协同治理的动力和活力,强化法域概念加强京津冀司法协同的形势研判,实现京津冀司法协同治理的模式转型。^[24]

三、党的建设研究

张力红针对机关党建撰文认为,近年来,河北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部署,着力发挥机关党建助力、引领、表率作用,为协同发展鼓劲加油、凝心聚力。一是强化政治统领,凝聚协同发展共识;二是夯实基层组织,激发协同发展活力;三是锤炼过硬作风,增强协同发展干劲;四是健全制度机制,深化协同发展合作。要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充分发挥机关党建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坚持目标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狠抓协同发展各项工作落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完善行政服务大厅等窗口单位党组织设置,提高服务协同发展的能力。^[25]

刘姗姗以河北传媒学院研究生院党组织建设为例,对新时代下民办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分析研究,撰文指出,新时代下民办高校的基层党建也有着新的时代特点,要善于使用互联网技

术激发基层党建创新能力,加强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党建相关建设,增强互联网党课学习教育,建设互联网党课知识考试。积极借鉴公办院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方式方法。民办院校研究生院基层党建要在各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发挥其政治核心作用,切实保障和监督学校各项工作的圆满开展。在继承研究生院党总支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应用“互联网+党建”的新模式,探索未来基层党建工作的新发展。^[26]

毛钺通过对河南南街村、河北周家庄和湖北官桥八组三个明星村的比较,得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必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关键性引领作用的结论。同时进一步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突出以服务农民群众,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村基层党建的核心工作;二是必须选任头雁型的领导和团结齐心的组织团队;三是注重思想和作风建设;四是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动意识,树立引领村民、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实干作风;五是注重组织建设,加快以内育外引、民主选荐为核心的选贤任能人才机制构建,大力实施招才引智战略;六是坚持因村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开展建章立制规范化工作。^[27]

王文好、阴雪颖以河北省唐山市祥富里社区为例,对基层社区党建品牌化的内部与外化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基层党组织可以为社区内部和整个社会带来正面效应,包括内部效应和外化效应。社区基层党建的内部效应分为改革创新效应和资源向品牌化社区倾斜效应。外化效应指社区品牌化有利于社会资源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惠及社区内群众的日常生活,实现社区的资源共享。作者针对建设品牌化党建社区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基层党组织主导设计,推广形象,明确良好的基层党建品牌定位;二是协调关系,与社会、市场形成良好有效长久的互动;三是建立良好的监察与监督机制,避免在品牌化建设过程中发生以权谋私的现象。^[28]

田丽以浙江象山和河北鹿泉乡村治理为例,对村基层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浙江象山的“村民说事”和河北鹿泉的“夜谈会”两种治理机制是对“四议两公开”制度的补充,建构了群众表达自身诉求的良好渠道,起到激发村庄内生动力、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等作用。虽然

两种治理机制形成的内在机理不同,分别受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阶层分化和华北经济中等地区个体农户分散化的影响,具有弥合不同阶层利益分歧和制约破坏集体行动村民的路径特征,但是共同作用在于都强化了党的领导,坚持了人民立场,有效化解了矛盾,促使村民形成了发展的共识,凝聚了发展的合力。^[29]

任彤彤以衡水市桃城区为例,对以基层党建引领促进“三社联动”进行了分析思考,认为加强基层党建是破解“三社联动”瓶颈问题的重要抓手,通过加强基层党建引领和促进“三社联动”对于新时代社区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基层党建为“三社联动”提供政治引领、提供组织平台和制度保障、提供动力与活力,基层党建与“三社联动”的结合,也深化了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度,为巩固党的领导和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开创了新路,为党的建设扎根基层,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积极影响。以基层党建引领和促进“三社联动”是新时代社区治理的新实践和新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工、居民等多方参与,共同努力。^[30]

四、政府自身建设与职能转变

崔晶针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问题,认为京津冀都市圈地方政府的协作治理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包括:地方政府在协作治理整体目标上的偏好差异,行政区划的体制性障碍,缺乏统一的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区域协调机制不完善,缺乏跨区域的合作组织等。对实现京津冀都市圈整体性协作治理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协调中央与京津冀地方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二是建立京津冀都市圈统一的信息网络体系;三是建立京津冀跨区域整体性协作治理组织和构建京津冀都市圈整体性治理的多元协作机制。^[31]

蒋敏娟、张弦撰文认为,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公共管理的跨界区域治理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协调和整合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五年之际,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可以看出,京津冀在协同治理取得进展的同时,还面临治理目标粗犷、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客体失衡、治理

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利益、资源等显性因素的影响,又有社会资本、文化等隐性因素的影响,还受体制、制度等共享因素的制约。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平衡地方利益,培育合作文化与社会资本,建立跨域协同治理机构及差异化绩效考核制度,建立资源协调的跨域协同治理网络。^[32]

寇大伟、崔建锋以河北省“放管服”改革为例,对整体性治理视域的“放管服”改革予以研究,认为在河北省“放管服”改革中,整体性治理的运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创新性与合法性的张力、大范围实行“双随机、一公开”有难度、审管分离后“互联网+”的缺失造成效率下降、县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有难度等问题。对此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制定理顺审批与监管关系的法律法规;二是促进“互联网+”在“放管服”改革中进一步应用;三是理顺地方政府的横向和纵向府际关系;四是上级政府部门加大对下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33]

王子益撰文认为,河北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存在着部门间缺乏统筹管理、上下级关于下放的权力衔接不足、下放权利含金量不足、网上审批功能较弱、监管制约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作者提出三点对策建议: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尽快完成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身份转变;二要优化审批流程,推进一门式或一窗式的审批形式;三要加大互联网技术运用,一方面要注意加强信息化的统筹建设,实现大数据的共享,另一方面要注重网络审批统一平台的建设,实现网络一站式的审批服务,继续深化探索关于手机App的建设,实现手机和网络审批平台的互通互联。^[34]

任焕彬以河北省省级以下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为毕业论文选题,选取河北省2011—2016年省、市、县三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分析。认为合理划分省级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提和保障,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河北省省级以下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存在不匹配现象,主要原因有各级政府事权交叉重叠、政府与市场界限模糊、支出责任不明确、转移支付不科学、

县级财力压力大等。作者借鉴发达国家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成功经验和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就促进河北省省级以下政府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度,根据公共产品的复杂程度、受益范围、提供效率等方面考虑,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从科学划分事权与支出责任;二是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法制化;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四是完善与地方责任相匹配的地方财权;五是提高公共产品效率。^[35]

杨将对南和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行研究,认为南和县行政审批存在着机制体制管理不顺、“互联网+政务服务”作用发挥不充分、审批与监管协调不到位、“中介超市”服务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审批人员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不够高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依法推进审批体系管理,不断提升行政效能;二是提高“互联网+”水平,增强群众办事效率;三是建立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四是加快中介服务标准建设,规范中介服务运行;五是提升审批服务质量,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36]

五、政府电子政务研究

李涵霄、王越文通过对河北省城市居民的政府电子化公共服务认可度调查研究,撰文指出,公众对电子化公共服务使用率较低,公众对电子化公共服务了解较少、但使用意愿较高,公众对电子化公共服务认可度较高。提出了两点对策建议:一是加强政府电子化公共服务宣传力度,使公众认识到电子化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和有效性;二是强化网络安全建设,保证电子政务可靠性,提高政府工作人员和公众的防范意识,建立职业化、专业化的安全保障队伍,使信息安全成为政府责任的重要一环。^[37]

李博愿以“河北发布”这个省级政务微信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其在前台传播和后台管理的运营现状。指出,“河北发布”在办事服务方面存在着提供的信息查询范围比较少、在线办理基本缺失、政府机构内部协作不全面等问题,提出了优化省级政务微信运营的几点策略建议: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完善顶层规划设计;二是健全体制机制,做到有章可循;三是打造专业团队,合理配置有新闻传播和信息技术背景的人才

队伍。^[38]

冯凯丽通过对石家庄市公民对政务服务网的使用进行研究,指出,政务服务网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公民使用政务服务网不充分;二是政务服务网内容有限,信息呈现方式单一,信息更新滞后,信息不全;三是系统不稳定,存在网页打不开的情况;四是存在一些安全性问题,容易出现信息泄露、失密泄密等情况;五是存在信息安全保障措施不完善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积极营造公民使用政务服务网的氛围,为公民尝试使用政务服务网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二是政府部门要继续做好转变职能工作,促进政务服务网与各专网的融合,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力,不断充实网站内容,优化用户体验;三是逐步健全管理体系,畅通对话渠道,推动政务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实现实体大厅向网上办事大厅的平稳过渡;四是尊重用户需求,切实以公民使用政务服务网的办事需求为根本的出发点,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共享;五是加强信息安全建设,在法律法规和技术迭代上做好各类工作,确保信息的安全性。^[39]

六、地方财政问题研究

孙静等基于2010—201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7个环保重点城市面板数据,显示不同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差异较大,其变动趋势也呈现多样化特点。财政分权对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存在明显负效应,政策协同强度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回归系数为正值但不显著。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建立与央地政府的财权、事权及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分权制度,加强中央政府环境治理的统筹协调力度;二是转变传统绩效考核理念,强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三是加强协调机构的权威性,推进协同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四是优化大气污染治理支出结构,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果。^[40]

韩学丽等撰文指出,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的非均衡发展、跨域公共服务失灵、信息孤岛、市场割裂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区域公共财政的整合与协同问题突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实质性推进,迫切需要依托雄安新区这一新的空间维度和治理平台,从财政层面进行区域财政整体治理构建,协调政府间财税利益冲突、

消除财政治理的分散化和碎片化、破解区域公共服务提供困境等难题,加快京津冀一体化治理格局的形成。应通过整合预算、税收分享、支出协同、共同财政基金、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构建,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财政合作机制引领作用为支点,设计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可行性政策,进而建构起财政整体性治理框架。^[41]

张贵等撰文认为,建立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河北雄安新区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但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支出并不能满足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合理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新区建设尤为必要。在尊重城市建设规律和明确新区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投融资经验,可以从“借、用、管、还、责”五个方面,拓宽投融资渠道,明确资金使用方向,加强风险管控能力,创新有效偿债途径,建立长效问责机制,有序有度地推进雄安新区建设。^[42]

于丽撰文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财政政策执行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三地存在过度竞争,未真正适应“区域一体化”;二是三地财政政策呈现出分散化,政策之间相互抵触和冲突,项目建设缺乏统筹安排和有效整合;三是三地财政资金主要依赖地方政府的自有财政资金和中央资金支持,未充分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提出以下建议:一要消除净财政受益差异,均衡地区经济发展;二要引入“财政协同”理念,形成财政合作机制;三要合理划分事权财权,消除“银政壁垒”;四要建立健全横向区域间转移支付制度;五要引入税收共享机制,设立共同财政基金。通过财政政策的改革与创新,发挥财政对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等方面的支持和引导作用程度,从而促进京津冀域协同环境的构建和维护。^[43]

王娟认为,近年来,河北政府债务逐年增加,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已连续成为河北各年的工作重点。基于河北政府债务现状,提出了三点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策:一是政府债务数据公开透明,尤其对于隐形债务的披露平台与统计口径要规范,切实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披露工作;二是严禁利用PPP模式变相举债;三是完善重点监控机制,督导高风险地区落实风险化解规

划,推动市县积极稳妥开展分类处置,逐步降低债务风险。^[44]

七、乡村治理研究

赵岐山、郭建民撰文指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是协商民主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关键地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河北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制度化层级低;二是协商民主相关制度较多流于形式;三是协商民主制度化氛围不浓、外部环境不够。提出了三点对策建议:一是完善组织体系,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各方分工负责、公众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二是营造浓厚氛围、提供良好外部环境;三是培养农民协商民主素质。^[45]

刘欢、王新捧对河北雄安新区容城镇为例,对创新乡村治理策略进行了研究,认为就河北雄安新区容城镇创新乡村治理而言,新时代的历史坐标赋予容城镇创新乡村治理以新的时代背景,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赋予其创新乡村治理以内生动力,传统乡村管理存在弊端是现实需要。提出了容城镇创新乡村治理的策略:一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二是把治理体系创新作为重要载体;三是把服务新区建设作为历史使命;四是把推进乡村振兴作为价值旨归。^[46]

马翠、姜海燕对承德市乡村治理体系进行研究,认为目前承德市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着:大多数村民与村干部普遍缺乏法治思维,乡村高层次人才及乡土文化流失严重等问题。对此,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是以乡村自治为根本,激发农民大众建设家乡的内生动力健全乡村法治保障体系;二是运用法律思维与法治方式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三是健全承德市乡村德治体系性,为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情感支撑。只有充分利用法治平台,以德治为支撑,在自治中发挥民主,才能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47]

徐勇对河北某县村干部腐败及其治理进行了研究,认为随着近年来国家的强农惠农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的资金流向农村地区,农村基层干部抵制不住外来诱惑,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侵害了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村干部之所以存在腐败的空间,与农

村基层管理制度“空转”、村庄村组干部“权力真空”、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羁绊”、村干部自我认知的偏差等不无关系。治理村干部腐败,第一个方面是制度层面,通过建立健全权力清单、村务、财务等制度,建立良好的基层政治生态,确保村干部权力的规范运行;第二个方面是权力监督层面,通过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建立立体、科学的监督机制,使制度能够落实到实处,大大减少腐败问题;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基层干部层面,通过加强基层干部教育,使干部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有所提高,对政策以及法律能够有正确的认识。^[48]

玉绍祥以河北某地区农村天主教地下势力为例,分析了农村非法宗教问题特点、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指出,宗教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国家干涉、控制其他国家的手段之一,也是其干涉我国的重要手段。农村地区宗教势力复杂,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为西方国家对我国宗教的干涉和渗透提供了土壤。处理好农村非法宗教问题,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解决农村非法宗教问题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多部门协同,以加强农村地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为根本,以群众路线为基础,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宗教管理队伍和宗教教职人员队伍为支撑,以构建多部门信息共享、共同研判、齐抓共管、联合执法的联席会议制度为手段,形成部门协作、全民参与的治理农村非法宗教工作的新格局。^[49]

八、河北政治史研究

王伟光对北魏在河北地区的治理进行研究,指出,北魏的兴起、发展与灭亡都与河北地区紧密相关。北魏前期河北地区治理体系的特点是治理目标明确、治理手段多样但治理方式粗暴;北魏中期河北地区治理体系经过完善,巩固了北魏对河北地区的统治,特点是治理体系成熟、治理效果突出但治理之下暗藏危机;北魏后期河北地区治理体系逐渐瓦解,这一时期治理体系呈现出治理意识淡薄、治理手段缺失的特点。北魏对河北地区的治理是一个因时、因势不断调整的过程,其治理体系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北魏在河北地区维持130多年的统治,充分显示其治理方式具有一定

成效。^[50]

谢守华对隋唐之际河北地区的政区沿革进行研究,指出,在隋末唐初之际,诸政权尤其是李唐政权,为了经营河北地区,在四个层面进行了政区建设,以求尽快掌控该地区局势,并恢复当地正常社会秩序。在跨高层区划层面,新置河北道(山东道)行台和幽州等三大总管府;在高层区划层面,新置相州等9个总管府或都督府;在统县政区层面,新置怀州等49个州;在县级政区层面,新置大基县等58个县。经过唐初对河北新置政区的整合与优化,在高层区划层面,唐初净增数目为2;在统县政区层面,唐初净增数目为3;在县级政区层面,唐初净增数目为12。李唐政权完成了对隋末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河北政区的再造与重构。^[51]

朱文通、丁钰津对清代直隶省下辖的府州建制进行研究,指出,清代直隶省下辖府州变动的原因有:特殊的政治、军事需要,多民族杂居的影响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有清一代对直隶省下辖府、直隶州的变动大部分是在基层区划中进行的,直隶省整体并没有多大变化,其变化主要来源于内部州、县的升降。清朝形成的行政区划格局奠定了以后直隶省发展的基调。特别是承德府、朝阳府的设立,加速了当地民族融合,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为后世开发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清末近代交通和经济的发展,又为后来州县作用和地位变化提供了落脚点,如唐山和秦皇岛(代替永平府成为冀东地区的中心)、邯郸(代替大名府成为冀南地区的中心)、沧州(代替河间府成为津南地区的中心)等地的崛起,都是极好的例证。^[52]

徐建平撰文认为,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加强了对河务的管理。直隶地方政府在原有各河河务局的基础上,加大了对水政的监管力度,设置了水上警察局,建立了河务局工巡队,并责成地方官加强对河务的监管,在保障航路畅通、维护水路运输安全、维护水事秩序、保护堤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洋政府时期直隶的水政监察制度建设,使当地的水务秩序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53]

刘国峰对1946年中共张家口市首届参议会进行研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6年中共张家口市首届参议会参议员选举基本体现

了民主,突出表现在:参议员选举范围的扩大、选民参与度的增加、中共张家口市干部“三三制”政策的贯彻执行、选举程序的规范化等方面。但是,参议员选举过程中,也出现了基层干部强制候选人提名、霸占宣传工具、欺骗选民等现象,阻碍了民主化的进程。认为中共张家口市参议会已具备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特征,中共张家口市参议会的建立,足以说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实践的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由于战争原因,中共张家口市参议会仅运行了5个月,参议会通过之议案无法全部实施,成为实践中的一大缺憾。^[54]

刘飞对解放石家庄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管理的实践进行了研究。指出,面对如何管理石家庄这个新课题,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放弃“搬运”政策,完成一系列转变。在长期建设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石家庄设置城市管理机构并进行了建立经济秩序、巩固人民政权、治理社会公害、修复城市基础设施等一系列丰富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城市管理经验。在建立经济秩序方面:随着石家庄市政府对中央经济政策认识的不断深入,最终确立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巩固人民政权方面:在登记国民党人员的过程中,石家庄市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政策,对国民党人员的入党动机、思想倾向有了大致的认识。在治理社会公害方面:中国共产党对石家庄存在的妓馆、烟毒等现象进行了清理。在修复城市基础设施方面:有重点地进行了水电、道路等工程建设。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为新解放的城市提供了管理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政策依据,也给当今的城市管理提供了借鉴。^[55]

张海荣通过对冀北一个生产大队1958—1961的收入研究,认为公社化初期乡村生产生活及其治理中存在两套机制:一是党和国家政令主导的显性的运行脉络;二是底层“理性”主导的乡村隐性的运行逻辑。对生产大队收入史的观照,可体会到农民劳动的庞杂与艰辛,这远不是可以用农业劳动低效所能解释的。对社队干部“多吃多占”问题,在物质极为稀缺之时,多吃多占难免要付出惨重代价,因为乡村知根知底的近距离交往,与频繁的政治运动,对多吃多占不

能不形成某种威慑。人民公社持续数十年,国家严密的组织布控与政治运动的开展是关键因素;基层政策执行中的“变通”作为压力下农民的“喘息”之道,即底层理性主导下“自我节奏”的存续,也是其中的重要缘由。这里的底层理性,既可以是应对上级的,也可以是乡土间不同组织和人的博弈。^[56]

(吴耀明: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讲师,
程瑞山: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

参考文献:

- [1]王东峰.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J].党建研究,2019(2).
- [2]王东峰.严守政治纪律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N].中国纪检监察,2019-02-14.
- [3]王东峰.认真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N].人民日报,2019-04-15.
- [4]刘凯.忠诚担当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N].人民公安报,2019-07-18.
- [5]孟庆瑜等.地方立法与法治政府建设——基于河北省的研究视角[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
- [6]黄琛希.京津冀经济合作之立法保障研究[J].法制博览,2019(1).
- [7]陈政栋.衡水湖国家湿地公园“一区一法”立法研究[D].河北地质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8]孙天瞳.白洋淀水环境保护立法问题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9]张立辉,刘媛媛.《河北省公路条例》立法探析——意义、思路与框架[J].中国公路,2019(3).
- [10]江东,王雪尧.论雄安新区的立法需求及实现路径[J].法制与社会,2019(22).
- [11]孟庆瑜,梁枫,张思茵.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推进法律机制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 [12]张玉霞.河北省北部山区新农村建设中环境污染问题法律对策研究[J].智库时代,2019(7).
- [13]郭雪慧,李秋成.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法治路径与对策[J].河北法学,2019(10).
- [14]丁鑫磊,康月盈.京津冀一体化水资源保护的法治策略[J].河北农机,2019(1).
- [15]赵海艇.京津冀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问题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16]王妍.京津冀区域扬尘污染治理法律问题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17]于文轩,孙昭宇.论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协同立法之完善——以区域法治发展为视角[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9(3).

- [18]付裕.京津冀雾霾治理区域合作法治化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19]王立军,田谧.雄安新区建设中群体性事件防范研究[J].河北法学,2019(1).
- [20]陈海平,赵春莲.庭审网络直播的实证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21]刘畅.京津冀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司法流程再造——以诉源治理推进纠纷“一站式”多元解决为视角[J].天津法学,2019(4).
- [22]郭雅雯.促进京津冀协同执法[J].人民论坛,2019(15).
- [23]王雷,闫琳特.民事一审案件繁简分流的困境与路径——以河北法院改革为例[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24]梁平.京津冀司法协同治理的模式转型[J].河北法学,2019(11).
- [25]张力红.切实把机关党建贯穿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J].机关党建研究,2019(2).
- [26]刘姗姗.新时代下民办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研究——以河北传媒学院研究生院为例[J].智库时代,2019(19).
- [27]毛铨.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引领作用——基于南街村、周家庄与官桥八组的典型调查[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4).
- [28]王文好,阴雪颖.基层社区党建品牌化产生的效应分析——以河北省唐山市祥富里社区为例[J].改革与开放,2019(16).
- [29]田丽.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比较研究——以浙江象山和河北鹿泉乡村治理为例[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9(12).
- [30]任彤彤.新时代社区治理创新:以基层党建引领促进“三社联动”——以衡水市桃城区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24).
- [31]崔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整体性协作治理[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
- [32]蒋敏娟,张弦.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关键变量的分析框架[J].行政论坛,2019年(6).
- [33]寇大伟,崔建锋.整体性治理视域的“放管服”改革——以河北省“放管服”改革为例[J].领导科学,2019(7).
- [34]王子益.河北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问题与对策[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9).
- [35]任焕彬.河北省省级以下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问题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36]杨将.南和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37]李涵霄,王越文.河北省城市居民政府电子化公共服务认可度调查[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2).
- [38]李博愿.开放政府成熟度模型下的省级政务微信运营策略研究——以“河北发布”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39]冯凯丽.公民使用政务服务网问题研究——以石家庄市为例[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40]孙静,马海涛,王红梅.财政分权、政策协同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基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城市群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9(8).
- [41]韩学丽,赵新峰,吕德铭.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财政整体性治理框架研究[J].中国财政,2019(1).
- [42]张贵,李涛,李佳钰.创新河北雄安新区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43]于丽.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提高财政政策革新水平[J].营销界,2019(26).
- [44]王娟.河北省政府债务现状及分析[J].纳税,2019(21).
- [45]赵岐山,郭建民.河北省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3).
- [46]刘欢,王新捧.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的实践背景及策略——基于对河北雄安新区容城镇的考察[J].乡村科技,2019(27).
- [47]马翠,姜海燕.乡村振兴视角下承德市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所遇难题与解决路径[J].区域治理,2019(41).
- [48]徐勇.河北省Y县村干部腐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
- [49]玉绍祥.新时期河北农村非法宗教活动治理研究——以河北某地天主教地下势力为例[D].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50]王伟光.论北魏对河北地区的治理[D].烟台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51]谢守华.隋末唐初河北政区建置沿革考论[J].邢台学院学报,2019(2).
- [52]朱文通,丁钰津.清代直隶省府州建制嬗变探析[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53]徐建平.北洋政府时期直隶水政监察研究[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5).
- [54]刘国峰.1946年中共张家口市首届参议会研究[D].渤海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55]刘飞.中国共产党学习管理城市的早期尝试——以石家庄为例的考察[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9.
- [56]张海荣.隐藏的秩序:冀北一个生产大队的收入研究(1958—1961)[J].中共党史研究,2019(12).

河北文化建设研究

陈旭霞

2019年,研究成果呈现数量大、类别多样、质量提升、热点凸显的态势。学术热点方面,西柏坡精神、文化遗产、京津冀文化、雄安文化等议题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常规研究方面,文化理论、文化建设、文化产业、文化史等的研究,或推陈或出新,不断厚实河北文化的魅力。

一、文化理论研究

(一) 燕赵文化

关于燕赵文化内涵研究,孙英臣认为,自从韩愈以“感慨悲歌”定义燕赵文化以来,由“感慨悲歌”演变而来的“慷慨悲歌”便成为燕赵文化的主旋律。自古至今,燕赵大地英雄辈出,燕赵儿女慷慨侠义,谱写了一曲曲高亢激昂、响彻云霄的悲歌、壮歌、浩歌、凯歌。如今的燕赵文化,以崭新面貌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1]贾文龙认为,战国时期,燕赵地域“慷慨悲歌”是“自行发展”的边地法律文明;秦汉时期,燕赵地域的法律文化是与郡县地位相适应的轻刑重礼的儒家风格;魏晋南北朝至元代,燕赵地域是中原农业法律文化与草原法律文化相融合的舞台;明清时期,燕赵地域作为京都陪辅,其盛行的法律文化是强调安定有序的政法文化;在中国近代,燕赵地域是西学中用的法制实验场。从军事文化向政法文化的转变是燕赵地域文化历史转变的最主要的层面。^[2]

关于燕赵文化分支研究,崔向东认为,孤竹是商周时期北方著名的古族,孤竹与商人先祖同族,其族名与竹有关。商汤时,孤竹为商重要方国,为商镇守北疆。孤竹从立国至灭亡,前后延续近千年,疆域领地时有盈缩,最大时地跨燕山南北。孤竹都城地望有卢龙、迁安和喀左三说,各有所据,反映了孤竹存续千年间都城的迁移实际。孤竹文化属于华夏文化体系,以商周华夏文化为基调和底色,吸收、融合游牧民族文化,呈现多元性和融合性文化特色。^[3]卜欣认为,中山国是东周战国时期白狄所建立的一个小国,由于是外族所建,长期以来关于中山国的记载只有只

言片语。但随着河北平山三汲乡大瓦和河光石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逐步掀开了中山古国的面纱。从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可以看出,中山国虽为小国,但在其200多年的历史中,从中原文化中吸收了绵延无尽的营养,兼容并蓄地整合到本民族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堪称“华夏辉煌”的灿烂文化。^[4]

关于历史人物对燕赵文化影响研究,范文华认为,开放、进取、包容的赵文化孕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赵国学者群,考据《列子》《庄子》《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等古籍,赵国诞生了荀子、慎到、公孙龙、虞卿、庞煖、毛公、赵处子、司马氏、宁越、桓团、聊苍、吾丘寿王等12子。他们作为百家争鸣中的“诸子”,为中华古文明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财富。诸子思想向来是中华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深入挖掘赵国的诸子思想,对于燕赵思想家的群体研究与弘扬河北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当代价值。^[5]朱丽霞指出戚继光从东南到东北守疆卫土、严密防守的同时,推动了当地文化的发展,较之于兵法军功,戚继光对燕赵文化的贡献更为巨大,影响更为深远,其中许多与戚继光相关的地方文化一直传承至今。^[6]

关于文化融合研究,冯永平通过对《易水歌》和《敕勒歌》这两首“绝唱”的浅析,探析其所展现的民族文化融合意义与现实途径,指出燕赵文化和草原文化经过漫长的冲突、凝聚、吸引、渗透、变迁和融合,以燕赵文化的胡化(草原化)和草原文化汉化(燕赵化)的双向作用的方式,达到了和谐统一、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紧密联系局面。李春林认为,草原文化和燕赵文化均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鲜明的区域特色和富于生命活力的当代价值,而且这两种文化中的许多因子都是相互融通的,甚至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其中很多内容原本就是同一的,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明蒙关系与明代九边长城防御体系、元代上京纪行诗和两都巡幸制度等。^[6]

（二）西柏坡精神

关于西柏坡精神内涵研究，王彦坤、康彦新概括西柏坡精神内涵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公仆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政治协商、团结合作的民主精神，立规严纪、集中统一的看齐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赶考精神。其中，“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7]丁晓平认为，“西柏坡精神”主要包括：“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两个一切”（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至上精神，“两个善于”（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立国兴邦精神，“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不懈赶考精神。毛泽东提出的“不做寿”“不送礼”等六条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给“进京赶考”立下的规矩。^[8]

关于弘扬西柏坡精神研究，夏泉、吴斌认为，当下，牢记“赶考”精神，就是要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面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心系人民，始终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国家的主人。人心向背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只有与人民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才能永远保持党的革命本色，砥砺前行。^[9]田海舰认为，70年前，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时提出了著名的“赶考”命题。争取考出好成绩，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执政“赶考”的永恒考题。“赶考”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10]袁秀等认为，70年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铿锵前行的坚实步履

和不懈求索，“赶考”精神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传承这一宝贵的革命精神和传统根脉，是我们党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营养剂，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重要动力。^[11]

关于西柏坡精神研究的学术检讨，张雪、张彤在梳理西柏坡精神30年的研究历程时发现，现阶段虽已经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的研究相比，其数量仍相对较少，且存在着研究呈现出地域性色彩、研究思路有待拓宽、深度仍需深化、缺乏广阔的传播途径等问题。^[12]

（三）文化遗产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王菲指出，河北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内涵丰富，保护和利用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但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目前仍然存在对“非遗”过度干预、活态保护意识匮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断代困境、“非遗”数字化保护滞后和工作队伍薄弱等突出问题。要实现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保护利用，应当明确角色定位，实现科学保护；加强合理利用，突出整体性保护；建立科学传承机制，有效保障传承人权益；完善数据库建设，推动数字化保护；多途径智力投入，加强“非遗”队伍建设等。^[6]金剑以唐山皮影戏、以廊坊永清核雕、以藁城宫灯等为例，按照从现状统计到价值核算、从理论分析到方法设计、从一般方法到具体方法的逻辑思路，以价值核算为重点内容，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核算的基本理论、方法设计及其应用。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核算的方法体系，提出了收益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营利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设计了收益法、支付意愿法、特征价格法、主观幸福法、感知价值法等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核算方法。^[13]

关于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赵侠等以廊坊市“胜芳花会”为例，通过对“胜芳花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乐社的音乐活动和生存状态进行分析，深入研究发展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对其主要存在的情况和原因进行归纳探讨，提出提升全民大众对民间音乐的保护

意识、走进校园文化、把握新媒体机遇、不断健全完善保护机制等民间音乐创新发展的建议。^[14]陈静、井春妹以保定老调的传承和发展为例,提出挖掘传统剧目、创作新剧目、多渠道培养新人、开展文化交流、组织开展戏曲展演活动等多方扩大地方戏曲影响力的保护措施和自身求变、走进民间、民众参与的传承与发展途径。^[15]杨玲等在分析沧州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挖掘梳理传统武术的当代价值、推动传统武术项目的整理研究和保护传承、让传统武术真正走近大众、扩大传统武术文化的影响力、推动武术文化产业化开发的新时代沧州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的对策。^[16]王春雷等通过梳理梅花拳的研究成果,分析梅花拳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功能,实地考察与调研传承情况发现,随着社会变迁,邢台梅花拳传承与发展中主要存在传承基础缩小、资金支持短缺、“文场”理论传承后继乏力、校园推广存在客观困难、健身功能有待改造、宣传推广手段单一等问题。现阶段需要融合学校体育、全民健身和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全方位扩大梅花拳传承群体和社会影响,积极创新,在梅花拳产业发展、组织建设、传播途径、本土文化完整性保护,以及传承人培养等方面多措并举,助力邢台梅花拳传承与发展。^[17]

关于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张璐茜等对河北民间剪纸艺术发展现状以及与旅游文化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以剪纸文化和保护民俗生态为切入点拓展旅游文化资源、拓展民间剪纸艺术形态向产业化发展转变、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的融合发展策略。^[18]冯云玲、乔南以易县清宫传统刺绣技艺为对象,通过查阅大量史料、资料收集、走访传承人,探索传统刺绣的历史渊源、技艺特征与发展现状,认为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的技艺,不仅有着严格规范的制作过程,独特的代表性针法,其刺绣风格、色彩、材料和纹样,都独具艺术特色、文化内涵、象征意义和艺术美感,刺绣作品也有独到的地域特色、审美特色与经济价值。挖掘、传承和发扬光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技艺,既有利于本土刺绣艺术的长远发展,也有利于增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意识,同时对现代服饰品中的刺绣技艺表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9]

关于工业遗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陈晓卫等以邯郸市国营汉光机械厂为例,探讨工业遗产中工业元素再利用的价值、再利用形式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认为工业遗产保护的目的是在挽留工业带给城市的历史印记和工业精神的传递以及工业文化的传承。国营汉光机械厂的工业元素是邯郸市城市工业时代文化的保留和沉淀,也是老一辈工业人情感的寄托和归属。改造再利用工业元素不仅避免老旧工业建筑的推倒重建,还将城市黄金地带的“灰空间”注入活力,使汉光机械厂重获“新生”。^[20]李爱民在对唐山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作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增加衍生产品种类、构建文化创意产业链、加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的支持力度、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工业遗产相结合的途径。^[21]

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李禾尧、贺献林指出,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遗产地人民在长期的劳作实践中形成了浓厚的以毛驴文化、石头文化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构成遗产地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到保护与弘扬农业文化遗产的工作之中,不仅有利于提升涉县旱作梯田的知名度,促进遗产地特色产品与生态旅游的发展,更将为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发展典范。^[22]

关于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程丽佳以河北省189个历史文化村镇为研究对象,在文化生态学视角下,对省域历史文化村镇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进行系统研究。并根据河北省历史文化村镇空间分布与类型特征现状,提出划定保护片区以整体性保护、划定文化线路以协调性保护、修缮街巷建筑以重点性保护的建

议。^[23]

关于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王文录认为,充分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河北省作为大运河沿线省份,承载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使命。加快推进我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立足文化遗产保护,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围绕打造原真性大运河、传承大运河文化、展示燕赵文化,合理建设利用,强化区域联

动,构建区域协调机制。^[24]朱保芹、金艳在分析衡水市运河文化遗产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强化运河环境整治、全面落实保护措施、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加大遗产保护宣传的衡水市运河文化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对策。^[25]

(四) 京津冀文化

关于文化协同发展研究,文魁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在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上,形成以先进地缘文化引领现代地缘经济的态势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是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优势,不但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能够在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下,统一认识、形成认同,克服任何困难、消除一切羁绊,统领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的内在融合。其次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地缘经济,可以通过大分工、大协作释放区域优势和优势区域的潜在生产力,使各个区域经济尽展各自风采,同时成就国家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的大业。^[26]任亮、孔伟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经济协同更是文化协同。而文化协同发展需要通过文化协同治理来实现,文化协同治理基于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构建。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由主体、客体和方式系统构成,治理体系的策略应涵盖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层面。^[27]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协同发展研究,董立叔等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探究河北省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现状,认为生存环境的改变、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传承人的断层和宣传的力度不够等是河北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面临的主要困境,提出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确证民俗体育文化的时代价值、加强规划与管理、建立传承评价体系、开发民俗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等河北省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对策。^[28]张慧芝认为,雄安新区设立后,京津间水陆交通建设、白洋淀水域修复都在加速,明清曾吸引京津商贾贵胄的郑州镇的扁鹊庙、庙会也在乘势复建。庙之肇建与明清京畿地区进入疾疫高发期存在因果关联,庙会则以服务京师消费为主要职能,其文化更彰显了燕赵文化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区域协同的核心要素是人,在三地居民文化身份认同与文化现代转型交融推进中,京津冀地缘文化共同体构建成为重要基础。带有京畿区拱卫京师、服务京师特征的郑州庙会文化,是今天京津冀三地

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历史文脉,也是三地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地域文化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29]周雅琴、孙响从工业遗产保护更新视角出发,提出健全区域化更新体系、搭建区域化数字平台、提升区域化民众素养的京津冀工业遗产型创意产业园区联动更新的建议。^[30]

关于公共文化共建共享研究,刘珂辛、王新良从加强京津冀文化馆系统的体系建设、制定京津冀文化馆雄安新区公益合作项目、加强京津冀文化馆交流合作机制建设、加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京津冀文化馆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三个方面着手分析,提出建立人才互动机制、加快整合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资源、制定京津冀文化馆雄安新区公益合作项目、加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京津冀文化馆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的加强京津冀文化馆交流合作机制建设的建议。^[31]裴旭利用互联网公开的统计工具,从京津冀三地资源服务、功能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并在一体化发展的框架下,提出加快机制建设推进资源整合、推进服务平台一体化,加速平台整合、创新一体化投融资方式的京津冀互联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议。^[32]

关于文化产业协同研究,张娜、赵晓军认为,目前京津冀三地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尚未做到统一步调、协同发展,三地出台的相关规划和政策法规之间也缺乏沟通和协调,难以形成合力。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地引导各地根据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推动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一是调研先行,二是统一规划,三是政策协同,四是引导发展。^[33]宋伟龙等认为,现阶段京津冀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在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机制体制、产业梯度、产业集群等现实障碍,构建以创意集群为主体、创新环境为制度保障、创新资源为核心资源的京津冀区域创新体系是突破障碍、实现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34]魏雅莉、孙文涛针对京津冀文创产业创新发展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整合文化元素与建立产业知识系统、发展“文化+”模式保障多元化竞争实力、引入先进培养模式培养文创人才、借鉴国外有益的人才培养模式、梳理京津冀文化特色、协同发展、建立统一品牌化形象的创新发展

策略。^[35]

关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研究,吴丰林、赵雅萍认为,近年来,各方在京津冀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域签署协同合作协议、实施协同合作项目、成立交流合作组织、搭建协同支撑平台做了大量而务实的工作,初步奠定了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京津冀文化和旅游产业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需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明确产业发展定位,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对接协作,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36]高丽敏等分析了国内外旅游协同发展理论与案例,并在充分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提出发挥各自优势、联动提升、形成旅游品牌、开发旅游产品等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措施。^[37]

关于京津冀文化研究学术检讨,李海峰等以CNKI数据库中1992—2018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为数据源,采用文献计量学和共词分析等方法,主要围绕论文的发文时间分布、核心期刊分布、核心作者分布、高频作者合作关系和高频关键词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国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认为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总体呈快速增长势头,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期刊群已经形成,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频作者合作团队已初具规模,近30年来研究机构和学者重点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八个热门研究领域,将为有关部门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和研究人员进一步开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提供参考。^[38]

二、文化建设研究

(一) 雄安文化建设

关于文化内涵研究,穆瑞锋等认为,雄安新区历史文化品格可归纳为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文化特质,人才辈出、文贤迭起的文化底蕴,通达质朴、民俗丰富的文化性状,厚德载物、仁爱平和的文化精神及多元融合、兼容并包的文化基调。这五大品格极具生命力,是雄安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石。^[39]

关于雄安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研究,吴泽从档案记忆观的视域下,结合雄安新区的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成果,分析雄安新区档案文化资

源开发面临的问题,提出多元主体协同开发、系统整合资源、强化文化服务功能、注重新技术应用的雄安新区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策略。^[40]

关于文化建设研究,齐骥认为,雄安之魂在文化,魅力之源也在文化。文化是雄安新区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在新区思想凝聚、创新引领和价值阐发中起到关键作用。作为一座举世瞩目的新城,雄安新区既要坚持“世界眼光”,又要坚持“中国特色”,发挥文化在引领当代价值、提升公众素养、提高生活质量、推动经济发展、优化社会氛围、塑造新区形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还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深刻的文化自醒、高度的文化自觉、奋发的文化自强,打造文化之城,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文化期待,为未来世界的城市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41]叶振宇指出,“雄安质量”是新发展理念的实践应用与创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时代内涵。实现“雄安质量”,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大胆创新,从城市建设、创新体系、生态环境治理、对外开放、城市安全等多条路径齐头并进,并引领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方向。^[42]

(二) 城市文化建设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田毅等通过对保定全市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文化队伍建设、文化资金投入、文化消费支出、文化相关企业现状、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提出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扎实群众文化队伍建设、提升群众文化供给品质、挖掘文化活动中蕴藏的产业价值、开展文化市场监管及专项整治的建议。^[43]武贞通过对河北省各级、各类博物馆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现状的实地调查,归纳河北省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博物馆工作实践,提出树立正确的服务理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建立评价与考核制度的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合理化建议。^[44]陈辰、刘倩聚焦公共文化人才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大力引进人才、加强管理、加大培养力度、调动积极性的加快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45]

关于文化品牌研究,吴晓霞重点分析广宗、临城、巨鹿三地利用文化资源创建文化品牌方面的举措,对邢台市文化品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人才创新、完善文化产业投融

资体系、延长产业链、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等提升中小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建议。^[46]王增成等通过总结分析近年来河北省文化品牌的发展对策,洞察品牌形象塑造中存在的短板,提出明确文化品牌定位、打造优质产品、全方位塑造文化品牌的策略。^[47]

关于文化走出去研究,张伟等认为,河北地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海外传播对接上,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良好契机,重视文化传播方式的合理运用,确保在推动河北文化与“一带一路”海外传播对接的过程中,尽可能立足尊重语言文化差异基础,提升河北文化与“一带一路”海外传播对接的效果,提升河北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认知度和感染力,更好地将河北文化扩散出去。^[48]

(三) 农村文化建设

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研究,程玉英、田晓倩通过介绍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现状,分析了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基础设施落后、垃圾问题严重、村领导不尽责、环境污染严重、农民素质待提高等问题,提出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处理垃圾、增加资金投入、加强村领导班子建设、增加污染治理力度、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提高农民素质的对策。^[49]尹越通过对邢台美丽乡村建设现状的调查,发现邢台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政府投入不足、环境污染情况严重、产业结构待优化、现代服务业尚需大力发展、乡村教育不平衡且建设人才短缺、乡村文化特色挖掘不深、农民建设美丽乡村的观念不强且其主体作用被忽略、乡村管理制度不健全、社会建设匮乏、部分农民的生活得不到很好保障等。针对问题,提出加强政府规划引导、改善乡村环境、优化产业、注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健全乡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50]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研究,王佩佩以河北省曲阳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为个案,通过实地问卷调查与访谈,全面考察了曲阳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思想建设、理顺管理体制、优化供给模式、完善基础设施、保障人才建设、落实资金保障等具体措施。^[51]

关于农民素质研究,张战、李永红认为,河北省农民思想状况主要表现为政治觉悟较高,主

体意识强烈,创业积极性高,精神文化需求强烈等。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问题,如集体观念淡薄,组织观念差,小农意识深厚,封建迷信活动时时有发生等。对农村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多措并举,注重农村干部的培养和素质能力的提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拓宽农民思想教育渠道,加大对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及惠民投入、加大对农村陈规陋习的防治力度等。^[52]

三、文化产业研究

(一) 文化产业发展

关于文化产业现状研究,陈璐从总体情况、发展趋势、产业结构、区域格局、动力机制、市场主体等角度分析了2017—2018年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形势与特征,揭示了2019年河北文化产业面临的有利环境,剖析了当前遇到的突出问题和障碍是没有形成“合力提升”、省域内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并提出了重塑顶层设计、大力实施“文化名企培优”工程及“借力改革创新”工程等加快提升河北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53]

关于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研究,邹玲芳以对河北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与文化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进行分析为基础,从产业基础、文化资源与制度保障等层面分析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与文化制造业融合的现状和制约因素,探讨推进产业融合的模式,提出了建立制度环境、培育壮大文化企业机制、建立文化创意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等推进产业融合的实施对策和建议。^[54]辛文玉等从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动态入手,分析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新问题,提出打造完整的区块链、建立产业集群、发挥区位优势、加快培养人才队伍建设的新举措。^[55]

关于产业融合研究,韩春秒采取网络民族志调查、抽样访谈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按照“全域扫描—河北实践—经验解析—河北对策”的思路展开,在聚焦乡村视频产业创作者多、关注者众、分布广泛、影响巨大等总体发展状况和河北省具体实践及国内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政府扶持、引智借智、多方合作、加强针对性培训等促进河北省乡村视频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思路与对策。^[56]

关于产业品牌研究,王刚、王莹通过对保定抗战文化资源梳理、产业现状分析、品牌培育策略的探讨,提出打造精品的品牌效应、加强品牌的扶植力度、拓宽品牌的生存空间的以抗战影视开发为主体的产业品牌培育策略。^[57]王宁通过对秦皇岛198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品牌传播策略或手段等深入分析,提出河北文创园区品牌传播策略:注重顶层设计,形成独特品牌定位;园区品牌内外兼修,塑造品牌发展支撑力;加强媒体新闻报道,形成园区品牌传播力;注重公关活动造势、借势,形成品牌传播影响力;强化受众体验情感,塑造品牌传播亲和力。^[58]

关于区域文化产业研究,刘恺兵等介绍了武强县围绕年画、乐器等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将企业变产业、产业变集群、集群变“高地”的发展特征,从政策激励、壮大龙头企业、以商招商、培育新业态等方面论述了武强县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与措施,总结了武强县发展文化产业的四大经验,分别是保持“久久为功”的韧劲和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高站位规划的顶层设计,培育市场主体、拉长做粗产业链条的手段,以及促进产业再升级的改革举措。^[59]张杨分析了文化产业的本质,阐述了5G技术的红利,总结了承德文化产业的现状,以5G赋能的视角,从培养创新文化、促进产业融合、加强政府指导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60]

(二) 农业文化产业

关于美丽乡村建设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李文华着眼于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与产业发展统筹规划、优化产业链生态、增强支柱产业核心竞争力、形成多点支撑的新型业态格局、实现产业形态的动态构建、营造科学文明的乡村文化的产业形态优化构建的策略。^[61]

关于村镇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王楚鑫等认为,特色小镇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阶段的创新探索和实践。河北省特色小镇建设新模式需要从准确定位特色产业,推动业态融合,挖掘文化资源,彰显乡村魅力,健全公共服务机制,带动乡村生态宜居,加强人才培育,提供人才支撑等方面来推动。^[62]郭晓杰对河北特色小镇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就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指出河北特色小镇存在文化内涵不够、内

生性不足、同质化严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挖特色、平衡类型结构、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等政策建议。^[63]刘继为等认为,河北省特色小镇的建设与规划呈现类型分布不均、特色产业不强、运作模式单一、建设资金短缺等诸多困局,京津冀协同视域下河北省特色小镇优化的路径:突出规划引领,坚持协同发展;寻求依托,建设环京津特色小镇;强化特色产业,推进产业链融合发展;上下联动,实现多元主体融合互补;创新融资方式,实现多元化融资。^[64]

(三) 旅游文化产业

关于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赵然芬、张卫兵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省11个地市2004—2017年旅游产业和2014—2016年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数理分析,结合模型结果,认为尽管河北省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但还存在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过小、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融合水平低等问题。要推进河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就要着力在深度挖掘文旅融合契合点、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培养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完善旅游配套设施等方面下功夫。^[65]苑潇卜分析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优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提出以民俗节日为主题、开发旅游纪念品、举办主题表演活动、通过博物馆展示文化的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66]

关于乡村旅游文化研究,李丽平、刘志霞以沙河市蓬勃开展的乡村旅游为基础,探寻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当前乡村旅游景区的建设存在文化内涵挖掘不足、资金投入不足、文化设施建设滞后、文化意识淡薄、重视不够、人才缺乏的问题,重视人才的作用,构建由专家学者、景区建设者和当地农民“三位一体”的人才体系;结合地域特点,形成品牌效应;根据文化所具有的不同属性,探寻不同的方式传承文化是提升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途径。^[67]

关于区域旅游文化产业研究,李会霞从蔚县旅游资源状况和贫困状况分析入手,提出“以点带轴带片”相结合、旅游扶贫与县域三次产业发展全面融合等旅游扶贫的基本思路和发展重

点,以及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创新旅游营销方式加大旅游扶贫资金支持和加强人力资源培训的保障措施。^[68]艾会雨根据对保定市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现状调查研究的结果,从政府和市场的角度对保定市未来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提出做好顶层设计、培育新业态、挖掘文化资源、培育知名品牌、改善旅游体验的建议。^[69]

关于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研究,汪思颖以河北青龙山景区为例,对地域性文创产品进行理论研究,认为地域文化创意产品市场化,要增强品牌意识,强调原创性,产品设计充分考虑购买对象需求,根据市场需求制定产品价格,构建“网络+热点+互动+购买”模式。^[70]王新颖在对传统文化对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与探究的基础上,以秦皇岛本地旅游产业现状为例,针对秦皇岛建立特色旅游文化品牌效应问题,提出利用秦皇岛的地理和历史文化资源、塑造核心景点、开发秦皇岛特殊的创意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建议。^[71]

关于旅游文化消费研究,郭玉洁通过对河北太行邢襄古镇创造文化需求案例分析,在综合对省内外典型文化旅游项目分析基础上,从品牌特色、文化体验、投入机制、管理体制和知名度建设五个层面入手,对河北省文化旅游项目创造文化消费需求的驱动模式和动力机制进行探讨,并据此提出培育精品文化旅游项目、创新打造“科技+”文化体验项目群、建立文化旅游项目多元投入机制、健全管理机构与体制、发挥媒体宣传作用、培育引导文化旅游消费市场的具体路径。^[72]

四、文化史研究

(一) 书院文化

莲池书院,又称“直隶书院”,因建于中国十大古典名园古莲花池而得名,创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由当时的直隶总督李卫奉旨创办,是省级官办书院。张鳞甲、章学诚、黄彭年、何秋涛、王振纲、张裕钊、吴汝纶等历代山长,都是学冠天下的宗师大儒,前后为中国培养出了毕沅、刘春霖、胡景桂、孟庆荣、傅增湘、冯国璋等一大批高徒学子。被誉为“人才的渊薮,学术的中心”。莲池书院饱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这其中既包括教育、藏书、祭祀等

中国书院普遍都存在的因素,也有莲池书院自身所特有的建筑、法帖等因素,值得今天传统文化学者深入挖掘与阐扬。^[73]

(二) 音乐文化

吹歌是流行于河北省的传统吹打乐。它以吹管乐器为主,辅以打击乐器,又称“笙管乐”,民间则俗称“音乐会”;演奏曲目大多来自传统民歌和戏曲唱腔,故名“吹歌”。河北吹歌的历史悠久,早在元代的时候就有“吹歌”一词,明清时期的文献记载就更多。明代王翰的《七夕篇》就记录了吹歌用于七夕节的场景,诗中“风递吹歌喧万户”的“喧”字,点出了吹歌作为吹打乐的特色。如今,河北吹歌以特有的方式在民间传承延续,蕴涵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信息,为道教音乐、民俗音乐以及音乐史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材料:一方面,河北吹歌现今还保留了很多古代的曲谱,对于传统音乐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河北吹歌至今仍在广大农村地区传承、流传,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现实的样态。^[74]

(三) 商业文化

清末保定商会的创建有着多重的背景因素: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冲击;政府对商会创建的强力推动;本地商人组织的积极参与。保定商会是西方冲击、政府主导与地方资源参与的多元互动的产物。保定商会创建伊始,即拥有明确的宗旨、民主的氛围、严密的组织结构及系统,显现了较强的组织能力。保定商会产生后,利用合法制度内的社会空间,一方面为保定商民请命、在商言商,另一方面又密切联系地方官府与民间社会,实现“通官商之邮”的职能,商会逐渐渗入到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活动之中。^[75]

(陈旭霞: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孙英臣.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现代变奏[J].学习时报,2019(6).
- [2] 贾文龙.家国天下:燕赵地域法律文化之国家角色转换[J].地域文化研究,2019(1).
- [3] 崔向东.论商周时期的孤竹国——辽西走廊古族古国研究之一[J].甘肃社会科学,2019(3).
- [4] 卜欣.河北中山古国文化艺术价值的重要性研究[J].才智,2019(12).

- [5] 范文华. 赵国诸子考略[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19(30).
- [6] 刘春子, 康建国. "多维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与碰撞: 草原文化与燕赵文化的对话" 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J]. 地方文化研究, 2019(5).
- [7] 王彦坤, 康彦新. 西柏坡精神内涵及其凝练原则和依据[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11-19.
- [8] 丁晓平. "赶考" 是一种伟大革命精神[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9-3-28.
- [9] 夏泉, 吴斌. 深刻领会新时代"赶考" 精神的时代意蕴及其特征[J]. 南方杂志, 2019(9).
- [10] 田海舰. "赶考" 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J]. 求实, 2019(11).
- [11] 袁秀, 等. 传承"赶考" 精神丰厚政治文化土壤[N]. 光明日报, 2019-05-13.
- [12] 张雪, 张彤. "西柏坡精神" 研究综述[J]. 新西部, 2019(27).
- [13] 金剑. 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核算方法及其应用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14] 赵侠等. 燕赵文化视域下冀中平原民间音乐发展创新形式研究[J].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 2019(5).
- [15] 陈静, 井春妹. 保定地方戏曲文化挖掘与保护研究——以保定老调为例[J]. 保定学院学报, 2019(5).
- [16] 杨玲, 等. 新时代河北传统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以沧州为例[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9(1).
- [17] 王春雷, 等. 困境与出路: 国家非遗"邢台梅花拳" 传承发展研究[J]. 山东体育科技, 2019(2).
- [18] 张璐茜, 等. 河北民间剪纸艺术与旅游文化的融合发展[J]. 大观, 2019(12).
- [19] 冯云玲, 乔南. 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的技艺特征[J]. 丝绸, 2019(12).
- [20] 陈晓卫, 等. 工业遗产中"工业元素" 保护再利用策略研究——以邯郸市国营汉光机械厂为例[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 [21] 李爱民. 唐山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探究[J]. 青年与社会, 2019(26).
- [22] 李禾尧, 贺献林. 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的特征、价值与保护实践[J]. 遗产与保护研究, 2019(1).
- [23] 程丽佳. 河北省历史文化村镇空间分布及其类型特征研究[D]. 河北工程大学, 2019.
- [24] 王文录. 加快推进我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N]. 河北日报, 2019-05-29.
- [25] 朱保芹, 金艳. 衡水市运河文化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J]. 科技资讯, 2019(8).
- [26] 文魁. 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理论启示[J]. 前线, 2019(11).
- [27] 任亮, 孔伟. 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结构、特征及策略[J]. 河北学刊, 2019(6).
- [28] 董立叔, 等. 京津冀协同的河北省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J]. 体育世界(学术版), 2019(4).
- [29] 张慧芝. 鄭州庙、庙会与京津冀地缘文化共同体[J]. 北京史学, 2019(1).
- [30] 周雅琴, 孙响. 京津冀工业遗产型创意产业园区联动更新设计研究[J]. 美与时代(城市版), 2019(9).
- [31] 刘珂辛, 王新良. 京津冀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联动机制研究[J]. 大众文艺, 2019(11).
- [32] 裴旭. 京津冀互联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差异比较分析[J]. 四川图书馆学报, 2019(2).
- [33] 张娜, 赵晓军. 推动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N]. 经济日报, 2019-8-9.
- [34] 宋伟龙, 等. 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障碍与突破[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3).
- [35] 魏雅莉, 孙文涛. 京津冀文创产业创新发展战略研究[J]. 人民论坛, 2019(27).
- [36] 吴丰林, 赵雅萍. 推动京津冀文旅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N]. 中国旅游报, 2019-3-4.
- [37] 高丽敏, 等. 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趋势与对策分析[J]. 科学与管理, 2019(4).
- [38] 李海峰, 等.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领域文献特征与热点——基于文献计量和共词分析[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1).
- [39] 穆瑞锋, 等. 雄安新区历史文化品格及传承机制探析[J]. 保定学院学报, 2019(2).
- [40] 吴泽. 档案记忆观视域下雄安新区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研究[D]. 河北大学, 2019.
- [41] 齐骥. 新时代雄安新区文化发展的战略思路和路径思考[J]. 发展研究, 2019(2).
- [42] 叶振宇. "雄安质量" 的时代内涵与实现路径[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 [43] 田毅, 等. 保定市群众文化调研报告[J]. 统计与管理, 2019(11).
- [44] 武贞. 河北省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 现状调查与提升路径研究[J]. 大舞台, 2019(2).
- [45] 陈辰, 刘倩. 河北省公共文化队伍建设问题研究[J]. 经济论坛, 2019(11).
- [46] 吴晓霞. 中小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研究——以邢台市为例[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9(1).
- [47] 王增成, 等. 互联网背景下河北省文化品牌形象塑造的途径研究[J]. 大众文艺, 2019(7).
- [48] 张伟, 等. 跨语言文化视域下河北文化对接"一带一路" 海外传播研究[J]. 国际公关, 2019(10).
- [49] 程玉英, 田晓倩. 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研究[J]. 现代商业, 2019(11).
- [50] 尹越. 乡村振兴视域下美丽乡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河北省邢台为例[D].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19.
- [51] 王佩佩.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河北曲阳县为例[D]. 河北师范大学, 2019.

- [52] 张战,李永红.河北省农民思想状况分析——基于保定地区的调查[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9(3).
- [53] 陈璐.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河北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对策——2018年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报告[A].康振海.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54] 邹玲芳.河北省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与文化制造业融合发展与互动共赢的对策研究[A].康振海.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55] 辛文玉,等.激发和创新: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构建[J].中外企业家,2019(7).
- [56] 韩春杪.2018年河北省新媒体产业发展的新动态与新思路——以乡村原创视频为例[A].康振海.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57] 王刚,王莹.抗战文化产业的品牌培育[J].名作欣赏,2019(24).
- [58] 王宁.河北文创园区品牌传播策略研究——以秦皇岛1984为例[D].河北大学,2019.
- [59] 刘恺兵,等.打造“文盛武强”新高地——关于武强县文化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A].康振海.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60] 张杨.5G时代承德品牌文化产业发展前景研究[J].品牌研究,2019(12).
- [61] 李文华.河北省美丽乡村产业形态优化构建探略[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62] 王楚鑫,等.创新思路 推进河北特色小镇建设[J].共产党员(河北),2019(6).
- [63] 郭晓杰.文化内涵视域下河北发展特色小镇的路径分析[A].康振海.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64] 刘继为,等.京津冀协同视域下河北省特色小镇的优化路径[M].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9(4).
- [65] 赵然芬,张卫兵.河北省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时空演变分析[A].康振海.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66] 苑潇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策略探讨[J].中国民族博览,2019(4).
- [67] 李丽平,刘志霞.河北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研究——以河北省沙河市为中心[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4).
- [68] 李会霞.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实证研究——以张家口蔚县为例[A].康振海.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69] 艾会雨.保定市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D].河北大学,2019.
- [70] 汪思颖.地域性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以河北青龙山景区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2019.
- [71] 王新颖.传统文化对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的影响研究[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9(11).
- [72] 郭玉洁.文化旅游项目创造文化消费需求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以河北省为例[D].河北经贸大学,2019.
- [73] 姚委委,郑新芳.莲池书院的中华文化资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 [74] 韦建斌.河北吹歌的道教渊源[J].中国宗教,2019(12).
- [75] 魏国栋.清末保定商会的创建及其组织系统探究[J].保定学院学报,2019(1).

河北社会建设研究

张丽

2019年,河北学者围绕社会建设各领域的现实问题,从河北省城乡建设、扶贫开发、生态文明建设、公共服务、人才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雄安新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内容更加深入,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成果更具应用价值。

一、河北省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研究

(一) 总体分析

张齐超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四个类别建构起一套社会发展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利用这一指标体系对河北省11个设区城市进行初步评价,力图揭示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研究表明:不同领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是四个类别中发展水平较高的;同一领域不同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经济发展的结构不协调,科技创新能力整体不足,公共服务领域公共阅读服务方面存在较明显短板;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11个城市明显分为四个发展层级。^[1]

(二) 城镇建设

刘玲、杨欣玥在分析河北省新型城镇化现状

的基础上,对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一是打破京津冀行政壁垒,实现区域内资源共享;二是合理调整城镇布局,协调城镇平衡发展;三是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镇化水平;四是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城镇。^[2]

张亚明等对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进行研究,在大量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基础上,首先提出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河北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 IFIC 模型,将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细分为产业定位力、建设形态力、功能叠加力、制度供给力。并从产业、形态、功能和制度四个维度剖析河北特色小镇的培育困境,主要包括,特色小镇未能紧贴主导产业,产业创新要素不足;特色小镇形态单调,缺乏文化与文明的积淀濡染;特色小镇功能叠加效应欠缺,京津优势借力不及;特色小镇政策泛化,体制创新不达标。基于 IFIC 模型,从产业定位、建设形态、功能叠加、制度供给四个层面提出河北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提升路径,一是坚持产业定位“特而强”为核心;二是坚持建设形态“精而美”为基础;三是坚持功能叠加“聚而合”为导向;四是坚持制度供给“活而新”为支撑。^[3]

张春玲等依据新型城镇化的宗旨,构建县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各抽样县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序,分析各县域之间以及各县域与其所属市域之间存在的差异,再用聚类分析法将抽样县域进行分类,得出结论:河北省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各县域在几个城镇化评价指标上的排序也不尽相同,受限于历史、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各县域都各有短板和长处。提出相关建议,各县域应该充分结合自身特点,根据现有发展情况,选择适合自身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同时加快弥补不足之处,多渠道、多路径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4]

郭晓杰对河北特色小镇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就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河北特色小镇存在文化内涵不够、内生性不足、同质化严重等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一是深度挖掘特色小镇的特色产业和特色资源;二是立足产业定位,平衡特色小镇不同类型结构;三是多途径获得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四

是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5]

连季婷、岑锦豪从河北省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进行城镇化响应度分析,提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运用模型分析了河北省 2000—2016 年非农产业、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特征,进而分析产业结构转变与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强度存在的关联。研究发现,河北省的非农产业城镇化响应系数值逐年增大,其中石家庄市和唐山市等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城镇化响应系数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边远地区的城市则存在系数值相对滞后的状况,并就分析结果提出相关对策。^[6]

(三) 三农问题

李茂、良立忠对河北省乡村治理进行了研究,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为河北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河北省的乡村治理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主要包括乡村人口数量持续减少、村庄行政正在发生巨变、农村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城乡统筹层次仍有待提高、村民自治流于形式、乡村治理难度与日俱增。提出必须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和十九大报告的要求,科学认识发展规律,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层面系统解决问题,应当以强化基层组织基础为根本之道,构建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快速全面提升河北省乡村治理水平。^[7]

李文华着眼于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提出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中产业形态优化构建的路径和策略,一是优化产业链生态,增强支柱产业核心竞争力;二是新兴产业融合互动,形成多点支撑的新型业态格局;三是把握农产品供需矛盾,实现产业形态的动态构建;四是营造科学文明的乡村文化,推动产业与农村社会的协调发展等。^[8]

侯建华认为太行山区是河北省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聚集了全省大部分传统村落,由南到北在河北省西部形成了一条传统村落带。指出由于太行山区自然、经济条件限制,很多传统村落深陷保护和发展的矛盾之中,面临年代久远形成的自然衰败和损毁比较严重、无序更新导致自建性破坏普遍、过渡开发导致建设性破坏突出、“空心化”严重以及保护资金不足等问题。提出太行山传统村落保护和更新的基本思路,一

是建立太行山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二是健全传统村落保护法律法规；三是完善传统村落保护机制；四是设立太行山传统村落保护区；五是避免过度开发；六是适度更新和改造传统民居；七是适当更新与完善基础设施；八是更新传统农业产业，以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9]

（四）扶贫开发

马正英认为河北省贯彻的党中央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精准脱贫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还存在脱贫精准度有待提高、脱贫攻坚责任落实不到位、贫困人员内生动力未充分激发、扶贫领域腐败作风等问题。就河北省农村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提出实施机制，一是精准落实政策，确保精准脱贫实施基础；二是整合人员力量，形成精准脱贫实施合力；三是发展脱贫产业，激发精准脱贫内生动力；四是严实作风建设，保障精准脱贫资金效益。^[10]

程玉英通过对河北省产业扶贫现状分析，找出扶贫产业在发展中存在规模化种植难以实现规模化收益、打开市场难度较大、农产品品质不高、农业产业缺少高科技人才等问题。提出农业产业扶贫的对策，一是统筹规划发展特色产业，二是加强龙头企业的发展，三是精准特色扶贫产业，四是创新产品品种，五是开展智力扶贫，六是增加资金投入力度。^[11]

王春蕊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涉及搬迁群众安居、就业、生活等方面的系统工程，如果处理不好，会造成诸多社会矛盾。通过对河北省涞源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的易地扶贫搬迁模式进行分析，找出当前安置区的产业发展、移民就业、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社区文化、搬迁群众后续扶持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12]

严文杰通过对河北省一些深度贫困地区的驻村调研发现，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存在几大困境，一是扶贫工作中各行为主体存在各种预期问题，驻村工作队易受定势思维预期的影响，贫困户预期能脱贫但很难实现稳定脱贫，企业预期产业扶贫项目中存在“政策性负担”而“望而却步”；二是扶贫领域中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影响稳定脱贫，扶贫资金统筹整合机制建设不完善，产业扶贫项目后续监管和服务机制不健全，京津冀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仍未有实质性进展。

提出河北省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的解困思路 and 措施，一是着力化解扶贫领域汇总的各种预期问题，驻村工作队树立良好的预期，帮助贫困户形成正确的预期，引导企业降低“政策性负担”的预期；二是加快破解扶贫领域中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创新涉农资金整合机制，健全产业扶贫项目后续监管和服务机制，建立京津冀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13]

邢慧斌等从教育扶贫视角深入探究了河北省留守儿童精神扶贫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政策、管理主体、教育资源、师资素质、家庭监护等。并从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四个层面提出农村留守儿童精神扶贫对策建议，一是从政府层面，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作用，完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吸引和培养优秀师资投身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二是从社会层面，建立农村社区的留守儿童管理机制，加强留守儿童志愿者服务，开发留守儿童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三是从学校层面，成立专门的心理辅导中心，开展针对留守儿童家长的家长培训会，加强对教师的监督考核制度；四是家庭层面，创造更多当地就业平台和就业机会，鼓励农村青年自主创业，将留守儿童父母的外出就业转化为当地自主就业，同时加强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沟通。^[14]

刘艳华等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河北贫困地区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基于 Alkire-Foster 多维贫困测度模型，甄选出了导致妇女贫困的主要因素，即教育、就业和健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河北贫困地区妇女脱贫的路径，一是加强教育扶贫的力度，开展助学计划、加强成年妇女教育、加强贫困妇女思想教育；二是助推贫困妇女就业，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就业岗位、推进贫困妇女灵活就业、以创业促就业；三是改善贫困妇女的健康状况，改善贫困地区医疗设施和水平、加强重大疾病和妇女疾病的防控、做好医疗保障工作。^[15]

张葳在深入分析近年河北省乡村旅游扶贫成效的基础上，总结出河北特色的旅游扶贫模式，研判当前需要破解的问题，探讨了精准扶贫视角下河北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一是因地制宜，识别和帮扶精准再精准；二是提高实效，机制和模式精准再精准；三是强化配套，多轮驱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四是互动互促，精准激

发区域社会主观能动性。^[16]

王书贵根据河北省东部平原地区精准扶贫的现状,指出河北省东部平原地区现存的精准扶贫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一是切实转变现存的对精准扶贫工作的认识,二是全面开展脱贫攻坚,三是整合精准扶贫的资金,四是确保精准施策与精准识别。^[17]

(五) 生态文明建设

田翠琴对 1978—2018 年河北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进行了研究,系统梳理了 1978—2018 年河北省环境保护的发展主线、历史分期、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进程,建构了改革开放以来省域环境保护史研究的范式与主要框架。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阐释了近四十年省域环境保护史的主要研究内容与发展主线。提出环保战略、环保规划、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是环境保护史研究的四个主要概念和四大主线。二是探索了省域环境保护史研究的新方法与历史分期的依据。将 1978 年以来的河北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环境保护全面开展时期(1978—199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期(1992—2002)、实施生态立省战略时期(2003—2012)和京津冀环境协同保护时期(2013—2018)。梳理分析了四个时期河北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历史演变过程及环境治理的重点、特色、成效、经验与教训等。三是突出了河北省环境保护的特色与典型经验。40 年来,河北省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既紧跟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前进步伐,积极落实国家的环境政策与制度安排,又创造出具有本省特色的环境治理经验,具有典型性和可推广性。四是资料翔实,数据可靠,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些数据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可靠性,能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该书对探寻河北省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对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与推进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18]

刘书越认为河北省城市社区大气污染治理从先易后难、先重点后全面的初始期,进入紧盯排污大户、重视盲区散户、着力啃硬骨头的攻坚期,要通过补短板、消盲区、克难关、调政策等途径,打赢全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实现雾霾治理从“利剑斩污”向“釜底抽薪”的历

史性跨越。^[19]

张静宏等对河北省乡村旅游业在追求经济效益同时出现的生态环境被破坏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将环境保护纳入整体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做好引导和监管工作,重视环保问题以及完善乡村旅游环境保护的立法和制度等相应对策。^[20]

(六) 人才发展

赵砚文、李秀然对河北省科技人才创新发展保障机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政府在科技人才保障机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科技人才创新发展保障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人才引进的保障机制不完善、不系统,人才培养力度与多元投入保障亟待加强,以收入分配为主的激励保障政策没有跟进到位,未能充分发挥好人才评价“指挥棒”的作用,科技人才潜心研究的工作生活环境有待改善。提出加强科技人才创新发展保障机制建设的对策建议,一是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保障科技人才创新发展;二是健全科技人才引进协调与联动工作机制;三是加大科技人才培养与研发多元投入保障力度;四是完善长效激励保障机制释放科技创新活力;五是建立有利于科技人才创新发展的评价机制;六是营造适宜科技人才创新的工作生活环境。^[21]

姜兴通过对全国“人才争夺战”态势与特点及河北“参战”情况的分析,认为河北发布的人才新政具有人才引进力度大幅提高、针对人才层次仍然主要是高层次人才、组织推动不够深入的特点,并从转变人才竞争方式、补齐人才发展基础性工作“短板”、保障人才工作组织与宣传、创造优良人才生态环境四个方面,提出进一步推进河北省人才发展机制创新的路径。^[22]

邢明强、刘晶认为河北省人力资源市场行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仍面临着一些问题,提出河北省人力资源服务发展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改进,主要包括,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实施更为可行的服务发展行动计划,加快升级改造人力资源服务市场平台,扎实推进重点领域项目实施,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营造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23]

马文才针对河北省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发展存在的数量不足、引进难留住难、人才承载力弱、创新环境不完善等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一是

确立人才优先发展地位,加大人才投入;二是坚持高端引才,优化招才引才体制机制;三是强化人才培养,提升人才素质能力水平;四是深化人才改革,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五是优化创新环境,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24]

周语嫣等通过对河北省电商精准助力脱贫攻坚的历史进行总结分析,指出河北省农村电商人才创业就业助力脱贫存在的问题,并从加强政策扶持、建立相关物流体系、大力培养相关技术人才、提高农民的电子商务意识等方面对电商人才就业创业精准助力脱贫攻坚提出对策建议。^[25]

(七) 科技创新

张冬燕等在分析河北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环境基础上,从政府和研发机构两个角度,提出河北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对策,从政府角度看,一是要完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政策体系,二是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三是鼓励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新型研发机构培育和建设;从研发机构角度,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研发活动,并积极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二是探索科学有效的运营模式。^[26]

二、河北省公共服务问题研究

(一) 总体评价

郑萍对河北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近年来河北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财政投入逐步提高,服务供给方式不断创新,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在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劳动就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公共文化体育等领域都取得显著成效,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仍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提升的方面,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地方配套资金不足、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结构存在偏差、需求调整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信息化程度较低,并提出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导向机制、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信息化水平等对策建议。^[27]

(二) 教育

王颖对河北省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教育观念进行实证调查,提出了相关建议,一是建立农村幼儿园教师专项经费,二是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准入门槛及待遇水平,三是制定具体的帮扶措施并

积极推动落实,四是加强农村幼儿园教师的自主学习。^[28]

张国丽阐述了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模式的重要意义,分析河北省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基本现状,并从构建相对完善的多元主体协同体系、引入多个企业的深度融合与联动、引入社会服务产业进行产教融合、全方位引导校企对接评价体系四个方面,探讨了河北省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提高社会服务能力的策略。^[29]

王燕敏、宋土顺通过对河北省属 12 所重点建设高校下属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进行考察,从名称与定位、职责与功能、组织与结构等方面,分析当前省属“双一流”建设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发展现状,从确定学术发展还是院校研究、规范机构职能、完善人员构成等方面提出河北省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发展之路。^[30]

张丽梳理了河北省老年教育的发展现状,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河北省老年教育的群体参与和需求状况进行了解和分析,发现目前老年教育主要存在各部门协同推进合力不够、区域发展不平衡、各类资源供给短缺、缺少本地特色品牌、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薄弱、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度不够等问题,并从六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一是下好全省老年教育发展“一盘棋”;二是采取梯度推进、强帮弱扶策略,促进省市县乡村五级老年教育发展;三是继续加大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四是着力打造地域老年教育品牌;五是积极推进老龄科学专题研究;六是营造老年教育社会关注和支持的浓厚氛围。^[31]

胡国华、刘春惠为破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教育中供需矛盾的难题,采用调查法对河北省老年教育供需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教育需求方面,老年人教育需求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居住类型的老年教育内容需求有所差异;在教育供给方面,供给机构数量不足,主体单一;供给资金不足,资源有限;供给模式陈旧,内容片面;供给政策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并从改革供给主体、增加供给资金、创新供给方式、优化供给内容、整合供给资源、完善供给政策等供给侧方面,提出老年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新路径。^[32]

(三) 劳动就业

王娟等对河北籍已返乡就业创业大学生实际

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其返乡就业创业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一是有针对性制定优惠政策,加强落实力度;二是完善返乡大学生工作福利制度体系;三是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四是增强大学生对农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33]

郑慧毅等对河北省城镇化发展的现状与大学生就业现状进行了研究。采用回归模型进行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将有助于城镇化率的提高,而城镇化率的提高将改善就业结构,将直接或间接的对大学生的就业水平起到拉动作用,提出应加强经济建设,推动城镇化发展以促进大学生就业等建议。^[34]

石云生、宗胜旺基于2018年河北20所本科院校大学生进行就业质量分析,研究发现,河北省大学生就业供给结构矛盾、专业结构矛盾不明显,就业类型矛盾、就业地域结构性矛盾、能力结构矛盾则较为明显。提出化解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建议,一是持续推进河北省经济结构改革,确保就业总量稳定;二是制定积极人才政策,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向省内及基层流动;三是规范企业用工,增强大学生就业的稳定性;四是深入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充分发挥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效益;五是持续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加强校企合作培养人才。^[35]

李丽丽、赵雪对河北大学生返乡创业进行研究。基于对100名河北省返乡创业大学生的调查,从创新和知识两方面研究了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模式构建,发现河北大学生返乡创业者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重视知识的作用,大学生相信科技的力量和知识创造价值,认为这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创业者的重要一点;二是注重创新,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谋求在形式、内容上创新传统农业,为农村发展注入活力和时代元素;三是依托政策,返乡大学生关注政策的变动,充分利用国家政策促进创业。并依据知识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从价值创造和商业模式出发,将河北大学生返乡创业划分为两大类型五种模式。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一是地方政府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增加返乡新引力;二是大学生发挥自身优势;三是加强返乡大学生创业培训;四是转变村民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态度。^[36]

冯赵建基于需求分析理论的视角,通过实地

调研了解科技创业人员的需求以及服务体系现状,分析当前科技创业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吸取国内外科技创业服务体系优化的经验教训,探索河北省科技创业综合服务体系全面优化路径,提出河北省需要通过与国内其他省份的友好开放合作以及区域性互动优化,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更符合本省实际的科技创业服务体系,并使科技创业服务体系朝着高效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向转变,促进河北省新兴产业技术迅速发展壮大,为其顺利健康发展提供网络、平台和资金等方面支持和服务。^[37]

(四) 社会服务

严晓萍通过对河北省城市社区老人活动状况进行分类,总结出河北省城市社区老人特点有:数量多,收入低,退休早,再就业比例低,自发组织活动多,室外娱乐活动多,政府对老年服务投入少,补贴侧重生活,缺少老年人再就业政策和社会人文支持环境等。认为信息化时代,老年人也需要不断学习,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同时及时做好心理调适,如老伴去世,突然生病失去健康、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等,以减少老年时期的不适感和无用感。并就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协助老年人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提出增加老年人活动服务投入、重视智慧社会老年人媒介信息素养培养、创造老年人再就业社会环境、提供多元文化养老资源、完善社区适老环境建设、借助智能设备满足居家照护需求服务等建议。^[38]

侯刚波等结合河北实际情况,认为任何单一养老模式均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养老困境,提出须探索建立以“土地养老”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以“家庭养老”为主提供居住环境,以“兴趣社团”丰富业余生活,以“社区养老”给予看护照料,以“社会保险”完善制度保障五位一体综合型的农村养老模式。^[39]

王静、冯梓峰对河北省养老模式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多元化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的特点、优势,梳理了当前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多元化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政府应该在理念倡导和政策支持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共建共享的筹资模式;三是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和医养结合

养老机构；四是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五是培养专门的医护人员。^[40]

于向辉、李素权认为河北省已经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较为充分地发挥了社会救助的“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作用，在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在救助水平、救助方式等方面仍存在问题，提出强化社会救助制度设计、鼓励社会资源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强化救助对象精准化、救助管理精细化、健全社会救助监督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救助管理制度等完善河北省社会救助体系的思路。^[41]

（五）医疗卫生

韩聚强等对河北省贫困县农村基层中医医疗服务现状进行研究，随机抽取河北省 52 个贫困县的 197 个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对其服务现状进行调查，并采取描述性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约 95% 的贫困县农村设有基层医疗服务机构，但仅有 20.2% 贫困县农村配置了中医医疗服务；在基层中医医疗服务中，有中医服务人员的仅为 42.2%，且中医服务人员的学历偏低（有学历的 42.2%）。农村基层常用中医诊疗项目的开展受限，仅有中成药、中草药、针灸、刮痧、拔罐、推拿在开展。并得出结论：河北省贫困县基层中医医疗服务能力较低，机构设置、人员层次、诊疗项目开展还需进一步提高。^[42]

（六）公共文化

靳志军、吴秀红从总体目标、构建共享资源池、应用技术、服务模式、运营控制管理等五个方面对河北省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进行设计，并从构建移动互联应用为主的平台体系，探索与社会力量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公共文化云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新的服务模式，实现其结构合理、运营高效的服务机制，需要政府管理部门主导，在资源整合、服务开发、跨平台应用、宣传推广等方面，与大型成熟互联网企业进行社会化合作，形成多元互动的供给格局，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43]

（七）基本住房保障

王迎、刘彤彤通过梳理国内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政策，结合河北省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形式，提出相关的结论和建议，一是在相关保障性住房

的制度层面上看，政府在探索多层次保障制度的同时，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制定规划；二是在保障性住房分配机制上来看，应宏观地、整体地考虑问题，将准入机制、动态审核机制、退出机制整体考虑。^[44]

三、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研究

（一）总体分析与展望

武义青、冷宣英认为雄安新区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不仅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重要平台，也是缩小河北与京津发展差距、带动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互动发展，形成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良性互动关系，有利于以雄安新区建设这个“点”带动周边地区乃至整个河北的发展。提出要把握《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实质，发挥雄安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周边地区也要发挥地缘优势，主动在产业、交通、生态等方面对接融入，还要协同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建立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新格局。^[45]

张贵认为创新决定着雄安新区的前途和命运，建设创新型城市是雄安新区的内在要求和最终归属。雄安新区要从外引和内生两种途径来培育发展创新基因，集聚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国际创新要素和资源。要优化人才、资本、技术、知识及信息等创新要素在空间分布及空间组合状态，构建以“一核、三城、三带”为基本框架的京津雄创新三角区，推动形成京津冀区域发展空间新格局。^[46]

徐永利、徐正夫从程序员、众创空间和教育特区三个维度，探讨以创新人才为本、以众创空间为载体、以教育为基础，构建雄安新区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创新环境，使创新者有意愿、有机会、有能力发挥才智，从而实现人才价值、创新产业和城市生态的有机融合与互动，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47]

王丽、毛寿龙认为雄安新区建设国际一流创新型城市，应形成以创新主体、创新制度、创新资源以及创新文化为核心的支撑系统，通过整合创新要素，增进政产学研平台的合作，达到融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于一体

的协同创新效果。提出六个方面的着力点,一是集聚全球创新资源;二是创新制度,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三是激发创新主体创新活力;四是培育创新文化;五是创建国际一流的政产学研合作平台,整合创新要素;六是加强有效制度供给,推进京津雄协同创新。^[48]

(二) 生态文明建设

张宗兰、高维峰认为雄安新区代表了京津冀经济圈新型生态城市的发展趋势,其生态文化构建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映照,也是新时代基于人文与共生理念下新型生态城市创新探索的重要范例。指出科技服务、绿色互哺、人文共享是雄安新区生态化质量发展的价值依归,并体现为生态文化创新与经济产业共生的融合统一,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共生统一,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的辩证统一。提出在实践过程中要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构建人文生态系统,提升科技的文化赋能,加强生态意识教育,培育健康生态政治机体,促进雄安新区的生态文化创新。^[49]

高星等选取雄安新区 1986 年、1996 年、2006 年、2016 年四期的遥感影像数据及统计年鉴数据,利用 RS 和 GIS 技术,分析 30 年间雄安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同时估算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对生态系统敏感性进行分析。得出研究结果:一是雄安新区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明显,建设用地、林地和水域面积增加,耕地面积减少;二是雄安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下降趋势;三是雄安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缺乏弹性。并且评估研究雄安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于加快雄安新区生态建设、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具有指导意义。^[50]

赵文廷等运用文献研究、经验分析、工程类比等方法,在大清河流域自然与社会基础主要要素分析基础上,从流域的生态廊道地位和作用、水资源涵养功能及其产水能力、防洪减灾地位与作用 3 个方面,分析大清河流域生态环境对雄安新区的保障作用,指出流域水资源问题是影响和制约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关键之一。提出缓解雄安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和确保大清河流域生态安全的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措施构想,一是大清河流域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宏观调控,二是地表水调蓄与地下水开采布局联合调整,三是结合土地整治的地表水治理,四是结合地表水治理的地

下水治理对策,五是水资源综合利用和节水技术研究与应用,六是流域综合治理市场化运作与管理。^[51]

(三) 人才发展

周爱军对创建雄安国家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进行研究,并从 8 个方面提出对策,一是做好试验区的管理机构配备和人员、资金保障工作;二是打造“雄安国际智谷”标志性建筑和“才智雄安”云平台;三是推进试验区国际原创基地建设;四是依托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推动京津人才入雄进程;五是创新人才合作新横式引进海内外顶尖精英;六是推进试验区人才管理服务市场化改革;七是为试验区营造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人是提高新区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才战略意识和决策素质。^[52]

刘京晶等通过选取了硅谷、深圳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个地区作为数据样本,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得出三个地区人才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证明不同发展阶段人才机制的促进作用不同。提出雄安新区人才体制机制构建路径,要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充分激发企业在人才机制构建中的积极性,发挥政府在人才机制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实施柔性引才政策,搭建人才创新平台,加大区域人才合作,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在人才引进方面,要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发展经费筹集机制,搭建高端人才工作创业平台,提高人才资源开发能力;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加大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比重,注重实施人才的分类培养,重点培养科技人才;在人才使用方面,要深化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实施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构建大数据和人才机制相结合的人才供需系统,加速推进本地农业人力资源转型。^[53]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研究

(一) 总体分析与展望

康振海认为进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京津冀三地亟须构建协同发展新机制,从低水平协同步入分工合作密切、布局合理、联动性强的高水平协同发展阶段,提升协同发展的效益和水平。其中,产业是核心,创新是引领,要素是基础条件,服务是基本保障,环境是硬性约束,五者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京津冀优势互补高质

寇大伟从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分析京津冀雾霾治理区域联动机制的成效,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沟通平台缺失,二

是议事协调机构的调动能力有限,三是末端治理和源头治理的矛盾问题,四是大气污染跨界传输的协商问题,五是区域内机动车限行尾号与政策不一致。进而提出应对之策,一是设立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沟通平台,二是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治理雾霾,三是促进京津冀雾霾治理技术层面的更深入协同,四是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积极参与的雾霾协同治理机制,五是开展京津冀雾霾协同治理第三方评估。^[62]

牟永福认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功能定位的实现受制于诸多影响因素,如环境承载力、产业布局、生态贫困、生态代价转移性补偿等。基于此,提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获得预期稳定可持续的支撑力,必须构造“一城四带”绿色发展格局,即“一城”,即雄安新区生态城,“四带”即冀西北冰雪经济产业带、燕山—太行山生态旅游产业带、冀中南绿色农业示范带和滨海循环经济产业带。^[63]

贾维通过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下河北省大气污染法律治理机制存在问题的研究,针对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不一致、大气污染联合执法有待加强、大气污染案件纠纷解决不畅这三个方面提出解决措施,一是进一步推进一体化立法,实现有法可依;二是强化联合行政执法,形成执法新格局;三是畅通大气污染纠纷解决,落实污染者担责。并认为河北省大气污染法律治理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河北省生态支撑区的建设,同时对京津冀一体化治污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种机制的建立是区域大气联动治污的必然选择。^[64]

成丹丹分析了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进一步深化了大气污染治理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快法律保障体系,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三是建立京津冀大气质量检测制度。^[65]

(四) 公共服务相关问题

李欣旖、闫志利采用德尔菲法,调查了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现状,认为存在24项阻力因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合作主体、合作资源6个维度。明确了各阻力因素的阻力强度;采用决策试验和评价实验室研究法,分析了各阻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逻辑关系,明确了各阻力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原因度和中心度。在此基础上,遵循全要素、全方

位原则,构建了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政治推动机制、经济拉动机制、社会联动机制、合作行动机制、文化带动机制、资源流动机制。^[66]

李凡等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背景,采用访谈法和信息检索法确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结构要素初级指标,在初级指标的筛选上,又采用问卷调查法实证遴选确定最终指标,构建出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结构要素体系,并对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出了建议。^[67]

王艳霞对环京津健康养老产业圈建设进展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分析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状况,针对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中的政策扶持、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层面的突出问题,从完善养老服务人才扶持激励政策、制定养老护理员职业能力评价认定办法、建立多层次培训机制、加大养老服务专业扶持力度、打破医保限制、创新志愿者助老模式等方面,提出破解养老服务人才困境的对策。^[68]

李国柱、王新慧通过建立京津冀城镇养老保险层次协调度模型,并采用京津冀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经济适宜系数高于天津、河北,天津基本适宜系数高于北京、河北;北京养老水平最高,河北养老水平最低;北京与天津城镇养老保险在基本层面的协调性比经济层面的协调性高,河北与天津高层次协调度逐渐高于低层次协调度,北京与河北城镇养老保险在基本层面的协调性比经济层面的协调性高。最后提出了京津冀养老保险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一是做好京津冀养老保险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使全民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完善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制度。^[69]

韩兆柱、邢蕊基于一个整体框架下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从缓解大城市养老压力和为公民提供更优质的养老服务两方面考虑,协同优化三地养老服务供给。认为整体性治理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不同地区、政府部门以及公私部门之间的协调整合,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从而提供满足公民生活需求的高效公共服务。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加快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的步伐,打破政策性壁垒、破除地区本位主义、促进公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是破解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困境的必然选择。^[70]

刘晓静等认为河北省人口老龄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养老服务面临资金瓶颈、医养结合存在现实障碍、养老服务人才短缺、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方面的挑战。提出政府应该加大财政补贴并拓宽投融资渠道、发展医养护结合模式以方便老年人养老与就医、加大养老服务护理、管理和评估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以居家社区养老为重点的养老服务体系。^[71]

任亮、孔伟通过对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现状及结构进行分析,总结出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五点特征,主要包括体系结构趋于复杂化与开放化、运行机制趋于市场化与平等化、功能内容趋于复合化与包容化、方式手段趋于协同化与参与性、整体格局趋于网络化与互动化,并从政府治理策略、市场治理策略、社会治理策略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一是从政府治理策略上,明确政府“元主体”定位,区分政府双重职责,推动政府体制机制改革,政府从主管转变为主导;二是从市场治理策略上,依法巩固市场的基础性地位,依法保障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依法构建文化市场体系,依法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三是从社会治理策略上,充分调动和发挥文化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彰显民众主体功能,大力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72]

裴旭认为京津冀三地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上取得了不少成绩,初步建成了依托互联网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文艺辅导等多种资源,并依托网站、App、微博、微信等多种渠道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利用互联网公开的统计工具,对京津冀三地资源服务、功能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在一体化发展的框架下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一是加快机制建设推进资源整合,二是推进服务平台一体化,三是创新一体化投融资方式。^[73]

董立叔等以体育学和文化学为基础,运用田野调查等方法,对河北省民俗体育文化进行研究,探究河北省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现状。分析得出生存环境的改变、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传承人的断层和宣传的力度不够等是河北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面临的主要困境,提出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确证民俗体育文化的时代价值、加强规划与管理、建立传承评价体系、开发民俗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等发展对策。^[74]

(五) 人才发展

孙琳琳、张玮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河北科技人才引入和保留的影响因素,主要从河北经济发展状况、创新环境方面、教育资源方面、生活环境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吸引和聚集人才的对策建议,一是借助雄安新区机遇促河北发展;二是加强和完善科技人才引进机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利用重大项目和产业集群引入和聚集人才;四是注重人才的培育;五是完善人才服务机制;六是完善城市软硬环境。^[75]

梁林等通过构建京津冀人才资源配置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运用 VENSIM 软件对京津冀区域人才资源配置进行动态模拟与预测,从经济发展等 5 个方面设定了 13 种政策仿真方案,分析了不同政策方案的仿真结果。研究发现:调整环境层面子系统的各项要素对系统优化作用最明显,尤其是第三产业对京津冀人才资源配置系统优化作用明显,增加教育投资对人才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要高于对科技创新的投资。提出了四个优化京津冀人才资源配置的对策与建议,一是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快速良性发展,二是大力提高区域教育培训水平,三是改善区域科技创新环境,四是提升人才依存的组织环境。^[76]

(六) 科技创新

陈玉玲认为区域创新能力事关科技创新的整体水平,是影响河北省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区域内外创新发展双重不平衡,限制了河北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河北省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走区内协同和区外协同相互促进之路。持续优化区域创新创业环境,通过区内协同创新发展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强化开发区创新发展,发挥开发区作为全省创新示范区的效应,促进河北省整体创新实力的提升,使河北更好地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77]

(张丽: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张齐超.河北省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统计测度[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 刘玲,杨欣玥.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状及对策[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3).
- [3] 张亚明,杜翠翠,何旭.特色小镇 IFIC 核心竞争力提升路

- 径研究——基于河北实践的思考[J].商业经济研究,2019(1).
- [4]张春玲,杜丽娟,马靖森.县域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1).
- [5]郭晓杰.文化内涵视域下河北发展特色小镇的路径分析[C].河北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6]连季婷,岑锦豪.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城镇化响应强度分析[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9(4).
- [7]李茂,良立忠.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升河北乡村治理水平的现实路径研究[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8]李文华.河北省美丽乡村产业形态优化构建探略[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9]侯建华.太行山传统村落保护和更新的基本思路[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10]马正英.河北省农村精准脱贫实施机制优化研究[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9(9).
- [11]程玉英.河北省农业产业扶贫问题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2).
- [12]王春蕊.河北省易地扶贫搬迁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C].河北农业农村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13]严文杰.攻坚阶段河北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困境及其解困措施[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14]邢慧斌,杨青,朱彦伊.教育扶贫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精神扶贫”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教育文化论坛,2019(6).
- [15]刘艳华,常晓玲,李志刚.精准扶贫视阈下河北省贫困地区妇女多维贫困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16]张葳.精准扶贫视角下河北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J].经济论坛,2019(8).
- [17]王书贵.河北省东部平原地区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4).
- [18]田翠琴.河北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1978—2018)[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19]刘书越.深化河北省城市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0]张静宏,黄万猛,赵洋,高建立.河北省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与解决对策分析[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9(1).
- [21]赵砚文,李秀然.河北省科技人才创新发展保障机制研究[C].河北人才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2]姜兴.新一轮国内人才争夺战背景下河北省人才发展机制创新研究[C].河北人才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3]邢明强,刘京晶.河北人力资源服务市场分析[C].中国人力资源市场分析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4]马文才.河北省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发展问题及对策建议[J].经济论坛,2019(2).
- [25]周语嫣,徐津,梁娟娟.“互联网+”背景下河北省电商人才就业创业精准助力脱贫攻坚问题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9(1).
- [26]张冬燕,王冬至,杨香合,刘丽.河北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对策建议[J].价值工程,2019(31).
- [27]郑萍.河北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评价[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18—2019),2019.
- [28]王颖.河北省农村幼儿园教师教育观念调查研究[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2).
- [29]张国丽.深化河北省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研究[J].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2019(16).
- [30]王燕敏,宋土顺.省域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现状与出路——基于河北省属“双一流”建设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分析[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31]张丽.河北省老年教育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32]胡国华,刘春惠.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与发展研究——基于河北省老年教育的供需分析[J].继续教育研究,2019(5).
- [33]王娟,周勋章,薛松,苏蕊,刁培鑫.河北籍返乡大学生就业创业影响因素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9).
- [34]郑慧毅,杨红瑞,魏晨昊,黄惠泽,王子杰.河北省城镇化发展与大学生就业相关性的实证研究[J].智库时代,2019(1).
- [35]石云生,宗胜旺.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结构矛盾状况分析——基于2018年河北20所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报告[J].知识经济,2019(30).
- [36]李丽丽,赵雪.乡村振兴视野下河北大学生返乡创业模式调查[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2019(2).
- [37]冯赵建.新时代河北省科技创业服务体系优化研究——基于需求分析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9(21).
- [38]严晓萍.河北省城市社区老人活动状况分析及思考[C].河北社会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39]侯刚波,李艳丽,李宏伟,彭君.河北省农村养老模式创新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40]王静,冯梓峰.推进多元化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路径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4).

- [41] 于向辉,李素枝.河北省社会救助体系优化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7).
- [42] 韩聚强,薛军利,李杰茹,安阳阳,赵润生,李爱英.河北省贫困县农村基层中医医疗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9(2).
- [43] 靳志军,吴秀红.河北省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建设与实践探讨[J].河北科技图苑,2019(3).
- [44] 王迎,刘彤彤.河北省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分析[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9(2).
- [45] 武义青,冷宣荣.推动建立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新格局[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46] 张贵.雄安: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型城市[J].前线,2019(9).
- [47] 徐永利,徐正夫.雄安新区创新经济发展与核心竞争力培育——基于程序员、众创空间和教育特区三个维度[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 [48] 王丽,毛寿龙.雄安新区创新型城市建设研究:一个概念分析框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4).
- [49] 张宗兰,高维峰.科技人文融合与绿色共生:新型生态城市视域下的雄安生态文化创新理路[J].生态经济,2019(6).
- [50] 高星,高宇,李晏,申伟宁,刘丹宁.雄安新区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与敏感性分析[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 [51] 赵文廷,王树涛,许皓.基于雄安新区水源涵养的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措施构想[J].林业与生态科学,2019(1).
- [52] 周爱军.创建雄安国家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的构想与路径研究[C].河北人才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53] 刘京晶,曹鹏,邢明强.雄安新区人才机制构建研究[C].河北人才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54] 康振海.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机制[N].经济日报,2019-12-13.
- [55] 王华彪.京津冀三地文化协同发展报告[C].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56] 史艳玲,刘子轩.河北省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对策研究——借鉴日本首都圈建设经验[J].保定学院学报,2019(2).
- [57] 赵培红,杜朋奇.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进展研究[J].统计与管理,2019(6).
- [58] 刘玲,韩红莲.京津冀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及演进机制研究[J].经济论坛,2019(2).
- [59] 阎东彬,范玉凤.京津冀城市群功能空间失衡状态测度及治理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 [60] 王文录,王彦芳.积极打造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三大高地[C].河北省社会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61] 陈国鹰,郑姝慧,张爱国,万宝春.京津冀城市群大气环境效率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9(1).
- [62] 寇大伟.协同治理视域下京津冀雾霾治理联动机制研究[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3).
- [63] 牟永福.“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生态价值及其战略框架[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1).
- [64] 贾维.河北省大气污染法律治理机制研究——以京津冀一体化为视角[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9(10).
- [65] 成丹丹.大气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研究——以京津冀为例[J].法制博览,2019(1).
- [66] 李欣旖,闫志利.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阻力因素与动力机制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9(7).
- [67] 李凡,张宏卫,王湘玉.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指标体系构建分析[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9(4).
- [68] 王艳霞.构建环京津健康养老产业圈的人才困境及对策研究[C].河北人才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69] 李国柱,王新慧.京津冀城镇养老保险协调发展测度研究[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9(3).
- [70] 韩兆柱,邢蕊.基于整体性治理的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9(1).
- [71] 刘晓静,张向军,谢秋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下河北省养老服务面临挑战及发展建议[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 [72] 任亮,孔伟.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结构、特征及策略[J].河北学刊,2019(6).
- [73] 裴旭.京津冀互联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差异比较分析[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9(2).
- [74] 董立叔,陈梦,王海军.京津冀协同的河北省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J].体育世界(学术版),2019(4).
- [75] 孙琳琳,张玮恺.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科技人才聚集现状及对策[J].商讯,2019(35).
- [76] 梁林,曹文蕊,刘兵.京津冀人才资源配置政策仿真和优化路径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3).
- [77] 陈玉玲.协同视角下河北省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9(1).

河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高智 吴诤

2019年河北省生态文明研究,侧重以京津冀区域视角看河北,注重方法和理论创新,聚焦生态建设、低碳发展、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循环经济等热点难点问题,所提对策建议更具参考和应用价值,许多研究成果为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一、生态建设

(一) 生态文明

张宗兰、高维峰认为,雄安新区代表了京津冀经济圈新型生态城市的发展趋势,其生态文化构建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映照,也是新时代基于人文与共生理念下新型生态城市创新探索的重要范例。科技服务、绿色互哺、人文共享是雄安新区生态化质量发展的价值依归,并体现为生态文化创新与经济产业共生的融合统一,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共生统一,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的辩证统一。在实践过程中应构建人文生态系统,提升科技的文化赋能,加强生态意识教育,培育健康生态政治机制等措施,促进雄安新区的生态文化创新。^[1]

牟永福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的趋势,但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一是始终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艰巨性和持久性;二是始终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三是始终保持生态环境治理的高压态势。^[2]

杨东广、吴大康认为,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的困境在于:生产资料与生产方式转变下的冲击、现代水生态教育理念的缺失、水环境保障制度的缺位。“三生融合”的新发展态势将为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提供保障。资源共通是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的基础;空间共享是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的条件;效益共赢是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的关键。因此,必须坚持绿色高效的生态发展道路,落实水文化教育理念的培育路径,强

化水环境制度的落实力度。^[3]

毕杰、段乐认为,在京津冀协同视角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可有效地解决京津冀地区的生态难题、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打下良好的基础、可为区域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有利的参考。为此,应充分发挥各个区域的生态优势,找准生态文明建设重点,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促进三地之间的协调和配合。^[4]

(二) 生态环境

张静宏等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会为活动场所,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为对象的一种旅游类型,与乡村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近年河北省乡村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在带动了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出现了大气污染、生活废水污染、固体废物堆放以及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应采取以下对策加以改善:一是将环境保护纳入整体规划;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政府做好引导和监管工作;四是重视环保问题;五是完善乡村旅游环境保护的立法和制度。^[5]

王树强、徐娜基于京津冀2004—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协同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进程加快,京津冀环境质量状况不均衡,促进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环境效应是结构效应。因此,应加强政府政策与市场资源配置相结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建立跨区域环境质量协作机制,创建京津冀创新实验基地。^[6]

王大本、刘兵运用量化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综合水平、主要影响因素等进行评价。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无论是综合水平还是有序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破坏”子系统对天津市和河北省土地资源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影响较大。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加强对本地区地质情况的普查和科学管理;不断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化水平;加强生态空间体系建设;实现对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规划。^[7]

耿香利认为,河北是农业大省,生态农业试点范围不断扩大,一批养殖、种植、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基地和农业观光园迅速崛起,同时也面临雾霾治理、水源衰竭、水质污染等问题。最后得出如下结论:生态农业不能局限在少数基地,需要在空气、水生态治理的基础上扩大生态农业范围,从认识、技术、组织、立法、执法等环节突破瓶颈,多措并举加以推动。^[8]

柴民杰等认为,农田系统的生态环境是评价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方面。河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其农田系统的生态环境健康对实现农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借助文献资料法,从水资源安全、化肥、农药和地膜使用以及农业机械化等角度出发,阐明河北农田系统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结果发现:农田水资源总量不足,水质有待提升;农田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大,地膜用量大;农业机械化水平虽高,但潜在环境问题不容忽视。因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强化农村污染源头防控,推进节水灌溉,贯彻实施科学用水相关政策法规;第二,控制化肥、农药和地膜的使用;第三,推进农机的技术革新,研发低碳环保型的新型农机产品。^[9]

(三) 生态经济

孟庆瑜等认为,协同推进兼具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两方面效能的环保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方面。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推进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一是顶层设计明确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推进大方向;二是区域关系倒逼环保产业协同推进;三是技术创新推动京津冀环保产业科学分工;四是针对性投资激发京津冀环保产业市场潜力。目前,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推进仍面临障碍:三地环保产业的关联度较差,未能充分发挥互补性优势;环保产业集中程度较低,规模化效应有待加强;环保产业协同政策法规不健全,缺乏硬性约束机制。因此,应建立构建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推进的法律机制,具体包括: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规划的法律机制、京津冀环保产业对接对标的法律机制、完善京津冀环保产业科技创新的法律机制。^[10]

许文静等认为,河北省作为面向京津的物流节点逐渐显现出其区位优势,但由于河北省物流业发展程度不高,在包装、仓储、装运和运输等环节对环境造成影响。而河北省与京津是唇齿相

依的生态系统,京津冀雾霾防控离不开河北生态环境治理,河北发展生态物流对京津冀雾霾防控的意义表现在:一是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二是降低污染,提升形象,实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结合京津冀雾霾防控,河北省生态物流发展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深入企业,倡导生态物流发展理念;二是根据生态物流发展理念,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三是按照物流业务环节,抓好生态物流发展;四是加大投入,发展新技术新工艺;五是资源整合,促成京津冀物流企业合作。^[11]

李昌明等认为,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能源消费进入增速换挡期,三地都面临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空气质量、提升能源供应保障水平等共同需求,京津冀三地新能源产业集群间的共生对区域经济的发展 and 环境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但京津冀新能源产业集群区域内跨省市合作存在障碍:一是行政区划体制抑制产业集群跨省市协同发展,二是统一能源市场尚未形成,三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差抑制产业集群参与合作发展的积极性,四是公共服务资源落差和生产要素市场分割,五是产业发展缺乏核心技术和自有品牌。产业集群系统是由多种要素和多种主体协同形成的复杂系统,京津冀新能源产业集群区域内跨省市合作的模式选择需要综合考虑集群组织结构特点、产品结构异构互补、品牌效应及共性技术资源等相关因素。三地未来可以采取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异构互补型合作、品牌驱动型合作、共性技术协同型合作等模式加以推动。^[12]

李星、佟继英基于生态位理论构建了高技术产业生态位适宜度模型,经实证分析发现:京津冀三地高新技术产业生态位适宜度分别位居全国第5、13、18位,京津冀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创新资源分布不均,无法满足区域高技术产业协同发展。提出如下结论:在京津冀地区,北京市的高技术产业生态位适宜度较高,创新资源能够较好地满足高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天津市的高技术产业生态位适宜度相对较低,创新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河北省的高技术产业生态位适宜度最低,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要素;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地区的高技术产业生态位适宜度表现出明显的不足。^[13]

（四）生态补偿

刘广明、尤晓娜认为，补偿模式系决定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效果的关键环节所在，政府主导的现行模式契合了生态补偿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回应了京津冀区域的现实状况，但仍存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方式单一、受偿主体获得感低、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等问题。此外，京津冀生态补偿模式的整体效率和长期效益偏低，补偿资金来源单一、规模有限，无法完全满足生态补偿的实际需要，有违权义公平配置原则。^[14]

孔伟等基于生态资产视角，通过分析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建立适合京津冀发展实际的生态补偿价值核算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认为：2010—2016年京津冀各省市每年的生态资产变动不大，同期区域整体生态补偿价值波动较大，其原因可能是国家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降低了生态修复及环境治理成本、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等，使区域整体生态补偿价值减少。因此，应成立专门协调组织机构、拓宽生态补偿融资渠道、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建立多维生态补偿途径等举措对补偿机制进行完善。^[15]

田学斌等认为，京津冀山水相连，共处一个生态单元，推进生态协作，重点完善区际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是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发展的题中之义。但从总体上看，对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目标要求，区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建设任重道远，仍存在主体责任不清、生态补偿标准模糊、补偿形式较为单一、生态补偿公众参与不足等限制区域生态保护积极性发挥的深层次问题。加快完善京津冀生态补偿长效机制，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厘清补偿主体责任；二是科学确定生态补偿标准；三是促进补偿来源与形式多元化；四是注重公众参与；五是建立健全实施保障机制。^[16]

赵昕等综述河北省在农业控水、耕地地力保护、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发展循环农业、草原禁牧与保护方面的农业生态补偿现状，围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补偿受偿意愿等方面对河北省农业生态补偿研究进展进行论述。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在理论层面，农业生态补偿对于解决农业环境污染、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农业生态补偿问题，对于提高农业生

态环境补偿的效率，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方面，河北省针对控水、耕地地力保护、畜禽粪污资源利用和发展循环农业等实施了相应的补偿措施。今后，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仍然需要探索建立多元化农业生态补偿途径，更加充分地利用市场手段，形成更加高效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河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17]

魏巍贤、王月红基于机会成本法建立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CGE模型，定量研究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问题，并构建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完整框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研究结论：第一，河北省“去产能”对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具有明显效果。第二，由于不同生产行业减排效果差异较大，因此限产减排需分行业精准施策。第三，针对特定大气治理预期控制目标，确定具体的生态补偿标准区间。第四，在补偿标准基准“点值”和区间的基础上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完善补偿标准确定机制，并加强动态校准。第五，构建有效的区域协调机构。^[18]

二、环境保护

（一）污染协同治理

户艳领等以京津冀为研究对象，从区域资源环境直接或间接影响因素出发，选取经济水平、基础建设、人口与消费、资源环境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应用熵值评价模型评价京津冀十三个城市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系统，得出以下分析结果：北京和天津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更高。因此，以提升区域环境协同保护为目标，应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京津冀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发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城市承载水平；优化资源供给结构，扩大清洁能源供给；加强自然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19]

寇大伟认为，京津冀雾霾治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克服“等风来”心理，应建立参与主体多元、治理过程协同、协同结果互利的雾霾治理理论框架。京津冀三地出台首个环保领域统一标准、京津冀能源结构清洁化协作、加强京津冀重污染天气预警、建立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等均是这

一理论框架的具体应用。目前,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沟通平台缺失、议事协调机构的调动能力有限、末端治理和源头治理矛盾突出、大气污染跨界传输协商不畅、机动车限行政策不一致等机制性障碍亟待突破,应通过以下路径加以改进:一是设立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沟通平台,二是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治理雾霾,三是治理技术层面的更深入协同,四是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积极参与的雾霾协同治理机制,五是开展京津冀雾霾协同治理第三方评估。^[20]

张坤、冯红认为,环境协同治理工作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当完成的重点任务之一,但京津冀地区环境协同治理工作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京津冀地区现有的环境治理工作存在碎片化特征;二是京津冀地区环境协同治理工作领域尚未建构利益协同补偿机制;三是京津冀地区尚未建构跨地区的环境协同治理工作机构。因此,应采取以下策略进行改良:一是切实强化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治理合作力度;二是切实完善地方政府之间的基本性利益协调机制;三是建构并完善京津冀地区环境协同治理专门性工作机构。^[21]

关于京津冀协同背景下河北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研究。贾维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省作为重要生态支撑区,省内大气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河北省定位的实现。目前,三地大气污染法律治理机制存在立法不一致、联合执法有待加强、案件纠纷解决不畅等问题。因此,在协同发展下实现依法治理成为当务之急。一是进一步推进一体化立法,实现有法可依;二是强化联合行政执法,形成执法新格局;三是畅通大气污染纠纷解决,落实污染者问责。^[22]徐海珍认为,河北省大气污染主要受产业结构、地理、制度、意识等因素影响,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保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对大气污染排放总量进行规定;二是协调地方立法;三是加强对重点行业的区域协同治理。^[23]

赵新峰、袁宗威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大背景下,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体制、机制和政策工具层面所暴露的问题突出,亟须调整策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束缚,协同推进、强化治理。从政府层面,应基于协同治理的

理论框架,在系统分析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优化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路径;在体制层面,实现由“属地管理”向“区域协同治理”转变;在模式层面,实现由“运动式”协同治理向“常态化”协同治理的转变;在政策工具层面,实现由“单一型”工具向“复合型”政策工具转变。^[24]

(二) 河北污染防治

张玉霞以河北北部山区为例,认为城市工业生产污染、农业生产废弃物、农村生活垃圾废物等是河北北部山区新农村建设环境污染主要问题。同时,从法律角度探讨新农村建设环境污染成因,即:缺乏相关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农村环境保护执法困难、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意识匮乏。因此,应采取以下法律措施加以完善:加快推进制定农村环境保护法;加强农村环保执法部门建设,提升执法人员素养;增强新农村环保宣传,提高农村各类主体环保法律意识。^[25]

赵会分认为,目前,河北污水集中治理处于推广阶段,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污水收集配套管网较少,导致诸多污水处理厂低负荷运行,水资源回收率与处理率较低,可采取以下对策进行改善:一是加强基础建设;二是加强人才培养;三是加强资金渠道建设。^[26]

贾维等认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背景下,河北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存在以下问题:区域壁垒导致立法不统一、利益区隔致使执法联动不充分、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缺失导致政策效果不佳、跨区域大气污染案件合作亟待加强。强化河北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法律保障应采取如下措施:打破壁垒推进协同立法、利益共享加强执法联动、全面加强区域生态补偿力度、加强跨区大气污染案件审理合作。^[27]

郭禹辰、张亚林阐述了绿色金融的内涵,指出京津冀资源环境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愈发突出,根源在于粗放的产业结构、高能耗的能源结构以及高排放的运输结构。应坚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撬动经济绿色增长的金融支点作用,改变现有的投资结构,引导社会资本逐步退出“两高一剩”行业、转投绿色高新产业,借助绿色金融调整产业、能源和交通结构。就河北省绿色金融支持大气污染治理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顶层设计,强化与京津区域

合作。二是完善区域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绿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三是提升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力度,满足区域绿色金融需求。^[28]

三、低碳发展

赵松岭、杨子夜选取 2015—2017 年数据,对京津冀区域内物流业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北京能源消耗量最大的是煤油,天津、河北能源消耗量最大的是柴油;三地物流业碳排放量最高的是北京,其次为河北,最后是天津;煤油碳排放量极不均衡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直接体现;柴油车排放标准推行、交通运输结构是柴油碳排放总量最高的主要成因;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是京津冀三地的各类能源消耗量和吞吐量极不均衡的原因。因此,完善京津冀物流业低碳协同发展机制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明确京津冀三地物流业具体发展定位;二是出台京津冀物流业低碳协同发展政策;三是制定京津冀物流业低碳发展统一法制规范;四是调整京津冀交通物流运输结构;五是物流企业积极参与协同发展;六是构建京津冀物流业信息服务平台。^[29]

孙丽文等利用 IPCC 法计算京津冀六大高能耗行业碳足迹,利用 de Bruyn 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二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北京碳足迹贡献度起抑制作用,天津促增作用趋势下降,河北促增作用趋势上升;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效应是京津冀碳足迹主要促增因素,能源强度效应起主要抑制作用,能源结构效应差异明显,北京起抑制作用,天津起微弱抑制作用,河北起促增作用。最后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经济规模效应是首要促增因素;第二,产业结构效应是北京、天津两地工业碳足迹次要促增因素,而河北省碳足迹产业结构效应仅为第三大促增因素;第三,能源强度效应在京津冀地区对碳足迹起强劲的抑制作用;第四,能源结构效应方面,由于河北省严重依赖煤炭能源,使其成为该地次要促增因素,而北京地区能源结构已成为第二大抑制因素,其能源使用结构对其他两地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因此应着重调整河北省的能源结构问题,降低煤炭能源的使用。^[30]

郭琦等从低碳经济视角出发,以京津冀地区 64 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 2016—

2018 年发布的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社会及管制报告等进行分析认为:公司规模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国有控股比例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综合实证分析提出建议: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环境会计准则体系、加强企业内部宣传学习力度。^[31]

蒋雪梅、郑可馨基于 2002 年、2007 年和 2012 年的地区间投入产出表,从区域间产业转移和贸易的角度,对京津冀地区间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隐含的碳排放转移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量呈上升趋势,且天津与河北在制造业上的相对优势导致其单位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转移强度远高于北京单位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转移强度。北京和河北最终需求引致的天津碳排放转移的 50% 以上由间接贸易贡献,天津和河北最终需求引致的北京的碳排放转移则多由直接贸易贡献。^[32]

文洪武认为,碳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绿色金融活动,是推动低碳发展的有效手段。就雄安新区碳金融发展可行性进行分析:一是雄安新区绿色发展定位,为碳金融发展提供了明确方向和政策保障;京津碳排放交易试点,为新区碳金融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雄安新区大规模融资需求,为碳金融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最后提出了雄安新区碳金融发展路径,即:加强碳金融发展顶层设计,打造全国碳金融发展标杆;建立多元碳金融服务体系,为新区绿色发展提供金融支撑;构建有效的交易监管体系,注重风险防控;加强中介服务机构和相关人才培养。^[33]

四、绿色发展

王燕等认为,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是我国生态建设的一个重点领域,由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和措施,打造有益于各方合作的环境,将引导并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经济绿色发展以紧抓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尤其在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建设实现对接和资源整合;以市场一体化为前提,加快三地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的流动合作;以建设绿色经济为理论指导,制定切实科学的环境保护标准,编制生态保护规划,加大区域环保政策协同力度,建立环境合作发展基金;以智慧城市体系为依托,保障城市职能完善,建立

联动发展的国际城市群；以产业合作为核心，合理定位各城市的功能，重构城市产业门类和结构比例，打造本地产业和外地产业纵横相连的价值链，建立以北京为核心、天津为支撑、河北为保障的经济一体化城市群。^[34]

王英臣等认为，河北省的绿色建筑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相关政策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完善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居民的认识有待提升，政府的激励政策效果仍需进一步加强。因此，河北应在多个层面加以改进：首先，在政府方面，应使用多种媒体对绿色建筑进行大力宣传，让居民切实从购房、用房中获得绿色建筑的实惠，以积极引导代替强制执行。其次，在居民方面，应该多了解绿色建筑知识，明确绿色建筑对城市未来发展的必要性，意识到绿色建筑理念是一种栖居认知的价值转向，注重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和谐统一。第三，就开发商而言，应该在绿色建筑的技术、材料的研发方面增加投入，实现绿色性与经济性协调发展。^[35]

孔伟等认为，绿道作为一种绿色线性空间，已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普遍选择。建设京津冀绿道示范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张家口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多重叠加的历史机遇。张家口绿道建设存在以下问题：重视不够，缺少专项规划和统筹协作；零星分布，尚未建成绿道网络体系；配套落后，设施及硬件质量有待改善；内容单调，缺失张垣地域文化和特色；产业缺失，未发挥绿道经济带动作用；知名度低，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绿道品牌。因此，张家口建设京津冀绿道示范城市应采取以下措施：编制专项规划、高效节俭因地制宜开发建设、串联风景名胜区和传统乡村、循序渐进构建绿道休闲网络、突出地方特色、完善配套设施、举办体育活动、打造绿道品牌、探索绿道精准扶贫创新模式等。^[36]

王会欣认为，河北省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决去、主动调、加快转”的重要指示精神，明确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和治本之策，以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绿色发展。一是坚持绿色引领高质量发展；二是补齐发展短板、做强做大优势主导产业；三是化解过剩产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是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五是在对接服务京津中优化产业结构布局。^[37]

黄华等结合绿色发展与城市化内涵，通过构建两者的耦合度模型，对“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区域绿色发展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指标评价体系来看，“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区域绿色发展较为均衡，各指标贡献份额相当；城市化过程中贡献度差异明显，集中表现为经济城市化。从综合指数结果来看，“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地区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是区域间综合指数差异呈现扩大趋势，特别是河北省绿色发展综合指数最低。从耦合协调程度来看，“十二五”时期京津冀三地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差距明显。^[38]

（高智：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谏：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张宗兰,高维峰.科技人文融合与绿色共生:新型生态城市视域下的雄安生态文化创新理路[J].生态经济,2019,35(6).
- [2] 牟永福.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N].河北日报,2019-05-24(007).
- [3] 杨东广,吴大康.白洋淀水生态文明建设困境及其破解路径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4).
- [4] 毕杰,殷乐.浅谈京津冀协同视角下农业信息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22(23).
- [5] 张静宏,黄万猛,赵洋,高建立.河北省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与解决对策分析[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9,44(1).
- [6] 王树强,徐娜.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环境效应及其影响机制[J].企业经济,2019,38(2).
- [7] 王大本,刘兵.京津冀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9,33(2).
- [8] 耿香利.河北生态环境与生态农业建设[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9(19).
- [9] 柴民杰,李磊,张小丽.河北农田系统生态环境问题及改进措施研究[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6(5).
- [10] 孟庆瑜,梁枫,张思茵.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推进法律机制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4(2).
- [11] 许文静,李佳,杨立铭.河北省生态物流发展对京津冀雾霾防控的作用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9(11).
- [12] 李昌明,刘海滨,张向东,张富强.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新能源产业集群区域合作发展模型及模式选择研究[J].科技经济导刊,2019,27(31).
- [13] 李星,佟继英.京津冀高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研究——基

- 于生态位理论[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3).
- [14]刘广明,尤晓娜.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模式检讨与优化[J].河北学刊,2019,39(6).
- [15]孔伟,任亮,治丹丹,王淑佳.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基于生态资产的视角[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9,35(1).
- [16]田学斌.构建京津冀生态补偿长效机制[N].经济日报,2019-09-11(015).
- [17]赵昕,吴子龙,吴运东,张浩.河北省农业生态补偿的现状与研究进展[J].农技服务,2019,36(3).
- [18]魏巍贤,王月红.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研究[J].财经研究,2019,45(4).
- [19]户艳领,李丽红,张婉双,张学军.京津冀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及在环境协同保护中的应用研究[J].统计与管理,2019(6).
- [20]寇大伟.协同治理视域下京津冀雾霾治理联动机制研究[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3).
- [21]张坤,冯红.京津冀环境的协同治理研究[J].才智,2019(10).
- [22]贾维.河北省大气污染法律治理机制研究——以京津冀一体化为视角[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9(10).
- [23]徐海珍.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法律制度研究[J].法制博览,2019(8).
- [24]赵新峰,袁宗威.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困境及路径选择[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5).
- [25]张玉霞.河北省北部山区新农村建设中环境污染问题法律对策研究[J].智库时代,2019(7).
- [26]赵会分.河北污水集中治理现状与对策[J].法制博览,2019(2).
- [27]贾维,刘淑华,徐晓静.河北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法律保障——以区域生态协同治理为视角[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9).
- [28]郭禹辰,张亚琳.绿色金融支持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对策研究[J].山西农经,2019(22).
- [29]赵松岭,杨子夜.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量测算及低碳协同发展机制研究[J].生态经济,2019,35(10).
- [30]孙丽文,韩莹,杜娟.京津冀高能耗产业碳足迹的影响因素——基于 de Bruyn 模型[J].技术经济,2019,38(8).
- [31]郭琦,韩江雪,魏东玲,尉清平,刘洋,李涛,田婕,支建勋.低碳经济视角下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上市公司为例[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5).
- [32]蒋雪梅,郑可馨.京津冀地区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8(6).
- [33]文洪武.碳金融支持雄安新区绿色发展路径探析[J].河北金融,2019(8).
- [34]王燕,王闻珑,郭立宏.略论京津冀经济绿色发展[J].经济研究导刊,2019(29).
- [35]王英臣,王斌,耿潇潇.基于产业链理论的河北省绿色建筑发展路径研究[J].住宅与房地产,2019(22).
- [36]孔伟,任亮,王淑佳.多重战略机遇下京津冀绿道示范城市建设个案研究[J].生态经济,2019,35(2).
- [37]王会欣.以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绿色发展[N].河北经济日报,2019-07-06(003).
- [38]黄华,申伟宁,袁硕.京津冀区域绿色发展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9,35(3).